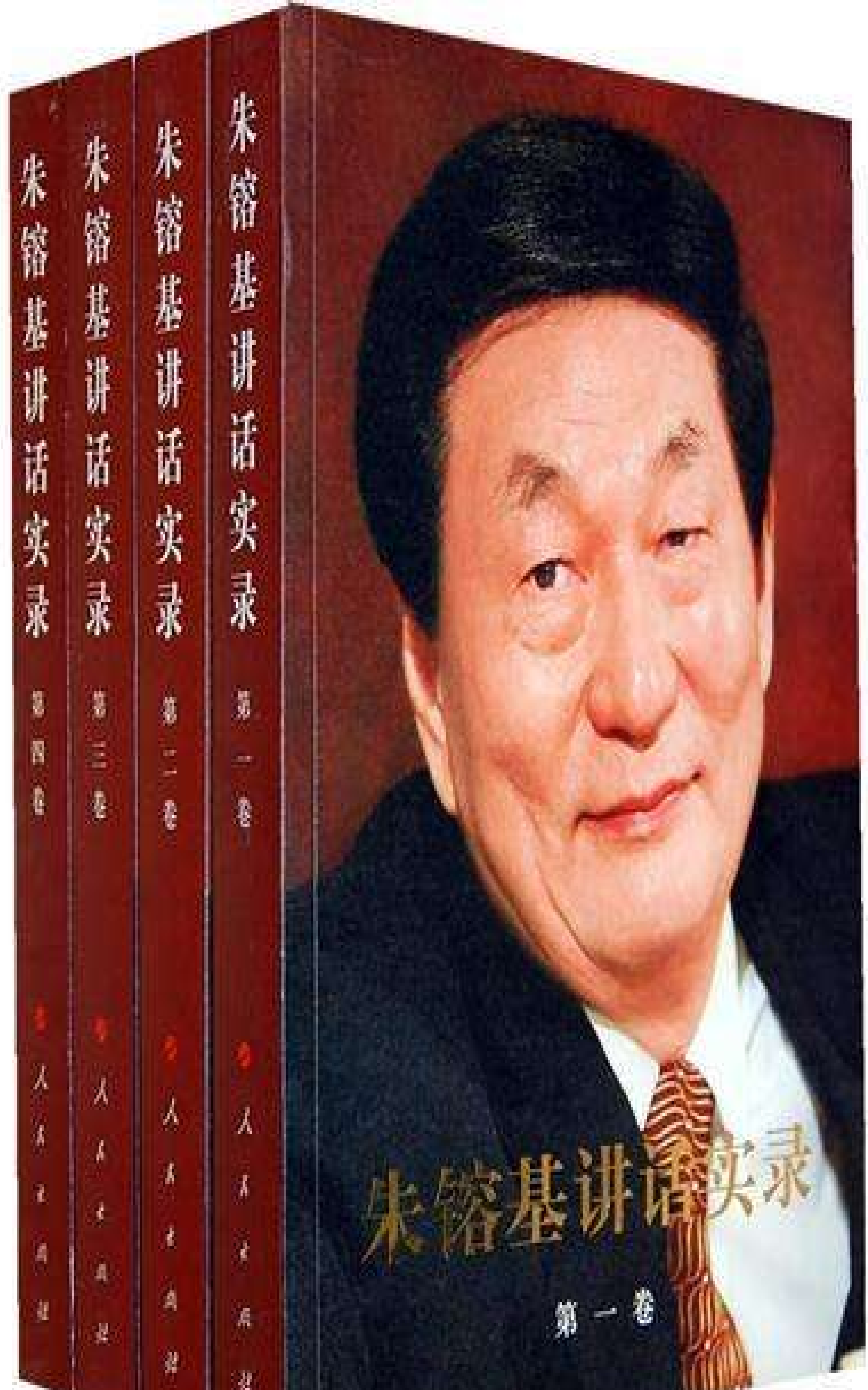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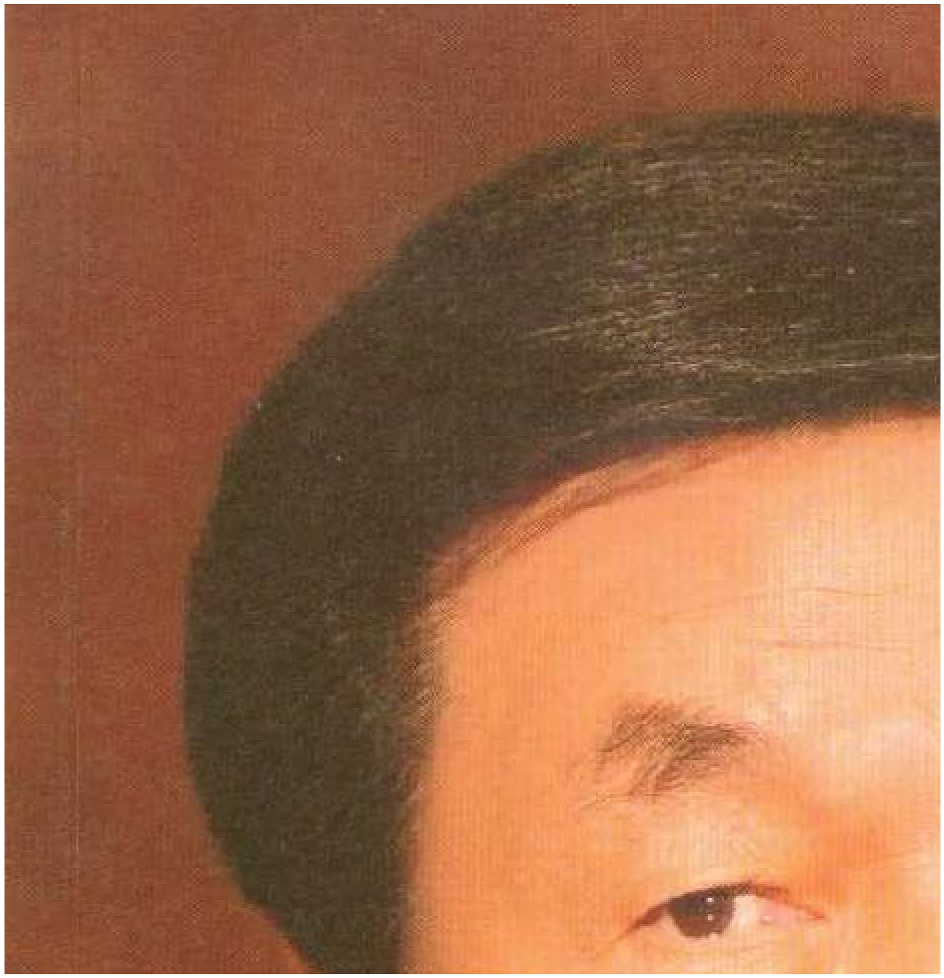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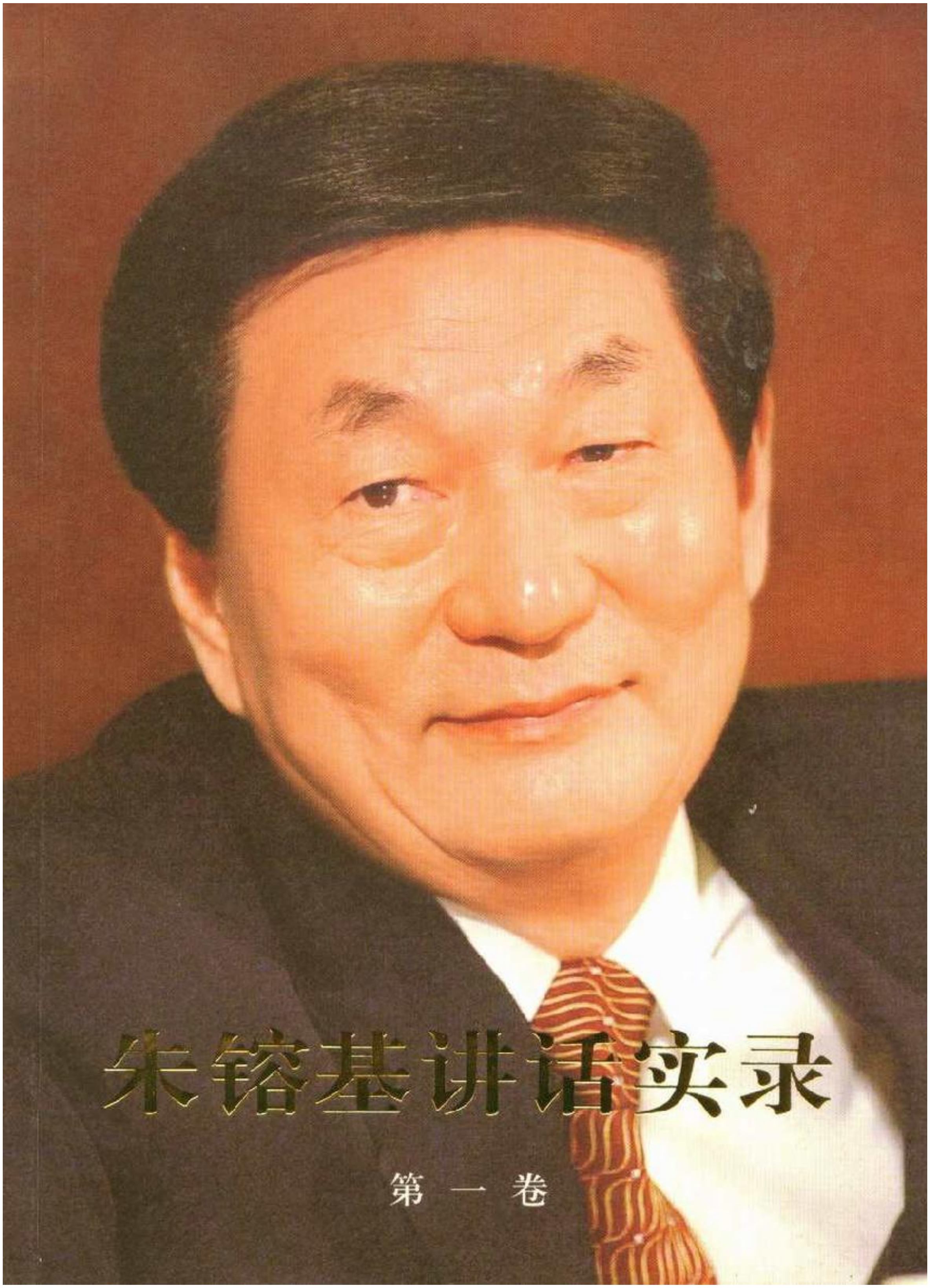

朱镕基讲话实录
第四卷
朱镕基讲话实录
第三卷
朱镕基讲话实录
第二卷
朱镕基讲话实录
第一卷
朱镕基讲话实录
第一卷

VISIT…

LANZAROTE Caliente.com




朱镕基讲话实录
第 一 卷

朱镕基讲话实录（第一卷）

朱镕基

简介

封面一

朱镕基讲话实录

第一卷

人民出版社

封面二

责任编辑：王一禾　洪　琼　陈光耀
责任校对：吴海平　徐林香
装帧设计：曹　春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朱镕基讲话实录．第一卷／《朱镕基讲话实录》编辑组 编．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9
ISBN 978－7－01－010128－6

I. ①朱…　II. ①朱…　III. ①朱镕基－讲话　IV. ① D2－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154846 号

朱镕基讲话实录
ZHU RONGJI JIANGHUA SHILU
第一卷

《朱镕基讲话实录》编辑组 编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北京画中画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1 年 9 月第 1 版　2011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00 毫米 ×1000 毫米 1/16　印张：33.75
字数：406 千字　插页：2

ISBN 978－7－01－010128－6　定价：49.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010）65250042　65289539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参与发行

封面三

责任编辑：王一禾　洪　琼　陈光耀
责任校对：吴海平　徐林香
装帧设计：曹　春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朱镕基讲话实录．第一卷／《朱镕基讲话实录》编辑组 编．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9
ISBN 978－7－01－010128－6

Ⅰ．①朱…　Ⅱ．①朱…　Ⅲ．①朱镕基－讲话　Ⅳ．① D2－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154846 号

朱镕基讲话实录
ZHU RONGJI JIANGHUA SHILU
第一卷

《朱镕基讲话实录》编辑组 编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北京画中画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1 年 9 月第 1 版　2011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00 毫米 ×1000 毫米 1/16　印张：33.75
字数：406 千字　插页：2

ISBN 978－7－01－010128－6　定价：49.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010）65250042　65289539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参与发行

图



1991年2月6日，朱镕基陪同邓小平考察上海大众汽车有限公司。



1998年3月6日，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图为江泽民和朱镕基在主席台上交谈。



邓小平和1992年10月19日在中共十四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江泽民、李鹏、乔石、李瑞环、朱镕基、刘华清、胡锦涛合影。

1994年3月，朱镕基在八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小组上发言。



1994年3月，朱镕基在八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小组上发言。

编辑说明

《朱镕基讲话实录》选入的是朱镕基同志担任国务院副总理(1991年4月至1998年3月)、国务院总理(1998年3月至2003年3月)期间的重要讲话、谈话、文章、信件、批语等348篇，照片272幅，批语、书信及题词影印件30件。

《朱镕基讲话实录》分为四卷，其中，前两卷为朱镕基同志担任副总理期间的文稿，后两卷为他担任总理期间的文稿。各卷文稿均按时间顺序编排：第一卷为1991年5月至1994年7月，第二卷为1994年8月至1997年12月，第三卷为1998年3月至2000年6月，第四卷为2000年7月至2003年2月。

编入本书的文稿，均根据音像资料、文字记录稿和手迹编辑而成，绝大部分是第一次公开发表。有些曾经公开发表过的文稿，编入本书时为突出重点或避免重复，作了删节。有些过去曾经公开发表过的书面讲话稿，此次未编入本书，编入的是当时即席讲话的录音整理稿，其内容是对书面讲话稿的重点阐释和补充。编者对正文中涉及的部分人物、事件和专有名词等，作了简要注释。对专有名词在每卷首次出现时作注释，再次出现时只注明首次注释的页码。对担任党和国家领导职务的同志不再注释。本书文稿的多数标题为编者所加。

朱镕基同志逐篇审定了编入本书的全部文稿。

中央领导同志对本书提出了宝贵意见。中央有关部门和有关省、自治区、直辖市负责同志对本书的编辑工作提出了指导意见。中央有关部门，有关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有关单位提供了部分资料和照片。人民出版社对本书出版给予了大力协助。在此，一并表示谢忱。

参加本书编辑工作的有：李炳军、廉勇、张长义、谢明干、林兆木、鲁静、侯春同志。马东升、李立君同志参与了有关资料的收集整理等工作。

本书编辑组

2011年5月25日

关于质量管理和技术监督工作

(1991年5月15日)

1991年5月15日至18日，国家技术监督局在北京召开第二次全国技术监督工作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技术监督部门负责同志。这是朱镕基同志在会议开幕时的讲话。

国家技术监督局成立三年来，做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我在国家经委工作期间，主管过国家标准局、国家计量局、国家经委质量局的工作。这三个单位就是现在国家技术监督局的前身。当时提出三年内要制定1.2万项国家标准，现在已制定了近1.7万项。当时提出的推广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的任务，现在也超额完成了。产品质量的认证，生产许可证的发放，计量器具的检定，企业的计量定级、升级等工作，也都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最近，国务院领导同志重新明确了分工，李鹏同志让我协助分管工交各部，包括国家技术监督局的工作。所谓“协助分管”，就是协助总理工作。所以，我想先对工交各个部门，一个一个地登门拜访，听取意见。昨天下午我到了国家技术监督局，与局党组的同志们进行了交谈，对我有很大的帮助。我希望也得到工交各部的部长和党组同志们的帮助与支持。我离开北京三年了，很多情况已不熟悉，得有一个熟悉的过程，熟悉工作就需要下去调查研究。

关于质量管理和技术监督工作，刚才宋健同志的报告已作了全面阐述。我想再强调几点，概括起来是三句话：

第一句话：对当前产品质量的状况不要估计过高。 我感到，经过两年的治理整顿，经济形势已经好转。但是，应该看到，目前国民经济还存在着一些不可忽视的问题：第一，生产增长速度较快，但效益在下降，特别是全民所有制企业的效益下降；第二，尽管现在物资库存有减少的趋势，但产品库存还在继续增加；第三，国营企业的亏损面还在扩大。搞活国营大中型企业，特别是提高国营大中型企业的经济效益，是当前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所以，国务院提出今年作为“质

量、品种、效益年”，是非常正确的。第一就是质量。目前从总的情况看，不能估计过高，有些企业的问题还相当严重。

我讲讲上海的情况。我在上海，经市委和市政府同意，提出了“质量是上海的生命”这样一个口号。这个口号是在一个大中型企业厂长的会议上提出来的。当时做记录的同志把它改为“质量是产品的生命”，后来又有一些同志把它修改为“质量是企业的生命”。没有一位同志敢把我这句话原封不动地讲出来。他们认为如果“质量是上海的生命”，那么，政治是什么？后来，我多次解释过这个问题。我说，同志们，我现在是讲经济工作，我没有讲政治工作。“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这句话我时刻记在脑子里，没有忘记；现在我是谈经济。为什么要提“质量是上海的生命”呢？因为质量问题对上海来讲确实已经是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大家都知道，上海一无能源、二无原材料，没有资源啊！上海所需要的能源、原材料都要从各地长距离运来，上海劳动力的成本也很高，这样生产出来的产品就没有竞争力。如果我们的产品没有高质量，没有好性能和多品种，那么很快就会从国内市场上被挤出去。实际上，现在上海产品在国内市场的占有率正不断下降。同时，出口产品如果质量不高，也进不了国际市场。最近，我访问了西欧六个国家，一是注意他们的住宅建设，另一个是注意他们的市场。他们市场上的商品确实丰富。我们的产品虽然也很丰富，但品种和质量不如他们。在他们的市场上，很难找到中国的产品。意大利生产的产品很多，特别是在消费品方面，丝绸、服装、家具、皮革制品几乎都是意大利制造的，占领了西欧很大一部分市场。家电产品大部分是日本生产的，像德国这样高度工业化的国家，市场上销售的家电、照相机等，也基本上是日本制造的。所以，产品质量不高就进不了国际市场。上海的经济效益、财政收入，多年来处于滑坡的状态，这样搞下去，上海是没有前途的。因此，我才提出上面那个口号，使大家真正有一种危机感。我并不认为这个口号适用于全国各个省区市，你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提出自己的口号。

但是，这个口号从1988年提出来，抓了三年，并不理想。我讲两件事：第一件，去年第四季度进行了全国产品质量抽查，上海的产品质量合格率只有76%，低于全国的平均水平。这个抽查结果，给我敲了警钟。抓了三年的产品质量，喊了三年“质量是上海的生命”，抽查的结

果还是低于全国的平均水平。我们决定还是要在报上发表，而且要发表评论。当然，抽查本身就带有一定的偶然性，被抽查的那几个企业生产的也不是上海的拳头产品。抽查结果在报上公布后，震动很大。当时，李先念同志在上海专门找了我，问我上海的产品质量怎么可能低于全国的平均水平呢？是不是公布错了？我老实回答说，没有错，是我们决定在报上登出来，以警醒上海企业的。这说明，质量管理工作和技术监督工作一点儿也不能放松。第二件，就是“桑塔纳”轿车。“桑塔纳”轿车的国产化是我在国家经委的时候开始抓的。当时，姚依林同志、宋平同志让我去抓这件事情，我专门到上海去开了一个会。1987年，制订了“桑塔纳”轿车国产化的计划，要求狠抓国产化的质量。我一再强调，国产化不能搞“瓜菜代”，质量一定不能低于进口的产品。当时确实也制定了很多措施。但是，近一年来，我不断接到各种反映，说“桑塔纳”轿车的质量下降了，引起我很大的警惕。上海市委、市政府下了决心，抽调几十个研究所、检验站的力量，组织了一支庞大的队伍，对“桑塔纳”轿车的质量进行一次全面检查。同时，把两辆轿车从上海开到厦门，再开回上海，进行破坏性试验。检查的结论是：从总体上讲，“桑塔纳”的质量并没有下降，它至今还是德国大众公司在海外企业所生产的汽车中质量最好的；但是，其中确实有一部分零件的质量不符合标准。“桑塔纳”轿车的国产化还没有全部完成，只达到60%，另外还有40%要进口。进口的零部件质量也不都是好的。在不合格的零部件里面，外地生产的不合格率比上海本地生产的高一点。因为那时“桑塔纳”轿车的生产批量太小，外地企业为上海协作生产“桑塔纳”的零部件效益不高，甚至要赔钱，所以积极性不高。此外还有一些客观原因，“桑塔纳”的零部件协作生产点有160多个，质量管理就很难保证。上述两个例子说明，质量管理工作是非常艰巨的，就是对名牌产品，现在也不要过于乐观。

第二句话：质量管理和技术监督工作非常重要。 当前我们实行的是计划经济和市场调节相结合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但是，说实在话，现在的市场还很不发达，很多产品还是卖方市场。当然，目前有一些家电产品形成了一定的买方市场，但是，大量产品还是供不应求，还是“皇帝的女儿不愁嫁”。“萝卜快了不洗泥”，这种毛病一直是存在的。这样，消费者的利益往往不能得到很好的保护，完全靠竞争、靠企业本身的机制来提高产品质量，是不大容易的。在这

种情况下，技术监督工作就显得非常重要和十分必要。我记得在1984年的时候，经济过热，产品质量大大下降，假冒伪劣商品充斥市场，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1985年。当时国务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全国人大常委会专门讨论了产品质量的问题。1985年7月，邓小平同志作了一个重要的指示："工业生产特别是出口产品的生产，中心是提高质量，把质量摆到第一位。"①在当年9月份召开的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他又再次强调了产品质量问题。我记得在那一年的第三季度，国家经委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扭转产品质量下降的状况，特别是第一次建立了国家监督抽查产品质量制度，这个制度一直保持下来了，而且发挥了作用。

---

① 见邓小平《抓住时机，推进改革》(《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32页)。



1991年2月6日，朱镕基陪同邓小平考察上海大众汽车有限公司。右一为中办副主任王瑞林，右二为邓小平女儿邓榕。

我记得当时就提出产品质量抽查老是不合格怎么办？后来定了一条，抽查两次不合格的，厂长应该免职。厂长应该管质量啊！也有个别厂长说，厂长是主管全面工作的，质量应该由主管生产的副厂长管。我们在上海规定，不重视产品质量的人、不管产品质量的人，不能当厂长。如果产品质量出问题，一定要免厂长的职，这一点在上海大体上还是能被接受的。质量不好，产品卖不出去，还当什么厂长？当时规定，抽查一次不合格，限期整改，停产整顿；第二次再不合格，还是同样的产品、同样的企业，厂长就要免职。当时推行这个制度确实是很难的。同志们也知道，免掉一个厂长不那么容易，我在上海免掉了几个厂长就引起轩然大波，很多人要跟我辩论。辩论以后，

大家感到还是免掉好，不从严要求、不执行纪律不行。但是，两次抽查不合格就免掉一个厂长，阻力也相当大。后来就做了一些修改：抽查两次不合格“而又不认真整改者”，应该免职。这么一改，弹性就大了，此后一个厂长也没有免掉。这也不行，于是我们又重新作出规定，取消了那一句带弹性的话，恢复原来的规定，就是抽查两次不合格就免职。如果不从严要求，在目前这个情况下，要想把质量整顿好是很难的。航空航天部曾提出“五个铁”①，铁了心要把质量搞上去。我当时也提出过，产品质量检查科科长应该“六亲不认”，不然的话，质量是搞不上去的，还是要严。

---

① “五个铁”，指以铁的纪律、铁的手段，铁面无私，把住铁的关口，铁了心也要把质量搞上去。

另外，应该提高企业的质量检验工作与检验员的地位。大家都知道一个叫格里希①的“洋厂长”，他是一位德国退休专家，武汉柴油机厂聘他当厂长。他跟我讲：你们企业质量检验科里的人都是“老弱病残”。在我们德国的企业里，检验科的人都是非常有能力的人，他们的地位是很高的，是不能由厂长随便免掉职务的。只有这样，他们才能坚持原则，不然企业怎么能提高产品质量?

---

① 格里希，即威尔纳·格里希，联邦德国发动机制造和铁芯技术专家。1984年至1986年，被武汉市政府聘任为武汉柴油机厂厂长。

第三句话：即使是产品质量上了轨道以后，技术监督工作仍然很重要。 西方发达国家的产品质量应该说上了轨道了吧，他们有一个市场机制，产品质量上不去，企业就有破产的危险。但是，他们出口到我们这里的产品，照样有不合格的，并且还相当多。因为他们的产品也不是一个个地检验，也是抽查。所以，绝对不能取消技术监督工作，不能轻视技术监督工作，永远要把技术监督工作坚持下去。当然，技术监督工作不是靠国家技术监督局一个部门就能够完成的，比如打击假冒伪劣商品，就还需要有工商局、进出口商品检验局以及其他部门的配合。也只有在计委、经委、财政等综合部门的支持下，技术监督工作才能搞得下去。真正提高产品的质量也不是一个企业能解决的，

企业本身如果没有技术进步，没有技术改造，没有必要的生产手段和检测手段，产品质量也提不高。同时，相关企业的配套产品质量不提高，你也生产不出合格产品。不靠全面的质量监督、全面的质量管理，产品质量是搞不好的。所以，技术监督部门应该跟有关的生产部门密切合作。对于如何理顺质量管理机构的问题，我们还可以研究。各个地方有各个地方管质量的方法，各地质量管理机构的设置也不尽相同。希望大家在会上互相交流，共同把质量管理、质量监督工作做好。

搞活国营大中型企业要强调内因为主

(1991年6月2日、3日)

1991年6月2日至6日，朱镕基同志在辽宁省考察工作，先后考察了沈阳、本溪、鞍山、大连等地，并于6月2日、3日在沈阳主持召开了搞好国营大中型企业问题座谈会。出席会议的有沈阳部分国营大中型企业的厂长、经理。这是朱镕基同志在两次座谈会上讲话的主要部分。

一

(1991年6月2日)

我从1951年到东北工业部工作，对辽宁的工业有40年的感情。辽宁工业当前面临着比较大的困难，困难程度也不尽相同。变压器 厂、鼓风机厂、机床三厂属于比较好一点的类型，虽然也有困难，但企业的潜力很大。从50年代到现在，这几个厂我去过好多次。

企业困难的原因是很复杂的，既有客观原因，又有主观原因；既有外部原因，又有内部原因。不久以前，宋平同志专门就如何搞活国营大中型企业找我谈过一次话，他提出一个观点，就是现在报纸上宣传外因太厉害了。不是说不要讲外因，分析问题本来就有内因和外因，但是外因讲得太多，内因讲得太少，这样不利于国营大中型企业扭转目前的困难局面。当前国内财政赤字这么大、银行透支这么多，已经难以为继，还减什么税？让什么利？已经没有可减可让的了。扩大自主权，权给你，你能搞得好还行，你搞坏了怎么办？我们现在的经营管理，就管理的组织、管理的手段讲确实有进步，但生产秩序、劳动纪律还不如50年代、60年代。60年代"学大庆"、"学解放军"的时候，强调加强"三基"工作①，大练基本功，设备都擦得锃亮。现在糟践到什么样子了，混日子的情况占多大比例，大家心中都有数。管理水平在某些方面比过去降低了，松松垮垮。不去加强内部管理，不从严要求，外部条件再好也要垮下去。希望同志们从这个方面去想一想，每个工厂都有很大的潜力。潜力都挖出来也很难，但克服困难的潜力还是能挖得出来的。我后来给宋平同志补充了一点，我说我很赞成这个观

点，应该特别强调内因，目前管理实在不像话了。但我觉得搞好管理有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工厂的领导干部要振奋精神，要抓党风，抓领导班子的作风，要讲廉政，要讲与群众同甘共苦。如果领导班子还是吃吃喝喝，好房子先分给自己，把自己的家属安排到最好的岗位，那么没有一个工人愿意跟你干。因此，抓企业管理要与抓党风、抓廉政建设、抓思想政治工作联系在一起，不然，加强内部管理还是一句空话。面对当前困难，大家很着急，这个心情我是理解的，而且我也很同情，厂长确实难当。我过去虽是搞工业的，但对工厂了解得不深。这三年到上海以后，与厂长们在一起的时间比较多，更了解到厂长的苦衷，但我还是要讲企业的问题是内因为主。企业的外部条件也必须解决，但外部问题比较复杂。这次李鹏总理让我到辽宁来，就是要把辽宁的困难了解得更清楚，就如何解决这些困难的办法，与同志们研究得更清楚，然后回去汇报。

---

① “三基”工作，指基层建设、基础工作和基本功。

昨天我向李鹏总理汇报了三角债的问题，李鹏总理决定以辽宁为突破口来解决这个问题，这是对辽宁的关怀。三角债问题说到底是基本建设项目欠企业的钱不还。本来规定基建项目地方要拿50%的资金，技改项目地方要拿70%的资金。但是审批项目时，没钱也说有钱，项目定下来了，摊子铺开了，地方的50%或70%的配套资金又拿不出来，兑现不了，不仅拖延工期，而且出现了相互拖欠，这就是三角债。所以，上项目时要把住两条：一是市场不落实千万别上项目，二是没有钱不要上项目。这不仅指地方，也包括中央。不要以为先把项目搞上去，没钱可以向银行贷。银行的钱也是有限的，发放到一定规模就不能再发了；同时，借了钱也是要还的。资金不足，项目不能完全建成投产，效益出不来，拿什么还钱？借了钱都不还，银行怎么办？三角债的问题归根结底是乱上项目。要解决这个问题非常困难，不是几年能够解决的。基本建设资金不到位，即使对这个问题从现在起就开始解决，新账不再欠了，老账还清也不是一年两年的事。但我们总要努力去解决，要恢复和建立金融秩序、生产秩序。现在就拿辽宁做试点。我们在这里一个星期，就是想与省里各方面的负责同志研究一个原则的办法。北京正在组织一个工作班子，马上就要来辽宁，

目的是从这里取得解决三角债问题的经验。不但要清理省内的欠账，而且要清理省外的欠账，为此银行要拿出几十亿元贷款，才能把欠款清掉。前边的清了，马上又会有新的欠账，但问题也会大大缓解。然后再研究怎么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要采取好多措施，包括严格金融纪律，使新账不再欠了。如果生产的产品卖不出去，还在继续生产，制造积压产品，对于这样的企业先给“黄牌警告”，下一步让它停产。我们要在全国对几百个企业首先给“黄牌警告”，准备停几百个企业，不然就没有秩序了。当然，凡是有三角债的企业都停了也不行，造成三角债的原因非常复杂。但也确有这样的企业，生产的东西一点用也没有，它还在继续生产，还不如让它停产，给它发救济、给工人发补助，不要再去浪费原材料了。



1991年6月2日，朱镕基考察沈阳重型机械厂。前排右二为辽宁省省长岳岐峰，左一为沈阳重型机械厂厂长黄松涛。

现在，全国只选辽宁一个省作为解决三角债问题的突破口，这是对辽宁的最大支持。希望同志们在困难的情况下，与全体职工同甘共

苦，把企业的内部潜力挖出来，我们的日子就好过了。

二

(1991年6月3日)

今天听到的这几个企业的情况，比昨天听到的几个企业的情况要好一些，除了纺织企业困难些以外，其他企业都还可以。辽宁是中国很重要的工业基地，为国家作出了很重要的贡献，但现在也确实遇到了困难，而且困难还相当大。目前国家也很困难，所以，大家一定要立足于现有的设备、现有的生产能力，挖潜改造，在工艺上下工夫，在管理上下工夫，降低成本，节约原材料。搞比较大的基本建设项目，一定要慎重。要考虑到今后的趋势是原材料价格不断地上涨，产品的价格始终赶不上原材料、能源、运输的涨价幅度，那么企业的利润就会不断地减少，亏损只能更多。如果不是在现有的设备上赶快开发新产品，改进工艺，降低消耗，加强管理，辽宁的问题就解决不了。靠拿钱去扩大基本建设来增加效益，肯定会塞空。第一是没有那么多钱，我就是带来20亿元也不能满足大家的要求。你们的口气都不小，都有“大厂”的气派，一讲就是几个亿。国家哪有这么多钱？第二，把钱投进去以后，前3年到5年是花钱的时候，是钱往里投而不出一个钱；后边的7年到10年也是一个钱也赚不了，因为要还本付息，有什么效益？也就是说，把钱投进去后要15年才出效益，说少一点也得10年。大家一定要在现有企业上下工夫，在现有的生产能力上下工夫，靠外延、靠扩大基本建设是“此路不通”。当然，也不是说一点儿建设也不搞，不是这个意思。根据量力而行、量入为出的原则，搞一点基本建设也是必要的，那是补缺口。搞了原材料，后边没有后加工，这就是需要搞的。搞了后加工，前边没有原材料，也要搞吧？这就是要有选择地搞。全部依靠外延扩大再生产来提高效益，那个效益是要落空的，或者说10年到15年是拿不回钱来的。这还是说你们已经看准了的项目，要是没看准的项目，那就更糟糕了。没看准的事情，项目上去以后一投产，市场没有了，产品也没人要了，这种事情还少吗？同志们，我再说一次：国家要帮助大家解决困难，但厂长、企业家们要把眼光放在内因上，要看到主观因素。我觉得刚才宋保纲①同志讲得比较好，他们厂有困难，但也有主观原因。他个人承担了责任，承担责任也不是说空话，而是分析了几条自己决策上的失误。这种精神应该

提倡。如果把一切困难都推给国家，这种人不够资格当厂长。厂长还是比较清楚自己企业前途的，得有点信心。这个信心就不是一句空话了，能够看到自己的不足，立足于现实，努力去克服困难，就比较扎实。昨天，有的厂长就不那么扎实，他说："你把钱给我，我保证上去。"把几个亿都交给你，我能相信你的保证吗？国家能相信吗？大家都要对国家负责。希望大家能够注意这个问题。要在内因上去做文章。真正的企业家要眼睛向内，苦练内功，加强管理，挖掘潜力，不要老想着国家给拨款。你们将来都要成为真正的企业家。自己加上个"家"字，容易但不值钱，要真正在管理上下工夫。我现在还担任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的院长，昨天那些厂长中有三位是我的学生。要学习一下管理学，这个不是资本主义，而是资本主义的管理方法，我们拿来还是非常有用的。市场，在外国是一门非常重要的学问，不学这个东西会吃很大的亏。

---

① 宋保纲，当时任沈阳第二毛纺织厂厂长。

调整企业组织结构

(1991年6月18日)

1991年6月9日至18日，朱镕基同志先后在辽宁、吉林、黑龙江省考察工作。这是朱镇基同志在黑龙江省考察期间，与省委、省政府负责同志座谈时讲话的主要部分。

我们这次到东北三省来，主要是调查研究搞活国营大中型企业的问题。目前，全国的国营大中型企业都遇到了困难，东北三省的国营大中型企业尤其困难。这是由许多深层原因所决定的。就黑龙江省的工作来看，我们感到省委、省政府的工作做得很好。特别是农业基础问题解决得比较好，是全国提供商品粮最多的省份。当然也面临着一些困难，主要是国营大中型企业的困难。困难的原因来自两方面：一方面是宏观的问题，有计划安排的问题，也有很多政策原因造成的问题。比如三角债，不是一个省所能解决的问题，我们一定要帮助企业缓解这些困难，让企业有个较好的环境。另一方面是企业内部管理问题，包括产品结构、产品质量等问题，这方面要下很大工夫来解决。

企业要提高经济效益，主要应从内部下工夫。宣传部门要充分宣传企业挖掘内部潜力的先进典型，如果过多地强调宏观影响，对调动企业的积极性没什么好处。在这方面，因调查时间很短，还提不出更多的好主意，主要想到以下几点：

一、要下工夫抓生产、抓质量、抓品种、抓效益

现在全国大约有40%的国营大中型企业亏损，辽宁预算内工业企业的亏损面是60.5%，吉林是48.5%，黑龙江是52%。企业的固定资产净值只剩下一半或一半多一点。有的企业连折旧都不提，还发奖金吃老本，这样的企业很难活下去。现在企业的产品转换能力相当薄弱。国营大中型企业不出效益，地方经济很难发展。乡镇企业发展很快，活跃了农村经济，贡献很大，但它交不了多少税。外资企业“免二减三”①，也交不了多少税。我们引进技术是让它对国民经济发挥积极作用，如果把国内能生产的产品也引进来，让它挤占国内市场，对我们

有什么好处？搞基本建设必须很慎重，短期内难以见到效益。至于看不准的项目，一上马就意味着亏损。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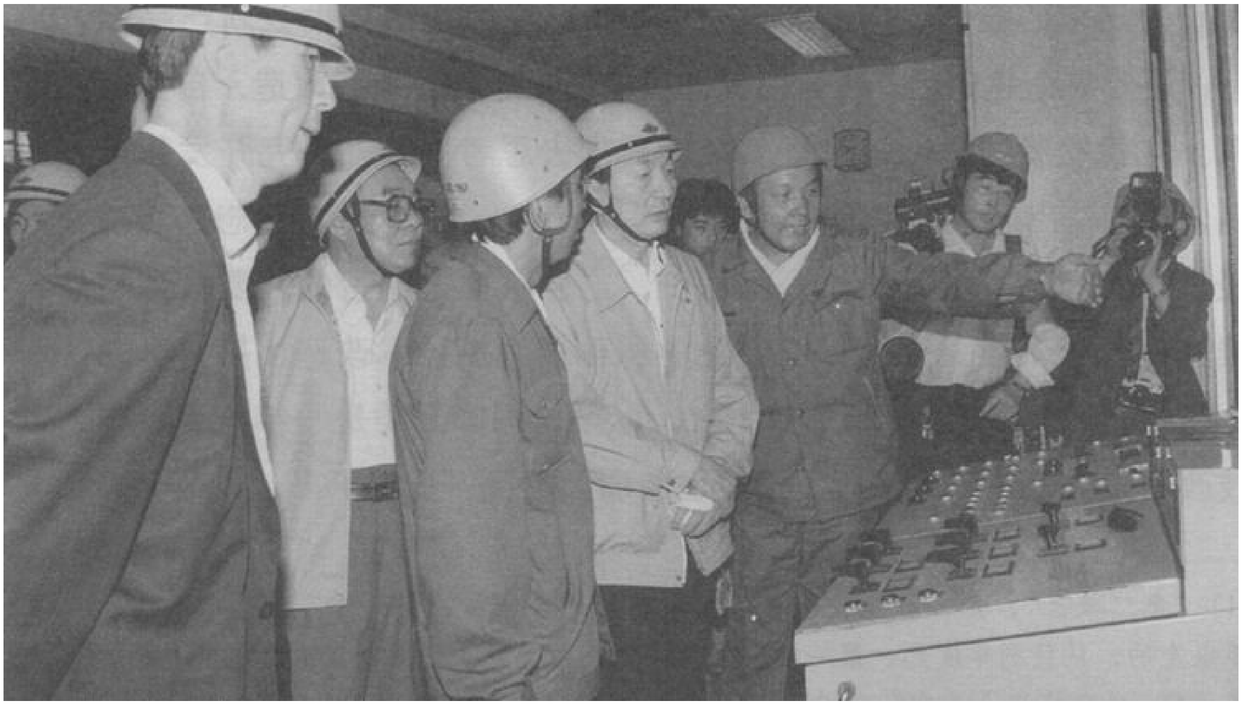
① “免二减三”，是一种税收优惠政策，指生产性外商投资企业，经营期限在十年以上的，从获利年度起，第一年、第二年免征所得税，第三年至第五年减半征收所得税；外商投资企业实际经营年限不满十年的，应当补缴已免征、减征的企业所得税。

抓生产，现在一个很大问题是货不对路、质量不行、品种单调。百货公司东西很多，但销售量增长不快。光靠上级帮助找新产品不行，还要靠企业自己。企业要真正形成自主经营、自我改造、自我约束、自我发展的机制，真正从市场需求去思考问题，研究开发新产品，想办法出质量、出品种、出花色、出效益。上级部门要想办法减轻企业负担，不要乱摊派、乱涨价，这样做才是明智的。要看到一线企业已经不堪忍受了！要让企业积蓄能力搞技术改造，搞“小改小革”，真正把质量、品种搞上去。以前，国家经委是一年一度召开技改衔接会，让财政部门、银行也参加。项目一旦定下来，资金全部到位。这种技改衔接会很有必要，可以避免重复建设。而现在不是这样了。

二、要在调整企业组织结构上做文章

黑龙江的工业结构是重工过重、轻工过轻。这个结构怎么改过来？靠基本建设调整结构，时间长、花费大；要通过改革和开放的办法来解决，不能一说调整工业结构，就要建多少工厂，最有效的捷径是在调整企业组织结构上做文章。比如亚麻工业，我赞成在各方利益分配合理、互相信任的基础上组织亚麻集团。这是调整结构很重要的方面。如果你们再去搞自行车、缝纫机，怎么也搞不过人家。亚麻是黑龙江的优势，别人怎么也搞不过你们。亚麻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很有前途，哈尔滨亚麻厂有2.7万锭，其他地市有9万锭，应当组织起来，打入国际市场。一两个行业兴起来，就可以把黑龙江的经济搞活。要搞贸、工、农一体化，可以进一步发展为资产一体化、管理一条龙，哪个省份也竞争不过你们。亚麻可以打开国内、国际两个市场，值得支持。还要搞好企业兼并。根据我在上海的经验，企业兼并是最容易成功的。搞集团都想当总经理，谁也不服谁；企业兼并是穷富互帮，各

有所求，双方自愿。吉林化学工业公司把一个军工厂兼并了，很快就转亏为盈。有些企业之所以上不去，是领导班子有问题。领导班子工作漂浮，牢骚满腹，靠它去克服困难是不可能的，这样的领导班子就要调整。



1991年6月5日，朱镕基考察鞍山钢铁集团公司。左二为辽宁省省长岳岐峰。

调整企业组织结构，还要逐步解决“全民”怀抱“集体”的问题。日本最近报道中国“东北现象”，说“东北大中型企业已经面临衰退的危机”。我看只要采取措施，不至于那么严重。不过这次到东北三省调查，我倒看到了一个真正的“东北现象”，就是“全民”里有一个“二全民”。所谓“二全民”，就是集体企业由全民企业背着、抱着。这个现象辽宁有，吉林有，黑龙江也有。辽宁最典型的是鞍钢，这个企业的职工“全民”有22.3万人，“集体”有17万人，“集体”吃“全民”很厉害，简直没法办。你们这里厂办社会(办教育、办医院、搞福利)，好像比辽宁还厉害。全民企业怀抱集体企业，很不好管理，总得想个办法，通过分流、疏通，让集体企业从全民企业的母体中分离出去。当然，这不是那么容易，但现在就要起步，可以先在少数企业搞试验。这个问题不解决，全民企业

的包袱就会越来越重。我在鞍钢讲：再过十年，你这个企业就要达到100万人，岂不是大笑话！

东北地区乡镇企业的基础薄弱，发展乡镇企业也有困难，希望你们搞点调查研究。现在江苏、浙江的乡镇企业，实际上不全是乡镇企业，而是国有小企业采用乡镇企业的机制，结果搞活了，技术水平也很高。东北地区照它们那样搞，技术上不行，可以考虑参照上海的做法。上海的做法就是采用乡镇企业与国营企业联营，搞产业分工、转移的办法。乡镇企业为国营企业生产零部件或协作产品，盲目性小一点，与国营大中型企业的摩擦小一点。要引导乡镇企业与国营企业挂钩，为主体厂配套，可以利用国营企业的边角废料、余渣废水。开始搞时，要有点特殊的优惠政策，让它先拱出地面，以后逐步成长。

三、要继续扩大开放

昨天看了你们的外贸洽谈会，没想到能搞这么大规模，去年成交18亿瑞士法郎。要重视发展同苏联、东欧的贸易，不仅要有西方市场，还要有苏东市场。苏联不可能总是困难，黑龙江与苏联经济结构互补，苏联又处于欧亚大陆桥的中间，发展对苏联、对东欧国家的贸易有得天独厚的条件。你们发展对苏贸易，要发展加工出口，还要发展转口贸易。沈阳的困难比大连大些。大连有转口贸易，有国内、国际两个市场，靠两个市场才能活起来。你们国营大中型企业的技术力量很强，哈尔滨飞机制造公司的办法值得考虑。他们派出24名高级工程师，与国外合资生产汽车，一年赚回1.8亿元。这种把智力当做资本合资经营的傲法值得提倡。现在有些产品进口得太多了，国内的生产能力发挥不到一半，这个问题需要研究。当然，我国与美国、西欧贸易都是顺差，不进口他们的一些东西，生意做不下去，但进口额度要适当控制。最好的办法是进口设备时不要全进口，我们制造一部分，他们赚大钱，我们赚小钱，这样就能把黑龙江的机械工业搞活。

最后，还请你们研究一个问题，就是应当加快住房制度改革。住房制度改革后，职工自己出一点，父母给一点，亲友筹一点，住房是买得起的。以为社会主义社会就应当人人住公房，花钱买房就不是社会主义，这个观念应当转变。上海实行住房制度改革时开展了全体市民大讨论，通过讨论转变了观念，住房制度改革进展起来很顺利。因此，住房制度改革要加快一点，要下决心搞。

地方政府是地方煤矿的安全责任者

(1991年6月28日)

1991年4月21日，山西省临汾地区洪洞县三交河煤矿发生特大瓦斯煤尘爆炸事故，死亡147人。全国安全生产委员会、能源部、劳动部、全国总工会等单位组成联合检查团，对山西省地方煤矿进行了安全检查。6月18日，能源部安全环保司《煤矿安全简报》第1期发表了《山西省地方煤矿安全大检查情况通报》。这是朱镕基同志在该简报上的批语。

同意家华①同志批示。

① 家华，即邹家华。

我很赞成简报中提出的：坚持“谁办矿、谁受益、谁负责安全”的原则，明确地方政府就是地方煤矿的安全责任者，特别要明确乡、镇长是安全第一责任者。因此，对三交河煤矿特大事故也应该查处地方政府的责任者。请李沛瑶①同志阅研。

① 李沛瑶，当时任劳动部副部长、全国安全生产委员会常务副主任。

朱镕基

6.28

振兴阜新首先要振奋精神

(1991年8月1日)

1991年7月28日至8月2日，朱镕基同志在辽宁省考察工作，先后考察了沈阳、阜新、鞍山等地。这是朱镕基同志在阜新考察时讲话的主要部分。

关于阜新的一些困难，我们早就听说了。国务院对解决辽宁的经济问题，已经有了一系列的方针政策，并且给予了很大的帮助。今天上午，阜新市委、市政府给我们介绍了情况，我们又到矿里、市里看了看。对阜新的问题，我想讲一些个人的意见。

一、振奋精神

有的同志说，你到阜新来讲振奋精神，是不是说阜新人精神不振奋呀？但我还是要讲，阜新的党政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要振奋精神、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为什么要讲振奋精神？这不是某一个人讲的，而是党中央、国务院的号召。我上午在阜新矿务局讲，矿务局要振奋精神，并不是无的放矢。我们一路看到居民住房的困难状况，到海州露天煤矿的居民住宅访问了几家退休工人。人家见到我们，就把我们围起来了。有的工人意见提得很尖锐，也有的工人流眼泪了，说："现在没有人管我们了。"我们看到上班的路都是泥泞的，我也可以想象到下雨的时候是个什么样子。我问了一下老百姓，他们说一下雨是根本进不去呀。同我们一起去的海州露天矿的负责同志不敢出面，群众围住我们的时候，也不敢出来说几句话。我知道也难管，但修一修路不行啊？修一修门窗不行啊？所以，我说还是要提振奋精神、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这话在阜新市政府的汇报里就有。我认为全篇汇报中这句是最好的，即："阜新面临的问题是相当严重的，要改变这种状态，要靠阜新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我要给你们再加上一句："尤其要靠领导干部振奋精神。"你们的精神不够振奋，别看已经写在纸上。

振奋精神要注意两个问题：第一，不要把煤炭看成是自己的包袱。阜新这个城市是城以煤兴，没有煤炭就没有阜新。阜新有光荣的传

统，为国家作出了重大的贡献。这里是一个新兴的煤炭城市，比如海州露天矿，1953年才开始投产，是156项国家重点建设工程之一，是花了大量投资建设的。到现在已采出了1.5亿吨煤，还剩下5800万吨。尽管整个阜新矿区可开采量在逐年减少，但还没有失去经济价值。我建议你们以后少说阜新煤炭不行了。你们的用意是好的，资源越来越少了，因此你们要发展其他的产业，这种心情我可以理解。可是你们这样一讲，把自己的队伍吓坏了。我看阜新煤起码还可以采20年到30年。倒是对煤炭行业的经营管理要很好地研究，包括体制改革、用工制度等。很多煤矿都不像阜新这个样子：包袱背得很重，下井的人越来越少，地面的人越来越多，全养着。应当从这些方面想点办法，提高经济效益。阜新市特别是矿务局要对职工加强思想教育，增强职工信心，树立矿兴我兴、矿衰我衰、爱矿如家的精神。阜新煤矿在历史上作出过重大的贡献，有光荣的历史，今后要继续为阜新振兴、为国家的经济振兴作出贡献。阜新煤炭行业有全民职工9.2万人、集体职工8.8万人，加上家属35万人，占了阜新总人口的一半。这一半人背着沉重的包袱，老说他们不行了，老说他们贡献小，而不是去振奋精神，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阜新怎么能搞得好？你不把煤矿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你的产业结构怎么转换？转换产业结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不是一天两天能做到的，你着急也不行啊。

第二，不要对“七五”期间的成绩估计过低。阜新在“七五”期间的成绩不小。从1985年到1990年，全市粮豆总产增长1.34倍，农业搞得很好，而且还有很大潜力。人均五亩地，哪儿有这么优越的条件呀！农业这个基础打好了，什么都可以发展，这个成绩不能否定。乡镇企业总收入增长近两倍，虽然基数小，但速度这么高，这说明大有前途啊！发展乡镇企业要根据现有的基础，不能急于求成，尤其不能采取国营企业的办法办乡镇企业，如果用行政命令下指标发展乡镇企业，一哄而起，将来屁股都擦不完。如果把财政收入往里投，产品却销不出去，那就要背上包袱了。因此要因地制宜，积极地引导，同时用政策来积极鼓励，不能下指标。南方发展乡镇企业已有十多年的基础，是真干出来的。你们要总结经验，研究政策，看怎么样能搞得快一些。总之，要充分肯定“七五”期间的成绩，要看到振兴的前途。

二、转变作风

请大家不要这样理解：一提转变作风，就是作风不好了。我讲的就是要你们转变作风，深入基层，发动群众，组织群众生产自救，这个要求不太高。据我所知，群众对你们分房子的意见还是很大的，对住房的状况是很不满意的。如果我们多到矿工家走一走，访贫问苦，嘘寒问暖，你自己分的房子不要最好的，恐怕情况就大不一样了。职工家的门窗坏了，给点儿材料，帮助修一修，搞点儿水泥，组织大家修修路，让人家下雨天别一脚水一脚泥的，这些事情总还是可以做的吧。我讲转变作风就是这个意思。对亏损的企业，是不是可以组织干部下去帮助分析一下亏损的原因，想点儿办法，减少积压，调整产品结构。如果能这样做工作，就可以逐步克服困难，扭转被动局面。

三、深化改革

我觉得现在要解决阜新的困难，很多方面要从改革上做文章。如果用老办法去转换产业结构，不会有好效果。我的意思是说，搞企业不能按过去那一套办法，一听说上项目，就七大姑八大姨安排一大堆人。阜新光气厂在大连时300多人，刚才听说搬到你们这里后现在是1500人。你们讲这样可以多安排一些待业的人，我看这不是个办法。你安排那么多待业青年有什么用？会把这个厂子搞垮了。我主张，现在要多搞一些集体企业、乡镇企业，给点优惠政策，让他们自己发展去，这样他们用钱就精打细算了。我想阜新还是有相当的基础，可以把煤矿退休的技术人员组织起来，让他们把待业青年带起来，根据需要发展新的产业。国营企业就不能这样，如果你搞一个大项目，一个厂子才解决几百人的就业，你这里有16万人待业，你解决不了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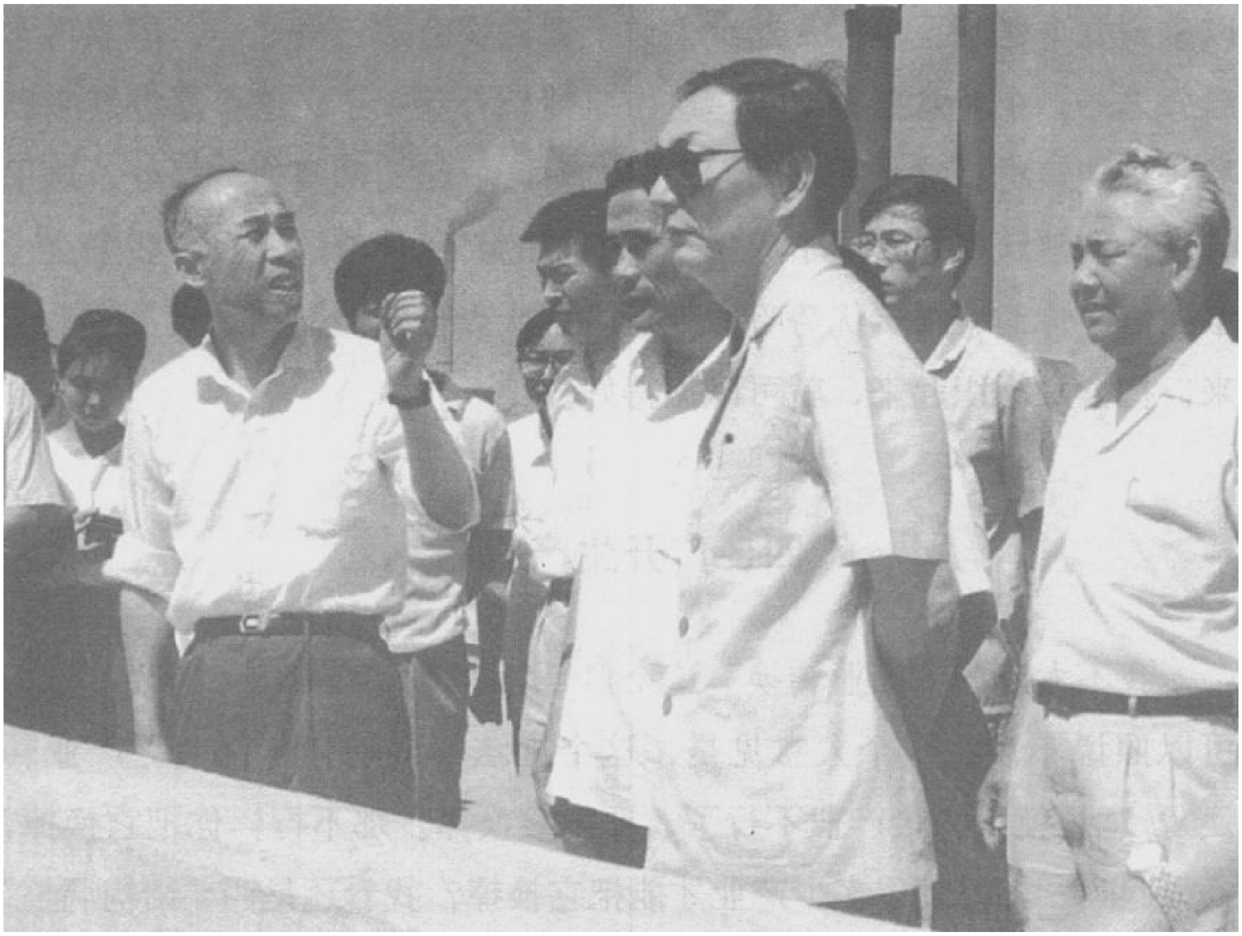
再一个改革，就是住房制度改革。住房制度改革，阜新迫在眉睫。这里有一部分人的住房实在是太困难了，我们今天还没有看到最困难的。阜新要下大决心搞一个大规模的房改计划。你们完全有条件，你们这里什么都有，钢材在东北地区积压，煤炭就近，烧砖制瓦、玻璃厂自己有，搞房屋建设很有条件。建筑行业在美国是国民经济三大支柱之一，将来在中国也是个最大的支柱。阜新有煤、有电，发展建筑行业很有条件。国家、集体、个人三家一起拿钱，住房建设就发展起来了。我在上海搞房改的办法是：第一，所有职工都要交住房公积金，按工资的5%扣。第二，提高房租。谁住的房子多，房租就要交得多，这是个制约。干部住房多一点，是过去国家政策规定的。你说把

过去的政策都取消了，大家平均分配，这个恐怕会天下大乱了。这也得进行说服教育。上海准备了一年，全体市民讨论了两个月，差一点出不了台。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进行了大量的说服工作。我在电视上讲了一次话，报上一登，90%的人同意我的讲话，群众的气平下去了。干部要在住房方面起带头作用，不能搞特殊化，不要住得太多了，要关心一下群众。干部为自己的未婚子女准备住房，人家能不有气？作风不转变，房改是搞不成的，老百姓对你没有信心，也不服气。你把道理讲清楚了，工作做细了，群众会通情达理的。总之，搞一个合情合理的房改办法，让人民群众家喻户晓，不用筹很多钱。现在上海一年房改拿九个亿，今年就可以收到六个亿，明年就可以拿到九个亿甚至更多。这个大体上要占资金的三分之一，国家再拿三分之一，企业拿三分之一，这个事情就办起来了。这个事办起来以后，把建筑材料等产业带动起来了，对产业结构调整很有好处。这里有煤，但建筑材料发展不起来，你们烧的砖比外地的还贵，我怎么也不相信。你们有煤炭优势呀，就是没有认真去抓。把技术人员发动起来，把群众组织起来，就可以搞得好。

四、广开生产门路

我不大赞成“产业转换”这个口号。当然，不是让你们改，你们可以照说不误。我个人意见是，这个提法不确切。什么叫“产业转换”？意思就是煤炭产业不行了，要把它换掉。那不行！你把它换掉，换得起吗？你得发展多少产业才能把它换掉？我看还是叫“结构调整”好。新中国刚成立的时候，全国有500多万纺织锭子，上海有250万，占全国的一半；现在全国有4000多万锭子，上海剩下220万了，只占全国的5%，还得再关50万，不关50万就没有原料。但我们也不能把它叫“产业转换”，纺织产业丢掉以后，上海就没法上缴中央的财政收入了。上海的纺织工业在80年代初期一年提供给国家的利税是30亿元，敢把它“换掉”吗？只能说停掉几十万纱锭，那样它的危房也不用再改造了。但现在也不敢马上就关，如果马上就关，新的产业还没有发展起来，工人没地方去。产业转换不是个名词问题，怎么叫都可以，但是要认真研究这个问题，着急不得。不是把煤炭产业换掉，你怎么敢换？国家的经济没有煤炭不得了，而且煤炭产业还有兴旺之时。煤炭积压是暂时的，很快就会紧张的，煤炭价格还是会上去的，国家的价格政策也是

逐步提高煤炭价格。当前，价格为什么不敢提得太快呢？因为下游产业的消化能力不强。如果煤价、电价涨得太快，好大一批机械企业、轻纺企业就要关门。但从长远讲，煤炭价格要不断提高，煤炭产业还是有前途的。你们说煤炭资源枯竭，现在石油资源枯竭比你们厉害得多呢。大庆油田过去注1吨水就可以采1吨油，现在注15吨到20吨水才采1吨油，采出来的还大部分是水，得再把油滤出来。这个麻烦得不得了，但还得开采，不开采怎么办?我们现在调整产业结构的步子要加快，但煤炭行业还是主力。今天，我提个建议：阜新的煤矿工人这么多，“打出去”行不行？到辽宁铁法承包一个矿，到陕西神木承包一个矿，基地还放在阜新，这不就可以解决就业问题了吗？上海现在有几十万建筑工人是外地的，包括铁道系统、冶金系统、各个省的建筑队伍，有几十万人在上海干活。这些工人都是很有经验的工人，比重新招工要好得多。刚开始可能有些阻力，不让阜新煤矿工人去，我认为有关部门的领导要出面协调一下。你们也别提过高的条件，只要能养活你们的人就行了。我想，广开门路就是要靠自己从各个方面广开门路，特别是发展集体企业，而不是靠国家给安排几个项目。现在的国营工业企业包括煤炭企业也都应该自己找生路，广开门路，生产自救。



1991年8月1日，朱镕基在辽宁省阜新市考察海州露天煤矿。前排左一为阜新矿务局局长夏福祥，右一为阜新矿务局海州矿党委书记陈泽光。

做好棉花的产供销工作

(1991年8月18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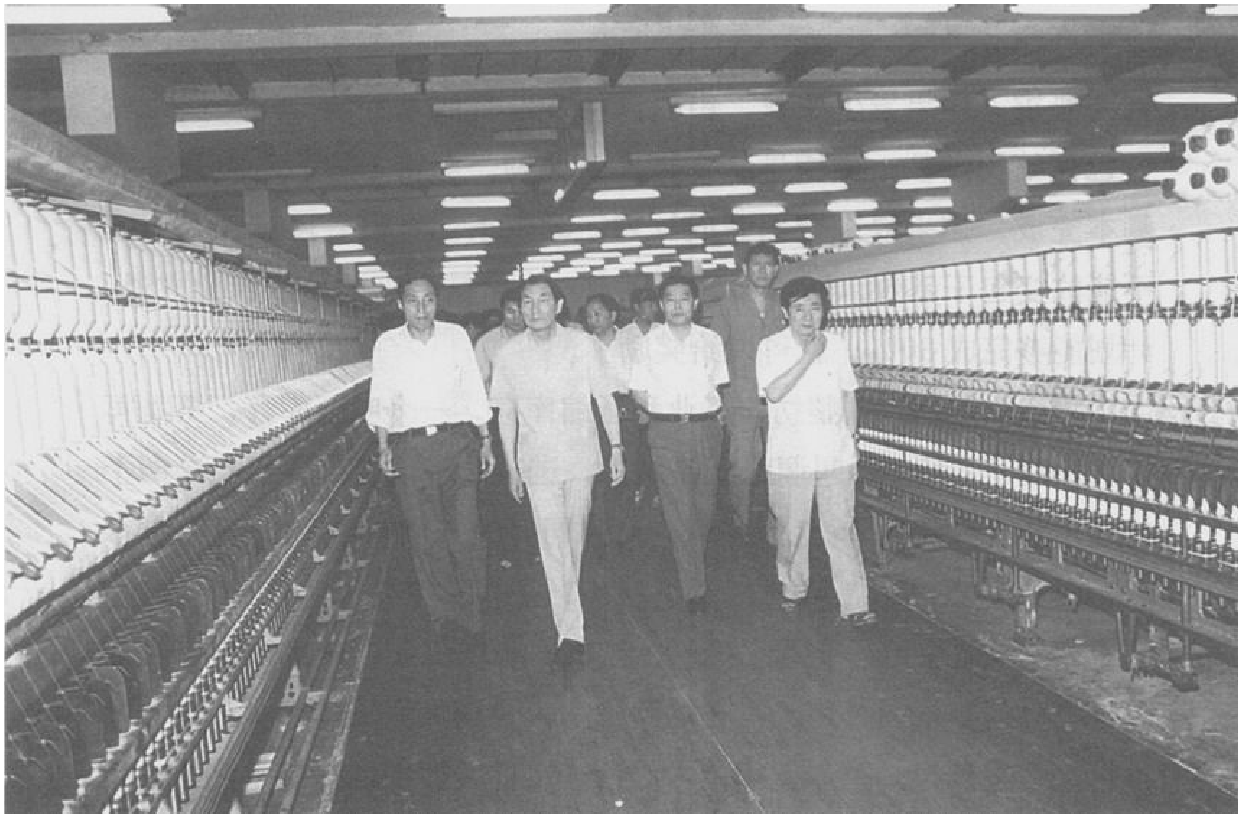
1991年8月16日至19日，国务院在北京召开全国棉花工作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分管负责同志，供销社主任，棉麻公司经理，农业、纺织厅(局)长；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有关负责同志；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这是朱镕基同志在听取分组讨论情况汇报后的讲话。

第一个问题，我想讲一下为什么今年的棉花工作会议要由国务院召开。这是因为棉花的地位在我国仅次于粮食，是第一大经济作物，牵涉到好多个省区市农民的利益。到目前为止，纺织工业还是我国第一大户，是最重要的支柱产业之一，特别是出口创汇贡献大。尽管它上缴的利税逐年下降，但是仍然保持着第一大产业的位置。最近几个月，在棉花的产供销工作中出现了许多尖锐的矛盾，特别是纺织工业实现的利税，丧失了或者说转移了200多亿元，对国民经济的正常发展产生了很大影响。因此，经过研究，李鹏总理决定，今年的棉花工作会议由国务院召开。这次会议由国务院召开好处很多，领导重视，大家回去后工作比较好做。明年我们要检查今年在这里讲的东西究竟兑现了没有，哪个省兑现得好，哪个省不执行，该奖励的要奖励，该表扬的要表扬，该批评的要批评。这样，大家就能统一认识，齐心协力，振奋精神，把工作做好。我相信这个工作是能够做好的。

第二个问题，当前或者说最近几年，棉花产供销工作中存在的许多问题，根本原因是供销矛盾。分析起来有这么几条：第一，对1984年棉花大丰收，估计有些过高了，因而可能放松了对棉花产供销工作的重视，影响了粮棉比价，应该做的工作没有做。第二，由于对棉花形势的估计过分乐观，在宏观上对纺织工业的发展，调控不是那么有效。因此，纺织工业来了一个盲目的重复建设，搞得太多了，一个县搞一个或者搞几个项目。这个后果现在看得很清楚了，全国搞到了4000多万锭子，其实有三分之二就足够了。这就造成我们今天的困难，产销失调了，供销也失调了。第三，这几年也确实出现了一些自

然灾害，棉花减产，我们的工作也没有跟上去，因此在棉花的质量上就出现了比较严重的问题。

现在看起来，第一句话可以说，当前棉花工作中存在的许多问题是供销矛盾尖锐化的反映。第二句话应该说，现在解决这些矛盾的时机和条件已经成熟了。一个是矛盾到了非解决不可的时候了，另一个是现在解决的时机也成熟了。为什么这样讲呢？第一，今年棉花南方遭灾，但北方产区还好。特别是新疆，增产的潜力很大。估计今年的棉花产量不会比去年少很多，搞得好也可能多一点。明年的棉花进口准备增加一点，从今年的23万吨增加到30万吨。估计今年的棉花形势还是好的。第二，大家已经看清楚了，再这么盲目发展纺织工业要吃亏，已经感到非压缩纺织工业生产不可了。大家应该得出这个统一的认识，就是要抑制棉花的消费，而不是纺织品的消费。纺织品的消费市场，我们应该开拓，但是棉花的消费要抑制。生产那么多棉纱、棉布干什么？又卖不掉。刚才大家讲三角债，我了解了一下，不是三角债，而是两角债。主要是纺织企业欠供销社棉花款。为什么欠？纺织企业的产品卖不掉，没有钱，向银行贷款也贷不到，所以就只好欠着了。如果纺织品的销路好，早就把钱还给供销社了。纺织品出口是有配额的，多了还是出不去。我说时机比较成熟了，是大家看到纺织品限产势在必行了。今年计划是生产2300万件纱，上半年就搞了1358万件。7月份更高了，一个月就超计划生产26万多件纱，这么搞下去怎么得了！今年生产2700万件纱也打不住，非减下来不行！不是说没有办法控制，有办法。就是从纺织部落实到各省区市，再落实到县，落实到基层，然后银行根据这个减少贷款，不能无限增加流动资金去搞积压产品。对收购棉花坚决不“打白条”，收购资金一定要保证。纺织品不压下来，占压那么多资金，我们就没有办法保证收购。全国纺织企业不是减产，而是限制增产，不要超产。解决两角债的办法就是压缩纺织厂积压的产品，压缩库存，限制超产。之所以说时机成熟，一是今年棉花的生产形势比较好，二是大家对于抑制棉花消费有共识，三是各级领导现在比较重视这个问题了。



1991年7月3日，朱镕基在湖北省考察沙市棉纺织厂。

第三个问题，讲讲刚才大家提出的一些问题，有些还要和大家讨论。第一，当前各地区农业部门还是要抓棉花后期管理，一定要把棉花拿到手，一定不要放松，力争超过去年的产量、收购量，超得越多越好。这一点应该说还是很有希望的。关于在一些棉花产区粮棉不争地的地方多开发一些棉田，扩种一些棉花，这个问题我建议还需要继续研究，请农业部牵个头。第二，在棉花收购工作中，当前首先要抓质量，务必请同志们不要放松。如果我们今年把质量关把好了，一切就都活了。如果还像去年那样，弄虚作假，砖瓦、石头都掺在棉花里面，就什么都乱套了，一切价格比例都完了。所以，质量问题务必抓紧。主要是领导要负责，各级领导亲自抓质量工作，然后我们加强监督。现在看起来领导不抓是不行的。今年，国家技术监督局要把抓棉花质量作为抓质量工作的重点。一定要执行统一的棉花标准，坚持这个标准，不按照这个标准就要罚，经济的、行政的处分都要。首先要抓住质量问题，然后是价格问题。总的来说，现在棉粮比价还是比较合理的。大家也都承认，现在的粮棉比价是能够调动农民积极性的。

我到山东、湖北调查，问了农民，他们都说对这个粮棉比价可以接受，他们有种棉花的积极性。当前是要稳定政策，所有的政策都要稳定。包括包干，一定三年，已经是最后一年了，现在要改变这个，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要再稳定一年，以后再研究。总之，棉花价格要稳定，不能够再大起大落了。但是，现在确实存在一个问题，就是地方定了一些优惠措施，说是体现在生产过程中，实际上还是加重了纺织企业的负担。我认为再不要变了，再不要加了，再不要在边界地区提高价格，把人家的棉花买来再调出，千万别干这个事情了。至于为了鼓励调出棉花，给调出省以利益补贴，我看给产区一点儿奖励，是一个办法，可以促进调拨计划的完成。但是一定要有前提：一是你的质量一定要符合合同要求。如果发生争议，由国家技术监督局来仲裁。这个奖励就要包括处罚条款，你质量不合格还要奖励，那就不行。二是计划要基本完成。如果要求全部完成计划，像山东就觉得有困难，我们又不能改变包干基数，所以，是不是定一个合情合理的数字，比方说，计划能够完成80%，就可以给奖励了。

第四个问题，调整纺织工业和压缩库存。一个叫压库存，不能再增加库存了；另一个叫调整产品结构，进行技术改造。要狠抓这两个问题。如果今年压46亿元库存，可以同时编一个明年46亿元的技术改造计划。不改造，就开拓不了新市场；销路打不开，就没有效益。技术改造要注意三个问题：第一，这次搞纺织工业的技术改造，一定要在充分研究国内外市场需要的基础上，弄清究竟搞什么，千万不要盲目搞重复建设。第二，搞技术改造一定要发挥各地的技术优势。我们往往是公布一个产业政策，说要发展什么，各地就都发展什么，这样的产业政策等于零，在新的水平上又重复。第三，这次技术改造，一定要使技术上一个等级。如果这个技术在国内已经有了，我劝你趁早不要搞。要集中力量突破一些新的领域，把钱花在这上面，着眼于未来。因此，我赞成引进先进技术和设备，要到国外去寻求新的技术、新的设备，使纺织工业上一个台阶。我们现在有一定数量的外汇储备，对几个发达国家的贸易顺差又很大，不进口一点技术、设备，进出口贸易也进不下去。所以，现在也是进行技术改造的一个极好时机。

第五个问题，纺织品出口还是要提高附加值。现在纺织品出口是有配额的，出口只能那么多，而“三资”企业就占了不少配额。还是要尽量想办法，提高纺织品的附加值，同样的出口数量，就能更多地创汇。这方面希望外贸部门和工业部门，推广上海工商结合、开拓国内市场的经验，否则工商矛盾很难解决。同时，这也提出了另一个问题，即工贸结合，开拓国际市场。讲了多少年，没有实现，也到了非解决不可的时候了。完全靠国内市场不行，还是要扩大出口市场。

第六个问题，就是所有这些问题的解决，都需要地方党委和政府加强领导，严格执行国务院的决定。只要领导亲自负责，党委和政府把这项工作当做重要任务来抓，这些问题都是可以协调解决的。只要国务院规定了，一定要严肃执行。我还有第二句话，有法必依，有法就要依。为了使国务院的决定能够兑现，今年我们要抓几个典型予以通报、处分。

清理三角债要抓住固定资产投资拖欠这个源头

(1991年9月3日)

1991年8月31日至9月3日，国务院在北京召开全国清理三角债工作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主管清欠工作的副省长(副主席、副市长)，清欠办公室主任，主管基本建设工作的计划委员会副主任，主管技术改造工作的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人民银行、工商银行、建设银行分行主管清欠工作的副行长，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等。这是朱镕基同志在会上的讲话。当时企业间互相拖欠货款的情况十分严重。此前国务院有关部门所进行的清欠工作主要是清理流动资金，收效不大，甚至出现前清后欠、边清边欠、越欠越多的情况。朱镕基同志在调查研究基础上指出，三角债的主要源头是部门、地方和企业为追求产值和速度而盲目上建设项目，因而固定资产投资缺口严重，造成对生产企业设备、材料货款和施工企业工程款的大量拖欠。因此，他提出从固定资产投资拖欠这个源头入手清理三角债、顺次解开债务链的新思路。实践证明，抓住这个源头，投入1元清理了4元拖欠，收到了很好效果。

这次会议有几个特点：一是领导重视，国务院对清理三角债工作很支持，下了很大决心，拿出350亿元贷款来支持清欠工作。二是会议没有把清欠单纯当做财务结算或金融问题来对待，而是对三角债问题进行综合治理，不仅清理固定资产投资拖欠，而且也对产成品积压采用“压贷挂钩”①的办法进行控制，明年还要增加技改投入，包括争取每年拿出15亿美元国家结存外汇引进先进技术和逐步减免企业“两金”②，来增强企业还贷能力和技术改造的能力。三是虚实结合，既学习了国务院一系列政策文件，也制定了操作性很强的办法，并交流了东北地区清欠的实际经验。四是会议强调了清欠和防欠结合，防止新的拖欠。代表们感到很有收获，增强了清欠的信心。

---

① “压贷挂钩”，是压缩产成品资金及发出商品、应收销货款资金占用，与增加技术改造包括技术开发贷款挂钩的简称。

② “两金”，指能源、交通重点建设基金和预算调节基金。

下面，我针对大家反映的问题讲几点意见。

一、紧紧抓住固定资产投资拖欠这个源头，力争取得清欠工作的好成绩

对清理三角债问题，有很多同志还是想看看再说，并不是充满信心。我认为，不下决心，这件事解决不了。去年清理三角债工作取得了经验和成绩，但由于多年积累的深层次矛盾不是短时间可以解决的，所以出现了前清后欠、边清边欠、越欠越多的情况。从今年上半年的几个指标看，生产速度相当高，今年1月到7月份，全国预算内国营工业企业总产值比去年同期增长10.4%，销售收入增长15.6%，而实现利润却下降13.1%；企业亏损面达到36.7%，比去年同期增加2.7个百分点，亏损额达到177.8亿元，比去年同期增加18.6%；产成品占用资金达1332.5亿元，库存超过正常水平700亿元。生产速度上升与经济效益下降的矛盾还没有解决。今年上半年，全国新开工5万元以上基建项目个数和总投资分别比去年同期增长近100%和80%，全民所有制投资规模增长18%。生产发展速度和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很大一部分是靠拖欠生产企业来支撑的。国家、地方和企业都感到压力很大，难以承受，各地区、各部门和企业要求清理三角债的呼声十分强烈；一些全国人大代表和全国政协委员分别就清理三角债问题提出了几十份提案、议案；很多老同志也很关心这项工作，提出许多宝贵的建议。特别是很多基层的同志纷纷来信提出建议，他们的热情使人感动。我认为，解决这个问题的时机成熟了。



1991年6月，朱镕基在辽宁省沈阳市主持召开清理三角债问题座谈会。

国务院对解决三角债问题十分重视。5月下旬，李鹏总理把这个任务交给我。6月1日，他主持召开国务院总理办公会议，进行专题研究，提出以清理三角债作为搞活国营大中型企业、提高经济效益的突破口，要求我们在半年内有所突破。国务院清理三角债领导小组根据对去年清欠情况的分析，认为三角债前清后欠的原因主要有三个：一是固定资产投资缺口严重，造成对生产企业设备、材料货款和施工企业工程款的大量拖欠。建设工程竣工了，钱还未付，使生产企业背债，为建设单位代付利息。仅去年一年就拖欠500亿元，生产企业和施工企业一年为此付利息50亿元。二是企业亏损。企业亏损本来是应该

关门的，但由于各种原因做不到，而且还要生产，贷不到款只好拖欠。去年预算内国营工业企业至少有500亿元明亏，这还不算潜亏，即虚盈实亏，造成拖欠其他单位的流动资金。三是积压产品超储700亿元，占用了流动资金，企业为了维持生产，只有拖欠。这三个源头造成的三角债合计近2000亿元。此外，商品交易秩序混乱、结算纪律松弛、信用观念淡薄，也是加剧三角债的重要原因。这三个源头和一个原因，造成了严重的三角债。

对三角债严重性的估计应该是“两点论”：一方面，这是多年来积累的深层次矛盾的体现，深层次矛盾不是短时间所能解决的，我们计划在三年内解决；但另一方面也要看到，只要措施得当，还是可以解决的。今年要清理1000亿元，这个目标是可以达到的。三个源头一起抓，风险较大。去年清欠投了500亿元，其中100多亿元用于清理基本建设项目的拖欠，有效果。从固定资产投资项目拖欠入手进行清理，清一块就少一块，不会增加新欠；而从流动资金入手进行清理，可能会造成新的积压。国务院同意从源头入手进行清理，认为清理流动资金拖欠要慎重，并决定在东北地区开展清理三角债的试点工作，作为全国清欠的第一阶段。在东北地区试点中，我们提出了“压贷挂钩”办法，以解决产品积压问题。

7、8两个月，国务院派出清欠工作组分赴东北地区和其他地区，配合试点工作的进行。根据东北地区典型调查，固定资产投资拖欠在拖欠总额中只占15%到20%，很多同志对从固定资产投资拖欠入手进行清理没有信心，认为解决不了问题。在这次会议上也有类似的反映。我们反复讲这个道理，看起来固定资产投资拖欠占拖欠总额的比例很低，但那只计算了一次债务，没有把连环清欠的叠加效果计算进去。对投资拖欠的电厂投入资金，电厂把钱还给设备制造厂，设备制造厂还给钢厂，钢厂再还给煤矿、铁路，这样叠加起来，效果就大了，投入1元可以清理3元到5元拖欠。东北地区试点还未结束，目前就已达到投入1元清理3元，即1：3的比例。如果搞得好，看来能达到1：4或1：5的效果。东北地区试点证明，从固定资产投资拖欠入手进行清理，不是背新的包袱，不是扩大基本建设规模，而是清还旧债，既可行，又有效，没有风险。

这次会议上对清理流动资金拖欠的呼声很高，实际上是对从固定资产投资拖欠这个源头入手进行清理的效果还有疑虑。还有的同志提出，固定资产投资拖欠，大部分是效益不好、资金没有来源的项目，注入资金就背上了包袱。我们说，清理固定资产投资缺口造成的拖欠要分三年完成，现在要先清效益好的项目拖欠，先清大中型项目。我主张按这个次序进行清理，这在实施方案中有具体要求。对效益不好的项目，欠债也不是不还了，这类项目不在少数，如果都不还钱，生产企业就活不下去了。投资规模已经完成，建设单位不付原材料生产企业的钱、施工企业的工程款，生产企业、施工单位只好从银行贷款维持生产，等于替建设单位付利息。这是把建设资金缺口的负担转嫁给生产企业和施工企业了。这是造成大中型骨干企业困难的主要原因之一。所以，不管项目效益是好是坏，都要还钱。建设单位还不起，银行贷款给建设单位，由建设单位来付利息，不能让生产企业背，只有这样才能把金融秩序整顿过来。

注入资金清理固定资产项目拖欠，是不是扩大了信贷规模，有没有风险？我说，没有，至少从理论上讲没有扩大信贷规模。建设单位欠生产企业的钱，生产企业从银行贷款来维持生产。现在，银行把固定资产投资贷款借给建设单位，建设单位把钱还给生产企业，生产企业就可以把钱还给银行。总的看，固定资产投资贷款增加了，流动资金贷款减少了，而贷款总量并没有增加，只是信贷结构调整了。当然，这只是从理论上讲，在实际操作中必然有些滞留和流失，投入要大于收回。为了解决三角债问题，增加一些贷款也是有必要的，没有大的风险。而且在资金运转时，我们还要排一个次序，尽量不使资金流到产品积压的企业。最难办的是，借钱给一些企业，让它还债，它不借，宁可欠债不付利息。这不行！要有行政干预，就得要它借。为什么当初批项目、上项目、搞建设的劲头那么大，根本不考虑还钱呢？欠债就要还钱。

还有的省反映，由于受灾，企业效益差，地方财政减收，自筹资金困难，注入资金由政府担保，政府领导心中也没有底。我们说，要担保是因为这部分资金本来应该由地方政府、企业自筹，而你一下子又自筹不出来，只好由银行借给你，但是政府必须担保还款。搞项目时你拍胸脯，说有钱，当时可能是有一部分钱，但用了几次。搞第一个

项目时说，我那里有1亿元；搞第二个项目时又说，我那里有1亿元；搞第三个项目时还说，我那里有1亿元。“一个女儿嫁了几次”，所以开工后就没有钱了。因此，为了恢复正常经济秩序，把旧欠还清，地方自筹确有困难的，银行贷给你，但要由地方财政担保，在下个财政年度还给银行。如果地方财政不担保、不还钱，可能明年还要大搞建设，那就真把建设规模越搞越大了。担保就是防止产生新的拖欠的措施。因为投资中自筹比例达30%到50%，数量相当大，如果银行不投入一部分资金，企业自筹拿不出钱，清欠就收不到预期的效果。为了支持国家重点基础工业和基础设施的建设及重点技术改造，国务院已经决定，今年由建设银行和工商银行共同发行国家投资债券100亿元，其中，80亿元用于基建，20亿元用于技改，额度已经下达到各省区市了。在债券没有发出去之前，先请银行把钱借给地方，由地方政府担保；债券一发出去，地方就把钱归还给银行。这就算自筹，这就需要担保。总之，今年还不了明年还，明年还不了后年还，不能把债烂掉了。

一些省区市表示自筹有困难，我们也体谅，所以对困难大的省区市把自筹比例适当降低，多给些银行贷款。但是，我还是希望与会同志回去后向省委、省政府汇报，把明年要搞的项目压一压，少搞点，特别是压楼堂馆所项目，把为那些项目准备的钱挪一些过来，把欠人家的钱还掉。这样，大家就都搞活了。

我们希望，经过大家的努力，今年可以清掉1000亿元，大体相当于现有三角债的三分之一，也可能还要多一些。10月份要把清理效果统计出来，以坚定大家的信心。

二、坚决而稳妥地压缩产成品库存，搞好“压贷挂钩”和流动资金清欠

大多数省区市提出，流动资金拖欠严重，要求清理流动资金拖欠的呼声很高。我要强调，对清理流动资金拖欠要十分慎重，不能采用“水多加面，面多加水”的办法，只能采取釜底抽薪的办法，把庞大的库存压下来，把库存减少的钱用于技术改造和技术开发，才会收到预期效果。因为流动资金拖欠，库存积压是重要根源。就是说，相当一部分产品不适销对路，卖不出去，企业还要维持生产，要发奖金，这样必然造成库存大量增加，占用银行贷款，贷不到款就拖欠别人。紧俏商

品是没有拖欠的，如“桑塔纳”轿车就没有拖欠，“奥迪”轿车交钱还买不到。有拖欠的主要是积压滞销的商品，你借给生产企业钱还旧账，它还会再积压、欠新账。因此，对产品积压滞销的企业，要进行产品结构的调整，不能再借它流动资金生产积压产品。

进行结构调整，有一部分企业要停产搞技术改造。把积压产品占用的资金变成技改资金投进去，把死钱变成活钱，使技术水平上一个新台阶。技改资金的投入，一部分变成设备，一部分变成工资，这两部分又会拉动消费需求，推动社会生产。现在实行“压贷挂钩”的办法，也有利于信贷结构的调整，并不扩大信贷规模，只是把流动资金贷款变成固定资产贷款，没有风险。现在，有些产品积压几年也卖不出去，最后要报销大量损耗。大家要卧薪尝胆搞结构调整，两三年后工业生产就会出现新面貌。

有人提出，“压贷挂钩”是一个好政策，但搞不好会造成新的投资膨胀。我们说，不是一点风险都没有，但我最担心的问题不是这个，而是库存压不下去，已经分到各省区市的压库指标最后不能落实。对仓库里的东西加强推销是对的，但降价推销的后果也很严重，今年推销掉了，明年的市场就受影响。事实证明，降价推销不是治本的办法。压库还是要压产、减产、停产。不这样，库存就压不下来。但压产关系到关停并转，关系到社会稳定。对这个问题就看有没有决心，如果下定决心，加上扎扎实实的思想政治工作和比较完善的配套措施，就可以既维护社会稳定，又把积压滞销产品的生产压下来，腾出流动资金搞技术改造和技术开发。这是我们面临的艰巨任务，一定要搞好。12月份将召开全国企业技术进步工作会议，还要讨论这个问题。技术改造项目不是能随便上的，要加强宏观控制，要认真选择，尤其是大的项目、新的项目，要经过论证，避免出现盲目上马、重复建设。要通过改造，使企业的技术水平上一个新台阶。

会议上，很多同志交流了看法，认为关停并转并不可怕。现在与1962年的情况完全不同了，现在不是商品匮乏，而是东西太多了，要赶快掉头，停产搞技术改造和技术开发，停产搞新产品，使企业和产品都上一个新台阶。

产品积压有一个过程，我们要作历史分析。1988年我当上海市市长，那年基建开始压缩。真正的压缩是在1988年下半年到1989年上半

年，银根抽得很紧。当时，地方的同志都反映银根抽得太紧，生产搞不下去了。现在看来紧是对的，乡镇企业的重复生产压下来了，重复建设紧掉了，楼堂馆所砍掉了，治理整顿确实取得了很大成绩。但治理整顿是一个痛苦的过程，压缩基建，抽紧银根，必然导致生产一度下降。现在回过头来看，当时确实应该忍受这个过程，进行关停并转，进行结构调整，完成这个调整的任务。但是，这个过程因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而受到了干扰，在那种特定的情况下，如不能保证工厂稳定生产，就不能保证社会稳定，因此就松动了信贷。要看到那时松动信贷是有其历史原因的。尽管当时是在结构未调整好、市场未启动的情况下，靠银行贷款支持生产，增加了库存积压，但是，这对于促进生产迅速回升、稳定人心、稳定社会，是功不可没的。而现在我们不能再靠无限制地从银行借钱来维持生产，靠多发奖金来维持稳定。要向职工群众讲清这个道理，企业亏损还照发奖金、增加工资，继续吃“大锅饭”，是不允许的。

还有人说，对关系国计民生的生产资料，如煤炭的压产要慎重，压产容易，恢复生产难。实际上，我们并没有压煤炭。我在“质量、品种、效益年”活动第二次全国电话会议上讲了，我们尽可能不压生产资料生产，不放空其生产能力，能出口就多出口一些，能收购就多收购一些。对统配煤矿的流动资金困难，我们尽力帮助解决。对日用小商品，我们也没压。我们点名压产的都是资金占用多的产品，如纺织品、卷烟。这次烟草公司动作很快，卷烟产量要压150万箱，产值30亿元。原来预计这样做会影响财政收入17亿元，经过调整产品结构，影响没有那么大。国家计委也很快调整了分省计划，各地区要严格执行。要重申1983年国务院有关通知中的规定，对不执行国家计划盲目超产和违反物价政策降价竞销的企业，要实行经济制裁。凡是超计划生产的卷烟利税全部上缴中央财政。要动真格的，不然计划就没有严肃性。

有人说，压减积压产品200亿元，影响财政收入怎么得了！我看 一点儿也不要怕，影响的是虚收。如果对积压产品生产不采取釜底抽薪的办法，积压也不减产，亏损也不关停，老投钱进去维持生产，长此下去，要么是财政补贴，要么是银行垫支，都是坐吃山空。这些企业

上缴的财政收入，是用银行的钱交税，从银行口袋里转到财政口袋里，这种减收没有什么可怕的！

在今年8月28日的国务院总理办公会议上，李鹏总理指出，限制积压产品生产，已经吹风三个月了，但真正做的很少。如再不下这个决心，三角债、产品积压问题都解决不了。地方不但要支持限制积压产品生产，而且要转变观念，自觉去做。对这个问题的处理稍有不慎就会引起社会不稳定，因此既要积极坚决，又要考虑承受能力，十分慎重，但这件事情非下决心不可。如果不慎重，就会闹事。如果不去做有力的思想政治工作，不把道理跟工人群众讲清楚，特别是领导干部不跟群众同甘共苦，那是不行的。解决关停并转问题，要注意研究各项配套措施，希望各省区市的同志回去后创造一些经验。我们要看到，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正确领导下，现在政治稳定、社会稳定、市场繁荣。有这样的条件，只要组织落实，领导重视，思想政治工作坚强，完成这个任务是不会影响稳定的。如果什么事情都不敢做，困难只会越来越大。要下决心，广开门路，如实行厂内待业、轮流上岗、轮流放假、待业保险，发展第三产业等等。总之一句话，不能再制造积压产品了。国务院生产办生产调度局和企业局也要下去与各省区市总结这方面的经验，做到既要实现压产目标，又要保证社会稳定。现在搞关停并转，跟过去的情况不一样。现在经济实力加强了，工人奖金没少发，搞一点关停并转并不是那么可怕。经过两三年努力，企业可以翻身，只要有了盼头，人心就不会散。

再回到主题，就是要同心协力把清理三角债工作做好。这个工作，不是银行一家能做好的，但也不能把银行作用估计低了。在这次会议上，这么短的时间内，不可能搞得很清楚，即使有不该注入资金的，我们也只好承认下来。给每个省区市一个总数，请你们站在国家立场上去把好关。我曾经三次到辽宁省，对他们讲，这些项目基本上都是你们拍胸脯答应下来的，项目上去后，就没钱了，现在要中央的贷款清欠。中央可以贷一部分，但是，地方总得千方百计把自筹资金补上。现在，缺口就是地方自筹的那一部分。各地不要把钱都用在明年大搞基本建设上。今年已经搞成的基本建设的资金缺口，地方不给钱，就缺乏全局观念了，应该把这个钱先还了，既解决了本省企业的困难，也缓解了其他省份企业的困难。这件事情，拜托大家了。我们

只确定注入每个省区市的资金总数，将来哪个项目注入多少，还得由你们“几堂会审”确定。大家回去要做工作，一定要实现这个目标。

有的部门提出，压缩流动资金搞技改，希望技改指标的调剂由部门掌握。昨天，我向李鹏总理汇报这个问题时，他的意见还是由地方掌握、调剂。因为库存能否压下来，主要由地方做工作；压下来的资金怎么用，要以地方为主，允许在行业和企业之间进行调剂。但要吸取过去宏观失控的教训，地方要充分尊重行业主管部门的意见，充分了解国内外市场信息。现在不少项目开始时规模搞得很小，企业为了达到规模效益，再扩大规模，造成宏观失控。我主张省区市间联合起来集资搞一些大项目，无非是投资、产品、产值、利税、劳动力等进行合理分配的问题。请国家计委、国务院生产办研究一个办法，把产值、利税分别计在有关省区市，大家都得利益。要让每一个省区市都能发挥自己的优势，都有自己的拳头项目。

有的人提出，“压贷挂钩”只与产成品资金挂钩是“鞭打快牛”。华东等地的产成品库存低，压不下来多少，影响到挂钩的技改规模。我们研究，可以不单与产成品挂钩，也与发出商品挂钩，这样有利于调动库存少的省区市的积极性。我们主要是压产成品资金，但是不能因为压减产成品，生产企业就把积压产品转到发出商品中去，搞库存搬家，因此，发出商品占用资金不能再增加了。如果发出商品减少了，也可以搞一部分挂钩。现在工商银行与各省区市协商，初步落实压缩产成品资金194亿元，实行“压贷挂钩”办法。请人民银行与其他银行，如农业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等，也参照工商银行的办法，商定并提出具体办法。

还有人说，国家为拖欠项目注入大量资金进行清理，但不追究形成拖欠的原因和责任，对今后防欠极为不利。我认为，不是不追究。注入资金，各级政府就要追究责任，部门也要追究责任。这次清欠，资金要注入，责任要追究，教训要吸取。这种清欠方法就是追究责任。让欠账的单位不还钱，才是真正的不追究责任。

还有人说，不能把清欠的作用提得太高，似乎拖欠问题解决了，深层次问题就解决了。我看清理三角债已经触及深层次矛盾的各个方面，因此不能把清理三角债工作的意义估计得太低。企业没有搞活，没有约束机制，上项目没有控制，大家吃“大锅饭”，项目搞坏了没有人

负责，亏损了也没有责任，这都触及了深层次问题。深层次问题一点儿都不解决，三角债问题就解决不好。能解决一部分三角债，说明深层次问题已经开始受到触动了。三角债问题解决好了，对解决深层次问题是一个很大的推动。

机电部的同志说，库存中有四分之一是虚账，损耗要冲销，因此不能简单地实行“压贷挂钩”办法，否则会出问题。我说，对此不要有顾虑。清产核资、清仓查库是下一步应做的工作，我现在讲的压库主要是压产。就算库存中有一部分报废了，现在的库存大得很，也够用，实行“压贷挂钩”办法没有什么大的风险。

三、会后的几项任务

在这次会议上，各地区提出有拖欠的项目1万项，其中基建5700项、技改4300项，拖欠380亿元。我们准备注入230亿元贷款，要求自筹110亿元。这230亿元包括各环节要留点钱交产品税，已按省区市分了指标，有的还不满意。不满意不要紧，只要你的项目搞清楚了，还可以再商量。“压贷挂钩”的目标原定200亿元，现已认定194亿元，其中今年使用21亿元，其余结转到明年使用。

这次会议已经明确了任务，请同志们回去后做好以下几项工作：

(一) 各地区、各部门要高度重视这一工作。政府要重视，省长、自治区主席、直辖市市长要亲自抓。首先要从组织上加强，要从计委、经委、财政、银行等部门抽调得力干部，充实清欠办公室的力量，清欠队伍要保持稳定。

(二) 搞好清欠培训工作。对有关清欠人员要先进行培训，要一直培训到基层的经办行、分理处和企业，要抓紧用半个月时间进行培训。这个工作搞好了，跟上了，清欠工作就会少走弯路。9月20日，全国开始注入资金，统一行动。

(三) 要紧紧抓住固定资产投资项目拖欠这个源头进行清理，毫不动摇。要按照规定的时间和这次会议的要求，认真依次进行连环清理。我们坚持哪个省区市先搞清楚就先给哪个省区市注入银行清欠贷款，搞不清楚的就暂不注入。

(四) 在清欠工作中，各地区和各部门都要树立全国一盘棋的思想，识大体，顾大局，要坚决反对和克服本位主义、地方保护主义思想，克服和纠正“拖欠有理”、“拖欠有利”、“拖欠出效益”的错误思想。清欠资金不能只进不出，一旦发现违纪现象，要给予有关的银行行长处分。要真正建立起正常的金融秩序，一定要严格扣缴滞纳金。国务院已经发了通知，人民银行已经制定了办法，自9月1日起执行，过一段时间要组织检查。该扣不扣的，是银行的责任，处分行长；是企业的责任，处分厂长、经理；是政府官员干预的，也要给予处分。不这样做，就整顿不好商品交易秩序。

我再讲一下流动资金清欠问题。今年注入的350亿元清欠资金，除注入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外，还有60多亿元，原想对重点行业的流动资金进行清理，由于会上意见不一致，会后再进一步研究。但我要讲清楚，将来还不了钱，滞纳金仍然要交。对扣缴滞纳金问题，任何一家都不能逃过。如果有一家逃过，结算纪律就无法执行。一个国家，金融没有纪律，结算没有秩序，还能搞经济、搞生产吗？“杀人偿命，欠债还钱”，哪有不还钱的道理！当然，造成这种现象有历史客观原因。问题已经明确了，企业有困难，国家、地方一起帮助解决，资金要到位，解决亏损、积压问题也有办法了。现在是要整顿秩序，你把滞纳金交给人家，其他单位欠你的滞纳金也给你，由于是连环拖欠，你也吃不了什么亏。这些规定，不执行不行。不执行的，被检查出来要通报批评。由于形成拖欠的原因复杂，因此都要顾全大局，对重点企业不能因为不付货款就不发货、不给车皮，那样就“天下大乱”了。

希望大家回去以后要抓紧向省区市政府主要领导同志汇报，迅速行动。要做好思想政治工作、组织落实工作、业务培训工作，坚定信心，振奋精神，齐心协力，打好清理三角债的决定性一仗。

对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意见

(1991年10月1日)

1991年8月24日，新华社《国内动态清样》第2105、2106期发表了两篇《西部省区采访录》，反映西部地区一些干部对西部地区发展的看法和建议。薄一波同志认为“这是个大问题”，建议中国工业经济协会会长、原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吕东组织研究。吕东将薄一波的意见和该材料送朱镕基同志。这是朱镕基同志在该材料上的批语。

吕东同志并报薄老：

如何加快西部经济的发展，确实是个“大问题”，这也是邓小平同志提出过的“共同富裕”的问题。《采访录》提出了一些好意见，值得进一步思考和研究。总的感到：第一，西部地区必须发挥自己的资源优势和科技优势，发展能源、原材料工业和知识密集产业，扬长避短，事半功倍。第二，西部地区的“结构转换”一定要考虑全国的产业结构调整。要慎重对待“发展加工增值，延伸产业链条，沟通上下游工业的循环”的问题，这条路子势必导致与沿海地区已经重复建设的加工工业趋同化，而又缺乏质量、品种的竞争力，结果是事倍功半，事与愿违。第三，重要的是加快价格改革，理顺上下游产品的比价，扭转资源产品利润率低的状况。第四，采取配套政策(产值计算、税收、利润、产品分配)，鼓励沿海加工工业与内地实行联营。方式可以多样化(西部供原料，东部搞加工；西部粗加工，东部深加工；东部深加工向西部转移)，关键是利益分配要向西部倾斜。归根结底要有一个长短结合的规划，但规划只能定方向，辅以鼓励政策和宏观调控手段，实施还要建立在省际自愿联合的基础上。赞成薄老批示，先请工经协会组织一些专家进行研究，理出一些思路、措施，提请国务院有关决策部门采择。请酌。

朱镕基

10.1

9/10 家宝同志并报镕基：我们加快西部经济的发展，确实是个"大问题"，这也是小平同志提出过的"两个大局"的问题。《采访录》提出了一些好意见，值得进一步思考和研究。我的感想：第一，西部地区必须发挥自己的资源优势和科技优势，发展能源、原材料工业和知识密集型，扬长避短，事半功倍。第二，西部地区的"结构转换"一定要服从全国的产业结构调整。需慎重对待"发展加工增值，延伸产业链条，沟通上下游工业的循环"的问题，这条路子势必导致与沿海地区重复建设的加工工业趋同化，而又缺乏质量、品种的竞争力，结果是事倍功半，事与愿违。第三，重要的是加快价格改革，理顺上下游产品的比价，扭转资源产品利润率低的状况。第四，采取配套政策（价格、税收、利润、产品分配），鼓励沿海加工工业与内地实行联营。方式可以多样化（西部供原料，东部精加工；西部粗加工，东部深加工；东部深加工向西部转移），关键是利益分配要向西部倾斜。归根结底要有一个长远统筹的规划，但规划只能定方向，辅以鼓励政策和宏观调控手段，实施还要建立在省际自愿联合的基础上。赞成薄老批示，先请经协会组织一些专家进行研究，理出一些思路、措施，然后请国务院有关职能部门决策。请酌。

朱镕基
10.1.

镕基阅：

送上薄老在《动态清样》2105 期上的批示复

10/10 印件，我们正在商议如何进行研究，望请您给以批示。

[illegible]

[illegible]

吕东

一九九一年九月廿日



1991年3月4日，朱镕基在上海举行的第一届中国华东进出口商品交易会上与吕东合影。

大力发展船舶工业

(1991年10月5日)

这是朱镕基同志在中国船舶工业总公司听取工作汇报后的讲话。

听了大家的介绍，感到船舶工业近十年有了很大的发展，而且已经成为面向国际市场的产业。船舶工业这十年的发展，实际上是改革开放的产物，也是改革开放取得成功的一个显著标志。船舶出口在过去是想都不敢想的事情，现在真正出口比较好的还是船舶工业。这主要是把握了世界产业调整方向，摸准了国际船舶市场行情，并且采用国际标准，从一开始就注意引进国外主机、船板等，这条道路是正确的。现在要考虑如何来提高国产化能力。从船舶工业这十年的发展，能够总结出很多经验。



1989年9月21曰，朱镕基在江南造船厂听取工作汇报。右二为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副 主任兼财经委主任陈沂，右三为中国船舶工业总公司副总经理王荣生。

目前，我们正处于产业结构大调整的前夜。产业结构调整主要是两方面的内容：一是能源、交通和部分原材料依然是落后的，电力工业最近几年搞上去了，但是煤炭、石油还非常落后；交通有很大的发展，但是依然落后于国民经济的发展。能源、交通、原材料工业特别是矿山，需要有一个大的调整。对这个结构问题近几年注意到了，但远远没有完成调整的任务。二是加工工业的重复建设，又给我们造成了新的困难。当然，这是多年积累的问题。加工工业特别是轻纺工业和一般的机械工业，生产能力富余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要是不调整的话，谁都活不下去，搞活国营大中型企业只能是一句空话。没有市场，怎么搞活？产能这么大，2000万台彩电，1500万台电冰箱、洗衣

机，卖给谁？这些加工工业如果不调整，不转换产业结构，效益就始终没法提高，相当大一部分企业就生存不下去。造船工业是应该更快、更大规模发展的一个产业，因为一个产业能不能发展，关键是看有没有市场，造船工业就是有市场。一是国内20年以上船龄的船舶都要更新，这个市场是很大的。二是国际市场也有一个周期，90年代应该是这个周期中比较兴旺的时期。从世界产业结构发展的方向来看，船舶工业是劳动密集、资金密集、技术密集型产业，辛苦得不得了，像钢板除锈就是非常辛苦的，西方发达国家没人干了。因此我们这个发展中国家造船，至少可以兴旺20年，也许就像日本那样，可以长期兴旺下去，因为我们人多。我们要估计到这个形势，认识到发展船舶工业是我们产业结构调整的一个方向。要向船舶战线的职工讲清楚产业结构调整的重要性，振奋精神，鼓舞士气，把船舶工业搞上去。我觉得，船舶工业发展要立足国内、面向世界，要打入国际市场。我们的船舶工业能够发展得这么快，就是靠引进技术搞出口。

加快船舶工业发展，现在要狠抓三项工作：

第一，狠抓缩短造船周期。造船首先是抓船台，船台是造船的咽喉。缩短周期光喊空话不行，要一个船台一个船台地抓。只要你们认真抓，制造船台的周期缩短一半是可以办到的。缩短船台制造周期一半，你们的造船能力就提高一倍。现在不是没有市场，而是你们的效率没有发挥出来。要特别注意提高工时利用率，这要有目标，要有一套定额管理方法。

第二，狠抓提高国产化比例。抓国产化，首先是要有一定的批量，生产能力要上升到100万吨以上，要搞100万吨甚至200万吨以上的，人家才有兴趣。只有国产化搞起来，船舶工业才算壮大起来, 才能够通过关停并转把更多的厂子转到你们这边来。这样，就带动了全国的产业转换，同时也大大地降低了成本。因此，要想尽一切办法，提高质量，提高国产化比例。

第三，狠抓科学技术进步。要抓好科研院所同企业的结合，要落实“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你们培养了一支能够面向世界的科技人员队伍，这是一支了不起的队伍，是最宝贵的财富。现在要充分发挥这个队伍的作用，在这个方面要舍得花钱。要研究中国港口、航道的特点，研究中国运输的规律，以适合中国的情况，以这个取胜，在这方面外国

船是做不到的。怎样充分发挥科研技术人员的积极性？这个问题很重要。现在独立的科研院所很多，但是科研与生产总结合不好，你们要想办法改革一下。是否还是搞企业集团才行？船舶总公司说是一个集团，实际上是一个部。要真正跟企业结合得很紧密，还是要探索用什么样的形式。要组织企业集团，把研究所放到企业集团里，使科研成果能够马上用于企业的生产。有了经济效益，企业才会有兴趣。希望你们探索一下这个问题，总之，要把这批技术人员培养到国际水平。

为了实现到本世纪末翻两番的目标，上面是三条主要的措施。要实现这三条，很重要的是要深化企业改革，改革企业机制。第一点，企业内部的改革首先是分配制度的改革。吃“大锅饭”是搞不下去的。缩短造船周期也好，提高国产化比例也好，都要跟分配挂起钩来。光喊口号不行，必须从企业的管理制度、从内部分配制度来改革才行。要建立责任制，工期两天缩短一天，工人就拿两天的工资，或者拿一天半的工资，这样才有人肯干。第二点，船舶总公司是不是也向所属企业放一点权？不要过分集中，该集中的集中，能够不集中的最好不要集中，管那么多事情干什么？管得了吗？我总觉得船舶总公司还是要发挥行业管理的作用，如果完全当一个经济实体，太大了。就是作为经济实体的话，也要发挥下属企业的积极性，少来一点行政干预。当前反映最大的就是搞企业升级啊、质量金牌啊、评比啊、检查啊，企业对这些最头疼。这次暂停这些活动以后，企业没有不叫好的。

除了深化改革和挖掘潜力以外，建设方面还是要下点工夫。当前一定要把大连的20万吨级船坞抓上去，这是一个关键。现在要赶快把它搞成，要搞就快搞。这件事还是该你们总公司来抓，我们帮你们共同抓。另外一个是浦东的船坞一定要上，因为我看准了船舶工业要发展，这犯不了什么错误，没有很大的风险，我看要下决心搞，这对浦东发展也有益。浦东开发是我们在90年代的开发重点，但如果没有项目进去，这岂不成了一句空话？中国造船业的中心一个是大连，一个是上海。上海港是全国最大的港口，在这里搞个大的造船厂有很多优势，又可以推动浦东开发。这个项目一定要上，不上这个项目是没有眼光的。

“正点”是民航服务质量的中心

(1991年10月7日)

1991年10月7日至8日，全国民航服务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出席会议的有民航各管理局、航空公司、省(区、市)局、航空分公司、机场、飞机维修工程公司、地方航空公司及民航局机关部门负责同志。这是朱镕基同志在会上讲话的主要部分。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民航的工作很有成绩，发展很快，不论客运、货运，还是运输总量，1990年比1985年基本上翻了一番。但从现状看，民航的发展还落后于社会需求，今后会有一个很大的发展。可以说，这几年民航的大发展是改革开放的产物。同时，民航的发展也是我们改革开放的一个条件，没有民航的先行，改革开放很难扩大下去。所以，大家一定要看到民航进一步发展的远景。民航是改革开放的一个窗口，外国人到中国来，首先看机场怎样，各方面设施水平如何，服务水平如何。我们民航的同志，既要看到过去取得的成绩，又要看到责任的重大和发展的远大前景，更加努力地工作。那么，民航发展在哪些方面还不能适应国民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事业的需要呢？应当解决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方面是基础设施、运输力量不能适应需要；另一方面是内部经营管理水平和服务水平不高，这是主要矛盾。关于第一方面，我们要根据国家财力、物力尽量解决。我现在到处宣传要更加重视发展民航，主张增加投资，主张航空设施要达到国际水平。国家要采取一些办法来加强民航设施建设。关于第二方面，即提高民航的服务质量，我认为要解决三个认识问题：

第一个认识，要有紧迫感。现在我最害怕的是你们自我感觉十分良好，这样就不可能进步。我听说，你们和铁路比，认为自己比铁路好，正点率很高。我不知道你们是怎么统计出来的，是否准确。我看不要沾沾自喜，要跟国际水平比。我们搞改革开放，民航没有达到国际水平怎么行？你们要采用国际标准。外国有些优秀企业的标准，还高于国际标准。你们的服务质量确实有改善，有些航线确实不错，但

是国内外旅客的投诉还是不少。所以，你们要高标准、严要求，要有紧迫感。

第二个认识，要有责任感。应该认识到，民航的一切作为，代表着国家的形象、民族的精神。你们是一个先驱、先行、先锋，外国人首先是从我们的民航、民航人员看这个国家的素质和精神状态的。你们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要用这种感情来改善你们的服务态度。一个国家的民航服务水平很低，飞机老不正点，如果连这个都抓不上去，这个国家是没有前途的。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比德国人、日本人的严格要求差得远。我们应该有民族的自尊心，中华民族是一个伟大的民族，这一点应该从民航的工作人员中体现出来，应该从民航的身上体现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我们应该提到这个高度来检查我们的工作，改进我们的工作。

第三个认识，要搞内因论。从主观上找原因，不要从客观方面去原谅自己。内因是根据，外因是条件，外因要通过内因才能起作用。特别是我们的领导干部，要以具体事例分析问题存在的原因。我认为客观原因是有的，不承认这一点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但是内因呢？如果很好地从主观方面去努力，这些问题不是不能克服，不是不能改进的。我今年4月份访问西欧，早晨到机场后才知道飞机不能起飞。原因是飞机的油管坏了，要换，要开票、办手续，因此要晚点到下午两点半起飞，但到两点半也没准点起飞。这又为什么呢？机长跟我讲，原因是装行李的临时工不懂配载业务，把行李摆得不平衡，他带头上机才把行李摆好。我说你身先士卒，很感谢你。摆行李，是否有制度？是否应该有个人去监督？怎么能让临时工随便放？有了制度如果没有严格执行，就要从内部找原因。所以请大家研究一下，怎么改进，怎么振奋精神。思想政治工作非常重要。特别是有些乘务员觉得自己了不起，认为乘客都是拿公家的钱坐飞机的，我让你们坐飞机就不错了，还要让我微笑服务，没门儿！这几年，“人人为我，我为人人”提得太少。在上海，我一直讲这句话。我为人家服务，人家也在为我服务。你不尊重人家，难免别人不尊重你。我们是一个大家庭，要互相服务。老是摆客观原因，不讲内因论，是无法提高服务质量的。

当然，我们要想尽一切办法来改善民航的外部条件，但我认为你们主要的条件比别的部门好，你们主要的问题是改善内部经营管理和提

高服务质量。外因要通过内因起作用，否则，即使把你们的基本设施搞得再好，如果你们的服务态度还是一团糟，也发挥不了作用。我非常赞成民航局领导同志提出来的奋斗目标，要把民航的服务水平提高到高于全国的平均水平。我觉得这个目标比较恰当，但这只是第一步。明年，我要提出你们应成为全国的标兵，这不是不可能。

抓正点，你们叫“正常率”，我用通俗的话讲是“正点”。正点是民航提高服务水平的中心环节。如果服务不好，乘客还可以忍受，在飞机上不过就是一两个小时。如果航班正点了，到机场后就等半个小时，加起来也就两三个小时。但如果不正点，在机场耗一天，饭也吃不上，乘客还能受得了吗？首先要把正点搞好，不正点就打乱了正常秩序，对社会效益造成的损失不知有多大，对国家名誉造成的损失不知有多大，对旅客心理造成的损失也不知有多大。不正点，其实也是没有安全感，这不是指飞机掉下来，而是不知几点飞。现在的社会是信息社会，节奏都很快，人家不能老跟你泡着。大家普遍认为飞机应当是最正点、最容易正点的，但是现在大家都说最保险的还是坐火车。所以，民航首先要抓正点。提高服务水平，特别是抓正点，是你们贯彻“质量、品种、效益年”活动的一个中心环节。我在这里讲服务质量，你们可能提出，那安全昵？安全第一嘛，人命关天嘛。但是，服务质量不好，安全根本无法保证。当前民航的主要矛盾是服务质量太差。服务质量是民航的生命。我不是乱提口号，我只是讲一个观点，这个观点究竟是否成立，大家可以商量。不从这个方面努力下工夫，民航是很难发展下去的，或者说很难适应改革开放的需要。

要解决服务质量问题，首先必须做到三点：

第一，严字当头，从严要求。江泽民同志强调，要从严治厂、从严治企业。我在上海工作时，一直讲从严。现在我们的“关系学”太多了，大家都不愿批评了，讲情面、讲关系，怕穿“小鞋”。这样下去，我们党和国家的事业是要被断送的，必须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

上次我听民航局领导汇报工作时，毫不客气地批评了他们一通。我不是否定他们的成绩。民航局的领导干部，不管是过去的，还是现在的，这些同志素质好、党性强、很精干，文化程度也比较高，很有经验，但最大的缺点、弱点就是管理不严。当“老好人”不行，一定要

严格要求。我知道，做这件事很不容易。我的脾气不好，有时在情况不明的时候批评人，得罪了一些人，我要改掉随便批评人的毛病。但如果怕得罪人，党和国家的工作就搞不好。我宁肯不当这个官，看到问题，我一定要指出来。心软的官是带不出好兵的。

第二，齐心协力抓好服务质量。特别是抓正点，正点是综合指标的体现。没有整体上综合管理水平的提高，飞机就正不了点。抓正点服务，不是搞一个专门小组就能解决问题的，只有党政一二把手直接抓，才能见成效。这个“牛鼻子”，是中心环节，抓住正点死死不放，出了问题严格处理，想办法改进。属于内部管理的问题，你们自己解决；属于外部的原因，我和民航局有关同志帮你们解决。这样，整个管理水平就上去了。希望你们领导班子一二把手集中力量来抓这件事，集中力量打歼灭战，在年底前抓出成效，使民航工作转入良性循环的轨道。

第三，转变作风。江泽民同志讲，转变领导的作风要深入基层，关心群众疾苦。没有这一点，前面讲的从严要求、齐心协力都是一句空话。自己高高在上，不关心群众疾苦，不下去听取群众意见，也不下去检查，那什么事情也办不成。我们要办实事，有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解决不了的把道理讲清楚。领导同志不深入基层，不跟群众同甘共苦，不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切全是空话。

加快技术进步，搞好国营大中型企业

(1991年10月10日)

这是朱镕基同志在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同志会议上讲话的主要部分。

今天请大家来开会，主要是研究如何贯彻最近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精神，落实搞好国营大中型企业，特别是搞好企业技术进步工作。下面我讲两点意见。

第一，要加强宏观控制。

(一) 停止重复建设，停止再批长线建设项目，制止资金不落实、留缺口的现象。最近，江泽民同志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强调，要把扩大再生产的重点放在技术改造上，而不能主要靠铺新摊子。当然，技术改造也有重复建设的问题。今年纺织部召开厅局长会议时，我提出，一个纺纱锭子也不能再增加了。现在至少已有4000多万锭子，可是还在批准新项目，扩大生产能力。没有棉花，又没有市场，建起来干什么？不管什么理由，谁也不能再建了。前几天，我在中国汽车工业总公司讲，要停止一切汽车项目的审批，现在摊子已经大得不得了。要明令公布，谁再批汽车项目，包括零部件，要追究责任。每家都想自成体系，自己搞一套，将来都是给自己找麻烦。空调热已经不得了，现在还在引进。国家计委及时起草了一个文件，我非常赞成，又加了两条：停止审批一切空调机项目；为了有效控制，请人民银行会签，凡是再搞空调项目的，任何银行不许贷款。我希望国家计委、国务院生产办会同各个部门研究一下，把长线产品列出目录，明令各地区一律不准再搞。这不是与地方作对，而是帮助他们，为他们着想。批不批就看两条：一看是否赚钱，效益好不好。有些项目大家都看着好，你搞了一个，我也要搞一个，结果是一哄而上，生产多了销不掉，最后的结果是大家都没有效益。二看是否符合国家产业政策。但是，我认为光有产业政策还不够，如果没有国家统一规划，照样会重复建设。我请国家计委、国务院生产办和行业主管部门考虑：

“长线一个不批，短线只批一个。”短线、缺门的，只批一个项目，批量生产，实现规模效益，好消化吸收，也好实行技贸结合。如果说搞两个项目可以有竞争，也要看准了，确有市场，分期再搞，先搞一个。搞建设不能一哄而上，否则大家的日子都不好过。

(二) 减少滞销产品生产，压缩长线产品库存。现在，无论如何要解决几百亿元的库存积压问题，把这些资金盘活，把死钱变成活钱。库存怎么处理？降价处理不可行。当然，季节性降价，残次产品按质降价，是可以的。在正常情况下，降价处理只能是把消费提前，冲击市场，使销售更困难。怎么办？就是减产、压产，除此以外，没有别的好办法。这次压产后，要清仓查库，弄清楚库存多少、损耗多少、内盗多少，恐怕会发现很多问题。在清理三角债过程中，我们提出了“压贷挂钩”的政策，目前要先减产。根据各部门的意见，决定今年下半年减少库存200亿元，实际上是要压产200亿元。今年压200亿元，明年压200亿元，后年再压200亿元，合计600亿元压下来，库存就正常了，企业的利息负担也就减轻了，还可以增加技改资金。

第二，要增加投入，加速企业技术改造，推进产业结构调整。

光压缩生产不够，还是要上等级。要开拓新领域、新产品、新市场，技术进步非常重要。李鹏同志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加快技术进步，是增强企业活力的重要手段和物质技术基础。凡是前几年技术改造抓得比较紧的，企业活力就强；没有搞技术改造，或者技术改造搞得少的，处境就比较艰难。”①这段话讲得非常正确。我回忆过去，如果不是认真地抓了技术改造，困难比现在要严重得多。技术改造在1979年到1982年那个时期叫“挖、革、改”②。当时没有多少钱，财政部每年只能拿出22亿元，又集中企业折旧的30%，进行重点安排。特别是银行搞了一个轻纺贷款，一年20亿元。一些大城市，就是靠轻纺贷款把轻纺工业搞上去的，增加了好多品种，开拓了市场。从1982年到1987年，是技术改造的一个重要时期。当时国家经委和工交各部与国家计委、财政部、人民银行、工商银行、中国银行，还有经贸部，配合得非常好，搞了一个引进技术3000项，搞了一个“三为主”项目1200项，就是以沿海项目、轻纺项目、出口项目为主，这些都起了很好的作用。还有机械工业的改造，第一批550项，第二批565项；军转民项目第一批126项，第二批170项；机械工业出口基地400项。到

1986年后，我们强调对技术引进的消化、吸收，国家抓了引进技术消化吸收“十二条龙”。各省区市、各部门搞了 “三百条龙”。这几千个项目中大概有10%是效益不好或失败的，另外90%都是好的。现在真正能够开拓市场、能够出口、效益比较好的，就是靠搞了这些项目的企业。如果那个时期不搞，就没有今天这个局面。这些项目都是经过当时各个行业主管部门和国家经委、国家计委、人民银行、财政部一起审查的。刚才讲的那几千项，基本上没有什么重复。现在的112条彩电生产线，与刚才讲的项目挂不上钩。112条彩电生产线当中，经过国家计委、国家经委审批的只有7条，其他都是各个省区市自己用银行贷款上的。所以，现在真正能够有效控制的宏观手段就在银行，银行用贷款来控制，不然我们说半天都是空话。调整产业结构就是要靠技术进步。搞技术改造也跟基本建设一样，如果搞重复建设，不是又在制造新的困难吗？解决重复建设问题，光靠国家产业政策还不够，要把国家产业政策具体化，根据产业政策制定统一规划。我们已经制定了一个“八五”规划，包括基本建设和技术改造。这个规划还有两个问题需要仔细研究：第一个问题，在规划中对于企业产品的更新换代、长线产业的调整转换、新兴产业的开拓发展，还没有能够具体化。也就是说，不让它生产彩电、电冰箱，那让它生产什么东西呢？这么大的富余加工能力让它怎么转换？这个问题要很好考虑。第二个问题，重点建设项目的资金不落实，资金分散，国家能够掌握的钱不多，安排不下来。因此，为了贯彻中央工作会议的精神，为了对当前的工交企业进行技术改造和结构调整，必须抓紧落实“八五”规划的重点技术改造项目，特别是前三年的技术改造项目。后两年还看不太准，先把前三年的落实。今天就是动员各个工交部门，大家团结起来，齐心协力，抓紧两个月的时间，把“八五”规划特别是前三年的规划和重点技术改造项目落实好，以达到产品更新换代、调整产业结构、开拓新兴产业、开辟新的技术领域的目的。用两个月时间搞好这个规划，要明确对各个行业支持什么、限制什么，加强宏观控制。今年12月份开会部署，全国统一行动。当然，这个规划今后还要进一步完善，但是，这第一步跨出去非常重要。为了制定或者落实这样一个规划，我想，要处理好以下四个关系：

① 见李鹏《关于当前经济形势和进一步搞活国营大中型企业的问题》(《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册，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696～1697页)。

② “挖、革、改”，指对老企业进行挖潜，对旧工艺进行革新，对老设备进行改造。



1991年7月6日，朱镕基在湖北省襄樊市考察第二汽车制造厂。左一为湖北省省长郭树言，前排右二为第二汽车制造厂厂长陈清泰，右三为国务院生产办副主任赵维臣。

一是集中与分散的关系。

江泽民同志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对搞好国营大中型企业的问题讲了七条，其中第五条讲了发挥中央与地方两个积极性，实际上就是处理集中与分散的关系。我们现在要落实“八五”规划前三年的技术改造项目，也碰到一个处理集中与分散的关系问题。地方有地方的想

法，他们想搞那些项目，有些是政府的想法，有些是企业的想法，两者并不是完全一致的。我们从全国的宏观角度考虑，又有另外一种想法。碰到想法不一致怎么办？不外乎有两种做法：一是国家不做统一规划、统筹安排，让地方各搞各的。这样，虽然项目都上了马，但资金有缺口，谁都不能及时地把它们建成投产，发挥效益。二是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在目前摊子铺得这么大、这么散的情况下，在照顾到发挥地方的积极性和不影响企业自主权的情况下，稍稍集中一点，逐步把产业结构调整过来。我想，目前我们还是应该采取第二种做法。是不是可以这样办？就是跟过去相比，我们稍稍地把银行贷款这一部分的安排适当集中。企业技术改造资金的很大一个来源，是企业自己的折旧、自有资金和留利。这一部分不要平调，平调了效果很不好。现在折旧率很低，留利很少，只有20%到30%的企业有点留利，如果再平调出去搞全行业的发展，只会削弱企业维持自己简单再生产的能力。不要平调这部分，还是让企业去维持简单再生产，或者适当扩大一点再生产。

我们能够适当集中的就是银行贷款。今年全国技术改造总规模950亿元，预计完成时可能会超过这个数，明年计划是1100亿元。今年950亿元的技术改造总规模里面，大部分是企业自己的钱，属于银行贷款的是280亿元，其中包括新增贷款100亿元、银行收回再贷180亿元。我的意见是把收回再贷中由地方银行安排的这一部分的比例减小。比如180亿元中，只留60亿元给地方银行安排，另外120亿元与100亿元新增贷款合在一起220亿元，作为重点来安排。这样，项目就集中了。我觉得这样做既不影响地方的积极性，也不是收回银行的自主权或者影响银行的自主权，而是更好地进行宏观调控。因为这些重点项目，现在要经过“三堂会审”，不但有地方、企业、行业主管部门、咨询公司参加，还有掌握宏观调控的国家计委、国务院生产办、经贸部、财政部、人民银行、工商银行参加，对宏观形势就看得比较清楚，这些项目搞出来就会有效益，不会重复。把主要的资金集中搞这些项目，留给地方自己安排的余地比较小，盲目上马、重复建设的机会就会少一些。我看一定要实现这一条。今年即将召开全国企业技术进步工作会议，大家带回去的是经过认可的项目，80%或者90%以上的资金都给安排好了。银行贷款都落实了，你只要有10%左右的自筹资金就行了，你搞的项目就可以保证很快建成，发挥效益。请国务院生产办与

人民银行、工商银行共同研究提出具体办法，大家来落实。这是一个大的变革，有些道理和利害关系要讲清楚，免得将来各地哇哇叫“过分集中了”。

现在有些现象奇怪得很，都说没有钱，但是提出那么多项目，上得那么猛，不知哪儿来那么多钱，还不都是银行的钱！刚才有的同志讲，债券也是个问题，债券同样是银行的贷款，发行要严格控制。名为企业发债券、企业承担风险，实际上风险在银行，最后风险还是在国家。债券原来由银行发，年利息8.64%。现在由企业来发债券，但是要通过银行来发行，又加上一个百分之二点几的手续费，一下子变成11.16%，不是更加重了企业的负担吗？所以，发行企业债券也要控制。现在地方有些同志不了解这个情况，以为这就是给他们增加资金了，把债券当做无偿拨款来使用。其实，将来还起债来可厉害哩。所以，这一次我们投入贷款350亿元清欠，一部分就是为了解决债券不落实的问题，因为只有效益相当好的企业才愿意承发债券，多数企业对每年11.16%的利息承受不起，结果只好拿银行贷款来垫付，借新债还老债。有不少行业的同志跟我讲：“我们的资金不够，国家计委和国务院生产办分给我们的资金太少了。”我说，现在不是资金少的问题，而是怕你用不掉。我可以断定你用不掉，因为你的好多项目经不起推敲，问几个问题，你那个项目就站不住脚、上不去了。现在不是资金不够，资金没有问题，而是要认真地研究每个行业究竟应该搞什么。千万不要搞重复建设。

二是沿海与内地的关系。

现在这个矛盾很尖锐，内地、沿海地区都要上新项目，都要搞深加工，这个问题怎么办？西部地区究竟怎么发展？很值得研究。我主张：第一，还是要从深化改革和完善政策上来解决这个问题。在全国现有加工能力过剩的情况下，西部地区或内地不要走重复建设的道路，重点放在搞深加工，延伸产业链，这么搞法效益不一定好。从全局考虑，不能这样搞。随着我们经济情况逐步地好转，国营大中型企业逐步增加盈利，要不失时机地提高能源、原材料的价格，使西部各个省区觉得发展资源产业对他们有利，而不是非得搞深加工产业才能有效益。现在大家都搞加工工业，恐怕有一部分加工工业的产品要降价。第二，要鼓励沿海地区的深加工企业与内地搞联营。这种联营可

以考虑内地搞粗加工，沿海地区搞深加工，得到的利润协商分配；或者是沿海地区的深加工工业向内地转移，搞联营，搞企业集团。这就要在产品和利润的合理分配、产值的分别计算、税利的上缴等方面，让内地和沿海地区都有好处，用不着再去搞重复建设了。在内地建很多加工工业，暂时没有很大好处，因为质量、品种和深加工的优势在沿海城市。还是要发挥地区优势，扬长避短，促进横向协作、联营来完成这个历史发展的过程。我们鼓励联营，并要想办法促成这种联营，搞企业集团。当然，深加工工业不能完全集中在沿海地区，每个省区市都要有达到规模经济的拳头产品。

三是科研与生产的关系。

搞技术改造不能单纯地搞一点设备更新，更不能完全依靠进口设备，必须在我们自己的技术开发、技术攻关、科研成果转化的基础上搞技术改造。

过去国家经委召开技术进步工作会议，意思就是不单纯讲技术改造，还包括技术开发和技术引进。一方面依靠自己技术的发展、开发、转移、转让；另一方面依靠对国外技术的引进、消化、吸收，在这个基础上进行企业的技术改造。但现在有个很大的问题，就是科研和生产怎么结合？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但如果科技与生产结合得不好，生产力就形不成。不解决两者结合的问题，科学技术就不能成为生产力。我们现在的科研体制来源于苏联模式，应用技术的科研力量都独立于企业，或者说大部分独立于企业。而在发达国家不是这个体制，他们最强的开发力量、科研力量是在企业里，在企业的研究所或者技术研究中心。他们的一个技术研究中心，有时一年的经常费用就是几亿美元甚至几十亿美元。我们企业的科研力量非常薄弱，整个科研力量大概有五分之三都分布在独立于企业之外的科研院所、大学。所以，我们的企业老是搞几十年一贯制的产品，技术老是更新不了，技术进步的步子很慢，要引进一点真正比较先进的技术很不容易。不解决这些问题，企业很难摆脱困境。

我设想，可以有几种形式来解决科研与生产相结合的问题。第一种形式是，由各个科研院所把他们的技术成果转让到企业去。但这里存在很多问题：首先，知识产权的问题没有很好地解决，转让技术不值钱。另外，科研院所的科研成果是实验室成果，最多是中间试验成

果，还没有解决批量生产的工艺、设备问题，企业还不能直接应用。结果自己搞了很多所办工厂、校办工厂，虽然可以免税，得益多一些，但也是重复建设，工艺还是搞不好，工艺的优势不在这些科研机构里面。所以，还是要承认知识产权，大家合作开发、攻关，甲出技术，乙出设备，共同来解决工艺问题。国务院生产办和国家科委要制定一些政策措施，共同把这个问题解决好。第二种形式是，由重点企业提出课题，确定要解决什么技术问题、开发什么新的产品，国家给企业贷款或者拨款，由企业进行招标，各个科研院所都可以投标，再由企业择优选择科研院所进行合作，联合开发。上海这样搞了三年，很起作用，解决了很多技术难题，一些大学和科研院所也都得到了好处，在经费上得到了支持。这种方式值得提倡。第三种形式是，由企业集团建立自己的科研中心或者技术研究中心。最近，顾秀莲①同志跟我讲，我国农药、化学药品的配方落后于国际水平，我们必须有自己的研究中心。她要我给几亿元资金，搞一个技术研究中心。我说，你这个技术研究中心搞在什么地方？如果放在化工部，那个成果是没法应用的，也许写几篇论文就算了。再说，即使我有几亿元给你建了技术研究中心，你也养不起。这个技术研究中心要建，也只能建在企业集团。把几个农药厂组织起来成立企业集团，然后共同建立一个技术研究中心，那个时候国家可以给几亿元贷款。谁来还贷呢？化工部无法还贷，但企业集团有能力还。这样，研究的成果就可以为企业所掌握，转化为生产力，将来可以发挥更大的效果。所以要逐步把科研院所融入到企业里面去，将来企业集团组成了，厂所结合的问题也解决了。在近两个月里，希望国家科委、中国科学院、国家教委把所属的科研技术力量都动员起来，与各行业主管部门共同研究在每个行业里面开拓什么新的技术领域，科研单位有什么新的成果可以转化为生产力，共同搞一点新的项目，把企业从当前的困境中解脱出来。

① 顾秀莲，当时任化学工业部部长。

四是技术引进与技术开发的关系。

这一次我们搞技术进步、技术改造的规划，一定要促进技术水平上一个新的台阶。我们过去那一轮的技术引进，确实把国际上一些一般实用技术引进得差不多了。今后要上一个新的台阶，在技术开发的基

础上还要引进技术。今年4月份，我访问欧洲，看了飞利浦公司。他们现在搞了一种磁带，是立体声录音带，在普通的录音机上放，音色、音质跟激光唱盘的一样。对这种技术包括日本都在攻关，并且都已掌握了，就看谁先推出这个东西。他们还在搞幕后的谈判，打算几家采用同一种制式，共同推出去占领市场。如果掌握了这个技术，确实可以开拓一个新的市场。总而言之，对这些耐用消费品，各个国家都在那里研究，都有新招儿。现在就是怎么能把这些技术开发出来或者引进来，这是我们的一个课题。我们的行业主管部门、企业与科研单位要联合开发或者联合引进，这样才不至于买一些重复的或者落后的技术。最近，国务院决定，今后三年每年拿出30亿美元现汇支持技术引进，其中15亿美元搞重大基建项目，15亿美元搞重点技术改造。我们希望主要是买软件，当然也可以带进来一些关键设备、仪器仪表。国家过去在这方面有一套行之有效的办法，还要继续执行。各地区、各部门要千方百计地组织用好。准备采用什么办法，还要同银行商量。初步的意见是：由银行按美元现汇汇率配给买汇贷款，最后还人民币就行了。但这个配套买汇的人民币贷款用什么利息来还，还要进一步研究。按过去“拨改贷”①的利息行不行？“拨改贷”的年利率是3.6%，再加一个手续费1.8%，总共是5.4%。希望大家提出项目，项目提出来了再来平衡。贷款不“切块”了，也不要说冶金部门分多少、化工部门分多少，谁提出的项目能提到点子上，就给谁外汇。我相信，这样用汇对于改善我们同发达国家的贸易进出口状况大有好处，对于扩大改革开放政策在国际上的影响也大有好处。在这方面，国务院机电设备进口审查办公室也要积极配合，该卡的要卡，该支持的还要支持。这样才能引进一些先进的技术，把企业的技术改造搞好。

---

① “拨改贷”，是国家预算内基本建设投资由财政拨款改为银行贷款的简称。

我讲了这四个关系，总的意见就是希望在这一次比较大的结构调整工作中，能够充分运用宏观调控手段，把项目搞得适当集中一点，效果更好一点，把技术进步工作做得更好。宏观调控的手段主要是三条：第一条，政策鼓励。制定一些鼓励政策，使企业自觉地服从宏观调控。第二条，资金支持。集中一些贷款，统筹安排，项目资金不留

缺口。第三条，政府协调。各综合部门、主管部门要发挥政府管理经济的作用，帮助企业推进技术改造和技术进步。我相信，大家会自觉地服从这个宏观调控。

下面，我讲一讲有什么鼓励政策，使大家自觉地服从这个宏观调控，把项目纳入整个结构调整的规划。大体上有这么几条：

第一条，提高折旧率。我们希望列入重点技术改造项目规划的企业，明年再提高一点折旧率，以增加企业的自有资金。

第二条，减免企业从折旧基金中上缴的“两金”，增加企业的技术改造能力。现在每年从折旧基金中提取的“两金”，据财政部估计是73.4亿元，实际上并没有收到那么多，大概有60多亿元。其中，有20多亿元是从能源、交通部门收来的。李鹏同志在最近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明确地讲了，这部分资金是应该还给企业的，因为这是企业用来维持简单再生产的，把它收走了，等于让企业吃老本。但是考虑到财政的承受能力，国家准备用三年返还，就是每年返回20多亿元。还有就是降低企业所得税税率，财政部准备把国营大中型企业的所得税税率由现在的55%减少到33%，这样，国家每年要减少100亿元的所得税收入。这也是分三年实现，每年30多亿元。通过这两项，每年返回给企业50多亿元。退还“两金”能使所有的企业都受益，所以这50多亿元中，还是要将减免“两金”的比重加大一点。可否考虑，从明年开始，对能源、交通部门，包括邮电、民航，还有原材料工业的矿山，这是几个薄弱的环节，一年内就把“两金”统统退回去，不要分三年了，支持他们一下。其他免“两金”的，就是列入重点技术改造项目规划的企业，也是一年就把“两金”都退回去。这样，就给这些需要重点支持的企业增加一点自有资金。但这个办法还需要和有关部门进一步协商，并报经国务院批准。

第三条，发放贴息贷款。过去一年有5.19亿元作为贴息，因为银行的贷款利息比较高，企业还本付息比较困难，所以由财政部给予贴息。当年的结余，可以结转到下年使用。这样，列入重点技术改造规划项目的贷款利息，就可以从年利率8.64%降到6%左右。可以根据项目和企业具体情况，给予有差别的贴息率。这对于企业的技术改造是个很大的支持。

第四条，增加新产品开发的基金。从销售收入中增提的这部分可以减免“两金”，特别是对列入重点技术改造规划的项目，给予优先减免。

第五条，恢复引进技术的外汇渠道。中国银行的外汇贷款还要继续提供。我刚才讲的15亿美元不是一般的外汇贷款，而是人民币配套的贷款，只要偿还配套人民币的本息就行，不用还外汇了。此外，还可以向中国银行贷款，借外汇还外汇，或者还人民币，但都需要银行给配套人民币贷款。过去是中国银行贷1美元配1元人民币，这些办法要恢复。国务院生产办要与人民银行进一步研究，把外汇的渠道搞活，增加技术引进投人。

第六条，实行“压贷挂钩”的办法，增加技术改造资金。连续三年，每年压减库存200亿元，可以增加600亿元的技术改造贷款，但任务很艰巨。

对江西发展的几点意见

(1991年10月16日～22日)

1991年10月16日至22日，朱镕基同志在江西省考察工作，先后考察了南昌、九江、吉安等地，分别听取了江西省委、省政府及有关地市的工作汇报。这是朱镕基同志在听取汇报后讲话的要点。

一、要继续加快农业结构的调整，促进工业发展

江西省委、省政府坚持贯彻中央以农业为基础的方针，农业结构的调整取得了很大进展，不但粮食生产上去了，棉花、油脂、水果等的生产也上去了，现在又发展蚕桑，荒山绿化进展也比较快。进一步调整农业结构，这是正确的，对促进工业发展大有好处。只要把农业这个基础抓住了，工业就一定能发展起来。如果不优先发展农业，就工业抓工业，工业一无原料，二无市场，又缺技术，容易背上包袱。九江的棉花平均亩产130多斤，产量比较高。多种棉花，不仅能促进江西纺织工业发展，还可以与上海搞联营。江西这么大，要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多种点棉花、水果等经济作物。要充分利用自己的资源优势，大力发展乡镇企业，搞好农副产品的深度加工和增值，把产品推向国内外市场，提高综合经济效益，增加县乡财政收入，扭转部分县市长期吃财政补贴的状况。

二、集中财力，加快交通运输等基础设施建设

江西经济要想发展得更快一些，就要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加快能源和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上。江西山区很多，如果不大力发展交通运输，商品经济是搞不活、发展不起来的，省里要拿出更多的资金进行这方面的建设。京九线①是关键，公路、水运也很重要。只有使农村、山区四通八达，经济才能搞活。我到山东去考察，发现他们的公路建设得很好，干工作也是扎扎实实的。他们有句话：“要致富，先修路。”农民对这句话理解得很深，修路的征地费很便宜。公路运输、水路运输，包括民航都要上去。交通不便，即使想开放也开放不了，江西目前这种交通状况很难吸引外资。江西要大力发展小水电，发动农

民自办，搞点贷款。当然，搞能源、交通建设需要集中一些资金，是不是可以在不收紧政策、不增加企业负担的情况下，通过企业加强内部管理、挖潜改造，为能源、交通建设提供更多的资金。需要建设的项目很多，必须量力而行，集中力量打歼灭战，不要把战线拉得太长、摊子铺得太大，要制定一个比较详细的发展规划。搞基础设施建设，如果财政困难，可以引进点外资。江西井冈山、庐山等旅游资源很丰富，要发挥自己的优势，大力发展旅游业和其他第三产业，这也是筹措资金的重要途径。

---

① 京九线，北起北京西客站，南至广东深圳，连接香港九龙，跨越京、津、冀、鲁、豫、皖、鄂、赣、粤九省市，包括同期建成的两条联络线在内，全长2553公里，于1996年9月通车。



1991年10月18日，朱镕基在江西省考察九江外贸码头。前排右一为江西省省长吴官正。

三、采取休养生息政策，增强企业发展后劲

江西的工业基础不是很强，但是你们采取了一些搞活企业的政策，对企业发展起了很大作用。我们听到的、看到的企业，活力都比较大。政府给了一些宽松政策，藏富于企业，有利于企业休养生息、自我改造、自我发展，这个政策是正确的。不要只顾一时之利，收得很紧，把企业挖得很苦、挤得很干。有的地方挖企业的钱盖楼堂馆所，看起来城市建设漂亮了一点，但这样搞，企业是没有后劲的。一个地区的工业有没有前途，关键是看有没有后劲。你们在这方面是做得比较好的。你们历届政府换届时没有留下大的包袱，这是好事。如果上一个项目，花了好几个亿，又没有什么效益，还要进行改造，损失就大了。我看搞项目不要着急，还是看准了一个搞一个，按这个办法搞下去，是会有前途的。

四、加强宏观调控力度，走企业联合发展之路， 避免重复建设

发展汽车要走联合发展的道路，不能各自为政。现在全国各省区市，除西藏外都在搞汽车，但都形成不了批量。从长远讲，中国要有个大的轻型汽车生产厂，或一个轻型车系列生产厂。现在看起来，“五十铃”汽车是柴油车，油耗比较低，比较适合我国农村情况，有发展前途，但现在没有形成批量。我认为，中国轻型车、柴油车要搞联合发展。目前大家都上，这种搞法不行，一定要走联合发展的道路，组建企业集团。实践证明，不是不能联合，只要把利益关系协调好了就可以联合。无非是产值计算在哪个地方，利益如何分配，税收上缴给谁，劳动力如何安排，把这些协调好就行。总起来说，联合起来发挥的效益比不联合要大得多，利多弊少。所以我认为，“江铃”与“庆铃”要联合，组建成一个轻型汽车集团。当前最关键的问题在发动机生产，“江铃”和“庆铃”两家可以联合起来建发动机厂，规模在本世纪末达到20万台，与日本五十铃公司去谈技贸结合，买它的生产许可证和一些关键设备，特别是铸造设备，其他配套设备在国内生产。在你们这里搞这么一个大企业，对带动江西的一些工业发展是有好处的。究竟在哪

里建，这就要比条件，如果发动机厂建在你们这里，也不能让重庆吃亏，那就按照各方投资来分配产值、分配税收、分配利润。这个问题如果不及早协调，变成既成事实后就很难办了。总之，不定在一个地方装配，“江铃”与“庆铃”都分一点，利益均沾。“江铃”、“庆铃”各装配10万台，铸件按照分工规划，统一供应。请中国汽车工业总公司和国务院生产办派人来调查研究这个问题。现在全国加工工业占整个工业的70%，加工能力超过市场需要的一倍。国营企业现在这么困难，是盲目、重复建设引起的，大家都不能满负荷生产。汽车在我国是个特殊产品，但盲目发展，将来后果也是很可怕的。当前无论如何要把汽车生产控制住，不要盲目生产。

五、千方百计吸引人才，加快企业技术进步

吸引人才很重要，江西终究还是比较偏僻一点，如果没有一点优惠政策，人才是引不进来的。对科技人员不重视，经济就无法振兴。现在国家的情况与十年前不一样了。那个时候实行产品包销，现在市场竞争激烈，如果不发挥知识分子作用，科技不与生产结合，搞不出几个拳头产品，工厂根本活不下去。现在不是靠拼体力，要靠科学技术这个第一生产力。企业要注意把资源、市场、技术和管理有机地结合起来；要加强外引内联，走出去、请进来，学习先进的技术和管理；要密切与科研部门的联系，不断开发新产品。企业扭亏主要是两个办法：一是职工分配与企业盈亏挂钩，亏损企业不发奖金，工资总额不能增加，让企业自主经营、自负盈亏；二是抓好技术改造，亏损企业不要一条道走下去，亏了多少年还这样干。这在国外不可想象，谁给你补亏？九江柴油机厂转产开发新产品，效益就出来了，产品也不积压了。现在的问题不是资金不足，明年资金会有很大的增加，但要适当集中。所谓“集中”就是大家在一起“三堂会审”，统筹安排，避免重复建设。项目一定下来，资金就予以保证。我估计这个资金你们用不完，但上什么项目一定要好好研究，提出一批效益好的项目。

六、抓好企业领导班子建设，深化企业改革

企业实行厂长负责制，任免干部就是由厂长提名，经过党政领导班子集体讨论后由厂长任命。厂长要尊重党委的政治核心作用，在任命干部时充分考虑党委的意见。企业的厂长、书记要协调配合，发挥整

体优势，要“两心变一心”。要注意发挥职代会的作用。职代会对中层干部进行民主评议，对干得不好的干部一定要适当调整，取信于民。

七、加强廉政建设，转变干部作风

江西的干部素质比较好，作风比较朴实，工作比较扎实。最近，你们抓清理三角债，抓压缩库存，抓扭亏增盈工作，雷厉风行，抓得比较实，效果比较显著。这种作风应该保持，对促进经济发展是有好处的。我知道江西的一些企业经济效益比较好，揩企业油水的人也比较多，对这个问题一定要严肃处理。干部作风直接影响党和政府与人民群众的关系，干部作风不正，就破坏了党的向心力与凝聚力，这是绝对不能允许的。机构设置要求企业与上面对口，会把企业搞乱，必须精兵简政。一个工厂如果三个人能把它管好，就让三个人去管，为什么非要设那么多机构？有人管这项工作就行了。对企业的评比检查要尽量减少，国务院除了搞一个财务、税收、物价大检查外，其他都不搞，希望你们也不要搞。企业评比先进、产品评优，其中不少是形式主义，还有很多不正之风。产品质量好不好、销不销得出去，要到市场上见高低，让用户去评议。不要开鉴定会，产品鉴定、技术鉴定由检测部门负责。停止企业评比检查，企业普遍欢迎。现在中间环节增加企业负担的弊端实在太多了，像煤矿亏损严重，而煤价并不低，钱都在中间环节流失了。必须进一步整顿好经济秩序，切实加强作风建设。

控制重复建设的关键在银行

(1991年10月29日)

这是朱镕基同志在中国工商银行总行听取工作汇报后的讲话。

现在大家都在研究如何把经济工作真正转到调整结构、提高效益的轨道上来。要想做到真正转轨，不是那么容易。当前经济形势是好的，但存在的问题也是令人忧虑的。企业的负担很沉重，超正常库存七八百亿元，一年付给银行七八十亿元的利息，再加上三角债两三千亿元，也是要付利息的。企业负担沉重，亏损面这么大，这个问题不解决，就转不到提高效益的轨道上来。现在看起来，这里面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多年积累的重复建设、重复生产问题一直没有解决。这不只是十年积累而是几十年积累的问题，是宏观调控方面的问题。现在结构调整虽有成绩，但效果不是很显著。基础设施还很落后，电力建设搞上来了，而石油、煤炭还差得远，越来越落后了；铁道、公路这些交通基础设施虽有很大的发展，但还不适应经济的发展，如果把交通建设搞得更快一点，经济会发展得更好。就是说，现在一方面是钱还不够，但另一方面又把大量的钱用在重复建设上，主要是加工工业摊子铺得太大。我最近去了十几个省，看到的还是在大搞加工工业，而且方兴未艾，其原因就是加工工业赚钱。如果价格不调整，汽车、摩托车不降价，利润这么高，沿海城市搞，内地也要搞，怎么也控制不了。如果再不控制重复建设，盲目发展加工工业，还是一个省搞一个，这样搞下去，宏观经济管不住，微观经济无论如何搞不好、搞不活，效益没办法提高，欠银行的钱也永远还不清。所以，解决这个问题要从两方面着手：一方面，加强宏观调控，改善企业外部经营环境；另一方面，加强企业内部管理。

国务院生产办准备在12月份召开全国企业技术进步工作会议。这次会议非常重要，是转折时期的一次重要会议，要在总结过去企业技术进步工作经验的基础上，克服过去的弊端，发扬过去搞技术改造统一规划的优点，还要有所创新，以便在三年或稍多一点时间里，真正把目前加工工业过大的摊子调整过来。当然，这件事情不是光靠技术改

造能够解决的。现在那些重复建设形成的加工工业生产能力，一些主要产品都是富余三分之一至二分之一，不把一些企业关停并转掉，光靠技术改造也是不行的。现在实行关停并转，无非就是两个问题：一是过去的债务怎么办？二是人员怎么办？要想一点政策鼓励关停并转。最近，一些老同志也讲“不死掉一块，活不了一批”，意思就是要实行关停并转。

技术改造非常重要，现在确实要支持一些技术先进的、有发展前途的、产品有销路的企业搞技术改造，使它们的产品形成大批量，这样一来，其他的小厂就不会再上了。我举一个明显的例子：以前载重汽车生产厂家不知有多少家，但“一汽”、“二汽”形成批量生产以后，成本降下来，载重量为4吨、5吨的汽车就没有人搞了。搞小批量生产无论如何是无利可图的，竞争不过大厂，再搞地方保护主义也不行。现在很多省又都在搞载重量为0.5吨至2吨的轻型车，这样搞不得了，将来这个摊子没法收拾。目前全国光搞“五十铃”柴油轻型车的厂家就有九个，都搞整车组装，这样搞下去，投资不知要浪费多少，到最后大家都活不下去。



1991年10月29曰，朱镕基考察中国工商银行总行。左一为中国工商银行行长张肖。

怎么加强统一规划？我觉得最重要的宏观调控手段就在银行，别的办法说一千道一万，效果都不是那么大。当然，也不是说光靠银行一家。比如财政贴息，支持一些该支持的企业；实行一点差别利率，这也是一个重要的调控手段。还有一些别的宏观调控手段，但最重要的宏观调控手段还在银行。所以，这次开全国企业技术进步工作会议，一方面很注意跟各个行业管理部门商量，把行业规划做好，但是行业规划能不能实施，关键是在银行；另一方面，我们非常重视国务院生产办与银行特别是工商银行的合作，因为技术改造的贷款主要来自工商银行。今天我来也就是为这个目的。要想一个办法，制止目前这种盲目的、重复的加工工业建设，有些产品就是要开名单，停止审批。另外，要拿出一些重点项目来，用三年或者更多一点时间，集中力

量，支持它们形成批量生产。在几个重点行业、重点项目、重点技术领域，集中给予支持。一定要在一年到三年以内把那些该支持的、成批量的大项目都保住，把那些盲目生产的项目压住。整个技改工作都要根据这么个精神去搞，真正形成技术先进、大批量、成本很低、效益很好的项目，全国几个重点行业都分别搞一两个项目就够了，要形成规模经济，分布到各个省份都有它的拳头产品，改变都搞“小而全”、“大而全”，搞盲目建设、重复建设的局面。

重大技术装备国产化最重要的是质量

(1991年10月30日)

1991年10月30日，朱镕基同志主持召开会议，听取国务院重大技术装备领导小组办公室工作汇报。这是朱镕基同志在听取汇报后讲话的主要部分。

对重大技术装备工作，我是很重视的。听了你们的汇报，总的看，国务院重大办的工作是很有成绩的，大家做了很多工作，重大技术装备国产化有了一套办法，工作进展是正常的。下一步是研究如何改进、提高和发展。今天，我主要想谈几点希望，也就是要强调几点：

一、重大技术装备国产化最重要的是质量

重大技术装备国产化工作，最重要的是质量。什么是质量？产品要达到国际标准，最好是达到国际先进标准，达不到这一点就没有前途。质量问题相当复杂，涉及的环节很多，不允许凑合，不能有半点含糊，主要领导同志非下决心不可。对质量问题，不仅要下决心抓，还要下本钱，要常抓不懈。

现在国际市场的竞争非常激烈，要求我们一定要把质量搞上去。首先，我国是对外开放的国家，不能自我封闭。我们要参与国际竞争，各单位、各地区对进口设备，不能简单地用行政办法去卡。主要是要按经济规律办事。你的设备质量不行，怎么能压用户去买你的呢？设备质量上不去，就很难推广应用。其次，为加速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我们需要大量利用国外贷款，外国政府贷款的主要条件就是卖设备，各种金融组织贷款的目的之一也是出口设备。最后，还有个国际贸易逆差问题，西方国家对我国的贸易逆差较大，我们不进口他们的东西是不行的。我国的外汇储备到今年年底可达210亿美元，越来越多，不进口人家的东西，对外生意就做不成。消费品可以不进口，设备总是要进口的，因此国产设备将遇到强大的竞争，尤其是重大技术装备。同志们一定要看到这个竞争的形势，在抓国产化时要把质量搞好。

对于质量问题，我们一定要立足于高标准、严要求。要做一种设备，不做则已，一做就要做好。我们搞重大技术装备的国产化，都是瞄准国际先进的关键产品，要十分重视引进技术；要组织国内的技术力量，消化、吸收引进的技术，引进不了的要抓紧组织技术攻关。问题是现在时间紧迫，需要抢时间，从技术开发到形成成果，然后组织批量生产，有一个相当长的过程。我们要非常重视把技术引进、技术开发和技术改造很好地结合起来，以加速重大技术装备研制企业的技术进步。

我很欣赏“三全”的提法：全权、全套、全过程。抓重大技术装备的国产化，就需要进行全套、全过程管理。不仅要抓质量，还要抓交货期和配套。设备交货拖期，是非常令人头痛的，会影响整个工程建设工期。如果不能按时交货，用户就没有办法采用你的设备。国内设备配套差，配套设备的质量和交货期一样影响工程建设。昨天《解放日报》报道，据上海煤气厂设备质量调查统计，只有30%合格，40%修整后能凑合用，30%根本不能用。这真是气死人！我在上海抓了几项工程，有相当一批配套设备的质量不好，特别是风机、泵、阀门，有的根本没有做好，有的叶片都装反了。机电产品的质量怎么会搞到这种程度！配套问题不解决，就很难发挥成套设备的作用，单是主体设备是推广应用不了的。因此，抓重大技术装备国产化，一定要高标准、严要求，要抓质量，包括交货期和配套，要全权、全套、全过程一起抓。

二、重大技术装备国产化要有依托工程

重大技术装备研制工作，一定要瞄准国民经济建设中大量需要的设备进行国产化，必须有一个依托工程；否则，研制和技术引进工作无法进行，也搞得慢，搞出来又没有人使用。设备制造厂和设备研制工作最好是一开始就参与工程建设，设备研制工作围绕工程建设进行，研制与工程相结合的原则一定要坚持。泛泛地进行设备研制是不行的。

12项重大技术装备项目中，目前要集中力量抓乙烯、化肥设备国产化。现在是乙烯热，各地都要上乙烯工程，已经批了16套小乙烯，如果都搞上去是不得了的。16套小乙烯工程的投资大得不得了，至少要960亿元。对这种年产11.5万吨的小乙烯我很担心，一是投资大、成本

高、能耗大，将来要背沉重的包袱。二是市场有没有这么大？三是资源也是个问题。有的项目，气源就不够嘛！国内恰恰是乙烯的后加工设备不能国产化，16套乙烯设备全进口不得了，如何成套地自己生产乙烯设备是个问题。国务院重大办要赶快抓乙烯设备的国产化，不然堵不住大量进口。请你们考虑把北京燕山石化、上海金山石化的两套改造工程项目作为依托工程，组织实现设备国产化。对已批准可行性报告的乙烯项目进行一次调查，掌握对外已签约的情况，组织搞合作制造、合作生产。



1994年10月28日，朱镕基考察燕山石化公司化工一厂，祝贺30万吨乙烯装置改扩建成45万吨获得成功。前排右三为中国石化总公司总经理盛华仁。

关于30万吨合成氨、52万吨尿素的大化肥工程，几年前就讲16套是最后一批成套进口，现在看来“最后一套”没个完，不能这样。要搞出一个国产化样板，达到国际标准，就不再全套进口了。大化肥必须安排一个国产化依托工程，这次要下决心把它搞上去。洞庭、龙庆两个项目可以这样考虑，你们打个报告给国家计委，把设备费用与一部分外

汇从基本建设投资中预拨出来，给制造部门预先安排设备制造。进口必要的原材料和部分国内目前制造不了的设备零部件，需要引进技术及制造厂的相应改造包括添置加工设备所需的外汇，由国务院生产办解决相应的外汇额度，关键是投资预拨要尽快组织落实。国务院重大办要重点抓好乙烯、化肥装备国产化，这是重中之重，依托工程要抓紧从各方面去落实。

此外，沙漠石油和海上石油设备的问题很大。沙漠石油开发的风险很大，海上石油开发还是有希望的，它们对石油设备的要求都很高，需要当做重点来抓。

三、统筹安排制造与使用部门共同攻关，发挥各自的优势

机电制造系统在制造方面是肯定有优势的；而使用部门熟悉工艺，在工艺方面有优势。搞重大技术装备国产化，就是要发挥制造和使用部门两个方面的积极性，协调好两方面的矛盾，把两个制造体系统一组织起来，发挥各自的优势。从一开始就要统筹安排，两边兼顾，都要承担一定的任务，这有利于推动重大技术装备国产化工作。

四、充分利用好国家拨款这一手段

重大技术装备国产化要全权、全套、全过程地进行管理，就要有手段，要充分利用好国家拨款这一手段。你们每年有6000万元的国家拨款，这是个很硬的手段。看来，管理方式需要改变一下，拨款往往花钱很多、效益较差。把拨款改成贴息贷款的方式，6000万元可以办6亿元的事。这样，可以办的事就多得多了。研制项目都有依托工程，应该都能偿还贷款，真正偿还不了的研制项目是极少数的。拨款改为贴息，6亿元贷款，一年贴息大数约6000万元。我想不是一下子就改过来，是不是先改一部分。可以与国务院生产办商量，用两个亿的专项贷款，由国务院重大办安排设备研制项目并负责贴息。此事要与国家计委和财政部商量一下。所安排的设备研制以及技术引进项目要与技术改造结合起来，国务院重大办统一组织实施。你们先与各方面协商，目的是要把这批经费用好，提高工作效率。希望这些想法明年就开始实施，争取在今年12月份召开的全国企业技术进步工作会议上进行安排。

机关要为基层办实事

(1991年11月13日)

1991年11月8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信访局《来信摘要》反映，全国人大代表、河北省黄骅市大麻电路板厂厂长温永和，沧州地区经济委员会干部高金楼联名致信朱镕基同志，反映机械电子工业部机关办事难。该厂在1987年经国家批准引进一条电路板生产线，当时只引进了2台数控钻床，现急需再引进4台，从1991年8月8日开始，先后到机电部多个部门办理审批手续，耗时20多天尚未最后落实。为此，他们提出三条建议，希望机电部机关改进机关作风和提高工作效率。这是朱镕基同志在《来信摘要》上的批语。

何光远①同志：

① 何光举，当时任机械电子工业部部长。

是否可以改进一下审批工作方法，对外只有一个窗口，限定审批时间，例如十天。对内由这个窗口单位负责联系、协商、决策，不要让下面来的同志从这个处跑到那个处。总之，机关要为基层同志办实事，急企业之所急。

此件复印送生产办、审查办①负责同志阅研并举一反三。

① 生产办、审查办，分别指国务院生产办公室、国务院机电设备进口审查办公室。

朱镕基

11.13

关于搞好国营大中型企业的几个问题

(1991年12月20日)

1991年12月20日至22日，国务阵生产办公室会同国家计划委员会、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和中国工商银行在北京召开全国企业技术进步工作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人民政府有关负责同志，经济委员会(计划经济委员会、生产委员会)、财政厅、人民银行分行、工商银行分行负责同志，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这是朱镕基同志在会上讲话的一部分，曾发表于《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册。编入本书时，对个别文字作了订正。

今年9月份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着重讨论了搞好国营大中型企业的问题。江泽民同志在会上指出：“进一步搞好国营大中型企业，不仅是经济问题，而且是政治问题。”“今后我们要集中力量切实搞好国营大中型企业，使其更好地发挥在国民经济中的主导作用。”“要把经济工作真正转移到调整结构和提高效益的轨道上来，体现速度和效益的统一。”①李鹏同志指出：“增强国营大中型企业活力，除改善外部条件外，从企业来说，更重要的是通过进一步深化改革，转换经营机制，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加强企业管理，促进技术进步。”②当前的工业交通工作，要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工作会议和党的十三届八中全会的精神，大力调整结构，推进技术进步，转换经营机制，加强企业管理，达到提高经济效益的目的。这不仅是明年，也是整个“八五”时期工业交通工作的指导思想。

① 见江泽民《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册，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700、1701页)。

② 见李鹏《关于当前经济形势和进一步槁活国营大中型企业的问题》(《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册，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693页)。

一、大力调整结构

经过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和近三年的治理整顿，我国的国民经济有了较大的发展。农业和工业之间、农轻重之间的比例有了相当的改善，但是经济工作中有一些深层次问题还没有解决。经济结构不合理是其中的主要问题之一。就工业内部结构来说，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产业结构“有长有短”。从总体上说，一般加工工业长，基础工业短，加工工业的生产能力超过了能源、原材料和交通运输等基础产业的承受能力，大多数也超过了市场的需求。

——产品结构“又多又少”。原来产品结构单一的状况有所改善，但是，一般性的轻纺、家电、耐用消费品多，严重积压；而投资类产品中的“五高二低”(高技术含量、高市场容量、高附加值、高创汇、高效益，低能耗、低物耗)产品十分短缺，挡不住大量进口。

——企业组织结构“一散二肿”。“大而全”、“小而全”的状况没有大的改变，专业化、社会化程度低，不能形成规模效益；机构臃肿，人浮于事，劳动生产率低，管理水平落后。

——地区产业结构“走势趋同”。由于价格体系没有理顺，宏观调控不力，大多数地区发展基础产业的积极性不高，而加工工业进一步膨胀，在同一技术水平上重复建设、重复引进，导致投资效益差、产品积压、企业亏损。

形成工业内部结构不合理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是长期遗留下来的问题，像技术落后、价格扭曲等；有的是改革开放以来出现的新问题。三年治理整顿取得很大的成绩，主要目标基本实现，但多年积累下来的深层次问题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急于求成导致宏观失控、结构失衡的历史教训尚未引起足够重视。争投资、上热点项目的势头还在兴起。旧账未清，新债又起，我们面临新一轮重复建设的危险。必须下定决心，采取有力措施，坚决刹住这一势头。

企业是国民经济的细胞，是各种结构的载体。国营大中型企业又是企业中负担最重的部分，成为矛盾的焦点。宏观管不好，微观活不了，再不抓紧结构调整，国营大中型企业很难克服面临的困难、发挥它在国民经济中的主导作用。

目前总供给与总需求基本平衡，正是调整结构的好时机。机不可失，不能再徘徊不前、等待观望了。

结构怎么调整？总的来讲，大的产业结构的调整要靠基本建设投资的倾斜。但是，几十年的经验告诉我们，单靠基建投资倾斜是不够的，必须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实行三个结合。

一是实行计划经济和市场调节相结合。 要把这两方面的优点很好地结合起来，既要加强宏观调控，又要充分发挥市场调节的作用。

现在，我国的经济运行机制已经由单一的计划经济转向计划经济和市场调节相结合。地方财政包干，分灶吃饭，使地方政府的权限扩大，中央政府的调控能力减弱，利益目标多元化，贷款资金渠道很多，资金分散，项目分散。在这种情况下，管理经济的办法必须适应客观形势的变化而有所改进。指令性计划、项目审批制度等各种行政手段还是要用的，但是其作用和效果越来越有限，用得不好，常常发生负效应。在新的形势下，国务院各部门更主要的是要学习运用各种经济杠杆等，实行行业管理和宏观调控。

国家计委、国务院生产办和工交各部门要密切掌握并及时发布主要工业产品的国内外市场信息、生产现状、发展动态，使各部门、各地区的负责同志和企业领导能及时了解经济全局和市场变化，减少盲目性。

有关部门要认真研究制定具体的产业政策，包括技术政策和技术装备政策，指导企业的技术发展方向。

行业管理部门要把产业政策落实到项目规划，要发挥地区优势，防止地区产业结构趋同化。



1991年7月9日，朱镕基在山东省考察青岛电冰箱总厂。前排左一为青岛市市长俞正声。

部门规划只能是指导性的，因此，必须通过政策倾斜，包括财政政策、税收政策、金融政策、价格政策、外贸政策等，来影响地区、企业的投资方向，保证国家重点支持项目的建成。国家对应该支持的行业只要认真支持，真正搞好一两个技术先进、批量大、成本低、效益高的项目，就会有利于避免重复建设。“一汽”、“二汽”的载重汽车搞起来以后，原来抢着上的中型载重汽车工厂基本上都关门了。现在的汽车热，是轻型汽车热、微型汽车热。如果一开始就下决心及时建成一个年产20万辆的轻型汽车厂，汽车热就不会像现在这么厉害了。

要加强经济立法，运用法律手段进行调控。目前重复建设的主要原因，是没有建立一个合理的、能对投资行为负责的投资机制。今后要抓紧从法制上建立起投资责任制，改变投资行为与责任脱节、政府为企业的投资行为承担责任、银行为企业承担投资风险、国家为银行承

担经济后果的状况。这种状况不改变，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机制就无法完善。

二是实行中央和地方两级调控相结合。 搞好结构调整，一定要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发扬大力协同、合作办事的好传统。国务院有关部门要按照有计划、按比例的经济规律，运用综合平衡的办法，充分发挥市场调节的作用，在深化改革的基础上，切实加强国民经济的宏观调控。各级地方政府要在全国一盘棋的前提下，既要发挥积极性，也要加强本地区的宏观调控。要认真研究自己的地区优势，制定经济战略、发展方针、主攻重点，做到心中有数。要有一批项目储备，不断进行科学论证和可行性研究，随时准备修正和补充。否则，盲目地看行情、赶浪头，根本无法进行宏观调控，只会永远被动。各地对自己的财政、信贷、外汇、物资、重要的原材料、运输能力等要综合平衡，不能不管平衡一味地争项目，把缺口和风险留给中央。

今后国家安排的项目，主要放在技术难度高，大家都想搞，而分散搞又不能形成规模效益的大项目上。地方能办到的、近期效益好的项目，尽可能发挥地方的积极性，根据各自的特点去安排，只要项目是建立在充分研究预测国内外市场的基础上，不是一哄而上的，国家就不要去过多地干预。有些品种多、花色新、适合较小规模生产的产品，由小企业生产，紧密结合市场需要，效果可能更好。

要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通过两级调控，既符合地区特点和资源优势，又符合宏观合理的生产力优化布局，力求使每个省区市都有一些可以引以自豪的、具有地方特色和一定经济规模的重点项目和拳头产品。

三是实行存量调整和增量调整相结合。 调整结构工作的难度很大，尤其是存量调整，难度更大，但不调不行。对存量调整和增量调整要用不同的方法，并把二者有机地结合起来。

存量的调整，主要是对那些生产能力过剩、产成品严重积压、长期亏损的企业，实行关停并转。由经营管理好、有发展前途的企业兼并产品积压、长期亏损的企业，是各地行之有效的办法。这里，一要解决债务政策，二要解决人员安置政策，解决得好就能大大推进企业兼并或联合。

实行关停并转，调整工业内部结构，要和产业结构的调整结合起来。现在加工工业过度膨胀，冗员过多，包袱太重；另一方面，第三产业很不发达。如果能把一部分加工工业人员有组织地转向第三产业，不但有利于工业轻装上阵，流通领域获得新鲜血液，也有利于工商企业改善经营状况，提高职工收入。为此，有关部门要研究对业人员实行适当的政策优惠，主要是转业期间税收和劳动政策的优惠。

实行关停并转，要尽可能少关停，多并转。但是对少数长期经营性亏损、扭亏无望的企业，不关停也是不行的。今年国务院发布了一个文件，要求各省区市选十个左右企业进行关停试点，许多省市都进行了这项工作，效果不错。

多数企业调整结构工作的重点，主要是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开展群众性的合理化建议活动，从小改小革入手，推广新技术，革新工艺，更新设备，转产新产品，这是调整存量的又快又省的办法。

增量的调整，一定要实行项目投资和银行贷款两个集中，防止重复建设、重复引进。投资要划分为续建项目和新开项目两部分。对于续建项目，在资金安排上要作具体分析。第一，对于那些符合产业政策、技术先进、产品销路好、效益显著的，资金一定要打足，不要留缺口。要促其尽快建成投产，及早发挥效益。第二，对于那些市场销路看不准、效益不显著的项目，资金安排比例要低一些。第三，对于那些不符合产业政策、产品又无销路的项目，要坚决停止安排贷款。对于新开项目，一定要坚持择优定点，提倡实行招标，鼓励和组织跨地区、跨部门的联合投资。只要把产值、产品、利润、税收、劳动就业等都按投资比例进行分配，把各方面的关系协调好，并在法律上给予保障，各地区、各部门就会赞成联合起来进行投资，组织跨地区、跨部门的企业集团，发挥集团优势，实现规模效益。

二、推进技术进步

江泽民同志指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们必须下工夫调整结构和提高效益，把扩大再生产的童点放在技术改造上，而不能主要靠铺新摊子。”①这是历史经验的总结。为了调整结构，在加强宏观调控的工作中，特别要注意调整基本建设与技术改造之间的比例。要紧紧围绕企业的技术进步，增加企业的技术投入和产品的技术含量，在技术

改造和技术开发上做文章。根据多年的经验，要搞好企业技术进步，必须处理好三个方面的关系。

---

① 见江泽民《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册，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701页)。

(一) 内涵与外延的关系。

在扩大再生产的问题上，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央反复强调以内涵为主的方针，这是符合马克思主义观点的。但是一些地方和部门仍然热衷于建新企业，铺新摊子，忽视老企业的改造，结果摊子越铺越大，而效益却越来越低。这次中央工作会议重申这个历史经验是非常重要的。

对于基础产业、基础设施来说，扩大能力，实现产业结构调整，主要应该依靠基本建设。但是对于绝大多数工业部门来说，对老企业进行技术改造，可以收到投资省、见效快、效益高的效果。老企业搞改造，不但许多“硬件”如厂房、设备和辅助设施可以利用，还有许多“软件”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如企业管理经验、工程技术人员和职工的素质、现有的销售渠道和售后服务体系等，这是老企业的优势所在。即使在老厂建新车间，安装新设备，也比铺新摊子要快、要好、要省。燕山石化公司在现有30万吨乙烯的基础上进行技术改造，可以增加15万吨生产能力，比新建项目投资节省30%左右，时间缩短一半，效益提高一倍以上，能耗降低三分之一。明年要把燕山石化的改造作为一个重大项目来支持，两年半改造完。这对其他4个30万吨乙烯工厂的改造是有指导意义的。

热点项目一定不能到处布点，一哄而上，争原材料，争市场，搞得大家都不死不活，效益很低，到头来还得调整，造成极大的浪费。现在热点很多，比如录像机，是一个新的热点。目前已有11个装配厂，不能再上了。如果由国家和有关省市集资，搞一个录像机零部件系列的集团公司，包下全国的录像机零部件生产，形成规模经济，就可以大幅度降低零部件价格。这样做，对国家、对有关省市、对企业、对用户都有利，还能以价格优势进入国际市场。联合起来发挥的效益比不联合要大得多。这样不但少铺了新摊子，而且收拢了旧摊子，对加

工工业的调整、改造是十分重要的。当然，我们更加反对以技术改造为名，实际上去搞新的基建项目。这会损害现有企业的后劲，是得不偿失的。

(二) 企业技术进步中各项工作的关系。

企业技术进步工作包括很多方面，主要是技术开发、技术引进、技术改造和群众性的技术革新等。要把技术开发和技术引进紧密结合起来，在开发的基础上引进，在引进的基础上创新，用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绝不能复制“古董”，在低水平上重复。

改革开放以来，根据邓小平同志关于利用外资、引进技术，改造现有企业要成千上万项地搞起来的指示，通过各种渠道和方式，积极引进和吸收国外比较成熟的先进技术成果，大幅度地提高了许多企业和行业的技术水平。这是我国企业技术进步工作的一个主要特点。目前，随着国际形势的风云变幻，引进国外先进技术的难度增加了。国务院提出，明年要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我们要继续做好引进技术、加强老企业技术改造这项重要工作。

科技研究与开发工作，世界上许多国家都把它放到重要地位。对它投入的多少，决定国家的科技水平，影响国家的综合国力。为了促进企业与院、所结合，加强技术开发，我们支持化工部进行在企业集团中建立技术研究中心的试点。有条件的企业集团经过主管部门批准，可以进行试点。各部门、地区、企业也要采取措施，鼓励多种形式的厂所结合、厂校结合，并且尽可能地挤出一些钱来，加强研究开发工作。

加快国内的科研成果转化为生产力，在目前显得更加重要、更加紧迫。解决这个问题要“两头热”。首先企业要热，要高度重视技术进步，要看到这是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关键。产品和技术不更新，企业哪来效益？现在有些同志只看到鼻子下面的一点点东西，急功近利，缺乏开拓进取精神，不在技术进步上下工夫，一“等” 二“靠”，躺在国家身上，企业怎么能搞好呢？我们的企业家要有远大的眼光，主动去和科研院所、高等院校的专家、教授交知心朋友，加强合作与交流，加强科研与生产的结合。同时，科研单位、大专院校也要热，要动员更多的科技工作者，主动投身到国营大中型企业这个科研工作的主战场上来。

动员广大职工，发扬主人翁精神，广泛开展群众性的技术革新活动，这是我们的优良传统。在目前许多产品陈旧、滞销的情况下，更要特别强调眼睛向内，挖掘潜力，适应市场，进行小改小革，加强产品设计，多搞“点子产品”，扩大产品销路。一些身价平平、结构也不复杂的日用品，如果设计稍加改进，赋予它新的功能，可能开拓一个新的市场。有个企业在薄薄的名片盒上，加了一个圆钮，用时只需轻轻向上一推，一张名片就从盒子的一端冒出来，比打开盒子一张张地去捻方便多了。其实，里边只加了一个弹簧片。这种“点子产品”并非高难技术产品，无须花费巨额投资，效益还来得快。这也是一个企业素质和机制的问题，是企业是否认真依靠市场、面向消费者的问题。

总之，要推进企业技术进步，需要处理好各方面的关系。我们曾总结出一套经验，特别强调了要处理好技术引进与自主开发的关系，引进、开发与技术改造的关系，引进与消化吸收、国产化的关系，科研与生产的关系，重点技术改造与群众性技术革新活动的关系，以及一条龙的工作方法等等。这些经验，对今后继续处理好企业技术进步中各项工作的关系，把企业技术进步推向一个新台阶，仍然具有指导意义。

(三) 集中与分散的关系。

现在有些部门在项目安排上还是包揽过多，对一些不该支持的项目也支持、许愿，甚至搞人情项目，必然导致重复建设，火上浇油，遍地开花，后果堪忧。要加强宏观调控，做到两个集中：第一，提高国家集中安排的专项贷款的比重，减少一般贷款的比重；第二，行业主管部门要集中力量保重点，不要撒胡椒面。实行两个集中的目的，就是希望能有一批企业形成与国外同行业相接近的经济规模，在国内市场上有很强的竞争力，在国际市场上站稳脚跟，成为有世界水平的企业或企业集团，为国家作出更大贡献。

处理好集中与分散的关系，需要对项目审批作一点改革。技改项目的审批，仍按国务院规定的审批权限进行，限额以上技改项目在行业主管部门审查的基础上，由国务院生产办审批，国家计委会签；限额以下技改项目按企业隶属关系由部门和地方自行审批。对于长线产品和热点产品项目如何控制，国家计委和国务院生产办将另行制定新的

办法。在新办法颁发前，停止一切长线产品和热点项目的审批，银行不予贷款。

明年的技术改造专项贷款，各部门已按计划做了安排。专项贷款总额度达不到今年计划水平的省区市，我们将给以补足，项目由省区市补充安排。但是，第一不能搞热点项目，第二要报各行业主管部门备案，补充项目由国务院生产办征求各部门意见后会同银行统一下达。这样安排以后，剩下的技改专项贷款指标，会后我们要请各行业主管部门牵头，会同有关综合部门、各省区市、中国国际工程咨询公司一起，认真深入地研究安排一些新的国家重点项目，进行增量调整。要用这笔钱干几件大事，要上一些真正对调整结构有决定意义的项目。

三、转换经营机制

去年第四季度以来，随着工业生产的回升，经济效益下降趋势逐步减缓，但经济效益不高的局面没有明显改观。今年11月底，全国预算内国营工业企业产成品资金占用比上年同期增长2.4%；1月至11月实现利润比上年同期下降6.1%；企业亏损面由1990年年底的31%，扩大到1991年11月底的34%；1月至11月亏损额比1990年同期增长10.8%。企业经济效益不高，严重制约着国民经济的发展，增加了财政的困难。扭转这种状况，已经刻不容缓。

怎样才能提高企业经济效益？ 一方面要努力改善企业的外部经营环境。党中央、国务院已经制定了十二条政策措施①，在财政比较困难的情况下，迈出了比较大的步子，很不容易了，各地正在贯彻落实。另一方面，现在需要企业作出更大的努力，迅速转换企业经营机制，这是搞好国营大中型企业的根本。

---

① 十二条政策措施，指1991年9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为搞好国营大中型企业创造良好外部条件，决定采取的十二条措施。

这些年来，各地在企业改革方面做了大量工作，比较普遍地实行了承包经营责任制，同时进行了许多有益的探索，企业的活力开始有所增强。但是同改革的目标相比，就是说，要在发展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中，使企业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社会主义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具有自我发展和自我约束的能力，还有很大的距离。

搞好企业，关键在企业自身。内部机制不转换，企业躺在国家身上，职工躺在企业身上，捧“铁饭碗”，吃“大锅饭”，外部环境再好也没有用。干部、职工的积极性调动不起来，企业缺乏追求技术进步、追求经济效益的内在动力和压力，潜力挖不出来，企业的效益怎么能提高呢！现在，相当大比例的国营企业亏损或者是濒于亏损。更为严重的是，有许多企业，问题不只是亏损，而是坐吃山空。不少企业该提的折旧费和新产品开发基金没有按国家规定提足用好，实际上是吃了老本。亏损了，职工奖金照发；企业办糟了，厂长易地做官；产品积压，工厂照样生产；任务不足，一个人也不精减；企业内部奖罚不明，干多干少、干好干坏一个样。这些都是属于机制方面的问题。这些问题不解决，企业效益不可能提高，有些企业死水一潭的局面也不可能改观。本来嘛，企业经营不善，亏损了，就不能发奖金；继续亏损，还要降低干部、职工的工资；资不抵债，企业就得关门。不建立这样的机制，你着急，他不着急，企业怎么能搞得好！不久前我到徐州考察，很受启发。徐州市在贯彻搞好国营大中型企业的二十条政策措施①时，突出抓了企业内部分配、人事、劳动制度的改革。如规定经营性亏损企业的主要负责人在本企业扭亏为盈前，不得易地按原职级安排工作；对长期扭亏不力的厂长就地免职或降级使用，目前已有32名正副厂长被免职、降职；对21名连续亏损三个月的企业领导干部下浮一级工资；对23个连续亏损六个月的企业，全体干部、职工下浮一级工资；对20多户产品积压、管理混乱的企业实行停产整顿；对两户资不抵债的企业实施破产；一些企业还实行了领导干部聘任制，工人上岗经过考核，拉开了分配档次。采取这些措施以后，亏损企业干部、职工的精神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吃“大锅饭”的观念有所转变，企业的生产经营状况开始好转。

---

① 二十条政策措施，指李鹏同志在1991年9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提出的，为增强国营大中型企业活力、提高国营大中型企业效益而采取的二十条措施。

现在有些地方什么都不敢动，关停并转不敢动，不称职的企业领导班子不敢动，工人奖金不敢动。企业亏损了，奖金照发，没有钱发奖金从银行借贷也要发。我们要巩固当前政治、社会稳定的好形势，但

是，对于稳定也要有辩证的理解、积极的态度。徐州市的经验说明，加大改革力度，转换经营机制，加强内部管理，从严治厂，是人心所向。这个问题关系到工人阶级的切身利益，只要领导干部以身作则，和职工同甘共苦，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切实做好思想政治工作，完善配套政策，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做好待业培训，妥善安排职工生活和转业工作，这样即使关停并转，也不会影响稳定，还会促进企业经营机制的转变，提高经济效益，真正地稳定社会，巩固社会主义制度。

现在各地都有一批经营机制转换比较成功、生产经营比较好的企业。例如，上海第二纺织机械厂有个好的领导班子，拥有比较充分的经营自主权。在职工收入分配上实行“企业自主、国家征税”的办法，工资、奖金、补贴等全部纳入工资总额，计入成本。在劳动制度上实行全员合同制，全厂4800名职工绝大部分和工厂签了劳动合同，三年内辞退了166名职工，免了两个副厂长的职。为搞技术改造，提高了固定资产折旧率和新产品开发基金提取率。他们深化改革，从严治厂，科技兴厂，效果显著。1988年到1990年，上缴税金年平均递增20%以上；1991年出口创汇可达2000万美元；1990年人均收入4026元，实际工资总额年均增长4.49%，大大低于年均全员劳动生产率增长9.25%的幅度。

上海第二纺织机械厂的经验告诉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的、充满生机与活力的社会主义企业，第一靠深化改革，转换企业经营机制，调动广大职工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激发工人阶级的主人翁首创精神；第二靠转换机制基础上的科学管理，从严治厂，正确规范社会主义企业中的人与物、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第三，归根到底还得靠技术进步，只有技术进步，才能大大提高经济效益，发挥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总之，要通过调整结构，推动技术进步，转换经营机制，加强企业管理，使国营大中型企业充满活力，提高经济效益，真正发挥国营大中型企业在国民经济中的主导作用。

关于组织“中国质量万里行”活动的批语

(1991年12月21日)

这是朱镕基同志在国务院生产办公室草拟的《关于组织“中国质量万里行”系列新闻宣传活动的实施方案》上的批语。

维臣①、育理②并艾丰③同志：

① 维臣，即赵维臣，当时任国务院生产办公室副主任。

② 育理，即朱育理，当时任国务院生产办公室副主任兼国家技术监督局局长。

③ 艾丰，当时任人民日报社经济部主任。

原则同意组织此项活动。建议：

一、发挥新闻监督、群众监督的作用，政府部门不参加组织委员会，可请艾丰同志担任主任，请质量管理协会、中国消费者协会并国家技术监督局一位副局长担任副主任即可(群众组织负责人可保留)。

二、不要组织声势浩大的集中采访活动，以分散私访，事先不做准备为好，这样才能发现问题。

三、目前质量问题很不令人满意。正面报道真正好的典型是必要的，但更多的要揭露问题，否则脱离群众。

四、谢绝地方一切招待吃请，严格防止给企业摊派活动经费，认真注意不增加企业负担，真正贯彻中央关于搞好大中型企业的精神。

五、经商财政部同意，补助活动经费30万元，从增加国家质量监督抽查经费中拨给。

妥否，请酌。

朱镕基

关于组织“中国质量万里行”系列新闻宣传活动的实施方案

为了更好地总结与宣传全国开展“质量、品种、效益年”活动的情况，报道先进典型，传播新鲜经验，同时揭露质量差的典型，狠抓质量意识的培养，造成一种重视质量的舆论声势，人民日报经济部与中国新闻文化促进会倡议组织“中国质量万里行”系列新闻宣传活动，为中央和国务院总结“质量、品种、效益年”的活动和召开全国质量工作会议，做好宣传工作。

一、主办单位

“中国质量万里行”系列新闻宣传活动的主办单位共11家：国务院生产办公室、国务院“质量、品种、效益年”活动领导小组办公室、国家技术监督局、中国工业经济协会、中国质量管理协会、人民日报、新华社、经济日报、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新闻文化促进会。

二、组织领导

成立“中国质量万里行”活动组织委员会

名誉主任

薄一波　　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副主任

总顾问

吕　东　　中顾委委员、中国工业经济协会会长

宋季文　　中国质量管理协会理事长

徐志坚　　国务院副秘书长

主　　任

赵维臣　　国务院生产办副主任

副主任

维昆、育才并艾丰同志：

原则同意组织此项活动。建议：

一、发挥新闻舆论监督的作用，政府部门不参加组织委员会，可请艾丰同志担任主任，请质量管理协会、中国消费者协会并国家技术监督局一位副局长担任副主任即可（具体组织工作人员可保留）。

二、不要组织声势浩大的集中采访活动，以分散采访、事先不作通知为好，这样才能发现问题。

三、目前质量问题很不令人满意。正面报导先进的典型是必要的，但更多的要揭露问题，否则无益解决。

四、谢绝地方一切招待吃请，严格限制随行报道活动经费，不增加企业负担，真正贯彻（认真落实）中央关于搞好廉政建设的精神。

五、经商财政部同意，补助活动经费30万元，从增加的国家质量监督抽查经费中拨给。

妥否，请酌。

朱镕基 12.21

大力调整工业内部结构

(1991年12月25日)

1991年12月25日至29日，中国石油化工总公司在北京召开第九次经理(厂长)会议。这是朱镕基同志在会议开幕时讲话的主要部分。

根据中央工作会议精神，搞好国营大中型企业的关键是抓好调整结构。结构再不调整，企业是搞不活的。我不是谈整个国民经济结构问题，应该说，我们的改革、整顿取得了很大成绩，特别是农业和工业、农轻重之间大的方面的比例关系有了很大改善。我这里讲的是工业内部结构。对这个内部结构，大家都很清楚，基础设施很薄弱，铁路、交通、原材料、能源、矿山都满足不了需要。加工工业的绝大多数产品供大于求，可以开个很长的单子，看了以后非常惊人。重复建设、重复引进方兴未艾，这个问题一直没有解决，可怕就可怕在这个地方，这个历史教训一定要认真吸取。还有一个问题是急于求成，急于求成的结果是宏观失控，宏观失控导致结构失衡，结构失衡导致供需失调，供需失调最后就导致国营大中型企业亏损，形成一个恶性循环。这个问题也要引起高度重视，抓紧进行解决。



1991年12月25日，朱镕基在中国石化总公司第九次经理(厂长)会议上讲话。右为国家体改委主任陈锦华。

现在，又出现了一些热点，如乙烯、聚酯、涤纶、录像机、空调机，热得不得了。中国有2600多个汽车厂，其中装配整车的550多个，生产零部件的2000多个。这样下去行吗？现在一辆“奥迪”汽车卖27万元，还要交现钱，相当于5万美元，这种车在国际市场上大概只卖1万多美元。国内市场这种价格能维持长久吗？现在为什么那么多走私车进来？因为走私车便宜。将来我国恢复了在关贸总协定中的缔约国地位，这种扭曲的价格都要降下来，不能根据这种错误的价格信息搞热点项目。为什么大家热衷于搞乙烯、搞聚酯呢？也是因为能赚钱！现在国内的石油价格低，1吨平价油是204元、高价油是500多元，国际价格每吨折合人民币800多元，还得拿外汇去买。我国的价格改革一定要进行，一定向国际市场靠拢。我们一参加关贸总协定，外国价格便宜的产品就会进来，不让它进来是不行的。将来的关税顶不住，审批也顶不住，什么都顶不住，就得靠我们自己产品的竞争能力，才能顶

住。现在这样搞下去，有什么竞争力呢？搞个年产11.5万吨的乙烯，将来有什么竞争能力呢？所以我跟一些同志商量，根据中央工作会议的精神，要把这个热点抑制下去。怎么抑制呢？提倡联合投资，同时运用宏观调控手段，严格禁止热点项目上马。恐怕其他手段不太多了，审批没多少用处，你不批，他也照样干。建设乙烯本应先经过国务院机电设备进口审查办公室，要审查之后才能签合同，但实际上没有哪个项目是等批了才签合同的。我不是说这套办法要取消，这套办法还得用，行政审批还得要；但目前更重要的是控制银行贷款，就剩下银行贷款这个宏观调控手段比较灵了。因此，银行要配合好，不然也是控制不住的。

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手段是组织联合投资。我问了很多省的意见，他们口头上还是赞成的。我对他们说，你们要搞这个项目、那个项目，无非就是要产值、要利润、要税收、要产品。要你们那个地区发展得快，你们搞联合投资、按股份分配不行吗？产品可以分，税可以分，利可以分，产值也可以算一份在你那个省，这样搞不也就表现了你们的政绩吗？只有劳动力不好分，但我看，劳动力也可以设法协调一下，比如招工就可以协调嘛。江泽民同志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了，要尽量在技术改造上做文章，不要再铺新摊子。现在全国有5套年产30万吨的乙烯装置，即燕山、大庆、齐鲁、扬子、金山，都有条件在年产30万吨的基础上经过技术改造达到年产45万吨，投资需要20多个亿；而建一个年产11.5万吨的乙烯装置就要40多亿元。比较下来，技术改造要比新建节省投资30%到40%，能耗可以降低三分之一左右。所以，要把这5套乙烯装置在短时间内搞上去，要搞联合投资，大家要有这个思想准备。

石化总公司也和地方合资搞扩建，是要把一部分利税分出去的，这跟你们总公司的利益有矛盾。但是如果你们不让利，就没有人愿意跟你们联合。搞联合投资不容易，但我们要下决心搞希望同志们共同努力。现在，首先把燕山的年产30万吨乙烯改造为45万吨，投资20多亿元，做个样板。燕山搞成了，大庆、齐鲁、扬子、金山要跟着上，资金保证，确保改造一个成功一个。同时，在这个过程里，大力组织联合，小的项目少搞或不搞。还有聚酯项目，石化总公司搞3个大的，即辽阳、天津、洛阳，每个年产20万吨，共60万吨，现在全国已经有120

万吨的生产能力。纺织部报了13个年产6万吨的聚酯项目，国家计委已批了3个，还有3个正在会签。6万吨小聚酯是不行的。社会化大生产，专业分工是进步的。马克思讲过，这是一个民族成熟的标志。年产6万吨聚酯有什么竞争力？这一点我已同国家计委的同志取得共识，今后不再批了。但阻力不小，不少省长还在找我批。

我们还是要坚定不移地搞规模效益，年产20万吨聚酯一定要搞，年产6万吨的不要搞了。不花很大力气去做调整结构的工作，搞活大中型企业就是一句空话。我多次讲，现在我国的价格信息，有些是十分不准确的。根据这些信息计算出来的效益，到投产时往往变了样，弄不好还要背个包袱。现在要顶住一个项目很不容易，有些地方的领导同志不大清楚国家的全局，也不大了解国内外市场，都存在一种侥幸心理，反正风险都是国家的。

我在全国企业技术进步工作会议上讲了三个结合：一是把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两方面的优点结合起来。现在我们往往没有结合好，定项目时没有考虑市场。二是把存量调整和增量调整结合起来。现在看起来，存量调整比较困难，增量调整无论如何要抓住。明年增加的技改投入，全部掌握在国家手中，不能再撒胡椒面了。要组织联合投资，这一点要取得各省区市的理解。三是把中央和地方两级调控结合起来。光靠中央，把风险交给国家，地方一点不考虑，有赤字也要上项目，那怎么行?

思路不知对不对，请同志们研究一下。如果成立的话，就要统一认识，在今后三年到五年内，集中力量按这个思路抓下去，我想大中型企业是可以搞好的。

加强有色金属矿山的行业管理

(1991年12月27日)

1991年12月27日至30日，全国有色金属工业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出席会议的有中国有色金属工业总公司有关单位负责同志，有关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冶金厅(局、公司)、有色金属公司负责同志。这是朱镕基同志在与部分代表座谈时讲话的主要部分。

有色金属工业是基础工业，是带有战略意义的重要原材料工业，影响着一个国家的国防实力。党中央和国务院对有色金属工业的发展非常重视，采取了很多政策措施。目前有色金属工业的发展，已经从长期以来的卖方市场转入了买方市场，这就带来了一些新问题。同时，在改革开放的情况下，面临着国际市场上的竞争，特别是将来我国恢复在关贸总协定的缔约国地位后，会带来一些新的挑战，如保护知识产权、消除关税壁垒等问题，而我们处理这些问题的经验还不足。当前全国经济形势以及有色金属工业的形势都是好的，而且还在向好的方向发展。我相信，这些在前进中出现的困难和问题是可以解决的。

发展有色金属、黑色金属、化学工业、建材工业，一定要重视矿山这个基础。前些年普遍不注意加强矿山工作，这个教训我们在过去就已经总结过了。党中央、国务院曾多次强调要搞好矿山工作，但在实际工作中往往被忽视。这里有个价格体制问题，即矿产品价格低，搞矿山总是赔钱，而加工环节的利润却很高，这是不重视发展矿山、不肯在这方面下工夫的主要原因。矿山条件很艰苦，你们应常去矿山，深入基层调查研究。对矿山工作不重视，将来是要吃大亏的。

加强矿山工作，首先，要加快推进价格体制的改革，提高矿产品价格，煤炭、有色金属、黑色金属、石油等非提价不行。这些工业品价格和国际市场价格差那么远，价格严重背离价值，给出的是错误的价格信号。为什么各地拼命地搞乙烯、聚酯这些东西？主要原因是国内石油价格太便宜了。由于错误的价格信息，这样的项目马上变成热点，各地一哄而上。因此，价格体制一定要改革。

其次，我们主观上也要重视矿山工作，从政策上支持矿山建设。现在有色金属矿山的问题比黑色金属的还严重，乱采滥挖问题始终没有解决，破坏性的开采非刹住不可。刚才有的同志讲，钨、锡、钼曾有过光荣的历史，但现在为了出口，拼命地乱采滥挖，把资源破坏了，外国人还抗议我们搞倾销。赚了多少钱呢？今年有色金属全行业创汇10亿美元，其中中国有色金属工业总公司创汇5亿美元，为了这么点外汇，把我们的有色金属矿山搞成现在这个样子，何苦来哉！鞍钢也是这个状况，“七五”期间的技术改造工作是很有成绩的，但是忽视矿山建设，把希望寄托在进口矿石上。现在全国进口澳大利亚、巴西、印度的铁矿石成了风，而不去抓国内矿山的建设，这是不行的。所以，我要求鞍钢在“八五”期间的技术改造中，要把钱主要用于搞矿山建设，后加工先不要搞。我再一次请有色金属工业总公司要加强矿山工作，有色金属矿山是国家交给有色金属工业总公司管理的，不要认为矿山是牵涉地方的问题，责任都在地方。

有色金属工业总公司是代表国家实行行业管理的单位，乱采滥挖的人在地方，但责任在有色金属工业总公司，你们要把这个责任担起来。否则，谁来保护有色金属矿产资源？现在我们实行行业管理的体制还不大顺，有几种情况。石化、船舶、石油、海洋石油总公司比较好一些，为什么呢？因为中国石化总公司成立时，企业收得全，没有其他部门插手，所以比较好管。中国船舶工业总公司当时也比较好办，大的造船厂包括修船厂也都收上来了；重复建设的情况比较少，但也不是没有。你们有色金属工业总公司的体制就有点困难了，成立经济实体时收了一部分企业，地方还留了一部分，而你们又受国务院委托行使行业管理的职能。行业管理要公正，你手里有直属企业，人家就怀疑你的公正性，容易发生利益冲突。因此，就出现了你们管理的140多个矿山中，40多个矿山有乱采滥挖的现象。

所以，我希望有色金属工业总公司把工作重点和主要精力放在行业管理上，特别是放在保护矿山上。对直属企业，主要还是扩大它们的自主权，同时加强宏观的调控。宏观调控很重要的一点，是加强对直属企业领导班子的考核、培养、帮助、整顿、建设，这些工作不能放松。要在加强宏观调控的基础上，扩大企业的经营自主权，督促它们

转换机制、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考核它们的成绩。不要什么事都去帮它们干，什么事都去干预，花很大的精力还不一定搞得好。

现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融通了，竞争很激烈，要顶住进口，关键是要提高自己产品的竞争力，这是一项有战略意义的工作。提高有色金属产品的竞争力，主要靠企业内部挖潜，处理好以下几个问题：第一，不能挤电价、挤别人。各人有各人的难处，挤别人不是办法。有人提出当前有色金属工业最大的问题是电价问题，我不同意这个提法。对一个厂来说可能是这样，一降低电价，就马上变亏为盈；但对国家来讲，最大的问题不是电价问题；即使电价降了，厂子虽然变亏为盈了，但好多深层次的问题并没有解决。那样的“盈”也只能是暂时的。而且很难说什么电价是合理的，一个国家，一个时期有一个时期的政策、有一个时期的电价。现在为什么电发展得这么快？有一条原因就是靠集资、靠贷款，包括从国外贷款、进口设备。搞得很快，但上去以后负债很重，不提高电价怎么还债？要不然就缺电。一些国家生产铝，都是在一些有铝矿资源的地方建水电站，国家给一些支持，电费就便宜，那是为了促进铝业发展。现在我们整个水电的比重很小，电力发展资金不足，电价要大幅度降低是很困难的，所以压电价不是一个根本的办法。第二，不能挤矿山，不要把矿产品的价格压低，拿国家的资源做补偿，这也不是个办法。总的讲，还是要提高矿产品的价格，这样才能保护国家的资源。资源税是矿山应该交的。矿产品要反映它实际的价值，应该包括资源税，但要考虑矿山目前的状况，考虑它的承受能力，制定合理的税率，否则不是使之发展，而是使之后退。要使矿山的勘探资金越来越多，而不是因此减少，不然的话，有色金属工业就无法发展。在这个前提下，要转换企业经营机制，加强企业管理，挖掘内部潜力，降低成本，提高与国外产品竞争的能力。

抓紧制定《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转换经营机制条例》

(1992年1月10日)

1992年1月6日至10日，全国经济体制改革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出席会议的有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主管经济体制改革工作的负责同志，以及经济体制改革部门负责同志、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这是朱镕基同志在会上讲话的主要部分。

我昨天上午到会上来，邀请了十个省市的同志，座谈转换企业经营机制问题，也看了会议简报。同志们都要求把转换企业经营机制作为今年改革的重点，并且要求《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转换经营机制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尽快出台。李鹏同志已多次讲过，今年改革的重点是企业改革，特别是企业经营机制的转换，我完全赞成。下面，我谈三点意见。

第一点，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李鹏同志在去年12月23日的国务院全体会议上讲话时指出，在当前经济形势比较好的情况下，也要看到一些深层次的问题，这些问题严重地影响了国民经济向良性循环的方向发展。我的体会是，对目前一些深层次的问题，作为高级干部应当有正确的认识，要有紧迫感。目前有三分之一的企业亏损，还有三分之一的企业潜亏，这个问题如果拖得太久，是会坐吃山空的。所以在去年全国企业技术进步工作会议上，我提出工交战线不能再等五年了，近三年就要扭转过来，要扭亏为盈。今年就应该刹住企业效益滑坡的势头，明年就要好转，后年就应该转入基本正常的发展，否则财政会越来越困难。对这个问题应该有紧迫感。那么，怎样扭亏为盈？怎样解决国营大中型企业的问题？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李鹏同志提出二十条措施，总的精神是转到调整结构、提高效益的轨道上来。其中十二条是解决企业外部经营条件的，只能逐步落实。我算了一下，财政今年大体上让利80亿元。现在企业一年亏损几百亿元，这80个亿解决不了多少问题。要再增加，财政、银行都承受不了。因此，说来说去还是要靠内因、靠自己。所以又提出了八条，要求抓企业内部管理，转

换经营机制。光上面着急，下面不着急是不行的。只有把改革的重点放到转换企业经营机制上，这二十条才能全面落实。

第二点，为了促进企业经营机制的转变，国务院决定要制定一个《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的实施条例。怎么制定？李鹏总理在国家体改委的请示报告上有明确批示，也讲过多次。我归纳为三条，可以说是我们制定这个《条例》的指导思想。第一条，不能搞得太烦琐，包罗万象，否则这个《条例》出不了台。只能把重点放在转换企业经营机制上，就一些主要问题作出明确的规定，其他细节有待于以后补充。今年要集中精力搞好《条例》，作为贯彻《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的实施细则。第二条，这个《条例》很重要的一点，是要用法律的语言来界定所有权和经营权。这里要特别强调，一个厂长受国家委托来管理和经营国家财产，对国家负什么责任？不能把国家财产吃掉，要保值增值。现在我们有的同志对放权让利讲得多了，当然这也是应该的，但是对一个企业、一个厂长应对国家承担什么责任讲得太少了。如果把国家财产吃空了，也没人过问，企业亏损，厂长照当，这样不行。第三条，这个《条例》一定要解决人事、劳动特别是内部分配问题。要建立投资和分配两个约束机制，说到底，就是要解决包盈不包亏的问题。企业、厂长拿到很多条件，盈利了，得到许多好处；亏损了，没有任何责任，这不行。

第三点，怎样制定这个《条例》。我和陈锦华①同志召开了一个会议，与有关部门一起商量了工作进度。我们的心情和大家是一样的，这个《条例》应该尽快出台。不出台，企业亏损的局面就难以扭转。但是也考虑到难度很大，最后下了决心，准备用三个月搞出初稿，然后再用三个月时间协调国务院各部门的意见。很多地方的同志顾虑这个《条例》发下去有没有用，其实关键是我们政府各部门的意见要一致，这是很难的。大家说时间太长，我看三个月时间恐怕也协调不下来。各部门有各自的困难，意见不大容易统一。最乐观的估计是上半年协调完，7月1日颁布实施，这是最理想的情况了。为了搞好这项工作，我昨天上午对十个省市的同志提出要求，请他们把国家体改委现在拿出来的《条例》草案带回去。大家认为这个草案虽然还不成熟，但比没有好得多，给予了相当高的评价。我限定他们在1月23日国务院生产办召开的主管企业工作的各地经委副主任会议上，把修改好的本

子带回来，或者是“另起炉灶”，自己另搞一个也可以。请这十个省市的同志回去向省(市)委、省(市)政府主要负责同志汇报，一定要按期交卷，要动员体改委、经委、计委及企业界的同志共同来修改。今天我也向其他省区市提出这个要求，请回去修改好后在下次开会时带来。这对那十个省市来说是硬任务，其他省区市的任务相对“软”一点，但也要修改，要主动去做这件事情。有的同志说，要求太快了。同志们，你们不是说着急吗？我们很着急，你们也要着急啊！而且要反映意见，这个时候最起作用，否则《条例》出台后就加不进去了。其实，对现在企业存在的问题大家都清清楚楚，关键是要拿出解决办法来。同时，我对有关部门特别是劳动部、人事部、财政部以及银行等也提出了要求，请他们回去后向主要领导同志汇报，党组要讨论，把《条例》修改出来。修改时不能删掉内容，也不能回避矛盾，只能提出你们的意见，觉得哪里不行就提出修改意见，大家一起来探索改革的路子。

---

① 陈锦华，当时任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主任。

下面，我就怎样具体修改这个《条例》谈几点意见：

一、先立后破，分期达标

这个《条例》不是只管一两年，而是准备长期起作用的，要先把规章立起来。分期达标，就是说，达到目标要有个过程，逐步才能达到。先立后破，是要求先有规范，有配套措施，否则就实现不了。企业没有辞退职工的自主权，就不能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而企业要能够辞退职工，就必须完善法规，措施配起套来。比如，要健全待业保险等社会保障制度，搞好转业培训，建立职业介绍所等等。《条例》如果不包括这些内容，就没有办法执行。很多省市的负责同志告诉我，现在许多企业没有人事权，职工、干部都由上面安排。《条例》既要能保证企业的用人权，加强劳动纪律，又要能保证社会安定，这不是那么容易解决的问题。

二、划分责权，转变职能

现在，部门很多，每个部门的权力都很大，管得过宽。有的部门说，这个《条例》没有什么用。李鹏同志刚才讲得很好，政府不精简

机构、转变职能，企业就无法实行这个《条例》。因此，制定《条例》要把重点放在划分责权方面。国家把管理权委托给企业了，企业应该承担什么责任？向国家承担什么任务？《条例》都要有明确规定。完不成任务，厂长就应该下台，不能容忍企业连续亏损三年。亏损第一年要“黄牌警告”，第二年要以观后效，如果第三年还不行，那就对不起，再好的厂长也要请他“另谋高就”了。这就是责。既然给了他这个责，就要给予他相应的权力；中央各部门的责任就是监督他不能把所有权给吃掉了，不能把国家财产吃光了，他承担的任务要完成。至于怎么完成任务，那就是他要在国家法律法规、政策以及国家计划指导下来完成，不能接受各部门甚至个人的命令。如果企业的发展规划、经营决策，谁都去干预，那不行。现行的许多制度，包括审批制度，都要逐步进行改革。不仅企业要建立自我约束的投资机制，银行也要建立这样一个约束机制，就是说，银行也有个责任问题，不能把风险交给国家。企业和银行都有了约束机制，审批就没有必要了。现在你审批，企业也不照你批的做，甚至你不批，企业也照样上它的项目。所以说，只有划分责权，主管部门转变职能，企业才能达到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目的。怎么监督，也不必写得那么细。当然也可以考虑一些组织形式，比如说像德国企业那样设监事会。我想，我们的国营大中型企业是不是也应该有这么一个监督机制？监事会可以包括所有权代表、职工代表、企业界的代表、银行界的代表以及管理学家的代表。由监事会来负责监督审计。但实际上真正的财务账目，是委托会计师事务所来审计的。据我了解，国外的会计公司是很厉害的，比财政部的专管员要厉害得多，它是按法律办事，不是按个人意志办事的。会计公司如果营私舞弊，要受到严厉的惩罚。最近，美国有一个大会计公司，因为一桩舞弊案子，宣布破产了。破产采取“扫地出门”的办法，会计公司所有合伙人的财产全部被没收，只留给他们一部小汽车。公司的财务只要会计公司一签字，哪些能打入成本、哪些不能打入成本，就定了。财政部就根据这个来判定，没漏税则已，如有漏税，就得坐牢。如果公司舞弊，比如说向会计公司行贿，它的负责人是要坐牢的，会计公司也要破产。我们是不是也可以采取这样的形式，在厂长任期内进行审计。如果等任期结束以后，厂子都搞垮了，几千万元、上亿元资金都黄掉了，再去审计，再撤厂长的职，还有什

么用？我看，每年所有权的代表都应该对每一个企业进行审计，检查它的资产负债表。



1991年10月16日，朱镕基考察江西汽车制造厂。右四为江西汽车制造厂党委书记蒋林生，右五为江西省委书记毛致用，右七为江西省省长吴官正。

三、依法治厂，定出规范

《条例》中所有条款都应该使用法律语言，要讲得很明确，要把实质性的矛盾提出来，敢于去碰硬，提出解决的办法。如果笼统地写，那就是说根本不准备实行，因为把矛盾都回避了。可以说，《条例》中提出的很多问题都是针对各部门现行规定来的，那就是要对现行的规定进行改革。不改革，这个《条例》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如果把这个《条例》制定出来了，并成为一个全国的规范，我看企业就好管了，依法治厂，就可以从严了。违反了《条例》规定，就“六亲不认”，该处分就处分，该撤职就撤职。另外，关于分配问题，在《条例》里一定要把效益工资写清楚。我的主张是：根据国民经济的发展和效益

的情况，规定一个全国总的工资增长幅度。各部门据此规定本行业的工资增长幅度，行业要规定工资增长平均数和最高限，最高限可根据本行业先进企业情况来定。在这个基础上，企业根据自己的效益计算工资增长。效益要包括全面的指标，不能只是一个指标，特别不能只是产值指标。企业的工资增长只能低于、不能高于行业的工资增长最高限。以前搞的收入不封顶，那不得了，会形成收入差别的悬殊。就是资本主义国家也要实行收入平均化，每年工会也要同雇主谈判，定出平均工资水平、每年工资增加多少。工资水平高一点的企业可以建立工资风险基金，今年盈余，明年亏了，可以用盈利来弥补亏损。现在我们还没有这种储备，今年盈利多，就全部分光了；明年亏了，也不认账，这不行。

总之，制定《条例》要抓住几个重点，重点一定要十分明确，要有可操作性。没有可操作性，那就不要搞《条例》了，因为我们已经有《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了。

充分认识发展信息产业的重要性

(1992年1月11日)

这是朱镕基同志在听取邮电部工作汇报后讲话的一部分。

我要着重说的一个问题是，必须充分认识发展信息产业的重要性。

现在是信息时代，连美国人都把信息产业的发展作为他们的国策，你看美国的总统咨文、委员会报告等等，有关信息产业的内容都是他们最重视的东西。在信息时代，发展信息产业的社会效益是不可估量的。特别是我们进行改革开放，没有信息产业的大发展，国民经济是不能够很好地发展的。现在美国已经实现家庭微机国际联网，这说明它的信息非常灵通，适应市场竞争的能力非常强，科技交流的效率非常高。虽然说当前美国的经济不景气，但它的实力还是很强的，关键在于科技。现在还没有哪一个国家能同它比，就是日本也还是赶不上。所以，对信息产业的发展应该有足够的认识。对这个问题，我的观点非常明确：只要是邮电部、电子工业部要钱，我从来不卡。当然，给了钱不能浪费，要用在急需的地方。

最近，我连续听了电子工业方面的几次汇报。要发展信息产业，电子工业一定要搞上去，邮电事业一定要搞上去。你们两家要配合好、衔接好，不要搞重复建设。对有些部门我是卡的，如对加工工业就要控制它们的总规模，把这方面的钱给卡下来。绝对不要搞重复建设。我们过去吃亏就在这个地方，搞了很多重复建设、无效劳动，不知道浪费了多少钱，而真正该发展的没有发展。这次折旧免交“两金”，返回的40亿元中，基础设施包括能源、交通、通信等就占了30亿元，就是要首先把基础设施搞上去。这一点，在指导思想上一定要非常明确，观念一定要转变过来。邮电事业没有重复建设问题，而且邮电发展了，信息产业发展了，能带动整个社会的科技水平、经营管理水平的提高，带动对外开放的发展。今天我说这些，就是希望大家都来重视发展信息产业。

对通信产业的发展，大家不要认为它现在的发展就够了，我觉得还很不够。刚才你们汇报中讲“八五”期间将增加程控交换机1000万门，我看还应再快一些，应搞到1500万门。这当然是我估计可以有这么一个速度，因为大家都已经认识到通信产业的重要性，各地都会把钱花在通信产业上。而且，通信产业自己的积累能力也在逐步增强。只有这么一个比较快的发展速度，才能真正把我们国家的科技这个第一生产力搞上去。讲“科技是第一生产力”，要首先从信息产业开始，信息产业发展了，可以带动整个科技事业的发展。

领导干部要廉洁奉公

(1992年1月11日)

1992年1月11日至14日，全国交通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出席会议的有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交通厅(局)主要负责同志。这是朱镕基同志在会上讲话的一部分。

我想再强调一下加强精神文明建设问题。要把精神文明建设搞好，要把各项事业搞好，领导班子建设是最重要的。要真正把中央的一系列政策贯彻落实到基层，没有各级领导班子以身作则、为人表率、清正廉洁，就什么事也搞不成。各级领导干部要深入群众，多做调查研究；领导干部要廉洁奉公，作出好样子，不要请客送礼、大吃大喝。这些方面国务院都是有规定的。首先是我们这些人要以身作则。最近，我去了十几个省，要求第一条，不要迎送。迎送干什么呢？地方上的同志一定不要来迎送，这要省掉多少事嘛。总理、副总理、部长加起来有多少个，都迎送不得了，大家不堪负担啊！第二条，不陪餐。一起吃饭就是请客，自己吃饭也要严格要求，四菜一汤。大家都这么做，好风气就出来了。如果省委书记、省长来吃饭，规格能低吗？如果光是省委书记、省长那倒好办，但他们一来就不是几个人，马上就是多少桌，部长下去可能至少三桌吧。有人说，我们在一起吃饭，一边说说话不是节省时间吗？我说节省不了时间，只有一张嘴巴，不是吃饭，就是讲话，能节省什么时间呢？第三条，绝对不收礼。一条烟、一瓶酒也绝对不收。第四条，不在宾馆里听汇报。我去了十几个省，都是到省政府去听汇报。这倒有个好处，每个省政府机关什么样子都知道了，哪个艰苦朴素、哪个豪华，我都清楚了。另外，一些生活小节也要注意。李鹏同志就批示过，下去不要跳舞。你去跳舞了，大家都来跳，跳舞成风不得了啊。不搞这些增加别人负担的事情。我相信只要我们负责同志、各级领导班子，大家都严格要求自己，讲党性，作风就带出来了。我们往往讲社会风气不好，社会风气怎么会不好呢？同志们，肯先是我们干部风气不好嘛。江泽民同志在上海一再讲“上梁不正下梁歪，中梁不正倒下来”。只要我们从部长到

厅局长大家都严格要求，整个社会风气就好了。我们政府机关廉洁，也就敢于去治那些作风不好的人。希望你们把这个问题提到巩 固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防止“和平演变”的高度来认识，切实加强精神文明建设。



1992年1月11曰，朱镕基在全国交通工作会议上讲话。右为交通部部长黄镇东。

国务院生产办要服务好、 态度好、廉政好

(1992年2月2日)

这是朱镕基同志在国务院生产办公室1992年春节团拜大会上讲话的一部分。

国务院生产办成立半年多来，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大家抓工作，确实抓住、抓准了国民经济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同志们对这些问题认真地抓，加班加点地干，没有人说苦说累，抓出了显著的成绩。一是清理掉1360亿元三角债，是总额的40%了，大大地缓解了企业的困难。二是限产压库，这项工作难度很大。但是，到去年年底实打实地压掉了229亿元，这就大大地减轻了企业的负担，使亏损面下降了7个百分点。三是预算内国营工业企业1991年下半年实现利润上升2.8%。不要小看这2.8%，它标志着我们的工业企业已经从效益滑坡转为上升。我们一定要看到这个成绩的取得是很不容易的，同志们应该为自己的工作取得的成绩感到自豪，同时，应该鼓舞自己的信心。事实证明，只要认真抓，就可以抓出成效。另外，我还要指出，完成这些工作，同志们是在很困难的条件下进行的。我们的办公地点分散，人数很不够，一个人要当几个人用。昨天，我们开生产办党组的民主生活会，邀请了中组部、中纪委和中央国家机关工委的同志参加。党组成员都做了自我批评，没有人吹嘘成绩，但是，对同志们工作的艰苦我也说了两句。有关部门的同志听了非常感动，会后对我们说：你们这种精神真可贵，在很艰苦的条件下，大家的干劲还这么足，效率这么高，没有人叫苦，令人钦佩。我想，我们也应该充分地肯定自己的成绩。

这里，我想向大家提几点希望。

第一点，我们虽然取得这么大的成绩，但是不能骄傲，我们应该谦虚。这一点，不是对同志们提出的要求，主要是对我自己提出的要求。昨天在生产办党组民主生活会上，我也做了自我批评。我还是有一些毛病，有时一讲成绩就讲得过分，讲别人的缺点讲得太多，对同

志们要求过高、过急，特别是对别的单位批评得太多，这是我的毛病。请同志们注意，我们的工作只是国务院工作的一部分，离开了兄弟部门的支持，我们的工作是做不好的。在内部也一样，生产办的技术改造局、科技局负责下达计划，我要求在今年1月底以前，项目一定要统统出门，要是没有秘书局和其他各个兄弟司局的支持，包括印刷厂，也是干不成的。每一件工作都是依靠大家共同努力干成的。因此，我们应该互相谦让。对于这一点，不但我要注意，希望同志们也要注意，特别要搞好同兄弟部门的协作关系。

第二点，一定要认真加强政治学习。江泽民同志在去年7月1日的讲话和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都强调要从政治上看问题。我们一定要从政治上来提高自己，加强政治理论学习，特别是学习毛泽东思想、邓小平同志的著作。加强机关思想政治工作的目的，就是要保证我们始终认真地坚持党的塞本路线。大家都看到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确实使我们改革开放十多年来取得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实践证明这条基本路线是完全正确的，可以管一百年。我们一定要把这条基本路线坚持下去。

第三点，要解放思想，把改革开放工作搞得更好，胆子更大一点，步子更大一点，速度搞得更快一些。中央一再地强调，要加快改革的步伐，加大改革的分量。我们一定要朝着这个方向去努力。我们还要随着改革的深入，注意转变机关的工作方法和职能。同志们，我提醒大家，我们的许多工作，绝对不能完全按过去国家经委那一套工作方法来做。时代已经不同了，改革已经前进了。如果我们什么事情都守着过去那一套办法来干，就不能适应这个要求，不能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要转变职能。如果我们生产办不转变职能，而去要求各个行业管理部门转变职能，那是不可能的。希望同志们一定要始终把解放思想、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变成具体行动。

第四点，要继续加强党的建设、干部队伍的建设，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生产办的人太少了，要注意选拔干部，把一些年轻的同志调进来，充实队伍。我们整个机关干部的年龄都偏高，当然高有高的好处，经历多，经验丰富，工作抓起来比较顺手，但是总得有人接班啊！总要调进来一些新生的力量，不然我们这个事业就不能推向前进。

去年，我提出三条要求，希望我们这个机关能够服务好、态度好、廉政好。我讲服务好，是根据邓小平同志的一句名言："领导就是服务。"①我们就是要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为基层服务，为各部门服务，为各地方服务。对于这一点，我们一定要牢记在心，什么事情都要设身处地替大家想一想，要服务好。我讲态度好，首先就是指对工作认真负责，有高度的历史使命感、责任感、紧迫感。对工作一丝不苟、认真负责、任劳任怨，这是个根本的立场和观点问题。其次是指我们对平级和对下级的态度都要好。同兄弟部门商量工作时要嗓门小一点，态度谦虚一点，考虑人家的困难多一点。团结协作好，也包括在态度好这一条里面。对下面的同志不能盛气凌人，不能以领导机关自居，要认真地听取人家的意见。特别是人家对北京各个部门不大熟悉，我们要设身处地帮助他们想一想，不要让他们到处去跑，在我们这里尽量就把工作协调好了，那人家会从内心感激的。第三条，廉政好。同志们都要记住这一条，即使一条烟、一瓶酒也不能接受。遇到这类事，你们要多做说服工作，说生产办有严格的规定，不许收礼、吃请。表示友情，可以有多种方法，为什么非要送东西？非要吃请？希望同志们在廉政方面继续加强，严格要求自己，在新的一年里把我们生产办机关的建设搞得更好。祝愿大家在服务好、态度好、廉政好这条道路上继续前进，取得更大的成绩。

---

① 见邓小平《把教育工作认真抓起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21页)。

全面正确地理解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精神

(1992年3月25日)

这是朱镕基同志在七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海市代表团讨论会上的发言。1992年春节前后，邓小平同志先后在武昌、深圳、珠海和上海等地就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坚持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特别是抓住时机，加快改革开放的步伐，集中精力把经济建设搞上去等一系列重大问题，发表了重要谈话。各地认真学习贯彻邓小平同志重要谈话，加快了经济建设步伐，但是一些地方也出现了片面强调发展是硬道理的问题。朱镕基同志针对当时对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精神理解的片面性，强调对邓小平同志南方重要谈话要全面正确地理解，要深刻领会其精神实质，不要片面强调发展是硬道理。当时有人认为这是同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唱反调。朱镕基同志也感到有很大压力。不久，邓小平同志看到了这篇发言的整理稿，予以充分肯定。中共中央决定将这篇发言以《中办通报》印发各地区、各部门，并刊载江泽民同志在发言上的批示：“朱镕基同志在人代会上海代表团会议上的发言，有内容、有重点、有分析、有办法，抓住了小平同志最近重要讲话的精神实质，使人很开脑筋，值得一读。”

今天，我是作为上海代表团的一名代表来参加会议的。我在上海当了三年多的市长，参加了五次全国人大会议，每年和大家见面，不敢说在座的诸位我都认识，90%我还是认得出的。今天看到大家，特别是一些老同志，身体很健康，心里非常高兴。公琦①同志昨天要我来发言，他要我多讲讲，但是今天没有多少时间了，讲一点什么呢?

---

① 公琦，即叶公琦，当时任上海市人大常委会主任。

大家都知道，这次大会之前，邓小平同志发表了很重要的谈话。正如中央通知讲的，这次重要谈话不仅对当前的改革和建设，对开好党的十四大，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作用，而且对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

设事业，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邓小平同志发表重要谈话以后，全国人民都欢欣鼓舞，这也反映在我们这次大会上；同时，也得到海内外各界人士的拥护和赞成。我想，一个讲话能够产生这么广泛、深远的影响，确实是很少见的。在这次大会上，我们大家要在邓小平同志重要谈话的精神指引下学习、讨论、贯彻，把工作做好。我今天想谈一点学习邓小平同志的重要谈话、学习江泽民同志在政治局全体会议上的讲话、学习李鹏同志的《政府工作报告》的个人体会，我谈的可能不对，请批评。

邓小平同志重要谈话总的精神就是要抓住当前的有利时机，不要丧失这个时机，思想更解放一点，胆子更大一点，步伐更快一点，把经济建设搞上去。我最近访问了澳大利亚、新西兰，感到现在的国际形势是有利于我们的。现在，很多国家都不景气，我在新西兰和澳大利亚都看到这种迹象，失业率很高，市面萧条，到处出卖大楼。现在，发达国家包括日本和德国，日子都不是那么好过；亚洲“四小龙”也都遇到了新的困难，国际竞争越来越激烈，他们那个地方的工资越来越高，劳动力越来越缺乏，所以他们也在进行经济结构的调整。如果不调整结构，不向高新产业发展，他们也要活不下去了。回过头来看我们自己的情况，我国经济确实是向好的方向发展，深层次的矛盾正在逐步得到解决。去年遭受那么大的水灾，造成200多亿元的损失，也可能还大一点，因为各级财政、人民群众自己承担了相当大部分的损失，没有对国民经济产生什么大的影响，农业还是照样的大丰收。现在发愁的是棉花调不出去，糖积压得厉害，而且出现了“卖粮难”，粮食储备已是空前的多，市场的商品非常丰富。所以说，一方面，我们自己如不调整产业结构就不能前进；另一方面，我们人民的基本需求得到满足了，形势确实非常好。这是一个有利时机，如果我们不抓住这个时机赶快上一个台阶，那就丧失时机了。但是，我们的思想怎么解放？胆子怎么个大法？加快什么东西？怎么才能把经济搞上去？我也在学习过程中间，谈几点体会。

一、首先要加快改革和开放的速度

这是邓小平同志重要谈话的精髓所在。过去十多年的改革开放确实取得了很大的成就，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没有人能否定这个历史事实。现在看，如果我们的思想再解放一点，恐怕我们的成绩就有可能

更大一点了。别的不好说，上海的情况我还是知道的。上海的思想是不是可以再解放一点？我在上海的时候一再讲，上海人太“精明”了。现在我还是这句话，太“精明”了，到头来就不高明了。什么事情都怕吃亏，怎么能够把它搞上去呢？斤斤计较，时机一丧失，就搞不上去了。国际经济正处在大调整的时期，我们不抓住怎么行呢？最近国务院发布了开发海南洋浦的消息，有人说洋浦的地卖得太便宜了。那是一块撂荒地嘛，你不用低价出租，就没有竞争力，外商就不来，那个地方也就开发不了，建设搞不上去，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也提高不了。何况在建设过程中，你还可以得到社会效益，建设队伍是你的，国内采购设备也是你的，还可以吸纳好多工人就业，他们的生活水平也提高了。为什么不算这个账呢？现在国际竞争这么激烈，你没有优惠条件，怎么吸引人家来投资呢？反过头来讲，上海浦东的地也别那么贵了。吸引外资，加快速度，过去我们还担心这个东西是姓“资”还是姓“社”，邓小平同志把我们这个思想问题解决了。你引进外资、引进技术、引进先进的管理，都在你的社会主义土壤上面开花结果，它就姓“社”了，不姓“资”了。这个问题解决了，不怕扣这个大帽子了，是不是？我们就可以把这方面的工作搞得更快一点。

最近谈到浦东开发，李鹏同志讲，浦东要是没有几个大项目，它就没有吸引力、没有号召力。所以，一定要搞几个大项目，大家要舍得花一点本钱。我们跟李嘉诚①先生合营搞集装箱码头，这是我在上海工作的时候就谈的事情。前些日子，我见到李嘉诚先生时跟他说，你要到上海去啊。他说去是一定去，但具体条件还没有谈妥啊。我一再鼓励他应该对上海有信心，还是要去。现在究竟卡在什么问题上呢?据说是股份占多少，他要求占50%，我们要求他占49%，就差那么1%，但也许这是关键的1%。我刚才跟黄镇东②同志商量了，这有什么关系呢？要互相信任嘛！不是谁多占了个1%，谁就把谁甩啦，谁就不照顾谁的利益啦，这不是一个主要问题。总之，要坚定投资者来投资的信心，什么事情都要抓紧办，错过这个时间就不行了。还有，我们跟法国埃尔夫石油公司合营的炼油厂，这也是一个10多亿美元的大项目，关系到上海的第二个出海口金山港，是个很重要的项目。这个项目搞成了，对上海浦东开发有很重要的意义。我是讲，这些大项目必须抓得紧紧的，赶快把它们搞成。上海现在有个出海口的问题，不解决这个问题，浦东的开发是很难的。昨天，汪道涵③同志介绍一个日本代

表团来见我，就是为了建造浦东的国际机场，即上海的第二机场。他们提出一个很好的见解，说这个上海的国际机场，建成规模不一定要世界第一，也应是亚洲第一。我想这个意见有一定道理。我倒不是说一定要争什么第一，不必追求这个虚名，而是要搞得比较好，符合实际需要。因为上海要成为国际金融和经济中心，没有一个好的基础设施，出海口本身又存在一些客观的不利条件，如果空中交通再不方便的话，要想成为这样一个中心是非常难的。所以，基础设施应该花一点本钱来搞。他们的这个意见可以考虑，日本人如果有兴趣，可以一起来建这个机场。中国内地找不到一个像新加坡那样的机场，香港也没有啊。我看了新加坡机场，确实是非常羡慕，我们也应该有这样管理先进的机场。

---

① 李嘉诚，当时任香港长江实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

② 黄镇东，当时任交通部部长。

③ 汪道涵，曾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上海市市长，当时任海峡两岸关系协会会长。



1992年3月25日，朱镕基在七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海市代表团讨论会上发言。右一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乔石，右二为上海市委书记吴邦国。

引进管理也是非常重要的，从上海来讲，我觉得这个思想还可以再解放一点。最近，我研究了一下股份制，找了深圳和上海两家证券交易所的理事长和总经理来座谈。我本来认为上海的证券交易所建在深圳之前，可能要比深圳的更好，结果得出相反的结论，还是深圳的走在前面。这里面是不是反映出一个问题？就是上海自己的思想还不够解放。我总结了上海与深圳股票市场的差距：

第一，深圳发行股票是33亿股，现在总市值是100亿元。上海只发行了3.49亿股，与深圳相差近10倍。

第二，上海上市的公司没有几家是有名的企业，还是1986年搞的那几个公司。第二批上来的有几个像样的了，如上海第二纺织机械厂、嘉丰棉纺厂、凤凰自行车厂等，但经验还没创造出来。



1990年12月19日，朱镕基出席上海证券交易所开业仪式。前排左一为上海市委原书记汪道涵，左二为香港贸发局主席邓莲茹，左四为上海市副市长黄菊，左五为国家体改委副主任刘鸿儒，左六为上海市政府外事顾问李储文；第二排左二为中国人民建设银行行长周道炯。

第三，上海的股票价格只有两家公司放开，深圳的股票价格是全放开的。放开就有风险，我们还没有经历过这个风险。

第四，深圳的股票经过大起大落，人民群众的风险意识和金融意识得到了锻炼。上海现在还一个劲儿往上升，还没有真正下来过眤，谁知道下来是什么结果啊！听说最近股价稍微下来一点点，马上就有几十个人到市政府上访。这些人还不知道什么叫股票，认为社会主义的股票是只准升，不准降的，风险都在国家，那怎么得了！

此外，上海在电脑管理方面、在发行股票的方法上面，也不如深圳。

从沪深两个试点的经验看来，这条路子是可以走得通的，就是说社会主义的股票市场是可以建立起来的，不是姓“资”的，而是姓“社”的。但是，现在还不敢说试点已经成功了，为什么呢？还会有很大的风险。就是因为我们自己还不习惯这个东西，人们认为股价只能上去，不能下来。深圳股价去年最高的时候超过发行价的120倍，发行的1元钱股票，后来卖到120多元，现在已经下来了。不仅下来了，而且还稳住了，这说明它经过了一次考验，将来还会有多次的考验。上海是一次考验还没有经过，你们会有睡不着觉的时候。但是路子是可以走得通的，初步经验已经积累了，当然推广还早，这个东西还要很好地试验。我听到一个数字，全国已经有380个企业发行股票，那怎么得了啊！将来名声搞坏了，再也恢复不起来了。在上海、深圳试点开设证券交易所是党的十三届七中全会讨论过、作过决定的，是列入了“十年规划”和“八五”计划的，所以我个人意见，要让他们大胆地试、大胆地闯，不要限制过多。我不是说你们不要按上级的规定做，我的意见是上级应该让试点的单位大胆地去做，大胆地去闯。束缚过多，就始终建立不起风险意识和市场来。还是要放手一点，让他们去闯。可是，推广还没到时候，等这两个地方弄出一套经验再说。

其他地方可以首先搞企业内部的股份制，增加企业的凝聚力，同时改革自己的会计制度。

这讲的是外开放。邓小平同志的谈话一下子使我们的思想豁然开朗，这些东西要大胆地试、大胆地闯，把资本主义国家的好的东西移植到我们社会主义制度下面来。

关于改革，我们的框框确实还比较多，当前最大的一个问题是企业经营机制的转换，这项改革如果不向前跨一步的话，很多深层次的矛盾就不好解决。现在，我们已经搞出一个《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转换经营机制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初稿。不久前，我请各部门负责同志开会，发现有些主管部门不大同意这个《条例》，你不赞成这一条，他不赞成那一条。说来说去，是不肯放权。为什么权不肯放呢？他们也有苦衷啊！你国务院赋予我这个权力，现在国务院机构没有精简，职能也没有修改，你叫我放权，到时候出了毛病谁负责啊？难点就在这里。他有他的职责，原来都有红头文件规定让他管，他不管怎么行！就是说部门管得还比较多，这样企业就不能自主经营，也不能自负盈亏。最近，我跟陈锦华①同志商量，我就采取这么个办法，一章一章来，《条例》共有七章，讨论每一章时都把主管部门请来，如讨论劳动用工制度就请劳动部、人事部、公安部、民政部、国家教委来。首先要“自我革命”，要突破，不突破现有规定，制定这个《条例》干什么呢？你总得自己说出来哪一条可以突破。我们要认真学习邓小平同志的重要谈话，要解放思想。有人说，是不是等改组了行政机构、国务院转变了职能再来搞这个《条例》呢？这是相辅相成的啊！你现在不开始转变职能，行政机构就没办法改革。大家的思想还是过去的思想，你怎么改？所以现在就应有所突破，政府少管一点，让企业自主经营。江泽民同志讲了这么一句话：思想要解放，政企要分开，职能要转变，宏观要管住，微观要放开。我是非常拥护的。这句话的意思就是，政府就是政府，不能代替企业作经营管理决策。政府的职能非转变不行，政府部门只管宏观。我们有些部门，对宏观不感兴趣，专管微观。管微观，权大得很，把企业管得死死的。对宏观该怎么管呢？要用政策、法令来管，不能靠人治。要依靠政策、法令，依靠经济杠杆、各种经济手段去管，不是靠政府下命令。这样企业才能自主经营，政府再要求它自负盈亏，那才有可能做到。我现在正在

做这方面的工作，但是难度大得很，我准备下个礼拜至少开五次会议，要找有关部长来商量，不然的话就没办法弄，他们不自我革命就突破不了。另一方面，对企业要有要求，要真正做到自负盈亏。所以，我们一定要实行《企业破产法(试行)》，一定要有投资风险机制。现在银行没有风险机制，为什么呢？银行是按照各级计委(计经委)的项目计划发放贷款，如果项目建成后没有效益，还不了款，账黄掉以后，银行没有责任，你没法怪它啊，项目不是银行定的。以后不能这样，要给银行投资决策的自主权，再黄了账，银行要负责，不能把风险归于国家。所以，这要经过改革包括价格改革才能做到。现在我们非常担心，省里面叫我们批项目，我说批可以批，问题是将来搞坏了谁负责啊？现在大家都希望上项目，“大干快上”又来了，大家的劲头大得很。问题是能搞的项目，大家都上，搞上去了以后，产品的品种、规格，大家都是一个样，那你的产品卖给谁呢？搞到最后项目一点儿效益也没有，省长、市长找不到了，也许是调任了。银行也没有责任。真正高、精、尖的项目又搞不出来，这一点我们很清楚。现在我们不少轻工、家电产品搞得太多了，生产能力闲置；就是这个问题嘛！投资一定要有风险机制，银行要有风险机制，企业也要有风险机制。如果这个企业资不抵债要垮台，那么这个企业就得关停并转；银行要讨债，债务还不清就清盘；清盘偿付不了，银行有责任，要用准备金来抵付。地方也要承担责任。下岗的工人怎么办？地方要出来负责，必须建立社会劳动保障体系，搞职业培训、职业介绍所，做安置劳动力的工作，保证社会的稳定。我觉得这正是企业经营机制转换中一个深层次的矛盾，是要解决的一个首要问题，希望今年在这个方面有所突破。这个问题突破了，可以说就找到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和市场调节相结合的运作模式。其他各项改革还有很多，总之，思想都要解放一点。

① 陈锦华，当时任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主任。

我还要讲一下上海的住房制度改革。尽管上海的房改方案还不完备，但是已经在市区800万人中实行了，农村郊区500万人也在搞。现在有些地方，方案讲得很好，但是还没有实行，或者只是试点。上海

是实行了，而且取得了效果，住房建设已进入了良性循环。所以不能光说，而是要赶快做。

二、要加快经济结构调整的速度

经济结构不调整，我们是不能前进的，这是去年中央工作会议提出的一个任务。去年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是7%。工业增长14.2%，高得不得了啦。第三产业的增长速度是多少呢？是5.2%，太低了。这个结构不调整怎么办呢？第三产业不发展，人民群众的生活很不方便，社会效益、总体效益提不高啊！14.2%的工业增长速度现在证明是高了，为什么说高了？去年上半年工业增长速度就很高，但是生产的东西不少都进了仓库，形成库存积压，银行仍给企业贷款。到下半年，我们限产压库，把上半年增产的东西压掉一部分，把仓库里积压的东西卖掉了，结果企业效益大大地提高，亏损面降低了7个百分点，国营企业的亏损面从36.7%降到29.7%。这就证明，卖不掉的东西，生产得越多，就越没有效益。限产压库促销，效益就出来了，企业就活了。相反，第三产业要快搞啊，据说上海的商业网点在新中国成立以后还不如以前多，现在赶快把它搞上去。发展第三产业投入少，产出多，就业人数多，为什么不朝这地方使劲儿？香港的第三产业更赚钱了，它搞的是高级的第三产业。即使是发展低级的第三产业，包括到街上去卖油条，都比吃国家的补贴要光荣。去年的工业企业亏损补贴有300多亿元，要扭转过来。北京最近有一件事情，东安集团公司兼并了北京手表二厂，我看后非常赞赏。我说这是方向性的突破。首先他们“自由恋爱”，不敢向上报，为什么呢？因为阻力重重。他们自己先谈好了再报，北京市召开了一个市政府扩大会议最后拍板了。我说这个事情做得非常好。现在手表生产的多得不得了，北京这个手表厂是很落后的，生产的还是低级机械表，根本没有竞争能力，长期吃补贴。东安集团看中了它的厂房，位置在双榆树，那里正好缺一个商场。商场一开，肯定赚大钱，人民群众知道了肯定非常高兴，居民区有个大商场啦。结果花了多少代价呢？第一，设备占了600万元，东安集团说你愿意拿走就拿走，我只要你的厂房。第二，东安集团接下了手表厂100万美元的债务和全体工人，然后再支付1200万元，买下了这个厂。这个条件太优惠了，装修商场还要花2000万元。当时东安集团的总经理给我讲，东安集团稳赚钱，是有把握的。所以，我认为这样调整结

构、关停并转，才能为工业发展开辟广阔的前景。现在工业部门人浮于事，如果把现在工业战线上的人减少一半，我看效率会有很大提高，而且效益也会更好。如果完全在工业企业内部调整，我们哪儿有那么多资金啊！现在也想不出那么多门路可搞，“高、精、尖”一下子又搞不出来，有的搞起来也是重复建设，所以，发展第三产业是个最好的办法。上海作为全国的经济中心，商业要是不发达那怎么得了啊！调整结构可以大搞第三产业，也可以减轻关停并转的压力。但是部分工人会有思想问题，说我们都是搞工业的，现在去搞商业了。我说这有什么不好？比你吃国家补贴要好，你为国家作了贡献，自己也得到好处，我想这个思想工作是做得通的。对发展第三产业，观念也应该改变，这并不是低人一等。上海的女大学生很多去报考航空小姐，考上了认为很光荣，看来，这个观念是可以转变的。

另外，基础设施建设必须加强，这个结构非调整不可。不搞基础设施建设，就没办法开发，外国人也不会来。但是，我们许多同志把注意力都集中在搞工业项目上，以为这些项目的效益好。说实话，有些项目效益好是由于错误的价格信息，因为我们的价格改革还没到那个程度。如汽车，全国有2600多个汽车厂，全世界第一，不是汽车产量第一，而是制造厂数目第一。汽车行业是高度技术密集型和资金密集型的大工业，没有规模经济就没有竞争力。你说这样遍地开花地搞，能够建成现代化的汽车工业吗？为什么这样搞？因为大家都认为搞汽车工业可以赚钱。之所以赚钱，因为汽车是控制进口，国内市场垄断。像“桑塔纳”轿车在国外卖1万美元，我们定价是17万元人民币，实际上卖到二十几万元，相当于4万到5万美元；“奥迪”轿车更不得了啦，现在卖到30万元，在国外也不过万把美元。显得效益高得不得了，实际上是假的。将来中国恢复在关贸总协定的缔约国地位后，这就很危险，根本不能够与国外竞争。这样搞工业是不行的，重复建设没有效益。还是要搞基础设施建设，否则光搞工业，效益也上不去，搞不出好东西。所以，我对上海大规模建设道路、桥梁、机场，是非常赞成的。只要这个格局形成以后，财源就能滚滚而来。

三、要加快提高企业经济效益的速度

现在效益不是太好，我是讲国营企业。我们要很好地学习邓小平同志重要谈话蕴涵的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他每讲一个问题，就对我们提

出了新的任务、新的要求，而在它的后面，也跟随着几个约束条件，我想大家在学习中都会体会到这一点。譬如他在前面讲：“能发展就不要阻挡，有条件的地方要尽可能搞快点”，紧接着讲：“只要是讲效益，讲质量，搞外向型经济，就没有什么可以担心的”。你如果忽视后面讲的三个约束条件，就达不到前面提出的要求。又如他前面讲：“我国的经济发展，总要力争隔几年上一个台阶”，向我们提出了新任务；下面马上一个约束条件：“当然，不是鼓励不切实际的高速度，还是要扎扎实实，讲求效益，稳步协调地发展”①。现在我在国务院是分管生产的，比你们的信息多一点，所以就有点担心了。我跟你们讲几个数字，今年1、2月份基本建设的速度上来了，投资增长了33%，技术改造的投资也增长了50%，都上来了。上来好啊，有钱搞就好啊！但是如果没有钱，搞起来就形成新的三角债，将来还得我来清啊！据我所知，大多数省区市没有钱，是“赤字财政”，缺口都到银行挂账。光粮食亏损欠补，去年在银行挂账近300亿元，今年第一季度又增加挂账30多亿元。因此，“大干快上”无非是靠扩大银行信贷，靠多发票子。另外，上这么多项目，将来是重复建设怎么办呢？搞基础设施建设我非常赞成，当然也要看能力，但它没有产品积压的危险。搞工业项目，危险就相当大。今年1、2月份企业产成品库存增加了100多亿元，去年辛辛苦苦压掉了库存229亿元，现在一下子就上去了100多亿元。当然，这里有特殊情况，刚才说的糖和棉花都积压得一塌糊涂，那是没办法的，不能把糖扔掉，把棉花扔掉，只好储备起来；另外还有季节性的问题，2月春节前后客运比较多，把货运挤了，所以积压多了一点。但是库存积压还是多了，还是存在着问题，只追求高速度把东西往仓库里塞，这个不行。另外一个问题是，亏损又上升了6.8个百分点，刚压下来又上去了。为什么呢？还不是不讲效益，单纯去追求速度！这些问题不是主流，但要引起我们注意。所以，我今年强调三角债要继续清，限产压库促销要继续搞。今年的流动资金一定要再减少100亿元，不能占用更多的流动资金。如果把这几个关口都把住的话，就不会出什么大的问题。我的意思是说，你胆子大、步子快，还是要用在改革开放上，用在调整结构上，用在提高效益上，千万不要往仓库里使劲。

① 见邓小平《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5页)。

另外，银行贷款也要控制。现在有12个省区市要求多存多贷，说银行存款上去了，应扩大贷款规模。后来人民银行查了一下，12个省区市就是去年存款多了一点，但从多年累计来看都是贷大于存啊。这12个省区市中是不是包括上海，我不大清楚，我也没有查，大体上都是沿海地区。也就是说，过去是内地支援了你们，把资金都贷到你们那儿去了；现在你们刚刚发展了一下，去年存款多了一点儿，但总的并没有多，你们马上就要都贷掉，那国家怎么办？好多地方都占用了资金，去年增加了10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放出基础货币600亿元人民币。去年多收了这么多棉花、这么多粮食、这么多糖料，把资金都压进去了，这钱从哪儿来？都要求多存多贷，实际上你没有多存，最后还不是要国家再多发票子，不是又增加了通货膨胀的潜在危险吗？所以，这些方面还是值得注意的，当然现在还不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只要我们全面、深入地学习领会邓小平同志重要谈话的精神实质，实事求是，真抓实干，工作热情，头脑冷静，就不会发生什么大问题。

四、要加快科技进步的速度

邓小平同志多次强调“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科技不搞上去，搞那么多工业项目没有效益，经济怎么能搞上去？一定要提倡讲科学、靠科学，这才有希望。农药、医药我们过去可以仿制，现在不行了，从明年1月1日开始，要保护知识产权，我们就不能仿造人家的，得自己开发。开发一个新产品不容易啊！要从几万个里面筛选一个，不知要花多少亿美元，难度很大。但如果我们不把科学技术搞上去，不形成自己的开发能力，每年就要多进口农药、医药。现在每年要花十几亿美元，再过10年每年要花30亿美元，那我们辛辛苦苦赚的美元，都买农药了。不买农药怎么办？农业是基础啊！所以，就要加快开发。保护知识产权对我们的一个好处，就是可以刺激我们把科技搞上去。所以，我同化工部商量成立农药集团，就是把长江三角洲的农药企业组成一个集团，里面设置一个研究开发中心，把钱贷给它。还是像上海那个搞法，组织中国科学院系统的科研机构、国家教委系统的科研机构，几路大军联合起来搞开发，要给予他们优惠条件。我在前天向他

们建议，现在上海的大楼盖了那么多，你们的农药研究开发中心赶快去买几幢楼，给科技人员包括海外愿意回来的一人分一套房。但是，这些科技人员要有真才实学，真能够搞科研，再加上给他们优惠条件，这样才能真正把上海建成一个科技中心啊！当然，也不是一个农药研究开发中心就能解决问题。医药集团也准备在河北石家庄搞一个研究开发中心，设在华北医药集团里面。先搞这两个中心，搞好了再在全国推广。

我虽然离开了上海，但我每天看《解放日报》、《文汇报》，总是挂念着在座诸位和上海1300万人民。希望我们大家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把上海的工作做好，为振兴上海、振兴中国而奋斗！

为学与为人

(1992年4月1日)

这是朱镕基同志为清华大学电机系建系60周年撰写的贺文。

四十多年前，母校电机系主任章名涛教授在一次会上对我们讲过这样一段话：

“你们来到清华，既要学会怎样为学，更要学会怎样为人。青年人首先要学为人，然后才是学为学。为人不好，为学再好，也可能成为害群之马。学为人，首先是当一个有骨气的中国人。”

哲人已逝，言犹在耳。清华就是教我们为学，又教我们为人的地方。它以严谨的学风和革命的传统，培育了一代又一代献身革命和建设祖国的“有骨气的中国人”。饮水思源，终生难忘。为学在严，严格认真，严谨求实，严师可出高徒。为人要正，正大光明，正直清廉，正己然后正人。清华电机系行年六十，弟子六千，为人为学，人才辈出。值此建系六十周年大庆，敬录章师名言，愿与同学共勉。

海南要保护好旅游资源

(1992年4月18日)

1992年4月15日至22日，朱镕基同志在海南省考察工作，先后考察了海口、三亚等地。这是朱镕基同志在三亚考察时讲话的主要部分。

1987年我来过三亚，这几年三亚城市面貌变化很大，基础设施建设进展很快，房子盖了不少。三亚的城市总体规划搞出来了，要把规划实施好。三亚是中国最南端的滨海旅游城市，是中国最好的旅游地之一，有着丰富的旅游资源。要很好地保护这些资源，要有一个发展旅游业的战略方针。

除了旅游资源，海洋资源也可以充分利用。搞什么工业都要问一下，是否污染环境？千万不要污染这个环境，千万不要以为搞工业最赚钱，其实搞第三产业最赚钱。围绕服务类的东西可以多搞一点。如果只管搞工业，不问是否污染环境，是不能当三亚市长的。环境保护的标准一定要高，一点都不能放松。工业也要搞，但要搞没污染的工业，如高科技、电子、食品、轻纺工业等，为旅游业服务。

亚龙湾的环境与五年前相比，是更坏而不是更好了。五年前我就讲过要保护这里的环境资源，这样漂亮的沙滩没有几个国家有，不能随便乱丢东西，现在沙子也变黑了。在凤凰机场对面的山顶上盖了点火台，我管它叫烽火台，没什么用，而且对准跑道，妨碍了机场，把点火台盖在“天涯海角”不是挺好吗？脑袋发热就乱盖，要吃大亏的。市主要领导要出去走一走，看一看。我去过法国海滨，那里很漂亮, 大道两边种的是棕榈树，一走进去就是一派热带风光，绿树旁边都是大饭店。亚龙湾要很好地规划，要按照国际标准来搞。当市委书记、市长的，要在规划和发展战略上下工夫。



1992年4月16日，朱镕基在海南省儋县考察华南热带作物学院、华南热带科学研究院植物园。前排左一为国务院生产办副主任王忠禹。

农村要致富，要搞好配套建设，当领导的应该把农民致富的问题解决好。这次我从海南岛西线过来，看到农村基本上还是自然经济，商品经济不发达，猪、牛、羊不圈起来，到处跑，汽车得给牛、羊让路，到处都是猪粪、牛粪，把海南的形象破坏了。海南岛的滨海公路应该是非常漂亮的。要到岛外请一些能工巧匠来帮助发展旅游业，发展经济。要引进人才，特别是科技人才、管理人才。当然，本地人才也要用。目前整个海南的管理水平与内地比，起码要落后十年。管理的关键问题是人的素质，所以，要大胆引进科学家、管理人才、技术人员。人才不一定到外国引进，你们的市长不就是从内地引进来的吗？引进就有“杂交优势”。

要利用这里的自然优势，搞好旅游服务设施建设。要多搞一些旅游景点，让人家来后留得住，来过还想来，不要让人家来一次就不想来了。凤凰机场很快就投入使用了，高速公路也很快就会搞好了，所以，要把景点搞起来，有阳光、沙滩、海水，又有吃的、有住的、有

玩的、有买的，这样才能把人家吸引过来。你们要到外国看一看，如威尼斯、夏威夷、澳大利亚的“黄金海岸”，了解一下什么叫国际水平。不搞成国际水平就没有人来。要认真学习人家的规划。

质量是企业的生命

(1992年4月28日)

1992年4月27日至30日，国务院生产办公室和国家技术监督局在北京召开全国质量工作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经济委员会主管质量工作的副主任、技术监督局局长及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这是朱镕基同志在会上讲话 的主要部分。

我就加强质量工作讲十点意见。

第一，召开这次会议是贯彻邓小平同志重要谈话精神的实际行动。

这次全国质量工作会议，是我们抓经济工作的一个很重要的环节。去年一开始是清理三角债，不解决这个问题，很多企业难以正常运转。要清理三角债，必须抓限产压库促销，否则，企业的包袱很重，效益很低，无力偿债。在抓这些工作以后，大家都感到目前不抓质量不行了。正好在这个时候，邓小平同志发表了南方谈话。这个谈话在国内外引起了广泛而热烈的反响。我们这次会议就是要在邓小平同志重要谈话精神的指引下，把抓好质量作为贯彻邓小平同志重要谈话精神的一个实际行动。

这次会议，我们请了各省区市经委一位主管质量工作的副主任，以及一位技术监督局局长来出席。但是有的地方经委副主任请不来，只来了一个副处长。如果主管质量工作的经委副主任都不来，全国质量工作会议的精神怎样贯彻呢？我觉得不少同志对质量工作兴趣不大。如果说今天开这个会是分钱、分项目，不要请就来了。为了一个项目，可以跑北京几十次；抓抓质量工作，都没有时间了。我们大家都可以反躬自省，包括我自己，我们是不是都那么重视质量？抓质量，不像抓速度、抓项目那样热火朝天。所以，我必须强调一下，我们这次会议就是贯彻邓小平同志重要谈话精神的一个实际行动。邓小平同志很重视质量工作，关于提高质量问题，他讲过多次，大家都应该好好学习。不讲质量，国民经济是搞不上去的。

第二，召开这次全国质量工作会议是为了唤起全民的质量意识，真正认识到“质量是企业的生命”。

我过去讲过，厂长不重视质量不能当厂长，市长不重视质量不能当市长，经委主任不重视质量根本不能当经委主任。质量工作应摆在经济工作的首要地位，“质量第一”嘛！我在上海当市长时提了一个口号：“质量是上海的生命”，是考虑到上海的特殊情况。从全国来说，提出“质量是企业的生命”，总还是可以吧。今天我讲把质量工作摆在经济工作的首要地位，恐怕也会有些争议，那就说摆在重要地位总是可以的吧。我确实感到，现在在许多方面还没有把质量问题摆在重要地位。

我们实行对外开放政策，产品不仅面向国内市场，还要进入国际市场。现在国外产品已大量进入了，因为我们的工业企业太缺乏竞争力了。如果我们再不把自己的产品质量搞上去，企业低负荷生产、亏损严重的状况会愈演愈烈。我们的对外贸易，已经不像改革开放初期只占世界总贸易额的1%到2%，现在已占到5%了。我国几百亿美元的商品出口了，如果质量不行的话，国家的形象就给破坏了。从这个意义上讲，质量问题不仅具有经济意义，甚至具有政治意义，质量本身代表一个国家的形象、一个民族的精神。总之，我们必须树立全民的质量意识，大家都要认识到“质量是企业的生命”，并且真抓实干，这样我们才有可能把质量工作做好。

第三，既要充分肯定质量工作的成绩，又要看到当前质量问题的严重性。

谁都不能否认，改革开放以来的质量管理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不管是什么产品，尤其是市场上的商品，大大地丰富了，质量也大大地提高了。这个成绩要肯定，不然，我们没有信心。但确实也要看到，现在质量问题还是相当严重。一方面，是来自群众的反映。当前，老百姓最关心什么事情呢？回答出乎我的意料，是“中国质量万里行”！可见，群众对质量问题何等关心。产品质量问题与群众的切身利益息息相关。现在的产品质量很不稳定，很多东西的质量都比过去下降了。价格涨了，质量却降低了，谁能不关心这个问题！所以说“中国质量万里行”搞得好，为老百姓说了话，撑了腰，敢于把问题暴露出来。老百姓讲，“中国质量万里行”应该是“中国质量天天行”。另外，用户方面反映：“中国质量万里行”对一些消费品曝了光，但对大东西还没有曝光。

这次会议提出要抓大型装备的质量。如果抓不上去，我们永远不能独立自主。发电设备花了很多钱引进技术，可我国三大动力设备制造基地①目前质量问题还是很多。大化肥设备已经进口21套了，现在还要进口。各地都发展乙烯，但是乙烯的所有装置都得进口。另外，基础件、元器件，如液压件、密封件等的质量，多少年过不了关，这也是影响大型装备质量上不去的重要因素。这些东西质量不好，原因有技术问题，有设备加工精度达不到的问题，重要的还是质量意识和管理水平的问题。像水暖器材、建筑五金的质量也搞不好，这总不是技术问题吧，是不重视质量造成的。大家都有这个体验，家里不是水龙头漏水，就是抽水马桶漏水，或者电源插头、插座不通电等等。元器件的质量不好，材质也不行，造成用户和群众多少损失、多少烦恼啊！

---

① 我国三大动力设备制造基地，分别指上海市的上海电机厂、上海汽轮机厂、上海锅炉厂，黑龙江省哈尔滨市的哈尔滨电机厂、哈尔滨汽轮机厂、哈尔滨锅炉厂，四川省的东方电机厂、东方汽轮机厂、东方锅炉厂。

产品质量问题，实际上存在着“信誉危机”，大家对质量不相信了，没有信任感。产品质量的好坏，不完全取决于一个企业、一个行业。一个零件、一种材料质量不好，可以影响一大片。如果大家都放松质量，后果不堪设想。

第四，解决质量问题的方法是，要把利用市场机制和加强政府监督结合起来。

在目前的条件下，市场机制和行政措施都不能偏废。当然，考验质量首先靠市场的竞争，企业生产要以市场为导向，根据市场需要来生产，靠市场竞争压力逼迫企业改善它的产品质量。过去质量为什么搞不好呢？是因为“皇帝的女儿不愁嫁”、“萝卜决了不洗泥”，多少年都是卖方市场，东西少，市场需求大，生产什么东西都有人要，所以质量上不去。改革开放以来，产品越来越丰富，大多数产品的市场都变成了买方市场。但是，买方市场并没有解决质量问题。我想，这是因为我们还没有一个真正完善的市场，企业的经营机制还没有真正转变。在资本主义国家里，市场非常起作用，哪个产品质量不好就销不掉，

那个企业就有可能破产。在我们这里，市场固然有竞争，这比过去好多了，但是产品质量不好，销不掉，还是照样生产，东西可以放到仓库里去。这是因为企业经营机制、银行风险机制还没有转变。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完全相信市场的作用，以为可以放松领导，取消行政干预和政府监督，是要吃大亏的。利用市场就要赶快促进企业转换经营机制，这是一个很大的题目。即使是有了市场机制，有了企业经营机制的转换，如果我们不抓企业的质量管理，产品的质量还是会搞不好的。我认为，在当前情况下，政府的行政干预、舆论的监督还是十分必要和有效的，绝不能放松。

我还要特别讲一下舆论监督。过去，舆论监督对提高产品质量也作出了贡献。但是，最近的“中国质量万里行”活动，确实在比较集中地、有意识地为质量工作造舆论，让大家提高一点质量意识。我想，“中国质量万里行”不但深受群众的欢迎，而且确实也成为政府各个部门和各企业的“万里行”，对它们帮助很大，引起了很大的震动，促使人们更加重视质量。这个活动的发展方向总的看是健康的，起了很好的作用，党中央、国务院的领导同志对此都是肯定的。所以，舆论监督要继续搞。

政府的监督，最主要的是要继续把国家质量监督抽查这个制度真正完善并坚持下去。有些同志担心，现在强调企业的自主权，很多企业都把质量管理机构、质量检验机构取消了。同志们，这是不行的！企业有自主经营的权利，但还必须有国家的宏观管理，不是说企业可以随便把质量管理机构、质量检验机构取消的。国家还有法令，明文规定企业必须有这方面的机构。有些同志有一种误解，说日本的“全面质量管理”有那么一句话，叫做“产品质量不是检查出来的，是体现在每一个生产过程中间”。因此，他们就说，那就可以不要最后的质量检查，在产品的生产过程中就把质量问题解决了。这种理解是不对的。其实在日本，照样有最后的质量检查，而且是非常严格的。在目前情况下提倡“自主检查”，是不合时宜的，不符合当前企业的状况，那样做会乱套的。根据目前企业的劳动纪律状况，提倡“自主检查、自主装配”，产品不经质量检查就出厂，根本不行。所以，质检机构不能削弱，更不能撤销。各道工序的质量检查要加强，最后的成品质量检查也不能够取消。国家规定的质量监督抽查制度，需要进一步完善。当前，最重

要的是要对质量监督抽查的结果做认真处理。如果光检查不严肃处理，检查多少次也是没有什么用处的。我们要适当地扩大抽查面，但也不能扩大得太多，因为经费没有那么多。如果要扩大到向企业收费，就会增加企业的负担，不允许那么做。所以，国家的质量监督抽查制度，只能作为一种威慑力量，要求企业提高质量。我在这里重申：第一次质量监督抽查不合格，亮“黄牌”，限期整顿；整顿期满后进行第二次抽查，如果再不合格，厂长免职，这里指的是免正厂长的职。厂长不管质量，管什么？一定要严肃这项制度。关于这项制度，过去已经作过规定，国务院批准了这个规定，国家经委原来已经实行过，免掉了几个厂长。现在要继续严格地执行这个规定。不然的话，光靠市场，光靠机制，质量是抓不上去的。当然，我希望质量监督抽查不要重复进行，国家技术监督局已经搞了产品抽查，各地就不要再搞了。一个厂，不要今天国家去查，明天省里去查，后天县里又去查。抽查就是一种威慑力量嘛，要搞突然袭击，使企业感觉到每天都有被抽查的可能。这样，企业才能天天注意质量。质量监督抽查除了要求企业提供检查的样品外，不允许向企业收费。抽查费用从哪里来？希望财政部门给予支持，增加一些质量监督抽查经费。

第五，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对质量工作作出具体部署。

一是根据国务院领导同志的指示和这次会议的文件，各地要制定一个质量工作规划。根据这个规划，对今年怎么抓好质量工作起步，作出具体部署。然后，请各省区市政府集中研究一次，把质量工作抓上去。

二是号召各企业开展质量大检查，普遍都要查。但是，我强调企业自查，不是要各级机关组织很多检查组下去查。要号召企业对自己的产品质量进行大检查，自己看看有什么问题，提出解决质量问题的措施。由企业结合转换经营机制自己搞，拟定一些具体的措施来攻关，把质量工作抓起来。同志们，质量问题主要是管理问题，需要企业发动全体职工自我解剖、自我革命。



1991年7月13日，朱镕基在山东省潍坊第二印染厂查看新产品。

三是加强质量的监督抽查，要搞“突然袭击”式的质量监督抽查。各地区经委和技术监督局的同志，都要去了解一下哪个工厂搞得好、哪个工厂没有动。对那些不动的企业，搞一次质量监督抽查。一次不合格，“黄牌警告”，限期整顿；整顿期满，再搞一次突然袭击的抽查，仍不合格的，把厂长免职。

四是抓好重点行业、重点产品的质量工作。这次会议提出了抓四类产品，这不仅是国家进行质量监督抽查和整改的一个重点，也是各地的重点。第一类，主要是原材料。钢材的质量不高，是做不出合格产品的。现在钢材的产量上得很猛啊！我希望重点要放在质量、品种上面。第二类，是大型装备，特别是发电设备与基础件、元器件。这些东西都是至关重要的，应该也是监督抽查和整改的重点。第三类，是耐用消费品。老百姓买这类产品不容易，质量不好太坑人，要把这些产品的质量抓好。第四类，是影响人身安全、健康的产品。质量问题

一经发生，要从严处理。夏天马上就要来了，不少饮料历次抽查的结果都是只有三分之一左右合格，三分之二都不合格，里面大肠杆菌超标，那怎么行呢？这不但坑人，而且是害人嘛！像这类产品，要作为重点进行抽查并整改。对产品质量差、危害人员生命健康的，甚至于掺假害人致死的人，一定要追究刑事责任，依法从严处理。

五是实行“质量否决权”和质量与分配挂钩。结合经营机制的转换，在企业里只要实行这两条，质量一定能搞得上去。就是要动真格的。要实行“质量否决权”，不能说只要把工业发展速度搞上去了，把产量搞上去了，就“一俊遮百丑”，这个不行！质量跟分配挂钩，每一个生产环节，每一件半成品、零部件，谁生产的产品质量不好，只要检查出来，就应减发谁的奖金和工资。一定要严格执行这两个办法。这方面我们应该多写一些文章，做一些调查，对那些典型事例严肃处理。

根据民航抓正点的经验，我认为质量是可以抓上去的。他们首先严格规定正点统计方法，出了事故认真处理，一丝一毫都不放过。东方航空公司对晚点事故的处理，是很不容易的。过去对机长那是碰不得的，骄娇二气厉害得不得了。这次由于不正点，让一个机长停飞一年、降一级工资，一下子就把整个公司都震动了。今年第一季度民航的正点率从过去的70%提高到86%。许多外国人跟我说，这件事情提高了我们的国际威望。我希望各地区、各部门都认真抓一抓质量工作，把劲头使在这个方面，争取今年见效。

第六，打击制造和销售假冒伪劣产品的违法活动。

这项工作也要动真格的，特别是舆论界，希望能够对这个问题很好地配合宣传。这次会议后，大家都回去好好地研究一下，如何认真地打击制造和销售假冒伪劣产品的违法活动。因为假冒伪劣产品所造成的危害，比质量问题造成的危害要大得多。严格地讲，假冒伪劣产品不能算是个质量问题，它本来就是想骗人。如果不采取严厉的措施来打击，跟质量工作混在一起，“信誉危机”就更严重了。在这个问题上，大家反映有很多困难：一是执法部门打击不力；二是回扣盛行；三是地方保护主义，有些地方，明明知道有人是在制造和销售假冒伪劣产品，却认为这是致富的一种方法，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四是法制不健全，对如何打击制造和销售假冒伪劣产品的违法活动，还没有明确的规定；五是有关部门协同配合不力。在这次会上，要讨论这些问

题。会后，国务院要颁布一项关于打击制造和销售假冒伪劣产品违法活动的法规，做到有法可依。对拿回扣问题，大家倾向的意见是，现在完全禁绝有一定的困难，但要重申回扣绝不能落入个人腰包。如果是经销假冒伪劣产品拿回扣，就要以贪污、受贿论处。对此，国务院将作出一个决定。我希望商业部门要抓一抓这件事情，百货公司应该把假冒伪劣产品赶出去。有些商品进来时，明明知道它们是假冒伪劣产品嘛，但是你收受了人家的回扣，就让进来了。对于这种现象要严肃处理一批，才能把这股风刹住。至于地方保护主义，大家首先要提高认识，这么保护怎么得了呢？全国没有统一的市场，市场机制怎么能形成呢？至于有关部门配合不力问题，要大家共同努力来解决。有些同志埋怨，很多案件送给法院了，法院受理的只有10%。我想，这个事情也不能完全责怪法院。我认为很多事情可以采用行政法规来处理，可以罚款嘛，罚得他倾家荡产，不一定都要通过法院。有的人还可以撤职嘛，谁收受回扣、推销假冒伪劣产品，就把谁的经理、厂长职务撤了。对于危害了人民群众生命健康的，或者造成了很大损害的，把这些人送到法院里去，就要他坐牢，或者是枪毙。凡是查出来是假冒伪劣产品的，一律把它们销毁，就像“扫黄”一样，拿拖拉机把录像带都碾掉，然后一把火烧掉，不要再去折价处理，否则会害死人的。只有这样，采取坚决的措施，才能够制止假冒伪劣产品的泛滥。

第七，管理体制问题。

有些同志提出，各地在质量工作的管理体制上还没有理顺，对开展工作有影响。在去年召开的全国企业技术进步工作会议上，我讲过这个问题。当时我说，我到国务院生产办以后，为了加强质量管理工作，采取了两个措施：一是由国务院生产办副主任兼任国家技术监督局局长，分管质量工作；二是在现有行政隶属关系不变的情况下，国家技术监督局质量管理司再挂一块“国务院生产办质量管理局”的牌子，由国务院生产办和国家技术监督局双重领导。实践证明，这样做对加强质量管理工作是有利的。所以，我现在仍然认为，这样一种体制是好的。我那次讲话以后，武汉市这样做了，上海市技术监督局的质量管理处也同时挂上了“上海市经委质量管理处”的牌子。当然，国务院有规定，机构设置不强调一定要上下对口，但这种体制可供各地参考。另外，如果部门之间在工作中存在矛盾和问题，要提倡这些部门的主

要领导同志直接交换意见，例如国家技术监督局局长和国家商检局局长每月碰头一次。经验证明，只要从工作出发，部门领导出面主动协调配合，问题就可以得到解决。

第八，关于技术改造资金和管理经费问题。

质量的进步，归根到底还是要依靠企业的技术进步。没有技术开发、技术引进、技术改造资金投入，质量也很难上新台阶。有些同志反映，搞质量管理工作没有钱，缺乏“硬”手段，希望能划出一笔资金由管质量的部门掌握，用来支持一些急需解决的质量问题。我认为，现在国务院生产办和各地经委在技术改造、技术引进和科研方面所立的项目，其目的都是直接或间接为了提高质量、发展品种。我在这里强调一下，各地经委、计经委、生产委要认真考虑质量管理部门提出的意见和项目，优先安排为提高产品质量所提出的技术改造、技术攻关项目，并摆在投资重点的第一位。

第九，关于激励机制问题。

有的同志提出，应该制定一些鼓励政策，激励企业提高产品质量。我认为，最主要的是激励机制，要把质量同企业内部的利益分配挂起钩来，充分发挥市场的导向作用。产品质量上去了，打出了名牌，建立了信誉，企业的效益就好了，这是最好的激励。各地要在自己的实践中使之具体化。如果把激励机制理解为要恢复评优、升级活动，那么我在这里郑重宣布：评优、升级活动再也不要搞了，把“评优”转向“治劣”嘛！

第十，把质量抓上去，要依靠各部门、各地区、各条战线齐心协力，共同配合。

我讲的各部门、各地区、各条战线，包括工业企业、非工业部门的企业、乡镇企业、“三资”企业，都要把产品质量抓上去。行业管理部门不仅要管国营企业的产品质量，也应该管集体企业、乡镇企业和“三资”企业的产品质量。对于这一点，农业部乡镇企业局的同志也同意。大家共同来管嘛，共同把质量工作搞好。如何管？一是要通过政府监督、媒体曝光和行政干预等手段，二是要依靠市场。生产部门与流通部门，特别是商业部门和经贸部门，要搞好协作。产品不但包括国内的产品，也包括出口的产品，大家共同管好。流通部门不管、不把

关，工业企业的产品质量也很难提高。另外，就是产业部门要同技术监督、工商行政管理、商检、公安、司法、监察、审计、法院等各方面齐心协力，相互配合，共同把产品质量抓上去。

煤炭行业扭亏增效的关键是提高劳动生产率

(1992年5月20日～29日)

1992年5月20日至29日，朱镕基同志在山西省考察工作，先后考察了大同、太原、阳泉等地的统配煤矿。这是朱镕基同志在考察期间关于发展煤炭工业问题讲话的要点。

国民经济要上一个台阶，山西煤炭工业的发展举足轻重。通过这次调查，我深刻感到山西的煤炭在全国国民经济发展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山西年产2.9亿吨煤，其中1.79亿吨通过铁路运出去，2700万吨通过公路运出去，这2亿吨煤相当于全国调出的商品煤的80%，在全国举足轻重。现在是大家贯彻邓小平同志重要谈话精神、刚开始准备上新台阶的时候，已经感到了各方面的紧张。首先是运输的紧张，但很快也要表现为煤炭的紧张，对这一点千万不要忽视。过去的困难时期我们都经历过，当年在北京京西宾馆开计划会议，实际就是“倒煤”的会议。煤炭决定一切，决定工业发展速度和国民经济发展速度。如果我们不注意煤炭这个问题，就会回到过去那种情况，整个国民经济就上不去。现在，全国工业亏损大户第一是煤炭，第二是石油，全国的亏损补贴的一半就被这两家占了。石油行业虽然亏损，可补贴后它的日子还好过；煤炭行业也有亏损补贴，但日子很不好过，问题比较大。所以说，要扭亏，经济要上一个新台阶，不把煤炭、石油行业搞好是不行的。

现在铁路极不适应形势的发展。全国一天计划要求装19万车煤炭，我们的铁路只能装7.5万车，这样国民经济怎么能上台阶？根本上不去呀！所以，我回去后就会要求铁道部研究这个问题，赶快采取紧急措施，想一切办法提高运力。特别是在山西，山西是中国最重要的煤炭工业基地，山西的铁路运输是战略性的动脉，动脉不畅通，对国民经济的影响极大。其他省区市调进的煤，100吨中就有80吨是从山西来的。不重视山西的铁路运输，就是不懂得中国的经济。经济上台阶要卡就卡在这个地方，现在已经卡在这个地方了。所以说，山西的煤炭

如何运出去，如何打通铁路这一战略性的动脉，这是国民经济发展中战略性的问题，要很好地研究这个问题，重视这个问题。

在这里，我也要向山西省提出一个希望。山西是中国最重要的煤炭资源和煤炭工业基地，过去已经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今后还是要继续重视煤炭工业的发展。这几年，山西煤炭产量上去主要是靠地方煤矿。1978年，山西煤炭产量不到1亿吨，现在增长到2.9亿吨；在增加的2亿吨中，统配矿只增加了5000多万吨。所以，山西还是要大力发展地方煤炭工业，这不是一个赔钱的行业，随着煤炭价格的理顺，成为一个赚钱的行业指日可待。我非常赞成山西省委、省政府关于改造和发展山西地方煤炭工业的思路，应该认真地对待这个问题。要把地方的煤炭工业变成现代化的、有规模效益的。不能够拼资源、拼设备、拼人命。山西的煤炭资源是非常宝贵的，像大同出产的那种煤，不能够乱挖滥采，把它搞掉了，太可惜了，将来有一天我们会后悔的。也不能拼设备，光靠维简费①维持不了简单再生产。更不能拼人命，地方矿特别是乡镇煤矿的人员死亡率太高，不重视安全的问题相当严重。一定要把地方矿改造成为现代化的矿井。不然的话，煤炭价格一放开，地方矿就会没有竞争能力了，就糟糕了。现在煤炭还有个差价，到那个时候地方矿就真困难了。煤炭的价格是一定要放开的，不是三年，就是五年，搞得快也就三年。价格一放开，那就是要靠竞争了。所以，必须抓紧在三年时间内，把地方煤矿改造成为现代化的、具有规模效益的矿井。而且今后开矿，不能够乱挖滥采，一定要有个正规化的程序。应当看到，山西的希望还是在煤炭，煤炭搞好了、搞活了，山西的其他建设就可以上去了。

---

① 维简费，指维持简单再生产的费用。



1992年5月21日，朱镕基在山西省大同市考察云冈煤矿。

煤炭工业现在处于全行业亏损，去年国家补助了57亿元。今年1月到4月又增亏，预计亏损100亿元。这种状况，是难以为继的，这样搞下去是不行的，国家受不了。当前，煤炭工业要狠抓扭亏增盈，要减轻国家对亏损补贴的负担。现在煤价是低，至少比国际市场价低，但低到什么程度值得考虑。不能用政策性亏损来掩盖经营性亏损，要研究和分析成本上升得是否合理，研究挖潜的可能性。煤炭企业摆脱困境就是要贯彻邓小平同志的指示，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煤炭企业的出路要从三个方面考虑：一是调整煤价，进行价格改革；二是挖掘内部潜力，改革企业内部经营机制；三是改革流通体制。三个方面不能只强调调整价格这一个方面。煤炭一旦普遍涨价，全国马上就会有三分之一的企业由潜亏变成明亏，这里不亏，那里就亏一大片，整个工业企业的效益就不高。所以，仅依靠煤炭涨价这一个方面，是不行的。

但是，我不是说煤炭价格就不改革了，是要改革的。应该承认煤炭的价格没有理顺，它的价格低于它的价值，价格构成还不合理，这是我们进行价格改革的一个方向。实际上，每年都采取措施提高煤炭价格。现在，国家物价局有一个方案，就是把目前的指令价、指导价、定向价三种计划价格合并成一个价格，改革后煤矿所得到的好处比现在稍多一点。国家物价局测算的吨煤价格是90元，这样全国的煤炭行业就不亏了。当然，这90元是从全国平均来看的，不是煤矿出厂价。另外还有市场价格，这两种价格并轨还需要几年时间。这样不仅把指令价、指导价、定向价三种计划价格合并了，而且它跟市场价格的差距缩小了，中间倒煤的人就会减少，有一定好处。然后，在这两种价格的基础上，经过几年再完全走向市场定价。要一下子跳到市场价，那也是行不通的，全国很多行业都要亏损，社会就会不稳定。这几年对煤炭价格每吨一年提高5块钱或几块钱不是个办法，提来提去，煤矿没得到多少好处，说是搞了煤炭发展建设，事实上不见得，还是要通过价格改革让企业得到实惠。

另一方面，也不要对提高煤炭价格抱过高期望，因为价格是由供需关系决定的，现在就是把煤炭价格放开了，价格也不一定卖得上去，煤矿也不一定能得到实惠。在我的印象中，大同的煤是实行指令性计划的，到了上海也得每吨120元，而市场价大概是150元到160元。所以，拿1991年跟1984年作对比，用户真正在用煤上花的钱，远远超过煤矿成本的增长。只不过煤矿没有完全拿到涨价后的利润，因为中间环节加价相当大。所以，怎样减少中间环节，把中间环节的钱用于发展煤矿，而不是拿去盖大楼或给各个企业发奖金，这要靠价格改革来解决。但是，如果把宝都押在价格上，靠提价来救煤炭行业，用户也承受不了。因此，不从降低煤炭工业的成本着手，不从减少中间环节的利润流失着手，只是单纯考虑提高价格，那我们的下游工业、用煤单位就会受不了。我说来说去没别的意思，就是说还要把根本的着眼点放在加强企业管理、降低自己的成本方面。

煤炭工业要减轻国家对亏损补贴的负担，扭亏增盈，怎么办呢? 这一路上，我一直在考虑这个问题。通过调查，从最基本的成本分析入手，可以发现目前煤炭工业的主要问题所在。现在，全国的工业成本里80%是原材料，10%是工资，10%是折旧和管理费用，大概是这么

一个构成。这个构成当然是变化的，也就是说，工资占的比重越来越小，原材料的比重越来越小。在西方发达国家，原材料的比重大概在60%以下，我们却占到了80%。从折旧和管理费的比重看，随着现代化、机械化程度的提高，折旧的费用要上升，有机构成要提高。这是全部工业成本的状况。那么煤炭工业的成本呢？它有它的特殊性，根据大同、西山、阳泉矿务局的情况来看，工资占了30%，材料、配件占了30%，折旧加管理费用占了40%。这就是说，煤矿的折旧和管理费用占了很大的比重，原材料的比重并不太高，但是工资的比重并没有减少，相反还增加得特别大。根据阳泉矿务局汇报的成本上涨状况来看，从1984年到1991年，吨煤成本从18.61元上升到50.71元，增加了172%。但是，其中材料的费用从每吨5.54元增加到14元，没有超过172%的幅度；折旧加上管理费也没有超过总成本增加的幅度；唯独工资成本从每吨5.16元上升到每吨15元还多，差不多增加了两倍，相当于1984年的三倍。工资为什么增加得快？我不是说大家的工资、奖金发得多了。煤矿工人很辛苦，而且有生命危险，工资应该高一点。我是说人太多了，你们搞了综合采煤，降低了事故发生率，设备费用大大增加了，可是人员没减下来。机械化的优越性体现在什么地方？人还是那么多，这样搞机械化就没有意思了！现在看来，把成本一项一项地分析，都有潜力可挖，但是其中最大的潜力就是减人。组织减下来的人去搞多种经营、综合利用，发展第三产业。他们又可以创造价值，不吃煤炭“大锅饭”，成本就降下来了，煤矿的实力就增强了，财源就活了。

所以，我想来想去，要扭亏增盈，应该把我们的主要精力放在提高劳动生产率上，减少人员，发展第三产业。这是扭亏增盈的根本途径，也是由我们煤炭工业的特点所决定的。这个观点我从大同讲到太原，又讲到阳泉。

怎样减人？有两个途径：一个途径是，现在煤矿井上的和井下的人员还是多，要用提高机械化的程度来提高工作效率，同时提高井上服务人员的效率，把一部分人减下来。井下不要那么多人，办公室更不要坐那么多人。第二个途径就是发展多种经营，搞第三产业。要争取把人逐步地、有计划地、很快地转到第三产业，转到多种经营，转到资源的综合利用上，包括搞深加工。阳泉矿务局搞的那个喷粉煤深加

工就挣钱很多，吨煤50块钱的成本，卖到150元，这100元是纯利润了。另外，煤矿用的好多零配件，自己就可以做，这些钱就不会被别人赚了，而是自己赚了，这方面潜力很大。这样搞，我相信能把企业搞活，用自己的力量扭亏增盈。当然，搞活企业需要一些外部条件，一个是价格，另一个是运输。但是，你们一定要眼睛向内，立足于挖潜，内因为主，这样才可以解决问题。我们调查了大同的云冈矿，最突出的是多种经营搞得好。云冈矿现在约有1万人，去年生产419万吨煤，3000人在井下，3000人在井上为井下服务，还有3000人在搞多种经营。它的奋斗目标是，在几年内井上加井下采煤的共3000人就够了，再转化3000人去搞多种经营。那就是说，三分之二的人搞多种经营，三分之一的人采煤。我看这个比例非常恰当，也就是说，现在在岗的人多了三分之二。究竟几年能完成转化，具体情况不一样，但这总是本世纪的一个奋斗目标。现在全国的统配煤矿，一共有360多万人。就是说，120万人就够了，有240万人要拉出去搞多种经营、综合利用，发展第三产业，那煤炭工业就繁荣了，就根本不存在亏损问题了。这是有条件可以实现的。

煤矿减人，搞第三产业，首先得转变观念，落实措施。我在云冈矿区访问了一户矿工家庭，女主人37岁，没工作待在家里。我说你可以搞点第三产业。她说不行啊，工人阶级怎么能摆小摊、做生意？很丢脸的。我说卖油条也比吃国家补贴好嘛，为人民服务，为什么不能搞？大家不要认为自己是搞煤的，不能搞多种经营。搞煤的人太多了，都吃“大锅饭”怎么得了！越吃越穷呀！今年一定要抓这件事，措施要落实。扭亏增盈要动真格的，要采取压任务的办法。不压怎么办呢？如果敞开亏下去，去年亏57亿元，今年亏100多亿元，那怎么行呢！大家得想办法呀！不是我在这里胡压、乱压，云冈矿就是采取这个办法，叫做“断奶绝粮，逼上梁山”。他们成立了劳动服务公司，一直发展到内蒙古、北京去啦，开办地毯厂，“打出去”承包经营，把零配件留给自己生产，举办各种行业。现在已经有三分之一的人完全“断奶”，就是工资、奖金都是劳动服务公司负责，不吃矿上的“大锅饭”。有这个现成的典型在这里，证明这是可以做到的。现在有些地方不是一学习邓小平同志的重要谈话，就层层分配高速度的指标吗？省里提出增长16%，地市一级要增长20%，再往下一级要增长22%，这怎么得了！那可不行！但是扭亏增盈还是要动真格的，还真得压一压指标。压指

标要经过分析，不要简单化，不是说一压，就什么问题都解决了。但总还得有点儿行政措施，有点儿压力，领导干部、工人群众才能调动积极性。

其次，要有政策扶持发展多种经营、第三产业，包括资源的综合利用。国务院已经起草了一个关于发展多种经营的规定，对工业富余人员发展第三产业给予减免税收的优惠。需要有这个政策，如果没有这个政策，只是压任务，第三产业是发展不起来的。在政策措施上，还包括国家在贷款上的支持，专门给煤矿一个发展第三产业的专项贷款，不给点儿钱，第三产业也搞不成。

再次，需要有一个机制。请中煤总公司研究一个激励企业发展第三产业的机制，使企业有积极性去发展第三产业，不是被迫地，而是自愿地去发展。如果没有这个机制，企业没有积极性，就变成形式主义了。开个会推广，讲得都挺好，但是回去以后，还是吃他的“大锅饭”。凡是那些多种经营、第三产业搞得好的煤矿，要给他们奖励，工资、奖金可以多发，可以多盖些宿舍，由此增加的收入给他们留一 块，不要什么钱都到上边报账，没有钱就去要。

总之，只要我们的工作做得好，随着价格的改革、多种经营的发展、体制的理顺，煤炭工业三年实现扭亏增盈是可能的。只要大家朝这个方向努力，包括铁路运输、港口运输上去了，煤炭工业的效益就可以发挥出来了。为实现煤炭工业三年扭亏增盈，希望大家共同努力。

希望大寨发展得更好

(1992年5月28日)

这是朱镕基同志在山西省昔阳县大寨村考察时的讲话。

这次到山西，在大同、太原、阳泉进行煤矿调查，阳泉离大寨很近，所以有机会到大寨来访问。虽然看的时间很短，但是给我的印象很深。大寨的农田建设确实了不起。我想，这样一种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治山改土、发展生产的精神，任何时候都应当学习，大寨应当保持和发扬这种精神。如果全省的农田都能像大寨这样改造的话，山西的粮食产量还可以在现在的基础上提高一倍，我认为是有这种可能性的。加强农业的基础建设，农业还可以取得更大的发展。我们应当看到，中国经济的发展、农业生产能力的提高和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确实是在邓小平同志提出了改革开放以后，在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了生产关系，解放了生产力，这样才有了如今农村发展的巨大成就。在这些成就里面，农民是受益最多的，这个我们随处都可以看到。改革开放这十多年来取得的巨大成就里面，农村的变化最大，农民的生活水平提高最多。所以，农村的发展，还是要继续坚持和完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发展农村集体经济，完善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这样农业才能更快、更好地上一个台阶。总之，大寨这种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确实是应该发扬的。大寨也应该在新的形势之下，特别是在邓小平同志发表了重要谈话以后，更好地贯彻邓小平同志的指示精神，发展得更好。在这里，我提三点希望：

第一，解放思想，改革开放。大寨精神要发扬，但大寨过去那种做法也有不少“左”的东西。所以，在新的形势下，要解放思想，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搞改革开放。农村的发展要搞商品生产，这要靠本事，要了解省内外的市场行情，了解搞什么赚钱、搞什么东西是发挥大寨的优势，这样才能发展起来，才能发家致富，才能有所进步。

第二，统筹安排，量力而行。郭凤莲①同志去上海、浙江、江苏等地看了一遍，但不要看花了眼，那些地方跟你这个地方的条件不一

样，那些地方的很多做法对你这个地方也不一定合适。各个地方有各自的实际情况，都要根据当地的具体条件、具体情况，从实际出发来发展自己，这一点要注意。比如你们大寨，530多口人，劳动力才270多个，土地700多亩，就这点儿家底，你能办的事也就这么多。如果搞得太多了，没有重点，可能一件也办不成。安排时要考虑这个问题，到底你有多少人力，有多大财力、物力，特别是农民的素质，因为办好多事是需要技术的，好多技术不是一天两天就可以掌握的。所以，你们不要全面铺开去搞项目，先搞一两个就行了，要有个次序。我觉得，你们首先要把农业搞好。大寨就是靠战天斗地、治山改土起家的，不能把过去艰苦创业的精神丢掉，要认真把农田基本建设搞好，这是你们吃饭的家底，是本钱啊！在搞好农田基本建设的基础上，一定要搞好多种经营。但是搞多种经营也得看条件，你们有没有那么多水呀？能搞什么、不能搞什么，要好好研究。要依靠老农民，依靠知识分子。

---

① 郭凤莲，当时任中共山西省昔阳县委常委、大寨村党支部书记。

第三，自力更生，眼睛向内。典型从来就不是别人树起来的，而是干出来的，是奋斗起来的。外界的扶持只能创造一定的条件。你们要靠自己的积累来发展，也就是以内因为主，靠你们自己干。但是，县里、地区、省里包括我们要给予你们帮助，这是没有问题的。现在外国人还经常来你们这里参观，这也是生财之道。不但是有经济意义的生财之道，而且也有政治意义，要让他们来看看我们中华民族的精神，看看大寨人是怎么干出来的。所以，发展一点旅游业是可以考虑的。你们的路不好，要修一修，还要种树。山头绿化了，路修得很好，梯田也修得很好，外国人一看风景很美，这样旅游业就可以发展起来了。发展旅游，可能比你们办几个工厂还赚钱，这就是商品意识。

总之，今天来大寨，我们学习了很多东西，同时也提出点希望。我们既然来了，说明没有忘记大寨。



1992年5月28日，朱镕基在山西省昔阳县大寨村考察。前排左一为山西省省长王森浩，左二为大寨村党支部书记、全国劳动模范郭凤莲。

(1992年5月31日)

1992年5月13日，原煤炭工业部部长高扬文写了 一份调查报告《反映统配煤矿两大问题》，分析了统配煤矿亏损和不合理摊派等问题，提出了放开煤价等建议。这是朱镕基同志在该报告上的批语。

罗植龄①同志：

在山西和王兴家①同志商量拟定：一、放开市场煤最高限价，二、放开新投产井基建煤价格，三、将指令性、指导性、定向煤三种价格合为一种价，在此基础上按原定加价十元，七月一日出台。请即研定，速报国务院批准实行。

至于高扬文同志提出放开徐州、枣庄矿价格，请你们提出意见。

此件印请王忠禹①、叶青①、胡富国①同志阅示，并印请赵志浩①、陈焕友①同志审阅批示。

朱镕基

5.31

---

① 罗植龄，当时任国家物价局局长。王兴家，当时任国家物价局副局长。王忠禹，当时任国务院经济贸易办公室副主任。叶青，当时任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任。胡富国，当时任能源部副部长兼中国统配煤矿总公司总经理。赵志浩，当时任山东省省长。陈焕友，当时任江苏省省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便笺

罗植蓬同志：

在山西和王森浩同志商量拟定：一、放开市场煤最高限价，二、放开新投产基建煤价格，三、将指令性、指导性、定向煤三种价格合为一种价，在此基础上按原定加价十元，七月一日出台。请即下发，速报国务院批准实行。

至于高扬文同志提出放开徐州、枣庄矿价格，请你们提出意见。

附件印请王忠禹、叶青、胡富国同志阅示，并印请赵志浩、陈焕友同志审阅批示。

朱镕基

5.31.

关于首钢改革发展的意见

(1992年6月4日)

1992年5月22日，邓小平同志到首都钢铁公司视察，肯定了首钢的经验，支持首钢进一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加快发展的设想，并说朱镕基懂经济，你们可以去找他。为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对贯彻邓小平同志在首钢指示的部署，朱镕基同志率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国家计划委员会、国务院经济贸易办公室、财政部、冶金工业部、对外经济贸易部、中国人民银行以及北京市的有关负责同志到首钢调查研究。这是朱镕基同志在首钢调研时讲话的主要部分。

我们今天到首都钢铁公司来，是为了贯彻落实邓小平同志视察首钢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大家知道，今年年初邓小平同志视察南方时发表了重要谈话，全国人民都在进一步解放思想，落实措施，力争国民经济尽快上一个新台阶。在这个时候，首钢的同志在总结已经取得的显著成就和成功经验的基础上，又提出了进一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加快发展的设想。你们学习邓小平同志的重要谈话，跟得很快，做得很好，群众发动得很广泛、很深入，这一点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在这个时候，邓小平同志到首钢视察，肯定了首钢的经验，同时原则同意你们进一步改革开放和发展的设想，这是一件大事，党中央和国务院都非常重视。前天，江泽民同志找我谈了话，表示了对首钢的关心，要我向你们传达。昨天下午，李鹏同志主持国务院会议，对首钢提出的设想和落实邓小平同志的指示，商定了一些原则意见，当然只是原则，很多问题还有待于有关部门具体研究落实。我们今天到首钢来，主要是进一步了解和研究首钢改革开放与发展等方面的情况：第一，根据邓小平同志的指示，研究如何推广首钢的经验；第二，研究首钢如何进一步改革扩权试点。下面，我就上述问题谈一些想法。



1992年6月4日，朱镕基到首都钢铁公司调查研究。前排右一为国家体改委主任陈锦华，右三为国家计委副主任姚振炎。

一、关于如何总结和推广首钢经验问题

我以前也来过首钢几次。这一次再来，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首先，看到工厂的面貌已经改变了。这里不仅是一个工厂，也是个公园，完全没有过去那种破破烂烂的景象了。更重要的是人的精神面貌改变了。我跟首钢的同志们接触，感觉到他们确实是精神饱满、生气勃勃，有一种勇于开拓和进取的精神。现在全国有三分之一的企业明亏，三分之一的企业潜亏，国营大中型企业改善经营管理的任务艰巨得很。有的企业精神面貌好一点，有的企业就不是那么振奋，怨天尤人的比较多。那为什么首钢与这些企业不一样呢？我想，答案就是企业能够自己做主，职工能够自己当家。这也是我学习邓小平同志重要

指示的一个体会。我想，要推广首钢经验，首先要推广这一条，这是第一条经验。

国务院贯彻邓小平同志的指示，最重要的一条，就是深化企业改革，加快转换企业的经营机制。中央4号文件①已把它列为第一条。转换企业的经营机制不只是转换企业内部的机制，最重要的是政府机关的职能要相应转变。如果我们的政府机关还是那么死死地把企业管住，不管宏观，而是管微观，什么事情都要干预，企业的生产经营管理自己不能做主，职工也就不能当家，企业的效益一定搞不上去。所以，我们把制定《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转换经营机制条例》，作为贯彻实施《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的一个补充，就是要创造条件，使企业能够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约束、自我发展，不能再由政府各个部门用行政干预来代替企业作生产经营决策。我觉得这一条是非常重要的，抓住这一条，就找到了目前国营大中型企业搞不活的根本原因。首钢的经验证明，这样做是成功的。首钢成功的经验，给我们一个启示：只要让企业特别是国营大中型企业自主经营，让它有一个自负盈亏的机制，有一个风险机制，不是企业花国家的钱，而是企业花自己的钱，这样一个钱就可以顶两个钱用；如果把企业的钱都收上来再分给它，两个钱也顶不了一个钱用。我在上海工作时就有这个体会。上海原来公共厕所很紧张，各区县不修厕所，说修厕所没钱，因为预算里没这个钱。实行区县包干以后，厕所让各区县自己建，现在上海的厕所漂亮得很。如果你给企业批钱搞项目，人家就跟你诉苦，要的钱很多。你批100万元，实际上让它自己干的话，50万元就够了，你何必管呢？把钱收上来再往下分，分得也不合理，让企业干这个事又不让人家当家做主，它就敞开口花你的钱。刚才，你们介绍了很多情况，首钢自己当家做主的办法多得很，钱也省得很。你给企业钱，就得干预它；它报个计划，还要联合审批，没一年时间文件批不下去；审批以后，政府对项目还得干预，不能搞这个，只能搞那个，“打酱油的钱不能买醋”，七拖八拖黄花菜都凉了，还搞什么？这是一条很重要的教训。

---

① 中央4号文件，指1992年5月22日《中共中央关于加快改革，扩大开放，力争经济更好更快地上一个新台阶的意见》。

第二条经验，加强企业内部经营管理，从严治厂。我在上海工作时就提倡从严治厂。企业如果没有纪律，没有一个规范要求，随随便便，自由操作，后果不堪设想。我看，首钢能够办得这么井井有条，管理严格，产品质量好，是与整个企业科学的经营管理分不开的。首钢内部有一系列健全的制度，包括劳动分配制度。现在企业真正能够把分配拉开差距的不太多，拉开差距不是那么容易，这里有很多内部矛盾呀！我在上海了解闵行区那几个重型机械厂、发电设备厂，他们一到年底都互相打听，你们厂发多少奖金，他们厂发多少奖金，人家发得多，你少发了就不行，工人就不答应啊。不但工厂间的奖金水平要平均，工厂内部的奖金更要平均，不平均就要得罪人，谁敢？企业建立健全一系列的内部经营管理制度，就要从严要求，就要不怕得罪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也是一个很大的课题、难题。

第三条经验，首钢发展多种经营，扩大经营的领域，越搞越活。这也是一条很好的经验。首钢有20多万人，这里有历史遗留的原因。但是，如何在本来不需要这么多人，而又有这么多人的情况下，能够取得效益呢？这就得开展多种经营。生产设备越来越自动化，如果不给下岗的人找出路的话，企业的效益没法提高；都放到社会上去，就会影响社会稳定。我认为，首钢在多种经营方面搞得比较好，不但发展了第三产业，而且搞了比较高级的第三产业或者是其他行业。刚才我们看到首钢不但能生产钢铁，还能够制造生产设备，而且是高科技的设备，可以打到国外去。这个前途是非常远大的，所以我们非常支持把首钢办成一个跨国经营的公司，“打出去”，不但出口商品，而且能够出口技术。中央4号文件强调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力争经济更好更快地上一个新台阶。学习中央4号文件，大家要注意其中有一句话，就是“要把那些有条件的企业集团办成跨国公司”。同志们，这句话就是为首钢这类企业写的，就是希望首钢能办成这样一个跨国公司，不但可以搞钢，也可以搞其他产品。当然，也不是说所有的都能搞，总是有相对优势的嘛，发展第三产业更没有问题了。这是对全国有普遍意义的。

二、关于首钢进一步改革扩权试点问题

首钢送给李鹏同志一个报告，根据昨天李鹏同志主持的国务院会议精神，对这个报告原则上我们都是支持的。但是，具体的实施方案要

与各个有关部门进一步商讨。比如有些问题从首钢提出来是合理的，从发展生产、提高经济效益来讲，也是合理的。但是从宏观方面来看，还需要有一定的程序，要互相商量，从而能够找到一个最佳的选择。比如讲扩大投资立项权，首钢要求有多少自有资金和自筹资金就有多大的投资立项权，这些资金由首钢自行支配。我认为这个要求是合理的。在《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转换经营机制条例》里面就有这一条，只要是企业用自有资金搞建设，不要审批。但是，当需要国家拨款或者是贷款的时候，就需要综合平衡了，国家也有个重点呀，银行也有个风险评估呀，这就要有审批手续。企业用自有资金搞建设不需要审批，但是还有个相关条件问题，因为企业不是光有钱就行了。刚才讲了没有煤不行，有了煤，铁路部门运输跟不上也不行啊！所以，这个问题还得进一步商量。如果这些相关条件已全部具备，不需要国家再投资建设，那当然也不要审批了。如果在现有条件以外，还需要国家各部门或者其他省区市提供相关的外部条件，如煤、电、气、水，那就得商量了。商量就得有个程序，但是我们一定要简化这个程序。

再比如说扩大对外经贸权，原则上我们也是支持的。刚才我讲过，中央4号文件没写上首钢，但有的规定就是针对首钢的。我参与起草了这个文件，就是希望把有条件的企业集团办成跨国公司。但是，有关部门也有一点意见。比如，李岚清①同志昨天说，首钢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公司和国际贸易公司，合并成一个公司、分两个事业部行不行啊？这便于集中领导，便于统一政策，不一定办两个公司。办两个公司虽然都是首钢的，但也容易打架呀。外经、外贸分不开啊。我看这也是一种建设性的意见，可以考虑。自行出口，没问题呀，欢迎首钢扩大出口，进出口权可以给。但另外一个方面，还有一个规定，有个一、二、三类商品出口管理问题。经贸部也在研究进一步改革外贸体制问题，也在解放思想，那些一类、二类商品少列一点，放开得多一点嘛。现在已经研究出了一些措施，尽量缩小国家控制的产品范围，尽量地放宽企业出口经营权限。根据这个总的原则，然后具体到首钢的这两个国际公司应该怎么办，都可以商量。首钢自行审批驻外人员，原则上应该这样，不然怎么搞跨国公司呢？但是，现在首钢这个要求跟现行规定差距较大。差距大总是可以商量一下嘛，原则上应该这样做，否则的话搞不了这个跨国公司。比如说，我们出口的设备坏

了需要修理，电报来了，那里已经停产了，请赶快派人去修。这边呢？还在办签证、办护照，两三个月过去了，人家公司停产两三个月受得了吗？应该做到那边电报来了，这边人马上就去。但如何具体落实，我们来协调一下。比如说，将要求企业自行审批本企业三年到五年期内多次往返的出国人员，改为一年批一次可不可以呀？每年办一次手续，我看这个应该能办到，也可以办到。做生意嘛，需要多次出国，一年办一次手续，以后不要再去办签证，也不要办审批了。但有一些国家，要求中国人不能去得太多，有这种限制，所以还要由综合机关审批一下。还有外汇使用方面的自主权问题，需要跟国家外汇管理局商量一下。金融问题涉及首钢成立财务公司究竟有多大的权力，因为金融是一个统一的系统，究竟首钢财务公司可以有多大的权力，也要商量一下。周正庆②同志和陈锦华③同志都讲了，可以参照中信公司④财务公司的办法来研究。国际上大的企业集团，它的财务公司是怎样一种设置？怎么一个章程？按照国际惯例办事嘛！我们要把首钢办成一个跨国公司，就要按国际惯例办事，组织财务公司也要按国际惯例办。一是参照国内已经实行的中信公司的做法，二是按照国际惯例来研究成立这个首钢财务公司。

---

① 李岚清，当时任对外经济贸易部部长。

② 周正庆，当时任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

③ 陈锦华，当时任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主任。

④ 中信公司，指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

我今天讲的意见，除了我已经指明是江泽民同志、李鹏同志讲的以外，其他全是我个人的意见，如有错误，希望同志们批评指正，反正这个问题还在商讨之中嘛。今天就成立一个小组吧，有关部门的同志和今天来的同志参加，由陈锦华同志牵头，要形成一个文件，报国务院批准。这个文件要能解决问题，现在光有原则性的东西还不好办。落实邓小平同志的指示要快一点，请在一个星期内形成文件初稿，报国务院批准。我讲的这个文件主要包括首钢改革开放和发展等方面的内容，原则上都有了意见，下一步就是商量具体办法了。各个部门的

同志要和首钢接上头，确定联系人，各个部门的同志不要等，要主动找首钢的同志研究落实。

缓解铁路运输紧张状况

(1992年7月16日)

1992年7月14日至18日，铁道部在北京召开全国铁路领导干部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全国铁路系统各单位的负责同志。这是朱镕基同志在会上讲话的主要部分。

全国经济上新台阶，铁路怎么办？我希望通过这次会议，大家都来讨论一下这个问题。铁路运输不适应国民经济发展的状况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加强能源、交通和基础工业，应该说我们党和国家一直非常重视，但这个问题始终没有解决得很好。最近几年，电力搞得比较快，有一系列的优惠政策，尽管现在还不能适应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部分地区还是缺电，但总的来讲，在基础设施方面，电是解决得最好的。发电装机容量达到一年增加1000万千瓦，这个建设速度相当了不起。煤矿现在看来还是一个大问题，不要看煤炭暂时有点积压，一年增加1000万千瓦的发电装机容量，意味着一年必须增加3000万吨煤，但我们并没有相应地建设煤矿，煤炭生产能力的接续还是个问题。我现在很担心，到明年煤炭供应肯定要紧张。统配煤只有5亿吨，其他都是地方煤矿，主要是小煤矿，不少是乱挖乱采，拼资源、拼设备、拼人力。最近，我到山西和河北秦皇岛，希望晋煤外运能多拉一点。经过协调，今年能够多拉1000万吨晋煤出来，并不挤别的物资。但秦皇岛港方面说，无论如何达不到日接3000车。我们给它解决了一些问题，现在每天接卸3100多车。按这个速度，今年多拉1000万吨煤出来应该没有问题。现在的问题是南方各港口不愿多接煤。我告诉有关省市，要煤不是上馆子吃面条，随要随到。你现在不存煤，明年你的经济发展速度上去了，再要煤，运都运不出来，你找我就晚了。石油也越来越紧张，搞不好我国可能成为石油净进口国。东部地区的石油产量要稳住相当困难，西部地区的油怎么运出来？所有的基础设施中，港口落后，海运也落后，船使用多年，该更新的没有更新。比较起来，还是铁路最落后。虽然我们很重视，但这么多年没有很好地解决基础设施，特别是铁路建设落后于国民经济发

展的问题。这个问题之所以长期没有解决，有更深层次的经营机制和管理体制问题，领导也承担了责任，这一点要把它讲清楚。但是，我们怎么办？现在全国经济要上一个新台阶，要赶快把铁路运输搞上去。铁路运输搞上去了，全国的经济就好上台阶了；铁路运输搞不上去，上台阶就受影响，责任是非常重大的。现在铁路运输到处都紧，目前要满足国民经济发展的需求是不可能的事情。今年铁路货运量计划完成15.2亿吨，比去年增长4%，而现在国民经济增长的速度在10%以上，工业生产增长速度超过18%，这个4%怎么能解决问题？煤炭运输，今年上半年只比去年同期增长1.9%，其中统配煤运输还减少了，怎么能满足需求呢？今后三年，预计你们的货运量平均增长速度是2.8%，而工业生产发展速度是百分之十几、百分之二十。所以得出一个结论：即使我们采取种种措施，铁路运输的紧张状况在今后几年不是缓和，而是会更加紧张；铁路负荷不是减轻，而是会加重。在这种形势下，我们没有紧迫感、没有危机感不行。什么叫危机感呢？大家都在贯彻邓小平同志的重要谈话精神，大干快上，结果却都被铁路运输给卡住了，你们这个压力是不好受的。有危机感，就要有责任感。铁路运输现在影响到国民经济的发展，我把这个问题喊得早一点，也可能会解决得好一点。因此，我希望铁路战线的全体同志都能增强这种紧迫感、危机感、责任感。

全国经济要上新台阶，铁路怎么办？一个是近期的措施，另一个是远期的措施，我结合下去调查的体会说一说。从近期来讲，要采取以下措施：

第一，转换企业的经营机制。光你们着急不行，全体铁路职工都要着急，一直到分局长、工班长、小组长，全体职工大家一起着急才行。我一直讲，铁路职工是一支半军事化的队伍，指到哪里打到哪里，队伍的素质是好的。但是，我们这种集中的管理方式在经营管理上也有落后的一面，吃“大锅饭”比较严重。我们一方面要保持优点，加强职工队伍的组织纪律性和思想政治工作，从严要求；另一方面，在经营管理上要进行改革，要放一点权。你们一个企业有几万人，甚至几十万人，要让他们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要给他们包干。如果什么钱都到上面来领，那是无底洞。国务院最近已经通过了《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转换经营机制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很快就要公开

发表了。这个《条例》在很多方面有突破，能制定这样的条例是很不容易的。它增加了企业的自主权，也增加了企业本身的责任，使企业能够自主经营、自负盈亏，推动它进入市场，使它有自我积累、自我改造的能力；同时，又具有自我约束的机制。在投资风险、个人收入分配等方面，有一种约束的机制。在这些方面，我认为《条例》有所突破。我希望你们对《条例》认真地进行宣传、贯彻。只要认真贯彻《条例》，就一定会见到成效，一定能够把企业、基层的积极性调动起来，解决当前铁路方面存在的问题。

第二，加紧进行技术改造。技术改造先搞“短、平、快”措施，能马上见效。根据铁路运输需要，扩建车站、延长股道等等都是“短、平、快”，把设施配套起来，运力就能增加。最快的措施是增加机车车辆，我和国家计委商量，今年增加4亿元的购车费。我们商量，如果铁路资金还不够，就要多少给多少，把铁路所有的车辆厂开动起来。如果车辆厂生产的机车还不够，可以进口。你要钱给钱，要外汇给外汇，只要你实际需要。不把钱用在关键的地方，国民经济能搞上去吗？现在就是铁路卡经济的脖子，不把钱用在铁道上，用到哪里去？还能去搞加工工业吗？目前，加工工业上得很猛，将来是要吃亏的。铁路多修一条，绝对吃不了亏，即使超前也吃不了亏，基础设施建设本来就应该超前的，多花点钱是应该的。把铁路搞上去需要花钱，国家会支持的。总之，技术改造见效快，要抓紧搞。

第三，通过合理的劳动组织，提高劳动效率。要把大家动员起来，把人的积极性充分发挥出来。现在，铁路的维修、施工都要“点”，一要就要很长时间，有的甚至几个小时列车不能通过，影响运输。能不能减少些要“点”的次数，缩短些要“点”的时间，上班就拼命干，减少对运输的干扰和影响？我想，在这方面铁路部门还有很大的潜力。

第四，需要科学的调度管理。调度要长短结合、远近结合，这里面很有学问。我在山西考察时就讲，希望铁路多拉煤，但是绝对不允许以“黑”压“白”，运煤炭挤别的。我一再强调，多拉煤把别的挤掉了不算本事，这不行。我在河南召开大型企业厂长座谈会时，洛阳轴承厂的厂长在会上说：我一个月要41个车皮，只给34个，差7个。我们的轴承都是出口的，人家每个月都等着我的货。由于车皮不足，不能按时交货，把美国市场丢掉了。一车煤炭是几千元，一车轴承价值是150万

元，差距很大，运哪个合算？这个例子使我又体会到，不能用煤炭压其他物资。当然，煤炭的社会效益很大，也不能只看它本身的价值。所以，要合理调度，要了解用户的情况。这方面要由各地的经委来帮助决定轻重缓急，发挥国民经济的最佳效益，把不利影响减到最小程度。铁路运输满足不了需要，就只能挑能够发挥最好效益的来满足。这不是简单地通过今天发几车煤、明天发几车轴承就能解决问题的，需要很好地研究和分析，更讲究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从长远来讲怎么办？铁道部的“八五”计划是按“3、5、6”来安排的，就是修建复线3600公里、电气化铁路5600公里、新线6100公里。按这个安排，“八五”时期前两年因资金不足，没有达到五年的平均建设速度，后三年要补上来，这是最低纲领，必须完成。我提个希望，“八五”计划争取提前一年完成，行不行？有没有这种可能性？所有的项目都提前一年完成，请大家讨论。我想，如果不提前一年，恐怕今后的日子比较难过，“九五”期间的日子更难过。所以，还是要想办法力争提前，提前一年不行，提前半年也好，每个项目都要加快各个环节的工作。我认为京九线是当前矛盾的焦点，应该集中力量打歼灭战，采取分段投资包干的办法。当地的省委书记、省长要共同努力，力争京九线提前一年半全线通车。只要全体动员起来，搞这么一条南北大通道，不是不能提前通车的。提前一年半不行，提前一年也是好的，“时间就是金钱”嘛。要注意的是工作不能议而不决，现在好多事情往往是在那里扯皮。芜湖长江大桥就为公路桥是否与铁路桥修在一起扯皮，扯了那么久啦。铁道部的意见，公路桥、铁路桥一起修，投资省；交通部说，为了便于维修，铁路桥、公路桥要单独修。安徽省赞同铁道部的意见。我说，这个事情实在没有必要扯皮，就得要决断。我别的经验没有，修桥我有经验。我在上海遇到的问题是，有人说黄浦江不能修大桥，要修隧道。南浦大桥是江泽民同志决定修的，杨浦大桥我们决定还是要修。南浦大桥建成后，成为上海一大景观。修杨浦大桥时，有人提出多种多样的造型方案。我们决定按南浦大桥翻版，采取同样的设计，使用同一个施工队伍的原班人马，流水作业，建设速度大大加快，明年下半年就可以通车了。现在，上海体会到这个决策是正确的。如果当时“百花齐放”，总在讨论修这种桥还是那种桥，那到现在根本没有南浦、杨浦两座桥。就是说，该定的事得赶快定。我赞

成京九线搞个领导小组，要有决断能力，能够把沿线各个省市协调起来，采取断然的手段，集中力量打歼灭战，在京九线创造一个铁路修建的高速度。然后，其他各条铁路线都提前半年到一年完工，我看是可能的。

同志们，在近期，我们的铁路运输不能满足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这是肯定的，十年以内也满足不了需要。但是，要尽最大的努力。只要你们千方百计尽了努力，工作有一个大的改善，我想全国人民会谅解你们、支持你们的。我今天在这里表个态：为了提高运输能力，不管是近期的还是远期的，不管是技术改造还是基本建设，不管是劳动组织还是加强管理，你们碰到任何困难以及不能解决的问题，都可以找主管部门解决。该找国家计委的找国家计委，该找国务院经贸办的找国务院经贸办，该找劳动部的找劳动部；他们不能解决的问题，你们来找我；我解决不了，可以找总理。总之，我愿意尽我微薄的力量，和同志们共同把铁路运输和铁路建设搞上去。关于建设资金问题，昨天，我和叶青①同志也商量了，可以想各种办法：第一，从政策上讲，对于铁路建设资金不足部分，由国务院考虑提高铁路运价或提高建设基金水平，积极地推进价格改革；第二，因为国家的拨款有限，铁路部门可以多用一点贷款，扩大一点贷款使用的范围，和建设基金、拨款结合起来使用；第三，调动地方的积极性，鼓励地方修建铁路，并实行“新路新价”。“新路新价”这条原则，国务院已经定了。京九线是新线，当然可以实行新价。但是，怎么实行？你们要研究具体办法，要有可操作性，要有利于运输、有利于建设。

---

① 叶青，当时任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任。

听说明年铁路运营要亏损，李鹏同志非常关心，让我跟李森茂①同志讲，可不能让建设资金被工资等人头费吃掉了。我想，这个问题是不是找一找出路，发展多种经营。因为有各种涨价的因素，提高了运输成本，铁路确有发生亏损的危险。但是，我考察煤矿得出一个体会，现在普遍人浮于事，三个人的饭五个人吃的状况哪个行业都有。铁路系统是个半军事化的组织，我看也存在人浮于事的问题。你们可以把一部分人拉出来搞多种经营，增加财源。我希望铁道部门狠抓一下这件事情，每个铁路局、铁路分局都要有一名负责同志来抓多种经

营，结合企业转换经营机制，把多余的人拉出来搞多种经营、资源综合利用，特别是发展第三产业。我在煤矿考察时反复强调发展多种经营，不要盲目发展加工工业，那是重复建设，将来肯定是站不住脚的。最好的办法是发展第三产业，搞商业，搞服务业，这些东西是不怕多的。拉出来搞多种经营的职工待遇不变、身份不变，还是全民职工。我想，对这项工作，铁道部要抓一抓。你们一共有342万人，才十几万人搞多种经营，这个事业发展潜力很大。我相信，铁路部门在这方面会开辟一条途径。但是，有一条要切记，搞第三产业，不能以车谋私、以票谋私，不能经营车皮、车票。铁道部党组制定的严禁以车、以票谋私的决定是正确的，要坚决执行。如果利用行业的有利条件，去倒卖车皮、车票，就会损坏铁路的声誉，就会败坏党风、路风，甚至毁掉我们的一批干部。对这个问题，各级领导干部务必引起高度重视。

---

① 李森茂，当时任铁道部部长。

最后，我还要强调一下铁路运输安全问题。安全问题是伴随着运输而产生的，任何时候都不能放松。特别是在运输紧张时，更要强调安全。这几年，铁路部门在运输安全方面做了不少工作，见到了成效。但是，这项工作稍有松懈，就会出问题。一出事故，就可能造成车毁人亡，这方面的教训是深刻的。因此，必须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的方针，始终如一地把运输安全工作抓紧抓好。要加强管理，改善设施，确保国家和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确保铁路运输的畅通。

棉花购销体制要改革

(1992年8月8日)

1992年8月5日至8日，国务院在北京召开全国棉花工作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有关负责同志，计划委员会(计划经济委员会)主任，经济委员会主任，供销社主任及棉麻公司经理，农业厅厅长，纺织厅厅长；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有关负责同志；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这是朱镕基同志在会上讲话的主要部分。

一、对当前棉花形势的估计

从1988年以来，棉花供不应求，质量下降，发生了很多问题。去年，国务院决定召开全国棉花工作会议，产供销一条龙来抓。会后，各级党委、政府抓生产和购销，抓质量整顿。国务院派巡视组、联络员、检查组督促工作。今年的形势有了很大转变，棉花由供不应求转为供过于求，国家也增加了储备。由于市场容量有限，纺织工业技术改造跟不上形势变化和市场要求，纺织品库存增大，棉纱产量减少，对棉花的需求增幅减缓。另外，由于化纤比重增加等因素，使得棉花显得多了一些。这是好形势。这种好形势，历史上不常有。上半年纺织工业利税比去年同期下降22.4%，其中利润下降62.8%。第二季度有所好转，但也不是根本性好转。纺织工业的根本出路是技术改造，要上品种、上质量，在国内开拓更大的市场，稳住和扩大国际市场。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轻纺产品直接关系到人民的生活。这两方面的东西多了是好事，物价稳定，国家就稳定，社会就安定，这是改革开放的成绩。但是，太多了也不行，如果积压太多，经济效益就下降，国家负担不起。

现在国家储备棉花2000万担，还不算多，可以再增加一些储备。明年的棉花需要量大概是9000万担。如果纺织工业技术改造加快，也许棉花需要量会增加。要珍惜这个好形势，不要看成是个包袱，而不去做好棉花工作，造成棉花生产的大起大落。农业部认为，对今年的棉花生产不可估计过高。棉花播种面积增加了200万亩，但北方不少地区

干旱严重，死苗、绝收面积相当大。最近，棉铃虫对棉花生长也有影响。农业部预计，1992年的棉花产量接近或相当于去年水平，预计收购量是1.06亿担，去年是1.05亿担。所以不能太乐观，还是要千方百计把棉花生产管理好，把棉花收上来。要保护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二、棉花流通体制问题

这是会议讨论最多、最热烈的问题。大家的一致意见是，棉花的统购统销体制一定要改革。改革方向很明确，最终要放开，即价格放开、经营放开，建立社会主义棉花市场。大家也都同意对现行棉花流通体制进行改革，但认为一定要有计划地逐步进行，不能在很短的时间内全面放开。首先要考虑农村的稳定、农业的稳定，这对整个国民经济是至关重要的，政策只能是逐渐地变化。

今年怎么办？按1992年度预计收购棉花1.06亿担算账，经过反复研究确定，定购9000万担，完全按照既定的政策收购。考虑到中央财政状况，今年国家只能增加棉花储备1000万担。这就是说，1亿担稳住了。从国家宏观考虑，如果现在不搞一点市场调节，完全统购统销，不给农民一点市场信息，他们就不会去调整农产品结构，明年的棉花种植面积很可能会再扩大，棉花产量还要大量增加。到那个时候，各方面都会非常困难，棉农的利益也保护不了。我们反复研究，也非常尊重棉花产区同志的意见，政策确实需要稳定，搞市场调节要慎重，不能大幅度影响棉农的利益。但不给农民一点信息，不搞一点市场调节，也不好。两个方面都要考虑：一方面，对现行棉花流通体制总的是要进行改革，非改不可；另一方面，政策要相对稳定，政策的调整要有利于农村的稳定，不能出现棉贱伤农的情况。因此，1992年度的棉花购销体制还是要做一点改革，前进一步，要搞一点棉花市场。如果一步不走，到1993年度再改，很可能落空，困难会越来越大，改革还会推迟到1994年。我们的意见，由各产棉省区根据自己的承受能力分散决策。其范围最多无非是1600万担棉花进入批发市场，但必须是一个有宏观调控的棉花市场，不是完全根据市场需求来定价，因为需要量就是9000万担。如果自由定价，棉花价格就会下降得很厉害，要制定保护价。国家首先通过1000万担中央储备去调控市场，市场价格下降时，就用保护价去收购棉花，把市场价格稳定下来。一旦由中央储备的1000万担指标收购完了，再把600万担的地方储备作为调控手段收

购，就能始终把棉花收购价格稳定在保护价上。如果大家认为把1600万担都拿去搞市场调节的影响太大，那就搞600万担。1000万担还是按现行政策统一收购，收购之后，再让600万担进入市场，由地方去制定保护价。有宏观调控的棉花市场，保护价格的“度”可以由地方掌握。如果地方觉得照顾稳定多一点，慎重一点，就把保护价格水平定高一点；如果根据地方的情况觉得应给农民一个比较强的信号，那就把保护价格水平定低一点。保护价完全可以由各省区分散决策。总之，要有点差别，给农民一个信息，棉花种得过多，价格就卖不上去。希望主要产棉省区开一个市场调节的小口子，进行一点试验。但是，各省区都搞看来有困难，希望山东、河南先行一步。其他地方的棉花市场很小，影响和作用也小。山东是产棉大省，也是主要调出省，影响到很多销区，将来势必要开放棉花市场。河南有郑州粮食批发市场，积累了经验，虽然现在成交量不太大，但这套操作规范、电子系统、经纪人、报价系统已建立起来了，再增加棉花一个品种也很方便。对其他省区，我们不做硬性要求。总而言之，决策权下放，由各省区自己决定，根据具体情况，搞得更好一点，不强求统一。

至于1993年度的棉花购销体制改革，我们请国家体改委提了一个意见，提出了几种思路，无非是一个走得快一点，一个走得慢一点。第一个思路，走得快一点，叫做“全面推进，一次放开”。今年的棉花集中收购任务基本完成以后，主要产棉省区立即着手建立棉花市场体系，经过八九个月的准备，从1993年度新棉上市起，全面放开棉花市场，包括价格和经营渠道。其实就是放开价格，放开经营，放开市场，国家不再给直接的补贴，只是在必要时，通过棉花批发市场以最低保护价收购储备棉的方式，实施对棉农利益的保护。这个改革思路的步子比较大，好处在于避免价格“双轨制”造成的弊病，但是风险比较大，需要一定的条件。第二个思路，慎重一点，叫做“分散决策，逐步推进”。对总的体制面上不做大的改革，而是通过试点，一个地方一个地方地搞。可以考虑取消棉花调拨的指令性计划，纺织企业和棉花经营企业以市场会员的身份在市场上签订供需合同，或通过其他方式稳定供需关系，协商定价，实行保证金制度；同时也要调控市场，保护棉农的利益。销区直接到产区农村去挑棉花，恐怕不是个办法，还是要在批发市场上交易。1993年度搞一两个，1994年度再搞一两个，我们估计搞三年，到1995年，棉花流通体制的改革就基本上完成了。这就是“分

散决策，逐步推进”。会后请国家体改委再找一些同志座谈，搞一个框架性的意见，然后发给大家。各省区自己也要提出个基本思路，准备哪一年进行试点、根据试点内容可以做到哪几点，然后报到国务院，争取在今年9月份作出决策。



1991年11月18日，朱镕基在江苏省无锡市考察国棉二厂。左三为江苏省省长陈焕友。

三、供需挂钩问题

很多同志提出意见，现在企业转换经营机制，企业自己有采购权，应该由它自己去采购棉花，怎么还搞产销区省市间的挂钩呢？他们认为这不符合改革的方向。说老实话，这是有一点行政干预。因为现在棉花是供过于求，纺织企业非常困难，棉农的利益又要保护。现在不搞以省市为基础的挂钩，棉花就调不出来，棉花供销之间就会发生很大混乱。所以，实行供需挂钩，是为了保护产区的利益，同时也要求销区的政府作一点贡献。如果政府不去督促企业把棉花调出来，棉花就调不出来了，现在许多棉花送货上门都送不出去，因此，1992年度

要搞一年供需挂钩。1993年度怎么搞，要看棉花购销体制改革后的情况再定。

四、收购资金问题

会议讨论最多的是棉花购销体制问题。究竟强调稳定多一点好，还是强调改革多一点好，大家讨论得比较多。实际上，我认为问题最大的是收购资金。同志们千万不要轻视这个问题，因为1991年度的收购资金就没有完全解决。纺织厂欠了供销社80多亿元，把资金都占用了，今年需要的收购资金，目前看来至少还有一半没有落实。这个问题要是不解决，收购仍然“打白条”，影响到农村稳定，恐怕问题就更大了。我希望中央和地方，上上下下都要重视这个问题，要首先保证农产品收购资金，不能挪用去干别的，把钱都占用了，结果没钱去收购，农村就不稳定，这苦头我们是吃过的。最大的宏观调控就是要保证农业的稳定。

中国人民银行、中国农业银行要高度重视收购资金问题，要尽快拿出一些具体办法和解决措施。地方政府、银行、供销社要积极想办法，挖掘资金潜力，多方筹措。地方企业欠的款，地方政府要帮助解决。现在供销社占压了很多资金，有工业欠款，有储备棉，还有超正常库存。这些占压的资金，比如纺织厂欠的80多亿元，农业银行不要罚息，也不加息。总之要千方百计，大家来想办法，把资金搞活，保证收购工作更好地进行。国务院经贸办、人民银行、商业部，各方面都要密切注视这个问题，及时向国务院反映，及时解决资金在收购、调拨中的一些问题，不要影响棉花收购工作。

五、地方优惠措施问题

地方优惠措施是不是保留，由各省区政府来决定。国务院发过几次文件，去年的全国棉花工作会议上也明确过，就是一切优惠措施都要体现在生产过程中，不能体现在价格上，也就是不同意价外加价。价格很高不是也卖不出去吗？原则上，原来进入收购和供应价格的地方优惠措施，应当停止实行，有什么困难，再具体解决。

六、棉花进出口问题

这次会上，大家的意见比较一致了。经贸部赞成给各省区市棉花进出口权，中国纺织品进出口总公司的棉花进出口公司是中央的，要与各省区市的棉花进出口公司脱钩。批准各省区市棉花经营单位有棉花进出口经营权，可以进口，也可以出口，自负盈亏，国家没有补贴。当然，国家要实行宏观管理，价格要协调，不要搞低价倾销，如果你一个价，我一个价，谁也卖不出去了。还是由经贸部来管，经贸部考虑要成立行业协会来协调定价。我们希望采取措施多出口一点，希望产区省千方百计，哪怕给一点补贴，也要争取把棉花多出口一点。因此，我们赞成而且主张把这个权力下放。

最后一个问题，就是为了保证今年棉花收购工作的顺利进行，要保证棉花的收购质量。去年采取的有效措施，如国务院派出巡视组、在各纤维检验局设联络员，在一些省际边界地区起了很好的作用。去年的棉花质量比前几年有很大提高，今年要继续进行这些工作。据纺织部反映，还是有个别地区的棉花等级不到位；另外，亏重比较普遍。请同志们今年要加以注意，不要放松，不要认为现在棉花供大于求，就可以不重视这个问题了。特别是在开一点小口子、搞一点棉花市场的问题上，如衔接得不好，很可能定购计划内的棉花质量又不能保证了。当然总的趋势，我们还是要防止压级压价，由于棉花多，供销社在收购棉花时，对压级压价的问题要特别注意。因为无论我们考虑得怎么周到，怎么稳定政策，怎么保护农民利益，实际上农民利益是下降的。一定要考虑到这个因素。如果再压级压价，农民受很大的损失，就会影响整个农村的稳定，希望能够加以注意。

对民航发展的想法

(1992年8月10日)

这是朱镕基同志与中国民用航空局主要负责同志谈话的主要部分。

我在8月1日从南京回来，8月3日中央政治局常委开会，主要议题讨论完后，江泽民同志让我讲了南京空难①的情况，我也汇报了民航任务与能力不相适应的问题，常委们对此都很关心。今天请你们来，是想讲讲我的想法。

---

① 1992年7月31日，中国通用航空公司由南京飞往厦门的GP7552次航班B2755号雅克42型飞机，在南京机场起飞时冲出跑道，撞向机场的防护提，起火爆炸，机身断裂成三截。机上126名乘客和机组人员中，死亡107人。

我思考了很久，民航非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不可。现在的状况是任务和能力远远不能适应。改革开放以来，各项事业发展很快，民航跟不上，卡住“脖子”，进不来、出不去，国内抱怨、国外评论很多。虽然民航作了很大的努力，但民航的现状与国家改革开放、国民经济发展的差距太大。这不是谁的责任的问题，而是经济发展长期结构失调的客观反映。当前由于任务的压力，民航的发展速度很快，人员素质、机场设施都跟不上，非出事不可。今后可能还要出事，我很担心。

我分管民航一年多，随着逐步了解和加深认识，感到问题很大。我指出这一点，并不是批评民航，而是强调民航是个薄弱环节，呼吁各方面去支持它、加强它。

怎么办？无非是从主观和客观两方面去找原因，认真研究，加以解决。客观方面包括飞机购置、机场设施建设、机务维修以及解决空中走廊等问题。国家要下大的决心增加投入，一个一个地解决。请你们的计划部门全面研究一下，今后三年、十年要解决些什么问题。另一

方面是主观原因：第一是加强干部队伍的建设，提高人员的素质；第二是管理从严，要严格要求；第三是改革现行管理体制。

提高职工队伍的素质，必须加强培训。听说中国民航飞行学院每年培训出来的飞行人员不到200人，要求还不是太高。地方要成立航空公司，不够条件的不能同意。民航局要从国家的角度进行管理。为适应民航发展的需要，我想民航飞行学院要达到每年招400人的水平。当然，对民航飞行学院要给钱，要加强领导班子。师资很重要，要再进些人。要增加对飞行训练设备的投入，如要搞飞行模拟机等。我到新西兰访问，人家国家虽小，但飞行训练设备很先进，飞行模拟机可以模拟在东京等许多世界级大城市的机场降落。我见到了在那里培训的中国国际航空公司的飞行员。“软件”跟不上是个大问题，但“硬件”可以先上嘛。

如果自己培养飞行员短期内不能满足需要，可以送飞行员到国外去培训，你们的思想要解放一些。我在这里帮你们定两条原则：一是宁可多花点钱，也要培养高级的飞行员；二是不要怕他们跑，毕竟跑的是少数。当然，我们要挑选优秀的人员派出国，尽可能做好工作，争取不跑或跑得少一点。

另外，要提高飞行人员的工资。为什么？因为他们从事的工作有个风险问题，工资应该高。我在1984年曾乘美国联合航空公司的航班，坐在我旁边的就是这个航班一个飞行员的夫人。她告诉我，她丈夫每年工资是十几万美元。我问为什么工资这么高？她说她整天提心吊胆，工资高，风险也大。这件事应该通过贯彻落实《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转换经营机制条例》(以下简称《条例》)来实现，企业有权决定工资分配的形式，拉开工资的档次。《条例》规定工资总额和经济效益的增长挂钩。例如去年工资总额是1000万元，今年实现利税增长10%，工资总额可以是1100万元。发多少？怎么发？国家不管，劳动部门也不要管，你们自己有权决定。工资高，待遇好，就应该严格要求。地区差别问题由民航局来协调，差别还是可能有的。如何巩固、加强和发展空勤人员的队伍，要从各方面考虑：一是加强培训力度，扩大培训范围；二是送到国外去培训；三是提高飞行人员的工资，调动积极性，稳定队伍。

要加强机务建设，现在我们的机务距离国际先进水平差得太远了。北京飞机维修工程有限公司是你们民航目前最强的机务部门，但它的问题也非常多，其他机务部门就更差了。要采取根本性的措施。据我所知，北京飞机维修工程有限公司的费用这么高，如果不是你们进行行政干预，其他航空公司的飞机宁肯送到国外去修，也不会送到它那里去修。我听到的反映是，北京飞机维修工程有限公司的维修质量不太好。包括万里委员长上次访问日本和我这次去南京处理空难事故乘坐的飞机，都是不完全适航的。

上周，我会见了德国经济合作部前国务秘书冷格尔，这个人是我的好朋友。北京飞机维修工程有限公司的胡佩①也跟着来了，他提了三个问题：一是投资问题，二是中方合作者无能，三是出国培训的审批问题。我告诉他，这些问题是可以解决的。同时，我也坦率地对他说，用户对你们的意见也很大，要改进工作。胡佩也认账。我熟悉德国人是通过上海大众汽车公司。他们谈判非常认真，寸土必争、寸权不让，但他们信守合同。我们应该要求他们严格按照合同办事，不能在他们面前显得软弱无能，要把合同规定的权利拿到手。当然，现在的合同不完备，也就不好说了，要研究调整。

---

① 胡佩，即威尔内·胡佩，当时任北京飞机维修工程有限公司总经理。

北京飞机维修工程有限公司的领导班子一定要加强，引进一些人才行不行？机务的重要性不得了。要派既讲原则、又有管理能力的企业家去。现在已把“心脏部门”交给人家了，只好吸取教训。总之，怎么加强机务的建设，要认真研究，提出措施。

赶快提高我们的管理水平，首先就是要从严。有一次，我在上海机场迎接一位外国总统，客梯车出了问题，总统下不来飞机。要是我管，就得把那个负责的干部撤了。不然没有纪律，什么都无所谓，不知还要出什么事！这次南京空难，就是由于飞行员不按规程办事，断送了自己和100多人的生命。民航的管理太松了，太不严格，真令人胆寒。如果我们再不严格要求，再不认真处理，对这些人和事的宽容，

就是对人民的犯罪。希望我们都要有点“豁出去”的精神，不要怕得罪人，不要考虑个人得失。

通过这次事故，要把坏事变成好事。民航局全局上下要真正吸取教训，严格按操作规程办事，增强全局工作人员的自觉性、责任感。你们要强硬一些，一定要严格要求，违反规章造成严重后果的，不管是谁都要从严处理。

还有，要改革管理体制。改革开放，要大胆地改。我们没有能力飞的国内航线，让外国人飞，放他们进来嘛。昨天，丁关根同志转来一个文件，反映的是新加坡提出新加坡航空公司要飞贵州没有得到许可。为了改革开放，自己飞不了的航线，可以先让别人飞，以后我们有能力时再对等。对于这个问题，上下都要通。看来，你们局领导是认真贯彻的，但下边可能还不太通。

对地方航空公司的发展要热情支持，要一视同仁。他们的条件不够，要帮助他们创造；他们的飞行员不行，要帮助他们培养。同时，对他们也要严格要求，不合格的不签字，不能讲情面。另外，关于机场管理一定要权力下放，组织机场管理委员会，先从上海开始，一个一个地搞，搞出一个模式，政企分开，平等竞争。人事总是要有人管的，你们鞭长莫及，就交给地方党委，让他们去管理、去负责。他们花钱建设机场，但管理权一点不给人家，也实在说不过去。从上海开始下放权力，这也是江泽民同志的意见；李鹏同志也明确说了，同意下放权力。因为上海的力量比较强、比较集中，相信上海可以管好。如果在上海下放权力成功了，除了北京，其他地区都可以下放。只下放中小机场，推广的意义不大。机场一下放，对所有的航空公司就会一视同仁。民航局政企分开，也能做到公正。

办公司、建机场，允许外国人投资、参股建设，但这也不能一哄而起，而且管理权要掌握在我们手里。外国人投资、参股机场建设，他们要的是经营免税商店和安排地勤人员就业的权利，这样他们才能赚钱，收回他们的投资。这对我们的机场管理并无大碍，好处是可以利用外资加快机场建设。

在部分省市股票市场试点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

(1992年8月13日)

1992年8月12日至13日，国务院在北京召开部分省市股票市场试点工作座谈会。出席会议的有部分省、直辖市和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这是朱镕基同志在会上讲话的主要部分。

邓小平同志视察南方发表重要谈话以后，全国改革开放事业出现了蓬勃发展的势头。邓小平同志指出："证券、股市，这些东西究竟好不好，有没有危险，是不是资本主义独有的东西，社会主义能不能用？允许看，但要坚决地试。"①邓小平同志这个讲话解决了证券、股市姓"资"姓"社"的问题，消除了人们思想中的疑虑，我们可以大胆地进行探索和试验了。

---

① 见邓小平《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3页)。

股份制和股票市场在世界上已有几百年的历史，最初是为了扩大经济规模和分散投资风险而发展起来的。它对于经济的发展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第一，为经济发展筹集低成本的资金，降低投资风险，加速经济增长；第二，通过投资者的监督和市场的压力，促使企业改善经营管理；第三，有利于按照市场的需要，优化资源配置，调整产业结构。

但是，股份制和股票市场的积极作用，只有在一定的条件下才能得到发挥。从市场发展的一般规律看，资本市场总是在商品市场(包括消费品市场和投资品市场)发展到一定程度后才有可能建立和发育。现在，我国商品市场还不健全，还有相当一部分商品的价格受到控制而扭曲，企业的盈利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国家政策的影响。在这种企业经营的外部环境很不确定的情况下，不能指望股份制和股票市场能很快地发展。股份制有利于实现政企分开，但是另一方面，股份制本身并不一定就能解决经营者的自我约束机制问题。要解决这一问题，必须

借助于市场竞争和经理人才竞争机制的形式，以及各种法律法规和各种中介机构的建立和健全。当然，这都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做到的。经济体制改革是一个庞大复杂的系统工程，任何单项改革都不能孤军深入，股份制这种在商品经济发展到比较高级的阶段才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企业组织形式，也不能脱离其他方面改革的进程而先期获得成功。

股票市场既有其积极的一面，还有消极的一面。如果脱离法律化、规范化的轨道，也会出现过度投机，损害公众利益，造成货币幻觉，形成泡沫经济，引起经济波动，诱发社会问题。

这次深圳发行股票认购证中发生的问题①，香港报纸把它归纳成为一句话，究其原因，就是不成熟的市场经济所造成的。这种看法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注意。

---

① 1992年8月7日，中国人民银行深圳经济特区分行等单位发布1992年新股认购抽签表发售公告宣布，在8月9日发售新股认购抽签表500万张，每张身份证可以买1张抽签表，每人一次最多买10张表，然后将在适当的时候，一次性抽出50万张有效柚签表，中签率为10%。结果引来全国各地近百万人涌入深圳，彻夜排队抢购，造成轰动一时的“深圳股票认购证风波”。

对证券、股市的试验，邓小平同志是十分慎重的，他指出：“看对了，搞一两年对了，放开；错了，纠正，关了就是了。关，也可以快关，也可以慢关，也可以留一点尾巴。怕什么，坚持这种态度就不要紧，就不会犯大错误。”①我们要全面理解邓小平同志的重要指示。只要我们实事求是，坚决按邓小平同志的指示办，积极地创造条件，配套地进行改革，就可以使股份制和股票市场试点健康、稳妥地发展。

---

① 见邓小平《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3页)。

今年以来，股份制的试点和股票发行交易工作都有了很大的发展。党中央、国务院对这项改革十分关心，江泽民同志、李鹏同志多次主持讨论，并且经常给以明确、具体的指示。国务院、各有关部门和各

地政府也做了大量的工作，从总体上看，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也要看到，股票市场的来势很猛，在一些地区出现了不同程度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有关立法和专管机构还不健全，而一些地方违反国务院有关规定，不顾条件是否具备，擅自批准公开发行股票、开办交易所，造成一定程度的混乱。国务院已通报批评了一些省市擅自发行股票、债券的行为。据我所知，还有一些省市实际上也已经发行了股票，我们还没有来得及查明。

第二，群众缺乏必要的金融风险意识，对股票存在种种模糊的认识，以为买股票就能发大财，盲目入市，使我国股票市盈率远远高于世界各国的平均水平。市盈率就是股票每股的价格除以每股收益。一般是十倍左右，在香港最多也就是几十倍。我们现在已经达到几百倍，有的甚至达到一千倍。这显然是不正常的。如果这种股票热任其升温，势必导致股市崩盘，引起震动。

第三，非法投机者也趁热蜂拥而起，甚至同我们干部中一些意志薄弱者勾结起来，搞人情股、关系股。一些机构，包括某些金融机构，很多公司也违反规定趁机入市，甚至与不法分子联手作弊，操纵市场。这种丑恶现象不仅引起群众不满，在国外也造成不良影响。外国报纸说，中国民间游资充斥。为什么群众手里有这么多钱？同志们，不是群众手里有这么多钱，其实都是公家的钱，是银行的钱，或者企业、公司拿银行的钱去炒股。今年上半年，全国信贷规模超过计划一倍，其中不少流入了股市。

第四，一些证券中介机构素质不高。一些地方的会计师事务所和资产评估机构，不具备基本的业务素质，不但审查不严，甚至作伪证。我们的政府如果放过这种恶劣行为，不能保护公众利益，就是失职、渎职。

第五，没有掌握股票发行市场的一般规律，借鉴国外的成熟经验也不够。我觉得要按国际惯例试一试：一是不限量供应认购证；二是只收工本费；三是核对身份证，一人买一份。我看这个办法不会引起那么大的混乱。香港的办法，是在领申请表的同时，把钱一起交上，中了签的，把股票给你，没中签的，把钱退给你。这种办法有的同志说

会造成大量的资金流入深圳，但这是短期的，抽签完了，资金还会汇回去。自己的办法不行，就不要轻易否定国际通行的办法。总之，在没有经过实践证明可行的办法以前，不能轻率地公开发行股票。再出事，国内外影响都不好。

第六，不少地方和企业急于通过发行股票，筹集资金上项目，扩大投资规模。这样会使已经十分紧张的能源、交通、原材料的供求矛盾更加突出。目前，间接融资的规模已经偏大，直接融资的增长势头也很猛，存在着诱发通货膨胀的危险。

当前出现的股票热，受到国内外的关注。不少新加坡、中国香港等境外的政界、经济学界人士和新闻媒体普遍认为，发展中国家建立股票市场“宜慢不宜快”。这方面，印度尼西亚、印度等国家都有过痛苦的教训。即使那些股票市场历史悠久的西方发达国家，也不时被突然而至的股市风暴所困扰。一些日本专家认为，筹集资金和转换企业经营机制，也并不必须偏重于股份制一途。日本企业在经济高速增长期间，主要采取由银行吸收存款的间接筹资方式，以降低筹资成本、减少投资失误、增强企业竞争力以及保障居民金融资产的安全性。这是国际公认的成功经验。我们应当认真地研究和借鉴这些经验。

这次会议上有人提出一个观点：“为什么形成股票热？就是因为供求失衡，筹码不够。解决办法就是再多发股票。”这个观点只考虑一个方面，没有考虑另外一个方面。股票市场虽然也受供求规律的支配，但是它不同于一般的商品市场的供求规律，而是带有极大的投机性，对群众心理的影响特别大。另外，中国有自己的特殊情况，股民缺乏风险意识，现实就是股票赚大钱，这当然刺激他们的需求，这种需求是满足不了的。

为了保证股份制和股票市场试点工作的健康发展，必须在国务院的统一领导下，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展这项工作。目前，要重申国务院和各有关部门的规定，坚持稳妥试点的原则，一方面总结经验，另一方面健全法律法规和创造必要的条件。待条件具备后，再考虑逐步推开。

下面，我根据党中央、国务院确定的方针，讲几点个人的意见：

一、进一步规范股份制和股票市场

首先，要加强股份制和股票市场的法规起草工作。前一段，国务院有关部委曾先后下发了《股份制企业试点办法》、《股份有限公司规范意见》、《有限责任公司规范意见》等近十个有关股份制规范的意见，这只是一系列股份制与证券市场法规配套文件的一部分。国家体改委要牵头抓紧起草证券法、股票发行与交易管理规定，报全国人大或国务院批准后，尽快颁布。法规和各种办法不可能在一开始就尽善尽美，这需要在实践过程中根据出现的情况和问题不断修改、不断完善。全国性的法律、法规颁布后，各地地方性法规与之相矛盾的，要以全国性法律、法规为准，不能各自为政，降低股份制和股票市场的规范标准。同时，要力求与国际惯例接轨。

其次，要加强股票市场中介机构和证券交易所的建设。包括证券公司、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资信评估机构等，保证股票发行与上市公司的质量，这样既维护了国家的利益，又保护了投资者的利益。我们股票市场的中介机构要向国际标准看齐。财政部要参照国外有关法规，抓紧制定对会计师事务所的管理办法，这会有利于保证股份制与股票市场试点工作的顺利进行。

另外，股份有限公司的组织和运作要规范化，各试点地区和单位要根据目前已颁布的法规，对股份公司进行规范，对一些不规范的行为要加以纠正。只有做好股份制企业的规范化工作，打好基础，才能保证上市公司的质量。

对这次会议以前一些地方擅自批准成立的股份制公司和发行的股票，也要认真做好善后处理工作，要区别不同情况，按照国务院有关部门的规定进行规范和清理。

二、加强股票市场的监管工作

为了加强对股票市场试点的统一领导，国务院建立了证券管理办公会议制度，代表国务院行使对证券市场的管理职权。现在的证券市场在我国还仅仅是最近几年才出现的新事物，我们还没有监管的经验，要借鉴和吸收其他国家成熟的、行之有效的管理经验，结合我国的实践，建立符合我国国情的监管体系。

国务院已决定组建国务院证券委员会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国务院证券委员会是列入国务院序列的独立机构，负责统一协调股票、债券、国库券的有关政策，负责宏观管理和指导监督。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是准官方或半官半民的监督管理组织，不是政府部门，由有证券方面知识和经验的同志和有关专家组成，其职能就是根据国务院授权，对证券市场进行稽核、检查和监管。在这两个机构没有成立之前，各部门仍应各司其职，工作中的矛盾由国务院证券管理办公会议统一协调解决。同时，股票市场的运作，基本上是依法进行的微观经济活动，要更多地依靠从业机构的自律管理，政府部门主要是立法和依法监管。政府部门过多的介入和直接干预，不利于保持政府公正、超脱的地位，也容易把所有风险都推到政府身上。

为了保证试点工作的顺利进行，保证股票公开、公平、公正地发行和交易，促进股票试点工作的健康发展，要抑制投机行为，对人为操纵、内外勾结、利用内幕消息进行股市交易的不法分子要坚决打击。严禁党政机关各级干部和国营企业、事业单位以“机构”或“基金会”名义入市炒买炒卖股票，违者要给以纪律处分。一些股票发行试点城市要注意打击黑市交易和其他违法活动。

三、保证股票发行和上市公司的质量

各地在进行企业股份制和股票市场试点中，一定要注重保证股票发行和上市公司的质量，严格按规范进行操作。如果股票发行和上市公司的质量得不到保证，国家的利益就可能受到损害，投资者的合法权益也得不到保护。要保证股票发行和上市公司的质量，就要按照严格的程序进行工作，主要是要过三关。

第一关，就是要严格对发行股票企业的资产评估和财务审核。对于资产评估不实，伪造、漏报企业财务资料，以及会计师事务所与企业串通虚报资产和财务盈亏等违法行为，要严肃处理，违反法律的要追究相应的法律责任。要加强资产评估和注册会计师制度的建设，要抓紧制定股票发行过程中的资产评估和财务会计审核标准。为尽快提高评审质量，试点初期可以聘请一些国际知名的会计师、律师，就国内股票发行与上市的财务审计和稽核工作提供咨询意见，逐步使我们的会计师事务所达到国际标准。

第二关，凡要求发行股票和上市的企业必须向证券交易所提出申请。证券交易所要建立和完善上市委员会。上市委员会由交易所会员代表、会计师、律师和企业的代表组成。当地政府要指定一位主要负责人归口管理这项工作，上市委员会是民间机构，但要加强领导，政府应有一定责任。上市委员会对上市公司的申请提出审批意见，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备案。证监会在一定时间内有否决权。

第三关，是加强政府有关机构对股票发行的稽查监督。国务院证券委员会要管股票发行额度，进行宏观调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要监管股票发行和上市。今后，未经证券交易所上市委员会批准，并向证监会备案，任何企业不得擅自发行股票。马虎过关或徇私过关，要追究法律责任。证监会也要在公众监督下进行工作。

另外，当前在试点工作中较为突出的一个问题就是缺乏从事股份制与股票市场的专业人才，使我们的一些工作受到了影响。为此，要按照国际惯例，加强对专业人员的培养。这是一项基础工作，一定要加紧进行。人才培养在立足国内的同时，还可以采用招聘等方式从海外吸纳一批学有所成的专业人才回国工作。

四、全国统筹规划，分三个层次，积极而又稳妥地进行股票市场的试验

第一个层次是在上海、深圳举办证券交易所，可以公开发行可上市股票。第二个层次就是允许广东、福建、海南三省以及广州、厦门两市公开发行不上市股票。这是今年1月的规定，但是后来发现，公开发行不上市的股票很难操作，既然公开发行，又不让它转让、上市，就必然要形成黑市交易，而且很难禁止。所以，现在考虑改为公开发行异地上市的股票，即在当地发行，在上海或深圳上市。三省两市在本地公开发行股票，也有一个采用什么办法的问题。发行后如何与上海、深圳联网、上市，也有一些技术性的问题需要研究。第三个层次是其他省市。可以挑选一两个符合条件的企业到上海或深圳去发行可上市股票。在公开发行股票还没有找到妥善办法以前，就在每一个省公开发行股票，风险相当大。现在改革开放要做的事情很多，股票发行试点放慢一步，反而可收水到渠成、事半功倍之效。还是分三个层次，积极而又慎重地试点为好。

由于目前各方面条件的限制，某些地区的股票热已引起一些混乱。李鹏同志已召开国务院总理办公会议，决定在最近一个时期内，全国暂缓批准公开发行股票。这段时间可长可短。待立法加强，组织机构建立，以及发行办法完善以后，再行开始。暂缓绝对不是停顿。只是讲暂缓批准，批准以前的工作照做不误。各地可以积极创造条件，做好基础准备，而且工作要做得更好。如果工作进展顺利，可以早一点重新开始批准。我们总的意见是，对股份制和股票市场要坚决地探索和试验，并积极引导，想办法把这件事办好。还是要照邓小平同志的话做，坚决试、大胆地试、大胆地闯。现在适当放缓，是为了总结经验，积蓄力量，使股票市场能更健康地发展。

五、适当控制股份制企业的试点工作面

股份制试点工作，要以探索转换企业经营机制为主要目的。在目前市场发育很不完全的条件下，股份制对于转换企业经营机制的作用不宜过分夸大。要按照《中共中央关于加快改革，扩大开放，力争经济更好更快地上一个新台阶的意见》和《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转换经营机制条例》的精神，创造条件逐步进行股份制的试点。各地要加强对试点企业的正确引导，在转换经营机制、改善内部管理上下工夫。同时，要坚持试点取得经验后再逐步扩大的原则，着重抓好已试点企业的规范化工作，注意不断总结经验，不要急于在面上铺开。

还有一点，企业内部职工持股也包括法人相互持股，只能出具出资证明或股权证书，不要采用“股票”形式，严格限制转让范围，不要扩散到社会上去。股份制改革试点最好选择国营大中型企业，这样才能积累经验。当然，大企业改组工作量更大，不能仓促行事。

今天到会的都是一些省市和国务院有关部委的负责同志，希望大家要以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大局为重，统一认识，从全局出发，认真执行国务院对股份制和股票市场试点工作的有关规定，坚决按照国务院有关股份制和股票市场试点工作的统一部署来办。今后，无论哪个地区或部门，如果不听招呼，令不行、禁不止，仍然擅自批准发行股票，就是违反纪律，就要追究有关人员的责任。只有这样，才是对国家负责任，对改革开放负责任。这要作为一条纪律，希望大家遵守。通过这次会议，大家总结了经验，统一了认识，经过我们共同努力，

一定会将股票市场试点工作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保证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健康发展。

关于通用航空公司空难事故的批语

(1992年8月14日)

1992年8月11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信访局《来信摘要》反映，中国通用航空公司航空器修理厂机务人员黄复初致信朱镕基同志说，7月31日中国通用航空公司B2755号飞机失事并非偶然，是该公司长期以来管理混乱、公司领导严重渎职的结果。雅克42型飞机自引进后，技术资料管理和飞机维修工作都存在很多问题。通用航空公司职工对这些问题曾多次向中国民用航空局反映，一直未引起重视。这是朱镕基同志在该《来信摘要》上的批语。

请蒋祝平①、闫志祥①同志阅(要看原信)。

对通用航空公司要严肃查处，不处理人不好向全国人民交代。

民航局对人民来信(早已敲响警钟)不予重视，空难惨痛，事出有因，也要吸取教训。

(抄送书明①同志)

朱镕基

8.14

① 蒋祝平，当时任中国民用航空局局长。闫志祥，当时任中国民用航空局副局长。书明，即王书明，当时任国务院副秘书长。

坚决打击走私活动

(1992年9月7日)

1992年9月7日，朱镕基同志主持召开专题会议，研究打击走私问题。这是朱镕基同志在听取打击走私情况汇报后的讲话。

当前走私问题严重，缉私秩序混乱，并且还有恶性发展的趋势。尽管海关、公安等部门做了大量工作，打击走私取得了很大成绩，但走私活动仍然有发展的趋势。所以，应该引起我们重视，并采取相应的措施。

走私活动的危害性是很大的，不但在经济上，而且在政治上和国际上都有非常恶劣的影响。首先是在经济上，如果不严厉而且有效地打击走私，国家对外开放就不能够正常进行，国内的民族工业也不能很好地发展。一开始，走私物品集中在彩色显像管、电冰箱、压缩机，现在又发展到录像机、集成电路、电子计算机等等，这必然严重影响我们民族工业的发展。经济上的危害很大，而政治上的危害更严重。走私活动对我们的党风、政风以及队伍的腐蚀很严重。老百姓很有意见，特别是腐蚀到军队和执法机关内部，影响就更坏。因此，必须从政治上考虑打击走私的问题。我看到一份简报，说某个单位走私一船一万台录像机，只花了十万元就买通了边防的干部，货就被放进来了，但这船货可以赚好几千万元。走私在国际上的影响也是很恶劣的。真正跟我们做生意的外国人并不希望走私活动猖獗，否则正当生意就没法做。



1992年9月26日，朱镕基在广东省珠海市考察工作。图为在拱北海关缉私艇上听取工作汇报。右二为珠海市委书记兼市长梁广大。

分析走私活动猖獗的原因，从客观上讲是我们自己的工业还处于幼稚状态，主要靠关税等手段来保护，我们的价格体系也不合理，已越来越不适应我们进入国际市场的要求。比如国内汽车价格太高，相当于国际市场的五到十倍，因此，从香港走私豪华汽车什么办法都有。录像机也是这样。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我们要恢复关贸总协定缔约国地位，参加国际市场的竞争，必须逐步理顺国内的价格体系，提高国内工业的竞争力。如果完全依靠关税的保护，我们的工业发展不起来。

打击走私应采取的措施，第一，要提高全党及各级党政领导干部的思想认识，使大家认识到走私不仅仅是经济问题，而且是政治问题，是违法犯罪问题，必须予以打击。现在有的人认识还不清楚，出现了一个村、一个县以走私为业的现象，认为走私是开放搞活、繁荣经济的好办法。这是完全错误的。所以，必须提高大家的认识。我赞成以

国务院的名义发一个通知，统一思想，端正认识，明确打击走私重点省区和部门的职责与任务。

第二，要进一步完善立法，坚持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要打击走私，必须严刑峻法。过去，我们存在有法不依、处理不严的问题，往往以经济处罚代替法律处理。针对目前走私活动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要尽快对有关法律法规作进一步完善补充，使打击走私工作做得更好。要查处走私大案要案，抓住几个大案件，严肃处理，震动一下，就能够把走私活动的气焰打下去。因此，请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中央政法委员会牵头，组织有关部门集中力量查处几个大案要案，公开进行处理，谁讲情也不行。

另外，关于各部门协同作战问题，也应从立法上完善一下。如工商管理部门遍布全国，要发挥它们在缉私中的作用，请全国打击走私协调小组提出意见，报请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考虑。同时，请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研究制定打击贩卖走私物品的规定。

第三，要从思想政治上和装备手段上加强缉私力量。首先，要从思想政治上提高海关、公安系统及有关部门缉私队伍的政治素质，以保证真正有效地打击走私。此外，物质上也要给予保证。原则上同意海关系统增加编制，加强缉私力量，也包括公安系统建立两个海巡大队，请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人事部尽快考虑。我赞成加强缉私队伍建设的关键是提高素质，增加人员要从现有党政机关干部和军转干部中调剂解决，不要从社会上招聘。

增加缉私装备问题，要实事求是地考虑，原则上由财政部解决。总之，增加缉私装备这个事非办不可。

缉私秩序也要很好地整顿。多头缉私实际上没有效果、没有秩序，要坚决制止。

一定要把深圳经济特区办好

(1992年9月26日)

1992年9月20日至28日，朱镕基同志在广东省考察工作，先后考察了广州、湛江、茂名、惠州、深圳、珠海、中山等地。这是朱镕基同志在听取深圳市委、市政府工作汇报后讲话的一部分。

我五年没来深圳，这次来刮目相看。深圳变化很大，成绩很大，证明了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完全正确的。看到特区政策的成功，我感到非常高兴。我觉得深圳很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已经形成了良性循环，这个非常重要。一个省、一个市、一个地区形成了良性循环，就说明经济发展走上了正常轨道，前途就不可限量。

特区政策现在证明是成功了，但是，搞特区是希望将来能推广到全国，就要求有普遍意义。因此，我觉得特区的试点非常重要，现在还只能说是取得了第一个阶段的胜利，或者说是一个初步的胜利。我觉得要完全把特区办好，恐怕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这些只是我的一种想法，提出来供大家参考。

第一，利用特区政策吸引外资，引进技术，加快经济建设，这一点深圳特区已经成功了。当然，还应该向更高阶段发展。深圳实际上也注意到这个问题了，就是原来的一些办法对特区发展起了很好的历史作用，现在不一定要再搞下去了，例如你们刚才讲的“三来一补”①，应该向更高阶段发展。我看，深圳当前首先是抓基础设施建设，把城市建设得更符合经济中心这样一个条件。深圳正在建设，前途远大，我觉得标准还可以更高一点。我们历来忽视中心城市建设，深圳是个新城市，要向国际城市的方向发展。特别是香港回归祖国以后，深圳如果还是一个乱七八糟的景观，那就不行了，就不能成为华南的一个经济中心。在城市建设方面，规划一定要抓得好，标准稍微高一点，不能今年修了，十年后又要重新翻建。现在欧洲那些大城市，几百年的建筑，仍然令我们赞叹不已。资本主义几百年的发展，对中心城市建设是非常重视的。所以，我认为抓基础设施建设，非常重要。其

次，基础设施的完善，为发展高级的第三产业准备了条件，这是促进良性循环最重要的。光靠搞工业，收不到几个钱，现在看得很明显。特别是搞“三来一补”，更收不到几个钱，而且环境越搞越坏，那是历史的产物。所以，还是要发展金融、服务、咨询、仓储、旅游等高级的第三产业，特别是商业，把流通领域搞活，这个非常重要。昨天，李灏②同志讲了一个清况，对我启发很大：现在每天通过深圳海关的车辆，人家是几万辆，我们是几百辆，全给香港人包了，大量的走私物品从这里进来了。如果我们搞一个运输公司，完全按国际惯例经营，在香港高薪聘请职员，把运输业包起来，比办工业的效益要好得多。另外，只有这样，我们才真正掌握了国际经营的手段。现在，我们和香港是前店后厂的关系，他们是店，我们是厂。他们赚大钱，80%、90%都让他们赚了，我们也就拿个10%。这说明， 我们还没有掌握国际经营这个手段。我觉得，我们不要把注意力过度地放在工业方面，要把流通领域搞活，把高级的第三产业发展起来。工业还是搞高新技术产业，真正来搞知识密集、技术密集、经济效益比较高的产业。已经到这个程度了，深圳再搞劳动密集型的产业是浪费土地。深圳按这个次序搞是大有希望的：首先是认真抓基础设施建设，把城市真正建设成为中心城市；然后，大力发展高级的第三产业；工业结构要调整，主要是搞高新技术产业和经济效益高的产业。

---

① “三来一补”，指来料加工、来样加工、来件装配和补偿贸易。

② 李灏，当时任中共深圳市委书记兼深圳市市长。

第二，深圳作为一个经济特区，可以运用资本主义的各种经营方式，但是我们还是能够保证社会主义经济作为一个主体。同时，我们可以抵制资本主义腐朽的东西，建设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这一点，我觉得深圳是抓得很紧的。也可以说，我们还是能够运用特区来建设社会主义的。

第三，党的十四大将确定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点我们要给予更多的注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究竟怎么搞，我看应该首先在特区搞出一个模式来、搞出一个雏形来。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意味着我们的企业都要推向市场，服从市场经济的规律，自主经营、自负盈

亏，国家实行宏观调控。这个宏观调控是好讲不好做。怎么调控？怎么通过金融、财政等各种手段把经济管好？最重要的是法律，就是要有法律制裁。法律体系健全了，一切按法律规定办，真正走上法制轨道，我希望能够在深圳、珠海这些特区首先实现。不这样搞是不行的。我们的企业往往是上项目的时候是市场经济，把项目效益说成好得不得了，说是你们不要管我，我的项目是百分之百出口，一个钱不要你的，讲得非常好；项目上马后，就要搞计划经济了，你得给我原材料，给我让市场，帮我借钱。这样怎么行？一会儿市场经济，一会儿计划经济，我们政府哪受得了！这就要有法律约束，企业搞不好就要破产、清盘，追究领导人的责任，不能把风险全放到政府身上。所以，我觉得在特区，要先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模式、一套法律体系健全起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不在五到十年内解决这个问题，国民经济要上新台阶是非常困难的，最后还可能出问题。

同志们，深圳确实跑在全国前面了，但现在不能满足于此。邓小平同志给了你们这个任务，一再鼓励你们。我希望你们下点工夫，真正搞出一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模式。对企业真正地放权，政府就是监督。责任是企业的，资不抵债的时候，政府就警告企业，甚至罢免企业领导人，但是平时政府不干预企业的决策。政府各部门要大大精简，不要去管那些不需要政府管的事情。另一方面，政府调控的手段运用得怎么样？譬如房地产，政府要下个狠心，把信贷规模控制住，它就热不起来了。要有个清醒的估计，哪有那么多人需要豪华别墅呀？房地产市场能发展那么快吗？总之，要在探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模式上创造一些重要的经验，这是我对深圳的一点希望。

广东的实践证明了改革开放政策的成功

(1992年9月28日)

这是朱镕基同志在广东省考察工作期间，听取省委、省政府工作汇报后的讲话。

广东这几年的发展相当快，改革开放的成绩很大。我这次实地看了以后，更深刻地感受到发展变化之大。在这里，我想谈三点感想和一点希望。

第一点感想，我认为广东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证明了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成功，证明了改革开放政策的成功，也证明了特区政策的成功。这是中外公认、举世皆知的。首先，广东的农业问题解决得好。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农业上不去，其他经济部门就发展不起来。农业发展也是根据邓小平同志的思想，首先在农村实行了改革。现在，广东的农业确实已经走上了一条高产、优质、高效的路子。很多地区从粮食不能自给，到实现了自给有余。这是广东经济发展的一个很重要的基础。其实，广东的产业发展经历了一个调整结构、提高效益的过程。记得80年代初期，我来广东，那时候地方同志谈的大多是如何发展“三来一补”企业。后来是抓利用外资，引进技术改造现有企业。现在，广东的产业结构调整又提高了一步，逐步地向现代化、大批量、高新技术的方向发展。工业经过内部调整、改组，正向更高一个等级发展。这是非常可喜的现象。

随着工业的发展和流通领域的繁荣，基础设施的建设变得越来越重要了。这些年，广东花了很大的力量搞交通建设。没有基础设施建设，你的土地值不了几个钱，你的地要卖好价钱，就得修公路、铁路。沿海、沿江地区要修港口，另外还要修机场。基础设施搞起来以后，经济的发展就更快了。

广东各地对城市建设也很重视，许多城镇跟我五年前来的时候相比完全面貌一新了。我看，城市建设规划还是要实行“一个人、一支笔、一张图”，一管到底。要是听这个的意见，又听那个的意见，那不得了

啊，肯定搞不好。就得一个人管，就是市长管。我在上海工作时就是我管，“一支笔”，只有我才能批地。土地对广东非常重要，因为它可以吸引外资。如何将土地开发纳入城市和交通的规划，怎样充分利用级差地租，怎样把生地变成熟地，怎样考虑长短结合，才能够使这块地更值钱，这些问题都要认真研究，通盘考虑。如果几支笔来搞是不行的，要吃大亏。

看了广东这些地方，我确实深刻地感到，沿着邓小平同志指引的改革开放道路走下去，我们的经济建设就能够加快，人民的生活水平就能够不断提高，党就有威信，人民也会拥护我们。广东能够取得这些成绩，我觉得一个主要的原因，是广东省委、省政府在改革开放以来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大家围绕着发展生产力、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条主线，既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又坚持改革开放，一心一意坚持走这条道路，这是一条非常重要的经验。当然，广东有较好的客观条件，毗邻港澳，华侨众多，所以利用外资、引进技术、开辟国外市场的渠道都比较方便，但主要还是广东的同志工作做得比较出色，办事能够从实际出发，能够把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的积极性调动起来。我们下去一看，到处都热气腾腾，干部、群众都心情舒畅，这一点应该充分肯定。

第二点感想，我觉得改革开放以来广东的实践，证明了邓小平同志今年南方谈话的精神是完全正确的。只要我们认真地学习，全面地理解，扎扎实实地贯彻执行，全国就能够像广东一样，加快改革开放，加快发展速度，真正使国民经济上一个新台阶，最终实现“三步走”的战略目标。

我特别感到，今年以来广东的发展特别快，这显然是邓小平同志的南方谈话产生了强大威力，调动了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也激发了外商的投资热情。香港的大老板过去给我的印象是，捐赠几个亿都可以，但几百万元的投资他都不干。广东也许情况不一样，投资可能稍微多一点，别的地方要香港大老板去投资是很难的。但今年以来不是这个情况了，外商和港商纷至沓来，香港大老板们也来了，不但是到广东，也到上海、北京及内地去了。他们的投资热情很高。这是一个新的动向、新的变化。这是因为邓小平同志的南方谈话进一步肯定了改

革开放政策的成功，表明了党的基本路线要长期坚持下去的决心，从而掀起了这样一个高潮。

第三点感想，我觉得广东的实践证明，根据邓小平同志的思想提出来的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在中国能够或者将要得到有效的运行。邓小平同志早已指出，市场经济并不是资本主义独有的，资本主义也有计划；社会主义也有市场，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广东的实践就充分证明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模式是行得通的，而且非走这条路子不可。广东把企业推向市场，让企业能够自主经营、自我积累、自我改造、自我发展、自负盈亏；政府转变职能，不干预企业的经营决策，但要进行有效的宏观调控。这种模式在资本主义国家实行了几百年，也是逐步形成，而且是逐步有效的。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在仍然保持社会主义的性质、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也能够实行这个模式，这就是广东现在的做法。当然，我们现在还不完善，特别在宏观调控方面，我们做得不够好，还不会运用宏观调控的手段进行资源和生产力的合理配置与结构调整。我们的本事还不大，还不能把一切经济活动纳入法制的轨道，对企业还是干预过多。但是我相信，做得不够的方面是能够完善的，这条路是能够走通的。广东在短时间内能走到现在这一步，我相信将来肯定能够把这些方面完善起来。

最后，我根据接触到的一些宏观情况，对广东省提出一点建议和希望。中央最近一再提出，要认真地学习、全面地理解、扎扎实实地贯彻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精神，既要解放思想，又要实事求是。这是因为，我们要把已经调动起来的群众积极性引导好、保护好、发挥好。我们在珠江三角洲一带看到干部、群众的积极性很高，大家精神焕发，干劲很足，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这是非常可喜的，对这种积极性一定要保护好，不能给他们泼冷水。但也要引导好，因为还有个宏观的问题，许多事情在局部是能够做到的，但拿到宏观上来看也许就做不到了。中山市讲15年、顺德市讲10年赶上亚洲“四小龙”，可不可以做到？我相信可以做到。但作为一个战略整体来看，就要考虑一些宏观问题了。全国目前是什么状况呢？全国的形势空前的好，但是也有一些问题要引起我们的注意。什么问题呢？一个是投资规模，另一个是信贷规模，超过太多了。今年7月，全国全民固定资产投资比去年同

期增长35.6%，实际规模比这大得多，下面有的没有报。如果就是这个数，也不是不得了。问题是摊子还在铺，越铺越大，到8月份已经比去年同期增长36.4%了。如果按这个趋势发展下去就不得了。投资连带着信贷，哪来那么多的钱？就是要银行多发票子。票子发得太多，宏观经济就可能出问题，我们不能不考虑。因此，党中央、国务院最近发了一个通知，要求对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和信贷规模进行宏观调控。这不是说现在已出了什么了不起的大事，而是说如果这一趋势还这么发展下去，那事情就难说了。另外，同志们也要考虑到国际形势的变化。现在全国四分之一的产品是出口的，广东和上海的产品各是三分之一出口。因此，进出口贸易对中国来说非常重要。目前全世界经济萧条，或者说国际市场有限，想让出口保持目前百分之十几到百分之二十的增长速度，相当困难。我们对国际市场的增长不能估计太高，特别从长远来看，归根结底还得靠我们自己，要加强管理，提高产品的质量和竞争力，真正去占领市场。所以我总的感到，既要看到当前形势大好，又要清醒地估计可能发生的一些问题，要全面规划，统筹安排，不能把摊子铺得太大。

广东很重视基础设施建设，我认为这是抓到点子上了。最近这几个月，我基本上是在抓铁路、抓交通、抓民航。经济怎么能够搞得上去呢？我们现在正在研究对上述这几个部门的体制进行改革。要通过改革，调动各个方面的积极性，调动中央和地方的积极性，调动领导机关和基层的积极性，通力合作，群余群力，共同把事情办好。不仅包括交通，还包括邮电通信，不调动各个方面的积极性，邮电通信事业也上不去。现在单是多装电话机没有用，因为没有通道，打不通。电话机装得越多，通道不足，接通率就越低。最近，我们考虑，要把铁道部门、电力部门、机电部门和通信兵等的通信能力也充分利用起来。只有大家一起上，才有可能把电信搞上去。总之，今后三年就是要大力抓好基础设施建设，再不下气力抓就晚了。广东在治理整顿这几年没有丧失时机，抓紧基础设施建设，促进了经济发展，情况就大不一样。就全国来讲，晚了一步，现在要赶上去。

加快基础设施建设，也要注意全面规划、统筹安排，一下子想搞得太多也不行。比如说铁路，广东主要是先抓好几条带战略意义的主干线的建设。我觉得，广东各市县大的基建项目，应当服从全省的统一

规划，如果各行其是，就不好办了。基础设施建设要超前，但不要造成浪费。广东的土地是很宝贵的，在搞开发时应当十分爱惜，对这 一点同志们务必引起足够重视。

贯彻邓小平同志重要谈话精神，既要解放思想，又要实事求是。从全国宏观的情况来考虑，经济建设要保持一个合适的发展速度，才能实现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战略目标。我完全相信，广东力争20年赶上亚洲“四小龙”的目标能够实现。但在具体的工作安排上不能操之过急，特别是前十年应当多从稳重一点的角度来考虑。后十年情况就不同了，经济实力增强了，基础打好了，市场机制建立起来了，就可以考虑搞得更快一些。



1992年9月22日，朱镕基在广东省广州市考察黄埔港。前排左一为广东省省长朱森林。

关于当前经济形势和 宏观调控的意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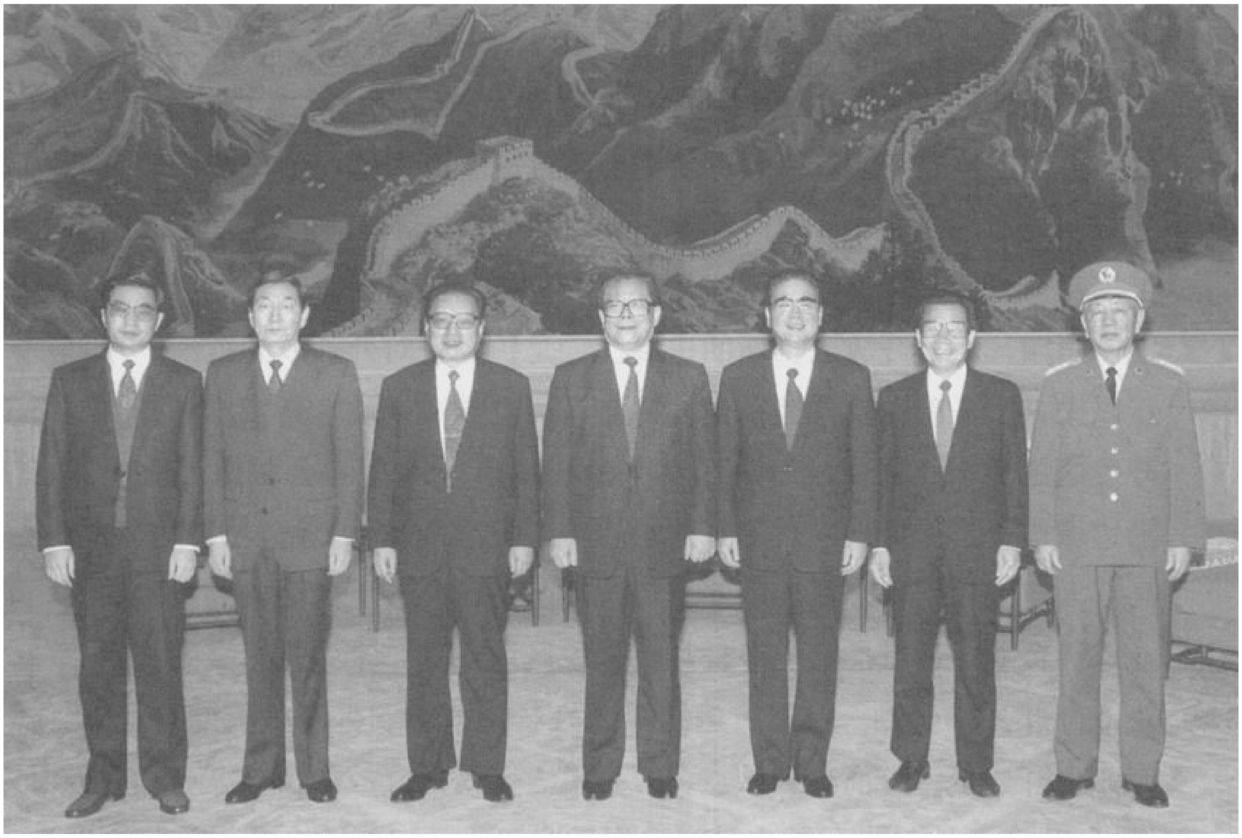
(1992年10月20日)

1992年10月20日，即中共十四届一中全会闭幕之后的第二天，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北京爷开经济情况通报会，给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中共中央、国务院各部门主要负责同志打招呼，防止经济过热。这是朱镕基同志在会上讲话的主要部分。

党的十四大总结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坚持党的基本路线的伟大实践，以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统一全党思想，确定了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决策和部署。这对动员全党和全国人民夺取社会主义事业的更大胜利，实现振兴中华的伟大理想，将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为了贯彻落实党的十四大精神，我根据江泽民、李鹏同志的指示，对当前全国的经济情况作一个通报，并对如何加强宏观经济调控，提出一些意见。

一、改革开放和国民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

以邓小平同志视察南方重要谈话和今年3月中央政治局全体会议为标志，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广大干部和群众思想更加解放，精神更加振奋，上下团结一致，到处热气腾腾。



1992年10月19日，在中共十四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江泽民、李鹏、乔石、李瑞环、朱镕基、刘华清、胡锦涛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合影。

(一) 改革开放向深度和广度发展。

第一，人们的思想观念发生了重大转变，改革开放意识显著增强。通过学习邓小平同志的重要谈话，打消了姓“资”姓“社”的顾虑，许多领导同志亲自抓规划，各地区大胆搞试点，全国出现了生机勃勃的新局面。

第二，以转换企业经营机制为重点，全民所有制企业的改革有了新的进展。国务院今年发布的《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转换经营机制条例》，对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的责权和经营机制的转换，作了明确而具体的规定，对原来的企业管理体制有了明显的突破。

第三，价格改革迈出了较大步伐。今年先后提高了粮食购销价格，实现了购销同价，有16个省区市的380个县市进行了放开粮食价格的试点；7月1日，又提高了铁路货运和煤炭、天然气的价格；较大范围地

放开了生产资料的价格，使国家和有关部门管理的生产资料与交通运输价格由1991年年底的737种减少到目前的89种；取消了煤炭、原油、成品油、钢材的计划外价格的最高限价。

第四，对外开放取得新的进展。一是扩大了对外开放的范围。今年以来，国务院在支持浦东开发区建设和批准海南成片开发洋浦经济开发区的同时，还批准开放了5个沿江城市、18个省会城市、13个沿边城市。二是扩大了对外开放的领域。批准北京、上海、天津、青岛、大连、广州6个城市和5个经济特区各试办一至两个外商投资商业零售企业，还批准在上海外高桥保税区内设立一家中外合资的外贸企业。此外，金融、保险、旅游等原来禁止或限制外商投资的行业，今年也开始进行外商投资试点。三是扩大了对外开放的窗口。先后批准了34个开放口岸，其中沿海口岸7个、沿江口岸4个、沿边口岸12个、航空口岸11个。

第五，利用外资增长较快，外国和港澳台地区投资者的信心增强。今年1月到9月，实际利用外资117亿美元，比去年同期增长52%。

此外，转变政府职能、精简机构的工作正在开展。县级机构改革试点单位已有350多个。有关部门还按照中央4号文件的精神，拟订了投资、财政、金融、商业、外贸、科技、教育等方面的改革方案，正在陆续出台。

(二) 国民经济发展步伐加快。

第一，农业在连续几年丰收的基础上，今年又取得了好收成。农村经济注意调整结构，开始迈上高产、优质、高效发展的轨道。乡镇企业加快了发展步伐，预计今年的总产值可增长30%以上。

第二，工业发展速度明显加快。1月到9月工业总产值比去年同期增长19.3%，预计全年可能超过20%；国内生产总值比去年同期增长10.6%，预计全年可能超过12%。国有大中型企业的经济效益有所提高，骨干作用有所增强。

第三，财政收入增长较快。1月到9月，累计财政收入2668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21.8%。扣除增加发行和提前入库的国库券收入227.51亿元，按可比口径计算，增长11.4%。财政支出2619亿元，增长16.4%。

第四，进出口贸易持续增长。1月到9月，全国累计出口总值575亿美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6.2%；进口总值525亿美元，比去年同期增长21.4%。边境贸易和“三资”企业的进出口贸易发展更为迅速，与去年同期相比都是成倍增长。

二、当前经济发展中的几个问题

今年以来，随着国民经济高速增长，也出现了一些值得重视的问题。

(一) 固定资产投资增加较猛，但未向产业结构优化的方向发展。

今年以来，固定资产投资一直保持了较高的增长速度。1月到9月，全民所有制单位固定资产投资比去年同期增长36.3%，全国新开工5万元以上的基建和技改项目已达36931个，比去年同期增加7958个。9月末，全民所有制单位在建总规模已达12306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23.2%。新开工项目中，能源、交通、原材料等基础产业的比重下降，高级写字楼、豪华公寓项目明显增加，一般加工工业和低水平的重复建设有所抬头。建设项目超概算和资金安排不落实的情况越来越严重。

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过猛，还带动了现金投放过多，推动了生产资料价格的上涨，如建筑用钢材价格，已由年初的每吨1700元上涨到3000元左右。

(二) 金融形势趋于紧张，银行信贷和货币投放压力增大。

一是信贷规模不断扩大。去年1月到8月，银行贷款增加额只有974亿元，今年达到1864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91%。按照这个趋势，全年新增贷款规模可能达到4000亿元，而去年实际是2895亿元。二是货币投放增多。到今年10月15日，货币净投放达到481亿元，比去年同期多投放300亿元。9月末，市场货币流通量达3559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30.4%。去年全年货币发行量为533亿元，今年原计划发行600亿元，预计要发行900亿元。三是储蓄存款增幅下降。9月末储蓄存款余额为10852亿元，增幅比去年下降4个多百分点，主要是计划外集资挤了储蓄存款。四是农副产品收购资金紧张，有些地方出现了 “打白条”的现象。

(三) 工业生产高速增长，交通运输紧张，产成品库存增加。

今年1月到9月，工业总产值增长19.3%，但能源生产总量只增长3.1%，货物周转总量也只增长3.3%，大大低于工业生产的增长速度。铁路运输的矛盾最为突出，当前货运车皮满足率只有60%，铁路主要限制口只能满足需要的40%左右。沿海港口也出现了压港、压船、压货的现象。交通运输已经成为影响经济增长的 “瓶颈”。

去年我们搞限产压库促销，产成品资金占用到去年年底比6月底减少229亿元。今年8月底比年初又增加了257亿元，相当于今年同期银行新增工业流动资金贷款309亿元的83%。“三项资金”①占用增加更多，今年8月底比年初增加544亿元。

---

① “三项资金”，即产成品、发出商品和应收销货款占用的资金。

(四) 经济发展的若干热点出现了一些值得注意的问题。

今年以来，经济发展中出现了几个热点，主要是开发区热、房地产热、股票热等。从总体上说，这是改革不断深入、市场逐步发育的反映。但是，有些地方脱离实际，不顾条件，盲目攀比，发展过快。据不完全统计，1991年年底，全国共有各类开发区117个，到今年7月已发展到1874个，比1991年增长了约15倍，占地面积增长幅度更大。1991年年底，全国房地产公司有3776家，到今年8月底已超过5000家。今年头8个月，房地产业有偿出让土地约2000幅，面积达1000平方公里以上。股票发行出现了超计划发行和不经批准擅自发行的情况。

三、采取积极措施，加强宏观调控，促进国民经济持续高速发展

总的来说，当前经济形势大好，对于这一点，国际舆论也给予了高度评价。但是，对于发展过程中的一些问题，国内外不少人士也表示担心。一些国际金融组织、世界权威研究机构、著名经济学家和工商界人士都认为，中国已经出现经济过热，通货膨胀的压力正在逐步加大。《亚洲华尔街日报》的年度调研报告认为：“尽管增长如此快速，看来中国的通货膨胀率今年能保持在7%以内，但是不一定能维持到明年。事实上目前城市的通货膨胀率已达11%，经济过热现象已开始出现。”10月9日，英国《金融时报》一篇文章说：“今年通货膨胀率加速

上升已引起人们担心，中国可能又要经历一个‘繁荣—下降’的经济周期了。”

对这些估计，要作具体分析。我认为，目前我国经济加快发展，是由于十多年改革开放积累的潜能转化为动能的结果。从全国来说，根据现有的经济实力和社会承受能力，这种发展速度是有其客观条件和物质基础的：第一，农业发展不但已经成功地解决了人民的温饱问题，而且还有一定的粮食、棉花等储备。第二，消费品的生产能力大于市场需求，不必担心消费品供应短缺。第三，重工业有相当的基础，可以提供我们需要的大部分能源、原材料和多数技术装备。第四，我国已逐步从封闭型经济转变为开放型经济，进出口贸易已经占国内生产总值的三分之一，外汇有一定的储备，吸引外资的环境明显改善，可以从国际市场上调剂余缺，支持国内经济增长。因此，当前中国经济发展总的来说是正常的、健康的。但是，许多人士的这些担心，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没有根据的。我认为，现在有以下几个问题值得我们研究和考虑。

(一) 关于投资拉动和速度问题。

在市场疲软、经济发展缓慢的情况下，可以采取增加投资的办法来启动和刺激经济的增长。这也是其他国家常用的方法。事实上，当前的投资拉动确实促使工业企业，特别是重工业企业的生产高速增长，经济效益有所回升。但是，这种投资拉动仍然是从放松货币控制开始，并不完全是依靠宏观经济杠杆和市场机制的驱动，而更多依靠的是政府的直接干预。世界银行最近关于中国经济的研究报告指出：“放松货币控制，生产即开始迅速回升，但回升的速度和方式也引起一个关键问题，即这种回升是否持续，以及它是否会把经济径直带上一股强劲的上扬势头，从而导致通货膨胀和经济过热的卷土重来。”这就是说，投资拉动的强度要适当。但是，由于我国尚未建立起市场的宏观调控机制和企业的自我约束机制，由投资拉动的经济发展一旦加快，就会以加速状态前进，直至达到极限速度，产生“飞车”现象。目前，我国的经济增长速度，不但已经远远超过了党的十四大提出的要求，而且已经超过或者接近世界各国和各地区，包括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在内的经济起飞时期的高速度。尽管我们主观上还希望能更快一些，但这样的加速度能否不经过大的震动而持续发展下去？我们大家都还没有把

握。从今年以来投资规模增长速度逐月加快的趋势来看，原有的经济结构矛盾更加突出，交通运输全面紧张，生产资料价格急剧上升，有利于市场经济机制形成的买方市场逐渐消失。这已经可以说明，投资拉动的强度在继续加大，通货膨胀的风险也越来越大了。



1992年1月19日，朱镕基考察“惠州26－1”油田的海上开采平台。左四为广东省副省长张高丽。

另外，目前投资的资金来源并不完全是自有资金或银行贷款，很多是来自各种计划外集资，如卖地、卖户口、发行证券、粮食挂账、欠

缴税金和各种硬性摊派，已经引起财政金融秩序一定程度的混乱，造成某些不良的社会后果。

问题还在于，现在铺下的摊子，后续投资还很大，明年的投资贷款和货币发行规模势将难以为继，搞得不好，就有可能留下一批“胡子工程”以及因为没有市场需求和原料供应而无法竣工的项目。

(二) 关于改革和发展的关系问题。

加快改革，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党的十四大提出的历史性任务，也是关系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的一个重大问题。这个改革是一场新的革命，绝非易事。我们应当把注意力的重点放到加快改革上来。

为了尽快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使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必须加快价格改革。如果我们打算在三年左右的时间里基本上放开生产资料的价格，明年就应该考虑：铁路货运提价，原油平价转高价，煤炭的国家定价部分减少，电也要提价。实施这些改革，对加快交通运输、能源等基础产业的发展，抑制加工工业的过快增长，调整和改善国民经济结构，是十分必要的。这部分提价因素，再加上今年调整价格“翘尾巴”和市场价格自发上涨的影响，可能拉动物价 指数上升7%，其中大中城市的物价指数将再次突破两位数。看来，给价格改革留下的回旋空间已经很小了，如果投资拉动的强度继续加大，物价上涨的形势就会更为严峻，对改革全局是不利的。

(三) 关于当前面临的农副产品收购资金紧张问题。

据人民银行分析，造成农副产品收购资金紧张，主要是以下几个原因：商业部门调销后的货款收不回来，如纺织工业尚拖欠去年的棉花款；财政该补贴的未补或欠补；部分省市的农业银行储蓄下降；上半年银行信贷增加过多，有的地方挪用贷款搞开发区、房地产和购买证券等。摊子铺得太大，影响贷款及时收回再贷。

据人民银行测算，今年农副产品收购资金需要1200亿元。根据惯例，银行承担60%，即700亿到800亿元，目前资金尚未落实。商业部门自筹和财政补贴加价款占40%，即400亿到500亿元，资金只落实不

到一半。目前，已有11个省区提出还要中央帮助解决农副产品收购资金319亿元。如要人民银行解决这个缺口，只有再多发票子。

(四) 关于国际市场问题。

我国经济与国际市场已经有了相当密切的联系，我们的经济盘子应当建立在对国际市场发展趋势的恰当估计上。现在世界经济萧条，国际市场容量有限，今后我国出口要保持每年25%的增长速度是有困难的。当前，美国经济不景气；日本受泡沫经济影响；欧洲经济的“火车头”德国在统一政策上出了问题，为了抑制通货膨胀，采取了高利率政策，从而动摇了欧共体的货币体制。香港地区是经济最景气的地方，但也是对世界经济波动反应灵敏的地方。一旦国际市场动荡，香港地区就要受到冲击，从而波及我国南方沿海地区。恢复我国在关贸总协定的缔约国地位，对我国的改革开放会有促进作用，但我们也要履行义务，减让关税，增加进口，面对竞争。今年我国外汇储备虽有增加，但增加速度明显放慢，近两个月，外汇储备急剧下降。国家外汇储备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一种晴雨表，外汇储备下降到一定程度会影响外国投资者的信心和我国的对外信用。为了应对国际形势的风云变幻，我们应该保有必要的外汇储备。目前两百多亿美元的国家外汇储备，仅够三个月的外贸支付和还债需要。

综观以上四个方面的问题，为了不使今后几个月的经济环境绷得过紧，防止社会总需求和总供给的矛盾进一步扩大，促进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发展，党中央和国务院已下发了《关于加强对固定资产投资和信贷规模进行宏观调控的通知》(以下简称“中央8号文件”)。现在，我在这里再次强调以下宏观调控措施：

第一，加强对固定资产投资规模的调控，严格控制固定资产贷款规模和新开工项目，正确引导资金投向，调整投资结构，保证重点建设。

今年计划调整以后的投资规模和信贷规模不能突破。严禁挪用流动资金贷款搞固定资产投资。要认真执行国家产业政策，切实调整产业结构，尤其要突出加强交通运输的建设，停止一般加工工业的重复建设。新上项目的概算必须考虑到价格上涨的因素和相应的铺底流动资金，不得留缺口，不准形成新的拖欠。全国清理三角债工作已经基本

结束，全国基建、技改项目在1991年年底以前形成的拖欠已基本清理完毕。从今年开始再发生的固定资产投资项目的资金拖欠，国家不再投入资金清理，而应扣减有关省区市下一年度的基建、技改投资和贷款规模。要切实加强对社会集资的管理，各类证券要按国家计划发行，不得以乱发债券、股票和向企业硬性摊派等方式搞计划外集资。现在，全国共有1874个开发区，不但超过了国力所能承受的限度，也超过了实际需要。各地要坚持开发一片、收效一片的原则，根据需要和可能适当进行调整，特别要注意与现有企业和老城市的改造结合起来统筹安排。

第二，加强对信贷规模和货币发行的调控。

今年经过调整的货币信贷计划，信贷规模已经有了较大增加，是能够适应加快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步伐需要的。因此，各级党委和人民政府以及有关部门都必须坚决、认真地执行好这个计划，不得以任何方式迫使银行超计划发放贷款。今年全国信贷规模要控制在3500亿元左右，现金投放要控制在900亿元以内。中央8号文件规定："哪家银行突破了，由哪家银行负责；哪个地区突破了，由哪个地区的党委和人民政府的主要领导同志负责。"

第三，积极组织货币回笼、资金归位，确保农副产品的收购。要严格实行有关部门、有关地区各级政府机关的责任制。人民银行该投的基础货币已经分配下去，各地不得截留、挪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政府主要领导同志和人民银行行长要负责本地区的收购资金到位；各级专业银行行长要负责本系统的收购资金到位；各地商业、供销单位负责人要负责组织货款回笼，继续用于收购；各地财政厅(局)长要负责财政补贴资金拨补到位。要层层抓落实，限期到位，定期检查。必须采取坚决措施，遏止粮食企业挂账猛增的势头。凡属地方财政应补未补而要求新挂账的，银行一律不予挂账，并停止贷款，由上一级财政部门如数将应补未补款扣回后拨给粮食部门。纺织部和有关地方政府要组织纺织企业千方百计搞好限产压库促销，迅速归还棉花欠款。产品没有销路的，要立即停止生产。总之，银行该贷的要贷，财政该补的要补，商业系统的收购资金要到位，农业银行挪用拆借出去的资金要收回。不该搞、不该贷款的项目，或者不急于搞、不急于贷款的项目，都要给收购资金让路。如果哪个地方由于资金问题影响了农副

产品的收购，引起了群众的不满和社会的不安定，应当由该地区各级政府有关领导负责。

第四，努力扩大出口，加强进口管理，确保今年年底国家外汇储备不低于200亿美元，力争保持年初217亿美元的水平。

我们应该吸取历史教训，花光外汇储备可以是很快的。我们不能把扩大基本建设规模放在大量进口原材料和能源的基础上，更不能把宝贵的外汇用于进口消费品包括小轿车。应该集中有限的外汇主要用于引进先进技术，改造国民经济的薄弱部门，加快产业结构调整。今年8月底我国外债余额已达665亿美元，年底可能接近700亿美元，下半年还本付息就要106亿美元，已经接近警戒线。要严格禁止计划外再借新债。

对以上几项宏观调控措施，有的同志可能提出，这些主要还是行政手段，为什么不采取经济手段？对此，我想说明的是：第一，目前造成投资膨胀的原因主要是政府行为和各种不规范的行政干预，对此仅仅采取经济手段是不能很快解决问题的。而且，在当前市场发育很不成熟、约束机制远未形成的条件下，经济手段也很难及时收到效果。第二，即使是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也不排斥在必要时使用行政手段。第三，现在采取的措施，也并不完全是行政手段。

在认真贯彻执行中央8号文件、严格实施国家宏观经济调控措施的基础上，各地区、各部门的领导同志要把工作重点逐步转移到深化改革、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方面来。要切实安排好今冬明春的工农业生产、市场物价、财政税收和其他各项经济工作，确保国民经济的发展取得更大的成就。当前农村的突出矛盾是农民收入减少、负担过重，部分农产品销售困难和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扩大，致使农村市场难以拓展，还有些地方忽视农田水利、基础设施的建设。如果不采取积极措施解决这些问题，不仅农业这个国民经济基础的稳固要受到影响，而且还要制约工业的发展。因此，各级领导同志务必高度重视农业和农民问题。

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的关键时刻，为了巩固和发展当前的大好形势，加快国民经济发展的步伐，实现党的十四大提出的宏伟战略目标，希望各地区、各部门的领导同志，从全国大局出

发，按照党中央和国务院的要求，自觉执行国家的宏观调控政策，切实解决好当前经济工作中的问题，真正使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更好更快地上一个新台阶。

总结清理三角债经验，防止产生新的拖欠

(1992年12月23日)

1992年12月23日至26日，全国清理三角债总结表彰会议在北京召开。出席会议的有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以及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这是朱镕基同志在会上的讲话，曾发表于《金融工作文献选编(1978～2005)》，原标题为《总结清理三角债经验，防止产生新的拖欠，保证国民经济健康发展》。编入本书时，对部分内容作了删节。

从1991年下半年开始的全国性清理三角债工作已经取得很大成绩。到目前为止，1991年12月底以前形成的三角债已基本清理完毕。今天召开总结和表彰会议，主要是总结两年来清理三角债工作的成绩和经验，并重申防止新欠的措施。

一、清理三角债取得的成绩

1991年6月1日，李鹏同志主持国务院总理办公会议，研究清理三角债问题。当时，全国三角债累计达3000亿元左右。1991年6月底，在工商银行开户的4万户企业，“三项资金”占用达3523 亿元，其中产成品占用1306亿元，严重影响了国民经济的正常运行。许多企业转不动了，频频告急，要求尽快组织清欠。因此，国务院决定把清理三角债工作作为搞好国有大中型企业、提高经济效益的一个突破口来抓。

形成三角债的主要原因，一是由于建设项目超概算严重、当年投资计划安排不足和自筹资金不落实，造成严重的固定资产投资缺口，形成对生产部门货款和施工企业工程款大量拖欠；二是企业亏损严重，挤占了企业自有资金和银行贷款，加剧了相互拖欠；三是企业产品不适销对路或根本无销路，产成品占用资金上升，形成投入－产出－积压－拖欠－再投入－再产出－再积压的恶性循环。此外，商品交易秩序紊乱，结算纪律松弛，信用观念淡薄，也加剧了三角债。

首先在东北三省四市进行了清欠试点，明确了清欠工作的指导思想，立足于治本清源，从解决三角债源头入手，重点对固定资产投资项目拖欠这个源头进行清理，并狠抓了限产压库促销、调整产品结构和扭亏增盈。这两年，全国共注入清欠资金555亿元，其中银行贷款520亿元，地方和企业自筹35亿元；清理拖欠项目14121个，其中基建5420个，技改8701个，连环清理了1838亿元的拖欠。除少数不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及贷款条件的项目外，全国基建、技改项目在1991年年底以前形成的拖欠已基本清理完毕。

在连环清理债务链的过程中，与源头相关的机电、原材料以及配套工业等生产资料行业、建筑安装施工企业，相应清理了流动资金拖欠1400多亿元。为了解决与固定资产拖欠项目关联不大的行业的流动资金拖欠，1991年对拖欠煤炭、汽车、棉花的货款也进行了重点清理；1992年4月份，以宝钢为龙头进行流动资金清欠试点，在取得经验之后，又积极稳妥地在关系国计民生的煤炭、电力、林业和有色金属四个行业进行了重点企业流动资金清欠；为了缓解棉花收购资金紧张，在今年12月份又清理了棉花拖欠款28亿元。以上共清理流动资金拖欠352亿元。

这样，两年共清理固定资产投资和流动资金拖欠款2190亿元，1991年清理1360亿元，1992年清理830亿元，实现了注入1元资金清理4元拖欠的效果。通过清理三角债，明显地缓解了企业资金紧张的状况，加速了资金周转，提高了经济效益，使一大批能源、交通、原材料重点建设项目建成投产，并使一大批原来亏损、微利企业转为盈利，增强了经营活力，对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二、清理三角债的主要做法和经验

李鹏同志在今年3月7日召开的国务院总理办公会议上，对全国清理三角债工作取得的成绩给予了很高评价。他说，这次清理三角债工作指导思想明确，工作方法科学得当，基本上遏制住了前清后欠的势头，取得了很大的成绩。这有利于搞好国有大中型企业，有利于企业转换经营机制，有利于国民经济的正常运行。

之所以能取得这样的效果，主要是抓住了形成三角债的源头和清理的重点，采取了以下做法：

(一) 立足于治本清源。从清理固定资产投资项目拖欠这个源头抓起，顺次解开债务链，同时在防止新欠上下工夫，抓住了主要矛盾。这个认识是通过调查研究并经过东北试点后取得的。实践证明，从固定资产投资拖欠项目入手进行清理的做法是成功的。两年来，大部分清欠资金回流到了机电、原材料等生产资料行业以及建筑安装行业的国有大中型企业。投入固定资产投资贷款，解开债务链后，收回了流动资金贷款，银行总的贷款规模并没有大的增加。

(二) 治理流动资金拖欠采取釜底抽薪的方法，实行限产压库和"压贷挂钩"的政策。流动资金的拖欠有三个源头。由于投资缺口产生的拖欠，通过注入固定资产投资贷款，相应得到清理。但是，由于企业亏损和产品积压造成的拖欠，就不能通过注入流动资金贷款来解决，那只能是增加企业亏损和积压占款。扬汤难以止沸，只有通过限产压库促销、清仓查库、扭亏增盈等工作促使企业改善经营状况，从而釜底抽薪，减少流动资金占压和企业间的拖欠。1991年，全国完成限产压库229亿元，安排了70亿元技改挂钩项目。由于1992年库存上升和信贷规模十分紧张的原因，从清欠贷款指标中拿出30亿元兑现了部分技改挂钩项目，收到了好的效果。

(三) 各级领导高度重视，各有关部门团结协作。国务院组织制定了清理三角债的方针、政策。各有关部门和各地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加强领导，深入现场督促检查。各级计委、经委、银行、财政及清欠办等部门通力合作，全国几十万人的清欠队伍统一行动，经过艰苦努力、辛勤劳动、认真操作，使注入的银行信贷资金及时到位，启动运转顺畅。各新闻单位加强宣传报道，保证了清欠工作的顺利进行。

(四) 狠抓防欠措施的落实。为防止新欠继续产生，国务院有关部门制定了清理三角债、限产压库、扭亏增盈、防止新的粮食财务挂账等配套政策措施，各负其责。针对今年上半年粮食财务挂账和固定资产投资建设又出现拖欠的新情况，发出了《关于一九九二年上半年粮食财务挂账情况的通报》和《关于今年上半年固定资产投资新拖欠情况的通报》。国务院办公厅及时转发了这两个通报，推动了这项工作的顺利进行。

三、关于防止新欠的意见

去年以前全国范围内出现的三角债，是我国新旧经济体制转换过程中，多年积累的国民经济深层次矛盾通过资金形式的反映。产业结构失调、企业效益不高，导致了企业间的信用和金融秩序问题。货款拖欠是企业之间的经济行为，本应由企业按照法律规范予以解决。由国家投入信贷资金进行清理，实际上是将企业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转移到企业与银行之间，这只能是国家采取的一种非常措施。目前国家组织的清理三角债任务已基本完成，但企业之间的三角债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今年以来，由于国民经济高速增长，银行货币投放、信贷规模增长很快，产成品积压和企业亏损额也在上升，有的地区又靠新的拖欠和施工企业垫资上项目，建设项目超概算和资金安排不落实的情况仍很严重。据建设银行对1991年在建的266个大中型基建项目概算执行情况的调查分析，这些项目实际需要投资超过计划安排达50％以上；列入今年基建计划的402个续建大中型项目，也有63项超过计划投资总额。因此，必须认真贯彻落实防止新欠的各项措施，以免再度出现全国范围的三角债。

第一，搞建设要量力而行，不留资金缺口。要认真按照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对固定资产投资和信贷规模进行宏观调控的通知》和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确保农副产品收购和严格控制新开工项目的紧急通知》精神，制止单纯追求工业产值和低水平重复建设的倾向，严格控制固定资产投资规模，严禁挪用流动资金贷款搞固定资产投资。要加快投资管理体制的改革，做到项目投资决策、审批者的权力和责任相统一。国家计委、国务院经贸办等有关部门已作出规定，要求安排建设项目要综合考虑物价、利率、汇率、劳动工资、建设期贷款利息和铺底流动资金等因素，不得留缺口，不准形成新的拖欠，不准挪用流动资金贷款搞固定资产投资。从今年开始，由于建设资金不落实再发生新欠的，要扣减有关省市和部门下一年度的基本建设、技术改造投资规模与银行贷款规模，并对拖欠严重的企业以及上级主管单位有关负责人予以通报和行政处分。

第二，落实好清欠贷款回收计划。要按照中国人民银行等部门《关于收回固定资产投资项目清欠贷款有关问题的通知》，抓好清欠贷款的回收，按贷款合同规定的还款计划认真执行。凡完不成年度还款计划的，不得安排新开工项目。银行有权根据清欠借款合同，于第二年

从企业自有资金或项目投资中扣还。企业无力归还的，从有关省区市和部门固定资产投资计划中扣收。

第三，认真落实好《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转换经营机制条例》(以下简称《条例》)。《条例》所规定的14项企业经营权，解决了容易产生拖欠的许多问题。各级政府要尽快转变职能，防止由于政府行政指挥或计划失当造成的产品积压和拖欠。企业要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在经营活动中自觉按市场经济的要求，规范自身的行为，严格按经济合同的要求办事，自觉防欠。

第四，加快企业补充自有流动资金和压缩“三项资金”占用工作。1991年为了搞好国有大中型企业，国家选定了1000多户骨干企业，在“八五”期间每年按销售收入的1%提取补充流动资金。这项工作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效，要逐步扩大到有承受能力的大中型企业。要继续压缩不合理的产成品资金占用，加快资金周转，对“三项资金”占用超过合理水平的企业，银行应当停止增发贷款。

第五，采取有效措施解决粮食财务挂账问题。各地区要按照国务院《关于解决财政欠拨、欠补、欠退和企业挂账问题的通知》要求，对老的挂账要逐步消化，属地方财政应补未补或未补足而出现新的挂账的，银行一律不予挂账，并停止贷款，由上一级财政部门如数将应补未补款扣回后拨给粮食部门。

第六，进一步加强法制管理。要支持、鼓励企业增强自我保护意识，依法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在执行经济合同中发生的经济纠纷，企业应向仲裁机关申请仲裁或向人民法院提出起诉，追究违约方的责任。各企业对经确认无法收回的应收账款，要按照财政部颁发的《企业财务通则》和《企业会计准则》的有关规定处理，避免长期挂账，消除潜在亏损。

第七，加强对固定资产投资项目的监督检查。今后，凡是由国家拨款、国家银行贷款、各级政府举借或担保的各类国外贷款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在项目决策阶段或开工建设之前，均需由国家审计机关审计确认资金特别是自筹资金来源的合理性和可靠性。未经验资的项目，有关部门不予办理开工手续，施工企业不得施工。

第八，加强银行结算制度改革，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要引导商业信用，使企业之间的信用行为合同化、票据化。银行要按照国务院《关于整顿商品交易秩序，严格结算纪律的通知》精神，继续认真加强银行系统的结算纪律和对企业结算活动的监督。企业不得无理拒付应付货款，银行也不得袒护在本行开户企业的无理拒付行为，否则追究有关人员的责任。

在一九九二年全国经济工作会议上的总结讲话

(1992年12月24日)

1992年12月21日至24日，国务院在北京召开全国经济工作会议。出席会议 的有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负责同志，国务院各部、委、局负责同 志。这是朱镕基同志在会上总结讲话的主要部分。

这次会议开得很好。好在什么地方呢？会议期间，我参加了小组讨论会，感到大家确实是敞开思想，畅所欲言，冷静估量了当前的形势，对当前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作了如实的反映。同时，对明年的工作，大家统一了认识，表示要振奋精神，真抓实干，进一步深化经济体制改革，转换企业经营机制，搞好国有大中型企业，限产压库促销，扭亏增盈，狠抓质量，全面推进技术进步。这些工作一点也不能放松。只要我们大家统一认识，扎扎实实抓下去，大好形势一定能够发展，当前存在的问题和困难也一定能够逐步缓解并解决。但是，对思想统一的程度，也不宜估计过高，统一认识可能有一个较长的过程。

对于当前经济形势，可以把大家反映的意见概括为三句话：第一句话，形势大好，要充分地肯定。形势确实是大好，特别是邓小平同志的南方谈话、3月中央政治局全体会议关于加快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决定、党的十四大的胜利召开，调动了全国人民的积极性，确实出现了历史上不多见的好局面。这个认识大家是一致的。第二句话，防止发生经济过热。当前确实是出现了一些热点，要注意防止过热，大家对此的认识也是统一的。我看这就需要“两点论”：既要看到当前的有利条件，也要看到不利因素；既要充分肯定当前的成绩，又要看到问题。“两点论”不是各占50%，形势大好是主流，前进中的问题是支流，但是如果这些问题不解决的话，会发展得越来越严重。第三句话，解决问题不要一刀切。大家普遍反映，你热我不热，全国热地方不热。我参加几个组的会，没听哪个省说自己这个地方是过热了。特别是西北、西南地区的同志说，我们这里不但没有过热，连暖乎、温乎都没有达到；东北地区的同志说，跟沿海省市比起来，我这里还冷着呢。

而沿海地区的同志又认为他那儿有条件将经济增长速度搞得更快一些，也不存在过热问题。尽管大家都是敞开思想讲，赞同要防止过热，但是一谈到具体问题，就认为自己这里没热。就是说，“别人害病，不要让我也吃药”。全国形势这么好，每一个省都想抓住这个千载难逢的机遇冲上去，我们很难断定谁热谁不热。恐怕这个问题还是要请各地领导同志，根据中央精神，对当前形势作一个冷静的估量。然后，分析自己在哪些方面有问题，要采取一些什么措施来解决。我想至少可以作以下一些分析。

首先，热不热主要不是看生产速度，而是看建设规模、资金投入。只要是注意了质量、效益、外向型，产品能卖得出去，速度能搞多快就多快。我们不但不怕快，而且要力争有效益的高速度。问题是这个速度主要是靠加快改革开放，改善现有企业经营管理，还是主要靠建设资金投入。最近我看到一个报告讲，南方某个省经济增长速度很高，但是靠现有企业发挥潜力的增产因素只有20%到30%，其余70%到80%是靠大量的资金投入。这当然也可以，只要自己有钱，产品又有需求。问题是明年如果没有那么多钱投入，问题就来了。李鹏同志在全国计划会议上讲了，不是我们要抽紧银根，其实银根并没有抽紧。票子超发这么多，信贷规模突破这么多，说明并没有抽紧银根，明年计划也没有抽紧。更没有像1988年那样，压缩基本建设。问题是你铺的那个摊子，不是现在这个增长规模所能够容纳得了的。所以，不是谁要抽紧银根，而是总要有个总量平衡。因此对高速度需要分析，是真正扎扎实实靠现有企业的技术进步、产品质量提高和企业转换经营机制、调整结构搞上去的，还是靠大量的基本建设资金投进去的。如果摊子铺得很大，建设规模超过资金、原材料、外汇供应的可能，明年就难以为继了。

你那个地方的资金紧张不紧张，首先看农副产品收购资金保证了没有。如果连农副产品收购资金都保证不了，那就是你的基本建设规模搞得太大了，仓库里的东西积压得太多了，不然农副产品收购资金怎么会紧张？全国1200亿元农副产品收购资金，中央银行的800亿元早就拨下去了，为什么收购进度还慢了一半呀？农副产品收购资金你都不保证，那就可能是开发区搞得太多了，房地产搞得太多了，建设项目上得太多了。有的地方银行贷款不够，就发债券、股票、奖券，卖户

口和使用其他集资方式，提走了部分银行储蓄存款，到收购农副产品的时候当然就没有钱了。

其次，要分析工业高速发展的规律性。你说一年可以增长20%，可以相信，再多一点也可以相信。你说可以搞到50%、60%、70%，甚至于一年翻一番，就值得怀疑了，能搞那么快吗？一年搞这么快，也可以相信，但几年都这么快，就不大容易让人相信了。有些地方在前几年调整结构，集中力量搞了一些重大项目，这两年投产了，这当然可以快了。但以后几年你还上得去吗？一个项目搞几年才能投产，能按照这个速度连续搞几年吗？所以，不能一概而论，要非常认真地进行分析，分析一下推动经济高速增长是持久的因素还是暂时的因素。今年的飞跃也要靠前几年的积累，不可能年年都飞跃。所以邓小平同志讲，要隔几年上一个台阶。一年上一个台阶就很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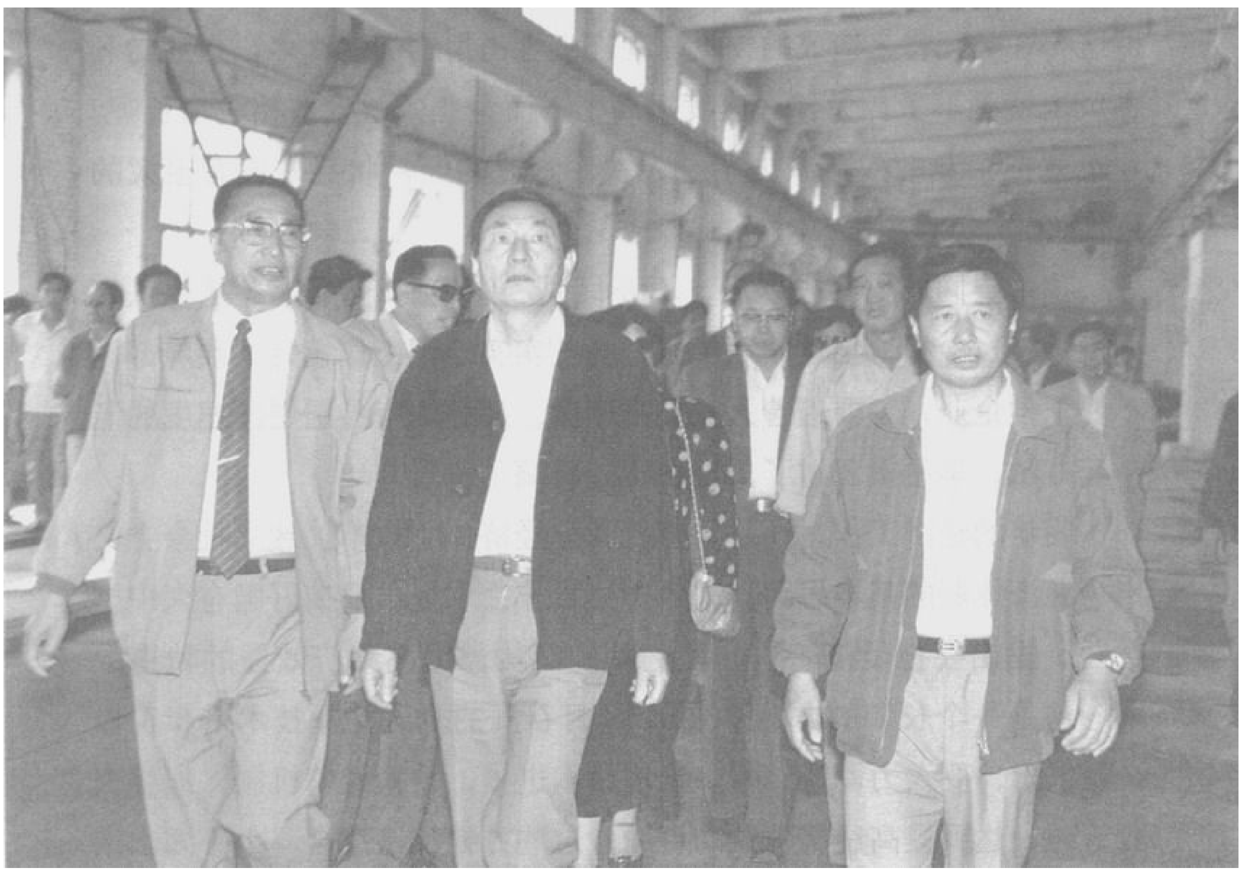
再次，要分析工业发展的速度主要是靠重工业还是靠轻工业上去的。目前重工业的发展速度主要是靠投资拉动的，或者说过去的生产能力没有发挥，现在投资增长一拉，一下子生产加一倍，这都是可能的。但那是不会长久的，能老是增长一倍吗？投资拉不动怎么办？一年投资增长百分之二十几就很高了。今年工业企业产销率是95%到96%，重工业是98%，是靠投资拉动把产品销掉的。但轻工业的产销率只有90%到92%，相当一部分产品销不掉。因此，资金占用增加了590亿元。当然，这其中也有铁路部门运不出去造成的积压，可总是积压在仓库里了。在这590亿元里，有随着生产速度上升而增加的合理库存二三百亿元，也还有300多亿元是积压的。所以，姑且不讲这590亿元将来造成的损失，现在资圣占用增加这么多，企业的利息负担就受不了。为什么速度提高了，而企业效益没有相应增长呢？利息就把企业的效益减去了一大块，企业的经营状况并没有很大的改善。

我希望同志们回去以后，不要只说“你热我不热”，还是要认真分析一下，冷静地估量一下形势，扎扎实实地把工作搞好。政府部门不要干预企业，不要逼着人家搞高速度。那种地市县层层压速度的老一套办法，早已批评过了，现在不能再搞了。

明年的经济工作，还是要坚持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思路。去年中央工作会议提出要搞好国有大中型企业，提出要把经济工作转移到调整结构、提高经济效益的轨道上来。

这是一个长期的方针。去年12月召开的全国企业技术进步工作会议提出，要大力调整结构，推进技术进步，转换经营机制，加强企业管理，达到提高经济效益的目的。这些方针都是符合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精神的，是真正贯彻邓小平同志指示的正确方法。明年的经济工作还是念这本经，因此我要强调以下几条。

一要积极转换企业经营机制，努力搞好国有大中型企业。《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转换经营机制条例》(以下简称《条例》)经过各方面的艰苦努力，好不容易颁布了。大家要去认真贯彻，不要把它摆在一边，置之不理。只有进一步深化改革，把国有企业搞活了，上面讲的这些问题才能解决。把《条例》赋予企业的权利落实了，按照这条道路走下去，就能够自主经营、自负盈亏。



1992年8月25日，朱镕基在甘肃省考察白银有色金属公司。前排左为白银有色金属公司经理陈永年，右为白银有色金属公司西北铅锌冶炼厂厂长刘维玉。

有不少企业提出要进出口权。现在机电企业没有自营进出口权很麻烦，牵涉很多技术问题和售后服务问题。我赞成只要符合条件，尽量给它自营进出口权。而大量一般性产品的进出口，如果过分分散出口，也难以管理。我们尝试推广一个办法，就是联合的办法。我一直在做这方面的工作，也促成了一些事情。我看还是工业企业和外贸企业联合，借鉴日本综合商社的办法，再加上我们自己的经验，搞一种工业企业和外贸企业互相参股的模式。工业企业自己要建立一套出口体系不是那么容易的。最近，经贸系统的中国化工进出口总公司分别与中国石油天然气总公司、中国石油化工总公司互相参股，成立了联合的石油进出口公司，我看这种形式就很好。现在全世界的船舶进入了一个更新周期，抓住了这个时机搞拆船工业肯定大有前途。物资部管拆船公司，五矿公司管进口旧船。我建议拆船公司和五矿公司相互参股，联合建立拆船进出口公司，马上制定一个规划，搞到300万吨的拆船能力。全国集中搞一两个点，效益高，环境污染也容易清理。所以，企业不要一味地要权，要走出新的改革路子。

有些机关在精简时成立了许多公司，想把已经下放的企业重新收上来或者利用仍旧保留的行政权力，强迫企业接受这些公司的“服务”，这也是不行的。企业应有的权利不能收。

明年要继续减轻企业的负担。第一，去年中央工作会议有个二十条政策，其中十二条是改善外部环境的，八条是要求加强企业内部管理的，这些政策在今年继续执行。第二，财政部花了很大的力量，制定了《企业财务通则》和《企业会计准则》，我非常支持。“两则”是带有改革精神的，给企业也放了一些权，让了一些利。第三，国务院经贸办在这次会上又提出了十五条政策措施，其目的也是减轻企业负担，增强企业自我积累、自我改造的能力。这些政策还没有定，让大家先讨论，国务院还要审议、协调。

二要注意防止产生新的三角债。两年来经过艰苦工作，我们取得了清理三角债的巨大成绩。国务院正式宣布这项工作已经结束，以后再发生新的三角债，不再采取国家投入贷款这个办法。我们制定的八个文件都是为了防止新欠，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谁新上的基本建设项目如果投资不落实，就要在下一年的投资和贷款规模里扣回来，不能再依靠国家注入资金。

三要继续抓好限产压库促销。 这项工作绝对不能放松。我认为，这方面以前从国务院生产办到国务院经贸办的同志都下了很大的工夫。要不是这么做，今年的“三项资金”占用就绝不是增加590亿元的问题，可能要增加到上千亿元，那就是另一种局面了。有人说限产压库是行政手段，不符合市场经济原则。问题是对于片面追求产值增长速度，仅仅用经济手段去解决是不可能完全奏效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在逐步更多地采用经济手段的同时，还必须采用行政手段。



1992年9月27日，朱镕基在广东省中山市考察威力洗衣机厂。右一为广东省副省长张高丽。

四要抓紧扭亏增盈工作。 今年这么高的经济增长速度，国家补贴没怎么减少，这怎么能行？亏得最多的就是石油、煤炭行业。这些行业亏损也有客观原因，但大家都要想办法扭亏。绝不能一手拿国家补贴，一手搞铺张浪费。明年给石油、煤炭部门都规定了扭亏指标，一定要争取完成，其中很重要的出路就是发展第三产业。

五要狠抓质量和技术进步。企业的技术进步要抓住几个重大项目。今年纺织行业抓住了机遇，动用国家外汇储备15亿美元中的一部分引进技术，把自动络筒机、喷气织机等技术都引进来了。纺织行业一定要把这几个项目搞上去。一旦搞上去，纺织行业就会翻身，质量、品种、效益就上去了，全盘都活了。质量工作永远不能忘记，永远是我们管生产的同志首先要抓的东西，任何时候都要念这本经。抓质量、抓技术进步，不靠这个手段，你那高速度能搞上去吗？我们过去吃亏就吃亏在进行基本建设、引进技术时，没有按照产业政策，大家都分散去搞，形不成规模经济，搞得没有效益，没有什么竞争力。

最后，讲一下明年的宏观经济环境，大家要有足够的估计。第一，前面讲的宏观指标相对于现在铺下的摊子是很紧的，搞什么东西都要量力而行，不能再乱铺摊子了。有些开发区搞不下去了，没有前景，就赶快停了。当前国际上一片萧条，对国际市场的容量不要估计得过分乐观，不要以为我们想出口多少就能够出口多少。第二，我们要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首先要进行价格改革。明年原材料、能源、运输要涨价：考虑煤炭指令性计划部分，从1月1日起再放开1.6亿到1.7亿吨；铁路货运从7月1日起每吨每公里涨1分5厘；3000万吨原油平价转高价；钢材价格基本放开；电价也相应上调。不涨价，这些薄弱环节就始终得不到加强，重复建设会更厉害。政府要两方面都考虑：不加价，结构调整不了，薄弱环节改善不了；加了价，企业负担加重了，亏损要增加。所以要采取措施消化，宏观政策要注意这个问题。第三，明年我国要争取恢复关贸总协定缔约国地位，保护知识产权、中美市场准入已达成了协议。这就要减让关税，减少非关税保护措施。最近已经公布了第一批3000多种税目的产品，降低了关税。这些固然有利于我们进入和参与国际市场，但是对我们的企业也是一个严重的挑战。如果不意识到这一点，那将来又会有相当多的企业面临很多困难。所以，我们在考虑明年工作时，都要把这些因素考虑在里面。最后我要说，我们还是要进一步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搞好国有大中型企业，转换企业经营机制，防止产生新的三角债，抓好限产压库促销，抓紧扭亏增盈，狠抓质量工作和技术进步，打击假冒伪劣产品；同时，要进一步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和企业民主管理，抓好两个文明的建设。

我相信，紧紧地抓住以上这几条，持之以恒地抓下去，大好形势一定会继续发展，目前存在的这些问题就会逐步得到缓解，并最终得到解决。希望我们大家共同努力！

加快铁路建设与改革步伐

(1993年1月11日)

1993年1月8日至11日，全国铁路领导干部会议在北京召开。出席会议的有全国铁路系统各单位的负责同志。这是朱镕基同志在会上讲话的主要部分。

首先，要充分肯定铁路工作的成绩。去年，铁路职工在国民经济高速发展、铁路运输设施很不适应的非常困难的情况下，奋发图强，千方百计超额完成了预定的运量目标。我们铁路的工作尽管做得不错，但还是不能够适应国民经济发展的要求。当前，铁路运输太困难了，对国民经济的发展制约太大了。这更加坚定了我这样一个决心，一定要把铁路工作抓上去。把铁路建设抓上去，抓住了这个环节就能带动全局。要提高国民经济的效益，就要调整产业结构，当前就要大力发展交通运输事业。尤其铁路，既是排头兵，又最薄弱，亟待加强。今天我想重申几个问题，也算是给同志们鼓鼓劲。

一、决战三年，加快全国铁路建设步伐

为什么说决战三年呢？人的这股气要鼓足，时间拖得太久不行。关键是这三年，搞上去了，可以起到决定性的作用。现在铁路运输全 面紧张，十二条线二十几个限制口的运载能力只能满足需要的40%，最多也就是60%。用三年总要把这种状况改变一下吧，要一鼓作气，狠狠地打一个歼灭战！但是三年解决不了根本问题，五年也解决不了，恐怕要十年。我们先把这三年的决战组织好。昨天，我同铁道部党组的同志们初步研究了一下这三年应该完成哪几条铁路线建设，一共排了十条线，大概有七条在“八五”期间是可以完成的，有三条完不成。

(一) 京九线，全长2370公里。铁道部原计划在1997年建成，现在准备1995年年底铺通，1996年实现分流配套、发挥效益。这已经是尽了最大的努力。但是，大家能否再想点办法，争取在“八五”期间发挥一点效益行不行？实现在1995年年底以前有所分流，哪怕工程还没有全部完成。因此，我自告奋勇来给你们当京九线的顾问，给大家起点精神

鼓舞的作用，希望加快一下建设速度。要把京九线作为一个典型，可以考虑实行分段包干、分省包干，看能不能搞快一些。我建议，京九线途经的每个省的常务副省长也当那一段铁路的建设顾问。因为对这些省来讲，这条铁路是一条生命线，对当地的经济发展是很重要的。我听到一些反映，说有的地方对修铁路还要收劳力集资费；有的地方铁路建设与文物保护发生了矛盾，虽然经过专家勘察论证，避开了，对文物没有影响了，但还是不让动工，一耽误就是三年多。我希望大家要把眼光看远一点，积极支持修铁路，铁路发展起来了，对经济会有很大的推动。修铁路经过的地方政府，不要搞摊派，敲竹杠，收这个费、那个费，搞得铁路修不通。如果扫除了这些障碍，我相信铁路建设就可以加快。只要中央和地方、路内和路外共同努力，积极配合，团结协作，铁路建设一定能够加快，决战三年一定能够取得决定性的胜利。

关于修不修京九线也有不同意见。最近，有位在铁路系统工作过的老同志写信给我，随信附上了一位同志的建议，他对修京九线有不同意见。我仔细研究了他的建议，认为这个意见提得好。首先，他敢于提出不同意见。其次，他有两个重要的观点是正确的。一是在加快新线建设的同时，必须重视科技兴路，发挥现有铁路的潜力，进行技术改造，采取配套措施。这个意见很重要。我们在决战三年、加快铁路建设的同时，绝对不能忘记这一条。一定要加强对老线的技术改造，这些挖潜措施投资很省，见效很快，值得铁道部仔细地研究、采纳。二是在加快新线建设的时候不能忽视工程的质量，否则后患无穷，特别是要避免地质条件没搞清楚就施工，这几十年的教训太多了。我们在加快铁路建设的时候，肯定会遇到这个问题，一定要事先注意。要在“质量第一，百年大计”这个前提下加快建设，绝对不能压指标，单纯地求快。京九线还是要修，因为就当前国民经济发展的状况看，不是仅仅改造旧线就能解决问题的；技术改造还是要搞，目前搞得还是不够，离要求差得很远。铁路运输还得做适应经济高速发展的准备，还要加强，还是要修京九线这条南北干线，而且必须快，要打歼灭战。

(二) 兰新复线①，全长1600公里，1995年年底完成。我不是在压指标，但咱们要有一股劲儿，要有一个奋斗目标，大家去真抓实干。

① 兰新复线，是国家“八五”重点建设项目。它东起甘肃武威南站，西抵新疆乌鲁木齐，全长1622公里，于1994年9月完成全线铺轨。

(三) 宝中线①，全长500公里。我去看了，干得不错，条件非常困难，桥梁隧道里程在20%以上。希望在1995年6月修通，这对缓解天水这个口子的铁路紧张状况将起到很大作用。

---

① 宝中线，是国家级电气化铁路干线。它东起陕西宝鸡，西到宁夏中卫，全长498.19公里，于1994年通车。

(四) 侯月线①，全长250公里，1994年6月铺通。

---

① 侯月线，是晋煤外运的南通路之一。它西起山西侯马，东到河南济源月山，全长256.6公里，于1994年通车。

(五) 浙赣复线①，全长940公里，还剩400公里没有完成，1995年要全部建成。

---

① 浙赣复线，是中国重要铁路干线。它从浙江杭州经江西通往湖南株洲，全长946.4公里，于1995年4月全线竣工。

(六) 京广线①改造，主要解决广州北、株洲北、衡阳北枢纽的改造，把京广线的运输能力从现在的3000万吨提高到5000万吨。

---

① 京广线，是贯通中国南北的重要铁路干线。它起自北京，止于广东广州，全长2288公里，纵贯河北、河南、湖北、湖南、广东五省。

(七) 大秦线①二期配套。煤运到秦皇岛没问题，可从秦皇岛港运不出去，卡脖子，要采取特别措施解决。

---

① 大秦线，是中国西煤东运的主要通道之一。它西起山西大同，东至河北秦皇岛，横贯山西、河北、北京、天津，全长653公里。第二期工程于1988年开工，1992年12月开通运营。

以上七条线基本上都是1995年前完成，剩下三条即使完不成也要搞出个名堂。

(八) 南昆线①，我去看了。这条线太重要了，对支援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开辟西南通路，意义都非常重大。尽管这条路非常难修，高山峻岭，有100多米高的桥墩，人很难进去，电也没有，但也不是不可以提前修通。怎么办？从易到难嘛，先从南宁往云南修，今年可以过平果，先把这一段打通，接着尽量往前延伸，等三年决战完成以后，再把一些队伍补充加强到困难地段，建设速度就可以加快。总之，对这条线要采取积极的态度，“八五”期间尽可能多修一点。这对于广西经济发展和贫困地区脱贫致富有决定性的意义，对云南、四川、贵州也都有积极作用。

---

① 南昆线，是国家一级电气化铁路干线。它东起广西南宁，西至云南昆明，北接贵州盘县红果镇，全长874公里。它是在艰险山区修建的一条长大干线，全线修建桥梁447座、隧道258个，于1990年12月正式开工，1997年12月开通运营。

(九) 成昆线①电气化改造，全长1100公里，也是非常难修，但完成后可使运输能力从800万吨提高到1800万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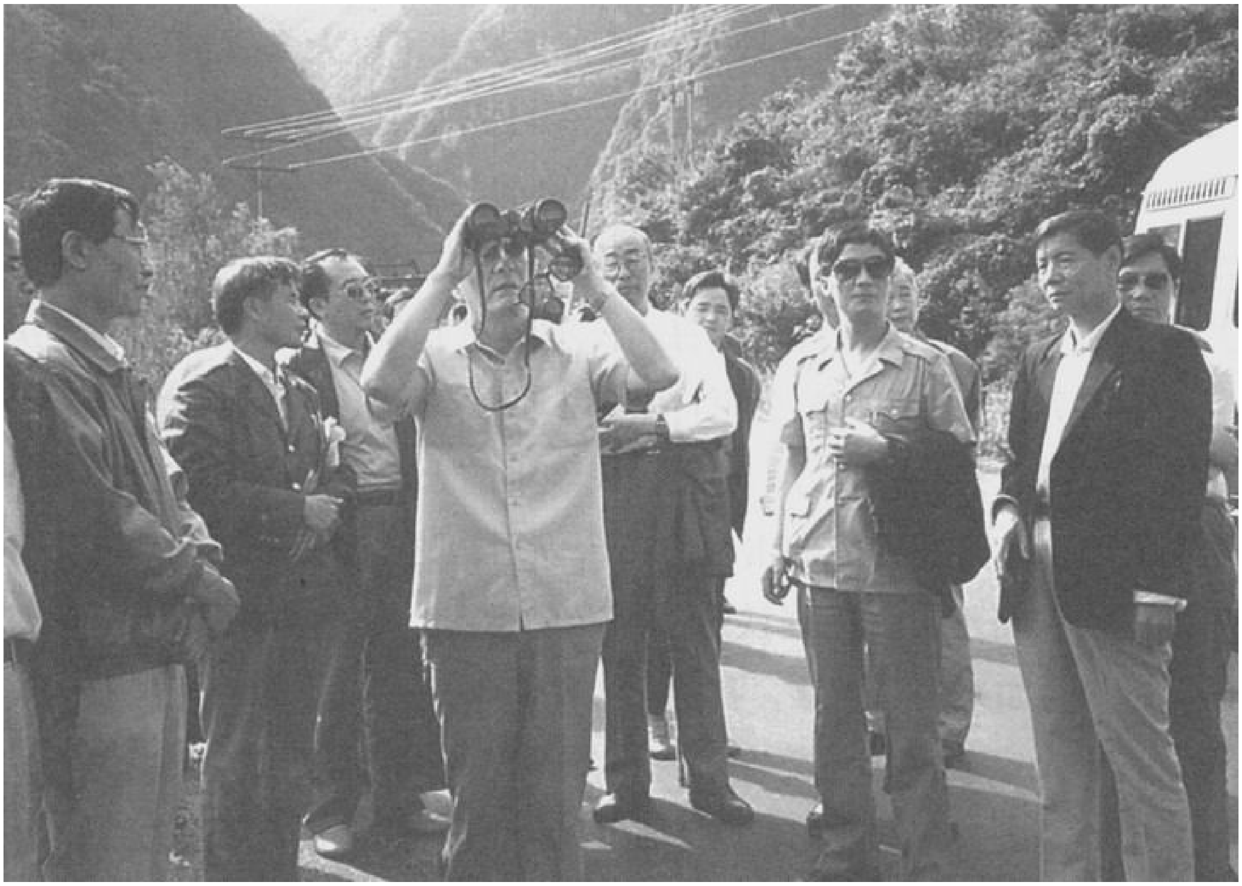
---

① 成昆线，是中国重要铁路干线。它连接四川成都和云南昆明，全长1100公里。

(十) 西安至安康线。对宝成线①二线有很大的争论，四川与陕西方面有不同意见，就是走安康还是修复线。去年我到宝成线考察，通过与各有关方面研究，最后认为还是走西安到安康这条线比较好。先打通安康到阳平关，从阳平关修到成都。西安到安康一直往南，还可以通到贵阳。这条线对陕西省的脱贫致富有决定性的意义，所以陕西省听到这个消息后欢欣鼓舞。如果修宝成复线，施工期间影响运输，进出川物资的运输将更加困难，因此四川方面对修西安到安康线也能接受。这条线施工难度很大，其中70％是桥梁隧道，有长18公里的隧道。

---

① 宝成线，是中国第一条电气化铁路。它北起陕西宝鸡，南至四川成都，全长669公里。



1992年8月23日，朱镕基在秦岭视察宝成铁路宝鸡至秦岭段越空工程时观察地形地貌。左五为铁道部副部长屠由瑞。

我们昨天初步研究了一下，七条线在“八五”期间完成，并且尽快发挥效益，另外三条线要争取大部分完成。这样，目前的限制口到1995年运输能力可以大大提高，紧张状况就可以大大缓解，也可以说是限制口的翻身。我们提出这样一个目标，希望大家共同努力。

但是，还有很多困难。除了刚才讲的，坚持“质量第一，百年大计”绝不能放松以外，还有很多其他的问题。第一是建设资金问题。去年7月1日，铁路建设基金每吨公里增加了1分钱，国务院已经决定从今年7月1日起每吨公里再增加1分5厘，但要看上半年的经济形势。我们大家共同努力，促使国民经济的大好形势继续发展，力争这个措施在7月1日能够出台。出台以后，这个钱一分也不能吃掉，都要用于铁路建

设。根据铁道部平衡的情况，今年建设资金还差22亿元。到时如果实在不够，我们想办法再增加一点贷款，请国家计委考虑。请大家放心，只要在确保“质量第一，百年大计”的前提下，尽可能搞得快一些，我们就绝不能让大家没有钱，没有钱也要挤出钱来搞。铁路不搞上去，国民经济就很难上去。第二，物资的供应也是个问题。上次，我跟物资部、冶金部的同志说过了，铁路建设是重中之重，物资先给铁道部。今年上半年钢轨还差18万吨，物资部、冶金部要尽快想办法，保证一下这个需求。马鞍山钢铁公司负责提供的车轮、轮箍，也要开足马力生产。总之，各部门的同志都要支持，齐心协力，把铁路建设搞上去。

二、深化改革，改善铁路经营管理

铁道部根据煤电油涨价、运营成本提高的情况测算，今年要亏35亿元，现在估计只亏4.9亿元。我在昨天讲了一句话：铁路部门不允许亏损，不应该亏损。同志们，对你们施加一点压力，现在我们要集中力量把铁路建设搞上去。国家把大量的投资投入铁路，你们的建设队伍都上去了，你们的闲人都有活干了，你还亏损？现在亏损的最大原因是人多，煤矿、石油行业都是这样，大约多二分之一到三分之二的人，怎么消化？主要是发展第三产业。这么大量的投资投进去，为你们创造了发展第三产业的条件，而且还同意给你们优惠政策发展第三产业，特别是要发展商业、服务行业。我相信各个铁路局只要在这方面多想办法，就不会亏损。要做到这一点，确实需要深化改革。去年，国务院发布了《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转换经营机制条例》，铁道部又搞了实施办法，大家要很好地贯彻。铁道部本身要放权，不能像过去那样管理。一定要把责任加在企业身上，让它真正成为一个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企业。半军事化的组织、集中统一的管理，这是我们铁路的特点所决定的，必须有集中统一的调度，必须有集中统一的建设。但不是什么东西都要集中，在经营管理方面要放点权，让企业有更多的经营自主权，这样企业才有可能做到自负盈亏。我相信这样一搞，每个铁路局的积极性都会提高，它看到自己创造的价值，自我积累，自我改造，就会有利于发挥现有旧线的能力，有利于旧线的技术改造。我希望铁路系统能够在企业转换经营机制、铁道部转变职能方面，在企业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道路上有突破性的进展。在这个

前提下，我相信今年铁路行业不会亏损，而且有可能拿出更多的钱投入旧线的技术改造。

三、狠抓路风，加强全国铁路系统的精神文明建设

我在广西到农村访问了一户果农，问他申请计划外车皮要不要塞钱。他说不要，不但不要塞钱，连烟也不要递，铁路办事人员身后挂着“要廉政、抓路风、不允许送礼”的牌子。这是普通农民的反映。我看柳州铁路局的路风是比较好的。总的来讲，铁路的路风都是比较好的。这要感谢我们的很多老部长、老同志，在这方面抓得比较紧，两个文明建设一起抓，加强了思想政治工作。但是，现在铁路上的问题也不少，车匪路霸还相当厉害。车匪路霸不完全是铁路本身的问题，与整个社会的治安和铁路内部的廉政相关，所以要狠狠地抓。只有这样，才能把我们铁路部门的工作落实到基层的每一个职工，使大家都能发挥积极性，团结一致，完成我们的任务。

最后还要强调一下，要注意铁路运输和建设的安全。去年还算好，铁路没有出很大的事故，就是宝成线有两次塌方。希望同志们还是要抓质量，抓安全，鼓舞士气，真抓实干，奋发图强，把铁路运输和铁路建设抓上去。

搞好金融宏观调控

(1993年1月16日)

1993年1月12日至16日，全国银行分行行长、保险分公司总经理会议在北京召开。出席会议的有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银行分行行长等。这是朱镕基同志在会上讲话的主要部分。

在国民经济运行中，金融是非常重要的调节手段，除了价格杠杆以外，金融是影响最广泛的调节手段。因此可以说，去年国民经济取得的成就，与金融工作者的努力是分不开的，金融战线的同志们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当然，在工作中也有一些教训、一些问题。针对当前出现的问题，我讲三点意见：

一、严格进行总量控制，从紧进行宏观调控，防止经济过热

去年，国民经济高速发展中出现的一些问题，是前进中的问题。出现这些问题的原因，是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没有形成。国民经济在旧的机制下高速发展，出现一些问题是不可避免的。这些问题，也只能通过深化改革，通过完善企业和金融机构的自我约束机制来解决。在市场机制还未形成的情况下，我们应该严格进行总量控制。同时，应在资金投向上、在调整产业结构上下工夫，特别要支持铁路、港口、民航、通信等基础设施建设和能源及原材料工业发展，以提高整体经济效益，抑制通货膨胀。

去年，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增长40%左右，贷款规模、货币发行量都增加很猛，这都是历史上没有过的，今后的工作更要谨慎一点。今年的信贷规模要严格进行控制，一定不要突破。从紧进行金融宏观调控，就是说，金融是宏观调控的最后一道关口，从一开始我们就应该努力工作，守住这道关口。事实已经证明，控制总量是相当难的，如果开始不紧，往后总量就很难控制住。

首先是控制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去年和前年清理三角债，重点是清理固定资产投资项目的拖欠，银行做了很大的努力，对这个成绩要充

分肯定。现在看来，去年由于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安排过多，地方自筹资金往往是“一女多嫁”，安排不落实，最后还得依靠银行贷款。银行信贷规模有限，贷不了那么多，就又可能产生新的三角债，这是我们应当认真注意防止的。

另外，流动资金占用过多，也是造成现在信贷规模猛增的一个原因。今年无论如何要继续坚持限产压库促销的方针，扭亏增盈，不许挂账。不要追求那种带水分的、不讲效益的速度。凡是销售、运输不出去的东西，不能让它生产，不能让它占压资金。“压贷挂钩”是清理三角债的一个好办法，要继续实行这个办法，这样可以减少资金占用，加速资金周转。

二、深化金融改革，建立银行风险约束机制

现在，我们的银行一方面受到行政的压力，在原来计划经济体制的惯性作用下，要服从行政命令，叫你贷你就得贷。另一方面，银行贷得越多，奖金就越多，办公楼也就盖得越高。我看这是强迫和自愿相结合。也就是说，银行只有激励机制，没有承担风险的约束机制。贷款项目没有效益，贷款收不回来，银行却没有责任，这是不行的。专业银行作为金融企业，要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在国家政策的统一指导下，进行金融活动。不能搞奉命贷款，贷款要经过审查、评估，包括政策性贷款，也要进行审查，不能把风险转嫁到国家身上。这次会议也提出了建立责任制问题，希望大家很好地实践，逐步建立银行承担风险的约束机制。这里牵涉到投资体制改革问题。我感到，现行投资体制存在很大问题，不改革是不行的。要借鉴多数国家搞市场经济的成熟经验，改革投资体制，成立真正的政策性银行、独立的商业银行，把银行办成具有风险约束机制的，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银行，不能把银行当做政府或部门的出纳和会计。

三、严格控制发行证券和新建金融机构

国库券是国家为了平衡财政收支而发行的证券，不发不行。当前，企业债券发行这么多，问题不少。通过银行信贷，还有产业政策，国家可以对宏观经济进行调控，项目可以优选。但是，企业债券不受银行控制，有的利息高达20%，企业怎么能还款呢？实际上，最后风险还是会转嫁到国家身上。另外，债券发多了，势必影响银行存款。新

成立的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要严格控制股票、债券的发行。我们要保护公众利益，按国际惯例办事，实行规范化管理。那种主张先推广、后规范的意见是不对的，那非把企业搞乱不行。我们的意见是先立法，再试点，取得经验以后再推广。我希望证券的发行要慎重，不要发得太多。现在国库券卖不掉，主要原因就是国库券的利息没有企业债券和其他债券的利息高。尤其是有的地方盲目推广内部职工股票，用高利息集资，最后把股票推到社会上去，将来危害很大。

另外一个问题是，对新建金融机构也要严格控制。最近批准成立了一个首钢华夏银行，许多国有大中型企业纷纷要求给它们金融权。我知道外国的大企业集团也有银行，这是它们企业集团综合经营的一种业务嘛。如果把它当成企业集团的“钱袋子”、“保险柜”，随时可以开保险柜去取钱，那怎么能保护公众的利益呢？现在我们的企业集团还没有条件都来搞银行，只能搞华夏银行这一家，先试试看，而且它要接受中央银行的统一管理。企业集团办财务公司，部门、地方办信托投资公司，都要规定严格的条件，并且要从严审批，加强监管。现在，金融、财政等系统办了不少投资公司、证券公司，针对如何管理也应该加快立法步伐。我以前讲过，要坚持银行业与证券业的分离，禁止银行从事证券业务，严禁用银行贷款经营证券业务。银行设立的证券公司，必须与银行脱钩，组织、人事关系都要脱钩。证券公司不能用吸收的客户交易保证金来发放贷款。对于行政机关办信托公司、证券公司、房地产公司，证券公司与银行之间的资金拆借，信托投资公司兼营证券业务，存贷款利率与债券利率的协调等，都要尽快研究并制定管理办法，纳入法制的轨道。

实行真正的政企分离

(1993年2月17日)

这是朱镕基同志在《经济日报》1993年2月11日刊载的《翻牌公司的内幕新闻》一文上的批语。

这篇厂长经理座谈会的发言摘要里所反映的问题，看来带有一定的普遍性。《条例》①颁布已经半年多，在我们的身边还发生这样的事情，可见贯彻《条例》确非易事。在政府机构改革、转变职能的过程中，通过成立行政性公司，把已经放归企业的正当权益收上来，甚至取消企业的法人资格，重新使企业成为行政附属物和经济盘剥的对象，这不是改革，而是倒退。这样做，不仅不利于市场主体的形成，而且会强化行业垄断，窒息市场活力，显然，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是十分不利的。因此应当明确，各级政府机关在机构改革中成立的公司，或者由富余人员组成的公司，都必须立即和原机关脱钩，实行真正的政企分离，在经济上独立核算(开办初期需要财政补助的也应单独立账)，除极个别特殊情况并经国家批准外，这些公司不得兼有行政职能。这应当作为一条重要的原则确立下来。希望国务院经贸办党组作些调研，制定出有关规定和办法。

朱镕基

1993年2月17日

---

① 《条例》，指《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转换经营机制条例》。



1993年 2月11日 星期四 政府之窗 经济日报 第七版

从一些政府行为看建立市场经济新秩序的必要性

组建集团公司，对于提高生产力，合理配置资源，增强企业竞争力，迅速与国际市场接轨有着重要的意义。但是，不管自愿与否，强行组建集团，收走企业法人资格等做法，是和改革的目标背道而驰的。

2月4日，中国企协召开厂长经理座谈会，与会的同志披露了这一段时间一些部门在组建集团中的所作所为。座谈结束时，主持人袁宝华会长对记者说，建议《经济日报》把今天座谈会的内容公诸报端，题目就叫——

翻牌公司的内幕新闻

本报记者

●取消企业法人，收走法人权益，机关变企业，企业变车间，政府行为兼有行政管理、企业经营、经济技术服务三种职能，企业还有什么自主权？

●行政权力直接进入市场，必将形成中间截留，市场垄断，企业机制转换和多年积累的改革成果是前进还是倒退？

●截留《条例》下放给企业的权力，仍以旧的职能划分和管理方式行事，还谈什么转变政府职能？

1993年2月11日，《经济日报》第七版刊登《翻牌公司的内幕新闻》一文。

积极稳妥地进行棉花流通体制改革试点

(1993年3月10日)

1993年3月8日至10日，国务院在北京召开全国棉花工作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各有关省、自治区、直辖市负责同志和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这是朱镕基同志在会上讲话的一部分。

棉花问题在我国国民经济中具有特殊重要的战略地位。50年代初，我们就把棉花作为稳定社会、恢复经济的最重要的农产品之一。六七十年代，周恩来总理、李先念同志亲自抓棉花工作。棉花是我国最重要的经济作物，全国大约有两亿棉农，他们是以生产棉花为主要收入来源的。可以说，没有粮食、棉花等主要农产品的稳定增产，就不可能有我国工业的稳定发展。对此，我们必须有足够的认识，绝不能疏忽大意。去年，主要是由于自然灾害，全国棉花总产量减少了20%，大约少了3000万担，这是个大事情。如果今明两年棉花生产还是上不去，对今后几年的纺织工业和整个国民经济的正常运行，就会带来严重影响。



1993年2月19日，朱镕基在山东省嘉祥县护山村向农民了解化肥供应及价格情况。右二为内贸部部长马李胜，右三为山东省省长赵志浩。

这次棉花工作会议确定了一些政策，就是要向农民传达一个信息，即国家需要棉花，要调动广大棉农的积极性，按照国家合同定购计划，多种棉花，种好棉花；不要怕多种棉花卖不掉，国家保证收购，今年的棉花肯定能卖个好价钱。要解除棉农的顾虑。过去曾经发生过“卖粮难”、“卖棉难”，今年我们要下决心解决这个问题。可以告诉广大棉农，只要是在定购合同计划以内的棉花，收购价格绝对不会低于上个年度。即使棉花大丰收，也会用增加国家和地方储备的 办法，按保护价收购，不会让农民赔本，而且要让农民得到一定的利益。这样棉农才有积极性，才能把棉花种足种好，并且愿意增加投入。

这次会议上，大家对棉花流通体制改革问题反映很强烈，许多省区市都要求放开棉花市场，放开棉花价格。大家都希望把改革搞得更快一点，这种愿望是好的，但是要根据实际情况来作决定，否则欲速而不达。我们考虑，现在还不是全面放开棉花价格的时机，因为去年棉花歉收，不能完全保证国民经济的需要，在这个时候讲全面放开棉花价格是不妥当的，时机不成熟。经过几年的试点，粮食价格逐步放开了。农产品由国家定价的，目前只有棉花、油料、烟叶等几种特殊商品。现在，纺织行业处于全行业亏损的边缘，近期也没有很快好转的迹象。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机制发育还不健全，棉花生产丰歉波动较大、产量还不能完全适应纺织工业需要的情况下，一下子完全放开价格和经营渠道，只能导致“棉花大战”，造成价格猛涨，不但农民得不到好处，纺织工业也会受到损害。所以，我们认为不能全面放开棉花价格和经营渠道，还是要坚持去年国务院55号文件①精神，积极稳妥地进行棉花流通体制改革试点，取得经验，再逐步推广。对此，我代表国务院再讲三点意见。

---

① 国务院55号文件，指1992年9月22日《国务院批转国家体改委关于改革棉花流通体制意见的通知》。

第一，进行棉花流通体制改革试点、放开棉花价格，只能在棉花定购数量以外的范围进行，而且必须在认真完成外调任务的前提下。合同定购的棉花价格不能放开，定购的棉花已经签了合同，如果在棉花歉收、已不能满足纺织工业需要的情况下，放开价格不是要大家都去抢购棉花，哄抬价格吗？最终是纺织工业承受不了。所以，定购的棉花，价格是国家管理的，不能放开，国家定购数量以外的才可以放开。放开价格要真正起到促进生产、引导消费的作用。如果棉花丰收，还要搞保护价，增加国家储备，财政拿钱贴息，维持棉花价格不下跌，防止棉贱伤农。这一点要明确。搞粮食流通体制改革，我们有了一些经验，如果没有平准基金，没有一笔风险基金准备丰收时多收购，盲目地放开粮食价格，丰收时价格就会下跌。棉花市场也是这样。

家都去抢购棉花，哄抬价格吗？最终是纺织工业承受不了。所以，定 购的棉花，价格是国家管理的，不能放开，国家定购数量以外的才可 以放开。放开价格要真正起到促进生产、引导消费的作用。如果棉花 丰收，还要搞保护价，增加国家储备，财政拿钱贴息，维持棉花价格 不下跌，防止棉贱伤农。这一点要明确。搞粮食流通体制改革，我们 有了一些经验，如果没有平准基金，没有一笔风险基金准备丰收时多 收购，盲目地放开粮食价格，丰收时价格就会下跌。棉花市场也是这样。



1993年2月21日，朱镕基在山东省德州地区了解农业机械情况时，德州行署专员杨传堂(前排左四)汇报农用拖拉机购销与使用情况。前排左一为山东省委书记姜春云，左二为朱镕基夫人劳安；第二排左二为农业部副部长陈耀邦，左四为化工部部长顾秀莲。

第二，搞棉花流通体制改革试点，要在原有的收购、加工场所，以供销社为主渠道进行。供销社收购点都有棉花收购标准，有棉花检验机构，因此只能在这个基础上，以供销社为主渠道进行试点。棉花市场要规范化、法制化、现代化，不能搞“骡马大会”式的棉花市场。

第三，要严格执行国家的棉花收购标准，强化国家质量抽查监督工作。绝不能把棉花经营搞乱，使棉花质量下降，重复过去的教训。最近，商业部到山东省做了一些调查，我把他们调查的情况向大家说一说，以便引起大家的注意。根据调查，放开棉花市场不一定能卖好价钱，农民可能得不到多少好处，主要是中间环节得好处，“倒爷”得好处。对放开棉花市场担忧的是纺织厂，忧的是棉花价格放开的时机不成熟。现在棉花供求关系趋紧，如果棉花价格上涨，质量下降，没有稳定的渠道供应，纺织企业将难以承受。济南市国棉四厂反映，刚宣

布棉花市场放开，省内农口的某公司就到厂里兜售棉花，并要在价外加价3%。还有一些对棉花品级标准毫不了解的公司，也向纺织企业兜售棉花。去年9月到12月，山东省对青岛市未下达调棉计划，山东省供销社青岛棉麻采购站的供棉量仅占当地棉花供应总量的10%左右。有的产棉县已经提出，因今年棉花价格已放开，对国家调拨计划，如价格高就执行，否则就不调棉。因此，一旦棉花价格放开，国家的调拨计划、出口计划及储备任务都将难以完成。据反映，现在产区计划外纱厂正在恢复生产。青岛市纺织工业总公司认为，如不马上抓紧采取措施，数月以后，青岛市将有相当一批纺织企业可能“无米下锅”，被迫停产。同时，将难以保证棉花质量。小轧花机禁而不止，虽然山东省政府三令五申，禁止用小轧花机加工棉花，但是产地县的乡村普遍在筹建小型棉花加工厂。国家质量技术监督局在最近召开的纤维检验专业会议上，邀请了准备试点的几个省的代表参加，他们反映的问题也是比较严重的，出现了不要标准的错误认识。今年1月份江苏省纤检所检验的南京十批棉花中，品级下降的占10%，重量不足的占60%；从山东调拨的棉花质量看，相符率很低，只有30%左右。棉花等级下降是由于遭了灾，使质量大大下降；再有，就是不执行质量标准，使一些棉花经营单位非法牟取暴利。有的单位直接在轧花厂更换包装，随便升等升级。据了解，江苏省半数以上的轧花厂有这种情况。还有一些经营单位，到南方购回低等级棉，到山东改装成高等级棉外销，转手获取大量利润。在这种情况下，监督检验工作遇到很多困难。所以我的意见是，一定要严格执行国家标准，强化国家质量监督抽查制度。如果放松了质量工作，降低了棉花质量标准，我们今后几年都恢复不起来，纺织行业会遭受很大损失。因此，我们要积极稳妥地搞好棉花流通体制改革试点，棉花市场要规范化、现代化，要审核经营单位，实行会员制，未经审查的经营单位不能进入棉花交易市场。要强化国家的质量监督抽查工作，哪个地方搞歪门邪道、弄虚作假，就登报批评，还要罚款；否则，国民经济发展就要受到损害。我们希望大家要顾全大局，按照国务院文件精神办事。总之，对棉花流通体制改革试点既要采取积极的态度，也必须慎重行事。在棉花歉收的情况下，一是防止“棉花大战”，二是防止质量下降，这两件事务必请同志们注意。

防止通货膨胀要始于“青蘋之末”

(1993年4月1日)

1993年4月1日，中共中央召开经济情况通报会。这是朱镕基同志在会上讲话的主要部分。

一、对当前经济形势的估计

去年以来，在邓小平同志视察南方重要谈话精神的指引和鼓舞下，全国经济形势总的说来是很好的，发展是健康的。同时也要看到，当前确实面临不少问题，我们要善于总结经验，及时发现和解决这些前进中的问题。我这里想强调一个观点，当前各种矛盾集中表现为金融形势紧张，究其根源是投资规模过大，问题在于经济结构没有改善，隐患是可能引发严重的通货膨胀。

现在，金融形势紧张的状况已经越来越明显地暴露出来了。

(一) 在去年和今春大量发行货币的情况下，许多地区仍然出现支付困难。去年投放货币1158亿元，今年元旦至春节22天又投放了1100多亿元，春节后回笼不理想。按往年的规律，3月底应可全部回笼。但到3月31日，还有259亿元没有回笼。因此，全年货币投放将可能在1500亿元以上。货币发了这么多，有些地方仍然支付困难，已有13个省来电、来函告急。“白条子”的问题暂时解决了，但“绿条子”问题依然存在，一些农村邮局不能及时兑付汇款，如四川积压待兑汇票3亿元，湖南也有2亿元。专业银行存款备付金大幅度下降，备付率由去年年初的10.4%降为年末的5.8%，今年又进一步下降到3.8%，已在警戒线以下了。

(二) 资金大量流向沿海地区，内地大量集资分流，储蓄存款增长相对下降。去年的贷款规模虽然控制在计划之内，但数百亿元的资金通过集资和拆借，绕过贷款规模的限制流向沿海地区，由短期贷款变成长期贷款。

(三) 重点建设资金难保，扶持棉花生产资金和粮食预购定金等农业资金有规模、无资金，政策落实不了。由于存款增长缓慢，资金来源减少，加之不少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的资金通过各种渠道被拿去搞房地产、炒股票等，保证重点建设投资越来越困难。特别是一些地方的重点建设资金和农业资金没有保证，将资金缺口留在刀刃上。

(四) 外汇紧缺，调剂市场上人民币大幅度贬值。主要是进口的需求太大，外汇市场供求矛盾加剧。去年年末，我国外债余额达693.2亿美元。按实际收汇计算，我国的债务率为128%，偿债率为24.8%，分别高于和接近国际公认的100%和25%警戒线。外贸出口也不理想，据海关总署统计，今年1月到2月全国出口仅比去年同期增长2.3%，增幅是1986年以来最低的；进口则增长23%，增幅是出口的10倍。截止到2月底，国家现汇结存202.5亿美元，比去年同期减少30.4亿美元。

金融形势紧张的根源在于投资规模过大。去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达到7582亿元，比1991年增长37.6%。去年铺开的摊子，现在正是用钱的时候。今年头两个月，固定资产投资继续高速增长，国有单位完成投资228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64.1%。目前全国在建规模3万多亿元，即使不上新的项目，按目前的投资进度逐年递增，也要五年才能完成。

问题还不只是投资规模过大，关键是产业结构没有改善。同时，由于社会总需求增长过快，原有的结构矛盾显得更加突出。

一是产业结构没有改善，有的地方反而有劣化的趋势。从投资结构看，去年在国有单位投资中，能源、原材料等国家重点建设投资虽有增加，但比重由1991年的44%下降到39.8%；加工工业投资增长幅度明显高于能源、原材料投资增长幅度，比重由16.5%上升为18.4%。

农业问题不容忽视。我国农业的技术基础和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比较脆弱，今年1月到2月，农业投资的比重又下降近一个百分点。

二是地区结构不平衡问题更加突出。从地区投资结构看，明显地向东部沿海地区倾斜。由于沿海地区的经济发展比内地快得多，进一步刺激内地用高利率的办法集资，分流银行储蓄存款，以保住资金不致外流。

三是所有制结构的发展趋势值得注意，国有经济的产值增长幅度明显低于非国有经济。

隐患是有可能引发严重的通货膨胀。现在，通货膨胀还在可以控制和承受的范围内，但是，发展趋势值得注意。从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看，今年1月到2月比去年同期上涨10.5%，其中35个大中城市上涨15.2%。从工业品价格看，今年1月到2月比去年同期上涨18.2%，原材料、燃料、动力购进价约上涨25%。钢材、铜、铝、木材、油品等生产资料的价格超过国际市场价格。有些工业企业的生产已经难以维持。从国库券的二级市场看，至今年3月31日，1992年五年期的国库券价格下跌至面值的94%。人们开始寻求保值手段，如抢购黄金首饰、外汇等，以减少通货膨胀带来的损失。这反映了群众对通货膨胀的预期心理正在形成。今年国库券发行困难，也与此有关。

另外，今年为了理顺价格，加快改革，加大基础行业的投资力度，优化产业结构，决定提高铁路货运及石油、成品油等生产资料的价格。5月1日，还要提高营业税的税率。银行利率也不能不提高。这些改革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必要措施，但在短期内会提高企业的生产成本和固定资产投资的开支，也会推动各种物价的上涨。

因此，我们不能不对通货膨胀予以高度重视。当然，只要农业不出问题，所有这些还可以控制在能承受的范围之内。如果农业有个三长两短，那么通货膨胀的发展就会相当严重。而通货膨胀具有一旦启动就会加速发展的特点，它不可能在没有任何措施的情况下，自动停止和消失。通货膨胀发展到一定程度，国民经济就会陷入混乱，从而诱发许多社会、政治问题。这种教训是很多的。国际、国内经验还表明，对于通货膨胀应当防止于“青蘋之末”，不能等到它严重发展后再去治理，那要付出很大的代价。

二、当前需要采取一些应急措施

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必须通过深化改革，但这有一个过程。为了改革和发展能顺利进行，建议针对前进中面临的突出问题，采取以下一些应急措施：

(一) 要考虑提高银行存贷款利率的问题。因为物价上涨，银行实际存款利率已为负数，降低了群众储蓄存款的积极性，加剧了资金的紧张，在某些地方已经出现了“利率大战”。提高利率是市场经济条件下治理通货膨胀的通常做法。在我国当前企业经营机制尚未转换和投资责任机制尚未形成的情况下，提高利率对抑制信贷的作用不显著，但对吸收储蓄存款是迫切需要，而且势在必行。当然，要考虑到提高利率会增加企业目前已经很重的利息负担和还款困难。要充分估计到一些刚刚好转的国有企业会重新陷入困境，有些企业会从盈利转为亏损，对此要有足够的思想准备，但是不提高利率，宏观经济的困难会更大。

(二) 要考虑刹住全民集资的趋势。现在兴起的高利率全民集资之风，如果任其发展，将会形成银行储蓄下降、资金周转失灵和投资失控的后果。国内已经发生一些利用高利率集资、骗取资金的大案，值得我们警惕。集资一定要按国务院的规定执行，对违反规定的要登报批评。在今年国库券销完以前，一律不得发行企业债券。对集资活动要进行整顿。国务院即将颁布关于集资管理的法规，在此之前，对集资暂缓审批。

(三) 要按有关规定和规范，积极稳妥地进行企业内部股份制的试点。最近，证券的发行、转让和收益分配，以及企业内部股份制推进过程中积累的问题，有逐步暴露之势。有些企业把明确规定不准上市交易的内部“股票”推向市场，有的城市已形成几万人规模的股票黑市交易。发生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是在法律法规不健全、群众缺乏证券知识和风险意识的情况下，某些地方领导急于筹措资金，不按国务院规定和规范办法有步骤地进行试点，急于求成，随意铺开，不考虑可能给社会安定带来的后患。国务院办公厅将要下达关于制止在企业内部股份制试点中不规范做法的通知，希望各级政府认真执行，严肃制止和查处各种违法违纪行为。关于企业在国内公开发行股票并到上海、深圳上市，以及少数企业到香港发行股票和上市的问题，国务院已经做了部署，下达了指标，各部门、各省区市都在积极进行股票发行和上市的准备工作。关于股票发行和上市的管理法规也即将颁布。希望各地区要按国务院的部署办事，不要擅自行动，不得突破今年股

票发行的指标。希望有关部门要按照1992年国务院68号文件①的分工，各负其责，共同把全国的证券市场管好。

---

① 1992年国务院68号文件，指1992年12月17日《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证券市场宏观管理的通知》。

(四) 银行要限期清理和收回超范围、超期限的拆借资金。各专业银行要限期留足备付金和交足准备金，严格控制基础货币的供应。要严格禁止银行或非银行金融机构将信贷资金用于炒买炒卖房地产和股票、期货。当前各地银行无论资金多么紧张，也要在保证支付的前提下，一保农产品定购和收购资金，二保铁路等重点建设。其他贷款要根据国家产业政策，量力而行。

(五) 要采取一定的经济措施，调整资金的地区分布结构。从资金运动的规律来看，资金必然要往获利高的地方流动，但这样必然会加大不发达地区的困难，进一步扩大地区间的经济差距。在目前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不健全的情况下，中央有必要、有责任进行宏观调控。我们既要鼓励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也要注意帮助中西部地区的发展，实现共同富裕。

(六) 要进一步重申并且严格贯彻执行《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转换经营机制条例》(以下简称《条例》)中的规定。企业必须坚持工资总额增长幅度低于本企业经济效益增长幅度、职工实际平均工资增长幅度低于本企业劳动生产率增长幅度的原则。要严格控制消费的过快增长。

三、要根本解决问题，就必须加快和深化改革

从根本上讲，当前出现的问题，还是由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没有在深层次上受到触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没有形成。历史经验证明，靠旧的体制、旧的方法、旧的机构，高速发展经济是有很大风险的。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是缺乏约束机制和风险机制，没有宏观调控的市场经济体制的缺陷是经济上的无政府状态。如果不改革旧体制、建立新体制，而让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两者的弊端结合起来，“大锅饭”加上盲目性，高速发展是难以持久的。因此，当前加快改

革，特别是加快投资、金融、财政体制的改革，应该成为我们经济工作的重点。当然，正在进行的企业改革绝不能放松。总之，要加快发展就必须深化改革。

(一) 当前各个方面针对固定资产投资膨胀，普遍认为从加快投资体制改革入手，带动金融、财政体制的改革，对于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关系重大。投资体制改革的重点，是建立投资约束机制和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宏观调控体系。今后对于一般加工工业项目，应该主要由专业银行和商业性银行根据国家产业政策和计划、行业管理部门的规划，独立评估，自主决定贷款与否，并对贷款项目的效益和回收风险负责。对于社会效益好而投资回报期长的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项目，应该主要由国家和地方筹集政策性资金来解决。可以考虑成立国家长期开发信用银行，由它根据国家综合经济部门确定的产业政策、生产力布局方案和推荐的项目，经过独立评估，在国家确定的投资和贷款总规模内，自主决定。

(二) 与投资体制改革相适应，还要进行金融体制改革。银行体制改革的重点，是建立中央银行的宏观调控体制和转变专业银行的经营机制。要强化中央银行的权威，严肃金融纪律。要建立一套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利率形成机制。中央银行要配合财政用发行国债弥补财政赤字的做法，试办国库券、财政债券、国家长期开发信用银行债券的抵押、买卖业务，为间接调控货币供应量创造条件。专业银行的改革要以政策性银行与商业性银行分开为目标，先做政策性业务和商业性业务分账经营、分别核算的试点，并进行贷款限额管理下的资产负债比例管理和资产风险管理试点。对政策性银行和商业性银行都要建立一套监督机制，中央银行要对专业银行实行每年稽核的制度。还要考虑政府有关部门对银行实行监督的组织形式。

(三) 要进行财政体制的改革。这些年财政累计向银行透支达1398亿元，这个问题已经到了非解决不可的时候了。今后要在进一步深化财政改革、强化税收征管的基础上，逐步做到只用发行国债的办法来弥补财政赤字，停止财政向银行透支借款的做法。要下决心理顺中央和地方的财政关系，明确各自的财权和事权，形成一种较强的约束机制。

(四) 要进一步贯彻落实《条例》，深化企业改革，强化企业的监督机制、约束机制和激励机制。既要落实企业的自主经营权利，也要落实自负盈亏的责任。要加强对国有资产的管理，理顺产权关系，确保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防止国有资产的流失。要进一步探索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产权关系。关于国有资产的管理，国务院正在组织起草更加具体的管理办法，作为《条例》的补充。

四、关于抓住机遇和珍惜机遇的问题

邓小平同志关于抓住机遇、加快发展的指示，高瞻远瞩，催人奋进。我们应该认真体会，正确把握。我领会这里有两层含义：一是大发展的机遇不多，稍纵即逝，如不及时抓住，把经济迅速搞上去，坐失良机，就可能犯历史性错误；二是发展机遇难得，应该十分珍惜。如果不切实际，盲目求快，造成大的损失，也会失去机遇，同样会犯历史性错误。在改革开放以前，我们也有过几次发展机遇，但是没有抓住、抓好，结果拉大了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当时，我们主观上也想大发展，但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不能保证经济高速、有效地发展，加上经济指导思想有些不切实际，结果经济大起大落，反而失去了机遇。因此，要抓住机遇，加快发展，必须坚持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一定要按经济规律办事，坚持从实际出发，在优化结构、技术进步、改善管理、提高效益上下工夫，在这个基础上求得较快的发展速度。如果我们仍然用铺摊子和只追求产值、不讲效益的办法来搞经济工作，旧体制下曾经多次出现的老问题就有可能旧病复发，国民经济的稳定、快速发展就难以持续下去。所以，从积极的意义上提出要注意防止经济过热，是为了把经济工作搞得更好。

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 能够成功结合

(1993年5月13日)

1993年5月13日至16日，国际行动理事会第11次会议在上海召开。出席会议的有来自30多个国家的前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等重要来宾。这是朱镕基同志在会议开幕时讲话的一部分。国际行动理事会是非政府组织，成立于1983年，成员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前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

今后的五年，是我国改革的关键时期，当前正从各个方面加快步伐，力争在90年代初步建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现在有的外国朋友提出，中国一方面坚持社会主义，另一方面发展市场经济，二者似乎矛盾。这一问题的提出，实际上关系到如何理解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

我们认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而不是一种社会制度的标志。社会主义经济并不能简单地等同于计划经济。在我看来，社会主义经济的本质主要有两点：一是高度的资源配置效率、高度的劳动生产率，二是维护社会公正、实现共同富裕。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相比较，市场经济是比计划经济更为有效的资源配置方式。这是我们坚持社会主义而又选择了市场经济的一个重要原因。维护社会公正、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理想。公有制为主体和私有制为主体作为不同的财产占有形式相比较，以公有制为主体更有利于维护社会公正、实现共同富裕。因此，我们坚持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就是说在所有制形式上，我们以公有制为主体，而在运作机制上实行市场经济。

看来，问题的实质在于以公有制为主体能否建立起市场经济体制。对于这一点，我的看法是坚信不疑，积极探索。

首先，以公有制为主体并不排斥私有制的存在，今后我国将继续允许和支持私营企业、外资企业的发展，让它们同公有制企业平等竞争。其次，公有制的实现形式可以多样化，可以是国家所有、集体所有，也可以是国家、集体占有控股地位的股份制形式。同时，部分小

型国有企业还可以出售、出租给集体或个人经营。可见，以公有制为主体，同样可以建立起产权清晰、责任明确的企业制度。

当然，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在社会主义国家建立市场经济体制更是前人没有走过的道路。在经济体制改革中，过去我们向国外学习和借鉴了不少反映市场经济规律的先进的经营方式和国民经济管理方法。通过学习借鉴和自身的实践，我们对如何让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有了更为深刻的理解。建立责任明晰的产权关系是市场经济的基本要素，除此之外，还有另外两个基本要素。那就是，减少政府的干预，让企业自由地接触市场、进入各个市场领域；解除对价格的管制，让市场决定价格。

我给诸位展示的并不仅仅是一幅理论的图景，实际上，实践已走在理论的前头。迄今为止，我国约有股份制企业3700家，约70家公司的股票公开发行上市，1万多家企业被兼并。通过简政放权，各级政府对企业的干预大量减少，企业自主经营、自由进入市场的权利在逐步扩大。价格改革步伐较大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特征。去年先后放开了571种产品价格，国家定价部分已降至20%左右。市场价格信号已经越来越灵敏地引导着资源的有效配置。

改革不可能一蹴而就，各方面改革也不可能完全取得平衡。当前，我们突出地感到宏观经济管理体制的改革已经显得滞后，对国民经济的稳定、地区之间的均衡发展带来一些不利影响。因此，在继续深化企业改革的同时，今后一个时期将着重加快投资管理体制的改革，以此带动计划、金融、财政体制的改革。这些领域的改革对于建立宏观调控下的市场经济体制至为关键，难度却很大。但是我们的事业不仅得到全国人民的大力支持，而且得到许多外国朋友的热情帮助，我深信这项伟大的改革工程一定能够成功。

加强宏观调控的十三条措施

(1993年6月9日)

朱镕基同志于1993年6月9日主持召开国务院总理办公会议。会议针对当时经济过热、通货膨胀正在发展的严峻形势，研究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措施。这是朱镕基同志在会上的讲话。会议首先听取了国家计划委员会和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的汇报。国家计委还汇报了国务院派出的7个调查组的调查情况和政策建议。朱镕基同志经过反复考虑，在会上提出了加强宏观调控的十三条应急措施，同时又指示国家计委补充几条行政性措施。会后，国家计委补充了三条意见，形成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当前经济情况和加强宏观调控的意见》(即“十六条”)初稿， 经报请中共中央批准后，于6月24日以中央6号文件下发。这个文件对当时扭转经济过热、控制通货膨胀、实现“软着陆”，具有决定性意义。

根据国务院总理办公会议的决定，以7个部长为首的调查组到14个省市做了一个月的调查研究。回来以后，国家计委牵头进行了总结、综合，提出了当前应该采取的措施建议，对这项工作的成绩应该肯定。

当前经济形势的走向，有两个特点：一个是经济发展速度越来越快；另一个是票子越发越多，物价涨幅越来越高。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速度，去年是12.8%，今年第一季度达到15.1%；其中，工业总产值增长速度，去年是20.7%，今年第一季度是22.4%，5月份已经达到27.3%。仓库里积压的产成品越来越多，出口也在下降。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在3月、4月都突破了10%，其中35个大中城市在17%以上，5月份还呈上升趋势。我在去年的通气会上就讲过一个观点：通货膨胀一旦发生，就会以加速度发展。不要认为两位数不可怕，很快就可能突破20%。因为去年摊子已经铺开了，基本建设大量投入，生产资料价格猛涨，票子超经济发行，在这种情况下，一定会拉动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加速上涨。今天上午，我和李铁映同志会见了世界银行和国际货

币基金组织的负责人。他们的意见相当一致，都认为中国经济已经过热。现在不能再拖延了，也不能再去争论了，这几个硬指标已经摆在那里了，要把问题看得严重一点。去年基本建设投入增长60%，今年前5个月又增长近70%。去年货币发行1158亿元，今年春节前又发了1100多亿元，到现在还有477亿元没有回笼。历来上半年都是货币净回笼，而今年上半年货币净投放可能达到550亿元。如再不采取措施，今年货币发行有可能达到1800亿元以上。

怎样采取措施？我讲三条思路：

第一，当前最重要的是统一认识。如果还是认为“我这里不热”，还是讲“只要给我票子，我一定能把经济搞上去”，“通货膨胀没什么关系，现在市场上商品丰富得很”等等，就会贻误解决问题的时机。1988年的抢购现象并不是因为商品不丰富，而是因为群众对通货膨胀的心理预期。现在这个过程又已经开始，表现为抢股票、抢债券、抢黄金、抢外汇、抢高档商品，一般商品价格和服务收费普遍看涨，群众对此表示不满。

统一认识很重要的一点，是要把生产速度和基本建设投入分开。我们讲要抓住机遇，加快发展，只要是有效益的速度，生产出来、卖得出去，那就越快越好。现在的问题是，不认真去抓深化改革，抓企业的机制转换，抓经营管理、技术进步，抓质量、品种，抓扭亏增盈，而是成天在那里扩大投资规模，上基建项目，搞房地产、开发区，到国外招商。你说给钱就能把经济搞上去，我看未必。有了钱没有钢材，进口钢材又没有外汇，买石油也要外汇，我们已经变成净进口石油的国家了，铁路、港口、民航都卡着脖子，你怎么搞得上去？所以，必须统一认识，全国还是要一盘棋。由于所处的位置不一样，地方局部的感受与中央全局的感受不一样，局部和局部、沿海地区和内地的感受也不一样。但无论是什么样的感受，现在都应该统一认识，否则没法解决当前的问题。

第二，当前要采取的措施不是搞治理整顿，而是进一步深化改革。1988年治理整顿的办法适合当时的情况，有一些办法拿到现在也可能适用，比如保值储蓄。但是情况已经变化了，社会条件、利益分配的格局、经济管理的手段大不相同了。现在再用计划经济体制下的那套

办法已经不灵光了。现在只有走深化改革这条路子。我们应该把解决当前经济的突出问题，变成加快改革、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动力。只有改革动真格的，才能解决当前的问题。

第三，主要采取经济手段、经济办法、经济政策，尽可能少采取行政的办法。 去年，我在通气会上关于行政手段讲了三条：一是目前造成投资膨胀的原因主要是政府行为和各种不规范的行政干预，对此仅仅采取经济手段是不能解决问题的。而且，在当前市场发育很不成熟、约束机制远未形成的条件下，经济手段也很难及时收到效果。二是即使是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也不排斥在必要时使用行政手段。三是现在采取的措施，也并不完全是行政手段。

当然，主要还应采取经济手段。事实上，行政手段已经越来越行不通了。但要指出，如果没有坚强有力的组织手段、雷厉风行的纪律手段、铁面无私的法律手段相辅而行，任何正确的经济手段也是难以奏效的。把这些手段均视为行政手段，是十分有害的。

关于应急措施，很多同志发表的意见都是好的，但要区别一下哪些是当前就应该马上付诸实施的，哪些是涉及长远的配套改革、目前还不能马上实施的。我准备讲十三条应急的措施，不一定全面，希望有关部门加以补充、细化。

第一条，要把住基础货币闸门。 当前最关键的是严格控制货币发行，一定要把住这一关。货币发行量是基础货币供应量的最重要指标，这个指标不控制住，我们不知道会走向何处！控制了这个指标，就控制住了通货膨胀的速度。对基本建设规模、信贷规模要严加控制，但单纯控制这些指标，难以控制得住。资金早已多元化了，审批已经没有多大作用。当前基本建设规模为什么搞这么大？一是银行违章拆借，二是社会非法集资。这两个闸门一开，钱都来了，基建规模就上去了。钱怎么来的？究其根源无非是放松了银根，大量发钞票。我的意见，今年货币发行无论如何不能突破1500亿元。如不能守住这一关，形势就很危急。一定要把基础货币投放控制住，这是能够做到的。如果还像去年那样，今年可能1800亿元到2000亿元都能发下去，那么，明年的通货膨胀就可以想象了。

要控制住基础货币，就不能像现在这样，省里一来找，人民银行就都给兜起来。这个办法不行，这样下去，1500亿元肯定要突破。现在我们是要求不“打白条”、不“欠绿条”，要保重点企业生产、保重点建设，但地方都要求人民银行拿钱，这怎么得了！地方不是没有钱，集资、卖户口、卖地，有的地方钱多得用不完呢，却把硬缺口留给人民银行发票子，这样人民银行就不成其为中央银行了，宏观经济必然会失控。我们再也不能采取由人民银行发票子保支付、“包打天下”的办法了。

第二条，要坚决制止银行违章拆借。 人民银行已经起草了通知，马上发出去，要坚决执行。去年最厉害的就是这一条，人民银行千方百计控制贷款规模，但是通过违章拆借，绕过贷款规模，1000多亿元就放出去了，这是个很大的教训。现在要赶快收摊子，当然为时已晚，因为钱都是往获利高的地方流，投到了房地产、股票市场。那些房地产，将来可能卖不出去。在海南岛，房地产最多的已倒了十次手，中间的钱都已经分掉了，一些人成了暴发户，最后都反映在银行账面上，结果就是泡沫经济破灭，银行倒账。现在怎么办？第一，各个专业银行凡是违章拆借的，都要往回收。第二，收不回来的，一件一件报上来，认真查处，看看钱都到哪里去了。现在发现，凡是违章拆借的，多数与贪污受贿等腐败现象连在一起，如不彻底整顿查清，银行会瘫痪。在6月7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江泽民同志、乔石同志都指出，金融要整顿，首先从金融着手来深化改革，国务院要大胆动手，愈早愈快愈好。

以上两条，请李贵鲜同志负责。

第三条，要坚决制止乱集资。 现在全民办金融、全民集资，此风不刹住，利率再提高，储蓄存款也不会增加多少。这件事我和罗干同志来负责，国务院办公厅、法制局要召集国家计委、财政部和人民银行，迅速立法，制止乱集资。要把沈太福案件①从头至尾向社会公布，向全民进行法律和风险教育。要告诉人们，闷头想发财有可能倾家荡产。沈太福非法集资这件事，发现得太晚了。法律不健全，政府可以做检讨，但是不能赔，也赔不起。我们没有办法，只好清盘，清多少退多少。从沈太福案件也可以看出，这些事情都是与贪污受贿联系在一起的。

① 沈太福案件，指北京市长城机电科技产业公司(以下简称“长城公司”)特大乱集资案件。长城公司以生产一种高效节能电动机为名向全社会集资，其年利息高达24%。从1992年6月到1993年2月，在全国非法集资达10多亿元，投资者达10万人。1993年4月18日，长城公司总裁沈太福被正式逮捕；1994年3月4日，被判处死刑。

第四条，要严格控制信贷规模。 去年我们控制住了，今年还要继续控制。但是究竟控制到多少，这一条也请李贵鲜同志负责组织研究。

控制信贷规模，关键是不能什么都保。还是我常讲的，一保农业，二保重点企业的生产和出口，三保重点建设。在这个次序中，保农业是绝对不能动摇的，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动摇。别的保不了也要保农业，如果我们农产品收购再打一年“白条”，我们的基础就动摇了。“二保”、“三保”就是按国家产业政策来保。但是请大家注意，我们保企业的生产资金，但有的企业把生产资金拿去搞房地产了，而且还亏掉了，这怎么得了啊！这样的企业我们保得起吗？！

第五条，要准备再次提高存款利率，或者实行保值储蓄。 我是主张实行保值储蓄的。人民银行的同志担心物价上去后无力支付利息，但是我想：如果我们不能把通货膨胀压下来，让居民消费价格指数连续超过20%，那就没法交代了。我们无路可退。我相信，只要全党上下一致，通货膨胀是可以压下来的。保值储蓄最终付出的利息，可能比存款利率再提高几个百分点的利息要少。我们再次实行保值储蓄，就是出了一个安民告示，人民就安心了。这一条也请李贵鲜同志负责组织研究、比较，提出建议，然后由国务院讨论决定。我看这项措施出台的时机早一点好，因为现在国内外的经济学家都说我们的利率调控力度不够，要赶快加强。

第六条，人民银行要加快改革。 人民银行的各级机构要将自身开办的营利性金融机构分离出去，要下这个决心。人民银行的一切活动不能有利润动机，你掌握着钱，你又把这些钱调去搞房地产、搞投资，那样你就不是金融主管部门，而是唯利是图的投资者、投机者，那还有什么宏观调控？不能再搞了，要赶快交出去。财务、人员、资

金要彻底脱钩，绝不能把人民银行变成直接投资者、股票炒卖者、直接经营者。刚才贺光辉①同志讲的银行改革步骤，当然不是一下子就能够实现，但要抓紧研究、实施。

① 贺光辉，当时任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副主任。

第七条，专业银行要保证支付。 专业银行要有调度本系统资金的权力，要把省人民银行的权收上来，交给专业银行。现在挤兑是在挤专业银行，因此，如果把保支付的责任放在省人民银行的头上，一旦出了问题，我们是找不到人负责的。现在就要明确，如果发生了支付困难，是各专业银行行长的责任，首先要撤行长的职。这样，各专业银行才能收缩贷款规模，否则专业银行没有切肤之痛，是不会收缩的。请人民银行组织各专业银行制定具体办法来落实。

专业银行各级机构要同自身开办的非银行金融机构和其他经营机构，包括房地产公司、信托投资公司、证券公司，在资金、财务、人员上彻底脱钩，这一点要和人民银行一样。人民银行要首先“自我革命”，否则你自己没有脱钩，怎么要求专业银行脱钩？如不一刀两断，信贷规模控制不住，资金拆借也控制不住。

第八条，要把投资体制的改革和专业银行的改革结合起来。 刚才我讲了，投资体制不改革，单纯控制固定资产投资规模是控制不住的。我们经过长期的研究，已经设计了一个方案，要再研究一下，把方案搞得更完善一些。其目的就是要有一个约束机制、风险机制和资金配套的机制；否则，投资规模总是要失控，三角债还要继续发生。基础设施既然是政策性的，就要通过金融债券、财政投融资、成立国家长期开发信用银行来解决这个问题，产权要国家控股，银行贷款要配套。政策性的贷款和商业性的贷款一定要分开，至少要分别独立核算，不能再吃“大锅饭”，否则没法追究责任。要建立银行系统的监督机制。外国的银行都有监事会或者董事会，对银行的业务进行监管。我们的银行谁管？这要很好地研究。

第九条，国库券的发行任务一定要限期保证完成。 这件事情我和刘仲藜①同志负责。过去发行的国债，7月1日起就有240多亿元要兑付，国库券才卖了80多亿元，怎么还？刘仲藜的口袋里，最少的一天

只有800万元。前天，我又批准他向人民银行借款30亿元，不然他就没法开支啊！我们不能“打白条”发工资。现在有人想买国库券也买不到，可见宣传工作做得不够。要想一系列的办法，完成国库券的发行任务。有的同志提出来，在二级市场上发行国库券，就是低于面值发行，但这个办法现在也来不及了，当前只有采取服务到基层、服务到户的办法。国库券发行任务不完成，好多事情不能办，股票、债券都不能发，各个省区市会有意见。原则上还是完成国库券发行任务的省区市，可以发行股票、债券，但不能延伸到县。5月6日中央政治局会议的决议已经写上，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把完成国库券发行任务当做政治任务，财政部要抓紧。今后一定要确立一个原则：财政赤字只能通过发行国债来解决，不能再向银行借支。

---

① 刘仲藜，当时任财政部部长。

第十条，今年已经确定的发行股票和在海外上市的计划要落实。50亿元的股票还是要发行，九大公司到香港上市也要继续搞，但是一定要规范化，要按我们已经颁布的法律来规范。现在不少地方的股票黑市非常猖獗，储蓄受到影响。不开一个正门，不好取缔黑市。一个省只确定一两个企业的股票上市，如果你一个也不让它搞，它怎么取缔黑市呢？黑市一定要取缔，越晚越被动。

第十一条，要抓紧研究加强外汇市场管理，稳定外汇的比价。前些时候，我们放开了对外汇调剂价格的行政控制，外汇调剂价一下子上到1美元兑换人民币10元以上。有的同志说我们搞错了。但是，现在放开有一个正面的作用，就是限制进口，钢材的进口差不多已经抑制住了。当然，外汇比价上升这么高，不利于市场和心理稳定，外商的投资信心也受影响，必须采取措施稳定汇价。外汇比价上升的原因有四点：第一，投资需求、进口需求的拉动。第二，境外结汇，资本外流。现在好多单位竞相到海外办公司，到香港“买壳”上市，炒房地产，连外国人都感到奇怪，有关部门对此要加强监管。第三，炒卖外汇，搞投机。第四，人民币还要贬值的预期心理，导致惜售或抢购外汇。请李岚清同志牵头，就稳定外汇市场、加强外汇监管，尽快研究出措施来。

第十二条，要抓紧研究整顿房地产市场的办法和政策。邹家华同志一直在抓，还请邹家华同志继续负责抓下去。现在房地产市场这样热，一方面冲击了我们的房改，另一方面，泡沫经济的危险正在增加。本来1991年房改的形势非常好，但房地产热一来，就把房改冲掉了，都去搞高级房地产了，群众的住房问题解决不了。马来西亚住房部部长对我讲，他们有一个政策：所有房地产公司必须有二分之一的资金盖廉价房子，由政府来分配，建这部分房子是没有利润的，甚至是赔本的；但另外二分之一资金盖的高价房子，可以赚很多钱。我让刘鸿儒①同志去考察过，回来还写了一个材料发到各部门。我们无论如何也要实行这个政策。现在各地房地产公司如雨后春笋，不去解决老百姓的住房困难，都去搞高级别墅、度假村怎么行呢？我很担心，我们没有那么大的高级房地产市场。银行拆借资金，我估计有相当一部分，可能50％以上，投到这里面了。日本在1985年搞泡沫经济，1990年破灭，到现在经济元气还恢复不过来。我看泡沫经济迟早要破灭，你就不要再往里投钱了。

---

① 刘鸿儒，在1991年任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副主任。

第十三条，要加强税收征管，堵住乱减免税的漏洞。这件事我和刘仲藜同志负责，要制定一个应急的办法，要把税收上来。我提两条原则：今年以内不再出台任何新的减免税政策，对临时一次性减免税也暂停审批。谁打报告也不行，有问题采取其他办法解决。现在减免税的漏洞太大了，名义税率与实际收的税差额太大。不少企业，包括国有企业，转移利润、偷逃税款。特别是“三资”企业表现得更加明显，把进口原材料的价格高估，把出口产品的价格低估，把盈利做成亏损，最后一个税都不交。我们要搞一个应急的措施，加强税收的征管，否则财政会越来越困难。

我就讲这十三条，已经分了工，其中有七条是银行负责的，希望大家把它们细化，6月17日向中央政治局常委汇报，看常委们有什么指示，我们再研究。汇报还是请陈锦华①同志做准备，要把当前经济情况综合讲一下，然后根据深化改革的精神提出防止经济过热、制止通货膨胀、加强宏观调控的应急措施。常委们原则批准以后，我们就制

定文件一个一个下发，各项细化工作不能超过6月20日，这样6月底各项文件才能最后定稿。这件事请何椿霖②同志抓一下。

---

① 陈锦华，当时任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

② 何椿霖，当时任国务院副秘书长。

认真抓好“菜篮子工程”

(1993年6月24日)

1993年6月21日至23日，国务院在北京召开全国“菜篮子工程”工作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主管“菜篮子工程”的副省长、副主席、副市长及国务院有关部门的负责同志。这是会后朱镕基同志与部分会议代表座谈时讲话的主要部分。

这次“菜篮子工程”工作会议非常重要，也开得很好。会前，国务院总理办公会议听取了汇报，研究了进一步支持“菜篮子工程”发展的有关政策，并作出了一些具体决定。现在，我讲几点意见。

第一，我非常同意大家指出的，最近几年“菜篮子工程”的建设，包括生产和流通，都有了很好的发展，取得了显著成绩，但是目前还存在着一定的隐忧。我觉得，这样的估计是比较全面的。

当前形势很好。从去年以来，一直向前发展的好形势是历史上少有的。全国人民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积极性空前高涨，国民经济确实取得了很大的发展。但是，在前进过程中，由于两种机制的转换，不可避免地发生了一些矛盾和问题。主要是投资规模过大，并带动市场物价上涨。值得注意的是，农村物价上涨幅度超过了城市物价的涨幅。农村物价上涨，必然影响农民的生活水平。城市物价上涨，除了影响在岗的职工、干部的生活水平外，必然要导致一部分退休职工、亏损企业职工生活的困难。所以，党中央、国务院已经决定，要采取宏观调控措施来解决这些问题。现在采取措施还来得及，因为我们从去年以来一直在提醒大家要有一定的思想准备，既要抓住机遇加快发展，又要珍惜机遇、用好机遇。

为什么市场物价指数上涨达到两位数了，我们仍感到人心和市场还是稳定的呢？一个是政治上的因素。现在社会是稳定的，全国人民是团结的，政治上形势是非常好的。另外，“菜篮子工程”和市场消费品目前能够充分满足群众需要，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尽管我们采取了一系列宏观调控措施，但是见效起码要三个月，甚至于要半年。在

这期间，要稳定人心，稳定市场，靠什么？就是要靠“米袋子”、“菜篮子”！“民以食为天”，吃的东西价格涨得不那么厉害，人们的基本生活水平就能够保证。如果我们再狠抓一下消费品生产，狠抓一下质量、品种，使市场消费品的价格不要涨得那么快，充分地满足群众需要，物价涨势就可以趋缓。所以，现在是关键时刻。如果我们要让国民经济高速增长持续下去的话，全国就要服从宏观调控。在宏观调控的过程中，把“菜篮子工程”和消费品生产抓好，把市场安排好，这是保证政治和经济措施见效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手段。我们过去常讲，“菜篮子”里面看形势。“菜篮子工程”搞得好，大家都说市长好；“菜篮子工程”搞得不好，公共汽车上大家都在骂市长。这是我在上海工作时的亲身体会。但现在情况有了新的变化。比如说，各大城市跟各地都建立了商品流通关系。有的菜当地不一定种了，到别的地方买更便宜，而且品种更多。这就是大流通了，但仍然说明“菜篮子工程”的重要性。



1993年6月24日，朱镕基在北京中南海与出席全国“菜篮子工程”工作会议的部分代表座谈时讲话。

隐忧是什么呢？第一个隐忧是农产品、粮食价格放开以后，以为把农产品推向市场、把农民推向市场，就什么问题都解决了，曾经一度忽视了农业。没有看到，这样一来粮价下跌，甚至下跌到成本线以下，农民利益受到很大的损失。农民因此不愿种地了，生产积极性遭到很大的打击。任何一个国家，包括发达国家没有不对农业进行补贴的。以为把粮价、农产品经营一放开，政府就可以撒手不管，就不要提供补贴了，而把对农业的补贴拿去干别的，这就要吃大亏了。没有一个粮食的平准基金，就不能保护农民的利益。后来我们发现了这个问题，制定了保护价制度，保证农民不吃亏。粮食再丰收，价格也不能掉到成本线以下。怎么能够实行保护价呢？这就得靠平准基金。没有这个平准基金，怎么能够保证实行保护价呢？因此，我们得出一条经验：不论是中央财政，还是地方财政，凡是由于价格改革，把粮食价格放开的，减少的补贴不能挪作他用，还要一律用于农业。农业的补贴，支持农业的基金、投资和各种事业费用，不但不能减少，而且还要增加。美国的做法是大量地补贴在生产过程，欧洲共同体是补贴在销售过程，没有哪个国家不是想办法去补贴农业的，都得保护农民的利益。日本的政策是：美国的粮食再便宜，也不进口。日本的大米始终保持很高的价格，这就是保护农民的利益；否则的话，农民都不种稻子了。对我们来说，这个问题也必须解决好，不然也是一个很大的隐忧。第二个隐忧是搞开发区、搞房地产，确实在某些地区很热，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农业。这样下去，对农业，特别是对“菜篮子工程”就是一个很大的打击。暂时看来好像“菜篮子”很丰富、很繁荣，但从长远看是要出问题的。所以这次会议特别强调，占了菜地以后，一定要补上。不管怎么补，在远郊区再去开发菜地也好，建立固定协作关系也好，反正得想办法补上。这个问题要是放松了，将来是会吃亏的。第三个隐忧就是农业生产资料涨价。饲料涨价、柴油涨价、化肥涨价、农膜涨价，生产费用大大地提高，搞种植业和养殖业的人已经感到无利可图。在这个时候，政府如果不从政策、资金或者其他方面给予帮助，原来搞起来的“菜篮子工程”，有可能最后也维持不下去了。希望各省区市检查一下这件事情，对这个问题给予足够的重视，不让这个隐忧变成真正的忧患，不让不利因素发展下去，切实把“菜篮子工程”抓好。

第二，为了扶持“菜篮子工程”的继续发展，要稳定政策，就是稳定调动农民积极性的政策。特别是“八五”时期后三年，要继续稳定政策。这次，陈俊生同志把“七五”期间中央制定的扶持“菜篮子工程”的政策都列了出来，经过国务院总理办公会议讨论，统统地予以肯定，不变！只有个别的，比方说中央财政对饲料粮的平议差价补贴，过去曾经起过很大的作用，现在价格放开了，粮价放开了，补贴本身的意义就不像以前那么大了，所以我们准备逐步减少这项补贴。但是，刚才我讲了，减下来的补贴，这是中央财政的补贴，绝对不能拿去干别的，仍然要用于“菜篮子工程”，或者是用在农业上。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所有财政上对农业的支持，包括由于改革减下来的钱，都得统统用于农业。农业补贴绝对不得挪作他用；不但不应该减少，还应该增加，这点认识要统一。当然，现在财政很困难，但至少不能减少农业补贴。中央这样做，我们希望地方也应这样做。中央的补贴终究有限，大量的政策还是在地方实施。我们希望各个省区市都要稳定这个政策。如果你们能够进一步地支持农业，进一步地研究并采取调动农民积极性的政策，我们就向你们学习，向全国推广你们的经验。我讲要把减下来的农业补贴都用于建立平准基金，或者叫风险基金，总之是保护农民利益的基金。究竟怎么建立，我们还没有经验。我已经请财政部会同有关部门专门研究这个问题。中央、地方两级都要建立平准基金，还要搞一系列的立法，不然没保证。

第三，要把“菜篮子工程”的组织实施与贯彻国务院在5月27日发布的《九十年代中国食物结构改革与发展纲要》结合起来。农业也要调整结构，把产供销衔接起来，逐步向合理的食品消费结构发展。

第四，加强“菜篮子工程”的领导。加强领导，主要是依靠大中城市的市委书记、市长。这是他们最重要的一个职责，保证城市群众“菜篮子”的供应，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只有依靠他们，才能把这个工作做好。我们代替不了他们，没有他们，我们拿多少钱也搞不出成绩来。不仅是大中城市的市委书记和市长，省委书记、省长也要关心这个问题。这也是关系到一个省、一个地区政治和经济稳定的大问题。同时，也希望中央有关部门都来支持“菜篮子工程”的工作。



1993年12月15日，朱镕基在安徽省芜湖市考察菜市场。左三为安徽省委书记卢荣景，左六为国家计委副主任罗植龄。

在这里，我讲一下机构的问题。加强“菜篮子工程”的领导，就得有人去管这件事情。在机构改革过程中，我们已经发现，有相当多的地方，在粮食价格、副食品价格放开以后，把这方面的机构给撤了，人员“下海”了，经费“断奶”了。这样做倒是很痛快，省下一笔钱去搞开发区，但是吃亏就在眼前。我一直在讲，农业的服务队伍绝对不能散，机构不能撤，经费不能断。我们这么一个有8亿多农民的国家，基础就是农业。“民以食为天”，粮食问题、“菜篮子”问题关系到国家的根本。说实话，尽管目前经济存在许多问题，但只要农业不出问题，我们就不害怕。

当前农业主要抓三件事。第一件，坚决不“打白条”，要下死命令。第二件，切实减轻农民负担。第三件，就是在夏收以后的购销、储运中已暴露了很多问题，如丰收的地方缺资金，粮食运不出来。现在大

面积缺粮的地区很多，各部门、各地区要想办法解决当前夏收期间存在的这些问题，把粮食工作做好。同时，把秋种面积落实，要争取把农民的积极性再调动起来。

这些事情都得有人去抓。没有机构怎么抓？至于说机构本身机制要转换，人员要减少一点，工作效率要提高，官僚主义要减少，这些都是对的。但是，绝不能把机构都撤掉了。美国的农业部是全国最大的部，有几万人。种子的发放、检疫、农贷，分工细得不得了，都掌握在农业部，各种农业技术的推广工作也都在里面。我不是说美国的农业部规模大，我们的也应该大。我的意思是，有的人说搞市场经济，这个机构就可以不要了，美国不就是搞的市场经济吗？他们为什么还要？我们有自己的特点，不是要照抄，但做事情没有人管是不行的。

关于整顿路风问题的批语

(1993年7月2日)

1993年5月上旬，铁道部召开了全路整顿路风工作会议，采取了相应措施，于6月下旬向国务院报告了整顿情况。这是朱镕基同志在该报告上的批语。

请罗干同志告韩杼滨①同志：

要注意方向。路风首先是领导作风的问题，而不是群众的问题。只发动群众自查自纠，而不查领导，不让群众检举，路风是纠正不好的。首先把局长级干部的案件着力查清，严肃处理，路风就会好转。

朱镕基

7.2

---

① 韩杼滨，当时任铁道部部长。

金融工作“约法三章”

(1993年7月7日)

1993年7月2日，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会议决定朱镕基同志兼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7月5日至7日，国务院在北京召开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人民银行分行行长，各专业银行总行、中国人民保险公司的负责同志，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有关部门的负责同志等。这次会议是我国经济处于转折关头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也是为贯彻中央6号文件召开的第一个全国性会议。朱镕基同志在讲话中就认真贯彻中央6号文件、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整顿金融秩序作了具体部署，特别是明确提出对银行系统领导干部“约法三章”的严格要求，对扭转货币供应失控和金融秩序混乱的局面产生了重大作用。讲话曾发表于《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册，原标题为《在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的总结讲话》。编入本书时,对个别文字作了订正。

这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是一次统一思想认识、端正思想作风的会议，是一次推进金融改革的会议，也是一次贯穿批评与自我批评精神的会议。会议的第一天，周正庆①同志代表人民银行总行党组作了工作报告。会议期间，我参加了两个半天的分行行长座谈会，还同人民银行的一部分老行长进行了座谈，老同志们提出了很多很好的意见。这次会议达到了肯定成绩、检讨缺点、统一认识、团结奋进的目的，会议开得很好。

---

① 周正庆，当时任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

首先，要肯定成绩。最近几年，人民银行在李贵鲜同志和人民银行党组的领导下，做了大量的工作，成绩是主要的，应该充分肯定。各专业银行行长、人民银行各分行的行长、全体金融战线上的职工同志们，在党中央、国务院和人民银行总行党组的领导下，做了大量的工

作，我代表国务院向同志们表示衷心的感谢。你们两头受压，四方受气，任劳任怨，你们的处境我完全理解，我对你们表示亲切慰问。

其次，这次会议也检讨了缺点和失误。在会议发言中，很多同志都表现了自我批评的精神，这很好。我们的问题主要是没有严格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指示和银行的规章制度办事，而是各行其是，发生了不少违章违纪的事情，甚至还有不少大案要案，也反映我们没有很好地抓队伍建设。正如江泽民同志所指出的，金融秩序混乱，纪律松弛，已经达到影响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程度。有些地方的银行不能坚持原则，把“金库”的钥匙都交给了人家！你不能怕得罪人，顶不住就要报告，你不报告就是失职。

第三，统一了认识，坚定了信心。同志们说，如果不下决心扭转当前的金融混乱局面，不制止住通货膨胀，经济就可能大起大落，我们就会失去大好的发展机遇。现在中央下了这么大的决心解决经济发展中出现的问题，我们就更有信心了。这次会议统一了这个认识，大家回去就要狠抓落实，要动真格的。

第四，会议提出了明确的要求，也有落实要求的许多具体措施，大家还提出了很多可行性很强的宝贵意见，这样就更好贯彻落实了。

当然，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当前经济情况和加强宏观调控的意见》(以下简称“中央6号文件”)，光靠金融系统一家是不够的。只有全党、全国人民，特别是各地区、各部门的领导同志用中央6号文件统一思想、统一步调，大家一起努力，才能把中央对当前经济工作的重大决策真正落到实处。但是，金融是国民经济的命脉，在国民经济中处于重要的地位，我们承担了非常艰巨也很光荣的任务，对贯彻好中央6号文件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如果我们的工作做得好，对扭转局势、加强宏观调控会起到重要的促进作用。因此，我们要把自己的问题看得重一些，对自己要求更严格一些，切实把中央6号文件贯彻好、落实好。



1993年7月7日，朱镕基在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讲话。右二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钱其琛，右三为国务委员兼国家科委主任宋健。

今天，我根据党组同志的意见和会议讨论的情况，讲三个问题。

一、把认识统一到中央6号文件上来

以中央6号文件来统一金融系统的认识，是落实中央关于当前经济工作的重要决策，是完成整顿金融秩序、改革金融体制的任务，扭转资金全面紧张局面的关键。

关于中央6号文件的形成过程和背景，我在会议开幕那天的讲话中已经讲了。由此大家不难看出，中央6号文件是在总结了一年多来经济高速发展的经验，研究了前进过程中发生的矛盾和问题，集中了各部门、各地区和许多老同志以及各民主党派、群众团体智慧基础上产生的一个重要文件。可以说，这是一个集思广益的文件。同时，中央6号文件提出的十六条宏观调控措施，十三条是采用经济手段，三条是行政手段，但也不是“走老路”。我们是把解决当前经济工作中存在的问

题，作为加速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动力，力求通过加快形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办法，来解决当前经济发展中出现的问题。因此，这个文件是一个充满改革精神的文件。

要贯彻落实好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宏观调控的重要决策，必须用中央6号文件来统一全党的认识。根据我学习中央6号文件的体会，我认为当前需要统一以下三个方面的认识。

第一，强化宏观调控，防止经济过热，是当前迫在眉睫的任务。现在经济从总体上讲不过热，但局部地区、局部领域已经过热，现在再不强化宏观调控，有些问题就来不及纠正了。有些地方的领导同志不同意这个看法。有的说，你热我不热；有的认为，市场商品供应很丰富，物价涨了，补贴也多了，奖金发得也不少，不会出什么问题；有的说，只要你给我钱，我就可以抓住机遇，把经济搞上去；有的地方还说，我这里生产速度并不高，不但不热，而且还很冷；等等。我觉得，说经济热不热，不能只看速度高不高。如果生产速度是依靠挖掘现有企业潜力，调整结构，抓企业经营机制转换和质量、品种，抓改善经营管理，生产出来的东西运得出去、卖得掉，效益好，这样的速度越快越好。但是，如果是靠基本建设大量投入，摊子铺得很大，又长期建不成，资金十分紧张，已经影响到企业的流动资金和重点建设项目资金的需要，票子又发得很多，这种状况下的速度可能一时会很高，但不会持久。现在商品供应确实比1988年时好多了，但1988年也不是商品供不应求。我当时在上海工作，那时仓库里商品并不少，把商品拿出来，降价卖，抢购风马上就平息了。问题是宏观环境绷得太紧以后，人们对通货膨胀的心理预期就会加大，发生社会动荡的可能性也会加大。江泽民同志讲，由于所处的地位不一样，对形势的分析可能不同。但要对形势有个正确的认识，就要从整体和全局来看问题。现在我们的宏观经济环境已经绷得很紧，再不控制住总量，就可能发生严重的通货膨胀。对这个问题不要再争论下去了，希望大家将认识统一在中央6号文件的精神上，强化宏观调控，防止经济过热。

第二，整顿金融秩序是强化宏观调控的重要方面。

江泽民同志对于金融秩序混乱、纪律松弛的问题有过两次重要批示。大家要正视金融系统存在的问题，如果不正视、不解决这些问题，全国大好形势不但不能发展，而且有可能逆转。

一是违章拆借。这是导致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过大的一个重要原因。银行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根据中国人民银行总行调查，去年以来，拆出资金余额在1000亿元以上，其中最多的主要是广东、北京等几个省市。

二是非法集资。这不都是银行的事情。这种集资有很大的危害，造成很多社会问题：直接影响银行储蓄，使储蓄下降，重点贷款保证不了，“打白条”、“打绿条”难以避免；投资者上当受骗，有的甚至连本金也难以收回，北京市长城机电科技产业公司就是一个典型。对长城公司的问题发现太晚，我们有责任，让一些同志上了当，让老百姓吃了亏。但我们现在只能尽量把钱追回来，我们不能赔，也赔不起。群众在投资时，必须考虑投资风险，只是埋头想发财，结果可能会倾家荡产。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要利用这件事，对全民进行一次法制和投资风险教育，要加强这方面的宣传。有的省大办钱庄、当铺，它们也搞储蓄，搞存贷款。农村里各种基金会、互助会都搞起来了，导致资金成本越来越高，风险越来越大。这种现象一定要制止。国务院办公厅通报了五个地区乱集资的问题，刹了一点风，但还远远不够。从报纸上看，现在有的部门还在搞，有的未经批准发外币债券。国务院已经明文规定，在国内外集资都必须经过批准，不经批准搞集资是非法的。乱集资制止不了，提高存款利率也起不了增加储蓄的作用。

三是金融管理混乱，恶性案件不断发生。农业银行河北衡水支行擅自向国外开了100亿美元的备用信用证，尽管现在农业银行总行已发表声明作废，但后果还难以预料。现在有的部门、企业，在国外用上亿美元购买企业，也不向国务院报告。衡水案件暴露后，又陆续暴露了许多诈骗案件。现在各种诈骗活动很多，我们一定要提高警惕。

四是滥设金融机构，擅自或变相提高利率，结算纪律松弛。企业反映，按法定利率很难借到贷款，资金几经倒手到企业后利率很高。这次提高利率后，必须坚决刹住这些违法行为。要坚决杜绝企业给银行送干股和银行参股拿回扣等不正当做法。现在银行之间相互占用汇差的问题很严重，企业对此很有意见。

当然，上述问题并不都是银行的责任，其他部门的问题也不少。现在财政也在搞信贷，把国家预算资金变成预算外资金拿来搞有偿使用，拿去放贷款，越搞越大。这种状况必须通过加强金融管理来解

决。其他部门也要检查自身存在的问题，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这样大，绝不仅仅是财政和银行搞起来的。

第三，强化宏观调控，不是实行全面紧缩，而是进行结构调整，我们不会像外界传说的那样搞全面紧缩。

当前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从总体上讲是健康的，前进过程中发生的问题通过加快和深化改革就可以解决，没有必要实行全面紧缩，今后也不会采取全面紧缩的政策。今年的货币发行增加很多，资金投入也很多；资金紧张的根源在于固定资产投资规模搞得太大，致使重点企业、重点建设的资金没有保证。我们要进行结构调整，把不该搞的停下来，集中资金保证重点。要根据优化产业结构的原则，按照国家的产业政策调整资金投向，加强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在这个过程中，会暴露不少矛盾和问题，难免要触及某些方面的利益，引起一定的震动。对此，要有足够的思想准备。在这次整顿金融秩序中，要贯彻“软着陆、点刹车”的方针，不能刹车过急。现在主要是进行结构调整，要优先保证农业、重点企业和重点建设的资金需要。当前农副产品议价收购部分的资金还没有全额到位，重点企业的流动资金还很困难，今年上半年重点建设的资金到位率不到计划的一半。因此，当务之急是调整资金的投向，保证重点需要。

二、银行系统的领导干部要严格执行“约法三章”

人民银行党组要求银行的各级领导干部识大体，顾大局，严肃组织纪律，提出了 “三要”和“十不准”的要求，这些都是完全正确的，我都赞成，大家要认真执行。为了在最短的时间内扭转局面，根据江泽民同志的意见，我在这里将“三要”和“十不准”概括为“约法三章”。

第一，立即停止和认真清理一切违章拆借，已违章拆出的资金要限期收回。 各银行要在今年8月15日前，将违章拆给非金融机构的资金全部收回；拆给非银行金融机构的资金先收回50%，其余违章拆借，违章参股、投资的资金要在8月15日前提出收回计划和处理意见，并上报总行。

第二，任何金融机构不得擅自或变相提高存贷款利率。 不准用提高存款利率的办法搞“储蓄大战”，不得向贷款对象收取回扣，或者将资金通过“关系户”放高利贷。

第三，立即停止向银行自己兴办的各种经济实体注入信贷资金，银行要与自己兴办的各种经济实体彻底脱钩。过去违反规定将信贷资金充当资本金注入企业的，要限期收回。

各级银行都要认真贯彻执行"约法三章"，否则，将严肃追究当事人和主要负责人的责任。

认真贯彻执行"约法三章"，把金融秩序切实整顿好，必须加强各级领导班子的思想和作风建设。要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要始终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不懈地对职工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正人先正己，只要领导干部以身作则，认真执行"约法三章"，就一定能够带出一支坚强的金融队伍。

在整顿金融秩序时，要注意稳定队伍，稳定机构，稳定人心，保护大家的积极性。前一段时间金融系统出现的一些问题，是在特定的社会环境下发生的，有些是新旧体制转换过程中难以避免的。问题的责任主要在上面。对工作中发生的不触犯刑律的一般违章问题，只要明确责任，如实报告，认真纠正，改了就好。

三、进一步推进金融改革

金融改革，既要从我国目前实际情况出发，又要遵循市场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逐步向国际规则靠拢。

改革的重点是，强化中央银行职能，加快形成统一、有效的宏观调控机制，以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

通过改革，必须建立一个在国务院领导下的独立执行货币政策的中央银行体系，调节社会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平衡，保证币值的稳定；必须建立一个中央银行监管下的以国家政策性银行和国有商业银行为主体的、多种金融机构并存的金融组织体系；必须建立一个统一、开放、高效、有序的金融市场体系。为此，这次会议后，要在以下方面抓紧进行改革。

第一，加强中央银行职能和基础建设。

1、强化中央银行职能。中国人民银行作为我国的中央银行，其主要职能是，通过制定和实施货币政策，严格控制全社会的货币供应总

量；加强对金融机构的监管；保证金融体系的安全。首要目标是保持货币的稳定，以促进经济的合理增长。

2、运用宏观调控方法。现阶段要由控制银行信贷规模和现金发行，逐步过渡到控制全社会货币供应总量，综合运用再贷款、存款准备金、利率、储备限额、汇率等经济手段实施货币政策。根据市场发育的条件，逐渐增加间接调控的比重，逐步向间接调控为主过渡。

3、控制基准利率，实行灵活的利率政策，调节资金供求。在基准利率基础上，决定金融机构利率浮动范围和幅度，并以此影响货币市场和证券市场，逐步形成以中央银行基准利率为基础的利率体系。

第二，建立中央银行监管下的以国家政策性银行和国有商业银行为主体、多种金融机构并存的金融组织体系。

1、组建政策性银行，实现银行政策性和商业性业务的分离，改变目前专业银行政企不分的体制。目前，要抓紧组建国家长期开发信用银行和进出口银行。政策性银行在国家产业政策和规划的指导下，在国家财政的支持下，不以盈利为目的，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担风险。

2、分离后的商业银行要依法经营，坚持资金使用安全性、流动性和盈利性统一的原则。

要有组织地做好金融资产清理工作，为其他改革打下基础。逐步实行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担风险、自我约束。由信贷规模管理逐步转向实行资产负债比例管理。按巴塞尔协议的要求，逐步提高资本充足率。鉴于非银行金融机构的资金占全社会资金的30%，要加强风险管理。

对各类、各级银行实行监督和稽核的机构与机制问题应该尽快研究解决。可以借鉴市场经济国家这方面的经验，并且结合我们自己的特点，创造有效的形式。

第三，建立统一、开放、高效、有序的金融市场体系。

1、建立全国统一有序的、规范化的同业拆借市场，使同业拆借市场变为真正的头寸市场。

2、发展短期票据市场。规范债券的信用评级，促进债券市场的健康发展。完善股票市场。在企业股份制改造的基础上，规范股票的发行和上市，逐步扩大规模。完善证券交易所的管理。

3、外汇市场要通过加快外汇管理体制改革，控制资本流出，有效利用外汇资金。逐步建立以市场汇率为基础的人民币汇率机制，最终达到汇率并轨。这项工作明年要起步。

推进金融改革，首先要进一步增强加快改革的自觉性和紧迫感。有些同志提出，过去金融系统的改革讲长远目标的多，讲近期如何改的少。这个问题提得好，请人民银行总行党组认真研究这个意见，尽快拿出切实可行的近期改革方案。这里，我讲一下关于人民银行省分行、县支行机构设置的改革问题，我的意见是不能急，要慎重。从长远看，中央银行应按经济区设置分支机构，但目前省分行、县支行都不撤，要稳定机构，稳定队伍。分行、支行的职能要转变，在加强对金融机构的监督上多做工作。总的来讲，我们金融系统的同志特别是各级领导同志，要克服因循守旧的观念和单纯业务观点，要在深化改革中找到扭转金融紧张局面的出路。同时，要通过改革，建立起适合中国国情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金融体制。

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今天就要结束了。大家回去后，要立即向地方党政领导汇报这次会议的精神，尽快制定具体贯彻落实意见，扎扎实实地把工作开展起来，切实完成党中央、国务院交给我们的任务。

整顿财税秩序，加快财税改革

(1993年7月23日)

1993年7月20日至23日，全国财政工作会议和全国税务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这是继7月5日至7日召开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之后，贯彻中央6号文件的又一重要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财政、税务厅(局)长，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这是朱镕基同志在会上讲话的主要部分，曾发表于《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册，原标题为《整顿财税秩序，严肃财经纪律，强化税收征管，加快财税改革》。编入本书时，对个别文字作了订正。

不久前，国务院召开了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会议概括为四句话，叫做“整顿金融秩序，严肃金融纪律，推进金融改革，强化宏观调控”。根据江泽民同志的指示，强化宏观调控从整顿金融秩序入手，这是因为金融在国民经济中处于重要的枢纽地位。财政、税务部门同样是国民经济的重要部门、关键部门，因此，整顿财税秩序也是当务之急。昨天我向国务院总理办公会议报告，在全国财政、税务工作会议上也要提出四句话，叫做“整顿财税秩序，严肃财经纪律，强化税收征管，加快财税改革”。我认为，根据当前财税战线上的问题，应该提出这四句话。概括一点说，一是整顿，二是改革，用改革的办法进行整顿，在整顿的基础上加快改革。下面，我分开讲一讲。

一、整顿财税秩序是深化财税体制改革的前提

首先要弄清楚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究竟要求有什么样的财税秩序。我觉得应该破除一些混乱的甚至是错误的认识。有的同志以为随意减免税收，不规范地给企业以优惠，甚至竞相攀比给外资企业提供最优惠的条件，这就叫“改革开放”，这就叫“解放思想”。其实，这是一种很大的误解。你看看世界上哪一个市场经济国家是这样做的？市场经济的基本要求就是平等竞争，而随意减税让利不利于平等竞争，不符合市场经济的原则；行政干预、长官意志、主观随意性，正是传统计划经济的典型做法。市场经济是规范化、法制化的经济，不是谁

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更不是谁分管什么就可以为所欲为，而是必须接受法律、法规及行政纪律的约束。

我们应该从改革的角度来认真领会《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当前经济情况和加强宏观调控的意见》(以下简称“中央6号文件”)精神，认真地、自觉地整顿财税秩序。当然也应该指出，要整顿财税秩序，也不是财税部门本身能完成得了的，不少违章违纪的事情甚至于违法的事情是在当地某些领导直接干预和指示下发生的。银行没有顶住，财税部门也是这样。所以，财税部门的同志要坚持原则，要顾全大局，要对党和人民负责。除了某些地方领导的干预，有很多问题如抗税、逃税、偷漏税，涉及社会的各个方面，也不是财税部门完全能解决得了的。因此，整顿财税秩序必须得到全社会的支持，特别是各级地方党政领导的支持。我们应该把整顿和健全财税秩序提高到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维护长治久安的政治局面的高度来认识，大家共同努力把工作做好。

二、财税部门职工要严格遵守“约法三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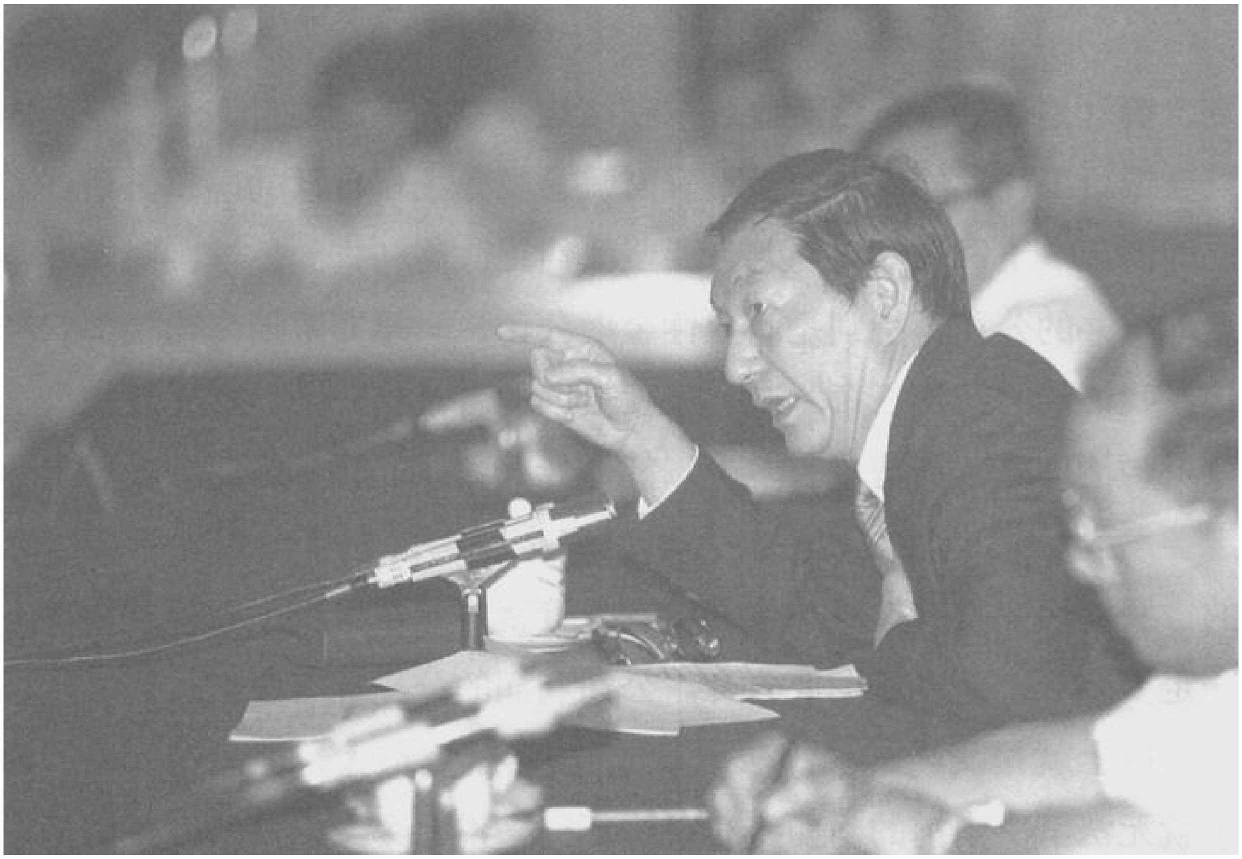
我在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给金融战线广大干部、职工提出了“约法三章”，今天也给财政、税务战线上的全体工作人员提出“约法三 章”。这个“约法三章”与金融工作的“约法三章”一样，把当前整顿的主要任务都概括进去了。要做到这三点难度相当大，但是不做不行，不做就不能扭转当前这个局面。所以，我在这次会上特别地呼吁和提醒同志们，大家一定要严格地、坚决地执行以下的“约法三章”。

第一，严格控制税收减免。 中央6号文件作了明确规定，今年内国家不再出台新的减免税政策。过去国家有政策规定的，如“三资”企业“免二减三”，还照样执行，但是新的口子一律不开。临时性、困难性的减免税今年内一律停止审批。我们要真正地对党和人民负责，希望税务总局、海关总署、进出口协调办公室不要再送申请减免税的报告来。任何人不许批减免税。有困难走别的渠道。减免税无从查核，最后弄得什么钱也收不上来。政策性减免税过去有规定，但是对期限已经到了的马上就得恢复征收。对各地越权自定的减免税政策，要坚决地按党中央、国务院的要求，立即停止执行，进行清理。对那些没有经过国务院批准，搞承包流转税，并在投入产出总承包中包了流转税的，都得进行清理，同时要按税法规定进行处理。今后的改革方案应

该把税政和税务分开，减免税属税政，应由财政部从严把关，税务机构无权减免税；征税属税务，是税务总局的职责，应该扩大税务总局在征税方面的权力和权威。这次会议以后，各地要组织专门的班子来清理、检查。我在这里宣布，从现在起，如再发现擅自减免税收，要严肃追究当事人和有关领导者的责任。

第二，严格控制财政赤字，停止银行挂账。财政收支的原则应该是量入为出，收支基本平衡，最好是略有结余。中央如果出现财政赤字，应该用发国库券来解决，不能到银行透支。到银行透支就是发钞票，就会引发通货膨胀。所以，我一再明确强调，财政到银行透支就到今年为止，因为今年已经打入预算了，从明年开始，绝对不许到银行借款弥补赤字。财政部向银行借的款，现在已经1000多亿元了，实际上很难还，今后不能这样搞。财政有赤字，可以发国库券，可以借新债还老债，这也就是间接地限制财政支出规模不能搞得太大。地方预算不能打赤字，到银行挂账是不行的，借钱是要还的。今年不许粮食企业再到银行增加新的挂账。现在累计起来，粮食企业因地方财政应补未补和其他原因造成的亏损在银行挂账已经接近500亿元了。前两年增加得很多，一年100多亿元。这里面大部分是本来应该由地方财政来补给粮食企业的。“民以食为天”，不花钱去补贴粮食企业，粮价怎么稳定？地方财政补贴不到位，粮食企业就到银行挂账，屡禁不止，今年又在银行挂了新账35亿元，这怎么得了！这次要作个硬性规定，下半年不能再挂。上半年已经挂了的，就只好扣中央财政拨给地方的粮食加价款和专项补贴，扣的钱直接由财政部拨给银行。

第三，财税部门及所属机构，未经人民银行批准，一律不准涉足商业性金融业务，所办公司要限期与财税部门脱钩。财税部门自己不要去办那么多公司。你去办公司，谁办得过你？你又是裁判，又是教练员，又是运动员，那打球谁打得过你？不能这样干，这样干会腐败的。当然，对财政信用问题有不同的认识。我的看法是，财政部门搞一点信用可以，有利于拾遗补缺，但搞多了不行，搞多了，特别是挪用财政资金放高利贷，就会出现腐败。如果没有严格的管理，一定是这种趋势。所以应该明确，要搞财政信用只能让专门机构去搞。这方面今后要立法，要严格控制，不能截留和挪用财税收入去搞信用放贷，不能搞高利贷，搞商业性金融业务要经过人民银行批准。



1993年7月23日，朱镕基在全国财政工作会议和全国税务工作会议上讲话。

现在基建规模为什么搞得这么大？当然是各个地方都想快一点。但是没有钱，怎么能搞这么大？这里的问题，第一是银行搞了违章拆借，通过拆借的渠道把钱弄走了，许多资金弄去搞房地产了，计划内的重点建设资金和重点企业的流动资金、农产品收购资金都不能保证。银行发放的贷款，投向也不合理，绝大多数投向商业、投向个体户、投向集体企业，而投向工业部门的很少，投向国有工业的就更少。这种投放结构是不行的。基建规模大一点不怕，问题在于大的不是地方，该搞的没有搞，瓶颈的制约越来越严重。第二是搞了非法集资，大家都用高利率集资，把银行储蓄抽走了。因此，重点建设没有钱了。第三是某些地方财政把预算内资金转成预算外资金，放高利贷，搞计划外的不符合产业政策和结构调整的基建项目。所以，不能只看银行工作上的问题，而不看财政、税务工作自己的问题。请你们立即清理一下财政信用问题，要坚决纠正放高利贷的做法。财政、税

务部门办的公司，特别是商业性金融公司，一律要限期与财税部门脱钩。我说的“约法三章”中，难度最大的就是这一条。首先要把公司或机构清理好，搞清楚有多少，都是什么关系。然后在财务关系上一定要脱钩，不能混在一起。当然，完全脱钩，在目前情况下是很难的，脱钩后还得有挂靠单位，没有人管就更无法无天了，但在财务上一定要分开，而且是彻底分开。公司利润的分配要有章法。

以上就是我说的“约法三章”。虽然难度很大，但后退无路，后退就无法解决当前的问题。对财税部门来说，今天以前所发生的不触犯刑律的一般违章问题，考虑到特定的历史条件，只要大家严格检查，如实上报，明确责任，认真纠正，改了就好。至于违法、犯罪则要另当别论。今天以后，如果再搞违反“约法三章”的事，一经查出，那就要按党纪国法严肃处理。这一点一定要明确。因此，对上面提出的“约法三章”，请财政部和税务总局搞出具体实施规定来。特别是脱钩问题，怎么个脱法，要有明确规定。原则我已讲得很清楚了，希望大家把这个精神贯彻下去。当然，并不只是对银行、财税部门才提出这样严格的要求。8月，中央将要召开中纪委二次全会，江泽民同志要去讲话，在全国开展反腐败，要制定一个反腐败计划。不在全国开展反腐败，我们就无法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掌握国家命脉的银行和财税部门走在前面，应当感到光荣。将来全党、全国都要这样做。

三、强化税收征管，严格执行国家财经纪律

整顿财税秩序要有个目标。今年下半年工商税收要力争增收亿元。没有这样一个奋斗目标，财政困难解决不了。今年已经没有时间进行大的改革了，只能靠一堵减免税，二卡银行挂账，三是实行脱钩，这样税收就可以大大增加。目前新体制还没有出台，不能不采取一些应急措施。当然，增收300亿元不是国务院下达的指令性任务，而是一个奋斗目标。大家回去好好考虑一下，有没有这个可能性。这方面，我补充几点具体意见。

(一) 税收征管要加强。税务部门要敢于顶住压力，执行国家统一税法。骗税问题要解决，以后发现一个要严肃处理一个，要认真地、毫不留情地处理，要坚决地与这些违法违纪行为作斗争。大家都知道，许多“三资”企业在账面上把原材料的价格“做”得很高，卖出的商品价格“做”得很低，最后，一点利润也没有，都是亏损，十几年都可以不缴

税。深圳有个经验，跑到香港去查原材料价格，结果发现原始票据都是假的。如果认真追查，可以多收不少钱。这方面要多给税务部门一些支持，包括收税手段方面的支持。银行不要占压税款，这件事银行一定要办到。

(二) 国库券要抓紧入库。买国库券是“名利双收”的事，一曰爱国，二曰高利，比银行存款利息还高一个多百分点，还给保值。搞乱集资靠不住，风险很大，买长城机电公司债券的人连本金都保不住，这是个教训。老百姓对《人民日报》发表的《十亿元大骗局的破产》那篇文章反映很好，可以多写几篇这样的文章，使大家感到还是到银行存款、买国库券是最保险的。同时，我们也希望财政部认真地总结一下国库券发行工作的经验，把办法好好地完善一下，这是一件大事情。应该考虑让银行、邮局、证券公司都能代销国库券。另外，也要搞好国库券的二级市场。原来讲国库券发完以后，就允许企业发债券。我们最近研究了一下，觉得这个问题很大。因为今年国库券只有300亿元，债券计划总额近1000亿元。如果国库券发行工作完成后，马上就把大量的债券推向社会，它的利率又比银行储蓄高，又会形成一股集资风，那么，我们两次提高储蓄利率所预想的效果就难以实现。所以，最近我们和人民银行、国家计委、国家经贸委、财政部等部门商量，投资债券不要发了，纳入信贷规模。地方企业债券也不要一拥而上，要报国家计委、国家经贸委审定，排个发行顺序，分期分批地发。有的也可不发，增加信贷规模就是了。中国目前主要还是要走间接融资的道路，银行还是主渠道，这样才能很好地执行产业政策。现在定了一个原则，下半年不能开工新的项目，要先保在建项目。这样，增加一点信贷规模可以满足大家的需要。股票只要是严格规范化的，就照常进行，照常试点。这方面我们还有一点把握。我们估计，最大的冲击来自集资，而不是股票。

(三) 加强“两金”和其他收入的征收管理。对征收“两金”，从方向看是应该取消的，但“两金”现在是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随便取消不行。国务院要逐步取消“两金”，折旧今年就免收“两金”，其他收入免收“两金”也要有个计划。要按计划进行，不能自行取消，这方面的工作还得抓紧一些。

（四）把财税大检查搞好。今年已宣布大检查从8月份开始，重点检查偷漏税、越权减免税和擅自取消征收“两金”。我有一个建议，财税大检查的方式是不是可以做一些改进或改革，就是要把这项工作逐步纳入正轨，不要搞突击。我主张把检查工作经常化。按照市场经济国家的做法，要有非常健全的会计师事务所、会计公司这样一个体系。中国一定要培养出一批国际水平的会计师，要靠他们去建立一批合格的会计师事务所，让他们去查，查出问题后重罚。这样，财税检查才起作用。但是，现在会计师事务所的水平还不高，而且弄虚作假相当严重。我们一定要立法，把会计师事务所变成一个光荣的行业、非常有权威的行业。对它们实行严格的法制，弄虚作假要停业、撤销、判刑。今年你们可以试一试，指定一些合格的、有权威的会计师事务所，给它们一些权力，然后对它们的审计结果作一个评定，使其逐步走上正轨。

（五）要坚持量入为出、量力而行，大力弘扬艰苦奋斗、勤俭建国的精神。办事要看财力可能，实事求是，否则不仅办不成事，而且会欲速不达，造成巨大浪费。地方各级财政要自求平衡。凡是年初打赤字预算的地区，都要按《国家预算管理条例》的规定，重新调整预算。上半年收入完成不好的、有可能出现赤字的地方，也要适时调整预算。江泽民同志多次讲要警惕享乐主义、拜金主义、极端个人主义和各种腐败现象，反对挥霍浪费。现在各种公司剪彩、开招待会，大包小包地送礼，后来发展到送礼券，有些领导干部就“笑纳”。资本主义国家都不能这样搞，这叫公开行贿。

（六）要保证国家重点建设资金的需要，压缩一般性的支出。不要办那种没有实效的节了。现在哪个地方不办节？什么节都有，我不是说不该办，而是太多了。钱花了不少，有多少效果？有几个外国人来？招商招进了几个？还不是大家吃一顿、喝一顿，从财政拿钱，或向企业摊派。要压缩一下会议的经费和行政开支，专控商品要停止审批。亏损企业、拖欠利税的企业也在大买汽车，银行绝对不能贷款给它们。

四、根本出路在于深化财税体制改革

现在如果不开始进行财税体制改革，明年的日子就很难过。财税体制改革在一个省里搞试点是搞不下去的，要改革就全国推行。在这个

会上财政部拿出了一个方案，我觉得这个方案还要修改。有的同志看到这个方案可能会说，你们是搞集中收入，把地方的财力收上去，那还不如搞统收统支得了。我看这是一种误解。我们总是向前走的，绝对不会回到统收统支的老路上去。但是，同志们也要有一种改革的思想。江泽民同志讲，现在这种包干体制是一种不适应市场经济的落后的体制。当然，我们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已过渡了14年，这么多年是在逐步改革、逐步前进。现在的财税体制是一种过渡性的体制，它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也起过重要的历史作用。不要用今天去否定昨天。下面，我对财税体制改革讲四条意见：

第一，要按照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总结14年改革开放的实践，尽快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财政税收体制。要充分认识加快财税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加快改革的进程。为此，中央已经决定，从明年1月1日开始，在全国全面推行财税体制改革，不搞试点。

第二，实行分税制和分别征收。分税制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在财政体制上不再搞什么包干、什么分成，而是按税种划分中央和地方的财政收入，中央收哪几种税，地方收哪几种税。实行市场经济的国家都是这样的。要尽量减少共享税，当然，共享税一点没有也不行，但原则是尽量分税。分别征收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组建两套税务征收机构，一个叫国家税务局，完全是垂直的，收中央税；另一个叫地方税务局，收地方税。共享税由国家税务局负责征收，统一政策，统一征管，收完以后，把地方应该分得的共享税收入退给地方，分钱不分权。

建立两套税务机构是个很好的办法。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程中，财政、税务、银行、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等要加强。现在精简机构，一些工业管理部门的人员要精减50%，这些人到哪里去？就是去加强这些部门。在税务机构改革过程中，要注意稳定，绝对不要引起人心浮动。明年1月1日实行分税制改革，但机构肯定一时组建不起来，所以一切工作都要靠现有的机构来做，无非是收了税再分账。组建机构没有一年甚至更多的时间是不行的，所以大家都不要人心惶惶。我倾向将现在的税务局改建成将来的国家税务局，地方税

务局再组建新的，可以从国家税务局抽一些人去，一步一步来，这样人心就安定了。

第三，在明确财政职能、进一步下放财政支出责权的基础上，划分税种，保证中央必要的、固定的支出。明确财政职能，是指财政究竟干些什么；进一步下放财政支出的责权，是指把许多支出职权下放给地方财政，事权都下放给它。在这个基础上，划分税种，明确哪些是中央的、哪些是地方的，从而达到一个目的，就是保证中央必要的、固定的支出。财政部现在提出的方案，表明了一种指导思想，就是建立转移支付制度，中央多收，然后返还给地方，以增强中央调控宏观经济的能力。这个指导思想没有错，但是我考虑，暂时不能完全做到，因为有些同志反映，把原来的上缴省都变成补贴省，这个办法还不易为下面所接受。所以，为了减少目前改革的阻力，还是要考虑现有的利益格局，不要过分强调把中央收入的比重提得过高，要逐步地来。根据财政部给我提供的国外资料，在财政收入中，一般的国家都是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60%，地方财政收入只占40%，中央财政收入占主导地位。而在财政支出中，中央财政支出占40%，地方财政支出占60%，地方占大头。这是因为中央政府负有保证全国经济发展、地区平衡、物价稳定的责任，负有巩固国防和拓展外交的责任。因此，中央财政在收入中应该占大部分、在支出中占小部分，这样它才有能力去调节地区之间的不平衡，才有能力去调控，这就是转移支付的理论。接下来的问题是中央每年要花多少钱，请大家考虑一下。我想有几笔支出是硬的，应该用中央的收入来支付。第一笔，是军费加武警费用支出。按照江泽民同志讲的，军队要吃“皇粮”，不要去经商，不要把军队搞腐败了，这方面的开支每年还要再提高一些。第二笔，是重点建设支出。当然，重点建设支出不能完全靠财政，将来要通过国家长期开发信用银行，可以采用金融债券和财政投融资等办法来解决。第三笔，是行政、科技、文教、卫生、外交、援外等经费，按需要恐怕也得加一些。粗粗算起来，这三笔支出数量就很大。中央财政应该收哪几种税呢？第一笔，产品税；第二笔，增值税。这两种税是比较可靠的，而且会有增长。第三笔是关税。企业所得税基本上由地方收，但银行、金融、保险、邮电、铁道等企业上缴的所得税无论如何要上缴中央。银行的利润、保险公司的利润归中央。中央大体上收这样几种税就差不多了。方案出台的第一年，要考虑地方的

既得利益。中央财政的比重以后逐年会提高。地方要是认真地收税，把该收的都收上来，也可能增长得更快。怎样设计税种和怎样划分税种，还需要结合具体情况很好地研究。实行分税制以后，要给地方下放支出的责权，地方的支出中央不要管，它愿意怎么用就怎么用，不要干预。现在我们过问太多，哪笔钱用在哪儿，买酱油的钱不能买醋，不必这么做。但是，地方不能随便增加新的税种，增加新的税种必须经国务院批准，不然大家搞乱摊派、开征好多税怎么行。要统一税法。要建立和健全税收立法和执法、司法相互独立、相互制约的机制，真正将税务和税政分开，把征收、管理和检查分开，增强约束和监督。

第四，在贯彻《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转换经营机制条例》(以下简称《条例》)的基础上，实行《企业财务通则》和《企业会计准则》(以下简称“两则”)，规范政府和企业之间的分配原则。要淡化承包责任制和利税分流的矛盾，不要把这两个东西对立起来。我们逐步完善“两则”以后，可以逐步化解这个矛盾。

我是不赞成承包流转税的。搞投入产出大包干把流转税承包了，我也是不赞成的。没有经过国务院批准的，要立即改正过来，都要按照“两则”来实行。“两则”也需要进一步完善，并与贯彻《条例》 有机结合起来。

我们准备根据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的决定，马上成立财政和税制改革领导小组，设计、起草财政和税制改革方案。金融改革现在也成立了一个领导小组，正在加紧设计方案。金融改革的主要指导思想，就是使中国人民银行成为真正的中央银行，各省区市的分行要转变职能，权要收到中央来；否则，金融一定失控，信贷一定失控，发票子一定失控。中央银行不能搞信贷，不能参与具体的信贷活动，它就是掌握利率政策、汇率政策、基础货币投放等，规定统一的货币政策。专业银行要成为真正的商业银行，自负盈亏。政策性贷款要与商业贷款分开，由专门的银行搞。比方说，现在要成立进出口银行、长期开发信用银行，这都是搞政策性贷款的。各级银行都要成立监事会，要有银行外面的人来进行监督。监事会每年要开两次会，审查银行的工作方针、资产负债表、工作报告。监事会最大的权力就是可以建议上级撤销行长的职务，有这一条就行了，就可以监督了。财政、税务、金融

这三个改革方案如果今年能在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上通过、明年1月1日实行，我认为这是一个长治久安的基础，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础。有了这个基础，目前存在的困难就可以得到缓解，甚至于基本解决，大好形势就可以继续发展，经济发展速度还可以保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平上。

最后，希望财税系统的各级领导班子要加强作风建设、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我们身上肩负着很重要的任务："四句话二十四个字"和"约法三章"。这些任务的完成难度都很大，我充分估计到了这个难度。那么，任务怎么样才能完成呢？就是各级领导班子要以身作则，只有自己以身作则，才能够严格要求部下。自己不能勤政，又不廉政，吃吃喝喝，乱批条子，任人唯亲，到处搞关系，把国家财产不当一回事，你还坐在讲台上面作报告，下面能不骂你？更不会照你说的去做。你也不敢认真处理一个人，就只能搞点福利主义，给大家发点奖金，形成一种庸俗的机关作风，这要害死人的。所以，必须从我们自己着手。自己带头，为人表率，才能有真正的廉政建设，才能真正遵守"约法三章"。大家一定要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同志们，我在这里讲的，如果我自己做不到，请同志们检举、揭发。如果我自己做不到，我绝对不要求大家。如果你们发现我有不廉政、不勤政的问题，你们可以检举、揭发。但是我也要求大家，你们自己一定要以身作则，"约法三章"你们首先要做到。我相信，只要大家团结起来，同舟共济，认真贯彻中央6号文件的精神，我国的大好形势就会继续得到发展。

统一认识，勇于改革，做好金融工作

(1993年7月28日)

这是朱镕基同志在中国人民银行总行机关全体干部职工大会上讲话的主要部分。

对今后工作，我想讲三条，作为希望，也可以作为中国人民银行今后一个时期的任务。

第一，统一认识。我希望同志们近期要更快地认真学习中央6号文件①，用中央6号文件的思想统一我们总行机关工作人员的认识，使我们全体工作人员跟党中央保持一致。我认为这是最重要的一个问题，也是我们这一次加强宏观调控能不能成功的一个关键。

---

① 中央6号文件，指1993年6月2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当前经济情况和加强宏观调控的意见》。

要全面地理解、正确地贯彻邓小平同志的指示，他的讲话是非常全面的。要实事求是，不能攀比，有什么条件就搞什么，出了问题自己负责。去年发现银行违规拆借问题相当严重。从银行把钱拆借出去，不仅直接把基建规模搞大了，而且导致计划内重点建设项目该贷款的没有钱贷，影响到整个国民经济的运转。这是个大问题。我们的贷款规模去年是3570亿元，今年是3800亿元，但今年上半年只安排了1300亿元，实际贷出去的只有900多亿元，就是说真正该放的贷款还不到全年的四分之一。所以，要看到我们金融工作的运行，在过去一年中，是有很多经验教训的，有许多失误的地方，助长了投资结构不合理、规模过大。去年基本建设投资总规模从1万亿元一下子跳到2.2万亿元，今年上半年又增长了69%，一年的时间，哪有这么大的财力？显然是靠发票子。在建规模最能说明问题。判断基建规模是否过大，是通过许多综合指标来看的。基建投资的年度规模增长太猛，特别是在建规模增长过猛，生产资料价格必然上涨更猛。钢材的价格，从去年年初的1600多元1吨上涨到今年的4000多元1吨，上涨了一倍多。我国从出

口钢材变成了进口钢材、进口原材料。通货膨胀率也急剧上升。这样得出一个综合判断，就是要防止经济过热。这样搞下去不行，基建的摊子不能再铺了。

同志们，你们是了解全国金融情况的，你们的认识应当比地方的同志高出一筹，你们心中应当有全局。这几十年，通货膨胀的经验教训是很多的。通货膨胀在没有启动时，人们往往不太注意；通货膨胀一旦启动了，那就会加速发展。这几个月就是通货膨胀加速发展的时候，现在35个大中城市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已经超过20%，6月份是21%，今后几个月肯定还要涨。这不是我们加强宏观调控的后果，绝对不是，你们要作解释，这叫“滞后效应”。就是因为去年以来基建规模搞得过大了，恶果今后几个月就要出现。谁也没有这个本事，一说加强宏观调控，物价马上就能降下来，神仙也做不到。宏观调控要起作用是几个月以后的事情，或者说是半年以后的事情。只要大家同舟共济，同心协力，统一认识，半年以后，经济形势一定能稳住，毫无问题。我希望同志们纵观全局，深刻理解中央6号文件精神，这样我们才能很好地调控金融。

金融是个枢纽。银行工作确实是操国民经济“生杀之大权”啊！你松一松，它就上去了；你紧一紧，它就下来了。你要它生，它就生；你要它死，它就死。银行工作就是有这个本事，尤其是在中国目前这个情况下。所以说，我们的工作是非常重要的，要非常慎重。



1993年7月28日，朱镕基在中国人民银行总行机关全体干部职工大会上讲话。右二为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戴相龙，右三为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白文庆。

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在统一认识上，取得了很大成绩。10个调查组回来汇报，普遍反映一个问题：现在资金拆借都停止了，而且正在拼命把拆借的资金收回来。这说明，参加全国金融工作会议的同志们的表现是认真的、积极的。大家也感到金融工作的“约法三章”讲得很清楚。但是又出了另一个问题，就是把所有的贷款渠道通通切断了，关上门了。你不是叫我关闸门吗？我全给你关上。拆借出去的资金，都变成钢筋混凝土了，你还收得回来吗？收不回来了！收不回来，你硬要他收，他就把正规贷款的钱都不贷了，都挪到收回的拆借资金里去，说我收回了多少拆借资金，那怎么行呢？

现在许多省都有这个情况：正道没有钱，信贷规模完不成。农业方面我们了多次会议，强调不“打白条”。现在是定购粮食不“打白条”，但议购粮没有人收购，眼看着粮价下跌。如果粮价要下跌到保护价以

下，那谁还种地啊！秋粮就没有人种了。重点企业的资金不到位，还差一半。也就是说，国家安排的那些能源、交通等重点建设项目，按历年的规律，上半年资金到位应当相当于全年计划的40%，现在却只有30%左右，而且是靠银行多发票子，临时由中央银行拨下去，这样才勉强使重点企业停工少一点。

由于流动资金困难，生产企业又发生了三角债。这样下去，那我们的经济就稳不住了，就要下滑。而我们恰恰希望经济不要下滑得太厉害，不要引起太大的社会震动，现在有这个危险。我们的工作是不是也有不周到的地方？比方说，今年第三季度的信贷规模现在还没有下达，贷款规模是多少，各地区都不知道。所以，我就要求把第三、第四季度按月的贷款规模统统下发，一直到基层，让企业知道没有压缩它们的贷款规模。同志们，你们每个人的工作产生的影响是非常大的，有一点考虑不周，下面就无法办事。我希望发个电报，把贷款规模尽快分配下去。江苏、浙江、安徽这三个省反映比较强烈，明天我就与人民银行总行的同志和各专业银行行长去南京，召集三个省有关负责同志开会，现场解决这些问题，当场把贷款规模下达给他们，研究怎么解决资金困难。只要不搞歪门邪道，只要是正常的资金需要，就是多发票子也在所不惜。我们有这个决心，但是你要走正道。

我一再讲，现在不是全面紧缩，只能搞结构调整。就是总的贷款规模不降下来，还是那么大，但是不要往房地产投钱了，特别是不要向什么旅游度假村、高级写字楼投钱，要往真正的重点建设项目、农业、有效益的生产里投。所以，我希望同志们把思想认识统一到中央6号文件上来，与中央保持一致，把自己的工作想得周到一点。对中央6号文件的精神要掌握，不能机械地执行。如果机械地执行，看样子你是压缩规模，一下子把闸门统统关住，那样干就把经济憋死了。这里还有一个新问题，就是发债券的问题。我认为在中国目前的情况下，就是要走银行主渠道搞间接融资，直接融资不能搞那么多。世界银行有些专家比我还极端化，认为中国根本就不能搞股票，美国搞了几十年都搞不好，还是那个样子，你中国就能搞好吗？这里面丑闻多得不得了，投机厉害得很。在目前的环境下，企业债券我也不主张发。为什么？没有这个必要嘛！搞企业债券，地方就可以批，那就没有产业政策了。另外，企业债券利率高于银行贷款利率，加重了企业负担，

筹资成本也增加，何必搞这个东西？今年计划发行1000亿元债券，除了其中300亿元的国库券，我对其他债券从来都是摇头的。前一段时间由于国库券的发行很不理想，因此规定在没有完成国库券购买任务之前，各种债券一律不许发行，这样才把债券控制住了。现在发行国库券的任务完成了，但完成得不好，只完成了300亿元多一点，这是出乎预料的。我不知道是怎么搞的，现在我还听到一些同志们讲，想买国库券买不到。首先是估计不足，其次是工作没做好。今后应当在现有的银行、邮局、证券公司都能买到国库券，想买就买嘛！国库券的发行工作虽然完成得不好，可总算完成了。现在就没有理由不让企业发债券了，但考虑到储蓄存款刚刚开始增加，几百亿元的债券就涌上社会，利率都高于银行储蓄利率，人们把储蓄存款又都取出来买债券，储蓄又要掉下来了，那么今年第三、第四季度的信贷规模更没有资金保证了。所以，我与国家计委、人民银行总行党组商量，作了一个决定，投资债券不发了。那怎么办？纳入贷款规模，增加信贷规模，利息还可以低一些，你何乐而不为？另外，企业债券不是都不能发行，但几百亿元一下子都推到市场上，受不了。可以分期分批发行，报个计划，国家计委排个次序：谁先发、谁后发，总不能一拥而上。有的债券不发的话，相应增加信贷规模，也可以达到同样的目的。当然还要规定一条，不能把债券都变成信贷，不然一下子增加六七百亿元信贷规模，那可不得了。总而言之，新开工的项目一律不准发债券。今年下半年不能再开工新项目了，这么多在建项目都没有资金保证，还能再新开工？必须开工的项目，个别报国家计委审批。这一条卡住了，信贷规模不需要增加很多，就能把债券问题应对过去了。

同志们，上面这一条规定是很厉害的。要进行宏观调控，我们都要执行中央6号文件，今年发行票子要控制在目标之内。目前本来是货币回笼的季节，却变成净投放近700亿元。去年货币投放1200亿元，加上这700亿元是1900亿元，这还是在不上新开工项目、保持原有在建规模的情况下；要是摊子再扩大，下半年再发1200亿元的票子也不够。所以，金融形势是非常严峻的。眼看今年的票子要发行2000亿元，我现在的手段就是提高利率，让储蓄增加，坚决刹住乱集资，才能少发一点票子。如果现在把五六百亿元的债券推向市场，储蓄就又要分流，票子又要多发。所以，这是生命攸关的事情。要把这个道理讲清楚。

原计划今年发行股票50亿元，没有改变，为什么？因为我们有手段。这手段就叫做“规范”，叫做“立法”。现在对股票有几个法规起作用，不怕它失控。因为发股票的企业想符合条件也不太容易，要过几道关才能发行股票，所以发股票不大容易失控。

第二，希望同志们要坚定一个信心，就是要通过强化宏观调控，能迅速扭转资金紧张局面，能保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地发展。大家要树立这个信心，我们是可以做得到的。只要大家能统一认识、同舟共济，我们就能够在不太长的时间里，扭转资金紧张的局面。今年7月份，就是从中央6号文件下发以来，国内外反映都是好的，形势已经开始改观。这说明中央6号文件的威力很大，符合实际情况，适应群众的需要，是得人心的。只要我们正确地执行中央6号文件关于金融工作的指示和我们最近作出的一些决定，同时注意及时解决执行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我相信，金融形势半年内有根本的改观是完全能够做得到的。希望同志们要有这个信心，我们大家团结一致，为实现这个目标来努力。

第三，希望同志们要树立一种勇于改革、开拓进取的思想观念，把金融系统的改革推向一个高潮。现在看起来，国民经济的宏观调控问题主要是金融调控，而金融调控呢，要靠改革。我们要下决心，加快改革步伐，现在是一个最好的改革时机，因为我们发现了这些问题，大家体会到了改革的紧迫性。在这样的一个历史背景下，顺理成章地把改革推向一个高潮，能够为人民群众所接受。金融改革的主要支点，用两句话来说，就是把人民银行办成真正的中央银行，把各个专业银行办成真正的商业性银行。至于政策性的投资，要设立政策性的银行。人民银行不要自己直接搞信贷，信贷要由政策性银行和商业性银行去做。人民银行主要是掌握货币政策、利率、汇率，控制贷款规模和基础货币的运用。人民银行最大的手段是金融政策，调控基础货币。绝对不允许地方政府干预中央银行的工作。如果各省区市政府通过当地人民银行分行干预金融政策，我们的金融一定会失控。这不是哪个人高明不高明的问题，而是一个所处地位的问题。因为局部不管全局，只要自己发展快就行，不知道快到什么程度就会影响全局。现在，人民银行各分行要转变职能，不能成为一个资金调度的银行。机构不要动，就是要转变职能。人民银行分行主要行使监督的职能，监

督社会集资，监督利率的统一，监督各个专业银行的工作。专业银行一定要变成商业银行。专业银行要能够从全国来调度资金，任何一个地方政府没有权力来干预专业银行的工作，说这个资金不能出省，绝对不允许！这是我们银行的权力，任何人不能剥夺。如果专业银行从全国调动它的资金还不能解决问题，再由中央银行用再贷款给它支持，这样才能形成一个正常的金融秩序。这一套东西，我们很快就要出台，先把方案设计出来，准备在今年八九月份召开的全国金融改革工作会议上全面地推行。关于这项工作，人民银行已经做了很长时间的准备。其实，这里也没什么奥妙，因为任何一个市场经济发达的国家都是这样做的，有现成的模式可以参照。专业银行要变成真正的商业银行，要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担风险。银行应该有很大的权力，但是，必须有监督，银行不能为所欲为。所以，我主张各级银行都要有监事会，这样的话，我看我们的银行都能办好。



1993年7月27日，朱镕基考察北京印钞厂。前排右一为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周正庆。

最后，我给人民银行总行机关工作提出三点要求。

一是要求我们全体工作人员，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和高度的责任感。 希望同志们要坚持这一点，应该看到我们工作的重大意义。我们要对历史负责，对后代负责。我们担负这么重要的任务，没有一个革命的人生观不行。马克思主义者从来都是讲世界观、人生观的，我们要树立革命的人生观、世界观。我们没有别的要求，中华民族落后了几百年，一定要在我们手里把这种情况扭转过来，振兴中华民族，使我们的人民能够扬眉吐气。我希望大家要用这一点来鼓励自己。只有每一个工作人员都以高度负责任的态度来对待自己的工作，我们中央银行的工作才能够真正地出效率、出成果，才能够真正成为国民经济的“神经系统”。

二是希望同志们能够树立一身正气、两袖清风的清正廉洁的作风。 我还是要强调这一点。现在我们一些行业的不正之风已经发展到相当严重的程度。今年8月份将召开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二次全体会议，全国要开展一个反腐败的斗争。如果我们再不反腐败，我们什么工作都谈不到了。我希望银行系统、财政系统成为反腐败的先锋。我们大家要严格要求自己，对于一些实际的、具体的问题，我们来想办法解决。比如我讲的脱钩问题，我在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讲得很清楚，这一脱钩就把财路给切断了，会影响到你们的生活。像这些具体问题，可以给解决一下，还得给机关工作人员一点补助，不要使他们的生活水平下降那么多。但是，要走正道，你不能再把信贷资金挪用了去办公司，把赚的钱拿来做回扣、用来发奖金。这种做法不得了，如果这样做的话，那这个机关非腐败得一塌糊涂不行。我们要想点别的办法，走正道，从各方面改善同志们的生活。但是，我们不要搞歪门邪道。我希望人民银行总行机关党委、纪检组、党组再拟定些具体的办法出来，加强廉政建设。

三是希望我们的机关成为一个作风谦虚、效率很高、服务态度很好的中央机关。 希望同志们要替下面来的同志设身处地想想，以谦虚的态度帮助他们，以解决问题的态度来接待他们。每一个人民银行总行党组成员要多了解些宏观情况，从全局来考虑自己这个局部的工作该

怎么做。如果自己把自己封闭在一个很小的圈子里面，一个人管一摊儿，分兵把口，连自己银行别的业务都不了解，更谈不上对其他部门情况的了解。这样下去，我们银行工作是绝对做不好的。每一个党组成员不但应该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而且要了解其他党组成员在那里做什么，自己应该如何配合全局的工作，还应该进一步了解现在国家计委在干什么，外经贸部在干什么。你不了解这些东西，你就不能使我们的金融工作更好地为各个部门服务。每个司局长、每个处的同志也都要了解全面情况。我想，提高机关工作效率还是大有文章可做的，希望同志们加以改进。

最后，希望我们大家团结起来，同舟共济，共同努力，一心一意把金融工作做好，把机关建设好。今后，我在工作中有什么缺点、错误，希望同志们批评、指正。你们可以给我写信，对你们的来信，我是每一封都会看的，而且会有答复。

解决资金紧张的八条措施

(1993年7月29日)

1993年7月初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之后，金融部门贯彻中央6号文件精神，收回违章拆借资金取得了成绩，但各地普遍反映银行只收不贷，企业流动资金紧张、生产困难。为摸清实际情况，及时采取对策，朱镕基同志于1993年7月29日至31日，在江苏省考察工作，并于7月29日在南京市主持召开有江苏、浙江、安徽省政府负责同志参加的会议，研究解决三省资金紧张问题。这是朱镕基同志在会上讲话的主要部分。这篇讲话强调解决资金困难，必须采取釜底抽薪的办法，堵邪门，开正路。这次会议决定中央银行贷给苏、浙、皖三省专业银行50亿元再贷款，由它们有重点地解决企业流动资金短缺问题。随后从8月初到11月末，朱镕基同志先后主持召开了八次资金调度会议，研究掌握宏观调控的力度和银根松紧的程度，并具体调整贷款规模，解决各地流动资金紧张问题。

目前，各省出现的资金困难是多方面原因造成的，金融系统的秩序混乱是个重要原因。如果不从根本上改变现在这种状况，即使注入几十亿元资金，也是解决不了问题的。资金困难的深层次原因是投资规模太大了，没有那么多钱，非要办那么多的事，办了这一件，把那一件挤掉了；办了不该办的事，把该办的重点给挤掉了。这恰恰是我们不希望看到的事情。这些问题当然不影响对成绩的肯定，形势是大好的，但存在的问题也不容忽视，不然怎么会紧张到这种程度？解决这个问题，只有按中央6号文件的精神，采取釜底抽薪的办法，堵邪门，开正路。现在不釜底抽薪，想拿几十亿元来解决三省资金困难的问题，是解决不了的。根据中央6号文件的精神，下面我提出几条解决问题的意见：

第一条，坚决停止非法集资。 请有关省政府搞几条有效的、切实可行的措施发下去，凡是超过银行规定的利率搞集资的，不管是什么人，一律停止。包括那些自办的各种金融机构、钱庄、当铺等的非法

集资，都不能搞，还是要走银行这个主渠道。在当前的情况下，不走银行主渠道，什么产业政策都没有了，后果非常严重。乱集资如果能刹住，资金紧张的状况就会有转机。各省负责同志在这个问题上态度要坚决，要派得力的工作组下去检查监督。

第二条，坚决停止违章拆借。 今年7月7日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以前发生的违章拆借，只要如实申报，认真清理，就不追究责任。7月7日以后还在搞违章拆借的，一定要追究有关领导的责任。已经拆借出去的钱，要尽量收回来；暂时收不回来的，要提出处理意见。拆借出去的资金即使投入了企业正常生产，补充了流动资金，用于重点建设，也得收回，改走正道，采取收回拆借、增加贷款的办法解决。增加贷款要有明确的政策界限，属于支持农副产品收购、支持生产和出口企业正常的流动资金需要、支持国家重点建设的拆借资金，收回后可转为银行贷款解决。对那些不符合产业政策、生产积压滞销产品的拆借资金，特别是对投入搞房地产和炒股票的拆借资金，必须作为清理的重点，抓紧收回。

第三条，坚决执行限产压库促销的方针。 产品运得出去，销得出去，有效益，这种高速度是我们希望的。产品销不出去，叫什么高速度呢？现在“三项资金”占用大量增加，5月底全国产成品资金比年初增加了572亿元，大大超过生产增长的幅度，说明有部分产品生产出来，没有销出去，或者没有运出去。不要追求那种得虚名、招实祸的速度。

第四条，坚决控制固定资产投资规模。 江苏、浙江、安徽三省的投资规模以80%、90%的速度增长，即使是搞基础设施建设，资金也保证不了。就是印票子给你搞，没有原材料，也搞不上去。如果中央不下6号文件，钢材价格还得涨，汇价也得涨，能搞得下去吗？投资规模一定要控制。那些没有销售市场的房地产项目，特别是那些高档别墅、高级宾馆、写字楼等等，该停的就要停。基础设施建设也要排排队，量力而行。下半年不要再上新开工项目了。

第五条，认真清理财政信用。 造成这么大的投资规模，资金来源除原来讲的民间非法集资、银行违章拆借之外，还有一个就是财政部门把预算内资金变成预算外资金，搞财政信用。财政部门搞一点信

用，拾遗补缺，是可以的，但不能拿财政资金去放贷。本来应该上缴的财政资金，被占用了去放高利贷，这是不允许的。财政信用不要搞得太多、太大，更不能拐几个弯，去放高利贷。一放高利贷，资金投向就难以控制了。

第六条，加强企业现金管理，严格结算纪律。 企业必须把钱存在银行里，不许搞体外循环。只要你走正道，银行就保证你的合理资金需要。现在各地企业的存款普遍下降，值得注意。请各省政府发个通知，要求企业严格执行结算纪律，对违反纪律的要追究责任。

第七条，确保农副产品收购资金。 为了确保收购农副产品不“打白条”，7月14日，我又主持国务院会议研究了这个问题。会议确定在个别地方收购资金临时出现缺口时，专业银行可按“先贷后报，先垫后补，事后算账，分清责任，限期归位，照章处理”的原则予以解决。大家都要按这个原则办。保支付是各个专业银行的责任，只能由专业银行负责。省专业银行解决不了，可以找专业银行总行；专业银行总行解决不了，可以找人民银行总行。这样才能分清责任。现在要解决的问题是：第一，各级财政补贴必须到位，不能再到银行挂账。今年新增的挂账，必须尽快归还银行；上半年发生的挂账由财政部统一扣回，拨交银行。第二，一律不准搞“户交村结”。“户交村结”就是收购粮食的时候，以户为单位去交，交完粮食以后，以一个村子为单位结算。村长把钱从银行领回去后，把摊派都扣掉，最后剩下多少是多少，甚至一个钱也不给农民。这种做法比“打白条”还要糟糕，农业银行要查这个问题。银行也绝对不能图省事，还是要一户一户结算、一户一户给钱。另外还有个问题，议购粮食那一部分，农民一点都不存，我们也收不了那么多。我一直主张放开粮价后，各个省原来用于粮食的补贴，应该用于建立粮食风险基金，不要拿去搞房地产。粮食收购价格下跌时，地方就用保护价收购一部分粮食存起来。存粮所需的资金由银行拿，但利息要由地方出。当然，国家也要存一部分粮食。如果把粮价放开后省下的补贴都用于搞别的了，对粮食市场放开不管，放任粮价下跌到成本以下，农业就必然要萎缩。至于经济作物，像烟叶就不能敞开收购。国务院最近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烟草专卖管理的通知》，就按这个文件规定办。凡属列入计划的，按国家定的价格收购；凡属超产的，只能按保护价格收购，价格下浮20%左

右，让农民保了本还有微利。超产烟叶的税收全部上缴中央。这就是给地方、给农民一个信号，不能盲目地发展烟叶等经济作物。关于国家储备棉花的资金问题，财政部拿利息，人民银行拿资金，并一起纳入各省的信贷规模。如果地方需要储备棉花，按保护价收购，银行可以拿资金，地方财政出利息。

第八条，银行要堵邪门，开正路。要严格执行信贷政策，改进服务态度，不准搞只收不贷，绝对不能挪用正常信贷资金去还拆借资金。那就是把正门、邪门一起堵死，银行等于关门，国民经济就要停摆。这种错误做法，各级银行绝对不能干。你不给企业正常贷款，企业也就不把钱存在银行，逃避现金结算，那银行怎么能保支付?

我相信，只要按上面讲的八条办，就能够抑制当前通货膨胀的趋势，又不至于引起很大的社会震动。但是，那些房地产项目不停一点，没有销路的产品生产不压一点，谁都不伤筋动骨，全面都要保，还是搞全面膨胀，那就解决不了问题，投资结构也无法调整。因此，请同志们务必顾全大局，调整结构，确保重点。

切实加强外汇管理

(1993年8月2日)

1993年8月2日，国家外汇管理局全国分局长会议在北京召开。出席会议的有国家外汇管理局各分局主管外汇工作的副局长。这是朱镕基同志在会议开幕时讲话的主要部分。

外汇管理工作历来重要，现在更为重要，已经成为稳定国民经济的一个重要因素。今天，我讲三个问题。

一、外汇工作和贯彻中央6号文件、加强宏观调控的关系

中央6号文件刚下达一个月，在贯彻全国金融工作会议精神以后，加强宏观调控的措施已经开始见效，这说明中央6号文件提出的十六条措施是完全正确的。只要我们坚决贯彻中央6号文件精神，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就会逐步向好的方向转化。

汇价是反映国家经济状况的非常灵敏的指标。从去年下半年开始，外汇调剂市场①人民币汇价出现了急剧跌值的趋势，今年以来跌势加剧，年初时是1美元兑换人民币7.4元左右，到6月为10.9元左右，个别地方突破了11元。主要原因是经济发展速度很高，投资规模过大，拉动进口需求激增，因此人民币必然要贩值。国内通货膨胀加速，对人民币跌值的心理预期非常强烈，一些持汇单位炒买炒卖外汇的投机活动，更是外汇调剂价格急剧变化的重要原因。另一个原因是，我们取消了调剂外汇的最高限价。当时考虑取消限价，有利于真实地反映市场汇价的情况。但有一个缺点，就是相关的配套措施没有跟上，致使人民币汇价一下子贬到近11元。汇率急剧变化对国内外产生了很不好的影响，既给进出口企业带来更大的风险和不确定性，又加重了国内通货膨胀的压力，影响了海外投资者的信心。有人说人民币贩值以后有利于出口，我看不见得。各国的经验证明，本国货币过度贬值并不能促进出口。出口能否增加不完全决定于汇率，主要靠产品的品种、质量和服务。在限制进口方面，也不见得能真正起到作用。即使如有

些人期望的那样，1美元兑换15元人民币，有的地方或部门还是会进口“奔驰”汽车。

---

① 外汇调剂市场，指从1980年10月以后，陆续在我国各主要城市设立的外汇调剂中心或外汇交易所。企事业单位可在这一市场利用留成外汇进行调剂。后期，个人和外商投资企业也可进入。1988年3月放开汇率后，调剂市场汇率由买卖双方根据外汇供求状况议定，与官方(挂牌)汇率形成了两种汇率并存的局面。1993年12月25日，国务院发出《关于进一步改革外汇管理体制的通知》，从1994年1月1日起，实现汇率并轨，建立以市场汇率为基础的、单一的、有管理的人民币浮动汇率制卑；建立全国统一的外汇交易市场，外汇指定银行为市场的交易主体。但继续保留外汇调剂中心，办理外商投资企业的外汇买卖业务。1998年12月，外汇调剂业务正式停办。

有鉴于此，江泽民同志强调要整顿金融秩序，首先要把汇价平抑下来，达到一个合理的水平，并且要相对稳定，避免大起大落。因此，在6月下旬，我和有关部门的负责同志研究了平抑汇价、中央银行入市干预的计划，准备从7月2日起进行干预。但是，中央6号文件一下达，7月1日，市场汇价就开始变化了，到7月9日，1美元兑换8.76元人民币，所以，准备采取的措施尚未实施。我从香港报纸上看到，有人预计内地外汇调剂市场美元兑换人民币的汇率会反弹。因此，我在7月8日就告诉国家外汇管理局，要准备进行干预，不让汇率反弹到9元以上，也不要降到8.5元以下。可惜国家外汇管理局没有经验，到10日汇价反弹到9.21元时，各地束手无策。在11日，我们把17个外汇分局的领导请到北京，研究入市干预的方案。7月12日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日子，中央银行第一次入市干预外汇调剂市场、平抑汇价，抛了6000多万美元，全国共成交1.1亿美元，创历史最高水平。这一仗打得很漂亮、很成功。现在汇价已基本稳定在8.6元到8.8元之间，中央银行抛的外汇从占总成交额的三分之二，甚至是四分之三，降到现在占总成交额的30%到40%。

近几天调剂市场汇价基本是平稳的，但问题并没有完全解决，形势仍然很严峻。持汇单位对申请卖出外汇并不积极，中央银行抛的外汇比较多，而申请买入外汇的需求还比较大。有的持汇单位把外汇当做

炒买炒卖的资本，等待时机卖高价。持汇单位的外汇不抛出来，中央银行受到的压力相当大。一方面，投资需求拉动的力度没有减轻，进口的需求仍很旺盛；另一方面，一些持汇单位还在观望。因此，调剂市场的外汇需求大于供给。要稳定汇价，在一定时期内就要抛售外汇。说外汇调剂市场价格的形势严峻，问题就在这里。只有把调剂市场汇价稳定在9元以下，才能保证国民经济的稳定发展，这一决心是绝对不能动摇的。目前的8.6元到8.8元是比较合适的价格，因为在7月9日前，在中央银行没有干预的情况下，汇价曾跌到8.65元，这是市场形成的比较合理的价格。汇价稳定半年以后，国内外对人民币都有信心了，外汇调剂市场就可以进行正常的外汇买卖了。同时，由于今后对留成外汇实行限期使用的办法，外贸企业会逐步把外汇卖出，外汇供应量会逐步增加的。我们对外汇市场的干预，是完全符合市场经济规律的。现在明确一点：今年以内，中央银行还是要对外汇市场进行强大的干预。当然，在抛外汇时要精心组织，研究调控艺术，就是用最小的代价使汇价稳定在8.8元左右。同时，配套措施也要认真执行。该收的外汇要限期收回，该收的贷款也要收回。搞市场经济也必须执行国家的法律法规，不能搞外汇投机。同时，要整顿金融、财政秩序。如果以上工作做细了，相信会提高对外汇市场的调控艺术和调控效果。全国18个外汇调剂市场，哪一家在干预市场、稳定汇价工作方面取得成功的经验，我亲自为它庆功、发奖，并公开登报表扬。不过要达到以下标准：抛的外汇少，成交外汇数量多，汇价稳定，抛出的外汇要真正给急需用汇的单位。另外，就是要坚决打击外汇黑市。现在某些企业到处大造舆论，说要采取对策，联合起来搞黑市，要以9元以上的价格卖出它们掌握的外汇。所以，一定要打击外汇黑市，才能真正稳定汇价。

二、对当前外汇管理工作的基本要求

第一，要继续进行中央银行对外汇市场的适度干预，提高调控艺术，讲求调控效果，满足客户需求。

第二，要切实保证完成按市价收购上缴外汇的任务，该收的外汇一定要收上来，为实现市场调控创造条件。该压缩的贷款要压缩，该收回的贷款要抓紧收上来，要督促持汇单位卖出外汇。坚决执行留成外汇额度和现汇限期使用的办法。只要这样做，平抑汇价的外汇来源就

是有保证的。为了达到稳定汇价的目的，即使再动用结存外汇储备，也在所不惜。最重要的是外贸企业要在下半年把出口搞上去，把外汇收上来，不要再流失了。今年上半年，据海关统计，出口额比去年同期增加4.4%，但扣除“三资”企业的出口，一般贸易比去年同期下降了。上半年进口增加了24%，贸易逆差高达50亿到60亿美元，导致结存外汇储备下降。如果现在再不抓出口收汇，国家外汇储备将继续下降，就难以支持外汇调剂市场的稳定。外汇储备一旦降到100亿美元，那就很危险，我国的对外声誉将大大下降。今年上半年出口额为386亿美元，扣除外商投资企业和易货贸易出口不结汇部分，应收汇282亿美元，但实际收汇185亿美元，其余的不知到哪里去了。外汇在境外结算漏洞很大，这里名堂多得很。在境外花钱买个小公司，就可以把外汇存在国外。所以，外汇管理局加强外汇管理、防止外汇流失的任务非常艰巨，要坚决同转移外汇收入的现象作斗争，把外汇流失的漏洞堵死。还要加强对进口付汇的管理。去年进口支付592亿美元，进口到货505亿美元，还有近90亿美元不知道支付到哪里去了，货走了一年还没有走到中国！加强外汇管理、防止外汇流失，这是第二项任务。

第三，要加强对外汇市场的管理和监督，按照国家产业政策调控用汇方向，严禁场外交易，打击外汇黑市。

最近，我在考虑一个问题：国务院是否要发一个通知，暂停收购境外企业。因为我们现在还没有达到输出资本的程度，但是目前有大量资金外流，特别是流到香港买“空壳”公司，在国际上已造成不良影响。

另外，我们需要再研究有关携带人民币出境的问题。如果人民币大量流到国外，外汇又收不回来，就会形成资金外流。同时，非贸易外汇和旅游外汇也难以收上来。过去外国人到中国来，都要把外汇通过银行兑换成人民币，外汇交给国家。现在由于可以携带人民币出境，外国人可以从境外带人民币或者通过黑市换成人民币，可以不用外汇而用人民币支付在中国的费用。因此，要重新研究携带人民币出境的政策，要加强管理。同时，要严禁外币在中国流通。目前，在沿海地区，港币、美元等外币大量流通，对此要严格管理。

第四，要按照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建立全国统一的外汇市场体系，扩大外汇市场覆盖范围，实现全国联网、统一规则、统一报价、地区之间互相调剂的目标。我赞成明年取消外贸企业无偿上缴20%的出口收汇额度的做法，前提是国家不再提供平价外汇，用汇单位一律都在调剂市场购买外汇。当然，对于那些需使用平价外汇的单位就要由财政补给汇差人民币。但是，因为目前这一套监管制度还不完善，如果没有完善的管理，外汇就可能随便流失到国外。外汇管理部门要与有关部门密切配合，加强出口收汇管理，坚决制止违章境外截留外汇、资本外流和各种外汇流失现象。要制定一套周密的管理制度，保证外汇不流失，都到调剂市场上去买卖。关于非贸易外汇怎么进入到外汇调剂市场，请同志们再研究。最后，要加强法制建设，加快立法步伐。总之，要以改革推动外汇管理工作。

三、对外汇管理局提出“约法三章”

第一，严禁外汇管理部门及其工作人员倒买倒卖外汇或参与其他部门及个人倒买倒卖外汇活动。

第二，严禁外汇管理部门及其工作人员以调剂外汇权、审批权、外债监管权和机构管理权等谋求出国指标或收受礼品等好处。

第三，严禁外汇管理部门及其工作人员越权减免上缴中央的外汇，严禁越权审批对外借款、担保及境外投资。

这个“约法三章”是国务院、人民银行总行对大家的要求。

关于外贸出口工作和 汇率制度改革问题

(1993年8月11日)

这是朱镕基同志在听取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工作汇报后讲话的主要部分。

一、当前外贸出口工作中急需解决的问题

(一) 要解决外贸出口流动资金不足问题。外贸出口资金一定要给予保证，但首先要搞清楚究竟缺多少。要派人下去搞些调查，到一些重点出口企业和重点出口地区，把情况尽量搞清楚。只要是真正用于出口，而不是挪用搞房地产、炒股票、炒外汇等，资金要给予保证。此事请人民银行、外经贸部与国家经贸委、国家计委协商后提出意见。

外贸出口资金紧张与地方拖欠外贸专业总公司进口货款有关。这也是三角债的一种。要派人到几个重点地区做些调查，调查清楚后，可以考虑采取由中央银行给欠款地区增加贷款规模，同时对其所欠货款强制扣还的办法解决。

外贸企业自身也要积累一些自有流动资金，不能都靠银行。不能在自有资金这么低的情况下，还大量去搞海外企业和其他没有效益的投资。

(二) 要统一认识，共同做好出口退税工作。出口退税是一件很重要的工作，要抓紧做好。一是要尽量简化退税手续，二是该退的税一定要退足。如何简化现在实行的“两单两票”①手续，请国家经贸委牵头，会同外经贸部、税务总局做些调查，统一认识，实事求是地加以改进。与此同时，要继续坚决打击骗税行为。目前正在研究实施的外贸、海关、银行、税务部门的计算机联网工作要抓紧，争取明年1月1日实现全国联网。

---

① “两单两票”，指出口退税企业在办理退税手续时要求提供的出口货物报关单、出口收汇核销单和出口发票、增值税专用发票。

(三) 要加强对外贸企业的监督与管理。为了增加出口，提高经济效益，并防止外贸企业总经理个人说了算和因决策失误造成国有资产流失，大的外贸企业要尽快设立监事会，以加强监督与管理。监事会可考虑由外经贸部、国家计委、国家经贸委、财政部、人民银行等部门派人参加，每年开一两次会，主要是对企业的经营情况进行监督、稽核，对企业主要负责人的任免和奖惩提出建议。当然，在加强对外贸企业监督的同时，还要进一步落实企业的自主权。监事会不能干预总经理的经营决策权。

对外贸企业当前存在的内部管理不力问题要有一些解决办法。对业务员的权力要有所约束，不能让其损公肥私。对外贸企业人才流失问题要予以充分重视，采取切实措施加以解决。

此外，要帮助、督促有进出口自营权的生产企业积极完成出口任务。对连续三年未能完成申请自营权时所报出口额的自营企业，要考虑取消其进出口自营权。

二、汇率制度改革问题

外贸体制改革要与其他改革相配套。下一步外贸体制改革的重点是汇率制度的改革，实行汇率并轨，即在经常项目下，实行人民币有管理的可兑换。这一着棋下好了，全局皆活。我们一定要坚定信心，推进改革步伐。汇率并轨后对外贸出口有许多好处，可以解决当前外贸面临的许多问题，在国内外都会产生很好的影响。首先是不再存在无偿上缴外汇的问题，汇率变化主要靠市场调节，可防止因投机造成汇率大起大落；其次是鼓励政策简单明了，今后企业只缴所得税，对外贸企业的贷款优惠利率也没必要了。当然，汇率制度改革很复杂，涉及许多部门，需要各部门统一认识，积极支持，把可能遇到的问题想周到些，把对策意见具体化。

在外商投资企业、海外企业与国内其他企业目前还不能做到平等竞争的情况下，不宜过早地实行货币的自由兑换。当前，一方面要认真研究如何加强对外商投资企业的外汇管理、审查与稽核；另一方面，要加强对海外投资的管理，加强出口收汇监控，对到海外办公司的申请，一律停止审批。对外商投资企业投产后的管理，国家经贸委要抓起来，及时发现问题，制定政策。

关于外贸体制改革问题，请外经贸部吴仪①同志牵头，国家计委、国家经贸委、国家体改委、财政部、人民银行、税务总局、外汇局、中国银行有关领导同志参加，组成工作小组，做进一步的研究，提出方案，向李岚清同志汇报后提交总理办公会议审议。

---

① 吴仪，当时任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部长。

(1993年8月25日)

1993年8月23日至29日，朱镕基同志在内蒙古自治区考察工作，先后考察了海拉尔、满洲里、呼和浩特等地。这是朱镕基同志在满洲里海关听取工作汇报时的讲话。

对假冒伪劣商品要从严把关，你们这儿是最后一关，这儿把不住，就流向了国外，问题就严重了，影响到我们国家的形象。最近，我看到许多材料，是俄罗斯有关方面反映我们的假冒伪劣商品太多，严重影响了我们国家的声誉。

假冒伪劣商品危害极大，一定要卡住假冒伪劣的商品，不让它们过关。靠假冒伪劣商品，国家是发展不起来的，是繁荣不起来的，也是没有前途的。

如何解决假冒伪劣商品流向国外的问题？我想无非就两条。一是海关要从严把关，严格检查制度。现在你们可能人力不足，检查全部商品有困难，但可以实行抽查，对一批商品抽查几处。一旦发现问题，要从严处理，成倍或几倍地罚款，把出口假冒伪劣商品的人罚得倾家荡产。

二是通过各种渠道，让广大人民群众检举揭发，发挥“隐线”的作用，鼓励群众揭发假冒伪劣的行为。对于群众揭发并能查到实据的线索，要重奖揭发检举的群众，要逐步地形成全社会抵制假冒伪劣商品的社会风气和环境。

在打击假冒伪劣商品的斗争中，还要充分发挥公、检、法、司的作用，搞综合治理。



1993年8月25日，朱镕基在内蒙古自治区考察满洲里海关。左一为国家经贸委副主任俞晓松。

分税制将会促进广东的发展

(1993年9月16日)

1993年9月9日至16日，朱镕基同志先后在海南、广东省就实行分税制问题进行调查研究。这是朱镕基同志在广东省调研期间，与省委、省政府负责同志座谈时讲话的主要部分。根据党的十四大精神，中央决定在1994年进行一系列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的改革。其中，财税体制改革是最重要也是阻力最大的一项改革。广东省在此前实行财政包干体制时地方财政留成比例较大，因而对实行分税制存在很大顾虑。朱镕基同志在讲话中从大局出发，既坚持改革的原则，又对广东省提出的调整地方财政收入基数年等实际问题，采取适当让步等灵活办法，从而化解了矛盾，为在全国顺利实行分税制改革创造了条件。

这次我和李铁映同志带着国务院有关部委的60多位同志，受江泽民和李鹏同志的委托到广东来，传达、介绍、解释党中央和国务院关于抓住机遇、加快财税体制改革的总体方案。原来你们对这个方案的调整不大了解，主要是方案变动大，彼此没有及时沟通，因而你们顾虑很大。通过三次“交锋”或者说三次交流，以及会后各个层面交换意见，我也与广东省各方面的同志作了接触，相信对大部分问题已有了一个解释，但你们是不是放心了呢？我也不敢保证，恐怕还是不大放心。恐怕还需要一段时间，大家进一步交流，把问题搞清楚。而且通过交流，我们对这个方案也深化了认识。这次海南、广东之行，特别在广东，我们花的劲相当大。我们了解到你们的顾虑在什么地方、困难在什么地方、问题在什么地方，有了切身体会和感性认识，在具体实施时对方案可以做补充或修订。当然，在大的原则性修改方面，还要由中央决定，但一些具体的细节修改我们可以自己做主。因此，这次到广东来，对我们是个很大的帮助，对于如何在全国推进这项改革也是很大的帮助。广东的问题解决了，全国的问题就迎刃而解了。所以，我们这次来的意义是非常大的。

刚才谢非和朱森林①同志的发言很好，体现了广东顾全大局、维护整个国家利益的立场和精神。我想，在广东省委、省政府的领导之下，财税体制改革方案会逐步地、圆满地得到实现。同时，我也告诉大家，谢非、朱森林同志在同我们的几次座谈中，对广东的利益是非常维护的，立场是非常坚定的，可以说是“寸权不让”、“寸利必争”。他们是尽了最大的力量，讨价还价，据理力争。但我也完全相信，他们这样做的出发点，不仅是为了振兴广东，而且也是为了全国的经济发展。所以，我想我们这样几次“交锋”，是非常好的，对推进财税体制改革是有利的。下面，我讲几个问题：

① 朱森林，当时任广东省省长。

第一，党中央和国务院肯定，实行财政包干体制对广东的发展起了很好的作用，促进了广东经济的发展。如果没有这种体制，广东的经济不可能发展到今天这个程度。党中央让广东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是完全正确的。党中央没有任何一个同志否定这一点，更没有如外界谣传的“要批包干制”。我可以负责任地在此声明，让广东先发展起来、在广东设立经济特区等一系列政策，都是正确的。这既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中央领导对广东的关怀，也是为了促进全国经济的发展。如果因为现在要改行分税制而否定财政包干、贬低财政包干，那是缺乏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党的十四大已经确定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市场经济的意义，就是要规范化、法制化，要平等竞争。因此，在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必须逐步改革现行的不适应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各种经济体制，这也是正确的，是历史所证明了的。所有市场经济国家在发展过程中所发生的问题，在我们这里都曾经发生过或正在发生。所以，如果不考虑参照、采用市场经济国家的一些现成做法，并结合中国的特点，根据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创造我们的市场经济模式，许多问题就解决不了。事实已经证明，必须往前改革。改革，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逐步进行。在这个过渡时期，不能不带有过去一些旧体制的遗留，还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期，才可能把它们逐步地改过来。当前，正好是一个机遇，可以尽快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框架建立起来，然后把内容逐步充实，继续向前发展。这一点，应该很明确地

肯定下来。实行分税制同广东实行的特殊政策、灵活措施没有矛盾，你们对企业包干、对市县包干的某些方法也不一定改变。但我看以后最终是要改变的，因为那个做法不规范。不一定要马上改，可以有一个过渡时期。我始终认为，分税制并不影响财政包干，就看怎么灵活地去执行。



1993年9月13日，朱镕基在广州珠岛宾馆向广东省委、省政府负责同志介绍财税体制改革方案。前排右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兼国家体改委主任李铁映，左为国务院 副秘书长何椿霖。

我同意谢非同志刚才讲的观点，在旧体制向新体制转换过程中，有许多改革应该允许广东先走一步，先试一试。对这个精神我完全赞成。比如股票，虽然原来就已经有了，但真正成立证券交易所，还是在邓小平同志去年发表南方重要谈话之后。他明确地讲到，证券、股市这些东西好不好，允许看，但要坚决地试。对了放开，错了纠正，关了就是了，怕什么。当然，现在股票的问题也不少。只要是中央看准了的，不但可以让地方试，而且中央在财力、物力上给予支持；如果是中央看不准的，中央只能是允许试，只能给予精神鼓励，地方就

“自费”改革。总之，要区别条件，区别情况。但是，勇于改革、勇于先走一步的精神，始终都是应该提倡的。我可以代表党中央、国务院讲这个话，没有否定财政包干体制。

第二，这次实行分税制的目的，是为了解决中央财政的困难。目前中央财政十分困难，已经到了难以为继的地步。如果不适当地集中中央财政收入、加强中央财力，日子就过不下去，最终全国都要受害，都搞不下去。比如广东的金融状况，今后几个月如果没有中央的支持，日子会相当地难过，经济发展不起来。所以，必须按照国际惯例，按照市场经济的原则进行财税改革。目的无非是两条：一是中央财政收入要稳定，不能再挖了。现在的情况是，地方财政增长很快，中央财政却在下降，地方纷纷到银行挂账并且数目越来越多。中央财政背了巨大的赤字，大量靠银行透支、发国债、借外债。二是中央财政收入要适当地增加一点。目前，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例太低了。在发达国家，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大多在60%左右，而我国目前不到30%，加上地方上缴后还不到40%。但是，对于这一点我们非常慎重，不能搞得太急，因为地方财力也不宽裕，也很困难，还有很重的发展任务。经过反复考虑，我们决定第一年不改变中央和地方原来财政收入的格局，第二年中央稍增一点，第三年再增一点，以后逐年增加，比例慢慢提高。从绝对数来看，增得也不多。同广东算账的结果，从1994年到1997年，中央从广东多拿走的不过占同期全省财政总收入的4%；到2000年，才是5%。由于广东的“蛋糕”做得大了，我认为这不会影响广东的发展，反而会促进广东的发展。

去年，广东财政收入是223亿元，上缴给中央23亿元，已作出10%以上的贡献。由于广东经济发展很快，财政收入这块“蛋糕”发展得很快，而递增上缴的比例没有财政收入增长的比例高，到今年估计上缴中央的财政收入会下降到占广东财政收入总额的7%到8%。到1994年，我估计这个比例还会下降。即使加上实行分税制后从广东多拿走的4%，也不会超过1992年广东上缴中央的比例。我的意思是说，从包干制改为分税制后，中央从广东拿走的财政收入，不会超过1992年这种比例关系，或者就在这个水平上下。因此，这不会影响广东的发展。就是到拿得最多的2000年，根据测算，当年广东财政收入将达到

1197亿元，中央如果拿走109亿元，也只是占9.1%。所以，中央制定的这个稳步进行财税体制改革的方针是正确的，不会对各省市造成很大的影响。

这次分税制改革是按照全国统一的税制、一样的比例、一样的做法，不能有单独不一样的方法，更不能“一省一率”。中央这次是从各省市的财政收入中都多拿了一块。不多拿，怎么集中呢？同其他省市比较，究竟从广东是多拿了还是少拿了？我看，从广东不一定是拿得最多的。因为这次改革采取了非常简化的办法，并不是照抄外国的模式，把中央的税种搞得很多，把共享税搞得很多。实际上，中央税基本没有增加，共享税只增加了增值税一种，非常简单明了，容易执行。增值税收上来后又返回一部分，只是拿得多、返还得少。哪些省要拿得多，哪些省拿得少？工业比重很大，而第三产业又不很发达的省份，拿得就多。我估计，辽宁会被拿得多，因为增值税主要与工业有关系，同第三产业的关系不大。广东去年税收大大增加，主要靠第三产业，靠房地产和建筑领域的税收等，而这些税收是留给地方的，中央一点也没有拿。这方面的潜力是很大的。从近几年广东的情况看，这些税收昀增长比增值税快。我估计在分税制改革中，上海、辽宁的财政收入被拿走的比例会比广东更高一点。当然，从绝对数来看，广东的贡献还是比较大的。越是第三产业发达的地方，中央从那里拿走的财政收入的比例就越低。

第三，关于“账外账”问题。广东可能有个特殊情况，江苏也许更加厉害，就是光算“账内账”不行，还要算“账外账”。这是我们到这里后最深的体会。对这个问题大家最关注。那天，我同叶选平同志谈的也主要是这个问题，他说他也搞不清楚，下面究竟收了多少钱。因此，很可能出现这样一种情况：虽然中央拿走的增值税并不多，但下面很有意见，因为以前是不用收税的，不但所得税不收，连增值税也不收。像电力行业实行包干，不收工业增值税，让它留在企业里，捆在一起去发展电力工业。预算外企业也不收税。一些地方搞“投入产出总承包”，只包一个基数，把所得税、增值税、利润全包在一块儿。而且，许诺以后税也不增加，等于把增值税免掉了一部分。还有一些困难行业、负债很重的行业，干脆让它们用自己的增值税来还债，等等。总之，“账外账”很大，好像谁也说不清。算账时，说来说去说不清楚的就

是这一块。对这个问题，老实说，我做不了主，要回去请示。这次到广东来，最大的收获是对这个问题有新的认识、新的体会、新的考虑。广东方面的意见是，为了保持政策的连续性，这笔“账外账”就暂时不要收了，让它能够保持包干到“八五”期末，无非还有两年。刚才，衡非、朱森林同志又讲到这个意思。回去后， 我首先要把情况向江泽民和李鹏同志报告，恐怕中央政治局常委还要开会讨论。我现在只能讲点个人意见，请你们不要往下传，因为个人意见是可以变的。我倾向于，对于广东省委、省政府已经认账的政策，为了保证顺利推行税制改革，在“八五”期间可以继续延续这个政策。但是，税还是要收，收了以后再返还。不收税是一种极不规范的办法，任何一个搞规范的市场经济的国家，都不会这样做的。由税务总局把税收上来，不是退给企业，而是退给广东省。通过这样的办法，使你们的电力行业总承包和其他一些承包办法可以继续下去。这样做，有一个好处，那就是打消大家的顾虑。说实话，这个“账外账”究竟有多大影响，你们没有底，我也没有底。不如原则上加以承认，具体的再加以甄别。财政部的同志担心，有了这一条，广东的同志会不会打个报告，说所有的增值税都早已包掉了、免掉了。不过我想，企业纳不纳税，总是有账可查的，最起码是有台账。我这样考虑，无非是中央少拿一点，增强企业的活力，使地方有积极性。但是，要坚持分税制的主要基础，即坚持分设两个税务局、分别税种、分开收税的原则。国税局是中央单位，由中央领导，中央发工资，中央任命局 长。地方税务局是中央、地方双重领导，以地方为主。必须这样收税，不然中央的税收没有保证。这一条必须坚持。但为了保持政策连续性，我们可以采取灵活措施。那就是在一个时期内，先收了税然后再返还。变动不会太快，避免引起很大的震动。

第四，究竟是以1992年的地方财政收入为基数，还是以1993年的为基数？这个问题，我个人无权作出决定，因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讨论通过的方案，是以1992年为基数。当时主要考虑今年还有几个月，如果宣布以1993年为基数，不知又会出现多少在基数上做手脚的情况，结果就会把税制搞乱了。但是，到了海南、广东后，我个人考虑，财税体制改革方案本身有一条原则：地方在实行分税制前的既得利益格局还要保持。既得利益应该算到1993年，1994年才开始改税制。所以，1993年的利益不应动。以1992年为基数同以1993年为基数相比

较，前者中央从地方拿走的比后者多。如果考虑中央财政困难多的因素，以1992年做基数为好；若考虑地方财政困难多的因素，考虑到顺利推行分税制，减少阻力，则以1993年做基数为好，这等于把中央财政集中的时间推迟了一年才实施。推迟一年，以我个人认识来看，也不是什么太大的事情。如果今年我们全党能够认识一致，大力推进这一系列改革，中国的国民经济面貌就会发生极大的改变，真正实现持续快速健康的发展。因此，能换取这样的结果，推迟一年实行，中央财政少集中一点，问题还不是太大。但这件事不只广东一家，涉及全国各省区市。财政部也有不同意见。我这只是个人意见。不能我在做“好人”，让刘仲藜①同志做“恶人”。他做“恶人” 也是为了国家，我就喜欢这样的“恶人”。具体怎么办，只能回去再研究，很快就会有结果。但即使决定改为以1993年为基数，现在也不会宣布，最快也要到今年12月份，到时候做手脚也来不及了，以 防止发生作假和混乱。

---

① 刘仲藜，当时任财政部部长。

第五，实行分税制的计算方法。那天，会上有同志提出三个基数的问题，还有其他的一些问题。我考虑，分税制的计算方法越简单越好，不要搞得太复杂。即：在第一年保持地方的既得利益，不要去抠总收入、总支出是多少，算不清楚，恐怕连省里自己都搞不清楚。现在，不列收也不列支的东西多得很，怎么算得过来呢？最简单的计算方法，是增值税中央拿四分之三，第一年从中扣掉广东原来财政递增包干时上缴给中央的部分，余数全部返还。第二年把上一年的返还基数，乘上一个系数后予以返还。以后，逐年类推。总收入、总支出是你们的“隐私”，我不想过问，我只管中央拿多少、最后给你们返还多少。

趁此机会，我对大家说说，这次实行分税制还有一个小小的“尾巴”没有改掉。这就是中央各个部都有财政部给的一笔钱，由各个部再拨给地方，总共300多亿元。比如，计划生育经费、中小学教师师资培训补贴等共100多项。从地方收上来，由中央各个部再分下去，把事权搞得很复杂，打酱油的钱不能用来买醋。这种分钱方法，就是统收统支，应该改革掉。我们原来计划在这次改革中把这笔钱砍掉，对地方收上来的钱该返还的，一次性还给地方。但后来考虑到我们的机构改

革还跟不上，部门还这么多，部长到下面出差，基层提出许多问题，而部长手中没有“一把米”，就缺乏解决问题的基本条件。如果把这笔钱砍了，中央50多位部长比你们对搞分税制的顾虑还要大。考虑到这一点，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把它放到第二步，留待撤销有关部门时一并解决。因此还是保留了一些不规范的遗留问题，这次不是纯粹的分税制。但我们确定，今后这300多亿元不再增加，逐步解决。

另外，昨天你们税务局反映，由于营业税等改为增值税，实际上广东企业因此多负担税收30亿元。经过税务总局对账，情况是这样的：在这30亿元中，有15亿元属于广东本身的税收增加，不是由于税率提高带来的；在剩余的15亿元中，有9亿元是外商企业的税收增加。为什么增加呢？因为外商企业原来实行的是工商统一税，出口企业不是退税而是免缴工商统一税。现在改为增值税，都要征税，也实行退税，并不增加它的负担，只是方法规范化了，即这9亿元是把原来不收的税收上来，但出口后还要退回去。所以，只有6亿元是属于真正增加的部分。我已声明，我们原则上不增加增值税的税负，由产品税、增值税和部分营业税改为增值税，是按照国际通行做法，换算过来，只是技术上的变化，而不是要增加企业的负担。根据这条原则，这6亿元不应增加。怎么增上去的？要继续算账。现在，对改革以后增值税税率有不同的意见、不同的换算办法。财政部算的账是定为16%不会增加企业负担，而国家经贸委的账是定为14%不会增加企业负担。各种产业结构的不同，就会影响到换算率的不同。这个问题还可以再商量。我建议，在全国首先在广东选择几个不同产业结构的城市，比如广州、深圳、珠海、汕头等，请税务局分别按照14%和16%两种税率去测算一下，看看有多少企业增收了、多少企业减收了，得出总额。全国也进行测算，最后再去决定增值税的税率。我们不想利用分税制改革提高增值税的税负，那样对改革不利。这同分税制是两码事，搞不好，会有人把罪名归之于分税制，归之于改革，造成更大的麻烦。

最后，我希望在我们对许多问题基本达成共识的基础上，双方多做工作，为改革创造条件。我们回去后，将把在广东发现的问题很好地、认真地加以研究，提请中央决策并把结果及时向你们通报。这次我们带来的这些改革方案，要等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后才能正式实施。在此之前，虽然不登报、不作报告、不发什么材料，但我还是

希望广东的各级领导，以及这次参加算账的同志，认真学习、充分了解改革方案的内容。对那些以讹传讹的同志要加以解释，不要把分税制说得那么可怕，不要把分税制同包干制对立起来，不要以这个否定那一个。这个改革方案，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已经讨论通过，不实行恐怕是不大可能的。如果既要执行，又把方案说得很可怕，使得干部、群众有一种抵触、抗拒情绪，那将来工作就很被动。应当做好了解、研究、思考的工作，然后考虑怎么过渡，对有错误认识的同志要进行解释。这样，才能使改革顺利地推行。同心协力，克服困难，对我们的工作都会有利。我想，广东的同志是会这样做的。

关于实行分税制问题致江泽民、李鹏同志并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信

(1993年9月18日)

朱镕基同志到海南、广东省就实行分税制问题进行调查研究回到北京后，即致信江泽民、李鹏同志并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汇报了与两省领导商谈的情况，反映广东省希望中央在两个问题上给予照顾：一是1993年广东经济增幅较高，希望以1993年实绩为基数；二是对广东原实行包干制企业所减免的税收，在实行分税制后国家在原定承包期内给予返还。为减少新体制出台的阻力，顺利推行分税制改革，朱镕基同志建议对这两个问题都作出让步，并提出了妥善解决的方案。

泽民、李鹏同志并报常委：

受你们的委托，9月9日至16日，我和李铁映同志率国务院14个单位共60多位同志，到海南、广东，向两省主要领导介绍了财税、金融、外贸、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的总体思路和主要内容，并经过仔细地对账、算账，重点对实行财税体制改革后对两省可能产生的影响做了研究；同时还了解了两省贯彻中央6号文件的情况，对他们在信贷规模和资金方面的问题进行了研究，并商定了解决的意见。现将有关情况和意见报告如下：

一、实行分税制改革对两省财力的影响

实行分税制改革后，与财政包干制相比，中央将从两省多集中一部分财力，但多集中部分占两省财力的比重都不大。

海南省的财政包干制原定实行到1995年。按包干体制，预计1994年、1995年两年，海南可得财力约65亿元；实行分税制后，中央从海南省集中的部分，两年合计3亿元到5亿元，约为同期地方财 政收入的5%到8%。

广东省的财政包干体制原定实行到2000年。1992年的广东财政留成收入为223亿元，扣除上缴中央财政的部分后，地方财力是200亿元。

实行分税制后，从1994年到2000年，预计中央累计从广东比实行包干制多集中财力约240亿元，约占同期地方财政收人的5%。1992年，按老体制，广东上缴中央的收入占其财政收人的比例为10.3%；按新体制，在2000年，中央集中的财政收入预计仅占广东财政收人的9.2%。所以，与1992年相比，广东的负担比例并没有加重。

二、两省领导对实行分税制改革的态度和要求

海南省领导同志表示，坚决拥护党中央、国务院关于财税、金融等总体改革方案，并以此统一各级干部的认识，进一步研究贯彻落实的措施。对实行分税制后可能给海南财力带来的影响，双方也已达成共识。海南省提出，海南的基础设施比较落后，地方财力薄弱，希望中央今后在这方面多给予支持。

广东省的同志对搞分税制财政制度改革非常关心，对在广东省明年实行分税制时机是否成熟还存在一些疑虑，对分税制方案的内容也有一些误解。今年8月15日，广东省委、省政府曾向党中央、国务院提出，在2000年前继续实行包干制，或者缓冲一段时间，至少将包干制维持到1997年。

为了使广东省领导同志对分税制有一个全面、准确的了解，并进一步消除他们的疑虑，我们先后召开了三次有省委、省人大、省政府、省政协负责同志及省有关部门和广州、深圳、珠海、汕头、佛山市的负责同志参加的会议，介绍情况、交流意见。会下，我和叶选平同志做了长时间的交谈，并和谢非、朱森林①同志两次单独交换意见；李铁映同志也和林若②等省市领导同志做了个别交谈；国务院有关部门还和广东有关厅、局对口交换意见，财政部、税务总局的同志日以继夜地工作，认真细致地对账、算账；几位部委领导也分头与广东省政府及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汕头的主要领导同志交换意见。经过对账、算账和反复交换意见，广东省委、省政府认为从明年起实行分税制势在必行，但提出两个问题，请中央予以照顾。一是1993年广东经济增幅高，为保现有利益格局，希望以1993年实绩为基数。二是在实行包干制时，省里减免了部分困难行业的税收；有的企业搞投入产出包干，税也不收了；还有一部分预算外企业，过去没有按规定征

税。实行分税制后，以上这些企业负担要加重，要求国家在原定承包期内对这部分税收给予返还。

---

① 朱森林，当时任广东省省长。

② 林若，当时任广东省人大常委会主任。

三、我们的意见

对海南、广东两省提出的要求，我们做了认真研究，提出以下几点意见：

(一) 党中央、国务院决定广东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实行财政包干体制，起了很好的作用，促进了广东的发展，对全国经济发展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对此，应予以肯定。但从发展方向看，包干制毕竟是一种过渡措施。为了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规范化、法制化、平等竞争的体制，党中央、国务院决定实行分税制改革是完全符合改革方向的。当前应抓住机遇，先把市场经济体制的框架建立起来，以后再逐步完善。明年在全国(包括广东)实行分税制之 后，对广东省内财政包干遗留的一些问题，既要坚持全国实行统一、规范的税制原则，也要适当照顾原来政策的连续性，可由广东省按照中央的指导性意见，根据省内实际情况研究决定。

(二) 关于企业在包干制下减免税问题。鉴于这部分税收国家过去并没有收上来，为了避免对企业产生过大的震动，并减少新体制出台的阻力，建议凡是在中央6号文件下发以前，由省政府批准的减免税项目或企业，经财政部、税务总局重新审定，可以在原定期限内(但不超过1995年)实行征收后再返还的政策。

(三) 关于基数年的问题。原方案主要是考虑1993年还有几个月，为避免人为扩大支出基数，确定1992年为基数年。但这次到海南、广东考察了解到，1993年与1992年相比，地方财政收支变化比较大，如果到1994年用原方案执行返还，从保地方既得利益着眼，对海南、广东这类财政收入增长很快的省份，其财力确实被多上划了一些。为了兼顾中央和地方的利益格局，减少改革的阻力，建议改以1993年为基数年。由于上划税种单纯，今后几个月做手脚的可能性不大。

考虑到广东担负着提前实现现代化的任务，分税制改革后，中央在重点建设投资等方面对广东的支持不但要与其他省区市一视同仁，而且还应有所倾斜。对海南省的基础设施建设，中央也要给予支持。

以上几点不仅涉及海南、广东，而且是带有全国普遍性的问题，建议作为适用于全国各省区市的统一政策定下来，这对顺利推行分税关于实行分税制问题制改革会起好的作用。

妥否，请予审批。

(抄报国务院备负责同志，家宝①、培炎②同志)

朱镕基

1993年9月18日

---

① 家宝，即温家宝。

② 培炎，即曾培炎，当时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副秘书长。

分税制改革有利于中西部地区发展

(1993年9月25日)

1993年9月23日至28日，朱镕基同志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考察工作，先后考察了克拉玛依、阿勒泰、乌鲁木齐、石河子等地。这是朱镕基同志在听取阿勒泰地区负责同志工作汇报后讲话的一部分。

这次我们到新疆来，主要是要和自治区的同志们谈分税制问题。现在设计的这个分税制方案，是根据邓小平同志的思想，根据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四大报告中确定的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原则设计出来的。这个方案，可以说把市场经济国家普遍的原则和它的一切优点，都力图吸收进去，对它的经验教训也是考虑过的。方案是符合国际惯例的，也考虑到中国的特色。

实行分税制，总的精神有两条。第一条，是要保证中央有一个稳定的财政收入。现在的体制根本不行，每年都是地方收地方的税，中央收中央企业的税，实际上也是“分税制”，但这种“分税制”跟我们现在的方案不一样，它使地方的税收增长很快，中央的税收却在不断下降。这个日子怎么过？中央收税是为了保证军队的需要，保证党政机关的需要，保证重点建设的需要，保证国家外交政策的需要，还要支援别的国家，还要保证全国各地区发展的平衡。富裕地区要对贫困地区作些贡献，如果中央不收一点钱的话，那样会富的更富、贫的更贫。邓小平同志有一个思想就是共同富裕。说实话，这是实行分税制的最主要的理由。现在中央的财政状况相当紧张，我说个数字，你们就清楚了。广东今年的地方财政收人增加32%，中央在广东的财政收入却下降了11%。中央财政收入一年一年下降，赤字越来越大。中央军委作了决定，军队不许经商。不许经商又不给他发饷，军队的日子怎么能过下去？军队怎么能稳定？刚才讲的是中央的赤字，地方没有赤字。分税制就是要达到解决中央赤字这个目的。分开收税，你收你的税，我收我的税；你别挖我的，我也不挖你的。我们就是为了让中央的财政收入至少不下降，并不是想让中央多收多少，也不想挖地方多少。我们只想不要把中央这块都挖掉了，那将影响整个国家安定。



1993年9月25日，朱镕基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阿勒泰地区考察皮革毛皮工业公司。左一为新疆雄吾尔自治区党委副书记王乐泉，左二为国家经贸委副主任石万鹏，左三为阿勒泰地委书记陈建喜，右一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副书记铁木尔·达瓦买提。

第二条，中央财政收入总是要增加一点，总是要比地方增加得快一点。不然的话，中央怎么能调整地区之间的贫富差距呢？阿勒泰地区的同志刚才讲，要修额尔齐斯河水库，要开发矿山，要修县乡公路，这些没有国家支持搞不起来。如果中央不从富裕地区多收一点的话，哪儿来这个钱？只有多印钞票。因此，中央必须从地方多拿一点，但拿太多也不行。拿太多了，方案反而通不过，不能实行。所以这个方案出来后，我们第一个到广东，首先从广东开始。它要是反对，这个方案就没法实行。因为它今后是要对这个方案作贡献的，拿得太多，人家不干。它有它的战略任务，邓小平同志给它一个在2000年赶上亚洲“四小龙”的任务。其实，中央政府也就多拿一点，也就是在广东原来实行包干制的基础上再多拿它整个财政收入的5%。拿这个干什么呢？

无非就是支持中西部地区。所以，中央不能拿得太多。为什么要你们强调自力更生呢？中央想从富裕地区拿很多，但人家也有人家的困难，实际上是行不通的。应该说，分税制方案有利于比较贫困的地区，我想你们新疆应举双手拥护。

但另一方面，也不能太着急。第一年不能改变原有的利益格局。开始第一年就拿人家的钱，人家就不干了。只能从第二年开始，拿那么一点点；再过一年，稍微多拿一点；下一年，再多拿一点；越到后来拿得越多。只有这样才行。你想一口吃成个胖子，一下子把人家的都拿过来，把广东的钱拨给你们，那么你们将来都投我的赞成票，但广东就会把我的职务免了。所以，不能太着急。我们一再强调，财税体制改革一开始，要保持目前的利益格局。利益格局不变，以后随着地方的经济发展，中央逐步多拿一点，这是总的精神。同时，要把补贴和分税制分开。增加补贴是另外一个问题，不是分税制的问题。实行分税制的结果，是中央集中了财力。中央积累的财力越来越多，对中西部地区的支持就会越来越大。

全国要实行统一的分税制，如果哪一个省区市例外，其他省区市就绝对不肯干。比如说增值税，中央拿75%，地方拿25%，全国都这样。分税制是全国统一的，不能改变，没有一个地方能搞特殊。今天讲分税制讲不了那么详细，也不是短时间内一下子能讲清楚的。只是给同志们一个印象，分税制是合理的，这项改革是正确的，对新疆是有利的。你们明白了，就会拥护全国统一的分税制。这对你们有利，对全国也有利。

信息要真实、及时、准确

(1993年10月14日)

1993年10月11日至14日，全国政府系统政务信息网络第八次年会在北京召开。出席会议的有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政府办公厅及国务院有关部门办公厅的负责同志。这是朱镕基同志在接见会议代表时的讲话。

信息工作很重要，也很辛苦。你们都是政府系统主管信息工作的领导同志，你们的工作做得很好。国务院办公厅统计了一下，最近几年，各部门、各地区政府系统的信息机构每年给我们提供6万多条信息，其中1万多条都送给我们看了。我每天要看很多文件，其中包括了你们报来的信息。你们的信息为国务院领导同志的决策，提供了非常重要的依据。因此，我向同志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我非常重视信息，每天的文件即使到晚上12点我也要看完。为什么我每天必须看呢？因为离开了信息就无法工作。你不了解情况，你就不能作出正确的判断，就难以下决心。信息应该是我们正确决策非常重要的依据，没有信息就不能够作决策。但是，同志们，这个信息也得准确，如果信息不真实、不准确的话，我们作决策就可能出现失误。所以，我觉得至少应该给信息工作提出这样几个要求：

第一，要真实。得说真话，但我们有的人不说真话，报喜不报忧，这个不得了。信息无论如何要真实。同志们，你们来自各个地区、各个部门，各地区、各部门的工作在党中央、国务院领导下都很有成绩，工作做得很好，但是不能排除个别的地区、个别的部门、个别的人，报喜不报忧，说假话，假造统计数字。对这个情况，同志们一定要辨别。虽然很难，但总是要注意这一点，信息要真实。

第二，要及时，不要“马后炮”。“马后炮”对作决策没有用，要及时地把信息反映上来。比方说，昨天我看到大量的信息反映资金紧张，好像问题大得不得了。这个信息实际上已经落后了。今年上半年的资金的确非常紧张，是因为开了邪门、堵了正路，搞拆借，搞集资，发

股票，发债券，炒房地产，把银行存款差不多都给抽光了，因此银行贷不出钱。中央6号文件下达以后，我们堵了邪门、开了正路，把违章拆借的钱收回来一部分。这个钱都转到重点建设和农业上面去了，调整了结构，资金紧张的情况缓和了。8月和9月，人民银行放下去1000亿元基础货币。在这两个月的时间里，把重点建设全年计划50%的资金都放下去了，到9月底，重点建设资金到位率相当于全年计划的70%，这是历史上没有过的。农业秋收的资金提前到位了，夏收没“打白条”，企业的流动资金也开始在发放。因此，现在再说资金全面紧张，就不及时了。如果你在7月份反映这个情况，那我们就要注意这个问题。9月底都已经过去了，你还说资金全面紧张，那就是“马后炮”了，已经不是这个情况了。

第三，要准确。现在有没有资金紧张的情况？还是有的。我们银行的工作还存在不少问题，该贷的也许没贷，不该贷的也许贷了，这个情况是有的。所以，你们在反映资金紧张的情况时要准确。什么叫准确呢？现在的情况不是全面的资金紧张，是有的工作还没有做到位，如对一些有效益的企业、有效益的生产支持得不够，没有及时地贷款给它们，如果反映这个情况，那就准确了。现在如果还说资金全面紧张，那就不准确了。昨天我看到一个报告说重点建设资金至今尚未到位，实际现在已经到位了70%，你还说没到位。你去问问重点建设单位，它们很满意嘛！所以，反映情况要准确，不准确的信息往往造成一种舆论，常常会误导我们作出错误的决定。

总之，信息一定要真实、及时、准确。

银行信贷要堵邪路、开正门

(1993年10月19日)

1993年10月19日，中国人民银行总行1993年第四次资金调度会在北京召开。这是朱镕基同志在会上讲话的一部分。

金融形势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迅速扭转，最重要的是刹住了乱拆借、乱集资风，然后两次提高利率，使储蓄存款上升，这三条实行下去，金融形势就缓和了，而且少发了200亿元票子；汇价稳定住了，物价恶化的程度抑制住了；过热的产业如房地产和规模过大的基础设施建设都放慢了，所以整个金融形势是大大缓解，见效很快。现在不能说乱集资已刹住，但乱拆借是刹住了。

也有问题。问题在什么地方呢？问题所在不是指导思想不明确，而是我们银行的工作不是做得十全十美，收回拆借搞得太厉害了。我们讲收拆借的时候，方针很明确，主要是针对正在参与搞房地产、炒股票的。对已变成钢筋混凝土收不回来的，不要硬收。拆借出去搞交通、能源的，或者提供给生产适销对路产品企业做流动资金的，不合法，应该收，但同时还要贷款给它们。堵邪路、开正门，不要走拆借，从正门走贷款。

我在今年7月的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已讲得很清楚，宏观调控不是全面整顿，而是结构调整，不是收。首先，在做这项工作时，雷厉风行是很好，银行系统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雷厉风行过，但在政策方面掌握得不够。这一收，恐怕大部分是把企业流动资金收上来了。因为搞房地产、能源、交通，炒股票，一借出去是收不回来的，如果硬要收，企业只能先把流动资金顶了债再说。其次，这一收把集资等来源都断了，资金无法调剂，市场陷于停顿了，这对企业的影响是非常厉害的。这次我在南京召开了有百货公司经理、工厂厂长参加的会议，他们反映这次收拆借影响相当大。当然，我们收回了大部分拆借，投入了重点建设和农业，对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起了重大作用；但也不得不承认，这造成企业的流动资金相当紧张。对这个紧张要具体分

析，一部分紧张是由于搞那么高的速度，生产出来的东西卖不掉、运不出去，没有效益，往仓库里存，“三项资金”猛增；但确实是有一部分生产适销对路产品、有效益的企业没有流动资金。这一点不能怪下面，政策完全掌握在我们手中，这就是我们的责任。所以，现在一紧，难以分辨谁有效益、谁无效益，确实存在一刀切的毛病。其中反映最强烈的是南京，银行开不了门。因此我带队去了南京，发现问题后，我认为要放。当然，不是无条件地放。当时讲得很清楚，基本建设要下来，速度要下来，乱集资不能再搞，在堵邪路这个前提下开正门。全年贷款规模在今年上半年都用完了，现在你不开正门，邪路又堵死了，还让人家活不活？因此我这次去，给江苏、浙江、安徽三个省增加了 流动资金贷款规模。现在看起来这三个省的问题解决得比较好，8月份，江苏情况开始好转，于是我们就推广江苏经验，按江苏的模式处理，把各省省长和银行行长找来开会，逐省核定并下达信贷规模、资金。但我发现我们银行内部思想不统一，工作做得不细，不解决问题。后来我就从广东开始，一个省一个省下去，碰到没有解决的问题就予以解决。每次下去都把各专业银行行长带上，因为银行对国民经济的调控作用太大了。现在看来，凡开了现场会的省区市都解决得比较满意，哪怕它的资金还是紧，也觉得满意。在北京解决不了地方的问题，要到当地了解现实情况，一个项目一个项目算账，最后拍板、解决。事实证明，不采取这种办法，就解决不了问题。

根据我们到基层了解的情况，我们统一了认识，决定还是要放。实践证明没有出毛病，放得还不够。当时我们说，“点球”到位，没有危险。我对这个问题也有一个认识过程，开始不敢让工商银行放得太厉害，因为有1989年的教训，就是怕生产积压产品，所以对企业流动资金还是卡得紧。现在看起来，企业流动资金紧张是一个事实，其中有合理和不合理的部分。不合理的部分，现在也不能让它马上下来，马上下来不得了。大家应该注意，现在国有企业生产下降的速度是很快的，这样下去是不利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必须考虑适应当前的情况。企业流动资金放了一点，没有危险，有危险就是通货膨胀。通货膨胀要“硬着陆”是不行的，这有教训。最好延长这种通货膨胀，同时把高速度延长一段时间，让它慢慢地下来，这是最大的成功。如果现在还扣着资金不放，那真要犯错误了。当然，不是瞎放，不是去

维持那么高的速度。现在速度下得很快，的确有资金上的原因。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我们少发了200亿元的票子，争取了主动，争取了时间。现在放正是时候，10月份是施工的黄金季节。

前一阶段，重点建设放得很好，但技术改造资金给耽误了。这是我的失误，我讲得不够。我一直讲技术改造优先，但没有把资金的数字讲出来，没把它落实到哪个银行多少钱。结果现在技改资金到位很差，把工商银行抠得太紧。所以，今天各专业银行提出的数字，我们都一一认账，没有危险，两个月要的钱一次给。

要求专业银行调度全国资金，又不给它留有余地，它怎么调度？请专业银行领导同志抓些具体事情，看看你们有没有本事调度全国资金，哪儿紧张往哪儿调。现在多给一些钱，让你们有调度余地，不要闹得揭不开锅。这个改革不能走回头路。另一方面，横向的拆借市场还得要发展。得让人民银行分行起蓄水池的作用，能把专业银行在各地区之间的头寸调剂搞活。这不是信贷规模，是为调剂头寸使用的，这可以弥补人民银行总行调度之不足。加快发展资金拆借市场，时间不要限在三天，三天周转不过来，时间抠得太严，谁都做不到，只要钱不跑到房地产里去，怕什么？我在南京与熊猫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负责同志座谈，这个厂的彩电有销路，但流动资金给压了，银行说它占压了许多“三项资金”，厂方说这“三项资金”占压是历史上造成的。这位负责同志说今年未增加“三项资金”，现在你硬要拿着这个指标说企业不合格，把资金拿走，它没法生产，生产减了三分之一，停了七条生产线。因此，我当场就决定，只要产品销得出去，工商银行就不要卡人家过去积压的产品，他需要贷多少就给他贷多少。我也给这位负责同志讲，如果银行不给你钱，你就向我告状。要加强横向和纵向的调剂，把资金搞活。使资金拆借市场再活跃起来，现在只有一条渠道，就是银行贷款。企业债券 也不让发了，但信贷这个门还半开半掩的，企业怎么弄法？我估计这次贷款规模安排下去后，资金问题就基本解决了，基本不会再喊资金紧张了，当然也不排除个别地方喊。

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1993年10月20日)

1993年10月18日至21日，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出席会议的有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政主要负责同志，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各有关部门的负责同志。这是朱镕基同志在会上讲话的主要部分。

从去年邓小平同志发表南方谈话以来，国民经济进入了一个高速发展的新阶段，取得了空前的成就。但是，在前进过程中也发生了一 些问题。这些问题在今年4、5、6三个月来势很猛，如果不认真解决，也会使大好形势发生转折。因此，中央采取了加强宏观调控的措施，在仅仅两个月的时间内扭转了这种局面。可以说，这些问题基本得到解决。但我讲的是治标，并没有治本，要从根本上加以解决，就要靠深化改革。

去年以来的形势变化，很值得我们深思。大家看一看外国的舆论，分三个阶段。对于去年邓小平同志发表南方谈话以后全国发展的形势，全世界一片叫好，赞扬中国出现了奇迹，很多敌对的言论也转变了。在世界经济萧条的时候，中国经济取得这样的成绩，很了不起。但从去年第四季度开始到今年上半年，五六月份达到高潮，舆论已经变了。他们认为中国经济已经过热，正在走着一个从膨胀到破灭的周期，现在采取任何治理经济过热的措施都已为时过晚。我讲的这些话，都是美国《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上的语言。

从中央6号文件下达以后，到7月底，舆论又有一个转变。他们认为中国采取宏观调控的措施取得了成就，大出意外，经济“软着陆”成功了，看起来中国还是世界上经济发展最有前途的国家。香港经过一段徘徊，在内地开始进行金融整顿时一片恐慌，认为中国内地实行全面紧缩，但我们一再宣告不是全面紧缩而是搞结构调整，香港受的影响非常小。从7月份以后，香港经济节节发展，股市节节上升。香港报纸现在都感到港股指数太高了。为什么股市这么繁荣？主要是美国和日本的游资进入香港。为什么进入香港？主要是看好中国市场。美国很

多大公司的董事长从去年以来都访问过中国。美国一个很大的投资银行，叫摩根士丹利，要把60%的资金投入亚洲，特别是投入中国，这对推动香港股市起了很大作用。我现在讲这些，是要说明形势对我们很有利，但千万要注意，别又让形势逆转。因为我刚才讲过，我们仅仅是治了标，根本问题并未解决，随时都有复发的可能。

一、宏观调控为什么这么快就取得成效

我自己也没有想到，宏观调控这么快就取得成效。首先是刹住了乱拆借，哪一次调控也没有这次这样雷厉风行。投资失控就是因为乱拆借，上千亿元拆借出去，投向房地产，投向股票市场。二是刹住了乱集资。这就把今年上半年银行存款急剧下降的趋势扭转了，同时也堵住了大搞基本建设的一个资金来源。这一条没有第一条做得好，因为集资的渠道太多，不像乱拆借那么容易刹住。乱拆借是一声号令就刹住了，谁也不敢以身试法，可以说基本上刹住了。三是两次提高银行储蓄存款利率，存款一下子上去了，银行增加了1000多亿元存款。这样，整个资金形势趋于缓和。

二、信贷资金投放上有保有压

现在有一种反映，说如今的资金形势比中央6号文件公布以前还紧张，说银行只收不贷、多收少贷，出现了令人困惑的资源配置劣化的现象。这些同志的看法，叫做“见木不见林”，没有抓住当前形势的特点。现在并不是这种情况。整个资金形势怎么会又紧张了呢？今年上半年日子确实已经过不下去了，6月份存款大幅度下降，大量资金通过乱拆借绕开信贷规模投下去了，房地产开发猛得不得了，农产品收购“打白条”。重点建设资金今年上半年到位率只有19%，就是说一年时间过去了一半，资金只到位五分之一。重点建设不上去，兰新复线、京九线不打通，生产的产品就运不出去、销不出去，“三项资金”占用大幅度上升。资金这么紧张，怎么没人喊？现在，资金结构有了很大调整，到9月底重点建设资金到位率达到70%，在短短的3个月时间里，把全年50%的资金一下到位，农业夏收没有“打白条”，秋收资金提前到位。到8月18日真正收回了400多亿元拆借资金，又统统投入农业和重点建设项目。不然，农业怎么会不“打白条”？所以，并不是全面紧缩，也不是只收不贷、多收少贷。上面那些说法都不符合实际情况。有些银行不贷，是无钱可贷。为什么无钱可贷？今年上半年搞得太厉害了

嘛！五六十亿元资金流到沿海地区炒房地产，绕过信贷规模把几百亿元投入基本建设，没有钱了嘛。看账面有几百亿元存贷差，那是假的，存款早已绕过信贷规模变成钢筋混凝土了，哪有什么存贷差？是靠中央银行发票子维持这么大基建规模的。

确实有一部分企业的流动资金相当紧张，但要分析原因，其中两个原因是银行工作的问题：一是收乱拆借收回了部分企业的流动资金。7月召开全国金融工作会议时，政策是非常明确的，即收回拆借的目的是整顿金融秩序，主要是防止资金继续绕过信贷规模投向房地产。只要你不继续投就行了，已经变成了钢筋混凝土、房地产的，收不回就不要硬收，可以让他们制订一个还款计划。二是有的银行对企业流动资金贷款和重点建设项目贷款发放不及时。我们现在并不是逼企业还债，通过拆借投入合理用途的，收了之后要马上再贷给它。这个政策是很清楚的。比方说，有一部分企业原来流动资金不够，今年上半年又没有正门可走，银行资金都投向炒股票、炒房地产，没有流动资金贷款，只好高利拆借资金来充当流动资金。把这种拆借资金收回来是应该的，因为乱拆借是违章的，但要马上贷给这些企业流动资金，而且要按银行利率贷，不能搞高利贷。如果拆借来的资金用于能源、交通建设，也要收回，由国家计委列入计划，按正规贷款继续贷给企业。这个政策也是明确的嘛！同志们，我们的银行就这个水平，但应该表扬银行的雷厉风行，到现在为止，我没有发现谁还在搞乱拆借。我已宣布今年7月7日以前的不予追究，7月7日以后谁搞就撤谁的职，现在还没有撤过一个人的职。但我们的银行还没有成为真正的商业银行，在收拆借资金的时候有点不分青红皂白，收了以后没有及时贷。为什么没有及时贷？没有钱，怎么贷嘛！银行开不了门，有的地方备付率只有0.9%，收回的一点钱先用于提高备付率以保银行支付，不是它不愿意贷。多收回的就400多亿元，而且其中很多是应该收回、不应再贷的。

现在很多企业参与炒股票、炒房地产，钱用的不是地方，挪用了生产资金。现在你催它们还钱，企业只好用生产资金来还拆借来的资金，然后再喊流动资金紧张。另外，这么高的工业发展速度，产销率又不高，大量占压流动资金，谁保得了！没有效益的速度，我们从来就不提倡。所以，对企业流动资金的紧张，应作一些分析。不要说成

是整体资金的紧张，更不要说成比中央6号文件下发以前更紧张。某些企业的流动资金是比中央6号文件下发以前紧张，但这是个别、少数、局部的现象。也确实有些有效益的企业，流动资金没有得到保证。银行工作是有很多缺点，这也与我们交代不清楚有关系，我们有责任，不能全怪银行。

7月份收了一个月的乱拆借，发现了里面的问题以后，人民银行派十个调查组去下面调查过这个问题。江苏是喊得最厉害的，因为它的基建规模增长最快，生产速度过高，产品也销不出去，根本原因就在这里。我们在7月底到南京，把银行、国家计委、国家经贸委的负责同志都带去了，召集苏、浙、皖的领导同志开现场会议。会上确定增加投放一笔资金，用于解决企业流动资金问题。回来以后，马上根据江苏的经验，在全国开始注意这个问题。在明确规模要下来、速度要下来、不能再乱拆借、不能再乱集资的基础上，保证大家生产资金的需要。只要是有效益的生产，都要保证。然后，我一个省一个省地研究需要投放多少，8、9两个月共发放再贷款1000亿元。我认为，这1000亿元下去周转起来，企业流动资金困难的局面会有好转。江苏从8月份开始缓和。现在有些同志反映的资金紧张状况，都是一个月、一个半月或两个月以前的情况。房地产项目有点困难，但没有停。据我们了解，没有一个房地产项目真正停下来，还在搞，只不过钱没有那么多了。现在把这部分乱拆借收回，用于重点建设，重点建设资金是到位了，但重点建设要把资金用到钢材、设备、工程队上，还有个过程。从这个项目转到那个项目，有一个周转过程。有人说我们做得不及时，我看相当及时。实际上宏观调控只搞了一个月，从8月开始放松银根。像第三季度这样放松银根，历史上都少有。我还是不放心，昨天召开了10月份的人民银行总行资金调度会。我现在差不多一个月要开两三次资金调度会。哪个地方喊得凶，我就研究哪个地方的情况，不喊的也照样研究。我们认为问题是不大的，但考虑到大家的情绪，又放了590亿元的基础货币。这590亿元今年可能周转不到一次，但也相当于1000亿元的贷款规模。

对于这个措施，在我们人民银行总行党组里面有不同意见。我们这个领导班子是老、中、青三结合：老的就是我一个，中年的两位，党组书记、副书记，其他都是“少壮派”，40多岁的年轻人。现在是年轻人

坚决地反对放，说宏观调控刚刚奏效就放松银根，会前功尽弃，这些钱肯定又得回到房地产和重复建设里面去，往仓库里去。我们这几次资金调度会都有激烈的争论。后来我定下来再放一点，放的这部分主要是供给各专业银行之间的正常拆借，是横向的资金调节。我的考虑是，明年要实行分税制、汇率并轨、放开价格等改革，都是大动作，应该创造一个宽松的环境。但是我现在也害怕呀，基本建设规模、生产速度还没有降下来，我是硬着头皮顶的。放的后果是很明显的：通货膨胀。这一点要跟同志们讲清楚，后果由我们大家来承担。不要光说资金紧张，我把资金放松了，将来造成通货膨胀，你们又说谁叫你们放的，那也不行。我们要统一认识，基于对形势的一种正确判断，共同承担这个后果，不能说风凉话。这次宏观调控一下子刹住了通货膨胀，说实话我也没想到这么快。我就讲宏观调控要制止通货膨胀不是那么容易，有一个滞后的效应。因为从去年到今年货币发行过大，前年才发590亿元票子，去年发1200亿元，今年上半年就多发了550亿元，发这么多票子必然有滞后的效应，所以我说通货膨胀会延续到明年上半年，至少要到今年年底，才能够制止。但没有想到八九月份物价就停止上涨了，8月份物价指数是15.1%，9月份物价没有再上去了。没有想到宏观调控、金融秩序整顿、抑制通货膨胀，见效这么快。

现在基础货币这么一放，见效快得很。这10多天，票子发了100多亿元，马上就要表现在通货膨胀上，第四季度的物价指数涨幅可能还要上去，你们要有思想准备。做任何一件事情，都要看到它的正面效果和负面效果。现在基础货币放一点，要让国有大中型企业的日子过得去，让人心趋于安定，社会趋于稳定，为改革创造宽松环境。另一方面，也要预计到由此导致的通货膨胀的加剧和延长。

三、现在突出的问题是市场问题

我今天讲这篇话的目的，就是要讲市场问题。江苏搞市场经济，反应灵敏，他们说资金问题缓和了，现在是市场问题突出了。江苏的乡镇企业很灵敏，很快感觉到这个问题。很可能出现两种情况，现在就要设法避免。第一种是通货膨胀继续发展，生产发展速度下不去，资金紧张，产品没有销路。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还继续投放资金，就会出现新的积压，就会发生通货膨胀，这个教训不能忘！一旦再造成大量的三角债，这个问题就很难办。第二种是如果不投放资金，不允许

制造积压，那就会出现滞胀。仓库里的东西销不掉，又不允许制造积压，企业的生产增长速度降下去了，企业亏损，人员下岗，这就叫“滞胀”。这也是不得了的！我看到了这个问题，在江苏又听他们反映这个问题，就召集了20多个各类企业开座谈会，更深刻地体会到这个问题。我们要不研究市场，就会走滞胀的道路，这个事情不好办呀！

市场问题又在什么地方呢？我认为重工业的市场，问题不会太大。因为迄今为止，我们基本建设投资的力度没有降低，两个月里投了50%的重点建设资金进去，就是调整了投资结构。房地产还会搞的，基本建设投资拉动需求暂时还不会减少。这是硬着头皮顶着，不敢一下子都撤下来，怕影响重工业。在近几个月以内，投资的需求不会降低，重工业投资的需求不会减少。但是，还有一个周期性需求的问题。现在最困难的是钢铁工业。从去年到今年上半年，钢铁工业发了一个大洋财，那个时候不提供预付款就没货，光鞍钢一个月就收预付款17亿元，全国钢铁工业一派繁荣。当时钢铁企业并没有很好地利用这个环境，而是把生产资金大量投向基本建设，摊子铺得太大，炒房地产，到沿海地区搞什么“窗口”。这几个大钢厂我都去调查了。鞍钢我是1991年去的，困难得不得了，当时我就只让他们搞齐大山铁矿，这是他们的命根子，其他不要搞，就可以搞到800万到900万吨钢。但是，不听老人言呀！他们没有矿山，还要搞什么1000万吨规模的钢铁厂，我看是1500万吨也不止。摊子全铺开了，没有钱，钢材又降价了，预付款也没有了，钱全垫进去了。现在怎么样呢？又 占用税款20多亿元，不交税了，情况比1991年还严重。这么搞行吗？如今，钢铁工业面临一个非常困难的时期。一个是基本建设铺那么大摊子，另一个是大量进口钢材，去年和今年进口钢材近4000万吨，不得了啊！钢铁工业不等到这三四千万吨钢材消化完，生产是上不来的。这个事情让我很头痛。我初步的想法，一是冶金工业现在要压缩投资规模，不能再铺摊子了，摊子已经太大了啊！二是要抓住这个好 时机着重调整结构，不要再去生产那些建筑用钢材了。三是要垫一点钱进去，不能让钢铁厂的高炉停下来，一停那就完了。恐怕要把相当大量的资金投进去，压在库存里，这个钱需要多少不一定呢。现在钢铁库存已经由2000万吨增加到2600万吨了，今年上半年库存已经上去了，还得上升，恐怕要突破3000万吨，那没办法！所以说，钢铁工业最头痛。

汽车工业是第二头痛。同志们，去年以来汽车需求是哄上去的呀。背着财政赤字还去买汽车，有些县市领导的车都换了好几代了，都是拿财政的钱去买的，企业亏损也到银行借钱买车，花几十亿美元去进口散件组装汽车。另外，大量地进口汽车，去年不是有好多汽车采购团都出去了，买回来的汽车不都压在仓库里吗？现在是银行借钱给它垫着呢。所有的汽车，不光轿车，库存都大量增加。今年上半年轿车库存增加了260%，卡车也卖不出去了，它有一个更新的周期嘛。现在吉普车也要停产了，“一汽”停产了，“二汽”也要停产了。汽车工业面临困难，外国人已经预言了，香港报纸也说，中国这次汽车工业的萧条，按照往年的规律，至少要萧条一年。所以，我觉得很多重工业企业，并不是由于投资力度减弱，而是由于周期性的需求减少，或者说是由于进口太多、积压太多、生产太多。

但是，我认为重工业总的看还是比较好的，最困难的是轻工业。内贸部写的报告太乐观了，认为现在的轻工产品市场是由旺转平，前景还是很好的。我不是这个看法，我看很快要由旺转平、由平转淡。现在一反腐败，公款吃喝一下子就下来了。过去那些暴发户现在赚钱也不那么容易了，哄上去的那些需求也不是那么牢靠了，像南京的彩电、热水器都卖不出去了。

总之，我最担心的是市场问题，我希望各省区市的负责同志研究市场问题，未雨绸缪。现在要看到“三项资金”占用正在上升，这个趋势很值得担忧啊！

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能维持像我们这么高的发展速度。我们的工业发展速度是百分之二十几、百分之三十，乡镇企业翻番啊。没有那么大的需求，人民生活水平也不可能提高那么快。另外，今年1月到8月全社会发放工资、奖金增长36.7%，一年的工资、奖金就增加了三分之一还多，这个是有据可查的，而实际上“小金库”发的钱根本没有统计进来。工资、奖金的增长远远超过通货膨胀，这是维持不了的。应该看到，这种分配是不公平的，亏损企业、离退休干部、公教人员欠发工资的屡见不鲜。所以说，这样的需求肯定不能持久，工资、奖金这样发下去还得了吗？

要解决这些问题，我认为，第一条，要把我们的注意力从基本建设转向技术改造。企业要赶快调整产品结构，抓质量、抓品种，尽快适

应市场的需求，调整自己的生产方向，抓企业经营机制的转换，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苦练内功，靠点真本事。厂长要老老实实坐下来练点内功，把企业的生产搞上去。第二条，要开始研究一点政策，我讲的是价格政策。我不是说现在号召大家一阵风都来降价，我是说要研究降价的问题。比如说汽车，汽车不降价是绝对卖不出去的。这里面 包括减税、让利等方面的政策配套。进口汽车要提高关税，国产汽车要降价。你那么高的国内价格，比国际市场价格都高两三倍，那人家不走私啊？什么电冰箱啊、彩电啊，价格要降下来，看能不能薄利多销。大量积压是搞不下去的。但还要慎重，要根据市场情况及早研究，不能一哄而上。第三条，要狠抓出口，打开国际、国内两个市场。去年以来，出口在萎缩。据外经贸部测算，我们的外汇储备最高峰是去年6月底，为254亿美元，到今年年底可能只有150亿美元了。外汇储备下降，在国际上的形象是很不好的。为什么呢？出口速度越来越下降，而且主要是“三资”企业出口，国有企业出口没有增加反而在下降；而进口在猛增，这怎么得了！所以，要赶快组织出口。现在不少外贸公司在炒房地产、炒外汇，不搞进出口了，那怎么行啊？ 对此有两条措施：一是今年还有两个多月，昨天我们决定，对于外贸出口收购资金给予充分保证，多收一点，多出一点。二是明年汇率并轨，对外贸企业出口会有很大的推动。第四条，要适当地降低一点乡镇企业的发展速度。乡镇企业要把劲使在调整自己的产品结构、提高质量、增加品种方面。

四、努力打开农村市场

我认为这是最重要的一条，也就是这个会议的主题。从去年下半年以来，我们在农业上出现了一些新的问题。一是粮食价格放开以后，没有稳定粮价，出现粮价下降的局面。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拿出一个宏观调控的办法，能够稳定农产品的价格。二是从去年以来，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进一步扩大，农民种粮已经无利可图，不愿意种地了。这个非常危险，其后果还没有充分地表露出来。三是我们去年把注意力过多地放在开发区、房地产上面，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农业。过去用于粮食的补贴，在粮食价格放开、补贴撤回来后，用于其他的地方去了，而不是用它来发展农业。我们应该注意到，所有的发达国家都是要对农业进行大量补贴，如果不补贴，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

很大，农民会活不下去。就像美国，只有几百万农民，负担了差不多两亿人口的吃饭、穿衣问题。劳动生产率那么高，还大量出口粮食，但是美国农民如果离开政府补贴，也还是活不下去。我们这么一个落后的国家，有八九亿农民，我们能够取消国家补贴吗？只有增加，不能减少。



1993年2月19日，朱镕基在山东省济宁市农村向农民了解生产、生活情况。

所以，我觉得现在如果我们对农业不采取一些根本措施，农业就会发生危机。这种危机由于我们明年加快深化改革，还会加剧。为什么呢？明年，价格改革要走第二步了，要放开煤炭、钢材、化肥价格。油价也得放开，原油计划内平价1吨200元、高价400元，而市场价是1100元到1300元。这样一个按计划管理的油价，导致石油工业萎缩，它没有钱搞勘探了。价格混乱，企业也不好经营管理。所以，明年无论如何要把油价放开。当然，放到多少可以考虑和研究，要规范化。

汽油和柴油马上要涨价，柴油涨价，农民还怎么耕地啊？所以，我请国家计委算了一笔账，就是把油价计划内平价取消，计划外1吨为400元，这比市场价格还差1倍多。油价恐怕要提高到800元1吨才行。考虑各种因素，明年物价的增长，粮价至少1斤要涨1角3分5，我觉得还不够。我估计小麦不涨到6角钱1斤就没有人愿意种地。如果不下这个决心，提高农产品的价格，稳定农民，稳定农业，我们的工业品在农村就没有市场。

大家回忆一下，实行改革开放，为什么会取得这样的成就？那是因为改革从农村开始，首先是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然后在1980年、1981年四次提高粮价。农村一下子就繁荣起来了。那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好办一点。再后来才有城市改革开放事业的发展。如果忽视了农业，改革开放就不可能前进，工业也不可能发展，工业品也没有市场。所以，我觉得今天应该下决心，提高农产品价格。怎么提高？那无非是定购粮按国家定价，使农民有利可图。比方说，增加中央储备粮，银行拿钱，财政部出利息，按6角钱1斤把农民的粮食收上来。农民手里的粮怎么办？建立一个粮食平准基金，用这个基金去平稳农村粮食市场的价格。什么意思呢？只要市场粮价降到每斤6角钱以下，你就用6角钱收，那不就稳定了吗？这个差价和利息谁来补贴呢？那就是建立粮食平准基金。这个基金由地方建立，它的吞吐调控由地方负责，中央可以对粮食平准基金作一点贡献，补贴一点，但主要靠地方的财政预算，钱不会很多。有的同志说，那就变成全额收购了。对！就得把农民的粮食都收上来，才能稳定价格。我说还不至于出现这个情况，农民是卖跌不卖涨。如果把粮价稳定在有利可图的价格上，农民就不会把全部粮食都卖掉。口粮、种子粮、饲料粮，农民都得留着嘛，而且农民还得有一点周转才行啊，所以不会形成全额收购的情况。我觉得不下决心把粮价、棉价都提高，将来很难避免出现滞胀的局面。当然，这会增加城市居民的生活负担和一些农产品加工企业的负担。但是，我认为这个困难是可以克服的，也是必须克服的。希望同志们考虑一下这个问题，研究一下市场问题。同时，也研究一下如何振兴农业，我看恐怕最重要的是要使用价格杠杆。只有粮食、农产品的价格提高以后，工业产品的价格才能放得开。工业产品价格不放开，企业不能平等竞争，也无法考核它的效益。价格不放开不行，价格不放开，没办法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树立全民环保意识

(1993年10月25日)

1993年10月21日至25日，第二次全国工业污染防治工作会议在上海召开。出席会议的有国务院工业部门环保司(办)负责同志和综合经济部门有关负责同志，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环保局局长、经济委员会(计划经济委员会、生产委员会)主任，各省会城市、计划单列市主管工业或环保工作的副市长、环保局局长、经委(计经委、生产委)主任，企业代表、特邀代表等。这是朱镕基同志在会议闭幕时讲话的一部分。

对工业污染防治工作，我有三点看法：第一，这项工作，是保护环境、保护自然、保护人类和造福子孙后代的事业，是很光荣、很艰巨的事业。第二，这项工作，既是技术性很强的工作，又是经济性很强的工作，而且与法制工作关系密切。第三，环保工作很有成绩。最近，中央电视台播放的《中华环保世纪行》，拍得很好，可以给全国人民一个很好的教育。从这部电视片中，大家都看到了陕西省铜川市工业污染的情况，我去过铜川市，确实是电视片中那种样子。同志们想想看，生活在那样的环境里，怎么能很好地工作、学习和生活？全国的环保工作者做了大量的工作，如果没有他们辛辛苦苦的工作，不怕得罪人，恐怕现在的环境污染情况还要更加严重。如果我们的环保工作不是这样有成绩，在很多地方改善了环境状况，我国环境污染继续恶化的状况也难以得到遏制。所以，我今天到会上来，向同志们表示崇高的敬意和衷心的感谢！



1993年10月25日，朱镕基在第二次全国工业污染防治工作会议上讲话。右一为国务委员兼国家科委主任宋健，右三为国务院副秘书长张克智，右四为国家环保局局长解振华。

对环保工作，我讲三点意见。

第一，环保工作与质量工作一样，要树立全民的环境保护意识。我们现在搞现代化建设，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有许多意识还不具备。没有这些意识，我国就不可能实现现代化，也不可能真正建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一些同志没有质量意识，没有环境意识，没有纳税意识，甚至连投资风险意识也没有，随便乱集资、乱投资，这怎么能适应我国建设现代化、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深化改革的要求？所以，强调环境保护意识非常重要。过去有一种看法，认为工业化初期的国家，没有资金搞环保，要牺牲环境，省一点资金来发展工业。我认为，这种看法是不正确的。造成环境污染后，再来治理污染，投资会更多；如果造成了难以挽回的损失，治理就很难。不要认为先发展工业、后治理污染的做法能够省钱，能够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不是的！例如，在开采煤炭问题上，如果搞大规模、现代

化的煤矿建设，劳动生产率高，即使建矿时投资多一点，但环境保护做得好，省去了生产中的治理费用，投资是可以补偿回来的。在煤炭的使用过程中，如果搞集中发电、集中供热，就不会造成现在这么大面积的污染。我国使用煤炭所造成的空气污染、酸雨的问题很严重，一些外国专家提醒我们要重视这个问题。有些治理污染的项目，眼下看起来投资是大，但从长远看很值得。所以，各级领导都要有环境保护意识，要搞工业就要有环保投资，就要采用现代化的、先进的技术来建设，就要按规模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同步的原则来办，不能怕花钱。现在一些同志有临时观点，只考虑短期效益，往往在处理发展经济与保护环境的关系方面瞎指挥，匆匆忙忙上项目，即使破坏环境、造成污染也在所不惜。这种做法是非常错误的，要采取措施加以制止。

第二，开展环保工作，一定要培养一支业务过硬、坚持原则、清正廉洁、刚正不阿的队伍。我最近看电视片《中华环保世纪行》，觉得安徽省马鞍山市的环境保护工作搞得不错，环保队伍确实做了很多工作。如果不培养这样一支过硬的队伍，环保工作就难以开展。当然，我们要进一步研究关于环保的政策、法规。目前已有不少关于环保的政策和法规，但还要进一步完善。现在主要是执行法规的问题，执行就得靠队伍，没有队伍是不能执行的，队伍不过硬也执行不好。

第三，要把环保工作与综合利用结合起来。有些同志认为环保工作是花钱的，不能创造效益，或者虽有社会效益，但没有经济效益。我看，这个观点是不对的。环保工作既有巨大的社会效益，也有一定的经济效益。如果把环保工作和综合利用结合起来，变废为宝，可以创造很大的经济效益。综合利用既保护了国家的资源，又充分利用了国家的资源，同时又净化了环境，可谓一举多得。我希望各有关部门联合起来，共同协作，把环保工作与综合利用工作搞好。

精心组织实施分税制改革

(1993年11月25日)

这是朱镕基同志在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机关全体干部职工大会上讲话的主要部分。

去年以来，财政部、税务总局和国有资产管理局的同志们做了很多工作，成绩相当显著。首先是我国的财政状况有了很大好转，1月至10月份收支平衡有余，结余92亿元，好于过去的年份。我想，这个情况还会越来越好。我在今年7月份的全国财政、税务工作会议上提出的“约法三章”，绝大部分执行得是好的，特别是在控制减免税方面有显著的成绩，因此财政增收，很多不必要的开支节约下来了。这当然要归功于党中央、国务院的领导，归功于中央6号文件的威力，但是，我们财政、税务部门同志的努力也是非常重要的。

其次是改革。从去年以来，我们在准备实行以分税制为中心的财政、税收体制改革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做得非常细致，既考虑了国际的惯例、各个市场经济国家成功的经验，也考虑了中国的特点。制定的分税制方案，得到了全国各地区、各部门的一致拥护，最后在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上一致通过。我看这是很不容易的。如果不是同志们做了大量基础的工作、细致的工作，很难做到这一点。这项改革，我们多少年想实行而没有实行得了啊！在党的十四大上，江泽民同志明确宣布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之后，这个方案才有可能提出。它是根据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提出的，没有这个理论就不可能进行这么大胆的改革。但是，实施这个方案比制定这个方案要难一百倍。同志们，这并不是夸张啊，要难一百倍呀！我们做了大量的工作，首先是到广东去做调查研究，征求意见。紧接着，我们又到十几个省区市进行调查测算。由于客观条件不同，情况毕竟不一样，有各种不同的类型。江苏、浙江是一个类型，山东是一个类型，辽宁是一个类型，上海是一个类型，西北地区是另外一个类型，天津从某种意义上讲也是一个类型。财政部的同志们忙着算账、谈话，不分昼夜。在这个中间我没少发脾气，我至今还感到内疚。后

来，我跟财政部的同志做检讨，我说：“你们这么辛苦我还发脾气，对不起你们！”他们说：“这次改革是有伟大历史意义的，跟着您一起南征北战，尽管挨点批评，但我们的心情非常愉快啊!”我听了以后，眼泪都要掉下来。我确实感觉到这次财税体制改革是国家长治久安的 基础，诚如江泽民同志讲的，是有历史意义的。从邓小平同志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领导我们实行改革开放以来，我们还没有进行过一次这么广泛、深刻的改革。尽管在制定方案过程中我们作了一些让步，但是框架已经树立起来了，机制已经建立起来了，现在就是一天一天地朝着预定目标前进的问题了。最难的是这一步啊，这一步奠定了基础，就会促进我们的国家走向繁荣富强。这是一个伟大的历史时刻，是邓小平同志的思想为这个改革奠定了理论和思想基础，他是旗手，是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为我们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江泽民同志亲自主持、决定这样一个改革方案，我们做了一点具体工作。在工作中，每一个重大的问题，我们都请示了李鹏同志。我和你们一起，都对这个方案的制定和推行尽了自己的责任和力量。我们是战友，我们参与了这个伟大的历史事件，我们作为共产党员尽了应尽的义务。在这里，我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向财政部、税务总局和国有资产管理局的全体同志们，表示我发自内心的、衷心的感谢！



1993年11月25日，朱镕基出席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机关全体干部职工大会并讲话。图为会后与财政部部长刘仲藜交谈。

这一次实行的分税制改革，或者叫以分税制为中心的财税体制改革，是这次财税、金融、投资、外贸、企业五大改革的中心环节。为什么呢？因为这五大改革真正触及地方利益的就是财税体制改革，它一改过去几十年实行的制度。我们不要去批判过去的制度，那个制度是符合当时的历史条件的，也是一步一步前进的。但是现在要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要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东西，如果还是以前那一套就要吃大亏，最后就要崩溃。这个改革触及地方的切身利益，但是要是不搞这个改革，就像一台发动机没有动力，经济就没法搞下去。所以去年以来，特别是近两个月以来，我花的时间最多、下的工夫最大的就是财税体制改革。现在准备实行的分税制方案就考虑到了这个难度，因此必须有中国的特色，要采取渐进的办法来进行。

改革总要有一个模式，机构、机制、制度都要按此建立起来。就分税制的目标而言，可以采取市场经济国家分税制的目标，但是要采取一种过渡的方式来补偿地方的利益，逐步达到既定的目标。这是中央的一种思路，现在证明是正确的。不采取这个过渡办法，我们根本就无法做到在两个月内全国各地区都拥护。分税制的目标是什么呢？就是要转换机制，适当增加中央财力。按照国际惯例，一些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中央政府的收入要占到财政总收入的60%，比60%高的国家还有的是，而它们的支出又只占总支出的40%左右，这也是一个规律。那么，中央政府多收的部分就采取转移支付的办法，按照各种系数、考虑各种因素返还给地方。这些国家正是用这个办法来维护国家的统一和经济的均衡。中央政府总要支持一些贫困的地区发展经济，来保持国家的统一和政策的完整。现在我国财政收入扣除债务，中央政府的收入只占30%还不到，而所占支出却超过50%，从哪里弄那么多钱来开支呢？靠赤字！赤字全由中央背了。中央的财政赤字一年一年往上加，怎么办呢？要增加发行国债来解决。今年发行300亿元国库券，结果售出310亿元，是当做政治任务才完成的。这说明我们的办法还是不行，要想办法让老百姓自愿购买。另外，明年有好多资金只能用来买国库券，比如说商业保险以及养老保险基金、待业保险基金的结余等等。明年凡是开支剩下来的钱必须用于购买国库券，不能拿去搞投资。邮政储金也要用于购买国库券，不得截留。这在美国也一样，美国的养老保险、年金等资金量最大的几项基金也是用来购买政府债券的。

所以明年要想多增加一点收入，就只有靠实行分税制改革，靠大家努力共同做好工作。但是中央还不能拿得太多，否则地方有意见，分税制改革就会遇到重重障碍，使你无法进行。我们现在准备实行的分税制是大家的一个创造，中央先收上来再退回给地方。这和国外的转移支付还不一样，他们是先多收了再返还一部分给地方，我们是收上来以后基本上又都返还给地方，中央没有留多少。现在算来算去，只要中央能够把增值税的四分之三收上来，中央的财政收入就可以达到占财政总收入的57%，接近60%的目标。但问题是，把增值税的四分之三收上来，中央的财政赤字是解决了，地方怎么办呢？因此，收上来还得退回去。怎么退呢？这里又出来个基数法，就是以1993年为基数，看看地方增值税的四分之三是多少，第二年基本上按照四分之三

的额度返还给地方，稍微加一点。假定1994年全国增值税比上年增长10%，那就在返还给地方的基数上加3%，中央从增量里拿大部分，地方留小部分。这个方案地方可以接受。这样以1993年为基数, 到后来中央就越拿越多了，到一定时候，1993年的返还基数相对就不太大了，等于最后中央把地方增值税的四分之三都收上来了，达到了中央的目标，也就是中央收入占全国收入的57%。我估计，这个目标要到2000年才能达到。但这里有两个问题：一是原来地方以为中央把增值税的四分之三拿走就不返还了，所以意见特别大，说那样地方就没法活了，实际上不是这样的；二是一些地方提出实行分税制，按原来的体制上缴给中央的那一块就不交了。那怎么能行？原来地方上缴的那一块有400多亿元，中央明年实行分税制只能增收95亿元。如果那样做，中央财政赤字不是又增加了300多亿元吗？现在是一个过渡时期，原体制上缴仍然要运行，这400亿元地方还得交，因为地方交的这400亿元是在1993年基数里的，没有变。地方原来能交，现在仍然能交，我们新拿的只是增值税增量的一部分，并不影响地方按照旧体制上缴。

需要说明的是，我们在后来跟各省区市协商时作了两个让步，这两个让步已经中央政治局常委和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了。一个让步是，有的地方违反国务院的规定，实行了所谓的“投入产出总承包”，把企业的产品税、增值税免了一部分。而按照新办法，免的这一部分没有进入1993年的基数，明年就得收上来，这样企业就感到很困难。所以对分税制的顾虑是很大的，这是某些地方反对分税制的一个重要原因。虽然它原来违反了国务院的规定，但要地方自己取消正在执行中的决定也不太合适。我们考虑再三，为了保持政策的连续性，减少推行改革的阻力，同意这些地方继续承包到1995年，但分税制机制仍然要建立，税仍然要收上来，中央可以根据各省区市政府原来确定的承包企业进行返还。从1996年开始不再返还，完全按新体制运行。第二个让步是，确定以1993年为基数。原来中央准备以1992年为基数，因为1993年还有几个月没有完，基数有可能做手脚，使中央该收的收不上来，中央当时也考虑到了这个副作用。这主要涉及沿海地区的利益，它们在1993年发展很快，财政收入增长很多，如果以1992年为基数等于1993年拿了它一大块，1994年拿得更多，使它们的利益受到很大的损失。以1993年为基数可以减小这方面的阻力，同时考虑到要做手脚也不是那么容易，所以中央就同意以1993年为基数。

现在弄虚作假的问题越来越明显。为什么呢？大家看9、10月份的税收全国平均比去年同期增长50%到60%，有的地区增长一倍甚至两倍，但是把产值增长、物价上涨以及财政收入本身的增长速度都考虑进去，这里面究竟有多少是非正常的，现在还不好说。一下增长这么多要提高警惕。这里我讲三点：第一，应该看到税收在9、10月份的大增长以及今后两个月的大增长是执行中央6号文件的结果，是执行全国财政、税务工作会议上的“约法三章”取得了成效，主要是把减免税收上来了，真正杜绝了随意减免税这个口子。多收税有什么好怕的呢？主要是要把账算清楚，什么是归中央的，什么是归地方的，至于怎么返还咱们再算嘛！所以，我们首先要正确地认识这个问题，多收了税不要害怕。我们的政策见效，工作见效，收税应该多。第二，9月份以前的银行信贷是很紧张的，9月份以后大大缓和，这个时候企业的欠税就交上来了。第三，这里面肯定有弄虚作假的问题。我们现在应该赶快想办法来防止有的地方弄虚作假，保证中央应该收的税归中央，否则我们财政就会感到困难。为此，我请财政部的同志草拟了一个电报，已经发出去了。现在看来，这个电报的措辞还 不够严密，也不够严厉。我下面讲的防止以1993年为基数弄虚作假的问题，请你们做记录，再发到全国各地区、各部门。

分税制改革是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个中心环节。为了充分调动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照顾地方目前的利益格局，党中央、国务院决定分税制改革以1993年为基数。为了防止各种弄虚作假行为，保证这项改革的顺利进行，国务院已经发出了《关于实行财政分税制有关问题的通知》，要求各地严格遵守财经纪律，严禁收“过头税”，严禁用不正当手段强制企业交纳历年“死欠”的税款。为了使各地全面、准确地了解分税制改革的内容，我再就防止以1993年为基数弄虚作假的问题，补充几点意见：

第一，要坚决防止利用减免税政策，虚增今年的收入基数，骗取两次返还。这次分税制改革，为了照顾地方政策的连续性，对中央6号文件下发以前各省区市政府批准实施的未到期的减免税项目或减免税企业，经财政部、税务总局审查后，予以确认，今年不列入基数，明后两年实行先征税、后退还的办法。这个办法已经照顾了地方的利益，因此，绝不允许各地再利用减免税政策虚增今年的收入，以抬高基

数。比如、有些企业已经搞了投入产出总承包，税已经减免了。现在有的地方为了抬高1993年基数，就让企业把税交上来，然后地方财政再返还给企业；同时，以减免税为由，再要求中央财政明年收税后重复返还。对此，财政、税务部门要严格进行审查，对重复申报、弄虚作假的，既不承认其为基数，明年也不再执行减免税先收后还的政策。

第二，1993年收回的“死欠”、“积欠”税款不能进入基数。“死欠”就是企业已倒闭，或者产品已报废，根本就没有能力交税，今年却采用转账或别的办法交了税，以此抬高基数；“积欠”是多年积累下来的老欠税，这部分税款是应该收上来的，但它是1993年以前欠的，不是当年的税源。“死欠”、“积欠”税款根本就不是1993年的税收，因此不能进入1993年的基数。

第三，不准收“过头税”，搞“寅吃卯粮”。凡税法规定应在下一年度征收的税款不准提前征收，如果提前征收了，也一律不准进入基数。要严格按照国家有关减免税以及外贸出口退税等政策执行，该归还的贷款应当及时归还，该退税的也要及时退税，绝不能为扩大基数而采取变通措施。凡不按政策规定而获得的收入，都不能进入1993年的基数。

第四，绝不允许强制银行给企业贷款交税，各家银行都要严格把关。财政、税务和金库管理部门要做好年终的对账工作，凡用贷款虚增的收入一律不做基数；没有入库的收入，也不能进入1993年的基数。

第五，今年5月1日，国家将商业零售环节营业税税率由3%提高到5%。按规定，今年商业零售环节营业税的24%归中央，76%归地方。凡挤占应上缴中央的收入，不能进入1993年的基数。

各地区、各部门负责同志要坚决贯彻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拥护改革，维护大局，旗帜鲜明地反对从局部利益出发的弄虚作假。要严格进行监督检查，切实制止出现的错误和问题。凡在基数问题上弄虚作假的，一经查出，国务院要严肃处理：一是要在全国进行通报，点名批评。二是要追究有关人员的责任，该处分的处

分，该撤职的撤职。三是要把违反规定的收入从基数中扣除，即中央财政在核定今年地方上划中央的收入基数时，剔除已经实行减免税政策的企业所交税款，剔除上缴的“死欠”、“积欠”税款，剔除地方未执行国家政策而征收的税款和应退未退的税款，剔除“寅吃卯粮”、收“过头税”以及收入混库①、错列项目的部分等；同时，还要进行一定的经济处罚。此外，各地1993年的财政收入，必须与同级金库的入库数一致。关于明年中央向地方返还税收问题，如果明年地方上划中央的收入少于今年，中央的税收返还也只能相应减少。总的原则是：既不能让老实人吃亏，更不能让弄虚作假的占便宜。还要指出一点，这次分税制改革方法明确，计算简单，所有基数问题上的弄虚作假，都是可以从税票上查出来的，千万不要“聪明反被聪明误”。为了维护法制的尊严，对弄虚作假、虚抬基数者，定要严惩不贷，勿谓言之不预也。

---

① 收入混库，指各级预算收入入库级次相互混淆，错误地将中央与地方之间、地方上下级之间和税种之间的财政收入混乱入库。

分税制改革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内容，关系国家的长治久安，关系今后的经济发展。希望各地区、各部门在行动上而不只是在口头上认真贯彻执行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的《决定》，自觉维护大局，共同把分税制改革搞好。

最后我想强调，要把认真学习《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作为当前的头等大事来抓。我们只有深刻地领会邓小平同志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才能把我们的改革搞好，把发展搞好。这一点，希望同志们一定要把它当做当前最重要的任务来对待。学习《邓小平文选》要按照中央的指示、江泽民同志的讲话，深刻学习，全面领会，正确贯彻。我强调几点：第一，要学得深一点。看看这个讲话是什么历史背景，邓小平同志过去是不是讲过这个话，过去是怎么讲的，现在有什么变化和发展。这样学习有助于更深刻地理解。邓小平同志讲话的特点，就是逻辑性非常强，思路非常清楚。第二，要全面地理解。比方说，去年以来在高速发展的过程中所发生的一些问题，都是由于没有全面地理解邓小平同志的思想。邓小平同志的讲话是辩证法，每一个方面都讲到了，既全面又有重点，只要你在工作中间都考虑到这些问题，就可以把握一个正确方向。如果你只是抓住一个方面去琢磨，

猜测这里面是什么精神，就往往容易犯错误。他既讲主要要反“左”，又讲要警惕右；既讲抓住机遇，加快发展，又讲要避免发生大的错误，大起大落。哪一个方面他没讲到？如果把邓小平同志的思想理解为就是一个“快”字，我认为这是贬低了邓小平同志的思想。发展是硬道理，低速度不是社会主义，这是确定不移的真理。但怎么发展，他在很多地方讲的是改革，他是改革的总设计师。不改革，能够发展上去吗？光讲高速度，不顾条件，不实事求是，能有高速度吗？我们历史上搞过多次，一下子高上去，一下子掉下来，高速度就是基本建设高规模，结果搞不下去了，就掉下来，最后高低一平均，又把速度拉下来了。所以，我们一定要全面地去理解邓小平同志的思想。第三，要正确地贯彻。我们每个人要学习做解决问题的能手，我希望同志们都要到解决现实问题中去锻炼。发表议论是很容易的，真正解决一个问题是很不容易的。大家都要学习如何成为解决问题的能手，碰到什么困难都能想出办法来，尽管这种办法对工作不是万全的，任何一个政策都有它的副作用。正如刚才讲的以1993年为基数，也是有副作用的，但是你想找一个没有副作用的政策是找不出来的。把问题解决了，你能够前进一步，你再解决第二步。这是我对同志们的一个希望。

财政部应该是我们宏观调控最重要的一个综合部门，当然金融也是一个最重要的部门。我认为财政和金融这两个部门，可以说是我们宏观调控的两个支柱。我这里没有贬低计划部门的作用，计划是总的宏观调控，现在计划的手段在哪儿呢？离开财政、金融还有什么手段呢？越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走，计划的权威就在于能够灵活地运用财政和金融这两个最重要的杠杆、两个调控手段。所以，同志们担负了非常重要的任务，你们是很光荣的。我希望同志们坚持优良传统，能够继续坚持原则到底，同时要改进自己的作风。希望我们大家团结起来，互相理解，互相谅解，共同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我完全相信，我们明年的工作一定可以取得更大的胜利。

在一九九三年 全国经济工作会议上的总结讲话

(1993年12月3日)

1993年12月1日至4日，国务院在北京召开全国经济工作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负责同志，国务院各部、委、局负责同志。这是朱镕基同志在会上的总结讲话。

全国经济工作会议已开了三天。大家一致拥护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和李鹏同志在这次会议开幕时的报告。对明年要进行的改革方案，大家表示赞同；对明年总的计划盘子，普遍认为比较妥当。在讨论中，同志们提出了一些值得注意的问题以及不少好的补充意见。我受李鹏总理的委托，把各个小组的讨论情况作个汇总，就大家提出的问题和意见作一些说明。我分别从改革和发展两方面来谈。

关于改革方案，大家认为：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所确定的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思路和国务院据此制定的具体改革方案，是一次历史上少有的、广泛而深入的改革。完成这次改革，可以基本上建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这是一个很好的历史机遇，我们应该抓住这个机遇，及时地推进改革，真正把我们的各项经济关系理顺，使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地发展。大家认为，这些改革方案的可操作性比较强，方案比较具体、比较配套，实施起来也比较方便。同时，改革方案考虑到了各方面的意见，既考虑了发达地区的意见，又考虑了发展中地区的意见，也考虑了不发达地区的意见，而且考虑得比较充分。这些改革方案的确经过了充分的酝酿，我们与全国近一半的省、自治区、直辖市负责同志，以及经济综合部门的同志当面交换了意见，充分听取了他们的意见。这次会议的分组讨论也是一个改革，把上述三种类型地区的同志放在一起讨论，使不同地区的看法得到交流，促进大家了解全局并兼顾各方面的利益，这样对改革方案的评论就比较全面了。许多地区，特别是沿海地区的同志讲，为了

全局的利益，自己应该多作一些贡献。对这些改革方案，大家总的意见是一致肯定的。

同志们反映的意见和建议主要有三条：一是觉得这次改革力度很大，难度也很大，自上而下的准备工作比较充分，但是自下而上的准备工作还不太够，因此，担心会不会搞乱。二是认为这次改革中央集权过多，影响了地方的调控能力和积极性的发挥。三是担心这次改革会加重国有企业的负担。我就这些问题讲几点意见。

一、关于改革问题

这次改革确实是空前的广泛、空前的深刻，内容非常丰富。要消化这些改革方案及其细节，需要下点工夫。这次改革看起来是全面推进，出台时间比较集中，其实许多事情已经做了或者正在做，并不完全是新的，也不都是集中在明年1月1日开始实行。难度比较大的，主要是分税制和税制的改革，还有汇率并轨的改革，这两项改革是比较艰巨、复杂的，而且有一定的风险。其他方面的改革已经在进行了，而且进展比较顺利。可以说，在党中央、国务院的正确领导下，全国上下同心协力，锐意进取，明年的改革出不了什么大问题。

下面，我分别来讲几项改革。

(一) 金融改革由三部分内容构成：一是把人民银行总行变成真正的中央银行。二是把现在专业银行中的政策性业务分离出去，把专业银行办成商业银行；同时，另行建立政策性银行。三是建立全国统一开放、有序竞争、严格管理的金融市场。

从第一个内容来讲，就是坚持在国务院的领导下，中央银行独立执行统一的货币政策，保证币值的稳定，把金融宏观调控的权力集中到中央。这个任务实际上已经初步完成。原来人民银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分行所拥有的7%的贷款规模调控权已收回总行，这完全应该，执行过程中也没有遇到阻力，执行的结果很好。与此同时，我们也给予人民银行各省区市分行应有的权力，比如金融监督、调查分析、横向头寸调剂、国库经理、现金调拨、外汇管理和联行清算。最近我们下达了200亿元资金给各省区市分行，作为一个“蓄水池”，调剂本地区专业银行之间的头寸余缺。各省区市分行做得很好，每个月都写一个

报告给总行，使我们能够及时掌握宏观调控的力度。今后继续这样转换职能，就能够发挥各省区市分行的地区调控作用。

从第二个内容来讲，把专业银行办成商业银行，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期才能达到，工作进程只能是渐进的。商业银行的几条原则包括自主经营、自担风险、自负盈亏、独立决策等。这只是个目标模式，要达到这个目标需要较长的时间。因为国有企业经营机制的转换，还需要相当长的过程，如果专业银行按照商业银行的原则独立经营，根据效益，独立决定信贷项目，那么，相当一部分国有企业就受不了。关于这个问题，明年我们朝着这个目标能走多快，国家经贸委正在和各专业银行一起研究制定具体的实施细则。

我认为，成立政策性银行没有任何风险，对中央、对地方都有好处，有百利而无一害。现在政策性的国家开发银行已经成立了筹备组，并草拟出了一个章程，印发这次会议征求意见。这个银行的任务，就是要承担限额以上的重点基础设施和基础工业建设项目。这些项目关系国家经济建设的命脉和后劲，覆盖面比较广，占整个全民所有制基本建设投资总规模的60%到70%。我们认为这一块最容易出问题，即安排资金时，资金留下缺口，所谓“自筹资金”往往落空，形成三角债。现在成立政策性银行，就是要在国家计划安排的基本建设规模以内，首先保证重点建设项目的资金，一开始就百分之百落实。成立国家开发银行，无非是进行总量控制，防止把同一块银行贷款规模“一女多嫁”，导致基建规模失控、银行贷款规模突破、票子多发、通货膨胀。今后，国家开发银行和国家计委、国家经贸委要配合好，在最初定项目的时候就把资金定下来。这并不是要打乱原来的渠道，也并不影响地方搞项目的积极性。我们认为，地方重大的基础设施和基础工业项目不报国家计委，自己来搞，难免会发生重复建设。现在某些方面已经过度了、超前了，这样下去不但国力无法承受，建成后利用率也不高，还会造成极大的浪费。成立国家开发银行不会伤害地方利益，相反，对地方真正需要搞的重点建设项目资金会保证得更好。我们力争国家开发银行明年一开始运作，就能够使资金得到平衡，避免产生新的三角债。最近发现许多电厂的自筹资金不落实，致使哈尔滨三大动力设备厂的生产周转资金都很困难。经查，中央的建设资金都到位了，只有地方的自筹资金没有到位。大量三角债的发生，也多是

因为地方自筹资金落空，要靠银行贷款，而银行又没有这块信贷规模。

进出口信贷银行①也成立了筹备组，正在制定章程。它主要是搞卖方信贷和买方信贷，鼓励出口，财政支持一块资金，这对推动大型成套设备出口有好处。关键是财政能拿出多少钱，能够支持多大规模的卖方信贷和买方信贷。总的说来，促进出口对中央和地方都有好处。

① 进出口信贷银行，即1994年成立的中国进出口银行。

农业发展银行是从现在的农业银行分离出来，搞政策性的粮棉收购和一些开发性的项目。这个银行准备在明年夏收以前成立，目前忙于秋收，不能分心。这个银行的筹备组马上也要成立了。现在的农业银行，在政策性业务分离出去以后，成为商业银行。同时，要在农村信用合作社的基础上有步骤地组建农村合作银行，国有商业银行可以向其参股，但不改变农村合作银行的集体合作金融性质。

(二) 外贸改革很多已经在做了，也没有什么风险。

(三) 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改革，江泽民同志讲是改革的重点和难点所在，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根本性的改革，但是只能逐步达到目标模式，明年准备先进行试点。李鹏同志说，结合实施《国有企业财产监督管理条例》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搞100个企业试点。国家经贸委、体改委、国有资产管理局联合起来搞100个，不要各搞各的。对国有财产的监管主要是防止国有资产的流失。大家顾虑监事会又会成为一个“婆婆”，干预企业的经营自主权。绝对没有这个意思，监事会只是受主管部门的委托，对大型国有企业进行监督。一年无非开一两次会，查一下国有企业的经营管理和资产负债情况，向它的上级机关提出奖惩意见，免得国有企业随便被卖掉，随便与外国人合营，资产随便流失。监事会绝对不干预企业的经营，不会成为一个“婆婆”。监事会成员不属于企业内部人员，不需要企业开工资，也不接受企业给他们的车马费。

(四) 外汇体制改革。汇率并轨是有点风险的。所谓“汇率并轨”就是取消汇率的“双轨制”。现在国家牌价1美元兑换5.8元人民币，调剂市场价1美元兑换8.69元到8.7元人民币。国家牌价已经不能反映实际换汇成

本和供求情况，应该取消，让市场来定价。当然，所谓“由市场来定价”，汇价也不能大起大落，否则外国人也不会来投资了，因此对这个市场也要进行管理，由人民银行负责管理和调节。市价涨到一定程度，就要抛售外汇，让它降下来；掉到一定程度，就要收购外汇，让它恢复到一个比较稳定的价格。汇率要有浮动，但浮动幅度不能太大，太大了不利于开放。现在看来只要人民币的币值稳定，实现有管理的自由兑换，外汇黑市就会越来越少。目前黑市的汇率比调剂市场还低，因为我们在调剂市场收购外汇还不是那么及时。实行汇率并轨，近期还只是在经常项目下人民币可以自由兑换外汇。外贸公司进口需要外汇，可以持有效凭证，拿人民币到银行去换外币。有效凭证就是指：进口许可证商品、配额商品，要有批件，没有批件不能进口；进口钢材等自动登记制商品是有计划的，要持登记证明和进口合同；引进项目的货物和技术进口是有合同的，要持项目批准部门的文件及相应的进口合同；其他所有符合国家进口管理规定的货物进口，只要持进口合同和境外金融机构的支付通知书，就可以到银行换外汇。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实行跟踪结汇。外贸公司创了外汇，必须换成人民币，在银行结算，银行按当天的汇价把人民币给外贸公司。有些创汇的外贸公司感到不放心，担心将来想用外汇的时候兑换不来外汇。我们的办法是出个“安民告示”。比如你创了10亿美元的外汇，结汇换成人民币，给你建立一个台账，承认你有5亿美元在银行里可以随时兑换，这样外贸公司就放心了。因为外贸公司现在的外汇留成比例只有40％，其余20％无偿上缴给中央，10％无偿上缴给地方，还有30％按市价有偿上缴，改革后建立了外汇台账，留成比例达到50％。这并不是说用汇超过50％就不让换了，50％用完了，只要持有效凭证，还可以拿人民币去换外汇。没有外汇的外贸公司要做进口生意也一样，拿人民币并持有效凭证到银行去换外汇就行了。这个办法是简便可行的，外汇调剂市场就只存在于银行之间，不需要客户直接进调剂市场了。非贸易外汇要持支付协议或合同去兑换。个人出国根据出国的凭证去换外汇。实行汇率并轨对外贸公司是极大的支持，取消了无偿上缴，1美元多拿3元人民币，相当于换汇成本每1美元可多收1元人民币。这个措施是从根本上推动出口，明年出口大有希望。

实现汇率并轨和经常项目下人民币可自由兑换，最大的风险是对外汇需求控制不住，特别是国内商品价格高于国际市场价格时，搞投机

的人就要换外汇去进口。如果我们拿不出外汇，汇价就要升高；否则，就要把外汇储备换空了。对这个风险怎么办？国家计委要对控制外汇需求作一个规定，对进口商品要进行宏观调控。比如钢材，现在钢铁工业企业的困难就是因为钢材进口太多造成的，去年进口一千几百万吨，今年进口两千几百万吨，加起来近4000万吨。我们要吸取教训。国家计委经过平衡，规定只能进口多少钢材，在计划总量之内的进口可以换外汇，超过总量就要“刹车”，不给换外汇了。自由兑换外汇存在一定的风险，但是为了促进出口，我们愿意承担这个风险。我们今年积累了调控外汇市场的经验，银行和外汇管理局都得到了锻炼，相信明年会做得更好。所以决定还是要实现汇率并轨，不这样，出口上不去。今年一直到现在为止，我们一般贸易的出口还是下降的，因此不采取措施不行。何时开始实行汇率并轨要严格保密，只能在并轨的头一天宣布。但可以告诉大家，风险再大也要并轨。

汇率并轨以后，外资企业怎么办？外资企业现在实际上是不结汇，如果允许外资企业到国家银行换外汇，这个风险相当大。去年以前的“三资”企业是创汇多于买汇。去年“三资”企业大发展，随便签合同，大量的产品销到了国内市场，外汇不能平衡。因此，现在如果贸然开放国内外汇市场，让外国人自由兑换外汇，我们担心外汇市场会一下子被冲垮。初步意见是，对外资企业先维持现行的办法基本不变，实行一段时间后视情况再做调整。总的来说，汇率并轨有点风险，但还可以承受，问题不是很大。

(五) 明年改革方案的中心环节是分税制和税制改革。这项改革的牵动面确实很大，有利益冲突。我们抓明年的改革，首先要把分税制和税制改革认真抓好。这项改革只能成功，不能失败，如果失败了，我们整个改革就有失败的危险。有的同志反映，分税制改革的方案太复杂，连专家都看不懂。我看不见得，现在的分税制改革方案应该说还是非常简单的。这个方案既汲取了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几百年的成熟经验，又照顾了中国的特点，考虑到了目前中国各个地区的利益格局，采取渐进的改革，着眼于首先确定目标模式，然后建立达到这个目标模式的机制。实行分税制改革，中央不可能一下子集中太多财力，要慢慢来，这样风险就比较小。不这样做不行啊！明年1月1日实行分税制，如果一下子中央财政收入就达到全国财政总收入的60%，把1000

亿元的财政赤字都给了地方，地方能承受得了吗？现在这个改革方案和美国、日本的税制比起来是简单的，也是由中国特色决定的。中国税收的特点就是流转税占的比重很大，其中的增值税中央拿四分之三，加上过去中央拿的关税和中央企业收入等，中央的财政收入就可以达到全国财政总收入的60%左右，其他税种基本上都给地方。像美国是联邦、州、地方三级收税，各有不同的税种，非常复杂。而我们的分税制是相当简便的，好执行。事权也好划分，中央的开支就是军费、重点建设拨款，还有中央和国家机关及事业单位的工资，主要是这三笔钱，现在一年大体上是2000亿元，其他由地方支出。按照这个办法，中央的财政收入可以集中到全国财政总收入的57%到60%，而中央的支出大概只占全国财政总支出的50%多一点。这样，中央集中的资金就可以平衡有余，就可以通过转移支付的办法，返还给地方，以调节地区间收入的不平衡，这是目标模式。这个目标什么时候能达到？大概要到2000年以后。现在中央一年差不多承担1000亿元的财政赤字，靠发票子和发国库券平衡。如果当前就做到中央财政收入平衡有余，就意味着把1000亿元赤字转给了地方，地方无法承受。因此在分税制改革的过渡时期，中央还得把基数年上收的四分之三增值税返还给地方，中央只留增量的大部分，使地方目前的利益格局不受到损害。

有的同志反映，中央返还给地方的是一块“死面”。实际情况不是这样。中央财政进行返还时，在返还基数的基础上每年都考虑有所增长，就是将相当于增值税实际增量的30%返还给地方，其余70%的增量归中央。中央并没有把地方财政收入全部的增量都拿走，从全国来讲，增值税只占到全部税收的40%左右，中央只拿增值税四分之三的增量的70%，相当于全部增值税增量的一半左右。地方财政收入增量的大部分仍归地方，所以不能说中央集中过多。明年通过分税制改革，财政部从整个财政收入的增量中大体多收95亿元。根据现在各地出现的弄虚作假的情况，这95亿元可能拿不上来了。就是多收95亿元，平均到每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也就是两亿元，当然，富裕的省可能多作点贡献。这样一个改革是非常温和的、渐进的，请同志们“高抬贵手”，因为这95亿元已经打到财政预算支出里了。以后“蛋糕”越做越大，增量越来越大，中央收的钱会逐步增多，有可能到2000年以后，中央财政收入可以占到全国财政总收入的50%到

60%。因此我们认为，这样的改革不会有大的利益冲突。我曾去了十几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这些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书记、省长、自治区主席、市长座谈。大家都能从维护大局出发，一致拥护分税制，愿意多作贡献，风格都很高。大家都觉得这个方案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原则，不会影响地方的经济发展。所以，只要大家思想统一，分税制改革不会有太大风险。

现在的问题是税制改革可能会引起一些具体问题，需要很好地重视。税制改革中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增值税的改革。过去的产品税、增值税、批发和零售环节的营业税统一改为增值税，都按增加的价值乘以统一的税率来计算。我们的原则是不增加企业的税负，不加重国有企业的负担，但是实际上不能完全做到，统一的税率只能使大多数企业的税负不增加。我们最后确定的增值税税率是17%，这个税率可以保证绝大多数的企业不增加负担，但是总有一部分企业的税负要增加。所以，我要给在座的负责同志打个招呼，叫喊税负增加的企业仅是一小部分。我想，我们还有别的政策来平衡税负增加的企业，即免收“两金”。总体来看，明年国有企业的负担不会增加，而是普遍降低。

再一个问题是要把对“三资”企业征收工商统一税改为征收增值税，这可能也会增加一部分“三资”企业的税负。要有一个补偿的办法，即对外资企业实行增值税以后，税负加重的企业到年终算总账，加重多少，返还多少，返还年限根据合同年限定，但最长不超过五年。新办的“三资”企业一律按全国统一的增值税征税。我们在各大城市都召开了外商座谈会征求意见，大部分外商都是通情达理的，他们表示可以接受。

还有一个大的问题，是增值税的计算，即以销售额减去原材料、外购件的价值为计税基数，按净增的价值乘以税率17%。为了避免发票作假，要用印钞票的办法印发票，只在一家印刷厂印，一系列防伪工作都要跟上去，一个环节脱节都会引起全国的混乱。因此，大家都要把注意力转到改革方面来，放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个长远的目标上来，这样才可以防止可能发生的风险。

二、关于中央集权过多，影响两个积极性发挥的问题

根据我刚才简要介绍的各项改革方案的内容，同志们可以看出中央并没有在现有的基础上集权过多，集钱也不过多。所谓“集权”，金融本来就由中央调控，历来如此，现在只是把违章分散的现象清理、整顿一下，并没有改变地方在经济调控方面的能力。我们正在筹建农村合作银行和城市合作银行，也是为了达到促进地方经济发展这个目的。在金融方面无论是成立商业性银行还是政策性银行，都是为了加强宏观调控、保护总量平衡，不涉及权力转移问题。财政分税制划分了中央和地方的职责和事权，并不影响眼前利益的格局。中央也没有收权，如果说收权，也只是把某些地方挖中央财政的权收上来了。如果税务局不分成国家税务局和地方税务局，中央该收的钱是收不上来的。今年1月到9月，全国的财政收入增加11.6%，地方的财政收入增加18%，而中央的财政收入只增加0.9%。不分开收税，中央的税收没有保证。关于宏观调控，大家要统一在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决定》的精神上，合理划分中央和地方的经济管理权限，充分发挥中央和地方两方面的积极性。宏观经济调控权必须集中在中央。但是，根据我国国情，也必须给予地方必要的权力，使其能够按照国家的法律、法规和宏观政策，制定地区性的法规、政策和规划；通过地方税收和预算，调节本地区的经济活动；充分运用地方资源，促进本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实行分税制以后，中央更有能力来支援一些不发达地区和老工业基地的改造，不然，贫富差距悬殊很难缩小。

现在大家有个意见，说按新体制中央多收一块约95亿元，老体制的还要照收，而且有的地区还要递增一些，有点想不通。对此，我要说明一下。刚才讲通过分税制改革，把增值税增量的一部分收归中央，根据测算，明年中央大体可以多收95亿元；原来按老体制上缴的约有400亿元，如果要免去这一部分，中央财政赤字就要增加300多亿元，因此，作为过渡，400亿元只好照缴。对此，各地区都通情达理，认为400亿元还是应该缴，因为都在每个省区市的财政基数里，大家对此没有意见。有意见的是上缴递增的那部分。我想只要通过实行分税制改革，中央确实多收了，是可以把按旧体制上缴的基数和增量都逐步免掉，使分税制能够更加规范化，这需要逐步达到。我与一些省区市的负责同志协商后约定，只要中央明年多收的部分比95亿元多，首先考虑把按旧体制上缴的递增部分免掉。

现在出现了一个问题，就是确定以1993年为返还基数年以后，一些地区弄虚作假。原来方案是以1992年为基数年，一些省认为1993年的财政收入增长比较快，增值税的增长尤其快，应该以1993年为基数年。中央考虑到地方的既得利益，同意以1993年为基数年，给地方返还更多一些，这有利于全国每一个省区市。当时，财政部担心一些地方会弄虚作假。从今年9月和10月的情况可以看出，确实有人弄虚作假、抬高基数。其手法是：第一，收“过头税”，“寅吃卯粮”，让企业把明年的税今年就交，于是1993年的基数就高了。第二，把历年的“死欠”、“积欠”也收上来抬高基数。收上来是好事，但这些根本不是1993年的税，是不能进基数的。第三，所谓“纠正减免税”，即原来已经同意企业减免的稞收，现在又要企业上缴，然后又返还企业。这叫“空转”，企业没有受到损失，但是基数虚增了。9、10月份，全国增值税增长60%左右，其中有的省增长一倍到两倍，如果这样搞法，分税制改革就会失败。国务院最近连续发了两次电报，要求各地立即纠正这种错误，并派了两个组下去调查。我希望各位负责同志把国务院发的这两个电报能尽快转发到各地市县，告诉他们不要弄虚作假。弄虚作假都是会查出来的，只要一查税票就知道你的税怎么交的。对查出来的，第一，全国通报，点名批评；第二，不管是什么人，不管官有多大，主要责任者撤职查办；第三，弄虚作假部分不计入基数，也不返还。我希望各地区的负责同志，要教育地市县的同志，在行动上而不只是在口头上拥护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的《决定》、拥护改革，不要做与改革背道而驰的事情。中央绝不会在税都收不上来的情况下搞返还。改革本来很有希望，利益冲突也不大，就怕不实事求是。

同志们还反映，出口退税过去由地方负担20%，以后增加的出口退税由中央来退，地方原来承担的基数还要保留，大家希望免除这个基数。我也认为可以免除，但这样明年中央又要少收几十个亿，实在负担不起。再说，明年实行这个办法也还是一个进步。今年地方负担了出口退税的20%，明年出口退税增长了，地方只负担今年的基数，所占明年退税的比例可能就只有10%了，有的地方连10%还不到。三年以后，这个基数和出口退税额比起来就不算什么了。而且，出口退税最多的省都是沿海地区最富的省，这些省应该负担一点，把中央的困难减小一点，让中央过渡一下。

三、关于有的同志担心改革会增加企业负担问题

对此，我们已经做了充分的考虑。首先，明年我们把国有企业的“两金”全部免掉。今年以前是折旧部分免“两金”，只有对个别行业，如对石油行业全部免“两金”。明年国有企业统统免“两金”，免掉150亿元，这样就大大减轻了国有企业的负担。另外，我们准备清理一下企业的债务，适当减轻国有企业的债务负担。但这里有个原则，国有企业的债务不能“一风吹”，“一风吹”只会鼓励今后更加大胆地借钱、大胆地浪费、大胆地不还钱，那样银行就没法开下去了，也不符合市场经济的原则。对长期亏损、扭亏无望的企业，我们赞成对它实行破产或者兼并，要认真实行《企业破产法(试行)》。据一些地方的同志反映，银行怕企业破产后冲掉它的债权。现在我们在预算里打了70亿元作为呆账准备金，用于破产的国有企业。企业破产后，把它的资产拍卖或兼并，留一些钱安置职工，其他的用于偿还税款、债务，确实偿还不了的，经过批准用呆账准备金冲掉。我们希望明年能使这个机制发生效益，让破产成为一种机制，督促国有企业的厂长、经理们很好地改善经营管理，使他们明白长期亏损下去是不行的。对一些确实有困难或因各种原因还本付息有困难的企业，可以根据情况考虑停息挂账或者计息挂账，但要严格地控制，分清政策界限。总体来讲，国家会从各个方面来支持国有企业，减轻它的负担，解决它的困难。我们相信，明年只要我们认真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的目标模式推进改革，大家同心协力，国有企业的情况会逐渐好转。



1993年9月24日，朱镕基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克拉玛依与南新油田钻井队的石油工人交谈。

四、关于发展问题

绝大多数同志都认为，明年总的计划盘子还是可以的。但是，有不少的同志表示担心，感到今年发展的基数很高，明年9%的发展速度不低，又出台了一些价格改革的措施，物价指数控制在10%以内怕做不到。我认为，这种担心有道理。

谈到这个问题，我先讲一下当前的宏观调控形势，主要是金融形势和我们应该吸取的教训。今年6月份，中央下发了6号文件。从7月份起，我们开始整顿金融秩序，把乱拆借、乱集资、乱融资的现象整顿过来了，这个成绩是有目共睹的。我与丁关根同志商量，把世界银行一个关于中国经济情况的报告①发表在11月29日的《人民日报》上，目的是告诉大家，你们觉得现在银根收得太紧，世界银行认为我们还不能放松。这份报告对中国经济的分析是比较客观、中肯的，对宏观调控所取得的成绩是肯定的。同时，它提出一个观点：尽管宏观调控取得了这样的成效，但不可估计过高，放松银根的时机没有来到。他

们是在批评我们过早放松银根。我们认为这个观点很值得注意，因为外面有些谣传，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以后又要新一轮大上基本建设了。我们虽然在7、8两个月收了乱拆借，制止了乱集资，基本建设的速度有了一点降低，但并没有实行全面紧缩。因为全面紧缩一定导致生产大起大落，必然引起社会不安定，所以这几个月来放松银根主要是调整资金流向，进行结构调整。7、8两个月收了400亿元乱拆借，少发了200亿元票子，使通货发行过多的情况根本上好转了。但另一方面，收乱拆借的时候不可避免地收了一部分企业的流动资金，因此许多企业反映资金紧张。从8月初开始，我一个月开两次人民银行总行的资金调度会，根据各地反映的情况不断投放基础货币，缓解企业资金紧张的状况。从8月初到最近，一共投放了2100亿元基础货币。基础货币不等于钞票发行，而是中央银行向各个专业银行的再贷款。再贷款变成贷款规模还要乘上一个系数，一年是2.5。这2100亿元在8月份才开始投放，在年内周转2.5次来不及，但周转1.5次还是有可能的。因此，我们估计2100亿元投下去，可以实现3000多亿元的贷款规模。这个放松是必要的，因为今年整个上半年只实现贷款规模1000亿元，看起来全年贷款规模没有4000多亿元是下不来的。去年贷款规模是3600亿元，但绕过贷款规模的乱拆借和乱集资差不多有上千亿元，所以去年实际贷款规模大体是4600亿元。今年批准追加后的贷款规模也是4600亿元，跟去年差不多。希望大家也不要突击花钱，贷款规模可以转到明年。我估计今年可能完成4300亿元，加上上半年的乱拆借、乱集资，也是4600亿元左右，跟去年基本持平，但结构大大调整了。

---

① 指世界银行驻中国代表处高级经济学家华而诚撰写的《当前中国宏观经济形势分析》。

我听到各地普遍反映，说重点建设资金的到位率空前的好，包括基础设施建设和技术改造资金，确实是根据国家计委和国家经贸委的计划项目，“点球”到位了，没有错过施工的黄金季节。另外，农业收购资金基本上保证了没有“打白条”。现在农业银行的备付金率大大超过7%，达到13%了，钱存在那里等着收购农副产品。但有些省该到位的地方财政资金没有到位，向银行多挂账70个亿。地方财政的钱该拿的还得拿，不拿，财政部要相应扣减其中央专项补贴资金。一定要把农

业保住。企业前一个阶段资金较紧张，现在看起来大大松动了，但是也不像世界银行报告所讲的那样太松。我们现在的银行机构是个庞然大物，在6月份以前，经济高速发展的时候，让它“刹车”刹不住。7月7日，我们召开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下死命令“堵邪路”，好不容易才刹住。刹住以后让它启动，让它“开正门”，也是难得不得了。现在的备付金率高到10%左右，按规定只要求达到7%左右，银行信贷并没有放得很松。

今天上午，辽宁省的岳岐峰①同志提出，现在松动银根，有大上基本建设的危险。我说，你讲得很对，但是现在银根并不太松，关键在于地方领导不要压银行贷款搞房地产、开发区，上大项目。当然，银行也要整顿作风，改革机制。银行这个队伍里面有些人作风不正，给点回扣，讲点关系，也可能把钱乱贷出去。请地方的同志还是把钱花在应该花的地方。最近，我看香港报纸说深圳、海南的房地产热又复苏了，我就很担心。广东省人大常委会通过一个法规，禁止炒卖“楼花”，这很好。钱只要不是流到房地产、开发区、炒股票这三个地方，产品不要过量积压在仓库就好。资金目前是趋于缓和了，只要基建一大动，资金马上就会紧张起来。现在的基本建设规模已经超过了我们的承受能力，再加码不得了。

---

① 岳岐峰，当时任辽宁省省长。

物价指数能不能稳定在10%以内，关键在于基本建设规模能不能控制住。现在定的这个盘子，如果基本建设规模不突破，特别是银行贷款规模不突破，乱集资、发债券得到控制，就不会有什么大的风险。物价多涨一点，人民群众也可以承受。如果再突破这个规模，那就不得了。因为今年的宏观调控只是治标，不是治本，只是使资金暂时缓和，为了避免大起大落，搞的是“软着陆”，根本没有解决基本建设战线过长的问题，也没有完全解决银行货币发行过多的问题。明年如果再突破，今年的一些问题就会加重，最后的结果只能是“硬着陆”。因此，我觉得实现明年计划和稳定物价的关键，在于基本建设规模不要突破。粗略估计，对于现在已经铺开的基本建设摊子，明年国家计委给的基建盘子还是保不了。就是说，如果不停、缓建一批在建项目，明年一个新项目都不能开。我希望大家一起来保证实现明年的计划，使

经济能够“软着陆”。这里最重要的是，大家同心协力制止基本建设规模的失控。要控制物价涨幅，就要控制基本建设，要控制基本建设，就要控制固定资产贷款，明年1580亿元的固定资产贷款规模一定不能突破。



1993年10月7日，朱镕基在辽宁省大连市中国华录电子有限公司考察。右二为国家计委副主任曾培炎。

这两年我们在价格的结构性改革方面，迈出了较大的步子，实践证明都是十分成功的，没有引起社会的很大震动。明年价格改革中最重要的是调整石油价格。曾经设想每吨原油价格增加700元、800元、900元三个方案。李鹏同志决策，还是稳妥一些，定在700元，逐渐接近国际价格，这一目标准备分两年来实现。石油调价以后，会影响农业生产的成本和农民的收入，因此，粮食和农产品也要相应提价。同时，还要采取一系列的配套措施。例如建立粮食风险基金，中央拿出一笔钱，补贴给地方，地方也要拿出一笔钱，共同建立粮食风险基金。粮

食提价以后，粮食主产区将大大受益。但对非商品粮地区和贫困地区，由于石油和农业生产资料涨价、农产品成本提高，还要实行补贴，补贴到户、到人。同时，粮食部门还必须通过吞吐粮食来维持议购粮食价格的稳定，否则农民还是要吃亏。所以，没有粮食风险基金，整个价格改革都不能实现。明年要想方设法使农民增收，不但足以补偿农业生产资料的涨价，还要更多地增加收入，这样农村市场才能打开，工业品的市场问题才能解决。现在不怕资金紧张，怕的是没有市场。明年就是要在开拓国外市场和农村市场上下工夫，开拓国外市场主要靠汇率并轨，开拓农村市场主要靠粮食提价，靠建立粮食风险基金。这两件事办好了，明年国民经济就全局皆活了。明年的物价指数，国家计委预测是9.9%，其中结构性的改革直接影响涨价因素为1.9%，包括间接影响大概为4%。其余5%以上都是由于今年涨价“翘尾巴”和明年自发涨价。总之，价格改革还要坚定不移地进行，抑制自发涨价还要靠控制基本建设规模。搞得好，物价指数可以控制在10%以内，搞得不好有可能达到百分之十几、百分之二十，我们务必要避免这种局面。

最后，讲一下财政赤字问题。我讲的赤字概念，包括软、硬赤字在内。所谓“硬赤字”，就是财政保吃饭的钱差一块；搞建设借的钱是“软赤字”。明年的“硬赤字”要增加400亿元，解决的办法是发1000亿元国库券。所以，明年国库券的发行工作是一项很重的任务，如果不完成这个任务，财政的日子无论如何过不下去。明年发行国库券既要参照市场经济国家的办法，又要考虑我国的特点，由财政部和银行来组织，使要买国库券的人随时能买到。希望各个地区的负责同志高度重视这个问题。

希望大家齐心协力，把明年的经济工作做好，使改革获得成功，使发展取得新的成绩。

关于平抑粮价的批语

(1993年12月12日)

这是朱镕基同志关于调运和抛售粮食以平抑粮价问题在一天内作的三次批语。

一、在新华社《国内动态清样》(附页)第258期《对江西米价上涨的不同看法》一文上的批语。

二、在新华社《国内动态清样》(附页)第260期《贵州省政府采取措施遏止粮价上涨》一文上的批语。

三、在新华社《国内动态清样》(附页)第261期《湖北有关部门谈武汉米价上扬原因》一文上的批语。

一

皓若①、美清①并致用①、官正①同志：

紧急调运和抛售粮食，以平抑粮价，是市场经济必需的措施，不是走回头路。要赶快行动，不要迟疑。今年粮食是增产的，收购进度也接近去年，库存是充裕的，涨价如此之高是不正常的，是可以而且应该平抑到合理水平的。限价不是有效办法。

朱镕基

12.12

---

① 皓若，即张皓若，当时任国内贸易部部长。美清，即白美清，当时任国内贸易部副部长兼国家粮食储备局局长。致用，即毛致用，当时任中共江西省委书记。官正，即吴官正，当时任江西省省长。

二

皓若、美清同志：

要赶快加强粮食调运，恢复票证也无补于事。请忠禹①、万鹏①同志召开紧急会议，会同内贸部、农业部，安排好粮、油及副食品运输，从现在到春节，优先安排抢运。

朱镕基

12.12

---

① 忠禹，即王忠禹，当时任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主任。万鹏，即石万鹏，当时任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副主任。

三

皓若、美清同志：

要迅速督促有关省市调运、抛售粮食，平抑粮价，否则，将引起严重后果。粮价涨得这么高，而且发生连锁反应，一些国有粮食部门还认为是好事，而不采取措施平抑粮价，这是错误的。并告韩杼滨①、黄镇东①同志，现在至春节前，抢运粮食及副食品，优先安排运输。(抄送关广富①、贾志杰①同志)

朱镕基

12.12

---

① 韩杼滨，当时任铁道部部长。黄镇东，当时任交通部部长。关广富，当时任中共湖北省委书记。贾志杰，当时任湖北省省长。

平抑粮油价格，稳定市场供应

(1993年12月25日)

1993年12月25日，国务院在北京召开全国平抑粮油价格、稳定市场供应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有关负责同志，国务院各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这是朱镕基同志在会上讲话的主要部分。1993年11月以来，国内市场粮食价格突然暴涨。当时粮食库存充足，粮食供求关系没有发生大的变化，粮价暴涨主要是通货膨胀对群众心理预期的作用，粮食市场又有人乘机炒作。12月18日，正在安徽省作调查研究的朱镕基同志接到国务院有关部门关于平抑粮食价格的紧急报告，与有关部门商定，下决心动用国家库存粮食，向市场抛售，要求国有粮店挂牌降价，尽快将粮食价格降到合理水平。朱镕基同志回京后主持召开了这次会议，对平抑粮油价格作了全面部署。

一、目前存在的问题

今天国务院召开一个紧急会议，部署平抑粮油价格、稳定市场供应的工作。为什么要开这个紧急会议呢？因为出现了一些紧急情况。就是从11月下旬以来，粮油大幅度地涨价，由沿海地区到内地，由南方到北方，波及全国，由此带动了对家电产品、金银首饰和其他商品的抢购。抢购主要发生在中小城市，目前还未抑制住。

我们没有惊慌失措，也用不着惊慌失措。但我如实地讲，这个问题是在往严重的方向发展。我这是讲全国的情况，不是局部的情况，也许有一些省没有出现波动，也许有的省波动大一点，有的省波动小一点。但从全国看，情况发展得相当严重，很值得注意。

这种情况我们是不是以前料到了呢？没有完全料到，特别是没有料到在我们库存最充足、根本不会出问题的粮食上面发生问题。没有想到，至少我没有想到。因为，我在11月份把主要精力集中在“票子”上，我怕“挤”银行，而不是怕“挤”商店。

不久以前，在全国经济工作会议上我讲了，我最担心的是市场问题，目前已经不是资金问题。现在看来，货币投放倒没有出什么大问

题，市场问题依然存在。这两年进口近4000万吨钢材，把国内的钢铁工业搞得狼狈不堪，钢材销不动了。我在全国经济工作会议上讲了，钢材就得收购，高炉又不能停，平炉也不能停，不收购怎么办?中国的事情就得按中国的办法办，完全按经济效益原则办，一下子还达不到。现在钢材价格回升了一点，但还是难销，货款也不能及时收回来。价格回升，是因为心理预期认为基建规模下不来。市场问题没有解决，又发生了突击抢粮食的情况，现在粮食价格抬得空前的高，而实际上粮食库存充足，一点问题也没有。

一般地讲，粮食涨价对农民有利。我们在全国农村工作会议和全国经济工作会议上已经决定，明年一定要提高农产品的价格，特别是粮食的价格，粮食、棉花调价的幅度都算出来了。如果不调价，第一，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日益扩大，不利于调动农民的积极性；第二，明年的农业生产资料价格由于上游产品特别是石油调价还会上涨，不足以补偿农民的生产成本。石油不调价，石油工业不能发展，要萎缩。石油调价，化肥、农药等农业生产资料都得涨价。如果我们不提高农产品特别是粮食的价格，农民不但无利可图，而且不愿种地了，因为收获的产品连成本都补偿不过来。

我们是准备提高粮食收购价格的，而且这个消息已经传出去了。但是，第一，这次涨价来的时间太早了，我们一切准备工作都未做好。农业是基础，粮食是根本。粮食价格的抬高会引起万物价格的上涨。我们讲提价是要从下一个粮食年度开始，是从明年夏收的时候开始。正因为如此，石油调价才定在明年5月1日出台。到那个时候，我们要同时宣布粮食和石油调价，使其在时间上一致起来。涨价来的时间太早，弄得我们措手不及，非常被动。第二，粮食涨价不但提前了，而且幅度很大，最高的是我们原定明年调价幅度的三倍。我们明年准备一斤粮食提价1角钱，这次涨价最高时达一斤3角以上，最近涨的也还是在一斤2角以上，还是大大地超过我们确定的明年调价幅度。

这样，问题就来了。比如说，城市居民是不是承受得了？我们原来考虑提高粮价是考虑到给城市职工加工资的。原定今年10月1日加工资，平均每个职工一个月增加58元。由于各地的测算方案太高，财政承受不了，现在又让各地重新测算，这样就把时间耽误了。我们发了文件，要求在今年年底前把增加的工资发到职工手里。今年物价指数

达13%以上，其中35个大中城市超过20%。这么高的物价，工资一点都不加，老百姓能没有意见？结果增加的工资还未发，就涨价。老百姓本来就有气，现在不是气更大了吗?

这还不完全是一个城市居民的问题，不同地区的农民，情况也不一样。我到安徽滁县地区，这是个粮食主产区，对粮食涨价欢欣鼓舞，粮价越高他们越高兴。但是安徽省还有缺粮地区，比如岳西是大别山区的一个缺粮县，靠从外面调粮吃，而且是走山路运粮，现在就非常的危险。他们没有多少库存，买不到粮食，也买不起粮食，搞得不好，到冬天大雪封山的时候，青黄不接，有饿死人的危险。所以，农民的情况也不都是一样的，不同地区农民的情况千差万别，要听听他们不同的反映，不能笼统地说粮食涨价对农民有利。即使是粮食主产县，也不平衡，县内还有城镇居民。城镇居民对粮食涨价也是怨声载道。

总之，这次粮食涨价来得太早，准备工作没有做好，措手不及。涨价幅度这么大，谁能想得到呢?

现在我们讲粮价的涨落，要看同一品种，不要拿小麦和稻谷比，不要拿早籼米和粳米比，也不要笼统地讲平均数，这些都是不合适的。希望每个地区拿同一有代表性的粮食品种算算涨价幅度，也就是拿普通老百姓吃的粮食算一算。好米不要限价，谁有钱谁吃。稳定价格是稳定大路货的价格，是稳定绝大多数老百姓吃的粮食的价格。吃得起好米的人如果认为价格太贵了，他也可能回头买杂交米。我所说的稳定粮食价格，不是要求所有的品种都稳定在一个水平，既无此必要，又没有这么大的力量，关键是要稳住普通老百姓吃的粮食品种的价格。这是绝大多数人民的利益之所在。

二、产生粮油大幅度涨价的原因

我在报纸上已经公开讲过了、分析过了，这次涨价是一种人为的因素、暂时的因素、心理的因素造成的。绝对是这样，因为没有理由要涨到这个价。粮食库存很充足，现在是历史最高水平；今年粮食没有减产，至少保持去年的水平，很多地区都增产；收购形势很好，定购超计划，议购少一点，总的水平没有降低。那为什么要涨这么高？这真是怪事。所以说，是心理的、人为的因素暂时把它抬上去的。

粮价是怎么被抬上去的呢？广东是带头的，沿海地区是带头的。广东由于“比较利益原则”起作用，粮食播种面积大幅度下降，农民不种粮食了，粮食当然就紧缺。现在粮食市场又放开了，进口粮食价格合适的时候吃进口粮，价格不合适就放手到内地去抢购，把价格抬起来了，就是这么个过程。

这些去抢购的人并不是私商，而是公商，是大亨。这些大亨的特点是赔了钱找公家，赚了钱归自己。比起炒股票、炒房地产来，抢购粮食是“小巫见大巫”。大亨们可以一掷千金，粮食价格一下子就上去了。

我们的粮食部门在这个时候，在放开粮食市场和价格后，也没有经验，采取什么方针还不大明确。谁的责任呢？我的责任。我在国务院主管经济工作，不怪你们，也不怪粮食部门。粮食部门辛辛苦苦，做了大量工作，还面临着队伍不稳定的问题，不是他们的责任。我们没有思想准备，粮食价格放开才一年，在放开以后，没有明确的方针，因此，粮食部门跟着一起抢购粮食，抬高收购价格。当然，不是所有的粮食部门都是这样，但也不是少数。粮食部门要完成收购任务，不提高价格就收不到粮食，跟着一起抬，价格就上去了。11月下旬，粮食收购一天一个价。

在这种情况下，国务院应当强调粮食部门不要抢收粮食了。更确切地说，只能按国家规定的保护价来收，收不到拉倒，不能跟着一起抬。事后来看，粮食部门跟着一起来抢，价格会越抢越高，农民的惜售心理会更加严重。

粮食部门不去跟着抢收有什么风险没有？我看没有。关键是销价要稳定，就是私人粮店涨价，国有粮店也不要涨，要压住台。这样，老百姓都会到国有粮店来购买，我们不惜售，敞开销售，销价就稳定住了，粮食收购价也肯定会下来。现在，大家要来总结这个经验教训。

我到安徽调查了城市粮店、农村粮站。他们的意见是，高价收进来再降价卖出会亏损。合肥的粮店是自己到农村收购粮食，买进的粮食都是高价，标二杂交米每斤7角5分。安徽省政府作出决定近日要降到每斤7角钱，粮店说降到每斤7角要政府补贴才行。我说，现在卖的粮食大多是去年收购的，粮店现在高进高出倒卖，乱套了。粮店不是从粮食系统批发粮食，而是去高价抢购、高价销售，还振振有词说不能

降价。而从整个粮食系统看，收购的稻谷每斤只有3角2分，而大米每斤卖5角6分，怎么会赔本呢？

这就给我们提出一个问题：粮食市场的价格放开以后，粮食流通采取什么方针？国家的宏观调控究竟起什么作用？现在没有一个明确的方针，更确切地说，没有明确的办法。一方面是沿海地区高价抢购粮食，另一方面，农民乐于卖高价，加上粮食部门参加抢购，几个因素凑在一起，粮价一下子就上去了。

另外，对税制改革，老百姓甚至有些干部也不清楚，谣传这项改革会推动涨价。我看新出台的“消费税”这个名字就没起好，老百姓以为是加在消费者身上的、是价外税，实际上不是，并且只有11种商品有消费税。这个问题没有早讲清楚，税则在国务院没有通过前也不好讲。更可怕的是，有人认为税制改革要增加企业负担，企业就要转嫁负担，因而所有商品都要涨价。因此，我们要反复地讲，这次税制改革从全国平均水平看，没有增加税负，不会推动涨价。个别行业、个别产品提高税负或降低税负总会有的，平均算不会增加税负。少数增加税负的企业叫得厉害，不要被这种假象迷惑，造成全面涨价的态势。我们已经考虑到这一点，采取另外一项措施，就是普遍地减免“两金”，国有企业的150亿元“两金”不收了。这对于那些降低了税负的企业来说，得到了更多的好处；那些提高了税负的企业，也可以得到平衡。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的改革方案能把百分之百的人都照顾了，做不到的。所以，也不光是粮食涨价，还有各项改革的声势推动物价上涨，造成恐慌。

这次涨价由于党中央、国务院及时决策，严令全国国有粮食企业挂牌降价，平价抛售专储粮。因此，很短时间内就稳住了粮价。

有的同志说现在粮价稳定了，还开什么会？着什么急？问题是粮价稳定在什么水平上？稳定在这么高的水平，我们受不了哇！就是说，计划明年1斤粮食涨1角，而现在已经涨了两角，这个情况绝对不允许持久，一持久就会引起涨价的连锁反应和一系列问题，所以我们要开紧急会议。我说一句引起大家注意的话：我们现在是在暴风雨的前夕。我的意思是，如果现在不采取措施把过高的粮价降下来，那么我们就会面临一场全面涨价的暴风雨。我看把问题看得严重一点好。我们完全有措施、有力量、有能力把粮价降下来。千万不要只看到粮食

涨价对一部分农民的鼓励作用，粮食涨价的连锁反应要引起我们的注意。大家要了解这个情况，仔细思考一下。心理预期的改变、社会的动荡，这两条就够我们呛了。同时，粮食涨价马上就会反映到票子上来，就是全面的通货膨胀。今年货币发行量控制在1650亿元，日子还过得去，还可以说基本实现了宏观调控的目标。但是，不抑制住粮油价格上涨的趋势，它就会带动万物价格的上涨，明年春节的日子就难过了。这些情况我不能不给同志们讲一讲。你们在地方，不一定了解全面的情况，你们不了解今年年初和今年春节的日子是怎么过的，紧张得不得了！我亲自到印钞厂去动员，开足马力印钞票。现在进口印钞机安装好了，今年别说发1650亿元票子，就是发到2000亿元，都没有问题，但是，发这么多票子如何收场？银行不怕挤兑，商店也不怕抢购，就怕人们的心理恐慌，就怕价格抬上去，老百姓活不下去，发生社会动乱。我们这些主管经济全局的人不能不考虑这些问题。你们在一个省的范围，也是一个全局，也得考虑这些问题。

三、目前怎么办

今天会议上发给大家的会议纪要，是江泽民同志、李鹏同志同意的，是党中央的决定、国务院的决定，必须执行。在此之前，中办、国办发了一个紧急通知，也有这方面的精神。今天发的会议纪要更具体、更明确。

中央的精神是什么呢？我们大家一起来统一行动，协调配合，马上把粮油价格降下来。这既是精神，又是命令。同志们！不下命令不行，否则谁都不肯率先降价，降价就吃亏，谁还愿意干。

每个地区都有自己的利益，你降他不降，他跑到你这个降价的地方来买，粮油都流到他那里去了，他赚钱，你赔本。菜子油就是个明显的例子。上海菜子油1斤卖2元6角5分，江苏是3元6角，浙江是3元8角。上海原来一天销300吨菜子油，现在是900吨，中央紧急给上海调了4000吨。上海的价格低，江苏、浙江都来抢，民工一买几十斤带回去。因此上海也要求提价，上海宁肯补贴市民1块钱，也不能让全国都到上海来买便宜油。就是这样，我们也未同意上海涨价。如果我们认为1斤菜子油3元5角是合理的，全国都涨上去，就再也下不来了。我们通知上海等一等，我们来协调全国的油价，全国各地一个价。一个价

是指标准价，产区和销区总有差价，各种比价、差价按惯例计算就行了嘛。我们定的是基准价，全国统一，谁也别吃亏，谁也别占便宜。

今天开这个会就是下个命令把粮油的价格降下来，统一地降，谁都不许违背中央的命令。降价的目标分两步走：第一步，元旦以前，全国把粮价降到每斤涨1角钱的水平，就是涨价前的价格或者说是保护价加上1角钱，这就是元旦以前的粮价。全国都是这个基准价，允许有合理的地区差价。但是，没有达到这个价格的地方不得往上涨，这句话一定要加上。基准价只能是降价的依据，不能成为涨价的依据。低于基准价的地区，也要相应地稳定或者降低价格。第二步，明年春节以前，还要降，因为明年国家原来定的是每斤只涨1角钱，现在标二杂交米每斤6角5分，等于已经涨过了，明年调价还有什么意义？明年石油调价，农民不又该骂我们了吗？过了元旦，我们再看形势，也有可能粮价就自动下来了。只要降低销价，我估计没有哪个私商、大亨还敢去抢粮食。粮食部门不跟着抢，就没有人跟它抢，最后农民还得按原来的价格把粮食卖给我们。元旦后粮价不自动降的话，我们还要下命令降，总之要为明年每斤粮食涨1角钱留点余地。也就是说，明年春节以前，要把粮价降到涨价以前的水平，然后到下一个粮食年度即到夏收的时候每斤再涨1角，同时宣布石油涨价，就是这个方针。有不同意见可以说，也应该说，但各地一定要统一行动，绝无例外。至于基准价定了以后，不同地区、不同品种的差价、比价问题，有关部门再协调。

对食用油价格，我没有绝对的把握，我看菜子油不超过2元8角1斤行不行？油总是好办一点，关键是粮食。你们要放心大胆地抛食用油，不够就进口，外汇现在好解决了嘛！东南亚一些国家都要求我们进口他们的油，我现在不担心进不来油，就怕未测算好，一下子又进多了，又出现“卖油难”。测算好了，定个数分到每个省，你们自己去进口就行了。

粮食降到1斤6角5分或6角6分，食用袖降到1斤2元8角，粮食系统是不是要亏本呢？不会亏。道理很简单，去年收的杂交稻是100斤32元，早籼稻是100斤28元，就只有这个价。现在高价收进来这么一点，明年再说，明年还要提价嘛。再一个，粮食定购进度完不成就完不成，不要再去高价抢。这里没有要粮食部门不抓收购的意思，按涨价前的价

格不管你们叫定购价还是保护价，该收还得收，但不能再去高价抢购。用抬高价格的办法去完成收购任务，那成了凑热闹了，这不行！要稳住，不要怕。粮食降价销售，不会亏。

同志们，退一步说，就是亏，也得这么干，中央和地方共同来分担这个困难，要稳住大局。让价格这么涨下去也得给职工补贴，不是一样吗？但是到了不得不给职工补贴或者增加工资的时候，问题就大了，动荡的面就大了。所以我说，第一是不会亏；第二就是亏，也在所不惜，吃不了大亏，一定要把粮油价格降下来。

这个会议纪要里还讲了一些内容，工商、物价部门要依法管理好粮食市场，这些问题都得很好地研究。

四、粮食购销体制改革的问题

刚才我已经提到了这个问题，就是在粮食市场和价格放开以后，国家怎么管理好粮食市场。这个问题现在还不是当务之急，当务之急是把粮食价格降下来。但我也想讲一点思路，大家回去研究一下，研究建立一种什么体制好。

对粮食系统在历史上起的作用要充分肯定。从去年放开粮价以来，粮食系统做了大量的工作，辛辛苦苦，现在又面临很多困难，为克服这些困难想了很多办法，为减少国家亏损补贴、保证市场需要做了很多工作，这些成绩应当肯定。今年开全国粮食厅(局)长会议时，我一再讲要巩固粮食系统这支队伍，这一点没有变。但是，从10月以来的粮油突发性涨价也给予我们很深刻的教训。这些教训必须总结，必须通过改革来吸取。

第一，粮食工作的重点是收购。粮食不抓在粮食系统手上，市场是稳不住的。我在报上批评过一些错误思想。认为粮食放开后就不能管了，这是天大的错误，没有哪个市场经济国家不干预粮价的。粮食问题大得很，韩国金泳三在竞选总统的时候承诺不开放大米进口市场，结果在乌拉圭回合谈判时别国对他施加压力，因此他就开放了。开放以后，国民游行抗议，他深深地鞠躬向国民道歉，撤掉了三个部长，最后十个部门大改组，把总理也换了，都是由放开粮食市场引起的。看来粮价再这样涨下去，我也该引咎辞职了。日本的首相细川护熙也是由于开放国内的大米市场，向国民道歉。日本开放还是有条件的，

进口大米便宜，国产大米很贵，它长期不敢开放，用高价来买本国农民的大米。现在开放了，廉价大米进来还是卖高价，跟国内大米的价格一样，然后把差价补给农民。这个做法跟我们的差不多。这就是说，任何一个市场经济国家对粮食市场和粮食价格都要进行干预。如果我们在这个问题上撒手不管、放任不理，是幼稚的。也就是说，我们不了解市场经济体制怎么操作，缺乏这种知识，缺乏实践，因此才会有这种误解，认为干预粮食市场是走回头路，违背市场经济规律。

怎么干预？不掌握粮源行吗？现在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确实存在，确实不合理，但让它自发地调整就不得了，会引起一系列的震动。不合理只能让它逐步合理，一下子合理怎么做得到？谁承受得了？关键是掌握粮源。

我到安徽省调查，发现把粮食分为定购和议购，问题比较多。滁县粮食部门就指责银行，粮食收购资金保证不了不“打白条”，主要是议购部分保证不了。但银行说都保了，银行认为保了定购就是保了。确实说不清楚哪个讲得有道理。今后不要分定购、议购，就看国家需要掌握多少粮食才能够稳定市场，定个数，必须收购，必须保证资金。

这个数究竟是多少呢？请内贸部与各地粮食部门商定，估计需要掌握70%到80%的商品粮，必须收到库里才能够稳定市场。这些粮食是周转性的，与专储粮不是一个概念，而是进了仓库以后还要把它们再拿出来卖掉。怎样才能把这些周转粮食收进来，而且是按国家规定的价格收进来呢？我提出两个办法供大家选择：第一个办法，在粮食下来以后，粮食系统没有收购1400亿斤到1600亿斤以前，不开放粮食市场；只有当百分之七八十的商品粮收完以后才能开放，才可以多渠道收购。这个办法是过去的办法，大家反映又走回头路了，但我看只要能稳定市场、稳定价格就好。第二个办法，允许多渠道收购，大家一起上，但价格要统一。谁如果违反国家规定的粮食收购价，坚决予以查处。工商部门要加强管理，打击投机倒把。这个办法大家反映可能管不住。所以，这两种思路都还不成熟，应该还有第三种、第四种更好的办法，大家可以讨论。这不是当务之急，当务之急是粮食降价。但是我们要考虑到夏收很快要来了，这个体制问题要赶快改革。改革的目的就是国家要把粮食拿到手里。



1993年12月15日，朱镕基在安徽省合肥市王大郢村向农民了解粮食生产销售情况。左三为安徽省委书记卢荣景。

第二，除了抓收购这个中心环节以外，我们还应该把粮食加工和批发抓在自己的手里。粮食加工很重要。现在农村粮食加工有分散的趋势，一家一户都在搞碾米厂，然后与城市的私商挂钩，这样搞下去，粮价是无法控制的。所以，我们还是应以集中的、比较大一点的粮食加工厂为主，以比较低廉的成本来吸引农民和粮店，通过加工改进包装，批发出去。粮食零售就好办了，零售就是不光国有粮店可以卖，所有菜市场、超市、百货公司都可以卖。批零有差价控制，零售价就高不上去，谁想抬高谁就倒霉，因为你抬高了没人到你那里去买。

第三，粮食系统把政策性经营与商业性经营分开，分成两支队伍。第一支队伍管粮食的收购、加工、批发，国家还必须给一定的补贴。第二支队伍是粮店，是管零售的，这是商业性的，自主经营、自负盈

亏。实际上，你们现在已经这样做了，很多粮店不只是卖粮食，还卖百货。这一部分完全自负盈亏，分流以后变成零售商业，不吃国家补贴。国家也不应把包袱都丢给粮店，加重它的负担。国家该背的还要背一点，通过社会保障系统来解决，不要把这些负担都加给商业性经营的粮店，那样它就搞不成自负盈亏。但是也要给粮店一定的压力，它也要分流一点人员，也要作点贡献。将来，国家支持它发展第三产业，逐步搞成一种综合性经营的商店。粮食零售网点不仅不能收缩，还要增加一点。最近北京方面就有反映，看不到国有粮店了。过去集贸市场等到处都可以买到粮食，一涨价就显出国有粮店的重要性了。这次要求国有粮店挂牌降价，现在怕是看不到挂牌，国有粮店太少了，不能灵活地控制粮食市场，不能成为主渠道，看来国有粮店似乎是收缩太多了一点。今后不但不能收缩，还要适当地有所发展。就是说，在零售方面，国有粮店也要成为主渠道。主渠道不一定是占很大的比重，那不需要。现在还有国有的超市、百货公司、菜市场，它们也可以搞零售，也可以挂牌降价。总之，从粮食的收购、加工、批发，一直到零售，我们的国有粮食部门要成为一个网络式的主渠道，这样才能把价格控制住。但国有粮食部门不要搞垄断，还要有20%到30%的粮食由多渠道经营，鼓励竞争。这种思路对不对，请大家考虑，至少在今年夏收之前得有个说法。

关于如何处理不同意见的批语

(1994年1月2、12日)

这是朱镕基同志关于如何处理不同意见的两次批语。

一、1993年11月30日，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转来一位同志写的一份材料，指出当时的货币政策存在着若干问题，并提出了相应建议。中国人民银行专门组织撰写了一份材料，认为该同志的意见“不符合事实”。对此，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王维澄向朱镕基同志写了报告，解释有关情况的来龙去脉。这是朱镕基同志在这份报告上的批语。

二、1994年1月11日，国务院研究室向朱镕基同志报告：关于该室一位同志就汇率并轨问题向海外记者发表同国务院决定不一致的意见一事，已召开全体干部大会，对该同志进行了严肃批评，并要求大家从中吸取教训。这是朱镕基同志在这份报告上的批语。

一

(1994年1月2日)

维澄同志：

不要顾虑。不同意见总是有的，互相切磋、启迪思考有好处。今后，有不同意见或措词尖锐的意见仍请转给我(我希望听批评意见。银行方面的意见我并非都同意。我也经常给他们提批评)。

朱镕基

1.2

二

(1994年1月12日)

梦奎①同志并袁木①同志：

发表不同意见不但允许而且我总是采取鼓励态度，并且经常表示欣赏。×××同志发表的这个意见在讨论决策过程中，也是我们反复研究

过的。但是既经决策，就不要再发表了，特别是不能在公众场合，通过新闻媒介发表。吸取教训就是了。

朱镕基

1.12

---

①梦奎，即王梦奎，当时任国务院研究室副主任。袁木，当时任国务院研究室主任。

基础设施建设要统筹规划、量力而行

(1994年1月14日)

1994年1月8日，国务院总理办公会议讨论房地产业发展问题，要求写一篇指导性文章，送《人民日报》发表。这是朱镕基同志在该文章送审稿《防止房地产业盲目发展》上的批语。

同意，最好再写一篇社论，强调基础设施建设也要统筹规划，合理布点，量力而行。目前盲目大上，重复布点，规模已超过承受能力，建成后也不可能充分利用，还债都会有困难。滞后不好，超前也受不了，都是大项目。

朱镕基

1.14

继续整顿金融秩序，严格控制信用总量

(1994年1月15日)

1994年1月12日至15日，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出席会议的有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各经济特区、计划单列市人民银行分行行长，各专业银行行长等。朱镕基同志在闭幕会上的讲话，曾发表于《金融工作文献选编(1978～2005)》，原标题为《在全国金融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编入本书的是讲话的主要部分。

一、1994年金融工作的方针和任务

根据中央的总方针，国务院决定今年金融工作的方针是：继续整顿金融秩序，稳步推进金融改革，严格控制信用总量，切实加强金融监管。有的同志说，现在的气候是都在准备大干快上，都在讲发展是硬道理，你却讲金融还要严格控制，好像不合拍。同志们，今年金融工作的方针是根据中央的精神制定的，与中央的方针是完全合拍的，大家要坚决贯彻落实，不能动摇。

第一条方针是继续整顿金融秩序。要把金融秩序整顿好，不是一年两年的事，现在秩序还是相当的混乱。我昨天晚上看了一份内参，山西、河北联合破获了一起特大金融诈骗案，案件出在山西省忻州地区，牵扯到中国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去年出了几个大案，上亿美元都被诈骗分子汇到国外去，连图章都不查对，起码的规矩都没有，听起来令人不能容忍。哪个银行没有案件啊，这样搞下去怎么得了！不整顿怎么行呢？整顿工作一点也不能放松。同志们！我看需要对我们领导干部的政绩考核考核，促使大家兢兢业业，负起责任。做错了事情总得有点自我批评吧，不要等到撤职查办再算总账。去年整顿有成绩，但任务还没有完成，这项工作是金融系统长期、艰巨的任务，今年绝对不能放松，必须坚持不懈地抓下去。现在问题发现得比较多了，情况摸得更清楚了，下一步要认真总结教训，检查责任，切实整改，关键是领导干部。

第二条方针是稳步推进金融改革。为什么要稳步？就是别把老百姓吓坏了。金融改革去年已经进行了，把人民银行办成真正的中央银行，目标已经非常明确，已经起步了。今年要成立几个政策性银行，为把我们的专业银行变成商业银行进一步创造条件，这个问题基本上都打好了基础，马上都要出台了。我们要稳步推进金融改革，走一步看看发生了什么问题，及时加以补救。银行的改革应该说是走在前面的。如果不是这样，去年的宏观调控不会那么快取得成效。现在不可否认金融是宏观调控的一个最重要的手段，因此，要稳步地推进改革。

第三条方针是严格控制信用总量。就是说，今年国家计划确定的指标一点也不能突破。我刚才讲了，今年的形势好还是不好，关键要看是不是能把基本建设规模控制住。基本建设规模控制住了，票子就控制住了，通货膨胀的压力就可以减轻，否则后果难以设想。基本建设规模靠什么控制呢？关键在银行贷款。没有钱，基建怎么能上得去？1992年、1993年的教训就是我们把金库敞开了，基本建设才上去的。你把金库钥匙死死地把住，它怎么能上得去呢？现在基本建设的摊子已经铺得够大了。同志们记得吧，1992年的固定资产投资总规模是7582亿元，去年是1.15万亿元，今年计划定了1.3万亿元。现在看来，去年也不止1.15万亿元，今年也绝对不止1.3万亿元，起码现在有2000亿元的缺口，弄不好建设规模很可能一下子就上去了。大家不要拿1.3万亿元跟2000亿元的缺口比，好像1.3万亿元计划，超过2000亿元不算什么。关键不在这里，问题在于在这1.3万亿元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有5000亿元是属于个人盖房子、集体搞建设，不是国家花钱。其余的8750亿元是国有单位的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在这8750亿元外，再超过2000亿元是不得了的。为什么说有2000亿元的缺口呢？第一，现在还没有列入国家计委计划本子里的项目，硬缺口起码还有500亿元，留在那里等着要突破。第二，国家计委计划本子里安排的项目里面很大一部分自筹资金是没有着落的。自筹的比例很高，但到哪儿去自筹呢？过去是靠乱集资，靠银行乱拆借，现在把这个路子堵死了，他到哪儿去借？到哪儿去拆呢？这起码又是500亿元。第三，现在打到银行新增贷款总规模4700亿元里的固定资产投资贷款是1580亿元，占三分之一。这个比例历史上没有过，打得很高，也就是说，流动资金比例打得太低，到时候非要增加流动资金不可，起码差500亿元。这样算下

来，再加上其他一些因素，缺口不是有2000亿元吗？在这种状况下，如果我们不严格控制信用总量，发票子就不是1800亿元，发2500亿元恐怕也不够啊！现在如果不把基本建设规模控制住，也就是说，不把银行贷款控制住，将会出现难以预料的后果！因此，在李鹏同志主持召开的国务院总理办公会议上，已经讨论了对三个500亿元缺口的处理问题。第一个500亿元，即把缺口留在刀刃上的、计划本子外的500亿元，李鹏同志授权银行，不管什么硬缺口，绝对不能在计划外安排。如果这个缺口很硬，那就请到国家计委去纳入计划本子，把其他比较软的项目挤出来。要是挤不出来，那银行一个钱也不会贷。第二个500亿元，即国家计委计划本子上有的项目，国家安排的那部分贷款，银行当然要照计划贷；但自筹的那一部分，地方要真正自筹，也就是地方财政要拿钱，集资不行，银行贷款没有。因此，你的自筹资金不到位，这个项目就不要开工，你的资金不落实下来，国家的资金也不能到位。以后不能再搞这些名堂，到国家计委批项目时，说我自筹呀，我有钱呀，口气大得很！回去以后就压银行给贷款。现在不行了，你压银行也没有用，你要自筹不了，这个项目你就不要搞。流动资金500亿元，我原来也想把它挤到4700亿元信贷计划里边去，把1580亿元固定资产贷款减掉一点儿。但现在看来，1.3万亿元摊子已经铺下来了，把1580亿元固定资产投资贷款再压下去几百亿元，确实是难啊！大批的项目下马，又可能引起大起大落。考虑到中国的国情和现状，明明知道4700亿元、1580亿元的盘子是打不住的，也只好这样了。500亿元的流动资金缺口，下半年看形势再定。如果上半年信贷计划控制得好，下半年有余力，我们就在现在的计划数上加一点儿流动资金；如果上半年控制得不好，还超过了计划，下半年想加流动资金只能考虑再砍一批项目。总之，要到下半年看情况再定。但前面讲的两个500亿元，绝对不能超过。同志们，我就拜托大家严格地按照国家计委的计划本子、人民银行和各个专业银行总行下达的计划执行，一块钱也不能超过！如果没有这一条，今年的日子就不会好过，改革关就可能闯不过去！



1994年2月，朱镕基在福建省金匙摩托车厂考察，了解企业流动资金情况。前排右二为福建省委书记、省长贾庆林，右三为中国民用航空总局局长陈光毅。

什么叫做银行的独立性？银行不能独立于党中央，不能独立于国务院，但要独立于地方政府和国务院的各个部门。除党中央、国务院以外，对银行的工作谁也不能干预，可以提意见，但不能下命令，不能指定银行干这样、干那样。严格控制信用总量，这是国家的利益，是人民的利益，大家一定要严格地按计划执行。我现在不敢讲发行1800亿元票子一定能控制得住，因为国家计委的计算不一定是配套的，4700亿元的贷款和1580亿元的固定资产贷款不一定和货币发行1800亿元配套。我倾向于货币发行算少了这种分析，因为今年有很多因素要占用货币，如汇率并轨、税制改革都要多占用货币，这还没有加上通货膨胀的因素。虽然如此，我们还是要努力工作，力争货币发行控制在1800亿元。

第四条方针是切实加强金融监管。把银行贷款规模卡住后，扩大建设规模还有一条路，就是乱集资。这条路去年堵了一下，非常有效，特别是长城机电公司违法集资案公告天下以后，情况好得多了，但是

现在又有复活的趋势。根据各地人民银行分行写的报告，有些地方已经开始出现这个苗头。对乱集资，无论如何要把它刹住，加强监管，绝对不能任其发展。把乱集资和超规模这两条路堵死，基本建设规模就难以扩大，这样物价就稳定了。改革有了宽松的环境，就会取得成功。

去年7月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提出的“约法三章”，今年要继续贯彻执行。第一，就是禁止乱拆借，这一条还得坚持，要继续收回违章拆借。现在最担心的是房地产热的复活。人民银行有一个清理拆借领导小组，戴相龙①同志还要继续把这件事情抓下去，再做一次检查和清理，违章拆借还要继续收。当然，我不是要求你们不择手段地去收人家的流动资金。我是要求不能继续往里投，还要继续往回收。第二，就是不能乱集资，这是整顿金融秩序必须抓的事情。第三，就是要继续抓脱钩，即金融机构与所办经济实体脱钩。中国人民银行抓得比较好，各个专业银行进展不快，还要继续抓。已经有一个过渡的办法，叫“收支两条线”，现在就是把人和账分开，还有一个要脱开挂靠的关系。绝对不能够拿信贷资金去搞房地产。我刚才讲房地产为什么压不下去，就是因为房地产公司的好多后台可能就是在座的诸位。我也不知道你们现在都脱钩了没有，这件事情交给王岐山②同志去处理，要统统脱钩，不能手软。

---

① 戴相龙，当时任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

② 王岐山，当时任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

二、对金融系统广大干部、职工的三条新要求

第一，要严格控制今年的信贷规模总量。 控制信用总量的关键是控制各级银行的固定资产投资贷款。从今年开始，基础设施、基础工业重点项目的贷款规模均已划归新成立的国家开发银行统筹安排，其他银行不得挤占其他项目，特别是流动资金的贷款规模来扩大基本建设。各级银行对于超过贷款规模总量的项目、未经批准开工的项目、化整为零的项目，一律不予贷款。一个项目也不许贷，一块钱也不能超过。谁用不正当的手段突破信用总量，就要追查谁的责任。为了避免信用扩张，严格控制规模，现在有条件稍微紧一点了。因为去年我

们对专业银行投了2800亿元的基础货币，实际上实现了一半，还有1400亿元又通过准备金、备付金回到了人民银行，人民银行对专业银行净增加再贷款1400多亿元，比前年多了好几百亿元。到去年年底，专业银行平均备付金率超过了10%，因此，我们要收回一部分再贷款，春节以前准备收300亿元，现在已把任务分配到各专业银行，请各专业银行认真执行。紧的时候要松一点，松的时候要紧一点，及时调度，来呼应经济生活的脉搏。看来这是一条规律，银行就要做到这一点，要灵活反应。今年一季度全国银行贷款规模安排370亿元，相当于全年计划的7%，高于往年的比例，各行要从紧掌握，合理使用。总之，上半年控制得紧些。各银行都要做好工作，给那些效益好的企业、快要投产的企业优先贷款，有困难的企业也要救一下。

第二，在政策性业务分离出去以后，专业银行在向商业银行过渡的征途中，今年要大胆探索，跨出开拓性的一步。我们不能照搬外国银行那一套办商业银行的办法，还得考虑中国的情况，还得一步步地来，要随着国有企业内部经营机制的转换，等企业实现了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真正办成现代企业时，才能实现商业银行的原则。不然，我们的大批国有企业就要关门，社会就要不安定。但是，也不能光等企业的机制转换，得给它一点压力。专业银行一定要跨出这一步，朝着商业银行的方向前进，逐渐地做到自主经营、自负盈亏，逐步提高自己的经营水平。当前，银行职工懂金融业务的多一点，但真正懂宏观经济、懂企业生产经营的不多，要吸收一点新生力量，外国的商业银行就有各方面的专家。去年第四季度时，有些地方对“点贷”提出了不少非议。我对地方的同志说：我既没有创造“点贷”这个名词，也没有主张搞“点贷”。银行贷款怎么能这样放呢？一个省的工商银行要把钱贷给哪个企业都需要总行批准，那怎么行呢？没有这回事！实际上是去年第四季度，企业资金紧张的时候，有一些资金特别紧张的企业，往往是中央的直属企业，通过中央的主管部门向工商银行总行提出来，因此，工商银行总行给它们注入了一些资金。但这并不等于每一个项目的贷款都得经过总行批准。为了避免误解，今后不要再用“点贷”这个词。每个银行都要根据当地的情况，进行深入的调查来决定贷款对象和规模。我建议各专业银行总行的领导要深入实际，多在国内跑跑，多了解各地情况，加强资金的调度。我刚才讲一块钱也不能超过，这是对各专业银行总行说的，我不能对每个

省的工行、建行都这么要求，这要由各家专业银行总行自己来调度，来掌握。我们今年实行的方针是专业银行向商业银行跨进一步，要实行资产负债比例管理，但是不能没有限额，是贷款限额控制下的资产负债比例管理。两方面都要照顾到。因此，这就需要各专业银行总行发挥灵活的调度艺术，密切注视动向。另外，银行要和有关部门一起，配合《企业破产法(试行)》的实施，把今年增加提取的呆账准备金切实安排使用好。

最近，各地人民银行分行行长们做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很多报告写得很好，给我们的决策提供了很大的帮助，我非常感谢他们。希望各专业银行总行的行长今年也要求你们分行的行长下去调查研究，给你们写报告，然后把一些活的情况、实际的东西加以汇总，向我汇报。在这方面，各专业银行的工作要加强。

第三，各级人民银行分行要切实转变职能，在地区金融监管方面发挥主导作用。 金融监管的职能主要在各级人民银行分行，你们是中央银行的派出机构，你们负有监督本地区一切金融活动的责任。信贷规模要靠专业银行来控制住，乱集资要靠各级人民银行分行来控制住。这两条控制住了，才能控制住固定资产投资规模，才能减轻通货膨胀的压力，今年就不会出问题。各级人民银行分行肩负很重要的责任，你们不要参与具体的贷款活动了，你们的任务就是金融监管，刹住乱集资。我担心乱集资又以新的形式发展。我担心一些企业没有从实质上掌握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的精神，不是把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当做转换机制的手段，而是把它变成集资的手段，不经试点就全面铺开，大量发展股份公司，内部集资，职工入股、分红，把职工的银行存款拿出来扩大企业基本建设规模。我很担心会刮这股风，大家要及早地注意。

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决定》里提到办合作银行问题。这个事情绝对不能一哄而起，等中央拿出具体方案以后再试点。你们回去可以向省区市领导传达，各地都不许擅自进行城乡合作银行的试点，等中央制定方案后才可以有组织地进行。

还有一个农村合作基金会的问题。不论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的决议里，还是在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决定》里，都明确地讲了农村合作基金会不能办存贷业务。但实际上都在办，甚至有的地方到了

“法不治众”的地步。这个问题要引起我们的注意。还是要明令禁止，不能让它蔓延，想办法把它堵住。我也会在各种内部的、公开的场合里讲这个问题，希望农业部和各个地方的领导同志要明确这一点。

下面，我再讲一下汇率并轨的问题。汇率并轨是有相当风险的，但必须出台。有些同志怀疑出台时机是否成熟，说什么搞汇率并轨是不是为了参加关贸总协定？我说不是这样的。去年进出口总额1957亿美元，其中出口900多亿美元，进口1000多亿美元，贸易逆差120多亿美元。出口900多亿美元中差不多一半是“三资”企业的来料加工等，国家拿不到多少外汇；还有易货贸易，国家也没拿到多少外汇。但外汇的需求很大，我们的外汇储备实际上在下降。如果今年再这样下去，外汇储备真的下降到150亿或100亿美元，我国在国际上的信誉就成问题了。因此，必须来一个强刺激，把出口搞上去。只有汇率并轨才能改变出口下降的局面，不这样搞不行。另一方面，汇率并轨后也限制了进口，利大于弊。但要是不注意弊，外汇收支不能平衡，那也很麻烦。因为我们不能让人民币贬值很多，如果像去年6月份那样，一下子贬到1美元兑换11元人民币以上，国际、国内对我们都会没有信心，通货膨胀马上就会起来。抑制进口需求，不能单靠汇率来调节，还要靠其他配套措施。今年的汇率争取稳定在1美元兑换8.7元人民币左右，再低(人民币升值)，对出口不利；再高(人民币贬值)，人心就不稳定，又会出现炒外汇、搞投机的了。要达到稳定汇率的目标，一是结汇制要搞好，不能让外汇流失了；二是企业买外汇时不要卡，只要符合规定，就卖给人家。不然，企业感到换外汇不方便，它就会千方百计逃汇，不结汇。所以，中国银行以及做外汇业务的其他银行一定要保证结汇制的完善和售汇制的方便，不要卡别人。一卡别人，不但卡不住进口需求，反倒切断了外汇来源。结汇、售汇办法要搞完善一点。一是保证结汇，防止逃汇、漏汇，避免外汇流失；二是保证方便企业购汇。这项工作要做的事情很多，中国银行以及其他银行任务很重，希望在座的有关领导同志对汇率并轨给予高度重视，一定要把这项工作搞好。

正确处理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关系

(1994年1月17日)

1994年1月，中共中央统战部在北京举办民主党派、工商联、无党派领导干部理论研讨班。这是朱镕基同志为研讨班所作经济形势报告的主要部分。

这次经济体制改革是空前深入、广泛的，力度也很大。这么大的改革没出大毛病，说明我们既有勇于改革的胆略，又做了充分、扎实的工作。我们应当将改革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告诉老百姓；现在推进改革的时机是成熟的、条件是具备的，也要告诉老百姓。如果改革不为群众所理解，就很难成功。

今年进行的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基本构架的改革是非常必要的，不出台不行，否则经济就搞不下去了。财政、金融、投资、计划、外贸、企业改革要配套。要是互相不衔接，只改一个环节，其他环节不改，孤军深入，是改不成的。但另一方面，它又有重点，其他改革是配套的。这些改革中最重要的是财政税制改革和汇率并轨，比较难的就这两项，有点风险，我们已经充分估计到了。

现在是改革和发展最好的历史机遇。如果错过了这个机遇，我们就要犯历史性的错误。为什么说是历史机遇呢?

第一，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全国人民所拥护、所掌握。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同志所确定的改革目标，就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邓小平同志为我们解除了市场经济姓“社”还是姓“资”这个最大的思想顾虑。特别是党的十四大，根据邓小平同志的思想，明确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只有在这个理论的指导下，我们才有可能去博采世界各国经济体制的长处来为我所用。我们去年设计的改革方案参考了许多国家的资料，看哪个适合中国的情况，就用哪一个。社会主义就是公有制为主体，按劳分配，这些原则必须坚持，绝不动摇。具体的运作方式，都可以博采众长。到党的十

四届三中全会时，全党统一了认识，大家的改革热情空前高涨，这个机遇很难得。



1994年1月17日，朱镕基在经济形势报告会前与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进中央主席雷洁琼亲切握手交谈。

第二，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已经作了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若干尝试，已经闯过几次关，有了很多的经验。今年推出的改革有些在前几年就已经设想了，有些已经有具体方案了。所以，我们不是仓仓促促就提出这套改革方案的。

第三，1992年邓小平同志发表南方谈话之后，我们进入了高速发展的新阶段。虽然碰到一点前进中的问题，但是，我们在解决这些问题的过程中，积累了宏观调控的经验。通过这些起伏，全党受到教育，都统一到一个认识上面：只有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才能根本地解决我们国家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问题。

至于说改革方案还不完备，任何一个改革方案都不可能事先设计得完善无缺，只能在改革过程中不断实践、不断总结、不断调整。不去

实践，不去尝尝梨子，怎么知道它是什么味道呢？发生问题不要害怕，不要动摇。我们天天都密切注视着改革的进展情况，出现一个问题，就去解决一个问题，完善一个政策，来适应变化了的情况。任何改革都像驾驶新汽车那样，有个磨合期。现在，改革正处在磨合与试运转的阶段。我们希望这个磨合期短一点，逐步走入正轨。这么大的改革，牵涉几百万户企业、多少亿人的事情，哪会不出一点毛病呢？大家还是要坚定信心、同舟共济、克服困难，努力完成改革事业。

我去年一直讲，搞改革要在一个比较宽松的环境里进行。所谓“宽松”，就是通货膨胀的压力别那么大。但是现在不但谈不到宽松，应该说宏观环境还是很紧的。基本建设规模居高不下，流通的货币这么多，怎能不通货膨胀？并不是说商品丰富就不会发生通货膨胀。1988年的商品也并不是不丰富啊！人们产生了钱不值钱的心理预期，就要去购物保值了。再有一个社会分配不均的问题，老百姓的心理状态怎么平衡？在物价高涨的情况下，工资高的人还可以忍受，而离退休人员、亏损企业的人员甚至于连基本生活都保证不了，这就要影响社会稳定。今年的改革环境确实不太宽松。怎样解决这一问题？主要有以下几条：

第一条，大家要看到，改革环境虽然不宽松，不改革就更糟糕。改革，是为了建立一个机制来解决发展中的问题。不改革，问题会越来越严重。对于目前存在的通货膨胀压力，要去找它的原因，主要是 由于基本建设规模过大，不要把问题归咎于改革。我们现在有把握说，改革中的小问题会不断，但不会出什么大问题。我在今年1月15日的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明确宣布，银行的任务就是反通货膨胀。固定资产投资贷款指标，一块钱也不许突破！只要把贷款规模和乱拆借、乱集资制止住，基本建设规模就控制住了，票子的过量发行也就控制住了，通货膨胀的压力就消除了，就不会出大问题了。

第二条，严格控制基本建设规模，要上下认识一致。就是搞基础设施建设也要从实际出发，搞多了是不行的，超前了也是资金浪费，国家承受不了。去年，我们充分保了铁路，中国历史上去年是修铁路最多的一年，这确实可以缓解国民经济瓶颈制约。但是，搞基础设施建设要统筹规划，量力而行，不能每个省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第三条，抓好农业基础。具体说，就是加强对粮食市场的宏观调控和抓好“菜篮子工程”。去年11月份的粮食涨价，一方面是由于去年沿海省份粮食减产，一些人到内地产粮区抢购粮食，哄抬粮价；另一方面也是由于粮食价格放开以后，粮食部门对究竟怎样进行市场管理没有思想准备，对市场放手不管，使粮价放任自流。这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教训，就是要加快改革粮食购销体制，加强对粮食市场的宏观调控。粮食市场不能够绝对地放开，要“放而有管，管而不死”。粮食是基础，粮价一上去，那肉、禽、蛋的价格都要上去，老百姓受得了呀？粮价大上大下，农民也不见得得到好处。“菜篮子”的工作要引起重视。搞开发区把很多菜田、粮田推掉了，减少了菜地，菜不够了，而且价格很贵，人们的心理状态怎么平衡？因此要由市长负责，赶快抓“菜篮子工程”。保证人民生活的基本水平、保证物价不飞涨，这是衡量一个地方政绩的重要标准。对这个问题，思想上必须搞清楚。

第四条，国有企业的经营机制如果不改变，国民经济发展中的许多根本问题解决不了，良性循环就无法形成。像现在这样三分之一的国有企业明亏，三分之一的国有企业暗亏，这个局面要是继续下去的话，我们财政金融的状况就永远改善不了，国民经济也难以上一个新的台阶。所以，国有企业必须转换经营机制，这里面最重要的是政企分开。企业应该自主经营、自负盈亏，搞不下去就破产。但是，企业一旦要破产，人员怎么安置是个很大的问题。人员安置不好，要发生很多问题。但我想，不经过这个痛苦的过程，企业的经营机制也难以转换。从金融体制改革的方向看，最终要把专业银行变成商业银行。问题是专业银行变成商业银行以后，恐怕一大批国有企业就要垮台。当企业还没有商业化的时候，银行怎么商业化？因此，国有企业的改革是个很重要的问题。当然，今年现代企业制度的改革要先进行试点，逐步地探索，真正做到企业就是企业、政府就是政府。中国的社会保险制度一定要有我们社会主义的特色，要适应中国的情况，完全依赖高标准的社会保险不行，不搞社会保险也不成。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养老保险最终都要搞。今年，我们把这个当做改革的重点内容加以设计，以配合国有企业经营机制的转换，早日出台将有助于国有企业的改革。

会见美国财政部部长本特森时的谈话

(1994年1月20日)

这是朱镕基同志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并宴请美国财政部部长劳埃德·本特森时的谈话。

朱镕基： 今天非常高兴与本特森先生见面，欢迎到中国访问。昨天，你已经与我们的总理见过面了，今天我作为主管财政经济的副总理和你会面，这是具有特殊意义的。

我知道，你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是反法西斯的勇敢战士。我也知道，你长期在美国国会担任参议员，现在是克林顿政府中担任要职的重要内阁成员。你的声望和能力在美国是很有名的。今天与你见面，并就中美两国在经济方面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我非常高兴。去年11月，江泽民主席与克林顿总统在西雅图会晤，是开辟中美两国友好合作的一个新的转折。从那时起，中美两国的高层往来增多，特别是中美联合经济委员会会议停顿了一段时间后又恢复召开，一定会促进中美两国今后进一步的合作。

我还想再提到一点，我知道你是得克萨斯州大学法律系毕业的，我是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的院长，我们与得州的达拉斯大学有着友好的合作。我曾经去那儿三次，对那里有很深的印象。这是我的欢迎词，现在请你讲话。

本特森： 副总理先生，你已经打动我了。一提到得克萨斯，就想到我的家乡。我对中国的经济改革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对你们在改革中取得的成果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上次我来中国是1978年，到现在，变化非常大，唯一没有变的就是北京的山，还是那样。我看到，中国在婴儿出生率、医疗保健和人民的福利方面取得了巨大进展，这是任何其他国家无法相比的，我对这些印象非常深刻。这里是世界上经济增长最快的地区，克林顿总统本人非常愿意发展与这个地区的合作关系，特别是发展与中国的合作关系，这是非常重要的，这对双方都有利。我们的文化是有差异的，有许多不同的情况，但有许

多事情是可以通过双方的努力来做的。我们可以通过召开亚太地区的会议，未讨论我们双方共同关心的问题。我很高兴地得知贵国代表将出席亚太财政部长会议。我将在即将各开的美中联合经济委员会的会上与中国的财政部部长共同主持会议，并讨论一些问题。我们还将组成几个工作小组，就双方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看法。我们看到，在贸易增长快的国家中，中国是贸易顺差最大的国家。我也知道，我们在这方面计算的方法不一样。我们已高兴地看到中国的汇率统一并轨，还希望就市场准入、货币兑换和金融服务等方面的问题有机会进行讨论。此外，我们还关心激光唱盘、著作权、专利权等，很高兴有机会就这些问题进行讨论。



1994年1月20日，朱镕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美国财政部部长劳埃德·本特森。

朱镕基： 感谢你对我们经济改革的支持。从今年1月1日起我们实现了汇率并轨，去年我们进行了金融秩序整顿。应该说，我们在很大程度上是借鉴了美国的经验。我想我们的做法是符合国际惯例的，这其中也吸取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建议，到现在为止，情况是好的，还没有出什么问题。当然，希望以后也不出什么问题。

我们正在考虑更多地开放金融业，也就是说，还要允许更多的外国银行进来。关于允许外国银行做人民币业务的问题，我们要经过非常慎重的考虑。我本人也邀请了世界各地的许多专家来讨论这个问题。他们当中的许多人，也包括美国人，都说对这个问题要持慎重的态度。这是因为我们从今年才开始划分商业银行和政策性银行，目前中国的国有企业机制还未完全转变过来，中国的银行离商业银行的标准还差得很远，如果在这个时候批准大量的外国银行来做人民币业务，实际上是让中国的银行在不平等的基础上进行不平等的竞争。因此，我们一方面要加紧使我们的银行变成真正的商业银行，在这方面还需要得到你们的帮助；另一方面，我们要采取渐进的方式，逐步地做工作。今年，我们最多只会批一到两家外国银行来做人民币业务，进行试点，总结经验。

关于开放资本市场问题，这也是我们的金融改革方向。但从目前来讲，我们的立法很不健全，证券市场也很不成熟，投机性很大。目前，发行股票正处于试验阶段，如果在这个时候允许大量的外国机构进入，就会造成中国市场的极大不平衡。你们在证券市场方面有着上百年的经验，而我们只有两年的经验，还得允许我们有一个试验的过程，才能做大量的业务。在这方面，实际上我们与美国的证券机构有着非常密切的合作，与许多大的证券公司和投资银行，像高盛公司、美林公司、所罗门兄弟公司等，还有许多大的会计公司，像毕马威、安达信等，都有着密切的合作。我们从合作中学到了一点东西，但要学到更多的东西才能考虑让外国机构进入。总之，中国人基本上还不懂什么叫股票、什么叫资本市场。现在外国传说我们要发行奔驰汽车公司的股票，这只是他们的想法，我们谁也没有讲过这个话。

本特森： 副总理先生，我们对中国在这些方面所取得的良好进展印象非常深刻，我的那位在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工作的老朋友说过：他非常期待有机会来中国，但他在华盛顿的工作非常忙。他愿意为中国提供任何技术方面的援助，其中包括资本市场、证券交易方面的技术援助，这符合两国的利益。能在繁荣中国的改革方面进行参与和友好合作，对全世界都有利。我们很高兴地看到中国的汇率并轨，很关心这个问题，这有助于中国加入关贸总协定。我们愿意以积极的态度进行有关中国加入关贸总协定的谈判和对话。

我们还关心的是，汇率并轨后还有一个双重价格问题，还有人权问题、劳改产品问题等，这些不但美国人关心，国际上也很关心。我们希望看到这些方面有更多的进展，我们主要是考虑到国会方面的压力，国会议案上有些问题涉及这些方面，所以在决策时会考虑这些因素。你刚才谈到我在参议院工作了很长时间，实际上是22年了。过去，我认为政府的权力很大，但现在我认为国会有更大的权力。

朱镕基： 刚才提到的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格林斯潘，我请你再次转达我的口信，希望他尽快访问中国。一方面，他代表美国的利益、立场来与我们讨论美方关注的问题；另一方面，也请他站在我们的立场上，帮我们考虑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在金融改革方面应该考虑的问题。刚才提到的著作权、专利权保护问题，我们在这方面已经有了法律规定，虽然在实践过程中还有这样或那样的侵权现象，但我们是坚持保护著作权、专利权的。

关于人权问题，不久前，我与美国国会众议员说过，我们两国对人权的概念有不同的看法，我们不希望这个问题与最惠国待遇问题联系得那么紧密，中国的最惠国待遇对中美双方都有利。我非常高兴地得知，前不久在纺织品的问题上我们达成了协议，这是个好兆头，预示着你的来访和主持中美联合经济委员会将进一步促进我们两国合作的发展。

(午餐对的谈话)

本特森： 中国的经济发展很快。中国与俄罗斯的改革不一样，中国是采用试点的办法，而俄罗斯则希望更快的改革，想一下子跳过去，所以他们的过渡是很难的。中国的渐进方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

就。去年2月份，我在伦敦第一次出席西方七国财长会议，德国的财政部部长告诉我说，当一个财长受欢迎时，就意味着你的工作没做好。

朱镕基： 中国不能采用“休克疗法”，我们的情况和俄罗斯不一样，中国的人口比俄罗斯多得多，更要采取渐进的步子，改革太快，人民受不了。我们的物价指数达到13%，大城市接近20%，已经出现了通货膨胀的压力。发生的原因就是我们已经有了几十年的计划经济的历史，每当我们经济发展速度很高时，跟着来的就是通货膨胀。改革开放以来，发展速度很高，就出现了计划经济跟不上改革发展的结果，造成投资过大。去年6月份，我们已经采取了整顿金融秩序的措施，从根本上进行了控制，在半年的时间里取得了很大成效。今年推行的经济体制改革措施，其强度和深度超过历史上的任何一年，这本身也是推动改革前进，但是必须采取非常小心的态度。如果不进行这个改革，通货膨胀率会更高。由于中国的农业现在还是经济稳定的基础，基本上保证了人民的生活需要，因此，对通货膨胀不用担心，可以控制。去年11月份对粮价的调整，人们的心理一时还不能适应，发生了一点问题。当我们讲清楚后，市场上的粮价马上就降下来了。现在是供大于求，粮价涨不上去。我想我们改革成功的可能性比俄罗斯大，因为我们能保证12亿人口的吃穿。现在俄罗斯不能保证，他们的改革是很难的。

本特森： 我们也采取了一系列的经济措施。我们的增长率不像你们那么高，在3%左右，我们的通货膨胀率大体上也在3%左右。我们减少了预算赤字，同时降低了失业率。这些，在现阶段比其他的工业国家做得要好。

朱镕基： 我们今年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大体上要达到9%左右，也就是说在10%以下，不能太低。我们不愿看到中国的经济增长大起大落。关于物价指数控制在5%或5%以下，那是明年的事，今年做不到。我们的失业问题不像西方那么严重，但我们承认有潜在的失业问题，这实际上是把多余人员的问题交给了国有企业，这也是国有企业效率低的原因之一，实际上也是把社会保障的问题交给了国有企业。我们今年要加强社会保障方面的改革，减轻国有企业这方面的负担。

关于中国的财政收入，去年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总收入的30%，地方的收入占70%，但中央负担的支出占总支出的50%，这样就产生了大量的赤字。我们现在实行的分税制，就是要逐步改变这种状态，中央财政收入占的比例要多一点。新推出的税制，中央的主要收入是流转税，即增值税。收上来的增值税75%交中央，所得税归地方。按这种收法，中央可以拿到60%。但这种设计今年不能一下子达到目标，否则地方要负担1000亿元的赤字。因此，我们是采取渐进的办法，先收上来，再返回一部分，我们叫“转移支付”。如果不采取这种渐进的方法，中央和地方就会发生冲突。为达到这个渐进的目标，去年我跑了十几个省市去做说服工作，把我的身体都弄垮了。现在我才体会到，从地方的口袋里拿钱是多么难呀。幸亏我已经完成了这个工作，中央拿到的钱不多不少，正合适。

本特森： 美国也有同样的情况。请副总理先生介绍一下贵国国库券的情况。

朱镕基： 财政部发的是国库券，企业和地方发的是债券，证券市场发行的是股票。今年我们准备发行国库券1000亿元人民币、外债15亿美元，企业和地方发债券45亿元人民币，股票控制在55亿元。我们的股票现在有三种：A股是中国内地机构和个人购买的股票，B股是境外投资者购买的股票，H股是中国在香港发行的股票。现在我们的国库券利息高于银行存款利息，并且要求地方发行的债券利息低于国库券利息；否则，国家的国库券发不出去。我现在告诉你一些数字，你就可以看出财政制度非改革不可。去年我们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了13%，财政收入增长了23%，其中，地方的财政收入增长35%，而中央的收入减少6.3%。再不改革，我们的财政部部长要成乞丐了。

萨默斯①： 再请副总理先生介绍一下中国政府的汇率政策。

---

① 萨默斯，即劳伦斯·萨默斯，当时任美国财政部副部长，陪同本特森访华。

朱镕基： 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和大家都关心的问题。你们都知道，中国从去年1到6月份，人民币一直在贬值。到7月份，我们不得不用中央银行来干预汇率市场，但仅仅抛出了7亿美元，就把外汇 市场

稳定在1美元兑换8.7元人民币。从去年8月开始，随着大家的观点改变，我们又收购了50多亿美元，到现在一直是这个汇率，我们既不抛，也不收。希望这个汇率能一直稳定下去，不希望再有大的波动，否则会影响我们的外汇投资。人民币不管是升还是贬都不好，1：8.7这个汇率正合适。另外，我们现在的工业需要大量地从外国进口原材料和部件，如果人民币贬值，进口进不来，就会影响我们的物价和工业生产。在最近的《人民日报》上有我在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谈到了有关汇率方面的问题。

切实抓好农副产品的生产和供应

(1994年1月26日)

1994年1月26日至27日，全国“菜篮子”和粮棉油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出席会议的有各省、自治区人民政府主管副省长(副主席)，各直辖市市长，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负责同志，32个大中城市市长，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这是朱镕基同志在会上讲话的主要部分。

根据中央提出的工作方针，要保持一个比较宽松的环境，非常重要的任务就是要控制通货膨胀，控制物价的上涨。控制物价，关键是把粮油和副食品价格涨幅过大的势头控制住。农业稳定了，市场稳定了，人民的基本生活和切身利益保证了，其他事情就好办了。这一着棋下好了，就能处理好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关系。

一、当前“菜篮子”产品和粮棉油的生产、供应形势

总体上看，当前全国粮棉油和“菜篮子”主要产品的生产、供应形势是好的。1993年，全国农业生产形势比年初预计的要好，除棉花、糖料减产外，其他主要农产品获得了好收成，这是我们安排好市场供应的物质基础。全国粮食总产量达到9128亿斤，比上年增长3.1%。油料和肉类、禽、蛋、奶类、水产品、蔬菜等“菜篮子”产品的产量持续增长。农业生产之所以能取得这样的成就，是全党、全国上下共同努力的结果。目前从全国看，与人们生活密切相关的“菜篮子”和粮食等农产品生产，在总量上是有保证的，总供给与总需求可以保持基本平衡，只有棉花、糖料供需缺口比较大。

当前，粮食价格已基本稳住并有回落。全国粮食供求总量可以平衡。国家现有近1000亿斤储备粮，前一段时间粮食涨价，国家只抛售400亿斤储备粮，就基本稳住了粮价。去年年底，我们采取的粮食宏观调控措施，不是限价，限价是限不住的，我们是要求国有粮店挂牌降价销售。为什么可以挂牌降价呢？因为国有粮食系统收购的粮食是涨价前低价收进来的，即使加上必要的费用，卖价也不应该那么高。因

此，粮价降下来，是符合市场供求规律的，国有粮食系统不会因此而造成亏损。这样做，没有违背改革方向，恰恰相反，是反不正当竞争，反价格垄断。由于国有粮店带头降价，集市贸易粮价也就跟着降下来了。

棉花的问题比较大，已连续两年减产，特别是山东、河北这些主产省的产量减得多。新疆棉花大丰收，应该表扬，但是运出来还有困难。棉花减产，收购量减少，库存下降，供需缺口大，再不抓棉花不得了。

植物油的供应也有点问题，库存薄弱，现在主要是补充库存。我们已经决定，今年进口一部分食用油。去年油料丰收，只要及时组织加工，加上适当进口，还是可以安排好供应的。

猪肉的供应也有点问题，主要是饲养成本、运输成本上升，生猪存栏量下降。对此，我们要给予密切注视。猪肉基本库存还是有的，春节前的市场供应绝对没有问题。但一定要把生产、流通环节的问题解决好，把生猪饲养搞上去，不然猪肉供应也会出问题。

所有副食品中，蔬菜是最重要的。前一段时间，蔬菜价格涨幅较大，主要是由于有些地方菜田减少过多，去年11月间又发生严重冻害，加大了蔬菜淡季供应的难度。只要大力组织货源，形成大流通的格局，蔬菜供应问题也是可以解决的。

去年糖料减产，今年国际市场的糖价也偏高，但我们不得不进口一些。这个问题也不是太大。当然，进口也不能太多，否则今年糖料一丰收，又会造成积压。

可见，除棉花外，粮油和主要副食品的供应还是有物质基础的。前一段时间出现的粮油和某些副食品价格涨幅过大，其中一个共同的原因是，我们对于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实施有效的宏观调控还缺乏经验。今年是整体推进经济体制改革最关键的一年。为确保各项改革措施的顺利实施，必须继续加强和改善对国民经济的宏观调控。宏观调控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把物价水平保持在城乡人民和全社会能够承受的范围之内，确保粮油和主要副食品的市场供应。当前工作的重

点，第一是菜，第二是肉，第三是糖。我们要从为深化改革、促进发展提供良好环境的高度，认识平抑物价、确保供应的重大意义。

二、切实抓好当前粮棉油、“菜篮子”产品的生产和市场供应

要控制住粮棉油和“菜篮子”产品的市场价格，必须抓好生产，保证供应。生产上不去，供给短缺，要想稳住价格是不可能的。限价、限量、凭本供应，都不是好办法。去年年底之所以能把粮价很快平抑下来，关键在于我们有足够的粮源。因此，今年一定要加强粮棉油和“菜篮子”产品的生产，力争再获好收成。

为了保证今年农业生产的稳定发展，当前要特别注意抓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第一，抓好以主要农用生产资料供应为重点的备耕工作，组织好春耕生产。各地要对当前备耕情况进行一次检查，及时发现问题，及时解决。一定要打好今年春耕生产这一仗。

第二，继续落实今年的棉花种植面积。今年全国的棉花合同定购计划不变，省际间根据布局作适当调整。各地要保证国家计划任务的完成，明确责任，层层落实。

第三，稳定粮食种植面积。要吸取去年南方有些省粮食种植面积减少过多，导致减产，推动粮价上涨的教训。今年全国的粮食作物播种面积要保持在16.5亿亩以上。粮食调入省要提高自给水平，要有足够的储备；粮食调出省要按市场需求提高商品率。调出省和调入省之间要通过建立长期稳定的购销关系，努力做到供需平衡。

第四，制止滥占菜田，重视蔬菜和其他副食品生产基地建设。大中城市的蔬菜生产要坚持“郊区为主、农区为辅、外埠调剂”的方针。近年来，许多城市的基本建设和开发区挤占菜田严重。各大中城市必须严格菜田管理，制止滥占菜田，确保必需的菜田面积。要建立菜田保护制度。如确需占用老菜田的，一定要开辟新菜田，先补后占，占1亩至少要补1亩半。要切实加强菜田基金的征收和管理。要十分重视农区、外埠蔬菜生产基地建设，充分发挥其调剂和补淡的作用。肉、禽、蛋、奶、水产品等其他副食品生产基地建设也要抓好。要高度重视市场建设，形成大流通的格局，吸引更多的副食品进城交易。

第五，稳定农业机构与服务队伍。这个问题要提到巩固和加强农业基础地位的高度去认识。江泽民总书记在去年明确提出，农业行政管理部门只能加强，不能削弱。我在去年全国“菜篮子工程”工作会议上也讲过，但不少地方落实得不好。我再次呼吁和强调，无论机构怎么改，农业管理机构不能撤，队伍不能散，经费不能断。

粮棉油和“菜篮子”产品是人们的基本生活必需品，既要采取有力措施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增加供给，又要把价格控制在消费者可以承受的水平上。目前虽已稳住了粮油价格并使其有所回落，但某些“菜篮子”产品的价格仍然偏高。春节即将来临，如市场供应组织得不好，很可能出现新的一轮涨价。因此，平抑销价、稳定供给，仍然是当前各地尤其是大中城市政府一项紧迫而又艰巨的任务，希望大家切实抓好。

这里，我特别强调一下控制粮油价格的问题。

我在去年12月25日的国务院平抑粮油价格、稳定市场供应会议上讲过，平抑粮价的目标分两步走。第一步，把粮价降到去年11月份涨价前的水平。现在看来，经过平抑后，第一步目标大部分省区市做到了，有些地区还是偏高。这是指广大群众赖以为生的大众化粮食品种。第二步，继续稳定粮价，不能再涨了；有的地区还要适当降一点，降多少由各地确定。前一段时间粮食抛售中没有达到平抑价格目标的，要继续努力实现目标；原来低于平抑价格目标的，不能提价。国有粮店要继续挂牌销售，平抑市价。

油价没有实现平抑价格目标，现在每斤菜子油还在3元2角以上。没有油，光说一句话，价格是降不下来的。这个问题的解决，取决于进口和今年的油料增产。除确保完成食用油进口计划外，国家安排的储备油要尽快投放市场，以平衡供求，稳定油价。植物油价格不能再涨了。

三、认真落实扶持粮棉油和“菜篮子”产品生产、流通的各项政策

前几年，中央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支持粮棉油、“菜篮子”产品生产和流通的政策；去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又制定了一些新的政策。确保政策落实到位，对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发展生产、搞活流通、加

强宏观调控具有重要作用。各地区、各部门必须不折不扣地抓好这些政策的落实。关于近期扶持粮棉油和“菜篮子”产品生产、流通的政策问题，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提高今年的粮棉收购价格。国务院决定，从今年新粮、新棉上市起，提高粮棉收购价格。粮食提价幅度还是按原来商定的，每斤提1角，即4种主要粮食品种的综合平均收购价在去年涨价前的基础上每斤提高1角。不包括原来的价外加价。这个提价幅度是可以调动大多数粮农的生产积极性的。去年粮价上涨的好处并没有都到农民手里，主要是中间环节得利了。非商品粮地区和吃返销粮地区的农民，因农用生产资料涨价，也会增加支出，这要靠粮食风险基金来补偿。提高粮食收购价，不登报，以免给城镇居民造成又要涨价的误解。只通过内部文件把信息传递给农民就可以了。这对农民来说是好消息，会不胫而走、奔走相告的。

棉花去年每担提价30元，原定今年每担标准级棉的收购价再提高50元，达到380元。考虑到棉花生产确实潜伏着更为严重的问题，所以决定提70元，加上价外加价，去年12元，今年14元，等级差价5元，就是每担将近420元。这样将给一些纺织企业造成更大的困难。企业的出路在于加强管理，加快技术改造步伐，提高产品质量。棉花生产再不能滑坡了。各地区和各有关部门都要高度重视棉铃虫的防治，力争今年棉花丰收。

第二，继续落实扶持“菜篮子”产品的产销政策。这个问题，我在去年6月召开的全国“菜篮子工程”工作会议上已经讲过。当时，陈俊生同志把中央定的扶持“菜篮子工程”的政策都列了出来，经国务院总理办公会讨论通过，全都肯定了下来。现在重申，这些政策措施都要继续认真贯彻执行。总的原则是，中央和地方财政的各项补贴，都不要挪作他用，已减少的要立即收回来，继续用于“菜篮子工程”建设，包括生产基地建设，储存运输、冷藏加工、批发市场等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副食品风险基金的建立等。中央关于副食品风险基金的建立已有明确要求，要尽快建立起来，主要用于扶持全国性蔬菜生产基地建设，包括化肥、“南菜北运”的运费补贴以及少量的储备费用补贴等。国务院已组成一个专门小组，负责研究粮食价格改革的实施和粮食风险基金的建立，也要研究副食品风险基金的建立。

今年的税制改革，对粮食和副食品零售行业的税负是减轻的，批发行业的税负是增加了。为此，财政部、税务总局已决定，今年对国有、集体商业企业批发肉、禽、蛋、水产品和蔬菜的业务征收增值税后增加的税款实行退税，收多少退多少，即收即退。

第三，关于进口政策。粮、棉、油、糖、化肥、农药等都要有适当的进口。进口这些产品主要用于增加库存，增强国家和地方吞吐调剂的物质基础。进口实行“三统一”，即统一政策、统一价格、统一对外。统一对外就是由外经贸部协调。现在，进口所需外汇不成问题，并且减免了增值税和进口关税，可以保持进口价格和国内价格大体一致。实行地方自行进口，但必须统一协调，不可以都到国际市场上抬价抢购。

第四，粮食购销体制改革问题。对于这个问题有个基本思路，就是要把政策性业务和经营性业务分开。经营性的零售要自负盈亏，多种经营；政策性的业务主要是抓收购、搞批发，保证国家有足够的粮源，只允许有执照的国有粮食企业搞批发。批发环节属政策性经营，国家要给予适当补贴。关于收购政策，初步方案是分两步走，使国有粮食部门掌握2200亿斤商品粮的70％到80％，即1600亿斤到1800亿斤。第一步，国有粮食企业到农村收购粮食，统一价格，保证收购1500亿斤粮食；在1500亿斤粮食未收到手之前，不开放粮食市场。第二步，国有粮食部门完成粮食收购任务后，放开粮食市场，允许多渠道收购；国有粮食企业再收购200亿斤到300亿斤粮食，使国有粮食部门掌握的总粮源达到1700亿斤到1800亿斤。这样，粮食购销的大局就稳住了。这不是走回头路，因为市场经济不是不要计划，不是放任自流。粮源要掌握在国家手里，不能掌握在私商手里，否则就不可能稳住粮价，就会出大问题，我们就会吃大亏。开放市场，要像郑州粮食市场一样，有监督、有管理，不能一窝蜂都到农村抢购。粮食购销体制如何进一步改革，我们正在调查研究，要尽快拿出个办法来。另外，国有零售粮店和国有菜市场应占一定的市场比例，现在减少得太多，需要引起注意。

四、加强领导，明确责任，切实做好工作

这次会议要明确这样一条基本责任：粮棉油和“菜篮子”产品产销平衡的责任在各地区。李鹏同志一再强调，解决“菜篮子”问题, 就是由市长负责。我还要加一句，“菜篮子”是考核市长政绩的一个很重要的内容。“菜篮子”搞不好，我可以肯定你那个城市的建设也搞不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大中城市每年要对粮棉油和“菜篮子”产品拿出辖区内总量平衡的计划，比如生产多少，自给多少，调出、调入多少，出口、进口多少，储备多少，怎么综合平衡，要有一 套完整的方案和有效的措施，狠抓落实。自己该拿钱的要拿钱，不能什么事情都找中央。自己不能平衡的，还是要通过发展大生产、组织大流通来解决。销区要向产区订货，建立长久固定的购销关系。订了合同就要算数，保证兑现。

今年要把控制物价上涨、抑制通货膨胀摆在非常重要的位置。中央、地方要共同负责，一起努力，确保控制指标的实现。为此，中央和地方都要掌握必要的调控手段。如粮食和副食品风险基金、生产发展基金以及储备制度的建立等，都是非常必要的。今后，凡是由于不落实风险基金、不建立储备制度致使供需平衡出了问题的，要追究省长和市长的责任。各级领导干部都要不断地探索在市场经济体制条件下解决粮油和副食品生产、供应问题的新路子，创造新经验。要建立副食品生产、供应的目标责任制。对基地建设、市场建设、价格监控等都要有明确的考核指标，对市长、分管副市长和各有关部门分别考核哪些指标，要有明确规定。要实行定期检查，年终总评。对实现了考核指标的，要表扬；对没有实现考核指标的，要批评；问题严重的，要追究领导责任。中央各有关部委也要明确责任。农业部要安排、组织好生产；内贸部要组织好大流通，安排好储备和市场供应；化工、石化、机械等农用物资生产部门和供销部门，要组织好农用物资的生产和供应；铁道部、交通部要安排好运输；外经贸部要安排好有关产品的进出口；民政部门要协助粮食部门组织好灾区供应；工商、物价部门要加强市场和物价管理；财政部、人民银行要落实好调控政策及支持产销所需的资金；国家计委、国家经贸委要做好综合平衡、调度协调。

各级领导干部都要关心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对人民群众普遍关心的粮油和肉、蛋、蔬菜、水产品等副食品的生产与供应，要下决心组

织好、安排好。对于收入水平较低的离退休人员、困难企业职工和大专院校学生等，要注意解决他们的特殊困难。最近，党中央、国务院发出一个电报，中心意思是当前首先要保证公教人员的工资发放。现在很大一部分地区，尤其是贫困地区公教人员的工资发不出来，亏损企业工人的工资也发不出来，大学生的生活也受到很大影响。这些问题如果解决得不好，就会影响社会的安定。电报明确指出，宁肯少上几个项目，也要保证工资的发放。对亏损企业职工生活有困难的，政府要给予帮助。对大学生的生活问题，上海的做法是拿出一笔钱补贴给有困难的学生，李鹏同志认为这个办法可以推广到全国。

总之，形势要认清，认识要统一，政策要落实，责任要明确。各地人民政府和有关部门的领导同志，都要以对人民群众高度负责的精神，下大力量解决好“菜篮子”产品和粮棉油生产、供应方面的各种实际问题。通过全党、全国上下的一致努力，向人民群众表明，党和政府是有驾驭市场经济能力的，完全有力量、有办法解决好当前的问题，抓住机遇、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促进发展、保持稳定的目标是一定能够实现的。

把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办成世界第一流的经济管理学院

(1994年2月22日)

这是朱镕基同志给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的题词。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需要一大批掌握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熟悉其运行规则，而又了解中国企业实情的经济管理人才。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就要敢于借鉴、引进世界上一切优秀的经济管理学院的教学内容、方法和手段，结合中国的国情，办成世界第一流的经管学院。愿与同仁共勉之。

朱镕基

一九九四年二月二十二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需要一大批掌握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熟悉其运行规则，而又了解中国企业实情的经济管理人才。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就要敢于借鉴、引进世界上一切优秀的经济管理学院的教学内容、方法和手段，结合中国的国情，办成世界第一流的经管学院。愿与同仁共勉之。

朱镕基

一九九四年二月廿二日

把大庆建设得更好

(1994年4月13日)

1994年4月12日至16日，朱镕基同志在黑龙江省考察工作，先后考察了大庆、肇东、哈尔滨等地。这是朱镕基同志在大庆召开的座谈会上讲话的一部分。

这次我们专程来大庆，就是来“朝拜革命圣地”呀。以前由于各种原因没有来成，这次我说无论时间多紧也要来大庆看一看，因为大庆确实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第一，大庆真正改变了中国所谓“无油” 或者“贫油”的历史。从理论上讲，李四光打破了中国“无油论”或者“贫油论”，但从实践上真正打破的是大庆，大庆使中国人民树立了信心。虽然克拉玛依油田比大庆油田发现得早，但真正大规模找油还是从大庆开始，这个意义非常大。石油是战略物资，中国如果没有石油，就很难立足于大国之林。第二，大庆体现了中华民族的精神，就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艰苦创业精神，它改变了中国人的精神面貌。所以，大庆红旗、“铁人”精神，我看在历史上是永远不能磨灭的，目前依然有着现实意义。今天一到大庆，我就说向大庆学习，向同志们学习。“工业学大庆”这个口号，在历史上有意义，现在也有意义，因为大庆精神始终应该发扬。没有这种精神，我们国家没办法建设好。第三，大庆还体现了我们国家改革开放、自强不息、不断进步的精神。大庆是中国人自己创造出来的，又通过改革开放吸收了世界的先进经验，自己发明创造，在技术方面也立足于全世界的先进行列。大庆今天的建设和我原来想象的完全不一样，“干打垒”已经变成历史教材了，现在已建成一个崭新的城市了，面貌焕然一新。不但在技术上是先进的，而且建立了一个现代化的石油工业基地，这个功绩不可磨灭。同时，大庆依然在中国的石油工业中牢牢地居于骨干地位、决定性的地位。中国其他哪个油田也没有能够像大庆稳产这么多年，有这么高的年产水平，5000万吨稳产了9年，5500万吨稳产了9年，加起来一共18年，这是了不起的！所以我认为，大庆的同志们创造了历史功勋，今天还在

继续奋斗。我们不但应该学习大庆，更应该保持和发扬大庆这种艰苦创业的精神，继续把大庆红旗树下去，把这种“铁人”精神发扬光大。

下面，我想针对同志们讲的问题，讲两点意见。



1994年4月13日，朱镕基在黑龙江省与大庆油田1205钻井队的石油工人交谈。

一、关于大庆石油工业的发展

不久前，江泽民同志主持召开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讨论了石油工业的发展问题。中央认为，石油工业关于“稳定东部、发展西部”的方针是正确的。但是，我觉得稳定不等于不发展，这个问题也要讲清楚。稳定主要是讲产量要稳定，不要降下来。因为油田的产量有个自然递减的趋势，不要让它大减下去，这就叫稳定。然而，稳定不等于不发展，油田的多种经营、科研技术水平、经济效益还要不断发展。另外，我们不是不想发展，稳定也还是想发展。如果年产5500万吨能搞到6000万吨，那不是更好吗？所以，稳定是个最低的要求，我们还

是要重视东部油田的发展。中央还认为，贯彻关于“稳定东部、发展西部”的方针，中国石油天然气总公司是认真的、努力的，但是现在看起来力度还不够。因此，中央认为应该加强“稳定东部”这个力度。西部现在一下子拿不出来那么多石油，东部稳不住怎么得了！中国这么大一个国家，今年从过去的石油净出口国变成一个净进口国，这是一个不好的转折。我们应该看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不能够再说这是自然的，或者说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那可不行。我们国家的这个战略命脉不能操纵在外国人手里，我们还是要加强自己的石油工业。发展西部是毫无问题的，希望在西部，可是目前还拿不出更多的石油来，所以“稳定东部”的方针，力度要够，要加强。我们现在要采取有力的政策措施，来支持石油工业发展。但是现在勘探费不够，打的井不够，所以我们决定提高原油价格。按我的想法，去年提出了三个方案，每吨涨到700元、800元、900元。后来李鹏同志决策，决定采取700元这个方案，这样比较稳妥一点，否则推动物价上涨比较厉害。

大庆油田年产5600万吨石油，在20世纪要稳定，20世纪以后我希望也要稳定，不应该降下来，也不能让它降下来。年产量降下来怎么得了！这是个信心的问题。东部油田的年产量一定要稳定，不能降下来。你们告诉我，搞三次采油，采收率可以达到50%。此外，还可能发现新的油田。我是管宏观、算大账的，算大账的结果就是5600万吨的年产量20年不能下来。没有钱我给你保，千方百计保你的勘探资金，可是你不能弄得比进口油还贵。如果超过国际价格，控制进口油就非常困难了。去年，钢材就没有控制住，成品油也没有控制住。我曾讲，国家计委就得在这个宏观控制上下工夫，但也确实难得很。如果国内价格高了，走私、弄虚作假什么都来了，是很难办的事情。所以，大家还是要把科研、三次采油、聚合物赶快搞上去，多来找油，降低成本。你们稳油控水搞得很好，看样子原来对用电量估计得太多，现在一搞稳油控水，用电也不要那么多了，电就是钱。这是从全国的石油形势讲到大庆的稳产。

二、对大庆提一个希望

应该把大庆建成一个多种经营、综合发展的基地，一个现代化的城市，不能够单打一。这方面，大庆的潜力大得很。100万人，5000多平方公里的面积，跟上海差不多，一片平原，有水，就是无霜期短一

些、天气冷一点。这么好的条件，应该把大庆发展成为一个“北国江南”。你们刚才讲的发展替代产业，这是可以考虑的，应该是农、林、牧、副、渔以及第三产业全面大发展。只搞工业，投资很大，解决不了很多人的就业问题，回报期很长，国家的投资没有那么多。大庆发展农、林、牧、副、渔是很有条件的。一个是农业，大庆市一共有100万亩地，现在才开发了20万亩。这里有土地，有技术，有拖拉机，搞现代化的机耕，完全可以建成一个很大的农业生产基地、一个粮仓。我对农业不是很熟悉，但我想黑龙江省应该有这个条件。我印象最深的是大庆造林不够，没看到多少树林。我到宁夏黄河灌区去过，那里真是“塞北江南”，好像到了苏州、无锡一样。要造林啊！总之，我觉得大庆应该在农、林、牧、副、渔方面更敞开思路，谋求大发展。

石油工业跟煤炭工业是同一个问题，就是“吃油人”太多。现在全国统配煤矿有360万人，我估算了一下，100多万人足够了。真正把煤矿搞好，就要把多余的200多万人从煤矿里转出来搞多种经营、综合利用，发展第三产业。这样，煤矿才活得下去，才能结束吃国家补贴的历史。石油工业也有这个问题，就是人多。大庆油过去成本低，一吨几十元钱，现在一吨280元，增长了10倍。过去你“吃油”还可以，现在不行了，还是要把多余的人赶快转出来。

我看大庆会建成一个很漂亮的城市，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绿化搞得很好，像江南一样。你们的城市要重新规划一下，总得有一个市中心。要考虑到大庆发展的前途，不要增加人。城市太大了，是个很麻烦的事。搞现代化嘛，你们有的是技术，这样大庆就会很富裕了，那时就有钱支援工业了，不是像现在这样大家都靠油吃饭。

严防金融诈骗

(1994年5月25日)

1994年5月25日，国务院在北京召开“三防一保”(防诈骗、防抢劫、防盗窃，保证资金安全工作到位)电话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国务院有关部门、各金融机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及其他有关部门的负责同志。全国县以上各级人民政府主管金融工作的负责同志和各级金融、公安等部门的负责同志，分别在2000多个分会场参加了会议。这是朱镕基同志在会上讲话的一部分。

国务院为什么要召开这样一次电话会议，并把这个会议一直开到国家银行的县支行呢？这是因为现在金融诈骗已经成为我们银行系统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大家都记得，去年发生过农业银行衡水支行开出100亿美元信用证的大案。江泽民同志作了批示，他指出，这个案子告诉我们，金融系统的秩序混乱、纪律废弛，已经到了何等惊人的程度。但现在看起来，我们银行系统并没有真正吸取教训，这种金融诈骗案件还在发生，有几个特点：一是范围越来越广。从农业银行这 件事情开始，紧接着中国银行被骗换1.5亿美元汇到外国去了，又来了一个建设银行哈尔滨第二支行开出大额外汇存单，还出了一个工商银行上饶支行的案子，等等。二是情节荒唐。到银行骗钱太容易了，简直就像天方夜谭一样，传出去要成为国际笑柄。衡水支行的案子是100亿美元信用证。最近又发现一个诈骗分子谎称能引进500亿美元，并且已经存入工商银行。稍有常识的人，怎么会相信这种事情？三是性质恶劣，恶劣到可以假造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印章、信件。四是损失严重。为了追回衡水支行100亿美元的信用证，不知费了多少心血，钱也花得不少。这200张信用证虽然都控制住了，但还没有完全追回。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一方面是我们有些同志急于利用外资，又缺乏金融常识，上当受骗；另一方面，银行系统也存在不少问题。对此，我认为有三点教训：

第一，金融系统部分领导干部保护国家资产、维护国家利益的责任心太差了。骗钱这么容易，简直是把银行金库的大门钥匙交给了人

家，随便可以把钱拿走。现在我们银行系统内部不断发生贪污、侵吞国家财产的案件，作案的人大多是年轻人，我们很痛心，对他们教育不够。当然，这种案件在任何一个队伍里总是会有的，总是有极少数的败类。只要我们执法如山，这个问题是可以解决的。他们侵吞的银行公款，不管是几十万元还是几百万元，有一个就依法重判一个，这无损我们银行系统这支光荣队伍的形象。真正可怕的是，我们这个系统的部分领导同志没有责任心，敞开金库的大门，损失的就不是几十万元，而是几亿元、几十亿元，甚至是上百亿元。如果衡水案件的罪犯得逞的话，损失就是100亿美元，这种失职、渎职行为何以面对人民！我看，同志们应当把这个问题提到共产党人应有的对人民负责的高度责任心上来认识。我们作为国家的职工、共产党员，起码要有保护国家财产、维护国家利益的责任感。

第二，部分金融机构不执行国家的法律法规、规章制度，也已经到了非常惊人的地步。我们的银行法律法规离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标准还有较大距离，我们还要进一步加强立法工作。但是，现在已经有的法律法规不执行，这确实像江泽民同志讲的是秩序混乱、纪律废弛。比如，中国银行这1.5亿美元，怎么能汇得出去？每个业务环节都有制度规定，如果大家都按制度办事，就不会发生这种事情。



1994年5月25日，朱镕基在“三防一保”电话会议上讲话。前排右二为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罗干，右三为国务院副秘书长李树文，右四为公安部副部长牟新生。

第三，金融系统部分领导同志，也包括一部分职工，政治、业务素质确实不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很简单的问题，就是真伪不辨。

所以，应该提醒金融系统的全体职工，我们要从以上三个方面来检查自己。今后，不能再让金融诈骗案件泛滥、横行下去，不能再发生这种严重的大案。金融系统的全体职工都要负起责任，如果让这样的失职、渎职行为继续下去，人民是不会答应的。

这里我要提醒大家，不能轻信某些人借口为国家引进外资行骗，不要听那一套。利用外资无非是两个渠道：一是通过世界银行等国际金融组织借款、政府借款，以及商业银行借款。没有经过国家批准，没有纳入国家总量控制计划，谁都不能随便去借钱。二是直接投资。外国人直接来投资，搞合资经营。也有的是向外国银行借钱，要担保，

这要经国务院授权。因此，利用外资都要走正常的渠道，国务院对此有一系列的规定。各个银行只要有国际金融业务活动的，都要认真地把国务院的有关文件学习一遍，这些文件对报批程序和授权机关都有明确的规定。我赞成刚才牟新生①同志讲的：“管好自己的人，看好自己的门，办好自己的事。”根本不许搞国际金融业务，你非要办，违了法，出了事，要处分；没出事，也要处分，因为你违法越权。

① 牟新生，当时任公安部副部长。

请同志们从上述三个方面去检查，制定今后防范再次发生金融诈骗案的措施。首先要加强学习，无知就容易犯错误，就会给国家造成很大的损失。如果发生了这样一些案件，只要看出一点苗头，就应赶快补救。报案要及时，公安机关反应要迅速，该抓的就把他抓起来，该控制的就把他控制住，分秒必争。钱一汇到国外就麻烦了，官司就扯不清了。所以，我重申，如果银行已经察觉发生了金融诈骗案件，你还在隐瞒或不及时报告，就要追究你的责任。我们过去发生的案件，有的就是因为各级银行一层一层往上报告把时间耽误了。同志们，大案要一下子报到国务院来，国务院再组织各有关政法部门来破案。如果耽误了时机，这案子就难破了。希望同志们好好地传达和学习这次会议的精神，今后不要再发生这种事情，至少不要再发生大案。

搞好粮食价格和购销体制改革

(1994年5月27日)

1994年5月26日至27日，国务院在北京召开全国粮食价格改革工作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常务或主管副省长(副主席、副市长)、财政厅(局)长、物价局局长、粮食局(厅)长、工商局局长，河北、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苏、江西、山东、河南、湖北、湖南、四川、辽宁省的农业厅厅长，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这是朱镕基同志在会上总结讲话的主要部分。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粮食是万物之首。粮食价格和购销体制的改革，是关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能否平稳运作和国民经济能否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重大问题。党中央、国务院对农业非常重视。1992年，针对当时不少地方忽视农业、撂荒耕地、收购“打白条”的情况，江泽民同志召开六省座谈会，李鹏同志召开全国电话会议，部署解决。去年成立了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10月份召开了第一次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确定了要提高粮食收购价格，调动农民的种粮积极性。11月粮食价格暴涨以后，通过国有粮店挂牌降价的方法，刹住了当时的涨价风。12月份我们召开平抑粮价的第一次会议，今年1月份又召开了第二次平抑粮价的会议，把粮食价格稳定在一定水平上。今年3月八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后，中央又召开了第二次农村工作会议，部署了今年粮食价格和购销体制的改革。在此前后，党中央和国务院领导同志以及派出的几批调查组，同各省区市的负责同志充分交换了意见。最近，我又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的负责同志，先后在武汉、郑州召开了座谈会，就中央的方针和政策再次征求了他们的意见。前前后后、上上下下、反反复复，来回了好几个过程。经过这样的反复商量，中央和地方的认识基本上统一了，虽然时间晚了一点，但工作做得更充分了。这次全国粮食价格改革工作会议开得很顺利，江泽民同志和李鹏同志委托我来讲一讲，今天我讲两个问题。

一、粮食价格和购销体制改革要达到三个目标

第一个目标是换来一个粮食收购价格形成的机制。粮食的收购价格要体现三个原则：第一，要调动农民生产的积极性，也就是说，这个价格使农民除了补偿生产粮食的成本费用以外，还能够增加收入。现在农业生产资料涨价很厉害，如果不能得到补偿，农民怎么会种地呢？补偿了成本以外，还要能够使农民增加收入，这样农村市场才能够开拓。第二，这个价格要能够逐步缩小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同时又能够调整好工农业和农业内部各业之间协调发展的关系，促进形成一个合理的产业结构。要一下子消灭剪刀差不大可能，但总得逐步缩小，而且在农产品内部，比如说在粮食和棉花之间，都要有一个合理的比价。第三，城市的消费者能够承受。粮价高一点，农民当然高兴，但吃粮的人要能够买得起。既要考虑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又要考虑各方面的承受能力。因为粮价还牵涉棉花等经济作物、猪肉等副食品，确定粮价要瞻前顾后、全面安排。

第二个目标是形成一个稳定、合理的粮食销售价格。粮食销价要随购价而顺加，但又不要引起大的物价波动，要保持社会的稳定。粮食购价提高后，销价不顺加，又会形成新的倒挂，导致财政大量补贴销售环节。而销价调整，又要考虑城市居民的承受能力，不要引起物价大的波动。

第三个目标是建立一个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的，放而有管、管而不死、购销方便、调度灵活的现代化的粮食市场。不能把放开价格理解为放开就不管了，我们在去年11月份就吃过这个亏，引起了一场大涨价。所以，我讲要放活，但是要管，管而不死。购销方便，说的是农民交售粮食很方便，粮食的批发、零售也很方便，包括粮食调运方便。我们的目标是建立这样一个现代化的粮食市场。

我想，如果这三个目标实现了，就可以保证粮食生产和农业稳定发展，这是关系国民经济发展、国家长治久安的一件重大事情。我们的工作，就是围绕着这三个目标进行，差不多搞了整整一年。

第一个目标，就是粮食收购价格怎么形成？这是问题的核心。农民种不种粮，不只是看你给这个条件、给那个条件，而主要是看收购多少钱一斤。从去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开始，我们讲了一句话，粮食价格应该由市场形成。看起来地方的同志们都没有太理解，或者说跟我的理解不一致。现在定的收购价格，基本上是根据当前的市场价格再

加一点，符合我前面讲的三个原则。定了这个收购价格以后，我们就要通过国家掌握的粮食来吞吐调节，使市场基本上维持这个价格水平。当粮食价格下跌的时候，我们还是用这个价格大量收购，稳住粮价。当价格上升的时候，我们就要抛出库存，平抑粮价。总之，要基本维持在市场形成的这个价格上面，不能让投机分子把它哄抬上去或者把它压下来。实际上，我说这就是个定购价格，无所谓什么“议购价格”、“市场价格”，因为这本身就是一个市场价格。也无所谓什么“保护价”，因为就是要用这个定购价来稳定粮价，那么它就又是个保护价，保护农民利益嘛。可是这句话大家都不理解，总认为取消了议购价。大家有个传统的概念，就是定购价是低的，这个低价农民是认了，因为这是“皇粮国税”，你低价我也得交售；议购价是高的，应该放开。现在好像把这个政策收回去了，把过去总共收购的1800亿斤粮食都变成定购粮了，没有议价粮了。这个1800亿斤，去年有1000亿斤是定购粮，是低价；800亿斤是议购粮，是高价，特别是去年11月份涨得更多。今后你说就实行一个价，再怎么解释，大家也不容易接受。经过听取地方同志的意见以后，我们就把“粮食价格应该由市场形成”改成三句话：第一句话是，定购1000亿斤的粮食，按国家规定的定购价收购。这个价格也是根据上述三个原则由市场形成的。第二句话是，800亿斤的粮食，随行就市收购，就是市价。有些同志就担心，这个定购价定得是很满意的，就怕那800亿斤维持不住这个价格。所以，第三句话就是，国家粮食系统要通过粮食的吞吐，来把市价基本稳定在定购价的水平上。往下浮动一点是可以的，往上浮动一点也可以，多了就承受不了，低得太多，农民的利益又受到损失。因此，“粮食价格应该由市场形成”这句话变成三句话，这三句话征求了很多同志的意见，他们认为满意了，说全了。这就叫做充分发扬民主，集中大家的智慧。我想这次把这个问题向大家讲清楚 了，这样大家就可以往下传达了。



1994年4月4日，朱镕基在天津市南开区照湖里粮店调查粮食供销情况。前排左四为天津市委书记高德占，左五为天津市市长张立昌。

第二个目标，就是粮食的收购价提上去了，粮食的销售价要顺加。如果不顺加，那又是个购销倒挂。我们确定销价这个机制，一方面要考虑不能购销倒挂，增加国家财政补贴，补贴只能买来一个落后的机制。但是另一方面，也要考虑城市居民能否承受得了，不至于引起物价的大波动，两方面都要照顾。现在定的销价同目前的市价比，没有什么大的提高。购价提了10%，加上费用，销价也涨不了太多。但是问题在于，我们中间搞了一次挂牌降价。国有粮食企业对几种主要粮食挂牌降了价，如果把现在顺加的销价同挂牌价格比起来，那就涨得很多了。这个问题要考虑，这是中央领导同志非常担心的，怕再来一次“冲击波”。我们考虑既要顺加，又要物价稳定，所以提出一个分步到位的原则。分步到位就是顺加销价的时候分两步。先跨一小步，个别地区甚至暂时不要顺加。过几个月以后，等物价稳定以后再往前跨。这中间会形成一些购销倒挂，无非是要财政补贴一点，由中央和地方共同来承担。

中央定的原则还是分步到位。各省区市可以分散决策，但是要确保一条：绝对稳定。如果一步到位，又不能确保稳定，那么，一个局部问题就可能会成为一个全国性问题了。所以，我们提出来，原则上分步到位，在确保稳定的前提之下，各省区市也可以考虑一步到位或者是第一步跨得大一些。我们是想稳妥一点，分步走比较好。如果一步到位，对于大部分人民群众来说，不是很大的负担；对那些低收入的人来讲，也不是吃不起，但他们的心理会不平衡，怎么又涨这么多呀，有可能造成社会的不安定。因此，党中央、国务院在考虑这个问题的时候，想了很多的办法，确定了几条措施来解决这个问题，这就是：

第一，两种粮食不涨价，一种是标准粉，另一种是标二早籼米。很多低收入群众都是吃这两种粮食的。这两个品种在国有粮店继续挂牌按原价销售，至少三个月以内不涨价。这样就保证了大多数低收入的群众在粮食问题上不受影响。谁来补贴这个钱呢？大家都分担一点，实际上还是中央多拿一点钱。35个大中城市，再加上农村的贫困地区、重灾区等等，所需要的粮食，由国家把储备粮拿出来。价格要使基层的粮食企业不赔本。我们准备了100亿斤到150亿斤粮食，保三个月没问题。三个月之后，如果物价稳定了，可以再走一步，那就往前走；如果还是不行，那么再延长，反正我们下定决心稳定物价。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措施，这个措施一定要落实。各地区要与内贸部密切衔接。铁道部要把粮食运到销售点或加工点作为压倒一切的任务。保证有充分的粮食储备，有价有市。要估计到尽管有些城市居民现在不吃早籼米，也不吃标准粉，但是当粳米和富强粉涨价以后，可能他们又会吃不涨价的了，所以还得多准备一点。35个大中城市和重灾区、贫困地区以外的其他城镇，就得请地方政府来保证这两种粮食的平价供应。

第二，定向补贴。粮价涨了，你补多少？前面讲了，全面补贴是不行的。对确实有困难的人，我们要给他们以适当的补贴，钱由中央和地方财政按照隶属关系来承担。补贴范围和标准呢？一是城镇优抚救济对象，按照标准每月补6元钱。二是军队和武警官兵。按照军粮供应办法，算出来差价是多少就补多少，中央和地方财政各分担50%。三是大中专学生，平均每人每月补5元钱。不过，这个钱是补贴到学校，

具体如何补贴到学生由学校来决定。不可能平均去补，学生也有贫有富，不要规定那么死。其他需要补贴的对象，笼统一点，让地方政府决定。

第三，对于吃返销粮地区的农民，从各省粮食风险基金中补助。粮食风险基金有两种。一种是中央风险基金，就是支付国家储备粮的费用和利息。另一种是地方风险基金，用于两个方面：一是刚才讲的为了维持市场价格、稳定粮价，必须吞吐粮食。这里产生的费用，如果没有一笔基金来支持，就吞吐不了。二是用于补贴吃返销粮地区的农民。这个如何补贴，完全由地方政府决定。我们只负责帮助地方建立粮食风险基金，不去决定具体用途。中央财政每年拿出32亿元分给地方政府，帮助地方政府建立粮食风险基金。地方财政拿出的资金，中央原则上规定是按1：1.5的比例安排。但有些同志说，地方按1.5拿太高了，没那么多钱，或者说也不需要那么多钱。反正要能够维持稳定才行。

第四，为了使粮食系统有能力支持粮价的分步到位，必须给粮食系统以政策支持。我们决定根据去年中央11号文件①精神，落实粮食挂账停息。按照文件规定，今年6月30日以前，大家要报来过去的挂账，其中多少是属于政策性的，我们再核定。核定以后，逐步把利息给停了。我们希望多停一点，快停一点。但是，大家要想在一年内都把它停了，恐怕财政也受不了。我们尽可能地做吧。大体上需要多少钱呢？我们算了一下，按照1991粮食年度界限，450亿元的粮食挂账，属于政策性的有275亿元，一年的利息近30亿元，如果都免了，今年财政恐怕受不了，但总归要免掉相当大的部分。这样，粮 食系统的经营状况就会好转一点。拿了这笔钱，一个是为了维持稳定，粮食销价分步到位，如果出现购销倒挂，就得补贴。另一个是还账。进口的粮食没给钱，欠得最厉害的一个是内蒙古，还有辽宁、湖南、湖北。还是把钱还了吧，这个钱还了，债务链就解开了。千万别把这个钱吃掉，或者盖大楼，或者干别的什么了，炒房地产、炒股票，那是绝对不允许的，不许挪用。

---

① 中央11号文件，指1993年11月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当前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

第五，要做好应变准备。采取了这么多措施后，我还是不敢说万无一失。就是怕万一粮食牌价这么一变，导致或者是抢购粮食，或者是抢购其他副食品，或者是抢购工业品。大家要做好一切准备，该储备的一定要储备，一旦发现市场上抢购什么东西，限价没有用，只要把库存一抛，马上就稳住了。铁道、交通，还有港口，都得保证把粮食运到位，运到销售点。我看这个问题不太大，抢购也抢不垮我们，库里有的是粮食。食用油没什么可抢购的，为什么呢？根据各地的信息，油菜子都是丰收的。而且，我们进口了80万吨食用植物油。国际油价很低，我们买80万吨油，并没有把价格抬上去，还稍微有些降低，马上就陆续到货，所以食用植物油的库存是充足的，不怕抢购。我最担心的就是猪肉，各地情况不一样，有的地方猪肉库存多，有的地方恐怕不行。要及早储备一些，价格上扬就抛嘛。

全国四种主要粮食，稻谷多提一点价，因为稻谷价格在去年11月提前到位了，同时也是为了鼓励早籼稻的生产。小麦少提一点价, 因为小麦价格没有到位。这次小麦价格提得也真不少。玉米不提价，因为玉米关系到饲料，饲料价格现在涨得很高，再提玉米价格，饲料还得涨价。如果饲料价格再涨，肉、禽、蛋也跟着再涨价，那就不得了。所以，现在玉米不提价，物价部门要把饲料价格管住。大豆价格略有降低，由于现在大豆出口看好，有些地方在那里抬价抢购，要加强管理。有的同志希望玉米再多提点价，我们不是不愿意多提，而是担心饲料价格再涨上去。基本上是这个原则，但是也不能保证肉、禽、蛋一点不涨价。因此，大家要加强市场管理，对于其他比较紧缺的商品也都要有一定准备。我估计问题不会太大，但总要有足够的准备。所以，请各地在这个时候不要搭车涨价了，不要趁粮价调整之机乱涨价，无论如何要管住。现在上海搞了反暴利法规，反对垄断价格，反对扰乱市场，大家都可以立法，把市场管住。

我想，在采取了以上这五项措施以后，基本上就可以把市场稳定下来了，不会引起太大的波动。

第三个目标，就是加强市场管理，形成一个真正现代化的粮食市场。这次我们搞了一个文件①，还比较粗，但意思都有了，那就是不许非国有粮食批发企业到农村抬价抢购，要买就到县以上批发市场购买，只能由当地国有粮食批发企业到农户去收购。对进入粮食市场的

批发企业，第一，工商管理局要管理。得有批发商的资格，有流动资金，有存储的场地，有一定的资信。要经过审定才能入场。第二，税务局要管。要交税，不能到场外交易，偷税漏税。加强市场管理，已经成为我们现在能不能实现这三个目标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了。同志们，你们各地都要自己管住市场，无论如何也要把它管起来，不要怕人家指责。我有充分的根据说明，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粮食市场都是由政府管理的。国家计委发了个电报给我国驻各个国家的大使馆，各大使馆都回了文，说明国外的粮价是怎么管的，农产品市场是怎么管理的，没有哪个政府是不管的。政府不能够放任自流，这一条非常重要。我想，只要大家共同努力，粮食市场是可以管得住的。

---

① 指1994年7月2日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国家粮食储备局下发的《关于加强粮食市场管理，做好粮食批发企业清理工作的通知》。



1994年4月15日，朱镕基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考察粮库。右一为国家计委副主任郭树言。

二、现在是进行粮食价格和购销体制改革的一个最好的时机

当前的宏观经济形势是好的，比去年要好得多，是有利于实行改革的。当然，目前物价有点不稳定，今年1到4月份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是20%，但是这个20%有“翘尾巴”的因素，因为去年第一季度物价还没有涨上去，是去年11月暴涨上去的。因此，今年第一季度就显得高了一些。国家计委计算了一下，这次粮食购销价格调整，从全国来讲，只影响物价指数上升1%，不会影响很多的。如果能稳定在这样一个水平的话，物价指数越往后会越下降。到第四季度，我看基本上物价的上升幅度就不大了。这样，全年物价涨幅维持在10%或者超过一点，问题也不是太大。只要能够保证低收入群众的生活水平不受很大影响，我看局面稳定是可以维持的。所以，这是个好的条件。

但是，实现上述三个目标，维持大局的稳定，也不是那么容易，难度还是很大的。原因是人民群众的心理状态还不稳定，对于涨价的心理预期还是比较大的。已经有两次“冲击波”了，一次是去年11月份开始的粮价暴涨“冲击波”，今年三四月份又来了一次。而后面这次还是去年粮食涨价风波慢慢往北方地区波及造成的。粮食价格一涨，其他东西跟着乱涨价。这次粮食价格动一下，尽管采取了上述五项措施，也难说一点物价波动都不会发生。因此，希望大家要认识到这次粮食价格和购销体制改革是今年改革的最后一次决战。这一仗打完了，如果物价没有太大的波动，谢天谢地，形势大好。如果这一仗打输了，来一次物价大波动，今年好的形势就给冲掉了。无论如何请同志们不能掉以轻心，回去后一定向你们的省委书记、省长汇报，就说江泽民同志、李鹏同志委托我在这个地方向同志们呼吁，一定要重视这次粮食的调价和购销体制的改革，不能出半点差错，保证万无一失。中央领导同志很忧虑，担心我们工作没有做好，引起一场物价大波动，引起人心的不稳定。通过几次会议，应该说中央和地方领导干部统一了认识。可是，下面的干部和群众是不是理解我们的想法，就不一定了。因此，这次一定要做好党内的思想动员工作。我们搞了一个宣传提纲，将很快以党中央、国务院的名义发给大家。为什么要用党中央、国务院的名义呢？就是要引起省委书记、省长的重视，这件事情太大

了， 希望他们要亲自抓。程序上还是采取我们传统的办法，先党内、后党外，先领导、后群众。要按照统一的宣传提纲，结合当地情况，把理由讲透，说明为什么要做调整，怎么个调整法，党中央、国务院是如何关心大家生活的，采取了什么措施来保证市场的稳定，条件是如何的好，现在形势是如何的好。绝对不会发生大的连锁反应。要安大家的心啊! 有个前提，大家要遵守纪律，不要自相惊扰、庸人自扰，扰什么呀？不会发生什么大的问题，不会影响大家的生活水平嘛。各地要规定几条纪律，党员干部绝对不允许在这个期间上市场去抢购任何物资。谁这么干，要给谁纪律处分。这一点你们回去一定要跟省委书记、省长讲清楚，请他们亲自挂帅，把今年改革方面的最后一次战略决战打好。这一仗打好了，农业就稳定了，今年什么事情都好办。同志们，我希望我们大家高度重视，同舟共济，齐心协力，把这一仗打好。

纪念宦乡同志

(1994年5月29日)

这是朱镕基同志应邀为《宦乡文集》撰写的序言，原标题为《心里的话》。编入本书时，对个别文字作了订正。

宦乡同志是我国著名的国际问题专家、杰出的外交家和社会活动家。他在许多领域里造诣很深，建树甚多。作为一位学者，他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学术生涯中，为我们留下了大量的作品。这些作品既记录着宦乡同志个人的思想脉络和学术贡献，也折射出一个时代的历史进程，其中不少文章至今仍对我们富有启发和借鉴价值。继出版《纵横世界》和《纵横世界续编》之后，世界知识出版社又准备出版《宦乡文集》。这本文集收集了宦乡同志从1941年到1988年的近50年中，在报刊上公开发表的论文160余篇。作为他生前的老朋友，我应宦乡同志的家属和他生前所在单位——中国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的要求，怀着真挚的友情和深切的思念为这本文集写一点心里的话。

我与宦乡同志相识相处的时间不长，相知却比较深。我们彼此从事的工作不同，从来没有在一个单位共事。只是在1987年年末，我率中国代表团参加在美国夏威夷召开的太平洋论坛会议，他作为代表团的顾问，我们朝夕相处了一段难忘的时光。平时，我们曾经有过许多次促膝深谈，只要有机会，我们彼此就愿意交换对一些问题的看法。特别是80年代末，他身患重病在上海治疗期间，我多次前去探视，每次都要谈很长时间。宦乡同志博古通今，学贯中西，对许多问题都有精深独到的见解，与他交谈可以得到很多启发。同时，我不能不为他的忧国忧民、直言无惧，以及他在生命最后时刻表现出的对国家、对人民的深沉关切，对自己生命力的信心所感动。

已经记不清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间，但是我对宦乡同志是心仪已久。宦乡同志在我国报界、外交界和学术界，都有着不可磨灭的地位。

宦乡同志在青年时期带着强烈的爱国主义和民主主义思想，参加了进步的社会活动。1938年，他年仅29岁就出任国民政府第三战区《前线日报》总编辑，投身抗战宣传，发表了许多具有鲜明战斗性的文章。在此期间，他逐步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思想影响。抗战胜利后，他来到上海，1947年担任《文汇报》副主笔，1948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9年上海解放前夕，在党组织的安排下，他来到刚刚解放的天津，担任《进步日报》总编辑；不久即到北京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备工作，任筹备处副秘书长。

新中国成立后，宦乡同志从新闻界转到外交界，任外交部欧洲司司长；1954年奉调出使英国，担任驻英代办处常任代办；1962年回国后，任外交部部长助理兼研究室主任；1976年恢复工作后，奉调出使欧洲共同体，兼任驻比利时、卢森堡大使。在外交战线，宦乡同志表现出杰出的才智和大国外交家的风度，为我国的外交事业作出了贡献。

1978年回国后，宦乡同志又从外交界转到学术界，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党委书记、副院长。1982年，他负责组建国务院国际问题研究中心(1988年更名为中国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并任该中心的总干事。这一时期，他在组织和推动全国对国际问题的理论和政策研究、建立和发展我国的国际关系学科、培养研究国际问题的年轻人才、广泛开展对外学术交流和民间外交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十多年来，他发表了大量研究报告和学术论著，受到国内外的广泛重视。他卓越的学术成就，使他成为我国当代最著名的国际问题专家，在国际上也享有崇高声誉。

宦乡同志的品格同他的学识一样令人钦佩。在宦乡同志身上，有一种强烈的正义感，有一种“死犹未肯输心去，贫亦其能奈我何”①的气概。他常引用一句古人的话：“用心于正，一振而群纲举；用心于诈，百补而千穴败”②，来表明他的人生观。纵观宦乡同志的一生，他确实是敢于说真话，从不说假话，为了坚持真理，虽九死而无悔，他的言行是一致的。从他的履历来看，新中国成立前，他长期工作在上海等大城市，活动在知识界和上层社会；新中国成立后，他多次出任驻西方国家的使节，在世界著名政治活动家和知名学者聚集一堂的国际会议上，用流利的英语侃侃而谈，词严义正。可以说，他是位十足的“洋

派”知识分子干部。难能可贵的是在他的身上，始终保持着农民一般的勤俭朴实的淡泊作风。在我与他的交往中，他简朴的衣着、忠厚而毫无虚饰的言谈，给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在追逐金钱、爱慕虚荣、贪图享乐和一掷万金的风气有所抬头的今天，宦乡同志的这种作风尤其值得提倡。

---

① 见明清之际黄宗羲《山居杂咏》。原诗为：“锋镝牢囚取次过，依然不废我弦歌。死犹未肯输心去，贫亦其能奈我何！廿两棉花装破被，三根松木煮空锅。一冬也是堂堂地，岂信人间胜著多。”

② 见北宋苏洵《用间》。

宦乡同志在生命的最后时刻①，依然十分乐观。他不介意自己的疾病，却时时心系国家的前途命运。他是带着对祖国和人民的深深眷恋和殷切期望，离开人世的。可以告慰宦乡同志的是，在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导下，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我们的国家又有了长足的进步。今天写这篇短文，主要是寄托我们对宦乡同志的纪念，同时，也希望这本文集能让读者更多地了解宦乡同志，了解历史，从而得到更多的启迪。

---

① 1989年2月，宦乡同志因患肝癌于上海辞世，终年80岁。

卖地收入首先要用于安置拆迁户

(1994年6月4日)

1994年6月3日，建设部部长侯捷向朱镕基同志报送《关于请求解决城市拆迁安置住房建设专项贷款资金的紧急报告》，反映各地旧城改造规模大幅度增长，拆迁过渡周转用房严重不足，希望中国人民银行安排5亿元的专项贷款，用于沈阳、 哈尔滨、上海等10个问题比较突出城市的拆迁安置住房建设。这是朱镕基同志在该报告上的批语。

椿霖①同志并告侯捷同志：

城市拆迁应该有计划、有步骤，量力而行。现在有些城市不顾后果，大量卖地，大量拆迁，置拆迁居民于不顾，这样搞下去要影响社会稳定。应由有关部门联合发个通知，提请地方注意。卖地收入首先要用于安置拆迁户，要国家来背这个包袱是背不起的。请酌。

朱镕基

6.4

---

① 椿霖，即何椿霖，当时任国务院副秘书长。

稳定农业生产资料价格

(1994年6月17日)

1994年6月14日至17日，朱镕基同志在吉林省考察工作。这是朱镕基同志在长春与一同前来考察的国务院有关部门同志研究工作时讲话的一部分。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我们发展农业的主要经济杠杆，也就是我们党对农业的主要政策手段，是农副产品价格。近几年，党中央、国务院注意提高农副产品价格，差不多每年都提高1角钱左右，尽量使农副产品价格符合市场规律，体现了保护农民的利益。但是这还不够，特别是1992年以后，我们在农业政策方面出现了一些问题，比如“打白条”、乱摊派、占耕地等，加之随着乡镇企业的发展，对沿海地区农业比较效益下降等问题估计不足，影响了农业的发展。所以，从去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以来，我们进行了多次的调查，投入了很大的精力来研究这个问题。我们一直都在研究怎样做使粮食的价格既能抵消农业生产资料价格的上涨，又能使农民的收入有一定的增加，逐步缩小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现在，我们确定的粮食定购价格，并不是过去意义上的低价，而是一个相当高的价格，国家为此承担了很大风险。所谓“风险”，就是现在的粮食价格比去年的定购价格涨了40%，比现在的集市价格涨了10%，这样高的价格，会加重城市居民的生活负担。这个价格比起国际价格，已经不是很低了，但是我们觉得还是应该冒这个风险，因为没有农业这个基础，没有农业的大发展，实现整个国民经济的高速发展是不可能的。我们宁愿承担这个风险。

根据我最近一段时间的调查，包括我今天去过的公主岭市凤响乡，农民对现在这样一个粮食价格还是高兴的。许多农民都认为，只要现在的农业生产资料价格不再往上涨，就可以种地了。我们对这一点一定要有足够的估计，不能对即将到来的农业生产高潮估计不足。为什么今年的化肥价格这么高，农民还要种粮？因为农民一算账，种地还是合算的。粮食价格是党的农业政策的核心部分，是调动农民积 极性的主要经济杠杆。最近，有一种观点认为，粮食调价推动物价上涨1.5

至2个百分点，而农民得到的实惠，全被农业生产资料涨价抵消了。这个观点是不正确的。农业生产资料价格主要是化肥价格，去年和今年年初就已经涨上去了，现在定的粮食收购价已经考虑到补偿农资涨价以后还有相当大的余地，不然为什么农民的种田积极性大大提高，而化肥到处供不应求？至于粮价调整推动物价上涨，是会有一点，但由于我们采取了周密措施，绝没有那么大影响，粮食的集市贸易价格早就已经涨上来了。我们这次没有提玉米价格，因为玉米价格一涨，饲料跟着涨，肉、禽、蛋也涨。玉米和饲料价格稳住，肉、禽、蛋的价格就上不去，粮价调整的连锁反应就不会大。据我们测算，这次粮食购销价格调整，对整个物价的拉动只有1%。因此，不能低估这次粮食购销价格改革的积极意义。粮食调价已经取得了成功，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积极性。要巩固这个成果，农业生产资料价格一定要稳住。这样做可不可能呢？是可能的。因为农业生产资料价格已经涨上来了，已经够本了，如果再涨，高于国际市场价格，就会卖不出去。但是如果当时不涨，继续压企业平价供应，也不行。化肥厂亏损，企业就不干了。把价格压住，结果是没有化肥可买。当然，化肥企业只能保本微利。现在化肥的供应价格大大高于出厂价，是由于流通环节秩序混乱，工厂、农资公司、各种中间环节哄抬倒卖所致，必须整顿。

前些时，《人民日报》发表一位农民的谈话，他说现在不是农业效益低，而是地没有种好，把地种好了，效益不会低。他讲得很好。要提高收入，就要搞精耕细作、多种经营，不然，粮食再提价也是不行的。

下一步，就是要稳定农业生产资料的价格，甚至稍有降低。要实现这个目标，就要对农业生产资料的经营环节进行改革，减少中间环节。从现在开始，需要对几个问题作出决策：第一，压缩农业生产资料销售环节。从今天大家反映的情况和意见看，第一步是否可以考虑把大区的一级站取消，把经营、结算的功能收归内贸部农资总公司。我看已经到时候了，要取消一级站，把省下的流通费用留给农民。第二，各省要像吉林省那样，流通环节最多保留省、县两级，省级批发、县级批零结合，乡镇基层供销社代销。第三，是否要明确实行专营，至少是对化肥。这几点请大家研究。我觉得任何事情都不能绝对化，要发挥主渠道的作用，可以把专营的比例提高一点，但不能搞成

绝对的垄断。要允许工厂有点自销，但只能自销到有权经营化肥的单位，而不能销给农民，防止倒卖。多渠道的经营比较灵活。第四，汲取和总结石油流通体制改革的经验，统一定价，统一费率。要有地区差价、品种差价、季节差价、质量差价，但是基准价格必须统一，这是不能动的。物价部门要加强监督管理。国产化肥不统一定价，就会与进口化肥发生矛盾，会出现到处采购、花高价抢购、高价销售，结果是农民吃亏。要按必要环节批发下去，每个环节都有统一的费率。这样可以把费用降低一点，供销企业搞一些多种经营，分一点人员出去，不能都去“吃”农民。供销社要进行体制改革，精减人员，改善管理。通过这样一些改革，农业生产资料价格可以基本保持稳定，或者说稍有降低，使农民从中真正得到好处，种田的积极性就会得到巩固。我看，农业发展的高潮就会到来，整个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就有了基础。



1994年6月16日，朱镕基在吉林省公主岭市考察农贸市场。前排右五为农业部副部长万宝瑞。

对平抑与粮食有关商品价格的意见

(1994年6月17日)

1994年粮食价格改革方案出台后，实施顺利，市场平稳。但也有部分市地反映，出现了与粮食有关的部分商品价格有所上扬、少数地方农民对农资实行最高限价的呼声较高等问题。这是朱镕基同志在1994年6月17日《粮食价格改革信息专报(九)》上的批语。

椿霖①同志：

可印发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研处。玉米、饲料未涨，肉禽蛋涨价是哄抬，要提请有关省市注意组织货源，加强市场供应和价格管理。化肥要赶快把进口化肥拨下去，告化工部开足马力生产，同时，要抓紧农资流通环节的整顿、改革(我在吉林调查，已有初步意见)。食用植物油按现价不会亏损了，关键是内贸部要把库存通通拿出来供应市场，平抑油价，不要怕库存放空，用进口油来补上库存。

许多地方都反映这次粮食销价提价幅度大大超过购价提价，粮食系统加工费用打得太高，结果粮店价格比集市贸易还高，这是不可能维持下去的，而且会鼓励农民、个体发展粮食小加工厂。此事请白美清①同志认真研究。顺告，吉林省改革进展顺利，粮价、物价都无波动。

(请席德华①、罗植龄①、杨昌基①、刘山在①、马李胜①、许宗仁①、贺国强①、万宝瑞①同志阅)

朱镕基

6.17

---

① 椿霖，即何椿霖，当时任国务院副秘书长。白美清，当时任国内贸易部副部长兼国家粮食储备局局长。席德华，当时任国务院副秘书长。罗植龄，当时任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任。杨昌基，时任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副主任。刘山在，当时任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副部长。

马李胜，当时任国内贸易部副部长。许宗仁，当时任国家粮食储备局副局长。贺国强，当时任化学工业部副部长。万宝瑞，当时任农业部副部长。

着力改善国有企业经营管理

(1994年6月21日)

1994年6月18日至21日，朱镕基同志在辽宁省考察工作。这是朱镕基同志在听取省委、省政府工作汇报后讲话的主要部分。

1991年，我为清理三角债到过辽宁，1993年也来过一次。总的感到，这几年辽宁省的经济工作在省委、省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基本建设、基础设施方面都有很大的变化，各方面都取得了很好的成绩。特别是在农业方面，抓得很有成效，粮食基本自给，粮食亏损在银行的挂账没有增加。通过发展多种经营和乡镇企业，农民的收入增加了。但我也要提醒，乡镇企业要巩固、提高，要看到这里面很多是水分。搞得不好还会掉下来，这方面要多做扎扎实实的工作。

问题有一个：国有企业还是没有太大的起色。应该讲，我们错过了一个很好的历史机遇。1991年我来辽宁，那是最困难的时候，因此国家减少辽宁省财政上缴的基数15亿元，对辽宁给予了很大支持。当时我就讲，国有企业要加强内部管理，搞内涵式扩大再生产，加速技术改造，加强经营管理，不能搞外延式扩大再生产。但是现在有些厂长的口气大得不得了，放言敢于“负债经营”。1992年，我就批判过这个口号。什么敢于负债经营？实际上是敢于赖债经营。借钱还得起是企业家，还不起是赖债。我特别强调企业要加强管理，加强技术改造，一再讲这件事。1992年下半年，经济形势好得很。投资拉动首先是拉动重工业，辽宁省是重工业基地，所以日子好过了。那时买钢材是要预付款的，我听说某机床厂积压了几年的机床全卖了，这是千载难逢的机遇，本应该抓住机遇把国有企业搞好，增强应变能力。结果还是搞原来那一套，稍微有一点钱就大发奖金，大搞基本建设，大铺摊子。结果，经济一过热，宏观调控一来，需求减少，国有企业就又陷入了困境。当然，国务院的宏观管理也有失误，钢材、石油的进口没有控制住，加大了辽宁省作为重工业基地的困难。我这次到辽宁省来，又请了十个企业的厂长开座谈会。厂长们的讲话还是那一套，还

是讲国家如果给他几个亿，就能扭亏为盈，根本没有看到辽宁省国有企业的问题在哪里，这么搞下去就是恶性循环。我不是说辽宁省工业企业这两年没有一点进步，但可以说进步甚微，特别是企业管理没有多大改变。我这里说得尖锐一点，给大家敲敲警钟。

我想就搞好国有企业讲几点意见，供同志们参考。

第一，不论是从全国来看，还是从辽宁省来看，当前国有企业的经营状况并没有比以前更坏，而是比过去有所改善。这一点是基本观点。不能把国有企业说得一塌糊涂，似乎越来越坏，搞得人心惶惶，不是这个情况。据今年1月到5月的统计，全国国有企业亏损面是49.5%。但实行“两则”①以后把暗亏变成明亏，实际上去年的亏损面比这大得多，在60%以上，现在亏损面比去年是减少了。企业实现利润表面上比过去减少了，实际上是增加的，这是因为一大部分进入了成本，留利减少，而实际效益是增加的。一些好的国有企业都变成合资企业了，剩下的是基础原材料企业。这些企业本来就困难，效益低，比不过“三资”企业。国有企业亏损面49.5%是按企业个数计算的，中小企业个数很多，实际产值占的比重并不大；如果按销售产值计算的话，国有企业亏损面是27%，不是49.5%。所以，不要夸大国有企业的困难。所谓“许多企业停产、半停产”，我们通过调查得知，这些企业大部分是过去早就停产了，如小化肥厂早就停产了。半停产是开工不足，我们搞了这么大规模的生产能力，怎么能开足？是足不了的。

---

① “两则”，指《企业会计准则》、《企业财务通则》。

第二，国有企业困难的主要原因绝对不是资金不足，其原因复杂得很。我们并不轻视国有企业的亏损面比较大、困难比较多，但是对产生的原因要全面分析。它的原因很复杂，不能否认资金紧张是原因之一，但不是主要原因。现在看得很清楚，国有企业的主要问题是由于宏观调控一来，投资的拉动减弱以后，那些粗制滥造的产品供过于求，卖不出去。轻工产品滞销是由于农村的市场没有打开，而生产能力又大得很，生产的东西没有市场。特别是“三资”企业、乡镇企业，发展速度达到20%、30%，它们的优越条件多，国有企业的市场被它们抢了。国有企业主要还是市场问题，不是资金的问题。如果是真正

有市场、有效益的产品，任何一家银行都会支持的。问题是你生产的东西卖不出去，钱收不回来，如果再给你贷款，那就只有多发票子，结果就是通货膨胀。

第三，对当前国有企业的问题怎么去解决呢？辽省和全国不一样的是，国有企业比其他地区的更困难一些，今年比去年没有多大的改善。从全国看，国有企业是比去年好；辽宁省比去年差一些，但差得也不是太多。

怎么解决这个问题？从根本上讲，是要进行现代企业改造。这个问题很复杂，要一步一步地过渡。明年改革的重点要放到国有大中型企业上来，通过转换经营机制搞好国有企业。我认为辽宁省当前国有企业的问题，归根到底是管理的问题。企业从上到下缺乏管理的意识，缺乏管理的基本知识，管理的水平比全国要低一个等级，比沿海地区低不止一个等级。现在不去改善经营管理，而是搞什么新的花样，改变不了辽宁省国有企业的状况。发个股票、发个债券、搞个什么集团，这些都解决不了根本的问题。怎么改善企业经营管理？我讲三条：

首先，要政企分开，政企分开的前提是选择好厂长。政企不分开，工厂没法履行自主经营权，厂长也不会对经营状况负责。如果厂长选择不好，政企分开后，政府啥也不管了，那是最糟糕的。我今年到天津去，天津的工业企业亏损面比较小，市委决定由市委常委负责，分头下去抓扭亏，一个常委抓一个企业。企业搞得好坏，怎么能由市委常委负责呢？那是厂长的事，应该是他抓扭亏，怎么由你们去负责扭亏呢？另外，市委常委、副市长带人去搞扭亏，他们了解工业吗？有的副市长根本不懂工业，也分一个工厂给他，下去怎么抓？扭亏得看市场的变化，要看机遇能不能抓住、产品有没有销路、技术改造能不能跟上去，这得有个周期。要限期扭亏，就得给企业吃偏饭，因为市委常委手里有权，那就越扭越乱了！因此，政府只能做这样的事：第一，选拔领导班子。要看是不是把工厂搞好了、是不是有效益，不要听他们吹的那些东西。第二，创造一个好的宏观环境。就是要执行国务院的文件规定，不能以感想代替政策，制定“土政策”是不行的。我这次只来了三天，发现你们有好些做法肯定不是市场经济的做法。有些厂长，包括一些政府部门，不是按政策和市场规律办事，而是想怎

么干就怎么干。第三，政府对企业实行监督，主要监督企业是不是按国家的政策办事、经营战略对头不对头，不是去干预企业的具体经营，而是对其战略思想进行审核。可惜，有些政府部门不是这么做的。农业银行有一个调查报告，讲本溪石油化工厂，生产洗涤剂的，1989年以前是个很好的工厂，盈利。1989年开始搞技术改造，进口设备，本来请外地人来施工，市长出面干预说，钱不能让外地人赚去，只许本地施工队伍施工。一拖一年半，时机错过了，市场需求没有了，产品销不出去，于是从1989年开始就背上包袱、连年亏损，1990年到1993年累计亏损3000万元。还有潜亏，大量的产品堆在仓库里，产品报废4000万元。现在是企业资产1亿元，债务1.4亿元，严重的资不抵债。这个工厂这么多年没有人去管？市里不去了解、不去整顿领导班子，却把全市的各部门找到石油化工厂召开现场抢救会，决定了几条政策都是瞎胡闹。原来总厂有12个车间，现在12个车间都变成法人，自主经营，过去的债务不管了，由总厂负担。这个现象叫“大船搁浅，舢板逃生”，船沉了，总厂搞几个人在这个地方守着，其他车间都坐舢板逃生了。就是把1.4亿元的债务留给国家，利息不交了，债务说是总厂认了，总厂不生产，怎么承担债务啊？实际上是永远不还。市场经济都这么个干法，不能想象！所以，领导班子得选拔好，政府不要瞎指挥。如果政府都去管企业，只会越管越乱，是帮倒忙。代替企业去搞经营，最后发不出工资，工人必然游行来找政府。发不出工资应该去找厂长呀，把厂长撤了，整顿就行了嘛。要下决心整顿这些企业，选拔一些能干事、不耍嘴皮子的人。政府部门瞎指挥，追求政绩，怎么能办好企业？

其次，厂长必须有市场观念和质量意识。这是管理的基本要领。搞市场经济，不去研究市场，不搞出一两个拳头产品，保持质量信誉，怎么能够在市场立足呢？没有产品方面的优势，怎么能有立足之地？我发现辽宁省很多厂长根本不懂经营管理。搞技术出身的人当厂长，有些是不行的。既有生产技术知识，又懂经营管理，当厂长是可以的。可惜得很，现在有很多厂长连报表都看不懂，连报表都说不清楚，怎么当厂长？要对这些厂长进行启蒙教育。现在是搞市场经济，对厂长应有严格的要求。过去在计划经济时代，对厂长的要求也是很严的。当时企业的内部管理还是可以的，现在企业的内部管理比那时

差多了。有些企业情况刚好一点，市场好一点，马上就不顾一切地增产，产品粗制滥造，质量出问题，就是这样自己把信誉丢掉了。有了一点钱不是去补充自有资金，而是大发奖金、铺摊子，市场一变化，结果什么家底也没有，只好躺在国家身上。厂长不经过认真的培训、考核，主管部门随便派一个自己认为可以的人去当厂长，这样做危险得很。

最后，投资总得讲求效益。钱花出去是要还的，借钱得付利息。辽宁省三个项目搞得不是太好，抚顺乙烯、盘锦乙烯、锦西化肥，原料都没有，搞什么化工？越往后原料越少，而且设备的规模也太小，没有经济效益，进口设备花的钱多得不得了，背上了沉重的负担。锦西化肥用海洋石油气，价格也高得惊人，这怎么能行?

你们要教育厂长，把重点放在内涵式扩大再生产、加强技术改造、加快产品结构的调整上，要选准产品，不要铺张浪费。好多项目看起来效益很好，其实一点效益也没有。总的来讲，解决国有企业当前困难的关键，是加强企业内部管理。以为搞个什么集团就有钱了？本来一个厂子自主经营搞得很好，一进入集团谁也不负责了。我们的管理水平这么差，连一个小厂子都管不好，还有什么资格去当集团董事长、总经理？总之，现在辽宁省的国有企业管理水平还不行，不要好高骛远。我讲这点意见，绝对不是泼冷水，是要求调整结构，特别是调整厂长。

我觉得东北的工人阶级是好的，是有优良传统的，吃苦耐劳，听党的话。职工队伍是好的，搞好国有企业是有基础的。只要我们政企分开，抓好企业领导班子建设，认真抓好经营管理，我相信东北的国有企业是一定能够搞好的。

关于加快纺织行业结构调整的批语

(1994年6月22日、7月17日)

这是朱镕基同志关于加快纺织行业结构调整的两次批语。

一、1994年6月初，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中国纺织总会向国务院领导同志提交了《关于缓解纺织行业严重困难的紧急报告》，反映当时纺织行业的主要问题是“纺棉短缺的矛盾日益尖锐，北京、上海两市纺棉约有一个月的缺口，其他省市原料缺口在两个半月左右……纺织工典正常运行受到严重影响”。这是朱镕基同志在该报告上的批语。

二、1994年7月，中国纺织总会向朱镕基同志提交了中共上海市工业工作委员会、市经济委员会和市纺织工业局关于对上海第九织布厂停产、转产问题的调查报告，反映上海第九织布厂停产、转产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提出了一系列值得重视和吸取的经验教训：要大力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要认真做好职工思想政治工作，妥善安排职工就业和生活；停产、转产的企业要有强有力的领导班子，要尊重和发挥工 人的主人翁地位和作用等。这是朱镕基同志在该报告上的批语。

一

(1994年6月22日)

椿霖①、克智①同志：

首先要限产压库，把超产的棉花（一个月用量)压回来；其次要抓住停产整顿这个机遇，加快纺织行业的改革、改造、调整结构、提高质量，上一个档次；进口棉花不可能很多，把原计划中不拟进口的单位的指标，调整给需要增加进口的单位，进口总量先不必调整，此事请国家计委及时办理；进口涤纶，先要做调查，能用多少？效益如何？现在不能新开减免税口子(多进口涤纶，是企业行为，不要从上面组织，哪个企业要进口，按进口产品管理办法，银行可以保证资金和外汇)；对停产企业，纺织总会要会同地方政府和银行共同调查，及早作出妥善安排。

朱镕基

6.22

二

(1994年7月17日)

忠禹①、文英①同志：

由于棉花减产、棉纱超产，在今年新棉上市前，势必有相当一部分的棉纺织厂要停产、半停产一两个月之久，这也有利于纺织工业整顿、调整、改造、改组，并且也一定会有一些工厂需要转产、兼并、迁移。关键是从现在起就要抓好、抓紧纺织职工的思想政治工作和生产、生活安排的准备和部署。这是关系到300万纺织工业职工群众和社会稳定的大事，务请全力关注，切实办好。国家将从各方面给以必要的支持。你们提的意见很好，但要认真抓落实。

(上海第九织布厂转产中的问题和你们的意见可以在纺织工业系统通报)

朱镕基

7.17

---

① 椿霖，即何椿霖，当时任国务院副秘书长。〔2〕克智，即张克智，当时任国务院副秘书长。

〔1〕忠禹，即王忠禹，当时任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主任。〔2〕文英，即吴文英，当时任中国纺织总会会长。

忠禹、文英同志：由于棉花减产、棉纱超产，在今年新棉上市前，势必有相当部分的棉纺织厂要停产、半停产一、二个月之久，并且也一定会有一些工厂需要转产、兼并、破产。这也有利于纺织工业整顿、调整、改造、改组。关键是从现在起就要抓好、抓紧纺织职工的思想政治工作和生产、生活安排的准备和部署。这是关系到三百万纺织工业职工群众和社会稳定的大事，务请全力关注，切实办好。国家将从各方面给以必要的支持。你们提的意见很好，但要认真抓落实。

朱镕基

7.17.

（上海第九织布厂转产中的问题和你们的意见可以在纺织工业系统通报）

朱副总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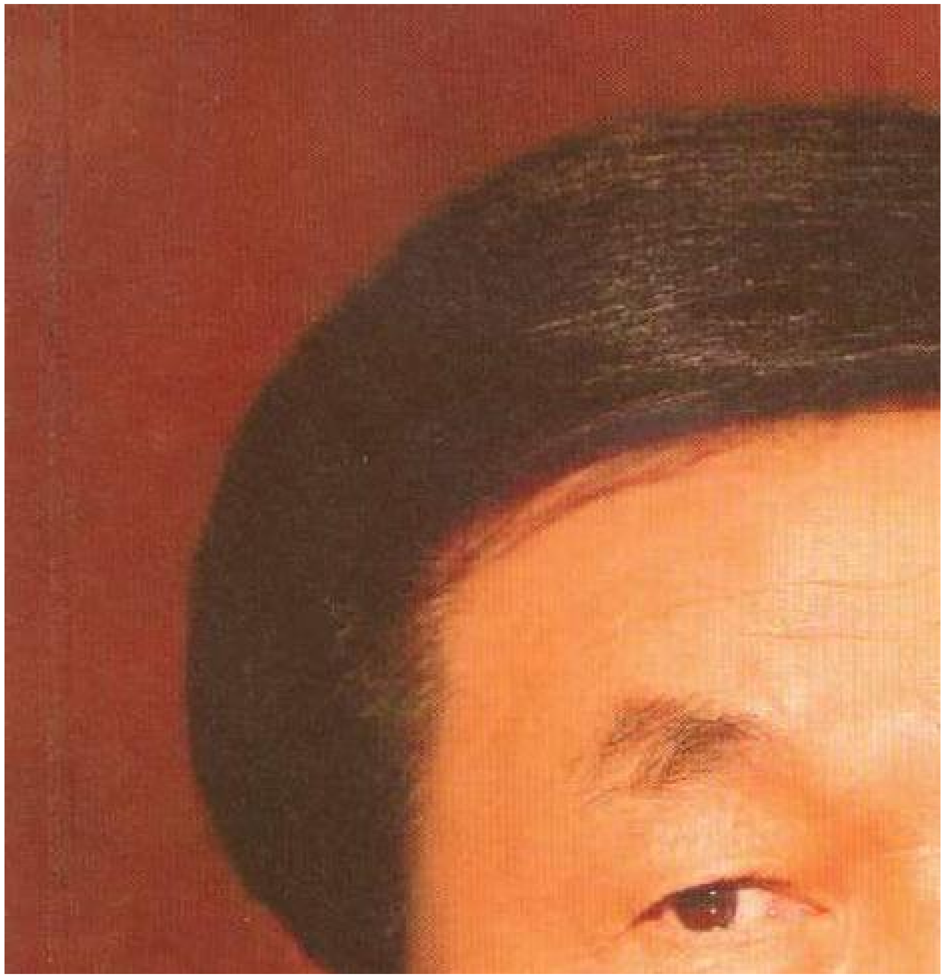
对上海市李家镐同志反映上海第九织布厂停产、转产中的问题，上海市工业党委、市经委会同市纺织工业局进行了调查，并提出处理意见。现将上海市工业党委、市经委和市纺织工业局的调查报告送上，请阅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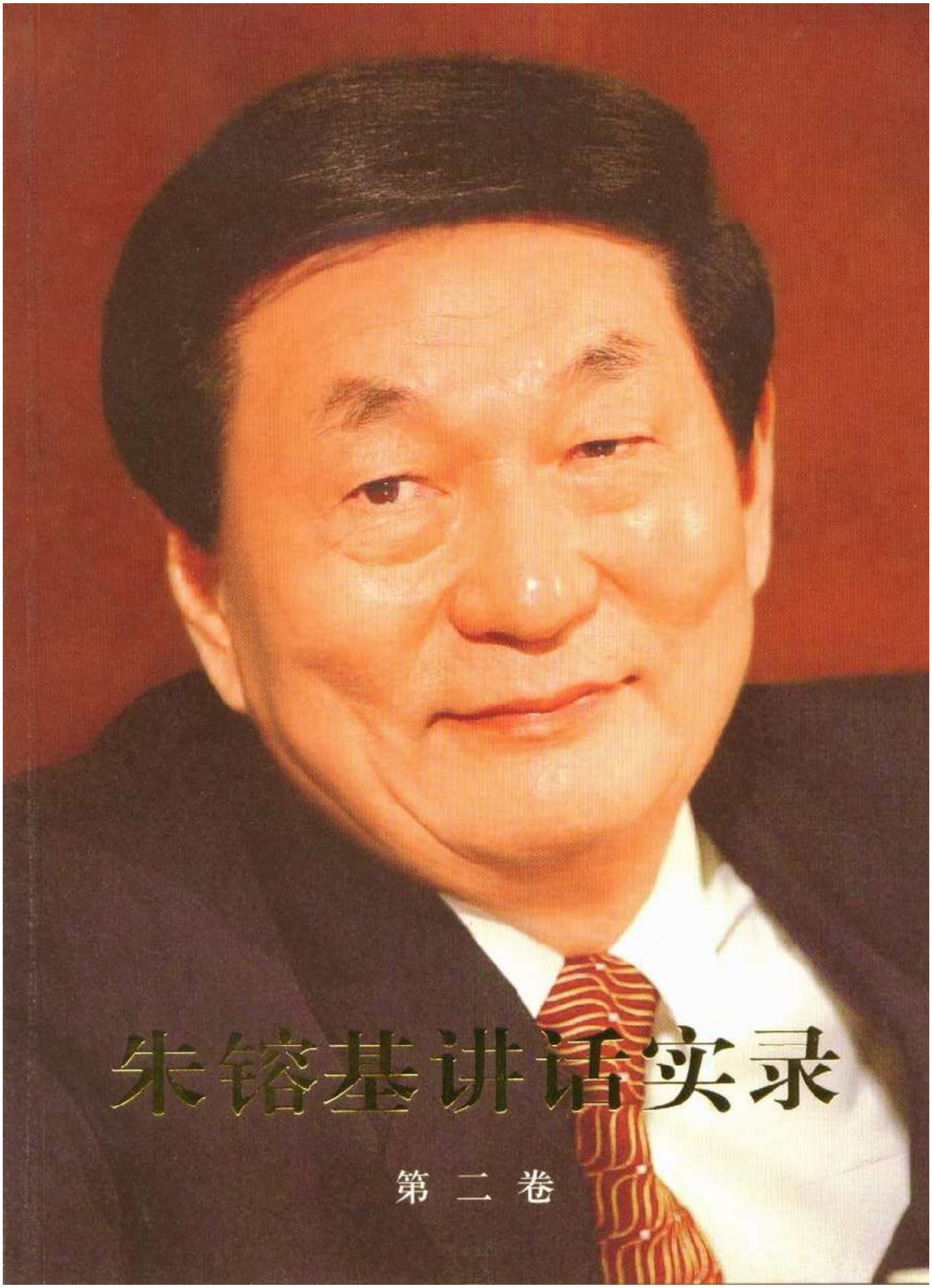
对上海第九织布厂停产、转产中出现的问题，我们研究后，认为有以下值得重视和吸取的教训：

1、要大力做好宣传教育工作。纺织主管部门要通过新闻媒介，大力宣传当前纺织工业调整改造的必要性和紧迫性，要使社会各界了解纺织、理解纺织和支持纺织。要使纺织行业的广大职工充分认识目前纺织工业所处的地位，发挥主人翁作用，自觉主动做好调整、改造和改组工作，以使纺织工业逐步走出困境，得到振兴和发展。

2、要认真做好职工思想政治工作，妥善安排职工就业和生活问题，生产企业关停并转迁，与职工利益密切相关，必须下大力量做艰苦细致的思想工作，特别是对下岗待业职工、离退休职工的生活问题，要按中央和国务院的有关规定，深入进行调查研究，认真听取职工的要求和意见，尽力予以妥善解决。

3、停产、转产的企业要有强有力的领导班子，要尊重和发挥工人的主人翁地位和作用。企业的停产、转产方案要认真听取工人群众的意见，要经工人或职代会




朱镕基讲话实录
第 二 卷

朱镕基讲话实录（第二卷）

朱镕基

简介

封面一

朱镕基讲话实录

第二卷

人民出版社

封面二

责任编辑：张秀平　杨美艳　姜　玮
责任校对：吴海平　赵立新　张　彦
装帧设计：曹　春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朱镕基讲话实录．第二卷／《朱镕基讲话实录》编辑组 编．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9
ISBN 978－7－01－010127－9

Ⅰ．①朱…　Ⅱ．①朱…　Ⅲ．①朱镕基－讲话　Ⅳ．① D2－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154845 号

朱镕基讲话实录
ZHU RONGJI JIANGHUA SHILU
第二卷
《朱镕基讲话实录》编辑组 编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北京画中画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1 年 9 月第 1 版　2011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00 毫米 ×1000 毫米 1/16　印张：32.75
字数：394 千字　插页：2

ISBN 978－7－01－010127－9　定价：49.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010）65250042　65289539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参与发行

图



1997年9月19日，在中共十五届一中全会上当选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江泽民、李鹏、朱镕基、李瑞环、胡锦涛、尉健行、李岚清合影。



1992年3月25日，朱镕基在七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上海市代表团讨论会上发言。右一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乔石，右二为上海市委书记吴邦国。



1995年12月7日，朱镕基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作总结讲话。



1995年9月9日，朱镕基在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和田县布扎克乡与维吾尔族棉农交谈。前排左二为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政府主席阿不来提·阿不都热西提，左三为国家体改委秘书长邵秉仁，左四为中国农业银行行长史纪良，右二为财政部部长刘仲藜。

编辑说明

《朱镕基讲话实录》选入的是朱镕基同志担任国务院副总理(1991年4月至1998年3月)、国务院总理(1998年3月至2003年3月)期间的重要讲话、谈话、文章、信件、批语等348篇，照片272幅，批语、书信及题词影印件30件。

《朱镕基讲话实录》分为四卷，其中，前两卷为朱镕基同志担任副总理期间的文稿，后两卷为他担任总理期间的文稿。各卷文稿均按时间顺序编排：第一卷为1991年5月至1994年7月，第二卷为1994年8月至1997年12月，第三卷为1998年3月至2000年6月，第四卷为2000年7月至2003年2月。

编入本书的文稿，均根据音像资料、文字记录稿和手迹编辑而成，绝大部分是第一次公开发表。有些曾经公开发表过的文稿，编入本书时为突出重点或避免重复，作了删节。有些过去曾经公开发表过的书面讲话稿，此次未编入本书，编入的是当时即席讲话的录音整理稿，其内容是对书面讲话稿的重点阐释和补充。编者对正文中涉及的部分人物、事件和专有名词等，作了简要注释。对专有名词在每卷首次出现时作注释，再次出现时只注明首次注释的页码。对担任党和国家领导职务的同志不再注释。本书文稿的多数标题为编者所加。

朱镕基同志逐篇审定了编入本书的全部文稿。

中央领导同志对本书提出了宝贵意见。中央有关部门和有关省、自治区、直辖市负责同志对本书的编辑工作提出了指导意见。中央有关部门，有关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有关单位提供了部分资料和照片。人民出版社对本书出版给予了大力协助。在此，一并表示谢忱。

参加本书编辑工作的有：李炳军、廉勇、张长义、谢明干、林兆木、鲁静、侯春同志。马东升、李立君同志参与了有关资料的收集整理等工作。

本书编辑组

2011年5月25日

房改试点的政策

(1994年8月4日)

1994年8月3日至5日，国务院住房制度改革领导小组在北京召开贯彻《国务院关于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的决定》工作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房改领导小组负责同志和35个大中城市主管房改工作的副市长、房改办主任，国务院房改领导小组成员单位负责向志，以及铁路、煤炭、石油三大系统主管房改工作负责同志。这是朱镕基同志在会上讲话的一部分。

房改非常重要，是党的经济政策的一个重要方面，关系到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现在衣、食、行的问题基本上解决了，可是住房问题远没有解决，而且很难解决。住房制度改革的成功与否关系着社会和经济的稳定。党中央、国务院一贯很重视房改，邓小平同志1980年4月关于房改的讲话①，把政策讲得很透彻，是房改的基本方针。这个方针从来没有改变过。房改政策是有连续性的，房改政策在某一阶段会有所侧重，而不是改变，从来就只有一套政策。

---

① 邓小平同志在1980年4月2日的一次谈话中指出：要考虑城市建筑住宅、分配房屋的一系列政策。城镇居民个人可以购买房屋，也可以自己盖。不但新房子可以出售，老房子也可以出售，可以一次付款，也可以分期付款，10年、15年付清。住宅出售之后，房租恐怕要调整，要联系房价调整房租，使人们感到买房合算。不同地区的房子，租金应该有所不同。将来房租提高了，对低工资的职工要给予补贴。这些政策要联系起来考虑。参见《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615页。

上海市在1990年至1991年搞房改，也是根据邓小平同志的思想和党中央、国务院的政策，参照兄弟省市经验提出来的。房改各项政策都是相互联系的。全国房改工作会议已经开了三次，基本精神是一致的。现在需要的是扎扎实实，埋头苦干，不要刮风。我不是因为当过

上海市市长，搞了一个房改方案，就在全国推广“上海模式”。各个城市有自己的特点，你们搞房改都可以有自己的办法，但都要符合中央的政策。上海市的房改方案就是在中央帮助下搞的，方案提出以后由全体市民讨论，讨论了半年，最后一致通过。目前已经形成了资金的良性循环，住房公积金已达到32亿元，到今年年底将达到40多亿元。政府有几十亿元在手，能周转，力量越来越大，可以真正为职工住房解决一点问题。上海房改方案有一套管理办法，成立了房屋管理委员会、公积金管理中心，钱存在银行，实践证明是正确的。这笔资金要严格管理，不严格管理不行。抚顺的群众给我写信反映当地有挪用房改资金的问题，经过调查果然这样，9000万元房改资金被挪用5700万元去干别的了，太不像话了！没有一套严格的资金管理制度不行。各地都要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根据中央的方针，搞出一套行之有效的办法，严格管理。只要大家认真去办，就一定能办好。房改不要急于求成，上海市1990年搞房改方案，1991年出台，真正形成良性循环是三年以后了，哪能一下子搞得那么好？



1990年4月17日，朱镕基陪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鹏到上海市虹桥路216弄居民家了解居住情况。后排右五为李鹏夫人朱琳，右六为朱镕基夫人劳安。

去年年底，一些地方和单位对中央的方针没有正确理解，刮了一阵低价卖公房的风。住房商品化是住房制度改革的终极目标。我听说北京的房子，三环路以外的1平方米要卖到6000元，是不是敲竹杠？房价这么高，怎么得了！怎么实行住房商品化？现在这个工资水平谁买得起？买不起，于是搞低价卖公房，那怎么行？国家的房子有多少？够不够卖？真够卖，国有资产流失了，还可以说让群众得到了好处；若不够卖，卖了一部分低价公房，其他的群众怎么办？会发生矛盾，要闹事的。去年搞了一阵低价卖公房，每平方米卖150元，这不是笑话吗？上海卖公房，是卖部分产权。1991年，当时上海住房造价每平方米750元，职工每平方米拿250元买三分之一的产权，这里面大有文章可做。住户只买三分之一的产权，将来倒手要经过批准，赚了钱，三分之二归国家，三分之一是住户自己的。另外，房子的地皮没卖，如国家征用，职工就得搬家。不明不白，每平方米150元就把房子卖掉了，怎么行呢？以为讨好了群众，实际上制造了群众之间的矛盾。条件还不具备时，低价卖公房，此路不通！卖公房必须有条件。第一，要提高房租。让群众感到房租这么高，不如买房合算，他才买。但是，提高房租要有一个配套条件，提高工资。不提高工资，老百姓会骂。时机要选择好，一步一步来，一下子把房租提上去怎么能行？第二，还得让老百姓买得起。房价太高，收入有那么多吗？第三，要有一系列配套政策，比如分期付款就可以进行试点。总之，低价卖公房目前不是办法。住房实行商品化要有一个过程，要有一套政策。即使以后，也不可能全部实行住房商品化。现在香港大量的劳动者、中小职员都住公房，还得等分配便宜的公房，因为买不起。有的地方把低价卖公房的钱挪用了，更不应该。所以，对刮起的低价卖房风，去年12月中央连续发了两个通知进行制止，不能再搞下去。现在这个风刹住了，今后要正确对待这个问题。旧公房可以卖，一个是价格要定得合理，另一个是职工买不起可以买部分产权。要有明确的规定来约束，不然将来要造成很大麻烦。有一些人买房不是为自己住，而是为倒手转卖的，特别是占了地皮，将来是很麻烦的事。

《国务院关于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的决定》经过多次酝酿，最后经李鹏同志主持召开会议通过了。现在的提法比过去更加完善了，但也不敢说一点毛病也没有，要在实践中再来研究和修改，使它更加趋于完善。



1989年10月12日，朱镕基在上海市考察曲阳居住区。

最后讲一讲“安居工程”。“安居工程”的目的是除了原来通过各种渠道盖的房子以外，国家支持一点贷款，把房子盖得更快一点，更便宜一点，同时促进房改政策的推行。而后来由于宏观调控，贷款口子开不了。第一，高端房地产开发没有压下来，也很难压下来。我估计还要有三年，至少两年，才能消化已经开发的房地产。第二，重点建设投资，地方资金不到位。今年上半年，国家开发银行资金到位，相当于全年的57%，建设银行贷款相当于全年的53%，时间过半，资金投入过半，而地方资金到位率只有24%。为什么不到位？因为摊子铺得太大，想干的事情很多，没钱。老项目差一大截资金，还开工新项目。今年上半年新开工项目有1100亿元，怎么得了！这边拖欠，搞三角债，那边新开工。在这种时候，怎么能放松银根？我们也没办法把缺

口资金都填上去。在这种情况下，要拿出大量贷款扶持应该搞的房改和“安居工程”建设，确实拿不出钱，只能小打小闹，搞点示范。大家通过原来的渠道照样干，国家贷款再支持一点，把“安居工程”启动起来，也是推动房改。国家计委明年在贷款规模中打了50亿元。另外，今年收购的钢材，明年抛出去支持“安居工程”，算算有几十亿元。明年拿这笔钱作为国家对房改的支持，把房改推进一步。杯水车薪，给谁呢？给房改最积极的地方。这笔钱只能解决40%的资金，其余60%还得地方自己拿。一个是配套资金，另一个是土地无偿划拨。本来1000元可以盖1平方米房子，现在可以盖得更多了。谁能积极解决配套自筹资金，就在那里搞试点，试成了再推广。今后，也许会在国家计划贷款规模中安排多一些。但是，我们已经吃够了苦头，一些地方要钱时拍胸脯说自筹60%，资金包了，等开工了又说没钱。千万不能这样搞。有钱就干，没钱就别干；今年、明年不干，后年还可以再干；什么时候有钱，什么时候干。没有多余的钱，就按原计划干，不要搞这个试点。总之，我们希望房改能够体现国家的支持，把房改政策、试点工作搞得更好。

跨出金融改革关键性的一步

(1994年8月15日)

1994年8月12日至16日，中国人民银行分行行长座谈会在北戴河召开。出席会议的有人民银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经济特区、计划单列市分行行长，各专业银行、交通银行、国家开发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行长。这是朱镕基同志在座谈会上讲话的一部分。

一、今年上半年的发展、改革情况和下半年的工作

总的说，今年上半年的宏观调控形势跟去年不可同日而语，比去年好得多了。大家回忆去年的情况，那时是“山雨欲来风满楼”，搞不下去了。在这种情况下，中央6号文件①一下发，全党认识一致，宏观调控进行得比较顺利。在宏观调控中主要是运用金融的手段，抓住了 “牛鼻子”。不要看只收了400亿元的乱拆借，这表示了决心。我经常讲，收了400亿元的乱拆借，杀了一个沈太福，开了一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制定了一个“约法三章”②，就把乱集资、乱拆借、乱贷款扭转过来了。这个成绩不可低估。但是，去年11月粮价带动物价上涨，当时有人归咎于宏观调控；也有人说是我们宏观调控没有坚持到底，到去年8月后放松银根，导致11月的物价暴涨。这些分析都是错误的。去年11月的物价上涨是1992年以来，特别是1993年上半年大量发行货币、基本建设大规模铺开摊子造成的必然后果，也是这两年忽视农业，乱搞开发区、房地产的必然结果，绝对不是因为搞了宏观调控或者没有坚持。去年7月份在南京开会解决江苏、浙江、安徽三个省的流动资金问题以后，我带了各家银行总行的行长一个省一个省地去搞调查研究，一方面研究分税制方案，另一方面是放松流动资金贷款，这是完全必要的。固定资产贷款规模一块钱也没有突破，流动资金为什么要放松一点？因为收了400亿元的乱拆借，而变成钢筋混凝土的贷款是收不回来的，只有把流动资金收走了。企业确实困难，不放松一点流动资金，国有企业的日子很难过，生产很快就要变成负增长。这样稍微放松一下，国有企业的情况第二个月就好转了。去年整个第四季度，各地区

非常满意，认为放松流动资金贷款是“及时雨”，避免了生产的大起大落，为今年的改革创造了一个良好的、宽松的环境。这样投进去的大约300亿元的资金，三个月后就表现为11月份的物价暴涨是不可能的，通货膨胀滞后期一般是九个月到一年。所以，去年11月的物价上涨是1992年、1993年过分地投资、过量地发行货币造成的。

---

① 中央6号文件，指1993年6月2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当前经济情况和加强宏观调控的意见》。

② “约法三章”，指朱镕基同志在1993年7月7日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提出的“约法三章”，见《金融工作“约法三章”》(本书第一卷第313页)。



1994年8月15日，朱镕基在北戴河召开的中国人民银行分行行长座谈会上讲话。右二为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周正庆，右三为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陈元。

今年上半年推出了许多重大改革措施，如财税改革、金融改革、投资体制改革、汇率并轨等。这些是非常大胆的措施。风险相当大的这几项改革同时出台，反映了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无产阶级革命胆略。没有对形势清醒、正确的估计，没有对自己的力量和困难的客观估计，是不可能同时推出这么多改革措施的。实践证明中央政策是正确的，改革取得了成功。各项改革措施运转起来，效果显著。今年发行1000多亿元国库券是前所未有的，原来预计银行存款会减少，准备多发票子，但是没有想到存款大量增加，比去年同期增加1000多亿元。因此，今年票子最多发1500亿元，这就为抑制通货膨胀打下了牢固的基础。这反映了我们党是有力量的，群众对政府是有信心的，相信能把物价降下来。在物价上涨很高的情况下，群众仍把钱存入银行，这是因为整顿金融秩序基本把乱集资刹住了。第二点做得很漂亮的是汇率并轨。由于汇率并轨刺激了出口，提高了结汇率①，国家外汇储备增加，7月底达353亿美元，比年初增加140亿美元。这增加了外商投资的信心，投资环境进一步改善，支付能力大大增强，外汇市场向规范化发展。

---

① 结汇率，指结汇额占外汇收入总额的比率。

这样，存款增加，外汇储备也增加，宏观调控的回旋余地大多了，人民对政府有信心，人心稳定，金融就稳定。取得这些成绩，是与在座同志的辛勤工作分不开的。

当前，要防止企业破产时把银行债权随意冲销掉。企业破产冲掉呆账是要经过各家银行总行批准的，法院没有权力单独判决企业破产，冲销债权。《企业破产法(试行)》明确规定，企业破产后变卖所得要首先偿还银行债务。我们推行《企业破产法(试行)》是很慎重的，是经过试验的。不能随随便便破产，不仅我们的呆账准备金有限，而且工人的承受能力也有限。破产只能是一种威慑力量，银行的钱不是可以随便不还的。要实事求是，不要从概念出发，要正确理解党中央、国务院的精神。

下半年的主要任务是反通货膨胀。当前一切工作的出发点都要考虑到在下半年把通货膨胀率降下去，力争不高于去年13.4%的水平，这就

意味着下半年物价指数只能增长7%。看来，要实现这一目标十分困难，但也不能放松，要力争实现。关键是要统一认识。有的经济学家提倡“通货膨胀无害论”，部分地方的领导赞同“通货膨胀有利论”。前者认为失业比通货膨胀更可怕，认为中国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失业。过分强调失业的威胁和危害，得出的结论就是要以更快的速度发展经济，扩大基建规模。更快的发展速度和更大的基建规模，就意味着通货膨胀比现在还要厉害得多，长期下去，人心就丧失了。现在人们对政府还有信心，还把钱存在银行。如果物价再涨下去，人们将把存款取走，就会像1988年一样出现抢购风潮。美国预计它今年的经济增长率3.7%，通货膨胀率2.7%，失业率5.7%，它就说经济过热了，三次提高利率，每次0.25%。

我们现在是“三高”，高增长、高投入和高通货膨胀。现在是两万多亿元的固定资产、两万多亿元的流动资金、三万亿元的国内生产总值。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这样的比率，起码是投入产出比率应该大于一。没有物价稳定，就没有人心的稳定，也就没有政治的稳定。所谓“通货膨胀无害论”就是要把我们引导到扩大基建规模、扩大投入、扩大货币发行的绝境，这是非常有害的。我们金融队伍里的许多同志都或多或少受到“通货膨胀无害论”的影响。而我们有的地方领导或多或少地赞同“通货膨胀有利论”。反通货膨胀最大的阻力在认识问题。

下半年要继续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严格地控制信贷规模，严肃地整顿金融秩序。“约法三章”和三条新要求①仍要继续执行。

---

① 三条新要求，指朱镕基同志在1994年1月15日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提出的三条新要求，见《继续整顿金融秩序，严格控制信用总量》(本书第一卷)。

预计今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由13%下降为10%，工业发展速度就应从19%降到15%以下，流动资金不应当趋紧。大家一定要正确分析当前资金紧张的原因，国有企业流动资金紧张的主要原因是市场问题，是产品积压问题。生产不降下来，必然是制造积压和相互拖欠，再加上进口过多所造成的困难。这些都不是通过银行增加贷款就能解决的问题。

二、推动金融改革跨出关键性的一步

国务院已通过《中国人民银行法》和《商业银行法》草案，并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人民银行总行最近派出六个分行的行长赴美考察，昨天我听取了他们的汇报，考察报告写得很好。通过考察，我们更加明确了中国人民银行是银行的银行，是中央银行，其主要职责是运用独立的货币政策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控，对所有金融机构进行监管，保证健康的金融秩序，保持货币稳定，促进国民经济发展。

中央银行在金融宏观调控手段方面，主要是运用利率、公开市场操作和存款准备金。我们国家对利率没有西方发达国家敏感，人家的利率是一种信息引导，经济界都通过利率的升降来看经济是过热还是过冷。中国对利率不很敏感，但我们要逐步地朝着这个方向发展，一个成熟的、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须朝这个方向发展。去年两次提高存款利率，确实是增加了存款，利率杠杆还是起了一定作用。随着企业经营机制的转变，利率杠杆会越来越起作用，但目前要抑制投资膨胀光靠利率是不行的。公开市场操作无非是通过外汇买卖、国债买卖来吞吐外币和人民币，调控经济。存款准备金在美国由于结算手段的现代化，作用越来越小，但对我们还是非常重要。所以，我讲要有一点突破，要迈出关键性的一步，就是我们要在这三个手段的运用方面跨出重要的步伐，特别是在公开市场操作方面积累一点经验，多进行研究，学习这方面的知识，逐步使我们银行的运作更加灵活。

中国人民银行的第二个职能就是对所有金融机构进行监管。不管是什么机构，只要有金融业务，都在中央银行的监管范围之内。美国有一个金融监管指标体系叫CAMEL(骆驼评级制度)，包括：第一是资本充足率(Capital Adequacy)，即资本占资产的比率。第二是资产质量(Asset Quality)，即贷出的款能否收回，是不是不良资产，这是考核银行业绩的一个重要标准。第三是管理质量(Management)。第四是盈利水平(Earnings)。最后一个是资产的流动性(Liquidity)，即兑付现金的能力占资产的比例是多少。这实际上也是中央银行对各个商业银行进行监管的指标体系。我们不一定都要按美国的方法办。下一步，我们准备再组织几个分行行长到日本或者欧洲去考察一次，看看它们与美国有什么区别，从而形成我们自己的考核指标体系。要真正地把商业银行管起来，不要害怕。中国人民银行各分行是总行的代表，也是国

务院的代表。委托你们去监管，都要按国家法律法规去监管。为《中国人民银行法》配套，还有各种规章制度和实施条例要制定。一个是调控，另一个是监管，都要跨出重要的步子。

关于中国人民银行的机构设置问题，现在国务院的精神是稳定。大家回忆一下，去年7月召开的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决定，收了你们7%的贷款权，有些同志耿耿于怀。人民银行四川省绵阳市支行行长写了一个报告，写得很好，有见解。但里面有一个让人非常头疼的观点，就是建议把现在贷款规模的70%下给专业银行，30%下给人民银行分行。这是一个败笔，说明他对中央银行的职能没有搞清楚，需要学习。人民银行各分支行的作用是监控，监控工作可是难做。去年人民银行动荡半年，好容易平静下来，稳定了。今年上半年整个工作做得不错，干部比较稳定。从各分行行长给我送的报告看，各分行稳定人心、稳定思想的工作做得还是很好的。现在又动荡起来了，消息不知从哪里传出去了，说要跨行政区设置人民银行分行。其实，这是一个公开的秘密，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里就写了，人民银行今后要走向跨行政区设置分行。现在刮起风来了，好像马上就要设置大区分行了，人民银行各分支行的队伍马上就要散了。还有一种谣言说，要把人民银行各分支行统统改成农业发展银行的分支机构。没有这个事嘛！现在，稳定人心、稳定队伍非常重要。我给大家交一个底，人民银行跨行政区设分行，是一个肯定了的方向。但是怎么设置还没有研究，无论怎样设置都得考虑中国的具体情况。美国有12个联邦储备银行，还有25个联邦储备银行分行，这些都是历史形成的。我们究竟怎么跨行政区设分行还需要比较、论证，需要很长时间。另外，根据中国的特殊情况，既要考虑到跨行政区设分行的好处，能够更好地避免地方一些不合理的行政干预；也要考虑到银行各分行的一切工作都是在地方党委领导之下，要依靠地方党委、政府的正确领导，离开他们的支持，什么监管工作也做不好。因此，即使跨行政区设置分行，也不能削弱人民银行各省分行监管的力量，也还要充分发挥省分行的作用。如果过多削弱省分行，大区分行就可能被架空。此外，还有许多技术性的问题要解决，比如清算的问题、代理金库的问题以及其他一些问题。总之，这个问题的决策还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今年干不了，明年也干不了。因此，请同志们要稳定自己的队伍，稳定思想，稳定

人心，不要听信谣言。你们这些行长都要做长期的打算，下定决心，在两三年以内，把金融秩序整顿好。这是你们的责任，不要以为要交班了，要调走了，可以不管了，没有这事，要安心地把工作搞下去。大家回去要讲，明年金融改革要跨出关键性一步，人民银行不动，大家安心工作，把监管工作做好。现在是关键时刻，整顿金融秩序的任务很重，还没有完成。但是，人民银行的队伍需要精减，水平需要提高，这一点要明确。现在人民银行一是人太多了，要“减肥”，提高效率。二是现有的人员不适应中央银行职能的要求，因此，队伍要调整，要进一部分人、出一部分人，不单是一个减的问题，还有一个调整的问题。要增加学法律、学金融、学宏观经济、学审计、懂企业管理的人。搞一般经营特别是搞具体银行业务的人，可以动一下，这是不应造成思想动荡的。那些作风廉洁、公正，有多年金融工作经验，熟悉宏观、又了解金融工作实际的同志，是我们中央银行的骨干，一定要很好地保存。即使他们的理论基础差一点，也没有关系，这种人才太宝贵了。中国的金融不是靠几个大学生、几个留学生就能够办好的，要靠有多年实践经验的人员才能搞好。当然，也要吸收一些新生力量，那些没有一技之长、没有专业知识的人不要再进了，不要凭关系进七大姑八大姨之类的人，进这种人，行长是不称职的。

我讲的中央银行跨出关键性一步或者决定性一步，不是指在改变机构方面，而是指运用经济手段来调控国民经济、调控金融方面。这方面可以借鉴美国的经验，它成立了各种各样的委员会，发挥各个地区银行的优点。但是必须集中决策，只有中央银行才能决策，其他机构可以分散进行研究，提出方案。我看，它们这些互相制约、分散研究、集中决策的经验值得我们借鉴，明年在这方面要跨出一步。

关于商业银行改革的问题。商业银行要改革，原来我讲要迈出开拓性的一步。现在看起来，我们的国家专业银行在转变成为真正的商业银行过程中有所进步，但是步子不大。这不是怪它们，因为中国的环境就是这样，企业的经营机制还没有转换。国有企业都不能自负盈亏，叫银行怎么自负盈亏啊？国有企业都不能够自主地决策，银行怎么自主决策啊？但从各专业银行本身来讲，要尽可能地向商业银行靠拢。目前我们还不能取消贷款规模，特别是固定资产贷款规模，别的约束力现在还约束不住，所以不能取消这个规模。但是，也应该逐步

地在资产负债比例管理方面跨出开拓性的一步。刚才讲的五个监管指标(CAMEL)，要朝这个方向走，我希望几个专业银行一定要在这方面不断前进，锐意改革！但是，要是没有别的措施配套，恐怕专业银行的进步不会太大。因为我们的企业改革非常迟缓，国有企业的改革尽管列为明年的改革重点，但是估计不会有很大的进展，破产机制试点困难重重。因此，在《商业银行法》颁布以后，我们要办更多的商业银行。这有什么好处呢？我想至少可以讲三条：第一，有利于引进竞争机制，削弱国家专业银行的垄断地位，可以促进我们在办成真正的商业银行的改革进程中能够走得更快。银行的垄断是相当厉害的，垄断和服务态度的下降是相互联系的，在垄断的状况下无论怎么强调，服务态度也上不去，因为只此一家。现在银行压单、压票现象是非常严重的，收手续费、拿回扣不得了啊！为什么？就这一家，还不敢得罪它，不敢揭发、检举。第二，有利于疏导地方的积极性，引导它们整顿金融秩序，办真正的商业银行。现在，金融秩序混乱，但是各个地方竞相成立金融机构，扰乱金融秩序的事情层出不穷，而且有越来越压不住的趋势。我一再讲，不能光堵不疏。一方面要堵，另一方面要疏，就同“大禹治水”一样，把这些乱七八糟的支流汇入一个我们能够控制的干流，然后用“水库”、“闸门”把它管住。我觉得我们不要怕地方办商业银行。允许地方办商业银行，不等于地方政府可以指挥银行，我绝对不是提倡这个，只是说还是要按照中央银行管理商业银行的办法来执行。但是，地方政府对这些商业银行是有发言权的。比方说，成立监事会，以地方政府为主，因为它比较清楚当地的经济情况。对资金的投向哪些合理、哪些不合理，地方政府是比我们银行还要清楚的。可以让地方在这方面有更多的发言权，但不是直接地指挥，比方说不能通过监事会来选拔、任免干部，制定方针政策等。设商业银行的进度要跟中央银行加强监管能力的进度相结合，请大家务必记住，办多少商业银行要与中央银行的监管能力相适应，你要是管不了，你就不要设。现在乱七八糟的非银行金融机构，中央银行管得了吗？所以，这个事情不要绝对化。相反，把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撤并以后，成立了真正正规的商业银行、规范的商业银行，中央银行更好管理。第三，有利于银行人员分流。这个银行不单指中央银行，各个专业银行的队伍都需要精减、调整，以提高整个干部队伍的素质。因此，我觉得商业银行改革的方向就是要办更多的、各种性质的商业银行。但

是，目前只能试点，先从城市合作银行开始。我讲商业银行改革的一个大动作，就是办城市合作银行。

城市合作银行不要拘泥于“合作”两个字，可以是股份制的商业银行，也可以是合作制的商业银行，都得按《商业银行法》管理，都得有监管指标体系来考核。中央银行要对它进行监管。如果办城市合作银行取得突破，那今后办商业银行就可以在较大的范围推广了，国家银行也就有很多帮手了，这对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有好处。城市合作银行怎么组建？是在城市信用社的基础上组建，因为现在城市里只有信用社有网点，利用现成的网点组建成一个城市的商业银行是比较容易的，同时也整顿了城市信用社。组建城市合作银行，原则上建议由该城市负责金融工作的副市长牵头，人民银行的分行或者支行行长参加，当然还要包括城市信用社或其他方面的人，一起来进行组建工作。为了慎重起见，这个事情不能一哄而起。我的想法，就是先试点，第一批试点在35个大中城市开始，第二步是在地级市，第三步才能够扩展到别的城市。这里要有一个先决条件，就是哪一个地方的金融秩序整顿好了，才允许那个地方办城市合作银行。金融秩序整顿好的标准，就是基本上刹住了乱集资、乱拆借。没整顿好就不能起到疏导的作用。疏导也是为了堵啊！堵住乱集资、乱拆借的源头。要整顿财政信用和各部门办的那些经济实体，绝对不允许财政系统自己去放贷款，吸收存款更不应该了。今后，要把财政信托投资公司的方向引导到政策性投资上去，因为它有财政资金，甚至于还有对外借债的指标，筹措的资金要集中用于政策性的基础设施建设。从这方面去筹资，引导它向这个方向发展，但也不能直接贷款，要委托银行来贷款。至于那些以商业性营利为目的，自己搞存、贷款的行为，坚决不允许。哪个地方金融秩序没有整顿好，就不批准那个地方成立城市合作银行。

农村合作银行暂不组建，将来农村合作银行也照此办理，不把农村合作基金会整顿好，就绝不允许设立农村合作银行。

三、银行与自办的经济实体要彻底脱钩，严肃查处银行队伍的不正之风

从现在查出来的情况看，大案要案发生最多的，一个是银行，另一个是财政。这两个部门发生案件造成的经济损失恐怕超过其他部门。

去年金融系统查处的涉案金额100万元以上的大案要案有74件，今年上半年100万元以上的大案要案就有50件了，其中有44件都是去年已经开始作案的，今年新发生的不是太多。1000万元以上的大案要案，在今年上半年有6件。“三防一保”①的工作，大家一定要好好去做。一定要用党的纪律严格要求，违反的要处分，要追究领导责任。没有这一条，很难杜绝大案要案发生。发生这种事情，多多少少是与领导有关系的。我前天讲了，农业银行因为吸取衡水支行这个案子的教训，搞了一个办法，是与各分行行长签订一个合同，谁要发生大案要案，就重罚，不发生大案要案的重奖。我说这个办法不行，没有效果。不发生大案要案是这个行长的责任，国家委托你管理，你不发生大案要案是尽了责任，国家怎么给你重奖呢？那不又成了巧立名目大发奖金吗？不发生大案要案是行长的责任，但是也确实是行长的政绩。重罚，发生大案要案的重罚，你怎么罚啊？你罚他几个月工资啊？那不行的。要记过、记大过、降职一直到撤职。要根据责任的大小，严肃纪律，不追究领导的责任是不行的。现在看起来，还是要有一个时间界限，去年7月7日以前发生的大案要案，不追究行长的责任，以后就要追究。今年实行“三防一保”以前发生的大案要案，可以处罚轻一点，实行“三防一保”以后发生的大案要案，一定要追究领导干部的责任，一定要给予严肃处分。

---

① “三防一保”，指防诈骗、防抢劫、防盗窃，保证资金安全工作到位。

另外一个，就是银行系统的不正之风太厉害。如果不刹住这个不正之风，今年讲的什么改革、什么发展、什么控制信贷规模都会落空。要发现一个撤一个，不下这个决心，我们这个队伍怎么得了啊！请各个行长注意自我警锡，如果还像去年那样搞下去不行。人民银行四川省分行来人了吗？审计署有一个材料，说经他们审计，发现四川省金融系统的一些问题。第一个是自办的经济实体，实际上都没有脱钩，或者说脱得不彻底。我们讲原来派往经济实体的人都得撤回，至少不得再发工资。但是现在大部分人都没有回来，工资却还在原单位照发。第二个是财务上的脱钩都是简单处理，有关财产界定，债权、债务清理的脱钩手续都没有办。第三个是仍有部分经济实体无偿占用人

民银行的房屋、汽车、招待所等资产，有5个分行继续向其经济实体注入信贷资金，这个绝对不允许。第四个是部分经济实体仍凭借人民银行办实体的有利条件，超范围地甚至非法经营金融业务。据查，上述单位的21个金融公司中有5个超范围经营，5个是没有经过批准非法经营金融业务。四川省证券公司德阳代办点在未经批准的情况下，超范围经营拆借业务，累计达到5147万元，发放贷款990万元，发放委托贷款2400万元，获得非法收入164万元。重庆银行租赁股份公司未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非法经营金融业务一年多。这个不到10个人的公司一年利润达到74万元，自己未予清理。人民银行四川省分行报给我的材料说，已经收回贷款2.7亿元。审计署报的数字与四川的不一样，贷款收不回来我也体谅，但是向我报数字要准确。对这种事情，人民银行四川省分行应该认真对待，要去稽核。我已经这么批示了，通知人民银行四川省分行认真整顿金融秩序，该取缔的要取缔，该关门的要关门。自办的经济实体要彻底脱钩，要按中央6号文件的要求、国务院的法规及有关脱钩的规定办事。对证券公司、房地产公司、信托公司，绝对不能注入资金。在各省区市领导会议上我都讲了，要他们下定决心，支持人民银行整顿金融秩序，你们就按这个要求办。谁受到打击报复就来找我。你们办不通就向我告状，我给你们撑腰。没有金融秩序，我们这个国家的经济能够搞好吗？重庆市一些非金融机构从事非法金融活动太厉害了。我在那里批了一句，请重庆市委、市政府要下决心，要取缔、要整顿。一个是要严格地要求，严厉地打击；另一个是疏导，办城市合作银行，要向正规化、规范化发展。有些同志提醒我，城市合作银行一办，发展快得不得了。我说，不要怕地方办银行，它也是国家的银行嘛，你怕什么？只占整个城市贷款规模的20%。但是绝不允许办省级银行，只允许办城市合作银行。

现在假钞犯罪太多。人民银行青海省分行的行长写了一个关于打击假钞犯罪问题的报告，人民银行总行要注意，我们要研究这个问题。一个是刑法规定的内容不完全。好多事情怎么处罚，标准不完全。没有罚则，怎么罚？同志们，你们都要要求严一点。假造增值税的发票太容易了。假造一张钞票，最多损失100块钱；而假造一张增值税发票，几千万元都没有了。我相信金融系统拿回扣、拿手续费已经成了一个风，要刹住是很不容易，但非刹不可！不要管别人怎么样，我只要管财政、银行一天，就坚持这一点。大家回去把我这个精神向下面

传达，我在位一天，就要对党、对人民负责一天，个人得失我毫不计较。希望我们大家心连心，统一认识，严格要求，严肃处理，把我们这支银行队伍整顿成真正能够战斗的队伍，不辜负党和人民对我们的信任。我希望我们大家共同努力，朝这个方向走出决定性的一步。

去年对银行埋怨的声音多，上半年对银行的不正之风、对银行本身的问题埋怨多，下半年主要埋怨我们抽紧银根，收乱拆借。今年上半年，舆论已经转变，包括中央政治局会议、国务院的会议都是说银行的好话，最近17个省区市领导都是说银行的好话，而且现在送上来的报告里也都是对银行工作给予充分的肯定。这一年多的金融工作得到了党和人民的认可，我觉得这应该鼓舞我们继续前进。大家应该有信心，我们的银行一定能够办好，我们严格地要求不是吃亏。我们要成为全国人民的表率。把我们的作风整顿好，把我们的银行办好，国民经济就大有希望。国民经济能不能搞好，关键靠财政、靠银行，大家都肩负着非常重要的历史重任。

市场经济也需要政府管理

(1994年8月19日)

1994年8月18日至19日，全国农业生产资料流通体制改革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出席会议的有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人民政府以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主管农业生产资料工作的副秘书长、计划委员会(计划经济委员会)主任、物价局局长、供销社主任、农资公司经理，中共中央、国务院和军队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这是朱镕基同志在会上讲话的一部分。

这次全国农业生产资料流通体制改革工作会议，主要是解决化肥流通体制问题。去年以来，党中央、国务院制定了一系列扶持农业发展的政策措施，从各方面加强了农业的基础地位，调动了农民发展农业生产的积极性。当前，夏粮收购任务已基本完成，农民踊跃售粮。农村经济保持了喜人的发展势头。但是，突出的问题是现行农业生产资料流通渠道混乱，经营环节过多，价格上涨过猛，直接损害了国家和农民的利益，影响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改革化肥等农业生产资料流通体制不仅十分必要，而且刻不容缓。

党中央、国务院非常关心农业生产资料流通体制改革问题，特别是化肥价格问题。国务院组织国家计委、国家经贸委、内贸部、财政部、农业部等有关部门做了多次调查，反复听取各地同志的意见，提出了关于改革化肥等农业生产资料流通体制的方案。现在方针已经明确了，政策很具体了，办法也比较完善了。国务院关于改革农业生产资料流通体制的一系列政策措施能不能贯彻落实，关键在于我们能不能统一思想认识。所以，我就着重讲讲认识问题。

我们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但是对政府要不要干预市场、要不要管理价格，存在着不同的认识。有些人认为市场万能，市场经济就是价格由市场自发形成，政府对市场不能加以管理。这些错误认识反映到流通领域，导致流通领域的混乱，使我们吃了大亏。这次会议上也有同志认为，国务院的办法好是好，但“比计划经济还计划经济”。如果

是这样一个认识，认为我们在走回头路，从改革的道路上倒退，那么，政策还能执行好吗？我认为，思想认识不统一，流通体制混乱的问题不解决，就没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生产好管，流通难管，现在我们经济中出现的问题主要在流通领域，不在生产环节。

我首先提出一个问题：什么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命题是党的十四大提出的，是邓小平同志的思想。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他1978年以来的许多重要指示中，都讲得很明确、很清楚。因此到党的十四大，完成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本理论的确立。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基本框架作了进一步的具体阐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基本精神是，市场要在资源配置方面起基础性的作用。社会主义要以公有制为主体，要实行按劳分配。我们并不是照搬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但市场在资源配置方面起基础性作用的这种基本机制是共同的。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我们进行了一系列市场经济方面的改革实践。就是在这以前，我们也不是实行单纯的计划经济，也根据自己的特点进行了许多符合中国实际情况的改革和探索。现在有一些人没有读懂西方经济学，又没有市场经济的实践，却要拿着教科书上的东西来指导中国经济的实践，崇拜那只“看不见的手”，鼓吹盲目、自发的市场力量，造成不好的社会影响。从亚当·斯密的古典经济学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凯恩斯主义，西方经济学经历了很大的发展、变化。1936年，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出版了《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他主张在货币、商品、劳务等方面，政府必须干预，特别是在决定恰当的总需求水平时，政府要对经济增长负管理责任。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50到60年代，弗里德曼等人创立的货币主义学派主张放任自由的信用，反对对信用的流动和利率的变动施加限制，但是仍然认为政府对货币的数量应该干预。所以时至今日，不要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政府也不可能不干预市场，也不可能不管理价格。如果对市场放任自流，对价格完全不管，那就不能避免贫富悬殊和社会分配的不公正。其后果只能是市场混乱，资源不仅不能得到合理利用，还会遭到破坏。



1994年8月19日，朱镕基在全国农业生产资料流通体制改革工作会议上讲话。左一为国家计委主任陈锦华，左三为国务院副秘书长何椿霖，左四为国家经贸委主任王忠禹，左五为农业部部长刘江，左六为外经贸部部长吴仪。

今年以来，物价猛涨，成为人民群众关注的焦点。究其原因，基本上都不是供求关系方面的问题。何况我们现在有较多的外汇储备，可以充分利用国内、国外两个市场，吞吐商品，调节市场。是价格改革步子太大吗？我们进行了一系列产品价格结构性的调整，适当提高了原油和农产品的价格，调价幅度并不是很大，而许多商品的市场价格却成倍上涨。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我看一个重要原因是受了一些远离实践的经济“理论”的误导。我们大家要根据邓小平同志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理直气壮地去管市场、管价格，切不可放任不管。

这次农业生产资料流通体制改革，我们认为它既符合市场经济的要求，也适应中国目前的现实情况。我们可以理直气壮地去执行。

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保障体制

(1994年9月8日)

这是朱镕基同志在听取社会保障体制改革专题调研组工作汇报时讲话的主要部分。

社会保障体制改革这个问题非常重要。党中央、国务院确定明年改革的重点是现代企业制度改革，这是一个根本。但是，国有企业改革必须有社会保障制度的支持，没有这个制度，就谈不上企业改革，所以，我们应该把社会保障问题提到更高的层次来研究。

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保障体制，应该考虑中国的三个特点：第一，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又是很贫穷的大国。吃“皇粮”的政府机关和国有企业职工比重特别大，退休的职工非常多，处理这个问题比国外要困难得多，照搬外国的办法在中国可能是行不通的。第二，国有企业目前的效益相当低，财政的钱收不上来，税收本来就不多，现在欠税还有几百亿元，财政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恐怕是全世界最低的，但到处又需要钱，政府负担不起。我们也不能学一些西方国家的高福利政策。第三，中国长期以来没有保险制度的底子，又有广大的农民。过去吃“大锅饭”，主要是靠财政、银行拿钱。现在要转到以社会负担为主，财政拿不起这个钱，转嫁到企业、个人身上也受不了。增加很多负担，还要保证生活都很好，那是做不到的。

根据这些特点，我们在建立社会保障体制时要注意以下三点：第一，保障水平不能太高，只能保基本生活。基本生活水平指的就是非常低的生活水平。第二，吃“大锅饭”是绝对不行的。我还是赞成个人账户应占主要的比重，建立个人账户有利于个人缴费，有利于企业缴纳保险费用，工人可以督促企业来缴。没有个人账户，很多钱就收不上来。第三，社会统筹的比例不要过高。我倾向于把社会统筹基金的一部分拨入个人账户。要考虑到中国几千年个体经济的影响，长期缺乏法制观念，没有保险观念，对好多事情都还不习惯，突然一下子都变成社会统筹，我们也受不了。

现行的社会统筹的养老保险办法，个人缴费也进入社会统筹，那就没有意思了，外国的办法不能照搬。个人缴费就是属于个人的，所有权属于个人，但又是社会强制的，退休前不能随便拿走。个人必须缴费，以后统筹使用，但钱是个人的，利息也是个人的，只是所有权和使用权不同的问题。

失业保险主要应该用于职工失业救济，保障失业人员的基本生活水平。管理费要减到最少，应该加强监督。再就业培训的经费是另外一种资金渠道，不能从失业保险中拿。现在把失业救济金大部分用于再就业培训，这个方向值得考虑，而且这种培训的有效性也值得怀疑。失业救济金、失业保险连再就业培训都一起管，那恐怕不行。

关于社会保障的管理体制，还是要成立统一的机构，过渡式的办法解决不了问题。我主张成立社会保障部，把劳动部、民政部、卫生部、人事部的社会保障职能统统拿出来，现在就要研究这个问题。机构改革没有两三年改不了，不是说这一届政府就一定要改，但是现在不研究，不制造舆论，下届政府也改不了。政府机关最重要的是政策统一、口号统一，部门多了不行。现在怎么办？本届政府的任期还有两年多，我不是很赞成成立什么委员会或召开工作会议，还是要各司其职，发生了问题，国务院开办公会议讨论。

我非常强调对社会保险基金的监督管理，监督的机制非常重要。我认为，从上到下应该形成一个监督的机制。建议全国人大成立一个社会保险委员会，这涉及1亿多职工的保命钱。全国人大一监督，地方人大也就出来监督了。我主张社会保险资金的运用和管理与政府机构分开。如果执法、立法、管钱、罚钱，都是一个机构，钱就不知道到哪里去了。如果从上到下的运营机构很庞大，管理费把养老金都吃掉了，那怎么得了！要加强对社会保险基金的稽核检查。机构问题不仅仅是成立一个社会保障部的问题，也是政企分开的问题。立法监督和资金运营要分开。

加强银行稽核监督工作

(1994年9月19日)

这是朱镕基同志在听取中国人民银行稽核监督工作汇报时的讲话。

一、关于银行稽核监督工作的重要性

中央银行要实现货币政策目标，必须有一个前提，即金融秩序是正常的。如果金融秩序混乱，搞“利率大战”，利率还能起什么作用？因此，没有一个正常的金融秩序，货币政策也执行不了，这个道理要向大家讲清楚。人民银行稽核监督与整顿、规范金融秩序的工作，其重要性并不次于货币政策。各级银行的领导干部都要非常重视金融稽核监督工作，要把好的干部充实到稽核监督队伍中去，加强这方面的力量。

现在国家银行承受的压力太大，经济中出现的问题都归咎于银行，这个局面必须改变。多办商业银行，把责任更多地交给地方，是解决这个问题的一个出路。我们要在整顿金融机构的基础上组建城市合作银行和农村合作银行，但这些机构的组建和发展，要同稽核与监管的能力相适应。如果中央银行对新成立的金融机构没有力量去稽核，又没有严格的法规制度来监管的话，只能越搞越乱。我赞成在整顿现有金融机构的基础上，发展地方性的商业银行，加强地方性商业银行建设。与此同时，必须加强人民银行的监管力量，加强金融稽核监督工作。

二、关于加强金融稽核监督工作的几点要求

(一) 加强金融稽核，首先要立法。现行的稽核监督的规定和办法要赶快修改，报请国务院重新发布。我同意人民银行提出的关于严肃处理金融机构违规行为的意见，过去只有罚款这一种手段，现在要明确规定行政处罚。一个叫行政处分，一个叫刑事处分，分开讲比较好。行政处分如降职、免职、撤职、取缔法人资格等，刑事处分如判刑等。这次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的《商业银行法》规定，对乱设金

融机构、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这是非常正确的，得到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赞成。没有这一条，根本治不了乱。因此，要抓紧制定《金融稽核监督条例》，报国务院批准发布。

(二) 加强人民银行和各专业银行稽核组织建设。现在要加强稽核部门的领导力量，把懂业务、坚持原则的优秀干部调到稽核部门去。要加强领导力量，而不是一般地增加人。如果进来的人业务素质低，人越多越麻烦。因此，只有调整、加强稽核部门的领导干部力量，才能解决目前存在的问题。

加强银行稽核监督工作，还要通过电子计算机手段进行管理。要将一部分懂金融、又懂电子计算机的大学生充实到稽核队伍中去，对于工作表现好的稽核工作人员要给予奖励。一个金融单位搞得好，是全体职工共同努力的结果，对稽核工作人员要一视同仁。当然，过分强调依靠奖金调动积极性不行，光靠奖金也鼓舞不了斗志，还是要加强党的建设，加强思想政治工作，严肃党纪国法。

(三) 当前最重要的是执法必严。我在去年7月7日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讲了“约法三章”，言出法随，镇住了一段时间。但是，现在又旧病复发，乱拆借、乱提高存款利率等问题又开始抬头。究其原因是对已查出的一些问题我们还没有处理，有些人认为我们是虚张声势，不过如此而已。看来，我们对前一阶段整顿金融秩序的成绩不能估计过高。你们反映的地方信托投资公司违规问题，情节严重的必须进行严肃处理，要撤换领导班子或吊销营业执照，如果不及时处理，债务将会越背越多。对其债权、债务，要交由法院按《企业破产法(试行)》处理。由于此类问题有许多是历史遗留下来的，如果不尽早揭露出来并做处理，将来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那就是我们的责任。因此，我们对发现的问题，要以对党的事业和对历史负责的态度提出处理意见。如果我们提出的处理意见正确，地方政府不接受，将来就由地方政府承担责任。

许多问题的解决单靠银行的力量是不够的，我们有党中央、国务院的领导和支持，对金融管理方面出现的问题，必须及时向党中央、国务院报告，并提出处理意见，这才能说我们没有失职。你们遇到困难，处理不下去，就给我写信，要是我不敢查下去，那就是我失职。

现在就是要严肃处理几件案子。审计署给我一个报告，他们审计了人民银行部分分支机构，查出的问题比人民银行自己查出的问题要严重。比如去年7月7日以后新发生的乱拆借，人民银行查出4.3亿元，审计署查出10多亿元，可见问题相当严重。我建议撤掉几个行长，然后登报。说一千道一万都没有用，撤掉几个行长马上就会起作用。人民银行现在把已经查出的问题不是分了很多类吗？把审计署的例子也列进来，人民银行会同审计署，共同来查。在每一类问题中可考虑先挑两个最严重的进行查处，给予撤职、免职或其他处分。撤职行长就要降级，免职可以平调，调出银行系统。要派人到当地把这些案子一个一个查清楚，铁面无私、公平公正地进行调查，然后执行去年7月1日我讲的“约法三章”。当时就讲过既往不咎，但再搞一定要撤职。这次查处对象起码是支行行长这一级，拍“苍蝇”不解决问题，要打“老虎”，处理结果集中登报。要把你们汇报中提到的几个问题都查清楚，如果情况属实，要撤一把手的职。你们要根据事实进行处理，然后把所有查出的案件都通知当地政府和纪检部门。新中国成立初期要不杀刘青山、张子善怎么得了？现在的情况要比刘青山、张子善那个时候严重得多，再不处理怎么行？当然，人地位越高，处理起来越难，但为了党和国家的利益就是要攻一攻。我们稽核力量有限，没有力量一个一个地查处，当前就集中处理这几类问题。要抓一抓法不责众的问题，现在已经形成一种歪风，胆子够大了，不刹一刹这种风不得了。另外，有些银行与自办的经济实体还没脱钩，少数银行还继续向自办经济实体注入信贷资金；有的分行从自办经济实体分红，用于本行职工福利开支，对这类问题也要处分两个。银行与自办经济实体一定要脱钩，搞行员制①收入不降低是可以的，再搞回扣、分红，就要严肃处理，否则社会影响太坏了！如果只讲银行福利太高了，我可以帮你们承担责任，但是如果银行福利又高又腐败，这个责任谁也承担不了。拿那么高的奖金还到处去分红，到处乱拆借，注入这个、注入那个，中央银行行长如果听任这么搞法，那就不是共产党的中央银行行长，这样的行长我是不愿意当的！我看大家要下定决心把这股歪风刹一刹，此其时也。我一直没找到时机，上半年正值改革的关键时刻，那时顾不上。现在是下一轮改革即将到来之前，时间有一点空隙，抓紧把这个事情处理一下。这项工作搞好了，我看银行职工的精神会为之一振，今后的金融形势会更好。再在这个基础上来办城市合作银行、

农村合作银行，可能要办得更好一点。因此，要抓紧办这件事，不能等，马上就办，一个月时间办完。抽调得力干部，集中力量查这十几个案子。如果属实，要处理，结果马上登报。其他那些案子，就按今天这个会议精神，比照查处上述十几个案子的做法，由你们一个一个地查处。政策界限非常清楚，1993年7月7日以前的既往不咎，除非触犯刑律、造成重大损失的，当然要承担责任，但一般问题就不处理了。1993年7月7日以后仍然干违纪、违法勾当的，必须严肃处理。

---

① 行员制，指银行系统实行的介于公务员制度和企业聘用制之间的一种职员管理制度。

三、建立和完善金融机构自我约束机制与合理的内部激励机制

刚才听汇报，发放存款单项奖①，副作用很大，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储蓄大战”、乱放贷款，维持了虚假存款的现象。请各专业银行考虑出一个能够全面评价银行经营活动情况的综合奖励办法，纳入正常的轨道，这样有利于正确地执行国家的信贷政策。我建议每个专业银行，由行长负责，召集一些基层行的干部开座谈会，参加者要有不同类型机构的领导干部，包括分行、支行以及办事处的干部，充分听取他们的意见。特别要选那些存款急剧增长的基层行，看是不是靠奖金搞上来的，里面正的作用有多少、负的作用有多少。在充分听取他们意见的基础上，你们提出一个意见：怎么发奖金既能真正调动积极性，又能正确执行国家的政策。前提是不论哪种办法，都不要降低原有的奖金水平。但如果实行新的办法，导致一段时间内存款下降，也不要害怕，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无非是挤掉了一些水分。这个事情要抓紧办，请四家专业银行②行长在一个月时间内，将意见报到人民银行总行，由人民银行总行听取汇报后，统一发一个规定。在研究制定银行奖励办法时，人民银行总行主管部门要派人参加各专业银行召开的座谈会，听取各方面意见。人民银行总行党组要进行研究，尽快拿出办法来。

---

① 存款单项奖，指某些金融机构违反规定，将存款单独作为考核指标，与职工个人的工资、奖励及其他个人利益直接挂钩。

② 四家专业银行，指中国工商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中国农业银行四家国有商业银行。

警惕金融、财政“双松”导致通货膨胀

(1994年9月20日)

1994年9月17日，中国人民银行调查统计司《八月份金融运行状况分析》一文反映，1994年8月，国民经济继续保持高速增长。金融运行表现为：货币投放加快，贷款增加较多，储蓄增长势头仍然较旺，专业银行备付率水平略有下降。这是朱镕基同志在该文上的批语。

人民银行的8月份金融情况分析印报政治局常委、国务院负责同志，抄送各有关部门。

七八月份货币投放大量增加，必须引起警锡。7月份投资规模增长回升到74%，是由于金融、财政“双松”的结果，银行贷款规模基本控制了，但外汇储备的占款增加2000多亿元，转化为企业存款；财政由于国库券发行好，支出一下激增，消费基金扩张之势惊人(8月份国家工资性现金支出增长45.6%，行政开支增长40%)。1～8月外资引进大大超过去年，大多投入房地产和土建。如不再加以控制，变“双松”为“双紧”，下半年抑制通货膨胀，恐将难以实现。

朱镕基

9.20

会见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格林斯潘时的谈话

(1994年10月24日)

这是朱镕基同志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会见并宴请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艾伦·格林斯潘时的谈话。

朱镕基：我很早就想见你，多次盼你来，现在见到你，很高兴。在马德里就想见你，当然，在马德里没有时间谈什么问题，只想请你吃一顿中国饭，但你提前回国了。我们为你这次来访做了长时间的准备。我知道你今天见到了江泽民主席，明天还要见李鹏总理。今晚只想作为你的同行请你吃中国饭。如果有什么问题，请尽管提出来。我们之间没有什么秘密，即使有，你也会知道。

格林斯潘：非常感谢副总理先生。因提前离开马德里，错过了你的宴会，我也感到很遗憾。

今天我们的会谈非常有意义、有建设性，我们就贵国改革进程中广泛的问题进行了讨论。你一定已经得到了关于会谈情况的汇报，我在这里不必再详细讲了。

在我们美国，对中国改革的看法也有一个演变的过程。从一个持续多年的中央计划经济体制转变为市场经济体制，是一个复杂而艰难的进程，中国已通过各种可行的方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在与江泽民主席、中国人民银行的会谈中，我已指出，中国取得成功对美国乃至整个世界都是十分重要的。我们的经验证明，贸易的发展会使有关各方获益。特别是中国这样一个在世界贸易中占重要地位的国家，其发展将使所有人受益。因此，我们愿在我们有多年经验的技术方面，为贵国的中央银行提供尽可能的帮助。

在中央计划经济体制中，金融体系的作用只是用来计算物质资源的名义价值。而一个完善的金融系统，如同我们在过去几十年间发展起来的系统，在计划经济中作用不大，只有在市场经济中才有可能起到

关键的作用。改革的目的正是在于建立一个更有效的竞争的市场结构，使中国经济成为充满活力和竞争力的经济。

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已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要形成一个有活力的市场机制，还要集中精力处理一些问题。例如，我们关心的一个问题是中国还没有一个完善的债务市场，国有企业的亏损大多由中央银行的高能货币融资。如果建立一个包括各种市场经济成分的机构，使政府的赤字可以通过市场进行融资，则不必动用中央银行的储备，导致通货膨胀的压力，引起不稳定因素。即使是西方市场经济的国家，其债务市场也有不健全的一面，但关键是要通过改善企业状况或实行企业的破产来消除大量的亏损。要加快改革，使社会保障系统独立于企业之外，当企业减员或破产时，不会出现对雇员不利的影响。

我们还讨论了一些技术性问题，特别是现代化支付系统的建立。它对于提高银行的储备、更有效地实施货币政策具有重要的意义。

派瑞①：我们了解到对中国人民银行的改革已有一系列建议和方案，它们对中国长期的经济发展有何影响?

---

① 派瑞；即罗伯特·派瑞，当时任美国旧金山联邦储备银行行长。

杜鲁门①：与人民银行的会谈中提到银行监管的问题，副总理先生能否谈谈在金融体制改革中对银行监管问题的处理?

---

① 杜鲁门，即特德·杜鲁门，当时任美国联邦储备银行国际金融局局长。

格林斯潘：改革是多方面的，涉及各方的利益。很多人已适应了旧的体制，改革会令他们不舒服。这里重要的是保持改革势头。如果缓慢或停止，损失会更大。

程杭生①：在过去的几场会谈中，听到关于通胀的不同说法。有人认为价格上涨是由于农产品、能源的价格调整引起的。想听听朱副总理的观点。

---

① 程杭生，当时任美国联邦储备银行副行长。

朱镕基：我很欣赏格林斯潘主席对中国情况分析的准确，也非常感谢你表示在金融合作方面愿为我们提供技术帮助。

我们感到在与美联储和你个人的合作中，会得到很多启发。你比我大2.5岁，智力因此比我大23%。你是经济学家，我只是一个电气工程师。你在美联储工作了12年，我当中央银行的行长只有一年。我们需要你的智力和经验。

现在中美两国关系处于较好阶段，特别是去年江泽民主席和克林顿总统见面以后，两国关系不断改善，芮大使①也为此作出了贡献。

① 芮大使，即芮效俭，当时任美国驻华大使。

我们两国的中央银行很早就有交往。去年开始的金融体制改革借鉴了许多美联储的经验。当然，我们的改革要根据中国特点进行，但最初的改革设想从美国得到很大启发。你和你的同事来访，我们非常重视。关于中国的改革，可以讲很长时间，但你没有时间。很多情况人民银行的周正庆副行长已经介绍了，有关国有企业的问题江主席也讲了。我主要讲讲通货膨胀的问题，它也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

首先，我认为中国的通货膨胀并不像外国舆论报道的那么严重。中国过去两年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约为13%，今年预计为10%到11%。通货膨胀率在1992年低于6%，1993年是13%，今年可能超过15%，甚至达到20%，但这不能说明中国的通货膨胀有多么严重。因为，我认为今年通货膨胀指数高的主要原因是，我们在向市场经济的转轨过程中做了一些价格结构的改革。这是任何一个发展中国家，特别是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国家所不可避免的阵痛时期。去年和今年的物价指数偏高，主要是去年11月，我们放开了农产品价格，农产品价格到现在几乎涨了一倍。如果不放开，农民就不种地，而大量地涌向城市。现在的价格由市场决定，我们受益匪浅。去年10月以前，中国生产的化肥无人买。现在市场上供不应求，可以说国际市场上有多少，我们就可以买多少。这说明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大大提高了。同时，我们把过去没有放开的能源、交通的价格也放开了，铁路的状况大大改善了。

这类价格结构性改革今后会越来越少。我预计从今年10月到11月，物价指数会越来越小。目前中国市场并没有供不应求，相反，供应非常丰富。当然，我们要继续实行宏观调控，推进金融改革，将基本建设和消费基金控制在一定水平。

整个金融改革的方向是将中国人民银行办成独立执行货币政策、对各类金融机构进行监管的机构。在适当的时候，我们要将中央银行的分行由按省份设置改为按经济区设置。同时，致力于将国有专业银行办成真正的商业银行，逐步开放金融服务市场。在会见你之前，我见了摩根士丹利总裁约翰·麦克先生，已同意他与建设银行成立中国第一家合资的投资银行，今晚他们就签署合作协议。

最近，我们派出包括几个人民银行省分行行长的代表团访问了美联储，去了华盛顿、纽约、旧金山、洛杉矶等城市，受到美联储的热情接待。我们要将他们带回来的资料发给全国的分行。在此，我要向你和你的同事表示感谢。我们受到了很多启发，但你们的经验我们不能照抄，中国的情况要复杂得多。

我们目前正处于逐步立法和健全法制的过程中，已向全国人大常委会递交了《中国人民银行法》和《商业银行法》的议案，但意见一直统一不起来。我们希望马上能通过。

你们有些办法在美国很有效，但在中国不一定有效，比如你们四次提高利率等等。

格林斯潘：最近第五次提高了利率。

朱镕基：每一次我都认真关注它的反应，你们每次提高0.25%，起到很大作用，但在中国作用不会很大。在中国也许提高1%也不会起到很大作用，因为有些企业不准备还钱，不在乎利率，但这种情况正在改变。明年我们改革的重点将放在对国有企业的改革上，随着它的成功，金融调控的杠杆作用会更大。现在我们就在研究提高利率，希望像你们一样成功，但效果不一定会很好。

格林斯潘：效果如何，现在还不得而知。

朱镕基：今天我的主要目的是请你吃中餐，但不知你是否会喜欢。我们可以在饭桌上接着谈。

(晚餐时的谈话)

朱镕基：关于外汇储备，我有一个问题要请教格林斯潘先生。去年我们的贸易出现逆差，今年上半年是顺差。我们年初的外汇储备有212亿美元，现在将近400亿美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总裁康德苏先生说我们的外汇储备太多了。据我们了解，台湾地区的国际储备有1000亿美元，日本800亿美元，估计美国超过700亿美元。虽然我们的外汇储备高达400亿美元，但还不具备实行人民币完全可兑换的条件。目前我们实行的是经常项目下的可兑换。美国财政部曾指责中国的外汇制度歧视外资企业。我看这是不了解情况。今年年初实行人民币的经常项目下可兑换前，我曾征求过外资机构的意见，现在这种选择不是歧视，恰恰相反，是对外资企业的照顾。目前，我们正在研究什么时候能够实行人民币的完全可兑换。

格林斯潘：现在，进出口与国际储备的关系不像过去那样是一个相当有用的概念了。评价一个国家的国际储备水平是否适当，主要考虑其国际储备的用途。在美国，国际储备的主要目的是支持汇率，因此要根据美元对不同货币所要给予的支持程度，决定各币种的数量。我相信人民银行的外汇储备，也起到了对汇率施加影响的作用。

史福①：你认为在完全可兑换下，汇率将怎样变化，适当的汇率是多少？目前中国实行的外汇体制还不是一个完全透明的体制，很多东西如不加详细解释，就很难理解，因而很多外资企业认为市场并没有正常运转。他们一定非常高兴听到你刚才这番话。

① 史福，当时任美国财政部部长助理。

我非常高兴地得知中国目前的政策是实行人民币在经常项目下的可兑换，尽管我们认为最终目标应当是完全可兑换，但这毕竟已是向前迈进了一步。我们鼓励中国继续深化改革，以便达到“复关”及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商业条件。

朱镕基：如果你去外资企业征求意见，请转告他们：如果他们愿意把外汇卖给中国的银行，他们就可以到中国的银行去购买外汇，但合同中承诺出口的产品必须出口，这是我讲的。另外，请你回国后向本

特森①先生转达，我在马德里时也曾对他讲过，在“复关”问题上，我们与美国进行了长期的谈判，作出了巨大的让步，基本上满足了关税及贸易总协定的要求。有很多事例可以说明，如今年1到9月份进口增加了30%，关税比去年减少，降低了几种商品的关税。希望美国支持我们尽快“复关”。在马德里时，本特森先生也许出于礼貌，既没表示反对，也没有同意，请你转告他，我希望从他那里得到一个肯定的答复。

---

① 本特森，即劳埃德·本特森，当时任美国财政部部长。

史福：我一定将你的意思转达给本特森部长。本特森先生一直支持美中关系的改善，支持中国“复关”，但要站在商业的基础上，此前的谈判也一直基于商业和经济的条款。

朱镕基：中国在允许外资金融机构在沿海开放城市开办营业性分支机构后，又开放了内地十大城市。今天，摩根士丹利将与我们的建设银行签署在北京成立合资的投资银行的合同，今后还会允许更多的其他金融机构在中国经营，如保险公司，美国国际集团已在上海设立了分公司。在中国通货膨胀率较高的状况下，我们已经作出了最大让步。希望明年的通货膨胀情况有所缓解，我们还可以在“复关”问题上作出更大的努力。

关于外资银行要求做人民币业务问题，国内外对这个问题有不同的看法。中国的商业银行与国际上真正的商业银行相距甚远，因此没有竞争力。随着中国银行立法的健全，中国允许外资银行开办本币业务的步子会迈得大一些。目前，中国打算先进行少数外资银行做人民币业务的试点，现正在进行选择。

格林斯潘：在美国，如果外国银行遵守美国的有关银行立法，并符合美联储的规定，是不反对外国银行开办当地本币业务的。外国银行到美国设立代表处、分行都是不成问题的。当然，这里有一个与当地银行竞争的问题。如果就这个问题征求美国当地银行的意见，它们当中大多数会反对外国银行进入美国市场。但作为联储，我们从整体上考虑，认为这样做有利于竞争，而竞争又会促进效益的提高。我们是欢迎外国银行在美国开办当地货币业务的。

感谢你和你的同事在会谈中表现的坦诚。请允许我代表美联储送给你一件小礼品，这是美联储的象征———只鹰。你们所从事的是一项伟大的事业，衷心祝愿你们取得成功。我们在联储随时欢迎你来访问，我会请你吃中餐，但我们厨师的技艺可能没有你们的强。

朱镕基：我也为你准备了礼物，是熊猫银币。这并不是说美国的中央银行像一只鹰，而我们的中央银行像一只熊猫，是希望中国人民银行既像鹰一样矫健，又像熊猫一样可爱。我们也随时欢迎你的来访，不论是你本人还是你的代表。

杰出的经济学家——薛暮桥

(1994年10月25日)

这是朱镕基同志在祝贺薛暮桥从事经济理论工作6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曾发表于《百年沧桑一代宗师：薛暮桥逝世一周年纪念论文集》。编入本书时，对个别文字作了订正。

今天是暮桥同志90华诞大庆的日子，这是非常值得纪念的一天。我好久没有见到薛老了，看见薛老身体这么健康，薛老的夫人罗琼同志身体也很健康，确实内心感到非常高兴。

参加这个会议的同志们都是薛老的老学生、老部下、老同事，我想我至少可以满足前两项条件。今天本想听大家的发言以后再讲几句祝贺的话，因为在座的有很多同志，可能有70%到80%是我的老上级，其他呢，大概还有15%是我的老同事。这些同志对我都有很多的帮助和教育，所以我本想听大家讲完以后再讲，但因为今天国务院有总理、副总理的碰头会，我不能耽搁得太久了，只好插在中间先讲几句。

暮桥同志是大革命时期入党的我们党的老党员，也是在学术上有很高造诣的非常著名的经济学家，在理论工作方面、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工作中，都有很大的成就。



1994年10月25日，朱镕基在祝贺薛暮桥从事经济理论工作60周年座谈会上讲话。左为薛暮桥。

我读暮桥同志的著作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前，在清华大学读书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追求进步，向往革命。我们当时读的书，主要是毛主席的著作，是从解放区带来的，如《新民主主义论》和有关解放区土改等方面的著作。同时，我们也读一些其他的革命的进步的书籍，我现在记得起来的就是艾思奇①的《大众哲学》、暮桥同志的经济学方面的著作。我学的是电机制造专业，但是我们那个时候也有经济学的课程。我认为，薛老在我入党以前就是我参加革命的经济学方面的启蒙老师，所以我可以说是薛老的一个老学生。

---

① 艾思奇，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教育家和革命家。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共中央高级党校哲学教研室主任、副校长，中国哲学学会副会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主要著作有《大众哲学》、《哲学与生活》等。

1952年，我从东北人民政府工业部调到国家计委。不久以后，暮桥同志就担任国家计委副主任、全国物价委员会主任。在那个时候，我就可以说是薛老的部下啦。但是，我这个部下跟暮桥同志差了好几级，所以那个时候暮桥同志未必认识我。当时，我们对暮桥同志是非常敬佩的，因为我们知道暮桥同志有很深厚的学术修养和很丰富的实际工作经验，理论基础非常扎实，在革命战争年代和新中国的建立过程中有很多的贡献。

刚才，胡绳同志讲了一个很重要的方面。薛老不但是一位坚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者和战士，有很深厚的学术功底，有长期的经济工作的实践；他的治学态度又是非常实事求是的，具有大胆敢言的学术精神。所以，对他的著作我从来都是非常注意的。特别是在改革开放以后，薛老的思想随着时代不断地进步，写了很多的著作。我认为，薛老是坚决地拥护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是拥护“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这一党的基本路线的；而且，他往往有自己独到的见解。薛老发表在《人民日报》的那些文章常常是一大版，我总是非常细心地去读，每一次都从中得到启发。

薛老的为人，我认为也是非常地坚持原则、党性很强。记得1956年，我在国家计委给当时的党组副书记张玺①同志当秘书。有一次，张玺同志告诉我，暮桥同志要求自己是非常严格的，生活上是非常简朴的，他要求把自己的稿费全部交给党。时间、地点我记得很清楚，张玺同志讲话时的神情我也记得很清楚。后来，张玺同志对暮桥同志说，你不必这样做，你都不拿，那谁也不敢拿稿费了。但是，暮桥同志还是把稿费全部交了党费，交了17000元，在那时可是一个不小的数字。可见，暮桥同志要求自己非常严格。

---

① 张玺，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国家计划委员会常务副主任，参与组织编制国家第一个和第二个五年计划。

“文化大革命”时期，我们在1969年年底到湖北省襄樊国家计委干校，薛老不久也来到了干校。当时，在干校流传着一些关于薛老的笑话。一次，薛老和我们一起坐着马扎听报告。突然有个同志发现，薛老是坐在腿朝上的马扎上，大家都笑了。后来再听报告时，很多同志

都要看一看薛老。说实在的，同志们是十分善意的，绝对是以一种充满尊敬的神情来关注薛老的。我觉得，这些笑谈都反映了薛老忠诚、老实、简朴、淳厚的一面。

薛老今年90岁，为党奋斗了60多年。我觉得薛老的一生是一位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一生，是一位非常杰出的经济学家的一生，是为党的学术工作，为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工作作出了重要贡献的一生。我在这里向薛老表示衷心的敬意，并且敬祝薛老健康长寿！

注意防范三峡工程建设的风险

(1994年11月2日)

1994年10月31日至11月2日，朱镕基同志先后在四川、湖北省考察三峡工程。这是朱镕基同志在湖北宜昌三峡坝区听取中国长江三峡工程开发总公司工作汇报时讲话的主要部分。

三峡工程是个伟大的、跨世纪的、全世界第一的工程，很多问题都要一丝不苟，设计、施工、规划各方面要密切配合，要有严格的质量监督。监理制是很好的，我在上海搞南浦大桥，就实行监理制。不实行监理制，你讲一万遍“质量第一”还是不行，到最后已经晚了，再花多少钱也挽回不了损失。你们工作做得很好、很出色，当然也很辛苦，希望你们继续努力。我完全相信，三峡工程的效益会很好，甚至于在同类工程中可能经济效益是全世界第一的。但是，绝对不要认为三峡工程风险不大，否则我们可能要犯错误。这风险不在你那个地方①，也不在你们湖北、四川那个地方，风险在国家。

---

① 指中国长江三峡工程开发总公司。2009年9月，它更名为中国长江三峡集团公司。

我不是说风险很大以至于工程搞不下去，不是这样。我们要注意防范三峡工程建设的风险：第一个风险是资金很大，国民经济能不能承受得起。这个风险不是说我们国家承受不了三峡电站，绝对不是。而是说我们搞了三峡工程不可能代替一切，你上，别人还照样要上。这个总规模是否承受得了？财政能不能承受得了？物价能不能承受得了？企业能不能承受得了？这是个大问题。我讲的意思是拜托你们预先把投资打够，把钱算够。如果钱不算够，最后结果大大超了预算，你说我怎么弄呀？我这样讲不是无的放矢，二滩水电站原来报预算48亿元，现在250亿元还下不来呀。如果按这个小数字来做计划，财政不破产才怪，银行也得破产。风险相当大，现在好多因素搞不清楚。我拜托你们在目前可以预见的范围里把资金算够，这样才是真心实意地

想让三峡工程上马，而且把它建好。如果不实事求是，算出来的投资听起来很小，就赶快上马，到时候投资大了我们承受不了。算工程总的资金需要量时，有两个因素要打进去，一个因素是考虑通货膨胀，第二是要打足利息，这样才能计算回报期。这个方法国际上是通用的。不把资金算准算足，不好向全国人大和全国人民交代。

第二个风险是移民，这个风险可是大得不得了。因为我们已经有教训了，如新安江水电站的移民，40年过去了，问题还没解决。三峡工程100万人以上的大移民，而且64%是城市人口，这个钱不知道是怎么花法，公用设施、城市建设等等不知道要花多少钱。农民安置，每户三万块钱绝对够了；城市工厂的搬迁，真不知道要花多少钱。所以，对移民问题要有足够的重视，否则三峡工程建成了，也蓄不了水。三峡工程包干400亿元来解决移民安置问题，对包干我是完全赞成的。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一次讨论三峡移民问题时，我就提出一定要包给地方，包给省长，而且要包死。我不赞成一切问题都跑到北京去定。所谓“包干”，也只能像现在这样包，至于钱到底够不够只有天晓得。为什么？因为事先没有规划，也没有迁移一个城市的经验。现在看起来，农民的搬迁要分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尽可能就地后靠。现在到实地看了以后，我觉得对这一点估计过高，因为无地可退，无后可靠，勉强怎么行呢？把山挖得一塌糊涂，植被也破坏了，这是不行的。因此要考虑第二个层次，在省里面安置，往人稍微少一点的地方、地稍微多一点的地方安排，或者到一个需要劳动力的城镇去安排，这个不靠省长根本不行。第三个层次，如果本省实在安排不了，还得考虑在省外安置。中国还有的是地方可去，还是有很大的潜力。农村的搬迁人数还比较少，城市的搬迁人数就多了，所以要考虑不要随便提搬迁这个说法，我觉得还是提安置比较好。搬迁并没有错，可以照讲，实际上我们应该着重地说安置。搬迁的观念要改变一下，因为从搬迁工程里面又要国家拿50亿元的贷款。这个贷款不是说不能贷，要看效益，不能当做安置性质使用，那样银行背不起。如果说这个工厂搬到另外一个地方去，生产原来产品或生产新产品确有效益，还得起贷款的，就借；还不起的，绝对不借。安置的钱要从移民费用里出，这一点一定要讲清楚。不然，这个投资又扩张到贷款里面去了，将来说不清楚要多少钱。

最后一个风险是泥沙。建三峡工程的泥沙问题究竟有多大？现在看，这个长江已经不是长江了，比黄河还要黄，成了“黄江”。一年有多少泥沙往下泄，说法不一，有的人说是9亿吨，还有的人说是6亿吨。泥沙问题究竟对大坝有什么影响？对河流的生态环境有什么影响？我只是提醒你们，这个问题还是有一定风险的，要很好地研究。说到底，上游植被的状况要是不改变的话，对大坝是没有好处的，任何技术方法恐怕也难解决。根据我们的经验，上游的植被至少50年内难以彻底改善。我们已经搞了40多年，植被究竟是改好了还是改坏了，长江的泥沙含量就是明证。我们现在就要重视这个工作，最后还要等树都长起来，没有几十年是不行的，如果不抓紧更不行。所以，我觉得泥沙总还是个问题，要继续研究。

现代企业制度改革试点的几个问题

(1994年11月4日)

1994年11月2日至4日，全国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试点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出席会议的有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主管经济工作的副省长(副主席、副市长)、经济贸易委员会(经济委员会、计划经济委员会)主任、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主任，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和单位负责同志，100家试点企业主要负责同志。这是朱镕基同志在会上的讲话。

党中央、国务院对这次会议非常重视，江泽民同志亲自主持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讨论了现代企业制度改革试点问题，通过了国务院提出的方案。

今年的改革，重点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宏观调控体系的基本框架，主要是进行财税、金融、外汇、外贸、投资体制等方面的改革，规模非常宏大，内容非常深刻。现在看，尽管还不很完善，但基本框架有了，为深化企业改革奠定了基础、创造了条件。企业改革是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所以，今年上半年基本上完成宏观调控体系改革任务后，我们就根据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精神，逐步把改革的重点转向企业改革。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四届四中全会上讲，从明年开始，要把深化国有企业改革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重点，力争在转换国有企业经营机制、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增强国有企业活力方面有所突破。只有切实抓好国有企业改革，才能真正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全国的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试点工作，由国家经贸委牵头。试点办法，由国家体改委、经贸委和有关部门共同制定。试点企业100家，从这里面总结经验。

关于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试点工作，我讲几点意见。

一、全面理解

要全面、正确地理解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作出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关于现代企业制度，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决定》有四句话："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概括得很全面。现在各地搞了那么多企业试点，但许多人理解得不那么准确，过分地强调了产权清晰，把重点放在探索产权形式上，在这方面大做文章。当然，产权清晰对推动企业经营机制转换有很大作用。但如果只是单打一，做不出更大的文章。现代企业可以有多种组织形式，我们要在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进行各种形式的探索。不是要把所有的企业都办成股份制公司，更不是把所有的企业都办成上市公司。只讲"产权清晰"这一句话，注意力只集中在这一方面，其他三句话成了陪衬而已，这样理解太不全面。现在有些所谓的"产权交易"，是将公有财产变着花样地转成个人财产，国有资产流失十分严重，这怎么是我们所要的"产权清晰"呢？一些企业搞内部集资入股，把银行贷款抽出来，成立一个股票科，然后去炒股票赚钱。这种以集资为目的、以投机赚钱为目的的股份制有什么用？只能更增加银行资金的紧张。我们不能将注意力只集中在以集资为目的的股份制上。产权清晰很重要，要继续探索，但不要把它抬到压倒一切的地位。

二、突出重点

我们应该很好地贯彻执行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四届四中全会上的讲话。江泽民同志说：深化企业改革关键是实行政企分开、搞好企业内部经营管理、逐步建立社会保障体系。这里讲的关键有三点，大家要好好学习，认真贯彻。

第一，要抓政企分开，切实转变政府职能。政府职能不转变，政企就难以分开，企业不可能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现在有些政府部门的人一下去，就让企业干这干那，甚至限期搞好，瞎指挥，吃偏饭。这不是以市场作为资源配置的基础，而是用行政的力量随意去干预企业。用行政手段短期搞好企业很容易，但不能巩固和持久。政企不分开，国有企业是搞不好的。我去年到北欧五个国家，其中挪威国有企业的比重超过50%。它有一个很大的特点，政府不直接管理企业的经营活动，但对企业领导人抓得很紧，大型企业的总经理要经政府和议会批

准任命，政府主要行使监督、执法职能。国外管理企业的一些有益经验，我们应当学习和借鉴。

《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转换经营机制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公布两年了，见效不大，主要是政企没有分开。我希望这次试点，中央各部门和地方政府少管一点。加强领导不等于什么事都管，管好班子最重要。还是三条：坚持和完善厂长(经理)负责制，发挥企业党组织的政治核心作用，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政府少管不等于撒手不管，要认真搞好试点，要监督、推动，但不要瞎指挥。

第二，要搞好企业内部经营管理。前一段时期，有些地方只抓产权交易，什么制度都不要了，企业内部管理一塌糊涂，假冒伪劣产品横行。一说搞市场经济，就以为可以全面放开，什么都不管了，那是不行的。还是要眼睛向内，苦练内功，从严要求，把企业管理基础制度健全起来。

第三，要逐步建立社会保障体系。现在党中央、国务院都在抓这件事，这是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最重要的配套改革。搞好国有企业需要逐步做到企业能破产、职工能辞退，解决好这两个问题，企业效益才可能上去。做到这两点，必须有配套政策。破产企业的人员要妥善安置，工人的基本生活要有保障，否则社会不稳定。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以后，国务院有关单位研究建立社会保障体系问题，包括养老、失业、医疗等保险制度。经党中央和国务院多次讨论，现在方案都出来了，准备开全国性的会议，先试点、再立法、后推广。养老保险制度已经进行了比较大范围的试点，今后将进行更大范围的规范化试点。

企业破产是个难题。《企业破产法(试行)》为什么难以执行？主要是职工的安置问题。原来规定企业破产的拍卖所得先用于偿还银行债务，这是正确的。但职工得不到安置，就会影响社会安定。现在为推动这项工作，应有新的思路。财产的拍卖所得先要用于安置职工，然后再用于偿还银行债务。拍卖要包括土地的使用权。亏损企业不少在城市中心，土地使用权很值钱，企业破产后安置职工绰绰有余。当然，这样搞，银行财产要受到很大损失，但不付出这个代价，企业长期亏损下去，银行的债务不但不能偿还，还会不断增加。要想得远一点，想得开一点。破产要有领导、有组织、有步骤地进行，先在国家

经贸委组织的18个试点城市①里试点。企业破产后，厂长应该免职或降职。把厂子搞垮了，厂长却升官，是不公平的。我们要坚持一条：企业破产试点先在18个试点城市内进行，银行参加。省市级银行不能决定企业破产，必须报总行批准。我认为破产机制非常重要，今年把破产试点搞好，明年再扩大试点范围，每个城市有两三个企业破产，这对全市的国有企业都会有大的震动，对推动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会起很好的作用。这件事很复杂，只能经过试点逐步实施，千万不能刮风。

---

① 18个试点城市，即1994年10月25日，国务院下发《关于在若干城市试行国有企业破产有关问题的通知》，决定在上海、天津、齐齐哈尔、哈尔滨、长春、沈阳、唐山、太原、青岛、淄博、常州、蚌埠、武汉、株洲、柳州、成都、重庆、宝鸡18个城市，进行企业优化资本结构试点工作。

三、相互结合

第一，改革、改组和改造要互相结合。改革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改组是企业组织结构改组，改造是企业技术改造。这几项不结合，企业搞不好，现代企业制度也建立不起来。比如纺织行业，如不改组，棉花都被小棉纺厂吃了，谁能搞得好？所以，我赞成棉花调一点价，提价后大中型企业勉强生存，小厂吃不起，小棉纺厂搞不下去了，企业组织结构改组的作用就发挥了。其次，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试点，还要与贯彻落实行之有效的有关行政法规结合起来进行，要继续推进面上的企业改革。1992年发布了《条例》，这也是符合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决定》精神的，其中好多条文到现在都没有落实，还要继续贯彻落实。今年又通过了根据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决定》制定的《国有企业财产监督管理条例》，国有企业如果没有外部的监管，国有资产很容易流失。目前国有资产流失的现象相当普遍，“大船搁浅，舢板逃生”。一个大厂，背一屁股债，分出十来个小厂，大厂剩下几个老弱病残背着债务，债务实际上都留给国家了，小厂不亏了，大发奖金，这是不行的，还是要监管。先从对国民经济有重大影响的大企业开始，要先派监事会进行监督，不管企业经营，只监督企业的资产负债情况。企业资不抵债，就可以建议撤换厂长。所以，建立现代企业

制度试点，应同贯彻《国有企业财产监督管理条例》结合进行，不能单打一。

这次会上提出了几个问题。一是不能吃偏饭，但能不能吃点新饭？大家看到，靠吃偏饭搞现代企业制度试点，即使有了经验也很难推广。偏饭不吃，新饭还是要的，如社会保险制度、企业破产制度、银行冲销呆账准备金、“拨改贷”①变为“贷改投”②以减轻企业还本付息的负担等等。但不要只在减税让利、优惠政策上打主意，现在已经是无税可减、无利可让了。国家财政很困难，收入增加不少，支出更大。大家还是要认真领会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决定》的精神，加快政企分开，加强企业内部管理，把配套措施搞起来，真正使亏损的企业扭亏为盈，盈利的企业办得更好。

---

① “拨改贷”，是国家预算内基本建设投资由财政拨款改为银行贷款的简称。

② “贷改投”，指把国有企业“拨改贷”债务的本息余额转为国家资本金。

第二，资金问题。当前资金紧张的情况，其中有很大一部分是由于企业相互拖欠引起的。这次企业间大量相互拖欠的原因和1991年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同之处。1991年主要是基建资金不到位，拖欠了生产企业的资金，形成连环套。因此，只要银行注入一定的贷款到资金不足的项目，偿还生产企业的设备、材料、施工款项，整个债务链条就解开了。现在不是这样了，只有一部分是基建规模过大、资金不到位引起的，约占全部拖欠款的三分之一，而且主要是地方自筹资金部分不到位引起的，中央没有资金不到位的问题。现在企业相互拖欠的主要原因是，进口失控引起钢铁工业和石油、石化工业产品滞销、积压，资金回不来。首先，1992年和1993年上半年钢材价格上涨得太猛，涨了一倍多，超过国际市场价格水平。1993年进口了很多，今年上半年还在进，国内企业生产的钢材卖不出去，钢厂又不能停产，造成压库，货款回不来。今年的拖欠款中，约有三分之一是钢铁工业引起的。其次，是成品油大量进口，造成国内成品油没法生产，大庆、新疆油田曾经部分关井。现在钢铁工业采取几项措施，一是不回钱不

发货；二是减产不停产，国家给予一定的流动资金支持；三是严格控制钢材进口；四是增加出口。成品油的销售情况通过降价有缓解。形势会慢慢地好转，拖欠情况也会缓和，但前提是坚决限产压库促销，千万不要追求没有效益的速度。

第三，中央抓的和地方抓的试点工作如何结合？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试点确实应认真探索，也很难说是一个模式，还要经过实践检验。各地区面上的试点企业应逐步向国务院的方案靠拢，不妨碍各自探索新的经验、新的办法，但不能违背国家法律和政策的原则规定。全国的试点工作由国家经贸委牵头，省里的试点由省政府自己决定。中央各部门不要给省里下通知，要求自己的对口部门如何如何办，否则地方政府就很难办了。

总之，为了共同的目标，大家要团结，要协作，多商量，同心同德，把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改革试点工作抓好。

企业改革中要防止国有资产流失

(1994年11月6日)

1994年11月2日至6日，全国国有资产管理暨全国清产核资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出席会议的有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财政厅(局)、国有资产管理部门的负责同志，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这是朱镕基同志在会上讲话的一部分。

党中央、国务院很重视国有资产管理工作。江泽民同志多次指出，我们负有历史责任，不能让国有资产流失，流失了不好向历史交代。我看了这次会议的简报，大家对国有资产管理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许多很好的意见。

加强国有资产管理工作，是包括在整个企业改革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同时对现代企业制度能否搞成功是一个保证。这首先因为我们搞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什么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我的理解是，它的一切运作都是按市场经济的规律、国际惯例来进行，但又必须是以社会主义的公有制为主体。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市场经济也许效率很高，但社会的公平就无法实现。所以，我们必须维护国有资产，保持公有制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主体地位。还有一条，没有以公有制为主体，就没有按劳分配。公有制的主体是国有企业，如果连国有企业都管不住，把国有资产流失了，就是私有化了，就谈不上社会主义了。当前，国有资产可以说是我们全国人民的共同财产、国家的命根子、社会主义的根本保证。国有资产没有了，社会主义也就没有了，所以，我们来担负国有资产管理工作，应当是承担了光荣的历史责任。我们是在保护全国人民的共同财产，我们是在维护国家的命根子，我们是在保护社会主义的基础。

刚开完的全国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试点工作会议，再次明确企业改革是从现在开始到明年的经济体制改革的重点。今年上半年主要进行财税、金融等宏观改革，改革的成功，为企业改革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今后改革工作的重点要转向企业改革，企业改革如果不成功，国有企

业经营机制还是不转变，宏观改革也不能够成功，它们是相互依存的。在整个企业改革试点中，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应积极参加，这是企业改革成功的保证。下面，我讲两个问题。

一、国有资产管理工作在现代企业改革试点中，应起的主要作用就是防止国有资产流失

我们参加试点的主要任务，就是制止国有资产流失，大家要明确这一条。国有资产管理局给我提供了一个材料，说现在国有资产流失有多种方式，非常严重。去年，国有资产管理局组织了一次调查，调查了24个省区的5800个单位，国有资产流失了360亿元；调查了10个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的280个单位，国有资产流失了85亿元，数字惊人。国有资产流失的方法有7种：

第一，中外合资建企业和股份制改组中，不评估或有意低估国有资产，这是最严重的，也是最不应该的。搞合资经营和搞股份制时把国有资产有意低估，或者由于极度无知，又极端地不负责任，把国有资产拱手送人。最典型的是湘潭精细化工公司跟新加坡的企业合营。首先，外方合资的股份都是破破烂烂的二手设备，折股很高；软件技术全是抄了西方国家的几个配方，没有经过试验，这个股份也折得很高，结果投产以后老是拿不出合格产品。然后，中方把自己入股的土地、厂房折价很低，这叫半卖半送。最后，在经营过程中，外方把外销价格搞得很低，低于国内市场价格。外商最通用的手法是把进口原材料价格抬得很高，在香港结算时就造假，把出口产品价格压得很低，中间的暴利都归他了。搞这种合资企业究竟有什么意思？根本不符合我们对外开放政策的本意。最后更可笑的是中方退出了，把整个工厂交给新加坡的商人，变成他的工厂了。这个事情莫名其妙。这不叫“卖国求荣”吗？把国有资产卖掉了，还不要钱或是低价卖，这是最大的一个问题。

第二，股份制企业对国家股不分红、不配股，都分给职工。现在开始分财产了，把国有资产量化了分给个人，这不就是搞私有化吗?

第三，有的地区以明晰产权为名，把国有资产无偿或低价卖给个人，搞负债持股。

第四，有的企业在经济困难时把企业改组分开，搞“大船搁浅，舢板逃生”，逃避债务。债务由总厂几个老弱残兵顶着，银行逼债总不能逼出人命来吧？企业就不还钱了。大量的职工都被分出来搞经营，没有债务，赚钱之后，大发奖金。这种情况很普遍。因此我就讲，对债权、债务关系一定要搞清楚。一个国家，不管是搞什么经济，企业把债务随便赖掉，这个国家是没有什么经济效益可言的。我想，造成这个债务是过去政企不分开的问题，好多是由于上级的瞎指挥，使企业负了债。再说，把企业的债务冲掉了，说是减轻了它的历史包袱，如果这个企业从此就办好了，我看也值得。问题是它绝对办不好。冲掉这一批债务，还有下一批，没完没了。企业的经营机制不转换，靠冲销债务去改变，历史证明是绝对不行的。我们不是不解决企业的历史包袱问题，不是不冲销它的债务。采取什么办法呢？就是破产的办法，永远给冲掉了。现在好多地方擅自把企业的债务冲掉了，其结果是越欠越多，永远冲不完。过去由国家“拨改贷”搞的重点建设，基础设施建设，还款能力是比较差的，特别是中间又有汇率的变化，这些项目里确实有一部分还不起债务。因此我们考虑，对那部分还不起债务的企业，“拨改贷”改成国家投资的股本，而且不要再还利息了，作为国家投资了。根据中央指示，国家计委正积极地制定方案，组织实施。

第五，一些企事业单位的部分国有资产不入账，形成大量的账外资产，这也是很大的问题。特别是对它们的境外投资情况根本不清楚。各部门、各地区究竟在境外办了多少企业？好多都是不入账的，甚至有的企业未经国务院批准到香港“买壳上市”，炒股票，源源不断地把国内资金流到境外去。我希望国家国有资产管理局好好管管这件事。国家国有资产管理局应当是党中央、国务院在国有资产管理上的一个耳目。国有资产流失你是制止不了的，但你应当及时把国有资产从什么渠道流失、流失了多少、是谁流失了等情况报告国务院，以便研究制定政策。你们想办法，探索吧，把国有资产管起来。

第六，全民企业办集体企业，无偿划转和无偿占有国有资产，把国家所有制变成集体所有制，把集体的资产变成个体的，给分掉了。

第七，在不规范的产权交易中廉价出售国有资产，造成了流失。“产权交易”一出来后，国务院是明令禁止的，但实际上禁而不止，还

在那里搞。规范地搞还好些，现在就是不规范，大量的国有资产从国有变成私有了。如果这么折腾下去，就把国家都折腾光了。

国有资产管理工作，包括清产核资、资产评估、产权登记、产权界定这一系列的工作，都是为防止国有资产流失服务的，都是非常重要的工作。我非常希望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对国有资产管理能够建立一套基本的制度。首先把情况弄清楚了，才能出政策。千万不要着急出政策，不要急于求成。好像国有资产管理部门一家就可以把国有资产管理搞好了，就可以保值增值了，还想参与经营。国有资产管理局怎么能参与经营呢？只能够建立一套基础的管理制度，总是在监视着国有资产变化的情况和国有资产在转移、经营管理当中的流失情况，随时向国务院报告，我们再来研究对策。

国有资产流失不是国有资产管理部门一家能解决的问题，但是你们的责任非常重大。这是一个光荣的历史责任，要担负起来。你们要把情况讲清楚，要有实实在在的东西，要有一系列的报表、制度、组织机构、监督的方法，还要有扎扎实实的工作、切实的调查，才能把这个工作做好，不然就做不好。

二、建设一支德才兼备、精明强干的国有资产管理队伍

我们这个队伍不要很大，但要有忠诚廉洁的品质，又要熟悉业务，懂经济、懂生产、懂会计。国有资产管理需要有这么一支精明强干的队伍，来保卫国家的利益，提得高一点来说，就是保卫社会主义。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明确决定，要加强中央和省两级国有资产管理机构。我想，也不好再要求每个地市县都设立国有资产管理机构，不要去干预地方政府的事情。但我们总是可以提一个要求，不管是哪里管，总得有人管这件事情。新中国成立前，在解放区，一个乡长什么都管，钱粮、纳税、支前、动员，他全管。国有资产总需要有人管，而且需要有统一的制度，把报表发下去要填上来才行，不然国务院怎么掌握情况？当然，我们不要搞得很烦琐，否则实际上也做不到。

另外，很多工业部门国有资产的管理机构也不健全。我们不干预各个部门设什么样的国有资产管理机构，但总是要重视这个工作。按照《国有企业财产监督管理条例》，就是要进行监管试点，成立监事会，这个很明确。中央企业是由中央各个部来牵头派出监事会，国家

国有资产管理局可以参加。如果你这个部门没有一批人来监管国有企业、管国有资产，那你怎么管企业呢？所以，党中央、国务院各个部门也要加强国有资产管理的机构。加强不等于加很多人，而是领导重视，有比较精干的人来管这件事情，而且要认真地管。当然，队伍的素质要提高。国家国有资产管理局对加强培训工作要给予重视。我多次强调搞注册会计师的培训，实际上，国家国有资产管理局也需要注册会计师，国有资产管理人员都要努力取得注册会计师资格。当然，主要是行政管理，如资产评估并不是要国有资产管理部门进行评估，但是要由国有资产管理局来认定。现在这个工作又搞乱了，因为资产评估机构可以收费，可以发高工资，所以认定机构就多得不得了。国务院下发的《国有资产评估管理办法》，明确规定只有国有资产管理行政主管部门才能认定。目前已经发现一些会计师事务所专门帮助企业造假账，这样的会计师事务所有什么用处？因此，要有一个统一领导、一个章法。但另一方面，我们要清正廉明，自己就不要搞资产评估了，否则难以服众。自己认定的机构专门高收费、乱评估、低作价，我们就没有权威了。因此，还是要把我们的工作做好了。

此外，现在有的地方把国有企业用留利搞的技术改造和基本建设资金形成的资产作为企业所有，这个不对，没有这个说法。国有企业获得的利润，都是国家的，资产增值也是国家的，不要搞企业所有制，只有国家所有制。这一点，大家在国有资产管理中要注意。

上海要努力搞好国有企业改革

(1994年11月14日)

1994年11月10日至19日，朱镕基同志在上海市考察工作。这是朱镕基同志在11月14曰下午听取市委、市政府工作汇报时的讲话。

今年的宏观改革为企业改革创造了一个条件，但是没有企业根本性质的改革，宏观调控、宏观改革也不可能真正成功。我觉得上海在这方面具有特殊的责任。上海的重点建设、基础设施建设、城市建设、产业结构调整，按照既定方针和已有的良好基础搞下去，就会一年变一个样，不会再发生波折和问题。现在上海面临的唯一要解决的问题是国有企业的改革，这项改革如果搞好了，就为全国提供了很有借鉴意义的经验。上海是国有企业最集中的地方，全国没有哪个省份有上海这样的特点。上海的主要经济指标里，国有企业都占70%以上，上海的国有企业对上海国民经济具有决定性的作用。上海要增强抗经济波动的能力，就要把国有企业搞好。只有把国有企业搞好，上海才会真正繁荣，才能形成良性循环。



1994年11月14日上午，朱镕基在上海市主持召开国有企业座谈会。前排右一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上海市市长黄菊，右三为国务院副秘书长席德华。

上海的经济基础在国有企业，但国有企业存在很多历史遗留问题，包袱是最沉重的。上海国有企业曾经给国家作出过重大贡献，其实每一个工厂的积累资金可以建十几个或几十个工厂，都上缴给财政，支援了全国。这几十年，上海老企业的技术改造确实落后了，这是受历史条件的限制，包括我在上海工作的时候也没有钱搞技术改造，所以企业设备很落后。现在很多外地的合资企业，甚至内地的乡镇企业都已经超过了上海老企业的技术和设备水平。过去上海是出口的主力、上缴财政的主力，产品质量是最好的，现在逐步地处于劣势了。但在另一方面，上海的各种费用提高得很快，特别是成本的提高。而外地企业使用大量的廉价劳动力，上海国有企业的工资成本根本不能与它们竞争。除新兴产业外，上海国有企业应该说处在比较困难的状态，尤其是纺织工业。因此，如果上海的国有企业搞好了，外地的国有企业没有理由搞不好。上海有着特殊的优势，上海工人阶级是了不起的。我当了三年市长，对此深有体会，只要给他们任务，上海的工人

阶级都会干得好。几个大的建设项目，如大桥、地铁呀，都可以证明这一点。上海工人阶级同企业的感情是很深厚的，我相信这个优势可以弥补劣势，一定能够把国有企业搞好。我来上海那一天，看了对上海灯芯绒总厂下岗工人的电视采访报道，一直看到夜里12点多。这个电视片敢于揭露矛盾，敢于把工人下岗以后遇到困难的心态都讲清楚，把问题都提出来了，并且不避讳这个问题。特别使我感动的是，那些每月拿120元钱的下岗工人并没有抱怨党，只是讲自己如何如何困难。这是一个新的问题，国有企业就是困难。另一个转岗以后一个月挣2000元到3000元的工人还是想回工厂，他说，如果工厂要我，我还是要回去。这样的话非常平凡，但听了以后要掉泪。而且讲这些话的人都不是拿着稿子，而是真情实感，侃侃而谈。上海的电视报道揭露了好多矛盾，引导观众去思考问题，探索解决问题的办法。

现在一般国有企业的富余工人有二分之一，甚至三分之二，如果把这部分工人的就业安置好，国有企业的困难就解决了。就业的门路还是很多的，文化人也会做生意，产业工人就不会做生意？做生意也包括服务性行业。我在今天上午就讲了，“桑塔纳”轿车出厂价不过10万多元，销售价15万元，外面有的卖到20万元，就是中间环节把钱赚走了。为什么“桑塔纳”不能在全国搞自己的销售网呢？谁也竞争不过我，“桑塔纳”就立于不败之地。所以，上海的产业还是要多样化发展，而且也有很大的潜力，不要单打一，不要把工业企业的富余人员都转去搞工业，思路应更宽广一点。工人的就业安置问题解决了，上海的国有企业问题就解决了，我相信一定能搞好。当然，这里有经营机制的转换问题，还有很多其他问题。破产与裁员本身是一种机制，要强迫企业转变经营机制，要它们自负盈亏。我希望上海在国有企业改革方面提供一些比较好的、成熟的经验。上海的国有企业搞好了，这是最有说服力的样板。上海这样一个远离原料产地的大城市，又是一个生活水平很高、老龄化的城市，国有企业改革都能搞好，外地为什么不能搞好？我就是提这么一点希望。

在一九九四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的总结讲话

(1994年12月1日)

1994年11月28日至12月1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出席会议的有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政主要负责同志，中共中央、国务院各部门主要负责同志。这是朱镕基同志在会上总结讲话的主要部分。

江泽民同志、李鹏同志对当前国内国际政治经济形势作了深刻的分析，提出了明年经济工作的指导思想、主要任务，对需要统一认识的几个重大问题，也都讲得很清楚了，我现在根据会议讨论中提出的问题，做一点补充。

一

当前经济形势总的是好的，特别是在改革方面，我们向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跨出了重大的步伐。现在看起来，这是很不容易的事情。尽管出现了这样或者那样不完善的问题，但是总的说来，预定的改革目标已经达到了，而碰到的风险没有原来想象的那么大。生产没有大起大落，保持了经济发展的好势头。社会发展方面的进步很快，人民生活水平也有很大提高。正如同志们所讲的，我们在今年干了多年想干而没有干的事情。各方面的成绩大家都看得见，国际也公认，是谁也不能抹杀的，必须充分肯定。



1994年12月1日，朱镕基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作总结讲话。右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乔石。

但是在充分肯定成绩的同时，我觉得也应该清醒地看到前进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最突出的问题就是通货膨胀。通货膨胀经过了几个过程：去年11月份粮食价格全面放开，带来粮食价格猛涨，棉花价格也猛涨，今年1、2月份物价在去年11、12月份猛涨的基础上，环比连续两个月上涨3%。在国务院采取平抑粮价的措施以后，3、4、5、6、7五个月，物价涨势明显趋缓，这五个月环比的增长指数在0.5%到1%之间，没有再猛涨了。但是8、9两个月涨势又猛了，8月份增长3%，9月份比8月份又增长3%。我想，这与我们各个地方过早地放开一些价格、减少补贴，特别是提高城市的服务业价格有关系。10月份好一点，比9月份增长1.7%，但还是很高。现在，11月份的物价指数还没出来，我估计还是相当高。我们过去算过账，如果物价维持在9月份的水平，不再往上涨，那今年全年的物价指数就是20.7%。现在10月份又涨了1.7%，11、12月份如果稍微再往上涨一点，那今年零售物价指数就超过20.7%了，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就达到25%以上。所以说，今年物价

的增长水平是改革开放16年来最高的一年，这一定会对明年的物价和经济发展产生很不利的影响。

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就是农村物价涨幅高于城市，内陆地区物价涨幅高于沿海地区。当然，这与原来沿海地区的基数比较高有一定的关系。但是，这种形势也是过去从来没有过的。在这种情况下，各个地区的感受不一样，各阶层人民群众的感受也不一样，但是确实有相当大一部分人民群众反应很强烈。物价大幅上涨，使整个的宏观经济环境绷得很紧，对改革和发展都不利，对吸引外资、扩大开放也不利。从国内外的经验来看，通货膨胀对经济发展只有害没有利。江泽民同志形象地说，靠通货膨胀来刺激经济发展是“饮鸩止渴”，我认为是非常确切的。骑上了虎背以后，就很难下来了。所以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把控制物价上涨、抑制通货膨胀作为当前和明年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作为正确处理改革、发展和稳定三者关系的关键，我认为是完全正确的。在这个问题上，我们首先要统一认识。

二

今年物价这么大幅度上涨，原因是复杂的，是多种因素交错形成的，要实事求是地全面地加以分析。价格的调整和改革是引起这一次价格总水平上升这么快的一个重要因素，而这种价格的结构性改革，是我们在向市场经济过渡进程中所不能避免的。也可以说，这是一个阵痛的过程，你不经过这个阵痛，就不可能建立起市场经济的秩序。这几年，我们对能源、交通、原材料的价格连续地作了调整，往上提，提价的金额总体上相当于两千几百亿元。特别是去年农产品价格的放开，对物价的上涨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但是这种价格的调整和改革，对于理顺价格关系、加快基础产业的发展、调整产业结构，特别是对于调动农民种地的积极性，都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不这样调整，我们会更困难。现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普遍有了提高，从去年化肥的滞销到今年的供不应求就可以说明这个问题。所以，价格调整和改革所引起的物价上涨是难以避免的，是必经的过程。

但是我们也应看到，这次物价大幅上涨，有比这个更复杂、更深刻的原因。这次农产品价格的涨幅，已经超过价格补偿性、结构性调整的范畴，不是都按我们原来的设想有计划、有秩序地进行，这个问题要引起注意。有一个数字讲今年的粮食价格比去年上涨47.4%，我觉得

这个数字不可靠，低估了当前的通货膨胀。现在主要粮食品种——大米、玉米、小麦的价格都上涨一倍以上，绝对不会是47.4%。那为什么出现这个数字呢？我找国家统计局的同志查了一下，发现现在形势变了，但统计方法还没有变。其中最大的一个问题是，统计局对价格取样点的选择，有85%从国有粮店里取样，只有15%从集市贸易取样。这是过去的做法，国有粮店是粮食销售的主渠道嘛。现在可不是这样了，我在北京市调查过，北京市国有粮店的销量只占30%，70%的销量是在集贸市场和私有粮店。蔬菜销售只有10%在国有菜市场，90%是在自由市场。国有粮店经常是有价无货的，它的价格不能代表市民的真正感受。另外，大米只统计标二籼米，这也是过去的做法。现在大家不吃标二米，都吃粳米了，现在是1元5角、1元6角钱1斤；但现在不统计粳米，只统计标二米，而标二米是从仓库里拉出来的、国家补贴的米。今年决定标二米不涨价，你拿不涨价的米来作为抽样，它就不能代表大米的真实价格，米价其实是涨了一倍。面粉统计取样65%是标准粉，富强粉只取35%，现在多数人都吃富强粉了，富强粉的价格涨得多，标准粉有国家补贴，涨得少。所以，粮食价格的上涨实际上不是47.4%，而是100%。也就是说，这一次物价上涨里面，粮食涨价是主要原因，但是粮食涨价没有按我们原来的设想调价，而是超过了预定调价的一倍，这个价格已经超过了上半年国际市场的粮食价格，已经不是结构性、补偿性的调整了。



1994年5月16日，朱镕基在湖北省汉川市刘隔镇粮管所考察粮食购销情况。右三为内贸部副部长白美清。

现在粮食的涨价，不光是我们去进行结构调整的问题，这里面已经出现了一个供求矛盾扩大的问题。这几年，粮食没有怎么增产，今年是减产，内贸部说减产350亿斤，国家统计局说大概减产200亿斤，总之是减产。粮食消费又在增加，一年全国净增人口1500万，跨区流动的人口有2500万，这些人都到城市里来买粮食，也都增加了粮食需求，推动了城市的粮价上涨。现在的粮食库存下降了，去年10月底粮食库存是2250亿斤，现在只有1950亿斤，少了300亿斤，调控能力大大地减弱了，特别是中央的调控能力下降了，国家825亿斤的专储粮，现在只剩下600多亿斤了。到哪儿去了呢？一个是救灾，一个是平抑粮价，又扩大以工代赈，今年前后拿出了200多亿斤。所以现在不能够很有效地吞吐粮食来平抑粮价，缺乏这种能力。与此同时，我们又扩大了粮食出口，减少了粮食进口。我们历史上是一个粮食净进口的国家，但是从1992年开始变成了一个粮食净出口的国家，特别是今年，

到10月份为止，已经出口了1070万吨粮食，而进口的粮食只有720万吨，净出口了350万吨粮食。所以最近国务院采取措施，一律停止粮食出口。这是指新签合同，原来签的合同还得履约，实际上也出口不了，因为国内的粮食收购价格已经高于国际市场价格，你卖到国外去不是赔本吗？所以我再一次地呼吁各地区的同志，你那个大米、玉米都不要出口了，再出口你自己得赔本啊。国内的调控能力已经减弱，不仅粮食不能再出口，棉花也不能出口了。

市场管理放松、流通秩序混乱，也是推动当前物价上涨的重要原因。由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没有建立，国有商业和合作社怎么样去适应新的形势，发挥它们主渠道的作用，出现了脱节。新的渠道还没有建立，原有的运行了几十年的那一套做法，又在相当大的地区过早地放弃了。粮店都变为国有民营，供销社都变成个体承包，没有国有商业了，结果就变成哪个地方价格往上抬，东西就往它那儿流。企业定价的行为也不规范，想怎么涨就怎么涨。某些地区、部门为了局部的利益，趁外汇管理体制改革、税制改革之机，提高商品价格和公用事业收费，也推动了价格的上涨。因此，分析物价大幅上涨的原因，不能光看粮食调价的结构性、补偿性这一面，也要看到供求平衡失调，以及市场管理混乱等因素。这些因素都是不能忽视的，现在问题还远远没有解决。

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过猛、基建规模过大，是当前通货膨胀的根本原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去年增长58%，今年现在说是增长百分之四十几，实际上不止。我为什么说它不止呢？利用外资这一部分按照统计的口径是不计入投资规模的，而这一部分今年增加得相当猛。1992年、1993年，我们签了大量的利用外资的合同，现在钱都进来了，今年1到9月份进来了230亿美元，全年估计要超过330亿美元，折合人民币2800亿元。这2800亿元大多是往基本建设里投，虽然不计入投资规模，但是用它买材料、开工资、发奖金，最后都是推动购买力的扩大，拉动物价的上涨。今年总的贷款规模是5200亿元，再加上这2800亿元，大家可以想象，社会货币流通量的增加是多么厉害。物价上涨就是通货膨胀，通货膨胀就是票子多了、货币供应量多了嘛。当然，我们要充分看到利用外资的积极、正面的意义。特别是外资进来以后，我们的外汇储备从年初的212亿美元，到11月中旬增加到460亿美

元，增强了我们的支付能力，提高了我们国家的信用等级，有利于扩大开放。但另一方面，大量的人民币出来以后，投向也不合理，相当大的一部分投向高级房地产，动不动就是几十亿美元，而基础设施建设配套的资金跟不上，供电、供气等基础设施紧张得不得了。同时，一部分投资又变成了个人购买力，推动了消费品价格的上涨。所以，对外资投向还是要引导，不能去搞重复建设。重复建设搞到谁都不能发挥规模效益的时候，投资就都收不回来了。我认为，现在的投资规模大了，各方面都承受不了，市场承受不了，生产资料供给也承受不了。

消费基金的过快增长，也是通货膨胀的一个重要原因。据统计，去年的现金支出以45%的速度增长，今年又是百分之四十几的增长，9月份的增幅高达60.3%。这个还不包括所谓“灰色收入”，数字惊人啊！我们一向坚持的是“两个低于”，即工资性收入的增长速度低于经济效益(实现利税)和劳动生产率增长的速度，这是符合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的。而现在根本就不是什么“两个低于”，而是“两个高于”，就是消费基金的增长远远超过劳动生产率的增长，超过实现利税的增长。更大的问题还在于分配不均。主要是两个不均：一个不均是盈利企业大发奖金，大大地高于平均数，亏损企业连职工的基本生活费还保不了。大多数的盈利企业从来不想以后的困难，能发奖金的时候就大发，甚至亏损企业也发。另外一个不均就是各阶层的人分配不均，相差悬殊。典型调查表明，很少数的储户占有多数的存款。这个情况要是搞久了的话，也会成为社会不稳定的一个因素。

现在看起来，物价涨势未止。10月份是在9月份三令五申的情况下，物价环比增长1.7%，11月份、12月份都不能确定，所以明年要把物价涨幅控制在13%左右，难度相当大。但难度再大，也要想办法控制住啊！历史经验证明，如果连续三年物价增长达到两位数，就很难保证社会稳定。所以，对当前的通货膨胀，既不要大惊小怪，也不能等闲视之；既不要惊慌失措，也不可掉以轻心。

三

为了保持国民经济发展的好势头，确保社会稳定，明年无论如何要使物价涨幅比今年有明显回落，目标是控制在13%左右。做得到也好，做不到也好，要奔这个目标努力，超过13%许多事情就很难办

了。各地区、各部门应该全面地贯彻江泽民同志、李鹏同志在这次会议上所讲的关于抑制通货膨胀的指导思想和工作安排。我再强调几条。

第一条，要下大力气抓好农业。在小组会上，各个省的负责同志都说亲身体会到要抓好农业。回顾几十年经济工作走过的路子，我们所遭受的挫折可以说没有一次不是从农业引发的。这一次农产品的大幅度涨价，再一次向我们敲响了警钟。现在我们对农业的重视程度确实还是不够啊，虽然讲得很多，但做得还是不够。对农业的投入，没有摆在一个重要的地位，好像基础设施建设，就是高速公路、高速铁路、航空港、深水港，就没有农业。沿海地区的粮食过去都是自给的，甚至是调出的，现在都要吃“进口粮”(指从别的省调进的粮食)，东南沿海六省市在1991年，粮食调进量只有91亿斤，1993年就增加到208亿斤，今年300亿斤还不够，许多耕地不种粮食了，耕地都变成开发区、搞城市建设了。复种指数没有了，早籼稻不种了。前两年，卖粮难，“打白条”，乱摊派，农业生产资料价格不断地上涨，使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受到挫伤。农业再这样搞下去的话，供求矛盾会越来越大，很难控制价格上涨。对于这个问题，全党、全国上下必须统一认识，重视农业，加大对农业投资的力度。中央财力有限，但是也要下最大的力量，来增加对农业的投入。现在财政赤字年年大幅度增加，如果不调整一下投资结构，农业投资怎么能上去呢？我觉得是要下这个决心，大家都要统一认识，调整投资结构。有些项目要停下来，先把解决吃饭问题的农业搞上去。中央投资主要是用于大江大河大湖的治理和一些全国性的基础设施建设。关键还在于各个地区，少搞一点景点、度假村、购物中心，真正挤出一些钱搞点农田水利、“菜篮子工程”。不然的话，农业是搞不上去的。耕地一年一年减少，人口一年一年增加，不增加投入，怎么样解决这个供求矛盾？粮价怎么下得来？当前要应急，几个大城市还得大力地推广机械化养鸡、机械化养猪，几百万人口的城市靠老太太养鸡来供应鸡蛋，那根本不行了。京、津、沪的鸡蛋从来没有涨价，它们的吃蛋问题不就是搞了机械化养鸡就解决了吗。这不需要什么太复杂的技术，只要加强管理。养猪也是一样的。现在要靠从四川调猪，尽管肖秧①同志拍了胸脯，我也非常高兴，但到时候猪肉是不是出得来，我还得看一看。下面没有渠道帮

他收猪啊。现在都是养猪户自己养、自己杀、自己卖，肉联厂都停工。哪儿价格高，猪肉就往哪儿流，没有主渠道来给你组织货源啊。

---

① 肖秧，当时任四川省省长。

总之，对农业问题不能够盲目乐观，但也不必悲观。改革开放16年的经验证明，只要领导重视、摆正位置、政策对头、措施得力，农业是能够搞上去的，农业的发展潜力还是很大的。

第二条，抑制通货膨胀要继续控制基建规模和消费基金的过快增长。现在，在建规模很大，不能再乱批新开工项目了。现有的都干不完，搞那么多重复建设、过多的超前的建设，资金也没有，工期拖得很长，超概算非常严重。现在超概算一倍、两倍是常事了。效益很差，钱又还不了。投资结构要进行调整。拿房地产来讲，根据建设部提供的统计材料，1992年房地产开发完成的投资比1991年增长117%，翻一番；1993年比1992年增长124.9%，又翻一番。现在看起来，今年还是翻番。这跟整个经济建设的步伐是不适应的，并不是真正给老百姓解决住房的问题。为了控制这种高档房地产投资的猛烈增长，引导外商的投资，现在提出三条措施，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制定具体的办法后再出台。

第一，严格控制出让土地使用权，严禁低价批租，严格控制用耕地特别是菜地搞房地产。从现在起到明年年底，一律不再批新的高档房地产项目。

第二，各级政府出让土地使用权的收入，要拿出30%到50%来购买国家基础设施建设债券。你盖一栋大楼得要多少煤、电、水、气啊。我没有钱搞这些配套的基础设施。我也不平调你的钱，只是要你买债券，把出让土地使用权的一部分收入拿出来搞基础设施建设，不然的话，这些房子建起来以后，会搞得全部基础设施都紧张。

第三，外商投资因开发房地产项目而进口的设备和材料照章征税，没有优惠。这个并没有修改有关外商投资企业的法律。如果你是为老百姓盖房子，根本就不需要进口设备和材料。你进口设备和材料，是为了搞那个高档的房地产，那就该交点税。这样也许国内的建材工业、其他配套工业还能够发展一下，还不至于像现在这么困难。

关于控制消费基金过快增长的问题，刚开了全国电视电话会议，现在就是要坚决地贯彻执行会议精神。我只想强调一点，马上就到年关了，我极不希望出现去年元旦钞票发光了赶印都来不及的那种情况。希望各地区、各部门的同志，在元旦、春节以前一定不能够乱发奖金、津贴，不能够提前发工资，不能够提前兑现承包款，让元旦跟春节能够平平安安地过去。元旦、春节以后，消费基金仍应按规定控制。

第三条，狠抓流通领域的改革和管理。近一年多来，我们深刻地体会到流通领域对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性，也有了比较感性的认识。这半年多来，我们开了一系列的会议，搞了几个文件，都是关于流通领域的体制改革，我们希望这些决定能够落实。现在看，它们并没有落实或者说基本没有落实。我觉得我们在思想上受到某些不正确理论的影响，认为市场是不能管的，价格是只有放开、没有管理的。这是完全不正确的，没有哪个市场经济国家是这样搞的。美国经济学家萨缪尔森说过，市场既没有心脏也没有大脑，既没有理智也没有良心。他比我们讲得深刻。没有政府的经济干预，只有市场所带来的缺陷是不能得到纠正的。对市场不管还行吗？我想我们已经有教训了。我们一直讲，不放开棉花市场，不放开棉花价格，但有的人一定要放开。放开的结果大家都看到了，搞得一塌糊涂！要不是拿出1000万担库存，又进口了1000万担棉花，纺织工业一大半企业就都停产了。今年的纺织品价格比去年涨了一倍啊。棉花质量也搞得一塌糊涂，虚开等级，掺杂使假。这是棉花市场和价格放开的后果。现在反过头来，只好还是回到我们原来的主张上面去。粮食、棉花这些重要的商品，没有统一经营、统一管理是不行的。加强市场管理，并不是说就要限价，我从来都不赞成限价。限价是因为你没有东西，但你限价，那个东西不就跑了嘛。加强市场管理，是要反暴利、反垄断、反欺诈、反对乱涨价，要审计成本、合理定价，要组织货源进来，这样价格就能够下来了。

四

明年经济体制改革的重点是企业改革。现在确实有不少国有企业由于历史债务和社会负担沉重，面临着相当多的困难。特别是当前企业间相互拖欠债务是造成企业困难的一个重要原因。企业间相互拖欠债

务是怎么引起的？其原因与1991年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同之处。1991年企业相互拖欠的主要原因是基本建设资金不到位，建设单位拖欠了生产企业的资金，形成拖欠连环套，这也是当前企业间相互拖欠的一个原因，但这是排第三位的原因，不是最主要的原因。最主要的原因，是发展速度太高，许多产品销不出去。10月份的工业发展速度是27%，这么高的发展速度，我们哪有这么大的需求呢？社会商品零售额增长率扣除物价增长指数以后，只增加了百分之几，就是说人家买东西只增加了百分之几，你的工业发展速度是百分之二十多，那谁去买你的东西？现在不单是大量进口设备和原材料，还大量进口消费品。今天《参考消息》就报道，现在外烟泛滥于中国市场，大量洋烟、洋酒、化妆品走私进来，连宴会上吃的东西许多也是从香港用飞机运来的。这么高的发展速度，成本又比人家高，产品销不出去，产销率是历史上最低的。把产品放在百货公司仓库里面，大量地占用了生产企业的流动资金。流动资金从银行借不到，那只好就互相拖欠。第二个原因，各种渠道进口的钢材和石油，在这一次企业间相互拖欠里面占了主要的地位。几千万吨进口钢材、1000多万吨进口成品油，这两项就引起企业间相互拖欠2000亿元，占了3000亿元三角债的三分之二。第三个原因，就是上面说的基本建设资金不到位。国家重点建设项目，安排的中央资金到位率达到100%，但是地方自筹的那一部分不到位，特别是地方自己建设的项目，资金更不到位。国家计委对560个地方的项目进行统计，一共拖欠500亿元。国有企业的机制没有转换，企业没有信用，而且认为欠债有理、欠债有利，银行结算制度也不健全。国家计委、国家经贸委、各家银行为帮助企业解决相互拖欠做了大量的工作，仅为了钢铁工业清欠，在东北地区试点就投入34亿元，现在又投入50亿元，但是现在问题仍然很突出。

要解决当前的企业相互拖欠问题，还是1991年就讲的一条方针，叫做限产压库促销。你的产品销不掉，你又不减产，净追求发展速度有什么用啊！如果产品发出去，钱回不来，你就不再发货、不再生产，不就没事了吗？冶金部部长刘淇同志给我一个报告，钢铁工业基本上都有三角债，但是有两家企业没有，一个是宝钢，一个是杭钢(杭州钢铁厂)，为什么？产品紧俏、质量好，你不给我钱，我就不给你发货。现在冶金工业采取这样的办法：第一，叫做减产。现在不是要求减产300万吨钢吗？不要再动摇了，就得减产300万吨，不减产是没办法维

持了。第二，多出口200万吨钢。第三，限制进口。国家计委要采取一些办法，限制进口钢材。那些紧俏钢材，比如有特殊要求的石油钢管要进口一点，其他都不要进口了。石油工业、钢铁工业现在都实行限产压库促销方针，坚持这个方针，我认为少则三个月，多则半年，钢铁工业跟石油工业的债务就可以清掉，问题就可以解决。

我认为，抓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搞好国有大中型企业，应该全面贯彻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决定》的精神。当务之急是明年国有企业改革要突出三个重点：政企分开、加强内部管理、建立社会保障体系。

第一，要政企分开。政企不分，国有企业没有责任制，什么事情都是党委、政府去指挥，那怎么搞得好啊？最后出了问题还不是找你？企业得有一个好的领导班子、一个好的机制、一个好的产品，才搞得好。所以我觉得，这个观念要非常的明确。当然，政企分开、企业自主经营，还要有监督。国务院关于国有企业的监管条例，是经中央政治局常委会通过的、国务院颁发的正式文件，大家要认真贯彻执行。

第二，加强内部管理。现在企业内部管理确实是不严，大有文章可做。这方面下点工夫，国有企业的困难就可以克服。

第三，逐步建立社会保障体系。中央政治局常委对这个问题都非常重视。没有社会保障体系，工人不能辞退，企业不能破产，国有企业永远没有活力。现在这个方案已经有了，我们重点研究四项：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医疗保险、住房制度改革，实际上也是住房保险。这四个方案都出来了，像住房制度改革，国务院已经发过文件了，也开过会了，如上海等很多城市都有成功的经验。养老、失业和医疗保险方案最近也出来了，这些保险制度的一个特点就是根据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决定》精神，具有中国的特色，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相结合。这些方案先在一定的范围里面试点，逐步地用国务院的法规规范一下，取得一定的经验以后再正式形成法律议案报全国人大审议通过，那个时候再全面推广。

当然，现在的情况下，靠社会保障体系解决不了国有企业机制转变的问题，国有企业负担太重。因此，为了转换这个机制，我们搞了一个破产的办法来试点，就是如果这个企业搞不下去了，拍卖它的资产，拍卖所得首先用于安置职工，然后再清理债务，不然的话，没有

哪个企业能够破产，永远是个包袱。这由国家经贸委组织在18个城市进行试点，但是试点一定要经过批准，冲销企业债务绝不能一哄而起，形成一股赖债的风，那不得了！企业兼并，也准备给一点政策。据说四川德阳的经验就是好的企业去兼并差的企业，盈利的去兼并亏损的。为了鼓励盈利的企业去兼并亏损的企业，对亏损企业遗留的债务可以考虑停息，但是要严防为了赖债的假兼并。明年要集中力量重点抓好一百户现代企业制度试点、三户国家控股公司试点、一批国家确定的企业集团和若干城市优化资本结构试点。试点的目的、试点的效果，是扭亏为盈，效益提高。最终要体现在效益提高上，那才真是试点成功啊。

明年的经济工作有不少有利条件，也有一些困难，只要大家统一认识，这些问题是可以解决的。

我特别要讲一下，现在抑制通货膨胀有一个很大的思想障碍，就是谁的物价低谁吃亏。确实是这样的，如果只有一个省或者一个城市的物价低，它一定吃亏。为什么呢？首先，公共汽车票价以及煤、电、水、气的价格不能涨，不能涨价就要政府来补贴，所以财政补贴要增加。另外，物价一低，外地的人都来抢购，物资外流，农民吃亏。但是我想，如果大家都来抓，就像拔河一样，统一号令大家一起使劲抑制物价上涨，就不存在这个问题了，物价问题、通货膨胀问题就一定能够解决。

深化改革，完善税制，强化征管

(1994年12月17日)

1994年12月13日至17日，全国财政工作会议和税务局长会议分别在北京召开，并于12月17日上午召开联合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财政厅(局)长、国家税务局局长及地方税务局局长，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各司局负责同志等。这是朱镕基同志在会上讲话的主要部分。

根据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所确定的工作重点，具体到财税部门如何落实，我想讲几点意见。

第一，深化改革，完善税制，强化征管。这是财税部门贯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的重要问题。现在看起来，我们的税制、分税制还有很多不完善的地方，需要进一步改革，但改革要慎重，要逐步完善。比如大家比较关心的完善分税制问题，那些按老体制上缴比较多的省份提出，现在的分税制是“双轨制”，最好改成“单轨制”。我看最好不要叫这个名词，因为我们并没有说过要实行“双轨制”。老体制的上缴，这是历史上遗留的问题，我们不可能一下子把它取消，并不是我们要搞“双轨制”。由于分税制改革采取了渐进的、平稳的实施策略，中央能够多收的钱，能够用于调剂贫富、缩小地区差别的钱还是很少的，每年只能在增量里面多收一点，而这个增量本身就不是很多，没有五年、八年的时间，中央财力不会有显著的增加。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中央很快就把按老体制上缴的部分都免掉，那中央就揭不开锅啦，开不了饭啦。所以，这个问题还得需要有一段时间逐步地解决。原来我们打算，今年把递增包干的递增上缴部分给减掉。比如，江苏去年上缴80亿元，递增5%，那今年就要缴84亿元，增长的部分今年就把它减掉，不要递增了。今年财政开支这么紧，又欠400多亿元的税，还拿什么钱来减少老体制的上缴？因此，今年是做不到了。但是，我们至少能在明年的预算里面把递增上缴的部分去掉。那就是说，江苏今年上缴多少，明年还上缴多少，递增部分就免了。做到这一点也是很困难的，因为贫困地区、中西部地区要求补助的钱大大增加，我们这边要免，

那边要加，收入又没有增加多少，这是很难的。但总是想这样去做，这已经很不容易了。所以，不可能在今年就取消递增上缴部分。

完善税制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加强稽核工作。现在我们实行了统一的增值税，好处很多，但如果不加强稽核工作，假造和假开增值税发票造成的危害，将是相当严重的。这个问题不是不能解决，关键就是要加强法制，加强稽核工作，特别是加强技术手段的运用。对这个问题，中央非常重视，政法部门、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审计署也都非常重视和支持。大家共同配合，这个问题就不难解决。打击骗税，一是要打击造假发票的，二是要打击真票假开的。这两种手段，一骗就是几百万元、几千万元，甚至上亿元呀！上次召开全国经济审判工作会议，任建新同志请我去讲话，我就讲“请你们帮助我们集中力量打击骗税”。抓住了就要处罚，该判刑的判刑，该枪毙的要枪毙，不这样的话，对国家造成的危害很大。要刹住这股风，绝对不能手软。另一方面，我们还要建设电子计算机联网稽核体系，把四联发票送入电子计算机网，几个城市大家一交叉、一稽核，就能查出是假造还是假开。我们不可能对所有的发票都通过这个稽核网来查，但是我们可以抽查，100张或10张发票里面抽查1张，查出问题就严厉惩处，以警世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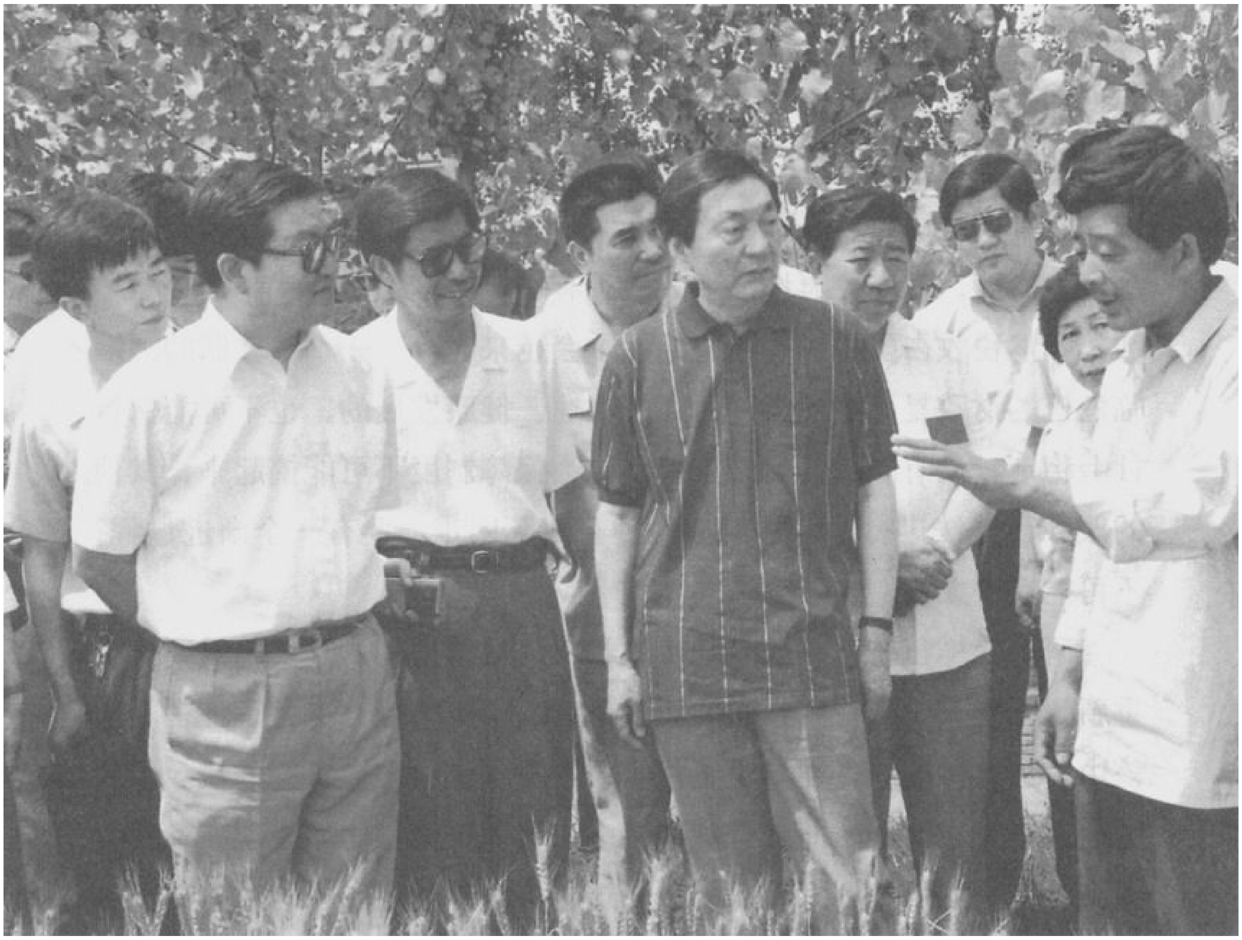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税务机关自己的队伍要干净。骗税的案子与税务机关内部人员关系很大，不敢说所有，但有相当大一部分是我们队伍里面的人和不法分子内外勾结进行偷税骗税。对我们内部人员的问题一经查实，就要严肃惩处，移送司法机关，绝对不能姑息。另外，我与项怀诚①同志讲了，请他拟一个办法，就是如果发生这种重大的案件，不仅要惩办主犯，惩处税务局内部参与作案的工作人员，而且要追究你税务局长的责任。因为问题出在你那里，你负有重大的领导责任。你对下属是怎么教育的？你就没有制度，没有检查，没有两个文明一起抓。所以，出了问题，主要领导也得处分，不然就没办法解决这个问题。

---

① 项怀诚，当时任国家税务总局副局长。

我想，从这几方面来加强工作，是完善税制的重要问题。此外还要特别注意人的因素，要抓人的教育、培养和各项管理制度建设。这个问题请各级财政、税务机关的同志注意，其他当然也有很多问题要完善。比如抵扣库存问题，库存的数量很大，怎么个抵扣？分多少年抵扣？据说现在报上来的库存水分都在50%以上，那怎么得了！这么扣下去，我们的税就收不上来了。这里面有很多问题要研究、要完善，同志们要加强调查研究，既要让企业不增加负担，也不能让国家的资产、国家的税收流失。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大家要很好研究一下。现在，中央财政已经到了非常困难的境地了。分税制改革想马上见效非常难，中央财政收入的比重要达到60%以上，实行转移支付制度，也要相当长的时间。但是，现在财政的开支一年比一年膨胀，压都压不下去，收入增长却相对越来越少。想多收税，多开一个税种，大家都哇哇叫。这次税制改革，原来的指导思想是不加重企业负担。实际执行的结果，根据国家经贸委最近的一次调查，企业负担降低了0.5个百分点，但是不同企业、不同行业之间总是有轻有重，不可能平均的。税负增加的哇哇叫得厉害；得到好处、税负减轻的，说我们好话的人却不是太多。所以，现在要再增加新的税种有一定难度。但我认为还是要增加，不然税收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会越来越小。一个很软弱的、濒临危机的财政是不能支持国民经济快速、健康发展的，也不可能保持社会稳定。没有国家的财力支持，社会保障制度不可能搞起来，其他的改革也无法进行。但是增加税种有实际困难，要有一个渐进过程，不可能搞得太快。



1994年5月22日，朱镕基在河南省尉氏县考察麦棉套种情况。左二为河南省委书记李长春，左四为河南省副省长李成玉，左六为农业部副部长吴亦侠。

研究怎样扭转现在财政危机的状况，很重要的一个问题是要研究重新划分事权。现在两方面的情况都有，中央为地方支付了许多不应该由中央支付的钱，地方也支付了一些不应该由地方负担的钱。但我觉得前者是主要的，而且有些事情中央可以少管。比如，现在各省收入上缴中央的是500多亿元，而通过中央各部返还回去的就有300多亿元，实际上中央只收了200多亿元。我看这种事情可以研究，中央干脆就收200亿元。沿海地区比较富裕，有些事情就不应该再要中央补贴了。补贴了并没有好处。当然，划分事权不是针对沿海地区的，主要是要加强财政收支方面的责任制，中央收的钱，保中央的必要开支，以及调剂一点贫富差别，维护社会稳定。只收这些必需的钱，其他由

地方量入为出，自求平衡。这是改善当前财政状况的一个重要途径。这方面我希望财政部、税务总局和有关部门的同志好好研究一下。

第二，切实加大对农业的投入，真正加强农业这个基础。财政部门要做到加大对农业的投入，就要抑制固定资产投资的过度膨胀，特别是严格控制高档房地产的规模。加强农业是抑制通货膨胀的一个最重要的问题。现在物价上涨里面65%是由于食品涨价，主要是农副产品涨价。如果加上棉花问题导致的纺织品涨价，这个因素还要大。此外，由于统计主要是以国有商业来采样，不能完全反映实际情况，因为集市贸易现在占有很大的销售量，它的物价涨势超过国有商业。如果现在不加强对农业的投入，提高农产品产量，供求关系会越来越紧张，物价涨幅就下不来。农产品供应想靠国际市场是不行的，我们稍微到国际市场上采购一下，国际市场上的价格就提高了。所以，尽管我们的外汇多得很，已经超过了3个月进口和偿还外债的支付需求，但国际市场上农产品价格太高，我们买不起。农产品买回来又要财政补贴才能销出去，财政也受不了。无论化肥还是粮食，靠国际市场都是不行的，只有立足国内。要加大对农业的投入，增强农业和农业生产资料的生产能力，特别是化肥生产。全国的化肥工业，包括化工部、石化总公司和地方的小化肥厂都要开足马力生产，而且要大力进行技术改造。化工部、石化总公司都要把增产化肥作为头等重要的任务，尽管某些石化产品也是供不应求，但要先搞化肥。

我们说农业是基础，加强农业喊了这么多年，特别是最近两年开了这么多次农村工作领导小组会议，但效果并不很大。大家的兴趣还是在对外招商，搞开发区、度假村上。高级别墅越搞越多，卖也卖不掉，现在还在搞，而农业实际上并没有下工夫去抓。财政部给我的一个材料很说明问题，1993年农业投入较大的10个省里面，东部沿海地区占6个，西部地区占两个。但根据1994年1到11月份的统计，东部沿海地区一个也没有了，西部地区倒是占了8个。这种情况必须改变，特别是沿海地区，原来粮食能够自给的、调出的省，现在大量调入粮食。我觉得这不应该，因为它们的土地都是肥沃的高产土地。现在把它们撂荒不种，搞开发区、搞房地产、搞城市建设，良田没有了，复种指数下降了。大量地调入粮食，粮价哪能不涨?

我希望大家很好地考虑这个问题，一定要把支持农业放在财政的重要位置上。当然，不是你们做主，你们是业务部门，是参谋部门，要提出意见。在制定财政预算的时候，首先要保农业。任何一个国家没有不对农业实行补贴的。任何一个政府从纳税人那里把钱收来，都要保证贫苦居民最起码的生活。政府不抽肥补瘦，不从阔人那里收更多的钱，保证低收入者能活得下去，而把负担加给那些贫苦老百姓，这是不应该的，是不利于社会稳定的。

第三，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江泽民同志特别强调要推进国有企业改革。财政危机的缓解要靠搞好国有企业。国有企业改革要走一条正确的道路，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决定》对此讲得很清楚，就是16个字："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但是有一段时期，不少地方把重点都放到了"产权清晰"方面，新名堂搞得很多，花花哨哨，什么内部股份制、什么集资等，然后变相地大发股息、大发奖金，这有什么好处？引进外资也是这样，有的地方为了争取优惠、扬名一方，不惜低效引进、盲目引进。搞起来以 后又缺乏监督，出现了虚列成本、转移利润等多种损害国家利益的情况。江泽民同志端正了这个方向。他在今年党的十四届四中全会上的讲话里明确提出，搞好国有企业关键是三条，要全面贯彻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决定》精神，不能只抓产权清晰。重点在什么地方呢？ 一是政企分开。政府老是干预企业、扶持企业，企业老是依靠政府吃"大锅饭"，政府永远甩不掉包袱。二是加强企业内部管理。没有内部管理，企业怎么能办好？三是完善社会保障制度。这方面，中央正在出台措施。没有社会保障制度，企业就不能裁人、不能破产。那样，国有企业就办不好。

第四，切实加强工资管理，控制消费基金过快增长。考虑到当前通货膨胀的压力和国家财政的状况，对下一步增加工资的措施，国务院总理办公会定了这么几条：一是国家公务员的年终奖，本来1994年的要开始发了，现在已经明确了，推迟一年。二是提高国家公务员基础工资的措施，明年不再出台了。三是国家公务员的政绩考核、晋升职务工资，按照《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规定是应该执行的，但也要严格按照规定的时间，那就是满两年，即在该条例颁布后两年，在明年第四季度才能够实行公务员的晋升、晋级考核规定。总之，节约支出是我们财政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

第五，强化纳税意识，严格依法治税，坚决杜绝欠税行为。目前，欠税已经达到了很严重的程度。今年到现在已经欠了465亿元，而且从我们摸底的情况看，到年终至少还有300多亿元。这个问题不解决，我们就要开不出工资了，机关就要关门了。在国外，欠税就是偷税、抗税，这是要坐牢的。我们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如果企业连税也不交，我们的国家机关怎么运转？我们的军队谁去养？国家谁来保卫？那不是要乱套吗？尽管欠税有一些客观原因，责任不完全在一个单位和一个单位的领导人身上，但是单位领导人负有主要责任。

现在，300多亿元的欠税收不回来，怎么办呢？从财税系统来讲，你们希望银行拿点钱给企业交税，这倒确实是一个方便的办法。但是这个先例一开，不仅会淡化企业的纳税意识，而且还要扩大开支、扩大消费，因为地方政府正等着这笔钱来开支，这些开支里面很难说都是正当的。同时，放贷款交税，银行就会大大突破贷款规模，直接推动物价上涨。我还是要求大家考虑当前这个形势，从大局出发，尽最大可能把欠税收上来。即使不能全部收上来，也要把大部分收上来，欠税300多亿元是不行的。

在今年的欠税当中，中央企业欠税是比较多的，而且欠税最多的都是国家重要的支柱产业，是效益比较好、发奖金比较多的企业，这就更没有道理了。我看了欠税单子，好多都是政绩好得不得了的、顶呱呱的企业。看来要给这些企业施加点压力，不施加压力，税收不上来。请你们到企业去催办一下，如果不交税，他的政绩都得打折扣。

对三角债引起的欠税，财政部提了这么几条建议：第一，没有销路的产品停止生产。凡是收不到货款的不要发货。第二，挪用税款铺摊子、上项目的企业，工程一律停下来。这是违纪行为，要检查、处分。第三，对一方面拖欠税款不交，另一方面又挥霍、浪费国家资财的企业负责人，要追究责任，严重的要追究刑事责任。不能因为有三角债，就把欠税的责任推掉。如果连必不可少的开支也保证不了，财政部可以向银行临时借款来解决；如果地方财政有困难，周转不开，可以向财政部借款，财政部再向银行借款。当然，借款是要还的。总之，在年前银行不会给企业贷款交税。现在有些企业说，即使给它们贷款也不交税，因为欠国家的税款不用付利息，而借银行的钱是要付利息的。所以，欠税要按照法律法规严格执行滞纳金制度。中国如果

不实行这一条，偷税、漏税、欠税的又不坐牢，我看财政制度永远健全不了。

另一方面，各个部门都不得阻挠企业交税。我已经听到反映，某些银行由于存款和奖金挂钩，为了保持存款比例，多发奖金，不允许企业去提钱交税，这绝对不能允许。我历来不主张银行工作人员的奖金跟存款挂钩，也不能跟贷款挂钩，因为一挂钩，银行就会采用很多不正当手段来吸收存款，甚至高利吸储，搞高利贷，不能用这个奖励办法。至于某些银行不让企业提钱交税，一经发现，就要处分这个银行的行长。税务局也有这个问题，今年完成任务就不想多收税了，能够保证去年的返还基数就可以了，因为多收的地方，中央拿大头，地方“吃亏”，这也不允许。总之，要想尽一切办法把欠税收上来。尽管今年只有十几天了，但这十几天很关键，企业大发奖金就在这十几天，压一下有好处。当然，也会带来一些困难，希望我们统一认识，同心协力地去克服当前的困难。至于中央企业，希望有关部门的同志能够抓一抓。十个欠税较多部门的负责同志已经表示要按中央要求做，努力推动清欠工作。希望你们把工作做细，去督促、教育厂长、经理把税交上来，这样今年难关就能渡过去。

加强国家外汇储备和外债的管理

(1994年12月19日)

这是朱镕基同志在听取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外汇储备工作汇报时讲话的要点。

一、对今年外汇储备增加的判断

今年外汇储备增加很多，目前已达到500亿美元，这是经济形势好的主要表现之一，也是今年改革的重要成果。多年来，我们想要增加国家的外汇储备，一直做不到。今年通过外汇管理体制改革，达到了这个目的，这是我们执行中央正确决策的结果，是改革的重大成果，成绩要充分肯定。另一方面，外汇储备增加较多也带来了一些新问题，主要是中央银行外汇占款增加近3000亿元，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物价的上涨和出口商品收购价格的上升。中国人民银行采取了收回再贷款等措施后，今年中央银行的基础货币增加并不多，货币投放大体上也可以控制在1500亿元左右，所以对通货膨胀的影响是有限的。不能把外汇储备增加很多这件好事说成是坏事，不能把这项改革重大成果说成是消极因素。但现在的趋势是外汇储备有增无减，应当在这方面加强管理，尤其是对外资在资本项下结汇的管理，这方面引起外汇储备增加没多大意义，只会增加人民币投放。

引起外汇储备增加的原因有多种，如贸易顺差增加、非贸易收入增加、外资投入增加等。“热钱”进来有多少，还查不清楚，现在看这不是主要因素。但是，贸易顺差引起的外汇储备增加到底有多少，各部门都要注意研究，这个数字要碰一碰，目前的统计方法，对有些问题说不清楚。另外，通过贸易账户结汇的钱有些实际上是外资资本项下的，有多少，现在也说不清楚。

二、对国家外汇储备合理水平的看法

国家外汇储备的合理水平，按三个月的进口支付能力计算，要报两个数据。一个数据是在海关统计的进口1000亿美元中，扣除“三资”企

业的进口300亿美元，还有700亿美元，每个月按70亿美元计算，三个月大体要210亿美元，再加上归还外债的10%要准备100亿美元，合理储备水平为300多亿美元；另一个数据是把“三资”企业的出口也算进去，合计约为400亿美元。现在外汇储备水平比合理储备水平大体多100亿美元。

判断国家外汇储备状况，还要考虑明年的外贸出口创汇能力如何？利用外资还能不能保持今年的势头？目前西方经济复苏，明年的外资流入量可能减少。另外，今年的粮食、化肥进口计划没有完成，少用了一块外汇，明年还得进口。所以不能简单地说国家外汇储备多了，多不多还要看明年的情况。

三、加强外汇储备管理的几条措施

目前外汇储备上升的势头还很强，要加强外汇储备管理，适当限制一下。几条具体措施是：

第一，加强对结售汇制度①的监督管理。对国内的外汇贷款和借用外债一律不准结汇，还要防止一些外商合资企业将资本项下的外汇通过贸易账户结汇的现象。

---

① 结售汇制度，是结汇制和售汇制的统称。结汇制指我国境内机构获得的全部外汇收入必须到银行结算，由银行兑给人民币的制度。售汇制指我国境内机构根据用汇需要，到银行办理手续，由银行售予外汇的制度。结汇制与售汇制同步实行。

我们执行《国际货币基金协定》①第八条款，是实行经常项目下的人民币可兑换，不是保证外资兑换。所以，对贸易项下进口的用汇需求要保证。另外，可适当放松机电设备进口限制。目前人民币汇率上升，机电设备进口比较困难，国家经贸委审批不要太严，可以取消一些非关税的限制，对需要限制进口的产品，通过关税手段来管理。

---

① 《国际货币基金协定》，1944年7月22日由联合国货币金融会议通过，1945年12月27日生效。该协定共31条。根据该协定成立了国际

货币基金组织。中国是该协定缔约国之一。1996年12月，我国宣布接受该协定第八条款，实现人民币经常项目下可兑换。

在非贸易方面，对出国人员是不是可以放宽带出外汇的限额，根据出国批件售汇？这样做，也就是多售汇几亿美元，影响会很好，有利于巩固大家对外汇管理体制改革的信心。

第二，对“三资”企业可以考虑实行国民待遇，与国内企业一样实行结售汇办法，但售汇要按合同管理，不是完全的自由兑换。可以不再提外汇自求平衡的要求。“三资”企业还可以保留现汇账户，但是如果外汇账户上有钱，就不售汇给它。取消现有的外汇调剂市场①，具体办法要报国务院批准，还要做好宣传工作，以免引起不必要的误解。

---

① 外汇调剂市场，指从1980年10月以后，陆续在我国各主要城市设立的外汇调剂中心或外汇交易所。企事业单位可在这一市场利用留成外汇进行调剂。后期，个人和外商投资企业也可进入。1988年3月放开汇率后，调剂市场汇率由买卖双方根据外汇供求状况议定，与官方(挂牌)汇率形成了两种汇率并存的局面。1993年12月25日，国务院发出《关于进一步改革外汇管理体制的通知》，从1994年1月1日起，实现汇率并轨，建立以市场汇率为基础的、单一的、有管理的人民币浮动汇率制度；建立全国统一的外汇交易市场，外汇指定银行为市场的交易主体。但继续保留外汇调剂中心，办理外商投资企业的外汇买卖业务。1998年12月，外汇调剂业务正式停办。

取消外贸企业台账问题要与外经贸部协商，现在看起来问题不大，关键是要让有关部门放心，有个保证，起码操作办法可以简化。

第三，利用外资产业政策的问题，要尽快研究。对批租土地外汇收入的三项措施，由国家计委牵头，尽快提出落实办法，在办法没有出台前，批租土地的外汇收入可以暂缓结汇。

要严格控制外商投资搞高档房地产。中国银行不能再参与房地产投资。现在，中国农业银行也有参与房地产开发的，其他银行也有，如光大银行也在搞，这样不行，这与国家政策不符。银行不能只看效益，不能只关心是否赚钱，要有政策观念。

第四，要加强对外债的管理。明年不要再借国际商业贷款了，不能审批和新签国际商业贷款。需要外汇贷款的项目，可以按照国家计委定的借用国际商业贷款的盘子，用中国银行的外汇贷款解决。对外国政府贷款也要控制，需要外国政府贷款的项目，也可以用中国银行的外汇贷款，利率也可以低一些。现在中国银行把钱存在国外，存款利息也是很低的。使用外国政府贷款购买设备，价格比较高，选择余地小。用我们银行的外汇贷款代替一些外国政府贷款，总起来算账，我们并不吃亏。当然，世界银行等国际金融组织的贷款和长期、优惠的外国政府贷款还要保留、维持，不要去动它们。

要加强对逃避外债管理行为的监督，地方政府不能搞信用评级，乱借外债。

近两年日元升值很厉害，对日元借款问题，国家计委要研究办法解决，能提前还款的，可以提前还款。有些国有企业对外还款确有困难，汇率风险中也有政策问题，可以研究由中央、地方、企业共同承担的办法。

第五，可以提高外汇指定银行外汇头寸限额，这样也可避免中国人民银行干预外汇市场过多的问题，目前人民银行天天直接入市的办法不太好。

第六，加强对短期资金的管理，明确要求停止外汇抵押人民币贷款业务，要打击地下拆借活动。

第七，加强对有价证券的管理，国务院证券委员会要研究办法，解决“三资”企业炒股和境外发行股票筹集资金的使用问题。中国证监会要加强对国债市场的监管。财政部不要管债券市场，股票、债券、期货由一个部门管比较好，出了问题，就找一家。

此外，人民银行明年还要继续收回一部分再贷款，货币发行明年计划按1500亿元安排，但内部控制按1000亿元掌握。

在胡乔木著作出版座谈会上的讲话

(1994年12月23日)

《胡乔木回忆毛泽东》和《胡乔木文集》第三卷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后，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当代中国研究所共同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两书的出版座谈会。这是朱镕基同志在会上的讲话，曾发表于《当代中国史研究》1995年第2期，原标题为《在〈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等书出版座谈会上的讲话》。编入本书时，对个别文字作了订正。

同志们：

在毛主席诞辰101周年前夕，《胡乔木回忆毛泽东》和《胡乔木文集》第三卷出版了。我们在这里召开座谈会是很有意义的。乔木同志是我们党久经考验的革命家、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思想理论战线的卓越领导人。他的治学做人确实是我们学习的楷模。拿我自己的体会来说，从读《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开始，以后每次读乔木同志的文章，包括刚才马洪①同志提到的《按照经济规律办事，加快实现四个现代化》一文，都使我们产生一种革命的激情和想一口气读下去的热切愿望。一个人的文章能够引起人们的激情，能够引起这样的反响，能够起到这样大的作用，并不是很多的。乔木同志革命家的品质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修养、文化修养，对我们来说确实是一个学习的楷模。

---

① 马洪，经济学家。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中共中央东北局副秘书长、国家计划委员会秘书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国务院副秘书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等职。

乔木同志是革命老前辈。我同乔木同志的交往不多，了解不深，但在1978年到1979年这一段时期，我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在马洪同志手下工作，当时也接触到乔木同志，跟他出过差，整

理过材料，多次听过他的报告。我当时的感觉就是乔木同志是我们的长者，他在你的面前总有使你如沐春风的感觉，没有拘束，想讲什么话就能讲出来，同时也确实体会到乔木同志的理论、文化、历史、艺术的修养非常深厚。你跟他说话， 就使你感到，你所知道的东西他都知道，而他知道的东西，你看不到边。这就是我的感觉。他往往不是去批驳和纠正你的想法，而是鼓励你把想法全讲出来，但是他从正面讲出他的想法，使你感到他想得比你更深。在他面前，你会油然产生对他的信任感、亲切感和尊敬感。

另外，我感觉到他的思想作风的一个特点，就是不断地吸收新的事物，研究新的问题，提出新的观点。这一点是特别难能可贵的。我在上海工作的那一段时期，他经常到上海来，每次我都去看他。从他的谈话里面，我受到很多教育、启发和鼓励。当我和他谈到改革开放中出现的一些新事物的时候，我发现乔木同志都很清楚。他在不断地思考这些问题，他很能够接受新事物，比我们的思想还要开放。我想，这个特点就使乔木同志的文章能够经常抓住时代的脉搏，提出大家所共同关心的问题，发表一些使人能够深思、很有启发的观点。同时他又不断地吸收新的知识，他看了很多的书、很多的材料，因此他的文章具有十分雄辩的论据和令人折服的论证。读这种文章是一种高级的享受。我认为乔木同志的道德文章是永远值得我们学习的。这次座谈会上，同志们讲了很多很好的意见，也加深了我对乔木同志的理解。这次座谈会是谷羽①同志生前就要求我来参加的，我不能不来，因此也讲了这么几句话来寄托我对乔木同志的怀念和对谷羽同志的哀思。谢谢大家。

---

① 谷羽，原名李桂英，胡乔木夫人。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中国科学院新技术局局长、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工程领导小组负责人等职。

就全国人大检查《农业法》执行情况的报告给中央领导同志的信

(1994年12月29日)

1994年12月23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执行情况的报告》在讲到农业存在的主要问题时认为：“粮食购销政策‘半年三变’，先是‘保量放价’，两个月后改为‘保量限价’，后来又变成‘保量定价’，有些地方干脆关闭粮食市场。棉花收购价格出台较晚，也是多变。”这是朱镕基同志就此问题写给江泽民、李鹏、乔石、李瑞环、刘华清、胡锦涛同志并国务院领导同志的信。

泽民、李鹏、乔石、瑞环、华清、锦涛同志并国务院领导同志：

这个报告中所反映的粮食购销政策执行中的问题，值得引起我们重视解决，但是有些是不符合事实的。如说政策“半年三变”。迄今在减产的情况下粮食仍已收购近1500亿斤，比去年收得多，相当于全年订购、议购计划1800亿斤的80%；棉花已收购5400万担，比上一棉花年度收得还要多。事实说明，中央粮棉收购体制改革的成绩是不能否认的，比去年那种放开不管导致粮棉价格飞涨、市场混乱的情况要好得多。目前，农村形势是好的，农民种粮的积极性已大大提高，至于农民仍有惜售心理(这是农民从去年收购后期粮价猛涨得来的“经验”)，不必太着急，只要不放松市场管理，粮、棉仍在农民手中，等于分散储备，并无大碍。由于我们已进口相当数量的粮棉，即使一段时期收不上来，市场供应也不会出什么大问题。但如这时放松市场管理，放开订购价(议购价已放开)，那岂不是“一年四变”，市场价格必然猛涨，先卖的农民吃亏，明年怎么办？

以上报告供参酌。

(抄报邦国①、春云①、家宝①同志)

---

① 邦国，即吴邦国。春云，即姜春云。家宝，即温家宝。

朱镕基

12月29日

会见日本大藏大臣武村正义时的谈话

(1995年1月9日)

这是朱镕基同志在北京中南海紫光阁会见日本大藏大臣武村正义时的谈话。

武村正义：我们一行刚到北京就受到你的接见，对此感到非常荣幸。

朱镕基：我去年曾访问日本，很遗憾没能见到你这位有名的政治家。今天非常高兴在北京见到你，作为主管财政、金融工作的同行，我非常愿意结识你，这将增进彼此之间的友谊和理解，对两国的友好合作关系都有好处。我对你访华表示由衷的欢迎。

武村正义：非常感谢副总理阁下在百忙之中接见我们。来华之前，我看了你的简历，知道你是湖南人。我本人在日本滋贺县当过知事。12年前滋贺与湖南结为友好省县关系，对此我感到很亲切。你在这样一个大国主管经济工作，可以说是经济方面的最高负责人了，工作一定很辛苦，我对此很钦佩。中国的经济发展令世人瞩目，日本人民也关注到中国所取得的显著成绩。然而日本几年来处于战后最长的一次经济不景气，去年有了复苏的迹象，今年经济增长速度可望在2.8%左右。

朱镕基：我也介绍一下中国过去一年的经济情况。总的来看，国民经济的发展及改革情况都不错。去年，我们在财政、税务、外资、金融、外汇等领域实行了前所未有的宏观改革措施。这些改革风险大，但各项举措均获得了成功。

首先，我们实行了财政分税制，建立了统一的税制，这一措施涉及地方的利益，弄不好容易出乱子。不过，我们总算过关了，去年的财税情况还相当好，税收收入增长了20%，财政收入增长18%。国民经济的增长速度也超过11%，当然我们也不希望这么高。财政收入的增长超过国民经济的增长速度，实际增长了800多亿元人民币。

我们在金融方面也加强了宏观调控，控制了银根，减少了货币发行量，前年共发行1500亿元，去年发行了1450亿元。我们对外汇体制也进行了改革，建立了按市场确定的统一汇率，汇率保持了相对稳定，人民币币值还稳中有升。去年的外汇储备也有大幅度增加，年初仅为212亿美元，年底增至516亿美元。去年也是外国直接投资增加最多的一年，全年达到330亿美元。尤其是在利用外资方面，外国大公司的高技术投资项目增加很多，使得投资的结构有很大改善。在北京、上海和大连，我们都与日本方面进行了有力的合作，引进了一些高技术合资项目。



1995年1月9日，朱镕基在北京中南海紫光阁会见日本大藏大臣武村正义。

回顾1994年的经济情况，总的来说是正常的，但也存在着问题。如通货膨胀指数仍然很高，去年超过21%，但我认为它并不那么可怕，因为通胀率的60%以上是由于农产品、食品的涨价造成的。过去我们的农业发展落后，如不提高价格，农产品的供应将不能满足市场的需要。因此，涨价的正面影响是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相信今年的农业发展会更好些。对于农产品涨价，城市居民也是承受得了的，因

为工资水平的提高超过了物价的增长。实际上，从去年12月份开始，物价指数逐步在下降，今年肯定会低些。可以说，我们对通胀问题没有等闲视之，但它也并不是那么严重。我本人对物价的估计有点失误，去年在东京时，我曾预测上半年物价水平会高些，下半年会逐渐降低，全年可控制在10%，今年将不超过10%。目前看来，这一时间表得拖一年了，农产品的涨价大大超出了我的预料。当然，我对经济总的形势的估计基本上还是正确的。鉴于这一教训，我不能对物价水平再多说了，只能说今年比去年会低些。对于搞市场经济，贵国可以说经验丰富，值得我们借鉴。还是请你多谈点高见。

武村正义：非常感谢阁下对中国经济现状所作的介绍。可以说中国的改革开放正以扎实的步骤逐步在取得成绩。日本的经济在战后50年中积累了很多经验，也出现过问题，经济发展情况时好时坏。我们也经历了两次通货膨胀，第一次是在二战后，第二次是在石油危机的年代。近些年来物价水平比较稳定，去年物价指数仅增1%，在发达国家中属最低的，有些物价还有所下降，我们称之为“物价破坏”。总之，日本最大的问题是总需求量不足。近两三年来，我们经济政策的重点是振兴需求、促进消费。因此，我们实行了减免税收、发行国债、促进公共投资，在对外贸易上则扩大国外进口。目前的官方利率仅为1.75%，降到了历史最低水平。因此，日本的情况与中国正好相反，贵国可以把它作为反面教材来研究。顺便提一下，随着经济的发展，地区之间出现差异。日本国土虽小，但大小城市、城乡之间也都存在差异，如何缩小差距，最终是一个政治问题。据我所知，中国的沿海与内地、城乡之间存在的差距也是一个相当严重的问题。

朱镕基：是的，沿海与内地、城乡之间的差距有逐步扩大的趋势。特别是近两年来，政策重点是发展国民经济，注重搞工业、城市建设和开发区，对农村及农业发展不够重视。因此，农民种地的比较效益太差，大批农民涌进城市，引起农产品缺乏。这次农产品的涨价可提高农业效益，这一政策有利于将农民稳定在农村。去年农产品的价格比前年涨了一倍，幅度是很大的，也必定对物价总水平带来冲击，但对改善城乡差距也会起一定的作用。

中日两国之间的经济、贸易及技术方面的合作关系在继续向前发展，这种合作关系是良好的。我相信大臣阁下的访华将进一步推动这

种关系的发展。我作为主管经济的负责人，还想提以下几个问题，请阁下关照：

第一，关于中国恢复在关贸总协定的地位，也就是加入新的世界贸易组织问题，由于政治方面的原因，去年没有谈成。中国不会放松按照世界贸易组织的要求进一步改革经济体制，特别是外贸体制，但是我们将坚持原则，不会无条件地屈服于压力。希望日方支持中方的这一立场。实际上，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给中方带来的利益不及带给世界贸易组织其他成员的好处。也就是说，中国的加入不仅对中国有利，它对大家都有利。

第二，日本在世界银行是相当有发言权的，希望日方支持中国在世行的地位。无论如何，中国都是一个低收入的发展中国家，世行对中国的经济地位应予以充分的考虑，对华贷款地位不应改变。

第三，日元贷款对中国的经济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目前第四批贷款前三年的项目及金额已经确定，这种重要作用也将继续下去。但日元的升值给我们的借款企业带来了沉重的负担，一些国有企业，特别是搞日元租赁的企业还款都出现了困难。中国政府正想办法解决还款问题，也希望日本方面给予一些支持和帮助。

我们是初次见面，本不应提这些问题，但因今后还需要合作，交换一下意见也是有必要的，因此我坦率地提出这些问题。

武村正义：副总理先生提到的三个问题中的第一个问题是关贸总协定，它已于年初改为世界贸易组织。去年年底，很遗憾没有达成中国所期待的结果。我们了解贵国，在发展阶段方面，有些国家提出了这样那样的条件。据我所知，今年2月份还将各开一次有关中国问题的小组会议。我相信通过成员国之间的认真讨论，将找出符合中国情况的途径。我们期待着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日方为此愿作出进一步的努力。

关于国际开发协会的软资款问题，我非常了解中国的立场和要求。在第十次增资时，日本为确保亚洲获取足够的资款份额作出了很大的努力，今后也将继续这样做。但坦率地说，有些出资国看到中国的经济显著发展，因此对向中国提供软贷款持消极态度，希望中方了解这一点。

关于日元贷款问题，去年已就第四批资款前三年项目及金额达成一致，今年的贷款额度也将确定。日本输出入银行在中国的能源开发上也提供了大量资金，目前中方提出了将贷款用于其他领域，大藏省也将积极给予考虑，将来输出入银行也可与有关部门具体商量。

最后，我要说一点，村山内阁将尊重日中两国所达成的联合声明，继续发展两国的友好合作关系。我们坚宁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不搞“两个中国”。日中两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均存在着良好的关系，我们真诚地希望中国的改革开放获得成功，也希望日中经济关系，特别是在贸易及投资方面，得到进一步的发展。贵国也应努力改进投资的环境。

朱镕基：感谢阁下对中方立场的理解和支持。至于有些人对向中国提供软贷款持消极态度，他们往往是在不同场合说不同的话。这些人谈到中国软贷款或中国“复关”时，就说中国经济发展快了，算不上发展中国家了；但为了在政治上贬低中国，他们又往往说中国经济虽发展快，但过热，通货膨胀率也高，没有效率，一点成绩也没有。在这方面，他们是缺乏原则的。我们历来是客观、正确地估价自己，中国经济发展虽快，但底子却很薄，因此仍属于发展中国家。我们没有他们说的那么好，也没有那么坏。在这方面，日本是最了解中国的。我很高兴听到你刚才说的话。希望在我们彼此的任职期间，我们将对两国的合作关系起到一些推动作用。

谢谢。

加快金融改革的步伐

(1995年1月14日)

1995年1月12日至15日，中国人民银行在北京召开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出席会议的有人民银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分行负责同志，总行各司局负责同志。这是朱镕基同志在会上讲话的主要部分。

这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是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后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会议的主要任务是贯彻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总结去年金融工作的成绩，部署今年的金融工作。我今天来与同志们见面，感谢大家一年来的辛苦，同时也给大家鼓一鼓劲、打一打气，使我们在新年伊始，用更饱满的热情、更高昂的斗志把今年的任务完成得比去年更好。下面，我就做好今年金融工作讲几点意见：

一、去年经济工作取得的成绩和存在的问题

现在有一种倾向，由于去年物价涨幅比较高，因此对去年的成绩估计不足，对困难看得过大，对前景看得不清，劲头不是很大，这是需要注意的问题。尽管去年物价指数高一些，超过原来的预料，但是无论如何去年经济工作的成绩是主要的，是很不容易的。去年一年我们干了好多过去想干而没有干的事情，原来预料的风险是很大的，但实际结果比预料的要好得多，成果比原来想象的大，问题比预料的小。旁观者清，外国和港澳地区舆论对去年中国改革总的是肯定的，认为中国进行的改革确实不容易，搞到这个程度令人佩服。



1995年1月14日，朱镕基在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讲话。

（一）财税体制改革获得成功。

去年财税体制改革的步伐迈得很大，原来我们担心税收不上来，也担心分税制会影响地方积极性，事实证明这一关我们闯过去了。去年，工商税收增收915亿元，增幅是25.5%，这是在1993年增长1000亿元基础上增收的，是很不容易的，税制改革确实是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去年12月，企业欠税还有468亿元，当时财政部很担心，怕完不成预定的税收任务，因此建议银行在12月份拿出260亿元贷款，贷给企业交税。但是银行考虑：第一，银行不能贷款给企业交税；第二，去年贷款规模原来计划4700亿元，因流动资金非常紧张，又扩大到5200亿元，贷款规模无论如何不能再扩大，因此银行下定决心不垫这个钱。后来财政部召开10个部门的部长会议，督促企业交税，收到了显著效果，12月份交税达680亿元，超过前年12月交税的水平。李鹏同志讲，在这件事情上银行的宏观调控是相当漂亮的。这一经验要很好吸取，

对客观情况要有正确的分析、了解，不可随风倒。去年财政赤字没有扩大，控制在计划以内。现在这一关闯过去了，获得了成功，今年税收和中央财政收入有希望比去年更好。

(二) 外汇管理体制改革取得重大成绩。

去年外汇管理体制改革迈的步子很大。这项改革确实有风险，但是我们闯过去了，成果大大超过预料，汇价稳定，人民币略有升值。从1994年7月开始，汇价稳定在1美元兑8.5元人民币左右，现在是8.4元左右。外汇储备从去年年初的212亿美元上升到年底的516亿美元，增加了300多亿美元，这是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1994年以前，在全世界外汇储备最多的国家排位中，我国排在第八、第九位之后，去年一年改变了局面，提前到第五位。我国外汇储备水平是不是太高了？考虑到我国的实际情况，我认为保持一个500亿美元的水平还是应该的，不能算很高。

当然，外汇储备增多也有不利的一面，主要是去年收购外汇使用了近3000亿元人民币，特别是部分外资兑换人民币扩大了基本建设规模，拉动了社会需求，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物价上涨。去年我们没有这方面经验，对外资进来兑换人民币未加控制，如果稍加控制，去年可能不会发那么多票子。1993年的乱拆借、绕过贷款规模问题，通过中央加强宏观调控、整顿金融秩序，下半年基本上扭转过来了。去年各方面都控制得比较好，乱拆借、乱集资、乱提利率基本上被刹住了。但没有想到外资去年进来了300多亿美元，我们历史上没有这个经验，对如何管理外资缺少办法。今年我们正反两方面的经验都有了，金融工作可以比较老练一点、成熟一点，一定会比过去做得更好。

外汇储备增加肯定是件大好事，有了500多亿美元的外汇储备， 我国的地位就不一样了，国家的信誉提高了，讲话就神气了。过去我们对外汇市场的操作没有经验，现在知道了点门道。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都说中国的外汇管理体制改革非常漂亮。本特森当美国财政部部长时，指责我们干预外汇市场，对外资企业实行歧视。最近，美国财政部改了口，美国国务院也发表谈话说中国的外汇管理体制改革是成功的。当然他们也还有不满意的地方，说我们对外资企业有点限制，对此我们下一步准备对外资实行国民待遇。应该说，外汇管理体制改革取得了很大成功，对稳定国民经济起了重大作用，这点应该

首先肯定。至于说多换出去一些人民币，有一点副作用，但问题不是很大，现在已经挺过来了，该出去的人民币已经出去了。外汇储备增加了，我们就要管理好，别随便把它花掉。

金融体制改革，去年也很成功，而且积累了很好的经验。三个政策性银行都已经组建起来了，运转正常，其中国家开发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正在逐步完善，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正在组建省级机构。中央银行在转换职能加强监管、各专业银行在向商业银行转化方面，都取得了很多成绩。

(三) 对去年物价上涨的分析。

现在的问题是物价涨幅高了一点，但也不是十分高。这不能看成是去年的问题，而是前年或更早一年遗留下来的问题。从1992年到1993年，基本建设的摊子确实铺得太大，几万亿元的在建项目铺下去。有些地方把农田推掉了，大搞开发区、房地产、城市建设，耕地撂荒了，这个“后遗症”正好落在1994年。再加上去年外资涌入的原因，基本建设规模还是不小。光从统计数字上看，比1993年是有所下降，但是外资进入那一块并没有统计在里面，那一块相当大，实际上去年的基本建设规模并没有减下来，这不能不导致物价的过快上涨。所以说去年物价增幅高(21.7%)，是1992年、1993年“后遗症”在1994年的体现。基本建设规模增长过快、消费基金膨胀，这是根本原因。农产品减少、农业受到损失，是另外一个重要原因。去年农业减产，既有天灾，也有耕地撂荒的因素。到去年11月底，粮食库存少了300亿斤，调控能力减弱；再加上居民生活水平提高，肉、蛋消费增加，消费需求的拉动，导致农产品供求关系紧张，因此粮食涨价，而且涨得很猛，集贸市场的粮食价格大概比去年涨了一倍，粮价上涨带动了很多物价的上涨。纺织品价格涨得也很多，主要原因是棉花涨价。

应该看到，涨价也有正负两面的影响，负面影响是城市老百姓承受不了，正面影响是粮价提高，农民收入增加，种粮积极性提高了。农民本应该从粮食提价中得到好处，提高种田积极性，但现在有些地方化肥涨价打击了农民的积极性。今年支持农业主要是要控制化肥价格，即使用补贴的办法也要把它的价格降下来，不然农民的这一点积极性又给打掉了。现在集贸市场的粮食价格已经高于国际市场粮食的到岸价，再提高粮价的余地已经没有了，要支援农业就要降低化肥价

格。通过这个方式，把农民种田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使农民盲目流入城市的势头有所减缓。现在各地党委、政府开始重视抓农业，鼓励农民发展多种经营，适当发展乡镇企业，可以把农民稳在农村，这是一件大好的事情。

粮食紧张状况也与各地盲目出口粮食、不进口粮食有很大关系。1992年以前，我国每年粮食进口大于出口，其中，历史上一年进口粮食最多的是1600万吨(1989年)，当年出口只有400多万吨。去年粮食出口1050万吨，进口700万吨，出大于进。这个趋势要扭转。现在中央采取措施暂时停止粮食出口，适当进口，粮食紧张状况会逐步得到缓解。

从客观上看，物价上涨过高是因为农业供求关系发生了问题，也是1992年到1993年的“后遗症”。现在，党中央、国务院采取措施，情况已逐步好转。农业已经出现往上的势头，我完全相信今年的农业形势肯定会比去年好，今年物价涨幅肯定会显著下降，但是要降到10%还是有困难的，因为“后遗症”还没有完全消除。中央定的物价涨幅13%的目标要力争达到，明年会进一步好转，把通货膨胀率控制在10%以下。

(四) 认真对待流通领域和期货、证券市场中存在的问题。

去年流通领域相当混乱，收购、运输、储存各个环节都有很大问题。我们还没有掌握市场经济的规律，有些人认为市场经济就是放手不管，因此出现棉花里面掺砖瓦沙石、猪肉灌水，不少地方出现假冒伪劣产品，价格随便往牌子上写，什么人都可以跑到农村抢购粮食、棉花等怪现象。另外，去年期货也搞得相当厉害，什么期货都出现了，按这个趋势搞下去，大白菜也要搞期货了。去年做国际期货主要是有色金属，但搞外汇期货的也有好几家公司，其实它们根本没弄懂什么叫期货，被外国人、经纪商误导，一赔就是几个亿。现在打官司，外国人说中国的公司不讲信用，赔了不给钱。在证券市场方面，1993年是炒股票，1994年已经变成炒国库券，去年上海证券市场国库券最高一天的成交量达625亿元，而同一天股票的交易量只有100多亿元。今年伊始，上海国库券最高一天的成交量达1100多亿元，现在全国流通中的国库券总共不过400亿元，这中间不知道倒手多少次。不是不能搞期货市场，而是没有到时候。期货市场是风险性最大的市场，

现在拿国家的财产去冒险，在我们整个企业经营机制没有转变前，这是在挖中央财政，赔了是国家的钱，不是个人的钱。

总之，总结去年的工作，我们既要充分肯定成绩，也要认真对待存在的问题。通货膨胀没有什么了不起，无非是基本建设规模大，消

费基金扩张快，只要切实采取措施，就能把通货膨胀率降下来。基建 规模过大的问题一定要解决，项目未经批准不能上马，利用外资要讲 究投向，不然基础设施建设越搞越紧张，物价越涨越高，这一条要控 制住；第二条，粮食涨价好处也很大，增加供给，情况会逐步好转;第三条，流通领域要整顿，投机倒把要打击。这样会有新的气象，通货膨胀会有所缓解。对银行的工作，大家要有正确的认识，别看我批评大家多，这叫“恨铁不成钢”，因为我兼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对 自己的部下不严格要求不行。现在看，财政对国民经济的杠杆作用越 来越小，财政还要继续改革，使它更好发挥应有的作用。金融的杠杆 作用越来越大，搞得好对国民经济影响很好，搞得不好影响很坏。我 们处于这种地位，不严格要求是不行的，严格要求不等于否定成绩。 去年银行的成绩是很大的，工作干得比较漂亮。我们的缺点不比其他行业大，但我们不能姑息，当然我们接触钱多，特别是财政、税务、 海关等部门接触钱多，发案率就高一点，这也是客观情况。今年是巩固、完善很重要的一年，我们的工作热情要更高一点，斗志要更昂扬一点，把工作做得更好一点。



1995年12月19日，朱镕基考察上海证券交易所。左五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黄菊，右一为上海市市长徐匡迪，右二为上海市委副秘书长宋仪侨，右三为上海市政府副秘书长韩正。

二、认真做好今年的金融工作

(一) 加快金融体制改革步伐。

香港报纸讲，去年中国在金融改革方面没有什么动作，成绩不大；财税改革动作大，成绩大。这种说法不确切，去年整个金融体制改革还是有很大的推进，特别是外汇管理体制改革。香港报纸还说，现在中国的宏观经济环境比较困难，因此金融体制改革会放慢步子。这种说法也不对。环境越困难越要改革，要统一这种认识，树立改革的观念。今年要加快金融体制改革，不改革就不能克服困难。企业经营机制现在还没有完全转变，专业银行按商业银行操作确实有困难，但这两种改革是相辅相成的，专业银行向商业银行转换也可以促进企业改革，不能等企业经营机制转变后金融体制才改革。今年，金融战线要高举改革的大旗，加快改革步伐。

去年，中国人民银行发挥监管的作用，在把人民银行办成真正的中央银行方面，有了很大的进步，职能的转变就是很大的改革。人民银行的同志铁面无私，认真监管，面对很大阻力，敢于坚持原则，不怕得罪人，很不容易，应该表扬。请舆论界帮点忙，把这样的经验、事迹好好宣传一下，弘扬正气。人民银行各省分行行长写的报告，我批了30多件，其他的我也都看了。这些报告反映出银行行长的水平在不断提高，许多报告很有见解，有自己的观点。同时，希望写给我的报告简短一些，开门见山，说明观点，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人民银行总行要加强监管力量，加大交叉稽核的力度，把工作做好。机构暂时不要变动，过去曾考虑按地区设分行，这样动作太大，要研究得成熟一点。现在要把人民银行省分行的力量充分调动起来，加强监管职能，把金融杠杆控制在国家手里。

办商业银行，搞资产负债比例管理，确实有客观困难，因为企业经营机制没有完全转变。但应该说，去年一年四个国家银行的工作还是有很大改进的，做了大量工作。人民银行收回四个国家银行的再贷款后，基本上没有增加新的再贷款。去年发了1424亿元票子，低于前年1500多亿元的水平。在外汇占款大量增加的情况下，应该讲控制得不错。货币投放1424亿元，主要是农副产品收购贷款和外汇占款增加较多造成的。四个国家银行有的还有亏损，但也是有原因的，在改善经营管理、提高贷款质量、向商业银行转变方面正在逐步向前走。希望今年改革的步伐更大些。四个国家银行要办成商业银行，必须把账分开，在贷款规模还要有控制的情况下，也要实行资产负债比例管理，逐步向商业银行过渡。现在企业不怕负债，要取消银行的贷款规模控制还有一定困难。如果没有贷款规模控制，地方政府干预银行工作的力量就大得很，银行要抵制很难。流动资金与固定资金很难分开，只控制固定资产贷款也不行。要在贷款规模控制下实行资产负债比例管理，贯彻多存多贷原则。各国家银行总行要加强资金调度。交通银行可以按商业银行的规矩来办，可以考虑实行资产负债比例管理，对全局影响不大。中央银行不给交通银行再贷款，由交通银行自己组织存款、发放贷款，这对四大国家银行的工作也是促进。另外是照章交税，交存款准备金。实行资产负债比例管理，交通银行可以试点，出了问题再完善。

加快城市合作银行的组建工作。现在地方的金融秩序太乱，城市信用社乱得不得了，整顿起来非常困难。请各地党政领导支持整顿工作，要在整顿的基础上把城市信用社办成一个规范的商业银行，做到第一交存款准备金，第二交税，第三实行统一的利率政策，不能高利放贷。要有一定的制度和报表，这样人民银行监管起来也方便一些。在整顿城市信用社和其他非银行金融机构的基础上，组建城市合作银行，对这项改革要坚定不移。要按商业银行的规矩办事，搞股份制，还可以把人民银行的干部分流一部分，从其他金融机构挑选一些好的干部过来参加组建工作。今年的目标是，35个大中城市在整顿完毕的基础上成立城市合作银行，明年再铺开，要搞扎实，不能一哄而起。今年的最高目标是35个大中城市，最低目标是京、津、沪先搞起来。要先立法规。国务院马上要批准城市合作银行组建办法，这还不是正式法律。根据这个办法去组建，督促检查，然后报批。等法规完善起来，经验总结之后，不会再出大的毛病了，再推广到其他城市。

农村合作银行暂时晚一点搞，因为农村金融秩序已经够乱的了，农村合作基金会搞得乱七八糟，弄不好会发生信用危机。要在整顿农村金融秩序的基础上，等条件成熟后，再组建农村合作银行。

办城市合作银行、把交通银行变成商业银行，对四大国家银行转变为商业银行会起推动作用，同时也为中央银行加强监管提出新的任务，要求监管工作前进一步。

(二) 彻底实行金融分业经营和管理。

1993年开始讲银行与自办经济实体要脱钩，也制定了办法，要求人、财、物分开，已经取得一些成绩，但是没有根本解决问题。要脱钩就要彻底脱钩，这关系到党风和社会风气问题，也关系到廉政和反腐败问题。党内出现腐败现象、社会上贫富差距悬殊，一个很大的根源就是官商结合，如果所有官员都变成商人，还有什么廉政可言？这一点在外国也不允许，政府官员一定不能参与经商，否则就要下台。银行办了一些经济实体，属于银行管，银行的资金通过各种渠道源源不断地向自办的经济实体“输血”，把金融市场搞乱了。“官商”问题不解决，腐败问题是解决不了的。首先要从银行做起，绝对不能拿国家资金去做买卖。官商分离关系到廉政建设，关系到我们党的生死存亡，关系到政权巩固。银行把这件事情做好了，在政治上意义很大。如果

银行做得好，下一步就是财政部门，也要真正做到官商脱钩。要把非银行金融机构交给地方，办成自负盈亏的经济实体，干部的管理、任免权交给地方党委组织部，业务还是由人民银行监管。资本金要逐步收回，能收则收，不能收就作为贷款由经济实体分期偿还，还本付息。这项工作要搞试点，先从建设银行开始。这个任务交给王岐山①同志，搞出一套办法来，今年上半年要把35个大中城市建设银行的所有经济实体全部脱钩，交给地方。下半年，工商银行要把35个大中城市的所有非银行金融机构全部交出去。明年总结经验后，在全国银行系统实行。大家在讨论中建议，这些自办的经济实体可以交出去一批，也可以撤销一批，能撤的都撤掉，没有多大用处的、投机性很大的，干脆撤销。这个意见可以考虑。人员由各级银行收回来，彻底清理，反正银行不能做生意，不能拿国家的资金去支持非银行金融机构。为了中华民族的前途，为了社会主义的命运，大家还是要从全局出发，下定决心进行这个改革。

① 王岐山，当时任中国人民建设银行行长。

另外，银行工作人员的工资还是要提高一点，不要降低生活水平；要走正道，给一点岗位津贴，实行行员制的要高一点，使大家的生活水平不要受影响。各个银行党组回去后要开会专门讨论这个问题，拿出一套办法。中央银行也要带头，所办的公司也要脱钩。还有，各银行的房地产部、国际业务部、信用卡部一个个都变成商人了，这不行，不能变成经济实体。房地产搞得这么厉害，银行是有责任的。首先要点中国银行的名，现在有许多国内的房地产项目到香港登报做广告，说中国银行提供按揭。房地产搞得太多，逃脱了基本建设规模的控制，名为利用外资，实际上增加我们基础设施的紧张，搞基础设施配套要花很多钱。北京到处建别墅、购物中心，增加基础设施的紧张，推动高消费，根本卖不掉，把钱压死了。因此，银行不能再参与高级房地产项目开发了。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确定了三条政策性措施：第一，不批新的项目了，今年一年不再批任何高级房地产项目；第二，卖地的钱要拿出30%到50%搞基础设施建设；第三，所有房地产项目进口设备、原材料，一律照章纳税。

(三) 缓解企业资金紧张问题。

银行从1993年下半年实行宏观调控以来，应该说银根并没有很大的紧缩。去年储蓄存款增加了6000多亿元，企业存款大量增加，资金从宏观讲并不紧张，但结构不平衡，一部分紧，另一部分还很松。炒国库券一天的交易量就达1100多亿元，股票、期货、房地产搞得这么厉害，说明企业的游资多得不得了，游资充斥市场兴风作浪。确实有部分企业资金很紧，形成3000多亿元的三角债，这里面有种种原因：有产销不对路的问题，工业增长速度高，但产品销不出去。特别是乡镇企业的好多产品假冒伪劣，不适应市场的需要。也有盲目进口的问题，大量进口钢材、石油，造成生产资料积压，压死了资金。要坚持限产压库促销的方针，没有市场不生产，不见钱不发货。前两年项目开得太多了，今年的流动资金贷款规模安排得太少，肯定差几百亿元。如果坚持限产压库促销，流动资金紧张的状况会有所好转，关键是执行不执行这个方针。专业银行要很好地研究资金的调度、贷款的质量、贷款是否贷到点子上，要分轻重缓急，心不要太软。

最近，由于企业相互拖欠，最困难的是煤炭企业，工资发不出去，国有煤矿不能全负荷生产。钢铁行业拖欠煤炭行业，煤炭行业实行不见钱不发货的方针是正确的。银行还是要看准当前薄弱环节，把钱投到恰当位置。一方面，叫钢铁工业、石油工业限产压库，增加出口，限制进口；另一方面，还是要给钢铁工业、发电厂发一点贷款，让它们把钱还给煤矿，缓解困难。请国家经贸委牵头，和银行一起研究向钢铁、电力以及原材料工业投一点流动资金贷款，把债务链解开。总之，要很好地研究，把有限的贷款规模很好地进行调度，解开债务链条，促进经济发展。提高贷款质量要建立制度，贷款不能一人说了算，要有贷款审查委员会，实行集体负责。地方政府无权直接干预银行贷款，贷不贷款，银行有最终决定权。

(四) 认真研究中国农业发展银行的机构设置。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在今年把省一级机构成立起来就可以了，下一步要不要往地、市设机构还看不准，要调查研究，先不要动；要稳定队伍，首先是中国农业银行的队伍要稳定。农业发展银行最基层的工作还是要委托农业银行做，农业发展银行不可能成为一个完全独立的、全面的、统一的系统。农业发展银行今年的首要任务是把该收回的钱收回来，解决农副产品收购资金中的35%被挪用资金问题。农业发展

银行从各方面要提出政策性意见，由国务院来决策，这个任务也是很重的，希望今年不要再出现多拿200多亿元贷款的问题。这件事应该通报一下，让各方面了解情况，引起重视。

(五) 抓好“三防一保”工作。

还要强调“三防一保”工作。案子去年发生得越来越多，当然，从另一方面看，是加强管理的结果，表明制度更严密、警惕性更高了，特别是领导干部的警惕性和责任心提高了，这是好事。去年出的案子都被及时发现，及时采取了补救措施。现在个人作案多，年轻人作案也很多，这样搞下去不得了。整顿金融队伍，提高职工素质，要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前途教育、爱国主义教育，严密各项规章制度。堵住漏洞，我们可以挽救一批青年。行长本身应是清正廉明、大公无私，“己不正焉能正人”？对大案要案要毫不留情，一定要查出来法办。银行的队伍不整顿、制度不严明，作案会越来越多，队伍就带坏了。银行行长负有带好这支队伍、提高职工素质的责任。希望把这件事好好抓一抓，绝不可以放松。

(六) 管理好国家外汇储备。

现在国家外汇储备达517亿美元，怎样运用是一个大问题。要妥善运用，加强管理，组织专人专题研究这517亿美元怎么管理、怎么运营、怎么保值增值，搞出个方案报国务院批准。

(七) 妥善处理好企业对银行的债务。

现在企业赖债的问题比较严重，对这个问题，中央的政策非常明确，企业对银行的债务是不能随便冲销的。企业的困难大多是历史原因造成的，赖债问题要逐步解决，绝对不能形成一股风。为减轻企业的历史负担而冲掉对银行的债务，这是不允许的。银行要坚持原则，没有经过总行批准，随便冲销债务的一概不认账。按照有关规定，去年70亿元呆账准备金基本没有用的，银行今年结转使用，今年能够冲掉呆账100亿元以上。具体办法由国家经贸委与银行共同商量，根据试点进度、审批程序来解决问题。这个钱主要是用于支持企业破产机制的实行，冲销债务可以，但企业必须破产，今后不再把包袱交给银行，还要控制在一定的规模之内。请国家经贸委牵头，会同几个专业银行来解决这个问题。各地银行要按照党中央、国务院文件办事，盈

利好的企业可以去兼并亏损企业，不能把债务冲掉了。为了鼓励兼并，可以对原来亏损的债务采取停息或部分停息的办法，但是也要按中央政策办，要经过批准。企业破产可以全冲掉债务，用拍卖资产的钱安置职工，但要经过银行总行批准，不是地方政府和各地银行能作决定的。

(八) 对违反“约法三章”①责任人员的处分问题。

---

① “约法三章”，指朱镕基同志在1993年7月7日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提出的“约法三章”，见《金融工作“约法三章”》(本书第一卷)。

去年为了贯彻“约法三章”，查了一年，查出违规比较严重的有12个行长。这里面有支行行长、分行行长，也有信托投资公司总经理。按道理讲，应该把这些人都撤职，否则何以号令天下？但也考虑到他们绝大部分是在地方政府要求下做的，要顶住有一定困难。可是如果不处分也不行，不处分他们，我们银行这个队伍就不能整顿好。由于有客观原因，所以分别采取免职、记过、调开的办法。对这件事的处理，我们很慎重，反复考虑，最后才定下来，被处分的同志要正确对待这件事。我们是“挥泪斩马谡”，人事部门要考虑不要因这件事影响对人的使用，还是要量才使用，请大家正确理解。我们还可能在报上发表此事，不如此不足以教育银行队伍。我们的队伍有上万个行长，才处分了 12个人，说明银行队伍还是一支过得硬的队伍。

关于当前的货币政策

(1995年2月12日)

这是朱镕基同志写给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周正庆、戴相龙并中国人民银行党组同志的信。

正庆、相龙同志并人行党组同志:

提高贷款质量是一项重要工作，相龙同志抓这项工作的计划，我也是赞成的。但是，面对当前基础货币过量投放、货币供应量过快增长的严峻形势，必须认真考虑以下四个问题:

第一，要加强外汇结算的管理。现在是“双放松”，外汇换人民币很松，什么外资、外债、热钱倒腾都可以随便换；而人民币换外汇更松，广东中山一些个体公司就可一次以97亿元人民币换取外汇骗取出口退税。今年一个月外汇占款又出去340亿元的基础货币，今年怎么办?

第二，要抓紧更多收回再贷款。现在金融机构融资手段层出不穷，游资充斥，冲击金融市场，企业贷款十分困难，高利难求。必须考虑在上半年内坚决收回500亿元以上的再贷款。同时抓紧银行办的公司“真脱钩”。

第三，要认真研究提高贷款利率，包括相当大幅度提高流动资金利率，以抑制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可从银行利差中提出一部分补贴特别困难而不能破产的行业和企业。

第四，要研究运用公开市场操作(包括国库券转换)收回基础货币，抵消外汇占款的影响。

以上四项措施难度都很大，而且需要高度统一思想认识和足够的舆论准备。请你们认真思考、调查、研究，先到我处一谈，然后我还要找一些负责同志商谈，并充分听取经济学家的意见。

(复印抄各专业银行行长)

朱镕基

2.12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

正庆、相龙同志并人行党组同志：（抄交行、各专业银行行长）

提高贷款质量是一项重要工作，相龙同志抓这项工作的计划，我也是赞成的。但是，面对当前基础货币过量投放、货币供应量过快增长的严峻形势，必须认真考虑以下四个问题：

第一，要加强外汇结汇的管理。现在是"双敞开"，外汇换人民币很快，什么外资、外债、热钱倒腾都可以随便换；而人民币换外汇更松。广东中山一些个体公司就可一次以97亿元人民币换取外汇骗取出口退税。今年一月外汇占款又出去了340亿元的基础货币，今年怎么办？

第二，要抓紧更多收回再贷款。现在金融机构融资手段层出不穷，游资充斥，冲击金融市场，企业贷款十分困难，高利难抑。必须考虑在上半年内坚决收回500亿元以上的再贷款。同时抓紧银行办的公司"真脱钩"。

第三，要认真研究提高贷款利率，包括相当大幅度提高流动资金利率，以抑制通货膨胀。可从银行利差中拿出一部分补贴特别困难而不能经清查核实破产的行业和企业。

第四，要研究运用公开市场操作（包括国库券转换）收回基础货币，抵消外汇占款的影响。

以上四项措施难度都很大，而且需要高度统一思想认识和足够的舆论准备。请你们认真思考、调查研究，先到我处一谈，过后我还要找一些专家商谈，并充分听取经济学家的意见。

朱镕基 2.12.

坚持和完善农村购销政策

(1995年2月27日)

1995年2月24日至28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在北京召开全国农村工作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党委、政府主管农业和农村工作的副书记、副省长、副主席、副市长，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委负责同志。这是朱镕基同志在会上讲话的主要部分。

一、关于粮食问题

要充分肯定去年粮棉购销体制改革的成绩。到今年1月底，粮食收购了1622亿斤，议购任务完成了93%，定购任务也接近90%，进度超过了前年。大灾之年能取得这样的成绩，很不错了，大家下了很大工夫。棉花收购了5804万担，比去年同期多收1200万担，比上个棉花年度多收700多万担。考虑到去年棉花的播种面积有虚报成分，能够收购到这么多棉花是很不容易的。特别是棉花的质量比1993年好多了，掺杂使假问题基本上解决了，但是虚高等级的问题还是存在的。收了这么多粮食、这么多棉花，把市场稳住了，把大局稳定了，这是明摆着的事实。去年粮食遭灾减产，粮食消费水平又提得那么高，粮食出口超过了进口，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还能够把粮食市场稳定到这个程度，是很不容易的。因此，对去年粮棉购销体制改革的成绩要充分肯定。



1995年3月22日，朱镕基在天津市武清县南蔡村乡向农民了解生产、生活情况。前排左二为天津市委书记高德占，右二为天津市市长张立昌。

我们的市场和价格改革一直是在一步一步地深化，没有走回头路。现在放开的程度，远远超过了改革开放以来的任何时期。1993年11月，全国粮食价格放开，粮价暴涨。棉花价格一直讲不能放开，然而也是统统放开，搞得砖瓦沙石都进了棉花包。那个“放开”不是党中央、国务院的政策。当时在没有准备的情况下，突然一下子全国“放开”粮食价格，其后果就是粮价猛涨，一天一个价，什么私商、公商都进入农村收购粮食，国有粮食系统也跟着一起到农村抬价抢购，搞得乱七八糟。那时的情况是人心惶惶，所以中央才连续召开几次会议稳定粮价，国家紧急调运专储粮，国有粮店挂牌降价，制止粮价猛涨。我们从来没有反对放开粮食价格，但是，放是放活，放而有序，放而有管，不是撒手不管。那种自发地放开粮食价格，只放不管，不是中央

的政策，也不是地方政府所赞成的。对这个问题，应该进一步统一认识，要理直气壮地肯定今天的成绩，我们的现行政策没有错。

有的同志提出定购粮的价格低了。我们要回顾一下历史，粮食购销体制改革有一个很重要的精神，也可以说是它的灵魂，就是粮食的定价要符合价值规律。这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精髓，就是发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我们在定购粮的定价问题上是煞费苦心的。定购粮的定价原则有三条：一是要有利于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二是要有利于缩小工农业产品的价格剪刀差，三是要让城市人民能够承受得了。我们就是按照这三条原则来定价的，当时完全可以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在定价以前，我亲自下去做了调查，在河南、湖北问了当地农民，他们都对当时的定购粮价格表示很满意了。同时，我在去年5月27日的全国粮食价格改革工作会议上说，化肥价格无论如何要控制住。但是，后来没有完全控制住。化肥价格在稳住一段时间后，又继续上涨。说句公道话，去年召开全国化肥工作会议还是起了作用的，各个地方还是做了大量工作的，不然的话，化肥价格会涨得更厉害。去年化肥价格上涨，其中有一个很大的原因，是由于部门之间扯皮，把化肥的进口耽误了三四个月，所以化肥供应缺口很大。这一点我们确实是没有做好，不像粮棉购销体制改革那么成功。但是，农民从另外一方面得到补偿了，就是对议购粮食价格我们没有限制，随行就市，农民从这里得到了补偿。

另外，据说有个别地区关闭了粮食市场，有的搞地区封锁，把粮食的正常流通搞死了。发生这种情况，也是由于担心粮食销区跑到主产区把粮食抢走，自己没粮食吃。他们是出于这种心理状态，但这也不是中央的政策。去年的国务院32号文件①里专门有一段文字讲加强粮油市场体系的建设："总的原则是积极发展粮油初级市场，巩固发展批发市场，逐步建立健全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粮油市场体系。要以农村乡镇集散地为中心，以粮站、粮库为依托，发展农村粮油初级市场，允许农民之间、农民与城镇居民之间在市场上进行粮食零星交易。"这就是说，我们允许农民到集贸市场出售他们的余粮，直接卖给城市老百姓都是可以的，没有卡死。这个文件还规定："在粮食主产区建立和完善省、市(地区)、县的区域性粮食批发市场。在铁路中转站、水运码头等粮食集散地，发展一批现货批发市场，以方便粮食由主产

区向销区流动。”我们曾经对这段文字推敲了好久，总结了很多经验。国务院32号文件只有一条限制措施，就是粮食销区出省采购粮食，必须进入粮食主产区县以上粮食批发市场，不允许到主产区农村家家户户去抬价抢购。这种限制是正确的，收到了很好的效果。怎么能让沿海地区跑到粮食主产区农村去抬价抢购，甚至去买青苗呢？要买粮就到主产区县以上的粮食批发市场去，那里有公正的价格，有工商部门进行管理，还有铁路部门配合运输。这一点是不能动摇的，不能允许那些炒股票、炒房地产的人到农村去抢购粮食，只能允许那些经过核准的粮食批发企业进入主产区县以上粮食批发市场。我认为，中央对于农村粮食市场怎么搞活、怎么管理，是有非常符合实际情况的正确政策的。个别地区关闭粮食市场，搞地区封锁，以为保护了自己的利益，其实是很不明智的做法，要坚决予以纠正。今后要以省为单位，粮食实行地区平衡。这并不是一个新的提法，国务院文件对这个问题已有明确的阐述。要求地区平衡，会不会发生产区粮食产量萎缩，销区买不到粮呢？不会的。现在省际粮食调剂，不只是靠中央的调拨，市场活动也很多。因此，不会发生产区不种粮、销区买不到粮的问题。政府用行政命令调这个、调那个，解决不了问题，要依靠市场的力量。看来，粮食价格有所波动，也不要大惊小怪，这是市场调节过程中难以避免的现象。现在要强调落实地区粮食平衡，落实中央的粮食购销政策，不封锁，不抢购，就不会发生产区的粮食销不出去、销区买不进来粮食的问题。

---

① 国务院32号文件，指1994年5月9日《国务院关于深化粮食购销体制改革的通知》。

大家希望定购粮的价格能够再提高一些，以减少收购的困难，因为定购粮和议价粮的差价大大超过去年上半年了。对这个问题，党中央、国务院经过反复讨论，觉得大家的意见有道理，但是对定购粮不宜提价。抑制通货膨胀是今年的首要任务。今年的定购粮如果提价，连锁反应的影响太大了。所以，今年无论如何定购粮价格要坚持不动，无非是让农民从议购粮方面得到适当补偿。同时，要严格控制农业生产资料的价格。如果要真心诚意地保护农民的利益，就得把化肥的价格稳住和降低，这要作为我们工作的一个重点。

有些同志讲，要允许各个地区对定购粮实行价外加价。这个提法不对。粮食定购一定要全国统一定价，不然会引起粮食的投机、跨地区的大规模抢购。但是，去年我们有一个政策：允许地方搞价外补贴，不进入粮食销价。这就不会引起混乱。就是说，广东省、江苏省等地方种粮的成本大大提高了，按全国统一的定购价格，粮食收购不上来。于是，地方政府从财政中给农民搞点价外补贴，例如粮食收购价每斤5角4分之外，再给农民补贴1角6分，这不就是以工支农吗？是完全允许的。江苏省在这方面做得比较好，广东省的价外补贴只落实了三分之一。我们还是要坚持粮食定购价全国统一，允许地方搞价外补贴。

有些同志提出要中央补贴粮价。我老实给同志们讲，中央的财政状况不允许这样做。为什么要实行地区平衡？原因之一就是中央在财政上没有那个补贴能力。无论是粮食也好，棉花也好，化肥也好，中央无力补贴。现在的情况是财政赤字都背在中央，地方没有赤字。不是中央不愿补，而是没有钱补。这就是今天要讲的，粮食、棉花、化肥都搞地区平衡，地方自己负责。几年来，我们好不容易把国家专储粮增加到800亿斤，去年吃掉了300亿斤，现在只有500多亿斤。怎么用出去的呢？一是救灾，二是平抑粮价。这些都是从国家专储粮中拿出来调剂的，这种搞法持续不了多久的。因此，只能各地区自求平衡。当然，还必须有全国的宏观调控。例如，各省区市的粮食播种面积不能减少，产量要增加，必须建立地方粮食储备，产区要提高粮食商品率，销区要提高粮食自给率等。各地区根据全国的宏观要求，看自己究竟需要多少粮食，应该种多少粮食，能够收购多少粮食、销多少，这些都是省长的责任和任务。总的就是这个精神。目前，也只能采取这个办法，才能解决我国的粮食问题，否则，粮食问题会越来越严重。

当然，这不是说中央没有责任了。我们管全国的总量平衡，你们管地区的总量平衡。中央要掌握粮食的进出口，组织、协调省际的粮食调运。中央在各地平衡的基础上，还必须制订全国粮食的生产、收购(包括议购)、交换、调运、进出口计划，否则，地区平衡也实现不了。当然，也要明确这些计划主要是通过市场手段来实现。中央要统一协调，工作很多，不是不负责任，而是有很大的责任。国家专储粮用于

全国性的重大灾害或是全国性粮价波动。一般性的灾害、一般的地区粮食余缺，只能靠地方自己的粮食储备、省区市之间的调节。国家专储粮的所有权属于中央，由中央来调动。要逐渐把这部分粮食的仓库转移到销区，以便于在紧急的情况下调运。国家专储粮每年还有个推陈储新问题，这也要请各地区协助调换。



1995年9月，朱镕基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考察棉花收购工作。右一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府主席阿不来提·阿不都热西提。

关于粮食销价，我们认为不宜作统一的规定，各个地方可以根据自己不同的情况来定价。但我也相信，因为中国不是一个封闭的国家，粮食市场会有一个平均的价格，各地不会有太大的悬殊。粮食销售部门收购进来的粮食的价格是不统一的，有定购粮的价格，有议价粮的价格，还有进口粮的价格。这些粮食是按综合平均价销出去。是将定购粮凭粮证专门销给那些低收入阶层，还是采取普遍定量的销售办法，均由各省区市自定，中央不作统一规定。总之，要保障粮食供应，并力求粮食价格基本平稳，以稳定大局，稳定市场，稳定人心。

要做到控制粮食的销价，必须坚持粮食系统“两条线”操作。这是去年粮食购销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一个叫政策性业务，另一个叫商业性经营，两套机构分开，搞“两条线”操作。去年为什么这项改革没有实行呢？因为各个地方的粮食系统阻力太大，思想不通。今年无论如何要坚决贯彻这一条。不这样做，粮食系统财务亏损，继续到银行挂账，亏损问题永远不能解决。因此，粮食系统必须从组织机构上分开，零售系统搞商业性经营，自负盈亏，政策性机构吃“皇粮”。

去年粮食价格调整(涨价)时有一条规定，标二米、标准粉按原价供应，中央有补贴，补三个月，主要是照顾低收人市民有个过渡期，以适应粮食涨价。实际上三个月后，因为考虑到稳定的问题，中央一直补贴到现在。这个粮食年度要完了，我们的意见是中央不能再补贴下去了，到此为止。那怎么办呢？同志们，不是有个粮食风险基金吗？中央已经拿了钱了，地方按1：1.5匹配，是一个省一个省核定的嘛。这个钱已经分别打入中央预算和地方预算，拿这个钱去补嘛。粮食风险基金已经建立了，就要运转起来。对此，请同志们早做准备，做好工作，不要引起波动。

二、关于棉花问题

大家提出的问题就是下一年度收购棉花要加价。我们认为加价是有道理的，因为去年的棉花价格是根据定购粮食的比价确定的，现在议购粮食的价格涨得很多，如果棉花价格不动，就会影响农民种棉的积极性了。今年实际上保留的棉田面积比去年减少了，这是很危险的。另一方面，现在纺织厂用的棉花每担价格已经超过现在的收购价格好几百块钱了。农民没有得到什么好处，纺织厂增加了很大的负担，中间环节得利太多，也包括地方政府的收费。根据这个情况，对今年的棉花购销体制要做一点改进和完善，就是9月1日新棉上市的收购价格要提高。要提早宣布，不然农民种棉花来不及。但要做好准备工作，否则要发生几种后果：第一，农民会惜售手里的棉花，等到9月1日以后再卖，这也是免不了的，不过，估计农民手中的棉花也没有太多了。第二，最怕的是现在供销社手里的这5800万担棉花，一下子加价，水涨船高，这个受不了。现在的棉花是去年9月1日以后低价收购进来的，是不能涨价的，这要靠你们地方来控制。第三，一宣布棉花提价，如果全国各地统统跑到农村去抢购棉花，那就乱了。所以在宣

布这件事情的时候，必须事先有充分的准备，要有相应的配套政策和具体措施，层层下达，不要登报。

棉花实行地区平衡，和粮食一样，搞省长负责制。从这两三年的情况来看，已经没有多少省调出棉花了。冀、鲁、豫本来是调出棉花的省，现在变成调进棉花的省了。南方地区可以扩种棉花，但我们不希望南方扩种，因为它们那里种粮食产量高，还是多种粮食为好。现在是湖南省、湖北省可以调棉花出来，江苏省也调出了一点，但量都不多。看起来，棉花基本上只能实行地区平衡。京、津、沪怎么办呢？依靠新疆产的棉花来解决。新疆有重大贡献，今年已经调出1200万担棉花了。京、津、沪及若干大城市不产棉花，但纺织工业很集中，只能由中央掌握新疆产的棉花组织调运。其他地区自己平衡。军队用棉由中央直接供应。这几个城市也不能全部靠中央调运新疆的棉花，还有个配棉的问题，也得通过市场活动到别的省购进棉花。因此，现在明确棉花也是省长负责制。种多少棉花由省长决定，纺织厂是属于地方的，供销社也是省长管的，这几方面由省长统一管起来，利益合理分配，棉花的价格问题、供求问题就解决了。

棉花“三个不放开”①绝对不能松动，一放就乱套了。下一年度的棉花收购价格统一加价，不能各自为政。

---

① “三个不放开”，指棉花不放开经营、不放开市场、不放开价格。

三、关于化肥问题

化肥价格涨这么多，刚才讲我们有点失误，没有按照计划进口那么多化肥，结果耽误了时机，现在进不来了。于是我们采取一切措施，开足马力增产化肥，春节也没有停工，一直在生产。但形势还是严峻，尿素库存比去年减少了500万吨，春耕生产所需要的化肥缺口比较大。现在除了开足马力生产，加强技术改造，从长远考虑要安排建设几个大化肥厂外，当务之急是“开仓济贫”，不要惜售，把仓库里的化肥，不管是中央的还是地方的，统统拿出来卖掉。我们有办法增产，还可以进口一些，不要害怕仓库里没有东西。春耕的季节不等人，一定要把化肥抛出去，让农民种上地。但是千万不要在这个时候坑农，来个化肥大涨价，奇货可居，对这样的事要严加管理。

对化肥政策，考虑到去年开了一系列的会议没有完全解决问题，今年要稍微完善一下这个体制。第一，中央的18个大化肥厂生产的化肥要制订公平的分配调拨计划，当然也要照顾历史情况。要严格地执行浮动上限1150元一吨的出厂价，绝对不涨价，谁涨价，撤谁的职。这个价是赔本的，赔本也认了，用别的产品来补偿。化肥厂自销10%，这个也不好再变了，但化肥厂不能直接卖给农民，只能卖给化肥经营单位，价格每吨不能超过1400元。去年定的每吨化肥1400元的销售价格是过得去的。第二，中小化肥厂都是地方的，这个化肥只能由地方定价，中央不定价，也不限价。第三，进口化肥，免关税，增值税即征即退，所需外汇由中央拿。但是这个价格，中央的进口单位就按代理作价，不赚钱，保本。至于地方用什么价格卖出去，由地方自定。也就是说，这三种化肥，最后是以一种综合价格卖出去，还是分别以不同的价格卖出去，由地方自定，省内平衡。我们相信，只要把流通领域管好了，化肥的价格不会比现在更高。但是，如果运化肥的汽车经过公路，当地到处设卡收费，然后拿这个钱去搞开发区，搞工业项目，这不是坑农吗？本来1400元一吨的化肥价格一下子加两三百块钱，这个价格农民怎么承受得了呢？现在，供销社和粮店都搞什么个人承包、什么国有民营，我认为这是错误的，弄得化肥销售根本没有主渠道了，化肥经营单位根本不听招呼，唯利是图。流通领域这种状况，不管怎么行呢?

四、关于资金问题

同志们都反映农业投入的资金不落实。我认为，对这个话要有分析，要有鉴别。农副产品收购资金应该说落实得相当好，这几年没有“打白条”。前年的农副产品收购资金只有450亿元，去年我们拿出750亿元来收购农副产品，哪里要增加这么多？这个钱到哪里去了呢？最近，我们对全国100个县进行了调查，审计署也去核实了。结果是收购资金中的35%被挪用了。其中，13%是地方财政补贴不到位；11%是收购单位把收购资金挪用于盖宿舍、发奖金、弥补亏损；还有5%是农业银行自己的问题，搞了别的工业项目，或者是给自己发奖金、盖宿舍。因此，不是收购资金不落实。我们大家要一起整顿。我跟农业银行的领导说，你挪用的这个5%无论如何要刹住。地方挪用、顶替的

30%，要请地方同志自己来解决。你们这样干下去，几百亿元的农副产品收购资金将收不回来。

至于说扶贫贷款、粮棉大县贷款等专项贷款，确实是没有完成计划。但是，这些是贷款，不是财政拨款，是银行的钱，是要还的。银行的钱就得看你的项目，你得有效益。你没效益，叫银行怎么贷款给你？那银行不变成财政了？所以，还得给银行自主权，银行要审查项目是不是有效益。农业银行经过调查，现在给乡镇企业的贷款有40%收不回来。信贷资金是不能够这么敞开口子用的。因此，我有两方面的要求：一方面，国家银行要坚决地按照中央的扶贫政策、扶持粮棉大县政策、支持中西部乡镇企业政策，落实专项贷款；另一方面，地方要保证这些项目有效益。没有效益，那是不能向银行贷款的，更不能强迫银行贷款。

国有企业改革不能只在产权上做文章

(1995年3月9日)

这是朱镕基同志在参加八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辽宁省代表团全体会议时的讲话。

去年，我们把重点放在宏观经济体制改革方面，现在看起来取得了很大成功，应该说为搞好国有企业创造了一定的条件。比方说税收负担问题，根据几个部门广泛的调查，去年实行新税制后，国有企业的负担平均降低了0.15%到0.6%，企业税赋负担不是增加了，而是降低了。当然，不可能所有行业都是降低这个平均数。比如说矿山，特别是独立矿山，税赋是增加了，而且增加得不少。这方面，我们也采取了一些措施来解决，如对煤矿增加了补贴，降低了增值税税率。去年仅国有企业的"两金"①，全国就减免了150亿元。今年把非国有企业的"两金"也都减掉了，又是30亿元，加起来共减掉180亿元。但是，我们去年还没有把工作重点转到国有企业改革方面，因为没这个本事啊，两面开花不行，所以在国有企业的改革方面，应该说我们的指导还是不够的，有些地方还有误导。比方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关于国有企业改革的方针、关于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很明确地概括为16个字："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但是在执行过程中，用产权清晰代替了一切。只在产权改革方面做文章，能搞好一个企业吗？我不是讲这是企业的责任，而是我们在这两年讲得不够，指导得不够。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明确讲了，搞股份制、公司化那是有益的探索。但现在全面铺开，到处都搞股份制，究竟有多大效果呢？全面地铺开，不规范嘛。集了那么多资，我看现在好多搞股份制集资的企业最后还不了这个钱，要失信于职工。另一方面呢，把企业管理放松了，质量管理放松了，技术改造也放松了，假冒伪劣产品横行，企业的效益也不讲了，唱高调、搞花架子的多了。我总觉得搞国有企业改革重要的是转变经营机制，要使产品能够适应市场的需要，产品要不断地更新换代。离开这些东西，搞一些花架子，开个股东大会，产权就明确了？大家集资，观念就转变了？工人就为自己干活了？企业改

革这样搞，我总觉得玄乎得很，实际上我没看到哪个企业这样能真正办好的。

---

① “两金”，指能源、交通重点建设基金和预算调节基金。

我们必须全面、准确贯彻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精神，不要偏于一个方面，把其他都丢掉了。去年江泽民同志的几次讲话，都把思路往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的正确思路方面引导，可是我们有些同志总觉得都是老生常谈，没什么新东西。怎么会没有新东西呢？江泽民同志在去年召开的党的十四届四中全会上，就办好国有企业问题讲了三条，一个叫政企分开，一个叫搞好内部管理，还有一个叫完善社会保险制度，这不就是新东西吗？我们在去年花很大力量抓社会保险制度的改革和完善。有了社会保险制度，才能建立起裁人和破产的机制，这就是新东西嘛！企业要是不能够裁人，不能破产，那不就是永远吃“大锅饭”吗？总是依赖国家，就不能适应市场要求，最后把厂子赔得精光，“资不抵债”，这样企业怎么能搞得好呢？尤其是一些企业搞短期行为，这个我看得太多了，至多也就好了两年，第三年就垮了。



1995年3月9日，朱镕基在八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辽宁省代表团全体会议上讲话。右一为辽宁省委书记顾金池，左一为辽宁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全树仁。

今年就是要正确地贯彻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的《决定》，把国有企业的改革搞好。要把企业搞好，需要下扎扎实实的工夫，办好一个企业那么容易呀？说我们没有新东西，说政企分开、加强内部管理在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上就已经讲过了。是讲过了，但是没落实嘛，企业自主权没落实，管理没抓好，管理松松垮垮。真正敢于得罪人，不去迁就工人的眼前利益，着眼于他们的长远利益，这样的厂长不多。有些厂长有钱不去补充企业的自有资金，而是大发奖金，得到工人的“拥护”，可最后把这个厂子搞垮了。所以，这些老话还是得讲，因为没有落实。是不是没有新东西呢？我说有，建立社会保险制度、破产机制、兼并机制、裁人机制，这些都是办好一个企业的根本机制嘛， 这些是新的，我们还没搞嘛。不要把“产权清晰”强调得过分，强调过分就变成私有化了。

如果我们的国有企业搞得一塌糊涂、资不抵债，这个企业还不能够破产，这个厂长还不能够撤职，那就是要把“大锅饭”永远吃下去。今年在这方面要有所突破，新东西就是让企业能够裁人。我们不是学资本主义，但是我们搞市场经济，要有竞争。否则企业是不能提高竞争力的。没有一个破产的阴影，企业怎么会向前走呢？谁不愿意吃“大锅饭”呢？所以，就是要建立这个竞争的机制，这才叫市场经济。但是，由于我们的社会保险制度现在还不健全，标准很低，因此，去年以来我们的思路有一个很大的改变。原来的《企业破产法(试行)》规定，企业破产以后，拍卖后的各种资金，首先要用于还债，然后再安置职工。当然，首先要把欠职工的工资还给职工。现在，我们把这个问题倒过来考虑了，企业拍卖所得首先用于安置职工，银行的债务从呆账准备金里冲销，国家来负担这个损失。因为不这样做，谁也不敢破产，职工不安置，社会就不稳定。但是应该看到，企业不能破产很多，企业破产多了，社会还是承受不起，因为被安置职工的生活水平要大大低于在岗位上的职工。破产搞多了，职工心理不平衡，就会引起社会不稳定。搞得太多，国家也负担不起。所以，必须有控制地搞。去年我们计划冲掉70亿元银行债务，可实际上一个钱也没有冲掉，谁也不敢

破产。今年我们准备再拿70亿元，共140亿元。我看也没有几个城市真正敢让企业破产，还是担心会影响社会稳定。起步不是那么太容易，但没什么可怕的，一个城市破产两三个企业，那个作用就大得很，机制就建立起来了。我们的一些企业家就不会成天到晚到处乱跑了，他们就得小心了。现在不搞破产、兼并、裁人机制，产业结构是无法调整的。刚才谈到东北的煤矿，为什么这么困难？全国的煤矿为什么只有东北的困难？当然，陕西也有几个困难的，但最多的是东北。因为大都是日本侵占东北时候搞的，资源枯竭了，人员的包袱重得不得了，成本很高，煤的质量很差。辽宁本身又已发展了地方煤矿，再加上山西煤矿的煤非常便宜，谁买东北生产的煤呢？煤卖不出去，人又那么多，它们不困难才怪呢。现在没有别的办法了，再投钱去进行技术改造，投进去就永远收不回来了。因此只有转产，转到第三产业或者其他行业，来安置这些职工，没有别的办法。这要有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只好用社会保险制度维持下岗职工的基本生活水平。

今年，企业改革没搞好的要继续搞，政企分开、加强管理、技术改造、质量管理过去都没有很好抓，今年要下工夫，扎扎实实地把这些工作抓好。另外，新的机制，裁人、破产、兼并必须搞，这方面要做开拓性的工作，不要害怕，这么搞，国有企业才会改变面貌。至于产权改革、股份制公司和股票上市也完全可以搞，是试点嘛。但只靠这个办法把国有企业搞好是等不及的，现在国有企业这么困难，再等筹办公司、股份制把企业救活，我说等不及呀！

现在国有企业破产的问题是：真破的没有，假破的很多。搞什么“大船搁浅，舢板逃生”，实际上是假破产。企业宣布破产了，把债务冲掉，其实还在那里生产，还继续向银行借钱，就是为了冲债、赖债，这叫什么破产呢？企业既然已经是资不抵债了，既然已经是没有任何拳头产品、没有前途了，就要彻底破产，工人拉出去重新培训，或者加以安置。这样，银行就把包袱卸掉了，尽管冲掉了原来的债务，但以后不再继续挂账了。现在企业说破产了，也不经过银行批准，法院一宣布，债务就一笔勾销了，而企业照样破破烂烂地在那里搞着，怎么能这样破产呢？所以，国家经贸委对这个事情要抓紧。你破几个嘛，银行给你冲掉债务。设备卖不了几个钱，你这块地还是很值钱的，卖掉地，安置职工完全够了，再加上一点社会保险资金、待业资

金，就可以了。如果真这样搞了，就会影响好多企业，它们就能兢兢业业地办厂，不吹牛皮、说大话，真正扎扎实实地把企业搞好。总之，我还是相信，只要认真贯彻党中央和国务院的正确方针，全面地、准确地贯彻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决定，国有企业是可以搞好的。

农村“四荒”拍卖必须规范

(1995年4月23日)

这是朱镕基同志在国务院办公厅呈送的报请审批《关于做好农村“四荒”使用权拍卖工作时通知》签报上的批语。农村“四荒”，指农村的荒山、荒沟、荒丘、荒滩。

原则同意，但考虑到当前的农村基层组织和党风的状况，如此重大的政策变更必须加强各级党的领导，尤其是省委要认真重视，慎重行事，先要有规划然后才能试点，取得经验后再逐步扩大。如不加控制，可能二个月内全国全部卖光。拍卖必须有规范的办法规定，否则一定乱套，拍卖所得资金必须另行制定严格管理办法。不要认为土地是集体的(实际是国家的)，资金就不能监管，结果是中饱私囊，或者冲击房地产、投机行业，为害甚大。本通知所谓“专户储存、滚动使用”是一句空话。

此外，中央是哪个部门负责监管，必须明确规定，是农业部？土地局？水利部？如无一个部门牵头主管，无人负责，将来出了大事，无从追究责任。

总之，要有配套规定、办法同时下达，否则难免发生全国性偏差。请李鹏总理指示。

(征求部门的意见要包括财政部、人民银行、税务总局)

朱镕基

4.23

证监会决不能搞权钱交易

(1995年5月10日)

这是朱镕基同志在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原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部副主任及原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两工作人员接受“鲁石化”股票的初查情况上的批语。涉案三人在泰山石化公司的股票“鲁石化”上市过程中，或帮助设计、审查方案，或帮助找国务院证券委员会有关人员“说了话”，接受了该公司的股票。

此案要彻底查清，从严惩处。此件复印直送周道炯①同志，要对证监会全体职工进行教育，今后再发生此类案件，一律法办，开除出证监会，并要追究证监会主席的责任。

另印送李铁映、张暗若①并盛华仁①同志。证监会决不能搞权钱交易，否则应该撤销。

朱镕基

5.10

---

① 周道炯，当时任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主席。张皓若，当时任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副主任。盛华仁，当时任中国石油化工总公司总经理。

在全国科学技术大会上的讲话

(1995年5月27日)

1995年5月26日至30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北京召开全国科学技术大会。出席会议的有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党委书记或省长(主席、市长、分管科技工作的省领导)，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这是朱镕基同志在会上讲话的主要部分，曾发表于《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册。编入本书时，对个别文字作了订正。

这次大会开始时，江泽民同志、李鹏同志对加速科技进步的问题，作了非常重要的讲话。今天，我主要结合学习邓小平同志关于科技进步的思想，讲三点体会。

一、经济建设必须依靠科学技术

邓小平同志历来十分重视科学技术对经济建设的重大作用。早在1978年3月18日全国科学大会上，邓小平同志就指出：“四个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现代化”，并强调必须“承认科学技术是生产力”①。1982年10月14日，邓小平同志在与国家计委负责同志谈长远规划时讲：“科学技术的发展和作用是无穷无尽的。”②1986年10月18日，邓小平同志指出：“中国要发展，离开科学不行。”③1988年9月5日，邓小平同志强调：“依我看，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④1992年年初，邓小平同志在视察南方时进一步指出：“经济发展得快一点，必须依靠科技和教育。”“要提倡科学， 靠科学才有希望。”⑤我们要做好经济工作，就必须深刻理解邓小平同志关于依靠科学技术进步加快经济建设的论述。最近正在编制“九五”计划，在这项工作中必须切实贯彻邓小平同志的科技思想；否则，编制出来的“九五”计划没有多大作用，甚至还可能给子孙后代带来后患。对此，我想讲三点意见。

① 见邓小平《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86、88页)。

② 见邓小平《前十年为后十年做好准备》(《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7页)。

③ 见邓小平《中国要发展，离不开科学》(《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83页)。

④ 见邓小平《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74页)。

⑤ 见邓小平《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7～378页)。

第一，集中力量完成在建项目，不盲目铺新摊子。“九五”时期，是我们实现现代化建设第二步战略目标的最后一个五年。要实现第二步战略目标，达到一定的发展速度，不能主要依靠增加投入，不能依靠铺新摊子，而是要靠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依靠发挥现有企业生产潜力，依靠在建项目尽快投产。当然，为了经济发展有后劲，“九五”期间仍然需要增加一定的投入，但这个投入是为“九五”以后的五年、十年准备后劲。现在开工的项目规模已有几万亿元，需要搞很多年才能完成。如果继续铺新摊子，资金又不够，工期拖得很长，包袱很重，不能形成投资的良性循环。因此，“九五”期间应该集中力量搞完在建项目，没有余力就暂时不开或少开新项目。这不会影响第二步战略目标的实现，而且能为我国经济在下个世纪健康发展创造宽松的环境。

第二，国民经济要快速持续健康地发展，必须依靠科学技术。建立在落后技术基础上的快速发展，不可能是持续健康的发展。编制“九五”计划，不能依据现有的技术水平去算账，这个账算出来是“面多了加水，水多了加面”，规模很大，投入很多，产出很少，效益很低，最后就会导致财政金融崩溃。既要有一个比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又能保持财政的基本平衡，通货膨胀保持在老百姓可以承受的程度以内，这才是真正的本事。做到这一点，才叫“快速持续健康”的发展。怎么能做到这一点呢？关键是依靠科学技术。2000年需要1.2亿吨钢、12亿吨煤等等，这是按现在的定额计算出来的。我们国内生产总值的综合能源消耗相当于日本的5倍、美国的2.6倍，能这样干下去吗？现在，

技术设备落后，产品傻大笨粗，原材料消耗那么大，能源大量浪费，依据这样的技术水平和物质消耗，算出来需要多少能源和原材料，然后算出来需要多少基本建设投资。按这种算法，2000年当年要1万亿元的财政收入、要发6000亿元国库券才能弥补赤字，这怎么行？我看，必须从根本上改变观念，真正按照邓小平同志的思想，要把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长期规划建立在科学技术进步的基础上，国民经济要轻量化、信息化，要提高产品的技术含量、提高附加值。各行各业都要进行技术改造，主要产品的技术性能和能源、原材料消耗定额都要逐步赶上世界先进水平。不从这个方面想办法，“九五”计划就是一堆项目表，最后我们要吃大亏。

第三，确定“九五”计划的发展速度，要建立在调整产业结构的基础上。工业发展速度不能那么高，因为投入太大，特别是国有企业改革任务没有完成以前，其发展主要靠投入，国力承受不了。要高度重视第一产业，继续加强农业的基础地位。要大力发展第三产业，第三产业有很大的发展余地，投入少，产出高，效益好。我国第三产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只有30%多一点，发达国家已达到50%至60%，差距是很明显的。对于第二产业结构的调整，要认真分析研究，要着力发展那些技术先进的产业，淘汰那些落后的产业，使国民经济轻装前进。

二、科学技术必须面向经济建设

邓小平同志的这个重要论断，现在还是没有完全落实。当然，这里有个体制的原因。我们现在这种体制的一个弊端，是不利于科研与生产的结合，不利于研究院所与企业的结合。比如说，科研院所与企业共同研究开发一个产品，开发出来以后，研究所就告状，说企业把研究所给甩了；而企业也告研究所的状，说研究所自己又去办个企业，把企业给打垮了。看来，必须使企业成为技术开发的主体，科学技术力量不进入企业，只靠吃“皇粮”的研究所，很难实现科技与经济的结合。有些研究院所必须由国家扶持，这是没有问题的。但绝大部分的技术开发力量都应该在企业，必须朝这个方向走下去，不然就不能真正解决科技与经济脱节问题，也就难以实现依靠科技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

当然，现在有很多困难，有些科研所进入企业集团也有顾虑，安全感不够，今天企业搞得挺红火，明天可能工资都发不出来。所以，不办好一批稳定发展的大型企业集团，就难以形成一批真正能够赶上世界水平的技术开发机构。

国家科委的同志要求我讲一讲，科学技术面向经济建设究竟重点面向什么。现在我最关心的就是农业，因为农业是国民经济当前最重要、最紧迫的问题。耕地少，人口增长太快，经济发展速度这么高，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很快。去年一有灾情就少了300亿斤粮食。今年要靠少出口和多进口粮食来补上去年用掉的300亿斤专储粮。所以我说，农业这个国民经济的基础最重要。在《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速科学技术进步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中，第一条是讲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第二条就讲大力推进农业和农村科技进步。这是完全正确的。农业就得靠科技，还要靠高科技。邓小平同志在1988年9月12日的谈话中指出：“将来农业问题的出路，最终要由生物工程来解决，要靠尖端技术。”①这个话大家不要忘记了。粮食品种的改良对近十年来农业的单产提高起到很大作用，但这方面的潜力还没有发挥。现在，低产田比重较大，按播种面积算单位面积产量，中国才500多斤，还有很大的潜力。现在肥乱撒、水漫灌，在这种落后的技术基础上，只抓大型水利工程建设，只抓化肥工业建设，结果是投入多、产出少。所以，还是要抓合理施肥、合理用水，节约施肥、节约用水，这方面有许多技术问题要解决。

---

① 见邓小平《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75页)。

我刚才讲了，编制“九五”计划，各行各业都要考虑依靠科学技术进步，尤其要加速国民经济信息化、电子化进程。我还特别关心，当前要狠狠打击骗税。现在由航天工业总公司、电子部攻关，加紧建设交叉稽核电子网络和防伪识别系统。不采用高技术，金融、财税系统的改革就没有保障。江泽民同志一再讲，现在拿着麻袋装钞票的时代早已一去不复返了。大家都应该通过票据结算，使用信用卡，如果没有全国的信息网络，就做不到这一点。还有企业三角债问题，有些企业是有钱不还欠款，它在银行多头开户，你扣也没法扣。最近李鹏同志

决定，全国找1000个国有企业，大约拥有全国60%的利润税收，实行全国联网。1000个企业联网，如果你多头开户，我都能查出来。在这1000个企业里，三角债就比较好解决了。这是个很大的工程。现在我觉得要攻关的事情实在太多了，一攻关马上就是很大的效益。依我看，如果把这些关攻下来，所节省的钱，可能比你们现在的科研经费要多10倍。当然，基础性研究、高技术还是要去搞，不搞不行。邓小平同志讲过："过去也好，今天也好，将来也好，中国必须发展自己的高科技，在世界高科技领域占有一席之地。"他还指出，高科技领域"不要失掉时机"①。现在该花钱就得花，要提早安排，如果慢一步，将来就会落后更多，就得花更多的钱。

---

① 见邓小平《中国必须在世界高科技领域占有一席之地》(《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79、280页)。

三、重视培养和使用人才

邓小平同志非常强调培养和选拔人才，这一思想几乎贯穿在他的全部著作之中。在1978年召开的全国科学大会上，他就提出要建立一支宏大的、又红又专的科技队伍，后来又不断地讲这个问题。1982年，邓小平同志讲："人才不断涌出，我们的事业才有希望。""二十年规划能否实现，关键就在这里。"①他总是用有没有希望来讲人才问题。1985年，他说："改革经济体制，最重要的、我最关心的，是人才。改革科技体制，我最关心的，还是人才。"②我们要认真贯彻邓小平同志关于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善于发现和使用人才的指示。

---

① 见邓小平《前十年为后十年做好准备》(《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8页)。

② 见邓小平《改革科技体制是为了解放生产力》(《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08页)。

在《决定》中，对增加科技进步的投入，也有一些新规定。比如，研究开发经费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在2000年达到1.5%，这是个奋斗目标，但是要努力去实现。财政预算要保证科技经费增长幅度高于财政

收入的平均增长幅度。科技的投入主要靠地方，现在财政预算还是70%的收入在地方。中央也要按要求保证科技投入的增长。我认为，现在有三个方面的支出应该摆在最重要的位置，科技当然是最重要的，还有教育、农业。教育是百年大计，现在再不注意，那就是一个失误啊！

邓小平同志在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上讲："我愿意当大家的后勤部长"①。我也要向邓小平同志学习，愿意当大家的后勤部长，尽我最大的努力！我希望今天在座的各部门、各地区的领导同志也当后勤部长。咱们大家一起当后勤部长，中国的科学技术事业就搞上去了。

---

① 见邓小平《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98页)。

关于党的建设与经济建设的关系

(1995年6月5日)

1995年6月5日，朱镕基同志在北京中南海怀仁堂给中央直属机关和中央国家机关部级领导干部上党课。参加党课的有中央直属机关、中央国家机关副部级以上的党员领导干部，解放军三总部、武警总部和北京市的有关负责同志共1100人。这是朱镕基同志讲话的主要部分。

我把今天要讲的内容概括为两句话，就是党的建设必须围绕经济建设，经济建设必须依靠党的建设。

一、党的建设必须围绕经济建设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这是一个重要的转折。从那时起，就已经确定了我们党的工作要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我们现在应该总结这16年来，转到经济建设方面是如何转过来的，是不是抓住了重点，效果如何。我认为，主要应该在三个方面总结经验：

一是一心一意搞建设，发展是硬道理。我们总结出这样一条经验：发展必须既是快速的，又是持续健康的。这个经验很重要。16年以来，或者说新中国成立后几十年以来，我们都在探索这样一条道路。就是说，我们既要有高速发展，也要持续健康发展。高速发展是个硬道理，但总得持续地发展下去，总不能搞了几年又走回头路；总得是健康的发展，不能搞得物价飞涨，民不聊生。所以，我觉得十几年以来或者说几十年以来，我们都在探索一个平衡点，就是既能获得一个快速的发展，又能获得一个持续健康的发展。根据以往的经验，我深刻地体会到：快速发展是比较容易的，持续和健康发展则很难；上去容易，下来难；铺摊子容易，维持这个摊子比较难，“欲速则不达”。

记得1992年邓小平同志发表南方谈话以后，我学习邓小平同志的这个谈话，从内心感到邓小平同志思想的伟大，也非常欢欣鼓舞地拥护。但是，从几十年参加经济建设工作的实践看，我担心的一点就是有些人往往容易片面地而不是全面地去理解邓小平同志的这个谈话，

我有这个方面的切身体会。1992年3月，我在七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海代表团的会议上讲了一篇话。我讲话的整个精神是：快要快在什么地方？胆子大要大在什么地方？思想解放要解放在什么地方？因此，整个讲话实际上是批评盲目追求速度，大铺基本建设摊子，不讲效益。快要快在什么地方？当时我提了四个方面：改革开放要加快，调整产业结构要加快，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要加快，科学技术发展的速度要加快。我是把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中提到的约束条件再三地强调，认为没有约束条件，经济发展是快不了的，快了就会出毛病。后来，我这个讲话传到邓小平同志那里去了，邓小平同志看了以后，给予肯定并要求印发全党。再后来，我的讲话发下去了，我问过很多同志，大家当时并没有太注意这个讲话。因为当时正是大干快上的时候，大家不太喜欢我这个讲话。今天不讲这个背景，大家也不知道，实际上，我那个讲话得到了邓小平同志的支持和江泽民同志的亲自过问。

现在回头看，1992年，我们进入一个高速发展的新阶段，成绩是巨大的，但是毛病也很多。这些毛病完全是我们在执行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的过程中，只看前半句、不看后半句所引起的。不是在改革开放、调整结构、经济效益、科学技术进步方面去做文章，而是在铺摊子方面做文章。开发区热、房地产热、城市建设热，把农业丢掉了，把农田也吞掉了，生产出来的东西卖不出去，仓库积压越来越多，不能说问题不严重。邓小平同志的南方谈话不是只有一句，不只是说“发展是硬道理”，后面还有好多约束的条件，提出了很多的要求，而我们都没有做到，只记住了一句“发展是硬道理”，认为发展越快越好，最后走到了一个很被动的地步。同志们，在这个问题上，思想是非常难统一的。我在1992年10月20日中央召开的经济情况通报会上，讲了我的看法。1993年4月1日，八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开完以后，中央又开了一个经济情况通报会，我在会上又讲了这个看法，讲得很尖锐，但很多同志并没有引起重视。一直到1993年6月份，经济热得已经搞不下去了，票子都印不出来了，中央出台了十六条宏观调控措施之后，全党的认识才在党中央的一声号令下统一，也就把局面扭转过来了。局面扭转后，本来希望很快地“软着陆”，但现在看来，这个“软着陆”非常地难，到现在还是没有完全“着陆”。各地对形势的估计、认识很难统一，富裕地区对形势是一种估计，不发达的地区又是一种估计，估计来估

计去，总还是速度第一，片面地认为不搞基建项目经济就上不去。十几年走过来了，这个问题解决了没有？我认为并没有完全解决。这个问题不解决，会不断地重复上面的教训。



1995年6月5日，朱镕基在北京中南海怀仁堂为副部级以上党员领导干部讲党课。

二是转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那么经济建设的重点是什么呢？农业是基础，科技和教育是关键。邓小平同志在1982年讲要把工作重点转到经济建设方面来时说："战略重点，一是农业，二是能源和交通，三是教育和科学。搞好教育和科学工作，我看这是关键。没有人才不行，没有知识不行"①。这几年的经验证明，没有农业这个基础，国民经济是搞不上去的，而且要出很大的问题。第一是吃饭，第二才是建设。建设不能吃光榨净，吃饭也不能吃得太好，吃得太好还受不了。总之，我觉得农业、科技、教育，从最近几年的经验教训看是非常重要的。

---

① 见邓小平《一心一意搞建设》(《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9页)。

三是如何使国有企业能够转到一个提高质量和效益的轨道上来，从根本上转变经营机制。这是一个困扰我们几十年的课题，而且是至今还没有解决的课题。我们看到了，国有企业确实是国家的支柱，60%

到70%的国家财力来自于国有企业。但是我们也要看到，我们为国有企业付出了极大的代价，把钱都花到这上面去了，然而回报率不高，效益不高，这正是影响我们进一步发展的一个主要障碍。我们财政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去年才11.9%，今年还会下降。在发达国家，财政收入相当于其国内生产总值的40%到50%。我们过去是财政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0%多一点，现在下降到这个程度，就是因为我们的国有企业没有什么利润，交不上来几个钱，好多企业是靠银行贷款给它们交的税。所以，我们的财政收入实际上主要是我们自己发的票子。票子发出后，一部分让企业交给国家，一部分给企业发了奖金和工资，另一部分是银行收回来一点利息。都是我们自己的钱！在这样的情况下，如何谈积累？最后，只能导致通货膨胀。所以，如果国有企业再不改革，没有一个真正的内在的机制，国民经济绝对搞不上去。我们现在讲财政收入的增长速度在百分之二十几不算低，但一考虑通货膨胀呢？通货膨胀率也是百分之二十几，等于一个钱也没有增加呀！财政支出倒是实打实地增 长上去了。国民经济又如何搞得下去呢？

党的建设必须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应该注意几个什么问题呢？

第一，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把工作重点转到经济建设上来，应该用经济的方法去抓出实效，而不能够以党代政、以政代企、党政不分、政企不分。

搞宏观调控，要用经济方法抓经济，不用或者少用行政的方法，否则会越帮越忙，越抓越乱。现在是搞市场经济，总得要面向市场，尊重价值规律。完全以党和政府的意志来办事是不行的。比如，国有企业搞不好，政府光想办法去救活企业，开资金调度会，开现场抢救会，大家共同出钱把企业救活，这样是绝对搞不好的。这种办法只能造成国家极大的损失，投入的钱是收不回来的，国有企业也是救不活的。党和政府管企业、抓经济还是要落实在出主意、用干部上，关键在选拔好企业的领导班子。最近，广西有个市要引进外资，市委书记要银行担保，强迫银行行长去签字。这是不允许的。搞了几十年经济工作了，怎么还这么无知呢？强迫贷款是不能贷的，银行的同志不要怕打击报复，钱收不回来是国家的损失。银行如果不给国家把关，就是一个敞开大门的金库，国家蒙受重大损失怎么得了呢？希望各部

门、各地区的领导同志千万要明确这一点，抓经济要抓到点子上，不能用行政命令的办法瞎干预。

第二，还是要两手抓、抓两手，不能一手抓、只抓一手。现在，我非常担心，好像一个地区的党政领导都在抓招商，都想抓经济，而且都出去招商了。都把注意力放在这一边，结果很多事情没人抓，党的工作没人抓，思想政治工作没人抓，社会风气没人抓，治安情况也相当让人担忧。因此，党政、政企一定要分清楚，各司其职，集体领导，分工负责。

第三，集体抓，不是书记一个人抓。我看这个问题，正如邓小平同志过去讲的："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就是在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的口号下，不适当地、不加分析地把一切权力集中于党委，党委的权力又往往集中于几个书记，特别是集中于第一书记，什么事都要第一书记挂帅、拍板。党的一元化领导，往往因此而变成了个人领导。"①我看，现在这种情况还是蛮多的。政府负责抓经济工作，党的工作、党的建设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但不是直接地要党委领导干预，也不是都要党委领导拍板，还是要集体领导。最近，我问一位省长，你们省的政府工作、经济工作是不是省委也开会讨论？他说，我们省委大约一个月开一次会。那怎么够呢？这是不行的。我在上海市当市长、江泽民同志当市委书记时，我们碰到重大问题、经济问题，都要向市委常委报告，市委至少一周开一次常委会，讨论经济工作。市政府准备采取的重大政策措施、准备进行的重大项目，都要拿到市委常委会上去讨论，常委集体讨论拍板，市政府去执行。这才是集体领导，市委常委都要了解上海要干什么、怎么干法。大家都有一份责任，才能够互相配合，齐心协力去干。现在一些省的集体领导不健全，党政职责不清，成员各干各的，经常发表不同精神的讲话，使底下非常为难。我认为，一个省的经济工作、思想政治工作、文化工作及治安工作都要经过省委的集体讨论，不能个人说了算，决定了以后分头去执行嘛，这样才能避免省长与省委书记不团结的现象。

---

① 见邓小平《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 年版，第328～329页)。

二、经济建设必须依靠党的建设

第一，我们现在是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是搞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就要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既要坚持改革开放，又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因此，必须依靠党的建设才能保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成。我体会，很多的经济问题，不是一个单纯的政策问题，而是一个政治问题，是党的原则问题。回顾自己参加国务院工作以来，我认为党中央、国务院所制定的经济政策都是正确的，都是经得起考验的。我主管的工作，差不多每一个文件都经过几次修改。但是，实际工作往往又出了很多毛病。很多不是政策本身的问题，而是政策能不能贯彻执行的问题。所以，经济建设必须依靠党的建设。没有党的建设，没有全党的认识一致，没有党风的建设，政策总是贯彻不下去，甚至出很大的偏差，最后还有人来怪政策不好。

搞市场经济，不能没有宏观调控。要用经济手段、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手段调节总需求来保持宏观经济的稳定。最近香港报纸说我是凯恩斯主义者，它不是恭维我，它是批判我。凯恩斯主义的核心就是要有政府干预。香港报纸是用的贬义，意思是不要瞎干预。实际上，凯恩斯主义从30年代到1958年以前，在资本主义经济调整过程中，起过很大作用。因为在30年代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以前，古典经济学的观点都是认为就业和通货膨胀可以自动调节，有一只“看不见 的手”来调节供求，不需要政府的任何干预。但是到了30年代发生经济大危机以后，这个理论被推翻了。出来了一个凯恩斯，他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这本书上讲：资本主义的经济是不可能达到自动平衡的，政府的财政和金融政策能起很大的作用，能够调节国民经济。比如，当供给超过需求时，政府可以拿财力来举办一些公共的工程来增加需求，减少失业。资本主义国家在30年代以后运用凯恩斯这一学说，实行政府干预，确实起了好的作用。但从60年代以后，资本主义国家的情况又变化了，多年采用凯恩斯主义的结果，是失业和通货膨胀同时发生的情况出现了。当时高失业率和高通胀率并存的“滞胀”从一个方面否定了凯恩斯的学说。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资本主义国家工人的生活越来越好，特别是由于工会的存在，给工人规定了很高的工资，成本推动了物价上涨；另一方面，福利、保险制度使得工作的人还不如不工作的人，一些拿退休金和失业救济金的人比工作的人生活还过

得好，谁还愿意干活呢？所以，用财政货币政策扩大需求，并不能解决失业和通货膨胀同时并存的问题。总而言之，现在看起来，从凯恩斯以来，没有市场经济国家的政府不搞宏观调控的。我们当然也应当吸取资本主义国家的这些经验。可见，搞市场经济需要宏观调控，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尤其需要宏观调控。要进行宏观调控，特别是进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宏观调控，需要一定程度的集中统一。没有一定程度的集中统一，政令不通，宏观调控就达不到它的效果，中央的经济政策也得不到贯彻执行。

现在的问题是比较严重的，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政令不通，各行其是。我们三令五申国家控制的产品不能随便涨价，但是有些地方每年都有擅自加价的事，加价的钱用来搞自己的基本建设，这是不行的。这就脱开了宏观调控，增加了企业的负担，扩大了基建规模，国家就无法控制局势。类似的情况太多了。二是政出多门，相互掣肘。部门太多，一个部门一个规定，一个部门一个调，在很多具体执行方面就撞车了。国务院从中协调的工作量非常大，往往一件事情很难作出决定。举个简单的例子，碱厂生产需要盐做原料，碱厂是由化工部管的，盐厂是归轻工总会管的，从去年以来，碱厂希望盐价放开，盐厂希望它自己垄断，各有各的道理，而且一次发动几十个厂长联名写信给我，从去年写到今年，两边信都来了，很不好协调，协调好了回去后又变了。我说部门太多了也是一个问题，部门多了可以反映它的情况，但如果都站在自己立场上的话，事情就不好办了。总还得根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原则，大家来统一认识、统一政策。三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现在看，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审批的效果是越来越小，项目限额不起作用，下面可以化整为零，不需要上面批准。但审批的办法还不能完全取消，事后还能起点作用，将来追查责任的时候，上面有个规定，可以用来处分人。四是本位主义，讲得重一些是地方主义相当严重。要解决这些问题，应该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全党统一认识，树立全局观点，服从政治纪律，在政治上和党中央保持一致。现在，很多政治纪律实行不了，一说要通报处分谁，很多讲情的人就来了，好多政策贯彻不了。

第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全党认真地贯彻民主集中制，加强党的决策的民主化和科学化，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保证党的决策能

够贯彻落实。民主集中制，首先是作决定的时候要民主化、科学化，让大家发表意见，但定下来后要保证决定的贯彻落实。现在的问题是很多真实情况反映不上来，很多同志批评我们老是坐在上面，也不下去听听现实的情况。说老实话，我们下去也不少，一个月至少出去两次，但问题在于下去的时候前呼后拥，好像听不到多少真实情况，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有时只好搞一点"突然袭击"，不到地方安排的农户家里去看。也不是不相信地方，地方也未必是认真地去布置的，但是好多情况都是下面的基层干部事先安排好了，使我们很难听到真实情况。我们还是应该提倡说真话，如果真实情况反映不上来，确实使决策难以正确制定。我认为，我们应改革一下地方的接待工作，不需要这么多人陪嘛，需要开什么座谈会就找什么人来。只有能听到真实情况，才能作出正确的决策。全党都应该提倡这种作风，才能真正贯彻民主集中制。

第三，当前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特别需要全党反腐倡廉。现在的问题非常严重，在台面上往往听不到真实情况，但在下面听到一些情况，确实令人感到担忧。腐败的问题相当严重，我把它概括了一下：一是贪污、行贿，触目惊心。特别是我管的这几个部门，问题相当厉害，每天都看到很多简报，反映银行、财政、税务系统的问题，一个人动不动就是贪污几十万元、几百万元，几千万元的也不少。现在好像不拿钱就不能办事。如果不把腐败问题看成是我们当前经济工作中的一个巨大毒瘤来清除的话，经济工作就搞不好，也搞不下去了。所以，必须把这个问题看成是非常严重的犯罪来予以打击。中央讲了，这个问题就得从严、从重地判处，有的就得依法枪毙。二是道德败坏，廉耻沦丧。个别高级干部道德堕落已极，嫖妓女、搞姘头、挥霍国家的财产。有个省的安全厅厅长在他儿子开的妓院里嫖妓女，这怎么得了呀！这个问题相当的严重。三是帮派拉拢，结党营私。提拔亲信，拉帮结伙，出了问题查不下去。有的书记直接抓组织部门工作，别人都不能过问，只有他一个人说了算。用人不经过组织部门正常的考核、选拔，任人唯亲的情况越来越严重。

一些庸俗的风气，使得上述现象越来越严重。第一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漠然处之，和稀泥。有些人认为这种事太多了，治也没法治，心里实际上还是很痛恨，但感到也无能为力。当然，人民群众是痛恨

这种现象的。我也收到了许多人民来信，都是告发贪污腐化、结党营私的。第二是支持或默许一些坏人为本部门谋利益，随便就可以给他们封个官。这些人原来都是一些个体户，或者是坏人，现在摇身一变成为大企业家了，国内外到处跑。我的讲话都是有所指的。第三是对要揭发的事情弄虚作假，顶着不办，以各种理由不让查办。这种风气如不及时纠正的话，我们查处贪污现象就搞不下去了，我们这个党就很危险了。据说，现在有的人不知在外国银行里存了多少钱，炒期货，炒股票，赔了算公家的，赚了塞入自己腰包，然后存到外国银行。他们都有护照，随时可以逃跑到境外。对这些不狠狠打击、不在全党动员开展反腐败斗争是不行的。

当然，上述现象是我们国家在这样一个历史发展阶段所难以避免的。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观念有很大转变，逐步地实行市场经济后，很多的观念跟过去不一样了。我们允许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但我们又讲共同富裕，不能用非法手段来致富。人们的思想在过渡时期难免要混乱，很多“向钱看”的情况甚至比资本主义国家还厉害。而在这个过程中间，国家的很多管理机制也不健全。对如何避免地区之间、城乡之间、工农之间收人差距的扩大，我们都缺乏一些法律制度来调节这些矛盾。市场放开了，但市场管理的机制不健全、不规范。所以，我认为，现在出现这些混乱现象在一个时期内也不要大惊小怪。应该说，我们党是完全有能力来解决这个问题的。我们历史上碰到的困难比现在大得多，我们都解决了，难道这个困难不能解决吗？完全可以解决。有人说，我们这个贪污腐败现象比资本主义国家的还厉害。这样说是不对的，只能说某些现象很厉害。我们知道，香港行政当局在70年代前是腐败透顶的，警察总监本身就是公开受贿的，无法无天，后来不也是逐步通过法制把问题解决得比较好了吗？我想，我们也是完全能够解决这个问题的。我们除了狠狠打击腐败现象外，不能因为“法不责众”而包庇，要克服种种阻力，认真地办案，严厉地打击。

我们应该提倡转变社会风气。我想应该有三个层次：一是共产党员应该有无产阶级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高尚的党性修养。这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应该进行这方面的教育。现在有些人已经丧失廉耻了，他们还挂着共产党员的招牌，跟他们谈什么共产主义呢？只有

开除党籍！上次我们中央政治局常委谈到中纪委办的一个案子，东北地区某市委副书记兼政法委书记家里被小偷偷了几万元，他不在乎，也不报案。后来一查，他是在那里倒股票。据我所知，现在党的高级干部里面，副部长、副省长以上干部倒股票的不乏其人，别人送的股票自己不拿，让儿子、女儿拿，一拿就是一万、几万股。大家知道，原始股票最后是很值钱的，等股票上市后，一出手就可以得到几倍或更高的收益。这位市委副书记夫妇俩每天晚上戴上面罩，变成“蒙面大侠”，到市区阴暗角落里去倒卖股票认购证。这个事情讲起来，我们觉得非常奇怪，他怎么会堕落到这种程度？这种人真有，还真不少。这些人不开除出党怎么得了呀？还能够姑息他们吗？改革开放必然会带来一些糟粕，但只要我们党的肌体是健康的，我们就可以抵制这些东西。如果从内部腐烂了，那就不行了。所以，在我们党内确实还应该提倡每一个共产党员树立无产阶级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不能讲“一切向钱看”。二是在广大人民群众中间，应该提倡为人民服务的优良品德。为人民服务现在好像讲得太少了。最近，我们提倡学习孔繁森①，无论如何要转变社会风气，恢复到为人民服务的轨道上来。现在似乎没有钱就不能办事，拿了回扣去改善机关的生活，这种办法是不行的。以薪养廉，我主张机关干部要提高工资，机关干部再不提高工资，将来愿意留在机关的会越来越少了。所以，机关干部应该提高工资。但是，不精减政府机关的人员，不提高政府机关干部的素质，工资也增加不了。现在机关干部如果要提工资，我认为两三年内至少要提高一倍，但得减一半人才行，不然没有钱发。所以，给机关干部提工资是应该的，也是以薪养廉。但是，还是应该提倡为人民服务。三是在职工中提倡热爱工作、遵守纪律。现在劳动纪律松弛，就靠发奖金做“好人”。外国都在提倡敬业乐群，我们至少应该热爱自己的工作，要遵守劳动纪律。要转变社会风气，不能一切都“向钱看”。在这方面，我们还是要多做一点工作，包括讲党课。我们要转变社会风气，必须从党内带头开始。如果我们不能以身作则，我们的高级干部带头挥霍，是不得了的。

---

① 孔繁森，先后于1979年、1988年两次赴西藏自治区工作，1994年因公殉职时任中共阿里地委书记。他被中共中央组织部追授“模范共产党员”、“优秀领导干部” 称号。

总之，我认为，只要我们重视这个问题，也认识到上述现象是过渡时期的必然现象，最终我们是可以解决这个问题的。但我们要进行艰苦的工作，要转变社会风气，提高大家的思想认识。党中央在反腐倡廉问题上的立场是非常坚定、坚决的，是毫不动摇的，是什么也不怕的，大家应该放心。现在就是需要我们全党统一认识，统一步调，去做工作。

银行业要加强经营管理

(1995年6月19日)

1995年6月15日至19日，全国银行业经营管理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出席会议的有人民银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分行负责同志，各经济特区分行负责同志，各副省级城市分行负责同志，各政策性银行负责同志，四大专业银行、股份制银行负责同志，中央国家机关有关部委负责同志。这是朱镕基同志在会上讲话的一部分。

现在，我国银行业发展正处在一个重要的转变时期。这个转变就是在过去两年金融体制改革和金融秩序整顿取得很大成绩的基础上，提出一个新的战略目标，即把银行工作重点转到加强经营管理和提高资金使用效益上来，尽快把国家专业银行办成具有国际先进经营管理水平的商业银行。

商业银行是经营货币的金融企业，要建立“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担风险、自我约束”的经营机制。现在，我国银行的不良贷款，占全部贷款的比例大体上是20%左右。其中，收不回的坏账占全部贷款的比例是3%左右，随着企业破产的增加，坏账所占比例还会加大。这就告诉我们，银行再不改善经营管理，将来无法向党和人民交代。因此，各家银行要认真执行国家的方针政策，在提高资金使用流动性、安全性的基础上，努力提高盈利水平。银行要考核盈亏指标，要限期扭亏为盈，一年亏损“黄牌警告”，两年亏损通报批评，连续三年亏损，行长“退位让贤”。同时，我们也要看到，扭亏不是银行一家的责任，需要一定的外部条件：一是企业改革要配套，二是行政干预要减少。各级政府、任何单位、任何人都要关心和支持我国金融业的健康发展，不得强迫银行贷款。银行也一定要坚持原则。党中央、国务院坚决支持银行依法自主经营，认真提高贷款质量。

商业银行及其他各种金融机构，要不断改进服务质量，增强为客户服务的意识。最近，国务院决定选择1000户国有大型企业，建立以资

金运行为主要内容的信息网络。这是一项加强对国有大型企业宏观管理的重要措施，各级银行要重视和坚决做好这项工作。

为了帮助银行改善经营管理，对有些问题要加以研究、改进：一是使专业银行的存、贷款利差保持在一个合理水平，二是备付金结构可以做一些改变，三是降低存款准备金率和明确财政性存款的划分。以上问题，请人民银行总行统一研究，逐步加以解决。

这几年金融业发生的一些诈骗、贪污案件中，损失的国有资产相当惊人。这些案件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个人贪污数额大，几十万元、几百万元、几千万元的都有；二是年轻人作案比例高；三是金钱铺路，集体作案；四是诈骗案数目上升。现在市面上，假钞票、假增值税票都出来了。犯罪案件增加，有社会原因，但和银行内部管理松弛、员工素质较低关系很大。只要加强领导，严格制度，强化管理，加强对职工的教育，很多案件就可以避免。我一再强调，凡是发生大案要案的银行，都与银行领导的官僚主义、不负责任有关，一定要追究银行主要领导的责任。

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反腐败是非常坚决的。如果银行干部在威逼利诱之下，敞开银行金库大门，那怎么向党、向国家交代？刚才，我会见了全国金融系统英模代表。他们确实是英雄和模范，在歹徒抢劫银行时能够挺身而出。像刘玲英①等同志，他们宁愿牺牲自己，也要保护国家资产；他们能够坚持原则，按政策办事，不讲私情；他们爱行如家，一心为公，具有共产主义的高尚思想品质。我们要向他们学习，向他们致敬！银行系统应该弘扬这种精神，学习这种精神。对这些同志和他们的家属要十分地关心，要安排好他们的生活。我们一定要提倡这种风气，绝不能在金钱面前吃败仗，在歪风邪气面前低头。

---

① 刘玲英，浙江省云和县云和镇信用社局村分社会计。1993年12月22日中午，一名歹徒手持尖刀，闯入信用社拒台内逼她交出金库保险箱钥匙。她宁死不屈，身中31刀，昏迷6天6夜后脱险，被评为全国劳模，当选为中共十五大代表。

银行改善经营管理，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人才队伍和领导班子建设。没有一个坚强的领导班子，没有一批人才，什么事情都搞不好。要积极培养和选拔各种金融机构的经营管理人才。要认真培训、大胆使用年轻干部，没有一批有知识、有朝气、锐意改革的干部，银行改革和整顿难以完成。各家银行在培训人才方面要下大力气。

我希望各级银行负责同志，在去年宏观调控、金融改革取得重大成绩的基础上，再接再厉，继续深化改革，全面提高银行经营管理水平，向国际先进管理水平看齐。

关于北京市的经济工作

(1995年7月1日)

这是朱镕基同志关于北京市经济工作的批语。

泽民①、李鹏同志：

北京市要找我谈经济工作，我于6月27日开了一个很小范围会议，听取了尉健行①、李其炎①、张百发①同志的汇报。总的看，北京市经济比较稳定，没有什么大的问题，市里开了一个要钱的单子，由于情况说不清楚，我请他们和综合部门对清口径后，两个月后再来谈一次。我对北京市的经济工作，根据你们多次讲过的精神，讲了几点意见：一是要端正首都建设的方向(是政治中心，不是工业、商业中心)；二是要端正北京市的服务对象(首先是党中央、国务院和职工、市民群众，不能只盯着外国人和高消费者)，调整产业结构；三是要顾全大局，带头和中央保持一致(不要在中央加强宏观调控时，鼓吹“大手笔、大文章”、“解放思想没有限度”、“防止经济过冷”等)；四是发展是硬道理，但首都需要稳定，规模不能太大，职工要保障生活，预定今年要出台的公用事业涨价措施应推迟到明年。

健行通知表示赞同这些意见。特报请审示。

朱镕基

---

①泽民，即江泽民。尉健行，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李其炎，当时任北京市市长。张百发，当时任北京市副市长。

泽民、李鹏同志：北京市要找我谈经济工作。我于六月廿日开了一个很小范围会议，听取了尉健行、李其炎、张百发同志的汇报。总的看，北京市经济比较稳定，没有什么大的问题。市里开了一个要钱的单子，由于情况说不清楚，我请他们和综合部门对清口径后，两个月后再来谈一次。我对北京市的经济工作，根据你们汇报提纲多次讲过的精神，讲了几点意见：一是要端正首都建设的方向（是政治中心，不是工业、商业中心）；二是要端正北京市的服务对象（首先是党中央、国务院和职工、市民群众，不能只盯着外国人和高消费者），调整产业结构；三是要顾全大局，带头和中央保持一致（不要在中央加强宏观调控时，鼓吹"大手笔、大改革"、解放思想没有限度，防止经济过热）；四是发展速度适当，但首都需要稳定，规模不能太大，职工要保障生活，并且今年要出台的公用事业收费价格措施应推迟到明年。

尉健行同志表示赞同这些意见。特报请阅示。

朱镕基

今年以来，在党中央、国务院的领导下，经过全市人民的努力，首都形势总的讲是好的。特别是4月份，党中央对北京市的工作做出了重大决定和重要指示，为我们指明了方向，有力地促进了首都的改革、发展、稳定。4、5月份我市财政收入完成了21.3亿元，同比增长20.6%，增幅比去年同期高11.6个百分点。当前全市人民思想统一，精神振奋，正在从北京的实际出发，坚决落实中央的各项方针政策，集中力量把经济搞上去，促进社会的全面进步。

下面我汇报两个问题。

一、1～5月份北京市国民经济情况

从1～5月份情况看，全市经济运行基本良好。主要表现在以下六个方面：

值得纪念的两年央行行长经历

(1995年8月28日)

这是朱镕基同志在与中国人民银行金融法律高级研修班学员座谈时的讲话。1993年7月2日至1995年6月30日，朱镕基同志兼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

这次中国人民银行举办的金融法律高级研修班办得很好、很及时。大家讲了许多很好的意见，这对统一银行系统的认识大有好处。我当中国人民银行行长两年，在座的各位行长都是这两年来与我一起共事的同志。大家每个月给我写报告，我也很认真地拜读，跟大家一起学习金融业务知识。这段日子不管是对我，还是对同志们，都是值得纪念的。

这两年中，在党中央、国务院领导下，在中央6号文件指引下，同志们在整顿金融秩序、深化金融改革、严肃金融纪律、严格金融监管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金融系统有了很大的变化。两年来取得的成绩在中国人民银行的历史上，或者说在金融系统的历史上，是值得纪念的。在这段时间里，我们把中央银行的职能明确了下来。过去，我们人民银行各分行在很大程度上是帮助各地党政领导筹款的机构，帮助他们上项目，一度错误地认为自己的任务就是怎样能使地方经济高速发展。但是对如何才能使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地发展，对如何才能保持货币稳定、不要导致通货膨胀这一点认识得不清楚，热衷于批条子，搞具体的事务。两年来，我们深刻地体会到金融对宏观调控的重要作用，体会到必须把对金融机构的监管当做我们的首要任务。应该说，两年来，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根据中央6号文件的精神，我们做了大量的工作，在中国人民银行的历史上翻开了新的一页。同志们都是有功的，尽管有的做得好一些，有的差一些，甚至有缺点、有错误，但功绩是不可磨灭的。我们一辈子能做这么几件工作，也算对得起国家、对得起人民了。

应该说，这两年金融秩序确实是大有好转。如果还是照两年以前那个趋势发展下去，一年票子发行量翻一番的话，一发就是一千几百亿元，国民经济很快就将难以收拾，更谈不上持续健康发展，快速发展也没有了。现在情况大不一样，应该说，到目前为止，金融形势相当好，当然也不能过分乐观。原计划今年上半年最好能回笼货币200亿元，实际上我们净回笼货币285亿元。我原来提出的目标，即把货币发行量控制在1000亿元以内还是有希望实现的，也是有可能实现的。如果能这样，今年保证把物价增长指数控制在15%，明年保证控制在10%就大有希望。

我们在外汇管理体制改革方面取得的成绩举世瞩目。1993年7月宣布我兼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时，外汇储备只有180亿美元，现在是700多亿美元。虽然今年下半年出口也可能掉下去一点，但是外汇储备肯定会超过700亿美元。700亿美元比180亿美元，增加了500多亿美元，这相当于4000多亿元人民币。目前尽管出现了通货膨胀，但是外汇储备达到这种状况，我们心中不慌。最近，香港报纸刊登美国财政部发表的报告，对中国出现的国际收支大量盈余表示关注，实际上是对中国国际收支状况的改善、外汇储备的大量增加表示肯定。这份报告同指出，虽然中国政府没有操纵市场汇率，但是美国政府仍期待中国政府进一步放宽外汇交易限制。这表明美国已经公开承认中国没有干预市场汇率。当然，完全没有干预也不行，当外汇盈余多时，不收购就要出现外汇黑市。特别是外国的投资这两年很多，进来那么多外汇，不让换成人民币，就会到黑市上去，汇价就不稳定了。看问题要作历史的分析，现在有一部分同志不了解情况，生吞活剥地理解外国的东西，说外汇太多是失策，推动了物价的上涨。他们把成功的事情说成是一个缺点，叫人哭笑不得。外汇储备增加500多亿美元是天大的一件好事，几辈子都没想到有这么好的事情，怎么把它说成是缺点？当然，我也不是说外汇储备增加一点没有推动物价上涨，但那不是主要原因。通货膨胀的主要因素是基本建设和消费基金过度膨胀、粮食供销失衡，推动整个物价上涨。搞那么大的基本建设规模、发那么多奖金，就是靠发票子，又没有效益，通货怎么能不膨胀？！不是外汇储备占款起了多么大的作用，推动了物价上涨。我们不能完全不干预市场汇率，不能不收购外汇，否则，情况一发不可收拾。现在人民币币

值稳中有升，非常坚挺，巩固了大家的信心。同志们，特别是我们各家银行的行长，你们一定要立场坚定地坚持这种观点。我们的外汇储备并不多，不能认为能够维持三四个月的进口需要就算够了。如果那么算，我国台湾地区、日本就不需要那么大的外汇储备。这里还有政治因素在里面，这是“政治储备”，是国家经济实力的标志，这个不是用几个月外贸周转算出来的。我国台湾地区外汇储备1000亿美元，日本外汇储备950亿美元。世界银行的报告说中国的外汇储备是充足的，但不是过多的，因为中国的外汇储备增加有暂时的因素，大量的投资进入中国，1993年是270亿美元，1994年是330亿美元。相当多的外资进入是在1992年签的合同，其中大量的是搞房地产、搞泡沫经济。另外，外贸增长主要靠的是汇率并轨的刺激，出口靠刺激上去了，以后不一定会增长那么快。

回顾这一段历史，我们在改革中跨出了很大的步子，现在我们还在跨新的步子。比如办城市合作银行，接着办农村合作银行。我们一方面整顿金融秩序，另一方面鼓励金融机构走向市场。金融监管已逐步加强。我们要把注意力从筹集资金转向开始加强监管，有些地方做得好一些，有些地方做得差一点，这些问题都会逐步得到解决。随着国有企业改革经营管理机制，真正实现自主经营、自负盈亏，银行的商业化、银行的改革也将跟着深入。我们已经立了法，《商业银行法》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强令银行发放贷款。为了争取写上这一条，我们费了很大的劲，得到了立法机关、各级领导 同志的理解。《商业银行法》还规定，擅自设立商业银行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商业银行法》把我们这两年进行的改革法律化、规范化，这就好办了。

最近，外国反贪污廉政组织把中国评为世界上贪污最严重的国家之一。按廉政顺序排国家名次，第一个是新西兰，第二个是新加坡，第三个是荷兰，中国列倒数第二。我绝对不同意这个评价，它带有极大的偏见，但我们的问题确实不少。金融必须有法制，必须立法，对金融监管要铁面无私。如果金融不能走上法治的轨道，整个国民经济不会有什么秩序的。如果有钱就能办事，钱随便就出去，国民经济不一塌糊涂才怪了。我们这两年整顿金融秩序很有成效，但有的同志说，金融系统出现的大案要案、贪污腐化越来越厉害，我不承认这个说法。大家不要只看现象，大案要案确实越来越多，但是仔细看，这些

案子全是以前发生的。案子越来越多说明我们查得严格，抓得很紧，把过去那些查不下去的案子查下去了，动真格的了。你们都有功，你们在党中央领导下，在中央银行领导下，认真查处各类案件，很有成绩，做了大量工作，要继续坚持下去。要看到自己的成绩，金融秩序正在好转。当然，我不否认在宣布银行工作人员“约法三章”①以后还有人顶风作案，有个别省的银行还相当严重，胆大包天，目无法纪，一个案子涉及几十亿元资金，但从全国范围讲并不多。应该看到，我们严肃金融纪律、整顿金融队伍，成绩很大。我们的队伍很有希望，是一支很好的队伍。

---

① “约法主章”，指朱镕基同志在1993年7月7日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提出的“约 法三章”，见《金融工作“约法三章”》(本书第一卷)。

我现在不当中国人民银行行长了，但是还主管金融工作。现有副行长中有几位到了退休年龄，或是快到退休年龄，大部分人还要继续奋斗。但不管当不当行长、在不在这个岗位上，我想我们大家要继续为中国的金融事业奋斗到底，当然包括我本人。我还在继续学习，当年我学的是工程，没有学金融，还要从ABC开始学。我希望同志们即使离开行长的岗位，也还要关心中国的金融事业，继续进行调查研究，根据你们几十年的工作经验提出改进金融工作的意见，帮助我们把金融改革进行到底，使中国金融事业能够真正达到世界先进水平，大家来共同努力。我把今天和大家见面作为一个纪念。继续工作下去的同志，即使我不当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我们今后见面的机会还是多的。退下去的同志，今后见面的机会也许少一点，但是我们的心还会在一起。我们曾经共同工作，这两年总是不能忘记的。希望大家共同努力，把工作做好。

另外，银行系统反腐败很有必要，目前腐败现象非常严重。特别是违反金融法律法规的问题，是在某些地方党政领导支持或是强迫下干的。我相信这种干预随着《商业银行法》的实施，会逐步减少。我讲这个话的意思并不是说我们银行要脱离地方党政领导，我们欢迎地方党政领导指导银行的工作，但是银行有银行的业务，银行有银行的规章制度，不能违反规定，按长官的意志去做。主观意志往往是错误的，不符合市场规律，最后造成大量的不良贷款，还是把损失转移到

老百姓身上，促成通货膨胀。这一点要跟地方党政领导讲清楚，不要干预银行业务，他们的意见银行要认真考虑，按照国家规定去做。银行要改善自己的服务，加强调查研究，把服务搞好，不要变成“老爷”。现在贷点款难得不得了，或者把资金转移到别的渠道，高利贷放出去，这就不好办。这样下去，我们银行将会真正脱离地方党政领导、脱离群众。如果又腐败、又搞特殊化，我们将有负于党和人民的重托。对反腐败、廉政问题，我们银行的领导同志还要给予更多的重视。

最近国务院多次开会，李鹏同志主持，研究银行要推行一个制度，行长实行三年任期轮换制，在一个地方待久了不行，好多问题自己难以控制。行长三年交流轮换是日本银行的制度。海关总署已发了通知，税务部门也要实行。中央银行准备向国务院汇报，要普遍建立这个制度。今天跟各个专业银行行长打个招呼，也要实行轮换制。我希望这件事不要造成人心惶惶，这样做有好处，一些具体问题要想办法合情合理地解决。有些同志提出，可以跨省市调动，也可以在本地区跨行业调动，这也可以研究一下。我希望不要引起大家思想上的波动，这不是针对哪个人的，而是为国家长治久安考虑。先把轮换制度建立起来，从现在算起，三年为一个任期，任期满后，行长就应交流轮换。在中国银行海外行，这个制度也建立了。同志们要考虑一下大局，具体问题具体研究解决，使这个制度能够推行，尽量减少副作用。

认真做好棉花收购工作

(1995年9月6日)

1995年9月4日至6日，国务院在北京召开全国棉花工作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各产棉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人民政府主管棉花工作的负责同志，以及计划委员会、经济贸易委员会、供销社及棉麻公司、农业厅、纺织局、工商局、农业发展银行的负责同志。这是朱镕基同志在会上讲话的主要部分。

全国棉花工作会议就要结束了。我把与棉花工作有关的一些问题再讲一讲，以进一步统一认识。

一、对今年棉花形势的估计

首先，要肯定去年的棉花工作和棉花购销体制改革的成绩。大家都知道，1991年抓了一下棉花质量问题，1992年的棉花质量有明显好转，但是1993年又出现了大的反复，掺杂使假达到惊人的程度，结果这一年的棉花仅收购了5000多万担。怎么过日子呢？靠动用1000万担国家储备棉和进口1000万担棉花才渡过难关。在这种形势下，党中央、国务院才决定对棉花实行“三不”政策，即不放开市场、不放开经营、不放开价格。在执行过程中，有些同志想不通，说我们又搞统购统销，但是我们没有动摇。现在看，执行的结果还是好的。预计1994年度收购棉花6300万担，比1993年度多收1200多万担；棉花质量状况也比过去好了，但还有虚高等级的问题。总的看，棉花质量大大改进了。这就说明，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是正确的。不是说我们对“三不”那么有感情，特别喜欢“三不”，就是反对放开，不是这个意思。放开要有一定的条件。我去年反复讲过，我也翻了书，学习邓小平同志的著作，学习经济学，进行了大量调查研究，开了很多座谈会。我当时讲过，必须具备五个条件才能放开市场。那就是一要有立法规范的市场体系，二要有完善的质量监督体系，三要有健全的市场信息体系，四要有必备素质的管理人才和相应的全民教育水平，五要有适当的宏观调控手段。另外，实行市场经济的国家，对重要的农产品，也

不是全面放开的，而是有严格管理的。目前的情况是棉花少，供求总量不平衡，越放开，价格就涨得越高。如果现在宣布提价，增产也要一年后才能见效。在长达一年的时间内，棉花价格就会暴涨，纺织厂就无法维持生产，再加上投机倒把、囤积居奇，情况会更坏。现在棉花资源比较紧缺，农民种田的积极性有限，各方面都把精力放在搞房地产开发、城市建设上去了，根本问题在这里。没有必要的生产和流通条件，农民没有种田的积极性，光提个价，棉花生产马上就能上去了？老实说，如果像1984年国家有8800万担棉花库存的话，还可以考虑放开。现在只有800万担国家储备棉库存，一点调剂余地也没有，放什么？放不得，放了就要“天下大乱”。实践证明，目前只能采取“三不”政策。不采取这个政策，我们就过不了供求总量平衡这一关。过不了这一关，经济上就要遭受重大损失。现在，棉花到手了，收购量比上一年多，基本保证了纺织生产的需要。“三不”政策是成功的，出的毛病并不大。

有的同志说，去年抓棉花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但也付出了很大代价。我知道山东省就下了很大工夫，抓得很紧，不准私商私贩收购棉花，宣传工作也做得非常充分。有的同志说付出了很大代价，主要是指行政命令，搞得急了一点，有这个问题。所以说，前期收不到棉花也不要过于着急，因为农民要看一看形势，看到后来市场还是不放开，结果他还得把棉花卖给供销社。另外一个最大的代价，是抬级抬价太厉害，有些地区甚至抬高两个等级，极大地增加了纺织工业的负担。

今年9月1日开始按新的收购价收购棉花，总的政策还是“三个不放开”。现在各地要求放开的呼声不小，有的地方建议“半放开”，总而言之还是要求放开。我再一次明确，现在不能放开，不具备条件。对棉花形势的估计不要过于乐观，棉花生产后期还要过三关：低温、早霜、虫害。前两年，预计棉花产量很高，到最后并没有收那么多。所以产量不要估计太高，工作还是要兢兢业业，还是要向农民讲清楚，在目前条件下，只有“三个不放开”这个政策才能保证农民的利益。我们要总结经验教训，不要搞得过急，实在不行还可以进口，纺织厂不至于关门。另外，新疆增产棉花的潜力很大，产量远远地超过了现在定的指标，作出了很大贡献。今年要特别注意不要再抬级抬价了，但

也不要压级压价，要严格执行质量监督制度，国务院要派巡视组下去检查，真正按国家的政策把棉花收上来。

二、要正确理解和认真贯彻棉花工作省长负责制

省长负责制不是我们今年才定的，去年改革粮棉购销体制时，国务院文件里就有省长负责制的精神。粮食和棉花省长负责制是要求各地自求平衡，而不是自给自足。我们讲的是自求平衡，省长要过问这件事，要使它取得平衡，不是讲生产出来的棉花自己全部用掉，那不是小农经济吗？那还搞什么专业协作？还有什么经济区域分工？规模效益、批量生产，都没有了。把粮食、棉花省长负责制理解为搞自给自足，指标层层分解到下面去，商品不准出省，这样做太缺乏经济常识了。有些地方的小棉纺厂效益很低，甚至赔钱，耗棉量很大，产品又卖不出去，占压资金，亏损在银行挂账，何必再搞下去？你调出棉花，每担还加30元钱，比你开小棉纺厂效益好。不管是粮食、棉花还是化肥，我们责成省里的负责同志过问这几种产品的地区平衡，自己生产多少、需要多少，应该到外地去采购多少，出省多少，进口多少等等，这就叫自求平衡，这才是粮食和棉花省长负责制的本来意义。还是按市场经济规律办事，该流通的让它去流通。如果把原来的流通渠道都打断，工厂配棉就没法配，那怎么生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应该说大家都懂一点吧，不要再搞地区封锁了。

这次会议确定了省际棉花调销1770万担，其中新疆调出1200万担，实际上别的省加起来调出也只有570万担。但我很担心这570万担落空，我希望不要落空。棉花产区不要搞封锁，国家制定了经济挂钩办法，销区每购入1担皮棉，在国家定价之外另付给产区30元。我再一次呼吁新疆以外的产区还是要调出棉花，数量并没有多少嘛。

我要特别讲一下，纺织锭子多的省区市，要继续贯彻限产压库促销的精神，不要超产棉纱。这两年，一方面棉花非常紧张，另一方面棉纱超产很多，今年上半年棉纱超产180万件。现在纺织厂资金紧张，为什么？就是超产的棉纱卖不出去。所以，棉产区要大力提高棉花产量，尽量把棉花调出去，不要发展设备落后的小纱厂，一定要限产压库。棉产区自己把棉花都用掉，棉纱又销不出去，效益并不好。销区呢，也要下很大力量限产压锭，不能再超产，超用的棉花要扣回来，

也不能占压流动资金再增加贷款，更不能鼓励超产。新疆棉花多，办纺织工业的积极性很高，要引起注意。新疆搞纺织工业可以，但要搞最新式的现代化设备，产品要达到能够出口的标准。不然的话，现在增加纱锭，最后产品销不掉，包袱又背上了。

三、在棉花收购问题上要总结去年的经验教训

关于价格政策。我们一定要坚持棉花由国家定价。各地要和中央保持一致，不要各行其是。各行其是的弊病很大。有三个省在国家规定每担标准级皮棉收购价格700元的基础上，又分别另加100元、100元和160元。这样做是自己为难自己。你的棉花怎么卖得出去？比国际市场的价格还高，你那里的纺纱厂用得起吗？国家定的每担700元的收购价格不是随便定的，除了新疆是个特殊情况，生产成本低，700元对新疆是高了点，其他地方700元不低也不高，国际市场也就是这个价。在目前情况下，国内收购价不能再高了。因此，那三个省的做法一定要纠正，不管有多大困难也要纠正，不纠正对你们没有好处，对农民也没有好处，纺织厂更承受不了。棉花生产关键要抓单产的提高。如果单产每亩只有50斤，即使是每担1000元的收购价，种棉花也赔本，所以要抓单产，各方面的条件要配合上去。亩产在100斤以上，每担700元的收购价，棉农肯定有积极性。只靠提价不行。大家应引以为鉴，还是按中央政策办比较主动，不会吃亏。有困难，还可以提出来研究解决。

关于收购资金。刚才听汇报，各地的同志都比较担心。去年银行拿出了1000亿元农产品收购资金，现在查明用在收购农产品方面的只有650亿元，另外350亿元被挪用了，干了别的事情，这是基建规模扩大的一个重要因素。这对推动通货膨胀是多大的力量！对这种情况不整顿怎么行呢？今年5月召开的全国农产品收购资金管理工作会议确定，解决农产品收购资金问题，不能只讲一句“保证不‘打白条’”，还要讲一句“绝对不允许挤占挪用收购资金”。这两条都得讲清楚。农产品收购资金来源于几个方面，财政补贴、价外加价款一定要及时到位，调销粮食、棉花的货款一定要及时回笼，不能延误。附营业务要到农业银行去贷款，不要挤占收购资金。粮食不能搞新的停息挂账，老的要逐步消化，在消化的前提下可以停息，最重要的是不要挪用农产品收购资金去干别的事情。去年挤占挪用收购资金350亿元，今年要求一下子

一点也不挤占挪用做不到，但起码要少打100亿到200亿元。总的要求还是绝对不允许挤占挪用，但在实际安排资金时，银行也难以一刀切下来。今年5月份以后，谁再有新的挤占挪用，一定要严肃查处。现在已经有查出来的，把钱弄去炒房地产、炒股票、办酒店、买汽车，这不行！粮食、棉花是国家重要的商品，怎么能挤占挪用收购款呢？在严格制止新的挤占挪用前提下，农产品收购资金是能够保证供应的。只重视向银行要钱，不重视解决挤占挪用问题，方向不对头。各级党委和政府，一定要注意严格制止挤占挪用农产品收购资金的问题。

市场管理不能放松。无论如何要严格禁止个体户及其他非棉花经营单位插手收购和经营棉花，这一点不能有丝毫含糊。现在已经了解到，有很多个体户认为有机可乘，蠢蠢欲动，筹集资金，准备要打开缺口。所以大家回去后，要宣传中央的“三不放开”政策，要严格管理。刚才我讲了，要总结经验教训，行政干预要注意方式方法，要对群众讲清道理。只要不让个体户和非棉花经营单位插手收棉，就不会有大问题。

今年的棉花质量要好好抓一抓。刚才讲1994年度掺杂使假行为大大减少了，但抬级抬价还是严重的。国务院有关部门的质量监督检查力度要加强，不然的话，棉花收购价提高了，再虚高等级，纺织企业承受不了。

进口工作还要抓紧。今年农产品市场稳定，进口起了很大作用。在这次会议上，我再次表扬外贸、内贸两个部门，包括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去年工作有缺点，耽误了进口化肥，因此去年化肥市场价格抬得很高，影响市场，粮价也上去了。今年为什么还能把粮价稳住？就是因为粮食进口到货1000多万吨，少出口1000万吨粮食，靠这部分粮食把销区的粮价稳住了。今年化肥进口到货1300万吨，主要是尿素，这对稳定市场的化肥价格也起了很大作用。可见，抓进口促进了市场供求平衡，所以今后还是要抓紧粮食、化肥的进口，不能放松。但还要看准时机，在国际市场价格低一点的时候买，高的时候不要买。去年进口棉花1000万担，今年已经订货1200万担，到货600万担，还要继续抓紧，这样国内的棉花价格就上不去。内贸部门、外贸部门和供销社对粮食、棉花、化肥的进口要高度重视，密切注视国际市场行情。

总之，棉花还是供不应求的形势，棉花收购工作要抓紧。棉花收购工作，主要还是靠供销社去做，希望各地党委和政府要加强对供销社的领导、监督，但是不要干预。我在供销总社成立大会上讲过，棉花和化肥这两项购销工作是供销社的主要任务。去年的棉花工作和化肥工作有些问题处理得不理想，今年供销总社成立了，应该有新的气象，把工作做得更好。

新疆发展经济的思路

(1995年9月8日～13日)

1995年9月8日至13日，朱镕基同志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考察工作，先后考察了喀什、和田、阿克苏、吐鲁番地区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一师及吐哈油田等地。这是朱镕基同志在考察期间讲话的要点。

一

新疆我来得比较少，1987年曾到过吐鲁番和喀什。我到国务院工作以后，1993年来过新疆一次，主要是到了北疆；这次来主要是看一看南疆。南疆的发展水平比北疆要差一点，特别是由于南疆特定的情况，稳定问题尤为重要。因此，党中央和国务院的主要领导同志对于南疆非常关心。我来的头天晚上，江泽民同志亲自给我打电话，要我关心南疆的扶贫工作，特别是改水工程，要求我们加以落实。江泽民同志特别关心南疆的稳定，指出南疆还存在一些复杂的情况，国内外一些别有用心的分子利用宗教问题企图闹事。我们在政治上要注意，在经济上要加快发展，改善群众的生产、生活条件，这样才能使我们的边疆从根本上巩固起来。他特别提到不要忽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作用，要帮助兵团解决一些实际问题，因为兵团在巩固边疆中起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我来的头天中午，李鹏同志也给我交代，对南疆的工作要抓落实。所以，我这次来是带着党中央和国务院主要领导同志对南疆的关怀和指示，是来落实这些关怀和指示的。

二

这次来新疆给我的印象，南疆比北疆发展的程度是要差一些，其中最贫困的地方，我看是和田。我在和田讲，应该用这样的定语："富饶而贫困"的和田。从宏观看，和田的环境非常严酷；但是从微观上看，很有希望。它的自然条件超过了内地的某些地区甚至是富裕地区。这么长的无霜期，这么高的积温，这么长的日照时间，加上又有水利灌溉的便利条件，这个地方会是一个非常繁荣、富饶的地区，完全有这个条件。因此，我们对和田或者是南疆的发展，都应该非常乐观、非

常有信心。从和田人民精耕细作、战天斗地的精神来看，是创造了生态的奇观，创造了沙漠中的绿洲这样一个奇迹。怎么利用这个富饶的条件，如何去开发，如何去扶贫，即利用资源开发和自然生态环境，改变贫困的面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与和田地区都有计划，我们都赞成。这是你们多年实践的结晶，要继续朝着这个方向去做。

关于南疆的改水工程，我看了几个地方，在和田看到这件事情正在逐步地落实，而且已经改好了一部分。看了以后，我们非常满意。工程花钱不是很多，农民得到了实惠。修一个水塔，建一个供水房，铺一条管道，接到农民家里。公家出100块钱，农民自己拿150块钱，就把农民很大的一个问题解决了。这件事情等我们回去以后，还要向江泽民同志、李鹏同志汇报。要继续把这个工程抓到底。经过我们检查，中央今年有1.4亿元专项资金用于南疆改水，一定要用这笔钱扎扎实实地把这批工程完成，一定要到位，一定不许挤占挪用。谁挤占挪用，谁就是犯罪，是对人民的犯罪。这一批工程完成以后，要赶快进行下一步的部署，中央再拨出专款来给予支持。这件事一定要拿钱，一定要解决南疆人民群众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现在看起来，只要我们党和政府抓这件事，不用花很多钱，也不是很难。老百姓喝那个涝坝水，实在不能再喝下去了。要关心人民群众生活，这也是稳定边疆，这是“心防”，心里面的国防，能够把边疆人民群众的心抓住了。江泽民同志、李鹏同志，还有上次李瑞环同志也来了，大家都非常关心这项工作，他们特别嘱咐我看看改水工程实施的情况。我们去看了，涝坝看了，自来水也看了，心里感慨万千，这样的事情应该办，应该早干、快干！改善人民的体质对发展整个生产力有好处，你们应该把这个事情抓紧办好。为什么我们把改水工程看得这么重要, 一定要解决饮水问题呢？这是巩固人心的工作呀！人心向背是最重要的。老百姓的心都向着我们，感到共产党时刻关心他们。不要说其他的，连喝水问题都牵动着中央主要领导同志的心，老百姓会为之激动的，这就自然把边疆巩固了。

三

我感到新疆的形势确实是很好的，比1993年有很大的进步，经济实力有很大的增强，就是南疆这样比较贫困的地区也有可能发展得很快，甚至可能会超过北疆。新疆有自己独特的自然条件，发展潜力很

大，发展速度也是非常快的。1993年，我来新疆就讲过一句话：“兰新铁路复线①只要一修通，新疆的经济就要起飞。”今年新疆经济发展速度已经达到11.6%，还不是起飞啊？以后还会更快，新疆发展大有希望。我对新疆工作的评价是：比较稳健扎实，没有什么花花哨哨的新点子，工作不断前进，一步一个脚印。这样的发展是比较稳当的，不是哄起来的。我看，要继续保持这种势头，把新疆的工作做好，把我们的西部边疆巩固，把各族人民团结起来，使各族人民的生活水平有显著的提高。下面，我想讲三点意见。

---

① 兰新铁路复线，是国家“八五”重点建设项目。它东起甘肃武威南站，西抵新疆乌鲁木齐，全长1622公里，于1994年9月全线铺通。

第一，新疆应该总结这几年经济发展的经验，确定新疆经济发展的正确思路。

我觉得，总结这几年的经验，新疆经济发展的思路应该是牢牢抓住“农业是基础，水利是命脉，交通是关键”。抓住这三句话，新疆的经济发展就有了根本保证。如果对这个方针有所动摇，偏离了这个方针，新疆的经济就会遭受挫折。

农业是基础。一个棉花、一个粮食，是新疆经济发展的最大支柱。新疆发展棉花生产，不论从哪一个方面来讲，都是内地不能够比拟的。内地像山东这样的种棉大省，亩产皮棉100斤就不得了了。新疆去年平均亩产是156斤，阿克苏农一师的棉花亩产可以达到270斤。在新疆发展棉花生产，有特殊、有利的自然地理条件。当然，发展生产还要稳住粮食，只种棉花、不种粮食也是不行的。一个粮食、一个棉花，新疆要是把它们种好了，新疆的经济发展就有了坚实的基础。特别是发展棉花生产潜力大，看了南疆，我感到以后我国的棉花供应不成问题了。新疆这几年棉花生产发展得很快，为国民经济作出了十分重要的贡献。如果没有新疆的棉花，国家的棉纺织工业就会遇到很大的困难，这给我们很深刻的印象，新疆的棉花能解决很大问题。

新疆既能发展粮食，也能发展棉花。比较起来，发展棉花对国家最有利。这样可以把关内的棉田腾出来种粮食，粮食可以高产。因为关内棉花不能保证高产，光热条件、气候条件，这些方面新疆都比较优

越，虫害也比较少。所以，中央发展新疆棉花这个方针是不会变的，价格政策也会稳定的。在提高棉花质量、提高单产这个前提之下，棉农的收入还会增加。现在就要靠规模效益来保证农民有稳定的收入，来保证农民愿意种棉花。如果全新疆都能像阿克苏地区一样棉花产量到2000年翻一番的话，就相当于全国总产量的一半了，那就很厉害了，新疆那就富了。你们发展棉花的条件非常好，你们也有开发的规划。为了加快这个规划的实施，我建议创造一种模式，就是农工贸相结合，产销直接见面，把它们联系起来。具体地讲，可以把阿瓦提作为这个模式的试点。阿瓦提准备发展60万亩棉花，我建议把这60万亩中的30万亩承包给上海，或者是天津或者是石家庄。由他们组织纺织厂投资、集资，由他们去招工来承包。到哪里去招工呢？四川省。三峡工程开工后有100万人要搬迁，结合这个工程有计划地去那里招工。你们除了收税，1亩地根据你们的标准收200元、300元、500元承包费，你稳收。按30万亩算，如果1亩收300元，你们就稳收9000万元，财政收入一下子增加9000万元，出差费就有了，你们不是说出差没有钱吗？现在纺织厂的原料是很贵的，我相信他们有积极性到这里来建立自己的原料基地。这对国家、对个人、对县、对自治区、对工厂都有好处。我一直想探索这样一种建立原料基地、稳定原料供应的开发方式，我始终认为这种开发方式应该推广，它可以省掉中间盘剥。外国也是这么做的，很多都是一个集团结合起来搞。过去因为交通不方便，现在中央决定要修南疆铁路。我相信你们开发棉田，第一年开荒，第二年种麦子，第三年收棉花，三年过后，南疆铁路就已经通到你们阿克苏了。那个时候就可以直达，不需要短途运输了，这又可以节省一大截运力。所以，整个规划要连续起来、结合起来，我看是十分有利的。这样阿克苏就可以成为新疆最大的产棉区了。



1995年9月9日，朱镕基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田县布扎克乡察看棉花生长情况。

新疆经济要靠棉花起飞，要在棉花这个方面做文章，把沿海地区的棉纺工业转移到新疆来。沿海地区那些棉纺厂都关门了，设备也不要了，让他们来这里开棉纺厂，发展深加工。另外，生产棉花还可以派生出许多副产品。这样南疆地区就可以很快富裕起来。我相信南疆的前途是非常美好的，希望我们共同努力来实现这个目标。

水利是命脉。要种粮食、种棉花，就要发展水利。新疆人民搞水利是有办法的，劳动人民积累了很多经验，要继续发挥这样的优势。新疆的几个地区都有自己的水利发展规划。我看，不能铺那么大的摊子，不可能都落实。我提出一点意见，供你们参考。第一条，新疆水的问题的解决，不能寄托在有很大的投资上，因为三峡工程一开工，财政拿不出更多的钱来。新疆要解决水的问题，第一个是要节水，这里面大有潜力。要提倡全新疆、全国都学习和田的渠道防渗经验。首先是渠道防渗，然后推广先进的灌溉技术，把漫灌改成微灌等。第二条，对新修的农田水利工程要有个统一规划，排出先后的顺序，绝不能一哄而起、全面铺开。不要搞太大的规模，项目要统筹规划，一个

一个来。第三条，水利工程的项目安排应该向南疆倾斜。额尔齐斯河工程也好，伊犁河工程也好，都是好得不得了的项目，但是，要按照轻重缓急来安排。南疆的水利一上去马上就出棉花，效益大得很啊！南疆潜力很大，只要把水利工程搞好，农业发展不可估量。水利工程要有远景规划，先上哪个水库、后上哪个水库要由自治区平衡，统筹安排，中央给予支持。

交通是关键。我刚才讲的棉花承包，如果没有兰新铁路复线的修通，没有南疆铁路的修通，就不可能实现。1988年我在上海市当市长的时候，到处求情要棉花。当时想派人带一点上海的物资、商品到新疆，与各个县直接挂钩，把棉花弄到手。后来发现行不通，棉花到了乌鲁木齐都压在火车站里根本出不去。现在，中央决定修建南疆铁路了，总长900多公里，投资49亿元。这个钱我们是要花的，南疆铁路一定要修，现在必须赶快立项，做开工前的准备。这条铁路修通后，南疆的建设步伐就会加快了。

第二，要使新疆产业的发展多元化，特别是第三产业，要抓流通、抓贸易、抓旅游。

现在是市场经济，要把第三产业搞活。搞工业要非常慎重。无论怎么说，新疆的管理、技术、干部业务素质都比沿海地区差一些。新疆如果不用最先进的设备来武装自己，是没有办法跟沿海地区竞争的。要调查一下，为什么新疆工业发展速度这么高，还亏损得那么厉害？工业是不能随便搞的，随便搞是要亏损的。我特别强调发展第三产业。我认为新疆在世界上是个神秘的地方，一定可以吸引很多的旅游客人到这里来。现在，吐鲁番的条件这么差，旅馆不行，道路也一塌糊涂。我想让刘仲藜①来帮助你们实现个计划，就是搞一个“新疆五日游”。你们可以跟香港中国旅行社合作，在香港报纸上登广告。简单地说，就是游客乘飞机直达乌鲁木齐，一下飞机，坐上大型豪华旅游车，送到吐鲁番。吐鲁番当地要搞一个国际水平的宾馆，当然也不必太豪华。在吐鲁番可以看交河故城、高昌古城、葡萄沟、火焰山，然后再让游客坐上旅游车，横穿塔克拉玛干大沙漠。横穿沙漠以后再到和田，那里真好看啊！有1500公里的葡萄长廊，还有500年的无花果、500年的核桃树，这些都是奇迹。这样，游客也就是花那么几千元钱，就觉得看到了世界上的奇观。还可以让他们看一看新疆的歌舞表演。

我看，发展旅游业，投资最小，效益最高，还可以提高你们的知名度。紧跟着，一些客商看到有利可图，就都进来了。发展第三产业，新疆是很有前途的，比搞工业要合算得多。我反复地、苦口婆心地讲，把我的舌头都说破了，就是让你们别乱搞工业。搞工业就要有批量，要搞规模经济，要高水平、高起点，有竞争能力。不能再走江浙大规模发展乡镇企业那条低水平重复的路了，现在很多乡镇企业都要淘汰了。

---

① 刘仲藜，当时任财政部部长兼国家税务总局局长。

第三，关于财政问题。

新疆的财政是困难，但不是很困难。你们还是要立足自力更生、发展生产，新疆是有希望的。我可以肯定，三年以后，你们财政的困难就可以基本上缓解了，不会有什么困难，发不出工资的情况就不会发生。同时，我也请同志们注意，新疆的财政问题，有很多方面是历史遗留下来的，不是要谁来负这个责任。实际上就是一句话："食之者众，生之者寡"，即吃"皇粮"的人太多了，搞生产的人太少了。干部太多了，以后不能再那么扩大机构了，还是要贯彻精兵简政的方针。历史的问题不可能一下子解决，但随着生产的发展，要逐步解决。

四

中央领导同志都很关心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我认为，现在新疆能够稳定，是与当初解放军进军新疆后建立了生产建设兵团有很大关系的。屯兵垦殖的政策在中国历史上就曾经有过，比如说左宗棠就采用过这个政策。但是我们的政策与历代的政策有本质的不同。过去的屯兵垦殖政策对内是镇压少数民族，维护封建统治者的政权；对外也曾经抵御外侮，维护祖国统一。今天，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对外起到了巩固边防、维护祖国统一的作用，对内起到了促进内地与新疆交流的作用。历史上早在唐朝的时候，西部与中原就有各方面的广泛交流，现在汉族文化中许多方面受到少数民族文化的影响，中原的文化也传到了各少数民族地区。很显然，没有中原与新疆经济和文化等各个方面的交流，新疆就不可能达到今天这样的发展水平。我认为生产建设兵团广大干部职工应该了解自己的历史，对外

巩固边疆、维护祖国统一，对内维护民族团结，促进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这是一项长期的工作。生产建设兵团有解放军的光荣传统，是一支有严格纪律的队伍，对推动新疆经济发展的作用是不可估量的。特别是生产建设兵团驻扎地区，也是新疆重要的棉花生产基地。生产建设兵团要继续保持人民军队的光荣传统，努力为新疆的经济建设服务。中央对生产建设兵团的政策要保持长期不变，特别是边境地区要靠兵团职工来保卫。在那里，兵团的职工既是当地的居民，又是保卫国防的重要力量。在新疆保卫边疆，光靠正规军队的力量是不够的，生产建设兵团必须发挥应有的重要作用。

云南要把旅游业作为支柱产业

(1995年10月6日～11日)

1995年10月6日至11日，朱镕基同志在云南省考察工作，先后考察了昭通、德宏、丽江、昆明等地。这是朱镕基同志在考察期间讲话的一部分，曾发表于《党和国家领导人论旅游(1978～2004年)》，原标题为《旅游业作为支柱卢业发展大有 希望》。编入本书时，对个别文字作了订正。

云南具有资源丰富、高山景观、亚热带气候等独特的自然优势，在稳定粮食供应的基础上，综合开发有自己特点的热带植物、花丼、水果等创汇农业、食品工业、旅游业以及相应的支农产业，将会形成云南经济的主要支柱，效益会比单纯办工业，特别是污染环境的重化工业要好得多，既能富省，又能富民。把旅游业作为一个支柱产业来发展，大有希望。实践证明，只要抓住人无我有的优势，就能占领市场。云南有丰富的旅游资源，又有那么多少数民族，发展旅游业是大有希望的。云南有许多宝贵的东西，发展旅游业就可以致富。据说，有的人不赞成把旅游作为一个产业来发展。我看，这是落后的思想。如西班牙，国家不大，靠旅游业每年收入上百亿美元。

丽江要高度重视发展旅游业。我们下飞机以后，对丽江印象很好，丽江完全可以发展成为一个重要的国际旅游景点。丽江要致富，除了以农业为基础外，还要发展旅游业，以及与旅游相关的其他产业。这件事要由国家和省里的旅游部门统筹考虑。因为云南的景点很多，昆明、丽江、大理、西双版纳，甚至德宏，应该做一个五日游或七日游的旅游规划，专门吸引国外游客。到什么地方去，要规划一条路线，哪个地方该修旅馆，哪个地方该修餐馆，哪个地方该修厕所，等等。云南是个很美丽的地方，丽江的发展前途也很大，但是要一步一步来。国家也好，省里也好，拿不出这么多钱，要集资，要吸引国内的投资者。那些只想炒股票、期货、房地产的公司，请它们去办旅游好不好？将来适当的时候，云南省可以制订一个旅游业发展规划，通过

发行股票吸引外国的投资。我看只要是有眼光的投资者，应该看到在云南投资搞旅游，回报率会很高，要在这方面多做一点宣传工作。国家旅游局要重视云南旅游业的总体规划，不要忽视丽江这个地方。丽江既有自然景观，又有历史文物，还有少数民族文化，这很难得。丽江作为重点旅游区要有高水平的文艺演出队伍，可以把演员送到东方歌舞团、省歌舞团去培训。丽江地区有困难，省里要帮助它们。总之，把云南省的旅游业发展起来，把它作为一项重要的产业来抓，这是云南各民族群众脱贫致富的一条好路子。

关于京西煤矿问题

(1995年10月15日)

1995年9月，宋平同志、袁宝华同志分别转来反映京西煤矿工人生活困难的材料。这是朱镕基同志关于京西煤矿问题写给江泽民、李鹏、胡锦涛、丁关根、尉健行等同志的信。

泽民、李鹏、锦涛、关根同志，并健行同志：

今年9月20日，袁宝华①同志转来邓力群同志批送的《生产力之声》杂志登载的《别把我们的心改凉了》一文。此前，宋平同志也批来此文。

---

① 袁宝华，曾任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

此文反映了京西煤矿工人的一些困难，多是事实。但是，文章的基调是以偏概全，全面否定改革，许多“情况”与客观事实不符。所谓“现在社会正把工人推向贫困”是错误的。

去年税制改革，煤矿实行统一的增值税率(17%)，确比以前的产品税增加了税负。一经发现，已立即改为13%，同时增加了对亏损企业的补贴(每年17.1亿元)，对盈利企业全额返还所得税。1993～1995年共安排煤矿转产专项贷款70亿元，由中央财政贴息9亿元。因此把煤炭工业的困难归咎于改革是没有根据的。

目前全国每年生产13亿吨煤，其中8亿吨是地方煤矿生产的，是市场调节，没有亏损；5亿吨是中央统配矿生产的。由于历史包袱沉重，机械化成本高而工人又减不下去，开采越来越深，一部分煤矿比较困难，要靠中央财政补贴，东北的北票、鸡西、阜新，西北的铜川等矿还有闹事情况。但总的看，统配矿的形势还是好的，这两年的成绩是实实在在的，坚持转产、减人、提效，形势会更加好转。

对于煤炭工业的特殊困难和我们工作中的问题，今后将予以更大的、特别的注意。至于京西煤矿因属北京市，煤炭价格由北京市定，还需请北京市予以关注，帮助他们解决一些困难。

特此报告，妥否，请指示。

朱镕基

10.15

加强同发展中国家的经贸合作

(1995年10月18日)

1995年10月17日至19日，全国援外改革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出席会议的有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外经贸委(厅、局)负责同志，国务院有关部门、金融机构、有关外经贸企业负责同志。这是朱镕基同志在会上讲话的主要部分。

党中央、国务院历来十分重视援外工作，把援外工作作为我国对外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次会议研究落实改革援外工作的各项措施，将有利于进一步提高对援外工作重要意义的认识，把援外工作做得更好，不断促进我国同发展中国家的友好关系和经贸合作。

今年7月17日至8月5日，我对南部非洲的坦桑尼亚、津巴布韦、莫桑比克、博茨瓦纳、纳米比亚、安哥拉和赞比亚七国进行了一次访问。我是第一次访问这么多非洲国家，获得了许多新的感性认识。我认为，党中央、国务院总结了40多年来援外工作的经验，决定对援外工作进行调整和改革是正确的。今天，我主要讲一讲如何同包括非洲国家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开展经贸合作的问题。

一、巩固和加强我国同发展中国家的经贸合作，把我国同这些国家的关系推进到一个新阶段。

过去，我们把发展中国家也称为第三世界国家，也就是广大的亚洲(日本除外)、非洲、拉丁美洲国家。它们大都处于不发达状态。我国自身也在发展中国家之列，向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援助，可以说是“穷帮穷”；同这些发展中国家开展经贸合作，可以说是穷朋友之间的合作。那么，在国内外形势发生重大变化的今天，这种合作还有没有必要呢？我认为很有必要。

第一，不少发展中国家处于战略要地。亚洲的许多发展中国家是我们的周边国家。把邻居的工作做好了，就能创造一个和平的周边环境，有利于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非洲也是个非常重要的战略地区。在政治上，非洲国家具有重要地位，长期以来是我国外交工作

的重要对象。在重大国际斗争中，非洲国家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都是我们依靠的一支重要力量。在经济上，非洲地域辽阔，自然资源丰富，是一个潜力很大的有待开发的地区。

发展中国家有120多个，其领土面积占世界陆地总面积的58%，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80%。从长远来讲，这是人类潜力和未来希望之所在。

第二，从非洲目前的状况来看发展中国家面临的困难。非洲是发展中国家的主要组成部分，占发展中国家总数的40%左右，领土面积占发展中国家总面积的三分之一，人口占发展中国家总人口的六分之一。发展中国家在政治、经济、民族、宗教、文化、领土方面的矛盾和争端，在非洲国家都有明显的表现。非洲国家大多是在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逐步独立的，它们虽然在政治上获得了独立，但在经济上并没有完全掌握领导权。它们面临着贸易条件恶化、债务负担沉重、资金严重短缺、科学技术落后等困难。莫桑比克每年二分之一的财政预算支出要靠发达国家捐赠。实际上，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命脉还操纵在白人或发达国家手里，这是发展中国家面临的最大困难。经济情况不好，必然影响到政治上的稳定，影响到政权的巩固。这是一个十分严峻的问题。

我国对非洲援助始于1956年，在截至1994年年底的38年间，先后向52个非洲国家提供了173亿元人民币援助，援建了农牧渔业、轻纺、能源、交通运输、广播通信、水利电力、机械、公共民用建筑等项目。其目的是帮助受援国维护民族独立，发展民族经济。项目投产初期的确发挥了作用，但是，目前这些项目都遇到比较大的困难。有些项目处于停工状态，成了受援国的负担，看了很让人担忧。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在政治上需要同其他发展中国家相互支持，在经济上需要与它们加强合作。我们有责任、有义务帮助它们摆脱困境。

第三，发展中国家目前是西方国家争夺的重点。在政治上，西方国家企图左右发展中国家各个党派的政治走向，将西方民主模式强加给发展中国家。在经济上，西方国家把发展中国家拉入各自的经济势力范围，争夺市场、争夺资源、争夺初级产品，企图控制这些国家的经济命脉。这在非洲表现得尤为突出。非洲国家资源非常丰富，有石油、铜、铀矿等。除非洲外，西方国家在中东地区的争夺也很激烈，

因为那里有丰富的石油资源。东南亚地区位于太平洋西端，扼守太平洋和印度洋之要冲，战略地位非常重要。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这里一直是美、苏在亚太地区争夺的重要地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苏联集团”这个对手不复存在的情况下，公然把“民主化”、“人权” 作为援助的先决条件，对发展中国家施加压力，甚至直接进行干预。因此，如何顶住西方的压力，选择适宜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发展政策，是当前发展中国家的一项重要任务。

第四，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培育了我国与发展中国家的友谊。我国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历来重视发展中国家的力量，对它们的作用给予高度评价，并在力所能及的条件下给予它们大量援助。接受我国援助的发展中国家，包括接受一次性或少量物资援助的国家，达到121个，接受经常性援助的发展中国家也有80多个。我国在崇山峻岭之中援建的坦赞铁路，全长1800多公里。为修建这条铁路，我们还牺牲了好多人，是很不容易的。这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以他们的伟大气魄在非洲创下的光辉业绩，从而奠定了中国人民和非洲人民的战斗友谊。但是，我国当年援建的这些企业目前普遍处于亏损、停工状态，有的项目濒于倒闭。如果我们不挽救这些企业的话，那就会使我们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辛辛苦苦培植的友谊结晶付之东流。所以我认为，我们现在对非洲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外交、经济援助与经济合作工作的一个很重要方面，就是把这些企业救活，使之发挥最大效益。我们有几百亿元投在发展中国家，基础非常好。我们有责任、有义务帮助发展中国家把已建成项目搞好，发挥它们应有的经济效益，使我国与发展中国家共同浇灌的友谊之花结出丰硕之果。

二、鼓励和支持我国优秀企业到发展中国家开展各种形式的经济合作，改革对外援助方式，着力培养当地新一代的管理人才和技术专家。

第一，为充分发挥过去由我国援建的大量老项目的作用，克服这些企业目前在经营管理方面的困难，经征得受援国同意，可由双方企业进行合资经营。过去我们向发展中国家援建了一大批项目，这些项目在投产的时候还都是不错的，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后来都遇到了困难，而且困难还比较大。我参观了坦桑尼亚友谊纺织厂，工厂因没钱买原料、交电费，基本上处于停工状态。我确实感到问题需要解决，

如果不解决，那么我们原来的目的就没有达到。我们分析，关键是企业的经营管理问题。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尤其是非洲国家，还没有培养出它们自己真正合格的企业家，还没有培养出一个合格的管理阶层。当然，我们现在也不能说，我们已经培养出来自己真正的企业家管理层。我们现在是有一些杰出的企业家，但也不是很多。把设备买进来容易，把技术引进来也可以，只要有钱，但培养真正的企业高层管理人员没那么容易。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管理人员、职员和工人的素质都较差，不可能把这些现代化的项目运转好、管理好。因此，我们的人一撤，工厂就垮了。同时也应该承认，这些十几年、二十几年前援建的项目，设备确实陈旧了、落后了，到需要更新改造的时候了。所以，要把这些工厂搞好是非常艰巨的任务。这些工厂好多是我们的企业承包建设的。要鼓励我国的企业到发展中国家去，跟他们合资经营。用我们的贷款建起来的项目，到目前为止还钱的受援国还不多。因此，我向他们建议，把贷款的一部分划给我们的企业，由我们的企业还钱，另一部分钱当然还得由受援国还。那么，划多少股份呢？我们提出，51%的股份归中方企业。我同坦桑尼亚的总统、总理都谈了，他们都同意。按国际惯例，那就是由中方控股了。控股后，管理权才能属于中方。董事会任命的管理班子要以中方为主，从厂长一直到班组长都要由中国人担任，然后再抓紧培养当地的管理人才。同时，我们要实行严格的管理；不然，工厂是管不好的。当然，严格管理还需要受援国支持。但是，我们要讲清楚，我们绝对不会抢他们的饭碗，将来这些领导岗位还是他们的。我们的目的是为发展中国家培养新一代的管理人才，把这一代人才培养出来以后，发展中国家才有希望。我认为，这条路是行得通的，要坚定不移地走下去，最终实现管理人员的本地化。对已经选定的重点项目，要抓紧试点，积累经验，逐步推广。第二，采取鼓励政策，推动我国的优秀企业到发展中国家开展各种形式的经贸合作，选择有资源、有市场、有效益的项目，主要是对初级产品进行深加工的中小型项目，在当地建立合资经营企业。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缺陷在于只有初级产品，而初级产品附加值少，钱都被外国人赚去了。推动我国的优秀企业到发展中国家开展各种形式的经贸合作，是有良好条件的。我们拥有中小型企业的技术，我们还有过硬的设备，管理也是能掌握的。我们的这个思路正符合这些国家的经济结构调整，我看是会受到欢迎的。事实证明，发展

中国家光搞初级产品不成，还要发展自己的加工工业。我国企业一定会愿意到其他发展中国家去的，因为有利可图。在坦桑尼亚，南京汽车厂组装“跃进” 牌汽车，长春第一汽车厂组装“解放”牌汽车，销路都很好。我们的汽车价格比日本的便宜70%，当然销路好。开拓发展中国家市场是一个重大的课题，要有一些人好好去研究，要有长远眼光，要提出战略设想和实施步骤，但不能急于求成。



1995年7月24日，朱镕基在津巴布韦考察烟草拍卖行。

我们的企业也要到其他发展中国家开展工程承包。我国有一批海外企业在这些国家开展承包业务，非常成功，信誉良好，前途远大，国家应给予充分支持。这些都有利于我国开拓海外市场，促进我国外贸、外经、外资工作的多元化、全方位发展。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所有企业派出的人员都必须是合格的、有管理和技术业务技能的、守纪律的人才，否则政治上影响很坏。同时，要注意少派遣普通劳动力到海外企业工作，以免与当地劳工发生就业纠纷。

现在我们与非洲的进出口贸易额只是我们进出口贸易总额的1%多一点，只相当于非洲对外贸易额的1.34%，太不相称。我们不去开拓非

洲这么一个广阔的、潜在的市场，那将来外贸怎么搞得上去？外贸出口市场一定要多元化，不然出口可能就要下来。我们自己的劳动力成本飞速上升，再加上西方国家政治上的歧视、出口配额的限制，我们的产品将来出口到发达国家将会越来越困难。把宝都押在美国、欧洲、日本身上不行，不开拓新的市场不行。非洲这个市场一定要开拓，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市场也要开拓。从搞加工贸易开始，它们的税费不高，产品出口到欧洲也没有配额限制。外经、外贸、援外一起上，援外搞企业合资经营，外贸把出口搞上去，大有可为，但必须注意不要一哄而起。

第三，为了支持我国企业与发展中国家的企业举办合资企业，我国将提供由政府贴息的优惠贷款，以部分解决这些合资企业所需的启动资金，并考虑在非洲设立中国银行的分行。当然，有个亏损问题。但是，同志们要有经济发展战略眼光，开始的时候赔钱，发展起来就会赚钱。何况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要挽救那些我们曾经援助过的项目，让它们“起死回生”，这也是政治任务。同志们，如果我们不进入非洲，不但原来的影响都会丧失掉，将来再想进可能站脚的地方都不一定有。我们的资金十分有限，无息贷款一般不再对外提供了。无论是由我国企业同受援国企业合资经营我国援建的老项目，还是我国企业同受援国企业合资经营中小企业，所缺乏的启动资金大部分可以由我国提供政府贴息优惠贷款或通过无偿援助解决。将来，政府贴息优惠贷款主要用来支持我国的企业与受援国企业合资经营的企业。

第四，我们的无息贷款一般不再对外提供后，要适当增加无偿援助的比重。在推动我国企业同受援国企业合资经营企业的同时，继续适当援助建设一些受援国人民能够广泛受益的社会福利项目和公共工程项目。过去我国在发展中国家以无息贷款援建的一些公共设施，发挥了极大的政治影响。我们帮助发展中国家搞的这类纪念碑式的项目还是很起作用的。盖个议会大厦、盖个大礼堂、盖个体育馆，普遍受到当地人民欢迎。如果全部由我们捐助建这些宏伟的建筑，我们还没那么多钱。但我看可以适当搞一些，主要搞一些能提高受援国人民生活水平的项目。我在访问纳米比亚时看到，由中国政府提供无息贷款、中方公司承建的低造价住房工程，为当地贫苦人民提供廉价住房，深受纳米比亚政府和人民赞誉。

总之，同发展中国家开展经贸合作非常重要，大家在思想上要重视加强同发展中国家的合作。这种合作是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相互帮助，既造福于发展中国家的人民，又加强了彼此间的友谊。

祝贺陈岱孙先生九五华诞

(1995年10月19日)

陈岱孙①先生：

① 陈岱孙，经济学家、教育家，曾任清华大学经济系主任、法学院院长，北京大学经济系主任。

欣逢先生九五大寿，本已定于明日登门拜谒，敬贺寿辰，适因公须即日离京，未克践约，怅何如之。

先生年高德劭，学贯中西，授业育人，六十八年如一日，一代宗师，堪称桃李满天下。我于一九四七年入清华，虽非入门弟子，而先生之风范文章，素所景仰。清华经济管理学院成立后，始得求教于先生之机缘，得益良多。

今逢大寿，唯愿先生健康长寿，松柏常青，学生有幸，幸何如之。特此

恭祝华诞

朱镕基

一九九五年十月十九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

陈岱孙先生：

欣逢先生九五大寿，本已定于明日登门拜谒，敬贺寿辰，适因公须即日离京，未克践约，怅何如之。

先生年高德劭，学贯中西，授业育人，六十八年如一日，一代宗师，堪称桃李满天下。我于一九四七年入清华，虽非入门弟子，而先生之风范文章，素所景仰。清华经济管理学院成立后，始得求教于先生之机缘，得益良多。

今逢大寿，唯愿先生健康长寿，松柏常青，学生有幸，幸何如之。特此

恭祝华诞

朱镕基

一九九五年十月十九日



1990年10月20日，朱镕基出席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陈岱孙经济学奖学金”设立仪式，适逢陈岱孙(右一)九十寿辰，当场赠送寿匾以示祝贺。右二为清华经管学院副院长赵家和。

信访工作是体察民情的重要渠道

(1995年10月30日)

1995年10月30日至11月2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在北京召开第四次全国信访工作会议。部分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或政府分管信访工作的负责同志出席开幕式。参加会议的有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分管信访工作的秘书长或办公厅主任和信访部门的负责同志，中央党政军机关部分单位分管信访工作的办公厅(室)主任和信访部门的负责同志，受表彰的先进集体代表和先进工作者代表。这是朱镕基同志在接见与会代表时讲话的主要部分。

重视和关心信访工作，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重视信访工作方面，为我们树立了典范。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对信访工作非常重视，作了一系列的重要指示。我自己也深深体会到信访工作的重要性。



1995年10月30日，朱镕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接见第四次全国信访工作会议代表。

首先，信访工作是我们体察民情的重要渠道。我们现在也下去考察工作，去调查研究。同志们，你们说我们下去看到的都是真实情况吗？应该说能看到一些，但不是那么多。并不是说谁要隐瞒什么东西，或者欺骗我们。好多事情一级到一级，就像过筛子一样，一个筛子比一个筛子细，过滤到你这里也就不多了。很多时候看到的不是那么真实的情况，特别是我们下去考察的时间又很短，所以有很多情况不了解，或者不能完全了解。而信访工作就能够起到重要作用，是真正体察民情的重要渠道。人家写信的时候，往往是匿名信，讲的就是他心里想要讲的话。当然，这些话也许不一定都那么符合事实；但只要有5%符合事实，对我们来说也是很好的一个了解情况的渠道啊! 其次，我认为信访工作是对政策执行情况的及时反馈。政策出台以后引起什么反响？你往往只听到一级一级的干部表示拥护中央的英明决策，而他们是不是都深入到群众中去了解这些政策的执行情况了？不一定。这些政策，特别是经济政策，直接关系到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他们感受最深，一觉得不对头，马上就会通过信访来反映了。因此，从信访工作里面就可以看出我们的政策究竟是正确还是不正确、全面还是不全面，这是及时的反馈。第三，信访工作是我们党，特别是我们党的高级干部联系群众的一个天然的渠道、天然的桥梁或者说天然的纽带。要紧密联系群众，我们应该多交朋友，多听一些真实情况，但是我们处在这个地位，往往又不那么容易交到基层的真心朋友。通过人民来信，你就可以真正地交到朋友了，这样也就能够比较实事求是地把我们的工作做得更好。

我在上海市工作期间，有一次带了一些区委书记、区长到黄浦区的八仙桥菜市场去参观，那个菜市场办得非常好。群众一听我们去了，一会儿就把菜市场包围了。很多人都拿着一封信，要求解决他们的切身问题。有一个老太太，瞧见我过来了，就往我这里跑。警卫人员把她拦住了，她说今天非找朱市长不行，不找朱市长解决不了她的问题。我就朝她走过去说，你不要着急，慢慢讲。她说家里厨房旁边的下水道堵塞已经一个礼拜没清理了，粪水快要冒出盖板了，怎么做饭啊！我说，你放心回去，下午就会有人去清理。如果没人去，你再打

电话找我。这件事，我至今忘不了。我们的基层干部确实应该多关心老百姓的疾苦。那位老太太一定是找过干部多少次，没有人管这些事，最后认为只有找市长才能解决问题。从这样一件小事本身，就能反映出我们与人民群众的关系。

去年我接到一万多封人民来信，这是指直接写给我个人的，不是给党中央、国务院的，也不是给其他领导同志的，是由中办、国办信访局报送我处理的。今年也差不多，每个月大概会收到800封到1000封人民来信。我非常感谢中办、国办信访局的同志们，他们的工作做得非常细致认真。重要的信，他们都是把原信全文送给我看；比较重要的信，他们摘要报送给我；他们还把每月收到的全部来信的处理情况向我作一次汇报。在每个月写给我的人民来信总结报告上，我都批示哪些信要送谁，哪些信要转哪个部门，该怎么处理。今后，我还是希望中办、国办信访局的同志们，你们不要怕我的工作太忙，要尽量地多送一些人民来信给我看。我知道你们转给有关部门以后，许多信往往可能石沉大海。这也不是怪有关部门的同志，他们对有些问题也没有解决的办法。说老实话，我也没有很多办法。但是，我要尽我的责任，我批下去，有关部门总是比较重视一点。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不但是关系到我们党和群众的关系，关系到我们的廉政、法制，也确实关系到我们执政党的生死存亡。就是说，我们听不听群众的意见、帮不帮他们办事、为不为他们服务，这是一个根本的问题。

要把信访工作做好，第一，需要领导同志特别是主要领导同志重视。一把手要重视信访工作。第二，也要依靠全体信访工作战线上的同志们，依靠你们高度的责任感。你们的工作做得很好，你们默默无闻地辛苦工作，为密切党和政府与群众的关系作出了贡献。信访工作是很麻烦的工作，要依靠你们的责任感，才能把事情做好。一般地讲，人民来信里面，只是提出个人要求的并不是特别多，多数还是对我们党和政府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提出批评，特别是对一些坏人坏事的举报。我认为，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衷心地希望，在领导重视和同志们的高度责任感与辛勤劳动下，我们互相结合，共同努力，就会把信访工作推向一个新的阶段，开创一个新的局面。

采取有效措施，促进贫困地区脱贫

(1995年11月14日～19日)

1995年11月14日至19日，朱镕基同志在广西壮族自治区考察了南昆铁路工程建设、百色革命老区与河池大石山区等贫困地区。这是朱镕基同志在考察期间讲话的要点。

我到国务院工作以后来广西是第三次了。1993年来调查研究，去年来救灾，今年来访贫，我确实感到广西在遭受严重的自然灾害情况下，发展还是很快的，各方面的面貌都有很大的改变。当然，目前广西还存在严重的困难，特别是扶贫工作。全区4500万人口，贫困人口有700多万，尤其是大石山区有相当一部分人缺乏生存条件，扶贫的任务很重。

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地区差别较大、贫富差距悬殊，始终是一个很大的社会问题。这个问题如果长期不解决，就会激化社会矛盾，会影响整个经济的发展，这一点现在看来越来越明显了。邓小平同志讲过两句话：一句是允许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另一句是共同富裕。先富起来究竟要富到什么程度，再来谈共同富裕呢？我不赞成某些人的讲法，说只要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贫富悬殊问题就会很快解决。我认为，他们没有体会到贫困地区人民生活的困难。我们都学习了邓小平同志的思想，谁都没有说要以牺牲富裕地区的经济来达到共同富裕。但是我们都是生活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大家庭里面，现在这个大家庭有7000万贫困人口，他们生活非常贫困，分布面很广，而且多是分布在少数民族地区、边疆地区。如果搞不好，就会出现不稳定的事情，会影响整个经济发展的进程。所以，我们要全面地、正确地理解邓小平同志的思想。

贫困是一种历史现象，很多是历史原因造成的，然而新中国成立几十年了，本来应该改变得更快一点，但要很快也难，脱了贫又返贫的现象还很多。我听说，有的农民搬到山下以后不习惯，自己又跑回去了。这里面有民族习惯或生活习惯问题，不是那么容易解决的。我感

到有个根本的问题要解决，就是教育问题、人的素质问题。群众的素质不提高，从外部使多大的劲也不容易产生很好的效果。发展教育还是个根本问题，但企图很快解决这个问题也不容易，需要一定的时间。

关于扶贫，党中央、国务院都有一系列政策。从中央到地方政府，对贫困地区应该尽什么义务、做什么工作呢？我体会，最重要的是：

第一，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国家的重点建设项目应该逐步地向贫困地区、向中西部地区、向内地倾斜。因为沿海地区有它的优势，人员素质比较高，教育、科技等各方面的水平都不是内地可以比拟的，它肯定是先富起来，先发展起来。不这样做，就会犯历史性的错误。搞平均主义，谁也发展不起来。所以，一开始基础设施建设必定是向沿海地区倾斜，向那些文化教育水平、科学技术素质比较高的地方倾斜。在沿海地区发展到相当程度以后，就应该及时地把重点建设、基础设施建设逐步向内地、向贫困地区、向中西部地区倾斜，这并不影响沿海地区的继续发展。重点建设特别是交通运输建设，是内地最需要的，效益也最大。而这些建设对一个地方来讲无论如何是负担不起的。修南昆铁路需要投资150亿元，广西段要50亿元吧，如果叫你广西拿这50亿元不是要你的命吗？只有国家才能拿得出这笔钱。我认为，这是对贫困地区最大的支援。不久前我到云南的昭通地区看了以后，反复地琢磨，只有恢复修建内昆线①，才是帮助昭通地区脱贫的最重要措施。因为它没办法搞别的，没有工业，只有一个烟厂。只要路一通，开放了，商品进去了，技术进去了，管理人才也进去了。天生桥水电站②这样大的项目，没有国家投资也是很难建设的。百色水库要赶快抓紧立项，抓紧做可行性研究，如果这个项目能建成的话，对百色地区脱贫是个根本性的措施。基础设施建设不单是提供税收的问题，而且带动其他产业的发展。从国家来讲，这方面要逐步地向中西部地区倾斜，现在已经有这个条件；从地方来讲，是要帮助搞好项目建设，不要制造麻烦，应该拿出你们的一份力量。国家是这样的一个方针，省里面也是这样一个方针，各级政府都应该这样办。要看到，这是脱贫的一个根本手段。

① 内昆线，由四川内江至云南昆明，全长872公里，是国家“九五”重点建设项目。其中，北段四川内江至安边、南段贵州梅花山至云南昆明于20世纪60年代建成。1998年6月，开始修建云南水富至梅花山、全长358公里的中段，2001年9月全线铺通。

② 天生桥水电站，位于广西隆林与贵州安龙接壤处的南盘江干流上，总装机容量120万千瓦。首台22万千瓦机组于1993年1月建成发电，到2000年年底，一、二级电站10台机组全部建成投产。

第二，国家制定一些有利于发挥中西部地区或贫困地区资源优势的政策。资源包括自然资源、人力资源等等。这些政策要有利于发挥上述地区的优势。例如，中西部地区的矿产资源比较丰富，因此原材料价格要提高，不能把利润都放到加工部分去，这样才能使中西部地区、贫困地区多得益。发电也是这样，水电资源基本上集中在西南贫困地区、少数民族地区，税收制度应该向这方面倾斜，要有利于这些地区的发展，要制定一些政策来促进贫困地区脱贫。

第三，实行转移支付，使富裕地区的财力有一部分向贫困地区转移，我们实行分税制就是这个道理。实行分税制，无非就是使中央能够集中更多的财力来用于转移支付。1994年以前，中央的财政收入只占全国财政总收入的30%，三分之二都在地方。去年进行的财税体制改革，其目的是把全国财政总收入的60%集中于中央。以1993年的地方财政收入为基数返还给地方，地方财政收人基数的利益没有受损失，只是把每个省新增财政收入的70%收归中央，也就是从增加的那部分收入里中央多拿一点。从贫困地区拿上来的有限，因为它增加的收入少，而从富裕地区拿来的比较多，拿它增加部分的70%就相当厉害。贫困地区收入增加的70%是交给中央了，但是中央返还给它的远远超过它上缴的部分。中央多拿的这一块，就是为了实行转移支付；另一方面，也搞一点为全国服务的重点建设项目。尽管今年中央收不到多少钱来用于转移支付，但从明年开始往后，一年会比一年多，这样中央支援贫困地区的能力就会加强，对富裕地区的影响也不大。这就是中央均贫富的政策，绝不是有人说的分税制使贫困地区更穷了。整个广西的扶贫工作，还是由自治区来统筹。中央能够尽力的就是：首先，支持重点建设项目。南昆铁路能搞多快就搞多快，要多少钱中

央就给多少钱；第二，中央的政策逐步向中西部地区、向贫困地区倾斜。转移支付目前增加的财力有限，但是将来的前途是光明的，会有更多的钱转移支付。

广西始终要以农业为基础，如果不发展农业，那么整个广西的经济就不能发展。我到中央来工作这几年，特别是近两年，深刻体会到，什么问题都好解决，就是吃饭问题不好解决。什么商品都不会冲击我们的市场，因为我们手里有700多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什么东西都可以买进来，但就是对粮食没有办法。稍微进口多一点，国际市场价格马上涨得一塌糊涂。从去年开始，我们就抓粮食进口，要不是动手早，今年这个关就过不去了，今年的物价不知道会涨到什么程度。我们抓住农业，抓住粮食，明年的物价涨幅，应该说有把握把它降低到10%。我们一定要改变这个观念，认为要发展经济就是搞工业、搞房地产，搞工业就赚钱，搞房地产更赚大钱，搞农业就衰。不是这样的。赚大钱就要冒大风险，它们是连带在一起的，高风险就可能把钱赔光。现在发展农副业是很赚钱的，而且越来越赚钱。我们现在国民经济发展的根本问题、关键问题，就是农业，我现在一天到晚头痛的也就是农业。所以，还是要大大地强调发展农业，要大讲农业是经济工作的首位、是关键。稳住物价就靠这个，粮价稳不住，什么都稳不住。只有农业发展起来，基础巩固了，经济才能发展起来。美国就是例子，它的粮食吃不完，大量出口，所以美国才有今天这样的经济发达。没有农业这个基础，经济是搞不好的。今年3月份开八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的时候，我到广西代表团时，就讲了这个问题。希望你们重视抓农业，你们的钱要往农业、往科技方面投。我还要强调工作作风问题。工作一定要扎实，特别是搞农业、扶贫，不是像卖一块地或者搞一个项目，一下子就富起来，就脱贫致富，没那样的大好事。因此，要扎扎实实跟农民在一起，兴修水利，改良种子，搞科技，研究化肥、种子供应问题，把精力摆到这方面来。工作要从怎么有利于脱贫，怎么使老百姓得到好处上一点一滴地做。对外开放，应该有一定的基础设施，没有这个条件，你喊破嗓子外资也不来，你开多少招商会也不顶用。现在我们搞的招商会、庆典，花钱太多，实际没有多大效果。



1995年11月16日，朱镕基向广西壮族自治区田阳县委领导了解冬菜种植使当地农民受益情况。前排右三为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书记赵富林。

铁路建设要雪中送炭

(1995年11月15日)

这是朱镕基同志在广西壮族自治区百色市召开的南昆铁路建设汇报会上讲话的主要部分。

南昆铁路是国家重点建设项目，建设工作目前已取得很大成绩。在南昆铁路建设工地的同志们都很辛苦，作出了重大贡献。我代表党中央、国务院，代表江泽民、李鹏同志，向南昆铁路建设指挥部及参建的全体干部、职工，向广西的领导和热情支持南昆铁路建设的各族人民，表示亲切慰问和衷心感谢。

南昆线一通车，百色的扶贫问题就好解决多了，农产品可以运出去，工业品可以运进来，经济就发展了。农业加科技，发展起来一本万利。“发展工业就赚钱”的观点不一定对，好多工业企业都赔本，我们国家工业企业有40%亏损。前两年房地产搞那么多，房子至今卖不出去，压死好多钱，进不得，退不得。调整资金投向，就是修铁路、修公路。当前我不太主张大规模修高速公路，太贵了，修1公里高速公路1500万元还不够。1993年基建投资当年增长70%，1994年增长40%，今年增长20%，增长幅度可以压缩一点，把钱投到农业中去。在资金总量中，加大向基础设施建设倾斜，胡来是不行的，好大喜功、不讲经济效益也不行。



1995年11月15日，朱镕基在广西壮族自治区百色市听取南昆铁路建设者的汇报。前排右二为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书记赵富林。

中央决定，继续坚持宏观调控，但不是抽紧银根，票子还是发得不少。主要使总体国民经济效益提高，改变经济增长的方式，将粗放型变成集约型，从靠大量资金投入，转变为靠效益提高，继续把抑制通货膨胀当做经济工作的首要任务。物价一定要降下来，物价上涨指数近几年都在两位数，老百姓怎么活？我想，明年会比今年好，明年会有更大效果，人民群众会更加拥护党中央、国务院的政策。对这一点我们是有信心的。因此，我们还要坚持继续支持基础设施建设，包括继续支持铁路建设的方针。我这句话仍然有效：南昆铁路能干多快就干多快，要多少钱就给多少钱。但这个话是有条件的，不是说想花多

少钱就花多少钱，重点建设“重点浪费”不好，在实施过程中还要精打细算，尽量节约人民给我们的每一分钱。我相信，铁道部是会这样做的。

质量第一，百年大计。不能光图快，如果把这个工程搞得到处塌方，质量不怎么样，那是不行的。但是我相信，铁道部一定会对工程质量精益求精，一丝不苟。监理单位要把住质量这个关。在保证质量和效益的基础上，要花多少钱、能搞多快，我都支持。按照原概算，花120亿元明年就完成了，我估计要超一点，但希望不要超得太多。南昆线没有广西和云南地方党委、政府的支持是搞不了的，因为条件太艰难了。他们做了很多的工作，我心里是有数的。工程进度早一天也好，早一个月也好，我再加一句，最好早三个月。我没有下命令， 也没有作指示。我只是提一个希望，没有经过科学的预测，提出工程提前三个月建成，仅仅是希望。1997年是我们关键的一年，面临香港的回归。香港的回归和保持它的繁荣稳定，就靠内地的经济发展。如果那个时候我们的情况非常好，接收香港就没有什么问题；如果我们的情况不太好，香港的人心就要浮动。我们三分之二的出口都要通过香港，那里发生一点问题都会不得了。所以，南昆线早一点建成，对于稳定我们的国民经济，保证香港平稳回归，都有重要意义。尽管目前建设还有许多困难，还有四座大桥要建，但要发动同志们攻关，给这些同志奖励、政治荣誉，表彰他们的功勋。我相信南昆铁路会在中国的铁路建设史上创造新的一页。

铁路建设今后要考虑雪中送炭，不能光是锦上添花。最近，我到云南去看了一下，云南的94%是山地。我不知道广西有多少山，但是我知道百色90%是山，当地生活很贫困，百色地区人均收入500元。云南昭通地区人均收入只有260多元，真是苦，看了我们都掉眼泪，最穷的地方人均收入只有100多元。在那里，当时我跟有关同志商量，决定恢复内昆铁路的建设，390公里长预算要花75亿元。我说不管多少亿元都得修，已修了一半，中间停了九年。这条路一通, 云南就有两条出省的铁路通道，昭通地区的贫困问题才能够解决，这叫雪中送炭。尽管这条铁路在运营初期可能会亏损，运量不会那么大，但是我们应当搞雪中送炭。百色地区是广西最穷的地方，不修铁路，它就脱不了贫，花多少钱也得修，这是战略性的决定。看样子，中原地带的铁路已经修

得差不多了，因为还要考虑到处都在修高速公路。现在，我们要逐步地到中西部地区修铁路。巩固我们的边疆、发展我们的边疆、支持少数民族地区，就得靠铁路。任务还是很重的，将来你们修铁路会越修越艰苦。我们不能总搞锦上添花，对京沪高速铁路我是泼冷水的，先雪中送炭嘛。我是上海来的，难道不希望看到上海通高速铁路？当然希望早日修高速铁路。得有钱呀，京沪高速铁路得花多少钱？说是600亿元，我看1000亿元也下不来！论证要实事求是。我不是反对修高速铁路，更不是反对修京沪高速铁路，时间未到，先做工作。“九五”期间能不能开工？我看很困难，既没有钱，也没有研究透。我们要修几条战略性铁路，来解决边疆和少数民族地区以及落后地区的经济问题，意义重大。这也是一个投资方向、战略方向的问题，在中西部地区修铁路有利于巩固我国的民族团结、国家统一，有利于缩小东西部地区的差距。同志们，你们现在做的这个工作是非常重要的，是子孙后代都会记住的。希望同志们在南昆铁路建设中创造辉煌的、历史性的业绩。

在一九九五年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的总结讲话

(1995年12月7日)

1995年12月5日至7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北京召开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党政主要负责同志，中共中央有关部门、国务院各部委和有关单位的主要负责同志，解放军 三总部和武警总部负责同志。在会上正式印发的朱镕基同志讲话，曾发表于《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册，标题为《再接再厉，做好一九九六年的经济工作》。编入本书的是朱镕基同志在会上即席讲话的录音整理稿。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开了两天半，今天就要结束了。大家反映跟去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比起来，气氛宽松得多了。我参加了华东组的讨论，我甚至想向他们借点钱了，他们的日子比我好过得多。去年开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时候，气氛很紧张。那个时候物价在飞涨，也不知道能不能压得住。把1995年物价涨幅控制在15%的目标，大家都认为不可能实现，起码是18%。去年12月初开会的时候，企业欠国家的税收是465亿元，我们担心12月份的工资都可能发不出去。现在情况好得多了、宽松得多了。正因为如此，我就得讲点使大家紧张点的事情了，给大家增加一点压力。这就是江泽民同志在他的讲话中引的两句话：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请同志们有点思想准备，我这个讲话不完全是添油加醋，恐怕是要放点生姜和辣椒，但是也不必紧张，不会向大家借钱，这一点你们可以放心。到今天为止，我干了45年的经济工作，大部分时间在国家计委。我得出一个教训，日子稍微好过一点、顺利一点的时候，切忌折腾，我就是想讲这么一句话。在这个题目下，我讲几个问题：

一、关于农业和物价问题

当前经济形势总的看是好的。去年出台的几项重大改革措施运行正常，取得了好的效果：企业改革继续深化，国民经济进一步向好的方向发展；农业战胜了比较严重的自然灾害，比去年增产；国有工业的

增长质量有所提高；物价上涨幅度明显回落，市场供应充足，人民生活继续改善；对外贸易持续发展，国家外汇储备有较大幅度的增加，人民币的汇率基本稳定。在去年物价大幅度上涨、农业歉收的情况下，今年能取得这样好的成绩，很不容易。这是认真执行中央关于经济工作的各项方针政策，继续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全国上下各方面共同努力的结果。今年改革和发展的成就以及“八五”计划的完成，为明年开始实施“九五”计划奠定了基础。这是成绩。

问题集中在当前的物价水平仍然过高，今年能够把物价涨幅控制在15%，这是一个很了不起的成绩。1到10月份是16%，1到11月份预计是15%，10月份当月是10.3%，11月份估计低于10%，12月份估计是9%，这样全年预计控制在15%以下还是有把握的。尽管是这样，我们要考虑到连续三年物价涨幅在两位数高位运行的后果。根据我们的历史经验，连续几年物价高位运行就要出事。特别是去年以来物价上涨的特点，是农村高于城市、内地高于沿海，这样对于那些欠发达地区和低收入居民，影响就比较大，就有不安定的因素。明年，党中央和国务院提出的目标是把物价涨幅控制在10%左右。在讨论的过程中，大家都拥护这个10%，但是谈到各省情况的时候，都说我这个省最好还是定在11%或者是12%、13%比较稳妥。如果大家都是11%、12%、13%，那中央这个10%如何来实现呢？所以看样子，这个指标还得分解一下，每个省都得有个奋斗目标。沿海地区的物价已经涨得差不多了，必须控制在10%以下，这样全国10%的目标才能实现。如果沿海地区都在10%以上，那内地想做到10%以下是不可能的，全国10%的目标就难以实现。

控制物价涨幅的关键在于加强农业，但物价高涨的根本原因是基本建设规模过大和消费过度膨胀。这两年物价上涨都是在粮食这个环节上突破。看样子，明年物价涨幅如果突破10%，还在于粮价，还是粮食问题。只要粮食和“菜篮子”的价格控制住了，物价涨幅不突破10%就有把握。别的东西没有什么好涨的，基本上供过于求。明年我最担心的问题就是粮食问题。这不是制造紧张空气，更不是悲观失望，但是我要把这个问题提出来。今年粮食价格之所以能够稳住，除粮食增了一点产，主要是靠进口粮食和停止出口粮食，把粮价稳住了。

现在世界粮食库存降到历史最低点了，根据国际行情，今年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小麦的主要出口国可能有点增产，但是很多国家粮食歉收，以致国际市场粮价还会继续上升。特别是俄罗斯，灾难性的歉收，如果它明年大量地在国际市场上采购粮食，粮价就不得了。所以，解决中国人吃饭问题只能靠我们自己。进口千八百万吨粮食，调剂调剂是可以的，多了是不行的。现在粮食需求每年增加几百亿斤，需求增长这么快，产量又没有大的增长，这真是不得了。

讲这个形势绝对不是要引起恐慌，而是说如果再不抓粮食生产，不把农业作为基础从口头上讲变为实际行动，那明年就还是一个比较严重的问题。如何加强农业，过去再三地强调了，我不多讲了。现在就是讲一个措施：明年定购粮价格要有所提高。不然的话，农民的积极性会受到很大的影响。现在四种粮食的平均市价是9角2分钱一斤，但是定购粮的收购价是5角2分钱一斤，差了4角钱，因此，就说是“皇粮国税”，你也很难收上来。在讨论过程中，大家都认识到这一点，都认为明年定购粮的价格一定要提高，这样才能鼓励农民种粮的积极性。



1995年月7日，朱镕基在浙江省永康市沈道村向农民了解生产、生活情况。右三为浙江省委书记李泽民。

提高定购粮价格会不会引起市场粮价的上涨？我们预计可能会影响一点，但是不会太多，关键还是看粮食能否增产，供求关系怎么样。整个流通领域的商品粮是2700亿斤，定购粮只有800亿斤，不到三分之一。而且，收购的定购粮有相当大一部分，已按市场价在卖了。真正

用平价买的只是一部分城镇的低收入居民，有的采用票证，供应一点早籼米、标准粉，那是平价的，是用定购粮供应的。大家的收入已经提高了，大部分人还是在市场上买粮食吃。所以我们认为，明年把定购粮价格提高一点，不至于造成销售价格有很大的提高。特别是把定购粮价提高以后，对农民来讲，他们的得益就多了。明年一些农业生产资料的涨价因素，可以从定购粮的提价里获得补偿。当然，最终会影响多少，还得看我们有没有粮食。今年的粮价能够稳住，就是因为我们手里几百亿斤的粮食抛到市场上面去了。明年如果粮食又减产，那粮价还得涨。所以，我还是诚恳地希望各地的负责同志，要把主要精力放在加强农业上面。粮食如果在明年没有较大幅度增产，物价就稳不住了，整个经济形势也难以稳定。当然，定购粮提价以后，原来那部分享受平价粮待遇的低收入居民，会受到影响。我想，各个地方还是可以采取一些措施。比方说，现在收购定购粮的时候，各地都有不同程度的价外补贴，比较富裕的地区像江苏、浙江，都是一斤粮食补贴1角6分钱。也就是说，实际上它们就是用将近7角钱一斤的价格向农民收购的。所以，明年的定购价涨到7角4分一斤也没有太大的影响。问题就是这一斤1角6分的粮食补贴也别撤回去，把这1角6分拿出来，定向补贴给城镇的低收入居民、大专院校学生、离退休干部职工和农村贫困缺粮人口。这样，粮食的价钱虽然涨了，但你给他补贴了，他的生活不受影响。这是完全可以做得到的。另外一条就是，即使定购粮价稍稍地提高一点，如果化肥、农资大涨价，农民还是得不到什么补偿。各个地方都要想点办法来控制农资涨价，包括化肥、柴油等等，这样才能够稳定明年的农业形势。

我再讲一个问题，就是节约用粮。粮食消费这样涨是没有办法的。我希望各个报刊要写文章宣传节约粮食，但又不能造成恐慌。现在光造酒一年就用掉400亿斤粮食，你看电视台的广告，一会儿“孔府家酒”，一会儿“杜康”，一会儿“酒鬼”，好像中国人都是酒鬼似的。我请有关部门的同志就节约粮食问题写了一篇报告，这里面的潜力是大得不得了，1000亿斤、2000亿斤粮食都可以节约下来。要真正做到，恐怕也蛮难的，但至少要做到粮食的消费量不要再涨了。要宣传少大吃大喝。我看好多不见得是吃掉了，而是倒掉了，特别是高级饭馆里面，吃不完都倒掉了。

影响物价涨幅的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江泽民同志在讲话里也强调了，居民个人收入增长得过快，而且差别悬殊，这是一个非常值得重视的问题。分配太不合理了，太向个人倾斜了。我特别要讲一下沿海地区，你的工资水平提得太高了，这是害你自己。最近《亚洲华尔街日报》发表了一篇文章，标题是《亚洲，你的成本太高了》。那就是讲，像中国沿海地区这样工资涨得很高，你就没有优势了，外国人就不来投资了，因为你的工资水平跟他的差不多。虽然你的工资稍微便宜一点，但是由于你用的人多，他觉得不合算，就不转移来了。现在看起来，内地还是有点优势，工资成本低。我看外资企业下一个趋势是向内地转移，内地要利用这个优势，但是你要保持这个优势，如果你的工资也都跟着沿海地区那样涨的话，恐怕你的优势也没有了。

二、关于改革问题

明年的改革主要还是国有企业改革。这是明年以至于今后更长一个时期内经济体制改革的重点，这一点绝对不能模糊和动摇。各地区、各部门要按照中央的部署，精心组织，勇于探索，切实抓好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试点，把企业的改革、改组、改造和加强管理结合起来，并且搞好各项配套改革，力争有所突破，取得实质性进展。

第一，要进一步坚定搞好国有企业的信心和决心。大家要把重点转到这个方面来，要认真抓，要有决心，还要有信心，因为这不只是一个企业的问题，而是关系到社会主义制度命运的重大政治问题。

第二，要全面、准确地理解现代企业制度的基本特征。这一点是带有指导性的。过去我们对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四句话十六个字，贯彻得不够全面、不够准确。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缺一不可，不能够只强调哪一个方面，那样是搞不好的。

第三，在深化企业改革中，要发展和壮大公有制经济。在改革过程中，要使公有制经济主要是国有经济掌握国家的经济命脉，这个地位不能放松。公有制经济要加强，不能削弱。企业可以卖，但不能随便卖。

第四，把深化企业改革同加强企业管理结合起来，同促进发展、提高经济增长质量结合起来。现在看起来很明显，你不把企业改革、行

业改组、技术改造和加强管理，也就是“三改一加强”结合起来的话，企业绝对办不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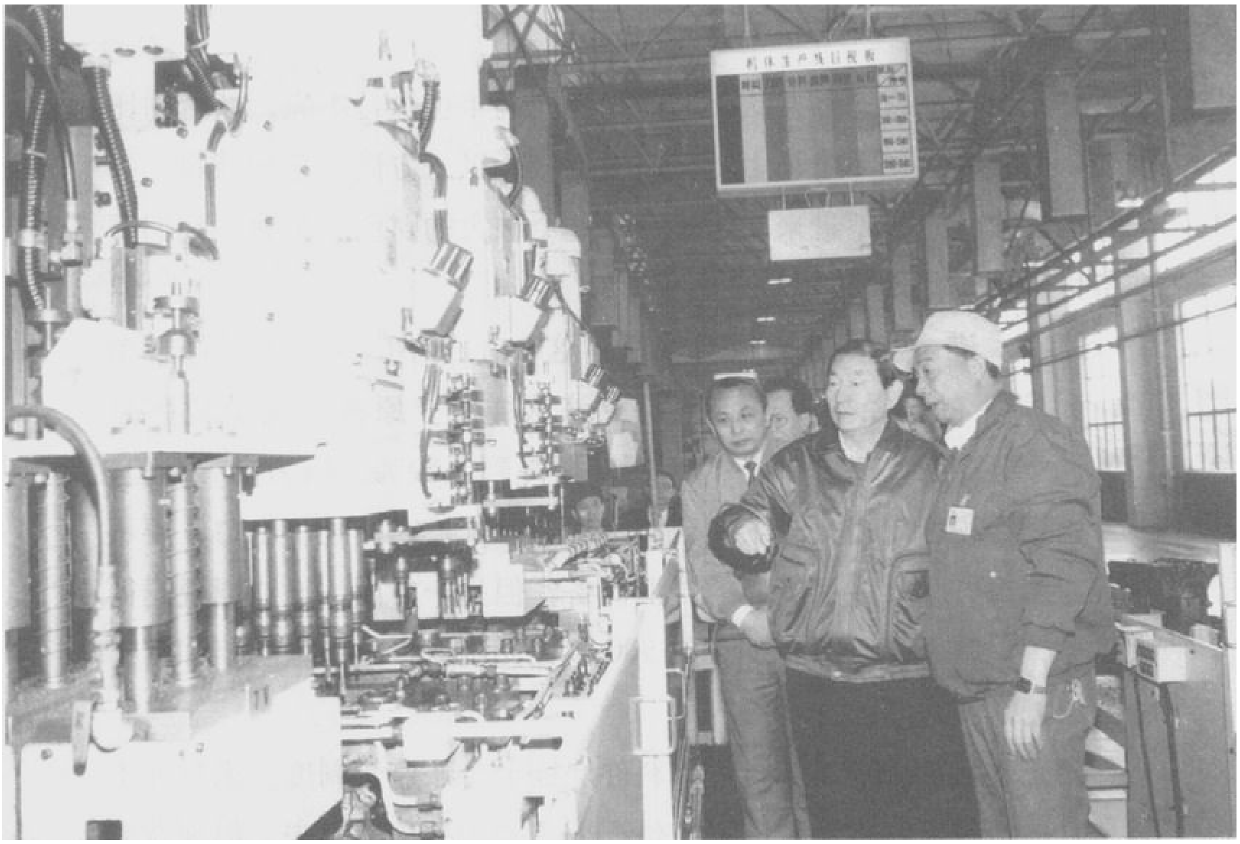
第五，认真抓好各项配套改革。这是个系统工程，各项改革必须都要配套，首先就是政企分开。如果政企不分开，还吃“大锅饭”，政府还是直接指挥企业，一出了问题还找政府，那企业怎么能搞好呢？另外，企业的人员要流动，企业能破产，这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优胜劣汰的一条规律、一个机制。我们也讲了，企业破产一定要考虑到社会的稳定，尽可能采取兼并的办法，但是企业搞不下去不破产不行。要有破产的机制，“大锅饭”不能永远吃下去，对此国家采取了一系列的政策。我们规定，企业破产以后，它的所有资产变卖所得，除了首先交税以外，主要用于安置职工，而不是主要用于还银行的债。因为现在的好多企业都是资不抵债，负债率平均在87%，它一破产，你要它还债，那职工就要流离失所了。所以要先安置职工，剩下多少钱再还多少债，其他的债务从银行的呆账准备金里冲掉。但是，破产一定要有限制，不能随便破产，逃废银行债务。必须经过批准，纳入国家计划，才能够冲掉这个债务，才能够实行破产。现在由国家经贸委牵头，在18个城市开始试点。我希望各个地方的负责同志好好看看国务院关于实施企业破产的法规，不能强迫法院随便地宣布企业破产。但是一定要有企业破产，要破几个样子，我们准备了100多亿元用于企业破产。实际上，要使一个企业破产很难，主要是要安置破产企业的职工非常难，所以最好还是让优势企业去兼并那些亏损企业。国家给了政策，只要优势企业把被兼并企业的债务承担过来，这个债务停息五年，你再逐步地把这个本钱还清，这也是一种优惠。这个优势企业来讲，虽然增加了债务，但是不用付利息，等于缓一口气啊；等这个被兼并企业搞好了以后，你再还本。

第六，深化企业改革要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要加强企业领导班子建设。

第七，进一步加强对企业改革的领导。搞企业改革不是中央一家的责任，大家都要负起责任来。如果企业改革的问题不解决，财政困难、金融紧张等难题是解决不了的。现在企业亏损额、亏损面不断地增加，但更大的亏损在地方办的企业，亏损面最大的都在这一部分。

大家要抓一下这个事情，把责任分清楚，中央有中央的责任，地方有地方的责任，大家一起来抓。

明年在进出口税收政策上有三项调整和改革，这也是明年深化改革的重要内容：一是大幅度降低关税税率，二是降低出口退税率，三是加强对加工贸易即来料加工的监管。



1995年3月21日，朱镕基考察天津汽车发动机厂。

第一，大幅度地降低关税，这是国际准则、世界贸易发展的趋势。江泽民同志在亚太经合组织大阪会议上宣布，中国明年的关税税率降低幅度不低于30%。我们现在的关税税率算术平均水平是35.9%，过去是百分之四十几，这两年已经降了相当多了。如果再降低30%，就是25%。各个国家对此的反应都非常的好，没有想到中国会这么大幅度地降低关税，有的人甚至不相信。不降低关税不行了，这是世界潮流，但是降低关税以后，财政困难一大堆啊，这次降低关税以后，财政少收入一两百亿元。当然相应的还有一条关于国民待遇的准则，就是外商投资企业投资总额内在进口设备和原材料等方面，停止减免

税。但这在两年以内见不到效，企业已经签的进口合同还得继续免，老合同老办法，这些老合同两年也执行不完。新合同比较少，而且签了也不是马上就进口设备。所以一方面大量地减收，另一方面增收的也收不进来，明年将是一个很大的财政难关啊，我们要准备付出这个代价。

第二，进一步调低出口退税率。这个在今年广交会上已经宣布了，大家现在已经接受了，觉得应该这样做。原来平均退税率是17%，今年7月1日降到14%，明年要降到8.29%。因为没有经验，一开始把退税率定得太高了。定高了也有好处，它鼓励了出口，要不然现在怎么有700多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但另一方面，出口退税退得太多了，财政承担不了。现在欠500多亿元没退，准备在明年和后年分两年把它消化了。

第三，对加工贸易实行进口料件保证金台账监管制度。来料加工贸易，应该是原材料免税进来，生产加工的产品免税出去，但现在实际上是原材料免税进来，加工完的产品全部或部分销到国内市场，这就是偷税了。正因为这种偷税的现象很严重，所以加工贸易发展得非常快。我们一千几百亿美元的出口额里，加工贸易差不多有500亿美元，全世界没有哪个国家的加工贸易占这么大的比重。进口400多亿美元、出口500多亿美元，差不多都占了进出口总额的百分之三四十了。现在我们的办法就是加强监管。你进口原材料的时候，还是不跟你收税，但是你要在中国银行里开一个台账，记录你进口原材料应该交多少关税。你把东西加工完以后，出口了，拿到海关的出口报关单以后，再到银行里销掉这个台账。你要是拿不到报关单，不能销掉这个台账，几家执法机关就要来检查你。这个工作要是做好了，可以堵住漏洞，同时有利于国有企业。

对外开放是我们坚定不移的方针。这些改革都是一些具体政策的调整和完善，并不影响改革开放的进程，相反会有利于我们进一步改革开放。这次出台的三项措施是面向全国的。这样做，将使我们在对外经济体制方面，能按照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的要求进一步走向统一规范，有利于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程度，提高对外开放水平。过两年以后，这三项改革的成果就会大大体现出来。但在最近一两年，有可能发生负面的影响。比方说降低出口退税率，出口产品的成本会有所上

升，明年降低关税税率会减少财政收入，这都会给中央财政带来一些不可低估的困难，但这也是改革所必须付出的代价。现在正是改革的最好时机，因为我们有七百几十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国际收支稍微出现一点不平衡，我们能够扛得住。在这个过程中间还可以采取一些政策措施，来调整改革的进程。大家放心，我们心中有数，基本上不会出现什么大的问题，也不会影响外资进入中国。

三、大力整顿和加强财经纪律

根据这两年的检查，我们感到目前经济秩序混乱的问题相当严重，违法违纪行为已经达到了惊人的程度。

一是偷税、漏税、骗税、逃税相当严重。一个地级市，用100亿元人民币套取外汇，而且假冒出口，骗取17亿元的出口退税；在另一个地方，海关的报关单82.8%是假的。不少地方，走私现象是公开的，有些地方甚至武装走私，令人触目惊心。

二是搞“两本账”。什么东西都“两本账”。财政“两本账”，把预算内的资金转到预算外，逃避预算的监督。银行“两本账”，有一个地方的银行表面上存款只有两个亿，贷款只有8000万元，但它实际的存款、贷款都另外有一本账，贷款多达35亿元，都是市长在那儿指挥，搞房地产等项目，投向都是非常错误的，钱都是收不回来的。有的企业造假账也很严重，不该摊入成本的摊了，该摊的不摊，乱发奖金、逃避税收等等。这些问题如果再不严肃地对待，不但影响国家的财政收入，恐怕相当多的干部会被毁了。我希望各地的负责同志要关心一下经济秩序的问题。还有好多是新问题，什么外汇期货、国债期货，证券回购也就是国库券的回购，也是买空卖空。

所以，明年要整顿和加强财经纪律，打击经济犯罪活动。一是要健全规章制度，强化监督管理，特别是我们已经在海关、税务、银行，开始实行一把手三年轮换制。现在看起来一把手不走，他的问题是谁也发现不了。外国也是这样的，这几个部门的一把手几年一轮换。二是要建立起计算机的监控手段。通过“金桥工程”①、“金税工程”②、“金关工程”③等，建立全国的计算机交叉稽核监督调控网络，利用技术手段来打击经济犯罪。三是要严惩各类经济犯罪活动。在这方面，公安机关、检察机关、法院做了大量工作，抓住假造增值税发票数额巨大

的要依法严惩，最近判了很多案子，很有成效。除了打击经济犯罪以外，对这些机关的主要负责人也要给一点纪律的要求，税务、银行、海关系统如果发生了内外串通的大案要案，不但要判处那些犯罪分子徒刑，单位的主要负责人也要负渎职的责任啊！现在正在制定办法，对一把手也要有纪律的约束。在这个基础上，明年再进行全国大检查，查处大案要案。我相信，只要我们加强领导，认真把这个事情搞到底，是可以收到效果的。

---

① “金桥工程”，指国家公用经济信息网工程。

② “金税工程”，是将一般纳税人认定、发票领购、纳税申报、税款缴纳的全过程实现网络运行，加强增值税征收管理的信息化系统工程。

③ “金关工程”，是一项推动海关报关业务电子化的国家信息化重点工程，核心是海关内部通关电子化系统、外部口岸电子执法系统。

加强对住房公积金的使用和管理

(1995年12月15日)

1995年12月13日至15日，全国住房制度改革经验交流会在上海召开。出席会议的有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房改领导小组负责同志和35个大中城市分管市长。这是朱镕基同志同与会代表座谈时讲话的主要部分。

住房问题关系到城市的繁荣和稳定，关系到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人是生产力发展中最活跃的因素，关心人、体贴人，解决好群众的切身利益问题，必然会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因此，房改工作确实需要抓得更快一点、更好一点。过去两三年，在国务院住房制度改革领导小组的领导下，有关部门同心协力，各地政府大力组织实施，房改工作很有成绩。刚才江苏省的同志讲住房公积金制度普及这么广，我是大吃一惊的，这不过就是两三年时间。这么大的国家、这么多的企业，一项制度能够推行这么快，说明这项改革是深得人心的。尽管房改工作曾出过一点偏差，比如前年年底一些地方刮“低价卖公房风”，实际上是从少数地方刮起来的，有些省市就仿效，房价便宜得让人都不敢相信，但一经发现很快就纠正了。总的来看，房改的政策导向是正确的，改革取得了很大成绩，我们应该树立信心，把这项工作继续抓下去。

在这次会议之前，根据国务院房改领导小组提出的问题，我在北京开会协调了一下，许多问题包括财政监督、委托银行承办等都取得了一致意见。但关于公积金的利率问题，还没有摸透，会上未作决定。会后，我请人民银行总行拿了个意见。今天上午，我和上海负责公积金管理的同志进行了具体讨论，才有了发言权。

我认为，公积金的使用和管理是房改工作的中心环节，关系到整个房改工作的成败。如果公积金使用、管理得不好，被到处挪用，甚至把公积金都赔了，那么职工就不会缴公积金。如果公积金的管理没有一套非常完善的制度、非常严密的监督、非常成功的运营，房改工作

就搞不好。这次会议之后要大力推进房改，首先就要抓公积金的使用和管理。各个部门不要扯皮，要按照这次会议确定的基本原则，同心协力，把这项工作搞好。

在公积金使用和管理方面，大家可以参考上海的经验。这不是因为我当过上海市市长，参与过这项工作，而是因为上海的经验是成功的。两年以前还不敢这样讲，我在上海时只是建立了公积金制度，对公积金的使用和管理能否取得成功，当时心里还没底，因为没有经过实践的检验。现在实践证明是成功的。不是说各地都要照搬上海模式，但上海的基本经验可以借鉴。我在上海时，每年盖的房子只有400多万平方米，现在一年盖900万平方米。当时上海群众的住房非常困难，现在搞活了，形成了良性循环，而市政府并没有拿很多钱，基本上是靠企事业单位和个人，市政府主要在土地和大市政配套等方面给予优惠。那时上海人均居住面积是6.6平方米，现在已达到7.8平方米，这很不简单啊！我今天去看了两个住宅小区，人民群众非常高兴，也很满意。三林苑小区外观很美，突破了原来火柴盒式的设计框框，但不豪华，整个小区的布局非常合理，各种配套设施考虑得很周到，室内格局也有很大的改变，很实用。另外要推广各种新型建筑材料，上、下水道要用聚氯乙烯管材，这样建设速度快，房屋价格还便宜。随着房改工作的推进和公积金制度的建立，整个建筑业将发生一场革命。建筑业及装修业将成为中国一个很大的产业，可以带动地区经济的发展。大家不要小看这件事情，衣、食、住、行是人的基本需求，“吃”的水平不可能提高得太快，但“住”是能想办法改善的。上海市公积金使用和管理经验的本质是什么？刚才江苏省同志讲的四句话就能概括，即：“房委会决策，公积金中心运作，银行专户，财政监督”。公积金个人交5%，单位拿5%，都进入职工个人账户，所有权归个人，离退休或工作调动时可以取走这笔钱，也可申请用它分期付款买房。对这些问题，大家的认识都一致，关键是收缴上来的公积金怎么管理？第一，要由住房委员会统一领导、统一管理、统一使用。第二，要在住房委员会下设立公积金管理中心来进行具体运作。住房委员会是决策机构，确定公积金的使用对象和政策等，执行机构是管理中心。但公积金绝对不能直接交给住房委员会和管理中心，否则就很容易产生腐败。第三，要在银行设立专户存储。绝对不允许挪用公积

金，公积金只能用于建房、买房和大修住房。第四，财政部门要进行监督，当然也包括审计。住房委员会在没有财政部门人员参加的情况下，是不能就公积金使用问题作出决定的，这就保证了财政部门的监督。财政监督的目的就是防止公积金被挪用。在座的各省区市同志回去以后，要向党委和政府的主要领导同志汇报：这次会议确定财政部门对公积金的职能是监督，不设财政专户。我对各地财政部门的希望是，首先要管好、用好预算内资金，不要把预算内资金转到预算外去，对预算外资金要加强财政监督。财政部门是住房委员会的重要成员单位，这样就可以达到财政监督的目的了。大家要同心协力，赶快把公积金制度建立起来，大力推动房改工作的进展。

下面谈银行专户的做法。银行专户内的资金由公积金管理中心运作，银行只收手续费，标准不超过0.5%。可以对公积金存款和贷款采取有别于银行利率的政策，叫“低进低出”。这样搞有很大的好处。各个单位将公积金缴到银行，当年缴存的公积金年利率只有3.15%，每年利息结转后计入本金；第二年开始增加存款利率，是6.66%，总之是远低于银行存款利率。公积金个人账户存到银行的利率是低的, 贷出去建房或买房的利率也是低的，这样做的好处是可以降低住房造价，卖给个人的房价也低了，减轻负担。贷给单位建房的年利率是7.2%这是很低的啊，现在银行的贷款利率至少是14%、15%。职工个人买房抵押贷款的利率也很低，基准利率是6.12%，然后每年增加一点，职工用这个利率申请抵押贷款买房，这是一件很好的事情。我认为“低进低出”是个好政策。公积金存款利率可以低一些，原因是：第一，公积金的一半是公家给的，利率低一点是可以的，不会影响职工个人利益。第二，低利率体现了互助性。如果职工的住房问题已经解决了，不用提取公积金买房子，存款利率低一点影响不大，但可以帮助没有解决住房问题的居民，体现了互助互济精神。因此，“低进低出”政策是合理的，只是在公积金内部封闭运作，银行不会赔也不会赚，只收取手续费。

存在银行的公积金数额永远要大于贷出去的数额，这笔存大于贷的钱就要在银行内产生效益，银行应该给这笔钱付利息，因为银行把这笔钱拿去运营了嘛。封闭账户内的公积金与银行没有关系，但存贷差银行可以运用。银行不是对所有的公积金都给利息，沉淀在银行的资

金，现在银行给的存款利率是9.18%，能否再高一些？因为这些资金不可能“死”在银行里，总是要由银行贷出去的，贷出去的利率至少是10.98%，因此银行可以给予稍微高一点的利率，按三年期零存整取10.98%的利率计息，各地可以参照这个标准执行。这就不存在银行运营公积金的问题，银行只管沉淀的那部分资金的运营，专户内的公积金绝大部分由管理中心封闭运作。公积金管理中心的编制和经常费用、工作人员收入等要由财政部门核定，住房委员会审核，报经市政府批准，从沉淀在银行的资金所获得的利息中支出，不直接和公积金挂钩。管理中心不能乱增编制、乱发奖金、乱盖大楼，要有监督和控制，避免管理中心的机构膨胀。管理问题很关键，这个问题不解决好，即使将来百分之百地推广了公积金，也不一定有成果。

还有一个问题是银行内部不要扯皮，具体地说，建设银行和工商银行不要扯皮，不要把公积金当做油水都来争夺，实在没有这个必要。公积金存在哪家银行，要由当地政府决定。我想还是由一家搞比较好。我不作硬性规定，但提倡由一家银行承办。工商银行、建设银行、农业银行这三家银行都可以承办，但在一个城市内只能由一家银行搞，至于选择哪一家银行由当地政府确定，已经分几家银行搞的，也允许有一个过渡期。现在还未建立公积金的城市，在设立公积金时要选择一家银行，不要再制造矛盾。

我今天讲的中心思想是要加强对公积金的使用和管理，这是房改工作的中心环节，请大家务必认识到这一点。如果没有一套完善的管理制度和运作办法，房改是要失败的。如果搞得好，就像上海这样，每年增加100万平方米的住房，形成良性循环，基本上不用市政府直接拿钱，就把老百姓的住房问题解决了，或者说是有了解决住房问题的希望，这件事情的意义太大了。大家回去后要检查一下，看是否有挪用住房公积金的现象。如果有问题，至少要内部通报，要严肃处置，以儆效尤。不然房改搞不下去，公积金也没人缴。

关于“安居工程”，上海搞得也不错。全国安排专项贷款50亿元，给了上海3亿元，上海自己配套4.5亿元，当年投资，当年见效。关键是建立了公积金制度，配套资金落实。没有配套资金，光是用国家贷款，房子也建不起来。政府还要在土地等方面给予支持。1996年全国“安居工程”的贷款规模暂定50亿元，我估计今年最多用掉30亿元，这

样，1996年的贷款实际上有很大增加。关键是要早下达计划，计划下达得越早，效果就越大，不要再扯皮。1996年年初就把计划发下去，地方政府马上就能用钱，当年就可以见效。1996年, 谁的配套资金多就给谁贷款，没有配套资金，给了贷款也建不成房子，还把指标浪费了。另外，我还想加一条，对于拿公积金做配套资金的城市要优先给予贷款，以支持建立公积金制度。

目前全国房改形势很好，通过这次会议我们总结了经验，进一步完善了过去的政策，会后还要就住房公积金管理和存贷利率等搞一个文件，经国务院批转发下去①。各地要按这个文件执行，把房改推进一步。推进房改对整个经济的发展是一个很大的推动，对人民群众的积极性是一个很大的调动。希望大家重视这个问题。有了这套比较完善的制度，还没有建立公积金的城市会后来居上，搞得更好。要扎扎实实搞好工作，特别是要加强对公积金的使用和管理，把这件事情办好了，房改就一定能取得成功。

---

① 1996年8月8日，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了国务院住房制度改革领导小组《关于加强住房公积金管理的意见》。

银行系统要建立健全的会计制度

(1996年3月17日)

这是朱镕基同志在中国人民银行报送的《关于上海部分金融机构内部控制的调查报告》上的批语。该报告归纳了上海中资金融机构内控制度存在的问题，主要是：总稽核对同级行长负责，审计工作缺乏独立性和权威性；各分行的外汇交易，虽然大多数前后台分开，但一般都处在同一部门总经理的领导之下；稽核人员队伍素质不高，知识结构偏于会计、出纳、储蓄、信贷，很少懂经济分析，信息管理和电脑知识也跟不上金融风险防范业务的需要,对央行的监管职能理解有偏误，有的人认为央行的监管应主要在合规性方面，风险防范和控制是商业银行自己的事，有的人认为央行对其他金融机构的监管是简单的管与被管的对立关系，不少人认为内控制度就是搞一套书面材料，对建立科学有效的平衡制约机制的必要性和方法认识不足等。报告还介绍了上海外资金融机构内部控制的有效方法，如实行“四眼原则”(任何一项交易都要有两人以上签字或授权)；总行对各分行每年至少检查一次；外汇各交易程序严格分开，授信严格控制，有的分行没有隔夜外汇头寸授权；外汇交易员的全部业务活动，包括电话、电传等，均有记录或录音，对这些记录和录音，交易员均无法篡改等。报告最后提出了建立内控制度的一些思路。

相龙①、陈元①同志：

① 相龙，即戴相龙，当时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陈元，当时任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

这个报告写得好，看来作者是懂行的，有基本功，也有思路，不似那些一窍不通而又口吐狂言的“领导”。会计和审计很重要。没有健全的会计制度，根本无法对企业(包括银行)的真实业绩进行考核，更谈不上遏制国有资产的流失。银行系统当务之急，是要认真建立健全的会计制度和存贷款内控制度。要借鉴外国经验，更要网罗人才，狠抓

培训，培养出自己的精通国际金融知识而又熟悉国情的一代新人。中央银行每年要对各个国家银行进行几次定期审计、稽核。凡是会计制度不健全，甚至造假账，搞“两本账”的，坚决调整其领导班子并依法处分。请将此报告和我的批语印发各级人民银行领导及国家银行总行领导。

朱镕基

3.17

要加快小化肥厂的技术改造

(1996年3月22日)

1996年3月20日至26日，朱镕基同志在山东省考察工作，先后考察了潍坊、日照、青岛等地。这是朱镕基同志在潍坊考察期间，听取化学工业部副部长贺国强关于全国小化肥工作现场会有关情况汇报后的讲话。

首先，请贺国强同志代我向参加全国小化肥工作现场会的代表致意，希望这次会议能推动小化肥厂的技术改造工作进入一个新阶段。

要充分认识小化肥厂技术改造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大家知道，江泽民总书记和李鹏总理都非常强调加强农业。当前农业发展中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就是要保证化肥的供应。

近几年来，我们在化肥生产和供应上下了很大工夫，基本满足了农业对化肥的需求，但化肥的价格涨上去了，抵消了很大一部分提高粮价对农民的好处。1993年年末，我们看到粮食市场价格大幅度上涨时，就估计到农民种田的积极性会高涨，对化肥的需求会增加。针对当时淡季化肥需求疲软、化肥厂流动资金困难的情况，国务院决定给化工部25亿元银行贷款，作为化肥厂淡季储备资金(1994年、1995年又分别给了30亿元和35亿元银行贷款)，保证了化肥厂淡季的生产，缓解了化肥的季节性供求矛盾。看来，当时的决策是正确的，化工部、银行执行得也很好。淡季储备资金使化肥厂充分发挥了生产能力，对支援春耕生产起到了作用。除了组织国内化肥厂增产外，1994年年初，国务院还决定要大量进口化肥，但由于部门之间扯皮，耽误了进口时机。虽然化肥进来了，供求矛盾缓解了，但进口化肥的价格太高，没有起到平抑化肥市场价格的作用，化肥的整体价格还是大幅度上涨了。

回顾这段历史，化工系统包括中国石化总公司尽了很大的努力增产化肥，应该受到表扬。但化肥仍不能完全满足农业生产的需要，化肥的价格也难以控制。因此，我们一定要下决心加快化肥厂的建设。第

一，要抓紧建设一批大化肥厂。建设新厂一定要搞规模经济，不能分散。在原料条件有保证的地方，要抓紧抢建几个大厂。天然气是生产化肥的最好原料，海南、新疆塔里木盆地都有天然气，新厂能搞多大就搞多大，要抓紧搞上去。但新厂的建设不能全面铺开，要集中力量打歼灭战。第二，要加快中小化肥厂技术改造的步伐。大化肥装置的建设周期较长，远水解不了近渴。加快中小化肥厂的技术改造，就显得更为重要、更加迫切。小化肥厂的技术改造已走出了一条成功的路子。目前，全国小尿素和小磷铵的生产能力分别达到了411万吨和241万吨，如果一年进口这么多化肥就要花十几亿美元！小化肥厂的技术改造适合中国国情，是化工部的一大功绩。贺国强同志告诉我，现在引进的以天然气为原料的大化肥装置能耗为700万到800万大卡，小尿素厂的能耗也只有1000万大卡，而且是以煤为生产原料的。这很了不起，有中国特色，要很好地总结经验。

现在要下大力气，即比建新厂花更大的力气来抓中小化肥厂的技术改造。

小化肥厂的技术改造下一步该怎么办？我提几条原则性意见：在条件具备，即原料供应有保证，技术、设备、管理都比较好的情况下，一是能搞多大就搞多大；二是能搞多快就搞多快；三是在地方自筹资金落实的前提下，要多少银行贷款就给多少。但要指出的是，地方自筹资金一定要落实，不能再挤银行贷款。所谓“地方自筹资金”，一是企业自有资金，二是地方返还企业的税利，三是地方财政拨款。一般要求自筹资金相当于项目总投资的一半，至少是30%。加强农业是当前的迫切任务，全党都要统一认识，不能光停留在口头上，要有实际行动。银行要把好两个关，一看有无偿还贷款的能力，二看地方自筹资金是否落实。

中型化肥厂的技术改造潜力也很大，希望你们能像抓小化肥厂的技术改造一样，对中型化肥厂划分不同的类型，搞出中型化肥厂技术改造的模式和经验。

“九五”计划期间，化肥的增量主要依靠中小化肥厂的技术改造。为了加快技术改造步伐，对项目的审批要简化程序，加快进行。现在我

把任务提出来，希望国务院各有关部门和地方各级政府一起，齐心协力，把这件事办好。

国有小型企业改革不是“一卖就灵”

(1996年3月24日)

这是朱镕基同志在山东省诸城市考察期间讲话的主要部分。此讲话于1996年4月23日以国务院办公厅《内部情况通报》印发各地区、各部门。朱镕基同志在印发此讲话时写了按语：“我在诸城市的讲话记录本来不准备印发。由于《经济日报》连续发表五篇关于‘诸城经验’的报道，并且说是在我肯定这个经验后才发表的，引起了许多同志的误会，纷纷向我询问，因此才决定印发我原来的讲话。我确实肯定了‘诸城经验’，但并不是肯定他们的所有做法，而且对他们的‘股份合作制’试点，在3月28日《人民日报》刊登的我的讲话报道中，也没有提到。但是我也没有否定他们的试点，这并不是‘不坚持原则’，而是对基层、企业、群众进行试点的积极性要注意保护，不能泼冷水，对试点的结果还需要继续观察。”

我这次到诸城来，是为了考察诸城市搞好国有小型企业的经验。去年12月20日，我在北京同国家体改委召开的全国体改工作会议代表座谈时，国家体改委推荐了你们的经验。我当时说过要亲自来看看。这次我来了三天，现在讲一点个人看法。

首先，我要肯定诸城市委、市政府在山东省委、省政府和潍坊市委、市政府领导下所取得的工作成绩，对你们在“八五”计划期间经济的发展表示满意，并且充分肯定你们在采取多种形式搞好小型国有企业改革方面的大胆探索精神，肯定这种探索和改革所取得的成效。

诸城市是县级市，大企业少，在仅有的几家较大企业中，除纺织企业以外，大部分企业的效益还是不错的。尤其是外贸集团，贸、工、农一体化搞得相当好。事实证明，只要按照党中央制定的方针政策，坚持“三改一加强”①，探索并采用多种形式，总是能把国有企业搞好的。山东在这方面做得好，每个市、县从各自的实际出发，都在探索不同的形式，不是只强调一个方面，只搞一个模式、一种办法，没有“刮风”。

① “三改一加强”，指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要把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同企业改组、技术改造和加强企业管理结合起来。

要正确理解和贯彻落实党中央确定的对国有企业实行“抓大放小”的方针。“抓大”，要通过政策，运用经济手段来抓。如果各级政府都来抓，用的又是行政干预的办法，我看国有大企业会被抓得受不了，越抓越死。普遍推行全行业的控股公司，看来可能不行。集行政手段和产权控股于一身，形成绝对垄断，那就没有市场竞争了。“抓大”，主要是为国有大企业创造自主经营的环境，尽量减少行政干预，不要从外部去搞瞎指挥、乱投资，但是要加强监督、审计。“放小”，是把国有小企业放活、搞好，而不是放松、放手不管，使国有资产流失，银行贷款收不回来。

这里，我特别要强调搞好国有小企业的重要性。目前我国国有企业的亏损，主要是小型企业的亏损。去年全国国有企业共亏损541亿元，比1994年增长20%；全国国有企业的1.1亿职工中，亏损企业职工人数达3000多万，占三分之一，主要集中在国有小企业。如果小企业搞不好，连发基本工资都没有保证，社会就难以安定。山东如果要推广“诸城经验”的话，我建议推广诸城市采用多种形式搞活国有小企业的做法。现在看来，搞活国有小企业的一种比较好的形式还是兼并，即由优势企业兼并劣势企业，但也不能千篇一律，更不能以行政手段搞“拉郎配”。

诸城市在搞活国有小企业的多种形式中，有一种形式是把企业净资产卖给职工个人，这种做法可以继续试验。但这种做法也有问题，有些问题可能在短时间里还看不出来。你们把这种形式叫做“股份合作制”，说它是公有制的一种形式，是一种“利益共同体”。但是理论界还有不同意见，有的学者认为，股份合作制只是“一种过渡性的企业组织形式”，“一个企业不可能既具有合作制形式，又具有股份制形式”，而且“既承认股份制原则，又承认合作制的一人一票原则，在企业管理的实际操作中也是有困难的”。当然，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和十四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二〇一〇年远景目标的建议》，已经把股份合作制列

为国有小企业改革的一种形式，但究竟怎么搞，还需要在实践中继续探索。我认为，在当前改革试点工作中，不必对此进行过多争论，理论界应进行探讨，试点还是要进行。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决定》，明确提出一般小型国有企业“可以实行承包经营、租赁经营”，“也可以出售给集体或个人”。一部分小型国有企业卖给个人不会有什么问题，不会影响公有制在国民经济中的主体地位。不管采取什么试点办法，只要符合邓小平同志讲的“三个有利于”就行。因此，你们可以大胆地试。但是也应看到，这种形式目前还只看到一点初步效应，很难说已经成为股份合作制的规范形式，更不具备推广的条件。这两天诸城市有关企业领导在汇报时，把他们所取得的工作成绩都归功于“股份合作制”，说改制后就形成了“利益共同体”，职工的积极性就提高了，产生了前所未有的效益，这也说得太绝对了。从你们的汇报来看，搞得好的企业都得有个好的领导班子，有个好的产品，通过加强管理，增加投入，进行技术改造，才有了这样的综合效果，并不是“一卖就灵”、“一股就灵”。从两天来的汇报和实地考察来看，这种股份合作制形式存在的问题不少。如诸城市泸河轮胎厂，厂长可以买6万元股份，而职工只能买3000元，相差19倍，分红比例又很高(22%)，厂长一年可以分红1万多元，职工只能分600多元。如果这样发展下去，不会是什么“利益共同体”，工人会说他是在为厂长干活。一人一股、一人一票也麻烦，不好操作。企业需要现代化管理，不能搞绝对民主化，也不能搞短期行为、少留多分，否则企业就办不下去了。

对于你们“股份合作制”企业的试点办法，至少有两点我是不赞成的。

第一，把企业净资产出卖给职工收回的钱收归国有资产管理局运营的做法风险很大。国有资产管理局不能管资金的运营，更无能力实现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其结果可能会是按照政府首长的意志或者是随意性加关系学，到处放贷。名为优化存量结构，提高资金效益，实际上把企业行为变成政府行为，投资风险很大，可能以后这些资金很难收回来。我也不赞成把这笔钱交给财政局。现在全国财政信贷有一两千亿元，有些县级财政局的科、室也到企业放高利贷，这是违反国家规定的。财政部在去年的全国财政工作会议上已经明确提出，要清理整顿财政信用，财政系统的钱如果借给企业有偿使用，必须委托银行

发放贷款，不能自己办信贷。现在的金融机构太多了，因此，我也不赞成成立基金会。另外，从诸城的国有小企业来看，资产负债比例都很高，平均在70%左右。如果把出卖企业净资产给职工所得的钱收归财政，表面上看来，国有资产不会流失了，实际上收回财政的只有30%。而其他70%是银行贷款，但收回这笔钱的风险就更大了，因为企业原本无偿使用的净资产现在要给股东分红，股息比银行贷款利息还高，也就是说，企业的资产负债比例提高了。企业在这种高负债情况下，是很难办好的。

第二，改制企业职工按股分红问题。现金直接分红，一是扩大了消费基金，二是削弱了企业积累能力。特别是对于一些资产负债率很高、贷款风险很大的改制企业，更应明确提出暂时不能实行现金直接分红。如果要分红，银行应该加强监管，并要求企业制订还贷计划，如果不按计划给银行还本付息就不能给职工股份分红。银行贷款都是老百姓的钱，不能不还。红利可以作为职工扩股留在企业。

我并不要求你们马上改变试点办法，你们可以继续试下去。但是，从实际出发，我建议最好是：第一，出卖企业净资产给职工所得的钱，不要收归财政或国有资产管理局，而是留在企业里使用。实际上就是，原来的企业净资产作为国家股，职工集资的钱是扩股，用这个钱还掉部分银行贷款，资产负债比例降低了，企业经营就会好转。第二，说服职工，集资股暂时不实行现金分红。职工股和国家股的红利，都作为扩股留在企业，以扩大企业积累。

搞好国有企业的根本出路还是实现“两个根本性转变”①，提高经济效益。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四句话和江泽民同志总结的 “三改一加强”，一定要全面贯彻。只强调四句话中的一句话或“三改一加强”中的一个方面，都是不能把企业真正搞好的。

---

① “两个根本性转变”，指经济体制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

不要过多责备企业，国有企业确实面临着许多外部困难。但是也要进行分析，不能把国有企业没有搞好都归咎于三点困难：产权不明确，历史包袱太重，资金紧张。资本主义国家实行私有制，产权该是

明确了吧，但照样有大量企业亏损、倒闭。历史包袱重，大多是由于企业固定资产投资失误，大量投入而无效益，或者是由于产品不适销对路，还盲目生产，造成库存积压，形成沉重债务。这两点不根本转变，包袱是永远甩不掉的。现在说流动资金紧张，实际上是大量企业把银行贷给的流动资金挪用到固定资产投资项目的资金缺口上去了。银行发放的流动资金贷款并没有减少，每年还有大量增加，增长率大大超过生产增长速度。很多国有企业不但挪用银行流动资金贷款搞建设，而且把企业的自有资金也都填进去了。据工商银行总行对20万户企业的调查，1992年年底自有流动资金为580亿元，1993年年底只剩340亿元，1994年年底为180亿元，到1995年年底已是负19亿元了。流动资金全靠银行贷款，企业经营还能不困难？我多次讲过，企业需要的流动资金贷款，只要是一不挪用于搞固定资产投资，二不制造积压产品，银行要充分保证，贷款规模可以追加。银行要加强为企业服务的观点，深入企业、市场进行调查研究，对贷款使用情况进行追踪，千方百计减少不良贷款。

政府对国有企业不要干预太多，要帮助企业选好领导人和配好领导班子，这对企业是至关重要的。为了帮助企业领导班子的健康成长和肌体更新，确保国有企业健康发展，要认真贯彻国务院发布的《国有企业财产监督管理条例》。政府对企业经营者要实行有效监管，尤其要注意防止企业经营者工资收入过高和投资决策的失误。

总之，我没有否定“诸城经验”，而是充分肯定诸城市采取多种形式放活、搞好国有小型企业的大胆探索精神。我只是希望你们不要把“诸城经验”归结为“股份合作制”。

致薄一波同志的信

(1996年4月24日)

薄老：

收到您亲笔签名送给我的《七十年奋斗与思考》，皇皇巨著，装帧精美，当即拜读，不忍释手。尤其是到延安见毛主席和草岚子监狱几段，写得尤其感人。在张玺①同志处工作时，我认识了刘锡五②同志，现在才知道是您送他一只烧鸡才出来的。您在八八高龄还不辞辛劳，为党的历史提供了见证，对我们进行了深刻的共产主义和共产党的教育，我们应该对您表示崇高的敬意。由于我明天要出差贵州、江西，调查扶贫工作，不能出席四月卅日要召开的《七十年奋斗与思考》(上卷)座谈会，特此奉函致意，祝薄老健康长寿，并对中卷、下卷的出版翘首以待。

---

① 张玺，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国家计划委员会常务副主任，参与组织编制第一个和第二个五年计划。

② 刘锡五，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共吉林省委书记、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副书记等职。

敬礼

朱镕基

4.24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

薄老：

收到您亲笔签名送给我的《七十年奋斗与思考》，皇皇巨著，装帧精美，当即拜读，不忍释手。尤其是到延安见毛主席和草岚子监狱几段，写得尤其感人。在张玺同志处工作时，我认识了刘锡五同志，现在才知道是您送他一只烧鸡才出来的。您在八十高龄还不辞辛劳，为党的历史提供了见证，对我们进行了深刻的共产主义和共产党的教育，我们应该对您表示崇高的敬意。由于我明天要出差贵州、江西，调查扶贫工作，不能出席四月卅日要召开的《七十年奋斗与思考》（上卷）座谈会，特此奉函致贺，祝薄老健康长寿，并对中卷、下卷的出版翘首以待。

敬礼

朱镕基

4.24.

QI SHI NIAN FEN DOU YU SI KAO

上卷

战争岁月



七十年奋斗与思考

薄一波　著

BOYIBOZHU

中共党史出版社

《七十年的奋斗与思考》上卷《战争岁月》于1996年由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

关于江西经济工作的几点意见

(1996年4月29日～5月5日)

1996年4月29日至5月5日，朱镕基同志在江西省考察工作，先后考察了九江、景德镇、南昌等地。这是朱镕基同志在考察期间讲话的要点。

这次我和国务院有关部门的同志到江西来，通过调查研究，对江西有很好的印象。农业搞得比较好，主要农产品实现了净调出，财政量入为出，工业有了一定基础，这些为将来的发展创造了很好的条件。取得这样的成绩确实不易，这充分说明你们贯彻执行党中央、国务院的政策是认真的，并且结合你们自身的特点有很多创造。这些成绩也是与你们广大干部群众艰苦奋斗、扎扎实实地工作分不开的。江西的工作大有希望。

你们在汇报中谈到，经济生活中还存在这样那样一些困难和问题。我看，这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困难完全可以克服。关于江西工作我讲几点意见：

一、关于农业

江西工业这几年为什么能有起色？一个重要原因是有农业这个好基础。农民生活改善了，有了钱，就有市场，否则工业是办不起来的。我赞成你们继续加强农业这个基础，在这个方面做文章，这是江西的优势。你们的种植业搞得不错，但我觉得你们在养殖业和垦殖业方面还有很大的潜力。我很赞成你们提的口号："在山上再造一个江西"。你们提出，使山上的产值逐步达到粮食作物的产值和整个耕地的产值，这是可以做到的，是大有文章可做的。农业基础的稳固，对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推动力是很大的。

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依靠科技进步，种子、化肥、科学的耕作方法都很重要，尤其是种子的引进、销售，要尽可能为农民做好配套服务工作。办好农业科技站，告诉农民怎样使用良种、怎样科学施肥、怎样有效地管理。省里领导同志跟我讲，现正在全省推广良种栽培、旱

床育秧、地膜覆盖、配方施肥、饲料开发等几项技术，主攻几项农业工程, 争取实现主要农产品稳产高产。这些事都很重要，你们要抓好。我希望对农业还是要加大投入，要坚持抓骨干水利工程与加快小型农田水利建设相结合，把基础打稳固，这一条做好了，将来一本万利。

在座谈中，一些同志反映目前棉花多了，库存积压严重。从全国的情况看，棉花并不多。去年的国家储备加上今年新增的1000万担，总共也不过3000万担棉花，我们历史上(1983年至1984年)国家储备加周转库存曾经达到过近9000万担。为什么现在都说多了？一是市场有了变化，二是我们的纺织工业没有搞好。国家要求压锭改造，但很多地方不是压锭，而是在扩锭，不是在改造，还是老产品，老是出口“两纱两布”①，怎么会有前途呢？现在我们甚至竞争不过印度、巴基斯坦。国外市场不好销了，反过来棉纺厂就不要棉花了，现在纺织企业棉花周转库存只有13天，你们这里只有10天，这怎么能保证生产配棉的需要？纺织行业亏损严重，于是把棉花的库存放在国家身上，放在供销社，这怎么行呢？现在有人议论，说棉花太多了，是由于棉花收购价格提得太高了。这个观点是错误的。不提高怎么保护农民种棉的积极性，农民怎能富起来？吴官正②同志也是赞成提价的嘛！我看过九江一个乡，农民情绪很好，这就是政策的效果。因此，现在的问题不是棉花多了，主要是纺织厂不按正常需要储备棉花了。最近国务院作了一条规定，要求每一个纺织厂都要储备两个月的生产用棉，流动资金不够可以由银行贷款。这实际上是工商银行的流动资金贷款增加了，而农业发展银行的收购资金占用减少了，工商银行把钱贷给纺织厂，纺织厂把棉花加工卖出去了，钱就收回来了。银行应该想通这个道理。国务院准备出台一个政策，将来在国家储备的棉花卖给纺织厂的时候，把利息和保管费用也加到棉花价格里面去，这样纺织厂也许就会有早买棉花的积极性。纺织工业的困难是暂时的，最终是能够搞好的。

---

① “两纱两布”，指棉纱、棉涤纶纱，棉坯布、棉涤纶坯布。

② 吴官正，当时任中共江西省委书记。

二、关于工业

对江西的工业来说，我指的主要是加工工业，要把工作的重点，从大规模地搞基本建设转向加强管理、发挥效益方面来。具体地讲，就是项目不可搞得过多，规模不宜过大。这次来江西，同一些企业的同志进行了座谈，也看了几个厂子，给我的印象都是好的，但普遍的问题是负债率比较高。这一方面说明前一阶段基本建设和技术改造有成绩，另一方面也说明企业包袱较重，要注意消化。不消化，继续往前搞，主要靠银行贷款搞建设，规模搞大了，包袱背得很重，将来翻不了身。所以，现在就应该要求企业加强管理、发挥效益，要还债，把包袱减轻，把资产负债率降到可以承受的程度，然后再扩大规模。

当然，填平补齐、小改小革还是要搞的。但总的来讲，大规模投资时期已经过去了，要集中精力抓市场、抓质量、抓管理、抓配套。下决心把精力真正转到加强企业管理上来，强化市场战略，努力提高市场占有份额，在这些方面多下工夫。要调集些精兵强将去开拓市场，去争取更多的订货，把现有生产能力充分发挥出来。

几年前到江西时，省里向我提了景德镇陶瓷改造这个项目。大家都很关心，给了支持。近几年景德镇陶瓷企业技术改造花了不少钱，但现在仍然很困难。我看了一些工厂，总的感觉是，你们在开拓市场、营销策略方面需要更加重视，在这方面的视野要更开阔一些，要在销售方面大做文章，把最有本领的人才推出去搞销售。过去你们陶瓷工业在指导思想上可能比较注重提高产量，但如果不注意开拓市场，那你搞出来的这些东西只不过是一些礼品、展品、奖品。投入了大量资金，没有什么经济效益，搞技改的账也就还不了，导致负债率高、企业经营困难。要充分发挥技术改造的效益，使借的钱能够还得了，就要把产品“打出去”。没有这个前提，你再抓改革、改造都是没有用的，没有市场，一切都是空的。

陶瓷工业有很多文章可做，工业陶瓷、建筑陶瓷应当发展，但日用陶瓷才是中国的特色，其他东西要搞，但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陶瓷行业的问题。振兴瓷器，首先要振兴日用瓷器。这需要很多专家去研究市场，开拓市场。现在国外那么多中餐馆，如果都用你们的瓷器，那可不得了！要调一批懂外文、懂外贸，又熟悉陶瓷文化的人来搞销售。同样，国内市场也是很大的，老百姓一日三餐都要用，现在消费档次提高了，谁都想有一套像样的餐具。景德镇的陶瓷要“打出去”，要打

“名牌战略”，不能老是窝在景德镇，“凤凰”飞不出去，就没有大作为。搞好国有企业必须解决好富余人员问题。景德镇陶瓷行业六万多工人，平均每个家庭一个陶瓷工人。人这么多，劳动生产率这么低，负债率高，差一点就资不抵债了。原因很简单，不管你们搞多大的技术改造，但人一个都没减下来，工资照发，设备照样折旧，不亏才怪呢!

三、关于开发区建设

开发区的建设，你们这里受害比较轻，但也不是一点没有。一些地方大搞引进外资，引来一些什么东西？光赚你的钱，占领你的市场，对你一点好处都没有，你引它干吗？我们现在既不缺外汇，也不缺钱，缺的是技术和管理。我不是说不要引进外资，我们对外开放的政策是不会改变的，但确实要讲究引进的方法、引进的结构。现在境外一些商人纷纷跑来联营合作，结果把利润分走了，把市场拿走了。如果他能帮助你打开国际市场，那么，应该分他一份利润，甚至大部分利润都可以分给他。但是，现在不是这样，明明是自己可以生产而且很畅销的产品，非要分一大块市场和利润给外商，这是何苦呢！所以，我们要好好地总结经验教训。



1996年5月2日，朱镕基在江西省景德镇瓷厂考察。

四、关于“资金紧张”问题

从1993年加强宏观调控以来，我们不但没有收紧银根，同时每年贷款规模的增加远远超过生产的增长。那为什么还感到资金紧张呢？就是各地把资金都压在基本建设上了，不能动了，这是最重要的原因。项目一倍两倍地超概算，又不能按期建成投产，总在那里拖，建成了，产品也没有市场，结果把资金都压死了。我多次讲，我们没有紧缩银根，每年贷款增加20%多，怎么叫做紧缩银根呢？所以，我们首要的是要严格控制基本建设的贷款，抑制拼命上项目、无限制地要资金。基础设施建设固然要抓住机遇，但也不能过急。现在你们这里工资比较低，民风还比较朴实，工程造价比较低，确实要抓紧搞一些基础设施建设。京九线对江西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是不可估量的，首先要发挥这个作用，然后有多少钱办多少事，不要借那么多债。大家的指导思想要真正转变到加快“两个根本性转变”上来。

对企业的流动资金，在两个前提之下是可以保证的：一是不要挪用去搞基本建设投资；二是产品要有市场，要能销得出去，生产积压产品是无效劳动。在这两个前提之下，你需要的流动资金，都应予以解决。市里解决不了，省里解决；省里解决不了，总行解决；总行解决不了，找人民银行、找我，我就是多发票子，也要帮你解决。只要它符合两个前提，这个资金是可以收回来的。

加快退税速度，防止出口大量下降

(1996年5月6日)

这是朱镕基同志就加快退税进度以遏制出口下降问题，写给财政部部长兼国家税务总局局长刘仲藜、国家税务总局副局长项怀诚的信。

仲藜、怀诚同志：

今年以来，外贸出口开始萎缩，纺织工业尤其困难，亏损严重甚至停工。退税率降低也是一个原因，但此项政策必须坚持。根据财政部安排，今年退税650亿元(其中当年退税450亿元，归还以前欠税200亿元)。按此平均一季度应退162.5亿元，但财政部实际只退121亿元，比去年同期还少退22亿元，这样更加重出口企业困难。因此，为未雨绸缪，防止出口大量下降，我建议加快退税进度，请考虑在上半年退完全部以前欠税(200亿元)，也就是说在上半年退税425亿元，下半年退税225亿元。如果技术上有困难，也可往后再匀一匀，总之要加快。我认为这是遏制出口下降的最有效措施。人民币贬值的办法不可取，这将影响对整个金融的信心，微调当然总是需要的。以上是否可行，负面影响如何，即请研告。

抄报李鹏、家华①、岚清①、邦国①同志。

朱镕基

5.6

① 家华，即邹家华。岚清，即李岚清。邦国，即吴邦国。

抄报 李鹏、家华、岚清、邦国同志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

朱镕基

仲华、怀诚同志：

今年以来，外贸出口开始萎缩，纺织品尤其困难，亏损严重甚至停工。退税率降低也是一个原因，但此项政策必须坚持。根据财政部安排，今年退税650亿元（其中当年退税450亿元，归还以前欠税200亿元）。按此平均一季度应退162.5亿元，但财政部实际只退121亿元，比去年同期还少退22亿元，这样更加重出口企业困难。因此，为未雨绸缪，防止出口大量下降，我建议加快退税进度，请考虑在上半年退完全部以前欠税（200亿元），也就是说在上半年退税425亿元，下半年退税225亿元。如果技术上有困难，也可往后再匀一匀，总之要加快。我认为这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

遏制出口下降的最有效措施。人民币贬值的办法不可取，这将影响对整个金融的信心，微调些总是需要的。此是否可行，负面影响如何，即请研究。

朱镕基

5.6、

致李政道先生的信

(1996年5月30日)

1996年5月28日，朱镕基同志到中国科学院会见并宴请了李政道，席间谈及一些名人诗词。这是两天后朱镕基同志致李政道的信。李政道，美籍华人物理学家，在1957年与杨振宁共同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

政道兄：

回来后查了“红了樱桃，绿了芭蕉”出处，系出自南宋词人蒋捷，其词为：

一剪梅(舟过吴江)

“一片春愁待酒浇，江上舟摇，楼上帘招。秋娘渡与泰娘桥，风又飘飘，雨又萧萧。何日归家洗客袍？银字笙调，心字香烧。流光容易把人抛，红了樱桃，绿了芭蕉。”

所以记错为李清照，因易安“如梦令”词云：

“昨夜雨疏风骤，浓睡不消残酒。试问卷帘人，却道海棠依旧。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其中“绿肥红瘦”一语亦属千古难得也。

关于“三星在天”，语出《诗经》唐风绸缪篇。《毛传》①以为“三星”即参星，《郑玄笺》②以为即心星，均指一星而言。近人朱文鑫《天文考古录》以为，三星是指一夜之间，三颗星座顺次出现。首章“绸缪束薪，三星在天”指参宿三星；二章“绸缪束刍，三星在隅”指心宿三星；末章“绸缪束楚，三星在户”是指河鼓三星。供参考耳。

---

①《毛传》，是汉代《毛诗故训传》的简称，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完整的《诗经》注本。

②《郑玄笺》，是汉代最有代表性的《诗经》训释著作之一，系东汉末年郑玄所作。

我和劳安衷心祝愿惠君①早日康复，言不尽意。

朱镕基

一九九六年五月三十日

---

① 惠君，即秦惠君，李政道夫人。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

政道兄：

回来后查了"红了樱桃，绿了芭蕉"出处，系出自南宋词人蒋捷，其词为：

一剪梅（舟过吴江）

"一片春愁待酒浇，江上舟摇，楼上帘招。秋娘渡与泰娘桥，风又飘飘，雨又萧萧。何日归家洗客袍？银字笙调，心字香烧。流光容易把人抛，红了樱桃，绿了芭蕉。"

所以误错为李清照，因为她"如梦令"词云：

"昨夜雨疏风骤，浓睡不消残酒。试问卷帘人，却道海棠依旧。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其中"绿肥红瘦"一语亦系千古难得也。

关于"三星在天"，语出《诗经》唐风绸缪篇。《毛传》以为"三星"即参星，《郑玄笺》以为即心星，均指一星而言。近人朱文鑫《天文考古录》以为，三星是指一夜之间，三颗星座顺次出现。首章"绸缪束薪，三星在天"指参宿三星；二章"绸缪束刍，三星在隅"指心宿三星；末章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

"绸缪束楚，三星在户"是指河鼓三星。供参考耳。

我和劳安衷心祝愿惠箸早日康复，言不尽意。

朱镕基

一九九六年五月三十日



1999年9月30日，朱镕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荣获“友谊奖”的外国专家和国外人才交流组织的代表。图为与李政道亲切握手。右一为原中顾委常委张劲夫。

要调整完善加工贸易政策

(1996年6月5日)

1995年12月7日，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国务院提出要对加工贸易实行进口料件保证金台账监管制度。1996年6月5日，国务院在江苏省苏州市召开加工贸易保证金台账试点工作座谈会。出席会议的有国务院有关部门和试点城市有关负责同志。这是朱镕基同志在座谈会上讲话的主要部分。

加工贸易保证金台账①试点工作，从去年11月开始以来已经进行半年多了。根据大家总结的情况，试点工作取得了预期的效果，是成功的，表明保证金台账制度已为许多外商所接受，看起来阻力基本没有了，可以推行。这证明国务院关于对加工贸易实行保证金台账制度的决定是正确的、可行的，今年7月1日在全国推行没有问题。有关部门、有关地区，特别是海关总署、中国银行对这项工作很重视，工作很有成效，我对同志们付出的辛勤劳动表示感谢。

① 加工贸易保证金台账，是对加工贸易企业的合同保税料件实行的一种管理手段。企业进口料件时，先在指定银行账户中存放等值于进口料件的关税和进口环节增值税税款的保证金，海关根据企业加工产品出口或内销的情况进行核销并确定保证金返还及扣除。

实行加工贸易保证金台账制度，是要达到两个目的：一个是监管有效，真正能够查出漏洞；另一个是方便基层，两者兼顾。如果既不有效，又不方便，劳民伤财，那就不要搞了。试点工作要加强宣传，希望三个试点城市都写篇文章在地方报纸发表，从你们保证金台账制度的试点情况说明有什么效益，如何方便操作、客商没有怨言、各方面都比较满意、对国家有利等。中央有关单位也要写份材料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把试点效果和情况昭告国内外。新闻界的同志要注意，有的同志不太了解业务，听了个别的反映，本不是倾向性问题，不是主流，你在报纸上一讲便成了主流，大家对这个办法就会表示怀疑，

对改革造成很大阻力。我们要加强正面宣传，有些个别问题可以通过内部协调来解决。

下面，我着重讲一个问题：加工贸易现在已经到了应该很好总结、研究和调整的时候了。我认为，加工贸易在历史上起了重大的作用，我国沿海地区的经济发展、经济特区的发展，与“三来一补”①的加工贸易也是分不开的。没有这个方式，我们的外贸事业、改革开放不可能发展得这么快。但是，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改革开放的深入，特别是我们国民经济发展到了相当高的程度，继续发展像现在这样的加工贸易，极不利于国民经济的进一步健康发展。我们应该客观地看到，时至今日，与其他进出口贸易方式相比，加工贸易方式有很多缺点，起码可以说有五个缺点：

① “三来一补”，指来料加工、来样加工、来件装配和补偿贸易。

第一，收不到税。政府从这里拿不到一分钱。加工贸易从开始占进出口贸易的5%到10%，发展到现在占50%多，政府却一个钱都收不到。如果这样下去，国家还怎么发展呢？

第二，拿不到技术，核心技术更拿不到。科研开发权不掌握在我们手里，如果说通过合资我们还能拿到一点技术的话，通过加工贸易则一点技术都拿不到，都是简单劳动。

第三，挤占了我们的国际市场。我们出口近1500亿美元，其中加工贸易占700亿到800亿美元，一般贸易出口实际只有700亿美元。外国人的商品把国际市场占了，我们自己的产品却出不了口。特别是服装，也不是什么高技术产业，利润大部分被外商通过加工贸易拿去了，我们自己生产的服装却出不去。在日本，七八十年代，我们中国货只能摆地摊，货架上看不到中国货。1994年，我访问日本，专门去看了纺织品售货中心，其中大约有40%是中国产品。从摆地摊到上货台，中国货能占这么大的比重，了不起。但是，这些中国产品大部分都是加工贸易，是外商在上海、江苏等地设厂加工的，我们拿了点加工费，但他们把我们的国际市场占了。现在外国所谓“反倾销”，对我们“制裁”，谁在倾销？不就是加工贸易产品在倾销吗？不就是外国人自己在

倾销吗？加工贸易给我们很便宜的价钱作为劳务费，然后外商把产品打到外国市场去，利益都是他们得了，反过来又骂我们。

第四，挤占了国内市场，偷漏税收。进口原料加工产品，如果转为在国内销售，按规定要补缴关税、进口环节税。但现在以加工贸易方式进口原材料，产品却在国内市场销售，一是把市场占了，二是把税偷了，形同走私，或是变相走私，这个损失太大了。现在谁也说不清通过加工贸易走私造成的损失有多少，我看至少有1000亿元。特别是对国民经济造成危害的“走私糖”，一个广东、一个广西，把加工贸易审批权下放到地、县，外经贸部把审批权下放到省，大家都可以审批进口原糖。糖现在能卖到哪里去？国际上都供过于求，还能出口吗？全部销在国内市场了。国内市场的容量也就几百万吨，而以加工贸易名义进口的就有200万吨原糖，恰好我们的糖料又丰收，市场糖价就猛跌，因为进来的原糖便宜，又不收税。糖价一跌，糖厂就无法维持，拒收制糖原料，广东、广西的蔗农和黑龙江种甜菜的农民苦得不得了。我今年1月份到东莞去开会的时候，朱森林①同志对我讲，银行不能把资金卡紧，现在糖厂都“打白条”，农民要“造反”了。我说，森林同志，现在不是这个问题，不是银行不给钱，而是糖厂自己不愿意收购。糖厂榨出来的糖都压在库里，实不出去，周转不开，糖生产不了，它收购糖原料干什么？这不是银行的问题，这叫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广东历来就是制糖的基地，加工贸易把自己的糖厂打垮了。归根结底，是省经贸部门没有管住加工贸易。还有，就是1992年到1993年不知谁批准建的精炼食用油加工厂，每年200万到300万吨的生产能力，都是现代化的工厂。你现在不给人家批进口油料，结果怨声载道，赔得一塌糊涂。这样搞也不对呀！你批准人家建厂，又不批准人家进口油料，这叫什么对外开放政策？现在搞得进退两难，国内的食用油价格在下跌，农民在埋怨，库存油快要接近历史最高点。批准搞食用油加工贸易是为了出口。可是你根本就不可能出口，转而都销售在国内，进一步压低市场油价，那农民就不能种油菜了！你们看这种“加工贸易”的危害有多大！

---

① 朱森林，当时任广东省省长。

第五，给城市社会治安、环境带来一系列问题。

当然，加工贸易时至今日，不是说没有好处，总是解决了一批农民工就业。从事加工贸易的大概有1000万人，每人每月工资500元左右，加起来一年有五六百亿元。但是，这些加工产品出口后外商能赚到的钱就不是五六百亿元了，而是2500亿元、3500亿元。钱大部分是被别人赚去了。我们拿了这五六百亿元却付出了巨大的损失。

现在，我们要好好研究加工贸易这种形式的发展方向。对此，我讲几点意见：

其一，当务之急是加强监管，使其合法经营。既然是加工贸易，产品一定要全部出口；如留在国内销售，一定要补税。保证金台账制度刚开始建立，还要进一步完善。今后如若发现保证金台账建立后个别企业仍在偷税，仍在走私，一定要严厉处罚。严格监管制度，特别是海关总署、中国银行负有重大责任。建立保证金台账制度，绝不是否定海关总署在监管方面的一套制度，对海关总署的工作要充分肯定。但要看到，任何一个监管制度都会有漏洞。多一道手续，增加一个保证金台账，不是可以把监管工作做得更好吗？增加一道保证金台账是不是就那么有效，会比海关总署现在的监管更有效？那也不一定，但总是会好一点。希望海关总署把我的意思传达下去，我对你们的工作是给予充分的、完全的肯定，但是还要进一步加强监管，多一些部门加强监管，对海关总署有好处。中国银行也要解决这个问题，谁为主？谁为辅？主要还是要靠海关总署，海关总署这一关把不住，中国银行再有本事也不行。中国银行应该意识到自己的责任，现在党中央、国务院要你们协助海关总署把这个门把住，今后，你们的制度、手段、工作都要跟上去，和海关总署密切配合。两家要亲密无间，同心同德，通力协作，才能把这个事情做好。加强监管的目的是为国家挽回损失，但是不要使加工贸易下降，还是要保证现有企业正常的加工贸易继续发展。不要因为我在前面讲了那么多缺点，就认为加工贸易没有好处了，那也不对，它还是养活很多人，关系到社会稳定的。

其二，继续研究调整进出口贸易的结构，逐步减少加工贸易所占的比重，不能让加工贸易超过其他贸易方式的发展。道理就是前面所讲的，而且历史和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深圳现在已经停止走加工贸易这条道路，东莞也意识到要向高新技术发展，增加新优势，还靠过去的“三来一补”是不行的。东莞搞了个彩色显像管厂，那就不是加工贸

易，而是他们自己办的厂，从国外买进来设备，现在已搞到年产250万台，税收、利润都很大。如果还搞加工贸易就糟糕了，什么也拿不到。我的意思是，现在要想办法用别的方式来代替加工贸易方式，对增量进行调整，对存量还是继续完善原有的经营管理方式。凡是增量的，要尽量采取合资经营或引进技术、引进设备的方式，尽量少搞加工贸易。深圳、东莞这两块地，寸土寸金，搞加工贸易把绿化破坏了，挤占了一大块地，划不来。因此，大家要研究如何调整、改革、完善加工贸易。我建议有关部门特别是国家计委、国家经贸委、外经贸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你们都要研究。要研究对策，把加工贸易现状搞清楚，肯定它的历史成绩，研究它的现状和发展方向。我认为，起码有三个政策可以采取，这样可以达到调整加工贸易的目的。

第一，严格保证金制度。新搞的加工贸易，要交保证金，不是空运转。先交保证金，要是变相走私，我们就扣款。欧盟各国都有严格的监管方式；日本的监管也有一套办法，严格得不得了。当然，我们与它们的历史条件不一样，如果我们要采取那么严格的监管方式，恐怕一下子也搞不起来，但至少要实行真正的保证金制度。

第二，限定加工贸易的范围。粮、油、糖这类涉及国计民生的敏感商品，绝不允许搞加工贸易；否则，不但会偷漏大量的税收，而且会冲击国内市场。

第三，采取一些办法和措施，鼓励把加工贸易转变为合资、合作经营，引进技术、引进设备等。搞改革要首先考虑加工贸易现状，对存量不要乱动，要在增量上做文章，在增量上做文章也要采取渐进的方式。分税制改革就是这样的，如果一下子把地方的税收拿到中央来，不大容易被接受。要采取渐进的方式，逐步来调整，通过增量方式来发展。我觉得研究调整加工贸易的时机已经到了，请各有关部门共同研究。

上海发展中需要注意的几个问题

(1996年6月11日)

1996年6月7日至11日，朱镕基同志在上海市考察工作。这是朱镕基同志与市委、市政府负责同志座谈时讲话的主要部分。

上海的工作在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下，做得很有成绩，这方面我不多说了。我认为，上海发展中有几个问题需要引起注意。

一、上海要发挥科研技术中心的作用。进一步发展高技术、高附加值的产业，是上海的当务之急

上海能有今天，是由于过去搞了一批在当时来说或者现在来看还是技术比较先进的、高附加值的产业，不然，财政收入不会有这么大的增加。现在看来，“七五”末期开始搞的、到“八五”后期发挥了很大效益的这一批产业，已差不多达到顶点了。如果再没有后续东西上去，如果老生产积压产品、不提高产销率，上海的发展速度就要降低。同时，上海又不适宜搞那些劳动密集型的产品，因为没有前途，也赚不了多少钱。我到苏州时，当地同志跟我讲，现在苏州生产的电扇、空调器等加起来搞到了年产500万台，但一台只赚10元钱，觉得不合算。现在，他们的自行车厂也不想要了，愿意卖给上海的自行车公司。他们不想再搞这个，想往高新技术发展。上海更要这样做，劳动力密集的产业都要往外转移，搞兼并、联营，扩散出去，搞高新技术。这种高新技术不一定是很高很新，而是在这个行业里是领先的，如果没有这个基础，第三产业就推动不起来。光强调发展第三产业，没有第二产业的基础，是发展不起来的，上海的优势也发挥不了，而上海的优势恰恰就在这方面。

过去，我总觉得深圳没有什么像样的产业，也没有上海这样的素质和人才。但最近到深圳看了以后，我发现某些方面上海就要或已经落后于深圳，如果上海再不警惕，将来会继续落后。那天有几位同志与我谈“909项目”①，我就提醒他们，你们去深圳看看。我推荐你们看两个厂：一个叫华为，做程控电话的；另一个叫康佳，做彩电的。这两

个企业的发展对我启发很大，它们的经营机制非常灵活，无上级主管单位，非常重视产品开发。去年12月，我到上海浦东考察了上海贝尔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贝尔”)。我原以为德国贝尔公司是全世界最好的，人均的创汇、利税、劳动生产率都超过美国公司。但我到华为一看，华为更好，而且华为的潜力比贝尔更大。华为有2000多人，贝尔有1000多人，但是华为员工80%以上是大学生，贝尔只有58%。华为有40%以上的人搞科研开发，现在生产程控电话的规模要逐步赶上贝尔了。今年一个月，华为生产程控电话30多万台，一年差不多是400万台；贝尔去年生产了429万台。华为在开发上下了很大力量，公司领导的市场观念很强，现在同所有国内中标建成的电话网都已经联网，任何软件上的问题都可以在总部解决，硬件通过设在每个省的办事处送货上门，售后服务非常好。华为的集成电路大大高于贝尔的水平。贝尔现在生产的是1微米，正在自己设计加工0.5微米。华为正在设计0.35微米，比“909项目”的水平还要高。华为搞的程控电话柜子比贝尔的还小得多，各种多功能、多媒体和程控电话机内部的接线都用光纤，贝尔没有做到。所以我就说，华为有能力跟国际大公司竞争，贝尔还不具备这个力量。因此，上海要居安思危啊！当然，上海是不会到“危”这一天的，如果上海到了“危”这一天，全国就没有希望了。

---

① “909项目”，指上海华虹NEC电子有限公司集成电路芯片生产线项目。

再讲康佳彩电。康佳生产的彩电在这几年间国内市场占有率已经是第二位，第一位是四川长虹，年产近300万台。我印象最深的是康佳的新产品开发，每年都推出很多新产品。上海的彩电生产下了很大力量，但没有搞上去，现在年产量是125万台，还是不行，打不出去，关键在于科研技术开发的力度还不够。

我举这些例子，就是说上海要把科研开发搞上去，成为全国最好的、集中最优秀人才的科研开发中心。有了这一条，上海的产业一上去都是高附加值的。

二、上海要往外打，去占领国际市场

这既可以为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创造条件，又能解决上海就业的困难。我去过非洲、拉丁美洲，最近到过东南亚。我想，只要我们有真正的企业家，就可以打进它们的市场赚大钱。特别是上海的发电设备制造业，现在还没有摆脱困境，国内一半以上厂家是购买外国设备，让人家占领了我们的市场。我们应该“打出去”，现在东南亚的电力发展很快，那里的市场很大。这次我出访回国以后，决定由周正庆①同志牵头，从银行贷款中划出一块，搞出口信贷，支持发电设备出口。现在的问题是，缺少真正的为国为民的人才、忠诚谋国的人才。许多搞外贸的人实际上是在为自己办事，赚了钱入了自己的腰包，亏了以后在公家账上报销，这样下去不得了！如果我们有像下南洋的陈嘉庚那样的人、那种精神，就一定能占领东南亚和非洲市场。我们的产品比他们的便宜得多，把零部件运出去一组装，马上就能赚钱了。因此，要把“打出去”作为上海的重要发展战略，我支持你们“打出去”。希望上海市委、市政府做一个部署，中央为你们提供金融支持，一定要物色一批忠诚为国的人，工资高没有关系，但不能什么钱都进个人的腰包。这一点，跟我一起出国访问的几位部长思想都是通的，特别是外经贸部会支持的。这也是国务院的一个方针。

---

① 周正庆，当时任国务院副秘书长、国务院证券委员会主任。

三、上海在城市建设中要注意的问题

最近，我看内参上有个反映，说浦东已经开始出现空楼了，于是记者就说中央关于浦东的政策没有落实。后来，我请何椿霖①同志去调查了一下。他说，凡是中央已经确定的政策都落实了，但是有些事情，比如浦东外资银行开放做人民币业务，因为中央还没有定下来，不能说没有落实。我从昆山过来，看到路上有相当一批小别墅都是空的，我就很担心。这几天我从电视上看到，陆家嘴高楼林立，要当心这些楼盖起来以后，更要空了。对这个问题，美国纽约联邦储备银行行长威廉·麦克唐纳也跟我谈过。他说，到了上海，看到浦东的房地产搞得太多，这也是一个问题。因此，我觉得你们也要居安思危，未雨绸缪。我们1993年吃亏就是吃在房地产发展得太快，至今广东至少还积压了500万平方米商品房，海南也差不多，大量资金都压在那里，遗留下来的问题至今还未解决。

① 何椿霖，当时任国务院副秘书长。

怎么办呢？我最近在考虑：第一，上海还是要加快改革开放的步伐。外商不来，你们这些楼卖给谁？租给谁？你们要经常讲讲这个问题的迫切性。从全国来讲，金融和保险业的开放要从严掌握，但是上海还是要加快，因为在上海风险不太大，能抓得住、看得见，能及时采取调整的措施。如果不把人家放进来，没有大量的银行、保险公司和证券商进入，没有外贸公司总部和像八佰伴这样的外国公司总部往上海搬，你们这些楼必空无疑，将来是上海的一场灾难。要重视这个问题，要把这个道理讲清楚。要把外国的一些大企业包括它们的总部吸引到上海来。第二，要进一步加强城市基础设施的建设。这几年，上海的城市基础设施已经相当不错了，已经够国际城市的水平。但是，印度尼西亚雅加达这个城市的基础设施比上海还好，大楼林立，120多家外资银行设在那里，都是银行大楼，整个城市设计非常漂亮。我认为，这在东南亚国家城市里是最好的，转一圈，你看不到很破烂的地方，贫民区都给遮起来了，绿化搞得很好。上海也要做到这个程度。第三，我建议控制上海浦西的建设。近日我出去看了一下，浦西的高楼大厦盖得不少了。我主张浦西不要再建太多高楼，主要是增加绿化面积。上海的绿化面积太少。记得我在上海工作时讲过，拆了房子后，居民要搬到浦东去，这样才能减少浦西的人口，改善浦西的环境。将来外国人到上海来不是要看浦东，因为那种高楼大厦人家有的是，他们还是要看浦西，还是要看上海的历史建筑，还是要看上海整个城市的风貌。现在上海有的地方还在盖很高的楼，建筑形式又不美观。我昨天看了上海博物馆、图书馆，举起大拇指夸赞，非常好，设计得真好。上海图书馆藏书量国内第一，大大超过北京图书馆的水平，设计没有落俗套，思想比较解放，这是进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一个很好的基地。这几个项目抓得很对。我说，浦西再盖房子要“求精不求多”，每栋楼都要考虑它的设计，要形式超群，不要再盖普通的几十层居民楼了，再盖也盖不出什么名堂了，而且搞得交通很困难。浦西的绿化搞好了，环境好了，浦东的功能才能发挥，浦东的300幢大楼就有市场了。不然，浦东什么时候才能繁荣呢？

金融系统要坚决反腐败

(1996年6月26日)

1996年6月26日，国务院在北京召开金融系统“反腐败，防抢劫、防诈骗、防盗窃，保护金融资产安全”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各家银行、保险公司的负责同志，纪检、监察和司法、公安部门的主要负责同志。这是朱镕基同志在会上讲话的主要部分。

我今天讲两个问题，一个是坚决地反腐败；另一个是狠抓防抢劫、防诈骗、防盗窃，保护金融资产安全的“三防一保”工作。这两个问题实际上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只要我们大家坚决地反腐败、讲廉政，金融系统绝大部分抢劫、诈骗、盗窃案件就可以防患于未然。从1993年党中央、国务院部署反腐败工作以来，金融系统非常重视，在三年多的时间里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第一，查处大案要案的力度一年比一年加强。三年来，金融系统查处了1.2万多个案件，其中百万元以上大案392件、亿元以上特大案件19件，经济案件和抢劫、诈骗、盗窃方面的大案要案发案率逐年下降。贪污、受贿、挪用资金等案件从1992年的4415件下降到1995年的2351件，金融抢劫、诈骗、盗窃等大案要案从1993年的1990件、1994年的1435件，下降到1995年的862件，堵截率达63%。这三年处分了1.3万多人，其中包括处级以上干部210人，清除了腐败分子，起到了教育群众、震慑坏人的作用。对这些成绩，我们要充分肯定。

第二，反腐败、抓廉政与加强金融监管、整顿金融秩序相结合，取得了很好的效果。金融体系中有中央银行、商业银行、政策性银行。政策性银行也好，商业银行也好，都直接为客户服务，搞经营活动。但中央银行的职能是监管，是对整个金融系统的运行进行监督。1993年以来，特别是1994年以后，我们强调了中央银行和商业银行的职能分离，强调中央银行的主要任务就是监管。经过这两年的努力，现在的金融秩序虽不能说是很好，但至少是有法可依了，大家知道怎么做是对的、怎么做是不对的。



1996年6月26日，朱镕基在金融系统“反腐败，防抢劫、防诈骗、防盗窃，保护金融资产安全”会议上讲话。右二为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罗干。

从总体上说，目前金融系统中的是非观念、法治观念比过去增强了，特别是去年，在金融监管方面采取了一系列雷厉风行的措施，取得了很大成效。一是认真清理查处“两本账”。什么叫“两本账”？就是有的银行分支机构的存款、贷款除了向上报的这本账之外，还有另外一笔“账外账”，在向上报的账外再搞存款，再去放贷。在某些地 方，“账外账”的数额很大。这怎么得了啊！有关“账外账”的问题，我们首先是从沿海地区某省一个县级市的银行发现的，它账面上只有两亿多元贷款，但发放的账外贷款有35亿元。经过调查，这个支行账外放的贷款质量非常差，大部分都收不回来。对这个支行的问题我们毫不留情，做了严肃处理。现在查出的全国账外存款达1625亿元，账外贷款达1890亿元，但这只是已经查出来的，实际上究竟有多少还不清楚。已

经查出来的这部分已占国家6万亿元贷款余额的不小比例，其中有个省的账外贷款就占全国账外贷款总额的三分之一以上。这么严重的问题，不整顿行吗？从这本“账外账”里要滋生出多少腐败分子啊！这是个罪恶的温床，危害太大，必须坚决取缔。二是清理查处了用假报关单套汇的违法违纪行为。沿海地区有个城市的一个犯罪团伙，从17个私营公司凑了近100亿元人民币，到大连、武汉、青岛等地的中国银行换成外汇汇到境外某公司，再由这个公司汇入境内，就变成了出口商品的外汇收入。这么一来，他们就可以骗取17亿元的出口退税。因此，去年人民银行总行组织700人到这个省一张一张地审查报关单据，然后将有疑问的送到海关总署进行鉴别。在送审的3617张单据中，竟有2946张是假的，占81.4%。经过这次打击，这类问题稍微有些收敛，但据说现在又开始抬头了，所以要严厉打击，要常抓不懈。三是金融系统在查处炒外汇、炒期货、炒股票、炒房地产和乱担保、乱贷款、乱投资、乱抵押等案件上也下了很大工夫。国务院三令五申不准搞外汇期货，对这种金融衍生产品的交易我们很不熟悉，有些人根本就不懂，你去炒这个东西，陷进去怎么得了啊！大家知道，英国巴林银行一个23岁叫里森的职员，在新加坡从事外汇期货交易赔掉14亿美元。但我们有些公司就是不听招呼，仍然去炒外汇期货，结果吃了大亏，最多的一个公司赔了8000万美元，还有三个公司各赔5000万美元，最少的赔了几百万美元。我们银行系统也有，中国银行山东省分行就赔了5000多万美元，处长已抓起来了，行长也已撤职。交通银行也赔了1200万美元，负责人也已处理。金融系统要坚决杜绝这类事情，要严格执行纪律。金融系统掌握着国家经济命脉，牵一发而动全身，如果不严肃纪律，后果不堪设想。

第三，金融系统的廉政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取得重大成绩。去年，人民银行总行制定了两个规定，一个是《关于对金融机构重大经济犯罪案件负有领导责任人员行政处分的暂行规定》，另一个是《关于对金融诈骗案涉及的金融工作人员行政处分的暂行规定》。人民银行和各家银行、保险公司还陆续下发了禁止用公款吃喝玩乐的规定，清理超标准小轿车3000多辆，处理了2000多辆；清理“小金库”2.8亿元，上缴财政1.6亿元；压缩和取消了一批不必要的出国团组。银行系统还采取了一项重大的改革措施，各个国有商业银行与所办的信托投资公司脱钩。先从中国工商银行和中国建设银行两家开始试点，这两家银行

的91户信托公司，已撤掉了60户，把股份转出去的有26户。其他银行也都要按此原则撤掉其所办的信托投资公司，或把股权转让出去。现在银行系统的招待费普遍减少了30%，我并不是说这就减够了，但是从这一点可以看到抓廉政建设见效了，群众关心的某些不正之风基本刹住了，至少可以说有所收敛了。

尽管我们取得了这样大的成绩，但是我们要看到，当前反腐败和“三防一保”工作的任务仍然十分艰巨。银行是一个特殊的重要行业，如果放松了警惕，稍有松懈，后果是非常严重的。根据党中央、国务院的指示精神，根据“严打”的方针和进展情况，我向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报.告后，决定召开今天这个会议，要继续坚持反腐败，坚持开展“三防一保”，这是一件刻不容缓的事情。今天请了政法战线的同志出席会议。我在金融系统讲过，在财税系统也讲过：对大案要案的犯罪分子要抓起来，依法处理，该判刑的判刑，该枪毙的枪毙。但是，我们的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也有责任。对凡是发生大案要案的单位的领导干部，特别是一把手，一定要给予行政处分，甚至撤职。

从金融系统发生的大案要案中，可以看出反腐败、打击金融犯罪不是搞两年、打两年就能解决的。银行系统有三种人，尽管人数极少，但是非常危险，我们对他们不能放松警惕。第一种人是特别贪婪、特别疯狂的人，为了个人享乐，一切都在所不惜，作案不计后果。四川省外汇管理局有个干部，第一次作案贪污了1040万元，并办好了去美国的护照。但他还不满足，又第二次作案，非要再贪污1500万元后才卷款潜逃，幸亏被及时识破抓住了。这种特别贪婪、特别疯狂的人，不但有一般干部，也有个别领导干部。第二种人主要是领导干部，对国家利益、资金安全极端不负责任，想怎么干就怎么干，胆子大得不得了。炒外汇期货，多少亿美元也在所不惜；开信用证，几十亿、几百亿美元也敢开，根本不考虑后果。第三种人，政治素质和业务素质都非常低劣，无知而又胆大，干出很多荒谬的事情。例如，辽宁省营口市某保险公司聘用一个农民当证券代办处负责人，这个农民啥也不懂，一上任就到处非法融资3个多亿，高息拆出和放贷，至今大部分资金收不回来。大家都知道“辽国发”证券诈骗案①，两个个体户，都是黑了良心想发财的人，有些领导干部还以为他们是在“活跃社会主义城乡经济”，其实是疯狂投机、买空卖空。他们哪里来的信誉呢？原来，我

们一些金融单位把在证券交易所的席位卖给他们，让他们在那里招摇撞骗，最后非法融资88亿元。等到我们清理证券回购时，他们早已卷款潜逃国外了，损失了38亿元收不回来，倒霉的是老百姓。我再给你们讲一个案件，从中可以看出我们金融系统某些领导干部无知到了何种程度。一个在美国留学的叫黄爱萍的人，在江苏南通注册了一家“皮包公司”。而南通几个银行也不调查她的资信和经营状况，就给她贷款4900万美元，结果有3000多万美元被搞到美国去了，钱回不来了，黄爱萍这个人也找不着了。谁贷的最多呢？中国银行南通分行一家就贷给她4000万美元。

---

① “辽国发”证券诈骗案，指20世纪90年代中期，辽宁国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负责人高岭、高原等人，采取私刻公章、伪造证书和票据等欺诈手段，在沈阳、武汉等地大肆进行非法融资和证券回购，炒作期货、股票等体外经营，负债98.66亿元，资产与负债差额为16.04亿元，给国家造成巨大损失。该案涉及违法犯罪人员数百人，涉及金额数百亿元人民币，导致当时在金融证券市场中最火爆的武汉证券交易中心等一大批机构倒闭，尔后引起的小至百万元、大至数亿元的诉讼案件有近百件。

为了引起我们领导干部的注意，我把1993年以后查出来的392件百万元以上案件的分布情况说一说。当然，我绝不是说哪个银行发生案件多，哪个银行就最腐败。如果你那里有案不查或查不出来，才真正叫腐败。但是我也不能不讲，案件高发的地方，你们更要注意啊！这392件案件中，中国银行有90件，占23%，中国银行的队伍要认真进行整顿。中国农业银行本来主要在农村活动，但是现在到处搞经营活动，发案就多了，有85件，占21.7%，应该引起注意。中国建设银行有71件，占18.1%。中国工商银行好一点，但是也不少，有57件，占14.5%。中国人民银行也有48件，占12.2%。中国人民银行不直接经营，发生这些案件无非是搞关系造成的，对这些案件要分析一下，好好整顿队伍。中国交通银行、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也查出一些案件，都是占5%左右。再说说大案高发地区，便于你们考虑以后检查工作的重点应该摆在什么地区。第一位是广东，占26.5%；第二位是江苏，占10.6%；第三位是辽宁，占9.3%；广西占8.4%；山东占7.1%。大案高

发地区重点集中在这五个省区，都是沿海地区。今后，打击金融犯罪活动的重点、检查的重点、监督的重点要放在这些地方。

在这里我也要讲一句，有一种舆论是错误的，说银行是最腐败的，抓了多少多少行长，这是不符合事实的。不能对我们金融系统这支队伍的信誉发生动摇，我从来就说这是一支听中央的话、能打硬仗、勇于进取、锐意改革、值得中央信赖的队伍。尽管人员工资稍微高一点，但不是最高的。这支队伍对国家经济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对金融队伍的基本估价必须客观公正。我们也不要担心查出大案要案多了会给金融系统抹黑，有多少就要查多少，一个也不要漏掉。但是我们应当看到，银行是个光荣的单位，也是个危险的单位。从1993年到现在，被罪犯杀死、杀伤的职工有166人，平均每个月6个人。银行有很多人在抢劫、盗窃案件发生时，与持枪、持刀的罪犯勇敢搏斗，光荣负伤，甚至英勇牺牲，我们要引以自豪。在当今世界，金融犯罪、骗银行、抢银行是国际性的社会现象，发案率是比较高的。当然，我们不能麻痹，要针对这些问题采取措施。但对整个金融队伍的评价不能发生动摇，不能败坏金融队伍的声誉。如果败坏了金融队伍的声誉，中国的经济就要垮台，这不是危言耸听。对金融队伍一方面要严格要求，另一方面还是要鼓励。要振作精神，把这支队伍整顿好，增强大家的荣誉感。

当前，总的要求是：要认真贯彻领导干部一定要讲政治的要求，干什么事情都要从政治的高度出发，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在这个前提下，重点要抓好三方面工作：

第一，继续坚决地反腐败，抓好廉政建设，严肃金融纪律，一定要把贪污腐败分子清除出金融队伍。我们银行的领导干部对此绝不能有任何姑息，有案不能隐瞒不报，不能上下包庇，不要怕亮丑，不要怕揭短。不仅要查经济案件，对那些道德败坏、腐化堕落的丑恶现象，也要严肃查办。

第二，切实加强金融监管，整顿金融秩序。金融系统一定要有铁的纪律、铁的账本。现在我请你们各总行行长向下传达，以今天为界限，今后继续搞“两本账”、用假单据套外汇、炒外汇期货的，不管是什么人，一律清除出银行队伍。没有这种铁的纪律，银行就无法办下去，也办不好。考虑到过去搞“两本账”有着复杂的原因，在一般情况

下，当事人坦白了，就不再查处。在今后一个月内，有问题的人赶快坦白交代，把假账拿出来。一个月后，就要执行上面宣布的纪律。同志们，我们不要怕得罪人。我们既然是共产党员，还是高级干部，就应该无私无畏。我始终主张为政要严，我们的银行要更严。根据三年来管银行的经验，我认为，只要我们认真地抓，绝对抓得好。我有充分的信心，我们大家一条心，就一定能搞好。那些腐败分子、极端不负责任的分子、一些素质很低的领导干部，请他们让位。必须把年轻有为、政治素质和业务素质高的人提拔到领导岗位上来。这样，我们这支队伍才能够兴旺。没有这个决心，良好的金融秩序就建立不起来，国民经济就搞不好。

第三，认真加强“三防一保”工作。最近，“严打”取得了很大成绩。但是我们也应看到，这是一项长期的工作。就是在“严打”期间，北京还有顶风作案公开抢劫银行的。打击还要严，绝对不能满足于现有的成绩。银行本身应该提高警惕，加强安全防范设施，采取各种措施，不能看着国家的财产受损失。

抓“三防一保”，一是解决保安队伍如何适应安全防范的要求。北京市银行系统雇用的3000个保安员属于22家保安公司，其中168名是“黑保安”，即没有经过保安公司批准、银行自己雇的，这要很好地整顿。我看，保安公司应该由公安部归口管，保安人员要经过训练。那些作案的都是训练有素的人啊，不是一般人做得到的。所以，一定要加强保安人员的训练，包括政治的训练、业务的训练、技术的训练。二是要解决运钞车不符合防盗窃、防抢劫要求的问题。要改革一下体制，不要随便什么人都去运钞，要由专业人员来运钞，让经过训练的保安人员去运钞。这个事情看怎么组织，要有若干规定。三是银行的电子化、信息化建设必须加快。这个钱一定要花，否则难以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信息系统包括报警系统，应该不是很难搞的，花钱也不是很多。整个金融电子信息系统都要搞起来，将来要用信用卡，现金流通越来越少了，都数据化了，没有电子信息系统怎么处理呢？现在，要把政治素质好，懂银行业务、懂现代金融知识、懂现代技术手段、懂电子计算机的人提到领导岗位上来，注意调整我们干部的结构。为什么电子信息化老搞不好呢？关键是懂银行业务的人不懂电子计算机，懂电子计算机的人不懂银行业务。这两者必须结合，不结合，电子信

息化就搞不上去。总之，我希望银行系统要根据公安部门的要求，也根据我们的能力，结合需要与可能，抓好“三防一保”各项具体措施的落实。

认真总结扶贫工作的经验

(1996年7月4日)

1996年6月29日至7月4日，朱镕基同志在甘肃省考察工作，先后考察了天水、定西、兰州等地。这是朱镕基同志在听取省委、省政府工作汇报后讲话的主要部分。

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是农民问题，发展经济根本上是发展农村经济。扶贫的问题是一个农业的问题、农民的问题、农村的问题，是消灭城乡差别、工农差别的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工业发展不起来，国民经济也无法持续健康地发展。现在，大家都把注意力集中在国有企业问题上，这当然是对的。但如果中国的农村问题、农民问题、农业问题不解决，没有农村市场，工业也就发展不起来，国有企业就搞不好。没有农业这个基础，没有农村这个市场，名堂再多，市场经济也发展不起来。前两年，我担任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组长，花了很多精力研究农业和农村问题。这几年，我抓得很多的工作是粮食问题、棉花问题、农业生产资料流通领域的问题和化肥问题，都是围绕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的。这些问题不解决，我们早两年就没得饭吃了。

甘肃是中西部地区一个非常重要的省，2300多万人，贫困人口占24%，比例很大。我觉得，这还只是特困户，应该说真正一大半的人还不富裕，还比较困难。所以，我认为在“九五”期间把扶贫工作抓好，意义是非常重大的。它不仅仅是一个扶贫问题，政治意义本身就很大。你们在“九五”期间一定要脱贫，我相信你们能做到，党中央、国务院一定会支持。我这次来主要是学习甘肃的扶贫经验，根据这几天对甘肃扶贫经验的学习的心得，把你们已经做的扶贫的具体措施，做了一首打油诗：引水要开山，集水靠挖窖，坡田改梯田，漫灌改滴灌，种树以保土，地膜来保墒，增收靠良种，脱贫靠科研。

引水要开山。这是甘肃的特点，不开山，水引不来。这句话就是大修水利的意思吧。“引大入秦”搞了19年，就是挖隧洞、修渡槽，开山引

水。把大通河的水引到秦王川，实现了几代人梦寐以求的愿望。这个愿望，只有到了新中国，到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才能变为现实。实践证明，只有兴修水利，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甘肃的粮食生产和农业发展问题。要继续抓好“引大入秦”的配套工程，使更多的人早日脱贫致富。引洮工程也是关系到甘肃脱贫的一个最重要的工程。这个工程一定会列入计划，一定会搞，只是迟早的问题。引洮工程的难度可能没有“引大”那么大，但投资是“引大入秦”工程的5倍，需要100亿元，不可能在5年内完成，“九五”计划能使它上马就很不错了。困难再大，这100个亿还是要花的。

集水靠挖窖。这是你们“121雨水集流工程”的经验，现在看起来效果非常显著。在执行中间，还应该总结经验，改进工作，真正地出实效。“121工程”不是简单地打个地窖的问题，有许多问题需要很好地研究。你们讲集水的面积就是径流的面积，那要看地势、水的走向，要研究怎么集得最多、渗透流失最少、集水的效率最高，要帮助农民总结出几条经验来。要注意水质，因为它不光是灌溉用，吃喝也是这个水，干净一点对健康有好处。

坡田改梯田，漫灌改滴灌。这是你们正在做的事情，不用多解释了。坡田改成梯田，就能减少水土流失，改变生产条件。滴灌是一种先进的灌溉方式，看起来甘肃非走这条路不可。那种水漫灌、肥乱撒的做法不能再搞了。这件事情做好了，甘肃很可能成为全国使用最先进灌慨方式的一个地区。怎么滴灌最有效，设备等一系列辅助设施怎样跟上去，都是很值得研究的问题，不能简单地一哄而起，最后老百姓得不到实惠。现在大量的是靠国家花钱，或者靠集资，或者靠救济，这个钱如果花得没有效果，老百姓就会失掉信心。



1996年6月29日，朱镕基在甘肃省天水市秦城区藉口乡向农民了解生产、生活情况。左一为甘肃省委书记阎海旺。

种树以保土。“种草种树，脱贫致富”，这是胡耀邦同志讲了的。天水秦城区那个放牛村，给我的印象很深，别的地方是光秃秃的黄土山，但这个村一片绿，种了许多树，而且是苹果树。这个经验应该推广。当时我说：“今日天水黄土峪，明朝陇右江南绿。”定西的小流域治理也给我非常深刻的印象。你们这个山是可以种树的，不要引水上山就可以种得活。这个非常重要，就怕种不活。现在黄土高原水土流失这么严重，黄河变得这么浑，这几年连年断流，就是因为历史上战争破坏，天灾人祸，树被砍掉了。把树林子砍掉以后，整个气候变化了，肥沃的土地流失了，才搞成今天这个样子。你的山都开荒种了地，那是个恶性循环。越没有粮食吃，就越到山上去开荒，越开荒就越没有树林，气候就越来越坏，最后落得个没得饭吃，无以为生。真正的脱贫就要改变生产条件，种草种树是根本措施。我很重视甘肃这个经验，要种树，要保土，最好是把你们山上统统种上树，那样甘肃

的气候条件就完全改变了。但问题是这样做我们就没得饭吃了，只好采用地膜技术来增产粮食，腾出一部分地，特别是山地来种树，这就是有远见了。种树如果完全种用材林，种一般树，就没有多少收入，投的钱回不来；最好的办法是种果树，搞经济林，那比粮食还来钱，这应当是一个正确的方向。

地膜来保墒，增收靠良种，脱贫靠科研。地膜覆盖、推广良种以及耕作制度的改革，都是增产增收的科技措施。要不断改进工作，把各种措施跟上去，真正地抓出实效。种果树也有一个改良品种的问题。我在江西、湖南看到果树种得很多，1991年就提醒他们，这么多果树，橘子那么酸，弄不好将来要吃亏。这次去看，他们种的都是好品种，是从日本、美国、法国引进来的良种。所以，必须搞好科学技术研究，总结农民的经验，确保果树种出来以后有市场。我看，将来水果也同电视机、电冰箱一样，会有激烈的市场竞争。关键就看谁在农业科研上下工夫，能够使品种不断更新，质量不断提高，而且包装、运输、宣传广告这一系列工作都能跟上。也就是要搞贸工农一体化，朝着这个方向努力。耕作制度的改革也是很值得研究的问题。比如种洋芋，能不能种那么多，种了以后出路如何，价钱会不会掉下来，还有洋芋如何加工，这里面还有许多问题要研究，不能一下子就铺开，我觉得稳一点好。究竟种什么合适，还是要尊重农民的意愿。当然，老百姓有时候的一些观念和习惯不一定都是合理的。总而言之，要从实际出发，非常周密地考虑耕作制度的改革。



1996年7月2日，朱镕基在甘肃省定西县鲁家沟乡太平村考察农户的雨水集储灌溉示范点。右一为甘肃省委书记阎海旺。

党中央、国务院非常关心扶贫工作，在财力上要向贫困地区倾斜，中央决定拿出一笔钱，每年增加扶贫资金。同时，希望地方也相应地增加扶贫资金。我们定了一条政策，中央拿100，地方至少要拿30。根据不同地区，最多的应该拿到50。如果你不拿，我就把这个钱给那些能够拿出钱的地方去。如果甘肃不拿，陕西能拿，那就给陕西了。意思就是要大家都来努力，不要中央拿钱扶贫，地方盖楼堂馆所。增加扶贫资金的政策是定了，但具体工作确实要靠地方去做。上次我们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讨论脱贫的问题，江泽民同志还讲过，捐献工作每年都要搞。这次到贫困户问了一下，都拿到了捐献的衣被。这不光是一个捐献衣被的问题，而是城市人民同农村贫困人民心连心的问题，是一种阶级感情啊！捐献要坚持搞下去。将来旧衣服捐完了，新衣服也得捐一些。这个花费并不是很大，但对农村贫困人民是一个很大的支援，政治意义很大。

这次我到甘肃来，感到甘肃省的面貌变化很大，工作比较扎实，从市县乡到村干部，作风比较淳朴，比较能够跟群众同甘共苦。贫困人口这么多，还能够保证农民渡过这两年大灾带来的困难，工作是做得比较好的。更重要的就是甘肃省已经找到了或者说总结出了一条脱贫致富的道路。按照这条路子走下去，脱贫致富就大有希望。

对税制改革要坚定不移，坚信不疑，坚持不惑

(1996年7月8日)

这是在全国税收征管改革工作会议召开前，朱镕基同志写给财政部部长兼国家税务总局局长刘仲藜、国家税务总局副局长项怀诚的信。

怀诚同志，并仲藜同志：

财税体制改革的三年是不平凡的三年。三年来税收征管工作卓有成效，政绩显著，铁的事实证明，税制改革(包括税务机构分设)是成功的、正确的；全体税务系统工作人员(包括国税系统和地税系统)工作是努力的，得力的，值得党中央、国务院信任。对此我们要坚定不移，坚信不疑，坚持不惑。当然，改革要深化，制度要完善，我们要认真面对新体制带来新问题的挑战。既要把该收的税统统收上来，又要严厉打击一切偷漏骗税活动，关键是要建立一支高效廉洁而又拥有现代管理知识和技术手段的税收队伍。我在不久前关于金融行业“三防一保”的讲话精神，同样也适用于财税工作战线，希望你们传达、讨论，参照实施，并且做出成效。预祝会议成功。

朱镕基

七月八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

怀诚同志并仲藜同志：

财税体制改革的三年是不平凡的三年。三年来税收征管工作卓有成效，政绩显著，铁的事实证明，税制改革（包括税务机构分设）是成功的、正确的；全体税务系统工作人员（包括国税系统和地税系统）工作是努力的，得力的，值得党中央、国务院信任。对此我们要坚定不移，坚信不疑，坚持不惑。当然，改革要深化，制度要完善，我们要认真面对新体制带来新问题的挑战。既要把该收的税统统收上来，又要严厉打击一切偷漏骗税活动，关键就是要建立一支高效廉洁而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

又拥有现代管理知识和技术手段的税收队伍。我在不久前关于金融行业"三防一保"的讲话精神，同样也适用于财税工作战线，希望你们传达、讨论，参照实施，并且做出成效。预祝会议成功。

朱镕基
七月八日

继续推进农村金融体制改革

(1996年7月14日)

1996年7月13日至14日，全国农村金融体制改革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出席会议的有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主管金融工作的负责同志，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志和中国人民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总行及分行负责同志。这是朱镕基同志在会上讲话的一部分。

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的方针在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决定中早已确定了，现在是赶快贯彻落实的问题。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农村信用社和农业银行脱钩，把农村信用社真正办成合作性质的、社员民主管理的、自负盈亏的金融机构。农村信用社的成绩很大，存贷款的数量很大，但问题也不少，亏损面达40%，亟须人民银行加强监管，使其认真遵守金融法律法规。农村信用社和农业银行脱钩经过两年的准备，条件比较成熟了，认识也比较统一了。但是，这项工作牵涉面太广，千万不能粗心大意。为了加强对这项工作的领导，准备成立一个农村金融体制改革部际协调小组，由戴相龙①同志牵头，各有关部门参加；各地区也要成立一个领导(协调)小组，由副省长出面牵头，农业银行原来管理农村信用社的同志目前暂时到领导(协调)小组办公室去做脱钩工作，工作完成后再做妥善安排。脱钩的目的是要使农村信用社将来在农村发挥重要的作用，保证减少风险，改善经营管理。

① 戴相龙，当时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

二是组建农村合作银行。这项工作可以在一些商品经济比较发达、农业所占比重较小的地方试点。那里的农村信用社已经发展到城市，资产也比较大，实际上已经是一个商业银行。在这种地方搞，风险较小，有利于试点工作的进行。农村合作银行是地方性商业银行，不再具有信用合作的性质，要按商业银行进行监管。这件事不能搞得太

快，要先试点，每省一个、最多两个，在整顿农村信用社的基础上组建农村合作银行。试点搞得好，取得了经验，再逐步推开。

三是进一步划清农业发展银行和农业银行的分工，农业发展银行要设下属机构。我们认为，成立政策性银行搞农产品收购是成功的，但确有分工不清的问题。实行这项改革以来，投入农业的收购资金没有太多的减少，资金被挪用的情况稍好一点，但仍相当严重，没有完全达到原来改革的目的。现在决定农业发展银行的总行、分行设营业部，并在全国约四分之三的县设分支机构，其余农产品收购任务较少的县和乡镇以下的业务仍委托农业银行代办，这样责任比较清楚。至于这一块业务从农业银行划出、农业银行亏损会更加严重的问题，我们可以从多方面解决。比如说调整县以下的银行机构，把那些信贷业务量较小的县工商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设立的分支银行撤并一些，但资金不能带走，任务不能带走，把阵地让给农业银行。

四是认真整顿农村合作基金会。合作基金会是合作性质的组织，只能在会员之间进行资金的调剂，不是金融机构，不能在社会上搞存贷款。但有的农村合作基金会把自己等同于金融机构，到处高息吸储、高息放款、违规经营，风险很大。有些地方的农村合作基金会已 发生资不抵债，甚至工作人员携款潜逃，坑害群众。农村合作基金会再也不能这样办了，否则贻害无穷。要办，就按合作性质的金融机构办，即办成农村信用社，或者和现有农村信用社合并，纳入人民银行的监管范围。如果还要搞基金会，并保留这个名字，那就只能是在会员之间进行资金调剂，不能再搞存贷款。另外，还有一个“地下钱庄”问题。过去山西省花了很大力量整顿过，目前在某些地方又厉害起来了。请务必下决心取缔“地下钱庄”，使它永世不复出现。

搞好金融保险市场对外开放

(1996年7月24日)

1996年7月24日，中国人民保险(集团)公司成立大会在北京召开。这是朱镕基同志在接见会议代表时讲话的主要部分。

社会保险制度体系的建立和完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的必要条件，而商业性保险是社会保障体系里面的重要组成部分。你们的前途也是非常远大的，因为中国有近13亿人口，是全世界最广阔的保险市场，在这样一个舞台上面，你们是大有作为的。

我今天借此机会想讲讲金融和保险事业的开放问题，也许你们会觉得很意外，怎么我跑到这里来讲这个问题呢？因为现在对这个问题议论很多，有一些跟我很熟的老同志表示忧虑，是不是我们的金融保险事业开放得太多了？是不是会影响我们的社会主义性质啊？这个问题，我应该跟同志们讲清楚。我们现在之所以能取得这么大的成绩，是由于我们坚决执行了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改革开放的基本路线。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今天这个成绩。

同志们，对外开放是双向的，我们利用开放引进了资本，引进了 技术，引进了管理，才有我们今天这个局面。但是你一点不给人家甜头，你把门关得紧紧的，那你怎么开放？怎么引进外资，引进管理，引进技术呢？这是双向的。同志们一定要看到，我们现在的进出口贸易总额是2800亿美元，去年，我们是顺差，通过香港一转口还得加几百亿美元，这些美元给香港人赚了，香港人也是中国人嘛，是中华民族的一部分嘛。我们的外债余额是1100亿美元，大部分是世界银行的“软贷款”和各国政府的优惠贷款，利率都比较低，我们利用这些外资做了很多事。我们还吸引了1300亿美元的直接投资，这对促进我国工业的发展，特别是促进我们外贸的出口，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不然，我们的产品能够进得去欧美的市场吗？进不去啊！我们得到了这么多好

处，你说人家看上你什么东西呀？看上你这个市场嘛。你这个市场一点不给人家，你净去占人家的市场，这个改革开放怎么搞下去？

同志们，现在处理好中美关系是我国外交政策的一个重要方面。美国的政界人士，特别是国会议员，不少人都是敌视中国的。谁帮我们讲话？美国的工商界老板。他们为什么帮我们说话？还不是因为他们在中国有利益。你什么利益都不给人家，你的对外工作怎么做？所以，开放是双向的，但主要是有利于我们的发展，我们得到的好处比对方得到的好处更多，这一点是不容否认的事实。在市场的开放方面，我们利用外资的政策是成功的，也是正确的。当然，我觉得在某些行业、某些产品方面也许开放得太过火了。比方说，某些设备有一半以上都进口外国的，我们自己生产这些设备的工厂都关门了，这就过了一点。但总体上，我们的外贸政策是成功的，是正确的。

现在对外国人的市场准入谈判还在继续，他们要求我们开放市场，主要集中在文化市场和金融保险市场上。文化市场方面的知识产权谈判，大家绝对不要以为只是为几个影碟的翻版，那个问题好解决，我们也应该解决，我们也不允许翻版，我们要保护知识产权；关键是美国千方百计要进入中国的文化市场，这个问题我不多谈。服务行业的开放，主要指金融保险业。中国这么大个市场，不但是商品市场，也是一个非常广阔的金融保险市场，不开放也是不行的。同志们，你还要赚人家的钱，你还要做生意，你还要利用外资，你把门关得紧紧的，什么都不能进来，那怎么行呢？

我们在金融保险市场开放问题上是非常慎重的，采取的步骤是适合中国情况的，这方面没有什么问题。有些同志不了解这个情况，好像大祸临头了。

现在一讲外资银行、外国保险公司在中国有500多个机构，就有人感到吃惊。是有啊，那些叫代表处嘛。怕什么？来5000个你也不要怕嘛。其中营业的外资银行有140家，有些人一听就吓死了，说什么外国银行侵入中国金融资本，感到不得了，“帝国主义又来了”。我们对外资银行的地区分布是严格限制的，对业务范围也给予了严格的限制，只能做结算。140家外资银行现在搞结算占多大分量呢？在全国的结、售汇业务中，结汇占2%，售汇占3%，比例非常小，这有什么大不了的？所以，我们还要继续开放，这没有什么危险。在华的外国保险公

司有多少？到现在为止一共批了3家，最早批的是美国国际集团，在上海，现在只允许它做人寿保险，财产保险没有开放。外资人寿保险去年只占上海保费收入的8.9%，其中美国国际集团占8.4%，东京海上保险①占0.5%。外国保险公司占全国保费收入的多少呢？去年全国保费收入是653亿元，其中外国保险公司5.4亿元，占0.83%。这个0.83%就改变了中国的社会主义性质了？没有这个道理。

---

① 东京海上保险，即日本东京海上日动火灾保险株式会社。

没有竞争，就没有进步。没有开放，先进的管理经验、经营方式、技术手段怎么能进得来呢？美国国际集团在上海引进了一个代理人制度，一下子就发展很快，中国人保上海分公司也马上采用了这个办法。我们现在用的代理人已经超过了美国国际集团，可见上海人精明得很，不比外国人差。但上海人再聪明，如果美国国际集团不进来，没有样板，也引不进代理人制度。最近国务院决定，在上海的外资银行可以做人民币业务试点。有些同志害怕了，外资银行做结算现在都感到威胁很大，做人民币业务怎么得了？我说，没有问题，别那么害怕，这个事情不会影响什么。这个比重小得很，也不可怕，绝对不会影响我们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的性质。



1996年7月24日，朱镕基在中国人民保险(集团)公司成立大会上接见会议代表并讲话。右一为中保集团董事长兼总经理马永伟。

中国人保公司去年的保费收入占全国保费收入的82.8%，太平洋保险公司占10%，平安保险公司占5%。你们不要害怕竞争，我相信你们不怕竞争。中央也为你们创造条件：第一，在开放的速度方面、开放的范围方面，一定要适应我们自己的监管能力。人民银行要把保险业的对外开放管起来，控制在规定范围里面。对外要大力宣传中国的保险市场是开放的，也要让人家来发展，不然人家说你做样子也不行。同时，我们也要监管，要把它限制在那个范围里面，也要与我们保险公司的竞争能力相适应，我们要竞争得过外国保险公司。第二，我们要逐步创造一个平等竞争的条件。比方说，现在外资企业的税收还享受优惠，要逐步地与中国企业趋于一致，创造一个能够平等竞争的宏观环境。第三，要锻炼我们自己的队伍，如果总怕竞争，老关起门来，怎么进入世界？它打入你的市场，你就不会打入它的市场啊！就那么自卑？我对这个问题已经考虑了两年，最近想了个办法。我到非

洲、拉丁美洲和东南亚看了以后，感觉到我们的产品完全可以打入它们的市场，取代西方的商品。什么电视机、电冰箱等等，我们都太多了，到那儿组装嘛，价钱比西方和日本的要便宜得多。人家来占领我们的市场，我们也去占领别人的市场。你怕什么？但这要提高自己的水平。现在在这些发展中国家，我们还能取得优势，将来再打入发达国家的市场嘛。江泽民同志也跟我讲，独联体国家、东欧国家的市场，我们完全可以打进去。开放是双向的。我相信，我们的竞争能力一定会逐步地提高。

管理科学，兴国之道

(1996年7月25日)

1996年7月25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在北京举行管理科学学科发展座谈会，宣布成立管理科学部。出席会议的有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委的负责同志，原管理科学组的新老评审委员，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的部分委员，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及在京高校的部分领导和专家、学者。这是朱镕基同志在座谈会上的讲话。

首先，我热烈祝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成立十周年，热烈祝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管理科学部的成立。管理科学组升格为管理科学部，表明管理科学的地位提高了，至少是在我们自然科学家的眼光中间管理科学已经升格了。这标志着中国的管理科学将要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我预祝管理科学在中国能够繁荣发达，促进我国的改革与发展。

讲到经济形势，可以说，通过进一步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宏观经济环境确实比几年以前要好得多。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一个特点，是既显著降低了通货膨胀率，又保持了较快的经济增长速度。去年经济增长10.2%，今年上半年比去年同期增长9.8%，其中工业增长13.2%，这已经相当高了，说明我们在加强宏观调控的同时，经济仍然保持了快速的发展。

由于这三年国家两次提高粮食和棉花的收购价格，采取各种措施鼓励农民种田的积极性，农业的基础地位有所加强。

财政和金融形势也都是好的。上半年财政收入增长17.7%，是历年来幅度最高的，特别是由于财税体制改革的成功，中央集中了比过去更多一点的财力。去年的货币发行量是近几年最低的，今年上半年在适度扩大流动资金贷款规模的情况下，货币回笼的情况还是相当好。国家外汇储备到7月中旬达875亿美元，因此，我们才有条件宣布人民

币在经常项目下可以自由兑换，实现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章程》的第八条款，这就大大地改善了我国的投资环境。

当然，前进中还有困难。主要表现在宏观调控和经济总量控制取得很大成绩的同时，国有企业改革虽然取得了进展，但也遇到了一定困难。生产发展速度仍相当高，但是净利润降低了，亏损面有所增加。

这也不是没有客观原因，相当大一部分利润转移到农业、企业折旧和社会保险基金方面去了。当前企业困难的根本原因，还是由于长期计划经济体制下的重复建设和企业经营管理机制转变滞后，造成国有企业的行业结构和产品品种、质量不能适应国内外市场的变化，库存积压和开工不足更加突出了。

针对当前的问题，江泽民同志最近指出，应当认真着力实现“两个根本性转变”，把宏观调控同微观搞活结合起来，大力调整经济结构(包括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使国有企业的生产适应市场的需要，从而提高国有企业的经济效益。这既是下半年的任务，也是今后几年的任务。

当前国有企业的困难，一个重要原因是企业管理不善。过去抓全面质量管理，在建立全面质量管理体系、加强财务成本核算、改革劳动人事制度方面下了很大工夫，现在有些企业把这些基本功丢掉了，甚至靠假冒伪劣产品蒙骗用户。这样搞是不行的。要全面理解和贯彻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规定的16字方针，即“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要全面抓好“三改一加强”，就是把企业机制的转变、技术的改造、企业的改组同内部管理的加强几个方面结合起来抓。

现在有些效益好的企业，不是靠科学的管理制度和严格的劳动纪律，而是靠政府、靠银行、靠关系、靠广告效应、靠短期行为，我认为单靠这些，企业不可能真正办好。今天到了要大力提倡改善中国的管理和发展中国的管理科学的时候了。党中央提出了科教兴国的方针。这个科学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两个方面，当然也包括了管理科学。现在，确实需要强调管理科学和管理教育也是兴国之道。

对管理的重要性，宣传得还太少，要大力宣传加强企业的经营管理，要大力提倡振兴中国的管理科学，要总结中国管理实践的经验。

现在宣传国有企业的厂长、经理艰苦创业的书籍还不多。要加强对先进企业的管理经验和现代管理科学的宣传，多出版一些这方面的著作。现代管理当然是西方起步早，我们也可以多出版一些介绍外国经验的书，看看人家是怎样发展的，看看李·艾柯卡①怎么把克莱斯勒汽车厂救活的，福特②是怎么勤俭办厂的，苹果公司、微软公司是怎么白手起家的。讲讲这些东西不是崇洋媚外，而是促使大家转变观念，适应市场，重视管理，学会用人，勤俭办厂。

---

① 李·艾柯卡，美国企业家，曾先后担任福特汽车公司总裁、克莱斯勒汽车公司总裁。

② 福特，即亨利·福特，美国汽车工程师与企业家、福特汽车公司的创办者，世界上第一个使用流水线大批量生产汽车的人。

这样的事例，中国也不是没有。30年代我们的民族资本家在夹缝中求生存就值得宣传。中国古代典籍中，涉及管理思想的不少，如《尚书·禹贡》、《管子·轻重》、《史记·货殖列传》、《汉书·食货志》、《盐铁论》等。那个时代的经济思想，不一定符合现代管理思想，但是早期中国的经济管理思想还是有可以借鉴之处的。潘承烈①教授研究中国古代管理思想，演绎《孙子兵法》，讲田忌赛马②(可以说是最早的博弈论思想)，在国际论坛上很受欢迎，说明其中有些观点也符合现代管理原则。总之，确有东西可以宣传。我建议，要掀起一股学习管理、加强管理、发展管理科学、加强管理培训的热潮，只有这样才能够纠正时弊。

---

① 潘承烈，当时任中国企业联合会、中国企业家协会副理事长。

② 出自《史记》卷六十五《孙子吴起列传第五》。

我国国有企业的改革和发展，没有轻巧的道路可走，只有老老实实地研究改善经营管理，建立一套现代企业管理制度才行。没有现代财务、成本、质量管理和科学决策制度，就不能搞现代市场经济。

今天，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成立十周年的时候，在管理科学组变成管理科学部这个大喜的日子里，我愿意跟同志们一起为振兴中

国的管理科学而奋斗。

关于企业破产和资本重组问题

(1996年8月20日)

1996年8月20日，国务院在北京召开研究企业破产试点和资本重组问题的专题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这是朱镕基同志在会上的讲话。

第一，关于企业破产试点工作。

实施企业破产是促使国有企业转换经营机制、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手段，同时也是保证国有资产特别是银行资产不要继续流失的一个重要手段。这项工作在国家经贸委的组织下，从1994年开始到现在，取得了一定的成绩，积累了一定的经验。但是，我们不断地收到一些材料，反映近两年来出现了假破产、真逃债的问题。很多企业没有按照有关规定去做，而是超越范围、超越地区，搞假破产，把银行债务冲销了，造成国有资产的流失。

这两年来，我在多次讲话和一些批语里，都讲到这个问题。不按照有关法律和国务院的规定，随意宣告破产，对于国有企业的经营机制转换没有一点好处，只会导致国有资产特别是银行资产的大量流失。有些地区搞假破产已经成风了，要刹住这股风，否则，国有企业改革要走弯路。

宣布企业破产的法律依据是1986年12月2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试行)》(以下简称《企业破产法(试行)》)。如果法院要宣布企业破产的话，这是唯一的法律依据。

1991年，最高人民法院有个贯彻执行《企业破产法(试行)》若干问题的意见①，并没有新的规定。《企业破产法(试行)》第四条明确规定："国家通过各种途径妥善安排破产企业职工重新就业，并保障他们重新就业前的基本生活需要，具体办法由国务院另行规定。"这个法律把破产企业职工的安置问题，交由国务院作出具体规定。请大家注意，企业职工安置是个前提条件，没有这个前提条件，企业怎么破产？谁敢破？我查遍所有有关文件，国务院还没有这方面的规定。因

此，根据《企业破产法(试行)》来宣布企业破产，就必须在当地具备这个前提条件，就是有比较健全的社会保障体系，有基本生活费保障制度，才能够执行。像上海等一些城市，经济实力较强，较早建立了一定的社会保障制度，有失业保险金、有养老保险金、有基本生活费保障，当然有条件依法宣布企业破产。没有这些保障制度的地方，谁敢破呢? 因此，这个法律从通过到现在近十年了，破产的企业并不多。

---

① 指1991年11月17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试行)〉若干问题的意见》。

有鉴于此，国务院从1992年开始，在制定《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转换经营机制条例》的同时，就在考虑企业破产的问题。经过两年多的研究、讨论，到1994年10月25日，国务院下发了《关于在若干城市试行国有企业破产有关问题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这个文件考虑到了《企业破产法(试行)》施行中的困难，即国务院还没有规定怎样安排破产企业职工重新就业和保障他们重新就业前的基本生活。因此这个文件开宗明义，第一条就规定实行企业破产必须首先安置好企业职工，只有安置好职工，企业才能够破产。怎样安置呢？第二条规定，企业宣布破产后，其所有的财产拍卖所得，首先要用于妥善安置破产企业职工，保持社会稳定。安置好职工以后，再按照《企业破产法(试行)》所规定的顺序来偿还债务。《企业破产法(试行)》规定的清偿顺序是：第一，首先要偿还破产企业所欠职工工资和劳动保险费用。这不是指以后安置职工的工资，而是指企业破产以前欠的职工工资，拍卖的资产首先要还工资欠账。第二，破产企业所欠税款。第三，还债。目前，国有企业的债务主要是银行债务。《企业破产法(试行)》的这个规定是很严密的，而且在清偿程序上也有规定：首先由法院成立清算组，它的成员由企业的上级主管部门、政府的财政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指定；然后召开债权人会议，按顺序清偿债务。1994年10月国务院下发的《通知》，基本上仍按照这个债务清偿的办法执行。但是，前提改变了，即破产企业财产拍卖所得首先用于安置职工，然后再按《企业破产法(试行)》规定的顺序来还债。显然，债权人要受到很大损失，特别是银行债务很难得到偿还，冲掉的银行债务是非常大的。因此，这个办法不敢在全国实行，只能在若干城市试点。银行的

钱是向老百姓借来的，不能随便冲销。所以，必须在银行成本里打入呆账和坏账准备金，作为一种风险损失的补偿。显而易见，如果冲销得太多，就减少了银行向财政的上缴，也就是减少了国家的财政收入，直接影响当年财政收支平衡。因此，目前不敢多搞，只能先在国务院确定的一些大城市试点，原来确定了18个城市，现在已扩大到58个城市。

现在有关企业破产的法律、文件就是这两个，要么按《企业破产法(试行)》执行，要么按国务院的《通知》在试点城市执行，不能单挑其中对自己有利的条款来执行。

现在，回过头来讲我印发给大家的材料。东北某化工厂破产的材料是国家开发银行送给我的。中国工商银行是这个厂的最大债权人，贷款1.1亿元；其次是中国建设银行，贷款4483万元。这个厂不在试点城市，就不能根据《通知》来破产；如果要破，就得按《企业破产法(试行)》来破。如果按《企业破产法(试行)》来破，这个化工厂先要还清银行债务，这就没有条件安置职工，也就是说，该厂不可能按《企业破产法(试行)》宣布破产。按《通知》破产也不行，因为它所在城市不属于国务院确定的试点城市。但这个化工厂根据地方政府的要求，不组织清算组，不组织债权人会议，就单方面宣布破产。这既不符合《企业破产法(试行)》，也不符合《通知》的要求。更荒唐的是，该厂给每个职工发3万元安置费，发完以后职工还在原企业继续工作，企业并没有破产。《通知》已经讲清楚了，如果企业破产，一定要把土地拿出来拍卖。濒临破产的企业值钱的主要是土地，但是该化工厂没有把土地拿出来拍卖并用于偿债，就把银行债务给冲销掉了，这完全是挖国家资产。同志们，这不就是假破产、真逃债吗？破产是一种机制，是转换企业经营机制的重要手段。如果银行债务被冲销后，企业职工也不下岗、转业，还在那里生产，企业继续亏损，企业的经营机制没有任何改变，这样“破产”有什么好处？不能这样胡搞。

第二个材料是东北某省破产成风的情况，事实是否如此严重，还可以调查。

第三个材料是王汉斌同志送给我的有关外贸企业破产的材料。我们一再讲，破产试点只限于工业企业，外贸企业不属于破产试点范围，因为流通领域情况复杂，“皮包公司”甚多，如果让它们随便破产，冲销

债务后再继续亏损、继续借钱，银行怎么受得了？这个问题在武汉曾经发生过，后来被制止了，但遗留问题还未解决。

根据这些情况，为了防止国有资产大量流失，在企业破产试点工作中，要端正认识，培训干部，依法办事，不能乱来。1994年《通知》的精神，实际上就是庭外和解、协议破产，而且只在国务院确定的58个试点城市中试行。冲销银行债务，必须得到国家专业银行总行的批准。地方政府和法院都不能随便宣布把银行的资产给冲掉。非试点城市的企业可以依据《企业破产法(试行)》破产，但是，不能用试点城市的政策。对各地企业破产的情况，请王忠禹①同志组织调查，各专业银行总行、人民银行总行、财政部、国家体改委和最高人民法院参加。要抓住典型事例，把数字搞清楚，究竟破掉多少企业？企业是怎么破产的？是真破还是假破？破的效果如何？职工是不是被重新安置了？是否实现了结构调整的目的？资本结构是不是优化了？把情况搞清楚了以后，我们再采取相应对策。

---

① 王忠禹，当时任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主任。

第二，关于资本重组。

国务院还没有发过任何关于资本重组的文件。关于这方面的材料，我只找到国家体改委在1996年8月5日呈送的关于选择几个城市进行国有经济债务重组试点工作调研情况的汇报。怎么进行资本重组，国家体改委也收集了江泽民同志、李鹏同志和我关于企业债务问题的讲话，还有吴邦国同志、李铁映同志的讲话，但是找不到任何一位中央领导同志关于企业债务如何具体重组的讲话，没有人谈过资本究竟怎么重组。因此，现在就要研究一下资本重组问题，资本究竟怎么进行重组才能起到真正帮助企业转换经营机制的作用。

让我们来解剖一下沿海地区某市星火制浆造纸厂这个例子吧。第一，这个项目本身先天不足，建厂决策就是错误的。花了8亿元，搞了一个草浆造纸厂，是个污染源，又没有原料，没法开工生产。第二，它几乎没有资本金。8亿元的投资只有3300万元的资本金，其他都是银行贷款。3300万元的资本金做8亿元的生意，这不是无本买卖吗？现在，3300万元已经亏掉了1900万元，剩的钱已经不够再亏一年了。第

三，经营管理不善。本来这个厂最多需要650人，结果用了1350人，大大增加了成本。现在怎么去救活这个厂呢？把银行的债权变成股权，搞“重组”的办法是行不通的。银行投钱进去以后风险很大，根本不知能否收回来，银行拿什么钱给储蓄客户还本付息呢？而且，《商业银行法》中已有明确规定，商业银行不得自行向企业投资。我已经讲过多次了，我再一次重申，没有国务院的批准，任何人不能把银行的债权变成股权。



1991年8月26日，朱镕基考察天津钢管公司。左二为天津市市长聂璧初，左四为天津市委书记谭绍文。

同志们，资本重组这个口号得有内涵。我认为，企业因建设资本金不足、产品选择不符合市场需要、经营决策失误、内部管理不善，造成产品积压、开工不足、亏损负债，要扭转这种情况，第一要兼并。让强势企业兼并弱势企业，并承担债务，可以享受免息优惠，但要在五年内还清债务。这就是重组，就是调整，是最好的办法。要多去想这个办法，不要老想去冲销银行债务。第二，救不活的企业要破产。破产要按照国务院的规定在试点城市进行，而且明文规定没有专业银

行总行的批准，任何人无权冲掉银行债务。希望各专业银行一定要顶住。第三，要补充资本金。企业要转亏为盈，必须补充资本金。企业没有资本金，还本付息的负担很重，厂长没法经营。关于补充资本金问题，财政部已经制定了若干政策，如提高折旧率等，用企业自己的积累补充资本金。地方政府也可以拿点钱给企业补充资本金。盖大楼都有钱，国有企业那么重要，就不能救一救？从多种途径去补充企业的资本金，它不就活了吗？再说，发行一点股票，我们也支持。只要股票经过审批程序发得出去，不影响整个证券市场，我们也同意发行。所以说，一兼并、二破产、三补充资本金，这就是资本重组的内涵。

我建议，资本重组问题也要请国家经贸委牵头组织有关部门调查研究一下，怎样进行资本重组才合理、行得通。

天津无缝钢管厂是个特殊的例子。因为它是国务院批准建设的，而它的100多亿元投资是借外国政府贷款搞的，现在国家不给它还债，不给它补充资本金，国家的信用就会受到很大影响。要财政部拿钱拿不出，要天津市拿钱拿不出，所以只有拿国家银行的票子了。拿银行的钱低息借给天津市，由天津市补充无缝钢管厂的资本金。之所以这样做，一是前面说的，它是由国务院批准建设的，更重要的是它引进的技术先进，产品有市场、有销路。补充资本金后企业有偿债的能力。这是债转股的特例，不能轻易用这个办法。

对于资本重组问题，大家要统一认识，做点调查，最后要搞个文件。如果不出个国务院文件，将来可能要乱套。

企业破产和资本重组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我看就由国家经贸委牵头组成调查组，赶快组织调查，总结经验，这是主要的。国家经贸委组织调查，也要请国务院法制局和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参加。

关于解决棉花调销困难的意见

(1996年9月12日)

1996年9月10日至12日，国务院在北京召开全国棉花工作会议。出席会议的有部分省、自治区、直辖市主管负责同志，供销社及棉麻公司、农业厅(局)、纺织厅(局、总会、总公司)、工商局、农业发展银行分行负责同志；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及新闻单位的同志。这是朱镕基同志在会议结束时讲话的主要部分。

棉花是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商品，国务院历来高度重视棉花工作。特别是1994年以来，针对1993年度出现的混乱局面和带来的严重后果，国务院果断决策，两次大幅度提高棉花收购价格，实施棉花市场、经营、价格“三个不放开”政策，适时利用国家储备和进出口贸易调节供求平衡，实行棉花工作省长负责制，大力整顿棉花流通秩序等。这些措施的实施，取得了明显的成效。棉花生产在连续两年滑坡之后，在1994年、1995年连续两年恢复性增长。1994年的棉花产量是8682万担，比上年增加1204万担；1995年是9536万担，比上年增加854万担。供销社的棉花收购数量逐年增长，市场供应充足。国家储备得到充实，今年经国务院批准，三次增加棉花收储1850万担，使国家棉花储备规模达到了2650万担。同时，为纺织企业安排了70亿元专项贷款，使纺织企业保持了一定的棉花库存。实践证明，国务院采取的一系列稳定棉花生产、保障供给的政策是非常正确的。对近三年棉花工作的成绩要充分肯定。

今年以来，棉花产销形势出现了一些新情况、新问题。纺织企业生产经营困难，全面亏损，不积极购棉。纺织企业维持正常生产要有一个半月至两个月的棉花库存，但今年一度只有十天左右的库存，最低时只有八天。纺织企业购棉不积极，把供销社当仓库，棉花调销困难，压库严重，已影响到棉花生产的稳定。

现在棉花是多了一点儿，也没多多少嘛。国家储备棉最多的时候有8000万担，现在储备了2650万担，这不算多。这几年，棉花收购价格

从每担300多元提高到700元，把棉花生产促上去了，形势才逐步好转。1993年只有2000万担库存，靠动用了1000万担库存、进口了700万担棉花才渡过难关，不然1993年的日子就过不去。1994年年初的棉花最低库存量差不多只剩下1000万担，但1994年进口的棉花已经减少了。1995年棉花增产较多，因此基本上没有进口多少。有的同志讲，大量进口棉花，冲击国内市场，造成了卖棉难。这不符合事实。

现在为什么棉花显得暂时有点多了呢？原因在于目前纺织工业不景气，出口下降，国内市场也不旺。这里有客观原因，包括降低了出口退税率和提高了棉花收购价格。但出口退税率不降怎么办？没有收那么多税，怎么能多退？棉花收购价格在去年提高到每担700元，当时看并不太高，没有超过国际市场价格。现在看，国际市场棉花价格回落了，我国棉纺织品竞争能力减弱的问题更突出了。但主观原因也不可忽视。1991年，我就提出要压减1000万棉纺锭，可现在呢？不但没有减少，还增加了。现在全国有4000多万棉纺锭，低水平重复，多是粗加工的产品，印染后加工没有搞上去，产品的质量、档次、花色品种不行，有什么竞争力？另外，现在加工贸易“三来一补”搞得太多了，不但进口了700万担棉花搞来料、进料加工，还直接进口棉纱加工后再出去，挤了一部分国内棉花的销路。再加上化纤价格大幅度回落，纺织企业多用化纤，也相应减少了用棉量。

如何解决当前棉花工作中的这些问题呢？

首先，要把纺织工业搞上去，这是关键。纺织工业要下决心进行压锭改造，最近两三年下决心压1000万棉纺锭，真正解决纺织行业长期没有解决的低水平重复、加工能力过剩的问题。在压锭过程中，绝对不允许把沿海地区的落后纱锭搬到西部地区去。西部地区要搞就搞最先进的，否则没有竞争力，将来还是包袱。所以在压锭的同时，要下大力气搞技术改造，搞深加工，提高质量，增加花色品种，降低成本，增强产品的竞争力。我希望国家计委、国家经贸委要把支持纺织工业走出困境，把技术改造搞上去，作为当前工作的一个重点。有些同志提出，要通过提高出口退税率以促进出口，来缓解纺织工业的困难。这不仅是纺织工业的问题，我已请国家计委全面评估和研究当前的出口退税率问题。现在国家税收减免、偷漏很多，总体上并没有收

到17%的增值税，你还要国家退17%的税，财政承受不了。但是，加快退税进度是必要的，要研究具体措施，抓紧抓好。

其次，要改革棉花流通体制。现在，棉花是独家经营。独家经营的结果势必出现抬级抬价，质量很差。最近，中国工商银行总行做了一次调查。尽管我们拨了专款要求纺织企业购买棉花，使库存达到正常水平，但纺织厂仍不愿意储备棉花，专款并没有全部用来买棉花。有些纺织企业用于购买化纤，重要原因在于棉花质量差，品级不符，掺杂使假。所以，棉花购销工作一定要改进。国家计委会同有关部门提出了一个改革棉花供应体制的意见，就是采取棉花交易会的办法，实行国家计划指导下的产需直接见面、双向选择。国务院经过讨论，认为这项改革虽然只是一小步，但朝着市场经济的方向在前进，风险也不大，因此，原则上同意这项改革。棉花交易会不要重复计划经济时期的做法，要向市场交易的方向发展。不是像过去的订货会那样只开几天会，而是既要有集中交易、又要有常年交易。棉花交易会实际上相当于一个交易市场。在棉花交易会上允许自主成交，虽然还是由供销社一家经营，但是供销社系统内有许多省棉麻公司、县棉麻公司，内部可以互相竞争，同时，又允许棉花价格适当浮动，这就形成了一个交易市场。现在的办法规定，三万锭以上的纺织企业才能入场。我看可以放开一些，只要有用棉计划指标的纺织企业都可以入场，这样有利于竞争。供方也要多一点，让大家竞争。

有的同志担心，实行棉花价格浮动后，在目前的情况下，价格下浮4%，供销社难以承受，就会把负担转嫁给农民。据我了解，现行棉花供应价格里，已经计入了半年的利息。经过两次降低利率，共降低了1.65个百分点，因此供销社棉花经营的费用也降低了。再说，从现在棉花每担700元的收购价到每担855元的供应价，中间这155元还是有节省潜力的。价格下浮了一点，棉花早一点脱手，可以节省费用和利息，对供销社来说不会吃很大的亏；相反，能促进供销社改善经营管理，加快周转，降低费用，把供销社办得更好。

还有的同志担心，棉花交易会的办法与“三个不放开”政策相矛盾。我看没有什么矛盾。首先，市场没有放开。经营还是供销社一家，只是在各经营单位之间引入了竞争，仍然不允许私商棉贩插手棉花经营。第二，计划没有放开，供需双方要凭证入场，按照国家供棉、用

棉计划进行交易。在用棉计划指标以外允许需方多买，但多买不能倒卖，多储备可以。第三，价格也没有放开。国家对棉花供应价还有中准价①和上下浮动幅度的限制，还不是自由定价。因此，这项改革同“三个不放开”政策没有什么矛盾，也不会影响“三个不放开”政策的执行。

---

① 中准价，指当时的国家计划委员会公布的商品零售中准价格，在此基础上加8%是国隶规定的零售到位价格，零售到位价格倒扣4.5%，是国家规定的批发到位价格。

总之，这项改革没有什么大的风险，步子迈得不大，但是方向对头，如果搞得好，可以逐步把棉花市场放开。这是建立国家计划指导下的市场，是一项很有意义的改革。这项改革实际上也是承认现实，因势利导。今年的棉花调拨计划完成得很不理想，据统计，50%以上棉花都是纺织厂自己去采购的，没有按计划调拨，实际供棉价已经下浮，有的已超过4%。所以，不如干脆承认这个现实，把场外交易变成场内交易，对棉花价格浮动也有个限制，使交易更加规范，更便于管理，更利于监督。凡是在棉花交易会上成交的，资金要保证，运输也要保证。

关于新疆棉花问题。对于新疆的棉花，国家是下了大力气支持的。新疆在1995棉花年度收购1900万担，国家安排专储980万担，安排销往各销区省份206万担，安排京、津、沪三大市储备新疆棉44万担，新疆自己要用400万担，损耗还有44万担，只多余200多万担。为了鼓励新疆种棉花，国务院同意再从新疆调出200万担进入国家储备。这样，前后安排新增专储新疆棉花接近1200万担。从长远看，发展我国的棉花生产，要稳步调整种植布局，同时主要依靠科技兴棉、提高单产。新疆棉花单产高，一亩平均产160多斤，亩产三四百斤的也不少，而且病虫害少，气候适宜种植棉花。新疆要发挥和利用这些优势，建成中国最大的棉花生产基地。

在金融改革与发展专题研究班上的讲话

(1996年9月24日)

1996年9月24日，朱镕基同志在北京中南海同省部级干部金融改革与发展专题研究班全体学员座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有关部门的负责同志，以及金融系统的负责同志出席了座谈会。该研究班为期16天，参加学习的有来自2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部分副省级城市以及国家有关部委的负责同志40人。

国家行政学院和中国人民银行联合举办的金融改革与发展专题研究班办得很成功。我是非常支持办这个班的，现在看来，效果也不错。发展经济，金融是关键。这一着棋走活了，什么都活了。1993年加强宏观调控，就是从金融开始的。首先把汇价稳定下来了，然后就是整治房地产，整治乱拆借，两个月就扭过来了。搞经济工作不懂金融，就会瞎指挥。希望你们把这个班持续办下去，办好了，让省长、市长也要来学。

一、关于当前的经济形势

当前经济形势的特点是，经过三年宏观调控，抑制了通货膨胀, 但经济发展速度并没有降得很低，从13.3%降到9.8%，仍然是较高的速度。通货膨胀明显降低了，1994年零售物价指数是21.7%，消费物价指数是23.7%，今年预计大概都是6.5%左右。这个6.5%是稳定的，并不像外国人说的，有行政干预或大量财政补贴的因素。关键在于基本建设规模下来了，这从根本上抑制了通货膨胀的根源。1993年基本建设的增长曾经达到79%，1994年也有40%多，1995年降到20%，现在还是这个水平。考虑物价因素和在建规模很大，现在这个比例算是基本合适了。基建规模压缩后，货币发行大为减少，从1992年到1994年，每年都是发1200亿到1500亿元；1995年降到596亿元；今年以来，只有325亿元，包括下半年农业收购资金的投放，预计今年总量超不过1000亿元，同时储蓄也上去了。

现在，我国外汇储备差不多达到1000亿美元，相当于8000亿元人民币。外汇储备在增长，但没有增加货币发行量，这一方面是因为储蓄上去了，另一方面是准备金不用于再贷款，而用于买外汇。过去13%的银行准备金交到中央银行来，又把它作为再贷款贷出去，结果都投到房地产等基建项目上去了。现在将再贷款不断收回来，变成外汇储备，存在外国银行里生利息。由于外国的低通胀水平和接近6%的利息率，外汇储备的收益还是很高的，而且并没有刺激通货膨胀。另外，这几年狠抓了农业。农业上去后，粮价稳定了，其他什么价格都上不去了。当然，能源、原材料有点涨价，这是根据政策原则主动涨价的，虽对物价有一定影响，但主动权在我们手上。总的看，物价是降下来了。据预测，明年的通胀率是6%，依据是今年6.6%的水平，翘尾巴的因素将大大降低，只有约2%；自发涨价，一般规律是3%；还有一个百分点是主动涨价。今后五年，通胀率可保持在5%左右，老百姓也只能承受这个水平，多了不行。如果我们保持8%到10%的发展速度，5%左右的通胀率，就是持续快速健康发展了，搞上五年、十年，我们的国家就大有希望。

当前，宏观经济形势可以说是1979年以来最好的。一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主要架构建立起来了，而且保持了一个较高的发展速度，二是财政赤字减少，金融形势稳定，钞票越发越少；三是物价得到了控制，社会总需求和总供给基本平衡，人心稳定。今年5月停办保值储蓄，两次下调利率，5月份下调0.9%，8月23日又降了1.5%，虽然社会上有点反映，但储蓄仍在继续增长。现在值得注意的一个现象就是社会集资。因为利率下降了，有人就搞高利集资、高利放贷。这个风险很大，要重视这个问题。总的看，这几个政策出台都没有引起大的问题。7月1日出台的人民币在经常项目下可兑换，也没有出现问题，结汇继续大于售汇，储备正在不断增加，也没有出现外汇的逆差。现在我国外汇储备已占居世界第二位。第一位是日本，由于日本进出口贸易顺差很大，外汇储备最多，2000亿美元；美国和德国不算黄金储备都是800多亿美元，如美国加上黄金储备，就有1500亿至1600亿美元，接近日本。现在看来，我国的经济实力确实大大增强了，出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好形势。这个形势是来之不易的，应当珍惜和发展这个好形势。



1996年9月24日，朱镕基在北京中南海同省部级干部金融改革与发展专题研究班全体学员座谈。右一为国务院副秘书长周正庆，右二为国家行政学院常务副院长桂世镛。

值得注意的是，现在又有人认为要放松银根。理由是国有企业困难，失业严重。放松银根能不能带动国有企业呢？实际上不仅带动不了国有企业，反而让外国企业得到了好处，现在基建项目中，一半以上的设备都是进口的。投资越多，外国企业收到的订货也就越多。设备要进口，消费产品也要进口，这样的机制已经出现了。解决国有企业的问题，还是要建立竞争机制。现在是开放的社会、开放的市场，没有竞争力是不能把国有企业搞好的。至于少数人下岗、待业，并不可怕，想办法安置就是了。如果没有一些人下岗，也就没有竞争，国有企业改革就不能进步。

二、关于农业问题

这几年，我们党的农业政策是完全正确的，农业的基础地位得到了巩固，粮棉供求状况大为好转。特别是粮棉的两次提价，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去年秋收又获得丰收，粮食问题大大缓和了。

现在有一种说法，认为进口粮食太多，造成“卖粮难”，这种说法是不实事求是的。大家回忆一下，1993年，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各省纷纷放开粮价，放开市场，到12月份，粮食一天一个价。实际上原来收购价格很低，1991年水稻收购价每斤只有0.18元，1993年放开，全涨上去了。当时为了平抑粮价，就抛专储粮。1993年国家专储粮达800亿斤，是历史上最高的。抛出部分专储粮，加之两次水灾，又调出部分救济粮，到今年年初只剩下400亿斤专储粮，少掉了一半，粮食情况是很严重的。如果不是1994年下半年决定进口粮食，1995年这一关过不去，粮价也压不下来。1995年6月至7月，粮食、饲料价格涨得很高。我们为什么敢大量调用专储粮呢？因为我们是有把握的，进口400亿斤粮食，出口35亿斤，净进口365亿斤。1994年进口粮价折合人民币每斤0.6元，是很便宜的；大量进口是1995年，折合成到岸价每斤0.7元，也比市价低。这样才稳住了粮食市场。去年物价稳定，根本的原因在于粮价稳住了，否则经济就乱了。

去年增产的粮食，专储粮里还看不出来，实际上还在农民手里。农民卖涨不卖跌，去年7月至8月，粮价涨到0.8元至0.9元1斤，跟着高价卖；到今年3月至4月，涨价涨不上去了，玉米放在家里发霉，就拿出来抛，这时就说“卖粮难”了。我们通知银行，保证收购资金，按市价收，10天内就收了17亿斤玉米。所以，从全国来看，不存在“卖粮难”的问题。局部的问题是多方面原因造成的，不能说是进口粮食带来的。由于去年粮食增产丰收，今年不进口粮食就可以把专储粮补起来了。应该看到，中国并不是粮食富裕的国家。今年下达专储粮计划是720亿斤，收到现在才达到620亿斤。就是完成了计划，也达不到原来的800亿斤。据国家计委、内贸部预测，秋收后可能达到800亿斤，因为今年玉米是大丰收。这样，还可以出口点粮食。原来不同意出口，主要是库存没有补起来。另外，出口粮离岸价每吨才140美元，还不如在国内市场销售。况且还要预防遭灾和急需粮食的时候，何必低出后又高进呢？但是粮食出口是放开了，大家可以通过中粮公司，看准时机出口。

最近，我们准备10月中旬在东北召开一次粮食座谈会，迎接秋收，统一安排粮食的购、销、运、储。粮食多的地区主要在吉林、黑龙江、内蒙古，辽宁也有一点，主要是玉米丰收。水稻丰收主要在江西、安徽、湖南，湖北可能也多一些。跨省调拨主要是这几个省区，其他省区就地储备就行了。中央储备只能搞到800亿斤，太多了也不行。希望各省也要建立一点储备，根据不同情况，搞到三个月到半年的储备就可以了。按此计算，全国地方储备粮可达360亿斤，但现在实际上只有200亿斤，有四个省还没有建立地方储备。希望大家都储一点，实际上就是负担一点利息嘛。

棉花也是一样，我国的棉花储备并不算多，现在大约有2800万担国家储备，历史上最高达到8000万担储备。现在说棉花多，无非是因为纺织工业不景气。但纺织工业加强压锭改造、退税支持后就会有起色。新疆产棉大约1900万担，扣除本地区要400万担，可调出1500万担做国家储备，由国家来负担利息。实际上粮、棉收购价提高以后，地方库存升值，也减少政府补贴，地方种粮、种棉，储粮、储棉的受益还是很大的。

另外，大家还要看到，自今年1月起，国际粮食价格涨到250美元一吨，我们已停止进口粮食了。我们进的时候都是国际市场粮价最低的时候，既稳定了物价，又没有造成农民“卖粮难”。我国粮食储备并不多，专储粮、地方储备、周转粮，加在一起是2450亿斤，这个数量并不多。但由于种种原因，如粮食系统服务态度不好，质量低，价格高，老百姓都到集市贸易去买粮食，粮食系统库存大量增加，表现出一种假象，好像中国的粮食多了。关键是要改善经营管理，改革吃“大锅饭”的机制，保证粮食的质量，让老百姓愿意到粮食系统来买粮。

三、关于国有企业问题

对国有企业要有一个正确估价，目前各方面的认识还不统一。国有企业一直存在不少的问题，现在也不必把问题看得太严重。不能只看到国有企业净利润减少了，因为相当多的利润转移了，转移到农业、社会保险基金或企业自有资金方面去了。

国有企业效益滑坡的根本原因，在于计划经济体制指导下的长期重复建设。生产结构不能适应市场需要，盲目性很大。另外，效益差的

中小企业太多，“大跃进”时期的弄堂工厂有的到现在还没有淘汰，有的企业生产的产品根本销不出去，但还在生产，靠银行支撑，长此下去怎么会有效益？因此，现在提出要在调整结构上下工夫，搞市场经济，面向市场。如果继续搞重复建设，国有企业是永远搞不好的。

目前，彩电已搞到3000万台的生产能力，但最多一年只需生产2000万台，三分之一能力空余；而这2000万台多数是几家规模大的企业批量生产的，如长虹、康佳等，其余大片亏损。规模最大的长虹年产也只有250万台的水平，这个水平无法跟外国人竞争。不少项目投产时效益很好，后来一搞重复建设就困难重重。如秦皇岛耀华玻璃厂的浮法玻璃，去年利税8000多万元，今年只剩下几百万元了。道理很简单，到处都是浮法玻璃，搞重复建设，花了很多钱，自己把自己打垮了。还有利用外资问题，搞盲目合资，进来一个，打垮十个，国有企业怎么能搞好？很多项目随意性很大，轻率拍板，可能当时有一点依据，能赚钱，但两年后情况就变了，不赚钱了。再如搞聚酯、涤纶，也是一阵风，结果价格成倍地下降，连借的钱都还不了。看来还是在用计划经济那一套办法对付市场经济，把国家的钱往水里扔。应该看到，国有企业已经到了一个更新时代了，不少老企业一定要淘汰，否则搞不活；新企业一定要适应市场需要，上新项目一定要进行严格的可行性研究。技术改造是要加强，但技术改造的方向不对、产品选择不好，就要背上新的包袱。

现在有一种认识，认为宏观经济形势好是牺牲了微观，牺牲了国有企业的利益得来的。这种看法是不正确的，国家的税收并没有加重。经过调查，是地方的摊派加重了。税制改革确实改掉了一些优惠政策，如税前还贷、包干制等等，但影响并不大。一是税前还贷的政策虽然改掉了，但所得税率却从原来的55%降到现在的33%，降了近一半；二是原来不允许把还贷利息打入成本，现在允许打入成本了；三是大大提高了折旧率，实际是扩大了企业的自有资金来源。这些都是为了搞活企业。所以，不能把国有企业当前的困难都归结为国家政策的改变，这不符合事实。刚才大家都谈到，国有企业还是要坚持“三改一加强”，不能偏到其他方面。特别是要强调加强管理，管理不善也是个很重要的原因。最近克林顿总统的顾问、美国经济委员会主席对我说，他们并不是主张一定要我们的国有企业私有化，但至少要创造一

个竞争的环境。竞争才能进步。如果没有破产、兼并、竞争，国有企业是搞不好的。

银行是自负盈亏的单位，赚的钱是要上缴财政的。这两年由于贷款利息的拖欠达到一两千亿元，致使财政赤字很大，大家要重视这个问题。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不能指挥银行，中央银行对商业银行也只能是监管，没有过去那些贷款调度权这套东西了。有些地方成立区域性金融领导小组，指挥银行贷款。经调查，有的搞“两本账”，上报一本账，自己有另外一本账，高息储，高利贷，这种无法无天的行为一定要整治！

银行如没有一个铁的账本就没有秩序，就会引发金融危机，是很危险的。一旦如此，来势非常凶猛，很快就会席卷全国，物价飞涨，人心动荡，是不得了的。因此，希望各个地方的领导同志都要体谅银行的困难，尊重银行的职能，帮助和支持银行做好工作。银行是一个垂直系统，分行行长是由总行任命的，当然，也要听取地方的意见，但地方政府无权撤销他们的职务，更不能随便抓人。在宏观调控过程中，银行的干部得罪了很多人。越是坚持中央的方针，就越有可能触犯地方的利益。在这方面要慎重，要全面地、客观地分析，如处理不当，就可能违反中央的宏观调控政策。当然，银行也应该改进工作，充分了解本地区经济、社会情况，千方百计提高服务水平，支持地方经济发展。总行的领导同志应经常下去，检查、指导工作，虚心听取地方党委、政府的意见，教育银行系统的干部，为地方经济发展搞好服务，作出贡献。另外，目前银行的工资、奖金比较高，当然，也不是所有行业中最高的。现在已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如今年冻结了行政费用开支的增长和工资的增长，停止建大楼，就是为了改善效益，向财政多上缴一些。对这些方面，地方党委、政府要加强监督。

四、关于新的经济热点

现在有些同志提出“新的经济增长点”的问题，这是指在新形势下能够带动整个经济形势发展的产业。经济学家在议论这个问题，计划、财政、金融、经贸部门也在讨论这个问题。我认为这个提法不大准确，还是提新的经济热点或消费热点好一点。

有些同志认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应是汽车工业，但大部分同志不赞成这个观点。因为我国的汽车工业不会像美国那样成为它的支柱产业中最重要的产业，没有油，没有道路，没有购买力。我国城市主要应发展公共交通。不是说汽车不能进入家庭，有些高收入的人，汽车已经进入家庭了。但广大群众是不可能的，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都不可能。我国现已成为石油净进口国，进口量越来越大，没有那么多的外汇支持，所以把汽车作为一个新的经济热点或消费热点是不行的。在汽车行业搞按揭，分期付款，我们不赞成。

现在汽车工业正在盲目发展，仓库积压。如用按揭贷款把这个包袱捡过来背，怎么能保证还钱？实际是在鼓励盲目发展。现在已有个别银行开始办理这样的贷款。这是关系到产业政策、金融政策的重大问题，未经国务院批准，不能这样搞。已经搞了的，要办好，不再扩大范围。这不是我们要发展的重点。

当前，真正能够成为消费热点，能够带动经济发展的是建筑业。但这里指的是民用住房建设，而不是高级房地产。这些年来，人民的生活水平、工资水平都已逐步提高。如果说1000元1平方米，不算地价，一个住户大约60平方米，要6万元。用分期付款方式，10年、15年还清贷款，大多数职工是买得起的，银行也没有多大风险。这个工作如搞得好，不仅有可能成为一个消费热点，而且将带动钢材、建材以及化工等行业的发展。但是，一定要有具体办法，经国务院批准后才能搞，不能一哄而起，因为从1992年开始的房地产热到现在还没有退下去，后果还相当严重，估计至少还有两三千亿元的房地产压在那里不能发挥效益，建成了也没有市场。到目前为止，固定资产投资增长最快的还是房地产，还在不断往里面投钱。总想建成后收回投资，但实际上希望渺茫。如果稍微放松一下，这部分钱不是去给老百姓盖廉价住房，而是投到高级房地产里面去了，危险很大。希望大家不要再向银行施加压力，搞汽车、高级房地产的按揭贷款等等。适合于广大职工群众居住的、低档的民用住房可以搞按揭贷款，但要制定统一的办法，逐步推开，不能一哄而起。

扶贫工作的关键是选好贫困县领导干部

(1996年9月25日)

1996年9月23日至2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北京召开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主要负责同志和分管扶贫工作的负责同志，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和解放军三总部的负责同志。这是朱镕基同志在会上讲话的主要部分。

这次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请这么多的地方党政主要负责同志参加，是从来没有过的，可以看出党中央、国务院解决贫困问题的决心。我们一定要共同努力，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提出的任务，在本世纪末基本解决贫困问题。

我仔细看了大家的发言材料和会议简报，大家提了很多好的意见，我们会认真研究。有几个问题，我再强调一下：

第一，我认为，扶贫工作的关键是选拔好贫困县的领导干部，主要是县委书记和县长。应该把最好的干部选拔到这样的岗位，将来脱贫以后，可以重用，一定要委以重任，要相信他们。为什么要提这个问题？因为我们在研究文件时碰到这个问题，就是层层派工作组，中央派，各省区市派，各地市也派，派下去都是“钦差大臣”，怎么得了！而且有些地方提出，说这个人下去以后就分片挂钩了，不脱贫就是他的责任了。如果都是这些“大员”、“钦差大臣”的责任，那还要县委书记、县长干啥呢？还相信不相信县委书记、县长呢？与其这么搞，还不如选最好的干部去当书记、县长，把责任交给他们。来很多“钦差大臣”，如果上去直接给省委书记、省长汇报，下面的县委书记、县长就很难做工作啊，那他们只能小心翼翼，什么决策都不敢作。因此，我认为，工作组下去，任务只能是调查研究，给省委、省政府反映真实情况，然后帮助当地办点实事，不要指手画脚，不要大包大揽，不要代替当地的领导干部作决定。



1996年9月25日，朱镕基在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上讲话。左二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吴邦国，左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姜春云。

第二，要选好项目。这次会议的文件，没有提一般工业项目，提的是种植业、养殖业、以当地农副产品为原料的加工业。没有原料不能搞工厂，在这方面我们已经吃了很多亏。一般工业项目是不能够随便上的，贫困县缺人才，缺管理经验，上了工业项目以后很容易背包袱、赔钱。现在重新去走过去沿海地区的道路，效仿“苏南模式”①，发展乡镇工业，那是不行的，时代不同了。现在不用说贫困地区的工业，就是大城市的工业都缺乏竞争力，因为很多外国产品进来了。再去搞一些质量、档次不高的加工产品，卖给谁？就是有相当技术水平的产品也是滞销嘛。基础设施建设要量力而行，因为没那么多钱。我最近到甘肃的天水、定西看了，这些地方最大的问题是干旱，他们扶贫工作的重点就是抓引水工程和节水、集流工程。例如，他们因地制宜挖水窖，搞一条沟，挖一个窖，抹一点水泥，让雨水流到窖里去，一年就靠这点水，吃也是它，浇地也是它，非常见效。他们要是轻易办个工厂，会把钱全赔光了，一点效果都没有。

① “苏南模式”，通常指江苏省苏州、无锡和常州(有时也包括南京和镇江)等地区通过发展乡镇企业实现非农化发展的方式。



1995年10月6日，朱镕基在云南省昭通市小龙洞回族彝族乡宁边村窝棚内看望农民。

第三，扶贫资金的使用要搭配。现在看得很清楚，有些地方搞工业项目没有一定的资本金，全是靠银行贷款，利息负担很重，这叫做无本买卖，企业哪有竞争力？怎能不亏损？我建议，把扶贫的拨款和扶贫的贷款结合起来用在一个项目上，使它有一定的资本金，这样可以保证那个项目将来有效益。不能把扶贫的贷款当拨款来用，那是有区别的，不能借了不还。大家建议小额贷款取消担保，那也可以，说句老实话，这种担保没有多大意义；延长还贷期限不是不可以，减少一点利息也可以。但是，不还贷总是不行的。一开始就要有这个概念：银行贷款是要还的。项目不配资本金，将来就还不了钱。银行对没有还款能力的项目提出一些意见，是帮助把关，我看是个好事情，多听听意见没有坏处。不过，银行干部一定要改善服务态度，绝对不准扣压、挪用资金；已经审查批准的项目，资金一定要按时到位。

加快粮食购销体制改革

(1996年10月14日)

1996年10月13日至14日，国务院在辽宁省大连市召开部分地区粮食工作座谈会。出席会议的有内蒙古、辽宁、吉林、黑龙江、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等省、自治区的主管副省长(副主席)，辽宁、吉林、黑龙江省计划委员会主任、粮食厅厅长、财政厅厅长，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这是朱镕基同志在座谈会上讲话的主要部分。

今年在抑制通货膨胀取得明显成效的同时，国民经济保持了较快的发展速度。全国宏观经济形势显著改善，一个重要原因是农业的基础地位得到加强，特别是粮食供求状况大为好转。今年的物价指数预计能够降到6.5%，估计明年的物价指数也能够控制在今年实际水平以下。就是因为连续两年的农业丰收，仓储充实，粮价稳定了，其他物价也就涨不上去。如果通过这次会议，我们进一步加强和改革粮食的经营管理机制，保证粮价不涨就更有把握，这就为明年稳定物价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当然，在这种好的形势下，出现了一些新的问题。粮食丰收后，也带来了一些新的困难。但必须有一个清醒的认识，目前我国不存在粮食多了的问题，从宏观上、从长远来看，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中国的粮食供求平衡将会始终偏紧。去年增产400亿斤，今年预计增产270亿斤，这670亿斤粮食扣除当年新增消费外，刚够补充国家专储粮库存，怎么能说粮食多了呢？去年秋收以前，粮食供应还非常紧张，因为丰收还没有到手。当时稳住粮价是靠进口粮食，要不是进口了300多亿斤粮食，去年的粮价就稳不住，后果就不堪设想。不能因为农业收成稍稍好一些，就说粮食多了，棉花多了，食用油多了，糖也多了，实际上都不是真正多了，而只能说暂时供求上平衡有余，而且也是地区性的有余。余一点是好事情，可以更好地控制物价。现在的主要问题是什么呢？是粮食系统的经营管理在新形势下出现了很大问题，已经严重影响了宏观经济效益，影响了国家的财政、金融。

首先是粮食的政策性亏损挂账。政策性的亏损过去是怎么造成的呢？是因为粮食的销售价低于收购价，造成了亏损，需要财政补贴。中央财政补贴到位，地方的补贴不到位，因此就只好到银行去借钱，挂在那个地方不能还。1994年进行粮食购销体制改革的时候，就把老账挂起来，实行“两条线”运行，政策性挂账停息，在五年以内消化完。现在看，这个政策是成功的，也是正确的。粮食系统是努力的，做了大量工作，是有成绩的，应该肯定。消化了多少老账呢？到1991年年底，过去老的挂账有545亿元，其中政策性的挂账是485.7亿元，经营性的挂账是近60亿元。到1996年6月底，政策性挂账消化了168亿元。搞了两年，现在政策性挂账还有300多亿元。而且已经消化的168亿元里面，靠停付利息消化的是50多亿元，实际上大家只消化了100亿元多一点。总之，粮食系统还是有成绩的，还得继续这样做下去，逐步消化。



1996年10月14日，朱镕基在正兴建中的粮食转运港口——辽宁省大连北良新港考察。前排右一为大连市委书记于学祥，右三为大连北

良有限公司副董事长兼总经理宫明程；第二排左一为辽宁省省长闻世震，左二为大连市市长薄熙来。

现在有一个严重的问题发生了，经营性的亏损挂账基本上没有消化，新的经营性挂账又直线上升了。去年，经营性的亏损又挂账50多亿元。今年1月到8月，经营性亏损猛增至155亿元，拿银行的钱垫在那里。国家粮食储备局预计全年要亏250亿元，这怎么得了！粮食系统在银行里一挂账，银行就不能向财政上缴了，财政平衡就发生困难，就会增加赤字。所以，我对这个局面非常忧虑。原有的300多亿元的政策性亏损、50多亿元的经营性亏损，这些老账还挂着，新的经营性亏损又挂上了200多亿元，眼看着还越亏越多，这个局面不扭转怎么得了！

产生这个问题的原因很清楚，就是国有粮店的经营费用太高了。现在集市粮价下来了，不高于甚至低于国有粮店的售价，再加上国有粮店的粮食是陈粮，农民在集市上卖的是新粮，质量比国有粮店的好，国有粮店的服务也不行，当然销售量大幅度下降，亏损就直线上升。如果还看不到这种转变，国有粮店再不尽早深化改革、改善管理，就会影响到整个经济形势，这就是我们讲的已经到了非改不可、不早改过不去的时候了。同时还要指出，当前的大好形势正是改革粮食经营管理体制的最好时机，国内粮食平衡有余，国际市场粮价回落，国内市场粮价稳定，这是粮食工作多年未有的好形势。必须抓住这个机遇。错过这个时机，改革的代价就更高了。怎么改革？改革的方向没有变化，还是1994年粮食购销体制改革这个方向，但是我们的步子要走得更快一点，改革的内容要更深一点，概括起来就是“四个分开、一个并轨”。

第一，政企分开。 政府跟企业责、权、利不分，搞在一起是不行的。现在已经基本上没有政策性的任务了，定购粮收进来，加上费用，卖出去就是市价，而且我们有能力控制这个市价，因为手里有粮食。没有过去高进低出的问题，也就不需要政策性补贴了。从中央来说，将来的国家粮食储备局就是管储备，就是管国家专储粮的经营、管理和保存，没有其他职责，就是一个自负盈亏的单位。我讲自负盈亏是指在中央财政补贴利息和费用的情况下，严格地讲它还是一个事业性的单位。那么，粮食的宏观平衡、政策的制定、粮价的监管怎么办？可以考虑在国家计委或内贸部成立一个粮食司(局)来管理。

第二，经营和储备分开。 储备就是两种储备，一种是国家的储备，另一种是地方的储备。管理这个储备应该有专门的机构，国家专储粮就是由国家粮食储备局来管，从上到下垂直领导，人、财、物统一，同粮食周转、地方储备彻底分开。专储粮的用途只有两个：第一个是如果发生全国性的特大自然灾害，并非一个省份能够解决的，就要动用国家储备粮。一般的灾情，就像这几年的灾情，原则上都由地方储备粮解决，不需要拿国家的专储粮。如果地方遭了灾，发生资金困难，那是另外一条线，去申请救济资金，粮食不需要从国库里面拿。第二个是当某一个省份的粮食政策发生了重大失误，没饭吃了，那只好由国家来开仓济贫。一般情况下，粮食的国家专项储备和战略性储备是不能轻易动用的，但是每年得推陈储新、得轮换。这是调节、控制粮食市场的一个重要力量，一个政策性的经济力量、经济手段。我们建议地方粮食系统的储备与经营也要分开。怎么分呢？地方要研究。搞经营完全是靠商业性的公司，没有理由要国家补贴，因为按收购成本加上费用后的价格销售粮食，为什么要亏损呢？上海现在的粮油销售环节已经没有亏损了，不需要国家补贴了。上海为什么不亏损呢？在批发环节，刚才讲过已没有政策性的补贴了；到零售环节，是采用便民店的形式，也就是说，它不是只卖粮食。世界上已经没有只卖粮食的商店了，只有中国才有。如果在粮店里油、盐、杂货什么都卖，或者说就是小的超级市场，它的经营就不会有亏损了。另外，上海还有一个经验，现在它的粮食市场不是由粮食系统一家垄断，它有三家。一家是粮食系统的零售店，向便民连锁店的方向发展；另一家是农垦局系统成立的农工商粮油公司，农场把生产的粮食拿出来自己开门市部销售，中间环节少，成本低；还有一家是农业局，就是组织市内各个县的农业系统搞产销直挂，农业局成立一个公司把农民的粮食直接拿到市场上去销售。不是独家经营，形成竞争以后，粮食的市场价格就上不去，粮食经营也不会亏损；亏损就关店嘛，人可以转业。所以，如果把体制理顺、分开，在改善经营管理方面，办法多得很，粮食系统是不应该亏损的。

第三，中央与地方的责任分开。 因为我们实行的是粮食省长负责制，省长要切实抓好本地区的粮食生产、供应、储备，管好本地区的粮食市场，这个责、权、利是统一的。国家只制定一些宏观政策，例如价格政策。去年北戴河会议决定提高粮食定购价格，当时有人担心

提高以后市场粮价会不会水涨船高。我们认为，只要粮食供求能够平衡，市场价格就涨不上去，可能会逐步向定购价靠拢。现在没想到粮食的市场价已经降下来了，很快向定购价看齐了。这也可以证明按现在这个定购价来收购粮食，农民还是有利可图的，足以鼓励农民的种粮积极性。因此，我们考虑对这种趋势大家要及早准备，就是粮食的市场收购价绝对不能低于定购价，如果比这个定购价低的话，农民种粮的积极性就要受到影响。好在现在化肥价格比原来下降得多了，原来每吨尿素卖到2300元，每吨磷酸二铵卖到2500元；现在挂钩尿素一般是每吨1400元到1500元，市场尿素价格每吨是1700元到1900元，磷酸二铵每吨大约2300元。所以，农民还是得到了很多好处的，现在农民种粮的积极性很高。我们不能挫伤这个积极性，要用保护价收购的办法，使粮食的市场价不低于定购价。绝不允许出现粮食丰收、农民减收的情况，不能让种田的人吃亏。

第四，新老挂账分开。 政策性的挂账是历史原因形成的，我们还要继续采取“两条线”运行、逐步消化等办法解决。要加大力度，我相信体制一改，力度就加大了。对以后经营性亏损的挂账我们是不能承认的，粮食系统在银行挂的账、借的钱是要还的。现在挂了200多亿元，还在继续挂下去，这确实是一个大问题。我们的态度是不认这个账，到时候就要还钱。再这么亏下去不行了，所以要加快体制改革。这次会议决定170亿斤专储粮由国家粮食储备局另找仓库，这就是改革的开始。把产区的170亿斤粮食收走，不占地方的仓库，国家储备和地方储备、地方周转就逐步分开了。粮权落实了，管理也规范了。

以上讲的是“四个分开”，还有“一个并轨”，就是进一步完善价格机制，实行定购粮价和市场粮价的并轨。这是很自然的一个过程，没有谁事先下一个命令，它们实际上已逐步并轨了。相反，我们不是硬性地要求粮食的市场价降到跟定购价一样，而是怕它降到定购价以下，损害了农民利益。如果不采取措施，很可能就降下来，所以，我们要采取各种办法来稳定市场粮价。稳定粮价不是过去那个意义，怕它涨得很高，现在是怕它降得过低。因此，在收购粮食和轮换储备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价格，不要引起市场价格降低。另一方面，如果在这种形势下粮食系统自己不改善经营管理，不降低费用，粮价太高那就销不出去，造成经营困难。我讲的这些，都是在北京与有关部门的负

责同志共同商量后的意见，后来在李鹏同志主持的总理办公会议上，做了简要汇报，李鹏同志也表示原则同意。会上，国务院确定由陈锦华①同志牵头，成立一个粮食购销体制改革领导小组，立即开始工作，抓紧研究具体的改革方案，经过国务院批准后实施。这是一个最好的时机，不会引起社会震动，不会引起粮价波动。当然，改革要平稳过渡。什么意思呢？不可能要求老的挂账、新的挂账一概都消化，这个你们也不用担心。总得要想办法逐步让它们过渡到新体制上去，妥善地解决这些遗留的问题。粮食系统的同志们也不要恐慌，“断了奶”了， 老账还没有还清，新的亏损也不认账，那怎么办呢？我们大家来研究一个办法。我今天是给大家打一个招呼，粮食管理体制要改革了，这是挡不住的，非改不可，改了以后有很多好处。如粮食仓库向销区转移，体制一改马上就可以解决。那就是地方的储备库自己建；中央考虑要把专储粮合理布局，就是把国家专储粮挪到销区去，中央的储备库由中央来建。中央、地方都可以利用停工闲置的厂房、仓库，稍加改造后储备粮食。

① 陈锦华，当时任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

关于资金问题，我们历来都强调这样两句话：一是充分保证收购资金的供应，绝对不允许“打白条”；二是绝对不允许挤占挪用，成立农业发展银行就是为了这个目的。但是由于改革没有彻底，体制也不顺，结果挤占挪用收购资金的现象还有增加。造成这种局面，我想农业发展银行、农业银行有责任。同时，地方政府的责任也不小，政府干预银行贷款。大量的收购资金被挤占挪用，去年是三分之一，现在是40%以上都被挪去干别的了。所以，今年决定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就是农业发展银行设分支机构，一统到底，附营业务移交农业银行。农业发展银行的贷款都是收购资金，是封闭式的运转，绝对不许挤占挪用。现在重申，凡是违反有关规定再挤占挪用收购资金的单位和个人，一定要严肃查处，绝不可放任姑息。人民银行要加强监督。

关于市场开放问题，收购粮食还得有个秩序。过去是先收定购粮，定购粮收到一定程度时就收议购粮，然后再收购专储粮。我想从今年秋天开始，议购粮跟定购粮基本上分不开了，价格差不多了，也就是收购粮食先收到1800亿斤，包括1000亿斤定购粮、800亿斤议购粮，再

收购专储粮。应该有个秩序，不然周转粮还没有收够，就变成国家储备。当然，国家粮食储备局不可能把收购部门也独立成为系统，还得委托原来粮食系统的粮站来收购，放在它的周转库里，然后倒库，存到国家粮食储备局的储备库里去。因此，专储粮的收购和销售、倒库，价格要服从整个国家的宏观调控和当地粮食市场的稳定。这个责任还是在当地的省长，因为他负责整个市场，价格还是由他来定。中央只有一个宏观的指导、一个基准的价格，具体的由当地政府决定。

艰苦奋斗，改变凉山面貌

(1996年10月27日)

1996年10月25日至27日，朱镕基同志在四川省考察工作，先后考察了凉山、攀技花、成都、绵阳等地。这是朱镕基同志在听取凉山彝族自治州负责同志工作汇报后讲话的主要部分。

我和中央有关部门的同志大多数都是第一次到凉山来，听了大家的介绍和实地考察，很有收获，增加很多感性认识。对凉山有三个较深的印象：第一是凉山少数民族的贫困还是相当严重的。尽管新中国成立几十年了，凉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由于种种原因，贫困依然严重。第二是凉山少数民族的扶贫开发，由于省委、省政府和州委、州政府做了大量工作，近几年进步很快。包括西昌市到昭觉县的柏油路，都是近几年修的。你们帮助彝族同胞改变人畜混居状况，马开明州长称之为“形象扶贫”，不管这个名字准确与否，但这件事做得很好。群众移风易俗，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只要方向正确，方法对路，到2000年基本消灭贫困现象是能做得到的。第三是凉山州的昭觉县条件还很艰苦，你们在这里工作很辛苦。昭觉县委几个领导才一部电话，这在沿海地区是很难想象的。你们发扬艰苦奋斗精神，说明你们物质条件虽然很贫困，但精神世界是丰富的。我们感到很高兴。

下面，我谈两个问题。

一、关于扶贫问题

中央已有了规划，到2000年要基本消除贫困现象。现在中央财政非常困难，原来计划要减少赤字100亿元，看来很难。但扶贫资金，包括扶贫拨款和贷款两项，还是要由108亿元增加到153亿元，中央是尽了最大努力的。

现在扶贫贷款银行很难收回来。贷款不是拨款，贷的是老百姓的存款。贷了款不还，银行只有多发票子，就会加重通货膨胀的压力。请大家千万不要把贷款当拨款用。

中央财政尽力而为，希望地方扶贫资金也要相应增加。现在中央预算收入只占全国财政总收入的40%，地方占60%，你们从哪里都可以省一点钱出来。有些地方口里高叫扶贫，扶贫经验也特别多，但就是资金不到位。那效果怎么样？我就不太相信。现在中央决定，扶贫资金中央出100元，地方一定要出30元到50元，这就是要逼各地拿钱。现在建楼堂馆所、铺张浪费多着啦，完全可以省出钱来扶贫。我到广西、云南昭通等地看贫困地区时，都掉了眼泪。老百姓那么苦，如果还建那么多楼堂馆所，铺张浪费，于心何忍？中央决定扶贫是“党政一把手负责制”，中央的钱下达到省，由省里统筹安排、统一确定。你省委书记、省长怎么用，我不指挥，买酱油或打醋是你的事。如果你用扶贫的钱盖个什么大楼，那监察、审计部门就要找你了。

你们提的要求，有些涉及政策问题，我们要带回去研究。如修干线公路问题，不在扶贫项目内，要交通部研究。中央决定，投资要向中西部地区倾斜。我不同意现在就修京沪高速铁路，那是锦上添花，现在时机不成熟；我主张雪里送炭，现在重点先修成昆路、内昆路、南昆路、南疆路、宝成复线、株洲到六盘水复线等等。这关系到中西部地区发展，关系到全国大局的稳定。



1996年10月26日，朱镕基在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与彝族群众交谈。前排左四为凉山州委书记肖光成。

二、关于扶贫工作的基本经验

我们在这里走马观花，感到凉山扶贫工作的经验是非常明确有效的。我看第一条经验是进行基本农田建设。近期必须达到一人有一亩比较稳产高产的基本农田。无论平坝或山区，都要搞好能保收的基本农田。我看你们公路沿线山林破坏很严重。不少地方刀耕火种、广种薄收，造成水土流失，对子孙后代影响太大了！这种状况必须改变。

如果处于长江上游的四川不搞好水土保持，三峡工程建好也要被淤积。我看要以愚公移山的精神，要以大寨精神，修筑高标准的稳产高产的基本农田。具体要求是：大搞“坡改梯”，垒石头，必要时用一些水泥。从现在起，努力修建高标准农田。这是百年大计，是子子孙孙的“活命田”。如果一人有一亩这样的基本农田，加上薄膜覆盖和良种等农业科技，就有了“保命田”。那样，陡峭山坡就没有人乱开垦了，农民就愿意退耕还林、还草了。我在有个省看了一个水电站，水库周围的山

上树非常少，我说一定要把水抽上去种树。由电站和地方各拿一点钱来种树。老肖①、老马②你们要非常重视水土保持。从西昌到昭觉这一路上，有几处封山育林搞得非常好，看了叫人高兴。但也有许多地方的山是光的，看了叫人心焦。你们要为农民解决烧柴问题。海拔2000米到3000米的高山坡上的植被，很难长起来，农民砍去烧了，怎么恢复得起来？！现在农民买不起煤，可以搞沼气、太阳灶等。你们不是要求搞开放口岸吗？搞好了水土保持，绿化了荒山，凉山成了九寨沟，才有人来旅游嘛，你现在这个样子，开放口岸谁来？

---

① 老肖，指当时任中共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委书记的肖光成。

② 老马，指当时任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州长的马开明。

第二条经验，是要从根本上改变落后的生活习惯，移风易俗，这是很有意义的事情。无厕所，无猪圈，人畜混住在一起，这怎么行！我们看到甘肃农村，穷是穷，但农户每家有个院子，干干净净，一下雨，雨水就集流到水窖里，吃、用就都靠它了。你们在昭觉上游村搞的“形象扶贫”，解决了好多问题，应该大力加以推广。先让彝族群众把厕所和猪、羊从屋子里搬出来，墙上开个亮窗，我希望你们三年内解决这个问题。

第三条经验，扶贫就是要发展农业、畜牧业，不要不切实际地搞什么工业，有条件的地方可以搞一点以农畜产品为原料的加工业。听说你们要搞什么造纸厂，我坚决不同意。你们这么点林子，到处是癞痢头的山，还能办造纸厂吗？污染你们怎么治？小厂的纸你卖给谁？好多老区和贫困地区的同志，一讲扶贫就是要求办工业，办一个厂亏一个厂，背一个包袱。现在不只是乡镇企业，国有企业都亏损，哪个产品有市场？如果有人批评你们不办工业，不以工业为主导，你们就讲是我说的，我的责任。只要你们把农、林业真正搞好了，再办现代工业也不迟。但现在你们就是要把农、林业搞好，把老百姓的房子改造一下，把厕所和牲畜从屋子里搬出来，让他们吃饱穿暖，把山林植被覆盖搞好。

1991年，我到国务院分管工交工作，那时小烟厂多，亏损很严重。我的对策，一是限产压库，二是坚决关掉计划外的小烟厂。小厂赚不

了钱，都是赔钱。四川省支持我，关了不少小烟厂。现在全国烟草工业利税已由100多亿元上升到今年的800多亿元了，这是当时关停小烟厂才带来今天的效益。这几年又在升温、泛滥，到处要求搞小烟厂。我看要坚决顶住，必须铁面无情。只要不怕得罪人，就可以顶住。你们这里办工业要非常慎重，现在重复建设搞得很多。你们这些县，原料、资金、人才都缺乏，谁要办工业，搞不好就会垮台。办企业关键在厂长，要真正懂经营会管理，大公无私。你们要把厂长抓好。抓管理，抓质量，才可以办好厂子。

我确信，只要你们按中央的方针政策办，带领全州人民艰苦奋斗，方向对头，措施得当，凉山一定会迅速改变面貌。

采取措施防止股灾

(1996年11月4日)

这是朱镕基同志在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近期股市行情的简要报告》上的批语。

请正庆①同志研究落实防止股灾的各项措施，尽快起草文件，由国务院颁发。

当前要迅速做到：一、人民银行采取措施切断银行资金流入股市的渠道，二、财政部采取措施抑制券回购资金流入股市，三、证监会加强监管，防止股票市场恶性炒作，全权负责防止股灾爆发。

请椿霖①、仲藜①、相龙①同志并罗干、锦华①、云宝①同志阅。

朱镕基

11.4

---

① 正庆，即周正庆，当时任国务院副秘书长、国务院证券委员会主任。椿霖，即何椿霖，当时任国务院副秘书长。仲藜，即刘仲藜，当时任财政部部长兼国家税务总局局长。相龙，即戴相龙，当时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锦华，即陈锦华，当时任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云宝，即姜云宝，当时任李鹏总理办公室主任。

在一九九六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的总结讲话

(1996年11月24日)

1996年11月21日至2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北京召开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党政主要负责同志，中共中央有关部门、国务院各部门和有关单位的主要负责同志，解放军三总部和武警总部负责同志。这是朱镕基同志在会上总结讲话的主要部分。

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开得很好。我参加了东北组、中南组、华东组的小组讨论，看了简报，昨天晚上和前天晚上听了各个小组召集人的汇报。我根据同志们提出来的意见和自己的体会，把这次会议的特点归纳了四句话：成绩说够，问题说透，措施对症，认识对路。这一次会议，大家牢骚比较少，对党中央、国务院以及国务院各部门提的意见不是很多，虽然很尖锐，但是非常中肯，对于做好明年的经济工作是有很大好处的。我今天主要是根据同志们在小组讨论中反映的问题，再作一些补充说明。

一、关于当前经济形势

很多同志担心，当前经济的好形势是不是稳固，是不是会逆转。我认为，当前的好形势主要表现在通货膨胀得到了抑制。这不仅是靠行政措施，而是带有治本的性质，只要坚持下去，这个经济的好形势就能够得到巩固和发展。理由是：第一，我们这两三年来，确实是控制了固定资产投资的过快增长。1993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长61.8%，1994年增长30.4%，1995年增长17.5%，今年预计增长20%左右，扣除物价增长因素，实际增长也就是12%。由于固定资产投资的过快增长得到抑制，票子就少发了。1991年的时候，发了590亿元票子，1992年开始比较快速地增长，发了1200亿元，1993年发了1530亿元，1994年发了1424亿元，通货膨胀的根源就在这个地方，基本建设的增长超过了国力的可能，只有发票子。去年我们只发了596亿元，才有今天的好形势。这还是在外汇储备大量占用人民币的情况下。去年外汇储备增加

了二三百亿美元，相当于人民币2000多亿元啊。今年发票子要力争控制在1000亿元以内。如果没有控制基本建设，没有少发票子，物价涨幅是绝对降不下来的。



1996年11月24日，朱镕基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作总结讲话。

第二，农业上去了。由于党中央、国务院采取正确的农业政策，两次提高粮食和棉花的定购价格，使农民得到很大的好处，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所以去年粮食增产400亿斤，今年预计增产270亿斤。正因为粮食的供求平衡有余，粮价才稳定。以粮食为主的食品在居民的消费中占了50%左右，所以粮价稳定了，物价就稳定了。

第三，社会总供给跟总需求实现了基本平衡，而且部分产品平衡有余。目前，粮、油、糖的库存都超过历史最高水平，主要生产资料包括钢材、水泥、玻璃、有色金属、化工原料、机电产品等都是平衡有余。外汇储备有显著增加。80年代，我们外汇储备最低水平的时候是18亿美元，现在已经达到1000多亿美元了。所有这些因素都有利于物价控制，所以我认为物价上涨是从根本上得到了抑制。当然，物价一点反弹都没有也很难讲，但是只要我们的工作正确，我认为不会出太

大的问题。今年以来，物价涨幅一直是逐月下降的，从1月份的7.6%，降到10月份的4.7%，1到10月份累计是6.4%。现在看起来，今年的物价涨幅会低于6.4%。香港今年的通货膨胀率大概是6.6%，我们比香港低。我想，这对于香港的回归、保证香港的繁荣稳定、坚定港人的信心，是有很大好处的。

我在这里特别要讲一下外汇储备。前几天，我国外汇储备已经达到1010亿美元，但我们的外汇储备并不充裕。

第一，外汇储备增加，是出于国际收支平衡的需要。理论界有些同志只根据外贸进出口周转三至四个月的需要，认为外汇储备有五六百亿美元就够了，有的人甚至于说400亿美元就够了。他们没有算我们现在的外债余额已经超过了1100亿美元，过去每年用于还本付息是100亿到150亿美元，从现在开始，一年要用200亿到250亿美元来还债。另外，外资对中国的直接投资，现在大概有1700多亿美元，就按百分之几或者10%的回报率计算，如果它不把利润继续投在中国，而是要汇回去的话，也得要一百几十亿美元。所以对外汇需求的计算，要考虑到各种因素。

第二，比较充裕的外汇储备是对外开放的必要条件，或者是重要的条件。我们回忆一下，邓小平同志发表南方谈话以后，对外开放有了长足的进展。当然有投资环境改善等种种因素，但是我认为外汇储备的增加是一个重要因素。特别是我们今年实现了经常项目下的人民币可兑换，这对于宣传我们中国的投资环境是很有好处的。

第三，是稳定香港的需要。这里讲一个插曲，就是前些时候，香港报纸说中央统战部一位副部长跟香港访问团的代表说，我们已成立了一个3000亿港元的基金，如果香港股市发生问题的话，可以用来救市。这一下子遭到香港报纸的讥笑，因为它认为你没有常识，这个股市是托不起来的。但后来这位副部长给李瑞环同志写了报告，说他绝对没有讲这个话，是香港记者造出来的。造也不会造，造了个外行话，说我们建了个基金是为了去托股市，这是风马牛不相及了。因为香港的股市市值差不多有4万亿港元，3000亿港元算什么？你还想托市啊？另外，香港在70年代、80年代，股市都曾经暴跌，曾有过托市的意图，都没有任何的效果。所以，这个股市是不能够去托的。我们讲要救是救什么东西呢？是香港汇率的稳定，就是港元的地位。我们担

心的是什么呢？就是一到明年7月，也许是6月30号，一些别有用心的势力联合起来，一下子把港元全抛出来，要换成美元拿走。你这个时候要是没有美元储备的话，那港元就贬值了，就会猛跌，那香港的整个金融体系、经济体系就要崩溃了。关于这个问题，最近香港金融管理局总裁来过好几次了，跟我谈过这个问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也来跟我谈过这个问题，他表示友好，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可以动用350亿到400亿美元来支持港元的稳定。我对他讲了四点意见：

第一，香港没有发生金融危机的可能，或者说可能性极小，因为香港的金融监管制度是比较完善的。

第二，万一发生这种金融危机，香港特区政府完全有能力解决这个问题，不需要别人帮助，因为它有62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比英国的还多。

第三，中国内地有1000多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为了稳定香港，我们保持了很大的流动性。我们绝对不会随便干预香港的事情，但如果发生金融危机，特区政府向我们提出请求，我们为了稳定香港是会帮助它的。我做了准备，但是我认为，需要我帮忙的可能性也不大。

第四，如果香港要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请求帮助，它可以向我们提出来，我们可以转达，因为香港不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成员。但是我说，恐怕没有这个需要。同样的，今年上半年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的行长也跟我讲，美国可以拿外汇出来，帮助稳定香港。我说我们中国内地的外汇储备加上香港的外汇储备比你的还要多，恐怕不需要你帮助了，但是我还是感谢你的好意。现在外国人不是看我们的经济增长速度有多高，而是看物价有多高、外汇储备有多少，他到你这个市场上面赚了钱，你有没有支付能力，所以，外汇储备是起很大作用的。

我觉得在经济形势好的时候，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因为很多外界舆论特别是香港报纸都预言了，说我们的经济现在又要开始新一轮的回升啊。国内也有不少的人，要求放松银根、扩大投资，说经济已经到了谷底了，该回升了。外国人评论说，我们的经济发展大概每隔五年有个政治周期，现在正好这个政治周期要开始了，而且他们预言，谁也压不住这种热度的回升。所以我想，我们应该坚决地按照江泽民同志、李鹏同志在报告里讲的，无论如何要坚持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和

货币政策。我们刚刚用几年时间把前一段的一些过热现象调整过来，如果现在又来一次经济过热，谁也受不了。



1996年10月28日，朱镕基考察攀枝花钢铁(集团)公司。前排右一为攀枝花市委书记秦万祥，右二为攀钢(集团)公司总经理洪及鄙。

二、关于国有企业问题

我们很重视国有企业的经济效益从去年下半年以来下滑的趋势，但是今年下半年已经开始回升。

国有企业的经济效益下滑，有各种复杂的因素，既是多年来矛盾积累的综合反映，也和近年来一些利润转移因素有关。利润转移到哪里去了呢？第一是转移到农产品里去了。近两年两次提高粮食、棉花和一些农产品的价格，农民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了，工业可是付出了相当沉重的代价。纺织工业从去年到今年这么困难，从盈利变成全行业的亏损，与棉花涨价有很大的关系。我看这个代价是值得付出的，不然的话农民没有生产积极性。据张德江①同志讲，吉林省农民人均纯收入，去年是1600元，今年预计2100元，差不多增加三分之一，农民得到了实惠。第二是转移到能源、交通等基础产品和基础设施方面去

了。大家回忆一下，这两年半到三年，电价、煤价、交通运输费用涨了多少？不然，哪有钱修铁路？这几年，铁路建设确实是很有成绩。这都是工业企业在那里负担，工业企业有相当大的一部分利润都转移到这方面去了。第三，社会保障体系这几年的进展是相当快的，也相应提高了企业的成本。听吴邦国同志说，上海的国有企业社会保险负担原来是40%，现在超过50%了。没有社会保险，企业兼并、破产、结构调整，都没法做，所以，现在虽然没有社会保险法，但国务院对于社会保险工作还是抓得很紧，出台了好几个法规，而且在逐步完善。第四，企业实施了新的会计制度以后，把折旧率几乎提高了一倍。折旧率不提高，企业搞基本建设、技术改造都没有资本金，无法实现自我改造。提高折旧率也提高了成本，减少了利润，但企业自我改造的能力增加了。第五，乱收费、乱摊派，也增加了国有企业的负担。第六，盈利企业的收入用于分配的比例太高，吃掉了相当大一部分的利润。以上这些利润转移因素，有些是改革和结构调整的结果，付出一定的代价是必要的；有些是消极因素，是应当纠正的。

---

① 张德江，当时任中共吉林省委书记。

这里，我想着重讲讲导致国有企业困难的三个根本性原因。江泽民同志、李鹏同志都讲了，我主要用一些实例来作说明。

第一，重复建设导致生产能力过剩。国有企业的困难不断发生，就是因为不断地有新的项目在那儿投产。目前我国电视机、电冰箱、汽车的生产能力，闲置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江泽民同志讲了汽车的例子，全国130多家汽车厂，也就是生产100来万辆汽车。还有汽车装配厂700多个、零部件厂3000多个。我看如果没有这么多汽车厂，而是像原来载重汽车只有“一汽”、“二汽”两家生产，小汽车也只有两家生产，那效益要比现在好几十倍。我们彩电的生产能力是年产3000万台，但是这几年每年的销售量也就是一千几百万台，最多不超过2000万台。彩电生产企业本来就吃不饱，但还在继续扩大生产能力，这样搞下去，到明年、后年，可能许多彩电生产企业都要关门。最近，听说江苏搞洗衣机的工厂现在都搞电冰箱，搞电冰箱的都要搞洗衣机，生产能力全扩大了。重复建设太可怕了，特别是我们现在资讯不发达，市场的信息也不清楚，总以为可以把别人搞倒，自己可以上去，不行

啊，强中更有强中手啊！作为你们的老朋友，我搞了46年经济工作，90%以上的时间在国家计委和国家经委，根据我的经验，我给我的朋友们、同志们一个忠告：从现在开始，至少一年，不要再上任何新的项目，行不行？我讲的是不上工业项目，不是基础设施。基础设施、农田水利是必须搞的，但是，第一，要量力而行，没有那么多钱，你搞那么多项目，怎么还债啊？第二，不要过分超前，修那么多高速公路、港口、机场，根本没有多大的流量，你把钱投到那儿是白花了，很不值得。技术改造不是说都不能搞，通过小改小革、科研开发提高产品质量，更新生产设备，这些都需要搞，就是不要再扩大生产能力，花冤枉钱了。根据国家计委统计，每年投产的项目里，有三分之一的项目一投产就亏损，或者停工。胡富国①同志大概知道，潞安矿务局的常村煤矿，用世界银行贷款，花了几十亿元，去年剪彩投产了，投产后现在就停在那里。谁来还这个钱啊？不要说还本，利息都没人还，所以不能搞这种重复建设。

① 胡富国，当时任中共山西省委书记。

第二，进口商品和外资企业的冲击。这并不是说改革开放不要搞了或者说搞错了，绝对没有这个意思。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今天，就没有我们这些年翻天覆地的变化。我讲的是不必要的进口冲击了国内市场。在外资企业的导向不清楚的时候，也搞垮了国有企业。这是我们应该注意防止的问题。我体会最深的就是钢材。1992年的时候，建筑用钢材只卖到800多元一吨，大规模基本建设一起来，钢材价格一下子涨到了1800、2000、2300元一吨，国内的钢铁企业发大财了，鞍钢那个时候光预付款就收了70多亿元，可就是没有货。但是好景不长，价格一下子涨这么高，所有的外国钢材都涌进来，钢材价格掉下来了，钢铁企业都亏损得一塌糊涂。1994年的时候，聚酯2.4万元一吨，国外的价格低，大量进口，去年降到1.2万元一吨，今年6000元一吨，现在可能回升了一点到8000元，从一吨2.4万元掉到8000元，价格掉了三分之二，所以现在建的化纤厂，建一个亏一个。广东、广西制糖工业本来是搞得很好的，特别是广西，这几年把制糖工业、甘蔗种植搞起来，农民也得到好处。去年偏偏要大搞加工贸易，大量地进口外国的原糖来加工白糖，加起来差不多进口了200万吨，一下子把我们制糖工

业打垮了，农民的甘蔗也卖不出去。针对这种情况，中央最近准备采取措施，由国家计委和国家经贸委牵头，经贸部等单位参加，成立国家进口商品协调小组，加强对进口商品的统一管理。如果进口商品冲击国内的市场，我们要通过税收手段和国际上通行的做法，保护国内的市场。

第三，企业管理滑坡。大家都知道，现在企业的管理确实是滑坡得相当厉害。这次我到四川去，看了航天基地，深有感触。我觉得运载火箭发射失败了这么多次，不能够怪哪一个人，因为这个产品是千万个零件集合在一起的，任何一个小片、一个小零件发生问题，都要失败。它是全国企业技术水平、管理水平和精神文明的一个综合反映。管理方面一个最大的问题是人多，这也是造成国有企业困难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我1991年到国务院来工作，管工交。当时我就深刻地体会到，人太多是造成亏损的重要原因。我记得那时统配煤矿是360万人，顶多有120万人就足够啦，多了240万人，人工成本占吨煤成本的三分之一。当时制订了一个计划就是减人增效，无论如何要把这些人分流到服务行业里面去，不然的话，煤矿是没办法扭亏的。制订了一个三年扭亏计划，一年给20亿元的补贴，后来加到30亿元，现在一共用了100亿元，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亏损逐步减少。不减人，亏损就减不下来。铁路系统现在也是亏损得一塌糊涂，去年亏损100亿元，也是因为300多万人有100多万人就够了，后来采取了措施，亏损减少了。粮食系统更不得了，现在有400多万人。前几天，我请了国家粮食局的一些老同志来座谈当前的粮食问题。大家都感到过去300万人，现在400多万人，减一半都没有问题，人这么多哪能不亏损呢？所以现在讲管理，首先要讲怎么减人。我认为，面多了加水、水多了加面是不解决问题的。一出现亏损不是从减人、分流、增效方面去考虑，而是搞项目，一搞项目就重复，本来那个厂子都亏得一塌糊涂，还搞新项目，亏得更多，这不是一个办法。因此，一定要抓好企业的管理，提高企业的管理水平。同时，国务院非常重视企业兼并、破产的工作，明年要加大企业破产的力度，用于破产的呆坏账准备金也要适当增加。国务院明确规定，破产只是在58个试点城市实行，但现在发现，全国成风了，不管试点不试点，到处都给你“破”，把银行债务给破掉了，职工并没有安置，叫做“大船搁浅，舢板逃生”。最近，召开了几次会议，下一步对企业破产要加以控制。不然，企业破产了但机制没有

转变，还在那里生产，还在那里亏损，还在那里向银行贷款，一“破”几百亿元啊，那国家受得了吗？所以，我建议王忠禹①同志今年年底或明年1月份先开一个兼并破产工作会议，让大家把国务院的文件好好学习一下。现在很多搞企业破产的人，还没有搞清楚《企业破产法(试行)》、国务院关于破产试点的文件精神，就到处冲销银行的资产，这受不了的啊！要先把这个文件学习一下再起步。兼并政策比较明确，只要你承认债务就可以兼并。据说天津搞得比较好，叫做“先贷款后兼并，先合作后兼并，先搬迁后兼并”，有几套办法。兼并是很值得推广的一种形式。煤炭系统对富余职工给贷款，发展服务业，也是个好办法。

---

① 王忠禹，当时任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主任。

三、关于粮食问题

对于粮食形势，我们认为不能估计太高。现在各个地方报的数字很高，高当然好。不怕没有地方装粮食，也不怕没有钱收粮食，但是如果你估计得过高，落空了以后会给很多方面造成损失。从历史的经验看，估产一般是“两丰两歉一平”。去年增产400亿斤，今年又说要增加400亿斤，明年再丰收很难啊。今年虽然有水灾，但今年恰恰没有旱灾，雨水调和，所以今年收成是比较好的。还应该看到，今年粮食的增产是以牺牲棉花和油料为代价的。今年棉花的播种面积比去年减少990万亩，油料面积减少825万亩，这两种作物都是减产的。明年要再有这么好的粮食收成，是不大可能的，所以要做这个准备。

一是要做好今年粮食收购工作。在这一次会议上，很多省区市的领导同志对粮食收购资金不能到位表示担忧。照道理讲，收购资金是绝对不会出现问题的，关键是应该收回的资金你要收回来。收购资金，我已经跟农业发展银行和农业银行的行长讲了，我说你们这两个月少睡点觉，无论如何不要出现收购资金脱节的情况，不要“打白条”。但另一方面也请各地负责同志监督粮食系统，把卖粮食的钱交回到银行来。现在严重的问题是粮食系统亏损，本来前两年实行“两条线”运行，粮食的亏损情况有所改善，从1992年3月份累计的政策性和商业性亏损550亿元，现在已经下降到300多亿元了，消化了100多亿元，但是今年

粮食系统亏损猛增，比去年新增了200亿元的亏损。这就是因为国有粮食系统费用打得太高了，粮食卖不出去，因此亏损很厉害。最近，国务院发了一个文件来解决这个问题。

二是要稳定粮价。前一个阶段，市场粮价在下跌，有一些地方有一些品种，市场价还低于定购粮价，挫伤了农民种粮积极性。现在秋粮已经开始收购，情况已经好转。各地国有粮食部门要改进粮食收购工作，加快收购进度。把农民愿意出售的粮食都收购上来，价格就稳住了。国家手里多掌握一些粮食也比较主动，这是利国利民的事。

四、关于财政金融问题

今年财政收入情况很不错，比去年预算差不多要增加1000亿元。增加的收入一大半都在地方，但是地方的支出也相应地增加了。中央财政收入也增加了，但是入不敷出，想了很多办法才避免了扩大赤字。但现在还有一个问题，欠税很严重。年初的时候只欠了一百几十亿元税，到现在欠380多亿元。税务局一定要把税收上来，我们不能依靠发票子来补税，也不能在12月份的时候通过银行大量放贷来交税，这绝对不行。所以，希望我们共同努力把税收上来，这对大家都有利。特别是个别省截留国税，这个不合适，现在很明显都是欠缴国税，其实，按照新的财税制度国税里面有一部分是返还给地方的，所以这个也不要分得太清楚了。还是要共同努力，一视同仁地把税收上来，更不要截留国税。

现在的问题在于明年日子很难过。今年的财政硬赤字是614亿元，加上国债到期还本付息1300多亿元，这样今年发了2000多亿元的国库券。明年呢？现在各个单位都说收入要减少，而支出猛增。一再压缩，明年的赤字还得900亿元，比今年增加300亿元，那又得多发300亿元国库券。恰巧明年国库券到期的又多，还本又要多五六百亿元，因此明年如果要按照这个需要，国库券要发到2600亿元以上，这么多国库券能不能发得出去是个问题。所以，还是希望大家量入为出，把赤字缩小。

金融领域的突出问题是银行经营日益困难，风险加大。主要表现在：

第一，不良贷款不断增加。去年国有企业欠银行的利息是2400亿元，其中差不多1000亿元是去年新增的欠息，有1400亿元是过去的老账没有还。今年1到9月份，比去年又增加了1100亿元，这是 一个很大的风险。所以，上项目借钱一定要考虑到能不能还钱，不然会造成很大的困难。

第二，乱设金融机构，违规经营。现在这个风险很大，不经过中央银行批准，就设立各种集资或者进行存贷业务的金融机构，存进来的钱给高利息，贷出去的款都压死了收不回来，最后老百姓挤兑，今年这样的事已经发生多次了。所以，一定要按照规定执行，没有经过中央银行批准，任何地方不能够设立金融机构。

最后讲一下股票的问题。我主要讲政府应该采取的立场。今年股票价格暴涨是不正常的，深圳的股市从年初的950多点，最高涨到了4000多点，后来回落一点，现在还是4000多点。上海的股市原来500多点，现在突破了1000点，成倍地增加。深圳一天的股票成交额190亿元，上海是108亿元。香港是多少呢？香港是全世界有名的几个大股市之一啊，它一天的成交额才102亿港元。我们深圳、上海的成交额都超过香港了，能想象吗？香港股市的市值现在是4万亿港元，比内地股市市值高十几倍，但是内地股市的每日成交额比香港股市还多，这说明大多数股票每天都在那儿倒手，这个投机性太大。

对股市要采取非常认真的、慎重的对策方针。经过多次研究，提几条要求：

第一，政府不干预股市。政府不要干预股市，也不要出台影响股市的各种政策，包括税务、贷款等等方面的优惠政策。要按照证监会发布的通知、规定来办事。

第二，“各人的孩子各人抱”。就是这些国有大公司该谁管的，谁把它们管起来，不能再去推波助澜了。

第三，切断银行跟股市的联系。许多国家的立法对此都是非常严格的，不能拿银行贷款去炒股票。所以，前些时候我们抓住两个典型，一个是工商银行合肥市分行，一个是中信实业银行济南分行，拿一两百亿元去炒股票啦。把这两个行长免职、记大过。就这个事我们专门写了一篇《人民日报》社论，题目是《坚决惩处违规行为，自觉维护

金融秩序》。我在那篇社论里面加了一句话，从现在开始，如果还有人利用银行贷款资金炒股票，一律撤职，为以身试法者戒。对《人民日报》的这篇社论，香港的报纸都很重视。此外，我们要加强宣传，使股市规范化，股民要有风险意识。

关于宏观经济和财税工作的几个问题

(1996年12月20日)

1996年12月18日至20日，全国财政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出席会议的有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财政厅(局)长，财政部驻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财政监察专员办事处专员，财政部各司局负责同志，中央有关部门财务部门负责同志，国有资产管理局负责同志。这是朱镕基同志在会上讲话的主要部分。

刘仲藜①同志、项怀诚①同志的报告事先我都看过，我都同意。本来，我是不用来参加这次会议的。国务院过去规定，部门召开工作会议，副总理也不一定出席，但是你们请我来，我就来了。为什么呢？想和同志们见个面，表达这么几个意思：

---

① 刘仲藜，当时任财政部部长兼国家税务总局局长。项怀诚，当时任国家税务总局副局长。

第一，今年的财政税务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当前经济的大好形势，是与我们财税战线全体同志的辛勤劳动、扎扎实实的工作分不开的。你们克服了很多困难，受到了很多责难，对大好形势的发展是有重要贡献的。如果没有你们把税收上来，把财理好，就不可能取得当前这样好的经济形势。所以说，我今天来就是向同志们道一声谢，向我们财税战线上的全体同志表示亲切的慰问和衷心的感谢！

我主管了几年的财政工作，给了同志们很多批评。有些批评，我想还是正确的，但是说话可能有点过头。在此也请同志们原谅，不要影响你们的工作情绪。

第二，讲一下明年的财税工作。这次会议上已经定了财政收支指标，同志们的风格也很高，都接受了这个指标。我希望大家努力工作，力争超过这个指标。因为明年有两件大事，一个是香港的回归，另一个是党的十五大的召开。我们做经济工作的，要保证这两大任务

的完成，绝对不能出任何问题。要把自己的工作做好，有什么困难要克服，财政赤字无论如何要逐步地缩小，可办可不办的事情要忍耐一下，不要办。基本建设的摊子不要铺得太大，物价不能够反弹。这也是我们的责任。财政收入指标要力争超过，财政支出指标能够压下来更好，起码不要超过太多。我昨天看了刘仲藜同志和项怀诚同志的讲话，由于他们的屁股坐的位置不同，说法有点差别。我刚才就问他们两位，我照谁的口径讲？他们说口径是一致的，但我还是能看出有一点差别。项怀诚同志讲明年工商税收增加12%，经过努力是可能实现的。同志们请注意，他说的是“可能”，不是“可以”。刘仲藜同志说明年经济增长8%，是国内生产总值按不变价格计算的。如果换成现价的话，物价假定增长6%，那么经济增长就应该是14%，“两税”(增值税、消费税)的增长至少应该跟经济的增长相适应嘛。所以，至少要超过两个百分点。同志们也能听出来，这显然有区别，对不对？我原来说，谁官大我就照谁的讲，现在我看还是照顾一下项怀诚同志的情绪，一个人讲一半。上一半就是税收增加12%的指标还是切合实际的，留有余地嘛。下面那半句话就照刘仲藜同志的讲，你们无论如何要超过指标两个百分点。我看有可能多超，今年1至11月份，全国财政收入增长18%。刘仲藜同志说到12月份可能要降下来，我说也没有理由要降嘛。明年税收增长14%，我认为是没有什么问题的。要发展当前的大好形势，我们对财税部门寄予莫大的希望。

第三，财税战线怎么深化改革，怎么完善宏观调控，怎么进一步地把我们的工作做好？在讲财税工作之前，我想借此机会，先讲讲有关宏观经济的几个问题。

一、关于当前经济形势

在最近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取得了一个共识。大家都反映会议充分肯定了成绩，问题讲透了，措施也讲得十分具体，因此，认识空前统一，心情比较舒畅。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开得很好，那就是因为形势好嘛。我看，这个形势比前几年要好得多。我们回忆一下，从1978年邓小平同志提出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到1984年以前，经济发展是健康的，发展速度也很快。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一个转折点，这里面一个重要的经验是重视加强农业，四次提高粮食收购价格，日子比较好过了；又吸取了过去的经验教训，基本建设方面

有所控制。但是，1984年农业大丰收以后，日子刚一好过，就开始折腾，来了个经济过热。到1985年的时候，我记得当时国家外汇储备只有18亿美元，也不知道那时日子是怎么过的。后来又经过几年调整，好了一点，但是元气还是没有恢复过来。1988年价格闯关，出现了全国性的抢购风潮。我那时在上海当市长，南京路上人山人海，什么都抢购。实际上，那时商品还没有匮乏到那个程度，主要是因为老百姓的心理承受能力不够。提出价格要闯关，可能是正确的，但是突然一下子提出来，人们承受不了。经过1988年这一抢购风波，社会就不稳定了。从1989年以后，为了稳定社会，开足马力生产，实际上许多产品没有市场、销不掉。从1989年到1991年，仓库里的库存增加几千亿元，成了沉重的负担。那两年虽然物价只涨了一点，但经济发展速度很低，效益也很差。

1992年，邓小平同志发表南方重要谈话起了很大的作用，解放了思想，把全国人民的积极性都调动起来了。应该说，这是一个转折点，从此，中国的国民经济就进入了一个高速发展的新阶段。这种发展的势头到现在还仍然保持着，这很不容易。从1992年以来，全国的面貌是完全改观了，我们有深刻的体会。我每年都到全国各地跑一跑，看到的不只是城市，包括县城甚至有些贫困地区的县城和有些农村建设得也是相当漂亮。它们体现出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确实是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但是，我们在执行邓小平同志指示的时候，不那么全面，有点过头，以致出现了房地产热，1992年、1993年搞得很凶。现在压了几千亿元的资金在房地产上，房子卖不出去，而且越压越多，为什么呢？它已经开了工，50层的大楼现在只建到5层，不把它建成又怎么办呢？不断地加重这个包袱，建成了又卖不掉，就这么个情况。很多搞房地产的公司后台都是地方政府，你们也清楚，现在问题都推到中央身上来了。最近几年，中央不都在处理这些问题吗？我看，五年也解决不了这些问题。房地产热、开发区热，把农田都推掉，莫名其妙嘛！股票热就更不用说了，不经中央批准就擅自开设股票市场，乱七八糟。到1993年的时候，日子就过不下去了，1993年年初，大量地发票子，人民银行钞票都印不过来。1991年，钞票发了590亿元；1992年就翻了一番，发了1200亿元。在我们国家，钞票是个晴雨表，因为我们其他

的支付手段还不发达，主要靠票子。1993年发了1530亿元。到了1994年，尽管我们在1993年进行了宏观调控，但由于滞后效应，还是发了1400多亿元。一直到1995年，宏观调控是真正地见效了，发了596亿元，所以才出现当前这样的好形势。今年，我们原本货币发行量要控制在800亿元，但现在看样子是要发到1000亿元了。我们在内部向人民银行总行下了死命令，绝不允许超过1000亿元。戴相龙①同志还是非常认真的，我跟他开玩笑说，你不给我控制在1000亿元以内，恐怕你得下台，我也危险了。为什么今年的票子多发了一点？关键是粮食的问题。粮食大丰收本来是件好事，为粮食丰收发票子是没有问题的，可以收得回来。我们不怕粮食多，为什么这会成为一个问题呢？是因为收了粮食，银行发出去那么多票子，粮食系统卖掉粮食收到的钱，三分之一没有回到银行里来，干了什么了？有的是补了企业亏损，有的是给职工发了奖金，400万人的粮食系统在吃这个钱。甚至还有的拿去炒房地产、炒股票。这里面也有我们银行自己的问题，挪用资金，搞基本建设、搞项目，主要是在地方政府指挥下搞的。我不是把责任都推给他们，还是各种因素促成的。我说今年的票子比去年多发一点，也是有它特殊的原因。我们今年还是控制得相当好的，特别是今年根据形势的发展，一度放松了银根，宏观调控的力度也放松了一点，上半年流动资金贷款超过信贷规模，发放了1000亿元，可惜效果不太好。1000亿元当中差不多有好几百亿元生产的产品没有销路，都进了仓库，没有产生应有效果。公平地讲一句，我对人民银行的批评要比对财政系统的批评多得多，因为我直接当过一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但是我也公平地讲，银行是尽了最大的努力了，因为今年的粮食收购资金要1300亿元，往年都是中央和地方各拿一半。但实际上，中央拿了700亿元以后，还是不够，地方还在喊要“打白条”。中央又拿了296亿元，共近1000亿元，地方还说不够。那好，地方一个钱都别拿了，中央也只好认了。你说怎么办呢？地方说他收不回票子，那中央就给他开一个口子，只要签字画押，都给地方垫，银行都给垫上。今年把粮食收购完了以后，就要请财政系统通过税收返还帮中央把这些钱扣回来。所以今年多发一点票子还是有一定原因的。

---

① 戴相龙，当时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

跟前几年比，现在经济形势确实是好得多了。经济形势好的特征就表现在发展速度没怎么降下来，始终保持了邓小平同志发表南方重要谈话以后的势头，今年还是10%嘛；而且通货膨胀没有上去，相反，下降的速度大大超过我们的预料。零售物价涨幅在1993年为13.4%；1993年经济过热的滞后效应，使得物价涨幅在1994年上升到21.7%；1995年，我们原定这个指标为15%，勉勉强强地降到了14.8%。今年，国家计委原来定为12%，我说非要压到10%不行，香港回归前夕必须压到10%，但我一点也没想到会压到了6%。1月至11月是6.2%，11月是4.6%，我看12月还会下来一点。从10%的目标一直压到6%，我认为这是很大的成绩。

通货膨胀怎么控制的啊？不是靠行政手段，而是靠一些治本的改革措施：

第一，基本建设规模确确实实是压下来了。固定资产投资在1993年增长61.8%，1994年增长30.4%，1995年增长17.5%，今年扣除物价因素，实际只增长12%，但基建总规模还是很大。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史经验证明，经济发展上折腾，都是从基本建设规模失控开始的。基本建设规模一失控，它的后果一定是忽视农业，直接地发票子，最后就是通货膨胀。这几十年，我们栽的几个跟头就是这么栽的。这次中央的宏观调控政策为什么能成功呢？就是中央从根本上抓住基建规模失控这个根子，抑制了一下，把基本建设规模压下来，把票子控制住了；同时，流动资金没有受影响，保证了生产需要，物价也就涨不上去。

第二，根本保证是农业。粮食不够，物价再压也压不下去。这几年，中央在农业政策方面下了很大工夫。我们最紧张的时候是1993年年底，那个时候粮价飞涨。当时我正在安徽，粮食一天一个价。因为前一个阶段粮食丰收，粮价很低，早籼稻每斤1毛8分钱都卖不出去，农民都不愿种粮食了。再加上水灾，把国家专储粮吃掉了一半。中央采取了一些措施：一个是两次提高粮食和棉花的收购价，另一个是进行粮食购销体制的改革。今年本来是遭了水灾，可“水灾一条线，旱灾一大片”，怕的还是旱灾。结果，今年不但把水灾的损失补上了，粮食还大量地增产，预计增产270亿斤。去年是增产400亿斤。原来估计今年的粮食产量将达到9600亿斤，我们按增产270亿斤做了安排，日子很

好过了。专储粮要收900亿斤，还得往专储粮库里加，供过于求了。国家统计局统计的粮食产量是10090亿斤，比预计增加了700亿斤粮食。现在不是发愁粮食少了，而是发愁多了；不是发愁粮价涨，而是发愁粮价跌，粮食多了，粮价就要跌。我是不大相信粮食产量这个数字，但国家统计局的同志讲，他们是用世界上最先进的方法测算的。我说我承认，不能抹杀统计部门的成绩，我完全肯定他们的工作，但这个事情是难以查考的。现在的方针是按增产粮食270亿斤即总量9600亿斤来做工作，按10090亿斤做准备。国家统计局的这个数字对我们作决策很有作用。如果有那么多粮食怎么办呢？很容易，一是要发票子，把增产的这些粮食收购回来；二是要找仓库，把它们装起来。现在停产的厂房多得不得了，还是钢筋混凝土的，只要稍微增加点通风设备，这样的仓库比现在的棚子高级多了，粮食储备局找到这些仓库非常高兴。储备粮食没有问题，你大量增产，我大量储备。现在形势好就好在农业，我们有绝对的把握，保证市场的稳定；可是反映到财政上出现了这么多问题，这个包袱我们还得背，费用负担只好加在中央身上。我们可以多收点税，把这个窟窿给补上。但还要注意棉花的问题，去年收了5700多万担，现在只收了4000来万担，这是个很大的问题，但我也不是很害怕，新疆的棉花长得特别好。现在中国的棉花供应，主要靠新疆。冀、鲁、豫的虫害很难解决，种棉花反倒不如种粮食合算，加上现在纺织工业不景气，棉花调销不畅，农民不种棉花是可以理解的，作一些结构调整也是可以的。农业取得这么大的成绩是各个部门努力的结果。今年秋收以后，农村市场将会大大兴旺，希望工业部门的同志看好这种形势，及时做好准备，别把那些假冒伪劣的滞销产品卖给农民，要增加一些适销对路、适合农村需要的产品来满足他们，不要坑农民。我估计纺织工业明年有一个振兴的机会，不要放过这个机会，棉花可能不够，有可能要进口，要提前做点准备。当前农业形势这么好，副食品工业会有很大发展。现在饲料厂也“精明”了，粮食越是丰收，越是不储备，看价格掉到最低的时候才进货。这样也不行，饲料厂还得储备一些。将来，肉、禽、蛋都会大量地发展，形势会是很好的。

第三，为什么说物价不会反弹，形势不会逆转？现在全国95%以上的产品都是供过于求，除了少数高档消费品我们搞不出来，其他的都供过于求，生产资料包括钢材、水泥、玻璃、木材等，也都供过于

求，物价怎么会上去呢？另外，我们的外汇储备很充足，如果个别商品出现短缺，马上就可以进口，把价格压下来。现在，农副产品包括粮、油、糖，各种物资的储备都超过历史最高水平。当然，粮食丰收了也还要防备灾害。连续三年粮食增产的情况过去没有发生过，我们对明年的粮食生产要做好准备，不能忽视农业，不要看到形势这么好，就把农业给丢掉了。只要有思想准备，即使来一个重大自然灾害，我们也不怕，是可以顶得住的。灾年也不会有什么了不起的灾，我们没有什么匮乏的商品，因此物价不会飞涨，涨价只是一时的。前一段时间，柴油的销售价是每吨2400元左右，现在涨到每吨3000元到4000元。新华社的内参如雪片般飞来，其实不是我们没有估计到这个问题，早就估计到了，为什么措施来得晚呢？就是因为我们在观察国际油价的变化。当初由于不允许伊拉克石油出口，需求增大，欧佩克要控制它的产量，把石油价格抬得很高。因此，原油价格从过去一桶17美元到18美元，涨到现在每桶25美元。我们的炼油厂很困难，由于国产石油不够，需要大量进口，而柴油的价格我们定得过低，比汽油低得多，因此炼油厂不愿生产柴油。再加上我们进口柴油的价格也很高，每吨3000元人民币，地方也都不进口，因此造成柴油紧张的局面。那我们为什么又慢了一拍呢？因为我们看到伊拉克的石油出口不是解禁了吗？石油换食品，允许伊拉克出口一部分，总价值五六十亿美元。我们想待油价降下来，然后再进口，结果油价只降了一两美元，看样子也降不下去了。到了冬天，美国的采暖用油大量增加，需求很旺盛，石油价格下不来。我们就决定立即进口，快得很，定购几百万吨柴油，五天到货，十天内国内油价就会降下来。我不是吹这个牛皮，而是盛华仁①同志跟我下保证书，十天就能把油价降下来。但进口油每吨3000元钱是贵的，国内还是按原来每吨2400元钱卖，这中间的差价怎么办？中国石油化工总公司自己内部消化，提高效益，从这里能够看到国有企业的好处。国有企业还是要掌握能源、交通、战略性的原材料这些关系国计民生的经济命脉，这样才能保证我们国家的生命。总之，好的形势是巩固的，是可以持续的，物价不可能有很大的反弹。为了把价格理顺，我们还要进行一些价格调整，还要主动涨一点价。但是，我现在可以预言：明年的物价涨幅在6%以下。为了香港的平稳过渡，希望想主动涨价的同志们也忍耐一下，后年再涨嘛。也没什么了不起的，无非财政多负担一点，都负担几十年了，何

必急于在这一年都把包袱卸了？大家都要提到政治的高度来看这个问题。

① 盛华仁，当时任中国石油化工总公司总经理。



1996年5月4日，朱镕基在江西省江铃汽车集团考察发动机总装生产线。前排左一为江西省委书记吴官正，右一为江西省省长舒圣佑。

二、关于国有企业问题

很多人提出，国有企业这么困难，工资发不出去，你说形势好，好在哪里？微观形势不好，宏观形势怎么好？对待这个问题，我们要有正确的、实事求是的认识。我们还不能得出微观形势不好的结论，那不合逻辑。微观形势不好，宏观形势怎么能好呢？刚才讲农业好，各行各业都繁荣，整个工业也很好嘛。就是其中的国有企业这部分，它的效益下降，这不是整个国民经济不好，也不是整个工业不好。国有企业占多大的比重？1990年和1991年，国有企业在工业中所占比重是55％到56％，三分天下差不多有其二了。那个时候的乡镇企业占

36%，二者加起来占90%多了，私营企业加“三资”企业不到10%，当然是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了。现在的情况怎样呢？去年全部工业里面国有企业的比重只占34%，三分天下只有其一了；今年恐怕更低了，下降得很厉害。乡镇企业呢？还是占36%，比重没变。二者加起来占70%，还是以公有制为主体，没有改变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性质，没有危险。别看国有企业只占34%，这34%是掌握了国家经济命脉的。乡镇企业占36%，其他30%就是个体、私营企业加“三资”企业。所以，现在国有企业的税负比重也减小了。不是说国有企业的效益稍微差一点，我们整个经济就不得了，但是它的作用还是很重要的，没有这一块就不得了。

对国有企业效益的下降也要分析一下。刘仲藜同志给我的材料显示，国有企业在今年1到11月份，盈利企业的盈利减少49%，亏损企业的亏损增加47%，这个问题就严重了。但是，我怀疑这些数字是通过什么口径统计的。现在有好多统计口径。一个叫预算内国有工业，这个是大家都用的统计口径。但是也有年报和月报、快报的区别，快报的统计口径只有6.9万个企业，年报的统计口径是8万多个企业。今年1到11月份的数字是快报的统计，而引用的那个对比的去年数字是年报的统计，换算一下，恐怕盈利没有下降那么多。但即使是盈利下降那么多，这里面也要分析一下。



1996年10月30日，朱镕基在四川省绵阳长虹电器公司考察。前排左二为四川省省长宋宝瑞，右一为绵阳市委书记冯崇泰。

我们不能否认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但还是有些客观因素。这里计算的利润是纯利润，企业的税收还是都交给国家了。国有企业的利润现在有好多是通过别的渠道分流走了。棉花涨价、农产品涨价，使农业原料成本大大提高，国有企业的利润就分到农业去了。能源、交通、电力的价格现在涨得很猛，国有企业的部分利润被分走了，你得承认啊！这也是一种结构调整。过去折旧率很低，现在差不多提高了一倍，也减少了利润，但增强了国有企业自我改造的能力。项目的还本付息现在打到成本里去了，也减少了利润。这些都是减利的因素，是

客观原因，不要完全责备我们的国有企业，也不要对国有企业的改革那么悲观。

还有一条就是摊派之厉害。说老实话，城市建设搞得那么漂亮，不是国有企业出资，各地政府有那么多钱干吗？我今年到四川绵阳长虹电器公司考察，长虹电视机市场份额占全国第一位，经济效益相当好。绵阳市容漂亮得很，有条最漂亮的街，我给它起了个名字叫“长安街”，就是长虹厂出钱修的。它还在市中心建造了电视机城、空调城，都很漂亮，这些都是国有企业作的贡献。现在有人骂银行的办公楼盖得太高了，其实银行办公楼盖得那么高，还不是地方政府让它盖的？地价给得也便宜，指定地方，还要指定楼层层数，银行不盖怎么办？我不是为银行辩护，我已下了命令，停止一切建设项目，没开工的都不许上了。税务局的办公大楼盖得也相当厉害。今年夏天，我到厦门去，看到那个税务局的大楼规模不得了。同志们，你们盖楼的时间稍微晚一点，过一年行不行？别盖那么高，也别盖那么好，最后挨骂的是我一个人。不要紧的，为你们房子住好一点，我挨点骂也可以。但是，你们还是要稍微约束自己一些，因为现在国家还不富裕，我们还在控制基本建设规模嘛。必要的你们还得盖，成立了国税、地税两个税务局嘛，不盖也不行，但还是要尽量节约一点。

所以，对国有企业当前困难的原因要作具体分析：

第一，国有企业真正搞到今天这种地步的最大原因是重复建设。公平地讲，国有企业的问题是经营机制没有转变，最大的问题是投资机制没有转变。重复建设，盲目建设，“大而全”、“小而全”，这是个根本的原因。我现在越来越发现这个论断是正确的：现在搞重复建设，比过去计划经济体制下更厉害。过去建设项目超概算、没有经过批准就开工，领导要被开除党籍、降级的。现在搞市场经济了，少数人认为主管部门管不着。什么审批？化整为零就是看得起你了。你限额5000万元，他报成两个项目，就不要你批了。大部分的建设项目根本不报批，早就开始干了。现在不是企业研究市场后再投资，许多是地方政府在那里指挥，都想把政绩搞上去，把发展速度搞快些，因此大量上新开工项目。国家计委给我一个估计数字，现在国家控制的、都经过批准的重点项目，三分之一是一投产就得关门。有关这种例子，我可以不看笔记本就说出好几十个。四川南充纺织厂搞锦纶生产，搞了八

年，一投产，价格太高了，根本就没有市场，只得宣告破产。我曾经开玩笑说，即使全世界的彩电都停产，中国也可以保证全世界的供应。胡锦涛同志告诉我，他最近到江苏去了一趟，看到现在搞电冰箱的厂搞洗衣机，搞洗衣机的厂搞电冰箱，搞彩电的厂去搞空调。上次我到四川长虹去，对公司董事长倪润峰说，你这个几百万台的空调一投产不得了，虽然你的做法很新颖，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无可非议，优胜劣汰，自由竞争，规模越大，效益就越好，但我们现在企业还不能裁人。这在美国很简单，厂子一关门，几万人解散就完了，政府养他们，保证最低生活水平。我们这里不行呀，你这800万台彩电、几百万台空调一出来，多少万人就要失业，企业亏损就要到银行挂账。王忠禹①同志告诉我，6万户国有企业中，有1200多户从50年代后期起到现在就没有盈利过，你说财政哪能补贴得起？财政补贴不起，就只能在银行里把账烂掉。优胜劣不汰，这个问题是非常严重的。我还对倪润峰说，最后你也不见得能优胜。你以为800万台彩电都能销掉了？也不见得，因为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的保护措施。最终的结果往往是优不胜、劣不汰。在国有企业的经营机制没有转变以前，困难就困难在这个地方。大家只顾盲目地上项目，也不研究全国市场，赔了钱，反正银行给“报销”。在这样一种体制下，任何国有企业都很难搞好。所以，在最近举行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江泽民总书记和李鹏总理在报告里都重点讲了严格控制新上项目的问题。他们讲的是政策，是原则。我今天想给同志们提个忠告，就是暂停一年，一个项目也不上。有些同志不赞成我的意见，说是走极端、一刀切。中国的事情不“一刀切”，说话等于没有说。你以为一上项目就能收到效果？我们在上面看得最清楚，因为每天几百万字的信息都汇到我们这里来，我们都知道谁的日子过不去了、谁在关门、谁在亏损，都知道你在搞什么。一些产品现在市场上根本就销不掉，他还采取办法来躲避审批，跟外国人合资，搞重复建设，这怎么得了！现在最先进的项目也就是个程控电话，上海有600万台的生产能力，也就只能生产400万台，多了根本卖不掉。搞重复建设，这是一个最大的问题。

---

① 王忠禹，当时任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主任。

第二，外国产品的进口和外资企业的冲击使得国有企业面临的竞争越来越激烈。我的意思不是说不要坚持改革开放的政策，不发展对外贸易。但是，你进口什么要考虑到保护自己，并且要熟悉国际惯例和“游戏规则”。外国人嘴巴说得很漂亮，但照样子保护自己，美国人就保护得厉害，我们要学会这个本事。事实证明，好多国内产品都是外国产品一进口就垮，这些问题好多都出在地方，不按政策办，什么挣钱就进口什么，走私不交税更不得了，进口的比国内的还便宜。1993年进行大规模基建的时候，大量需要钢材，价格涨了三倍以上，就是进口钢材进来把我们压垮了。外资企业享受各种优惠政策，一下子把我们国有企业打垮。引进外资应该符合产业政策，讲经济效益，也要照顾一下左邻右舍。引进一个外资企业，打垮一批国有企业，实在是不合算。国有企业也应该通过竞争使自己壮大。用行政干预的办法不一定能解决这些问题，我现在不是讲要加强行政干预，我是讲不要用行政干预的办法来打垮自己。本来市场可以按自己的规则去运行，你非要跟外国人合作来打垮自己，你这是用行政干预的办法来打垮自己。不怕真正搞国民待遇、平等竞争，就怕用行政干预使国有企业处于劣势的地位。

第三，管理滑坡，不重视管理。国有企业把眼光放在产权的改革上，这当然是对的，但不能完全放到这个上面，要全面贯彻中央的政策，你丢掉管理再怎么也改不好。运载火箭的发射是全国工业技术综合水平的反映，为什么过去技术不如现在、设施不如现在，还百发百中呢？为什么现在失败率这么高？你怎么解释？只要稍微有一个小片、一个小钉出一点问题，整个火箭发射就要失败。这个东西要一丝不苟，失败不能怪哪一家，因为运载火箭是在最后一关才能检查出许多问题，而完全检查出来很困难，但也不能完全怪中国航天工业总公司，好多产品是各地协作生产的零件，是全国的问题，一个运载火箭能看出全国的工业技术水平和精神文明建设。如果我们不把“两个文明”一起抓好，将来会每况愈下。所以，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把精神文明建设提到历史高度，要抓人的精神，也要抓管理。要做到万无一失，有这种思想准备才能保证我们的国有企业搞上去。

国有企业当前的问题大部分是有客观原因，要针对这些原因去解决问题。首先要制止重复建设，然后从各方面来保护我们的国有企业。

只要农业有基础，市场能扩大一点，国有企业就会有转机。但如果看到有市场了，又搞重复建设，效益就完全抵消了，不久的将来会更困难。即使不上新项目，把现有企业的潜力挖掘出来，加强技术改造，加强管理，完全能够满足现在市场需要。另外，我们有一个措施，就是刚才讲的优胜劣汰，还是要淘汰差的企业，实行兼并、破产。首要任务是鼓励强势的企业去兼并亏损、发不出工资的企业。好企业有市场、有优势，能把亏损企业改变过来，这是最好的，我们将要出台更优惠的政策来鼓励兼并。破产企业要把整个资产包括值钱的土地变卖所得，来安置职工，发最低生活费。这样的话，就能消掉一部分亏损企业。现在准备拿出300亿元做坏账准备金冲销国有企业欠银行的债务，但也要严防假破产、真逃债。要规定，绝不能允许破产企业的厂长易地做官，要形成一点压力。这有助于国有企业经营机制的转变，要兢兢业业地抓管理，不要乱上项目。采取这些措施，明年国有企业的状况会有所好转，但不会转变得很快。中国的国有企业要转变到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管理水平，不是一两年能办到的，但是我们希望明年就有一个相当大的转变，两三年内就有重大的突破。总之，国有企业是国家的经济命脉，大家还是要支持它。

三、关于股票市场

中国的股票市场在新中国成立前就有，那时上海的股票市场比香港地区的发达得多。新中国成立后，把它关闭了，成为禁区。社会主义国家能不能搞股票？邓小平同志说，可以试。1990年12月，在上海成立证券交易所，当时我在上海当市长，大家都认为这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一个重要标志。这实际上是一个最有效的直接融资方式，同时又成为企业效益的一个晴雨表，谁的效益好，谁的股票价格就高。特别是老百姓手里的钱越来越多，不满足于存在银行里，总是要寻找出路。不搞股票，照样会出现“地下钱庄”、买彩票、赌博，什么都有。买股票是一个正确的投资方式，有好处。现在外国的股市对社会稳定没有什么影响，通过基金的管理方式，把社会上的游资都吸引过来。但是，股票也是有风险的，特别是在不成熟阶段。这几年我们发展股票的历程是三起三落，一下子上去，一会儿下来。股民没有风险意识，政府对股票的监管力度也不够。邓小平同志当初就讲过，股票可以试，不行就关。现在关是关不了啦，城市人口差不多40%都进入股市去了，

怎么关呢？今年4月份之前，股市比较平稳，4月份开始升温，9月份后暴涨。香港股市排在世界前几位，一天的成交额也就是108亿港元；它的股票流通市值相当于我们现在的10倍，也就是说，它有4万亿港元，我们的股票流通市值只有4000亿元，但今年12月份一天成交量最高峰达到350亿元，相当于香港的3倍以上。这说明股市投机性很大，一些“垃圾股”，根本没有什么效益，都炒成七八元一股。为什么暴涨？大家都认为，香港“九七”回归之前，政府绝对不会让股市掉下去；否则，政府的面子不好看。以为买股票就必赚，因此今年9月份后新的股民进入得比较多，几个月的时间增加了800万户，现在有2200万户股民。我们算了一下，假定一家有4口人，这个股市就涉及8800万人了。大概有近40%的城市人口与股票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股市牵动人心啊。

股市要是出问题不得了，因为世界股票市场是有规律的，有涨就有跌，暴涨就暴跌。我们也担心在什么时候跌。我们本来是采取不加干预的态度，但这几个月以来，看到这种危险的趋势，大户操纵，银行的资金违规进入股市，股民们盲目地跟风，新闻媒介推波助澜。因此，这几个月我们做了一些工作，香港报纸评论说是下了“十二道金牌”。我们撤掉了两个银行的行长，因为他们拿信贷资金炒股票。我们在《人民日报》发表了几篇文章，目的就是提醒股民现在股市过热，风险很大，但毫无效果。香港报纸说，股民只看到“九七”香港回归的利好消息，别的不管了，无论怎么警告，他们都无动于衷。这样发展下去不得了。这时候，我们不能不讲话了，于是发表了一篇《人民日报》特约评论员文章①，是让中国证监会同志起草的，实际上是讲了三个道理：第一，这个股市现在是非理性的。第二，股票市场是有涨必有落，落的时候，政府不会托市，也托不起这个市。历史经验证明，没有一个人能把股市托起来。第三，股市风险自负。赚了钱你多得，赔了钱你自赔，政府管不了。现在股民的风险意识不如新中国成立前，那时的上海股民赔了钱就往黄浦江一跳了事。现在赚了钱的一声不吭；赔了钱的找市政府，砸市政府的玻璃。现在不警告他，将来出了事怎么办？因此，我们认为《人民日报》这篇特约评论员文章发表得正是时候。当然，我们估计这篇文章一登，股市也可能全面崩溃，一落到底，那也是不好办的事。因此，我们在此之前先建立了一个涨跌停板制度，这是国际惯例，但并不是现在每个国家都有。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股票一天上涨或下跌的幅度不能超过10%，现在看

来，这个制度提前建立是有好处的，要不然这个星期一就是“黑色星期一”，一垮到底了。当时，没有想到这篇《人民日报》特约评论员文章的作用有这么大。“十二道金牌”股民都不理呀！这篇文章一登出，星期一早上一开盘，股票一下全部下跌10%。要是没有这个10%的限制，就全部掉到底了，这种情况我们预料到了。但是我们也考虑到，炒股的很多是新股民，拿的是退休金、保命钱炒股票，这样一下子化为灰烬，也不太好。因此，我们决定在星期一的晚上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上发表中国证监会发言人的谈话，做了些解释工作。我们发现所有的外国评论，还有香港报纸的评论都是正面的，认为中国政府的做法用心良苦，无可厚非，不可求全责备，采取这个措施是必要的。第一天跌百分之九点几，第二天又跌了百分之九点几，但成交额第一天是20亿元，第二天就达到80亿元。成交额上去了，我们就放心了。既有人抛，也有人接，还有人进来。第三天的情况就更好了，股市反弹了，成交额是180亿元。直到第三天晚上，我才睡着觉。以后几天，股市有升有降。我估计问题不大，有惊无险。今后股市再涨、再跌，不能怪我，我已经把股市的风险讲得清清楚楚，你赚钱不告诉我，赔钱来找我，这有道理吗？现在外边又在谣传，政府会托市。香港《明报》记者写了一篇文章，我看写得很好，题目是《谣言止于智者》。这篇文章说，《人民日报》特约评论员刚说政府不会托市，现在又开始托市？朱镕基不会笨到这个程度，自己打自己的嘴巴。我宣布不托市，还托什么市？政府不会管的，股民自己投资，自己承担风险。我们采取一些措施后，各种信息反映上来，根本没有跳楼、打碎玻璃的事，没有激烈行为出现，说明中国的股民也在成长之中。对这件事中央政治局讨论过，中央也作过决策，当然要关心人民的利益。这不能叫行政干预。总之，这件事情，我们是做得对的，对今后股市的正常发展是有利的。

---

① 指1996年12月16日《人民日报》发表的特约评论员文章《正确认识当前股票市场》。

四、关于做好明年财税工作

这个问题我不多讲了，只强调几点。从1993年开始到今年，财政收入差不多每年增长1000亿元，这是历史上没有过的。过去每年增加一

两百亿元，就算财政收入增加多的了。现在每年1000亿元这么增加，但是还统统花光，主要是地方不允许搞财政赤字，赤字都背在中央身上。养军队、养国家机关，重点建设都是中央背着，中央的财政赤字很大，地方没有赤字，而增加的收入主要是在地方。今年能够保证中央的赤字没有超过原来的预算，真是不容易。此中的艰苦，真是不足为外人道也！还是要抓好增收节支、开源节流工作，不能再这样花钱了。

贾庆林①同志问我当市长的诀窍。我说：第一用人，第二理财，第三抓好“菜篮子”。只要把这三项工作抓好，政绩就上去了。理财非常重要，该顶就得顶，要按照中央的政策来办事。有些地方政府把地税局当做“亲儿子”，而把国税局当做“干儿子”，希望以后地方政府把他们都当成“亲儿子”。我过去讲过，左手、右手都是手，手心、手背都是肉。我从来都对地税局、国税局一视同仁。省财政厅和国税局不一样，前者虽然是地方机构，要听地方政府指挥，但是也要从全局的利益出发，一定要执行国务院和财政部制定的方针政策；对于不符合国务院的方针政策，不符合财政部指导的，你就得顶住。最根本的，还是要关心人民群众的生活。现在，如果对农民的利益不保护，看着粮价下跌，看着国有企业职工开不出工资、生活困难，不采取措施怎么行？有些城市，如青岛做得不错，市政府拿钱来补充国有企业的资本金。现在为什么财政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那么低啊？就是因为这个基金、那个基金太多，所以要少搞点工业项目，搞基础设施建设也要量力而行。农田水利建设是基础设施，不重视这个不行。兰新铁路银川分局几十年营造的防护林带，现在全被砍光了，真是不得了！孙永福②，你们回去研究一下，树虽不是你们砍的，我说你们无能，是指你们对地方政府的做法无能为力啊！所以，我看了有关电视报道以后，就把徐有芳③找来了。我说，我今年到四川大凉山地区视察，看到海拔3000多米的森林被砍得一塌糊涂。他们告诉我，阿坝地区砍得更厉害，这还了得！再这样砍下去，水土不断流失，三峡水库过不了几年就会淤掉。林业部是不是要改个名字，叫“砍林部”？当然，这不能全怪林业部，地方负责管这些事业单位。要立即研究措施，不准砍树。你缺木材可以进口嘛，你砍什么树呢？植树造林有利于千秋万代。不许砍树，而且要造林，你应该成为真正的林业部。绝不能为了眼前利益，为了出政绩、增加财政收入，拼命地砍林子。我讲这些事

都与你们在座的有关，靠砍林增加收入，对于这样的事情，各省财政厅不要赞成。我们还是要按中央确定的产业顺序，首先保农业。农业是基础，农田水利建设要摆到很重要的地位。其次，我们要保国有企业，减轻它们的额外负担。靠增加国有企业负担来增加财政收入，不是“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我看你们财政部门还是要顶一顶。顶得住顶不住不在于你们，但要坚持原则，尽你们的责任，还是能够起很大作用的。我经常告诫财政和银行系统的同志，少赴一些宴会，少一些大吃大喝，不然尽长肉，不长骨头。要少长肉，多长骨头，站起来嘛，该讲话就讲话。

---

① 贾庆林，当时任北京市代市长。

② 孙永福，当时任铁道部副部长。

③ 徐有芳，当时任林业部部长。

我看，现在税收增收的潜力还是很大。一个是国有企业的税收情况在明年会有好转，还是可以增收的。另外一个，个人所得税的潜力也是很大的，前年收了70亿元，去年是130亿元，今年收了190亿元，确实有成绩，这是地税局的成绩。地方政府也支持你们收。但征收的漏洞还是很大，我看这里面还有潜力。个人所得税是个很重要的税种，大量的财政收入从这里来。我顺便讲一下，对个人所得税和集市贸易税的征收，国税局、地税局原来有点矛盾，现在协调好了。集市贸易税有个什么问题呢？过去是自报公议。今年，我到浙江绍兴小市场去看了看，也亲自询问了摊贩，他们也是自报公议。这是不行的，与他们应交的税差得太多了。现在要实行查账征收，就是要按实际销售额查账。总之，要想办法把税收上来，非攻破这个难关不可。如果税务机关的人员能真正整顿好自己的队伍，成为一支坚强的队伍，那么不仅具有重大的经济意义，而且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我想，应该从这些方面来挖掘税收的潜力，堵塞偷税漏税的漏洞。

“两本账”的问题或叫预算外资金的问题，我也提醒大家注意，要加以整顿。同志们，你们回去查一查，你们的预算外资金有多少？查查非法截留的土地资金有多少，用得怎么样？我相信，这是改进我们财政税收工作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以后不要再搞这个名堂啊，再搞就

是犯法了。我今天在这里讲，责任主要不在你们，而在领导，但是你们也有责任。你们要有职业操守，要有共产党员的风格，该讲话要讲啊，不要怕打击报复，也不要怕不让你升官。地方领导不让你升，刘仲藜让你升，因为你坚持原则。我们党就要用这种人，不要怕，是非自有公论。

目前，各种不合理的开支花得那么多，花得那么快。发行国债，1993年连300亿元都难发出去，但1994年改变了发债的方法后，当年就发了1000亿元，1995年发了1500亿元，今年发了1900亿元，明年恐怕要发2600亿元，越发越多，赤字越来越大。借新债还老债，老这样干下去也不行啊。还得要节约开支。现在各种浪费现象不得了，出国的、开会的钱花得像流水一样。总之，大家要一起增收节支，开源节流，把我们的经济工作搞得更好，使整个经济形势越来越好。

戏剧要起到教育、激励人民的作用

(1996年12月23日)

这是朱镕基同志观看上海话剧团在北京演出的话剧《商鞅》后，接见剧组成员时的谈话。

我们今天得到一次很好的艺术享受。我并不是只喜欢京剧，你们演的话剧我已经看了好几出了。今天，你们把一个历史故事编成这么一部很感动人的历史戏剧，我们应该非常感谢你们。这个戏只演八场是不够的，应该多演，让北京的观众更了解你们。我相信这个戏会引起很大的反响，我看了很受感动。看戏时，眼泪都掉下来了。但我有一点意见，能不能把语言稍微现代化一些？你们这样编写有它的好处，使大家对中国古代的历史、语言受到一次很好的教育，但太多的文言文语言让人的脑子转不过来。这么一来，有些哲理性的语言就来不及消化。有些台词虽然是文言，但是成语如“锋芒毕露”，人们都很理解，就不要改它。有几句关键的话，用现代的语言来说，效果一定会更好。总之，我对今天的演出非常的高兴、非常的欣赏。这个剧对教育人民、鼓舞人民有很大的作用。

顺便讲一句，话剧《OK股票》我也看过。今年12月16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特约评论员文章，叫《正确认识当前股票市场》，这篇文章担了很大风险。我们担心文章发表后股市就会下跌，很多股民会不谅解，但实际上证明，这是一次很成功的对股民的教育。因此，我联想到你们去年演出的《OK股票》，这个戏还可以再演，而且希望进一步加工、修改，因为现在的股民比原来复杂得多，应该对他们进行必要的教育。《人民日报》那篇文章传达了三个思想：一是股票是有跌必有涨，有涨必有跌。因此，加入股市的人是风险自负。我不希望赔了钱的股民像过去的人一样跳黄浦江，但也不希望大家去上街游行。二是股市一定要规范化，不能过分投资、过分交易，但政府也不能托市。当时演出《OK股票》时，每天的股票成交量只有3亿元，现在每天有350亿元。股民们认为1997年香港要回归，朱镕基不会让股市掉下来，于是，非理性地涌入股市。这是个天大的误会，我哪

有这个本事！三是股市还是要发展。老百姓有了钱，可以进行正当投资，还可以把股市作为衡量企业经营状况的一个晴雨表。企业办得好，股票就值钱。从长远来讲，股市一定要发展，还要办好。香港报纸上讲的内地股民跳楼、自杀，那是谣言。希望把《OK股票》改得更好，也希望《商鞅》的演出继续成功。相信你们一定会受到大家的欢迎，刚才到场的观众都热烈地鼓掌了。我在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说过一句话：谁把《OK股票》这个剧本写好，我奖励他100万元。

商鞅变法①这本来是个悲剧。我来看这部戏的时候，心里在想戏的结局怎么办，因为商鞅的结局是五马分尸。但最后你们演的结局不是悲剧，这样处理更加激励人，使人们看到希望，“功过自在人心”。它使人们看后不是消极的而是积极的，它有一股壮志豪情。所以我认为，给你们这个戏写剧本的同志、演出的同志都下了很大的工夫，别具匠心。谢谢你们!

---

① 商鞅变法，是战国时期政治家、思想家、法家代表人物商鞅(约公元前390～公元前338年)于公元前356年起在秦国实施的改革。



1996年9月4日，朱镕基在北京人民剧场观看昆剧《司马相如》。第二排右五为原中顾委秘书长荣高棠，右八为中国文联党组书记高占祥，右九为文化部部长刘忠德。

《商鞅》不需要改得太多。上次，我在这里看昆剧《司马相如》，它的台词非常典雅，昆曲的语言本身就很高雅，理解起来虽然有点困难，但对大家是很好的教育。因此，《商鞅》绝大部分的语言都可以保留，只有在节骨眼上用几句现代的语言，让大家一下子就能领会，看戏时不要花太多的时间思考，否则我刚思考这一句，下一句又来了，脑子跟不上。请你们考虑一下。我相信，这个戏一定能改得尽善尽美。

大力推进企业改革，积极实施再就业工程

(1997年1月8日)

1997年1月6日至8日，国务院在北京召开全国国有企业职工再就业工作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经济贸易委员会主任、人民银行分行行长、劳动厅(局)长、商业厅(局)长、外经贸厅(局)长，“优化资本结构”试点城市的主管副市长，以及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有关部门的负责同志。会议还邀请各地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到会。这是朱镕基同志在会上讲话的主要部分，曾发表于《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册。编入本书时，对部分内容作了删节。

国有企业在改革的过程中必然会遇到一些困难。现在的困难，主要表现在国有企业整体利润下降，相当一部分企业亏损，甚至有些企业发不出工资。这是一个潜在的社会不安定因素，必须引起足够的重视。既要认识到困难的严重性，也不要过分夸大，要实事求是地分析这些困难产生的原因。国有企业利润下降确实有一些客观原因，至少有以下几个分流因素：

一是原材料、能源涨价因素。比如说，棉花价格两次上调，其他一些农产品也提价了，增加了工业企业成本。同时，电价、交通运输价格上调了，工业企业产品不能相应涨价，从而把工业企业的利润分流出去了。

二是会计制度改革带来计算口径的变化。会计制度改革后，企业折旧率明显提高，增加了成本，所以利润减少了。过去项目还贷利息不能进入成本，现在允许计入，也减少了当期利润。这些都是好事，相应地增强了企业自我改造能力，但减少了企业账面利润。

三是分配关系的调整。国民收入分配向个人过度倾斜，“八五”期间工资增长很快。当然，由于物价上涨，工资不能不相应增长，但确实增长得太多，这也减少了企业利润。

四是向企业的各种摊派屡禁不止，多则数百种，少则数十种。有些用于搞了城市建设，却相应减少了企业的利润。

我讲这些，绝对不是说国有企业自身的问题不严重，而是要看到有客观的原因。“失之东隅，收之桑榆”。针对这些问题，我们已经采取了一系列措施。1996年，银行两次降低利率，把这两次降低利率减少的利息加起来，国有企业减少了约1000亿元的负担，这也是国家对国有企业的支持。这两次减息，我们承担了极大的风险，例如一部分银行存款可能被抽出投资于股票市场。但是，虽然银行存款被分流，国有企业通过发行股票从股票市场也筹集了一些资金，增加了资本金600亿元。现在，中央财政、地方财政都拿不出钱作为资本金投入，企业自有资本金又积累不了多少，从股票市场筹集一部分资本金也是一个有效的办法。另外，1996年出口退税是退得最多的一年，财政预算列了650亿元，后来财政又挤出200亿元，共退850亿元，这也是对有出口产品的国有企业很大的支持。但是，有些办法是不能采取的。例如：大水漫灌式地放松银根，大量增加银行流动资金贷款，会造成产品大量积压，贷款收不回来；大量抹掉银行债务也是不行的。国有企业的根本问题是企业机制不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要真正搞好搞活国有企业，我认为有三个重要问题需要解决。

一要解决重复建设问题。重复建设严重是造成国有企业困难的最重要因素。据国家计委提供的资料，“八五”期间，我国的重点建设项目，建成投产以后大约三分之一会亏损。每个行业、每个企业都在搞“大而全”、“小而全”。搞石油的往炼油方向发展，炼油的往化工方向发展，各行业自行其是。在1996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江泽民同志、李鹏同志的讲话中用了很大篇幅讲解决重复建设问题。我也建议暂停上工业基建项目一年。当然，技术改造还要搞，但不要变相搞重复建设；基础设施建设必须搞，但也不要太超前，要量力而行。

二要正确执行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引进外资和进出口的政策。既要坚持对外开放，也要根据国际惯例，注意保护自己。现在有些行业本来很好，但“水货”一来，合资项目一上，国内企业就不行了。比如钢铁行业，1992年至1993年是黄金时期，钢材涨价，每吨螺纹钢价格由1900元涨到了4000多元，还要预付款。高额利润刺激了钢材大量进口，到了1994年，钢材就供过于求，造成销售困难。后来经过控制进

口，钢材销售才好转。1996年我国钢产量达到1亿吨，世界第一，主要是因为有市场。现在，外国的钢材又在低价倾销。要保持这一势头并不容易。要占住市场必须产品质量过硬，在品种上适合市场需要，否则，就很难发展。

三要解决国有企业人员过多的问题。人多往往就没有效率，好的企业也会被吃空。煤炭行业扭亏有成绩，人员减下来后，效益就提高。铁路系统、粮食系统也是人多。国有企业不减少富余人员，管理就改善不了，效益就提高不上去。

针对这些问题，除坚决防止重复建设、保护市场外，当前要采取以下措施：

第一，认真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搞活国有企业的方针政策和江泽民同志关于国有企业改革的几次重要讲话精神，扎扎实实搞好“三改一加强”。江泽民同志讲，今年要把国有企业改革放在更加突出的地位，在好的宏观经济形势下，把国有企业改革推进得更快些。其中一个重要的措施，就是考核企业的领导班子。要通过考核，把真正大公无私、政治强、懂业务、会管理、年轻有为的同志提拔到企业领导岗位上来。

第二，大力推行再就业工程。现在一些国有企业有困难，重要原因是富余人员多。没有完善的社会保险制度，就没法分离和安置富余人员，这就需要建立相应的社会保障体系，需要搞再就业工程，暂时不能再就业的，也要保证最低生活水平，逐步转业。“减员增效、下岗分流”，人员减下来，效益就提高了。减员要先下岗，然后分流到其他行业。这次会议原来叫“全国国有企业兼并破产工作会议”，建议改为“全国国有企业职工再就业工作会议”。国有企业兼并破产的政策，不是要收，不但不能收，而且要加大力度，要规范化。但是问题的关键和工作的重点，还是国有企业职工的再就业。我昨天从上海回来，在上海听了有关再就业工程的汇报，上海确实在这方面取得了一些成绩。上海1990年到1995年共下岗86万职工，安置了66万职工再就业，到1995年年底待岗职工20多万。1996年下岗20多万职工，当年再就业20多万职工，到1996年年底还是20多万职工等待安置，其中有15万职工依靠失业保险。这些措施对解决国有企业困难确实起到了重要作用。上海

纺织工业1996年前分离出22万职工，1996年成立了纺织行业再就业服务中心，8.5万职工下岗进入再就业服务中心，其中4.5万职工重新就业。1997年计划再分离5万职工。进入再就业中心的下岗职工，每人每月发基本生活费225元，由企业代交25%的养老保险、4%的大病统筹保险，另外还有住房公积金，大概每年平均向每人支付4300元。再就业服务中心的资金由三个方面共同筹集，即原有企业负担三分之一，财政从预算中拿三分之一，劳动局出三分之一，主要是向招聘外来民工的单位收取管理费。他们采取几家抬的办法实施再就业工程，我认为这就是在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国有企业富余人员分流和职工再就业的有效途径。这个经验可以推广。希望舆论界大力宣传再就业工程。

第三，要进一步规范企业破产政策，加大企业兼并和减员增效的力度。破产工作立法比较早，1986年就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试行)》(以下简称《企业破产法(试行)》)。这个法本身很好，但没有解决好破产企业职工安置的问题。《企业破产法(试行)》规定，破产企业职工安置问题由国务院另行规定。这恰恰是一个最关键的问题，职工不能妥善安置，企业就无法破产。1994年出台了《国务院关于在若干城市试行国有企业破产有关问题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明确了要解决职工安置问题。这个文件最大的特点，就是规定土地使用权拍卖所得首先用于安置职工，但在执行中出现了一些问题。主要有三个：一是执行时扩大了《通知》的适用范围。该文件规定只限于国务院批准的试点城市试行，但现在发现，绝大部分破产企业在非试点城市。据国家经贸委的汇报，1995年企业破产涉及冲销银行呆账86亿元，其中试点城市只用了14亿元。二是《通知》没有明确规定破产政策只限于国有工业企业。由于《通知》没有讲得很清楚，有些地方把内、外贸企业都包括在破产试点范围内。1995年就发现了这个问题，但当时只在银行系统讲了讲。经国务院批准，国家经贸委、中国人民银行于1996年联合下发了《关于试行国有企业兼并破产中若干问题的通知》，规定了内、外贸企业破产要从严控制，逐级上报，不经过中国人民银行和国家经贸委批准，不得破产。在国有工业企业还没有取得经验的情况下，破产不能推广到流通企业。我不是讲内、外贸企业不能破产，而是因为内、外贸企业没有多少自有资金，

情况复杂，要等国有工业企业破产取得经验以后才能考虑推行。三是在实施破产过程中，特别是非试点城市企业的破产，几乎都是“整体接收”。“整体接收”弊病很多，很容易造成假破产、真逃债。很多企业把债务冲销了，但厂子还在，仍在生产，造成亏损的根源并没有消除，搞不好还会二次破产。总结这些年的经验，不能再搞“整体接收”。

今后，帮助困难企业摆脱困境主要采取以下三种形式：

一是规范企业破产。区别真假破产有三个标准：第一条，是不是破的全是银行的资产；第二条，是不是破产后原企业组织机构和人员都不变，继续在原企业生产；第三条，是不是“既关门，又走人”。概括地讲，破产就是“关门走人”。根据上海经验，最好不要把资产(包括土地使用权)变现用作安置职工的安置费一次性交给职工本人，而是要成立企业再就业服务中心，把钱拨给中心，然后由中心统筹使用。总之，破产就是要使结构得到调整，机制得到转换，职工得到妥善安置。

二是鼓励企业兼并。江泽民同志多次讲，要多兼并少破产。因为破产搞得再好，也难免给社会带来不安定因素。要多兼并少破产，就必须给兼并比较优惠的政策。优势企业兼并劣势企业，如果留下一大堆债务、一大堆富余人员，优势企业也没有兼并的积极性，过去在这方面考虑得没有这么深刻。破产与兼并最大的区别，就在于前者是债务破掉了，后者是债务由优势企业担起来了。为了加大企业兼并力度，国务院最近将下发《关于在若干城市试行国有企业兼并破产和职工再就业有关问题的补充通知》(以下简称《补充通知》)，在鼓励优势企业兼并劣势企业方面，实行更多的优惠政策。第一，免去被兼并企业原欠银行贷款利息；第二，贷款本金分五年偿还，还可以根据情况宽限一至两年；第三，免收还款期内的贷款利息。被兼并企业的富余人员一定要下岗，下岗职工再就业以前的基本生活费，由兼并企业负担。

三是减员增效。煤炭行业从1992年以来实行下岗分流、减员增效，国家财政补亏从当时的60亿元减到1996年的10亿元，创造了减员扭亏的好经验。1996年，国家决定对10个特困的统配煤矿实行以产定人，确保不亏，富余人员一律下岗，进入再就业服务中心，在再就业之前

发基本生活费；同时，银行对其所欠贷款实行停息，限期还本。采取这个办法，煤炭行业反映比较好。我看，对一些困难企业也可以实行这种办法，但必须把富余职工分离下来。银行采取减息、免息的办法搞得太多不行。1997年用于兼并破产、减员增效、实施再就业工程冲销的银行呆坏账准备金总数控制在300亿元以内，其中，破产和兼并用200亿元，减员增效停息用100亿元。总之，能破产的要规范破产；能兼并的鼓励尽量兼并；既不能破产，又不能兼并的，如果产品有市场，可以采取减员增效、减免部分利息、实施再就业工程的办法，暂时缓解企业的困难。

国务院的《补充通知》，对兼并破产的批准程序作了调整，还是要制订计划。这不是搞计划经济，而是采取计划办法。邓小平同志讲，市场经济也有计划。各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由经贸委牵头，请有关部门和法院的同志参加，共同研究提出计划后上报全国企业兼并破产和职工再就业工作领导小组。

有的同志讲，试点城市经贸委牵不了这个头。我看，经贸委要大胆牵起来。牵头无非就是要客观一点、公正一点，要有全局观念，要有民主作风，多听大家意见，最后做一个决断。如果决定不了，就层层上报，由国家经贸委来决定；决定不了的，提交国务院国有企业改革工作联席会议研究决定。不要有顾虑，经贸委应大胆地牵这个头。为什么我不主张试点城市市长做组长，我觉得市长要超脱一点，可以指导工作，但不要下命令，还是由经贸委去牵头，让经贸委多听听各方面的意见，在协商的基础上作出决定，并付诸实施，这样各方面都比较满意。有矛盾没关系，矛盾解决不了可以上交，由上面解决。当然，各方面的同志要很好地配合，要坚持原则，国有资产不能流失，该讲的话要讲，不能拿国有资产做人情，但国务院的决定必须服从。

这次会议还有半天，希望大家畅所欲言，把《补充通知》修改得更完善，以便大家都按这个文件执行。我相信，经过采取规范破产、鼓励兼并、减员增效、实施再就业工程等措施，1997年在好的宏观经济形势下，我们的国有企业改革与发展一定会取得更大的进展。同志们对此一定要充满信心。

粮食丰收之后怎么办

(1997年1月13日)

1997年1月10日至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北京召开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负责农业和农村工作的党政负责同志，各计划单列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分管农业工作的负责同志以及中央各有关部门的负责同 志。这是朱镕基同志在会上讲话的主要部分。

这次中央农村工作会议集中研究解决粮食丰收之后怎么办的问题，这对实现今年农业生产稳中求进，促进整个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增长，将会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我就大家关心的几个具体问题讲点意见：

一、关于如何看待当前农业形势

当前，农业和农村形势确实很好。去年粮食在1995年获得较大丰收的基础上又创新的历史纪录，农民收入可能是近十年来增长幅度最大的一年。这是由于党中央、国务院的农业政策正确，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各地区、各部门工作很努力，才取得了这样好的结果。农业丰收，供给充裕，这为香港的顺利回归和国民经济进一步的持续健康发展，特别是对于稳定物价、抑制通货膨胀，打下了一个很好的基础。

如何看待当前农业形势？我看应当讲四句话：一是农业丰收，农产品供给状况有较大改善，农民收入有较多增加，成果来之不易，成绩应当充分肯定。二是农业丰收了，但还不稳定。农业基础设施薄弱、靠天吃饭的局面并没有根本改变；去年的丰收是多种有利因素优化组合的结果，还不能说明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完全达到了这个水平。有些因素，如粮食大幅度提价、大部分地区风调雨顺，这种情况不可能年年都有。三是农业还不是全面丰收，大宗品种的棉花减产1800万担，油料减产2000万担。去年粮食播种面积增加了3200万亩，其中一部分是减棉、减油、增粮，此消彼长。四是粮食并不是多得不得了，粮食问题并没有过关。对粮食增产总量要认真作点分析，不可估计过高，

还是冷静点好。现在粮食多了一点，是年度性的、地区性的、结构性的。我们有12亿人口，随着人口的增加和生活的改善，粮食需求还要增加，现在还不存在粮食过剩的问题。这样全面地分析形势，才能保持清醒的头脑。认为农业发展得差不多了，该松口气了，这种看法是错误的，也是没有根据的。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这个基础现在还不牢固。绝不能因为这一两年农业丰收就盲目乐观，出现认识上的反复，更不能放下农业就去忙着上建设项目。



1997年1月26日，朱镕基在四川省重庆市大足县邮亭镇考察粮食仓储和粮食收购情况。左一为国务院副秘书长周正庆，右三为重庆市委书记张德邻。

中央提出，今年农业要实现持续稳定增长。农业在较高的起点上不下滑，还要力争有所增长，这是个很高的要求。这也是保持良好的宏观经济环境，促进整个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要求。现在人们消费排第一位的还是吃，农业一下来，物价就上去，整个宏观经济环境又会趋紧。各地区、各部门一定要按照中央的精神，按照这次会议

的要求，从国民经济发展全局来看待农业问题，统一认识，再接再厉，坚持把农业放在经济工作首位不动摇，加强对农业的领导，加大抓农业的力度，增加对农业的投入，强化发展农业的措施。贯彻落实好这次会议精神，首先要解决好这个认识问题。

二、关于粮食收购问题

对这个问题我们抓得比较早，去年10月中旬，粮食丰收基本已成定局，国务院就在大连召开了部分地区粮食工作座谈会。会上，对今年的粮食收购工作和专储粮收购计划做了安排。接着，国务院下达了44号文件①。去年11月下旬，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又对粮食购销工作做了部署。前不久，国务院专门开会研究粮食收购工作，针对收购工作中遇到的问题，确定了一些新的政策措施。现在，定购粮基本收齐了，议购粮距离指标还有200多亿斤没有收完。专储粮指标是330亿斤，只收上来50亿斤，还有280亿斤没有收上来。如果把这500多亿斤粮食收上来，农民手里就没有多少余粮了，实现农民增产增收是没有问题的。

---

① 44号文件，指1996年11月10日《国务院关于做好当前粮食收购和储存工作的通知》。

目前，粮食收储情况总体上是好的，不存在“卖粮难”的问题，也不存在农民增产不增收的问题。与1995年过高的市场粮价相比, 现在的市场粮价回落包含着正常的因素。目前，小麦的市场价普遍高于定购价，晚稻的市场价一般相当于定购价，只有玉米的市场价稍低于定购价。而现在粮食的定购价已经比1995年高了40%，差不多高出提价以前的1994年定购价的一倍。根据国家物价局的分析，由于定购价大幅度提高，现在的粮食综合价格水平大体与上年持平，高于种粮成本，也高于进口粮到岸价。因此，农民收入肯定也是增加的。国家统计局预测，去年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可达1900多元，比上年增加300多元，农民收入中相当部分来自粮食，这说明农民是增产增收的。

这次会上，一些地方反映粮食收储困难、流通不畅。这个问题确实值得重视。

第一，尽快出台粮食保护价。有的地方到现在还没有制定粮食保护价，或者定得太低，有的地方还没有落实粮食保护价，这不行。希望各地马上把粮食保护价制度建立起来，保护价应大体相当于定购价，要坚持按保护价敞开收购议价粮，保护好农民的种粮积极性。

第二，落实粮食风险基金。现在中央的粮食风险基金已经到位，但不少地方尚未完全到位。必须按中央规定的比例及早落实，并从财政上单独划出来，建立由粮食、财政、物价、农业、计划等部门组成的粮食风险基金管理使用小组，实行专款专用。

第三，国务院最近决定新增加的100亿斤专储粮计划，重点安排在玉米集中产区。加上原来下达的230亿斤的指标，本年度中央专储粮计划已达330亿斤，各地要抓紧收储。黑龙江、吉林、内蒙古的定购粮、议购粮和专储粮要同时收购，专储粮按定购价收购。如果330亿斤的专储粮指标用完后，农民手中还有余粮要求出售，还可以追加中央专储粮计划。粮食部门要消除顾虑，放心大胆地收储。

第四，抓紧粮食调运和销售。要按照中央的要求，建立地方储备粮制度。产区要有相当于三个月销量的储备，销区要有六个月的储备粮，这要作为“米袋子”省长负责制的一项重要内容来考核。销区缺粮的时候，产区曾千方百计给你们调粮；现在产区销粮有困难，你们也该拉它一把。今后市场粮价只会回升，不要指望市场粮价会继续下跌。现在吉林省市场玉米价每斤不到5角钱，四川省市场玉米价每斤在7角5分到7角7分，差价还是比较大的，要抓紧组织东北地区玉米南下。农业部务必抓紧组织南方饲料企业收储粮食，完成80亿斤的任务。对主产区收购的中央储备粮，国家粮食储备局也要抓紧时间往外调运，尽快腾出仓库准备继续收购粮食。

第五，宣传部门在这个问题上也要有正确的导向。一不要吓着外国人，以为我们的粮食多得不得了，促使国际粮价进一步下跌，弄得我们想出口也出不了；二不要吓着农民，一说“卖粮难”，农民更慌了，可能把口粮也卖了。要给农民讲清楚，国家按保护价敞开收购粮食的政策不会变，农民需要出售余粮，随时可以按保护价卖出去，不要有恐慌心理，不要急于出手。要告诉农民，粮食连续两年丰收，要准备今年可能出现歉收，要储粮备荒。大家适当储备一点粮食，既解决了国

家集中收储的困难，又可避免万一歉收时口粮不够，还要用高价去买返销粮。

三、关于粮食流通体制改革问题

目前我国粮食购销方面出现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粮食流通体制不顺造成的。现行粮食流通体制不能适应市场需求变化，经营机制不灵活，中间环节过多，流通费用过高，亏损挂账严重。如不进行改革，不仅对粮食的生产、流通不利，而且财政、银行也承受不了。粮食流通体制已经到了非改不可、不改不行的时候了。

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的方向，概括起来就是"四分开、一并轨"。这个思路是早就明确了的，这几年一直在向这个方向努力，现在时机好，要加快推进。"四分开"，就是政企分开、储备与经营分开、中央与地方的责任分开、新老挂账分开；"一并轨"，就是粮食定购价与市场价并轨。这里面所包含的主要内容，已经多次讲过。现在，有关部门正在制订具体实施方案和征询各方面意见，国务院将尽早讨论研究实施方案。推进粮食流通体制改革，要坚持"一主多辅"的原则，逐步建立起国家宏观调控下的、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粮食市场体系。粮食由独家经营，弊病太多，不改不行。经验说明，有一点竞争，对于减少中间环节、改进服务质量、降低流通费用、稳定市场价格、提高经济效益，都有好处。当然，粮食多渠道经营也不是谁都可以搞，要经过资格审查，要加强管理，严格市场管理规则。

国有粮食系统必须积极转变经营机制，提高服务质量。要从单一经营粮油转为实行多种经营，向集中配送的便民连锁商店发展。要逐步发展粮食的深加工，增加食品的附加值，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分流人员，提高效益，在市场竞争中发挥主渠道作用。

关于住房制度改革问题

(1997年1月24日)

1997年1月23日至25日，国务院住房制度改革领导小组在四川省成都市召开全国住房制度改革工作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35个大中城市房改小组负责同志，国务院房改领导小组成员以及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这是朱镕基同志在会上讲话的主要部分，曾发表于《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册。编入本书时，对个别文字作了订正。

住房问题是关系广大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大事，党中央、国务院很重视住房制度改革。解决我国的城市居民住房问题，首先要明确住房制度改革的方向。近几年，各地区、各部门深化住房制度改革，做了大量工作，居民住房状况总体来讲有了较大改善，但还很不够。我在上海当市长的时候，上海市居民住房每人平均只有4平方米，通过推行住房公积金制度等措施，现在已经达到8平方米了，几年的时间增加了一倍。人民群众迫切需要住房，这个问题应该怎么解决呢？过去的住房政策是盖公房，分配式，低房租，是一种福利。这样的政策使住房问题越来越尖锐。党中央、国务院解决我国住房问题的政策，是推行和完善住房公积金制度，同时，通过多种资金渠道，采取相应的配套政策措施，走住房商品化的道路。尽管这条道路很长，但必须走。实践证明，这是解决我国住房问题的正确道路。

最近两年，我们搞了“安居工程”，实行了一些优惠政策，安排了一定的贷款，虽然时间很短，成效还不可能很显著，可是很得人心。我认为，“安居工程”这两年搞得很有成绩，解决了一部分人的住房问题，但还不是解决住房问题的主要措施。国务院会议讨论认为，要把普遍推行和不断完善住房公积金制度，作为1997年和今后一个时期住房制度改革的重点。这不是说“安居工程”不重要，而是要结合在一起搞，不要把这两项工作分离开来。“安居工程”是个应急的办法，是在住房公积金制度没有普遍推行起来，而且缴交标准很低的情况下，银行安排一部分钱来盖房子，卖给居民，尤其是住房困难户，这是有效的。现

在，我们还要重点推行和完善住房公积金制度。有人说，这是走新加坡的道路。其实，第一，不完全是新加坡的办法；第二，也不是只有新加坡才实行这个办法；第三，即使是新加坡的办法又有什么不好，人家行之有效嘛。实际上我们是结合自己的国情，借鉴别人的办法并做了很大的改变。上海的经验证明，在我国运用住房公积金制度，积累资金、加快居民住房建设、解决居民住房问题是行之有效的。这是我在工作中亲身体验到的。当时在上海实行住房公积金制度，是通过全体市民讨论决定的，我在电视台发表讲话宣布这种办法，然后全体市民讨论三天，大家通过电视等各种形式发表意见，机关团体也进行讨论。民意调查表明，上海市民几乎都拥护住房公积金制度。用公积金盖房子，一般十个月就把房子盖起来了，还大大降低了工程造价。实践证明，实行住房公积金制度是成功的。解决住房问题的资金怎么解决？全部盖房子的钱都让银行来拿，那是搞不久的，也是搞不多的。住房制度改革的实践证明，建房资金还得由国家、企业、个人共同分担。只有在机关和企事业单位职工中普遍建立起住房公积金制度，才能够提供稳定的、低成本的建房资金。这几年开过多次住房制度改革工作会议，都是强调推行和完善住房公积金制度，但是从全国来看，目前住房公积金的归集率还不高，公积金提取的比例较低，进展也较慢，不够平衡。我认为现在是时候了，可以提高住房公积金缴交率。住房公积金在上海有一套成熟的经验，我推荐你们看一看。普遍地建立住房公积金制度不仅不会降低职工的生活水平，反而能够为他们提供好处。住房公积金制度已经比较完善，可以归纳为四句话：第一句话，是房委会决策，即由住房委员会或房改领导小组决策，应该怎么使用、盖多少房子。第二句话，是“中心”运作，即有一个管理中心来运作，具体执行。第三句话，是银行专户，即住房公积金存到银行设立一个专户，利率是低进低出的，存进去的利率是低的，贷出去的利率相对也是低的。这样就保证房子是低造价，卖给居民是低价格。公积金如果一时用不出去，沉淀在银行的钱，银行还要照付利息，甚至是更优惠的利息。这也是一种优惠政策，鼓励住房公积金的建立。最后一句话，是财政监督，即由财政部门对住房公积金加强监督管理，确保住房公积金专款专用，安全有效运行，不允许挪用公积金去搞别的。最近发现一些单位挪用养老保险基金炒股票、搞房地产，有的还相当严重。养老保险基金是保命钱，怎么可以干这种事，

赔了以后怎么向职工交代？这个养老保险基金是不能动用的，国家规定只能用来买国库券。现在买国库券，利息比银行存款利息高，有什么比买国库券更保险的？炒股票、炒房地产可能血本无归，风险极大。



1997年1月24替，朱镕基在全国住房制度改革工作会议上讲话。左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兼国家体改委主任李铁映，右为四川省省长宋宝瑞。

今后，要把国家“安居工程”与利用公积金建房结合起来，统筹规划、统一管理、统一建设。地方政府给“安居工程”的优惠政策，也要给用公积金建的住房。为了保证住房建设资金的回收、运转，以形成良性循环，必须保证经济适用住房的低造价、低售价，促进住房商品化。现在为什么“安居工程”能做到1平方米造价1000元左右？我看无非是三条政策。第一，土地使用权由政府采取划拨方式提供。第二，市政配套费减免。各级政府、城市建设部门为“安居工程”提供政策支持，包括减免税费、减收配套设施费用。第三，房地产公司合理负担。城市政府要统一管理，经营性房地产公司都要承担一定比例的“安居工程”

建设任务，以经营其他业务的盈利弥补建造“安居工程”可能出现的亏损。房地产公司建的写字楼、商品房售价很高，利润也是很高的。建设“安居工程”房是要赔本的。根据大连的经验，就是要房地产公司赔一点，你不赔一点，就不让你拿到高级商品房、写字楼的招标。这个政策，是几年前马来西亚住房部部长向我介绍的，房地产商平均下来是有利润的，但他赚钱要在建高级商品房方面，对“安居工程”低价房应该作贡献，应该是赔的，这在马来西亚是一条法律。我看，这是一条公平的法律。没有这一条，要做到每平方米1000元左右是非常困难的。这就要求各级政府、城市建设部门也要为用公积金建房提供同样的政策支持，包括划拨土地、减免税费、减收配套设施费用、建设单位合理负担等措施。这样，经济适用房才可以建得更多，我们才能实现在低工资制度下走住房商品化的道路。在低工资条件下，房价搞高了，就实现不了住房商品化。

鼓励大家买住房，必须实行分期付款，不然买不起。银行对经济适用住房用户，要采取抵押贷款和分期付款的方式，引导居民住房消费，推动住房商品化。要确保国家“安居工程”等经济适用住房，优先出售给中低收入住房困难户，特别是国有企业职工和教师。中国人民银行已经制定一个通行的办法提交这次会议，请大家讨论。解决住房的问题，不论是企事业单位还是机关，都要通过住房公积金实现住房的商品化，一定要在全国各地方、各部门，包括机关和企事业单位实行，以解决住房资金渠道的问题。用公积金建房，银行提供买房贷款，对购房户实行分期付款，我看这样搞下去，住房问题是会逐步解决的。

低房租是个大问题。进退两难，现在房租太低，连维修费也不够。现在住房消费在居民生活费用中的比例是很低的，租金一般占不到双职工家庭平均工资的5%，国外家庭住房消费一般要占到生活费的40%，甚至一半。由于工资比较低，目前我们的恩格尔系数高，必须先保证吃饭。当然，这样长期下去也不行。实行低租金的政策，房子维修不了，大家也没有住房商品化的兴趣了。因此，提租是必要和必然的。但是，提租必须考虑增加工资和群众的承受能力。提租还有一个结构的问题，对一部分收入很高的人，租金提高五倍、十倍也不会在乎，但低收入的人就受不了。又不可能做到定向提租，也搞不清楚

他属于哪一类。《国务院关于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的决定》提出的到2000年房租应该达到占双职工家庭平均工资15%的目标不要动，作为一个方向性的政策引导。现有的工资水平下，租金提得很高是不可能的。1997年的月工资提高了20元，也刚刚补偿物价上涨，保证实际工资不下降。工资提高多了，财政也承受不了，因为现在财政还很困难。我有个想法，逐步地做到一边提房租、一边加工资，不然租金提不上去。请财政部研究一种办法，提高的工资里包括一部分指定是提房租的。当然，提房租比这部分增加的工资还要再多一点，就是说随着工资有所增加。现在工资里用于吃的比重越来越少，多拿出一点钱用于交房租，有利于推动住房商品化的进程，也有利于带动国民经济的发展。但是提房租这部分钱不能乱花，也得像公积金一样管理起来，用于住房商品化，盖新房子，逐步改革住房制度。一方面，财政拿一点房租的补贴；另一方面，个人也增加一部分房租在工资中的比重。我认为，用这个途径来提高房租是可能的。

从全国来说，经济适用住房建设，将是今后长期带动国民经济发展的最重要的消费热点。大力推行住房商品化、发展经济适用住房建设，是振兴整个经济的一个重要途径和必然选择。各地区、各部门必须及早谋划、及早准备。前一个时期，经济界提出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我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之前，找了国务院一些综合部门和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的负责同志座谈了一次，我也发表了意见，讲了怎么看待新的经济增长点的问题。我当时的看法，如果要提出新的经济增长点，首先就是实行住房商品化，加快住房建设。随着住房公积金制度的普遍建立，用于住房建设的资金将会大幅度增加。加快住房建设，其他相关产业就发展起来了，大大有利于调整国民经济结构。经过三年多来的深化改革、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我国经济呈现良好发展形势，国民经济保持较高发展速度，通货膨胀得到有效抑制。要充分利用这一有利时机，加快住房制度改革步伐，加大住房建设的规模，适应人民群众购买力的提高和住房需求的增长，大力建造低价的经济适用住房，推进住房商品化。这样做，一方面可以大大缓解城镇居民住房的严重困难；另一方面，可为国民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提供广阔市场。我讲的是住房，特别是和公积金结合的有一定资金渠道建设的经济适用住房，不是高级住宅，也不是写字楼。住房建设是振兴中国经济的个主要的方向，符合市场需求变化的方向，可以带动几十个

甚至上百个行业的发展。建设一般住房不需要进口原材料，可以带动钢铁工业和各种建筑材料的发展，也可以带动装潢材料和塑料、化工产品的发展。上、下水道可以用新型的聚氯乙烯管子，新型聚氯乙烯管子完全可以代替钢管，我们能够大量生产。还可以带动就业，国有企业一些富余人员可以转移到这些行业，有利于实施再就业工程。另外，老百姓扩大消费，购买力有了出路。谁都希望有属于自己的房子，能解决这个问题是很得人心的。即使在工资里住房消费比例多打一点，群众也是愿意的，但要明确产权，住房确实是属于他的。维修要提供方便，这样就可以鼓励大家买住房，让大家安心地购置一点财产。

我今天主要强调发挥住房公积金这个资金渠道的作用，来搞经济适用住房，然后用分期付款、保险的办法来推动住房商品化。这是振兴中国经济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措施，同时，也是调整经济结构、避免重复建设、扩大就业门路的一个完全正确的抉择。中央有关部门，要很好地研究、制定政策，包括工资政策、房租政策、土地政策、金融政策、建设政策，来鼓励住房商品化，让它更快地发展。干这件事情是深得民心的，老百姓对政府是会加深感情的。但是要提醒一句，千万别借这个名义来复活房地产热。1993年经济过热，热在什么地方？首先就是热在房地产。那次房地产热的主要建设内容是高级写字楼和豪华别墅。由于过高地估计市场需求，至今还有大量建成和未建成的房屋积压待售，起码有几千亿元的资金压在房地产上，造成国民经济重大损失。香港、广东叫“烂尾楼”，这个后遗症很严重。所以，各地区、各部门要十分警惕，千万不要让过去的房地产热在加快住房建设的名义下复活。现在不是去建写字楼，建高级商品房，更不是建别墅，要建经济适用住房，适应大家的需要。那些已经盖起来的高档商品房，再等十年，经济发展了，外国人来得更多了，让他们买，中国人是买不起的。但是其中廉价一点的商品房，怎么办？要当做一个特殊问题来处理。我看解决这个问题要下决心。积压的3500万平方米商品房价格要降下来，没有别的办法，无非是“三家抬”，地方政府要拿一点，不降价是绝对卖不动的。地方政府和业主都要考虑，与其老是这样压下去，过几年又得维修，还不如降点价卖掉。要把这个问题作为房改中的一个问题来加以研究，这本身不是房改的问题，是1993年房地产热遗留下来的问题。如果把这个问题解决了，既搞活了国家的资金，也

能使居民住房条件有所改善。请建设部会同有关部门、地区再继续研究，制定政策措施，促进销售，减少损失。要讲清楚，中央作一点什么贡献，地方作一点什么贡献，业主本人作一点什么贡献，不把"三家抬"这个问题说清楚，这些房子永远卖不出去。请同志们注意，这次会议进一步强调深化住房制度改革，加快住房建设，完全不同于1993年出现过的房地产热。千万别把我们强调的建设经济适用住房、为老百姓解决切身利益的问题简单化为房地产热。

我为什么提出要把推行和完善公积金制度作为国务院房改领导小组的主要任务？就是因为它的意义重大。因此我建议，"安居工程"的具体实施和解决积压商品房的主要工作由建设部来抓。国务院房改领导小组应该把力量集中在普遍推行和不断完善住房公积金制度方面，想办法把利用公积金建房和"安居工程"结合起来，不要搞成两套。这是国务院房改领导小组的责任。各有侧重点，这样比较好。

银行要提供优质服务

(1997年3月25日)

这是朱镕基同志在人民日报社总编辑范敬宜、求是杂志社总编辑邢贲思转报的中国服务质量大写真组委会《四平建行强化、优化服务管理，建立服务十大规范的调查》上的批语。

范敬宜、邢贲思同志向我推荐，把中国建设银行吉林省四平市中心支行作为“精神文明建设落实到优质服务”的一个典型，加以宣传推广。我委托中国人民银行和吉林省委主要负责同志进行了调查，一致认为情况基本属实。我希望所有国家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都能从这个单位的事迹中得到启发，并且认真改进自己的服务。

金融机构都属于服务行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我们的根本宗旨。一切金融活动的资金来源主要是人民和客户的储蓄和存款。人民是我们的“衣食父母”，我们只有向他们提供热情、周到、文明服务的义务，而没有对他们冷面相向、恶语相加的任何权力。金融行业精神文明建设的目标，就是在全国任何金融机构都能得到规范化的优质服务。

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都是企业，必须保证资金运用的安全、可靠、效益。银行工作人员要坚持维护国家利益，排除任何局部利益的干扰，一切服从于提高贷款质量，增进银行效益，防范和避免金融风险。因此需要建立现代金融制度，运用现代金融管理技术手段，这就是金融行业精神文明建设和物质文明建设的高度结合。

国家银行工作人员是一支信得过的队伍，全国几乎每天都有银行职工，为了保护国家资产而光荣负伤，甚至献出自己的生命。金融系统的全体工作人员一定会在新的形势下，讲政治、抓改革、勇于奉献、力争效益，把精神文明建设落到实处。

朱镕基

3月25日

关于严禁高利吸储的批语

(1997年4月6日，1998年2月21日、7月19日)

这是朱镕基同志关于严禁高利吸储的三次批语。

一、1997年年初，朱镕基同志针对人民来信反映中国工商银行哈尔滨市西十二支行、咸阳市分行有职工集资和高息揽储问题，指示中国工商银行前去调查处理。这是朱镕基同志在中国工商银行调查情况报告上的批语。

二、1998年2月6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信访局《群众反映》1998年第13期《一些金融机构违规吸储变相提高存款利率》一文称，许多人民群众来信反映，银行降低存贷款利率后，一些金融机构高息吸储，互挖存款现象愈演愈烈，严重影响金融秩序稳定，要求严厉查处。这是朱镕基同志在该文上的批语。

三、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信访局《给朱镕基同志信、电情况》1998年第11期归纳了当年6月份群众反映的金融系统违法违纪违规的大量问题。这是朱镕基同志在该材料上的批语。

一

(1997年4月6日)

相龙①同志：

工商银行对国务院领导的批办事项，调查是认真的，处理是严肃的。可以将此件批转各商业银行总行及人民银行省分行党组同志参阅，有利于引起警觉，整顿好金融秩序。高利吸储是一大祸害，必须彻底杜绝。

朱镕基

4.6

---

① 相龙，即戴相龙，当时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

二

(1998年2月21日)

请相龙、陈元①并各国有商业银行负责同志阅。银行高利吸储，已成痼疾，必须下重药、动杀手，否则金融改革从何谈起。各级人民银行应以此作为重点监督内容。

朱镕基

2.21

① 陈元，当时任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

三

(1998年7月19日)

请相龙、海旺①、廷焕①、小川①、雪冰①、林祥①、明权①、旭人①并杨景宇①同志：

高息揽储，屡禁不止，基层金融机构我行我素，置若罔闻，这与人行和各总行领导执法不严，下手不狠有关。建议今后类此案件，行长和责任副行长一律撤职，并请景宇同志研究规定刑事处分标准。

这些信件所列案件均请各总行查处。

朱镕基

7.19

① 海旺，即阎海旺，当时任中共中央金融工作委员会副书记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廷焕，即刘廷焕，当时任中国工商银行行长。小川，即周小川，当时任中国建设银行行长。雪冰，即王雪冰，当时任中国银行行长。林祥，即何林祥，当时任中国农业银行行长。明权，即王明权，当时任交通银行行长。旭人，即谢旭人，当时任中国农业发展银行行长。杨景宇，当时任国务院法制办公室主任。

会见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格林斯潘时的谈话

(1997年5月14日)

这是朱镕基同志在北京中南海紫光阁会见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艾伦·格林斯潘时的谈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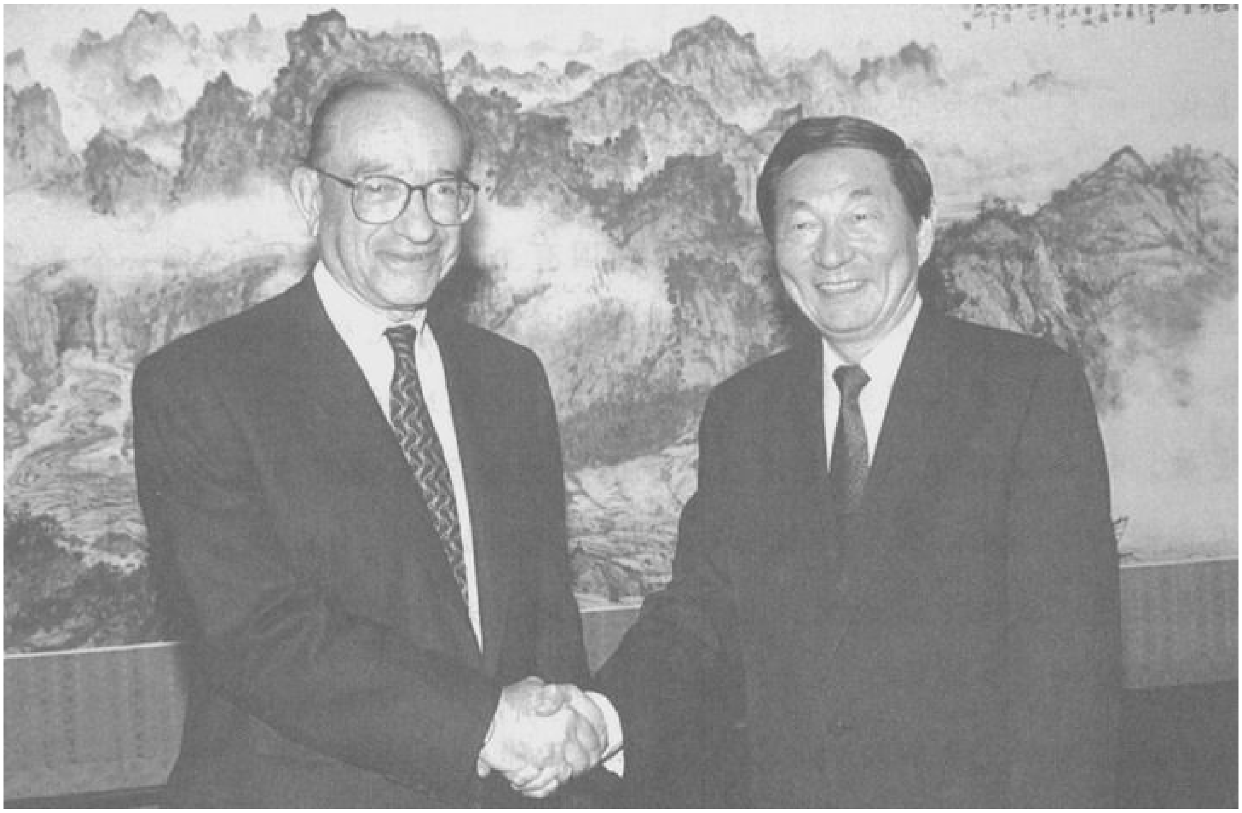
朱镕基： 我非常高兴见到你再次访问中国，我们的中央银行与美联储有很好的合作关系。我清楚地记得1993年我第一次与安吉尔①会见，与麦克唐纳②也见过两次，然后是1994年邀请你访华。当时中国经济面临困难，通货膨胀率达到24%，通过采取一系列财政、金融改革措施，情况有了显著好转。通过那次会见，我也学到了很多东西。

① 安吉尔，即韦恩·安吉尔，1986年至1994年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理事。

② 麦克唐纳，即威廉·麦克唐纳，1993年至2003年任美国纽约联邦储备银行行长。

1994年后，中国担心出现经济过热，采取了措施。去年的经济增长率是9.7%，物价上涨6.1%，近几年通货膨胀率第一次低于经济增长率。今年头四个月的经济增长率是9.4%。

现在中国的货币供应情况正常，去年实现了经常项目下人民币的自由兑换。由于中国实行了重视农业的政策，去年农业获得了大丰收，产量达到历史上的最高水平，对稳定物价很有帮助。所以，我有充分根据认为今年的经济增长率可以保持在10%，通货膨胀率保持在5%以下，而且这个趋势会延续到下一个世纪。



1997年5月14日，朱镕基在北京中南海紫光阁会见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艾伦·格林斯潘。

我们也注意到，1994年以来，美国经济持续增长，这当然与你的领导分不开。美国今年已经进入了第七个增长年，失业率较低。我记得1994年你七次加息，每次0.25%，有一次是0.5%。你每次加息，我都很关心。美联储从1995年到1996年三次降息，今年利率从5.25%升到5.5%是最引人注意的。我从报上看到，你说这次加息比以往更困难。总之，我讲这些是想说明，我们从你们那里学到了很多东西，你们的经验对我们很重要，我们希望学习更多的经验。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对我们的帮助也很大，我有一套他们的材料，正在一本一本地看，并且已要求有关人员翻译出来。

格林斯潘： 你刚才的谈话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美联储的情况你谈得很详细，令我很吃惊。1994年我来访时，中国的通货膨胀率很高，然而过去发生的一切证明你是正确的。由于你在抑制通货膨胀方面有着出色的成绩，而且也非常了解美国的经济，不如请你告诉美国如何去做。

我非常感谢你的盛情接待。我这次有两个感兴趣的问题，这两个问题是相互关联的：一是改革成功后的国有企业私有化问题，另一个是企业产权合理化可以促进中国经济的稳步发展。在这种情况下，调整国有企业产权结构是非常重要的，只有这样，才能比较容易地做到经济稳步发展。你和你的同事通过努力使中国成为世界上经济最具活力的国家，从我们的观察看，告诉中国如何去做是不妥的，因为你们在这方面做得非常出色。我刚才说的只是抛砖引玉。通过和中国人民银行的接触，我们对中国的银行体制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如果中国的银行支持改革，不良资产问题一定会解决的，只有这样，才能促进经济发展。

美国的自由市场经济搞了200多年，我们仍在学习市场如何运作、提高效率。随着21世纪的来临，新技术的影响日益加深，基础设施日趋合理。美国经济中有一个全新的发展，就是“硅谷”，它是美国经济发展的先锋。对于它的出现，我们也没有什么计划。它的出现基于两个基本力量：一是所有制产权，另一个是激烈竞争。不管是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个人价值和个人欲望都是难以计划的，问题在于个人价值和欲望如何表现出来。一个人参与市场活动，一定是为了未来的发展。我们对未来无法预测，但必须了解推动未来变化的力量。努力发展生产会面临许多问题，“硅谷”在发展过程中就有很多不确定因素，但那里受欢迎，因为那里机会多。我认为重要的是要解决那些不确定因素，因为人们是不会冒险去创造财富的。

一些具体问题也很重要，如产权。当人们意识到自我时，他们会为社会和自己创造更多的财富。“硅谷”的经验告诉我们，法律条款要清楚。政府不要随意更改法律，那样做等于告诉社会，法律是可以随便更改的。

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也会走到世界技术的前列，也会遇到“硅谷”的问题。我们发现，香港与“硅谷”非常类似。随着21世纪的来临，香港对中国乃至世界都会越来越重要。

我认为，逐步消除国有企业困难，继续保持企业生命力是很重要的。中国经济的稳步发展具有世界意义。过去的经历告诉我们，从提高人均实力到增强企业竞争力，中国是很有能力的。上次访问时我提

到，中国如能更强大、更繁荣，对美国和世界都是很有意义的。我相信，中国的繁荣能够扩散到世界其他地区。

朱镕基： 听人谈有兴趣的问题不觉得时间长。今年戈尔副总统访华时问我："你信格林斯潘，还是信弗里德曼①？"我说，他们俩在美国都很有名望，做得都很好，很有影响。我们中国人要按中国人的方式办事，就像你所说的，我不能告诉美国如何去做。但是，我们确实从你的经验、处理问题的方式上学到很多东西，也就是说，你告诉了我们如何去做。你的讲话告诉我们，要用新的办法去处理中国的问题。我记得去年美国股市上扬时，你说过"非理性繁荣"，随后引起全球股市下跌，只有中国的股市除外。去年12月，中国股市发了疯似的上涨，我们只能用中国的办法来应对。但从你的讲话中得到了启发，我们写了篇文章，在《人民日报》发表。我们没有用"非理性"这个词，只说它"不合理"。结果，股市确实下来了，但也引起了国家领导人的注意，担心是不是要一掉到底。当时我很镇定，说不会的，果然很快又上来了。

---

① 弗里德曼，即米尔顿·弗里德曼，曾任美国芝加哥大学经济学教授，1976年获诺贝尔经济学奖。

中国内地股市的市值只是香港的三分之一，但交易量是香港股市的三倍。对此，我很伤脑筋。而且，股市的发展也很不正常，你加息，股市下跌；我加息，股市反而上涨。这就是因为操纵股市的是国有企业，它们的钱是从银行来的。现在股指又很高，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也不能再干预。我希望学学你的办法。香港报纸说，美国股市是"绿市(green market)"(格林斯潘的英文是"Greenspan")，中国股市是"猪市(pig market)"，因为"猪"与我的姓同音。根据我们的调查，中国内地股市上的股民四分之一是老百姓，四分之三是机构，机构没钱就向银行借。

你刚才还谈到了国有企业问题，目前主要是结构不合理的问题，大部分企业不能满足时代的要求。我想结构调整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中国的大集团办得比较好；中小企业不行，这些企业设备旧，产品卖不出去，缺少竞争力。我们不从意识形态上看这些问题，从实际来

看，将这些企业私有化不行。因为目前中国还没有建立起社会保障体系，将这些人推向社会会引起动荡。现在我们实行“抓大放小”政策：“抓大”就是着重搞好大型企业；“放小”是要放开中小企业，只保留必要人员，多余的下岗，发最低工资，下岗人员搞第三产业。这个调整时间需要三年，那时国有企业的情况会有很大好转。多余工人再就业后，才能让中小企业实行股份制，当然也可以卖给私人。对此，我们不叫“私有化”。

最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康德苏说，金融风险来自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中国。我想，他在这一点上对中国不了解。中国不良贷款有20%是指过期不还，香港报纸将其说成“坏账”。中国不良贷款的形成是有历史原因的。过去有政府干预，现在干预少了。1992年到1993年房地产过热时，银行就发了大量的贷款，结果很多成了坏账。现在我们制定了措施，确定每年不良贷款率要下降2%到3%，到本世纪末逐步回到合理水平。为此，我们非常重视学习你们的经验，加强风险防范和金融监管。所以，我想在未来一段时间内，中国不会发生金融风险。

格林斯潘： 首先，我同意你的观点。中国的不良贷款问题不仅仅出自银行机构，是多年形成的。我想，现在的重点是要培养一大批称职的货款官员。以前是政府指令发贷款，现在银行要学会在市场条件下发放贷款，这当然需要时间，有时也会有风险。企业也要认识到贷款风险，就像“硅谷”那样。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的商业银行是能够学会区分风险的。中国银行在这方面有经验，中行在世界各地都有机构。从事金融业，培养人才非常重要。在计划体制下没有风险，但在市场体制下，一定要有风险意识，美国的银行在这方面的意识就很强。

朱镕基： 你的话使我想起，纽联储提出过愿意为我们培训中央银行干部的事情，特别是地区中央银行的干部。你们有12家地区银行，将来我们也有可能采取按区设行的结构。我希望美联储为我们培养地区中央银行高级官员，时间半年、一年都可以。虽然选人有些困难，但希望达成协议，费用当然由我们自己负担。请戴相龙①行长与你具体商谈这个问题。培养地区中央银行行长很重要，希望纽联储在这方面继续协助我们。

① 戴相龙，当时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

格林斯潘： 显然，我们也希望尽快提出具体意见。旧金山联储与中国人民银行在这方面打过交道，尽管时间较短，但毕竟有了接触。商业银行也应该在培养人才方面下力气。中央银行和商业银行的职员素质普遍提高，金融体系才能更好地分配资源。培训虽然不能立即见效，但是至关重要。

朱镕基： 非常高兴能有机会再次见到你，希望你经常访问中国。

格林斯潘： 谢谢。

对金融犯罪要严厉法办

(1997年6月21日)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信访局《给朱镕基同志信、电情况》1997年第4期归纳了1997年4、5两个月的各地群众来信、来电，强烈反映金融系统违法乱纪、违章违规、贪污腐败等问题，要求加大对金融犯罪的打击力度，整顿金融秩序，加强对金融业的监督。这是朱镕基同志在该材料上的批语。

请中国人民银行、工商银行、建设银行、中国银行、农业银行、交通银行、人保公司全体党组同志认真阅读、思考、讨论。我们的金融队伍已腐败到何种程度，即使并非都是事实，但人民群众就是这样评价我们的。如果再不严肃整顿、严厉法办，我们何以对党、对国家、对人民、对自己的共产党员称号。来信所列举的案件和责任者，要组织力量下去一件一件地调查清楚，并且一个不漏地法办。要派清官下去，不要派贪官和专做好人的官僚下去。

(抄送罗干、曾庆红①、曾培炎①、刘仲藜①、项怀诚①同志)。

朱镕基

6.21

---

① 曾庆红，当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曾培炎，当时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刘仲藜，当时任财政部部长兼国家税务总局局长。项怀诚，当时任国家税务总局副局长。

关于粮食购销工作的几个问题

(1997年7月11日)

1997年7月9日至11日，国务院在北京召开全国粮食购销工作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负责同志，计划经济委员会(计划委员会)和财政、物价、粮食(内贸)厅(局)及农业发展银行分行的负责同志；各计划单列市主管副市长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主管副司令员；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有关部门及新闻单位的负责同志。这是朱镕基同志在会上总结讲话的主要部分，曾发表于《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册，原标题为《关于粮食购销工作需要进一步明确的几个问题》。编入本书时，对个别文字作了订正。

这次会议上，部分同志对现在实行的粮食购销政策还存在一些模糊认识，需要进一步统一思想，有些政策也需要进一步明确。

第一个问题，关于对近几年粮食政策的认识。

我认为，要进一步统一对近几年粮食政策的认识，进一步统一粮食系统干部的认识。我从会议简报上看到，有的同志讲，如果按1992年“放开市场、保量放价”那个政策做下去，就不会发生问题，现在的做法是走回头路，在改革方面是倒退。这个认识是完全错误的。实践已经证明，按1992年那个做法是一场灾难。当时的形势是1990年、1991年、1992年三年粮食丰收，粮食产量上了一个台阶，每年收购2000亿至2400亿斤，包括定购粮和议购粮，大大超过现在的收购量1800亿至2000亿斤，国家专储粮规模达到812亿斤。那时普遍的呼声是“中国粮食问题解决了”，要求“放开市场、放开价格、放开经营”。在这种情况下，1993年2月，国务院发了个文件①，对“放开”是实行“分散决策，逐步推进”，但实际上，1993年除黑龙江、吉林、河北三省外，全国都放开了。结果没多久，到1993年11月粮价就暴涨，一天一个价。为什么呢？粮食系统1993年开始不收购粮食了，粮食都收到个体户那儿去了。粮食没有掌握在国有粮食企业这个主渠道手里，那粮价还不飞涨吗？涨起来以后，国有粮食系统慌了手脚，参与高价抢购粮食，助长

了粮价飞涨。为了平抑粮价，国家采取由国有粮店挂牌平价出售专储粮的办法，稳定了粮价。到1994年年底，专储粮库存下降了300亿斤，也就是抛售了300亿斤。这是个深刻的教训，怎么能说还要按那个政策做下去呢？国家宏观调控取得今天这样的成绩，我看正确的农业政策起了重要作用，如果农业政策继续像那样延续下去，就没有今天的好形势。

① 指1993年2月15日《国务院关于加快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的通知》。



1997年7月11日，朱镕基在全国粮食购销工作会议上作总结讲话。左为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罗干，右为国务院副秘书长周正庆。

我在1992年12月一个座谈会上讲过，我们讲“放开”，是指要放活，要搞活一点，不是放开不管。日本是市场经济国家，也没有放开粮

食。日本大米的价格高于国际市场价，始终是按保护价收购，财政进行补贴，他们也要保护农民的利益。我看了国家计委最近一个考察报告，反映日本粮食购销体制改革的历史过程：第一个阶段，是完全保护的，统购统销；第二个阶段，由于政府财政补贴负担太重，就放开了，放得比较多，但不行，农民反对，政府向国民道歉；第三个阶段，做了若干修正，还得实行保护价。我们要很好地重温和吸取历史的教训，政府对粮食非管不可，绝不可放开不管。我国人口的主体是农民，如果十亿农民的利益得不到保护，经济就不能发展，政权就不会巩固，社会就难以稳定。现在城市里亏损的国有企业的工人再困难，还是有饭吃，粮食是便宜的。如果搞得农民不种粮食，连饭都吃不上，那个时候国家会是个什么样子？！

有的同志提出，按保护价收购的粮食究竟是政策性的还是经营性的？与去年我在大连会议①上讲的粮食购销体制改革的思路是不是有矛盾？现在这种办法是不是把“两条线”运行都取消了，变成统购统销了？这种看法不对。我认为没有矛盾，没有走回头路，它与1994年提高粮食定购价、改革粮食购销体制的思想是一致的，改革的思路是一贯的。1994年开始建立粮食风险基金的主要目的有两个：

---

① 大连会议，指1996年10月13日至14日在辽宁省大连市召开的部分地区粮食工作座谈会。

一是在粮食歉收时，抛出储备，平抑价格，粮食企业出现亏损用粮食风险基金补贴；二是在粮食丰收时，用保护价去收购，收上来暂时卖不掉的，对利息和费用要给予补贴，从粮食风险基金中支出。农业受自然条件的影响，有丰有歉，如果粮价任凭丰歉波动的话，不是市民受损失就是农民受到重大损失，都是不行的。保持粮价基本稳定，就要运用粮食风险基金，只是不同情况下运作方式不同而已。以前是在粮食歉收的情况下运作，现在是在粮食丰收的情况下运作，这种办法根本不影响粮食按政策性和经营性两条线运行。1996年7月1日出台的销售价，基本是按定购价加上费用顺价，也就是说按商业性经营，粮食零售是不会发生亏损的，或者说基本上不会发生亏损。上海市就不亏损，上海市粮食销售有三个渠道，即粮食系统、农垦系统和农业系统，三个渠道互相竞争，谁也不亏损。刚才讲粮食歉收的时候粮食

企业抛售库存粮食出现亏损，丰收的时候按保护价敞开收购也要出现亏损，都要由粮食风险基金补贴，这是政策性的补贴；但是粮食系统商业性销售不应该出现亏损，相反应该改进经营管理，发展多种经营，努力盈利。

还有的同志不赞成采取按保护价敞开收购的办法，认为不如采取中央收专储粮的办法。这个问题我在全国粮食购销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上讲了，在河南、安徽调研时也讲了，收专储粮和按保护价敞开收购没有原则性的区别。既可以采取收专储粮的办法，也可以采取增加粮食周转库存的办法，效果都是一样的，无非是在粮食丰收的时候把粮食存起来，收购价格不要降低，费用由财政给予补贴。那么，为什么不采取增收专储粮的办法？就是因为专储粮已经收得太多了，中央负担很重。而采取由地方粮食企业按保护价敞开收购，超储部分用粮食风险基金补贴，这个机制比较好。1994年建立粮食风险基金的另一个目的，就是要把调控粮食市场的责任分散到各省去，中央拿一部分财政资金，地方拿一部分财政资金，共同建立粮食风险基金，从这里面补贴，由中央和地方共同承担。如果凡是多余的粮食都收到中央储备库里，中央财政受不了。大家都知道，地方财政没有赤字，财政赤字都在中央。中央主要负担外交、国防、重点建设，外债、国债都在中央财政身上。因此，粮食风险基金仅由中央来负担，负担不起。现在的办法，中央、地方共同负担，这个机制比较好。粮食购销工作要通过地方去做，如果补贴资金都是中央财政拿，事情都是地方做，地方不管花多少钱，这个机制就不会好。

总之，对现在实行的政策，认识要进一步统一起来。第一，按保护价敞开收购议购粮的政策是1993年以来粮食购销体制改革的延续，是在一步一步地走向完善，根本不存在走回头路的问题。应该把1992年的“三放开”看做是一个教训，如果按那个方向走下去，是一场灾难。第二，这次采取的政策措施，是去年大连会议的继续，没有违背去年大连会议上确定的改革原则。第三，现在专储粮的规模已经很大，库容不足，保管也跟不上，再增加专储粮会出问题。所以这次会议采取的政策，是改革的继续，不是倒退，不是回到计划经济老路上去。只要大家坚定不移，齐心协力，拧成一股劲，一定能够收到好的效果。

第二个问题，关于对粮食购销形势的估计。

在讨论中，一些同志担心实行按保护价敞开收购议购粮的政策后，会出现“吃得进，拉不出”。这个担心是可以理解的，现在压库就很厉害，再敞开收购更受不了。我对这个问题的估计是，不用太担心。这涉及如何估量粮食购销形势的问题。一方面，现在各地上报的数字，收购量越报越多。收购量，上一个粮食年度实际完成2384亿斤，各地预测上报的本年度收购总量是2825亿斤，就是说今年比去年特大丰收的情况下还要再增加收购400多亿斤。我看收购不了那么多粮食，敞开收购也没有那么多。今年秋季的粮食生产形势并不乐观，所以不可能有那么多余粮。另一方面，各地预计的销售数量越报越少，只有1200亿斤。这是不可能的事，难道都不吃饭了？不要相信那个销售预测数字。实际情况是，由于粮食部门敞开收购，掌握了粮源，别的渠道经营粮食少了，人们只能主要从粮食系统买粮食。因此，粮食部门不可能只销售1200亿斤，即使少销售一些，达到1995年1800亿至1900亿斤的销售量也是完全可能的。大家一定要坚定执行政策的信心。当务之急，是要把粮食先收上来，放心大胆地敞开收购，并加强销售工作，改善服务态度，改善经营管理，困难一定能克服。

另外，大家对有关部门核定的粮食合理库存数字有点意见，认为1100亿斤的数字偏大。因为地区不平衡，这个账暂时也算不清，还是先按核定的1100亿斤来计算补贴。大家对财政部草拟的文件中规定的销售指标1856亿斤有不同意见，对规定各地没有达到核定销售指标，多储的粮食不给补贴也有意见。我认为，1997粮食年度销售1856亿斤没有问题，很可能销到2000亿斤，1992年就销了2000亿斤。如果本年度的销售量没有达到1856亿斤，库存增加了，还是按实际来补贴。请大家做工作，努力销售，但不要低价竞销。

第三个问题，关于落实补贴资金问题。

在讨论中，一些同志对补贴资金能否落实也有疑虑，担心不能及时补、据实补。去年全国粮食周转库存1800多亿斤，初步核定合理库存1100亿斤，多余700亿至800亿斤粮食；根据今年夏粮产量，新粮敞开收购扣除正常销售后，估计今年还要增加库存700亿至800亿斤，总体上要比正常周转库存多1500亿斤粮食，按每斤补贴1毛钱计算，1500亿斤需要补贴150亿元。现在账面上有风险基金150亿元，其中去年结转79亿元，今年提取70多亿元。前不久测算，这150亿元中需用于地方储

备粮保管费用和利息等固定开支约45亿元，但刚才财政部汇报说，45亿元打不住，已经用了70多亿元，因为仅6月份用于补粮食销售价差就花了24亿元，这样，能用于超储粮的补贴只有70多亿元。我今天宣布，以后不能再动用粮食风险基金去补销售价差，因为已经对粮食企业超储粮食的利息、费用补贴过了，粮食企业应该正常经营，销售价按保护价顺加费用，不应该赔本，不应该再补价差。这里强调一下，国有粮食企业不允许降价卖，越降价越糟糕，粮食越卖不出去，产生恶性循环。另外，农村返销粮、水库移民口粮的价差补贴，过去都是从粮食风险基金里开支的。按理讲，这些支出不属于粮食风险基金的范畴，不应该从粮食风险基金中开支，应该由财政另外解决。今年就这样了，明年改过来。粮食风险基金缺口怎么办？我想今年还不会发生大的问题。首先，补贴算账是从1997粮食年度，即从今年4月1日开始的，从7月1日起拨给补贴，而财政年度算账到12月底，因此今年实际上不需要拿出那么多补贴。其次，敞开收购后，也不一定收得了那么多粮食，销售形势好转以后，还可以多销一些，补贴相应也会减少。有关部门要对补贴情况进行逐月跟踪、检查，逐月算账。再次，加一点行政干预，销区从产区调销一点粮食，产区可以减少一点补贴。最后，如果补贴还不够，可以在明年的财政盘子里再想办法，不会影响今年财政预算的执行。另外，各地都要再增加一点风险基金，以应对各种不测的情况。按照原来的规定，粮食风险基金要由中央和地方财政按照1∶1.5的比例共同建立，现在全国平均实际达到的比例是1∶1.05。我希望还没有达到1∶1.5比例的省份，尽快达到1∶1.5的比例。这笔资金中央没拿走，仍在地方财政的账上，也不平调，还是补足为好。现在连1∶1.05的比例都未达到的，首先应该补上。有的同志讲，中央要求财政要优先安排教育、科技，而且都规定了硬指标，必须占财政预算的百分之几，现在又要增加粮食风险基金，哪有那么多钱呀。同志们，别忘了，讲教育、讲科技，还有个农业呢。我不是不重视教育、科技，都应优先安排，但农业也要优先安排，这笔钱在地方财政预算里占的比例并不大。我建议各地明年财政里面除了增加教育、科技资金以外，还要把这笔资金加上去。中央财政要做出表率，要调整财政支出结构，把钱花在应该花的地方。

第四个问题，关于价格政策问题。

总的原则是，定购价跟去年的一样，保护价按去年规定的定购基准价制定，即比定购价低10%。但南方的早籼稻、北方的春小麦，由于质量较差，用途有限，增产多了销售不出去，完全按基准价收购，销售困难。因此大家建议，把价格往下浮动一点，给农民一个信号，减少一些销不出去品种的产量。下浮多少呢？一些同志建议比基准价下浮10%。我们考虑，不要下浮那么多，如果下浮10%，农民很可能连成本都收不回来。过去我们没有采取措施让农民少种，农民已经种了，价格下降那么多，农民的积极性会受到很大打击。我看大体上下浮5%左右，还是要保证农民的利益。今后要把这个信号发出去，宣传早籼稻的品种要改良，按现在这样种下去越来越销不掉了，价钱也会下降。另外，还要加强销售工作，民工还是愿意吃早籼米的。

第五个问题，关于省际调拨问题。

实际上省际粮食调拨已经没有了，都市场化了。如陕西，一个地区小麦丰收，一个地区缺粮，省里想调都调不动。所以省际调拨是很困难的，我也理解。但现在的情况是，全国粮食风险基金算总账有150亿元，由于地区之间很不平衡，粮食丰收了，主产区存粮较多，负担很重，粮食风险基金不够用；而销区可以买便宜粮食，不需要那么多补贴，粮食风险基金有结余。这样，150亿元就更不够用了。粮食风险基金结余的省，结余34亿元；而粮食风险基金不足的省，硬缺口达80多亿元。把一些销区结余的风险基金调到风险基金不足的产区，是行不通的。因为风险基金结余的地区，既有富裕地区，也有贫困地区，把富裕地区的风险基金调出去，也许可以，但要把贫困地区的风险基金调剂出去，根本不行，况且这个基金有一大半所有权是地方的，所以不能在省际调剂粮食风险基金。怎么办？请同志们服从大局，主销区、粮食风险基金实力强的地区，要努力从产区多买一点粮食储备起来，帮助产区多分担一些库存，还是采取这个办法比较好。缺粮的省份，过去都是从别的省买粮的，现在要求你还得买，不能因为粮食库存多了，就不买了。粮食调进后如暂时销不出去，先储存起来，费用从粮食风险基金中补贴一点嘛。请国家计委、财政部和国家粮食储备局确定一个省际粮食调拨计划，这不是恢复计划经济的做法，主要还是靠大家顾全大局，发扬风格，分担困难，努力做好这项工作。



1997年6月27日，朱镕基在河南省周口地区朱仙镇粮管所售粮现场与售粮农民交谈。前排左四为河南省委书记李长春，右一为河南省省长马忠臣。

销区到产区购买粮食的价格怎样确定，有两种意见：粮食部门希望执行保护价，便宜一点，可以推动销区到产区多买粮食；财政部门主张按定购价，价钱高一点，对产区的负担多减轻一点。我主张按定购价，多减轻一点主产省的负担。大家要发扬风格，执行定购价不一定加重负担，无非就是高10%，出售粮食时销价可以顺加，也不见得有多少亏损。稍微在定购价的基础上往下浮一点，也是可以的，大家协商，共同来解决问题。去年我要求农业部组织饲料加工企业储备一至两个月的玉米，原来定了一个目标是400万吨，现在签了合同的有380万吨，运到饲料加工企业250万吨，是很有成绩的。不然，饲料加工企业一吨玉米都不愿意买。工商银行要保证周转库存粮食的贷款资金。总之，大家共同努力，都来分担一点库存，都来推销一点粮食，这个问题就可以缓解了。

第六个问题，关于仓储问题。

我在河南、安徽调研时了解到，这个问题并不十分严重，可以想出许多办法来解决，实在不行，多租用社会仓库，特别是停产的国有大中型企业的厂房和仓库，许多国有大中型企业都有铁路专用线，很方便。中央已经分四批下达了15亿元的贴息贷款来修建仓库，其中第一批6亿元才用掉4.4亿元；后来下达9亿元，相当一部分还没有用。这次会议上，各地要求再增加一些简易建仓贷款，先再安排10亿元。谁要改造仓库，可以用这笔钱，利息由中央和地方各负担一半。粮食系统应该努力扭亏为盈，改善经营管理，发展多种经营，用增加的收入来归还贷款。

关于完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几个问题

(1997年7月30日)

1997年7月29日至30日，国务院在北京召开全国统一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工作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部分省会城市代表，以及国务院有关部门的负责同志。这是朱镕基同志在会上的讲话。

今天，我们是陪同李鹏总理来会见会议代表的，我没有准备讲话。但是，刚才听到地方的代表们提出了一些问题，我想就此讲几点意见。

第一个问题，就是刚才同志们提出的立法的重要性和迫切性，要求加快立法步伐，制定《国务院关于建立统一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决定》(以下简称《养老保险决定》)的实施细则，赶快发下去。我是同意这个意见的，讲得很对。但是，也要看到立法的严肃性，不能仓促行事，朝令夕改。大家可以回忆一下，我们的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经过三个阶段了，要达到统一的认识是极不容易的。上次会议我们提出的养老保险方案就是两个。为什么有两个方案呢？就是认识统一不起来、不一致，而且都有道理。后来，国务院决定将这两个方案交给各个地区自己来选择，在统一认识和实践的基础上再来定全国统一的方案。所以，今天能够拿出一个统一的方案，是很大的成果，是实践的结果，是很不容易的。因此，请你们回去后马上向省区市委、省区市政府汇报，自己制定细则，立即实行。不要等国务院发布全面的实施细则，再等就丧失时机了。

各地制定的实施细则，一定要符合《养老保险决定》的精神，要谨慎行事，而且最好注明这是一个暂行细则，如果国务院有了统一的规定，还得服从，要讲清楚这个问题。你们的实施细则都要报告国务院，抄送劳动部、国家体改委、财政部，为这些部门制定全国的实施细则打基础、做准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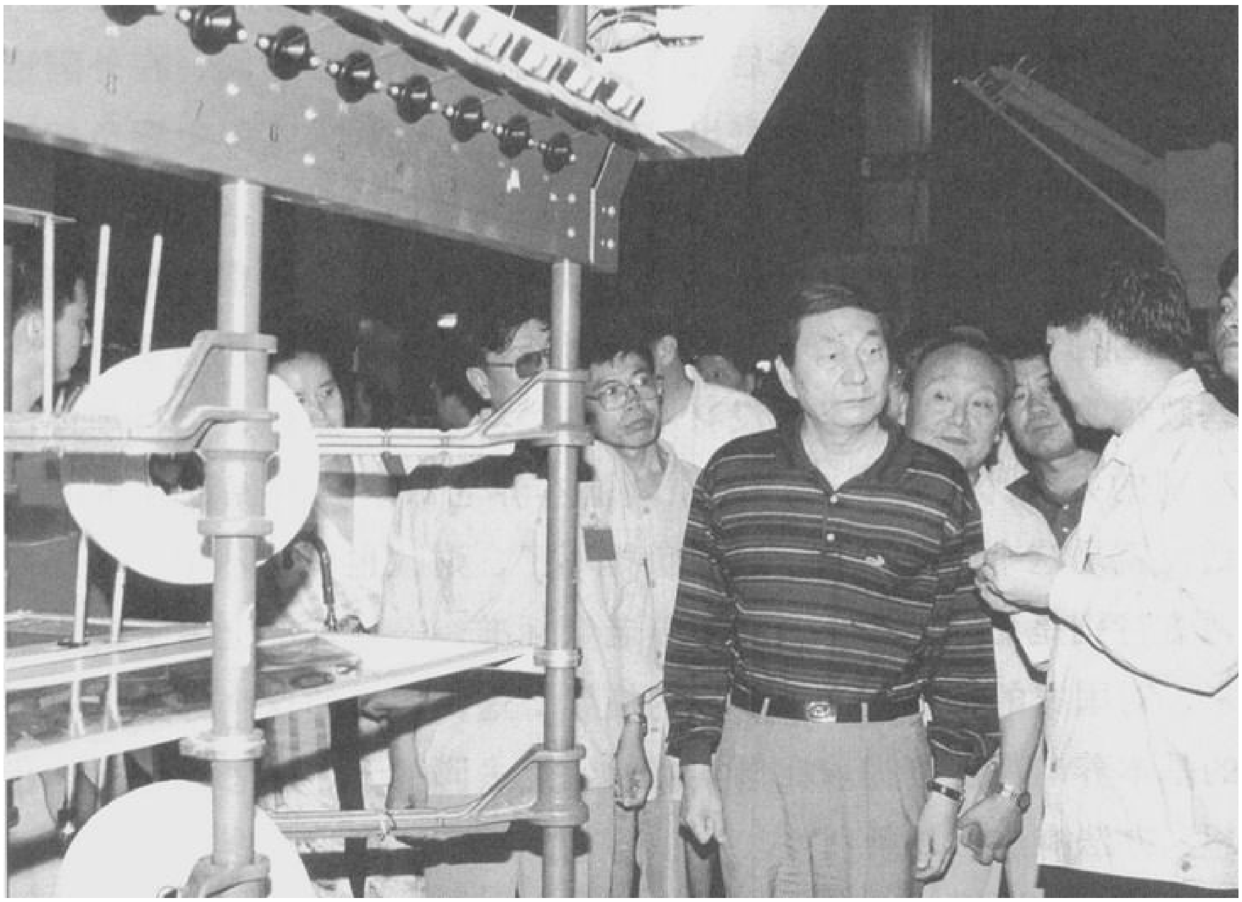
要保持政令统一，国务院的有关部门不要自行解释《养老保险决定》，或者作出一些新的规定，不要再搞文件“打架”了。否则，政令不统一，下面无所适从。对有关政策，《养老保险决定》已经讲得很清楚了，大家就根据《养老保险决定》去实行。然后，中央有关部门下去做调查研究，了解每个地区是怎么执行这个文件的，就可以发现很多问题。我今天向各部门、各地区的同志讲清楚，在一段时间内，国务院就这个问题不再发文件，各个部门也不要发文件。如果需要修改这个《养老保险决定》，或在实施中有什么问题，请各个部门做了调查以后，经过国务院研究协调，拿出一个统一的意见，由国务院发布。我想，这样便于各地执行这个《养老保险决定》。这是我讲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说不要等，也不可能很快地由国务院发出一个统一的实施细则，必须经过一段时间的实践。请同志们回去向领导汇报，立即动手制定实施细则，要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制定了实施细则就要抓紧实行。中央有关部门要加强调查研究，总结各地实施的情况，有了问题由国务院再协调。

第二个问题，就是大家希望尽快发布企业补充养老保险实施办法。对于这一点，我也可以告诉大家，快不了。为什么？因为企业补充养老保险是一个新事物，尚未实践，还没有经过充分论证。所以，现在马上搞一个实施办法，容易脱离实际。我们要先试行一下，先在行业统筹向地区统筹过渡过程中试行，在这个基础上制定实施企业补充养老保险的办法。建立企业补充养老保险，是李鹏总理提出来的。当时，一些省市强烈要求将行业统筹改为地区统筹，但这11个行业①也有他们的困难，因为他们的待遇水平高于地方，还有其他方面的一些问题。所以，行业统筹转为地区统筹暂时还有困难。后来提出采取过渡的办法，允许这11个行业保持他们的既得利益，这样有利于稳定职工队伍。就是说，他们可以参加地区统筹，服从统一的标准，但由于他们的效益比较好，可以由自己拿出一部分钱来搞企业补充养老保险。我看，还是先搞这一部分，用建立企业补充养老保险的办法来使行业统筹尽快地纳入地区统筹。至于企业补充养老保险今后怎么搞，总结经验后再研究。

---

① 1993年10月，国务院批准交通部、煤炭部、中国人民银行(含人民银行、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中

保集团)、民航总局、中国石油天然气总公司、中国有色金属工业总公司进行行业基本养老保险统筹，已经按地方进行统筹的，改为按行业主管部门进行养老保险统筹。加上此前已实行行业基本养老保险统筹的铁道部、邮电部、水利部、中国建筑工程总公司、中国电力公司，当时共计11个行业实行了基本养老保险统筹。



1997年7月20日，朱镕基在辽宁省辽阳市辽化公司考察。

第三个问题，就是大家普遍提出来的一个矛盾：一方面，基本养老保险费提取的比例过高；另一方面，钱又不够用。 这确实是一个矛盾，这个矛盾恐怕今后会越来越尖锐。不但在中国，在外国也有这个问题，但我们更加突出，因为我们这一代人实际上要负担两代人的养老保险。上一代人没有完善的养老保险制度，没有提取养老保险费，现在要从我们这一代人缴的基本养老保险费里给他们支付养老金。这确实存在一个需要和可能的矛盾，我们还需要研究一些政策来解决。我们不是没有看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但目前还没有别的办法。为什

么一再地强调基本养老保险只能保证基本的生活，就是这个问题，高了企业负担不了，财政也负担不了。如果像西方特别是北欧国家那么高的养老金标准，一旦标准上去了就下不来，对国家的发展是一个沉重的拖累。这次提出的这个方案，规定的基本养老保险费提取比例实际上比过去降低了。那怎么够呢？我想，办法有这么几条：

首先，提高养老保险的覆盖率和养老保险基金的收缴率。提高覆盖率，使养老保险负担少的企业也来参加养老保险，分担一部分困难。比如外商投资企业，招的多是年轻人，暂时没有养老负担，不用支付养老金，现在可以分担一点，这可以解决一部分问题。养老保险基金的收缴率一定要提高，这方面宣传得很不够。你要享受养老保险这个权利，就必须尽义务，必须按国家的规定缴纳养老保险基金，任何时候都必须缴纳，不缴将来退休时生活就没有保障。要宣传这个观念，一定要讲清这个道理。我还强调一点，对下岗的职工，企业必须保证他们的基本生活费，同时，还得要替他们缴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不然，他们到别的企业重新就业后，没有保险带过去，那他们就丧失了权利。我上次从上海了解到，上海的基本生活费是每月250元，实际上要发350元，因为要代工人缴保险。这是比较高的标准，别的地方没有这么高。这次我到辽宁，了解到他们的基本生活费大概是每月120元到150元，没有包括保险。我想还是应该包括保险，不给他们缴保险，职工下岗的思想阻力会更大。这个资金的筹措渠道，一是企业自筹，二是政府拨款，三是社会互济。通过各种渠道送温暖，逢年过节去送温暖，社会互济嘛。我的意思是说，保险一定要缴，老是“寅吃卯粮”不行。刚才有的同志提出来，东北每个地区企业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的比例都超过企业工资总额的20%，怎么办？《养老保险决定》里讲了，一般的是20%，如超过20%要报劳动部和财政部审批。但不是说高于20%的部分，劳动部、财政部批了就由部里来补，它们可补不了。劳动部没钱补，财政部也没钱补。再靠财政是没有办法了，而且基本养老保险费里面有三分之一本来就是财政的钱。因为企业提取基本养老保险费是打入成本的，实际上这三分之一是靠免所得税得来的，现在一年提取1100亿元，里面有300多亿元是国家财政的钱(包括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当然，财政应该支持这个事情，但说实话，现在没有能力再额外支持了。企业职工失业、下岗的问题，对地方财政已

经是一个沉重的负担，再叫它来负担基本养老保险，没有这个能力了。

其次，就是保证养老保险基金安全的问题。这个“保命钱”，一定要把它使用得当，安全地把它管好、用好，要百分之百用在养老上，不能用它干别的。现在，这个方面的问题多得很。据审计，目前已经流失了92亿元。我看了这个报告很震惊，所以国务院发了个文件①，要求各地认真核查、严肃处理。现在一年也就收入养老保险费1100亿元，92亿元跑掉了，怎么跑掉的呀？就是想增值，去搞投资，搞房地产、炒股票、上项目，干什么的都有，最后血本无归，钱都收不回来了，还增什么值呀！我看了这个报告以后，是很痛心的。我记得这几年，至少是从1994年以来，年年跟同志们讲，这个钱只能买国债，不能去搞投资。投资有风险，你可能赚一大笔，也可能全部赔光了。我们不能冒这个险，我们没有这个权力来冒这个险！不是国务院没有提醒，早就提醒了，可是有人就是不听，也不报告，等审计出来以后才知道。这个事情怎么处理？我们建议还是要把有关文件很好地学习一下。要认真调查，因为这只是个大概数字，究竟哪个地区有多少、流失在什么地方，先把事情搞清楚，你们回去自己查一查，实际上绝对不止流失92亿元。这里，我不客气地讲，大部分是劳动管理部门自己批的，财政部门也批了1.7亿元。你们要总结经验教训，我也希望那些有关的地方领导要总结教训，你没有权批，这种干预是完全错误的。一是要先把事情搞清楚，二是要严肃地处理责任者，三是要尽量挽回损失。国务院的《养老保险决定》是李鹏同志亲自主持讨论的，我们一再强调：养老保险基金留两个月的周转金，除此之外全部买国债。过去说大部分买国债、基本上买国债，实际上管不住。这次是下命令了，全部买国债。谁再违反这一条，就撤谁的职！你对人民不负责任，你有什么权力拿这个钱去炒股票、乱投资？你有什么把握能把钱收回来？风险很大啊！务必使全体同志们都能认识这一点。你们向省区市委、省区市政府汇报的时候，就说这是国务院的意见。希望省区市领导知道这个事情，这个钱不能乱用！买国债就是保值增值，国债利率比银行储蓄利率还高两个百分点；干别的，回报率很难有这么高，而且很可能是负回报率。对沉淀在银行的养老保险基金，银行不要按企业的短期存款利率计息，请人民银行总行研究一个办法，应该给它比较高的优惠利率。因此，经过这次改革，特别是在流失减少以

后，养老保险基金的总数实际上是增加了。国务院决定， 劳动部门所属社会保险管理部门的人吃“皇粮”，不再从养老保险基金中提管理费，又可以省一大块！所以，这个《养老保险决定》的意义是很大的。刚才，有的同志希望对社会保险管理部门在工资、住房和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给予照顾。这个要求是合理的，但照顾还要考虑到实施的可能。我只能向财政部门交代，要合理地核定、适当地照顾，使社会保险管理部门的同志们吃“皇粮”后待遇不降低，否则积极性就不高了。这个工作很重要，这个部门很重要。

---

① 指1997年2月18日《国务院批转财政部关于对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基金失业保险基金开展专项财务检查情况报告的通知》。

第四个问题，就是关于“收支两条线”和财政专户的问题。 刚才我听你们在发言中，对这个问题还不太清楚。为什么要实行“收支两条线”呢？一个是不从养老保险基金里面提取管理费，改由财政解决，实际上是增加了养老保险基金。另一个是防止挤占挪用这个基金，建立财政专户，加强财政监督，动用这个钱要经过财政部门审核。劳动部门有支钱的权力，但财政部门要监督它支钱的用途，这样就多了一层制约机制。社会保险管理部门不能随便提这个钱，不管是省委书记指挥还是省长指挥都不行。如果财政部门用了这笔钱，那是监守自盗、执法犯法，当然不行。现在大家担心，这样做又增加了一个管理层次，会不会影响工作效率？钱存在银行，支出时由社会保险管理部门开单子、财政部门审核，分工负责，我想是不会影响工作效率的。“收支两条线”就是这个意思：收多少钱，由社会保险管理部门开单子，才能够收到财政那个专户里面，才能够进入银行；用这个钱，也是由社会保险管理部门开单子，经财政部门核准，再由银行支出这个钱。财政监督就这一条：不许把钱支到别处去，拿这笔钱搞投资、炒股票，挤占挪用绝对不行。至于这个钱怎么收法，请你们商量，是税务部门代收好，还是劳动部门一家一户去收好？还是银行代扣好呢？请财政部、劳动部、人民银行总行、税务总局共同会商这个技术问题怎么解决，具体办法也不一定强求全国统一。至于这个钱算预算内的还是预算外的，就不要抠这个问题了，肯定不是预算内的，不会拿这个钱去平衡财政预算的。反正是要财政部门监督这个钱。财政监督这个钱不需要

那么细，细节是社会保险管理部门管的事。请大家把这个事情想通一点，把养老保险这个事情管好。今后，我希望财政监督、审计监督，还有社会保险管理部门自己的监督，都要加强。社会保险管理部门上一级对下一级要加强监督，大家共同把这个钱管好、用好。我认为，目前还不至于发生养老金支付不足的问题，但恐怕会越来越困难，所以现在这个工作要抓紧。

同志们，建立统一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这项工作意义重大，如果不把养老保险和其他保险建立起来，国有企业改革就没有希望，改不下去。为什么呢？要改革就必须减人，没有社会保障制度减得下来吗？所以，社会保险是非常重要的，关系到我们国家的发展。现在，外国人讲我们的宏观调控、“软着陆”有历史意义、世界意义。我看评价过高了，但确实成绩不小。他们唯一能批评我们的问题，就是说国有企业搞不好、搞不活，但我看国有企业是有希望的。之所以国企改革步子不能大，就是因为我们没有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今天，国务院为什么要来这么多人，苦口婆心地给同志们讲政策？就是希望这项工作能够开创一个新的局面。

棉花多了是一种愉快的负担

(1997年8月26日)

1997年8月25日至26日，国务院在北京召开全国棉花工作会议。出席会议的有部分省、自治区、直辖市主管负责同志，计划委员会(计划经济委员会)、供销社及棉麻公司、农业厅(局)、纺织厅(局、总会、总公司)、工商局、农业发展银行分行负责同志；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及新闻单位的负责同志。这是朱镕基同志在会上的总结讲话。

这次国务院召开的全国棉花工作会议，开得很好，充分肯定了棉花工作的成绩，对存在的问题分析得很清楚，也提出了解决的办法。国务院非常重视当前棉花工作中存在的种种困难，认为这些困难是大好形势下出现的困难，是一种愉快的负担。说来说去与粮食一样，棉花多了也是暂时多了，由此带来的一些问题总是好解决的，总比缺棉花好。下面，我讲几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关于当前的棉花形势。 当前的棉花形势跟全国总的经济形势一样，是一个好的形势。棉花供应不但保证了纺织工业和其他方面的需要，而且还有富余，棉花质量和流通方面的工作也都有进步。所以，我们对供销社和纺织企业及其他各个方面为此付出的努力和取得的成绩，应该充分肯定，大家绝不可灰心丧气。就当前棉花的供求关系来讲，尽管是供过于求，但是这种供过于求的形势正在逐步缓和，不是越来越加重。今年的棉花虽然还是供过于求，可是预计比去年好，因为今年的产量比上一棉花年度减少1130万担，尽管进口棉花多了几百万担，可能达到1600万担，但纺织工业的需要也增加了几百万担，所以供过于求的情况会继续缓和，这个问题还是能够解决好的。这就是总的估计。

第二个问题，在棉花供过于求的形势下，绝不可动摇党中央、国务院既定的棉花工作方针政策。 这些方针政策概括起来，就是我们每年全国棉花工作会议都强调的“三个不放开”。棉花是战略物资，而且是农民的主要收入来源之一，如果把它放开，工作就乱了，就很难收拾

了。这几年，我们的政策是成功的。在1994年以前，棉花还是短缺的；1995年提高收购价格以后，棉花是增产的。当然，现在纺织企业不景气，纺织企业产品出口碰到很大阻力，使用化纤的比例又大大提高，棉花相对地就多了，需要进一步采取宏观调控措施。但是不能否定成绩，不能否定“三个不放开”的政策。棉花提价的政策，是保护农民利益的政策，是正确的。棉花收购价格现在看似乎提得多了一点，对此，有个认识过程，而且事情的发展往往是出人意料的。我记得1995年召开全国棉花工作会议研究提高棉花收购价格时，国务院决定提到700元1担，每担提高100元。大家都不满意，认为提得太少。有些省给每担又加了150元。我们知道后发了通知，要求纠正。现在回过头来看，1995年提高棉花收购价格是提得多了一点，但当时并没有超出国际市场价格。后来，国际市场棉花价格逐步下降，进口棉涌进来了。总体上看，700元1担，内地棉农并没有得到很大利益。但对新疆就不一样了，新疆气候好，棉花的产量高、成本低，农民的收入提高很多，所以不用提到每担700元，每担630元就够了，另外70元用来补粮、补水、补化肥。这也是国务院同意的，新疆有它的优势。内地的棉花单产低，病虫害的问题解决不了，投入很大，收购价格提到每担700元，农民也赚不了多少钱。所以，现在不要埋怨1995年提价提多了。总的看，宏观调控的方向和政策是正确的，但各种因素有时很难预料。我们作每种决策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在当时的情况下，也只能那样办。现在出了些问题，想办法解决就是了。现在棉花供过于求，千万要坚持敞开收购。因此，我们又加了 “四不”，即不拒收、不停收、不限收、不压级压价和抬级抬价。加上“三个不放开”，概括起来就是坚持“七个不”。现在粮食收购、棉花收购，基本上不存在“打白条”问题，只有挪用收购资金的问题，所以就没有必要强调不“打白条”了。

刚才听取会议情况汇报，大家对敞开收购棉花好像有点情绪，认为是国家叫供销社敞开收购，结果发生一系列问题又不帮助解决。我看，大家的认识应该端正一下。敞开收购棉花不仅是党中央、国务院的要求，这也是形势的要求。大家仔细想一想，要是不敞开收购，会是什么后果？如果现在棉花多了，供销社不收，大量的私商，各种各样的公司、纺织厂，都会到农村去收棉花，那怎么得了！他们的费用还比供销社的低。棉花产量最高的年份是1984年，收购了1.15亿担棉花。1983年也是丰收，收了9000万担。1990年也收了1.05亿担。今年到

现在才收了5300万担棉花，数量降了一半，但经营人员没减，反而大大增加了。全国供销社有60多万人经营棉花，过去收上亿担也是这么多人，现在棉花少收了一半，人却比过去多了，费用怎么能不高？费用高了，价格怎么能有竞争力？如果放开棉花，供销社的棉花销售只会更加困难，棉花供应就乱了，价格也稳定不了。所以，坚持“三个不放开”政策、敞开收购棉花，既是国家利益之所在、保护农民利益之所需，也是保护了供销社的经营地位。希望大家认真贯彻现行棉花工作方针、政策。价格不能变，服务态度还要好，敞开收购，资金一定会保证，但一定不能挪用。

第三个问题，采取什么办法缓解棉花供过于求的矛盾和供销社的困难。 根本的出路在于改革。供销社的棉花购销体制和粮食购销体制一样，都需要改革，要改变吃“大锅饭”的习惯，改变人浮于事的状况。棉花供应价格再提高不可能了，今年国际市场棉花价格可能还要下降。要保护农民的利益，收购价格又不能降低，怎么办？首先，要降低供销社的流转费用。收购价定死了，只有降低费用，供应价才能降低，就可以和进口棉花竞争了，这样才能解决供销社的困难。目前流转费用占棉花价格的比例相当高，达到21%。当然，这里面包括税收和银行利息，但总还是可以降低的。降低费用就能降低供应价，农民和供销社的利益就能得到保护。怎么降低费用呢？就是要改革棉花购销体制。供销社的改革问题不是这个会议的主题，要进一步研究。但还是要提出这个问题，请大家考虑。我听到很多反映，就是地方政府强迫供销社把棉花赊销给当地的纺织厂，这些纺织厂的产品明明没有销路，但是还得开工。这是做无本买卖，这不是吃国家吗？造成供销社从今年1到7月份亏损9.7亿元。供销社的体制改革就是要防止吃国家的“大锅饭”，但是需要从长计议。目前可以做的就是下岗分流、减员增效，这是党中央、国务院对于搞好国有企业的一个大的方针。供销社是集体所有制性质的，但也要执行这个方针，防止吃国家的“大锅饭”。

在减员增效、减少流转费用的基础上，把棉花的供应价格再降低一些，但降低到亏损也不行。国务院几次开会，建议把供应价从过去的允许上下浮动4%，改为可以上下浮动6%以内，这样有利于棉花的促销。但是，这次会议上很多同志强烈反映，下浮4%，已经亏损得厉害；如果下浮6%，会亏得更多。同志们别误会了，不是非要你下浮

6%。如果你减员增效、降低费用的工作做得好，就可以下浮到4%，甚至6%，但没有指令性的意思。最近，我们开会研究，建议新疆从每担70元价差收入中让出一部分，使棉花供应价格降低。后来我给王乐泉①同志打电话，他同意从用于补粮、补水、补肥的每担70元中让出60元；除此之外，供应价再下浮4%。这就是说，1担棉花可降低供应价90元，等于1吨棉花降了1800元，这大大有利于新疆棉花的销售。我认为，新疆的同志是顾全大局的，这样做有利于扭转当前的困难局面，这是个很好的政策。新疆的同志提出，希望国家在新疆棉花基地建设上给予一定的支持，给一点贴息贷款，这是可以的。当然，这种支持要和全国棉花种植面积的结构调整结合起来，统筹规划。国内棉花的供应价格高了一点，进口棉花在这两年大大增加了，加工贸易方兴未艾，进口棉花有逐步取代国产棉花之势。这很危险，是个很大的问题，必须采取措施，把进口棉花顶出去，任何一个国家都会这样做的。今年进口的1600万担棉花只要顶出去800万担，全局就活了，很可能供销社就不会亏损或不会亏损这么多了。怎么顶？需要做好集中统一管理这件事。进口棉花的包装、质量管理比我们规范，价格比我们低，还有其他很多优势。因此，采取行政的办法，作用不太大，只有用经济的办法。我们应认真地、全力以赴地做好这件事情。

---

① 王乐泉，当时任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书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一政委。

要先用新疆棉花去顶替进口棉花，因为新疆棉花质量好、等级高；另外，集中统一管理比较容易。国务院决定这件事由国家经贸委牵头具体组织落实，要把它办好。要逐个开出原来的加工企业名单。新的进料加工、来料加工企业一律不批，不要增加。现在最重要的是保证国产棉花价格低于进口棉，其他条件我们要尽量做得和进口棉一样，有的可能一下子做不到，但价格一定要低。要做到这一点，新疆棉花就有这个优势，供应价1吨让了1800元，比进口棉还低一点。进口棉花不含税，我们的也不含税，棉花经营环节的增值税税率现在是3%，免掉或退税。加工环节的增值税税率是8%，也退税，对外讲就是零税率。有的纺织企业提出，现在光是来料加工、进料加工企业享受这个优惠政策，我们的产品是出口的，用的也是国产棉，是不是也给我们

这个优惠条件？同志们，现在不行。国家没有那么大的力量，退税只能限定在1600万担，不能扩大此项政策的范围。纺织企业现在用国产棉还能出口，就继续改善经营管理，搞好工作。另一方面，也不批新的加工贸易。这是我们这次全国棉花工作会议提出的一个非常重大的政策措施，主要与新疆棉花有关，但我想，对全局都是关系重大的。这一着棋走好了，全盘就活了。希望大家同心协力把这件事情办好。



1997年1月25日，朱镕基在四川省重庆市第三棉纺织厂考察。左一为重庆市代市长蒲海清。

第四个问题，棉花质量公证检验的问题。 我们考虑到，棉花特别是顶替进口棉的那部分，一定要保证质量。不是说别的棉花不要保证质量，而是这一部分更要保证。在供销社的检验之外，再经过一道国家纤维检验局的抽检。加强对棉花质量的监督检查，我认为只有好处。经过这一道监督检验，我相信对棉花质量的提高会有很大好处。同时还要规定一条，如果加工企业发现棉花掺杂使假，可以索赔，因为抽检总不能包包都检嘛。要从各方面规定严格的制度，把进口棉顶出

去。因此，我们决定对新疆棉花顶替进口棉的那部分，今年作为试点，实行质量公证检验，试点成功了再推广。同志们对这一点要想通，不是再增加一道环节。这一道质量公证检验不收费。不收费，很多矛盾就没有了。我们要求国家纤维检验部门提高工作效率，不要影响交货进度。这件事对棉花销售部门是有好处的，是帮你们把关的，你们的检验再好，也难免有问题。

第五个问题，关于发展棉花交易市场。 这是深化棉花购销体制改革的重要方面。我们希望所有流通的棉花都进入交易市场，规范化、经常化，不是一年开两次棉花交易会，而是要办成经常性的棉花交易市场，国家也便于监管。所有纺织企业、县以上的供销社都能进入这个市场。严禁纺织企业到农村去收购棉花。为了把棉花交易市场搞好，为了吸引大家到这个交易市场来，我们确定了一条：只有到交易市场买棉花，银行才提供贷款。工商银行要常年派驻人员在交易市场，对于是什么单位、到哪里去买棉花、代表哪个棉纺厂，银行应审查。你这个厂有多少库存，在一个半月库存内，银行都提供贷款，成交马上就给钱。库存超过一个半月，那就要看你是不是倒卖。倒卖绝不允许。正常生产需要的棉花，在交易市场成交，工商银行要尽可能保证贷款。当然，对那些根本就不能还贷款的纺织企业、纺织品根本就没有销路的企业，不能提供贷款。贷不贷款，工商银行要与中国纺织总会配合好，了解支持哪些厂子生产，哪些厂子不鼓励它们生产、要压缩。办好棉花交易市场不是供销合作总社一家的事情，中国纺织总会要大力支持，有关部门要积极配合。交易市场要办得规范化、现代化，信息很灵通，各项制度很完备。

第六个问题，关于纺织企业的压锭改造。 1991年开全国纺织工作会议，当时全国有4000万锭子，我就提出至少要压缩1000万锭。从1991年到现在6年，压了200多万锭，又增加了200多万锭，还是4100万锭，纺织工厂哪能不困难？哪能不亏损？今年1到7月份，纺织行业还是全行业亏损。除了压锭以外没有别的办法，再往里投钱，都是白投，救不活的。再去投资，再去改造，我说不如拿这个钱去安排下岗工人。所以，我希望中国纺织总会把这件事情搞好，三年内一定要压缩1000万锭，不能再耽误了，决心要大。我也知道这件事情不容易做，难度

很大，但是不要怕困难，要坚定不移，要做“恶人”，光做“好人”是不行的。

第七个问题，继续调整棉花生产布局，加大科技兴棉的力度。现在看起来，我们确实应该利用地理环境的优势，哪个地方适宜种棉花，就多种一点；哪个地方不适宜种棉花，就改种粮食或其他作物。这与70年代、80年代，甚至50年代、60年代完全不一样了，那时千方百计要大家种棉花。现在看起来在某些地区，病虫害的问题解决不了，投入很大，用工很多，棉花的单产很低，风险很大，农民增加不了多少收入，还不如种粮食。早几年，我们不敢说这个话。现在，新疆棉花发展起来了，有条件了，可以更好地优化种植结构。我始终认为粮食是不怕多的，因为可以转化。老百姓生活水平提高了，都想吃肉、吃鸡蛋，往蛋白质一转化，粮食就又不够了。棉花怎么转化呢？卖不出去就没办法。所以我看，要做好规划，集中搞好新疆棉花基地。新疆是一个很重要的地区，我们要帮助它发展经济，帮助它种棉花。它有种棉花的优势，符合经济规律。别的地方，要根据市场信息，能够销多少棉花就种多少棉花。不适宜种棉花的地方不要强迫农民种。其实，农民还是很了解信息的。只要政府不瞎指挥、瞎干预，农民是会根据市场信息调整种植结构的，但我们最好还是要有一个规划。

总之，希望大家兢兢业业把棉花工作做好，对棉花工作，我始终是乐观的。只要把顶替进口棉这件事办成，做好今年棉花工作就有一半的把握，局势就可能扭转。

搞股份制不要刮风

(1997年9月10日)

这是朱镕基同志在北京中南海接见省部级干部财税改革与发展专题研究班学员时讲话的一部分。这期研究班由国家行政学院、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联合主办。

昨天闭幕的党的十四届七中全会，通过了党的第十四届中央委员会向十五大的报告和《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这两个重要文件树立了邓小平理论这面旗帜，同时在理论方面有新的发展，尤其在所有制的理论上有创新。就是说，公有制成分不能只算国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企业，在非公有制企业中间，国家和集体的股份也应该算做公有制成分。对这个说法大家同意，但是过去没有讲，现在正式明确了。

有人说，现在国有企业的比重越来越小。1991年，我调到国务院工作时，在工业领域，国有企业占55%，集体所有制企业大约占35%到36%，私有企业以及外资企业等各种非公有制企业大概占不到10%，90%以上是公有制企业。从当前的情况看，国有企业只占三分之一了；集体所有制企业的比重没变，还是三分之一；中外合资企业和私有企业也占三分之一，三分天下有其一，这个变化很大。可以预料，今后国有企业的比重还会下降。对这种情况如果不在理论上作出明确的回答，就会有人认为社会主义的力量在削弱，私有化程度在提高。党的第十四届中央委员会向十五大的报告对公有制为主体、国有经济为主导，以及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体现在哪些方面，都作了过去所没有过的阐述。就是说，主要不在于公有制的比重，而在于它的控制力。

如何界定股份制企业？股份制是企业的一种组织形式，资本主义可以利用，社会主义也可以利用，关键看谁来控股。如果是由公有成分控股，这个企业还是公有制为主的企业。这个问题中央讨论多次了，但如果简单地把由国家或集体控股的股份制企业说成是公有制企业，就与《宪法》中界定的公有制企业即国有企业和集体所有制企业不一

致，而且，现在又没有到修改《宪法》的时候。因此，党的第十四届中央委员会向十五大的报告中做了很巧妙的处理，即认为由公有成分控股的股份制企业带有明显的公有性。这样，既没有越过《宪法》的界限，又突破了原有的概念。我看，这就是理论的创新。

我讲这个问题的意思是，请你们回去后给你们省委的领导带个话，党的十五大后，不要刮风。所有制理论有所创新，但并不是要在党的十五大以后刮起一股搞股份制的风。如果把着眼点转到这方面来，那就是对党的十五大文件没有全面理解。现在，这股风已经刮起来了。有的地方领导提出要以最快的速度完成股份合作制；有的地方甚至层层开会，布置进行股份合作制改造，引起了群众的不安。这个苗头很值得重视。大家可以看看我去山东诸城调查后的讲话，已用简报形式发到各地区。诸城的经验并不成熟，里面有好多问题，怎么能用来规范全国呢？去年报纸上宣传诸城的做法，很多同志有不同意见。有人提出，究竟是资本的联合还是劳动的联合？如果是劳动的联合，那就是“一人一票”；如果是资本的联合，就是“一股一票”。股份合作制究竟是“一人一票”还是“一股一票”？如果是“一股一票”，领导干部买那么多股，就是分配不公。我主张要探索、要试验、要不断实践，不要一下子刮起风来。不是说每个职工都占点股份，职工就能关心这个企业，企业就办好了，这种理论已经很落后了。党的第十四届中央委员会向十五大的报告对股份制的提法是经过多次研究和修改的，讲得是很有分寸的，没有过分地强调股份制，只是讲它是一种新事物，要引导，更没有讲全面推广。

当然，这次刮风与我们的舆论导向也有关系。不要去连篇累牍地宣传外国的股份制。外国的股份制能搬到中国来吗？何况股份制在 国经济中也只是占一部分，上市公司更是其中的一小部分，怎么能把它当做资本主义现代企业制度的普遍形式呢？靠股份制增点资，解决不了国有企业的问题。当然，可以利用股份制这个形式，但不是“一股就灵”，就能把国有企业当前的问题都给解决了。要看到当前国有企业的困难是历史遗留下来的，重复建设，没有市场，供过于求。现在只能靠“两个根本性转变”、“三改一加强”，兼并、破产、再就业，只能向这个方面去做。要认真贯彻中央关于搞好国有企业的方针，也包括“抓大放小”。“放小”可以有多种形式，可以是股份制、股份合作制，也可以

把企业卖掉，进行资本重组。变现很难，卖给谁？ 一堆破铜烂铁。一强调变现，就变成了变相的股票市场，搞产权交易变成发股票，这就不对了，就乱套了。如果到处都是股票交易所、产权交易所，那怎么行？股票不是那么轻易可以搞的，不要以为股票的钱来得容易，资产评估是1元，一发股票就变成6元、10元了，根本不是这么回事，那是因为中国的股票市场没有规范。而我们最担心的是现在发行的股票好多是“垃圾股”，将来一破产，对股票市场造成的影响到底会有多大难以预料。现在就要改变做法，让规模比较大的国有企业上市。现在，很多国有企业都亏损，没有盈利怎么上市？只有采用兼并的办法，让效益好的国有企业先去上市，筹集了资本再来兼并亏损的国有企业。

对国有企业的认识要实事求是。现在国有企业搞不好，不完全在于产权不明晰，主要是政企不分。企业没有真正自负盈亏，政府在那里指挥，上这个项目、上那个项目，只顾扩大企业规模，根本不看市场，这怎么能把企业搞好呢？如果企业产品没有市场，一亏损，政府不负责行吗？问题就在于此。如果真正地自负盈亏，这个企业的产品没有市场就得破产，把厂长都得给换了。现在不敢换厂长，因为企业是根据政府的意见上的项目，一旦不行了，能要企业负责吗？所以，政企不分的问题不解决，国有企业永远办不好。

在何梁何利基金一九九七年度 颁奖典礼上的讲话

(1997年9月23日)

1997年9月21日至23日，应世界银行行长詹姆斯·戴维·沃尔芬森邀请，朱镕基同志专程到香港主持于9月22日举办的21世纪中国经济发展高级研讨会，并于其间出席了香港何梁何利基金1997年度颁奖典礼。

今天，我以非常激动的心情来参加何梁何利基金①1997年度颁奖典礼。我以最真诚的感情，向获奖的科学家致敬！向何梁何利基金的创始人和他们的家属致敬！向以负责的精神付出辛勤劳动的何梁何利基金评选委员会、信托委员会、投资委员会和基金办公室的全体人员表示衷心的感谢！

---

① 何梁何利基金，是香港金融家何善衡、梁銶琚、何添、利国伟各捐资1亿港元，于1994年3月30日在香港注册成立的民间科技奖励基金。

何梁何利基金的成立，最早的倡议人是利国伟先生。他在1993年秋天跟我谈起这件事情，我认为这是非常有意义的，当时就指定国务院副秘书长徐志坚先生负责筹备这件事。由于利国伟先生的推动，又有何善衡、梁銶据、何添三位老先生积极参与，共同创立了这个基金。我想这是他们出于对祖国的热爱，也是对我本人的信任。能够办成这个基金，我感到非常高兴。

现在看来，这件事情办得很好。以科技为题，这个题目就很好，因为中国现在最需要的就是科技。昨天晚上，我会见了世界银行行长沃尔芬森先生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康德苏先生。康德苏先生问我：你现在最发愁的是什么问题？我说：现在最发愁的问题恐怕是中国人太多了，如果中国的人口跟你们法国一样多，我们就没有什么大的问题了。人口多，是我们经济发展中一个非常重大的问题。人均土地不多，资源有限，需要就业的人很多，这就是问题之所在。我访问澳大利亚时，对他们说，上帝太偏爱你们了，把铁矿等丰富的自然资源都

放到你们这里，本来是应该放在我们那儿的。我们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包括现在国有企业的困难，一个主要原因就是人太多了，一个人的饭三个人在吃嘛！

但是，人不是包袱，而是宝贵的财富。我们的问题在这个地方，我们解决这个问题的力量也在这个地方，因为中华民族不但是勤劳、勇敢的民族，而且事实证明也是聪明的民族。我不是在这里鼓吹什么民族自大的情绪，我只是讲我们应该有信心，中国人民是属于最聪明、最有才智的民族。过去因为没有受到良好的教育，所以他们的潜质发挥不出来。我们只要重视发展教育、科技，中国就会涌现出很多人才。坐在主席台上的杨振宁①先生不就是证明吗？在座的各位科学家不也是证明吗？其中有我的老师钱伟长先生，他是我在清华大学念书时候的老师。我今天给老师颁奖，您永远是我的老师。我的所作所为，要对得起您这个老师。要充分发挥中国人民的聪明才智，就是要发展教育，要提倡科技，鼓励教育事业，鼓励科技事业。只要我们的教育和科技发展起来，任何问题都可以解决。

---

① 杨振宁，美籍华人科学家，在1957年与李政道共同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

在发展教育和科技上，香港比我们做得好。董建华①先生告诉我，香港财政预算中科技和教育资金的比重是大于内地的。当然，我们还有一些特殊的情况，数字不完全可比，但是，我们总是要朝增加教育、科技投入这个方向去努力。

---

① 董建华，当时任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

我们也非常高兴这次颁奖典礼能够在香港举行，而且是在回归祖国以后的香港举行。现在是在中国的土地上，由中国人成立的基金，发给中国的科学家，我认为这是非常有意义的。

大家都知道，现在世界科技突飞猛进。如果我们不在科技上下工夫，迎头赶上，我们只会永远落后。相反，如果我们采取迎头赶上的政策，我们有我们的优势，我们没有旧的包袱。朋友们，在信息产业

的发展方面，中国是有成绩的，现在全国程控电话的数量已经达到1.1亿线，仅次于美国，而且每年还以2000万线的速度在增加。特别是移动电话发展得更快，已经达到1000多万台，这就是迎头赶上。

何梁何利基金以鼓励祖国的科技人才为目的，我想将来会越来越有意义，而且，它的影响、作用会越来越大。为了表达对四位老先生及其家属的敬意，我来之前，请中央文史馆的老先生作了几幅画，送给四位老先生和他们的家属。我在上面写了几句话："高谊可风，功在当代，泽被长远。"

我在这里推崇何梁何利基金，同时也推崇香港许多热心发展祖国的经济、文化、教育、科技事业的一些知名人士、爱国同胞。他们在这方面作了很大的贡献，成立了许多基金，对祖国的经济、教育、文化事业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我在这里对他们也表示真诚的敬意！

最后，为了表达我们对科学家们的崇敬心情，表达我们对来宾们的感谢，我刚才和董建华先生商量，我们要和大家一一握手。请你们在原地不要动，我和董建华先生走下来，我代表国务院，董建华先生代表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对大家表示衷心的敬意。

对“卖企业”问题的批语

(1997年9月26日，1998年4月25日、6月6日)

这是朱镕基同志对“卖企业”问题的三次批语。

一、1997年9月24日，香港《信报》财经新闻版《广州首次成功售出亏损国企》报道，广州异型钢材厂在广州产权拍卖行拍卖，由广州轻工机械集团联手广州钢管厂以5000万元投得(拍卖价为4650万元)，此拍卖款5000万元，扣除清算费用后，3000多万元作为原职工安置费；再扣除所欠税款，余额按比例偿还给债权人。债权人多为其他国有企业，部分债权人所得赔偿额低于原债项一成。这是朱镕基同志对此事的批语。

二、1998年4月24日，全国党建研究会副会长蒋振云给宋平同志写信，反映一些地方的领导同志认为国企改革重点是产权改革，主要方式是出卖，“放小”原则上是非国有化。宋平同志将信转送朱镕基同志。这是朱镕基同志对此事的批语。

三、这是朱镕基同志在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简报》1998年6月5日第58 期《〈中国垒济时报〉5月7日报道河南沁阳企业：差的送好的卖》一文上的批语。

一

(1997年9月26日)

邦国①同志：

① 邦国，即吴邦国。

如果报道属实，此种“拍卖”，实际上是冲债。部分债权人所得赔偿额低于10%，等于把银行和其他国有企业(我估计中央直属企业居多)的债权基本一笔勾销。如果推广这种做法，势将引起金融秩序的混乱。其实这种国有企业之间的资产转移，完全可以采取兼并的办法，银行

贷款可以停息5～7年，但要还本，保留债权。希望经贸委了解一下具体情况，不要一下铺开。请酌。

朱镕基

9.26

二

(1998年4月25日)

请岚清①、邦国、家宝①、吴仪、忠禹①同志阅示，并请经贸委、体改办、研究室研处。此事政策性很强，不能搞运动、不能刮风，也不要把“抓大放小”和“下岗职工再就业工作”放在一起来动员。报请泽民①同志审阅。

---

① 岚清，即李岚清。家宝，即温家宝。忠禹，即王忠禹。泽民，即江泽民。

在附件上“‘放小’就是原则上实行非国有化。方式方法，应以产权制度改革为突破口，以出售转让为主要内容，以股份制和股份合作制为主要形式，把竞争性行业中的国有小企业产权转让出去或彻底退出……”处批示：“抓大放小”，抓大是重点，放小也不只是拍卖、出售一种方式。出售中小企业不是当前的“主要任务”，更重要的是抓下岗职工的基本生活保障和再就业工作。

朱镕基

4.25

三

(1998年6月6日)

请岚清、邦国、家宝同志阅。并请马忠臣①同志一阅。把国有企业改革的庄严任务，简单化为“卖企业”，而且是半送半卖，还美其名为“改革”，这股风也不知是从哪里刮起来的。要煞一煞才好，否则将直接干扰当前下岗职工再就业的工作。

朱镕基

6.6

① 马忠臣，当时任中共河南省委书记、河南省省长。

邦国同志：如果报导属实，此种"拍卖"，实际上是一种赖债，部分债权人所得赔偿低于10%，等于把银行和其他国有企业的债权基本一笔勾销。如果推广（我估计中央直属企业居多）这种做法，势将引起全局性秩序的混乱。其实这种国有企业之间的资产转移，完全可以采取兼并的办法，银行贷款可以停息5—7年，但要还本，保留债权。希望经贸委了解一下具体情况，不要一下铺开。请酌。

朱镕基 6.26

基本医疗保障要低水平、广覆盖

(1997年10月27日)

这是朱镕基同志在听取国务院职工医疗保障制度改革试点领导小组组长、国务委员彭珮云工作汇报后的讲话，曾发表于《新时期劳动和社会保障重要文献选编》，原标题为《关于职工医疗保障制度改革问题》。编入本书时，对部分内容作了删节。

医疗保障制度改革工作的难度较大，比养老保险的难度还要大，因此，目前存在的问题还很多。我们要在深入调研的基础上，制订一个切实可行的、全国统一的职工医疗保障制度改革方案。下面，我就你们提出的问题讲一点初步的看法。

一、要确定基本医疗保障水平

如何确定基本的医疗保障水平，是整个医改方案成败的关键。李鹏总理一再强调，中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建立社会保险制度宜十分慎重，不能与发达国家攀比，只能提供基本保险。在我国目前的国情下，任何社会保险制度都只能有一个最基本的保障水平，既不能向美国、欧洲看齐，也不能向一些东南亚国家看齐。我们没有这个能 力，无论如何做不到。中国目前还建立不起一个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没有钱呀！那些发达国家把大量的财政支出用于社会保障，不工作的人甚至比工作的人待遇还高，没有谁上台后敢降低这个保障水平。如果谁把这个保障水平降低了，谁很快就会下台。所以，他们的社会保障水平越抬越高，他们的许多领导人都越来越认为这已成为政府难以摆脱的重负。我们要吸取这一教训。我们不可能建立这样的制度，因为没有这个财政能力。中国有12亿人口，要从大多数人民的角度去考虑问题，从实际出发。目前，在我国建立社会保障制度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符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只能确定一个最基本的、低标准的保障水平。中国人口这么多，每人标准提高1元钱，就是一个大数目。标准搞高了，实际上落实不了，最后就会变成国家的负担，增加财政赤字。对这个原则一定要搞清楚，对这个问题必须统一认识。

怎么确定基本的医疗保障水平？我认为医疗保险筹资不能根据需要，只能根据可能。因为现在医疗不但可以换血，甚至可以换肝、换肾，检查设备日新月异，医学技术日益进步，只要多花钱，许多病都可以治，但是我们实在负担不起。这不是说不能使用某种医疗手段，而是说必须从另外的渠道去筹钱，基本医疗保障制度里面没有这个钱。根据可能筹资，就是根据大家现在能够负担得起的数额来确定基本医疗保障制度的筹资水平，多了做不到，因为社会统筹主要是靠大家交钱，共济互助。如果缴费比例定高了，不仅有相当一部分亏损企业交不起钱，就是效益好的企业也不愿多交钱。所以，与其定一个比较高而实际上收不到钱的标准，还不如先不要提高这个标准。如果去年全国平均医疗费支出大约是工资总额的9%，那么目前，社会医疗保险的筹资标准绝对不能定到工资总额的10%以上，只能是10%以下，恐怕还是先定6%左右为好。现在企业亏损面为百分之四十几，全国情况复杂，地区差别很大，定一个统一的标准，只能是就低不就高，有条件的地方可以另外采取其他办法提高医疗保障水平。今后，随着生产的发展和职工收入的增加，基本医疗保障水平可以逐步提高，筹资比例也可以逐步提高。但现在很困难，做不到，起码三年以内难以做到。三年以后大部分亏损企业扭亏了，情况会有很大的改变。

二、要严格控制医疗费用开支

社会统筹医疗基金十分有限，在使用上一定要控制支出。大病花统筹基金要有个封顶线，原则是尽量保证不要超支。经过测算，确定了一个社会统筹医疗基金最高支付限额。要说明总共就这么多钱，每个人只能花一定的限额，超过这个限额，没有办法支付；否则，如果无限制地从统筹基金里拿钱，就会难以为继。封顶要讲出去，各地都要下这个决心；否则，医疗保险搞不下去。有的地方不敢封顶，那就只能自己背包袱，中央财政没钱可补。

为了把统筹医疗费支出控制在封顶线以下，从一开始就要控制，而不是到最后再来控制。应该对基本医疗作一个界定。比方说，做X光检查可以从社会统筹基金里报销，不另外缴费。如果要做CT检查或者做核磁共振检查，社会统筹基金就不能负担所需的全部费用，自己要交一部分钱。前些年，CT设备的进口没有控制住，据说，现在某些大城市里设备的密度甚至超过了发达国家的城市。CT、核磁共振设备很

贵，不少医院为了把买这些设备的钱收回来，对不需要用这些设备做检查的项目也让病人做，反正是公费医疗出钱，现在这种现象很普遍。应该规定，要做高级的检查或是高级的手术，费用就不能都由统筹基金支付。要求越高，自付的钱就越多。只有这样，职工用钱才会十分小心，不是大病，不去多开药，把钱省下来，准备一旦得了大病，可以有相当数量的钱。这样，才能保证社会医疗保险真正兑现。总而言之，要控制基本医疗保险费用，控制吃“大锅饭”，任何方案都要考虑这个问题；否则，这个改革方案就没法实行。基本医疗保障就是基本的、低标准的，这是全社会统筹，职工人人都可以享受，但标准是要有限制的。

三、要解决几个有关的问题

首先，要研究怎样解决基本医疗保障以外的医疗需求问题。按照低标准的基本医疗保障水平筹资，显然不能完全保障广大职工的健康，这是实际问题。但是，在我国目前的条件下，社会公共福利只能先做到这一点。在这个低标准的基本医疗保障水平以上的医疗需求怎么办呢？我看，就要靠商业保险、企业补充保险和社会救济这三个渠道。搞商业保险，就是说单位和个人如果有钱，可以到商业保险公司去买保险。外国都是这样做的，只要买了商业保险，一旦得了病，保险公司就会按规定支付医药费。现在我们的保险公司还没有普遍开展这项业务，以后要仿照一些发达国家保险业的做法大力开展。如果一个盈利的企业过去花费的医疗费多，现在的基本医疗保障水平低于这个企业原来的医疗支出费用，企业还有余力，那就可以拿出来给职工作为医疗补助费用。采取什么形式补助都可以，例如小病可以在企业的医院、门诊部(所)看，医药费在工厂的福利费内报销，或者发给职工本人都可以，总之，从福利费里支出。企业的税后利润可以由企业自己支配，这是他们的自主权。亏损企业的职工超出基本医疗保障水平以外的医疗需求怎么办呢？只能通过社会救济。我们也要建立慈善机构，提倡搞社会捐赠。我们要号召那些收入较高的工商界人士，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搞一点捐献，参加一些慈善事业。社会捐赠可以免缴所得税，捐赠者的名声和社会形象也好。地方收缴的个人所得税，也应拿一点出来用于社会救济。这个问题需要从长计议，提出要求，也要有配套的政策。

第二，要扩大基本医疗保险的覆盖面。我们的方针是“低水平、广覆盖”。既然确定了一个比较低的基本医疗保障水平，就应该覆盖全国；在一个城市范围内搞，就应该覆盖全市。要实行属地原则，不管是中央单位还是地方单位，一律参加医疗保险，“三资”企业也要参加。医疗保险不要像养老保险以前那样搞部分行业统筹，基本医疗保险从一开始就要全面覆盖，各个行业都必须缴纳基本医疗保障基金用于社会统筹。尽管目前困难很多，但是医保基金一律要缴，包括亏损企业，因为确定筹资标准时，已考虑了亏损企业的情况。企业亏损、破产、兼并，都要保证职工的基本生活水平，其中应包括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本来上海保障下岗职工的基本生活水平，每月250元就够了，因为还要代缴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所以，一个下岗工人一年需要4000多元。上海的做法是企业负担三分之一，地方财政补贴三分之一，从外来劳务人员交的管理费中出三分之一，用于补贴下岗工人。这就是说，不管企业如何亏损，医保基金一定要缴纳。地方政府应该帮助企业解决这样的问题。

第三，机关与企业的医疗保险相比要有不同的办法。筹资标准可以一样，但具体做法要有所不同。特别是当前机关干部的工资水平比较低，在制订医疗保险方案时，不能不考虑这个现实。机关与企业缴纳基本医疗保险金的标准应该一样，机关干部超出基本医疗保障水平以上的必需的医疗费用要由财政拿钱。以往国家为机关干部付出的医疗费用不能减少，而且还要逐步有所增加。目前，搞医疗保险不对机关干部有点照顾会不得人心，实际上也是不公平的。对离休人员的医疗保障更要有所照顾，无论如何，不能降低他们现在已经享有的医疗待遇。但这笔钱不能从统筹基金出，财政要拿钱，这是历史的补偿。人家革命几十年，现在老了，得了很多病，国家不保障他医疗，说不过去。这部分人毕竟很少，我们总可以想办法解决他们的医疗费用。由国家财政补贴的行政事业单位离休干部的医疗费用也要全部或部分由财政负担，企业离休干部由企业负担。地方上的离休干部，地方财政要负担。拿钱出来养老敬老，这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第四，关于职工个人医疗账户与社会统筹医疗基金相结合的方式及其管理。我赞成职工患小病时，都从个人医疗账户中开支。这样，他用这笔钱时会多考虑一点，不致出现赶快把个人账户里的钱花光、去

吃社会统筹的现象。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同时规定，看大病时社会统筹医疗基金只能用多少钱。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个人账户里节省下来的钱，有利于职工万一得大病时有钱治。要鼓励个人账户里的钱节省使用，明确节约归己。我想职工会节省的，这里面有较大的节约潜力。个人账户和统筹基金要分开，统筹基金不能向个人账户透支。医疗保险基金分多少给个人账户，可以研究，必要时，可以根据实际情况作些调整。职工个人医疗账户和社会统筹医疗基金存在银行，分别计息，应按沉淀资金的多少给予利率的优惠，比活期存款利率应高一些，可参照住房公积金的办法。上海就是这样做的，住房公积金全部存在建设银行，每天统计沉淀资金，然后按优惠利率付给利息，利息再存入其账户。

四、卫生系统要改革

卫生系统与国有企业一样，也存在人浮于事的情况。现在，城市里设了这么多的医疗机构(包括企业的医疗机构)，供给大大超过需要，资源相对过剩，必须进行结构调整。要实施区域卫生规划，实现资源优化配置与合理利用，减人增效。多余的人员要下岗分流，否则，搞那么大的摊子，养那么多的人，医疗费用肯定贵得不得了。如果卫生系统减一点人，成本降低了，医疗费用就会下降，医疗保障水平也就提高了。医院的富余人员经过培训，可以充实卫生监督执法队伍和社区医疗机构。我们对待国有企业下岗人员的政策同样可以在卫生系统实施，只要把人减下来，国家会给一定的政策。开展社区卫生服务既可以方便患者就医，又可以合理分流病人、降低医疗费用，这件事要抓紧推行。与此同时，要建立健全对医疗机构的合理补偿机制。我看，还是应当允许在医院开方子，到外面经批准的药店去买药。从长远看，这样做有利于竞争，只有好处，没有坏处，会促进医疗质量的提高和服务态度的改善，药品价格也会降低。医院卖药还是有竞争力的，只要价格合理，病人还是愿意在医院买药，毕竟方便一些嘛。总之，改革应该是全面的改革，不应只改一个方面。要积极推进医疗机构内部改革，提高医疗服务质量和管理水平。要建立一种好的机制，使医生能为病人合理地用药、合理地检查，控制使用昂贵的药品，减少浪费。

五、关于下一步医改工作

医疗保障制度的改革相当复杂，还是要进行试点，鼓励大家去探索。不要出台一个规定太死的方案，方案应该是原则性的，允许大家在实践中修改和完善。要鼓励大家采取不同的模式。有两条原则要坚持：第一，根据财政和企事业单位的实际承受能力，来确定基本医疗筹资水平和统筹基金所能支付的封顶线，严格控制医疗费用开支；第二，封顶线以上的医疗支出，通过商业保险、企业补充保险和社会救济来解决。只要坚持这两条原则，其他具体的做法都可以试。我看，全国应该有一个统一的基本医疗的最高缴费标准，定这样一个标准还是有必要的。缴费标准切忌太高，但一定要能做到收缴率比较高，至少要收到80%、90%。我们现在就要下决心进行这项改革，只要不把目标定得太高，我相信全国普遍进行这项改革是有可能的。

为了制订一个好的方案，你们可以采取多种方式去跟地方的同志们开开座谈会，听听他们的意见。先统一认识，看看这种做法在他们那里行得通行不通；同时，也发掘一下他们有没有新鲜的经验；然后，你们才能提出一个全国范围的医改方案。我认为，现在应该把准备工作做得更细一点，把调查搞得更深入一点，使大家的认识更统一一点，办法搞得更切实可行一点。我们现在就是要埋头苦干，做扎扎实实的调查研究、制订方案的工作。我们必须在明年3月份以前拿出一个大家能够接受的、全国统一的方案，然后再召开全国性会议讨论。

关于搞好轻工集体企业的意见

(1997年10月27日)

1997年10月27日至30日，全国轻工集体企业第五届职工(社员)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出席会议的有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联社职工(社员)代表大会选举的代表，部分企事业单位的代表，国家有关部门和有关新闻单位的负责同志。这是朱镕基同志在接见会议代表时的讲话，曾发表于“中国共产党历史资料丛书”《中 国手工业合作化和城镇集体工业的发展》第四册上卷，原标题为《朱镕基副总理在接见全国轻工集体企业第五届职工(社员)代表大会代表时的讲话》。编入本书时，对个别文字作了订正。

轻工集体企业是国民经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现在轻工集体企业有4万多个，人数有400多万人，产值达到2000多亿元，这是个大进步，我们不能忽视它。轻工集体企业在历史上起过很大作用，在今后我们国家走向现代化过程中一定能够发挥更大作用。现在，我们的轻工集体企业遇到不少困难，因为国民经济在不断发展，市场的需求在不断变化，而我们自己本身的能力还不能够适应这种变化。大概去年国有企业亏损面达到40%，轻工集体企业的亏损额有几个亿，但不是全行业净亏，还有微利，那不错，我要谢谢同志们啦！我最害怕的是全行业亏损。现在全行业亏损最有名的就是纺织，纺织工业曾经有辉煌的成绩，但后来它不适应市场发展的需要，工作也不得力，搞得现在全行业亏损了。我讲在这种困难情况下，轻工集体企业基本还是不亏，哪怕有一点点，就是一块钱利润也是好的呀！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五届一中全会上说，当前大多数企业要摆脱困境。这个目标我们一定要实现，一定能够实现，必须实现。因为，我们党的十四大报告、十五大报告都提出了到2000年，大多数国有企业要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建立了现代企业制度还没有摆脱亏损，这像什么话呀！所以，一定要解决亏损问题。解决亏损我讲是大多数，我没有讲全部。全部解决亏损，这不可能，总是会有一些企业亏损，总是要优胜劣汰，但大多数国有企业一定要走出困境。另外，我没有讲小型企业，我是讲大

型企业。现在国有企业亏损面达到40%，主要是中小型企业。对中小型企业要采取“抓大放小”的方针，在多种所有制的形式下，让它们搞得更活一点，我相信它们的亏损还要好解决一点。解决中小企业的亏损问题，虽有难度，但很有希望。轻工集体企业解决亏损问题，比国有企业要好解决一点，难度要小一点，因为你们的所有制比国有企业灵活，你们的经营管理也比国有企业灵活一些。现在我讲三个问题：



1997年10月27日，朱镕基在北京中南海紫光阁接见全国轻工集体企业第五届职工(社员)代表大会代表。前排左一为国务委员兼国家科委主任宋健，右一为原轻工业部副部长、中华全国手工业合作总社原副主任杨玉山，右二为原轻工业部副部长季龙。

一个问题就是政企分开。党的十五大报告指出，集体企业是公有制的一个组成部分。什么叫公有制？一个是国有企业，另一个是集体企业。你们的政企分开应该搞得更好一点，各级领导不要去干预企业，放开让它们去干。我觉得，你们要干预就去干预那个乱收费，你不去对它们搞那个乱收费，它们就会活得好一些。同志们，现在很多地方

是费大于税。税是我管着的，税的问题很多，我绝对不会偏袒税务部门，我相信经过两三年的努力，会有很大的好转。我经常收到人民群众的来信，不知收到过多少人民群众的来信，我批下去的我相信解决了，我没收到的、没批的恐怕还多一万倍呀！我经常警告税务总局，你们在人民群众中的形象是不好的呀，不要满足于税收的成绩。现在我们每年增加1000亿元的财政收入，这在历史上恐怕还没有做到过。过去我们每年增加100亿元、200亿元的财政收入就了不起啦，现在增加1000亿元真是不少呀！但是很多地方是费大于税，不能不讲啊！同志们，费大于税的问题一定要纠正，你们就是要减轻集体企业的负担。你们那个瞎指挥越指挥越糟糕。现在国有企业为什么困难，还不就是重复建设造成的。重复建设怎么造成的，不就是某些党政领导干部瞎指挥，成天要上这个项目要上那个项目，你有什么根据？所以我讲，政企一定要分开，这是第一条。

第二，要把轻工集体企业当成社员或者职工自己的企业来办。轻工集体企业是集体的，不是国有的，现在实际上好多叫“二国营”。如果是国有企业，就把那本经念熟一点，叫做“实行鼓励兼并、规范破产、下岗分流、减员增效和再就业工程”。这本经念熟了，国有企业就搞好了。如果你办不下去了怎么办呢？就不要让它吃“大锅饭”，你干脆调整一下，办不好那就要调整！但是，我主张这个问题不要刮风。我从党的十五大到现在，就一直在强调不要刮风。不要刮股份制和股份合作制的风。不要不顾条件，用行政手段立即推行股份制和股份合作制。我不是讲股份制和股份合作制不好。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五大上讲它们很好，我也觉得很好，但江泽民同志没有讲不顾条件，用行政手段推行。不顾条件，用行政手段推行这个不好，这就叫刮风。我讲刮风不是没有根据的，各个地方都有这个反映，就是要在一个月、最迟三个月推广实行股份合作制化，怎么“化”得好呢？同志们，我们“化”了好几次，人民公社化“化”没“化”过？不能再刮那种风。它愿意搞股份合作制就搞，职工愿意也要有个条件。都是一帮穷光蛋，资不抵债，股份合在一起有什么好处？你搞股份合作制，要从职工口袋里掏钱，企业连工资都发不出去，你叫人家掏什么？只要大家掏两个钱去入股，积极性就提高了？那也不见得。都把这些钱掏给领导班子去挥霍，那不是更糟！这个企业本来就应该调整，或者应该换负责人嘛，你还叫人家去掏钱，让别人掏钱丢在水里连个水泡也没有。你要考虑将来怎么

还人家的钱啦！不能随便乱喊口号，一天两天就股份合作化，把股份合作制喊到天上去了。其实在资本主义国家，股份制也不是普遍的，上市公司是很少的，别把股份制神化了。江泽民同志讲这个问题，是因为人家攻击股份制，说我们搞股份制就是搞私有化。江泽民同志讲这个问题是发展了邓小平理论。股份制还是公有制，但绝没有叫你一个月或两个月全部股份化。所以，我劝同志们不要刮风。有些企业有好的产品，领导班子是健全的，职工的生活也是过得去的，你让大家拿一点钱，扩大再生产，马上可以占领市场，产品有销路、有效益，那可以。但是不要所有企业都搞这个东西，要实事求是。我们讲发展多种经济，就是从人民群众的利益出发，来考虑这个问题。关键还是要在经营管理上下工夫，不要去追求那个时髦。

第三，要真正按照中央指示，转换机制，面向市场，把产品品种搞上去，把质量搞上去。轻工集体企业就是比较灵活，它的灵活是市场的需要，很多事情都可以做。国有企业是搞大路货的，一搞就容易重复建设，大批的积压产品出来了，你们别在这方面去追求、去学它。好多市场缺的东西，它造不了。大家要开动脑筋，引进技术，把产品搞得非常多样化。我举个例子，现在VCD很多。我看电视广告，VCD牌子，什么“爱多”、“小霸王”……至少20个。有人告诉我有3000个，我倒不相信，真有这么多就是灾难啦！这不得了，能销这么多吗？这就是一哄而上，将来就准备擦屁股，这些钱挂的都是银行的账。要是用这些钱给同志们发奖金，你们的收入至少连升三级。所以，不要搞重复建设。要慧眼识英雄，从市场上打开缺口，一定可以找到出路。我经常讲，轻工是搞小商品的。像指甲剪，我们并不是没有，但我没用过好的指甲剪。我今天带来了两个指甲剪，都是别人送给我的。我们自己产的剪两天就剪不动了。这个是台湾产的，用起来很灵便，剪后指甲不掉地下，都掉到剪子里去了，非常简单、非常方便，比我们生产的好。所以你们要下工夫，动脑筋，很多新产品可以做出来。中国的手工艺品就以它的精巧而闻名，有几千年的历史，怎么造不出这个东西呢？加上一点现代技术和模具，用点好材料就可以。现在人民的生活水平提高了，收入高了，可以买得起这些小商品，市场繁荣就看这些小商品，在这方面大有可为。

我觉得你们在政策上要给予支持，有些机构要精简，但是咨询机构要发展，要指导它们多开点展览会。你们可以拿出几万个产品搞展览会，政府也应该支持。我一直在考虑，像德国、日本促进中小企业发展有一个机构，我也在考虑成立一个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机构。你们是一个机构，但是你们没有这个手段，没有银行的手段，也没有活动经费。必须有政策性的机构能制定法规，怎么给财政优惠，怎么给银行贷款。不是个别地去扶持什么企业，那里面有关系学，要有个法律。我们也不是没有法，如《乡镇企业法》，但是我不客气地讲，不能只限于把它搞上去、哄上去。还有一个很关键的问题——扶优限劣，结构调整。要引导它，要限制它，现在要考虑有一个综合性的组织，有这样一个手段，推动中小企业发展。现在请同志们发表意见，怎么样把中小企业，包括乡镇企业、二轻企业、个体企业搞上去；怎么样扶优限劣，引导它们发展。总之，让我们共同努力把轻工集体企业搞上去，使它在国民经济发展中发挥更大的作用。我给大家三年时间。三年以后我们再来开这个大会的时候，我希望大家兴高采烈，实现全行业振兴。

落实“出疆棉”政策

(1997年11月16日)

1997年11月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关于当前“出疆棉”落实情况的报告》反映，在“出疆棉”政策落实过程中存在新疆棉当地价格加运费已高于内地价格、国际市场棉花价格已低于新疆棉以及购棉资金落实困难影响“出疆棉”合同执行等问题。这是朱镕基同志在该报告上的批语。

请印发国家计委、经贸委、外经贸部、纺织总会、供销总社、人民银行、工商银行、新疆自治区负责同志。从此事可以看出国务院文件也不起作用，令不行、禁不止，什么“国有企业”都各行其是，国务院各主管部门还有多大作用?

国务院的决定是符合经济规律和市场规则的，采取的政策是经济手段(财政补贴、退税以降低国产棉价格)，但是所谓“国有企业”就是不听，宁愿采用质量很次、拖延到货的外国棉，这难道是市场经济？是腐败！各级主管部门和新疆自治区应严格按国务院定的政策办，不得打折扣，否则国务院想保也保不了。

在文中有关新疆实际执行价格高于测算之处批示：不是什么价格问题，是纺织厂的借口。新疆也要制止乱收费，否则只好用价格较低的内地棉来顶进口棉了。

朱镕基

11.16

OP

请发国家计委、经贸委、外经贸部、纺织总会、供销总社、人民银行、工商银行、新疆自治区查阅。从此事可以看出国务院文件也不起作用，令不行、禁不止，甚至"国有企业"都我行我素，国务院各主管部门还有多大作用？

国务院的决定是符合经济规律和市场规则的，采取的政策是经济手段（财政补贴、退税以降低国产棉价格），但是所谓"国有企业"就是不听，宁愿采用质次价高、拖延到货的外国棉，这难道是市场经济？是腐败！各级主管部门和新疆自治区严格按照国务院的政策办，不得打折扣，否则国务院想保也保不了。朱镕基 11.16.

关于当前"出疆棉"落实情况的报告

朱镕基副总理：

上海会议后，我委于 11 月 5 日—7 日先后约请纺织、供销、纤检、财政、税务、商检、工行、海关、外贸等有关部门和新疆自治区的同志，商谈关于"出疆棉"落实情况。现将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一、当前"出疆棉"执行情况

在 10 月 7—9 日召开的全国第三次棉花集中交易会

深化金融改革，防范金融风险

(1997年11月18日)

1997年11月17日至19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在北京召开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会议针对当时金融风险不断积累的突出问题，对深化金融改革和防范金融风险问题做了全面部署。这是一次具有全局意义的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省长(主席、市长)和分管金融工作的副省长(副主席、副市长)，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有关部门的负责同志，各国有商业银行行长、副行长和各重点分行行长，中国人民银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分行行长，各保险公司和大型金融机构的负责同志。这是朱镕基同志在会上讲话的主要部分，曾发表于《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册，原标题为《深化金融改革，防范金融风险，开创金融工作新局面》。编入本书时，对部分内容作了删节。

这次会议上讨论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金融改革，整顿金融秩序，防范金融风险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充分体现了党的十五大精神，是一个很重要的文件。现在，我根据《通知》精神和会议讨论的情况，讲几点意见。

一、进一步深化金融改革和整顿金融秩序、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势在必行

对于深化金融改革和防范金融风险问题，我在近几年特别是去年以来考虑很多。为什么？因为金融领域里的问题越来越严重，隐藏着极大的风险。

党的十五大后，党中央、国务院把深化金融改革和整顿金融秩序，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摆在突出位置，作为经济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这是通观全局、审时度势作出的重大决策和战略举措。



1997年11月18日，江泽民、李鹏、朱镕基、胡锦涛、李岚清等中央领导同志出席全国金融工作会议。

党的十四大以来的几年，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好的、关键性的时期。这个时期，我们认真贯彻邓小平理论，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取得了很大成绩，社会生产力、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上了一个大的台阶。近几年，经济形势一年比一年好。事实证明，中央所采取的深化改革、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的决策与措施是成功的。主要是三个方面：一是坚持实行适度从紧的财政和货币政策，没有这一条，极有可能早就发生泰国现在的问题①。二是对财政、税收、金融、外贸、外汇、价格体制等进行了重大改革。特别是税制改革，使国家税收连续几年每年增收1000亿元以上。三是实行正确的农业政策。没有这一条，通货膨胀不会降得这么快。几年前，在经济的某些领域出现过热，导致严重通货膨胀以后，国民经济还能够连年保持9%至10%的速度，又能把通货膨胀很快降下来，这在世界上是罕见的。这些确实是来之不易的，是全党全国上下团结奋斗的结果。

① 泰国现在的问题，指1997年7月2日，泰国被迫宣布放弃自1984年以后一直实施的固定汇率制度安排，改行浮动汇率制度，当天泰铢即贬值20%，并引发一场波及东南亚的金融风暴。

巩固和发展当前好的经济形势，至关重要的是，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正视而不是回避前进中的问题。当前经济生活中的突出问题，是金融隐患和金融风险不断地加大。对此，《通知》明确指出了以下五个方面：一是国有银行不良资产比例高，应收未收利息急剧增加，经营日趋困难。相当部分不良贷款和应收利息是呆账、坏账，无法收回。二是非银行金融机构问题更加严重。据最近对122家信托投资公司稽核，不良贷款比例大大超过国有银行。城乡信用社问题也很突出，部分省市已出现局部性支付危机。三是一些地方、部门、单位乱设金融机构、乱办金融业务和乱搞集资活动。近年来，由于乱设金融机构、乱办金融业务、乱搞集资活动导致的挤兑风波，在一些地方时有发生。四是股票、期货市场存在大量违法违规行为。部分上市公司质量不高。不少证券公司挪用客户保证金，内幕交易，违规透支。一些地方擅自设立股票(股权证)交易场所，隐藏着很大风险。一些国有企业和金融机构，没有经过批准违规进行境外期货交易，给国家造成巨额损失。五是不少金融机构和从业人员弄虚作假，违法经营。高息揽储、账外设账等屡禁不止，金融诈骗等犯罪活动日益猖獗，大案要案越来越多。

对于金融领域出现的问题和隐患，党中央、国务院早有察觉，并不断地采取措施，颁布了一系列政策、规定。主要是：第一，1993年下半年开始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首先从解决金融问题入手，实行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整顿金融秩序，清理乱拆借、乱集资，提出“约法三章”①。当年清收违章拆借资金830亿元，刹住了这股“热”风。第二，改革金融体制。实行政策性银行和商业银行分开。进行外汇管理体制改革，加上其他宏观调控措施取得成效，国家外汇储备从1993年上半年的180亿美元增加到现在的近1400亿美元。去年年底实现经常项目下人民币可兑换。第三，运用利率杠杆进行宏观调控。这几年两次提高利率，抑制社会需求膨胀；三次降低利率，每年减轻国有企业利息负担七八百亿元。第四，加快金融立法步伐，加强对金融机构包括证券市场的监管。《中国人民银行法》、《商业银行法》等重要法律相继出

台。清理、撤并信托投资公司。清理了账外账，并“约法三章”，明确提出谁再搞账外账，一律撤职，而且不能再在银行系统工作。第五，严肃查处违法违规案件。打击金融犯罪，处理了一批大案要案。例如，北京市长城机电科技产业公司沈太福②、无锡邓斌非法集资案③等。

---

① “约法三章”，指朱镕基同志在1993年7月7日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提出的“约法三章”，见《金融工作“约法三章”》(本书第一卷)。

② 沈太福非法集资案，指北京市长城机电科技产业公司(以下简称“长城公司”)特大乱集资案件。长城公司以生产一种高效节能电动机为名向全社会集资，其年利息高达24%。从1992年6月到1993年2月，在全国非法集资达10多亿元，投资者达10万人。1993年4月18日，长城公司总裁沈太福被正式逮捕；1994年3月4日，被判处死刑。

③ 无锡邓斌非法集资案，指1989年至1994年，无锡新兴公司原总经理邓斌用无锡新兴公司和深圳中光实业总公司的名义，借合作经营一次性注射器、医用乳胶手套之名，以月息5%至10%的高利为诱饵，在无锡等地大肆进行非法集资活动，集资总额高达人民币32亿元，涉及12个省市的368个出资单位和31名个人，造成经济损失12亿余元。1995年11月，邓斌等主犯被判处死刑。

以上情况充分说明，近几年中央所实行的金融工作方针政策是正确的，采取的措施是得力的、有效的，金融工作成绩是显著的。如果这几年不这样做，我国就不会有今天这样好的经济、金融形势。但是应该看到，金融领域的深层次问题还没有触及，历史上多年积累的严重问题并没有解决。这次亚洲金融危机，促使我们下决心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再不能犹疑了。而要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必须分析为什么会造成这样的问题。产生金融领域的问题有多方面原因，既有历史的包袱，也有体制上的原因；既有外部行政干预的因素，也有金融系统内部风险控制不严的问题。实际上，是国民经济深层次矛盾的综合反映。第一，金融体制不适应改革和发展迅速变化的新形势。政银不分、政企不分，对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的行政干预过多，使人民银行不能依法履行职能职责，国有商业银行不能依法行使经营自主权。不进一步深化金融改革，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的问题就解决不了。第

二，房地产、开发区过热中，造成了大量的不良信贷资产。这些问题主要是在1992年、1993年发生的。相当一部分成为呆账、坏账。第三，国有企业资本金严重不足，高负债运营。从80年代初开始，国家实行固定资产投资"拨改贷"，流动资金全额贷款。企业变成无本买卖，负担过重。国有企业不改革，银行就会被拖垮，但是如果银行体制不改革，国有企业也改不了，因为它可以靠不断地向银行借钱，随意拖欠贷款本息取得资金来源。第四，经济建设中盲目上项目、铺摊子，重复建设，经济结构不合理，投资效益很差。这是造成国有企业困难的最大原因。第五，挤占、挪用银行信贷资金相当严重，造成大量呆账、坏账。

"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①应当清醒地看到，对于金融领域长期积聚的风险，如不切实加以防范和化解，任其发展下去，有朝一日爆发，就有可能发生影响全局的重大金融风险。这样，当前好的经济形势不但不能发展，而且还可能发生逆转，甚至会酿成大祸，动摇国本。党中央、国务院对防范金融风险工作极为重视。江泽民词志近年来多次提醒要注意防范金融风险问题，指出这是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重要方面。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他又明确要求："依法加强对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包括证券市场的监管，规范和维护金融秩序，有效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在党的十五届一中全会上，他进一步强调：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是我国经济工作的一项重要和紧迫的任务。中央其他领导同志也都十分关心金融风险的防范问题，作出了许多重要指示。我们一定要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要求，从经济和社会发展全局的高度，从党和国家安危的高度，充分认识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的极端重要性和紧迫性，增强深化金融改革和整顿金融秩序的自觉性和使命感。

---

① 见《礼记·中庸》。原文是："凡事豫(预)则立，不豫(预)则废。言前定则不跲，事前定则不困，行前定则不疚，道前定则不穷。"

二、关于中国人民银行和国有银行管理体制改革问题

这次《通知》中的一个重要内容，是进一步深化银行管理体制改革。主要包括：改变中国人民银行和国有商业银行分支机构按行政区

划设置的状况，精简管理层次和分支机构；成立中共中央金融工作委员会、中央金融纪律检查工作委员会和金融机构系统党委，完善金融系统党的领导体制。这是我国银行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的根本性改革和创新，是建立和完善现代金融体系、把银行真正办成银行的关键步骤，是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的重大措施，也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新型的政府与银行关系、银行与企业关系，使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彻底摆脱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羁绊的重大举措。

在会议讨论中，有些同志对改革银行管理体制存在一些担心和疑虑，这里有必要讲一讲。

有些同志担心，这样改革会不会搞得天下大乱？我的看法，这件事情难度很大，要付出一点代价，也可能出一点乱子，对此，我们要有思想准备。然而，应当看到，现在下决心消除金融风险隐患，正是为了避免以后可能发生大的社会震荡。如果现在不采取坚决措施，将来问题集中一起爆发出来，那就不得了啊！我们现在有很多有利条件，只要考虑周到，方法得当，工作做得好，可以避免出现大的乱子。这个问题早抓早主动，越拖越被动。

有些同志提出，现在进行银行管理体制改革，时机是否成熟，“一步跨十年”，能否行得通？我觉得，“一步跨十年”讲对了。这次改革就是要跨十年，因为是一次根本性的改革，意义非常重大，是国家的长治久安之计。我们是在过去已经进行各项改革的基础上迈了关键的一步。但是，这一步要跨多久呢？我估计最少需要三年。应该走出这一步，现在不走，将来要后悔。这次会议不是要求你们回去就马上动手，先要统一思想。思想统一了，就可以加快工作进度；思想不统一，又会刮风。《通知》是个指导性、方针性文件，是个整体思路，并不是具体实施方案。从现在到方案实施的这段时间，务必保持金融机构和队伍的稳定。各银行总行及其分支机构，要按照这次会议的部署认真做好金融监管和整顿工作，绝不能有丝毫懈怠。银行机构改革，成立金融系统党委，不是对地方党委、政府信任不信任的问题，也不是说过去金融领域出现的问题责任都在地方。现在改革，中央和地方各有分工，只会加强地方对银行的监督。成立中共中央金融工作委员会、中央金融纪律检查工作委员会和金融机构系统党委，目的在于加强党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发挥党的思想政治优势，保证

党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国家金融法律法规更好地在金融系统贯彻落实。中国人民银行和国有商业银行实行跨行政区设置分支机构后，分支机构的管辖范围与行政区划不再一致，分支机构的党组织也不宜再由地方党委领导。这种做法，符合党章规定，符合我国国情，也是同改变人民银行和国有商业银行按行政区设置分支机构相配套的、必然需要采取的措施。今后，地方党委、政府和当地金融机构党组织应当在各自职责范围内相互支持。金融机构要加强与地方党委、政府的联系，认真听取他们对金融业发展和监管的意见和建议。地方党委和政府应继续帮助和支持金融机构的工作，例如参与查处金融案件、维护金融秩序等。

有的同志说，这次银行管理体制改革是照抄西方模式，西方模式不适用于中国。我说，我们的所有宏观调控措施都不是照抄西方模式，都是有中国特色的。我们不是照抄，而是借鉴，不借鉴怎么改革开放？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是照抄西方。不借鉴不行，西方毕竟搞了几百年市场经济。不借鉴，何时能建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有人可能会说，省长不管金融，怎么管经济？不是省长不能管，而是看怎么管。《通知》写得很清楚，这次在深化银行管理体制改革的同时，要加快地方性金融机构体系的建设。区域性的银行将来可以多发展分支机构，还要增加城市商业银行，县(市)商业银行也要开始试点，城市、县(市)的商业银行都是股份制的商业银行，还有合作制的城市信用社、农村信用社。这些都是地方性的金融机构，它们的党组织关系都在地方，这就够地方党政领导管的了。怎么管？我们要牢记邓小平同志说的话："要把银行真正办成银行。"①地方党委、政府对地方的金融机构不能乱加干预，要让它们自主经营、自负盈亏。中国人民银行也要加强对地方性金融机构的监管，监管的办法要学习、借鉴西方中央银行的经验。

---

① 见邓小平《企业改革和金融改革》(《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93页)。

有的同志担心，跨行政区设立银行分行会影响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需要指出，中国人民银行跨行政区设立分支机构，是因为人民银行没有筹集资金的任务，是监管商业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的。谁来统

筹银行资金？由国有商业银行总行来统筹，商业银行总行才是法人。现在已经没有按地区存贷挂钩的问题了，是各商业银行的总行在统一调度资金，按照信贷原则和国家产业政策、区域发展政策发放贷款，没有地区规模限制，不会影响中西部地区的发展。国有商业银行在地市县的分支机构适当收缩后，总行的资金调度会比过去更加灵敏。

有的同志还提出，国有企业改革没搞好，金融改革孤军深入，行吗？应该看到，深化金融体制改革、整顿金融秩序，是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必然要求，两者是相辅相成的。确实，国有企业不改革，银行单独改革不会成功；但是，没有银行改革的推动，国有企业改革也是搞不好的。国有企业现在为什么那么困难，我认为有三个主要原因：一是盲目上项目、重复建设，各地区经济结构趋同化。二是企业资本金不足，负债累累，再好的企业家也难以经营。三是人员过多，“一个人的饭三个人吃”是普遍现象。所以，国有企业改革要对症下药。第一，不要再搞重复建设。对此必须一刀切。第二，要减轻企业债务。鼓励兼并，规范破产，增资减债，发展一些直接融资。第三，要实施再就业工程。现在社会上对就业问题反应强烈，主要原因是企业下岗职工的再就业没搞好。据统计，现在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大约1000万人，今后三年把这批人的安置和再就业搞好，就是一个重大任务。实行股份制、股份合作制，是搞活企业的一条有效途径。党的十五大报告从理论上阐明了这个问题。股份制是现代企业的一种资本组织形式，但是，不能认为“一股就灵，一股就化，一股就了”。搞股份制解决不了企业面临的所有困难和问题，也不是所有企业都能搞成股份制，更不是所有股份公司都能上市。股份制企业在资本主义国家也不是大多数，更多的还是独资和合伙制企业，上市的股份公司更是少数。因此，不要刮风。总之，不在“三改一加强”上下工夫，是不能解决国有企业的根本问题的。中央提出国有企业改革三年的目标，银行改革也需要三年，但稍微走前一点。走前一步，就是再不能让企业亏损在银行挂账，这会有效促使企业转换经营机制，实现三年改革目标。

三、关于完善金融体系和加强金融监管问题

第一，建立和完善多层次、多类型金融机构体系问题。《通知》明确指出，完善金融机构体系的方向和目标是，建立健全在中央银行宏观调控和监管下，政策性金融与商业性金融分离，国有银行为主体，

区域性商业银行、中心城市和县(市)商业银行(股份制银行)、城市和农村信用合作社、非银行金融机构和外资(中外合资)金融机构并存，分工合作、功能互补的金融机构体系。这样的金融机构体系，可以适应现阶段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近几年，我国多类型、多层次金融机构体系有了很大发展，今后的任务主要是在现有的基础上逐步加以完善和充实。对加快地方性金融机构的建设，要做好准备，积极稳步地进行，要严格按条件审批，并要与金融监管能力相适应，不要搞得太快。一下子设了很多金融机构，如果不符合条件，素质不佳，会给自己找麻烦。组建地方性金融机构，还要与国有商业银行精简分支机构和人员、整顿地方信托投资公司和城乡信用社结合起来，充分利用现有金融机构的设施和人员。不要把整个风险都押在国有银行身上，这样受不了。这里要讲清楚，地方性金融机构的业务经营虽然中央银行要监管，但如果出现了资不抵债、不能支付到期债务等问题，地方是要负责的，中央银行不能拿钱保支付。在金融体系中还有外资银行。外资银行还会继续增加，但不会都集中在上海、江苏这些地方，将来也会到中西部地区去的。关键是要改善投资环境，规范和维护金融秩序。

第二，积极稳步地发展资本市场，适当扩大直接融资。经过总结经验，现在来看，必须把股票市场融资和改革国有企业结合起来，要有利于大中型国有企业摆脱困境。但是，亏损企业不能上市，没有业绩不能上市。现在有个好办法，就是支持优势企业上市，筹来的钱去兼并有发展潜力的亏损企业，结果很有成效。比如，邯钢的管理确实好。舞阳钢厂很困难，一年亏损几亿元。邯钢说兼并了它可以转亏为盈，那就同意邯钢上市，让它发行股票；筹集了资金把舞阳钢厂接过去，今后就可以扭亏了。这是使国有企业脱困的非常好的办法。股市集资，前途很大，去香港上市融资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方面。但我们希望规范股市融资，要稳步前进，千万不能乱来。

《通知》要求，要彻底清理和纠正各类证券交易中心和报价系统非法进行的股票(股权证)基金等上市活动，各地产权交易机构一律不得变相进行股票(股权证)上市交易。这个决定是完全必要的。必须指出，目前正在蔓延的非法证券发行和交易活动，如不坚决加以制止，后果不堪设想。这次会议上，国家证券监管部门提出了清理整顿现有非法股

票(股权证)交易场所的三条措施，是经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讨论同意的。中国只有上海、深圳两个股票市场，不能再多搞了。这两个市场的网络非常发达，任何地方都可以上网交易，完全可以满足证券市场发展的需要。这次会议后，有关省区市要首先宣布一条，擅自设立的股票(股权证)交易场所不能再搞新的股票上市了，产权交易所变相搞股票交易是违反国务院规定的，是违法的。但是，处理这个问题要非常慎重，要有步骤地处理，安定人心。然后，讲明这方面政策：一是现在在非法股票交易所进行的股票交易，暂时还可以继续进行，比较好的企业股票经过有权的评估公司评估，可以在上海、深圳证券交易所继续上市。给它开一条路，只要企业好，还是可以上市。二是没有资格去上海、深圳交易所上市的企业股票，公司要保证股金的分红，保障投资者的利益。三是挂牌公司有能力自己赎回的，最好把股票赎回来。要分别几种不同的方法来处理。

第三，深化农村金融体制改革。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的方针，中央早已确定了，现在是抓紧贯彻落实的问题。一是农村信用社和农业银行脱钩，把农村信用社真正办成合作性质的、社员民主管理的、自负盈亏的金融机构。二是组建农村合作银行。要先试点，每省一个，最多两个，取得了经验，再逐步推开。三是进一步划分农业发展银行和农业银行的分工，农业发展银行要设下属机构，但收购任务较少的县和乡(镇)以下的业务，仍委托农业银行代办。四是清理农村合作基金会。农村合作基金会的问题很严重，隐患尚未充分暴露出来。任其发展下去，问题会越来越严重。国务院在1996年颁发的《关于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就作了明确规定：一是从1996年起，各地一律不得再设农村合作基金会；二是现有农村合作基金会立即停止以任何形式吸收存款和办理贷款。我看这两条都没有执行。现在，首先要认真执行国务院的决定。并根据这次会议的精神，对农村合作基金会进行全面的清产核资，冲销呆账，符合条件的并入农村信用社；对资不抵债、又不能支付到期债务的，要清盘、关闭。与有效资产相当的债务可由信用社来承担，但对资不抵债的债务不能承担。资不抵债、又不能清偿债务的，只好破产。要注意维护农户的合法权益。我们有好几个办法：一个是还本但不计息；一个是还本依法计息，高息部分不付。总之，要根据不同情况，采取妥善措施，分类处置，逐步解决问题，不

能出大的乱子。这方面的清理工作，有关部门还将进一步提出具体方案，加强指导，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

第四，加强金融系统内部建设问题。这次《通知》强调，要依法加强对金融机构包括证券机构的监管。目前，金融、证券领域之所以存在大量违法违规行为，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监管制度不健全，监管工作软弱无力。管理学一个基本原则是：信任不能代替监督。任何方面的管理都必须坚持这个原则，金融包括证券业尤其不能例外。我们必须把健全现代金融监管体系、加强金融监管放在突出位置，建设好金融监管这个“闸门”。要加快建立健全由中国人民银行和中国证监会外部监管、各金融机构内部控制、金融行业自律和社会监督组成的，严密、有效的现代金融监管体系和监管制度。

一是，大力整章建制，全面加强金融机构基础建设和内控制度建设。当务之急，是要按照国际通行的准则，改革和健全金融业财务、会计制度和存贷款内控制度。财务和会计制度是否健全，是金融机构存在的基础。没有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就不可能提高金融机构管理水平，更谈不上有效实施金融监管。我一再讲要办几个专门的国家会计学院，对现有的机关干部进行培训，到国有企业去当财会负责人，起码不造假账，国有企业资产才不会流失。银行也造假账，怎么得了！要重新树立和坚决维护银行“铁账、铁款、铁制度”的“三铁”信誉。各金融机构要认真研究新问题，制定新办法。有了好的规章制度，还必须严格执行；否则，规章制度就形同虚设。要切实执行财务、会计内部控制责任制。严格执行会计工作“约法三章”，严禁设置账外账，不准乱用会计科目，不得编制和报送虚假会计信息。在金融系统全面实行财会人员资格审查认证制度，凡有造假账、报假数、开假票据、滥用会计科目等行为的，一律取消财会人员的专业技术资格，调离财务、会计岗位，并依法追究法律责任；对授意、指使、强令会计人员编造、篡改会计数据的单位领导人，要一律撤销职务，依法从严惩处。如果不这样严格要求，没有“三铁”的纪律，这次会议提出的改革和整顿措施都是空话。国有企业也要实行这套办法。我现在想请一些很懂行的同志，包括懂技术、懂业务、懂会计的同志，再吸收一些外国大会计公司的专家，共同来草拟一套考核国有企业的程序、标准和方法。把这套软件用到企业中去，只要问几个问题，查一查原始

账，就可以知道是不是虚盈实亏，账是真的还是假的。要加强对国有商业银行和国有企业的审计。

二是，中国人民银行及其分支机构、证券监管部门及其派出机构，要真正把主要精力和工作重点放在对金融、证券业的监管上。尽快制定适合我国国情的金融资产质量评价和考核办法，进一步完善金融稽核、监管体系和制度。要充实中国人民银行和中国证监会的监管力量，充分运用法律武器，切实履行职责，敢于监管，善于监管。

三是，加强金融机构领导班子建设，努力提高从业人员队伍素质。这次进行银行、证券、保险等管理体制改革后，银行、证券部门的权力、责任更加明确了，任务更重了，责任更大了，对银行、证券、保险系统各级领导干部和所有从业人员的要求也更高了。必须坚持权力和责任相统一，今后再出问题，造成重大损失，就完全是你们自己的责任了。因此，一定要切实加强金融机构各级领导班子建设，对问题突出的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首先要对领导班子进行整顿和调整，不称职的一定要调离。要选择一批懂宏观经济、懂生产技术、懂财务会计的人才充实金融机构领导班子。要加强金融知识的学习和金融人才的培养。中国人民银行最近编写了《领导干部金融知识读本》，江泽民同志题写了书名，省长们可以看一看；对银行干部要考核，这些都不懂，不能当行长。同时，要大力培养人才，要选拔、使用真正的专家型人才。今后，由银行贷款的项目一律由银行审批，并由银行负责。因此，现在银行这批人就不够了，要结合政府机构改革，把国家计委、国家经贸委、财政部、税务总局和产业部门有知识的人才吸收一些到银行里来。对不适合在银行、证券机构从业的人员，要让他们下岗，进行培训或者转业。银行干部队伍的素质要提高，要能够独立地进行项目评估，当然也可以请咨询公司、评估公司来评估项目，但银行本身也要有这方面的人才，要集中大量懂生产技术、懂业务知识的人才。要大力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加强职业道德教育，全面提高金融包括证券、保险业人员的思想政治素质、业务素质和职业道德素质，做到铁面无私、执法如山、纪律严明、作风过硬。

四、把握时机，增强信心，把《通知》要求真正落到实处

这次会议上，大家认为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和金融形势的分析是符合实际的。《通知》提出的总体要求、主要原则和各项措施，是正确

的、可行的。但是，也有些同志担心，能不能做好这些工作？应当说，这种担心不是没有道理的，有些问题确实很复杂，解决起来难度很大。然而，我们既要看到困难，更要看到希望。当前是深化金融改革、解决金融领域问题的好时机，有着许多有利条件。

第一，当前宏观经济环境很好。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物价稳定在较低的水平。国家粮食、外汇等战略物资储备充足，财政、金融运行平稳，经济实力和回旋余地比较大，能够承受这种改革。

第二，各方面思想认识比较一致。党中央、国务院对深化金融改革、解决金融领域里问题的认识高度统一，决心很大。这次会上，大家的认识也比较一致，都感到不彻底解决问题不行了。现在，广大干部群众的金融风险意识增强，对规范和维护金融秩序有强烈要求。这次《通知》的政策措施符合国家和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一定会得到广大群众的拥护和支持。

第三，已积累了一些宝贵的经验。这几年，我们不仅有力地打击了严重破坏金融秩序的现象，而且对一些有严重问题的金融机构采取了不同措施，积累了解决各种不同类型问题的重要经验。例如：对中农信公司采取行政关闭、由建设银行托管的办法；对光大国际信托投资公司采取改组领导班子、债权转股权等综合措施；对中银信托投资公司，先由中国人民银行实行接管一年，然后由广东发展银行收购兼并；对福建、湖北等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由省政府组织地方财政注入资金和划拨优质资产救助。此外，最近对广东恩平农村信用社的信用危机，正采取先组建农村合作银行保支付的措施，恢复金融机构在群众中的信誉，然后再逐步解决资不抵债的问题。以上这些，都是化解和防范金融风险的有益经验，应当很好地总结和运用。

第四，目前政治、社会条件很有利。党的十五大制定了正确的政治路线，并选举产生了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新的中央领导集体。这个领导集体是坚强有力的，有驾驭全局和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当前社会稳定，人民群众对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前景、对党和政府有足够的信心。这些是最根本的有利条件。

总之，我们应该坚定决心，充满信心。只要认真对待，就一定能够成功。当然，由于金融领域里问题比较复杂，解决这些问题不是轻而

易举的，必须花很大的气力，付出必要的代价，要做缜密、细致、艰苦的工作。我们相信，在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和党的十五大精神指引下，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全国上下同心同德，振奋精神，锐意进取，扎实工作，一定能够完成《通知》提出的各项任务，建立起我国的现代金融体系和金融制度，开创金融改革和发展的新局面，实现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跨世纪的宏伟目标。

在机械、电机工程手册再版座谈会上的讲话

(1997年12月5日)

这是朱镕基同志在庆祝《机械工程手册》(第二版)、《电机工程手册》(第二版)出版座谈会上的讲话。

今天，我来看望大家，看望老同志，看望过去一起工作过的老朋友。我也代表国务院对《机械工程手册》、《电机工程手册》的再版表示热烈祝贺，对参与编审与编辑出版的同志们所付出的辛勤劳动表示衷心感谢!

我是学电机的。这两部手册，特别是《电机工程手册》，我是受益者。在沈鸿①、周建南②同志主持下，早在20多年前就开始编写这两部巨著，现在又组织第二版修订工作，这是很有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的。听包叙定③同志介绍，这次第二版修订编写及审稿队伍，涉及17个部委、全国500多个单位的3000余名教授、专家，其中，两院院士28名。两部手册计有26卷，5800万字。这真是一个浩瀚的巨大工程，非常不简单，钦佩得很啊!

---

① 沈鸿，曾任国家机械工业委员会副主任，《机械工程手册》、《电机工程手册》编委会主任。

② 周建南，曾任机械工业部部长。

③ 包叙定，当时任机械工业部部长。

盛世出典籍。明朝的永乐年间是鼎盛时期，《永乐大典》就出来了。乾隆年间是清朝最鼎盛时期，出了部《四库全书》。现在形势好了，《机械工程手册》、《电机工程手册》也修订再版了。这是值得庆贺的。

沈鸿同志和周建南同志，都是我很敬佩的老领导，他们两位在中国机械工业、电机工业发展史上是有影响的，是作出了历史性贡献的。我认识沈鸿同志，是1952年。我从东北工业部调到国家计委工作，他

是国家计委机械计划局副局长，他知识渊博的讲话和谈笑风生的学者风度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记得有一次听他作报告，他说抽水马桶总是漏水，怎么也修不好，是因为现在这种抽水马桶的机构太复杂了，最好就是放水直上直下，不要那个复杂的转换机构，也许就不漏了。后来我到澳大利亚访问，专门用心看了我住的旅馆的抽水马桶，就是直上直下的，而且是节水马桶，也不漏水。举这个例子，是想说人家在这方面是动了很多脑筋的。沈鸿同志也在动这个脑筋，这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后来搞我国第一台一万二千吨水压机，沈鸿同志是总设计师，就是靠动脑筋造出来的，功不可没啊！周建南同志的特点是亲力亲为，干什么事情都是亲自抓，什么问题总是要把它搞清楚，查很多资料，中国的资料、外国的资料，一定要把相关的情况搞清楚，工作作风非常严谨。我说这些，是提倡学习沈鸿同志、周建南同志这种好作风，改进我们的领导工作。



1997年12月5日，朱镕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出席“庆祝《机械工程手册》(第二版)、《电机工程手册》(第二版)出版座谈会”并讲话。右一为全国政协副主席钱伟长，左一为机械工业部部长包叙定，左二为国务委员兼国家科委主任宋健。

现在再版《机械工程手册》、《电机工程手册》，还给我们一个启示，就是要提倡一种扎扎实实、埋头苦干的作风。这样大部头的书，没有一种只问耕耘不问收获、踏实工作的精神，是搞不出来的。世界上的事情，要搞出点成绩来，都要有这种精神。我们不但要编《机械工程手册》、《电机工程手册》，还要编《企业管理手册》、《财务管理手册》等。我就想组织全国有关专家，再请些外国的会计公司，帮助我们设计一套用来检查财务账目的软件。将来设了监事会，每个监事会主席带一套这样的软件，到那些大企业去查账，一查就把账目查清楚了，不怕你弄虚作假。就是说，要把一个企业和基本管理制度建设好，再用这一套科学的软件去监督检查，就能真实反映企业的经营 状况。

我希望好好宣传一下《机械工程手册》和《电机工程手册》，这样两部洋洋巨著的再版，不仅会给人们以知识，还会给大家以埋头苦干精神的鼓舞。这是一项惠及子孙后代的事业。

在一九九七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的总结讲话

(1997年12月11日)

1997年12月9日至1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北京召开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党政主要负责同志，中共中央有关部门、国务院各部门和有关单位的主要负责同志，解放军三总部和武警总部负责同志。这是朱镕基同志在会上总结讲话的主要部分。

这次会议是在党的十五大以后，中央召开的一次很重要的会议。江泽民同志和李鹏同志作了重要的讲话，我完全同意。会议结束以后，要立即组织传达、学习，结合实际情况，提出全面落实的具体措施。下面，我就几个重要的问题作一点补充。



1997年12月11日，江泽民、李鹏、乔石.朱镕基、刘华清、胡锦涛、尉健行、李岚清等中央领导同志出席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在讲这些问题以前，我把最近亚洲金融危机的情况给大家通报一下。这场金融危机实际上从今年5月份就从泰国开始了，香港也多次遭受冲击，总算保住了联系汇率制度。本来我们以为已经跌到了谷底，但是后来韩国、日本的问题也相继暴露了，现在的情况比我们原来估计的要更严重一点。韩元汇价这几天连续暴跌。从1美元兑849韩元，今天上午掉到了1美元兑1719韩元。日本的问题也在暴露，但是日本的

情况毕竟跟韩国不同，它是一个债权国，现在它对东南亚的债权是2000多亿美元，韩国的大债主、泰国的大债主都是日本人，这一大块债务还不了以后，日本的银行也会受影响。外电分析，这些问题都不可能不影响到中国的经济。昨天我看到所罗门兄弟公司的报告，它断言我们明年下半年人民币就要贬值。美林公司是世界第三大投资银行，它说中国的银行从技术上讲已经破产了，所以它预言我们明年的经济增长速度会掉到8%以下。总之，现在面临着全球性的金融风暴，对中国经济作出的评论和预测多半是悲观的。所以，大家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要冷静一点，脑袋不能发热。经济工作有经济工作的规律，你得按规律走，人为地想加快这个、搞快那个，那是不行的。我觉得从当前亚洲金融危机，可以总结出几点经验教训：

第一，经济结构必须合理。你自己的经济结构没有问题，那人家攻不倒你。完全把这次亚洲金融危机的责任推给国际投机势力，或者说是政治阴谋，那是不行的。关键是你自己的经济出了问题。现在东南亚国家普遍大量借外债，把资金投在房地产上，最后房地产没有市场，资金就死掉了，银行纷纷破产，整个国民经济就转不动了。泰国、韩国最明显，经济虚假的繁荣，繁荣里面带有很大的泡沫、水分，经不起考验。主要是结构发生了问题，没有优势产业。我们在1993年已经有过惨痛的教训，幸好我们宏观调控开始得早，要不然我们就是今日之泰国。搞经济工作要十分注意经济结构问题。不管发展什么产业，必须要有市场，要有效益，要改善经营管理，不能靠铺摊子。铺开摊子收拾不了，最后还不了钱，银行一垮台，整个经济都垮台。

第二，必须有一个健康的金融监管体系。就是银行制度一定要健全，中央银行一定要有一套强有力的监管制度，谁违法就关谁的门，就停牌。这次东南亚国家的问题普遍都是出在银行上面，都从银行开始垮。韩国、泰国都发生了这个问题，随便可以借外债。另外，商业银行本身资本金、准备金也不足，大量的投资形成不良贷款，中央银行根本就不管，事先也不发出警告，最后一垮台就不得了。

第三，国家必须有储备。备战、备荒为人民啊！现在经济是全球性的、开放性的，外部冲击一来，你没有这个实力就顶不住。我们现在的粮食储备是历史上最高的，资金负担压得我们受不了。说老实话，

我们为粮食付出的代价太大了，但是不付出这个代价怎么办呢？将来没有粮食，万一发生灾荒，整个经济都要动摇啊，还是把它当成一个愉快的负担吧！当然，这个体制要改革。

另外，就是外汇储备，这几年我受到来自各方面的批评，说外汇储备太多了，现在可以看出来，这个外汇储备并不多啊！同志们，要是没有这些外汇储备，现在我们能顶得住吗？当然外汇储备太多也是不好。今年我们的外汇储备大约有1400亿美元，明年升到1500亿美元，我看是绝无问题，这是必要的。

吸取这些经验教训，大家要有思想准备，明年经济增长的速度要降低一些。下面言归正传，讲几个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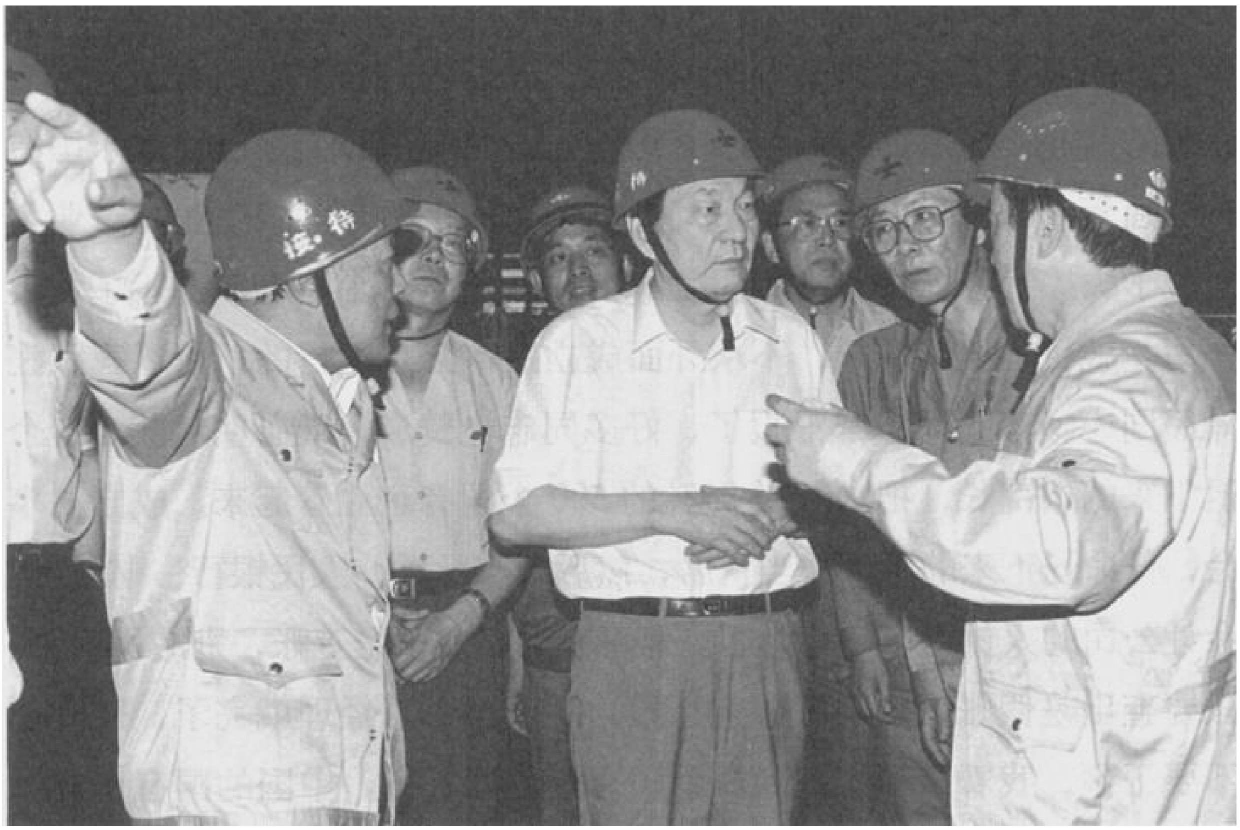
一、关于国有企业的改革和发展

这个问题大家很关心。中央提出用三年左右的时间，通过改革、改组、改造和加强管理，使大多数国有大中型亏损企业摆脱困境；力争到本世纪末大多数国有大中型骨干企业初步建立起现代企业制度。这个目标的提出是必要的，也是适当的，是完全能够实现的。我一直讲，要使国有大中型亏损企业脱困，必须针对造成亏损的原因去解决问题。主要原因有以下三条：

第一个原因是重复建设。搞重复建设，产品就没有市场，没有市场价格就下降，项目一投产就亏损，甚至于不能生产。去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我讲过，我说我讲这个话不代表国务院，我是作为你们的朋友，给你们一个忠告：不要再上项目啦，不要再新建设一般的工业项目啦！我们现在看得见的东西，全是供过于求的，有的甚至几倍地超过市场需要，使得国有企业不能满负荷生产，这是造成当前国有企业困难的最重要的原因。所以今年我在这里还是要讲，明年原则上不再新上一般工业项目，对基础设施项目也要从严控制。这些文字都经过了党中央、国务院领导同志慎重推敲，我的本意比这个还要严一点，就是新项目一律不要上了。你可以搞点技术改造，我们现在也决定放宽设备进口，国有企业进口设备可以免关税、免增值税，让你引进新技术，进行技术改造，搞出新产品或者改进老产品，但不要再去扩大产品生产能力了。

第二个原因是上项目没有资本金。项目建设资金主要靠银行贷款，有的项目负债率高达80%以上，你再好的效益也难以还得起银行利息。

第三个原因是吃“大锅饭”，人多。搞一个新项目就拉一大批人，七大姑八大姨都进来了。一个人的饭三个人吃，本来100人就够了，结果弄300人。这样，哪有不赔本的？



1997年7月21日，朱镕基在辽宁省考察抚顺矿务局西露天煤矿。右三为国家计委副主任曾培炎。

所以我觉得，要真正搞好国有企业，让亏损企业摆脱困境，最重要的，一是结构调整，不要再搞重复建设。二是没有资本金就不要上项目。我看这一条绝对不能放松，不管你是什么地方，没有资本金，银行绝对不给你贷款。三是减人，不减人办不好国有企业。减人的同时要做好再就业工作，保证职工最基本的生活水平，也要改变他们的择业观念。我们很重视这个问题，国务院准备明年召开一个全国再就业工程的大会，介绍各地的经验，把这个问题处理好。

关于增资减债问题，我们现在有几条思路。一是核销呆坏账。刚才讲企业负债率很高，经营不好。但是我们又不能把企业的债务都给免了，那是不行的。所以，我们只能够拿一点呆账、坏账的准备金，把一部分特别困难的企业，经过批准，纳入兼并、破产计划，免掉欠银行的债务。二是国家计委过去“拨改贷”的资金，本来是财政拨款，后来改成贷款收利息，企业受不了，现在再改回去，还变成拨款，那不就减轻企业负担了嘛。去年已经改了240亿元，今年再改300亿元，差不多改完了。三是到股票市场去筹集资金。现在看，企业发债券的效果都不好，最后都还不了钱，这样解决不了问题。经营好的企业，经过严格审查后去上市，到股票市场能够筹集到相当多的资金。今年包括到香港去上市，总共从股票市场筹集到了1300亿元，这对国有企业发展是个很大的支持。但是我们要考虑到，不能够光是锦上添花，能上市筹集资金的都是好企业，亏损企业是没有资格上市的，而我们现在要解决的是亏损企业问题，因此，我们鼓励优势企业上市筹集资金去改造、兼并亏损企业，这样国有企业的整体效益会进一步提高。

当然还有一条很重要，就是加强企业领导班子建设。现在看起来，一个好企业，很重要的一条是有一个好的领导班子。很好的企业去了一个坏的领导，一下子就把企业拖垮了。所以在这个方面，各地负责同志确实是要认真考虑，下点狠心，连续亏损的企业必须换领导班子。事实证明，换了以后就有很大的起色。最近我们在考虑国有企业怎么监管的问题。本来在1991年、1992年，国务院就制定了一个关于国有企业监管的条例，但是没有贯彻好。现在许多国有大型企业和企业集团处于失控状态。《公司法》里面规定的企业内部监事会，起不了太大作用。就目前这个状况，不从外面成立监事会是不行的。所以我跟江泽民同志、李鹏同志都汇报了，好多同志也赞成，准备明年找100个退下来的副部长，把占利税85%的500个国有企业管起来。成立监事会，任命退下来的副部长当主席，然后由审计署、人民银行、财政部、会计公司的人员组成一个小组。监事会的任务就是查账，别的不用管。只要查出是假账，就向国务院汇报，撤掉这个总经理就完了，别的你不要干预。我看只要把这500个国有企业办好了，中国的国有企业就有救了。因此，我们对搞好国有企业是有充分的信心的。

关于企业改制问题，主要是不要刮股份制和股份合作制的风。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五大报告里面讲，股份制这个形式，资本主义可以利用，我们也可以利用，不是搞私有化，这是理论上的突破。我也深刻地体会到，国有企业变成股份制，特别是上市以后有很大的好处，透明度提高了，更便于公众的监督，可以办得更好。但是从目前来讲，只靠股份制、股份合作制不能解决企业的问题。有些地方企业，工资都发不出去，还强迫职工拿钱搞股份合作制，简直是荒唐！江西省委书记舒惠国有一篇文章，我看了蛮欣赏的。我过去讲过“不是一股就灵啊”，舒惠国同志加以发展，他加了一句：“也不要一股就化，更不要一股就了。”股份制不可能适合各种情况，在外国，股份制也不是企业的普遍形式，上市公司更少，所以不是一股就灵。也不要一股就化，不要提出什么今年以内或者明年以内，全部实施改制，改成股份合作制，实现股份化。这都是“大跃进”那个时候的搞法，连工资都发不出去怎么“化”啊？也不要一股就了，以为把股份制、股份合作制一推广，事情就完了，那样国有企业就永远解不了困。所以我希望，这个问题要宣传得适度一点，还是多宣传领导班子如何振作精神，企业怎么通过“三改一加强”提高效益。

我为什么这么强烈地讲企业改制的问题呢？因为现在到处都在强调改制在多长时间改完。根据银行给我写的调查报告，这种所谓“改制”，就是把银行的债权都改掉了。我现在举几个例子：山东省烟台市提出乡镇企业改制中可以把银行债务挂在乡镇政府名下，做到轻装上阵。那你乡镇企业轻装上阵了，我这个银行怎么办下去呢？青岛平度市政府本着“卖光、卖断、卖彻底”的指导思想，在全市召开广播动员大会，推进乡镇企业的改制工作。安徽省今年6月初召开经济改革工作会议，要求今年全省乡镇集体企业改制面必须达到70%；阜阳地区召开了百万人电话动员大会，广泛动员改制。湖南省邵阳市和安徽省定远县，擅自规定银行要比照国家对国有企业兼并破产试点城市的政策，对银行贷款实行挂账停息。这怎么得了啊！工商银行安徽省定远县支行一直是个盈利行，今年二季度该县刮起小企业改制风，导致81%的贷款被悬空，没人还债，仅此一项，该行减少利息收入600万元，变成了亏损行。内蒙古乌兰察布盟行署领导在全盟的流通企业工作会议上提出，企业改制要解决好“四个不怕”，其中一个“不怕”就是银行不能怕资金流失。我都要向他“学习”了，我还没有这个不怕呢！我这里有一大本

调查报告，都是讲这些问题的，我三个小时也念不完。我只想讲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地方的领导同志，特别是市县乡村领导干部，要学习一点金融知识，至少要知道银行的钱跟财政的拨款是两码事，你不要拿着银行的钱当财政拨款去用，银行的钱是老百姓的钱，每天都得付利息，把这个钱花掉了要发生经济危机啊。所以，我建议国家经贸委、人民银行会同有关部门去调查一下，然后搞一个文件，提出几条办法来防止这种情况蔓延。要告诉各省市领导，地方各级政府没有权力来宣布银行的债可以不还！

二、关于金融改革

中央的会议开过了，通知也已经发出了，与此同时，我们成立了十几个由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和一部分地方同志参加的改革领导小组，研究制定落实通知精神的具体办法。这一次改革银行机构，成立金融系统党委，把金融系统党的关系收到中央，这个决定确实是历史上没有过的，这也是中国的特色。这样做，并不是对地方不信任，也不是说过去金融领域出现的问题责任都在地方。但是，地方党委和政府也确实有影响，特别是市县一级的政府和党委，对银行的贷款行为有很大的影响，造成了许多不良贷款。这次改革搞好了，可以保证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也能够保证商业银行按商业原则来开展金融业务，同时并不影响地方党委和政府对银行的监督，可能监督得更好。

三、关于粮食流通体制改革

这个问题不想多讲了，从1993年加强宏观调控以来，应该说中央的粮食政策是完全正确的，因此才有今天粮食储备大大增加、粮食价格下降的局面。但另一方面，我们也付出了很大的代价，就是粮食企业的亏损，1991年前的亏损挂账加上这几年新增亏损，总共亏掉1100多亿元了。所以，这个体制再不改不行了。请各地的负责同志有个思想准备，要研究这方面的问题。这次粮食流通体制改革大体上要在明年秋收前完成。

四、进一步提高对外开放的水平

我只讲一个问题，就是进出口税收政策问题。今年的贸易顺差预计达到350亿美元，去年才100多亿美元，进口萎缩，这是历史上没有过的。你只出口，不进口人家的东西，怎么跟人家做生意啊？所以国务

院经过多次讨论，现在基本上定下来，就是外商投资企业要进口设备，而这个设备是国内不能制造的，全部免除关税和增值税，明年1月1日开始实行这个政策。另外，为了鼓励出口，相应提高出口退税率。现在增值税税率是17%，我们出口退税退了9%。明年考虑从纺织工业开始试点，因为纺织工业萎缩得很厉害，急需鼓励它出口，把出口退税率从9%提高到10%或者11%，否则明年的日子恐怕很难过。

最后说一下，大家关心的政府机构改革工作。新的十五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和政治局指定我来负责牵头研究中央政府的机构改革问题。我经过跟一些同志商量以后，向江泽民同志和李鹏同志汇报，这个工作不能够大张旗鼓地开展，那样做的话，就会影响队伍的稳定。另外，一些好的意见一提出来，由于各部门的利益不同，往往一吵一争就变成一个情绪化的问题，最后就改不下去了，根本就没法改了。因此，现在我采取的办法就是一个部门一个部门谈，请每个部门的负责同志发表你对机构改革的意见，我已谈了五十几个部门了，我的腰已经都快谈断了，还没有谈完。但是我想，还是必须采取这样的办法，既不影响干部队伍的稳定，问题又了解得深入。初步看起来，意见分歧不是太大。现行机制我们实行了几十年，大家都知道弊病在什么地方，共同语言还是比较多的。所以，我并不认为政府机构的精简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大家的意见差不多，而且很多同志都认为机构臃肿问题，现在已经像一个脓疮都熟透了，必须把它割掉，这方面大家还是有共识的，也都有改革的意愿。等这一轮谈完以后，我会提出一个意见来，向江泽民同志、李鹏同志汇报后，再来第二轮，还是一个一个谈。大体上明年1月份能够拿出一个方案，一定会有妥善的安排，尽量不造成队伍的不稳定。这个事情向同志们汇报一下，有个交代。我想地方政府的机构改革，也请同志们加以考虑。

明年改革和发展的任务十分繁重，特别是金融体制和粮食流通体制等几项重大改革措施陆续出台，国有企业改革和经济结构调整的力度进一步加大，还要进行政府机构改革，下岗职工增多，人员变动较大。这些都给各级领导同志提出了新的要求，一定要切实协调好各方面的工作，处理好改革、发展和稳定三者的关系，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

认真吸取亚洲金融危机的教训

(1997年12月12日)

这是朱镕基同志在接见中国银行、中国人民保险(集团)公司海外机构总经理会议代表时讲话的主要部分。

最近几个月，东南亚发生了严重的金融危机，我们要吸取教训。虽然我们有幸避免了这场风波，但不能掉以轻心，因为危机还没有过去。不过，我看问题不太大，想动摇我们这个金融体系也还不容易。我们能够幸免，主要是中国经济实力的强大。另外一条不能否认的就是，我们的资本市场还没有完全对外开放，或者基本没有对外开放。我们进来的外资都是设备投资、借的外债，而且基本上是中长期的外债，所以人家动不了。上次我跟外国客人讲，投机力量想进来动摇我们，但没有这个渠道，所以，我们基本上可以避免这次遍及亚洲国家的金融危机。

近来，很多外国的领导人，包括前些日子来访的李光耀①跟我谈话，都在问我们的人民币是不是要贬值。我曾在报上宣布，中国的人民币绝对不会贬值。如果要贬值，港币和美元的联系汇率制度会受到极大的压力，所以我反复地讲人民币不会贬值。当时，李光耀说他完全相信，中国采取人民币不贬值的政策是完全正确的，但是光说没有措施，还是不敢相信。我跟他讲了几条，他听起来好像并不是那么信服。当然，我们面临的形势是很严峻的。东南亚国家的许多货币距值都在百分之三十、四十甚至五十以上，我们的人民币不但不动，还稳中有升，这样，吸引外资、出口商品的竞争力就大大削弱了。这个影响虽然目前还没有表现出来，但我想很快就要表现出来。比方说，吸引外资签的合同现在很少了。从实际的资金到达来看，现在还不会有影响。去年是417亿美元，今年可能达到430亿美元，但签的合同大大减少了。明年吸引的外资一定比今年减少，后年可能会减少得更多了。如果不采取有效措施，困难会越来越大。

---

① 李光耀，当时任新加坡内阁资政。

据昨天得到的消息，韩国的韩元由原来1美元兑849韩元已经掉到1719韩元，今天上午又掉到1900韩元。与此同时，印度尼西亚、泰国都受到很大的影响。特别是韩国、日本最近暴露的问题，是我们原来没有想到的。过去对亚洲“四小龙”说得了不得，现在回过头来看他们的银行制度，确实存在很多问题。我们也不要沾沾自喜，我们的银行也存在一些问题。为什么韩国的货币掉得这么厉害？原来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报的外债是1100亿美元，最近一查还得加600亿美元，差不多1700亿美元，是韩国的企业从国外借的。企业从国外借了多少，韩国中央银行根本不知道，结果现在发生了偿付危机。昨天，韩国中央银行行长要辞职。目前，韩国人心动荡，大公司纷纷倒闭。要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给的那一点援助，也不是那么好拿的。这等于把金融的调控权交给别人了，连财政赤字要打多少都要听它的指挥。

对这种情况，我们确实要提高警惕，认真吸取亚洲金融危机的教训。

第一，经济结构必须合理，不能搞泡沫经济。现在泰国和其他东南亚国家发生的问题，正是我们在1992年、1993年发生的问题。如果当时不是中央及时采取措施，那个时候的中国就是今日之泰国，不必等到今天了。泡沫经济在韩国的情况是这样，在日本也是这样的。日本当时神气得把美国的洛克菲勒中心都买下来了，现在不都统统退出了吗？日本搞泡沫经济、搞房地产，大量借外债，并且借的大量又是短期外债，泡沫一破，银行就垮台了，整个金融、经济都面临困难的境地。这对我们是深刻的教训。现在，我们至少还有3000亿元压在房地产上面没有解决，成为各大银行的坏账。大家确实要警锡。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五大报告里一再讲，我们现在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 会主义初级阶段。我看，有些地方的消费可不是初级阶段，已经是高级阶段，或者是半高级阶段了，太不相称。经济力量是初级阶段，但是搞的那些大楼比外国的都豪华。这些都潜伏着危机。



1997年12月12日，朱镕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接见中国银行、中国人民保险(集团)公司海外机构总经理会议代表。前排左一为中国银行原行长王德衍，右一为国务院副秘书长周正庆。

第二，必须有一个健康的、完善的金融监管制度、金融体系，我们现在还没有。现在看起来，亚洲国家所发生的这些问题，无一例外的都是由于中央银行根本不起作用，而银行又非常腐败，包括日本的一些银行。我们的国有银行则受地方行政干预，一些银行贷款是受地方政府指挥的，这怎么行呢？商业银行能办成这个样子吗？有人说，这是东方特色、东方的价值观，中国的、亚洲的银行讲关系、讲交情，不像西方的那样铁面无私。所以，这一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就是为大家创造条件，把金融系统党的领导关系收到中央，这样以后就没有借口了。现在我们银行内部还存在许多问题，不能完全怪地方政府和地方党政领导的干预。昨天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做总结时，我念了一封广东省河源市中国银行龙川县支行行长的信。这个龙川县支行就是完全受县委和县政府的指挥，大量地搞账外账，高利吸储，高利放

贷，以此表现县委书记、县长的“政绩”，目前投入基本建设的钱一个也收不回来。1993年7月7日，我提出了金融工作者“约法三章”；去年和前年，我又强调“约法三章”，不能搞“两本账”。在发生广东恩平事件①以后，当时国务院已经作过决定，谁再搞“两本账”，一定要把这个行长撤职、开除行籍。什么叫开除行籍？就是永远不得在银行系统任职。这些我早就宣布过。龙川县这个事情是在“约法三章”以后发生的。我非常气愤，让国务院办公厅到龙川县去调查，回来交的材料里面有一封信，就是那个支行行长写的。他在1996年11月给龙川县委全体常委写了一封信，大意是：县委常委叫我贷出这么多钱搞“两本账”，一个钱也收不回来，现在我已经感到没有出路了。这个事情应引起我们的警惕。不管这个行长是怎么受胁迫的，也必须撤销他的职务，开除他的行籍。人民银行总行要根据这件事情赶快给全国银行发个通知，谁再搞“两本账”，就以此为例。

---

① 广东恩平事件，指20世纪90年代，广东省恩平市的主要领导为了筹集资金上项目，擅自制定引资奖励办法，鼓励单位和个人引资，从而引发大规模的引资活动。为了保证兑付，恩平市领导又出面干预，令银行高息吸存、高息放贷，造成恶性循环。1997年年初，国务院派出工作组进驻恩平市调查处理此案，整顿金融秩序，事件的主要责任人均受到法律惩处。

我接到很多的反映，包括今天一位市长对我讲，银行系统的工资高，待遇、福利好，滥发奖金；人员随便提拔。我想，银行本身过去就是工资高一点的部门，高薪也是可以养廉嘛。现在的问题是，银行队伍里诈骗、贪污案件简直是骇人听闻。我跟人民银行和各国有银行的行长不知道提过多少次，要他们从严。现在对银行系统的问题处理得还是严的，你们不要骂行长，他们心软得不得了。都是我的主意，就是要严肃查处，再不查处，银行队伍就维持不了。我讲这个，目的就是要银行队伍自律。我们拿人民的血汗钱，享受了这么高的待遇，我们就要兢兢业业地工作。另一方面，每一位行长一定要从严要求自己的队伍，毫不客气，对贪污腐败分子，一定清出来，一定不能手软，而且一定要从严。这样才能使作案的人感到风险成本很高。所以，我再次对全体银行工作人员宣布，“约法三章”当中最重要的就是不

能搞“两本账”，谁要违反，一律撤职，开除行籍。这一条哪个行长不执行，我就把他拉下来。

第三，我们国家还是要有储备。这次人家之所以动不了我们，是因为我们国内局势稳定，粮食储备是历史上最高的水平。即使有两年大灾，我们也不怕。我们的财政赤字正逐年减少。但是，最可怕的是银行的不良贷款不断增加，这一点使我很伤脑筋。近年来外汇储备不断增加，今年年底肯定达到1400亿美元。这几年，我是受到来自四面八方的“攻击”，说外汇储备太多了，今天恐怕没有人再说了。如果没有这么多外汇储备，不但中国内地危险，连香港地区也危险。当然，香港是靠自己成功地维持了联系汇率制度，但是没有中央政府这个强大的后盾，它要应对这个局面就困难得很。所以我一再讲，同志们不要批评香港的联系汇率制度，道理非常清楚，全香港有3000亿美元的港币存款，你说联系汇率制度不能保了，人们一听说港币要贬值，都取出港币换美元，香港的外汇储备经得起换吗？所以，我们只有支持香港特区政府所采取的一切措施，在这紧急的时候、大敌当前的时候，不能批评人家，只能支持，为他们鼓劲。香港地区与其他东南亚国家和地区相比有根本的区别，它的这一套金融制度是比较健全的，甚至比日本的要好。另外，香港地区的房地产不像泰国这些国家，不是供过于求的问题，而是地价过高，导致房地产价格过高。所以，香港经济中泡沫经济的成分还是少一点，我们对香港的前途还是充满信心的。而对于我们自己，如果不采取对策的话，我们明年的经济确实要碰到很大困难。但是，我现在还是有信心的，信心就来自于大家。只要大家团结起来，认真地把工作做好，眼前的这些困难都是可以克服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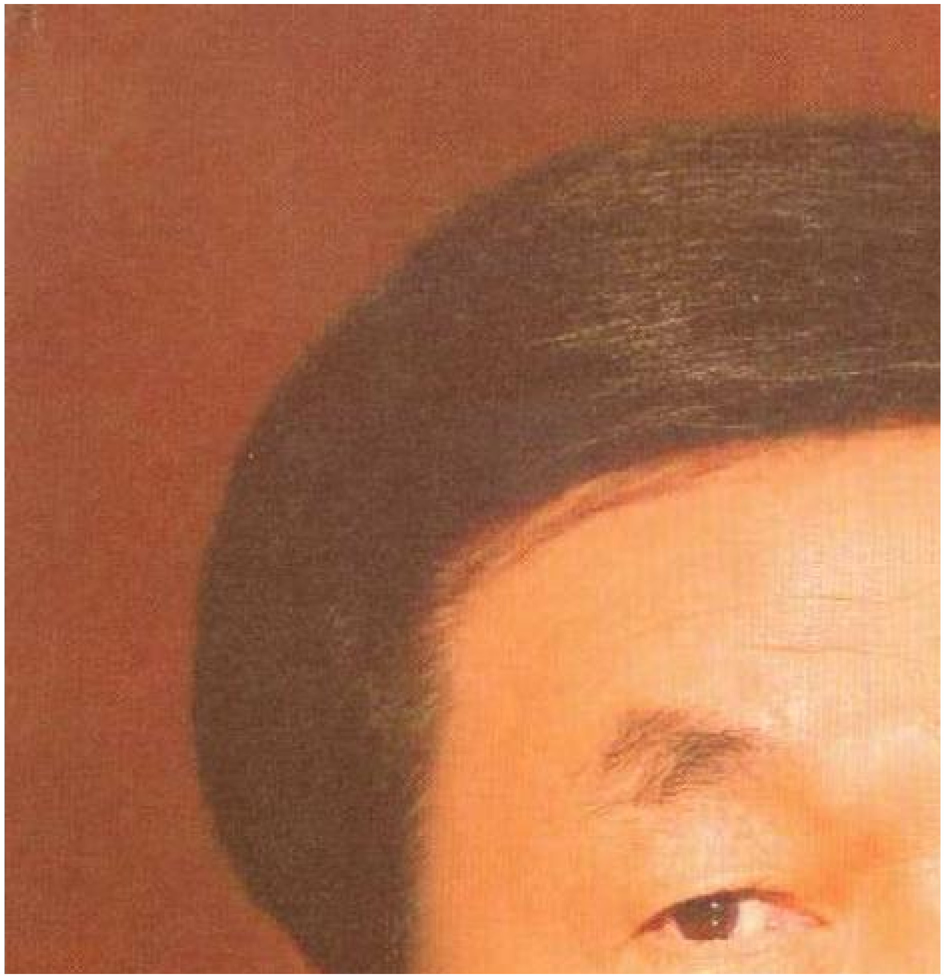
一个叫做所罗门的公司最近发表了一份世界经济报告，说中国明年的经济发展速度会大幅下降，人民币在明年下半年一定贬值。还有美林公司最近预言，中国的银行在技术上已经破产了。它对中国银行的情况并不太清楚，我们银行的不良贷款比例有25%，这点没错。但这25%的不良贷款里要分三块，这恐怕跟国际标准不太一样。人家分五种①，我们是分三种。第一种叫逾期贷款，就是超过合同规定的还款期的贷款；超过一天就算逾期，这个比例就比较大了，为13%。第二种，逾期两年以上的贷款，那就是有两年都不还款了，比例为百分之九点几。第三种是坏账，比例为1.7%，指完全收不回来的贷款。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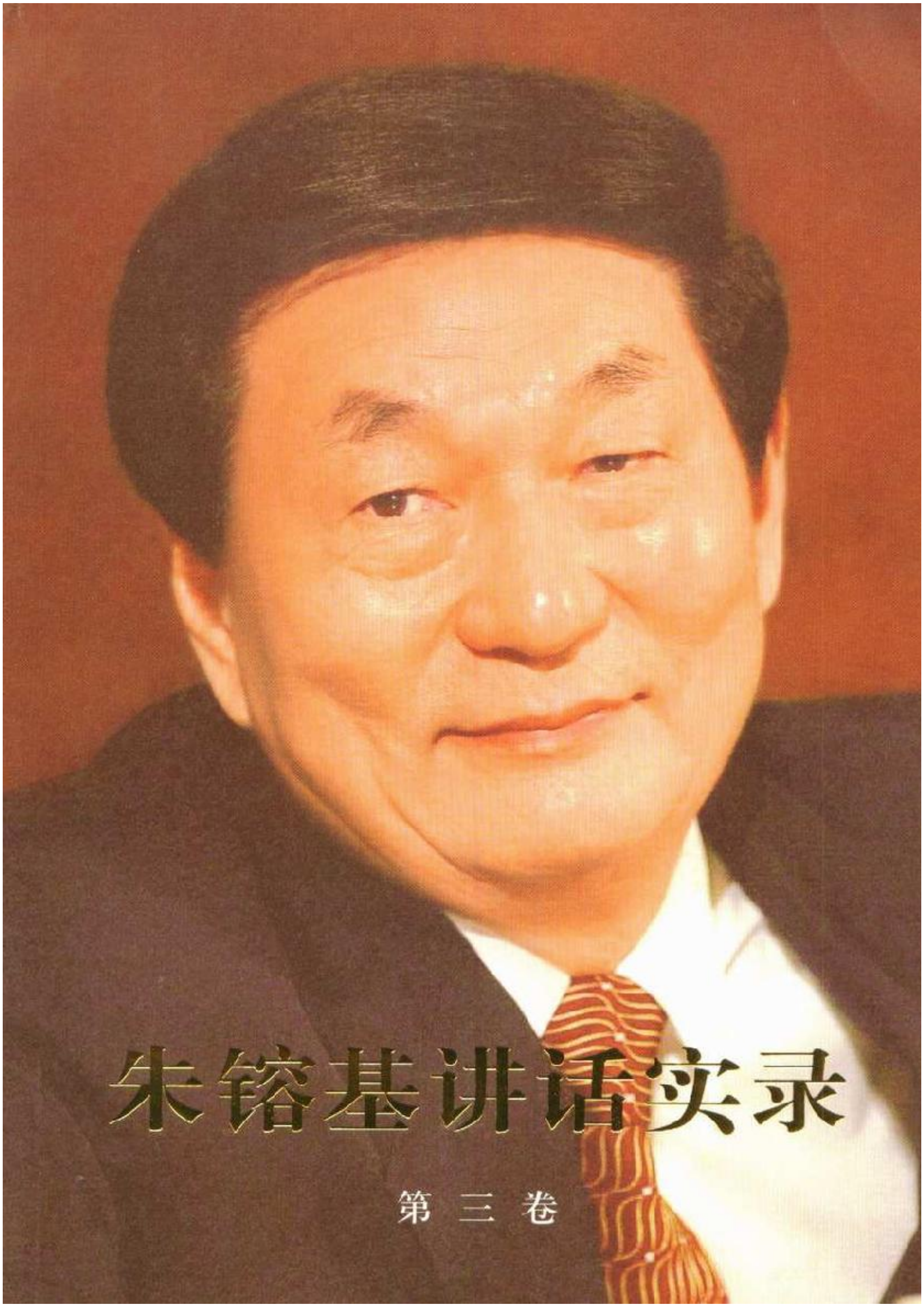
是，实际上我们25%的不良贷款中有相当大部分都应视做坏账，收不回来。所以各个银行的收息率很低，只有62%，应收未收的利息比例达到38%，今年有1570亿元，加上历史上的4000亿元，就是5570亿元，贷款的质量是很差的，这样下去是很危险的。尽管如此，也还不至于像美林公司所说的那样要破产。为什么？共产党在中国人民中间还有信誉啊！不会发生银行挤兑。但是也有一点，我们一定要把不良贷款比例降下来。如果老这么搞，不降下来，我就不敢说这个话了。我现在创造一切条件，让你们商业银行自主经营、自负盈亏，排除一切外来的干涉，剩下就靠你们自己了。现在的问题大部分是历史遗留的，一个是1992年、1993年泡沫经济留下来的不良贷款，另一个是最近几年大上项目、搞重复建设、根本不能还钱所带来的后果。今后就看你们的了，再也不能怪别人。不能再搞不良贷款，现在要求各个商业银行要撤并机构，加快一点地方银行体系的建设步伐，让地方分担一些风险，不要全压在国家身上。另外，把决策权拿到总行来，贷款几个亿的项目，总行都不知道，这叫什么银行？现在搞政府机构精简，一定要把政府各部门的财会人员、技术人员以及懂宏观经济的、懂生产技术的人员吸收到银行里来。今后需要银行贷款的项目，一律由银行决策。一旦决策失误，行长就要走人。有这么一种制度，中国的银行才有希望。

---

① 五种，指国际金融业实行的贷款五级分类制度，根据内在风险程度将银行商业贷款分为正常、关注、次级、可疑、损失五类，其中，后三类为不良贷款。2001年12月24日，中国人民银行发布《贷款风险分类指导原则》，宣布自2002年1月1日起，全面推行五级分类制度。

总之，我希望金融系统能够根据当前的形势，吸取东南亚国家和地区的教训，奋发图强，把我们自己的银行办好，早日使我们的银行成为国际水平的、现代化的、一流的银行。




朱镕基讲话实录
第三卷

朱镕基讲话实录（第三卷）

朱镕基

简介

《朱镕基讲话实录》选入的是朱镕基同志担任国务院副总理(1991年4月至1998年3月)、国务院总理(1998年3月至2003年3月)期间的重要讲话、谈话、文章、信件、批语等348篇，照片272幅，批语、书信及题词影印件30件。

《朱镕基讲话实录》分为四卷，其中，前两卷为朱镕基同志担任副总理期间的文稿，后两卷为他担任总理期间的文稿。各卷文稿均按时间顺序编排：第一卷为1991年5月至1994年7月，第二卷为1994年8月至1997年12月，第三卷为1998年3月至2000年6月，第四卷为2000年7月至2003年2月。

封面一

朱镕基讲话实录

第三卷

人民出版社

封面二

责任编辑：李春林　郑海燕　阮宏波
责任校对：吴海平　王　惠　阎　宓
装帧设计：曹　春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朱镕基讲话实录．第三卷／《朱镕基讲话实录》编辑组 编．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9
ISBN 978－7－01－010126－2

I．①朱…　II．①朱…　III．①朱镕基－讲话　IV．①D2－0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154933号

朱镕基讲话实录
ZHU RONGJI JIANGHUA SHILU
第三卷

《朱镕基讲话实录》编辑组 编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166号）

北京画中画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1年9月第1版　2011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本：700毫米×1000毫米 1/16　印张：33
字数：396千字　插页：2

ISBN 978－7－01－010126－2　定价：49.00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166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010）65250042　65289539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参与发行

图



1998年3月17日，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决定朱镕基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图为江泽民向朱镕基表示祝贺。



1998年3月24日，朱镕基在北京中南海主持召开国务院第一次全体会议并讲话。右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



1998年3月19日，朱镕基在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回答中外记者提问。



1999年3月5日，朱镕基在九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

编辑说明

《朱镕基讲话实录》选入的是朱镕基同志担任国务院副总理(1991年4月至1998年3月)、国务院总理(1998年3月至2003年3月)期间的重要讲话、谈话、文章、信件、批语等348篇，照片272幅，批语、书信及题词影印件30件。

《朱镕基讲话实录》分为四卷，其中，前两卷为朱镕基同志担任副总理期间的文稿，后两卷为他担任总理期间的文稿。各卷文稿均按时间顺序编排：第一卷为1991年5月至1994年7月，第二卷为1994年8月至1997年12月，第三卷为1998年3月至2000年6月，第四卷为2000年7月至2003年2月。

编入本书的文稿，均根据音像资料、文字记录稿和手迹编辑而成，绝大部分是第一次公开发表。有些曾经公开发表过的文稿，编入本书时为突出重点或避免重复，作了删节。有些过去曾经公开发表过的书面讲话稿，此次未编入本书，编入的是当时即席讲话的录音整理稿，其内容是对书面讲话稿的重点阐释和补充。编者对正文中涉及的部分人物、事件和专有名词等，作了简要注释。对专有名词在每卷首次出现时作注释，再次出现时只注明首次注释的页码。对担任党和国家领导职务的同志不再注释。本书文稿的多数标题为编者所加。

朱镕基同志逐篇审定了编入本书的全部文稿。

中央领导同志对本书提出了宝贵意见。中央有关部门和有关省、自治区、直辖市负责同志对本书的编辑工作提出了指导意见。中央有关部门，有关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有关单位提供了部分资料和照片。人民出版社对本书出版给予了大力协助。在此，一并表示谢忱。

参加本书编辑工作的有：李炳军、廉勇、张长义、谢明干、林兆木、鲁静、侯春同志。马东升、李立君同志参与了有关资料的收集整理等工作。

本书编辑组

2011年5月25日

在国务院第一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

(1998年3月24日)

1998年3月24日，朱镕基同志在北京中南海主持召开国务院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全体会议组成人员出席了会议，国务院各直属机构、办事机构和直属事业单位的负责同志列席了会议。在会上正式印发的朱镕基同志讲话，曾发表于《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册，标题为《励精图治，廉洁高效，做好跨世纪的一届政府工作》。编入本书的是朱镕基同志在会上即席讲话的录音整理稿。

今天，我着重讲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今年亟须抓紧解决、迫在眉睫的几件事情；第二个问题是政府机构改革，当前如果不做好这项工作，会影响整个社会的稳定和政府职能的正常履行；第三个问题是本届政府在工作作风和工作方式上要有一个大的转变，否则不能完成任务。昨天晚上，我几乎彻夜未眠地在考虑今天的讲话。因为是国务院全体会议，我请国务院研究室准备了一个讲话稿子，已修改过几次，并征求了各位副总理、国务委员的意见；稿子很全面，今天我不念这个稿子，会后印发给大家。这是即席讲话，我个人对自己的讲话负责，仅供同志们参考。上述三个问题我倒过来讲，从后往前，先讲国务院的工作方式和工作作风问题。

一、转变政府的工作方式和工作作风

同志们可以看到，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对我们这一届政府给予了极大期待：海内外的舆论都对这一届政府寄予厚望。我们如何能完成人民对我们的重托？我在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结束后的记者招待会上表达了我的真情。很多同志对我讲，你的讲话怎么没留一点余地？这是爱护我，也就是说，这些事情他们看来是不能完成的，别说三年，就是五年也完不成。但我为什么要这样讲呢？因为我深刻地感到，本届政府是跨世纪的政府，是一个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政府，如果错过了这个历史的机遇，下个世纪中国的事情就不好办了。我们应该看到，邓小平同志开创的改革开放的事业取得了空前的成功，李

鹏同志领导的两届政府为我们创造了好的宏观条件，我们国家的经济实力是比较强的，所有这些，为我们今后的工作打下了一个好的基础。但是，我们国家目前潜伏着很多危机，随时都可能爆发。我不是说政府危机，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是坚强的、团结的，可以驾驭任何复杂的局势。搞经济工作的同志都知道，现在问题很严重，老百姓在很多方面对我们是不满意的。特别是对我们的干部腐败，贫富差距悬殊，一些基层干部作威作福，有的高级干部官僚主义、漠视群众的利益，人民对此很不满意！但有一条还是满意的，就是经济持续发展，物价只跌不涨，保持基本生活水平是没有问题的。如果本届政府对存在的弊端不进行一个根本的改革，打下一个良好的基础，我看下一个世纪中国的事情就很难办。

在座的人里面数我的年龄最大，在座的同志包括“年轻”同志也不年轻了。我们工作了几十年，深知从计划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渡是多么的艰难，知道计划经济的弊病。所以，我们要想出一个比较好的办法来逐步解决，过渡到真正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我们需要在座的熟悉新旧两种体制的同志来担任主要领导。不能把那种夸夸其谈，理论讲一大套，根本不了解中国国情，不了解中国经济这几十年是怎么运转的人提上来，那是很危险的。对年轻有为的同志，看准了要选拔到上面来，甚至提到副手的位置上锻炼，准备提拔。但不能一步走完，解决这个问题是要靠一点权威的。第一代领导核心是毛主席，第二代领导核心是邓小平同志。现在树立了江泽民同志为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领导我们驾驭国内的经济形势，在邓小平同志逝世以后没有任何的波动，这是我们中国人民的幸运和幸福啊。本届政府可以说是集中了当今比较优秀的领导干部，我不是说这个班子是十全十美的，但中外一致认为是比较可靠的，是有能力的、有经验的，是可以应对复杂局势的。我们都应该为能参加这个跨世纪的领导班子感到自豪，感到骄傲。我讲本届政府前面是“地雷阵”、“万丈深渊”，我一点没讲错，当然我们要避开，不要掉下去。我们确实很艰难呢！同志们，从今天起，我们已经是一个“命运共同体”了，你们要下定决心跟我一起跳啊。不是往下跳，而是要用巧妙的办法，克服前面的各种困难，避开各种艰难险阻，到达胜利的彼岸。我们大家把命运拴在一起，都要有高度的责任感，赶快把这件事情办完，这样我们才好向人民交代。

我们一定要奋发图强，励精图治，把我们的政府建设成一个廉洁的、高效的、廉价的政府。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讲过“廉价政府”这个词，实际上就是指一个精简的、成本很低的、不浪费人民血汗的政府。我们一定要以身作则，变成这样一个政府，否则我们完不成这个任务。现在这样下去，是搞不好的。对于我们每个人，首先是我，同志们，你们后面也都跟着几十万人、几百万人，都要以身作则，做表率。只要国务院这个领导班子，包括我们在座的诸位，能够以身作则的话，就可以转变现在的不良社会风气。我一到上海工作，就信奉两句话：“民不服我能，而服我公。”就是说，老百姓并不是服我有多大的本事，有再大的本事也不见得比人家强啊，而是服我办事公正。“吏不畏我严，而畏我廉。”下面的官并不是怕我的严厉，怕的是我廉洁，屁股上没有屎。我行得正，坐得稳，我就敢于揭发你的歪风邪气。“公生明，廉生威。”公正才能明白，廉洁才能有威信，我在上海工作时一直就信服这个道理。我一直要求自己是公正的，尽管我并没有完全做到；我也要求自己是廉洁的，哪怕是一点小事，我都要考虑是否符合党的规定，不能有任何大意。我对自己的身边工作人员、家属都是这样要求。而且，我的秘书也经常这样提醒我，我们互相监督。我想，只要我们大家努力，是可以改变社会上的歪风邪气的。

我给大家提出五条要求以期共勉：

第一，要牢记自己是人民的公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能搞特殊化。最近，中纪委派出巡视组到一些地区和部门进行检查，查出不少问题。我就想不到，其中很多人还是我的老朋友，这么无法无天，哪儿还有半点公仆的气味？！爬到这个地位，就以为可以为所欲为，就可以随便享受啊？这怎么得了！

第二，要恪尽职守，敢于说真话。如果本届政府都是“好好先生”，我们就对不起人民。要做“恶人”，不要说“我们现在这个社会已经变成庸人的社会，都不想得罪人，我不同流合污就行了”，这样想是不行的。首先，你们可以得罪我。我这个人气量不大，很容易发脾气，你要跟我辩论，我可能当场就会面红耳赤。所以，我记住了这句话：“有容乃大，无欲则刚。”你没有贪欲，你就刚强，什么也不怕。这是我的座右铭。虽然我的气量不大，但是我从不整人，从不记仇，这是事实可以证明的。相反的，对于那些敢于提意见的人，敢于当面反对、使

我下不来台的人，我会重用他。当然，也不是对一切人都重用，如果他没有能力，我还是不能重用。但是，我绝对不会记仇。本届政府刘积斌①同志算一个，为了发国债的问题他曾跟我争得一塌糊涂，当时我对他很有意见。我到现在也认为，他还是错的，他那种发国债的办法是不行的，去年不是已经证明按我的办法做是正确的吗？不能搞市场招标，把利息抬得那么高，国家怎么负担呀？中国是特殊情况，国债利率比银行存款的利率高，世界上其他哪个国家有这种情况？你搞国债市场招标，只能把高利息给那些投机倒把的人。但是积斌同志很正直，很有能力，我认为选拔积斌同志担任国防科工委主任是很适合的。所以，请同志们对我放心。我当时可能会跟你们发脾气，跟你们争，甚至说一些很难听的话，因为“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我不是不愿意改，而是改不了了。但是，我这辈子只是被人整，从来没整过人。所以，我们都要变成这样的人，不仅敢于得罪像我们这样的领导，还要敢于得罪下面的人。不然，国家纪纲是树立不起来的。我对你们高度信任，我不担心你们打击报复，我担心你们不敢得罪人。你们首先要敢于得罪我们，其次要敢于得罪你们管的人，要把他们管起来。有些部门，处长在那里做主，地方的省长、市长来看他，他对人家连眼皮都不抬一下，这样做不好。国家计委就存在这种现象，地方有很强烈的反映。一个小姑娘坐在那里，地方的同志跑到她跟前去汇报，不但不让人家坐，而且连眼皮都不抬。变成“处长专政”，那还得了？我不是讲所有的处长都这样。如果有这样的同志，马上就把他换了。这些人都没有资格当处长，他们不是公仆，要送他们去学习。

---

① 刘积斌，当时任国防科学技术工业委员会主任；1988年6月至1998年3月，任财政部副部长。

第三，要从严治政，不怕得罪人。从严治政，要严格一点，不能随便就放过了。这不是放过一个人的问题，而是一个制度问题，否则，我们国家的命运可能就被“放掉”了。现在，我们很多同志怕说真话得罪人，怕别人不高兴，但是，你要糊弄我也不大容易。我们一定要养成敢于说真话的习惯。

第四，要清正廉洁，惩治腐败。我们自己要清正廉洁，才能惩治腐败，否则做不到。



1998年3月24日，朱镕基主持召开国务院第一次全体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右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钱其琛(右四)、吴邦国(右一)、温家宝(右五)，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罗干(右六)等出席会议。

第五，要勤奋学习，刻苦工作。确实要学习好多新知识。亚洲金融危机，我们过去没遇到过，那只有学习。各驻外大使馆发来的电报，我一份一份地看他们对亚洲金融危机的分析；虽然好多内容是雷同的，是从报纸上抄来的，但看一看，可以加深一下认识，100多份电报我都看了。境外报纸分析亚洲金融危机的部分我都看，香港报纸我一天至少看3份，看的就是经济版，不然我怎么知道它的股票行情、石油多少钱一桶。你不学习，你怎么应对现在这样变幻莫测的形势？不看材料，不看电视，不看报纸，不看《焦点访谈》，民间疾苦你都不知道、不了解，你怎么工作？人民来信可能现在我批的是最多的。同志们一定要关心群众疾苦。你看了才知道，有许多事情荒谬得不得了，令人发指，看了以后血压都会升高。我到国务院工作八个年头了，深刻地感到，出个主意是非常容易的。主意可以出得很多，可以天上地

下，博古通今，引经据典；定个政策也不是很难，只要你虚心听取各部门的意见，群策群力，也可以出台一个好政策，但是要落实就难得很。那不是你写一大篇批示，下面就会照着做，根本不是那么回事，最难就在于落实。我八年来的体会，就是要办一件事，不开八次、十次会议就没法落实。如果发一个文件，能兑现20%就算成功了，不检查落实根本不行。部委作出的任何决定、政策，也要下去检查、落实，反复地讲，反复地考虑。比如新疆的棉花，根本销不掉，几百万担压在国家库里面，不收上来也不行，农民就不种棉花了。为新疆的棉花，国家财政作出了很大的贡献。由于新疆的棉花价格比国外高，大家都愿意用进口棉花，我们自己棉花多了，却还拼命地进口棉花，走私猖獗。对这件事情我用过经济和行政办法，也不知开了多少次会，落实了没有呢？落实了，到目前为止，才卖出去几十万担新疆棉花。难哪！你们看没看3月15日那天电视的“3·15 行动”节目？这次是对传销这种不法行为的集中报道。什么是传销？就是一个人发展10个人，10个人发展100个人，推销假冒伪劣产品，害得参与者家破人亡。推销给病人的所谓“医疗器械”，搞得人家倾家荡产，病人原来还能站起来，使用后躺在床上起不来了。那些参加到传销网络里的人，有的几天就可以赚几千元，一个月赚上万元。我看了这个电视节目以后感到痛心。但是李岚清同志告诉我，他去年就作了批示，要取缔传销，文件给我看了，我也同意。时间过去一年多了，看来处理这件事情的阻力大得很呢。王众孚①同志，我不是批评你，工商局下面好多机构不一定听你的，因为都是属于地方的，有的腐败得很呢！但是，你还是有一个小小的缺点。岚清同志作了重要的批示后，你又印发了一个关于对传销的管理办法，那不就是说传销可以不取缔了！传销往往牵涉到地方的利益，那都是官啊，还有社会上的不良分子，都牵涉到里面。参加到这个传销网络里面的人，一旦要退出来，就要被毒打一顿。这是什么市场经济？简直是最黑暗的封建社会行为，所以非取缔不行，还能让它继续害人吗？我回忆起刚到国务院工作时，深圳的“股灾”就给了我一个下马威，全国都在搞股票。当时成都的股市有十多万人。他们在房顶上拍的照片，我至今还保留着。照片上人山人海，十多万人在那里赶骡马大会似的炒股票。四川省领导问我怎么办？我说坚决取缔，就是不许搞，不下这个决心怎么行？！所以，同志们，要落实、落实、再落实，你的文件发下去以后，你不下去跟着检查，没

有多少人理你。现在，我们一些公司的老总、地方上一些管经济的同志，既无知，又大胆，根本不懂经济，瞎指挥，胆子大得不得了。对这些公司不查不知道，一查吓一跳，报到我这里来的都是亏几十亿元的。中国农村发展信托投资公司亏68亿元，中国光大国际信托投资公司亏50亿元。最近，中国有色金属工业总公司炒国际期货，在伦敦期货市场上胡来，外国人都被吓坏了。后来，外国人看清楚了，这是一帮糊涂虫，就整了他们一下，结果亏了7.7亿美元，就是60亿元人民币，这不是对人民犯罪吗？！银行也是帮凶。中国有色金属工业总公司炒期货都是借外国的钱，也没有指标，这样做完全是违法的。谁给它担保的呢？中国银行湖南省分行。这个行长不但要撤职，而且终身不能在银行任职，我看他应该坐牢。中国银行总行都无权这样担保，何况一个省分行。领导班子是非常重要的。就怕这些“半吊子”，你说他不懂吧，他滔滔不绝，还能说几句洋文，搞得你晕头晕脑；其实，他狗屁不懂，在外面胆子大得不得了，就应该把这样的人撤了！不能怕得罪人。

---

① 王众孚，当时任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局长。

我们是“命运共同体”，大家互相激励、互相支持、互相帮助，就可以为全国的政府系统做个表率。因此，我们要共同“约法三章”：

第一条，在国内考察工作，要轻车简从，减少随行人员，简化接待礼仪，不陪餐、不迎送。我们带头做起，国务院的总理、副总理、国务委员下去考察工作，只带一个副部长以上的干部，其他有关的部门最多去一个司局长。很多问题在下面根本解决不了，没有必要带那么多人。不然，副部长不够用。国务院这么多副总理，他们怎么陪得起？不要一大帮子人下去，又吃又喝的，把风气带坏了。现在各省区市就这样，人民群众怨声载道。吃吃喝喝是不得了的，所以我加一句：不陪餐、不迎送。关于陪餐，我刚到国务院工作的时候，是非常严格的，要求不陪餐。到最后我没有办法，只同意陪餐一次，刚到地方的时候，省委书记、省长陪餐一次。后来，发展到去的时候吃一次，回来的时候还要吃一次。现在，我看不能再妥协了，还是各人吃各人的，搞到一起干什么？弄得谈话也不能谈话，搞得很庸俗。岚清同志说，把这个规定在报上公布，公布后，大家出去就都可以说，这

是国务院的规定，我们不想违纪。其实有一个省领导陪同就可以了，像我们下去都是代表政府工作的，省委书记就不必陪了。

第二条，精简会议，压缩会议时间，减少会议人员，不在高级宾馆和风景名胜区开会。我们可以到穷一点的地方去开会，大家去访贫问苦，也可以表示国务院对人民群众的关怀。

第三条，除党中央、国务院统一组织安排的活动外，国务院领导同志一般不出席各部门、各地方、各单位召开的会议。我们要刹一下“会议风”，什么都开会，讲的都是空话，最后还是不落实。国务院组成部门召开的会议，部长去讲，事先可以向主管副总理、国务委员汇报一下，该对你提的意见，当面就跟你讲了，你回去开会就行了。过去，我们把很多时间都泡在这种会议上面，没法思考问题。

还要作一个规定：国务院领导同志不参加接见、照相、颁奖、剪彩、首发首映式等事务性活动。我们要停止剪彩活动，我们国务院领导同志出席类似的活动干什么？国外也没有在职政要参加类似的活动。除国务院统一安排的以外，一般都不要搞，也不为各部门的各种工作会议发贺信、贺电，不题词、题名，在信封上签名例外。这个规定只管在座的这些同志。要把精力集中到研究处理重大问题上来，特别是下基层调查研究，了解真实情况。我们现在下去很难看到真实情况，地方事先都布置好了，我们有时突然改变他们的安排，马上就会发现问题。大家今后下去得想个办法，事先不要打招呼，想看什么临时决定，地方就来不及弄虚作假，否则我们看不到真实情况，制定的政策也不符合实际。“五条要求”和“约法三章”，我们大家要共勉。

二、关于政府机构改革问题

当前，你们要把相当多的精力放到这方面来，部门一把手要亲自抓，否则机关工作不能正常操作运行，会出大问题，火箭不能上天，飞机要掉到地上。稳定机关干部的工作情绪，提高他们的思想认识，让他们心里有底，这是个很重要的问题。但是，也绝不能因为要考虑到这些问题，就不认真执行这项改革措施，或者打折扣，这些都是不允许的。这次会议以后，各部门要马上开始制定“三定”方案，先定职能，否则部门之间扯皮；再定编制，不定编制就不能定人。这个事情要抓在前面。这项工作由主管各部门的副总理和国务委员负责，亲自

抓。我想，有几个部门是比较难办的，像国家计委、国家经贸委、外经贸部及国防科工委之间，彼此职能交叉。原则上一件事情只能由一个部门去办，不能由几个部门办。国家计委要尽可能在宏观调控，及时关注国民经济的总量平衡、总的走向等重大问题方面，帮助国务院出主意，少管些具体事情。

职能先定下来，然后定编制、定人数，国务院总人数要减一半，决心已定。首先，国务院要带头，副总理由上届的六位减到现在的四位；国务委员由八位减到五位，其中有两位还是兼职的。国务院副秘书长由十位减到五位，减了一半；机关工作人员减一半。如果国务院机关人员没有减一半，各部门也不会减。我们的国务院机关应该是高效率的，不减人就没有效率，老管一些不该管的事情，互相扯皮。精简机构以后，廉政建设方面相对好管一些。现在办任何事情都要钱，财政部门管收费的干部也要钱，最近人民来信反映，对企业的年检也要收费。现在财政和税务机关很不得人心，特别是直属税务局，你们要下去检查。人民群众最反感的是执法机关违法，腐败现象多半发生在这些单位。不客气地讲，公安、司法部门也是不得了。我看过一期《焦点访谈》，报道说山西某地公路收费，交警穿着军大衣，一来汽车就责令司机停下，开一张罚款单就是60元；司机稍有不服，马上加到120元；再不服，就是240元。你这不是“鱼肉人民”吗？这算什么执法机关？贾春旺①同志，我现在给你出一个“难题”，你那个公路收费工作一律交给交通部，公安部门要退出这个领域。你们因此减少了一笔很大的额外收入，今后国家可以考虑再补偿一点。这件事我们再商量，但是公路收费工作一定要交给交通部。一切工作都要实行“收支两条线”的政策，收钱的人不能管用钱。

---

① 贾春旺，当时任公安部部长。

国务院各部门定职能的事情要尽快分头定下来，定了的事谁也不能违背，力争到今年年底就开始正常运行，有的部门可以更快一些。分流出的一半人怎么办？这些人也是我们的宝贵财富，我们一定要把他们安排好，不能马上安排工作的，先安排定向学习，工资、补贴照发。中央国家机关3万多人里有54%的同志在40岁以下，还可以去学习。请宋德福①、陈至立②同志商量，统筹安排培训学习。要做细致

的思想工作，要发挥他们最大的作用。据我了解，现在的机关干部并不是很恐慌，有下去的思想准备，下去的待遇还有可能提高。请大家一定要把政府机构改革的工作抓好，初战必胜，千万不要出问题。另外，也不要造成误会。有些同志跟我讲，听说事业单位同样要减一半人，部里直属企业也要减一半人，那怎么可能？如果那样，我们分流的干部往哪里去？企业的职工下岗分流，那是由于效益不好，不减人就不能增效。我们讲的是分流机关干部，对事业单位只有一个要求：逐步减少补贴额。教育系统不吃“皇粮”根本就活不下去，但要减掉闲人。有些科研机构的后勤人员不减也不行，否则科研人员的待遇难以提高。各部门所属企业、事业单位同样有一个改革和调整的问题，但我们没有对它们提出减一半人的要求。这一点要明确，不要引起不必要的恐慌。在整个政府机构改革过程中，我估计还会发生一些问题，请你们及时报告情况。

---

① 宋德福，当时任人事部部长。

② 陈至立，当时任教育部部长。

三、关于今年的工作

在昨天的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上，国务院汇报了几项当前急迫的工作。江泽民同志主持会议并作了重要讲话，原则上同意我们的汇报，并指示我们要抓紧落实。我们汇报的主要内容，与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结束后的记者招待会上我讲的“一个确保，三个到位，五项改革”差不多。

第一是确保今年的经济发展速度达到8%。为什么要保8%？因为现在是骑虎难下，“九五”计划定的是8%，如果达不到，人民群众就会没有信心。我们初步估计今年经济增长8%并不难实现，经过努力还是能达到的。但是，有两件事情是千万不能做的：一是银行放松银根，生产积压产品，那等于“自杀”；再一个是搞“大干快上”，搞重复建设。现在就是要搞基础设施建设，但是含义可以更广泛一点，包括农、林、水、铁路、公路、高新技术、现有企业技术改造，还有大规模开展住房建设等等。我们在这些领域增加投入是有物质基础的，因为我们过去几年的货币政策比较紧，控制了货币的发行，现在我们可以多投放

一点银行贷款，特别是因为外汇储备在今年不会再按往年的速度增加。今年到2月底，我们的外汇储备没有增加，反而减少，相应地减少了外汇占用的人民币。去年是每天增加1亿美元，今年就停止了增加，甚至还减少了一点。

第二是关于金融问题，主要是今晚将要公布银行降低利率0.6%。这样可以减轻国有企业的负担，折合一年将近300亿元，有利于推动国有企业更好地发展生产。同时，可能导致存款的减少，但长期利率未降，只是降短期利率，影响不大。

第三是关于再就业工作。国有企业改革的关键在于再就业，宣传部门在这方面做得不错，还要加强，要改变人们的择业观。“三三制”①资金上财政已早做准备，中央和地方财政都留出了一部分资金来保证这些下岗工人再就业前的基本生活水平。今天下午，我将同吴邦国同志去东北地区，受江泽民同志委托召开三省一区的省(区)委书记、省长(自治区主席)会议，也就是全国再就业工作会议的预备会，听取他们对我们方案的意见。今年5月，我们将召开全国性的再就业工作会议。我想，把再就业这个问题解释清楚、安排妥当，一定可以激励我们的国有企业自强，使下岗工人安心，为我们今年的工作创造一个好的条件。

---

① “三三制”，指国务院规定对进入再就业服务中心的下岗职工，其基本生活费(包括缴医疗、养老保险金)由企业、社会、财政各负担三分之一。

第四是关于粮食流通体制改革问题。不改革不行，必须在夏收前解决问题。农业发展银行的收购资金一定要封闭式运行，准备在今年4月份召开会议。

第五是关于住房制度和医疗体制改革问题。各地试点都在进行，并且有自己的办法。我们现在要做的工作是对此进行规范，解决几个关键的、原则上的问题，推动住房制度和医疗体制改革更进一步。特别是住房制度改革，如果政策配套，对于今年的经济发展速度达到8%很有好处。

同志们，我们将共事五年，要精诚团结。国务院常务会议成员是团结的。我们是信任、支持你们的，你们也要相信我们是全心全意在这里工作的。我们大家没有矛盾，但会有意见分歧，不能保证在每个问题上都意见一致。我们受党教育多年，会服从大局，发扬民主，使我们国务院的领导工作能够符合实际情况。国务院领导同志之间会不会有矛盾、不团结？大家不要担心，没有！在大的问题上，我们是完全一致的，你们不要有任何顾虑。我们都是坦诚相见、畅所欲言，国务院一定会发扬民主，虚心听取大家的意见。我们现在建立了一种制度，停办国务院办公厅《昨日情况》刊物，改登国务院领导同志每天的批示，争取国务院领导同志的批示在两天内登出，这样，国务院领导同志之间随时可以沟通情况。现在，我对其他几位副总理的工作不是很清楚，清楚一点的就是财政和金融工作，就是这些有的也不是很了解。今后要解决这个问题，国务院领导同志之间每天要了解彼此的工作情况，并且尽量使我们对外的意见保持一致，以免使下面难以工作。请大家大胆工作，你们都是党经过慎重考虑选拔到领导岗位上来的，我们信任并支持你们。同时，也请你们监督我们，不要有任何顾忌。自觉接受同志们的监督，这一点我一定能做到。

妥善解决下岗职工的分流安置和再就业问题

(1998年3月25日、26日)

1998年5月14日至1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北京召开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和再就业工作会议。为了摸清实际情况，并为会议的召开做准备，朱镕基同志于1998年3月24日至26日到吉林省考察、调研，并在长春主持召开了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古四省区党政主要负责同志座谈会，听取对企业下岗职工分流安置和再就业工作的意见和建议。这是朱镕基同志在两次座谈会上的讲话。

一

(1998年3月25日)

党中央、国务院决定，用三年左右的时间，通过改革、改组、改造和加强企业管理，使大多数国有大中型亏损企业摆脱困境，力争到本世纪末使大多数国有大中型骨干企业初步建立起现代企业制度。这个目标完全有条件实现，关键是解决好下岗职工的分流安置和再就业问题。国有企业富余职工下岗分流，重新安置和再就业，虽然会给一部分职工带来暂时的困难，但从根本上说，有利于经济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符合工人阶级的长远利益。妥善解决下岗职工的分流安置和再就业问题，是社会主义本质的要求，是党和政府应尽的责任。这不仅关系国有企业改革的成败，而且关系社会稳定和政权巩固，是我们当前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必须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切实把这件事情办好。做好下岗职工分流安置和再就业工作，我想强调四个问题：



1998年3月25日，朱镕基在吉林省长春市主持召开的辽宁、吉林、黑龙江和内蒙古四省区党取主要负责同志座谈会上强调，要千方百计做好企业下岗职工安置工作和实施再就业工程。前排右一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吴邦国，右三为国家经贸委主任盛华仁，右四为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戴相龙。

(一) 国有大中型亏损企业三年脱困，减人是关键。 造成国有企业困难的原因，实实在在地分析，主要有三个：一是重复建设，二是盲目建设，三是人员膨胀。重复建设的问题还在继续，因为“点”都铺开了，收不了场，不把它建成，几百亿元就浪费了，把它建成还要再投入几百亿元，而且会把原来生产同类产品的国有企业打垮。盲目建设，就是为了创造什么“政绩”，没钱也要干。根本就没有资本金，全部用银行贷款搞项目，又是搞重复建设，贷款根本还不起，结果只能是亏损。我曾多次就这两个问题提出过忠告：别再上一般工业项目了，没有哪一样工业产品是短缺的。但重复建设、盲目建设没有完全制止住。从现在开始，必须下决心制止重复建设和盲目建设，对 一般工业项目，

中央财政绝对不拿一块钱补充资本金。我们不能把财政的钱随随便便投到一个项目里去冒风险。财政的钱主要用于解决公众利益问题，如基础设施、公共福利等。实施再就业工程就是搞公共福利，财政的钱要用到这些方面，而不能去乱搞项目。当前国有企业的一个突出问题是富余人员过多，企业负担沉重，不仅人浮于事，而且互相扯皮，影响职工积极性的发挥和企业效益的提高。国有大中型亏损企业要实现三年摆脱困境的目标，除了制止重复建设和盲目建设外，减员是一个重要途径。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对外开放的扩大，市场竞争日益激烈，继续沿用以行政的手段保护亏损企业的办法是行不通的，必须走鼓励兼并、规范破产、下岗分流、减员增效和实施再就业工程的路子。只有把人减下来，国有企业的亏损问题才能比较好地解决。

(二) 富余职工下岗分流是一个方向，是一项大的政策，是振兴国有企业的根本性措施。 绝对不能因为中国人多、要就业，国有企业就多招人，那不行。企业人员过多就会导致企业缺乏竞争力，没有竞争力的企业就无法生存。

我国有12亿多人口，到本世纪末将达到13亿，就业是个大问题。尽管这样，也不能把人都往国有企业里塞。我们一定要把国有企业建成现代企业，能用三个人的不能用五个人，使国有企业具有竞争力，能够参与竞争，这样才能够生存。国有企业真正有了效益后，才有条件去安置富余人员，去不断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不能让大家都在企业里混，“一个人干，一个人看，一个人捣蛋”，那样是干不好工作的，必须把另外那两个人请走，不叫他看了，更不让他捣蛋了，就留一个人在那里干。国有企业的改革和发展，减人是个方向，非减不可。因此，要实施再就业工程，负责对减下来的人进行妥善安置并逐步促进他们再就业。正是由于我国目前社会保障制度还不健全，远远不能满足需要，所以国有企业对减下来的人要自己负责安置和促进再就业， 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内容。

(三) 对于符合政策的下岗职工，一定要保障其基本生活。 国务院提出对进入再就业服务中心的下岗职工，其基本生活费(包括缴医疗、养老保险金)由企业、社会、财政各负担三分之一，即“三三制”原则。按照目前企业、社会和财政的承受能力，是完全可以做到这一点的。对

企业来说，这个负担比例并不高。上海市下岗职工的基本生活费包括医疗和养老保险一年是4000元，而职工年平均工资约1万元，4000元还不到全市年人均工资的一半。企业承担三分之一，实际上就负担原来工资的六分之一，一般企业完全可以承受。对一些特困企业，财政还要负责兜底。关于财政负担三分之一，这也不是很困难的。刚才讲你们四省区下岗职工加起来约200万人，其中国有企业职工只有110万人，要先解决国有企业的问题。实际上，你们这里的职工收入水平要比上海的低，基本生活费最多需要40亿元，财政负担三分之一，也就是13亿元左右，其中中央财政还要补助30%左右，剩下的由四个省区财政负担就没有多少了，你们应该负担得起。中央财政补助资金以专项转移支付方式补贴给中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现在社会上有多种救济渠道，社会负担的三分之一，也是拿得出来的，特别是现在提高了失业保险金的提取比例，这个钱是可以保证的。总之，就中央和地方总体的财力来讲，这点钱是拿得出来的，少搞几个重复建设、盲目建设项目，少搞一点铺张浪费，这个问题就可以解决。



1998年2月12日，朱镕基在天津针织厂了解企业解困和职工再就业情况。前排右二为国务院副秘书长张左己，右三为天津市委书记张立昌。

（四）要千方百计地实施再就业工程，这是企业职工下岗分流安置的最终途径。转变下岗职工的择业观念，是实施再就业工程的关键。我到天津、上海等地考察，感到现在不是没有就业岗位，而是有许多工作下岗职工不愿去干。现在有的企业亏损得一塌糊涂，到银行里去挂账，但是工厂内部的绿化、清洁工作却要雇外面的民工来干，下岗职工不愿干，这怎么能行？张立昌①同志在天津跟我讲，一些下岗职工认为送报纸一类的活比较“高尚”，可以干。我问去送外卖行不行？像美国买比萨饼，打个电话就送上门来。他说那就不会干了，至于绿化、清洁，那下岗职工更不愿意干了。我想将来开全国会议的时候，要请全国总工会的负责同志就这方面问题讲一讲。服务行业的就业潜力很大，比如保姆、钟点工等等。不能认为做这种工作就低人一等，而应该看到这也同样是一种高尚的职业。对许多家庭来讲，也迫切需要这种服务，这样可以使职工把本职工作干得更好。这完全是个光荣的职业。昨天，张德江②同志告诉我，吉林的农村专门有人把活猪运到北京等大城市去卖。去年吉林农业减产100亿斤，农民收入却没减少，还略有增加，主要是因为发展了饲料加工、畜牧养殖等多种经营。把猪销到上海、北京，吉林农村专门有一批人干这件事，也不是政府组织的，他们不吃“皇粮”，既活跃了农村经济，增加了农民收入，也方便了城市居民生活。但是，传销不能做，传销会害得人家破人亡。国务院即将下发通知，坚决取缔传销活动。

---

① 张立昌，当时任中共天津市委书记。

② 张德江，当时任中共吉林省委书记。

我们相信，只要各级领导高度重视，采取切实、有效措施，再就业问题一定可以解决。

二

（1998年3月26日）

这次会议开得很好，充分发扬民主，达到了畅所欲言、沟通情况、摆出问题、进一步统一认识的目的。同志们提出了许多很好的意见，这些意见对我们很有启发。下面，我就保障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的范围、标准和离退休人员与再就业工程的关系问题再讲几点意见。

第一，关于范围问题。为什么党中央、国务院这么重视企业下岗职工的分流安置和再就业问题？为什么新一届政府刚刚成立就到这里来讨论这个问题？这里的着眼点是为了保障下岗职工的基本生活，促进再就业，以保持社会的稳定。没有社会的稳定，也就没有社会的发展。而如果下岗职工的基本生活得不到保障，他们长期不能实现再就业，社会就不可能稳定。因此，保障下岗职工的基本生活，千方百计地实施再就业工程，事关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是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各级党委、政府最重要的任务之一。我们的领导干部和各个部门，要把大量的精力用在这方面。

我在天津看了再就业服务中心，在上海也与有关方面座谈过这个问题，昨天又看了长春的再就业服务中心。这些地方的再就业服务中心利用现代技术手段，沟通求职者和用人单位的信息，把劳动力组织好、管理好，帮助下岗职工找到生活出路。这项工作意义重大，但刚刚起步，要进一步加强。

保障下岗职工的基本生活，一定要考虑重点在什么地方。如果我们制定一个政策，对所有下岗人员都要保障他们的基本生活，那么现在已经离开工厂好几年的人，也会回来要求“落实政策”，将给那些困难企业、亏损企业以及地方政府造成不应有的麻烦。

昨天，吴邦国同志讲了，企业职工下岗不是改革造成的。但一些人有误解，认为现在1000多万名职工下岗是因为党中央、国务院提出了“鼓励兼并、规范破产、下岗分流、减员增效和实施再就业工程”的方针造成的。这种观点是完全错误的。中央这个方针是在去年1月份提出的，3月份正式发的文件①，正是针对一些地方出现了擅自破产、兼并和下岗职工无人管等问题提出的解决对策。实际上，各地早就有职工下岗的情况存在，只是没有叫“下岗”，吉林叫“放假”，别的地方或者叫“停产半停产”，或者叫“关门”，其实职工早就下岗了。好多企业从1994年以后就发不出工资了，那不就是下岗嘛，而且比下岗还厉害。职工下岗后，虽然名义上还在厂里，但实际上让他回家，工厂根本不管了。当时，中央对此还没有一套政策，企业没有办法，地方也没有财力。昨天，我在长春看了再就业服务中心，跟几个求职的职工谈了一下，他们基本上都“放假”了，企业什么都不管。只有长春第一食品厂的一个职工，在“放假”的第一个月从厂子领了130块钱，从此以后，好几

年一个钱也没拿到过。这怎么能说是因为中央的政策引起下岗呢？再说，职工下岗也是个必然的过程，国有企业困难的三条原因，很重要的一条不就是人员膨胀吗？企业本来只能养活一个人，却让三个人在里面，不让那两个人下岗，这个厂子能办好吗？这样下去，企业根本就没有竞争力，根本就办不好。职工为什么下岗呢？那是因为企业亏损没有竞争力，不减人，就不能增效，道理很简单。现在有1000多万人下岗，也反映了这样一个必然的过程。所以，一定要把这个关系搞清楚，那都是过去造成的，有的是1993年经济过热引起的后遗症，有的是几十年的后遗症，是历史原因造成的。现在，谁也不要埋怨，关键是怎样把这个问题解决好。

---

① 指1997年3月2日《国务院关于在若干城市试行国有企业兼并破产和职工再就业有关问题的补充通知》。

国务院文件中要明确，保障下岗职工基本生活的范围和重点是：现在与工厂还没有解除劳动关系、已进入再就业服务中心的下岗职工。有好多企业至今没有建立再就业服务中心，这个问题要因地制宜地解决。那些离厂好几年的职工，尽管还没有与工厂解除劳动关系，但是不能够全回来。要对此做一点调查，比方说，有的职工已经找到职业了，就不能再回原来的企业领基本生活费。有的职工虽然离开企业好几年了，却一直没有跟企业解除劳动关系，现在“流离失所”，政府、企业、社会也要负责救济、补助。这是个复杂而具体的事，要制定一套具体办法，让各地因地制宜去搞这件事情。

关键还在再就业，如果实现了再就业，就没有人跑到企业来要求“落实政策”。建议东北地区在全国再就业工作会议结束以后，选择适当时候开个经验交流会，大家交流一下再就业方面的经验、做法。建立再就业服务中心，最重要的是要配备工作能力强的干部，利用好现代技术手段。对今后职工下岗，一定要建立下岗的申报制度。如果不成立再就业服务中心，不能保证下岗职工的基本生活费就强制性地让人家下岗，那绝对不行，政府和工会组织要进行干预。



1998年3月25日，朱镕基在吉林汽车制动器厂下岗职工家中了解他们的生活情况。

今后，下岗职工一律要进入再就业服务中心，这要作为一种制度确定下来。不是不允许职工下岗，而是下岗职工一定要进入再就业服务中心，保障其基本生活。企业要申报，因为政府要补助下岗职工基本生活费；企业如果不申报，怎么补助？另外，绝对不能把盈利企业减下来的职工也由政府补助基本生活费。不是亏损企业，不得向政府申请下岗职工基本生活费，只有很困难的企业，连职工下岗后六分之一的工资都拿不出来，才能够申请补助，这个原则要明确下来。保障下岗职工基本生活的范围问题，我在北京时就考虑过，恐怕将来召开全国再就业工作会议、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后，制定办法时还要做修改。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以及国家经贸委要派人下去调查，到各省的再就业服务中心看一看搞得怎么样，要调查企业建立下岗职工再就业服务中心的普及面到底有多大。

第二，关于标准问题。我强调两点：一是“三三制”是个原则，不是绝对的。不是说对所有的企业都要财政补贴三分之一，这要看具体情况。如果这个企业确实困难，连三分之一也拿不出来，政府财政要兜底，要给这个企业更多一点的补助。如果这个企业虽然也困难，但不需补助三分之一，就不要给补助那么多。下岗职工每人每年补助的标准，应由各地根据本地情况确定。

第三，关于拖欠企业离退休职工工资和养老金问题。这个问题虽然不属于下岗职工的分流安置和再就业问题，但有的同志反映，这是各地当前矛盾比较多、容易引起社会同情、影响社会稳定的第一位问题。有的同志说，现在虽然下岗职工比较多，但像离退休职工那样的集体上访事件还不多。因为他们还年轻，多少还可以找到一点活儿干，或者还可以依靠父母。离退休人员一点没依靠，如果再领不到养老保险金，他们就“流离失所”了，所以，他们要讨个说法。这个问题值得我们高度重视，回北京后要认真研究。产生这一问题的主要原因是，养老保险基金入不敷出，又缺乏必要的积累。我的基本看法是，拖欠企业离退休职工工资和养老金，涉及的问题比较多，是影响社会稳定的大事，一定要采取切实措施解决好。一是要提高养老保险的覆盖面。就是说，“三资”企业、合作企业等城镇各种所有制企业，都要参加统筹，都要交养老保险金。新建企业对养老保险金暂时是不需要的，交上来后就可统筹调剂，完全靠国有企业的养老保险搞不下去。现在有的地方，每两个在职职工就养一个离退休人员，还有个别的企业是一个人养一个人。面对国有企业这种一代人要养两三代人的状况，养老保险金根本不够，很大的危机是“寅吃卯粮”，所以，一定要提高养老保险覆盖面。要让那些新办企业的年轻人作贡献，特别是“三资”企业，对它们要严加监管，一定要交养老保险金。这与投资环境无关，在哪个国家都得交，发达国家的养老保险金标准还比我们高得多。二是提高养老保险基金的收缴率。企业有钱不交不行，要查账，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一定要加强这方面的工作。三是加强养老保险的资金管理。到去年，养老保险金被挤占挪用了94亿元，这种情况不能再继续下去。现在中央已规定，不允许拿这个钱炒股票、搞房地产，自以为回报率高，其实风险很大，可能一下子就没了。我们硬性规定，养老保险金只能买国库券或存银行，不能干别的，干别的就是违法，相关人员就要被撤职。为了防止挪用、贪污，要实行“三驾马车”来管这个

钱：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负责收缴，存入财政在银行的专户；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要给企业拨多少养老费，先开单子，经过财政部门审核同意，然后才能从银行财政专户中拨付；银行没看到财政部门审核的意见，不能给钱。这一条必须很明确。

本届政府要转变工作作风，不要把力量和精力用在搞项目上，以为搞项目就能搞出政绩，那是绝对错误的。那个“政绩”可能“成名于一时，骂名于一世”。搞的时候出了“政绩”，剪彩的时候风光得很，项目一投产就亏损、就关门；过几年以后，人走了，升官了，后人要骂你一辈子呢！本届政府绝不搞这一套，从我开始，就不去指定搞什么项目，精力要放在为人民谋福利上。群众的积极性高了，生产才能发展。我们要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社会保险问题已经非抓不行了。外国的失业率很高，欧洲达到百分之十几，比我们的高；但人家的社会保障制度完善，人即使失业了，也能活得下去。在目前我国社会保障制度不完善的情况下，国有企业改革是很困难的，动不了人，很难破产。现在企业破产要有指标，自己乱破不行，过去那种破产方法是行不通的。为什么呢？人为破产后，资产首先要还债、要交税，企业根本没有钱来安置人员。再说，资产也值不了几个钱，连欠账都还不清，怎么能破产呢？企业要破产，要有严格审批程序。现在养老保险金欠债很多，我想请财政部、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国务院体改办等部门一起来研究。西方有个办法，为了弥补养老保险金的不足，发行一种不还本的国债。美国在历史上就发行过一种期限长达100年的国债，当时美国的社会保险制度还不完善，这种国债只给利息不还本。这带有一定的社会救济性质，很多有钱人还是愿意买的，因为有安全保证。再一个办法，就是将来要收社会保障税。最近，项怀诚①同志到美国考察，美国一年税收1.6万亿美元，其中8000亿美元是所得税和消费税，占一半；其他8000亿美元中有4000亿美元是社会保障税，是从个人那里收来的；而个人所得税很少，只有2000亿美元。将来，我们要完善税收制度，要考虑收社会保障税，不然，社会保险基金建立不起来。

---

① 项怀诚，当时任财政部部长。

总之，要从各方面加强管理，开源节流，把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逐步健全起来。当然，如果把重复建设、粮食亏损挂账问题解决了，国家就可以腾出几百亿元用到这上面来，财政预算也可以增加安排一块到社会保险基金里去。但目前暂时的困难，企业还要承担，不能不发离退休职工的工资和养老金，借口交不起养老保险金不行，要提高收缴率。虽然一些企业还没有倒闭，但确实困难的，尽管一两年没交养老保险金，也要给这些企业的离退休职工发养老保险金。失业保险也要加强。增提的两个百分点，一个点由个人交，另一个点由企业交，主要还是要用于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再就业，失业救济就只能靠原来那一个百分点。

政府机构改革要决心大、步子稳、工作实

(1998年4月10日)

1998年3月31日至4月11日，国家行政学院与中共中央组织部、人事部、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共同举办省部级干部推进政府机构改革专题研究班。这是朱镕基同志在研究班学员座谈会上讲话的主要部分。

这期省部级干部推进政府机构改革专题研究班，办得很及时，我非常支持。下面，我讲两点意见。

一、政府机构改革势在必行，政企必须分开

我先讲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是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节目报道的。某市有个葡萄酒厂生产“三梅酒”，是个名牌，企业被兼并后，商标也应该转让。但市委书记让市财政局把商标买下来，变成政府的商标。企业已被三九集团兼并，牌子就是不给人家，这个市委书记还振振有词。真是管得太宽了！如果我们的省委书记、省长、市长都这么干预经济，中国的经济怎么能搞好？怎么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企业都在长官意志的指挥下，还有什么竞争？还是吃“大锅饭”嘛！第二件事，最近上海搞“牛奶大战”，发人深省的地方在于企业把牛奶价格降到成本以下出售。这反映了一个机制问题，因为亏损了，工厂可以不负责任，可以挂在银行账上，由银行出钱。这也是行政干预的结果。同志们可以做点调查研究，如果哪一个企业亏得一塌糊涂还在生产，其后台不是市委书记就是市长。吃亏的是国家，账都挂在银行，一旦爆发金融危机，后果不堪设想。所以，再也不能搞政企合一了，再也不能搞行政直接干预了。

那么，政府管什么？政府首先是管市场，要把市场管住、管好。可是，现在政府不是管市场，而是办市场，政府同经济利益直接挂钩，也就没有公平竞争了。其次，政府要管质量。这次把质量技术监 督局从国家经贸委划出来直属国务院领导，就是要提高它的地位。虽然没有升级，但国务院决定加强这个部门，准备派几名副部长去加强领

导。政府该管的是市场和质量，不是去指挥企业的生产经营，不是去命令银行给企业贷款。这首先是个体制问题，但也说明政府机关人多了。如果人少一点，就没有那么多精力和时间去干预企业了。

转变政府职能的关键是政企分开。这次政府机构改革，为什么要把工业部门撤掉，改成国家经贸委管理的国家局呢？事实已经证明，靠工业部门管企业的方法是管不好的。过去设置八个机械工业部，也难以把机械工业管好。现在情况复杂多了，更难以管理。从机制上看，工业部门从本行业的利益出发，很难对自己管的企业认真进行监管，工作重点往往偏于向中央要钱、要政策。本届政府决定，工业部门没有管企业的任务，改为国家局，划归国家经贸委领导。这些工业局干什么呢？搞规划、搞行业政策、搞项目布点，防止重复建设等。总之，工业局和企业没有直接关系。

那么，今后政府对企业如何监管？就是要建立国有企业稽察特派员制度。实际上就是国务院派出的监事会，但是为了不同《公司法》规定的企业监事会相混淆，称为稽察特派员。由国务院派出，每个稽察特派员配专职助理四人，主要是配备懂审计、会计、金融和监察等方面的人员。这是企业管理机制的一个根本转变。

稽察特派员的任务主要是查账，不干预国有企业经营管理。稽察特派员一年去查两次账，对国有企业的财务状况进行分析、评估，搞清究竟是亏还是盈；同时，对企业主要领导成员的工作业绩进行评价。稽察报告经国家经贸委等部门审核后，向国务院呈报；然后，国务院通过人事部，根据情况决定对国有企业主要领导人的奖惩任免。为什么要这么做呢？我举几个例子。一个是某总公司，不经国家计委和国家外汇管理局批准，借了11亿美元的外债，做生意、搞期货。去年，我们发现它亏了1.5亿美元，赶快采取措施调整了总公司的领导班子。现在查出一共亏了7.7亿美元，简直是胆大包天！还有一个公司，原来说，这个单位好得很，多年都没有发现有什么问题。去年有人揭发，派人一查，亏损68亿元。我们当即决定，马上撤销了这个单位，由中国建设银行接管。这些亏损最后都由国家承担。同志们，如果我们的国有企业不是这样事先不请示、事后不报告，大把大把亏损，国家何至于像今天这样困难？国务院决定向国有大企业和企业集团派稽察特派员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是实现政企分开的重要举措，是对国有企业

管理方式的重大转变，也是符合国际惯例的。不这样做，大多数国有大中型亏损企业三年脱困的目标就成了空话。

稽察特派员到企业查账，一要同国有企业财务会计制度的改革结合，逐步建立符合国际惯例的现代企业财务会计制度，派有稽察特派员的企业要先做起来。二要同审计、工商部门结合，要充分利用审计、工商部门的成果，如有必要也可以请合格的会计公司帮助。派有稽察特派员的国有企业不再搞财务大检查，通常的审计也就可以不做了。稽察特派员只要敢于讲真话，不怕得罪人，就能查出问题。

为什么要人事部管这件事？现在看来，国有企业能不能搞好，关键在于领导班子、在于一把手。有的人无法无天，对他不能没有约束。我们派人去盯住他，把那本账盯住，不行就把他撤下来，让能人上。派稽察特派员是一个新制度，一开始需要稳妥一点。首先要选好人。现在的稽察特派员和专职助理都是严格挑选的，人数先少一点，但他们必须公正廉洁，正己才能正人。有犯罪前科的人不能干，喜欢吃喝玩乐的人也不能干，不能一开始就把名声搞坏。二是要搞好培训。人事部组织国内外专家、学者，在很短的时间内把教材编出来了，这个月就可以开始对他们进行培训。三是要有奖惩和监督。对稽察特派员要加强教育，要有严格的纪律，对工作不得力、玩忽职守的要给予处分。总之，要初战必胜。

地方的国有企业如何管？今后也要采取这个办法。把那些工业厅、局合并起来，不要管企业了。选一些优秀的干部监管企业、监督厂长。对政府机关人员分流工作，我们提出了16字方针，即“带职分流，定向培训，加强企业，优化结构”。为什么要写上“加强企业”？开始，很多同志建议写“加强一线”、“加强基层”，后来还是坚持提“加强企业”，因为企业是根本，企业办不好，一切都是空的。加强企业，就要把最优秀的干部派到那里去。过去常把企业搞得好的企业家，调上来当副部长、当局长，把人都抽空了；现在要倒过来，把优秀人才派到企业里去，政府不要干预他们的生产经营活动，让他们放开手干，但要派稽察特派员盯住他们，能人也不能没有约束。所以，要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企业机制上解决这个问题。政府机构改革是形势发展的必然要求和迫切需要，是解决深层矛盾、搞好各项改革和发展的一个关键。机构改革搞好了，各级政府真正做到精简、高效，把干部

的积极性都调动起来，管政府该管的事，使该加强的薄弱环节得到加强，指挥系统要灵，工作效率要更高，党的方针、政策得到正确贯彻，其他的事情就好办了。大家对此要有足够的认识，提高自觉性，尽管有困难、有阻力、有风险，也要迎难而上，下工夫抓好。

二、推进政府机构改革决心要大、步子要稳、工作要实

第一，决心要大。我们提出政府机构减员50%不是没有根据。政府不直接管企业了，管理机制、工作方法都要从根本上改变，人就可以减下来。过去由于人浮于事，埋没了人才，干了些不该干的事，这种状况不能再继续下去了。必须转变政府职能，改进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风，真正做到精简、高效。我这次出国回来后，首先就是赶着批文件，有十天没批了。我发现其中有一个文件是1月7日报到国务院的，这是中国残疾人联合会请示给它扶贫贷款，要财政部贴息。国务院办公厅把这个请示发给各部门去征求意见，到4月8日才有了结果，送给我批。用了三个月时间才拿出解决办法，这引起我很多感想。这不是孤立的一件事，类似的情况很多。本届政府绝对不能这么干下去了。首先，你要贷款，打报告来的单位要主动去联系，到银行去要这个贷款，看银行是什么意见；然后去财政部要贴息，看财政部是什么意见。你就得去跑，讲各种道理说服银行和财政部。他们同意了，再报国务院审批；他们不同意，你把他们的不同意见都写上。否则，国办就将这个文件退回去，说明这个打报告来的单位没有尽到责任。你把所有不同意见都报来了，该协调的都协调了，责任尽到了。国务院再对每个单位的意见进行核对，由主管的副总理作出判断，该不该办，就可以拍板，重大的政策决定最后报总理来批。过去，有事由国务院办公厅秘书局的局长、处长召集有关人员来协调，如果意见不一致，又由国务院副秘书长找有关部长协调。以后再也不能这样办事，国务院办公厅秘书局没有协调这个职能，也没有这个权力。协调是国务院各部门自己的职责，你自己应该找主管部门、左邻右舍去协调。意见不能统一、必须由国务院协调时，你应把自己协调的结果如实报告国务院。这时，国务院领导同志就可以决策了；必要时，国务院副秘书长可受主管副总理的委托协调一下。不下决心转变工作作风，办事效率就不可能提高，人浮于事的现象就不可能改变。因此，这次精简政府机构，我要求国务院办公厅必须起表率作用。

分流的干部怎么办？国务院系统的干部是高素质的干部，应该把他们派到更有用的地方去，发挥他们的才能。现在我们很多部门的领导力量薄弱，需要充实、加强。如商业银行，要把得力的副部长派去当副行长。再如税务总局、国家工商局、国家质量技术监督局都需要加强，特别是这些部门的直属单位要加强。机构不升级，但干部可以高配，正部长可以到另一个部门当副部长，副部长也可以到一个副部级单位当副职，司局级的单位也是这样。我们还准备抽调一批年富力强的司局长，经过培训，到高校去任职，完善高校领导班子的结构；一部分年轻、有文化基础的同志，还可以去学习，取得更高层次的学历或就业资格，以便充实到需要的岗位上去。所以，在机关减人的同时，实际上是加强了整个政府机构、企业和有关单位。现在应该下这个决心了，大气候已经形成，包括机关干部本身都认识到现在这种状况是不行的，没有效率，财政不堪重负。人员放在企业与放在机关是不一样的，不吃“皇粮”了，他得自己找活路，就要想法把企业办好。

第二，步子要稳。这期研究班上，有些同志主张，省级政府的机构改革今年就开始。国务院系统才3万多人，机构改革的难度相对要小些。但地方政府的机构改革就不那么容易了，党政机关干部加在一起有800万人，仅政府公务员就有530万人，减一半就是260多万人，人员分流的难度是相当大的。我建议你们今年先不要动，国家机关先走一步，你们从中总结经验教训。你们要“谋定而后动”，今年先把规划和分流人员的出路都想好，把机构改革方案搞出来，明年再开始。明年年底前把“三定”方案搞好，把减掉的那部分人定下来。这还不能说到位，到位要三年，即到2001年，使所有的人都得到安排。就是说，国家机关到今年年底，地方政府到明年年底，减下来的那部分人都要离开工作岗位，工资照发，经过定向培训，大体上用三年时间，逐步调配到更需要的地方去。

地方政府的干部如何分流？除了加强国有企业外，一个很重要的途径就是加强基层。现在有些基层干部的素质太低，有的人简直无法无天、作威作福。当然，绝大多数基层干部还是好的，问题就出在那少数人身上。因此，要加强基层，要用合格的人去代替那些不合格的人。

不少同志提出，人员分流中要采取措施优化公务员队伍。如何优化？绝不是说合格的留下，不合格的才要走。我认为，要把那些优秀干部放到国有企业去，放到基层去，放到更需要的地方去。留在机关的应该强弱搭配，如果将几个强人放在一起也不一定搞得好。加强国有企业和基层才是我们的主要目的。

第三，工作要实。政府机构改革涉及广大干部的切身利益，思想上不出现波动是不可能的。我们一再强调，对分流的干部不能歧视，绝不能降低国家规定的待遇。原工资照发，这是保持干部队伍稳定的重要措施。同时，要切实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工作要做到每个人，要让所有的干部都感受到，组织对他们是负责任的。这次国家机关的调整，对正部级干部的安排，经过了反复研究；对副部级干部的安排，我和中央组织部的同志一起研究过两次，还没有完全定下来。我和很多部长、副部长都谈过话。希望各级地方政府也要按照这个精神，一级一级地把干部安排好，要把他们用在最合适的地方。这是对他们的信任，也是工作需要。要做思想政治工作，要谈话，要把他们的想法摸清楚，全面地考察，把工作做细、做实，这样才是对国家干部负责任的态度。

尽管这次政府机构改革是个中等方案，但步子也相当大。我出访时，外国领导人见到我都说，你们下这么大的决心真是不容易呀！这么大的步子，在北京没有引起什么大的波动，应该说是基本稳定的。只要做到决心大、步子稳、工作实，我想不会出什么大问题。总的看，我们的干部绝大部分确实是好的，是能服从组织决定的。如宋瑞祥同志，原任地质矿产部部长，是正部长级。新组建国土资源部后，对他的安排我们考虑了很久，最后决定派他去与他的工作有联系的环保总局，任党组副书记、常务副局长，保留正部长级。对这个决定他能接受下来是不容易的。最近，他给我写了一封信，表示完全服从组织的分配。我觉得这种顾全大局的精神值得学习！所以我认为，只要把工作做到干部心里，我们的干部是有觉悟、通情达理的。如果处之以官僚主义，工作大而化之，什么思想政治工作都不做，简单化地一宣布，那就要出事。

各大银行都要成立中小企业信贷部

(1998年4月25日)

这是朱镕基同志在中国工商银行行长刘廷焕《关于赴鞍钢、辽化调查情况的报告》上的批语。

工商银行行长刘廷焕同志亲自下去抓项目信贷问题，这是值得推广的一种工作作风，各大银行行长都要下去调查研究，解决问题，落实中央3号文件①，不要只记得出国一件事，出国也是要出的，但主要工作在国内，尤其是今年的任务重，许多方面都没有落实。我昨天说过，各大银行都要成立中小企业信贷部，加强对各种所有制的中小企业特别是小型企业和个体生产单位的信贷工作。请工商银行带头筹建。

请岚清②、邦国②、家宝②同志并闻世震②同志阅。

朱镕基

4.25

---

① 中央3号文件，指1998年2月20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转发〈国家计划委员会关于应对东南亚金融危机，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意见〉的通知》。

② 岚清，即李岚清。邦国，即吴邦国。家宝，即温家宝。闻世震，当时任中共辽宁省委书记。

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刻不容缓

(1998年4月29日)

1998年4月27日至29日，全国粮食流通体制改革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出席会议的有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及国务院有关部门的负责同志，以及各地区计划、粮食、财政、物价工作和农业发展银行、农业银行的负责同志。这是朱镕基同志在会上讲话的主要部分。

一、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势在必行

这几年粮食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大家有目共睹。没有粮食工作的成绩，哪有今天这么好的形势？现在的问题是粮食企业的亏损在银行挂账严重，国家付出的代价太大，不堪重负。到今年3月底，粮食收购贷款余额是5431亿元，而粮食库存值只有3291亿元。亏损挂账和挤占挪用加起来是2140亿元，其中，粮食亏损挂账到去年年底为1210亿元，今年第一季度末，达到了1475亿元，新增亏损265亿元，有相当一部分是从挤占挪用部分划过去的，是造假账造出来的。对造假账的要追查，2000多亿元付诸东流啊！如果这2000多亿元真是给了农民，那倒是一件好事。但实际上并不是这样，而是有相当大的部分被浪费掉了。



1998年4月29日，朱镕基在全国粮食流通体制改革工作会议上讲话。右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左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吴邦国。

之所以付出这么大不必要的代价，归根到底是个体制问题。我们早就看到了这个问题。1996年，全国粮食企业亏损280亿元，挤占挪用320亿元，当时问题已非常严重。为了刹住这个势头，1996年10月份，我在大连主持召开部分地区粮食工作座谈会时，就提出要改革粮食流通体制，并提出了改革的基本原则。经过一年多的研究，去年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决定，今年夏天以前出台改革方案。中间又做了一些调查研究，请了许多地方的负责同志来座谈。在这个基础上，把改革方案向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做了汇报。常委会原则通过后，中央又召开了东北地区三省一区党政主要负责同志座谈会，再次听取地方同志意见，大家认为可行，最后才经中央政治局通过，就是现在的这个方案。现行粮食流通体制的根本问题在于：中央

拿资金，地方管企业，敞开花钱，吃“大锅饭”。这个体制再也搞不下去了！

1210亿元的粮食企业亏损挂账是怎样产生的呢？客观上讲，有粮食丰收、库存增加、利息和保管费用增加的因素。这早就预料到了，我们建立了粮食风险基金，实行了中央和地方两级粮食储备制度。中央专储粮全部由中央负担利息和保管费，由中央预算开支。地方储备粮的利息和保管费用是由粮食风险基金开支的。扣掉中央专储粮和地方储备粮增加的部分，粮食企业的周转粮最多也就多出700亿斤，利息和保管费最多也就是70亿元。粮食风险基金自1994年建立以来，到去年年初结存150亿元，足够补贴由于粮食丰收、库存增加而增加的利息和保管费。所以，亏损挂账1210亿元是没有理由的。

那么，亏损究竟亏到哪里去了呢？一是降价销售，亏掉了，这是最大的原因。应该说，我们已经有了在粮食歉收和丰收两种不同情况下，调控粮食市场的办法和经验。我记得，从1992年到1993年，农业连续遭灾，粮食歉收，但当时有些地方实行“三个放开”政策，即放开市场，放开价格，放开经营。当时许多公司、私商跑到农村去抢购粮食，粮食系统也跟着抬价抢购，粮食一天一个价。我在安徽发现这个情况，要求采取措施制止。一方面，采取经济手段，抛售专储粮；另一方面，再次强调国有粮食企业是主渠道，只允许当地的国有粮食收储企业到农村收购粮食，其他任何公司、私商不能到农村收购。这是粮食歉收情况下的经验。在粮食丰收情况下怎么做？1995年、1996年两年粮食丰收，1997年粮食就多了。为此，去年出台了一个重大政策，就是按保护价敞开收购农民余粮。虽然保护价比定购价略低，农民还是满意的。但这个政策没有得到完全执行，有的地方执行得好，有的地方执行得差。正因为没有很好地贯彻这个政策，农民就到集贸市场低价出售粮食。国有粮食企业的费用那么高，粮食当然就卖不出去。这时候国有粮食企业着急了，也降价亏本销售粮食。这就是吃“大锅饭”的体制，亏本了有银行拿钱，再加上农业发展银行失于监管，才造成了今天这个局面。二是人多开销大，吃掉了。全国粮食系统现有410万人，近10年增加了1倍，310万在职的，100万离退休的。实际上，只有不到一半的人从事粮食收储工作。另外一半多的人(160万)从事与粮食收购无关的业务，这些附营业务大量亏损，而且都算到粮食

亏损账里面来了，这必然增加粮食经营费用。费用越高，粮食越卖不出去，亏损就越厉害。因此，这些业务必须与粮食收购业务脱钩，实行自负盈亏。

有930多亿元被挤占挪用，这又是怎样产生的呢？1994年以前，挤占挪用300多亿元。1995年到1997年3年时间，一下子增加了455亿元，现在达到了930多亿元。挤占挪用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违规将粮食收购资金向非粮食收储企业发放贷款。例如，农业发展银行吉林省分行向乾安县植物油厂累计发放贷款1500万元，农业发展银行云南省元阳县支行向饲料加工厂、水果生产基地、仓储网点等发放贷款1500万元。尤其是一些地方违规向非生产性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发放贷款，购买汽车、移动电话，建楼堂馆所等。二是违规向国有粮食收储企业发放贷款，搞附营业务。本来，附营业务是由农业银行发放贷款的，后来农业发展银行也向附营业务发放贷款，并没有得到国务院同意。发放附营业务贷款，粮食收购资金怎么封闭运行？我举一个最突出的例子：广西植物油贸易公司通过广西粮油储运公司，挪用6500万元粮食收购资金进口毛菜油加工，一下子亏掉2347万元。这样的人不处理，怎么对得起老百姓？安徽省蒙城县粮食系统挪用粮食收购资金6775万元，自办经济实体85个，都是些宾馆、招待所、澡堂子、加油站、液化气站等等。拿粮食收购资金搞这些东西，怎么收得回来？三是炒股票、炒期货。如长春市油脂油料公司从1994年开始，将收购贷款投入期货市场。这些钱能收回来吗？四是干部职工个人借款。有的地方还搞什么“带粮分流”。不是要下岗分流吗？那好，你下岗，我给你发两万斤粮食。这是分光吃净啊！

为什么粮食收购资金出现亏损挂账、挤占挪用，实现不了封闭运行？这里的确有农业发展银行的问题，但主要还是体制问题。我一直讲，成立农业发展银行，就是为了保证粮食收购资金封闭运行，可是农业发展银行成立四年来，并没有贯彻这个方针。尽管这两年我们一直强调要“库贷挂钩”、“钱粮挂钩”、封闭运行，但实际上没有得到认真贯彻。农业发展银行承受的压力很大，如果不给粮食收购资金，要钱的人就说他们不以农业为基础，要负“打白条”的责任。特别是农业发展银行铺摊子的1996年，一年搞了2000多个分支机构，什么人都进去了。进去了就做“好人”，一年挤占挪用320亿元，亏损280亿元。拿钱往

外撒啊！一直到现在还没有建立起发放贷款的程序，没有一套规章制度。特别是多头开户，坐支现金，问题很大。比方说，今年第一季度粮食企业销售了320亿元的粮食，把费用扣掉，至少应该还贷300亿元。结果，只还给农业发展银行150亿元。粮食企业收回货款时不经过农业发展银行，怕经过农业发展银行会被扣下还贷，他们就跑到农业银行、工商银行等银行开户，把钱存在那里，再从那里把钱拿走。什么叫“封闭运行”？本来应该是，1斤粮食6角钱收购上来，7角钱卖掉之后，粮食企业自己留1角钱支付各种费用，另外6角钱还给银行。可某些粮食企业不这么做，1斤粮食5角钱就给卖掉，先补自己的亏损和费用，剩下2角钱还给银行；有的粮食企业甚至这2角钱也不还，还想方设法挤占挪用。这个问题不解决怎么行？

另一方面，产生亏损挂账、挤占挪用，国有粮食系统没有责任吗？我看也是有责任的。一些地方趁改革之机，加大亏损挂账基数，让中央多贴利息。国务院即将下发一个紧急通知①，有这么几条规定：一是严禁粮食部门和企业趁改革之机违规调账和不合理列支，扩大粮食亏损挂账。不许把那930多亿元被挤占挪用的资金都报为粮食收购亏损。二是粮食收储企业要严格执行粮食购销价格政策，不得进行“逆向操作”。这次会议后，大家要雷厉风行，所有的粮食企业一律顺价销售，不得低价销售。如果粮食顺价销售不出去，就坚决不卖。三是严格执行粮食收购资金专户管理制度，不准多头开户。从农业发展银行借的钱，卖掉粮食后，货款必须回到农业发展银行，不能流到别的银行。如果发现在哪家商业银行多头开户，就给哪家银行行长记大过一次。四是粮食企业不准以机构改革为名，搞“带粮分流”、“带钱分流”，或以兼并、改制、破产等名义侵吞国有资产和悬空、逃避银行债务。已经发生的，要立即纠正，并如数追回钱粮，挽回损失。五是农业发展银行对粮食企业收购资金的使用情况要严格监督管理，认真执行“库贷挂钩”原则，防止发生新的挤占挪用，切实做到收购贷款封闭运行。对今年第一季度的亏损情况，决定由审计署牵头，会同监察部、国家计委、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国家粮食储备局等部门，对粮食系统和农业发展银行进行一次全面审计，彻底查清问题。

---

① 紧急通知，指1998年5月3日《国务院关于坚决制止扩大粮食亏损挂账的紧急通知》。

二、改革的原则和要把握好的重点

这次改革要遵循“四分开一完善”的原则，即政企分开，中央与地方责任分开，粮食储备与经营分开，新老财务账目分开，完善粮食价格机制。在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的过程中，要切实把握好以下几个重点：

一是政企必须分开。政企不分是造成国有粮食企业吃财政和银行“大锅饭”的重要原因。今后，粮食行政主管部门代表政府对全社会粮食流通进行管理，与国有粮食企业在人、财、物等方面彻底脱钩，不得参与粮食经营，不得干预企业的经营活动。所有国有粮食企业，包括乡镇粮库，都要面向市场，实行独立核算，降低生产经营费用，增强竞争力，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约束、自我发展的经济实体，不承担粮食行政管理职能。要按照这个分工，各尽其职，各负其责。

二是中央与地方责、权必须明确划分。中央要抓好全国粮食供求总量的宏观调控。地方政府要对本地区粮食生产和流通全面负责，发展粮食生产，搞好粮食收储，保证粮食供应，稳定粮食价格，这是各地政府的首要职责。

三是粮食储备和经营必须分开。中央和地方的储备粮要与企业经营周转粮在管理上分开，真正做到储得进、调得动、用得上，并节约储存费用。无论是产区还是销区的政府，都必须保有充足的合理粮食储备。销区应主动分担粮食储备的负担，减轻产区财政的压力。这对销区是有很大好处的，粮价涨上来后，销区就有稳定粮价的物质基础了。

四是消化国有粮食企业亏损在银行的挂账，必须由中央和地方财政共同分担，限期归还。中央财政将负担除少数主销区以外的亏损挂账在限期内的全部利息。国有粮食企业要通过减员增效、改善经营、降低费用、提高效益，尤其要坚持顺价销售的原则，保证不发生新的亏损，在还本期限内，从经营利润中逐步归还亏损挂账的本金。为确保今后不再出现新的挂账，要切实做到粮食收购资金封闭运行。今后，粮食收购资金要严格按照“库贷挂钩”的办法供应和管理，坚决实行“钱随粮走”的办法，确保粮食销售后国有粮食企业能及时足额将贷款本息归还农业发展银行。农业发展银行要切实加强对粮食收购、调销、储

备资金的全过程监管。严禁再出现挤占挪用粮食收购资金的情况，对违反规定的，要坚决查处并停止贷款，还要它承担“打白条”的责任。

五是进一步完善粮食价格形成机制。今后在正常情况下，粮食价格主要由市场供求决定，国有粮食企业按市场价格经营粮食。为了保护生产者利益，政府制定粮食收购保护价，敞开收购农民的余粮；为了保护消费者利益，政府制定粮食销售限价，作为调控目标。当市场粮价低于收购保护价或超出销售限价时，政府主要依靠储备粮吞吐等经济手段，通过调节市场供求，促使市场粮价稳定在合理水平。

六是进一步健全粮食市场体系。要加强粮食市场体系建设，积极培育县以上粮食交易市场。要充分发挥国有粮食企业收购粮食的主渠道作用，严禁私商和其他企业直接到农村收购粮食；粮食销售市场要进一步放开、搞活，实行多渠道经营。

三、几个具体的政策问题

现在，有些地区认为没有能力消化亏损挂账本金；同时，对封闭运行、顺价销售、不挂新账缺乏信心，担心别人不坚持顺价，自己坚持顺价会吃亏。我想，应进一步统一思想，提高认识，明确以下几点：

第一，不允许发生新的亏损。要做到这一点，国有粮食企业必须严格执行国家粮食购销价格政策，不得“逆向操作”。各地要统一行动，实行粮食顺价销售，不准降价亏本销售。“顺价”就是粮食的收购价加上国有粮食企业的费用分摊和最低利润形成的销售价。国有粮食企业谁也不许低价卖粮，现在只要坚持一个月，粮价就会上去。开始时可能卖不出粮，费用怎么办？可以在农业发展银行设两个账户，一个购销账户，一个财务账户。购销账户，要实行“钱粮挂钩”，坚持“八个不贷”①，收一斤粮，给一斤粮的钱。卖掉一斤粮，连本带息还回农业发展银行，不允许挂账。在财务账户里，农业发展银行可以给国有粮食企业垫支一部分费用资金，以解决他们卖不出粮，但又必须发工资、支付费用的问题。不要担心别人不坚持顺价销售、自己顺价销售吃亏，现在已经把监督顺价销售的责任交给了农业发展银行。在“钱粮挂钩”的原则下，谁低价销售，谁的钱就回不来，农业发展银行马上就会发现，并立即通报给地方政府。要保证做到顺价销售，必须再次重申国务院的规定，只有国有粮食收储企业才能够到农村收购粮食，私商和

其他企业不得到农村收购。用粮单位到县以上粮食交易市场去买粮。粮食收购是垄断的，不能放开。如放开收购，粮食丰收时没有人去收购，歉收时都去抢购，天下就会大乱。1994年《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粮食市场管理，保持市场稳定的通知》中已经对此作了规定，后来又几次重申。同时，顺价销售要有一个保证条件，就是国有粮食企业一定要按收购保护价敞开收购农民余粮。如果不敞开收购，农民就会把粮食卖给私商，而私商的经营费用比粮食部门的低得多，他就能够低价销售，粮食部门就不能够顺价销售。应该指出，过去敞开收购的方针并没有得到很好贯彻。事先绝不要估计过高，不要轻易讲我那个地方是敞开收购的，没有降价销售；其实，好多地方都不是敞开收购粮食。如果真是敞开收购粮食了，农民就不会卖粮给私商或自己低价出售，那么国有粮食企业就可以按顺价原则决定市场价格了。总之，今后只要粮食收购是垄断的，而且是敞开收购，国有粮食企业自己不把粮食低价卖给个体户，社会上就不会有多少粮食，国有粮食企业就能够顺价销售。

---

① “八个不贷”，指：(1) 虚报收购，数量或库存套购收购贷款并挪用的，不予贷款；(2) 粮棉油赊销直接造成亏损挂账的，不予贷款；(3) 粮棉油销售收入不入账和坐支现金的，不予贷款；(4) 利用多头开户等方式转移挪用粮棉油调销货款的，不予贷款；(5) 违反国家规定降价销售粮棉，造成亏损无弥补来源，致使粮棉贷款不能足额归还的，不予贷款；(6) 挤占挪用收购贷款购置固定资产、从事附营业务、投资有价证券、转借他人用于有关部门集资摊派等的，不予贷款；(7) 不按国家规定将粮棉油调销货款存入农业发展银行专户，多头开户，挤占挪用粮食收购贷款的，不予贷款；(8) 利用兼并、改制、破产等名义悬空、逃废银行债务以及带粮分流人员等直接挤占挪用粮食收购贷款的，不予贷款。

有的同志讲，亏损消灭不了，理由是粮食库存太大，库存成本增加，顺价顺不了那么高。我认为不是这个情况。我在前面讲过，中央专储粮的利息和保管费用是中央预算拿钱，地方储备粮的利息和保管费用也打在粮食风险基金里了。扣掉中央和地方储备粮，全国周转粮最多也就多出700亿斤，所需费用和占用资金利息一年补贴70亿元足够

了。现在粮食风险基金每年已有70多亿元，足够补贴超正常周转库存粮食的利息和保管费用。当然，我算的是总账，各地情况不一样。有的地方粮食风险基金不足以补贴超正常周转库存粮食的利息和保管费用，原因是支付地方储备粮的利息和保管费用占去一部分，甚至把粮食风险基金拿去干别的了。如果控制一下粮食风险基金的使用范围，就够了。如果还不够补贴超正常周转库存粮食的利息和保管费用，可以增加粮食风险基金规模，中央和地方按什么比例增加，请财政部研究一个办法。这样，粮食顺价销售就不会亏损，库存过多就用粮食风险基金补贴增加的利息和保管费用，粮食购销价格就理顺了。

第二，粮食企业要下岗分流，减员增效。如果不下岗分流，不减人，亏损挂账不要说10年，30年也消化不了。那么多人搞名目繁多的附营业务，负盈不负亏，势必挤占挪用粮食收购资金，造成损失、浪费。所以，一定要按全国统一的政策，实施下岗分流、减员增效、再就业工程。对下岗的职工，要发基本生活费。要从机制上想办法，把这些人安置好。已分流出去搞附营业务的职工，应与粮食企业彻底分开，让他们自负盈亏。

第三，要积极消化粮食亏损挂账。一些地方反映消化挂账有困难。据我了解，几个沿海省市是有能力消化的。粮食主产区有些困难，有的地方可能10年也还不了，但10年以后的事现在不能说死。如果粮食流通体制改革见了成效，把粮食系统整顿好，国有粮食企业能够扭亏为盈，消化能力就会增强，就能消化亏损挂账本金。各地财政都很紧张，挂账亏损并不一定要靠财政来消化，主要靠粮食企业自己消化。除第一类地区①外，其他地区可以从明年1月1日起归还亏损挂账本金。但今年6月1日停息以后，不允许再出现新的亏损挂账。至于明年1月1日开始还本后，能否前两年少还一点，后几年多还一点，要根据各地情况酌情考虑，现在很难定一个统一的原则。

---

① 第一类地区，指北京、天津、上海、广东等省市。财政部、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审计署、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于1998年5月11日联合制定的《关于清理消化国有粮食企业新增财务挂账和其他不合理占用贷款的办法》规定：这类地区粮食企业的新增财务挂账，“由省、直辖市人民政府统筹资金在3年内消化挂账本金和利息”。

第四，关于今年粮食收购价格问题。中央已经决定，今年粮食的定购价由各地区参照去年价格水平自行确定。如果不参照去年价格水平，我担心会出问题。价格政策一旦出问题，农业形势就可能逆转。特别是近两年农民收入增加不多，如果粮价太低，影响农民的种粮积极性，不利于宏观经济形势稳定。价格不是一点不能降，关键是不能降得过多。现在有两种意见：一种是定购价和保护价同时降一点；另一种是定购价不动，保护价多降一点。对此，中央不作决定，由各地根据本地情况决定。毗邻的地区要注意搞好价格衔接，比如说早籼稻的定购价、保护价，江西、湖南、湖北三省就应该共同协商确定。各地政府要主动做好这项工作。

第五，粮食仓储设施一定要加强。要以扩建、改造为主，少搞新建的。国有企业、乡镇企业的厂房、仓库稍加改造，就可以利用。不要一说加强仓储设施，就大量地贷款去建新的。仓储设施贷款应予保证，由农业发展银行另开账户，严格审批。不少地方的国家专储粮没有专门仓库，和地方储备粮、周转粮放在一起。这些混库的粮库，中央暂时不收，但要做到账目分开、保管分开，未经国务院批准不得动用。将来中央新建专储粮库后，再把国家专储粮调出来，把仓库腾给地方。

国务院已明确，国家粮食储备局只管中央专储粮，中央的粮食宏观调控职能由国家计委行使。国家计委具有协调政策特别是价格政策的职能，所以，粮食宏观调控职能，也放在国家计委。

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是党中央、国务院今年部署实施的一项重大改革，也是今年经济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下一步的关键是抓好落实。各省区市要根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的决定》精神，结合本地实际情况，尽快制定贯彻实施的办法。各有关部门要顾全大局，紧密配合，齐心协力推进改革。希望大家统一思想，统一政策，统一行动，认真落实，确保各项改革措施顺利实施，务必达到预期的改革目标。

银行与所办公司必须彻底脱钩

(1998年5月14日)

这是朱镕基同志在审计署《审计要情》1998年第2号《安徽省证券登记公司非法经营金融业务造成拒台兑付危机》一文上的批语。

请家宝①同志批转相龙①、海旺①同志处理。银行(尤是人民银行)所办公司(房地产、信托、证券等)应与银行彻底脱钩或坚决撤并，政策早已在两年前确定。但是银行系统由于利益机制，贯彻很不得力，有的越办越大，违法乱纪，愈演愈烈，安徽省人民银行就属于这种情况，必须认真调整领导班子。我希望在这次金融改革中彻底解决这个问题，请人民银行和国家商业银行、政策性银行各级领导一体周知，不要低估中央和国务院的改革决心。

朱镕基

5.14

---

① 家宝，即温家宝。相龙，即戴相龙，当时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海旺，即阎海旺，当时任中共中央金融工作委员会副书记、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

把握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的重点

(1998年6月3日)

1998年6月3日，国务院召开全国粮食购销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在北京主会场出席会议。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各市(地)、县人民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分管粮食、财政、金融工作的负责同志，发展计划(经济)委员会、财政厅(局)、农业厅(局)、工商局、物价局、粮食局、农业发展银行、农业银行的负责同志在各地分会场出席会议。分会场一直设到县。这是朱镕基同志在会上讲话的主要部分。

今年4月底召开全国粮食流通体制改革工作会议以后，国务院派出了五个调查组到十几个省，对会议精神贯彻情况进行了督促检查。从各地情况看，各级领导都非常重视这项工作，抓得是很紧的。但是，工作进展不平衡，特别是县、乡两级抓得不够得力，会议精神还没有完全贯彻下去。我在安徽考察时，有一位县粮食局局长对“四分开一完善”对答如流，但是对当前工作的重点是什么，说不到点子上。可见，深刻领会《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的决定》精神，真正弄懂各项方针政策并落实下去，还要下很大工夫。

通过调查，我们感到，对有的政策细节，还需进一步完善。因此，我们调查回京后，对需要进一步明确的政策，又进行了研究，下发了一个补充通知。昨天，国务院常务会议又审议通过了《粮食收购条例》，很快就要发布。今后，还要制定粮食销售条例和其他相关条例，把粮食工作的方针政策都纳入法制的轨道。现在，中央关于粮食流通体制改革和做好当前粮食购销工作的方针政策，已经比较配套，也很明确。今天的会议一直开到县，就是为了把中央关于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和这次调研情况通报给大家，并对进一步做好粮食流通体制改革工作和粮食购销工作做出部署。

各地首先要认真地学习中央的文件，真正吃透中央的精神，这是做好粮改工作的前提。我最近看到新华社的一份内参，刊登了某产粮大

省一位粮食厅厅长的谈话，这个谈话的许多内容，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他一股怨气，满腔委屈，夸大困难，只强调别人的责任，不检查自己的工作。这样的领导能做好粮改工作吗？这不是一个人的问题，而是反映了粮食系统一部分人的情绪。这次粮食流通体制改革，如果不换一批人，不撤一批人，不抓一批人，是很难取得成功的。不称职的就要换掉，问题严重的就要撤职，触犯刑律的就要抓起来，否则，粮食流通体制改革就搞不好。全国粮食系统已经亏损挂账和挤占挪用粮食收购资金高达2000多亿元，如果继续一年几百亿元地亏下去，国家、地方和银行都不堪重负。做好粮食流通体制改革工作，事关全局，影响重大。我们一定要统一思想，统一行动，不折不扣地贯彻落实中央关于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的各项方针政策，把这项工作推向深入。当前工作的重中之重，就是贯彻落实按保护价敞开收购农民的余粮、国有粮食收储企业实行顺价销售、农业发展银行的粮食收购资金封闭运行这三项政策，加快国有粮食企业自身改革步伐。现在，我就这些问题再强调几点：

第一，按保护价敞开收购农民的余粮。这是当前整个粮食工作的基础。只有按保护价敞开收购农民余粮，才能保护农民的利益和农民的积极性，保证粮食稳定增产；才能把粮源掌握在国有粮食收储企业手里，主导粮食市场价格，实现粮食顺价销售。

国有粮食收储企业严重亏损挂账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在丰收的时候没有很好地执行按保护价敞开收购农民余粮的政策，致使农民把粮食低价卖给私商。私商的经营费用低，卖的粮食价格就低。所以，市场粮价就下跌。国有粮食收储企业由于人多、开支大，粮食经营费用高，粮价比私商的高，就销不动；越是销不动，就越不愿敞开收粮，私商的粮源就越多。而国有粮站、粮库为了发工资、奖金，就“逆向操作”，低价亏本卖粮，形成恶性循环。国有粮食收储企业如果按保护价把农民的余粮都收上来，掌握了粮源，就掌握了引导市场粮价的主动权，就可以做到顺价销售。所以，国有粮食收储企业要做到顺价销售，停止新的亏损，最重要的基础环节就是按保护价敞开收购。

去年夏收时，我们强调要按保护价敞开收购农民余粮，各地贯彻坚决，这项工作做得比较好，深受广大农民的欢迎。但是没有坚持下去，秋收时没有完全做到敞开收购，导致大量粮食流散到私商手中。

现在粮食的市场价比保护价低，农民为什么不以保护价卖粮给国有粮站、粮库，非要以市场价卖给私商呢？问题就出在国有粮食收储企业自身，没有做到方便农民、敞开收购。有的国有粮站、粮库对农民卖粮，限量限时，压级压价；有的工作人员服务态度不好，对水分高一些、自然杂质多一点的粮食，不是扣水、扣杂后收进来，而是让农民拉回去，这样导致农民卖粮有诸多不便，农民不愿受气，就宁可把粮食每斤便宜几分钱卖给私商；有的国有粮站、粮库附属的劳动服务公司和职工，低价向农民收粮，然后按保护价卖给国有粮站、粮库，从中渔利；有的国有粮站、粮库代扣“乡统筹、村提留”，农民卖粮得不到现钱，就不愿意到国有粮站、粮库卖粮；有的地方发放预约收购卡或其他形式的卖粮指标，既没有做到直接敞开收购，又出现倒卖现象。这些问题，影响了按保护价敞开收购农民余粮政策的落实，损害了农民利益，必须切实解决。

今年夏粮收购即将开始，各地粮食部门一定要坚决按保护价敞开收购农民的余粮。国有粮食收储企业要改善服务态度，认真执行政策。要方便农民卖粮，不要让农民排长队。对农民交售的粮食，要常年挂牌收购，不准限收、拒收、停收，不准压级压价。对质量差一点的粮食，不要让农民拉回去，可以按规定扣水、扣杂，按质论价，收进来再烘干晾晒。要保证卖粮的农民及时拿到现钱。国有粮站、粮库收购粮食时，除按国家有关规定代征农业税外，不准代扣、代缴“乡统筹、村提留”以及其他任何税费。乡镇干部、村干部也不准在粮站、粮库坐收统筹、提留款。对国有粮站、粮库违法乱纪的干部、职工，要坚决查处，不准以任何名义低价向农民收购粮食。农业发展银行要保证粮食收购资金供应。

要管好粮食收购市场。只有国有粮食收储企业才能从农民那里收购粮食，禁止任何私商、粮贩和其他公司到农村直接收购粮食。各地工商局要加强检查，发现一起，严肃查处一起，直至吊销营业执照。粮食加工企业和其他用粮单位，可以到县以上粮食交易市场购买。粮食销售要放开、搞活。允许外地企业和个人进入县以上市场买粮食，销售可以实行多渠道。

第二，坚决实行粮食顺价销售。这是国有粮食收储企业不再发生亏损和做到逐步消化亏损挂账的重要措施。不实行粮食顺价销售，就

不能收回成本和实现利润，国有粮食收储企业也就难以生存和发展。

近两年，市场粮价一直比较低，国有粮食收储企业不能实现顺价销售，除了一些地方没有按保护价敞开收购农民余粮，造成粮源流失外，另一个主要原因是国有粮食收储企业自己低价亏本卖粮。我们调查发现，这个问题比想象的要严重得多。一些国有粮食收储企业为了发工资、发奖金、盖房子，不惜低价亏本把粮食卖给私商。他们一边低价卖粮，一边到银行报账，不仅为私商和私营粮食加工企业提供了低价粮源，而且大量增加亏损挂账。私营粮食加工厂掌握了低价粮源，就可以操纵整个粮食零售市场的价格，致使国有粮食收储企业的粮食很难顺价卖出去。现在，私营粮食加工厂星罗棋布，规模也不小。许多私营米厂的粮源，主要靠国有粮食收储企业低价亏本提供。这次在安徽考察，我让我的秘书和国家计委一位同志当了一回“私商”，去三个私营粮食加工厂买粮。这三个厂子口气大得很，说你要多少粮就有多少粮，我马上可以卖给你。如果不是跟国有粮食部门内外勾结，敢夸这个海口吗？还有一个私营粮食加工厂，一天加工大米150吨，一年加工几万吨。靠农民一家一户卖给他稻谷，不可能有这么大的规模，实际上是靠国有粮食收储企业整卡车地送来粮食，这怎么得了！国有粮食收储企业按保护价收进来的稻谷低价亏本卖给私商，私商加工出来的米每斤只卖八九角就能赚钱；而我们国有粮食收储企业加工出来的米每斤不卖到1元至1元2角就亏本，粮食当然卖不出去，卖不出去就只能跟着市场跑，降价亏本销售，让私商牵着鼻子走。私商先低价卖粮，然后，国有粮食收储企业也跟着低价卖，甚至以更低的价格卖给私商。就这样，国家一年几百亿元的粮食补贴，并没有真正补给农民，而是流入私商腰包里了，还有一批腐败分子从中捞到了好处。真是令人痛心！

我们说国有粮食收储企业未能实现顺价销售，问题在于它自己低价亏本卖粮，主要在于体制不合理，再不改革不行了！粮食系统要改革，就必须弄明白为什么会造成这个状况，把原因分析清楚，不要一股怨气，满腔委屈，看不到自身问题。我们相信，只要国有粮食收储企业按保护价把粮食都收到自己手里，然后加上成本费用和必要的利润，再把它卖出去，就可以逐步实现顺价销售，停止亏损。应该说，在这方面，没有人能跟国有粮食收储企业竞争。谁能够出保护价？只

有国家才有这个能力。如果国有粮食收储企业不敞开收购农民余粮，又低价亏本卖粮，那就不可能做到顺价销售，就不可避免地要发生新的亏损。

这次调查发现，过去定的粮食顺价销售政策还有不够明确的地方，就是所谓“顺价销售”是指在哪一个环节顺价？原来讲得并不是很清楚。我们强调的粮食顺价销售，是指在粮食收储环节顺价，也就是要求国有粮站、粮库(包括尚未独立核算的附属粮食加工厂)等粮食收储企业，必须按照以粮食收购价格为基础、加上合理费用和最低利润形成的价格进行销售，不应当发生亏损。而那些实行独立核算的国有粮食加工、批发、零售企业，则可以按照购得进、销得出的原则，在进价基础上自定销售价格，自负盈亏。但是，现在不少地方在粮食零售环节也规定最低限价，这是对粮食顺价销售政策理解有偏差造成的。国有零售粮店是独立核算、自负盈亏的，进货渠道、进价不同，销售价格也就不同，不能规定最低限价。如果规定了最低限价，他们经营的粮食卖不出去，怎么发工资？谁负责？国有零售粮店是自负盈亏的，国家是不能补贴的。现在，许多国有零售粮店可以从私商那里进粮食，这有利于尽快消化流失在社会上的粮源，为国有粮食收储企业实现顺价销售创造条件。私商的粮食卖光了，国有粮食收储企业就可以控制市场并主导价格，就可以真正实现顺价销售。从现在起，对国有零售粮店不要规定最低销售限价，已经规定的要纠正。

第三，粮食收购资金必须封闭运行。 这是监督国有粮食收储企业执行国家粮食购销政策，防止挤占挪用，及时足额供应粮食收购资金的保证。

国家成立农业发展银行，就是为了实行粮食收购资金的封闭运行。农业发展银行一定要严格实行“库贷挂钩”、“钱随粮走”，坚持“钱货两清、足额还款”。国有粮食收储企业卖出粮食后，要及时足额地将贷款本金、利息还给农业发展银行。收一斤粮，给一斤粮的钱，是定购价的按定购价给，是保护价的按保护价给。卖掉一斤粮食，国有粮食收储企业就要连本带息还给农业发展银行；否则，下次收购粮食时农业发展银行就不给贷款。这里，农业发展银行起着决定性的监管和保证作用，责任非常重大，甚至关系到这次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的成败。

为保证"库贷挂钩"政策真正落实，农业发展银行一定要清查国有粮食收储企业的粮食库存。查清贷了多少款，收了多少粮，是不是在挪用粮食收购资金。银行完全有权力查账，这也是国际通行的做法。国有粮食收储企业要无条件地提供有关材料，如果不如实告诉农业发展银行收了多少粮、卖了多少粮、存了多少粮，农业发展银行就不给贷款。只有这样，才能加强监管，防止出现新的亏损挂账和挤占挪用。

农业发展银行要深入基层，改善服务。比如对国有粮站、粮库低价亏本卖粮，不能简单地停止贷款了事。一方面，要向国家负责，加强对国有粮食收储企业的监管，发现问题，要及时通报政府管理部门，给以严肃处理；另一方面，要改善服务态度，保证粮食收购资金及时到位，不耽误粮食收购。农业发展银行要为国家把住关，工作一定要做到家。各级政府，特别是县级政府，要支持农业发展银行的工作，共同维护国家的利益。各商业银行也要积极支持粮食收购资金的封闭运行。现在，粮食收储企业的附营业务贷款，已经从农业发展银行中分离出去，农业发展银行专门从事粮食收储业务信贷。国有粮食收储企业只能在农业发展银行开户，不能在其他银行开户；凡发现商业银行为国有粮食收储企业开户的，要严肃查处。

第四，搞好国有粮食收储企业自身的改革。 这是国有粮食收储企业的根本出路。现在粮食系统冗员过多，400多万人一年吃掉几百亿元，都打在粮食成本里面，粮食成本高得不得了，顺价怎么顺得出去？因此，一定要下决心减掉一半人。粮食系统310万在职人员中，真正从事粮食收储工作的也就是150万人，另外的160万人早已分流了，只是没有彻底脱钩。所以，减一半人的实际困难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大，把已经分离的160万人与国有粮食收储企业彻底脱钩，大部分问题就可以得到解决。我在安徽看到的一些国有零售粮店，粮食销售额只占总营业额的20%，完全可以自负盈亏。

国有粮食收储企业经营管理粗放、浪费严重的情况比较普遍，这也是经营费用高、顺价销售难的重要原因。今后，所有国有粮食收储企业都必须独立核算、自负盈亏。除收购环节由国有粮食收储企业垄断经营外，其他加工、批发、零售环节都实行市场竞争，通过竞争促进企业改进经营管理、降低费用。要尽快建立健全各项规章制度，加强内部管理，减少不必要开支，堵塞漏洞，防止浪费。国有粮食收储企

业只有把费用降下来，才有市场竞争力，才能有利于实现顺价销售，才能有经济效益。

总之，通过今天的会议，就是要使大家都明确当前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和做好粮食购销工作，关键是抓住“三项政策”和自身改革这四个要点。其中，按保护价敞开收购农民的余粮是保护农民种粮积极性，实行粮食顺价销售的基础；粮食顺价销售是不再发生亏损和逐步消化历史挂账的关键；粮食收购资金封闭运行是不再发生新的亏损和挤占挪用，及时足额供应资金的保证；粮食企业自身改革是顺利执行“三项政策”的条件。我相信，只要大家统一认识，统一行动，同心协力，扎实工作，粮食流通体制改革工作一定能够做好！

会见美国财政部部长鲁宾时的谈话

(1998年6月26日)

这是朱镕基同志在北京中南海紫光阁会见美国财政部部长罗伯特·鲁宾时的谈话。

朱镕基： 你的工作节奏真快，昨天还在电视上看到你在美国，今天你就到北京了，而且闪电式地访问了中国人民银行和财政部。

鲁宾： 是的，我与他们会谈的时间虽短，但很有成效。我不是外交官，不用讲什么套话，我们讨论的都是实实在在的问题。

朱镕基： 你虽然不是外交官，但你的话比外交官的还值钱。

鲁宾： 所以有时说话要小心，特别是评论市场的时候。

朱镕基： 欢迎你到中国访问。最近，美国出面干预日元汇率，取得了很大成功，我向你们表示祝贺。但你们的任务还很艰巨，今天的日元汇率又跌到142.35日元兑1美元了。

鲁宾： 你说得很对，这是一个非常艰巨的任务。我们在单日内就拿出20亿美元，这是很大一笔钱，但是解决日元贬值的根本办法是日本要采取行动。

朱镕基： 从东京会议传来的消息看，日本并没有采取什么措施。看起来，日元恐怕会维持一种既垮不了也好不了的状况，东南亚国家对此很担心。

鲁宾： 我想，你可以在明天与克林顿总统会晤时，同他讨论这个问题。我与总统谈过多次，总统认为，改善日元状况，最终取决于日本。



1998年6月26日，朱镕基在北京中南海紫光阁会见美国财政部部长罗伯特·鲁宾。

朱镕基： 我很担心目前的日元状况。有人估计，到今年年底，日元汇率也许会跌到180日元兑1美元，不知有没有这个可能？

鲁宾： 这个问题现在很难预测。一些经济学家认为，日元汇率最终可能会跌到160至180日元兑1美元，这对亚洲来说是一个很坏的消息。

我们要想方设法避免这种情况，说服亚洲国家对日本施加压力。

朱镕基： 有一种说法，日元兑美元今年180，明年230。这种说法也许有些过头，但多数人认为今年日元恐怕会跌破150线。日元继续贬值对东南亚的确是个坏消息，会进一步加剧东南亚的金融危机。但不管怎样，中国不会违背人民币不贬值的承诺。如果我们也跟着贬，那对亚洲国家将是很大的灾难。

鲁宾： 对整个世界经济也是如此。

朱镕基： 无论贬值会给我们带来多大好处，我们也不能那样做。对别人损害太大，最后也会损害我们自己。至于能顶多久，我就不说了，说了别人也不信。

鲁宾： 中国可以说是当今世界上信誉最高的国家之一。无论在经济方面还是在处理其他问题方面，中国都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充分尊重。因此美中两国应该携起手来，共同解决当前的危机。

朱镕基： 我刚才说了，人民币不会贬值，我们能够做到这一点。中国的出口占国内生产总值不过20%，尽管今年5月份外贸出口出现了负增长，但我们可以通过国内市场来弥补国外市场。现在的问题是，我们自己也面临着一些困难。过去搞了很多重复建设，市场供大于求，国有企业生产不足，工人失业。提高国内需求，如果向工业领域投入资金，不会产生任何效益，因此只能投到基础设施建设上来。但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回报期比较长，完全靠银行贷款不行，还要靠财政投入。幸好，几年来我们实行从紧的财政货币政策，现在有能力做这件事情。今年一季度的固定资产投资比去年增长了10%，二季度增长了15%，预计三季度会增长20%。这些投资会带动生产资料的生产，促进工业企业开工。今年一季度，我们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为7.2%，二季度可能只有6.8%，估计三季度会达到8%，四季度达到9%到10%。这样，全年即使达不到8%的经济增长目标，也不会差很多。现在，8%已经成了一个心理数字，哪怕达到7.9%，香港同胞也不会满意。

鲁宾： 这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我对中国的情况不了解，但我认为外国人关注的并不是某个百分比，而是这个统计数字是不是准确、是不是合乎国际标准。现在中国的信誉很好，即使发展速度只有5%到

6%，也不会对你们有多大影响。关键是看你们采取什么措施，如何处理好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关系。国际社会最为关注的是你们能不能继续坚持改革路线。

朱镕基： 如果没有亚洲金融危机，我们的经济增长率可能会超过8%。现在，亚洲金融危机给我们的发展带来很大影响，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增长率能达到7%甚至6%多一点就不简单了。但我们也认识到，8%是个心理数字，它对东方人的影响比对西方人的影响要大得多。如果今年的增长率达到7.9%，第二天香港的舆论就会说：人民币马上就要贬值。你刚才说你不了解中国，我认为这种谦虚是很宝贵的。

但是我想，如果我们确实达不到8%，也不勉强。其实，要达到8%很容易，比方说，我们完全可以放松银根，大量投资，不管它是不是重复建设，但我们不会干这种傻事。至于你刚才提到的我们的统计数字准确不准确，我也不知道，但我可以向你保证，今年的数字绝对不会比去年更不准确。

我们的改革正在按计划进行，也许还会加快；否则，就不能保证我们的经济增长。特别是银行系统的改革，进度明显加快了。我们从亚洲金融危机中学到很多东西，不加快改革，就不能稳定金融。最近我们关闭了几家银行，我们认为，不管有什么背景，出了问题，该关的就要坚决关掉。

最近日本出现的问题，给我们增加了一点信心。过去总有人以为中国的银行系统是世界上最坏的，现在让我们稍微有点安慰的是，也许我们并不是世界上最坏的，至少是倒数第二，而倒数第一的是日本。

鲁宾： 也许你说的是对的。中国和日本的情况不同，中国敢于正视自己的问题，并着手去解决。而日本却显得信心不足，缺乏解决问题的具体措施，这是两国之间的差别。

总理先生，我知道中国有四大银行，国际上有人估计，这些银行的坏账率达到25%到30%，当然这不是你们官方的数字。但不管这个数字是多少，我想中国可能比较缺乏这方面的技能。对此，你们有些什么打算呢?

朱镕基： 你讲的25%有一定的准确性，但这25%不是坏账，可以说是不良贷款。不良贷款不等于不能收回的贷款。当然，25%的不良贷款比例也是比较高的了，但是，完全不能收回的坏账、呆账的百分比不是很大。有一个很重要的情况是，这些不良贷款大多是在1992年、1993年房地产过热时造成的，直到现在还没有完全解决。在以后几年的金融改革过程中，新的不良贷款很少形成，老的不良贷款逐年下降，我们的目标是，每年下降两个百分点或者更多。现在，我们的银行正朝着审慎经营、严格控制不良贷款的方向运营。你在国内经常会受到你们国会的质询，我也一样，经常要受到我们国内的批评。有人说我是“惜贷”，吝啬贷款。一些经济学家对我说：“现在应该放松银根，多发票子，把经济刺激上去，但是你们银行就是不愿意贷款。”

鲁宾： 你们中国对这些问题的讨论很有意思。这样好不好，我们两个换个位子，你向美国国会负责，我向中国人民负责，怎么样?

朱镕基： 我可干不了你的活儿。

鲁宾： 我能不能再提个问题：面对东南亚和日本出现的危机，我们美国还应该做些什么才更好呢?

朱镕基： 我觉得现在对日本能够产生影响的只有美国，而不是别的国家。如果美国坚持向日本施加影响，日本还是有实力稳住日元的。如果美国在这个问题上犹豫，日元就会继续下跌，这对东南亚国家不利，对香港的打击也很大，反过来，也会影响美国。现在已经有人怀疑，目前美国的经济太好，股票价格太高，大家都在等着它下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愿意看到整个世界经济受到影响。从中国来说，我们只能做到人民币不贬值，但我们没有影响日本的能力。

鲁宾： 我们一直密切关注日元贬值的情况，包括克林顿总统在内，但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找到有效的办法去说服日本采取果断措施，扭转局势。我们可以继续向日本施加压力，但如果日本政府不行动，那还是没有用。你说得很对，美国的经济也一样容易受到打击，我们也想避免。此外，我们也非常关心香港的问题，请问你们怎么看待香港的汇率?

朱镕基： 港币与美元的联系汇率制现在是骑虎难下，没有别的办法，只能继续坚持。港币还会受到国际上的冲击，但我想香港能顶得

住，中央政府也会不惜一切代价支持香港。

鲁宾： 我想再提一个问题。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谈判问题上，我们的首席谈判代表提出了一个新的建议。今年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将达到600亿美元。你知道，在美国，贸易问题会受到政治的影响，是个非常棘手的问题，可能会导致贸易保护主义的浪潮。我们认为，美国的新建议符合双方的利益，希望中方认真考虑我们的建议。

朱镕基： 你们不要相信500亿、600亿美元这些数字，你们应该按照克林顿总统说的，把这些搞数字的人全部解雇。如果我们有500亿美元顺差的话，那么中国的外汇储备可能就是3000亿美元，世界第一了。

鲁宾： 你们正朝着这个方向发展。

朱镕基： 这纯粹是个计算方法问题。

鲁宾： 即便是按照中国的计算方法，这个数字也是相当可观的。

朱镕基： 我们的出口产品中，54%是加工贸易出口，就是说，从美国、日本等国进口原材料，在国内加工后再出口。中国并没有得到多少好处，就是增加了点就业。如果我们真的有500亿美元顺差的话，那么中国就不是现在这个样子了，就没有这么多困难了，我这个总理也就好当了。

鲁宾： 我同意你的说法，我们可以就计算方法进行讨论，但你也应该同意我的意见，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多年来一直有，而且在不断增加。

朱镕基： 对于这个问题，我们一直在想办法解决。这次克林顿总统访华，我们就签了30亿美元的合同买你们的设备，比你们帮助日本的20亿美元还要多。这次本来还想达成一项协议，美国承诺给予中国永久性最惠国待遇，同意中国明年年底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与此同时，中国在电信、金融等领域提出一个进一步开放的时间表，但是没有得到美方的欣赏，你们反而提出更高的要求，我们感到很遗憾。当然，这个问题还在谈。

鲁宾： 可能现在会有一些新的进展。

朱镕基： 如果能谈成的话，是美国对我们的帮助，同时也使我们更有能力去帮助解决东南亚的金融危机。

鲁宾： 但愿能成功。

朱镕基： 听说你还要访问东南亚几个国家?

鲁宾： 是的，我还要访问马来西亚、泰国和韩国。主要目的是表达我们对这些搞改革的国家的支持。我认为即使日本能够采取措施，加上韩国、泰国这些国家共同努力，真正解决目前存在的问题仍需要相当一段时间。

朱镕基： 日本本来可以做得很多，但他们没有做。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拿出40亿美元来帮助泰国、韩国和印度尼西亚。我告诉日本人说，我们借钱给这些国家，实际上是帮助他们还你们的债。

鲁宾： 谢谢你的会见。

竭尽全力，确保长江大堤安全

(1998年7月5日、9日)

1998年7月4日至9日，朱镕基同志先焙在江西、湖北、湖南省考察防汛工作。这是朱镕基同志在分别听取三省工作汇报后讲话的一部分。

一

(在江西省，1998年7月5日)

江西省前一段时间的抗洪抢险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目前，讯情尚未过去，长江和鄱阳湖的水位居高不下，有继续上涨的可能，形势依然十分严峻。绝不能有任何松懈麻痹思想，各方面一定要做好迎战更大洪水的准备。要把防洪救灾作为当前第一位的工作来抓，进一步落实防汛责任制，抓紧修复水毁工程，密切注意汛情发展，切实做好洪水调度，严防死守，确保长江大堤和鄱阳湖重要堤防安全，确保京九铁路①安全，确保人民生命财产安全。要切实安排好灾区群众的生活，确保群众有饭吃、有水喝、有衣穿、有住处、有病能治。灾区干部群众要自力更生，不等不靠，积极生产自救，在洪水退后要抓紧补种晚稻，发展多种经营。

① 京九铁路，北起北京西客站，南至广东深圳，连接香港九龙，跨越京、津、冀、鲁、豫、.皖、鄂、赣、粤九省市，包括同期建成的两条联络线在内，全长2553公里，于1996年9月通车。

江西省今年的灾情比较重，防汛经费应该增加。去年的气象预报说，今年将有比较大的灾情，国务院已增加了防汛经费。现在看来还不够，要考虑再增加一些。水利部要根据受灾情况，对应该增加多少防汛经费，正式向中央提出意见。

水利建设是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要加强水利建设，这有利于保持发展后劲，有利于扩大内需，确保今年8%的经济增长目标。

要加快已落实的水利建设项目的进度，国务院已经安排了一部分资金加大这方面的投入。对于水利设施建设，中央是支持的，国家也应当拿钱，但必须按程序办，由国务院有关部委审查，经总理办公会议研究确定，不能仓促上马。该你们做的前期工作，你们要抓紧做。鄱阳湖治理二期工程规划已经报到了国家计委，请国家计委按程序报批。廖坊水库是一个大型水利枢纽工程，它的项目建议书还没有批，也不能仓促上马。国家计委要抓紧该项目的审批，报总理办公会议研究。问题在于要把资金落实，究竟省里有多大力量、能拿多少钱？水利基金又能出资多少？水库可以发电，发电就有效益，可以用一部分银行贷款。如果资金还不够，需要中央支持，我们愿意多拿点钱，但得按程序办，要平衡全国的情况。



1998年7月4日，朱镕基在江西省九江市德安县乌石门村察看灾情，慰问受灾群众。左一为江西省委书记舒惠国。

要下决心解决长江大堤的加固问题。中央和地方财政共同出资，三年解决这个问题，免得年年动员这么多人上堤防洪，年年提心吊胆。这是保持长治久安的大事。目前资金确实紧张，但有些钱是胡乱花掉

的。比如共青垦殖场发行的债券，纯粹是胡花，那些钱如果用在水利建设上，可以办不少事情，要从中吸取教训。现在搞工业项目，很多都是重复建设，很可能完全是浪费，要把有限的钱投在基础设施上，这也是贯彻中央3号文件的精神。九江长江大堤的加固，一共需要9亿元，三年完成，平均一年就是3亿元。你们九江市究竟能拿多少钱？市里财政很紧张，关键是要调整支出结构，挤出钱来搞水利。是不是初步这样定，国家每年拿2.5亿元，地方每年拿5000万元，今年就开始，三年完成。加固长江大堤，是一件有社会效益的事情，财政应当拿钱。你们现在不要想发中央的财，也不要想发农民的财，地方财政一定要挤出钱来办这件事。地方承担的资金，千万不要搞摊派，加重农民和城市居民的负担。这次之所以到沿江的三个省来定这件事，就是想解决好这个问题。不是讲“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吗？在你们手上如果能办成这件事情，就是造福子孙后代。这个项目正式开工之后，一定不能胡乱花钱，造成浪费，必须保证质量。水利部门有监督职责。要搞最好的设计方案，做好施工方案的论证。修大堤绝不能偷工减料，水利厅厅长就要做好监理工作，对施工队伍要严格监督，确保工程质量。过去对搞江防也是很严格的，清朝时江堤倒了，负责江防的官员是要被杀头的。今年要完成3亿元的投资，准备工作现在就要开始，包括设计和施工物资的准备。

二

(在湖北省，1998年7月7日)

这次，我到江西，又到湖北，还准备到湖南，主要是因为今年汛情来势凶猛。目前，在江西九江和湖北有些地段已经超过了历史上的最高水位，而且汛期可能持久，汛情可能更加严重。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以下简称“国家防总”)决定的方针是，要准备应对1954年 型的大洪水，不是静止地保，而是洪水还可能超过1954年，也要保住。实际上，现在九江的洪水已经超过1954年了。1954年，荆江分了洪，减轻了长江中下游地区的负担。现在，我们不打算分洪，要死保。要做好这个思想准备，也就是说，要有更长期的防汛准备，要有迎战更大洪水的准备，在今年这个关键时刻，非保不可！

我代表党中央、国务院，代表江泽民总书记，向同志们表示慰问、表示感谢。因为在这么大的洪水情况下，你们做了大量的工作，顶住

了洪水，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同时，还做好了应对更大洪水的准备。我对你们寄予很大的希望，希望你们继续努力，绝对不要松懈。

从中央来讲，我们尽一切力量来支持应急的防汛经费，你们要的1.7亿元，暂时拿不出来，因为今年的防汛经费全国只剩下1.54亿元，好几个省还在等着呢。现在先给你们拨5000万元，请你们尽量用在急需的地方。将来还需要多少钱，请水利部、国家防总再根据情况核定，总之要确保。钱是要花的，但是不要浪费，要用好。至于说兴修水利工程的问题，我觉得需要认真地做好前期的工作，按程序报批，不能仓促上马；要有一个程序，但这个程序要加快，工作要抓紧。这里有个表，是你们水利厅搞的《关于请求中央解决我省长江防洪的几个问题》，提出防洪经费的数量是85亿元。第一，是长江大堤各个堤防的整治，40亿元。计划45亿元，已经花了5亿元，还要40亿元。第二，是分洪区的建设，表上是23.6亿元。第三，是病险水库的整治，2.5亿元。第四，是洞庭湖区湖北部分的整治，表上是20.5亿元，跟省里报的数字15.4亿元，又差几亿元，我不知道谁对。我讲这个话完全没有批评的意思，我现在来个"突然袭击"，你搞个报告也很不容易，这里面的数字有自相矛盾的地方是难免的。我不是嫌你要的钱多，我就怕这个钱要了以后，什么问题都不解决，那才麻烦。如果说用85亿元，把湖北的水害治了，那就谢天谢地了。我现在给你，你也花不了。所以说，要赶快抓紧做前期工作，要做细一点，对有些指导思想要认真研究。

考虑整个水利建设的规划，防洪、防汛、防涝，要有一个总的指导思想。一是立即停止围湖造田。现在，湖已经缩到最小，古称"云梦泽"、"千湖之国"，已经不是那个样子了。二是大力开展水土保持工作，植树造林。中央已经下定决心，长江、黄河中上游地区的树林不许再砍，砍树的队伍都要变成造林的队伍，中央准备拿出一大笔资金来解决这个问题，从四川省开始，今年就执行。否则，将来黄河小浪底水库、长江三峡水库都成了"沙库"。昨天到长江边检查防汛工作，我看长江跟黄河没有什么区别了，恐怕汉水变"黄河"的日期也不远矣。所以，一定要搞植树造林、水土保持，把钱用到这个上面去。事实证明，不搞水土保持，光建大型水库是没什么用的，只能是个"沙库"。如果把所有的钱或主要的钱放在修大型水库上，那是犯方针性的错误，是水利工作方针的错误。三是把大堤的整治放在分洪区整治的前面，

还是要保证大堤万无一失。昨天，我到荆州长江大堤察看，我们决定马上拨3000万元修大堤上的公路。每公里需要投资35万元，马上就修，全堤都修通水泥路面的公路。这样，防汛队伍就可以乘汽车调动，哪里决堤、哪里管涌，靠“人海战术”也可以把大堤保住。长江南岸大堤的标准低一点，也得修公路。分洪区内以后不要搞那么多建设项目，你们打算把23.6亿元花在分洪区，我怀疑要不要花这么多钱。早早做了决堤的准备，不是很合适的方针，应该立足于保堤为主导。如果堤都像汉口龙王庙那样中间用混凝土做防渗墙，就万无一失了。分洪区少花点钱，主要把大堤上的公路修起来，也便于经济发展，便于救人。病险水库的修整当然是应该的，洞庭湖水系也一定要治理，要规划以后实施。

三

(在湖南省，1998年7月9日)

首先，感谢你们在这次抗洪抢险工作中领导得力，军民团结奋 战，渡过了一道难关，取得了很好的成绩。当前，汛期还没有过去，也可能还有更大的洪水，我们要做好迎战更大、更危险洪水的准备，继续努力，绝不可松懈，坚持到底就是胜利。要竭尽全力，人在堤在，确保堤防万无一失。当然，万一发生溃垸的情况，我们一定要做好善后的准备工作，要救人，不能造成人员伤亡。



1998年7月8日，朱镕基在湖南省岳阳市麻塘垸察看洞庭湖汛情，慰问护堤农民。前排右三为岳阳市委书记张昌平。

下面讲一下洞庭湖治理问题。我们也不是今天碰到洪水就来谈洞庭湖，早就讲要治理洞庭湖。过去因为条件不具备，中央也拿不出钱来，所以，这个问题迟迟没有解决。现在，我们要加快洞庭湖治理的进度。水利部已经批复了洞庭湖的治理规划，目前就是要逐个项目来落实。我看，这里面应该有一个顺序。我认为最重要的是堤防建设，需要31.19亿元，这应该是摆在第一位的，首先得建堤防。第二是泄洪道整治，需要19.44亿元，包括用挖泥船挖泥、裁弯、清障等等。我认为，这两项是主要的。第三是城市防洪，需要43.09亿元。这原则上应该由各个城市自己负责，对这一点国务院也有规定。第四是蓄洪区的“安全楼”建设。我们昨天在君山看到的情况，主要是有个台子就行了，值钱的东西可以放在台子顶上，群众可以通过公路转移出去。期望“安

全楼”来保证群众人身安全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们应该把蓄洪区的“安全楼”建设放在最后。今年，当务之急就是要修荆江门、七弓岭等六个长江干提险段，精心设计，做好一切施工准备，洪水一过就动工，下决心建设高标准堤防。中央拨1.5亿元，地方拿5000万元，我们回北京以后马上拨款。洞庭湖治理的其他项目，由省里按程序报批，所需资金由中央和地方各拿50%，只要地方的资金落实了，项目的前期准备工作做好了，具备了施工的条件，就可以批准建设，中央该拨多少钱就拨多少钱。地方资金也一定要到位，不能向农民搞摊派。除了每年规定的群众义务工以外，群众其他的投工投劳一定要给工钱，不能加重群众负担，要千方百计增加老百姓的收入。

严厉打击走私犯罪活动

(1998年7月15日)

1998年7月13日至1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北京召开全国打击走私工作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负责同志，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同志，以及解放军四总部和海军、空军、武警总部负责同志。朱镕基同志在会上的讲话，对在全国迅速开展大规模的反走私联合行动和专项斗争做了动员和部署。讲话曾发表于《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册，原标题为《统一思想，加强领导，迅速而严厉地打击走私犯罪活动》。编入本书的是讲话的主要部分。

这次全国打击走私工作会议，是今年党中央、国务院召开的又一次非常重要的会议。会议开始时，江泽民同志接见全体会议代表并作了重要讲话。江泽民同志的讲话，语重心长，义正词严，忧国之情，溢于言表，对于我们在全国迅速开展一场大规模的反走私联合行动和专项斗争，严厉打击走私犯罪活动，对于深入开展反腐败斗争，从严治党、治政，都具有十分重大的指导意义。各地区、各部门和各个方面一定要按照江泽民同志的重要讲话和这次会议的要求，统一思想，加强领导，周密部署，在全国迅速而严厉地打击走私犯罪活动。下面，我根据会议讨论的情况，讲几点意见。

一、充分认识深入开展反走私斗争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走私活动猖獗是当前我国社会经济生活中一个突出的问题。在全国范围内雷厉风行地深入开展反走私斗争，是党中央、国务院根据形势发展作出的一项重要决策。它关系到今年经济发展目标的实现，关系到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关系到党风廉政建设的进一步加强。我们要下最大的决心，采取坚决果断的行动，务必取得显著成效。

近几年来，各地区、各部门在反走私斗争中做了大量工作，成绩是明显的。这一点应当充分肯定。但是也必须清醒地看到，当前反走私

斗争形势依然十分严峻。走私活动范围广，走私货物品种繁多、数额巨大，都是前所未有的。利用假批文、假单证、假印章的走私和瞒报、夹藏等瞒骗走私，以及利用加工贸易和保税区变相走私的违法犯罪活动愈演愈烈。走私最严重的商品是“两油”(成品油和食用油)、“两车”(汽车和摩托车)、“两料”(纺织原料和化工原料)，以及香烟、盗版光盘等。此外，还有大量的胶合板、照相机、感光材料、显像管、压缩机、手机、计算机、橡胶、药品、洋酒、洗涤用品等上百种商品。据有关方面估计，每年走私进来的商品价值高达千亿元。

日益猖厥的走私活动，已对我国经济、社会、政治造成多方面的严重危害。它使国家经济和税收蒙受巨大损失，冲击国内市场和民族工业，扰乱市场经济秩序。大量的走私活动，加剧了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的困难。当前一些企业开工不足，生产经营困难，下岗人员增多，在一定程度上与走私商品挤占部分国内市场有关。还要看到，大量的走私活动，阻碍党和国家方针政策的贯彻落实，使一些地方、单位政令不通，助长本位主义、地方主义和分散主义倾向；同时，腐蚀干部，败坏社会风气，诱发大量刑事犯罪。走私导致经济上的腐败、政治上的堕落。如果让走私活动继续泛滥下去，不仅会严重影响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而且还会搞垮我们的经济，搞垮我们的政权，搞垮我们的党。因此，打击走私犯罪活动，既是一场重大的经济斗争，也是一场严肃的政治斗争。



1998年10月24日，朱镕基在广东省黄埔海关仓库巡视查获的走私物品。前排右一为广东省省长卢瑞华，右二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国务委员吴仪；后排中为海关总署署长钱冠林。

近年来走私活动的突出特点，是法人走私泛滥，特别是特殊法人走私严重，形成内外勾结，走私、护私盛行。尤其是一些地方的党政军机关和执法、司法部门的挂靠机构和人员参与走私，在群众中造成极为恶劣的影响。这是当前走私活动猖獗、愈演愈烈的症结所在，由此也增加了反走私斗争的复杂性和艰巨性。不从根本上解决法人走私尤其是特殊法人走私的问题，就不能彻底打击走私邪恶势力的嚣张气焰。

为什么走私猖厥而又屡打不止?

首先，主要是一些地方和部门的领导干部对走私的危害性认识不足，存在着种种错误思想。有的人认为，“走私可以致富”、“走私可以搞活经济”、“打私不能打死”、“打私影响改革开放”。这些纯粹是奇谈怪论，荒谬绝伦！走私就是犯罪，走私只会使极少数人暴富起来，绝大

多数人的利益必然会受到损害。走私只会破坏改革开放，只会搞乱经济，而绝不是搞活经济。所谓“打私不能打死”，本身就是庇护、纵容走私，为走私张目。一些地方和单位的领导口头上讲打击走私，实际上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甚至纵容、支持走私，为谋求局部、小团体和个人利益，不惜损害国家利益。

其次，走私与腐败密切相关，与党内存在的不讲政治、不讲原则的庸俗作风有关。走私成风、腐败加剧，腐败保护走私，走私危害经济、遗祸国家。大量事实证明，哪些地方、哪些单位走私严重，哪些地方、哪些单位的腐败现象就很严重。党内存在的庸俗风气，使走私和腐败现象得不到有效制止。查处走私犯罪案件时，四面说情，障碍重重，使案件得不到彻底查清和依法处理。

此外，现行缉私体制和制度不健全，监管薄弱，执法不严，打击不力，也是走私活动猖獗的重要原因。早在1987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法》就明确规定：查处走私必须没收货物，并可处以货物等值以下罚款；构成走私罪的，应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这一法律规定长期没有得到执行。一些地方的执法、司法部门以罚代没、以罚代税、以罚代刑，这些做法实际上是放纵走私，助长了走私活动的泛滥。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一直重视打击经济犯罪，包括打击走私犯罪。早在1982年，邓小平同志就指出：“我们要有两手，一手就是坚持对外开放和对内搞活经济的政策，一手就是坚决打击经济犯罪活动。没有打击经济犯罪活动这一手，不但对外开放政策肯定要失败，对内搞活经济的政策也肯定要失败。”①从那时起，我们就坚

持不懈地打击走私犯罪活动。江泽民同志近几年对打击走私活动作过一系列重要指示。他说：无论是中央还是地方，我们都是在一条 船上，所有的同志都要同舟共济，大家一起迎着风浪，坚定不移地 沿着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迈进。如果我们心不齐，各行其是, 特别是如果容忍走私泛滥以及其他腐败现象滋生蔓延，一旦翻了船， 大家都要落水的。这番话语重心长，发人深省。江泽民同志前天接 见这次会议代表时再一次强调，为了把当前走私猖厥的势头打下去， 必须做到决心大、行动快、措施硬、惩治严。对于这样严重的犯罪 活动，必须坚决打击，绝不能手软。各地区、各部门、各方面一定 要深刻理解邓小平和江泽民同志的讲话精神，站在改革开放和现代 化建设全局的高

度，站在维护国家经济安全、实现国民经济持续快 速健康发展的高度，站在反对腐败、保证国家长治久安的高度，充 分认识严厉打击走私活动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增强深入开展反走私 斗争的自觉性，下更大的决心，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坚决把走私 猖獗的势头打下去。

---

① 见邓小平《坚决打击经济犯罪活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04页)。

二、关于深入开展反走私斗争的几个问题

江泽民同志在前天接见与会代表时的重要讲话和吴仪同志所作的工作报告，对深入开展反走私斗争的总体要求和工作部署都讲清楚了，大家要认真领会和贯彻落实。这里，我再强调以下几个问题。

(一) 突出重点，明确任务。

为了迅速而严厉地打击走私犯罪活动，党中央、国务院决定，从今年7月到年底，要集中时间，集中力量，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一次大规模的反走私联合行动和专项斗争。各地区、各部门、各方面都要立即行动起来，对走私势力展开强大攻势，给以毁灭性打击。

搞好这次反走私联合行动和专项斗争，必须注意点面结合，突出重点。从走私商品看，重点是成品油、汽车、香烟、盗版光盘等商品，对食用油、摩托车、化工原料、纺织原料、手机、计算机等商品的走私也要坚决打击。从走私地域看，重点是广东、广西沿海特别是珠江水域的海(水)上走私，以及中越边境北仑河沿线的走私活动。这些地区走私量大面广，影响恶劣。福建、浙江等沿海地区和内陆边境有关地区，也要加大打击力度。从走私手法和渠道看，重点是打击在进出口环节利用假批文、假单证、假印章的走私和瞒报、夹藏等瞒骗走私，以及利用加工贸易和保税区(仓)的走私活动。对重点商品、重点地区和重点渠道的走私，要采取特殊措施，加大打击力度。

这里，着重强调两个问题：一是打击利用加工贸易走私问题，二是打击法人走私特别是有特殊背景的法人走私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加工贸易对我国经济发展起了重要的积极作用，这一点是要充分肯定的，但加工贸易也带来很多问题。特别是近几年来

利用加工贸易走私的问题越来越多，比海上走私规模还大，危害也大。今年上半年，加工贸易出口已占我国出口总额的54%。今年1月至5月，全国查获利用加工贸易走私的大案要案157件，案值10.1亿元，占查获走私总案值的45%。在此类案件中，“三资”企业占有相当比例。如果不能制止利用这种方式的走私活动，走私严重的局面就不能得到根本扭转。因此，要理直气壮地打击利用加工贸易的走私活动。必须依法加强对加工贸易企业的监管；坚决依法查处加工贸易企业和“三资”企业倒卖登记手册和擅自内销料件、成品和减免税货物的行为。对审批新的加工贸易项目，必须从严控制，有关部门要抓紧研究制定具体办法。

法人走私，包括企事业单位以及一些地方党政军机关和执法、司法部门所办公司和挂靠公司走私，数额巨大、性质严重、手段恶劣、危害极大。这次要着重打击法人走私，特别是要打击那些有特殊背景的法人走私，严惩法人走私的组织者、策划者、参与者以及幕后支持者，追究其主管机关和单位主要领导人的责任。各地的党政军机关和执法、司法部门一定要认真查处下属单位所办公司和挂靠公司中存在的走私、护私问题。这次反走私联合行动和专项斗争的成效如何，很重要的一点是要看打击法人走私的进展及其成果。

这次反走私联合行动和专项斗争，要抓好三个环节。一要迅速刹住走私歪风，制止新的走私案件发生。为此，要继续贯彻“海上抓、岸边堵、口岸查、市场管、处罚严”的缉私工作方针，做到打防结合。二要彻底查处已发生的走私案件，狠狠打击走私犯罪分子，依法杀一批人，杀一儆百，震慑走私势力，教育干部群众。三要综合治理，标本兼治，从根本上解决打击走私乏力的问题。总之，要在全国形成打击走私、防范走私的新局面。

(二) 集中力量查处大案要案，坚决打击走私势力的嚣张气焰。

从以往打击走私的经验看，只有彻底查处大案要案，严厉打击走私犯罪分子，才能有力地震慑走私势力，也才能更好地教育干部和群众。80年代初期，广东省海丰县走私猖厥，由于当时依法果断地严惩了纵容、支持走私活动的原县委书记，才迅速地扭转了这个地区走私严重的局面。同样，1993年山东省乳山市走私猖獗，也是依法处决了走私犯罪的罪魁祸首，并判处原市委书记死缓，立即收到了杀一儆百

之效。因此，我们要把打击走私斗争引向深入，并取得显著成效，必须集中力量重点突破一批走私数额巨大、情节严重的典型案件，依法从快从严惩处走私犯罪分子。

要加大查处走私大案要案的工作力度。对发案率高、重大案件久拖不结的地区和单位，要由中央和省(自治区、直辖市)组织专门力量直接查处。要加强对办案工作的指导。对大案要案，主要领导要亲自过问，对涉及多部门、多地区的重大案件，有关地区和部门要联合办案，提高办案效率。

查处案件要来真的、动硬的，坚决排除一切阻力和干扰。不论案件涉及什么单位、什么人，都要一查到底，并依法从快从严惩处，绝不姑息。对那些性质恶劣、情节严重的走私犯罪分子，要依法给予最严厉的法律制裁。要狠刹说情风，谁说情，就请纪委、监察部门先来查一查，还可以让中央电视台的《焦点访谈》去采访，使走私分子以及庇护者、说情者没有藏身之地。要建立打击走私通报制度，以督促各地区、各部门加大查处案件力度。对于尚未结案的大案要案，要抓紧结案，依法处理。要加强群众监督和舆论监督，对典型案件的查处结果要及时曝光，以增强打击走私的威慑力。

(三) 深化改革，建立反走私新体制。

为适应反走私斗争新形势的需要，党中央、国务院决定对现行缉私体制进行重大改革。

一是组建国家缉私警察队伍，专司打击走私犯罪活动。国家缉私警察是对走私犯罪案件依法行使侦查、拘留、逮捕、预审权力的专职刑警队伍。国家缉私警察实行海关与公安双重垂直领导、以海关领导为主的管理体制，按照海关对缉私工作的统一部署和指挥，部署警力，执行任务。国家缉私警察不承担维护社会治安和打击其他刑事犯罪的职责，与地方公安没有隶属关系。由于走私案件具有不同于其他经济案件、刑事案件的特殊性，走私是跨国(境)犯罪，线索稍纵即逝，必须当机立断采取措施。因此，组建国家缉私警察队伍，有利于迅速、有力地打击走私犯罪活动。这是从我国实际出发，借鉴国际通行做法的一项改革措施。

二是联合缉私、统一处理。为了改变原来多部门不规范缉私、政出多门、秩序混乱的弊端，要建立以海关为主，公安、工商等执法部门联合缉私，对查获的走私案件由海关统一处理的制度。各执法部门查获的不构成走私罪的案件，一律交由海关予以行政处罚；构成走私罪嫌疑的案件，一律移送缉私警察侦办；查获的走私物品和价款，一律交由海关及时上缴国库，任何单位不得坐支截留。

三是改革现行缉私罚没收支管理办法，坚持“收支两条线”制度。缉私罚没收入全部上缴中央财政。中央财政留30%作为补税；其余部分的50%用于有关缉私部门改善缉私装备、办案、奖励缉私有功单位和人员，50%返还给省级财政，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统一安排，也主要用于反走私工作。缉私罚没收人还要拿出一些支持和奖励缉毒队伍。中央财政要简化返还手续，提高工作效率。

实行以上这些改革措施，既可以加强缉私力量，又可以从体制上、机制上保证及时、有效地打击走私犯罪活动，符合依法治国、依法行政的要求，是完全必要的。各有关方面要认真贯彻执行。

把反走私斗争不断引向深入，必须将打击走私活动同强化法制、整饬秩序、加强监管、惩治腐败很好地结合起来。各地的党政军机关和执法、司法部门都要坚决清理所办公司及其挂靠公司，并限期同所办公司和挂靠公司在人、财、物等方面彻底脱钩。这项工作已经讲了多年，至今没有落实好。党政机关和军队、武警部队是吃“皇粮”的，绝不能经商办公司。这次要下决心抓紧解决问题。问题复杂的，也要先脱钩，再整顿。要全面清理、坚决取缔走私货物交易市场，严厉打击贩私活动。现在法制不完善，已有的一些法律法规条文也缺乏力度，要根据形势发展和反走私斗争的需要，抓紧修订和制定有关法律、法规，完善各项管理制度，并严格执法，使打击走私走上法治化的轨道。

三、加强领导，狠抓落实

深入开展打击走私犯罪活动，既是当前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也是一项长期、艰巨的任务。各级党委和政府务必高度重视，切实加强领导，把这项工作放在重要议事日程上。各地区、各部门、各方面都要讲政治、讲大局、讲纪律，把思想和行动真正统一到党中央、国务院

的部署和要求上来。要逐级建立反走私斗争的领导责任制，特别是走私严重的地方，党政主要领导要亲自抓，切实负起责任来。对于那些领导软弱、打击不力，甚至阳奉阴违，不能在限期内扭转本地区、本单位走私泛滥局面的，要严肃追究当地党政主要领导的责任。各级公安、工商、监察部门和法院、检察院要把打击走私作为一项重要任务。各有关部门要密切配合，齐抓共管，协调行动，进行综合治理，共同承担起打击走私的责任和任务。要广泛发动和充分依靠人民群众，形成一种对走私活动“老鼠过街，人人喊打”的社会环境，构筑防止走私、打击走私的铜墙铁壁。

这次打击走私联合行动和专项斗争的成效如何，要看重点商品、重点地区、重点渠道的走私活动是否得到有效遏制，要看走私大案要案和走私犯罪分子是否得到彻底查处，要看人民群众对打击走私成果是否真正满意。国务院对打击走私工作的进展情况将组织全面检查。

要进一步整顿和加强海关队伍。当前打击走私斗争任务十分艰巨，实行新的缉私体制也对海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关键是要建设一支高素质、战斗力强的海关队伍。党中央、国务院对海关寄予很高的信任和重托。总的来看，我们的海关队伍是好的，作出了很多成绩，但是暴露出来的问题也相当严重。一些海关人员受贿放私，甚至参与走私。据统计，1993年至1997年海关系统查处的受贿放私、参与走私案件211起，涉案人员303人。这仅是立案查处的情况，有些问题可能还没有暴露出来。海关是缉私的主要部门和主要力量。正人必先正己，己不正焉能正人。海关要廉洁自律，严厉惩治腐败，坚决清除队伍中的害群之马。特别要整顿和加强海关系统的领导班子，坚决把那些软弱无力、素质不高、不适合担任领导职务的人员调出去，选派一批真正铁面无私、不怕得罪人、有牺牲精神和精通业务的人员充实到海关各级领导班子中。要培养一支忠于职守、高效廉洁、纪律严明的反走私队伍。不断加强海关队伍的反腐败教育和职业道德教育，全面提高人员素质。每个海关工作人员都要正气凛然，敢于坚持原则，敢于得罪人，认真履行党和人民赋予的神圣职责，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国家，做反走私斗争的坚强卫士。公安、工商等缉私执法部门也都要切实整顿队伍，特别是要加强各级领导班子建设，积极主动和认真负责地做好打击走私工作。要充实和加强缉私装备力量，下决心在所有

的口岸都配备集装箱透视检查系统，还要增加缉私艇、直升飞机等装备，提高反走私的战斗力。

在全国开展一场大规模的反走私联合行动和专项斗争，是党中央、国务院为确保今年经济发展目标顺利实现和经济健康发展的一项重要部署，也是深入开展反腐败斗争、加强党风廉政建设的重要举措，事关全局，意义重大。让我们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紧密团结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振奋精神，齐心协力，夺取反走私斗争的新胜利。

赤峰可以建设成为旅游城市

(1998年7月29日)

1998年7月27日至29日，朱镕基同志在内蒙古自治区考察工作，先后考察了赤峰、呼和浩特等地。这是朱镕基同志在赤峰考察期间的讲话，曾发表于《党和国家领导人论旅游(1978～2004年)》。编入本书时，对个别文字作了订正。

赤峰是辽文化古都，应该发展旅游，至少可以发展一些国内旅游。现在国内游客到承德去旅游的很多，你这儿跟承德也差不多嘛。

要把精力集中在发展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上来。不要再搞重复建设、盲目建设，不要再去盲目扩大工业生产能力。我觉得赤峰可以建设成为一个美丽的中等城市、一个旅游城市，因为你这里是辽文化古都。要有一些人研究这里的历史，把文物整理一下，发展一点旅游文化，就至少能够吸引一些国内的人来旅游。但这不是说马上去修一些大宾馆，那完全没有必要。那样一搞的话，就又是没有市场观念。旅游者不可能马上就来，这是一个发展战略。欧洲很多城市搞旅游，它们不是搞大宾馆，而是搞家庭的旅馆。一个家庭就可以开一个旅馆，自己一栋房子里面，有几间房子做客房，搞得非常干净，服务非常好，像回到家里一样，非常舒服。多瑙河沿岸的国家都是这种旅游方式，不是搞大宾馆，关键是干净。我首先感到赤峰很干净，这给人一个很好的印象。要发扬这个传统，把它搞得更好，搞得很精致，到处都很干净，人家就愿意来。我赞成你们改造机场，但不是今天，要逐步来。这是基础设施建设。

赤峰最大的基础设施建设就是治沙。我认为，要大规模地开展造林、固土、治沙工程。整个城市的面貌，在若干年以后将会发生巨大变化。也许我们看不见了，但是可以为子孙后代造福。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停止工业项目的重复建设和盲目建设，这恐怕要作为经济发展战略的很大问题来解决。城市建设搞好了，美化了，各方面都非常方便，财源就来了。应该说，赤峰这个地方交通还是比较发达的，有机

场、铁路、公路，需要再完善一下。要把劳动力转移到第一产业、第三产业方面去，搞基础设施建设，发展服务业，发展旅游业。工业肯定容纳不了这么多人，所以非要向服务业、旅游业寻找出路不行。保证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是暂时的措施，保证社会安定，最终还是要让大家就业。不调整经济发展战略，就业问题解决不了，社会还是不稳定。还是要靠调整产业结构，开辟就业门路。

如果将来赤峰变成旅游城市，下次我再来看看你们的辽文化。

把保证群众的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

(1998年8月8日)

1998年8月8日至9日，朱镕基同志亲临湖北省抗洪第一线，指挥长江防汛抗洪工作。这是朱镕基同志在荆江分洪区的讲话。

中央决定要确保荆江大堤的安全，确保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为了大局的需要，荆江分洪工程的运用，要做好必要的准备，做到有备无患。现在长江水位暂时稳住了，能够尽量争取不运用荆江分洪工程，那将是最大的幸事。在任何情况下，一定要把保证群众的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人的生命是最宝贵的，“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一定要有这个远见。

今年长江流域发生了1954年以来最大的洪水。湖北人民在省委、省政府的正确领导下，抗御了这样一个特大洪灾，虽然遭受了一点局部的损失，但总体上保住了长江大堤，保住了江汉平原，保卫了武汉三镇，立下了很大的历史功勋。在抗洪斗争中，中国人民解放军发挥了不可代替的骨干作用。昨天，江泽民同志特别要我代表党中央，代表国务院，代表他本人，向湖北省委、省政府和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向中国人民解放军，表示最衷心的慰问和感谢！

8月6日，湖北省委报告，沙市水位已超过44.67米，要求考虑分洪。党中央、国务院非常重视，江主席和我都非常支持温家宝同志到湖北防汛前线来，跟大家一起抗御洪水。江主席和中央军委特别命令解放军5万大军大战长江，这是历史上的壮举，起了很大作用。现在看来，你们的部署都是正确的，并且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温家宝同志来了以后，我经常和他通话，了解抗洪最新情况。他说守堤的军民情绪很高，纷纷表示决心死守长江大堤，特别是驻守监利、洪湖这一段堤防的空降兵第15军对坚守大堤有信心、有决心，我听了很高兴。第二天早晨6点钟，我又给抗洪前线打电话，了解到详细情况，觉得很有信心。

但是，沙市水位后来还是一直上涨，8月7日早上6点达到44.75米，7点44.81米，8点44.84米，9点44.87米，10点44.88米，到11点已经涨到44.98米了。我当时很紧张，特别是下午两点半的时候，九江大堤决堤了，这是谁也没有想到的。那时我们都很紧张，我给九江方面打了电话，问了一下前线的情况。下午6点，沙市的水位还在不断上涨，很快就要接近45米，我就立即到北戴河去，向江主席汇报后，决定晚上9点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除了7位常委外，还有国务院的副总理、国务委员，还有丁关根同志和张万年、迟浩田、傅全有①等同志。会议从晚上9点开到11点，经过了非常严肃、认真和热烈的讨论，每位常委都发了言，都讲得很透，从历史讲到现在，大家都非常关心长江的水情，关心湖北的安危。大家发言都是互相补充，没有发生任何争论，取得了一致意见。散会以后，我立即跟贾志杰②同志通了电话，想让你们尽快领会中央精神。接着，我又跟温家宝同志通了电话。后来，我们修改《会议纪要》，一直改到8月8日凌晨3点多钟。这中间，我又给抗洪前方连续打了四个电话。改好了这个文件，当时就把草稿先发给了你们，等江主席修改、签字以后再正式发文。现在，我再把这个文件跟同志们传达一下。这个文件是经过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慎重讨论决定的，全党、全军和各级政府应该严肃、认真地贯彻。文件里面很多语句都是江主席和中央政治局常委们的原话。文件的主要内容一共有八条：

---

① 傅全有，当时任解放军总参谋长。

② 贾志杰，当时任中共湖北省委书记。

第一条，当前长江防汛形势十分严峻，对此要有充分的认识和足够的准备。要把长江抗洪抢险工作作为当前头等大事，全力以赴抓好。

第二条，要坚决严防死守，确保长江大堤安全，不能有丝毫的松懈和动摇。如果长江大堤的安全不能保证，就会淹了江汉平原，淹了武汉三镇，造成极其重大的损失，特别是人民生命的损失。要积极做好荆江分洪区分洪的准备，减轻对长江左岸大堤的压力，有备无患。

第三条，授权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以下简称“国家防总”)总指挥温家宝同志，在沙市水位达到44.67米(争取45米)并预报将继续上涨时，

视是时洪水的大小，部分或全部开启荆江分洪区的进洪闸(北闸)，在此以前，我一直要温家宝同志跟你们交代，说我们没有分洪这个权，要报告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来决定。请你们给我留下时间，让我能够报告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如果你们只剩20分钟了，才向我报告，我找谁去呀？现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就定清楚了，授权温家宝同志。接下来的一句话，是我加上去的：“启闸的时间要考虑到分洪区群众的转移情况，确保分洪区群众的生命安全。”我们要对人民群众负责任，要千方百计转移群众，给一定的时间，多顶一会儿，再开这个闸。后边这句话也很重要：“分洪以后，长江大堤的防守不能放松。”要确保武汉市和江汉平原万无一失，不要以为分洪后就万事大吉。1954年你们这里分洪后，沙市水位下去了0.76米，到监利下了0.4米，到洪湖只下了0.2米。分洪解决不了大问题，在薄弱环节还是可能溃堤的。因此，严防死守在任何时候都不能松懈，不要把希望和幻想寄托在分洪上。

第四条，从现在起要加快荆江分洪区群众的转移速度，特别是老弱病残的群众要赶快转移。转移群众要采取得力措施，做好思想动员工作，这是最重要的。要动用军队、武警、民兵和一切可以利用的运输工具，组织群众迅速转移。要向群众讲清道理，不要强迫命令。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是第一位的，坛坛罐罐还可以再造，政府也会给予一定补偿。

第五条，中国人民解放军要按照中央军委的命令继续投入抗洪抢险第一线。参加抗洪抢险的部队受国家防总和当地防总的统一领导和指挥。武警部队和公安干警也要积极参加抗洪抢险。

第六条，要动员和组织一切人力、物力、财力进行抗洪抢险。抗洪抢险所需车、船和物资，国家防总和地方防总有权征用。

第七条，要防止大灾之后发生大疫。从现在起，就要做好灾区的卫生防疫工作，组织卫生部门和医务人员分赴灾区，防病治病，严防瘟疫的发生和蔓延。大水之后必有大瘟疫发生，这是规律。所以，中央已经通知卫生部，组织医疗人员，奔赴抗洪抢险第一线。药品的调运要及时，防患于未然。

第八条，要做好抗洪抢险的宣传报道工作，动员人民群众和社会各界，团结一致，坚定信心，夺取抗洪斗争的胜利。重大汛情、灾情，

由国家防总统一发布，不要乱报道。



1998年8月8日，朱镕基在湖北省沙市机场与多日战斗在抗洪前线的广州军区副司令员龚谷成亲切拥抱。

昨天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上，江泽民同志要我到湖北来。今天动身的时候，我就知道沙市水位在最近四个小时一直都没有涨。在我巡视过程中间，沙市水位一直在下降，形势在好转，我感到很高兴。这比昨晚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的估计稍微好一点。估计在长江中上游没有很大雨量的情况下，根据现在的形势来判断，沙市水位超过45米的可能性不是很大，可能是平稳地下降，也可能中间会涨起来一点点，但不可能超过45米。

但是，我认为长江的防汛抗洪斗争不能松劲，完全不能松劲！其原因就是长江大堤已经泡了40多天了，它可能不需要涨到那么一个高水位，就会溃堤。我最担心的是监利到洪湖这一段，所以明天要去看一看。那里一旦溃提，就比较厉害，那比荆江分洪要厉害得多。保住这段大堤不是靠分洪，也不是靠水位平稳下降就能够解决问题的。现在要特别强调，在大家都已经人困马乏、渴望休整一下的心理状况下，要继续再接再厉，一定要保持高度警惕，要坚决贯彻中央这个文件，不能有丝毫松懈。这是我要讲的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要继续加快荆江分洪区群众的转移工作，不能因为沙市水位没有达到45米就停止转移。转移群众的工作绝对不能停止，一定要继续。在没有宣布解除警戒以前，你们还得继续做。即便最后不开这个闸门，宁可做得过分一点，也要把群众迁移出来，以防万一，就怕万一。洪湖大堤万一溃了口，沙市水位还在44.67米以上，你们也得准备分洪。因此，绝对不要心存侥幸，还是要加快转移群众。尽管荆州市委、公安县委做了大量工作，很不容易，特别是上去的1万多名解放军做了大量工作；但是，我认为转移工作还可以做得更科学一些、更有秩序一些。比如，我们今天到的一个小镇，连一个村干部也找不着。干部绝对不能涣散，要层层负责。刚才，贾志杰同志给了我两本荆江分洪区运用方案和调度方案，做得很好；还有系统表，明确了一个人管几个人，哪一层管哪一层，也搞得很好，但是要落实。整个荆江分洪区都在你公安县之内，你得有一个系统表，每一个村、每一个镇都要有你的人负责，坐镇那个地方。干部不能走，不能光顾自己回家搬东西去了，那是不行的！如果你没有政府领导，军队1万多人

找谁去？军民要合作，地方政府和军队的领导要紧密结合在一起，组织群众转移。荆江分洪区有50多万人，据公安县委书记黄建宏同志讲，有三分之二的人在安全区，只有十几万人需要转移，实际上，工作量也就大大缩小了。这十几万人迁到什么地段，都要落实。公安县委、县政府要分工负责，跟解放军加强联系，哪个团、哪个营负责哪个地方都要明确，而且要有公安、武警维持秩序，严防在这个时候出现打、砸、抢、偷。我今天在分洪区那个小镇子看到，群众就像抗战时期逃难一样，乱哄哄的。我看了以后不大高兴，看不出秩序，看不出井井有条的转移。坐在办公室做方案是不行的，要下去落实。要跟人民群众在一起，做耐心细致的思想教育工作，说服他们，动员他们，使他们各得其所，到达安全的地方。我今天之所以讲得严厉一些，是不想让你们把这项工作松懈下来。千万不要以为沙市水位到不了45米了，不分洪了，大家就可以回家了。那可不行！

第三个问题，现在要继续加强堤防，加强群众转移工作，加强各项工作所需要的资金、物资的供应。

我要讲的就是这些。再次对同志们表示慰问，表示感谢。我来以前，江泽民同志嘱咐我，你们连日奋战都没有睡觉，无论如何也要睡几个小时。这是他的原话。这里面体现着江泽民同志对你们的关心。

农村电网改造要集中力量打歼灭战

(1998年8月13日)

这是朱镕基同志在国家电力公司《关于农村电价情况的报告》上的批语。

同意邦国①同志意见。国家贷款彻底改造农村电网，可以有效降低线损，还本付息和维护费用打入电价成本，但是免除地方附加的一切费用，我相信可以做到同网同价。因此，要坚持先改革、后改造的原则。改造要集中力量打歼灭战，改一个县，成一个县，达到合理水平，农民得到实惠。资金不撒胡椒面。请准备好再汇报。并请培炎①、春正①、叙定①、荣融①同志阅。

朱镕基

8.13

---

① 邦国，即吴邦国。培炎，即曾培炎，当时任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主任。春正，即王春正，当时任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副主任。叙定，即包叙定，当时任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副主任。荣融，即李荣融，当时任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副主任。

对证券公司的违规行为应严肃处理

(1998年8月27日、11月8日)

这是朱镕基同志关于严肃处理证#公司违规行为的两次批语。

一、这是朱镕基同志在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1998年8月15日《关于近期股市情况的报告》上的批语。报告称："从初步审计情况看，证券公司挪用客户保证金、透支等违规行为比较普遍。此类问题涉及面广，对市场影响大，只能在有利于维护市场稳定的前提下逐步解决。"

二、这是朱镕基同志在《审计署关于证券公司审计处理意见的请示》上的批语。该请示列出对88家证券公司及其分支机构进行审计查出的大量问题。有的领导同志提出"可通知有关部门分别进行处理"。朱镕基同志认为"分别处理可能不了了之"，应由中纪委、监察部牵头，有关部门参加，"进行重点查处，依法严惩"。

一

(1998年8月27日)

对证券公司的违规行为应严肃处理，"以稳定股票市场为前提"的提法不妥。没有规范、守法的证券公司，就不可能有稳定、健康的股票市场。证监会对目前证券公司存在的严重问题应进一步提高认识，否则愈陷愈深，不可自拔。

朱镕基

8.27

二

(1998年11月8日)

忠禹①、正庆①、海旺①、景宇①、金华①同志，并报锦涛①、健行①同志：分别处理可能不了了之，请金华同志提出情节严重、数量

巨大、证据确实的5至10家违法证券公司，建议由中纪委、监察部牵头，审计署、证监会、人民银行、外汇管理局参加，进行重点查处，依法严惩。其他非重点违法户可由主管部门分别处理。从审计材料看来，触目惊心，长此下去，后果不堪设想。在证券法尚未出台的情况下，请法制办、证监会会同有关部门，迅速制定规范证券公司的规定和打击犯罪的单项法规，由国务院颁布实施。

朱镕基

11.8

---

① 忠禹，即王忠禹。正庆，即周正庆，当时任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主席。海旺，即阎海旺，当时任中共中央金融工作委员会副书记、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景宇，即杨景宇，当时任国务院法制办公室主任。金华，即李金华，当时任审计署审计长。锦涛，即胡锦涛。健行，即尉健行。

教育和科技的发展也是硬道理

(1998年8月28日)

这是朱镕基同志在北戴河与全国优秀教师和科技工作者座谈时的讲话。

首先，我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对你们在各自工作领域作出的突出成绩，表示祝贺和衷心的感谢。

今年暑期，中央邀请全国科教战线上的部分优秀工作者来北戴河休假，就是为了让同志们从繁重的工作岗位上脱离出来，好好休息一下，有一段消除疲劳、思考问题、总结经验的时间。同时也希望利用这个机会，听取大家的意见，共商科教兴国大计。刚才，同志们提出了一些很好的意见和建议，值得我们认真研究吸取。

今年3月，我在新一届政府成立之时曾经说过，本届政府最大的任务就是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为此，国务院专门成立了国家科技教育领导小组。我任组长，李岚清同志任副组长。科教兴国战略最早是江泽民同志在1995年召开的全国科学技术大会上提出的，之后在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上得以正式确立，党的十五大重申了科教兴国战略和教育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邓小平同志全面、系统地论述过科技和教育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伟大作用。邓小平同志曾作出了一个伟大论断："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①也就是说，科技进步是经济发展的决定性因素，而发展教育是科技进步的基础。只有大力发展教育和科技事业，把经济发展切实转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才能加快现代化建设进程，提高国家的综合竞争能力，保证经济的健康运行，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面推向21世纪，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

① 见邓小平《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74页)。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现代化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我国已经进入了一个改革和发展的新阶段，面临着能否顺利迈向21世纪的关键时期。这样一个时期总的特点是机遇与挑战并存，我们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面临前所未有的机会，也碰到了未曾遇过的热点和难点。近期，党中央、国务院&经济工作中，在扩大国内需求、开拓国内外市场和保持人民币汇率稳定等方面采取了一系列重大决策，从而有力地促进了国民经济的稳定增长，保证了改革的顺利进行和社会的安定。这种良好的发展势头，与周边一些国家金融危机加剧、经济衰退等相比，形成了十分鲜明的对照。现在看来，我们有信心实现年初确定的各项经济发展目标。



1998年6月1日，朱镕基在北京京西宾馆出席中国科学院第九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四次院士大会并讲话。前排左为中国科学院院长路甬祥，右为中国工程院院长朱光亚。

但是，我们依然面临着许多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一是农业问题。现在，我国每年要增加1200多万人口，工业化和城市发展要不断地占用耕地，加上今年天公也不作美，所以，我们对农业问题绝不能掉以

轻心。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国家来说，只要农业和粮食不出问题，其他各项事业就有了坚实的基础和保障。二是产业结构不合理。多年来的重复建设导致了产业结构层次低，技术水平比较落后，规模经济效益较差。三是出口贸易问题。与去年同期相比，今年第一季度我国外贸出口增长率还不到5%，第二季度的情况也没有明显改善。这对于国际依存度日益提高的我国来说，无疑是非常严峻的问题。这种状况固然与亚洲金融危机以及日元大幅度贬值有关，但从根本上说，还是由于我国出口产品品种单一，质量不高，附加值低，缺乏足够的国际竞争能力。四是就业问题。目前的就业形势的确不能令人乐观，1997年，城市下岗人员已多达1000多万。有人说这是由于调整产业结构所引起的，这只是说对了一半。第三产业长期得不到相应的发展，增加的劳动力都积压在第二产业上，效益不增，反而减少，这不能说是充分就业。因此，这些问题的出现是多年以来矛盾积累的必然结果。

要解决这些问题，需要中央的决心，需要全国人民的齐心协力。但从根本上看，所有这些问题的解决都有赖于科技的进步和教育的发展。去年发生的亚洲金融危机给许多亚洲国家带来了损失，我们可以从中总结出许多经验教训。但最根本的经验之一，就是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中，必须牢固地坚持以科技进步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特别是坚持以创新为特征的高科技产业带动国民经济的发展，以教育发展来提高民族素质和社会文明水平。偏离了这一出发点，经济和社会发展就要受到干扰和挫折。这进一步启示我们：保持国家经济的健康成长和社会的全面进步，除了政治稳定以外，必须进一步加快科技和教育事业的发展，以提高国民素质和社会文明水平，培养大批合格的劳动者和专业人才，尤其是创新人才，以带动企业的技术升级和产业结构调整。

邓小平同志说过："发展才是硬道理。"①经济发展是硬道理，教育和科技的发展也是硬道理。从现在起，还有不到两年时间，人类将迈入21世纪。人类正在进入一个知识经济时代，即以智力资源的占有、配置、生产、分配、使用为最重要因素的经济时代。科学技术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空前广泛、深刻。世界范围内日趋激烈的经济竞争和综合国力的较量，归根到底是科技和人才的竞争。如果我们现在不大力发展科技和教育事业，很可能在以后造成难以弥补的损失，在日后

很难避免类似于亚洲金融危机风波的冲击。这对于我国这样一个大国是至关重要的。

---

① 见邓小平《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7页)。

近期，国家科教领导小组要研究科技和教育事业能否在原有的基础上发展得更快一些、更好一些，通过几年的努力，使我们的科技和教育事业上一个新的台阶。第一，发展科教事业需要加大资金投入、加大工作力度。过去，各级政府对科教事业的投入不足，与科教事业发展的实际需求有较大差距，影响了科教事业的发展。中央已经就实施科教兴国战略、抓好今后三至五年的科教工作做了专门研究，准备在知识创新、教育发展及其经费投入等方面采取一些新的措施。中央决定，本级财政支出中每年增加一个百分点作为发展科教事业的专门经费，到2000年提高三个百分点，增加额达到100亿元。

第二，实施科教兴国战略，要注意发挥高校和科研机构的生力军作用，进一步推动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要充分重视科技进步在改造与提升传统产业、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和提高产品竞争力等方面的作用。我国的经济改革和发展如果不建立在科技进步的基础之上，是绝对没有出路的。因此，科技和教育要始终坚持为解决经济工作中的重大问题作贡献，当前尤其是要在改造传统产业、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促进国民经济信息化等方面发挥重要的支撑作用。高校和科研机构要全力支持国家知识创新工程的实施，充分发挥智力资源的优势，为改造传统产业、促进技术升级和振兴区域经济服务。高校和科研机构要面向企业，与企业合建实验室和研究开发中心，加强与国内外各方面科研机构的协作，全两推进产学研一体化。要利用高等学校、科研机构和现有科技园区的优势，健全科技开发“孵化器”，组建一批专门为科技成果转化服务的中介公司，并加速高校科技成果的信息管理、咨询服务、市场预测和产品转化工作。高校和科研机构要为带动形成新的经济生长点作贡献，今后三至五年内，要采取多种方式，组建高科技产业集团。要对小型高科技企业的发展，科研人员、高校教师与毕业生的自主创业予以大力激励。



1998年11月11日，朱镕基考察载人航天工程。右一为国家计委主任曾培炎。

第三，要建设一支高素质的科教工作者队伍，要培养一大批科学研究、教育教学、科技产业化的创新人才，要为各种创新人才作用的发挥创造良好的环境和条件。从现在来看，具有高素质的优秀带头人、优秀的全新拔尖人才，是事业兴旺发达的保证。为了建设一支高素质的科教工作者队伍，需要在全社会进一步弘扬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良好社会风尚；同时，国家要采取切实措施，改善科教工作者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待遇，充分调动广大科教工作者的工作积极性和创造性。科技事业的发展不仅仅取决于好的基础条件，还要有投入的保障和良好的环境，使科技人员能够安心从事研究开发、从事创造发明。要大力完善知识产权、科技人员技术入股等法律、法规建设，保障科技人员的合法权益，以有利于广大科技人员积极性的充分发挥。

第四，要进一步加快教育和科技体制改革，提高科教队伍的素质和效率。我们已下大决心进行政府机构改革，中央国家机关已裁员一半，地方也要做相应的改革。同时，各级政府要减少重复建设，厉行节约，停建楼堂馆所，将节省下来的钱用于发展科教事业。教育和科技事业要加大改革力度，争取在改革中出成绩、出效率。

国家从总体上要下大力量提高科教工作者的待遇，但在科教系统内部不能搞平均主义、吃“大锅饭”。要提高经济待遇，健全淘汰机制，使优秀人才能够在科教岗位上尽快脱颖而出。90年代以来，随着科教事业的不断发展，科教工作者队伍的素质和效率不断提高；另一方面，科教队伍的整体素质还不能完全满足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不适应跨世纪的需要。我们要采取措施进一步优化队伍结构，进一步提高用人效益。要大力加强科研院所和教育系统尤其是高等学校之间的合作，要加强人员交流，相互开放，发挥各自的优势，共同攻关、形成合力，提高效益和水平。中央对我们的科学家和广大科教工作者寄予很大的期望，相信大家能够担负起这一历史赋予的重大责任。

同志们，科教兴国思想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党的十五大所确立的发展科教事业的基本方针。中央贯彻实施科教兴国的战略方针坚定不移，一定要抓出实效。虽然前进道路上艰难困苦还很多，但我坚信，只要广大科教工作者求真务实，真抓实干，我们就能克服前进路上的一切困难，科教兴国的宏图伟业就一定能够实现。

发扬抗洪精神，抓好灾后重建

(1998年8月31日～9月10日)

1998年8月28日至9月1日、9月7日至12日，朱镕基同志先后在内蒙古自治区、黑龙江省、吉林省以及湖北省、江西省、湖南省、重庆市、四川省考察抗洪救灾和灾后重建工作。这是朱镕基同志分别在黑龙江、湖北、江西、湖南等省考察时讲话的主要部分。

一

(在黑龙江省，1998年8月31日)

刚才，黑龙江省委、省政府做了汇报，国务院各部门来的负责同志也发了言。我原则上同意大家的意见，再强调两点。

一、在罕见的洪水灾害面前，我们已经取得了决定性胜利，特别是进一步增强了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的凝聚力。

今年，我们国家遭受了特大洪灾。长江流域的水灾是历史上最大的，超过了1931年，也超过了1954年的特大洪水。东北嫩江、松花江流域发生了超过300年一遇的洪水。这次水灾看起来是件坏事，但大大地增强了我们全民族的凝聚力。如果没有全国人民这样的团结，特别是没有中国人民解放军这支决定性的力量，水灾造成的后果不堪设想。

今年嫩江、松花江的洪水从历史上看更大，300年一遇，甚至500年一遇。由于军民团结奋战，特别是解放军的努力，使我们免于遭受更大的灾害和损失，渡过了这个难关。在这中间，确实出现了许多英雄事迹。因为和平年代没有战争，我们好久没有看到这种精神和动人事迹了。解放军将士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保护人民群众，把一次次生存的机会让给老百姓，太令人感动了。每天晚上看到电视中的这些报道，我的眼泪就要掉下来。我觉得这次对部队是一次实战演习，是一次重大考验，我们的人民解放军确实是一支可以信赖的军队，是一支能战胜任何敌人的军队。这次抗洪也证明了我们中华民族是一个伟大

的民族，有强大的凝聚力，军民团结、干群团结、党群团结都得到了大大增强。过去老百姓批评干部腐败、官僚主义，这次大家普遍承认我们的干部基本上走在前面，临阵脱逃的极少。关键时刻，中国共产党是经得起考验的，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党。所以，这场洪灾中全国虽然损失了1600多亿元，是一件很坏的事情，但是换来了教训，换来了全民族的巨大凝聚力，坏事还是可以变好事的。战胜洪水，对我们精神力量的加强是不可估量的。

从全国来看，抗洪抢险基本上取得了决战决胜。尽管在荆江洪湖一线还不能大意，不能松懈，但就全国来说，最危险的时期已经过去了。我们要认真总结经验教训，对在抗洪抢险中表现突出的同志给予表彰奖励，特别是对解放军指战员更应大力表彰。

二、转移工作重点，及早抓好灾后重建工作，夺取抗洪救灾的全面胜利。

在取得抗洪抢险决定性胜利的时候，要适时把工作重点逐步转向灾后重建。灾后重建包括恢复生产、安排过冬、重建家园等项工作。恢复生产包括各种水毁工程的恢复建设等。重点是解决灾民过冬的问题，尤其要防止大灾之后有大疫。刚才张文康①同志讲，长江发生洪灾，1931年淹死14.5万人，病死300多万人；1954年大水中死亡3.3万人，多数是病死的；这次这么大水灾，死了1300多人。就拿黑龙江来讲，这么大的洪灾，基本上没死人，真是难得。现在，要把防病过冬作为重点。在组织恢复生产、安排生活、重建家园的过程中，我们一定要吸取过去的教训，不是忆一切简单还原，而是更加合理地重建。较早的时候国务院就提出了一个思路，我在这里重申一下，提请大家注意。

---

① 张文康，当时任卫生部部长。

第一是“封山植树，退耕还林”。今天，我和老劳模马永顺①同志交谈时讲了这个问题。这些年，我们砍树确实砍得太多了，造成大量水土流失。毛主席、周总理都十分重视对水资源和生态环境的保护，作出过许多指示。但是，我们在执行中产生了许多问题，使森林多次遭到浩劫。最近几年，我们也都强调保护森林、保护生态资源，但实际

上砍树还是很厉害。今年的水灾肯定是与气候异常有关，但也与生态环境恶化有关。哈尔滨的松花江河床比1932年淤高了4米，河床淤积主要就是上游树砍得太多导致水土流失形成的。森林本身就是一个蓄水库。现在是大片秃山，一下雨，水都下来了。所以，江主席引了恩格斯《自然辩证法》这篇文章的两句话："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②，很值得我们深思。开荒把森林伐光了，把地种上了，粮食丰收了，但是，将来这个地方一发洪水就全冲掉了，甚至变成不毛之地。这是大自然对人类的惩罚。因此，去年我们就下了决心，今年更下定了这样一个决心，无论如何不砍树了！木材不够就靠进口，拿外汇买。今年，我们在财政十分紧张的情况下，拿出60亿元搞天然林资源保护工程，不准再砍树。首先是在长江、黄河的上游，就是四川、云南等一些地方，坚决不砍树，绝对不砍了。把砍树的人都变成种树的人，也要求他们搞点其他生产自救。由于我们的主要木材产区在东北地区，在黑龙江省，砍树完全停下来有一定困难，要逐步地停。但黑龙江省提出的减少砍树目标恐怕少了一点，要实事求是。当然，要考虑林业工人的生活出路问题，要补一点钱，但要组织他们搞生产自救，要分流搞多种经营，少砍树，双方都要兼顾，决心要更大一点。

---

① 马永顺，黑龙江省铁力林业局工人，先后11次被评为黑龙江省、东北森林工业总局模范。20世纪50年代后，他坚持义务植树40年，栽树5万多棵，从昔日的伐木劳模变成了植树英雄。

② 见恩格斯《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83页)。



1998年8月31日，朱镕基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松花江边与全国劳动模范马永顺(左一)交谈。右二为民政部副部长范宝俊。

第二是“平垸行洪，退田还湖”。就是要清除堤内障碍。堤内就是指河道，大家的概念要搞清。有的人在堤内再修堤，盖房子、种地，导致堤内洪水下泄不畅。今后水淹掉的垸子①就不要再恢复了，垸子靠老天爷平掉了，就让它行洪。这次没有淹掉的垸子要平掉，不要再种了。要退田还湖，洞庭湖、鄱阳湖的面积现在只剩一半了，中间都是洲滩民垸，与湖争地，这不得了。应该还原回去，让这些地方重新蓄水。我不是不重视控制性水库，在支流、干流上建水库，洪水来时能把洪水蓄起来，但这是长期性的规划，修水库需要很多钱，得逐步来。还是要全面抓：首先是抓水土保持，别再破坏上游植被，中游抓修水库，下游抓修堤。这应该是我们整个水利建设的基本方针。

① 垸子，指湖南、湖北、江西等地，在沿江、沿湖地带围绕房屋和田地等修建的像提坝那样的防水建筑物。

第三是“以工代赈，移民建镇”。要把居民从堤内迁到堤外来，政府要划一块地方给他们，做好新的小城镇的规划设计。让他们住到新的地方，他们才不会去恢复过去的垸子。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就是以工代赈。国家拿钱来建设小城镇，让他们来干活，付给报酬，特别是建房子，材料费要全部补助他们，不然他们不干，还要回到原来的垸子里去种地。

第四是“加固干堤，疏浚河道”。长江、黄河的干流都要按起码能抵御百年一遇洪水的标准，把堤修起来。现在长江、黄河都变成“天上河”了，河床比下面的城市、农村都高，如果发生溃决，一淹一大片。无论如何要加固堤防，吸取九江决口的教训。那里修堤时未经勘探，把堤建在沙子上面，下面一淘空就垮了。施工时混凝土里没有钢筋，堤坝质量不好，乱七八糟，洪水一冲就撕开了，沉了八条船，把几千吨面粉和黄豆填进去了，口子没堵住，水还在下面冲。最后，解放军第27集团军的工程兵用钢桩搭脚手架，然后投料石，才填住了。今后要吸取教训，修堤坝工程一定要立个法，谁在里面偷工减料，就依法严厉惩处，否则，这样害人不得了。我讲的这个思路，对我们的灾后重建工作是有指导意义的，都是我们用血买来的教训，一定要认真吸取。



1998年8月29日，朱镕基在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科右中旗察看灾情，慰问受灾群众。

关于恢复生产、重建家园的实施，要突出四句话：加强领导，突出重点，统筹规划，分步实施。一是加强领导。我们领导工作的重点，应该有所转变，适时、逐步地由抗洪抢险转向灾后恢复与重建。各级党委、政府要像抓抗洪抢险那样把这项工作抓起来，建立责任制，确保全面落实。二是突出重点。水毁家园不是两三年就能恢复起来的，有的要四五年。今年黑龙江省的重点就是抓过冬，既不花冤枉钱，又要保证群众能平安过冬。这次我们从齐齐哈尔到哈尔滨，实地看了以后，觉得省委、省政府，市委、市政府都做了大量工作，比我们想象的好得多。在国务院还没有作出具体部署以前，许多问题你们都已经考虑了，也着手做了，有些做得很好。三是统筹规划。我一再强调要搞好规划，不要花几道钱，能够一次花钱解决的就花一次钱，不要分几次去花钱。我们灾后不是简单地去恢复，不是简单地去重建，应该

比过去规划得更加合理、更加科学。我这次特别关心学校重建的问题，别的都可以先不建，必须先把学校建起来。科教兴国，教育非常重要。四是分步实施。灾后重建，百废待兴，工作千头万绪，在突出重点的基础上，要有中长期规划，有步骤地实施，逐年达标。

二

(在湖北省，1998年9月8日)

对于灾后恢复生产、重建家园的工作，我认为当前要做两件事。一是关于长远的问题，要继续进行可行性研究与论证以及方案的比较，湖北省应该在水利部等有关部门牵头下，很好地研究、规划，确定哪些应该搞、哪些不一定搞，要以科学的办法来议定。规划要做细，论证要缜密，要广泛地听取意见，从长计议。在规划过程中，要解放思想，汲取新鲜经验和国外的先进技术，然后慎重决策。二是当前迫在眉睫的事情，就是要突出解决灾民安全过冬问题，现在就要定下来，马上动手，不能延误时机。

这两方面都存在一个问题，就是钱怎么解决？这就属于论证的一个重要方面。你们开了一个463亿元的单子，这463亿元如果能解决湖北的水灾问题，我说是值得的。你们提出的规划，我粗粗地算了一下，463亿元分四年完成，平均一年是100多亿元。今年湖北遭遇了这么大的洪灾，如果不支持基础设施建设，经济上不去，农民的收入增加不了，社会就不稳定。今年，中央先给30亿元。抓紧长江干堤的设计、规划、钻探。地质不钻探，九江决堤就是教训。汉江、长江干堤都要修，但不可能一口气吃成个胖子，还是先修长江干堤，因为灾民都在这一线，可以利用灾民做劳动力。对已经有规划、做过可行性研究的项目要先干，包括水毁工程的修复。

当前，迫切要解决的是灾民安全过冬问题。第一，倒塌房子的重建。原则上，异地重建、移民建镇的，要全部补贴材料费；在原地重建的，补助要少，顶多补三分之一，而且标准不能高；不按规划建房的，一分钱不补，由农业银行开展农村住房信贷，借钱盖房子，分期付款，当然，要履行一定的担保手续，国家财政要补贴一点。总的来讲，移民建镇在这两年就是通过兴修水利解决农民的收入问题。另外，还要开辟生路，发展第三产业，这个任务非常艰巨。建房补助需

要多少钱？国家计委提出给11个亿，俞正声①同志还希望多一点。我考虑，各个省之间要稍微平衡一下，不能根据生活水平来拨。生活水平高就自己多出钱嘛。对东北地区也要照顾。我这次到了3个省区，总共同意给10个亿。哈尔滨的灾情最重，在飞机上向下看淹了一大片，损失很大。给了黑龙江5个亿，其中，4亿元用于住房，0.85亿元用于教育，0.15亿元用于医院。给了吉林3个亿，其中，2.7亿元用于住房，0.3亿元用于学校、医院。内蒙古的灾情稍微轻一点，给了两个亿。3个省区总共花了10个亿，把灾民的住房问题解决了，就好行动了。湖北灾情最重，特别是肩负着移民建镇、平垸行洪的任务，因此，我考虑给12亿元。我们还要到湖南、江西去，给它们的肯定比这少得多。我宁可在水毁工程项目上多给一点钱，以工代赈，让农民自己借钱来盖房子，然后再还给银行，也不要一次补助太多，还是要鼓励农民自力更生。第二，修复水毁设施，你们要12个亿。需要国家补助多少钱，报国家计委，与其他水利工程统筹考虑，简化手续，尽快批下去。第三，教育设施和医院的恢复，要统筹考虑，给教育系统1亿元、卫生系统2000万元，把这1.2亿元加进去。以上这些国家补助的钱，随时拨给你们。第四，灾民的救济费问题，最好考虑通过以工代赈来解决。第五，灾民的过冬衣被问题，完全可以通过捐赠解决。最后一项，就是抢险救灾已经花的钱。你们花了11.9亿元，要中央补贴8亿元。吉林说防汛抢险花了12个亿，黑龙江花了9个亿。这个钱要由水利部、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统筹平衡，把各省的情况汇总起来：欠账多少，地方负担多少，还要中央拨多少。最后强调一句，所有的资金要专款专用，绝不允许挪用，否则按纪律处分。

---

① 俞正声，当时任建设部部长。

三

(在江西省，1998年9月9日)

安置受灾群众的工作，江西的情况与其他地方不一样。东北地区地广人少，淹掉的都是低洼地带，也不想再恢复，普遍移民建镇，问题比较好解决。湖北是沿江行洪，垸子基本上淹掉了。现在把居民从垸子里搬出来移民建镇，距离比较近，它的规划做得比较细，这种问题

比较好解决。江西与湖南是一个类型，比较麻烦。过去已经围湖造地，也有人肯定了这种做法，这是历史上形成的。那时，粮食问题解决不了，不围湖造地，没粮食吃。现在怎么办？如果历史地看这个问题，当时围湖造地还是有功劳的。但这违反了自然规律，如今自然界开始惩罚了，对我们进行报复。所以，应根据新的情况，退田还湖。我们现在粮食充足，加上科技在农业上的推广，不需要再在湖内围湖种地了。这几年，每年因水灾造成的损失有1000亿元，今年统计损失为1600亿元，湖北说损失了500亿元。因此，必须考虑退田还湖的问题，这对江西来讲是个大问题。要安排那么多人的生路，这个事情得根据当地的具体情况，从长计议，分期执行，目标是退田还湖。



1998年8月9日，朱镕基在江西省九江市防洪墙决口现场指挥。

这次严重的水灾，比1954年的水灾持续时间长。1954年的水灾持续时间短，主要是因为那时淹了100多个城市，分了洪，鄱阳湖、洞庭湖也能蓄一部分长江的水。现在，鄱阳湖、洞庭湖自顾不暇，根本不能给长江分洪，造成高水位持续时间长，耗费了大量的人力。鄱阳湖、洞庭湖的治理是迫在眉睫的问题，要下最大的决心。今年跨多大的步子？你们提了从湖区搬迁十万人的规划，跨这么一步，我赞成，还应继续把规划做详细。我有个想法，你们提的规划只是解决当前恢复的问题，没有解决长远的退田还湖问题，长远和当前的结合还要做进一步的考虑。我觉得，你们的办法就是恢复原状，照样种地，其中有的垸子在行洪、蓄洪时，动用一下。你们规划今年移民十万人，要是再多，搞几十万人，移民建镇恐怕也很困难。对真正移民建镇的，要给予比较大的政策优惠。比如，建筑材料费，由中央财政补贴；基础设施建设，中央给予大力支持；农村电网改造，可以把新建的镇考虑进去。这些都是中央财政花钱。当然，其中的一些道路、用水设施、公用设施的修建要由地方考虑，如有困难，中央给予适当的补贴。至于农民丧失土地后的生路问题，要考虑得比较周全。我看，解决这个问题，不会有很大的难度。国家在最近几年内大修基础设施工程，农民是有出路的。农民还可以种点菜，搞水面养殖等等，总是有生路的。要明确，国家没有义务把洪水冲掉的东西都补偿还原。国家的钱也是纳税人的钱，我们每个纳税人都应该享受在困难的情况下国家给予的补助，但不能全部都补助，不能吃“大锅饭”。对在原地恢复房子的，基本上采取借钱还钱的政策，统一供应原材料，国家垫钱，但最后要用以工代赈的劳务收入来偿还盖房的钱。当然，对少数有特殊困难的人，可以适当补助一下。

还有，仍保留的垸子的汛期安全问题怎么考虑？搞高台建村、吹沙①都不现实，实际上也不可能。花那么多钱，没有用，大水来了还得冲掉。可以考虑，准备蓄洪的地方，到时人都得撤出来。这就要考虑撤退的问题，修好路，能够把人撤出来就行。比较难撤的地方就像湖南那样，修“安全楼”，这个钱花得少，修一个四到五层的简易楼，楼顶可以容纳几十人，只要楼本身能坚持十来个小时，外面就能把楼里的人救出去。国家补助在原地恢复住房的地方修几个这样的楼。

① 吹沙，是填湖造地的一种手段。其过程是：首先用沙袋将一定面积的湖面圈起来，然后再用泵将圈外湖底的沙连带湖水一起“吹”进圈内，湖水流出圈外，沙被沙袋滤下来留在圈内。渐渐地，圈内的湖面就被不断“吹”进的沙“填”成了陆地。

我想，要在这里创造一个模式，这个模式就是真正实行了移民建镇，一劳永逸，真正使鄱阳湖变成“浪打浪”的鄱阳湖、没有阻洪的洲滩民垸，这是长远的方向。当然，这个步子不要勉强跨得太大。一是财力不足；另外，老百姓还得看一段时间才能下决心搬迁。要树立一个移民建镇的样板，农民搬进去后开辟了生路，生活水平提高了，防洪期也安全了。再把其他几十万人移出来，工作就比较容易做。

四

(在湖南省，1998年9月10日)

这次抗洪抢险斗争在全国已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湖南省军民在省委、省政府的领导下，作出了很大的牺牲，付出了很大的代价。特别是人民解放军、武警部队，在抗洪抢险斗争中起了关键的、决定性的、不可替代的作用。遭了这样大的灾，能够把灾害造成的损失减到了最小程度，确实是不小的胜利。值得湖南人民骄傲的是，在这次全国抗洪抢险斗争中牺牲了25位解放军干部、战士，在这些烈士中湖南籍的有7位。特别是，湖南有许多像岳阳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罗典苏那样不怕牺牲、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好干部。在湖南抗洪抢险斗争最紧张的时候，我虽然没有抽出时间来这里和你们一起战斗，但是，我始终是关注湖南的汛情和灾情的，我也相信湖南人民能够战胜这次洪灾。这次我们到湖南来，就是为了贯彻落实江泽民主席关于恢复生产、重建家园、发展经济的一系列重要指示。在这方面，湖南省委、省政府也做了大量的工作，提前做了准备，做了规划。

这次灾后重建必须考虑到水患的根本治理。我们眼前最迫切的任务是安置灾民安全过冬、恢复生产、重建家园，但这项工作要与长远的根治水患的目标、规划相结合，不要花冤枉钱，要采取一劳永逸的措施。长远的目标就是要恢复洞庭湖原来的面貌，根本性的措施就是要大大地改善湘、资、沅、澧四水流域的生态环境，加强水土保持工作，使湖南真正变成山清水秀，洞庭湖浩浩汤汤。这不仅是为湖南作

贡献，而且是为整个长江流域作贡献。洞庭湖是整个长江流域最大的调蓄湖泊。因此，根本性的治理措施从现在就要开始。比方说封山育林、植树造林的工作，希望能够在三至五年里把这个任务完成了，不能再砍伐了。这牵涉到农村的能源问题，要很好规划。我认为，这个问题可以解决，能源可以替代。25度以上的坡地一定要退耕还林、还草，25度以下但水土流失严重的坡地也要考虑退耕还林、还草。不在乎开这几亩地，大自然对我们的报复、对我们的惩罚，比起得到的那一点粮食要严重得多，中国不缺这一点粮食。有些水土流失不是很严重的地方，可以实行“坡改梯”，还可以耕种。在育林的时候，要考虑针叶林、阔叶林相结合。我听专家讲，光种针叶林不行，不能达到水土保持的目的；要实行针叶林、阔叶林相结合，而且下面还要有草地覆盖，这才能真正起到水土保持的作用。所以，对这件事要很好规划，真正把湖南变成山清水秀的锦绣河山。中央下最大的决心，从资金方面支持地方完成这项工作。无非就是对伐木工实行转业，重新安置，何况有的伐木工还可以转为护林工和造林工。

这次大水冲毁了很多工程和一些洲滩民垸。我们在重建的时候，就要考虑恢复洞庭湖的本来面貌，使长江的洪道能够畅通，没有阻洪的设施，这是个长远的目标。今天听杨正午①同志汇报，说想把洞庭湖恢复到1949年以前的样子，我是非常高兴的。这是个千秋伟业，要完成很不容易，但无论如何要朝着这个目标去做，不能动摇。这次没有冲垮的垸子，要让老百姓迁出来是很难的；但对已经冲垮的垸子，恢复起来也是很难的，就要动员老百姓搬出来，换一个地方再建房，国家给予必要的支持。我看，这项工作是可以做的，意义也是非常大的。不可坐失这百年一遇的良机。这次把垸子冲垮了，就不要再恢复了。因此，我提出恢复生产、重建家园的32个字“封山植树，退耕还林；平垸行洪，退田还湖；以工代赈，移民建镇；加固干堤，疏浚河道”，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国务院专门讨论过，就是借这个机会把有的垸子撤出来还湖。可以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垸内不种地了，完全用于行洪；另一种情况是垸内不住人了，低水位时种地，高水位时不种。说是不住人，但在农忙的时候搭个窝棚总是可以的吧。垸内没有什么设施，只种一季庄稼，淹就淹了，不会造成很大损失。就是这两种情况。这两种情况都是要走人的，离土又离乡，但移民的安置地点可以规划在大洞庭湖的周围，安排在堤外。

① 杨正午，当时任湖南省省长。

中央的政策是，凡让出湖泊洪道、江河河道移民建镇的，每户补助建房款1.5万元，相当于盖100平方米左右房屋的材料费用。全部由中央财政补贴，材料都给了，只要动手就可以把房子盖起来。你们从洞庭湖搬出多少户，中央财政就按标准补多少钱。这项工作靠行政命令是不行的，不要勉强，群众工作要靠榜样和示范的作用。现在还没有示范的作用，要农民离开他们的土地来移民建镇是不大容易的。先从今年垸子被淹掉的这部分人做起，逐步地扩大。至于那些虽然冲掉了垸子但动员工作很难做的人，也不要强迫，他们要回去，就让他们回去恢复家园。像这种情况，政府只能是给予一点救济，每户补1000元。对这些人从政策上面不能给予很多优惠的支持，如果还给很多优惠的话，就没有人愿意搬出来了，那就永远也还不了湖。但是，这些人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纳税人，他们的房子被冲垮了，东西被冲走了，我们有义务帮助他们一下，让他们安全过冬。其他的就要靠以工代赈，政府组织兴修水利，灾民靠以工代赈来盖他的房子，农业银行可以提供一点信贷资金。

保护森林资源是千秋万代的伟业

(1998年9月12日)

这是朱镕基同志在四川省考察抗洪救灾和灾后重建工作期间，听取省委、省政府工作汇报后讲话的主要部分。

前一段时间，国务院提出了32个字的灾后重建政策性措施，前两句是“封山植树，退耕还林”。这件事情非常重要，这是我们这一代人对历史的义务。我们这一代人和以前几代人都对大自然造成了破坏，我们现在应该开始来补偿，开始来恢复了。如果不这样做的话，大自然的惩罚就在眼前，不必等到下一代人。我看在座的人多数都可以看到三峡工程蓄水，三峡工程建成要16年啊。但是我们如果现在不注意的话，听任上游的泥沙冲积，库区的山体滑坡，10年、20年后，三峡水库就可能变成个沙库啊！所以，保护森林资源现在非做不可，这是千秋万代的伟业。

这次我们到江西、湖南、湖北等地考察，是有收获的。江西省承诺把鄱阳湖现在3900平方公里的湖区，扩大1000多平方公里，达到近5000平方公里，把湖区的人都迁出来，把耕地放弃。洞庭湖区现在只有2700平方公里，和新中国刚成立时的4300平方公里相比，减少了1600平方公里。历史上洞庭湖是6000平方公里，“八百里洞庭”嘛。湖南省现在承诺恢复到5100平方公里，但是要在湖区修安全平台。我说这个是不行的，安全平台并不安全，湖区的人统统都要搬出来才行。我想，在本届政府任期内，我们能够做三件事情：把鄱阳湖恢复到5000平方公里；把洞庭湖恢复到5100平方公里；把四川的天然林都封闭起来，不砍树了。这样，我们才对得起子孙后代。不然，三峡水库就有隐忧。我们要高度认识这些工作的重要性，这是历史任务，也是历史的义务。我希望大家发扬坚韧不拔、锲而不舍、愚公移山的精神，把它们进行到底，有什么困难克服什么困难。今天我事先打了招呼，把阿坝、凉山、甘孜三个自治州的州委书记和州长都请来了。请来干什么呢？就是请你们把这个千秋伟业承担起来。

第一个层次是封山。就是要封山育林、封山植树，国有林区不再砍树了。要把这些森工企业的员工养起来，一部分人护林、种树，其余大部分人转业。转业也是去种树。当然，也可以转业干别的，但最重要的是让他们继续造林。这部分森工企业在银行的欠债，暂时不要冲销，可以考虑部分地停息，因为对这些企业员工的转业、组建还有一个过程。

停伐后对地方财政有影响，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首先要精兵简政，财政不能这样继续下去了。我曾长时间考虑过这个问题。现在农民的负担这样重，农村的一切矛盾都发生于此，总是解决不了。如何解决农民的负担问题？比如说“乡统筹、村提留”，让我们的政府人员从老百姓手里直接去收钱，这是一个很不好的制度，世界上其他国家没有这样的制度。但这是历史造成的，要按历史的观点来看这个问题。现在“乡统筹、村提留”从粮食收购的钱里去扣，那农民宁愿把粮食卖给私商，也不愿意卖给粮食收购站让你扣这个钱。所以，这个弊病很大。我考虑了好几年，能不能把乡村这一级政府都变成吃“皇粮”的，别到农民那里去直接收钱了？乡村政府不能搞任何企业，不允许有任何收费，一切由县财政来统筹安排。把费变成税，实行“收支两条线”。我以前不敢讲这个意见，前几天我到了湖南，问湖南省的领导同志这个想法是否可行，王茂林①和杨正午②都说是行得通的。如果下定决心搞这件事，对农民肯定是好事。但是他们提出一条，要把教育费纳入财政预算，这样就一点问题都没有。这个话现在就讲到此为止，只委托谢世杰③同志、宋宝瑞④同志你们来考虑这个问题，其目的就是减轻农民负担，精简乡村政府机构，“收支两条线”，搞一个正规的制度。

---

① 王茂林，当时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

② 杨正午，当时任湖南省省长。

③ 谢世杰，当时任中共四川省委书记。

④ 宋宝瑞，当时任四川省省长。



1998年12月28日，朱镕基在三峡考察期间植树。前排右二为朱镕基夫人劳安。

第二个层次是退耕还林。退耕还林就是25度以上的坡地要退 耕，25度以下的“坡改梯”，包括所有的林地。我认为这要采取一个承包的办法。一户补多少钱，或者说一亩补多少钱。甚至可以由森工队伍来承包一些比较大的工程，一亩补多少钱，可以定个标准。先给50%，到时我们来验收，验收完了再给50%。我是下定决心给这个钱，只要这个标准定得合理，你们改造好多少就给多少钱，没有限制。

第三个层次是水利工程的修复、建设。你们提出的项目要按程序报批，国家在这方面要花很大的投资。我认为这个投资是值得的，不光是造福子孙后代，而且是推动国民经济发展的强大动力。现在治水方针是蓄泄兼施，以泄为主，把沿江的堤防修好。过去忽视了这方面的工作，修水库的积极性比较大，修堤防的积极性不大。现在首先得修堤防，保证不被淹，要做出计划，分清轻重缓急。采取以工代赈，因

为它对施工队伍的要求比较简单，不像修水库那样需要专业队伍，可以多用一点民工。那些受灾的人都可以通过参加这个工程拿到钱，回去吃饭、盖房子。所以，你们赶快报这些项目，国家计委抓紧批，争取今年冬天就上马、就见效。其次是修蓄水工程。我们赞成修，但是先修什么、后修什么要做好规划，要有计划、有秩序。现在考虑，发电很重要，但蓄水、防洪更重要。电你们现在不缺，特别是三峡工程发电以后，四川就根本不缺电了，所以还是先修能蓄洪的水库比较好。这得有个全面的规划，这方面中央是舍得花钱的。四川的生态环境保护十分重要，要下工夫、花钱来保护生态环境。

与此相联系的恐怕要引发一些问题，比如：农村的能源怎么办？不许砍木材，农民的薪炭林是不是要保持？用什么能源来代替它？是供应煤炭，还是给补助搞沼气？对沼气我不太放心，因为它不是一年四季都可以均衡产气，不能保持稳定的能源供应。建议你们由一位副省长或一位省委副书记专门调查研究一下这个问题：在四川，农村的能源问题怎么解决？特别是在封山停采以后怎么解决？要多做点调查研究，到不同的地方去调查研究，和各部门商量，得出一个系统性的意见。另一个是木材市场问题。关闭木材市场，木材就要涨价，听说重庆市已涨了30%。现在要赶快抛售木材，粮食涨价抛粮食、木材涨价抛木材。没有木材可以进口嘛，我就不相信价格能上来。木材涨价不单会提高建筑成本，还容易造成农民偷偷地砍伐。他现在砍一根木材，就值过去砍两根的钱，所以他会偷偷去砍。因此，木材价格一定不能让它涨。国家计委要牵头组织有关部门研究这个问题，要立即把木材抛出来，稳定木材价格，不要让森林资源保护工作没法做下去。

天然林资源保护工程里面很多钱都是要靠以工代赈来解决，靠补贴的办法是不能解决问题的。我们的思路应该是靠调整产业结构，靠职工分流，靠以工代赈，来增加农民的收入，把这些问题给解决好。

希望四川省在森林资源的保护工作方面继续走在全国的前列，创造一个先例，成为一面旗帜。

关于救灾和灾后重建问题的报告

(1998年9月13日)

这是朱镕基同志到湖北等五省市考察抗洪救灾和灾后重建工作后，写给江泽民同志的报告。

泽民同志：

我于9月7日至12日赴湖北、江西、湖南、重庆、四川五省、市，按照您9月4日在江西讲话的精神，同地方同志共同商量落实救灾和灾后重建工作，重点是群众安全过冬问题，同时研究灾后重建同整治江湖、加强水利建设结合起来的具体政策措施。

看来，这次特大洪灾是以最小的代价取得了最大的胜利，但实际损失也是很严重的，灾后重建任务相当艰巨，也十分迫切。各地正按照您在江西讲话的精神认真部署救灾和重建工作。受灾群众生活都已作了安排，口粮供应是有保证的。所缺衣被通过捐赠完全可以解决。至今都还没有发生大的疫情。水毁的学校、卫生院也在恢复之中。问题较大的是住房，这也是我们这次下去帮助的重点。

五省、市同志均认为，这次洪灾是坏事，但可以变成好事。痛定思痛，一定要抓住灾后重建的机遇，治山治水，重整山河，根治水患，做到大灾图大治，大治促大变。各地都提出了初步规划设想，包括：一、五省、市拟用五年时间封山育林1.83亿亩，退耕还林2383万亩，可使五省、市森林覆盖率平均比现在增加14个百分点。四川和重庆从9月1日起已停止天然林砍伐。二、按照百年一遇的标准，加固长江干堤2600多公里，同时疏浚河道，清理河障。三、酌情量力，逐步退田还湖，扩大湖面，增加蓄洪能力。江西提出将鄱阳湖由现在的3900平方公里，扩大到4917平方公里，即恢复到1954年情况。湖南提出将洞庭湖面由现在的2700平方公里扩大到5100平方公里，其中一部分是退人不退田，洪水退时还可种田。这些目标还需深入论证。

无论是眼前过冬，还是长远治理，主要靠各地自力更生，但是也需要中央给予补助。我们共同商量，权衡全国情况，采取了以下措施。

一、区别不同情况，补助建房资金。对那些不影响行洪、就地重建的倒房户(约100万户)，每户补助1000元，使之能先建一间厢房过冬，五省、市共需11亿元。对这次被冲掉的洲滩民垸，拟逐步平垸行洪，移民建镇，不搞原地重建。湘、鄂、赣三省共涉及21.5万户，80多万人，对此国家应采取鼓励政策，促其实现，拟由国家补贴全部建房材料费(按每户100平方米，约需补助1.5万元)，共需30多亿元，分年实行，分期拨款。二、恢复重建学校，五省、市共需补助3.65亿元；恢复重建卫生院共补助0.75亿元。三、封山育林、加固干堤、疏浚河湖所需资金，根据工程项目可行性研究情况，按基建程序报批，逐年安排。目前亟须加快审批一批水毁工程修复项目，以利各地及早上马，便于以工代赈，救济灾民生活。

这次下去前，国务院已派出四个工作组到这几个省调研，帮助地方搞灾后再建规划，已由国家计委汇总形成了《关于灾后重建、整治江湖、兴修水利的初步意见》。这次又与各地商量作了进一步修改，拟在近日国务院讨论后向政治局常委汇报。现先呈请审阅，请予指示。

朱镕基

9.13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

泽民同志：

我于9月7日至12日赴湖北、江西、湖南、重庆、四川五省市，按照您9月4日在江西讲话的精神，同地方同志共同商量落实救灾和灾后重建工作，重点是群众安全过冬问题，同时研究灾后重建同整治江湖、加强水利建设结合起来的具体政策措施。

看来，这次特大洪灾是以最小的代价取得了最大的胜利，但实际损失也是很严重的，灾后重建任务相当艰巨，也十分迫切。各地正按照您在江西讲话的精神认真部署救灾和重建工作。受灾群众生活都已作了安排，口粮供应是有保证的。所缺衣被通过捐赠完全可以解决。至今都还没有发生大的疫情。水毁的学校、卫生院也在恢复之中。问题较大的是住房，这也是我们这次下去帮助的重点。

家宝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

五省市的同志认为，这次洪灾是坏事，但可以变成好事。痛定思痛，一定要抓住灾后重建的机遇，治山治水，重整山河，根治水患，做到大灾后大治、大治促大变。各地都提出了初步规划设想，包括：一、五省、市拟用五年时间封山育林1.83亿亩，退耕还林2,383万亩，可使五省、市森林覆盖率平均比现在增加14个百分点。四川和重庆从9月1日起已停止天然林砍伐。二、按照百年一遇的标准，加固长江干堤2600多公里，同时疏浚河道，清理河障。三、酌情量力，逐步退田还湖，扩大湖面，增加蓄洪能力。江西提出将鄱阳湖由现在的3900（平方）公里，扩大到4,917平方公里，即恢复到1954年情况。湖南提出将洞庭湖面由现在的2,700平方公里扩大到5,100平方公里，其中一部分是退人不退田，洪水过时还可种田。这些目标还需深入论证。

无论是眼前过冬，还是长远治理，主要靠各地自力更生，但是也需要中央统筹补助。我们共同商量，权衡全国情况，采取了以下措施。一、区别不同情况，补助建房资金。对那些不影响行洪、就地重建的倒房户（约100万户），每户补助1,000元，使之能先建一间厢房过冬，全省、市共需11亿元。对过去被冲掉的洲滩民垸，拟逐步平垸行洪，移民建镇，不搞原地重建。湘、鄂、赣三省共涉及21.5万户，80多万人，对此国家应采取鼓励政策，促其实现，拟由国家补贴全部建房材料费（按每户100平方米，约需补助1.5万元），共需30多亿元，分年实行，分期拨款。二、恢复重建学校，全省、市共需补助7.5亿元；恢复重建卫生院共补助0.75亿元。三、封山育林、加固干堤、疏浚河湖所需资金，根据工程项目可行性研究情况，按基建程序报批，逐年安排。目前亟需加快审批一批水毁工程修复项目，以利各地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

及早上马，便于以工代赈，救济灾民生活。

这次下去前，国务院已派出四个工作组到这几个省调研，帮助地方搞灾后重建规划，已由国家计委汇总形成了《关于灾后重建、整治江湖、兴修水利的初步意见》。这次又与各地商量作了进一步修改，拟在近日国务院讨论后向政治局常委汇报。现先呈请审阅，请予指示。

朱镕基

9.13

和《焦点访谈》节目组座谈时的讲话

(1998年10月7日)

1998年10月7日，朱镕基同志到中央电视台考察工作，并与中央电视台负责同志和《焦点访谈》节目组的编辑、记者进行了座谈。这是朱镕基同志在座谈会上讲话的主要部分。

《焦点访谈》开播以来，我不敢说是最热情的观众，至少也是很热情的观众，还是一个积极的支持者和义务的宣传员。我常在各种场合宣传《焦点访谈》。很多部长原来不看这个节目，但是他们来参加我召开的会议时，怕我问昨天看了《焦点访谈》没有，所以他们在开会的头天晚上一定会看。

《焦点访谈》现在越办越好，越来越受广大群众欢迎。被曝光的人看了这个节目，总是不那么舒服。因此，你们在制作和播出这个节目的时候也会遇到各种阻力和不愉快的事情，这些都是可以想象的，但是广大群众都是很支持你们的。为了表示这种支持，我早就想到中央电视台来看一看大家，感谢大家为宣传党中央、国务院各项政策所做的大量工作。你们克服了很多困难，很不容易，应该向你们表示感谢，也对你们今后的工作提一点希望。

今天我来中央电视台，不光是谈《焦点访谈》。整个广播电视战线的工作进步越来越大、越来越快，特别是在这次抗洪抢险的斗争中，宣传战线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把全国人民的凝聚力提高到一个空前的水平，万众一心，心心相连。事实证明，舆论影响的广泛性也是空前的。对于这一点，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中央领导同志都给予充分肯定。记者穿着救生衣，在洪水里工作，投入了真实的感情。抗洪前线的军民都很喜欢记者。因此，也应该对全体宣传战线的同志表示感谢，感谢同志们对国务院工作的大力支持。



1998年10月7日，朱镕基在中央电视台考察，并为《焦点访谈》节目题词“舆论监督，群众喉舌，政府镜鉴，改革尖兵”。右一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丁关根。

过去我们经常说，宣传工作要“以正面报道为主，以宣传成绩为主”，这是正确的方针，但这种观点也束缚了我们。什么叫以正面报道为主？是指99%都应该正面报道吗？98%、80%就不行吗？我看51%不也行吗？大部分节目以宣传成绩为主，有这么一两个节目来指出我们前进过程中的问题，动员全党的力量去解决它，这样做的效果比单纯宣传成绩好得多。没有这样的节目，群众的声音反映不出来，那还有什么民主？还有什么监督？现在，《焦点访谈》以它自己的工作成绩和实际效果，证明全国人民都接受了这个节目。并不是因为它开展了批评、报道了问题，大家就垂头丧气，而是从中接受批评，改进工作，看到了希望，看到了前途，坚定了斗志。《焦点访谈》就起到了这样的作用。现在，“《焦点访谈》现象”越来越普及了，不只是中央电

视台有一个《焦点访谈》，许多电台、电视台也都有类似的节目。我看《经济半小时》报道四川某地砍伐原始森林，好像就是受了《焦点访谈》的影响，手法也和《焦点访谈》差不多，这个报道就起到了很好的作用。我让四川省全面停止砍伐天然林，把砍林的队伍变成造林的队伍。四川省党政领导非常重视，下了很大决心，许多地区停止了砍伐。眉山地区还在砍，被记者发现了，报道了这个情况。开始省里说那是世界银行援助的项目，不能停。后来弄清楚，并不是这样的。这个项目是80年代世行援助的项目，但主要是帮助当地造人工林，而不是砍林。这个情况反馈到省里，他们立即召开会议，决定停止砍伐。政府接受监督的态度非常坚决。我看这个节目应该是“准《焦点访谈》”，而且在一定的程度上是“超《焦点访谈》”，影响非常大。北京电视台也有类似的节目。这是一个很好的现象，把老百姓的疾苦反映出来，把政府的毛病揭露出来，马上就改。有错就改，这才是共产党人的姿态，对人民群众的鼓舞很大；否则，耳朵里听到的都是腐败现象，越听会越感到没有希望。现在把问题揭露出来，改正以后就给人民带来极大希望，真正把人民群众凝聚起来，就有了信心。我为目前正在普及的“《焦点访谈》现象”感到高兴，它给了电视、广播记者以广阔的新闻天地来发挥他们的才能，在促进国家改革和建设、促进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

大家要习惯这种批评。你们哪一天找出我的毛病，来采访我，我一定接受批评，改正自己的错误。我们作了很多决定，国务院的重大决定都是从这里出去的，难免会有一些毛病，找一找，指出来，改正它。

对于《焦点访谈》，我有四句话：“舆论监督，群众喉舌，政府镜鉴，改革尖兵。”这是对大家工作的评价。

首先是舆论监督。《焦点访谈》充分发挥了舆论监督的作用，题材广泛，几乎包括了国务院政策的各个方面。我现在干的事情每一个方面都在你们的题材里，你们的报道对我们的工作很有帮助。今天上午，国务院召开常务会议，研究“费改税”问题。现在是费大于税，老百姓是“民怨鼎沸”。首先，要改革公路收费制。这也是受到你们节目的启发。我印象最深的是《焦点访谈》的《“罚”要依法》节目中那个乱收费的山西交警，那个报道太精彩了。“费改税”不能随便乱来，要从公路收

费改起。所以，国务院拟订了关于公路“费改税”的意见，建议修改《公路法》。今天上午开会以前，我把《焦点访谈》的有关报道集中给部长们放映了一下，大家看了，通过这个文件就比较容易了。现在我正在抓的几项改革，不能说都是《焦点访谈》给我的启发，至少我从中得到很多思路。比如说粮食购销体制改革，这几年下了很大的工夫，因为农业是基础。今天有这样的好形势，就是因为粮食产量在稳定增长，“手中有粮，心中不慌”。现在，物价出现负增长，就是因为粮食多。有了粮食，其他什么东西想涨价都涨不上去。但是另一方面，国家承载了很大的负担。去年，中央财政补贴粮食企业500亿元，但没有到农民手里，大都进了不法分子的腰包。500亿元可以做什么呢？全国的公务员的工资都可以加三级。现在有些粮食管理部门腐败得很，从农民手里低价买入粮食，再高价卖出，还要享受国家补贴。最典型的就是记者曹莛报道的《收粮不能入私仓》，节目播出的同时，河北的省委书记和省长就坐不住了，第二天，他们就发来电报说他们连夜开会，表示过去做了很多工作，今后要如何加强和改进。我看到后批给胡锦涛同志和丁关根同志，让他们也看一看。这说明这期节目影响很大，比我讲话的影响还大，为粮食购销体制改革立了一大功。不光河北省的领导同志看了，全国粮食系统，各地的省委书记、省长也都受到了启发。这个节目表现手法也不错，采访了不少人，用事实说话。电视记者用新闻手法，让事实说话，让当事人说话，从感性到理性，很短的报道把国家的粮食购销政策都融汇到节目里，政策性很强，很有感染力。

几个月前，在一次省市领导参加的会议上，我让他们看《焦点访谈》，一边开会一边看，比我们的讲话更生动、更有力、更能用事实说服人。1996年播出的《盗伐危及大动脉》，那个节目中反映的情况确实让人痛心。联想到这次水灾，当然水灾是由于天灾，但不能不承认砍树太多了，泥沙把河道淤积了。我们保持水土、改善生态环境、保护森林的政策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落实，这次看到严重性了。在湖北，还有人在占湖，特别令人气愤的是有的干部还振振有词，盖房有理。你们舆论监督的方方面面，都抓住了当前政策的重点。农村电价也是个问题，没有电网，有电送不出去。即使有电网的农村，电价也贵得不得了。没电盼电，有电怕电。农民买了洗衣机、电冰箱，当摆设。修的电网破破烂烂，拿铁丝当电线，损耗太大，电费贵得不得

了。看了你们的节目对我有启发，现在中央已经下决心，改造农村电网，改革农村电价，实行同网同价。现在城市居民用电一度4角7分钱，农村也一样。国家拿出1400亿元，用三年时间完成农村电网改造，让农民能用上便宜电。有了电，洗衣机、电冰箱才卖得出去；产品卖得出去，工厂的机器才转得快；工厂的机器转起来，开工率高了，国有企业才能扭亏为盈。所以说，农村电网改造和实行同网同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我提出这个意见后，国家电力公司欢欣鼓舞，各地也欢欣鼓舞，农民就更高兴了。

总之，《焦点访谈》发挥了非常重要的舆论监督作用。

第二是群众喉舌。你们的节目中讲的话，就是老百姓讲的话，所以节目才受欢迎。现在农村老百姓和干部打交道有句口头语：你听不听？不听，我们《焦点访谈》见。这说明《焦点访谈》在农民中间有影响，农民觉得有说话的地方，有人帮他们说话，而且说了话干部不听不行，有权威。《焦点访谈》能办到这个样子，同志们应该欣慰。你们为国家的改革和建设作出了很大贡献，发挥了很好的作用。

第三是政府镜鉴。我们确实从《焦点访谈》了解到我们不能了解的情况，它像一面镜子，反映出我们的政策究竟能不能得到很好的贯彻。我们下去往往了解不到真实情况，他们事先都准备好了，叫你到哪儿去视察就去哪儿视察，坐下来就听汇报，谁跟你说心里话呀！我在《焦点访谈》就能看到许多真实情况。我相信各级政府要真正为人民服务，要贯彻党中央、国务院的方针政策，会从这个节目里得到很多东西。希望编辑、记者越是艰难的地方越要去，只有在这种时候得到的材料才是最宝贵、最真实的。

第四是改革尖兵。现在《焦点访谈》节目大多是反映党和政府进行改革的过程中，推行政策遇到困难，有时落实不下去。你们走在前边，把政策执行中的种种问题指出来，促使各级政府把政策推行到底。现在，我们在推行粮食购销体制改革，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非常难。今天国务院又通过了一个有关的文件，本来4月份党中央、国务院已经下达过文件，执行半年来有点成绩，各地报来的材料都是说国务院的政策非常正确，但实际情况是没有真正生效。我希望今后《焦点访谈》继续发挥改革尖兵的作用，当好党和政府的助手。

另外，我觉得《焦点访谈》在新闻表现手法上有很多好的地方值得总结，主要是用事实说话，由当事人说话，非常生动。当然，我们也要注意与人为善。绝大多数干部是好的，要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绳之以法。对那些不讲理、干了错事还不认错的情况，要讲道理。记者事先要准备好，一两句话就顶住他，然后动之以情，合情合理，让他想想他的做法给国家造成多大损失、给农民增加多少负担、给自然环境带来多大破坏。最后绳之以法，做错了事必须纠正，一定要依法办事，穷追猛打。我建议你们要加强反馈，凡是报道过的事情，都得有着落，要看他改了没有，这样才能树立威信。当然，反馈也不一定在《焦点访谈》播，可以放在其他新闻中，这样也有利于增强人民群众的信心。

《焦点访谈》节目有没有什么缺点呢？确实还没有看到很大的缺点，只有一次报道，反映天津联通和邮电部门打官司。这个报道没有错，但是这些事情非常复杂，我们不要轻信一家之言，也不要过早地下结论。那期节目的主持人就好像是个裁判员，事先就判定，邮电部门是不对的，联通是对的，这就未必。很多事物错综复杂，作结论的时候要小心，要对它的渊源、历史纠葛和目前状况等作全面了解，最好是请熟悉情况，又比较负责的同志出来作结论、当裁判。节目主持人不要当裁判，因为那样很难服人。

最后，我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向中央电视台全体工作人员再次表示衷心的感谢！你们做了很好的工作，谢谢你们！

关于当前经济形势的若干问题

(1998年10月20日)

这是朱镕基同志为中国工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所作的经济形势报告。

首先向中国工会十三大祝贺，向中国工人阶级表示崇高的敬意。当前的经济形势，困难很多。对亚洲金融危机，中央是做了准备的，但没有估计到这么严重、影响这么深刻。去年我国出口增长20%，今年计划增长10%，并且制定了很多优惠政策。上半年出口增长没有达到10%，9月份出现负增长，预计全年可能会负增长。我国的出口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五分之一。出口每增长5个百分点，影响国内生产总值1个百分点。去年出门增长20%，国内生产总值增长8.8%，如果没有出口增长，去年的经济增长率就只有4.8%。因此，国内外都有人估计人民币要贬值。人民币贬值，出口会增加一点，但增加不会很多。东南亚国家货币大幅度贬值，出口增加并不多。即使我们的货币贬值，对东南亚、日本的出口也还是出不去，对欧美出口也有很大的限制，如配额等。人民币贬值弊大于利。中国老百姓最怕货币贬值、物价上涨。人民币贬值就是向老百姓发出一个信号：中国经济不行了。而且，会影响到东南亚国家货币再一次贬值，特别是对香港地区影响大，会造成金融市场的混乱。

我们有没有能力使人民币不贬值呢？我们有这个能力。大不了就是影响占国民经济五分之一的出口增长嘛。我们可以启动国内市场，保持国民经济的快速增长。我们手中有大量的外汇储备，到去年年底外汇储备为1400亿美元，居世界第二。日本排第一，2000亿美元。我们有强大的外汇储备做后盾，全世界对中国都有信心。有些外国人老谣传人民币要贬值，其实是那些做外贸生意的人想捞一把。今年出口下降，可能会负增长，但我们不怕，人民币不会贬值。到年底，外汇储备不会减少，对这1400亿美元要严防死守，像保长江大堤一样。长江大堤都能保住，1400亿美元的外汇还保不住吗?

关于今年中国经济能否增长8%的问题，吵得我头昏脑胀。最近，美国《时代》周刊预测，中国今年经济增长3%，不知它怎么测出来的，今年前三季度已经增长了7.2%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预测是增长6%，这个估计是怀疑我们的数字里面有水分吧。现在的实际情况是上半年增长平均达到7%，没有达到8%，原因在于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由于走私，导致石油降价。原来国外石油19美元到20美元一桶，现在降到13美元到10美元一桶。石油大量走私，造成上半年石油石化企业发生亏损，油卖不出去，涨库，影响工业发展速度。我们打击走私，除了大炮没用上，机关枪都用上了。走私分子设计了“橄榄艇”，专门对抗反走私的。我在一个文件上批了，请海军设计“反橄榄艇”。百万雄师过大江，还怕对付不了“橄榄艇”？我们坚决打击走私，一个月后石油企业就扭亏为盈了。现在骗汇问题也很严重，要狠狠地打击。查了一个月，查出有100亿美元的报关单是假的，100张单子中有55张是假的。海关、银行要实现电子计算机联网，以保证报关单的真实性。为什么我敢说140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少不了，因为我对打击走私、骗汇有信心。



1998年10月20日，朱镕基在中国工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经济形势报告。

今年随着各项措施的到位，经济增长8%的任务可以完成。说句老实话，8%和7.9%有多大差别？如果数字是实在的，我高兴；如果生产的产品积压在仓库里，就不要去搞。我们吃弄虚作假的亏太大了。我们要的是效益，不是速度。当然，没有一定的速度，也就没有效益。现在客观估计，上半年7%，第三季度7.6%，第四季度肯定超过7.6%，全年经济增长在7%到8%之间。为什么能做到这样？因为中央有正确的政策去实现预定目标。在世界上，我们的经济情况还是最好的，现在经济增长速度还在上升。我们采取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扩大财政投资的办法，这是因为工业生产已经供过于求，再建加工工业是自找死路。只能搞基础设施，公路、铁路、环保、城市建设等，这些不是重复建设。用财政投资的办法，是因为借银行的钱要付利息，而且这些建设回报期长，只能靠国家来投资。财政的钱哪里来的？都是老百姓的，包括工人阶级的贡献。现在银行的钱贷不出去，许多商品卖不掉，VCD的广告天天做，彩电大降价，销售效果不佳。我们要向银行发债券，去搞基础设施建设，可以促进经济发展，增加税收；同时，建设需要钢材、水泥和大量民工，这样就可以把过剩的生产力利用起来。这个思路在去年就形成了。这种由国家采取扩张性财政政策、通过扩大需求来促进经济发展的理论，发明者是凯恩斯，开始执行者是罗斯福。政府的钱如何用好，有艺术。用过度了，会回到“大跃进”时代，我们对此是十分清醒的。今年的固定资产投资原定增长10%，现在达到30%。中央精确估计过，没有危险。

我们的物价为什么不涨？这是宏观调控成功的结果，实现了经济“软着陆”；同时因为我们解决了粮食问题，连续三年丰收。现在的粮食库存大，即使再遭受比今年更大的自然灾害也不怕。今年的水灾，损失了400亿斤粮食，但没有受灾的地方庄稼长得特别好。东北地区今年玉米大丰收，非粮食主产区的辽宁，粮食生产形势也是好得很。因为粮食没有问题，水灾后粮食没有涨价。粮食不涨价，其他物品就很难涨价。现在消费品卖不出去，特别是穿的。希望大家从银行里提点钱出来，去买点东西。消费上不去的原因，一是消费者的购买心理，买涨不买跌；二是缺乏安全感，工人下岗、机关干部分流。有句顺口溜：

“工作几十年，老了没人养。想要靠子女，子女又下岗。”大家不要担心，老了还是有人养的，下岗也是暂时的。大家拿点钱出来，去买东西，市场繁荣了，就能上岗了。

关于国有企业改革问题。亚洲金融危机，从总体上讲，没有影响我国的经济发展，也没有影响我们的改革进程。年初《政府工作报告》中讲的几个改革都在进行。今年国有企业比较困难。国有企业在前年跌到了谷底，去年略有好转，今年又掉下去。为什么困难？第一，既有历史原因，又有近几年重复建设的因素。在产业结构调整上下工夫不够。工业重复建设问题，化肥、石油化工等行业都存在，很多工厂停产。前几年为什么不明显？因为有银行贷款。但再这样下去，银行也得垮台。近几年，银行不给信贷了，矛盾就暴露了，工厂没事干，工人下岗。第二，重复建设，做无本买卖，向银行借钱搞建设，负债累累。本届政府决定，不再上新的工业项目。第三，招了很多人，本来只需要1000人的工厂，招了3000人，养不了。第四，很多企业的领导班子不称职，不懂行，不会管，挥霍浪费，根本原因在这里。

有的人把国有企业问题归根于没有搞私有化，这是一个很大的错误。党的十五大提出公有制可以有多种实现形式，股份制是一种形式，而且重要企业搞股份制，国家是要控股的，其他股份向公众发行，不是卖给少数人。昨天，我会见美国前总统布什，他现在在做生意。他问我，中国的国有企业私有化政策有没有改变？我对他说，我们说的是股份制，没有说过要搞私有化，我们同他的理解不一样。俄罗斯搞私有化的严重性现在看得很清楚，他们把企业卖给了原来的厂长、部长，实际上是工业寡头、金融寡头在控制经济。俄罗斯最大的石油公司的经理到中国来谈合作，他自己当团长，副总理、部长当随行，政府作为陪衬。搞好国有企业，不是靠搞私有化，而是要停止工业重复建设。本届政府批了几千亿元的投资项目，都是搞基础设施建设。银行不能帮地方政府搞重复建设，搞重复建设就是让工人下岗。这个工厂开工之日，就是那个工厂关门之时。广州一个小乙烯工程花了80亿元，别的地方只要40多亿元。实际上是中间环节中饱私囊，肥了开发商，肥了中间商。工厂一投产，就亏损；不投产，一年还利息也要七八个亿。这不是什么政绩，是个烂摊子！银行不能助纣为虐，工人阶级对此要抵制，要上下一致，不搞重复建设。当然，不是说一

点新的加工工业都不能搞。如能引进新的技术，把产品质量、品种搞上去，当然可以搞，但这往往不是基本建设，而是技术改造。现在有的地方，没有活干吵吵闹闹，有了活又不好好干。想发财的人不少，想干活的人不多，不勤劳怎么致富？现在有些产品的质量一塌糊涂。我家里的门，锁舌和锁舌框对不上。去国外开会前，请专门做服装的师傅做西装，一穿，扣子在上，扣眼在下，老师傅十分着急。我说，这不怪你，是管理不善。国有企业的问题不是实行不实行私有制的问题，不要在这个制那个制上出馊主意，还是要做好“三改一加强”①。总之，还是那么几句话：第一，停止重复建设。第二，减员增效，下岗分流。有计划地下岗，这在西方很普遍。西方有社会保障制度，我们更要建立社会保障制度。今年5月14日至16日，中央召开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和再就业工作会议讨论了这个问题。建立再就业服务中心，给下岗职工发基本生活费，经过培训后再上岗。6月，全国下岗工人达702万，进入再就业服务中心的有26%。到9月底，98%的下岗工人进入再就业服务中心，拿到基本生活费。对此大家还不习惯，现在还有思想障碍，要多做工作。第三，整顿企业领导班子。国务院建立稽察特派员制度，第一批派出去的人查出大量问题，企业领导班子不负责任，挥霍浪费。一个稽察特派员带四个助手，只查账，不管企业经营。稽察特派员对企业领导班子的任免有建议权，由人事部任免，希望工会支持。实行稽察特派员制度，是希望工厂面貌能够改观。今年国有大中型企业比较困难，效益下降，但是我们仍然坚信，经过三年时间，大多数国有大中型企业能够扭亏为盈。只要我们制止重复建设，整顿企业领导班子，提拔有作为的中青年干部，建立起社会保障制度，就可以做到，没有悲观的理由。

---

① “三改一加强”，指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要把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同企业改组、技术改造和加强企业管理结合起来。

现在出现一种错误思潮，卖企业已经成风，美其名曰“抓大放小”。党的十五大报告中讲到小企业可以卖，但现在是全卖。卖，只是搞活小企业的一种办法。而且，现在卖的已不是小企业，像长春拖拉机厂那样的大厂，不经市里批准也在卖。由于该厂领导班子腐化，工厂停产，11个月不发工资，和私商签订契约卖厂子，并且是卖给原在厂里

干活的临时工，工人怎能服气？买厂的这个人厉害得很，一进厂就把保安、财务控制起来。有些所谓“卖厂”，实为送厂。买主哪有那么多的钱去买？工人连工资都拿不到，哪有钱买厂？我们收到一些群众来信，反映某些国有企业的固定资产被七折八扣卖给了原来的厂长或其家属。有的提出要“打破框框”；有的名为招标，实际上按最低价格卖，然后宣布银行债务作废；有的还开全省大会推广。这些做法是完全错误的。我们中央政治局常委中没有人同意过，江泽民同志批判过这种做法，胡锦涛、尉健行同志都不赞成，不知道这股风是从哪里刮出来的。最近，《人民日报》要发表一系列文章进行批判。这些错误做法，对工人阶级一点好处都没有。有的文章还吹捧企业一卖就如何如何好，这些企业本来就是不错的企业，又把银行的债务赖掉，当然一卖就挣钱。他们这样说，真是不知人间还有“羞耻”二字! 工会的同志要同心协力来制止这种事。中国的国有企业问题，不是一个“卖”字就能解决的。

关于离退休职工的养老金问题，一定要按时足额发放。职工老了没人养还叫什么社会主义？养老金，中央拿出几十亿元，企业拿出一部分。中央企业多数是好的，只有少数行业如煤炭、有色金属比较困难，由中央和地方统筹解决。

关于农村改革。粮食大丰收后，粮食库存增大，国有粮食企业经营很困难。中央去年已经补贴了500亿元，为何还亏损？原因是私商掌握了粮源，价格卖得便宜，国有粮食企业的粮价高，卖不出去。中央制定了很多政策，但贯彻不下去；国有粮食企业缺乏自负盈亏的机制，基层干部腐败。现在有一种思潮，说什么中央关于粮食流通体制的改革搞不下去了，要求国有粮食企业退出收购环节，让私商去收购。这和工业上的卖企业是一样的。这种论调，在1992年出现过。我们按保护价敞开收购农民余粮，保证农民的种粮收入。如果让私商去收购，价格马上就降下来，农民的利益就会受损害。没有国家敞开收购粮食，就没有今天的好形势。粮食销售可以放开，收购绝对不能放开。粮食加工厂私人可以搞，但他们不能直接到农民那里去收购粮食。有人提出粮食市场、价格、收购三放开，这是完全错误的。



1998年7月28日，朱镕基在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考察白塔国家粮食储备中转库。右一为国家粮食储备局局长高铁生，右四为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云布龙，右六为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部长张左己，右七为国家开发银行副行长屠由瑞，右八为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刘明祖。

同志们，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工人阶级在改革和建设中都是主力军和中坚力量。各级政府要关心工人的生活，工会要更好地发挥作用。我可以向大家保证，现在存在的问题可以逐步得到解决，明年的经济形势一定会比今年更好。

海关是守卫国家经济利益的长城

(1998年10月24日)

1998年10月20日至25日，朱镕基同志先后在广西壮族自治区、广东省考察工作，考察了北海、南宁、汕头、广州等地。这是朱镕基同志在考察广东省黄埔海关时的讲话。

这一次我和吴仪同志来，不是到广东考察工作顺便到这里来，我们是专程来看望大家，而且要同海关的同志当面讲几句话。今天，广东省、广州市的主要领导同志也来了。我们明天要在广州召开八个省区的打击走私、骗汇座谈会，请各地区的领导同志参加。

我们这样做，就是要进一步加强打击走私工作，进一步加大打击的力度。现在打击走私打得还不够，力度还要加大。要加快缉私体制的建设，没有一个立体的机制，就不可能把这项工作推上去。要加强缉私装备的现代化。简单地说，就是“三个加”：加大打击走私工作的力度，加快缉私体制的建设，加强缉私装备的现代化。要把我们的打击走私工作纳入一个“常备不懈，严防猛打”的、规范的、法治的轨道。长江大堤是严防死守，我看打击走私我们不但要严防，还要主动出击，还要猛打。“常备不懈”，就是说，没有最后的胜利，没有彻底的胜利，要一直打下去，不是打完了，而是打不完的，永远打不完的，必须做到“常备不懈，严防猛打”。



1998年10月25日，朱镕基在广东省广州市主持召开八省区打击走私和骗汇工作座谈会并讲话。前排右一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国务委员吴仪，右二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罗干，右四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李长春，右五为国家经贸委副主任陈邦柱，右六为国务院副秘书长石秀诗。

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走私的情况在最近几年越来越严重，在某些地方已经达到泛滥的程度。今年上半年由于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国际市场的石油价格大幅度下降，过去一桶原油19美元、20美元，现在只有10美元了，最多不超过13美元。大量的成品油走私，我们全国的油罐全面涨罐，没法经营，油田停了几千口井，大庆油田亏损了几十个亿。石化行业是新兴产业、支柱产业，从来不亏损，现在怎么会亏损呢？就是大量走私成品油。7月份召开了全国打击走私工作会议，9月份石化行业马上扭亏为盈，见效快得很。走私很猖獗啊！现在虽然打击走私初战告捷，但是还差得远啊！走私带来的危害性不仅仅表现在经济上，而且影响到我们整个党、政、军的廉政建设。如果让这种歪风泛滥起来的话，我们就有丧失政权的可能，共产党就可能变质，

这绝不是危言耸听。一些共产党员已经变质了，当然是少数，或者是极少数，但是他们都身居高位，影响很大啊！所以，江主席在全国打击走私工作会议上发表了一个振奋人心的讲话，号召在全国开展一个宏大的打击走私斗争，也可以说是运动。目前，这个运动还没完。

走私到底为什么这么猖獗？这么泛滥？很多同志，甚至一些高级干部跟我讲，就是因为海关的腐败、内外勾结。我从来不同意这种看法，党中央和国务院都不是这个看法。我在全国打击走私工作会议上分析了这个原因。第一条是我们对走私的危害性认识不够，特别是领导干部认识不够。上一届政府里我是常务副总理，我有责任。全党的认识都不够。走私的危害性、腐蚀性大得很，这种腐蚀就像艾滋病病毒一样，传染快得很。所以，首先要端正认识，大家都来提高这个认识啊！我看海关的同志要从思想上、从政治路线上、从根本上来提高这个认识，不要站在海关、坐在海关看海关呀，要从全国看海关啊！你们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你们这个关把不住，我们不但经济上受损失，政治上的危害性也很大。

第二条，我认为，最近这几年“特殊法人”的走私也是造成走私泛滥的一个原因，走私分子有背景呀。一般的小商小贩，小打小闹，都不要紧，不足以动摇国本。只有这些有特殊背景的人和他们所挂靠的公司，造成的危害才大。你不敢动他们，甚至于跟他们勾结。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啊！这些挂靠的人都是打着我们某些部门的旗号，其实根本不是这些部门里的人，鱼目混珠、鱼龙混杂呀！他们是在这面“保护伞”的旗帜下干坏事，干尽坏事！

同志们，江主席已经下了命令，这也是江主席在全国打击走私工作会议召开前几天几夜的考虑。他给我打电话讲，军队不许经商办企业，切断这个经济来源，就吃“皇粮”嘛。“养兵千日，用在一朝”啊，军队怎么能自己去捞钱呢？其实，这些钱也根本没有到军队口袋里，而是被那些混账王八蛋中饱私囊了。所以，同志们，江主席下了最大的决心，这个决心非常伟大。在他给我打电话时，我就表态，我不惜一切拥护你这个决定！我认为这个决定是有历史意义的。一律脱钩！全部接收！现在一定要在年底这个限期内完成任务，国务院系统、各级政府都得接收。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不接收怎么办呢？你不接收，军队脱得了钩吗？接收以后一定要清理。我看其中99%都要撤掉，不

撤掉有什么用啊？留着让他们继续走私吗？继续骗汇吗？同志们啊！我们是为了人民的利益。我们站在国门的最前面，我们要保卫祖国，捍卫国家的利益。不管什么有特殊背景的人，不管是谁，我们都不怕，头可断，血可流，原则不能丢！我跟钱冠林①同志讲，你给我狠狠地打击走私，谁再讲情，就曝谁的光。江主席讲过，我有问题，你来查我。江主席都说可以查他，什么人不能查？为什么不能查？我跟吴仪同志、钱冠林同志都讲过，我是你们的后台，江主席是我的后台。你们不要害怕，不要怕打击报复。工作中间的错误是难免的，有了错就改正，但原则一定要坚持。有什么担待不了的？我全都给你们担待，大不了我下台。不要怕，同志们！

---

① 钱冠林，当时任海关总署署长。

第三条，确实有一些地方的领导腐败了、变质了。大家都应该知道，广东省湛江市，整个党政机关都牵涉进去了，从市委书记开始，到常务副市长、副市长、市打私办主任、公安边防局政委和局长，当然还加上海关关长，这个海关关长受贿1000万以上。他们把我们一个政权、把我们共产党的一个根据地都给丢光了，你说这个危害性 多大！山东省乳山市那个市委书记应该判死刑。广东省海丰县杀了一个县委书记，叫王仲，他管海丰管了10年啊，所以现在有的人得杀呀！不杀还行?



1998年10月22日，朱镕基在广东省汕头海关缉私艇上了解缉私工作情况。左一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李长春，左二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国务委员吴仪。

海关本身的腐败也是个问题。海关内部确确实实有少数蛀虫，一直到关长这一级，也存在不少徇私舞弊、内外勾结、贪污受贿的情况，危害不小。我们对自己海关内部腐败的程度不可估计过低啊！必须严肃地整治，这点绝对不能留情。海关内部的腐败必须整顿。你是“守门员”，你如果双手举械投降，那不是注定输球吗？那怎么得了！但是，同志们，我是把海关的腐败排在最后，我认为这是符合事实的。首先一条，我们来承担领导责任，我们管教不严、认识不足啊！但是，大家也要重视自己的问题。现在是一个机遇，把那些蛀虫给清理出去，绳之以法，这无损于海关的光荣。要把那些不称职的“好好先生”、官僚主义者、好占点小便宜的人，都送出去。要把大公无私、忠于职守、清正廉洁，甚至于连牺牲自己生命也不怕的同志提到领导岗位上来。有人说我们的海关是一支散掉的队伍，我从来都不同意这种看法。我

们的海关响应党的号召还是很积极的，从今年1月份以来，在召开全国打击走私工作会议后，成绩很大，战果辉煌，当然远远不够，还没有把走私分子的气焰打下去。但是，海关确实做了大量工作，证明我们海关的绝大多数同志都是优秀的，是好的，是响应党的号召的。所以，我建议钱冠林同志把你们拍的《中华之盾》压缩成两集，送给中央政治局委员，以我的名义送，表现我们的海关坚决守住国门，是一支光荣的队伍。这个片子主流是好的，我看了以后很感动。片子里面有好多海关人员的英勇事迹，我看了以后认为这部片子是很有价值的。今后要注意宣传。一方面要揭露海关的缺点。少数蛀虫哪个机关都有，那无损于海关的光荣。不要护短，而且要大胆地自我揭露、清除。另一方面，我们的海关舍生忘死，坚持正义，不怕刁难和各种阻力，与走私犯罪作斗争，的的确确是光荣的，对这些要大力宣传。人活着就是要有一点精神。搞市场经济不只是为了金钱。

今天特意来看同志们，就是对你们表示支持，表示感谢，也表示慰问。我知道你们吃了很多苦，受到很多刁难、威胁，甚至面临生命危险，你们都顶过去了。我们对你们这种精神表示敬意，应该向你们学习，应该继续发扬这种精神。同时，我也希望你们认识到任重而道远，任务还是非常艰巨的。

现在要进一步加大打击走私的力度，力度不够啊！同志们，绝对不只是这一点点东西啊！有的人还在顶风作案呢！打！必须狠狠地打！最近，我从香港报纸了解到，在广东省惠州海域，用炮艇走私汽车。这些炮艇都是退役的，停泊在香港，窝藏在那个地方，等打击走私的风头过去了，它们再来走私。这次我们接到线报，结果机关枪倒是打了500多发子弹，当场打死两个走私分子。香港报纸报道说，内地真刀真枪动真格的了，震动还是很大。过去是动假的，现在是动真的了，但力度还是远远不够。这次我到汕头海关视察，了解到搞走私的“大飞”装5个发动机，时速可达50节，我们的船追不上。有的走私船还有装甲，我看到缴获的那几艘走私船上都有枪眼，但打不穿。我说，你用穿甲弹呀，再不行就调驱逐舰去开炮嘛！把它打沉啦，有啥了不起，咱们几百万解放军还干不了这个事情啊！我们要进一步加大打击力度。

加快缉私体制建设是中央作出的重大决定。海关建立缉私警察，这是对你们最大的信任，也是对你们最大的重托。海关缉私警察列入公安序列，但以海关领导为主。所有走私案件的处理，都要以海关为主来处理，海关缉私警察有权依法进行侦查、拘留、逮捕、预审，并直接提交检察院来起诉。但这项工作搞得太慢，必须赶快组建海关缉私警察队伍。解放军、公安系统都要大力地支持海关缉私警察的组建工作，把最优秀的力量调进去，绝对不能为了安排人、安置人，把一些“老好人”调进去，危害祖国啊！为什么要把最优秀的人送进来呢？因为海关缉私警察这支新组建的队伍，如果没有一批优秀的人，怎么开始工作啊？公安部不是从新中国建立以来就成立了吗？公安系统实力雄厚，而且可以随时补充新生力量嘛，你们可以挑选最优秀的人到海关帮助组建缉私警察队伍，但不能安排人、安置人。

打击走私搞罚款放行绝对不行，今后就没有什么罚款放行了，全部没收、罚款、抓人、起诉、判刑，该枪毙的枪毙。看走私分子要命不要命！我在汕头海关，看到他们抓了两只用小渔船改装的走私船，走私分子搞“蚂蚁搬家”，大油船停在外海，然后用小渔船过驳走私进口成品油。据说“偷逃税不超过5万块钱只给予行政处罚，就可以放行”。你不是规定不超过5万块钱吗？他就搞4.9万元，他照样走私，那怎么行呢？我看这条法律要修改，只要走私就得刑事处分，这样，走私成本也就高了，没有人愿意为走私分子卖命。那些“大飞”再快，我打一发穿甲弹就把它打沉了。据说这些走私分子的老板都给他们买了保险，买了保险也怕死啊！下一次，走私分子的炮艇再出来，我看就把它们打沉，打到海里去。新的缉私体制要赶快建立起来。

同志们，海关人员的工资就应该高，这是我说的。海关缉私有功的人应该重奖，现在这一点奖励不行。你们狠狠地打击走私就是了，打得财源滚滚进来，给你们发奖金。我这个话讲得似乎缺少了点政治，政治在前面早就讲了，后面就是讲还是要提高工资待遇，还是要重奖，不实行这个体制也是不行的。包括我们国务院啊，精简了机构以后，下一步就是要提高工资了。如果搞得一个国家干部、处级干部连一个看门的收入都不如，你不是逼着他去偷鸡摸狗吗？那些偷鸡摸狗的人不要拿我这句话作为借口啊！

海关的缉私装备必须现代化。在7月份的全国打私工作会议上，我就对钱冠林同志说，你要航空母舰我做不出来，但驱逐舰有的是，鱼雷快艇有的是，你嫌它们速度不够，还可以改装。现在国防工业正好任务不饱满，他们一听说要加强缉私装备，高兴得很，他们可以得到订货呀。在汕头海关，我看到他们只有五条艇。我说你们这五条艇根本不够，起码要加到十条，先加三条最现代化的，缉私艇就是要24小时在海域巡逻啊！走私船一来就可能碰上缉私艇，使走私分子不敢再冒险了。这个钱值得花，应该花，必须花。特别是缉毒，要筑起很严密的一条钢铁防线、钢铁长城。打击走私的装备，军队支持，国防工业支持，国务院支持，党中央支持，你们提出什么要求我们就满足，但我没叫你们乱花钱啊。不必要花的钱就不花，但你们一定要保证筑起这条钢铁长城。打击走私的装备要现代化。你们刚才讲的电子地磅当然可以搞了，我说还要搞X光透视检查，我告诉吴仪同志，现在每个海关都给配备一台进口的X光透视检查设备。可以先进口，这个东西我们一时做不出来的，进口一批以后再自己做。集中订货，要求外国公司转让技术。我记得在广东省惠州不就搞了一套X光透视检查设备吗？集中跟外国公司订几条生产线，让他们把技术带进来，以后我们自己造。现在等不及了。走私分子说这个集装箱空箱出口，他们骗鬼啊！拿着“照妖镜”一照，它不都露出原形了吗？电子地磅恐怕也是起这个作用嘛。所有集装箱百分之百都要经过X光透视仪检查才能够放行，这样还不一定查得出来呢！同志们，我们看电影也看到了，走私分子还是有办法让你照不出来，你们还得想别的办法。

目前骗汇很厉害，特别是在广东。广东的进口报关单54%是假的。现在实行电子计算机联网核对。昨天，我到人民银行广东省分行看了一下他们的操作，很不错！海关这个系统就是要跟人民银行、外汇管理局联网，跟基层银行、基层海关联网，让他无法逃避进口报关单核查系统。进口报关单，你拿个卡一看，把号码输进去，马上到海关总署去核对，真的还是假的，一对就对出来了。

总之，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现在我们国家的实力很强大，没有办不了的事情。关键是我们得齐心协力，大家共同努力，加大打私力度、加快缉私体制建设进度、加强缉私装备的现代化，一心一意把海关建设成为一条钢铁长城。

我请同志们把我的这些话，向你们的部下转达，转达我对他们的问候，转达我对他们的慰问，转达我对他们的感谢！

关闭广东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是正确的

(1998年10月24日)

这是朱镕基同志在广东省考察工作期间，听取省委、省政府工作汇报后讲话的一部分。

我们为什么能够避免金融危机？因为我们从1993年就开始采取强有力的措施，及时解决经济生活中暴露出来的突出问题，特别是刹住了房地产热，抓了整顿金融秩序、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亚洲金融危机的原因，无非是这几条：一是经济结构不合理。这些国家把大量的资金投在房地产上，建高档大厦，没有支柱产业。二是乱借外债。没钱就借外债，而且多是短期外债。政府官员通过关系从银行借款给大企业集团，把银行搞垮了。三是政府腐败，搞裙带关系、官商勾结。对于这些问题，我们都吸取了教训。尽管1993年暴露的问题现在还没有彻底解决，全国房地产压了5000亿到7000亿元，都是银行的钱，但终究避免了这些问题的恶化。另外，我们把外汇储备抓好了，现在我国外汇储备排在世界第二位。1996年8月，江总书记在北戴河召开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就深入研究了防范我国金融风险问题。1997年年初，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再次研究了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问题。1997年11月，党中央、国务院召开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全面部署了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的工作。

最近为什么要关闭广东国际信托投资公司(以下简称“广国投”)?

有的同志问，为什么不救？为什么要关？我们认为，如果有办法，绝对不会关；没有办法了，所以不能不关。经过中央和广东省领导同志反复研究，国家没有钱赔，地方也赔不起，广国投只能申请破产，按国际惯例办。今后要总结关闭金融机构的经验，按照法律规定实施破产的办法。这种事情今后可能会不断出现。这次关闭广国投，总的反映是好的。香港报纸说，中国是真正想进行金融改革，决心确实大，敢动刀子，割掉瘤子，只有这样中国才有希望。据反映，其他省市的国际信托投资公司，都感到有压力了。为什么？过去外国都以为

中国的地方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是国家担保的，就乱借钱给它们。现在一看，广国投关闭了，靠不住了，纷纷去逼债。我认为这是个好事, 就得有人逼债，这样它们才能知道这些钱不是那么容易借的。问题早暴露比晚暴露好。早揭开盖子，我们心里早点有数，再大的困难也能克服。不然的话，将来越陷越深，这么拖下去是不行的。

中央在研究关闭广国投问题时强调了三点：第一，不要把广国投的关闭跟改革开放联系起来，不能因此否定邓小平理论和改革开放路线。第二，不要因为关闭广国投就否定了广东改革开放的成就，广东改革开放的成就是客观事实，不能因为关闭一个投资公司，就影响对成绩的估价。相反，只有解决这些公司的问题，才能保证广东改革开放更好地向前发展。第三，广东还是中国的广东，省里解决不了的困难，中央还得帮助解决。所以，关闭广国投，是经过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批准的。只有这条路才是正确的。今后处理这些潜伏着很大金融风险的金融机构，也应当用这个办法。

广东出现的一些问题，是改革开放过程中必须付出的代价。问题总是会发生的，不光是在广东。我们绝对不是把广东的问题看得那么大。改革开放中有很多新的事物，开始是不懂得、不了解的，发生了这样那样的问题甚至很严重的问题，也是难以避免的。问题是付出了“学费”，一定要吸取教训，正确地对待，把思路理顺，就可以使各项事业健康地发展。我们要上下一心，共同努力，总结经验教训，克服困难。我相信，广东能够前进得更好、更稳、更快。

会见美国迪斯尼公司董事长埃斯纳时的谈话

(1998年10月26日)

这考朱镕基同志在北京中南海紫光阁会见美国迪斯尼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迈克尔·埃斯纳时的谈话。

朱镕基： 我和迪斯尼公司的老板见过两次，不知上次见的是否是你?

埃斯纳： 是弗兰克·威尔斯。

朱镕基： 我对你和你的夫人及同事到中国来访问表示欢迎。我对迪斯尼公司很熟悉。我到过洛杉矶的迪斯尼乐园，是阿曼森①夫人陪我去的。可惜，我没有去过佛罗里达的迪斯尼世界。我也去过东京和巴黎的迪斯尼乐园。不过我每次去都没付费。我和迪斯尼公司前任两个老板都谈过在上海建一个迪斯尼乐园的事情。我在当上海市市长的时候就在上海留了一块地，我认为那是最好的一块地了。上次我去上海时，问他们是否还留着。他们说还在，已经留了十年了。但我很失望的是你们宣布不再在亚洲建迪斯尼乐园，真的吗？香港报纸说的，因为你们对大屿山不感兴趣，对整个亚洲也不感兴趣了。

① 阿曼森，即卡罗琳·阿曼森，当时任美国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副主席。

埃斯纳： 香港的报道不属实。首先让我感谢你同意会见我们。阿曼森夫人向你问好。我们很高兴来到这里。我们刚从上海过来，上海的发展让人惊讶。在上海许多摩天大楼像树一样长出来，再次证明了上海市领导的才干。我们很高兴从北京机场到市区的公路上经过，我儿子特别喜欢这条公路，他现在正在长城玩。我们希望，同时实际上也正在与中国开展双边合作，进行各种高质量的项目。我们已投资12亿美元在中国生产消费品，而且我们放映了最好的影片《中国奇观》，这也是阿曼森夫人促成的双边协议的成果。不过，我想这部影片需要

更新了，要包括上海的内容。我们从1986年到1991年向中国提供米老鼠动画片的项目也很成功。1986年我第一次来华，自那以后，中国在保护知识产权和分账发行影片方面也取得了很大成功。我很赞赏我们一直在合作的基础上进行交流，但我们犯了一个愚蠢的错误，即发行了《贡顿》①。在这里，我不想谈论发行影片的细节。我对这一影片的发行一无所知，当然我知道这不能成为一个借口。我从《纽约时报》上得知这一消息，大吃一惊。之后，我们以一种最不积极的方式发行此片，还是发生了不幸的事件。这部影片对于我们的朋友是一种侮辱，而且花了很多钱，世界上除了新闻记者外也没多少人看。坏消息是拍了这部影片，好消息是没人看。我在此表示道歉，今后要防止再发生此类侮辱朋友的事情。总之，我们是一家家庭娱乐公司，是一种用傻乎乎的方式来逗乐的公司。我们的战略是希望在中国的电视台放映迪斯尼的儿童节目，开设迪斯尼频道和迪斯尼网址，提供各种教育节目，所有这一切将以迪斯尼乐园为纽带。大家都希望迪斯尼公司在中国建造一座像在洛杉矶、东京、巴黎那样的乐园。但建造这么一座乐园的成本很高，需要有很多人去玩。如果不能建成一座高质量的乐园，就不会有多少游人去。我们还有一些专业上的问题，如图书馆、电视塔等。我们要在专业上精益求精，这也是我们要面临的一个问题。所以，我想先在中国的电视上放映米老鼠、唐老鸭这一类的动画形象，提供各种产品和信息，当中国公众对这类产品的需求足够大时，就对建迪斯尼乐园产生了要求。就迪斯尼乐园的选址问题，我也想征求你的意见。在香港我们的朋友提出了几个地方，我们对上海也很有兴趣。在香港、广东，人们更富有，有利于支持乐园，不过上海人也越来越富有了。我们正在考虑这两处，想听一下你的意见。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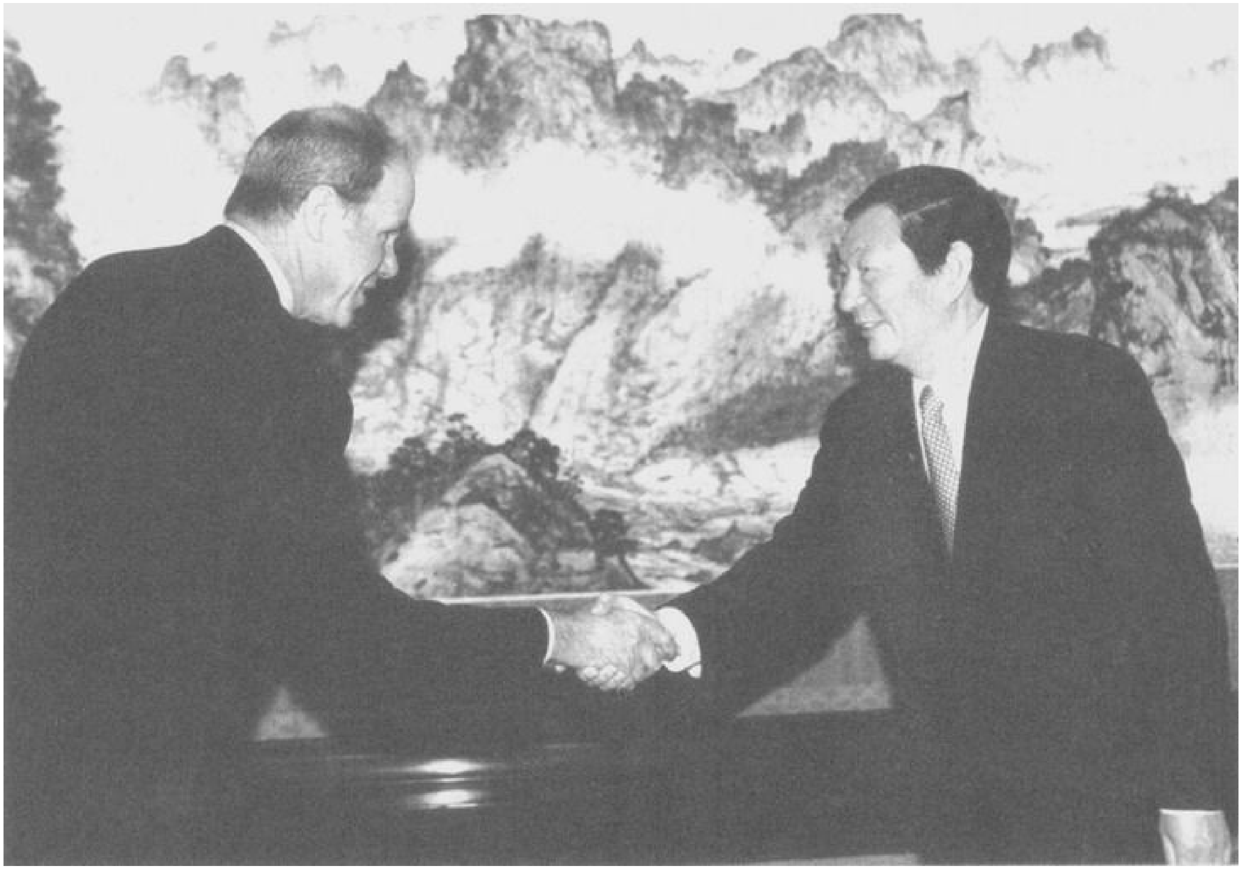
① 《贡顿》，即电影“Kundun”，中文译为《达赖的一生》，是美国导演马丁·斯科塞斯于1997年导演制作的一部影片。主要是通过介绍第十四世达赖喇嘛·丹增嘉措的经历，为达赖歌功颂德，暗中攻击中国。

朱镕基： 我很欣赏你改正错误的勇气和为发展中美友谊所做的努力，这也证明你是一个富有远见的企业家，这也是保证迪斯尼公司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对于建迪斯尼乐园，你要是在亚洲建一个，就要建在中国，因为世界上所有人都承认中国是最大的潜在市场。当然有

人预言2010年，也有人预言在2030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会超过美国。我觉得不好说。我们认为2010年是没有可能的，到2020年或2030年是否会赶上，要看中国自己的努力。即使数量上能赶上，在科技上我们还是赶不上。但不管怎么样，中国会成为亚洲最大的市场，在世界上也会有一定的地位。所以，作为一个有远见的企业家，是你作出决定的时候了。

埃斯纳： 你认为迪斯尼乐园应该建在香港还是上海，或是两个地方都建?

朱镕基： 回答很明确，上海。我当过上海市市长。现在我在北京工作，但我很了解上海的地位。上海是中国最大的城市。上海的经济实力比香港强大，尤其在工业和科技方面。上海本身有1500万人，周围是中国最富庶的地区——江苏和浙江。中国人都愿意参观上海。如果有迪斯尼乐园，去上海的游人就更多了。上海的海陆空交通都很方便，中国的第一条高速铁路就是从北京到上海。迪斯尼乐园建在香港，内地人不便去。建在广东要好些，如珠海，因为香港人可以去。但香港人也很喜欢去上海，他们对广东太熟悉，已经感到不新鲜了。如果迪斯尼乐园建在上海，他们去那里玩，交通不成问题。在今后的10到20年内，上海的发展速度将远远超过广东，因为他们在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方面都有优势。上海还有一个最大的优点：在广东建设费用很高，如果在上海，会比在广东便宜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因为广东跟香港学，地价非常贵，配套设施的费用也很高，在内地不是这样。上海高楼林立，这也不见得是好事，很多楼是空的，地价也就下来了。马来西亚的双峰塔是世界上最高的，比美国最高的建筑还要高，但它的经济还是不景气。上海人想要建一个比它更高的，我认为不一定要比谁高。我告诉他们与其建一座世界上最高的楼，不如建一座迪斯尼乐园。



1998年10月26日，朱镕基在北京中南海紫光阁会见美国迪斯尼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迈克尔·埃斯纳。

埃斯纳： 我已去过上海，我的直觉和你一样。你很有说服力。我想指出一个我们双方在研究问题上的区别。在香港，迪斯尼公司的业务开展了很长时间。我们在那儿设有电视频道，有专卖店，很有名。如果我们在中国内地也能开设迪斯尼频道，播放儿童节目，建立更多的商店，这样就可以为上海创造像在东京、巴黎开设迪斯尼乐园一样的条件，以保证它的成功。如果没有这些准备，经过一段时间，对迪斯尼乐园的需求就会减少。每年没有1200万到1500万人去参观，迪斯尼乐园就会成为一座空的建筑物。我们也不想要一座空的摩天大楼。

朱镕基： 中国有12亿人，1200万到1500万人对我们来说是小意思。中国有8亿农民，有一些也很富有。即使不算农民我们还有四五亿城市居民想去迪斯尼玩，所以，我可以肯定内地的游客要比香港游客多得多。同时，上海将会成为世界经济中心之一，越来越多的外国商人和游客会到上海去，不会比去香港的人少。迪斯尼在中国已经很有名，

比如唐老鸭。给唐老鸭配音的那个中国演员比我有名，比我还有钱。《狮子王》也很有名，小孩子没看过的不多。世界上再没有哪个国家比看过《狮子王》的中国人人数更多。我想中国游客没有问题。至于开办电视频道、玩具商店等不是不可以，但我们要达成协议：你先要确定在中国建迪斯尼乐园，我才让你进来。

埃斯纳： 你是一个很好的谈判者。我们并不是说产品一定都要是美国的。比如我们在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制造很多动画片，除了放映米老鼠、唐老鸭外还可放映中国的节目。电影《花木兰》很成功，我们可以继续拍摄《花木兰》的电视连续剧，中方可以一起参加拍摄。《花木兰》也可以成为中国迪斯尼乐园的一部分，这就体现了多元文化的特点。还比如说，立体电影对孩子和他们的父母有更多的教育意义。在上海，我们争论“鸡和蛋”的问题，即先有迪斯尼频道还是先有迪斯尼乐园的问题。我们的意见是一旦建立迪斯尼乐园，就会吸引中国的许多投资，它们会在电视上做广告。我们希望它们在迪斯尼频道上做广告。上海人建议我把这一问题带到北京来，因为只有朱总理可以作决定，所以他们让我到北京和你谈判。

朱镕基： 现在决定权在你。只要你决定在中国建了，一切都好谈。你不作这个决定，一切都不好谈。只要你决定了，至于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我们可以一起进行。建迪斯尼乐园要几年时间，在建的同时，你的商品可以进来。鸡和蛋一起上，那会很美味的。对于建乐园的方式，我也有不同看法，你说你的产品是多元文化的，我认为迪斯尼首先是介绍外国文化，特别是美国文化。如果你用中国文化建一个迪斯尼乐园，人们就不去了。他们可以去西安看兵马俑，去上海博物馆看青铜器，不一定要去迪斯尼。问题很简单，只要你作出决定了，一切可以商量，可以做可行性报告。

埃斯纳： 我同意基本上把美国加州安纳汉姆的迪斯尼乐园搬到中国来，我是非常希望这么做的。关于管理问题，我们要研究如何建立管理机制避免受到经济波动的影响。还要研究如何创立一个良好的伙伴关系问题。我们在日本与日方有很好的关系，我们相信与中国也会有这种关系。

朱镕基： 这方面没问题。我在当上海市市长时就想建一个迪斯尼乐园，这个梦想已经有十年了。如在那里建迪斯尼乐园，双方将会有良

好的合作。如果你们实行股份制，我们可以拿土地入股。地价比香港和广东要便宜，当然管理完全在你。

埃斯纳： 在上海谈判时，我们提出我们可以按照美国的模式办，也就是迪斯尼公司拥有全部的产权。我们也可以参照欧洲的模式，即建立股票上市公司。我们还可以采取日本的模式，由当地公司拥有迪斯尼乐园的产权；我们不拥有产权，只提供版权、管理方式和经验。在中国，我们也可以采取这种方式，中国拥有产权，双方共同经营管理。我们提供版权、娱乐产品和动画形象。我希望采取这种方式。

朱镕基： 采取任何方式都可以谈判。

埃斯纳： 我此行的目的是想结束《贡顿》引起的问题，同时介绍美国广播公司的总裁艾格先生。我们希望与中方合作报道有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周年的庆祝活动和中国迎接新世纪的情况，介绍中国的产品销往全世界。我们感谢中国在保护知识产权方面取得的成果，还希望在中国发行《花木兰》。《花木兰》没赚什么钱，主要是介绍中国。我希望我们同中国的关系能回到正常的轨道上来，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向前发展。

朱镕基： 关于电影问题，这里有一位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的赵实副局长，许多问题你可以和她谈。

埃斯纳： 谢谢你百忙之中抽时间会见我们。我们回去后可否给你寄一份建议书?

朱镕基： 这是一个好主意。

国有大中型企业三年脱困大有希望

(1998年11月27日)

1998年11月23日至27日，朱镕基同志在辽宁省考察工作，先后考察了锦州、大连等地。这是朱镕基同志在听取省委、省政府工作汇报后讲话的主要部分。

党中央、国务院提出的用三年左右时间，使大多数国有大中型亏损企业摆脱困境的目标，我认为是完全可以实现的，我对此是有信心的。我的信心就在辽宁，就在东北。因为东北地区，特别辽宁是老工业基地，如果辽宁能够实现三年脱困的话，那全国就一定可以实现。我们的目标一定能够达到，辽宁首先要达到。我完全相信你们，只要你们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的政策，辽宁的国有工业一定能够搞好。你们要意识到自己身上的责任，做出榜样，让全国树立信心。

三年脱困不是要求所有的企业都脱困，而是国有大中型企业脱困；也不是要求所有大中型亏损企业脱困，而只是大多数或者一半以上扭亏为盈。这个目标并不高，是可以实现的。大家对这个目标不要怀疑，不要动摇。现在有人说，一年过去了，国有企业不是比去年更糟糕吗？亏损加大啦，三年后还有什么希望啊？我的回答就是，秋后还没有到，你不要先算账，等秋后再算账吧。根据辽宁的情况看，我对三年脱困完全有信心。

国有企业搞得好不好，与宏观经济环境有很大关系。如果搞那么多重复建设，又是一个供过于求的宏观经济环境，哪个企业能搞得好？只要停止重复建设，把资金投入到基础设施建设，启动国内市场，国有企业就可以搞好。当前国有企业经营困难，是一个历史遗留问题，是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中产生的问题。过去是不考虑市场需要的，所以造成了大量的重复建设，供过于求。只要把重复建设制止住，市场成长三年以后，现有国有企业的生产能力都可以得到相当程度的发挥，国有企业就活了。

我为什么对国有大中型亏损企业三年脱困有信心呢？因为现在我作为总理，要死死地把住不许重复建设这个关。本届政府成立差不多八个月了，批了几千亿元的项目，没有加工工业项目，全是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包括铁路、公路、农田水利、环保设施、城市建设、电网改造等，这些项目都是能够带动生产能力发挥的。我相信只要坚持三年，你们大部分企业的生产能力就会发挥出来。我到大连造船新厂，让他们把伊朗的五条油船和巴西的两个石油钻井平台这两个合同抢过来，可以创汇6.9亿美元，鞍钢的板材也就有销路了，可以带动生产。所以，我给了大连造船新厂两个条件：第一个是出口信贷。如今，我们和日本、韩国存在激烈的竞争，因为它们的生产成本低，货币贬值了，我们的人民币不能贬值，但我给出口信贷。第二个是提高出口退税率，也起到了相同的效果。现在让我头痛的是，对地方的重复建设我无法完全防止，因为审批权不在我手里，限额以下项目的审批权都在地方手里。我只有下命令给银行，不许他们支持那些重复建设项目，这个单子要由国家经贸委来开。

应当看到当前国有企业的困难是怎么来的，就是不断地重复建设，钱花的不是地方。很多地方和部门的领导不懂经营瞎指挥，为了搞“政绩”，不考虑面向市场，建了很多多余的生产能力，建一个新厂打垮几个老厂。引进外资也是不考虑市场，盲目地引进，进来一个外资企业打垮几个国有企业。再加上招了很多富余人员，现在都没办法开工资了，只好不管了。不管了，还不闹事?

我相信，只要我们大家按现在的办法，共同努力三年，宏观经济环境是一定会改善的。大家已经看到了，从去年第四季度到现在，国家大量投资于基础设施建设，带动了国民经济的发展，效果很明显。只要坚持三年，宏观经济环境必然改变。这三年，需求总是要增长，重复建设制止了，那就意味着现有的国有企业可以开足马力生产。只要有市场，企业自然就能重现活力。我的信心就在这个地方。

办好企业的关键在领导班子。不搞好现代企业管理，什么企业也办不好。要把这个企业管好，领导班子是最主要的。资本主义企业办得好、办不好，也完全在于那个企业的领导人，它们的董事会也是经常换人的。我们不换行吗？现在不要行业部门管企业，国务院派稽察特派员，增加透明度。我们如今派出的稽察特派员，无一不是出去一

查，就发现问题一大堆。不单是经营管理上的问题，而是贪污、受贿、浪费、特权等问题。国有企业厂长、经理的思想要跟上时代的变化，现在是市场经济了，不能让你坐在那个位置上不断地制造亏损。企业亏损一年要“黄牌警告”，亏损两年要请你下台，就得这样干。你以为当厂长、经理一年亏几千万元、几个亿，可以随随便便，不把它当回事呀。我不处理你，怎么对得起老百姓？现在有的是人才，有好多能干的年轻人，让他们上来锻炼嘛。

办好国有大中型企业，要加强管理。说老实话，目前企业的经营管理，还不如七八十年代，甚至也不如50年代。有活不好好干，没活哇哇叫。过去是行业部门来管这些企业，部门都不希望自己管的企业出问题，都帮助掩盖企业的问题；查也查不出问题，因为厂长都是部长派的，都有背景，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我这么说可能太绝对了，反正这个现象相当严重。现在，我们的国有企业为什么办不好？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人控制，没有人监督，“三不管”，有一些企业领导确实是无法无天。一方面，我们要减少企业的主管部门，只由一个部门去管理。这个部门不管企业的经营管理，经营管理完全可以放开，你总经理拿多少钱、企业人员拿多少钱，我可以不管；我就管你的账，纳税了没有，贪污了没有，账目是不是真的？你盈利了，多发奖金我没意见。我不倾向于搞企业领导薪酬不得超过工人工资几倍的规定，我认为这些都是企业的自主权。关键是你要盈利，交税。企业亏损了，我请你下台。在当前的情况下，加强企业管理，除了要整顿企业的领导班子外，还要把企业的质量管理、成本管理、统计管理都建设起来，就像邯钢一样，一点一点去做，精心地进行经营管理。企业生存要靠市场竞争，产品质量差卖不出去，企业就得关门。另外，我们确实是要加强国家对企业的监督，企业自己得加强管理，这也是必须的。整个这一套办法，就是有中国特色的搞好国有企业的道路。

绝对不要想用什么卖企业的办法去解决国有企业的问题。全国卖企业的情况现在了解得清清楚楚了，没有卖到多少钱。有些人鼓吹一种谬论，说国有企业的改革就在一个“卖”字，卖企业可以卖8000亿元，剩下的国有企业就可以搞好了，这是说梦话！其实卖的时候七折八扣，几乎变成零资产卖掉。然后，把银行的贷款、债权都给冲掉，这不等于倒贴吗？根本就卖不到钱，是送掉的嘛。国有资产属国家所有，你

有什么权力卖？大家千万别犯这种方向性的错误。我们不是绝对不同意卖企业，我们搞活小企业有一个方式是出卖，但那只是一种方式，不是主要方式，因为在中国现在能买得起小企业的人不是很多。再说，这些小企业往往是亏损累累，负债一大堆。你能卖给谁？不是不能卖，而是卖不掉。党的十五大报告讲，要探索公有制的多种实现形式，主要讲的是搞股份制，向公众发行股票，这是一个正规的办法。不是现在这种“拍卖”，这个“拍卖”是假的。但是，推行股份制要有一个过程，因为企业直接融资、集资的能力有限，企业得有业绩。可以让盈利企业上市，上市以后拿资金去兼并、改造亏损企业，大家都盈利。我们正在运用这种方式来搞活国有企业。所谓“改制”，只能改这个制。不能够把卖企业当成一个主要方式。现在问题不在于小企业，而在于国有大中型企业。那些小企业只要宏观经济环境一好，它们自然就会好起来了。只要自力更生，小企业是能够活下去的。只要大家齐心协力，坚持不懈，扎扎实实地工作，就能把这些国有企业办好。



1998年11月25日，朱镕基在辽宁省大连造船新厂考察国有企业改革情况。左三为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副主任邵秉仁。

现在，辽宁处在一个大调整、大变革时期。经济结构、产业结构必须进行大的调整，同时，劳动力结构也需要调整。如今，很多产业已经落后了，没有市场或资源已经枯竭了。有的企业已经亏损累累了，不关门是不行的，如煤矿、有色金属矿等一些企业不关门是没有前途的。要下最大的决心，让它们破产，关了门以后把人员安置好。只要工人得到安置，逐步地就业，就不会发生社会动乱。实际上，有些人是没法再就业了，只好把他们养起来，发基本生活费总比亏损那么大好得多。调整劳动力结构，是要把国有企业大量的冗员、多余的工人，适当地转入到其他产业里去。同时，要对企业职工进行择业观念的教育。在东北地区，落后、陈腐的择业观念还很严重，要转变观念，今年比去年的观念就有了很大改变。我看，好多事情都可以去做。

企业脱困要抓紧时间，全力以赴。还有两年多的时间，我希望大家跟我共同努力，我们一起来闯“地雷阵”。1996年我到辽宁来了，1997年我来了，今年我又来了，明年也要来，后年还要来，我至少还可以来辽宁四次。希望同志们要把我的这一片心意都记在你们的心里。

搞“豆腐渣工程”就是对人民犯罪

(1998年12月3日)

1998年11月2日，交通部部长黄镇东《关于切实抓好公路建设质量的报告》反映，交通部组织专家对一些重点交通项目进行了检查，总体上说工程质量是好的，但也暴露出一些问题，如云南省昆明市的昆明至禄劝公路成了“豆腐渣工程”。这是朱镕基同志在该报告上的批语。

采取财政发债的方式，增加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是我国应对亚洲金融危机的重大政策措施，而成败的关键在于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的质量和效益。因此，搞“豆腐渣工程”就是对人民犯罪。交通部应将查出的公路建设质量问题通报全国，公开曝光，引起各级党政领导的注意和重视。

朱镕基

12.3

采取财政发债的方式，增加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是我国应对亚洲金融危机的重大政策措施，而成败的关键在于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的质量和效益。因此，搞"豆腐渣"工程就是对人民犯罪。交通部应将查出的公路建设质量问题通报全国，公开曝光，引起各级党政领导的注意和重视。

朱镕基
12.5

关于切实抓好公路建设质量的报告

镕基总理：

今年党中央国务院为应对亚洲金融危机，作出了扩大内需、加快基础设施建设的重大决策，公路建设的投资力度比去年提高了 50%。从 1—10 月份统计资料分析是能够完成今年预定目标的，但是公路建设的质量问题必须引起我们高度重视，并要在落实上下功夫。今年

在一九九八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1998年12月7日)

1998年12月7日至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北京召开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党政主要负责同志，中共中央有关部门、国务院各部门和有关单位的主要负责同志，解放军四总部和武警总部负责同志。这是朱镕基同志在会上讲话的主要部分。

我就明年经济工作的具体部署讲一些意见，重点讲六个问题：

一、今年经济改革和发展情况的基本估计

今年3月份，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以后，我代表国务院把今年的经济工作概括为："一个确保，三个到位，五项改革"。一个确保就是保持8％的经济增长速度。现在看起来确保不了，国家统计局预计是7.8％。主要原因：第一，是亚洲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的影响。尽管我们去年在北戴河就已经认识到亚洲金融危机会对我国经济带来不利影响，也做了一定的准备，但对危机后期影响的广度、深度估计不足。去年的财政状况比较好，除了赤字减少50亿元以外，我们原定计划发行的国债中有150亿元没有发完；后来经请示江泽民、李鹏同志，把这150亿元都发了。把这个钱留到了今年，就是为了应对亚洲金融危机。总共转过来180亿元，全投入到了基础设施建设中。到7月份一看这个180亿元的力度是远远不够的，因此后来又增发了1000亿元的国债，配套1000亿元的贷款，来投入基础设施建设，才使今年的经济增长速度勉强维持在7％以上。去年的出口增长20％，今年定的计划是10％，但现在看，不要说10％，零增长就算很好了，恐怕是负增长。第二，谁也没有预料到水灾的影响那么大。这一次水灾，2000亿元没有了，包括人民群众的损失，也包括铁路、公路、电信损失等等。长江封航一个多月，这对生产都产生了很大影响。所以经济增长速度达不到预定的目标，是可以理解的。相反的，要勉强地搞到8％呢，那是很不明智的。国外舆论说，由于中国要确保8％的经济增长速度，因此改革就停

顿了，这个说法是不正确、不符合事实的，我们的改革是按预期的目标进行，没有停顿。

三个到位，第一个是国有企业的改革，三年要脱困；第二个是金融改革，三年要完成；第三个是国家机关的精简改革，也是三年要完成。五项改革，讲的是粮食流通体制改革、住房制度改革、医疗体制改革、投融资体制改革、财税体制改革。三个到位、五项改革，全部都在按原计划进行。有的进度稍微慢一点，有的进度比预想的还要快一点、还要好一点，总之是没有停顿。

关于国有企业的改革。三年脱困，是讲大多数国有大中型亏损企业用三年左右的时间扭亏为盈。现在过去一年了，总体上讲，国有企业在今年由于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等原因，过去的矛盾进一步深化，效益状况比去年降低了，但是大多数的国有大型企业，特别是大型企业集团，经营的状况并没有恶化得那么厉害。要使企业扭亏为盈，主要是两个问题：一个就是不能再搞重复建设。再搞重复建设，产品没有市场，企业不能生产，它就没办法扭亏。如果大家三年都不上新的加工工业项目，不搞重复建设，我认为情况就会改变，现有的国有企业就可以开足马力生产，扭亏为盈就绝对没有问题。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人多。这一次我们在辽宁考察了不少地方，像有色金属矿、煤矿、大治桥镁矿、杨家杖子钼矿等，资源枯竭，产品也没有市场，但是几十万人还在那里养着，每年亏损的钱都差不多够一次性地安置这些工人了。所以这一次在辽宁，我把张吾乐①、张宝明②同志都叫去了，我们采取了大胆的举措，决定把本溪、抚顺的煤矿全关了，把辽宁的全部有色金属矿，除了一个铜矿外，也全部关闭，把人都安置就是了，这花不了多少钱，不然每年的亏损是不得了的。所以减人增效也是一个重要措施，不减人企业扭不了亏，但要减人必须安置好。这项工作，在今年党中央、国务院召开全国再就业工作会议以后有很大的进展，去年年底有1000多万下岗职工，根据现在的调查，到今年10月底，99%的下岗职工都进了再就业服务中心，都拿到了基本生活费。我不敢说这个数字有那么准确，起码下岗职工90%以上进了再就业服务中心，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成绩。国有企业改革还有许多举措，如压缩棉纺锭、企业搞股份制等，可见，国有企业改革正在推进。我仍然相信，三年大多数国有大中型亏损企业基本摆脱困境没有问题。

① 张吾乐，当时任国家有色金属局局长。

② 张宝明，当时任国家煤炭工业局(国家煤矿安全局)局长。

关于金融改革，外国舆论说我们为了保8%的经济增长速度，银行扩大向企业贷款，造成了大量的不良贷款，这个说法是不确实的。有一个时期大家批评银行惜贷，我一再解释，不是银行惜贷，这是银行改革的必然结果。银行应该有它的自主权，它要自负盈亏，不能随便给你贷款，不存在惜贷的问题。现在看起来，银行对不良贷款的控制比过去还是有进步的。我们提倡银行要改善为当地国民经济发展服务的态度，但不能强迫它贷款。我们讲要确保8%，从来都强调要追求一个有效益的速度，不能生产积压产品。

关于中央国家机关的改革，比我们预料的要好得多。国务院机关3.3万人，现在减下来了1.6万人，“三定”方案都已经批准了，新的机构已经开始工作。1.6万人已经分流，大部分人已经得到了安置，一部分人还在学习，一部分人按照国家有关政策提前离退休。由于各部门的思想政治工作做得比较好，保证了这项工作的顺利进行。

关于地方政府机构改革，最近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政治局会议都讨论通过了一个方案，有关文件即将下达。中央对地方政府的机构改革，只提了一个原则性要求：一是省、自治区、直辖市这一级的政府，部门设置基本上要跟中央对口，不然很难保证政令的畅通、上情的下达；第二，希望省、自治区、直辖市这一级政府机关的人数，逐步分期地减少一半左右。对于地市县乡这一级，我们没有提出要求，由各省区市自己来决定。

关于五项改革，我就不一一讲了，有的已经实行了，比方说粮食流通体制改革、住房制度改革、医疗制度改革，都开了不止一次的会议，都已经布置了，也已经有了文件、政策，正在开展。投融资体制改革，因为事关重大，还要经过进一步的慎重讨论。另一个是财税制度改革，主要是“费改税”，这个事情也是影响很大，几百种的费加在人民群众身上。我们想把公路的“费改税”作为一个突破口，这个事情李岚清同志主持研究了很多次，原来想在明年1月1日实行的，最后还是因为有不同的意见，现在看实行不了。但是我们还想积极推进这项改革。还有一个问题，现在农民负担这么重，确实是与收费太多有很大

的关系，而且“乡统筹、村提留”由干部直接去收，也影响干群关系。所以，如果能把“乡统筹、村提留”纳入税收的轨道，不要让干部直接去收，就可以大大改善干群关系，减轻农民的负担。当然，不许收“乡统筹、村提留”，其他上百种的费当然也都不许收，就加在农业税里了。这项改革有很多省很感兴趣，也觉得是当务之急，我们希望明年有几个省能够率先进行试点，创造一些经验。这个政策如果能搞好，那农民恐怕是要拍手称快啊，而且也极大地有利于廉政建设和改善干群关系。总之，改革和发展基本上实现了预定的目标。

二、明年经济工作的总体要求和宏观调控预期目标

我认为明年经济工作有很多有利的条件，特别是政治方面的条件，都比今年好。但是从国际的宏观环境来看，要比今年坏。也有人预言世界经济会出现严重的衰退。我觉得我们还是从坏的方面多估计一点比较好。在这种形势下，我们特别要坚持人民币不贬值的政策。为什么不贬值？首先还是为了我们自己的利益。你贬值无非是为了增加出口嘛，但事实上不一定能增加。我们固然要重视跟东南亚国家的贸易关系，但东南亚国家现在这样的情况，我们的商品实际上是出不去的。我们现在对欧洲和美国的顺差很大，你再想增加出口，他们就会采取各种办法反倾销，所以对欧洲、美国的贸易也不会有很大的增长，贬值是没有什么用的或者用处不是很大。但是如果贬值，人们对人民币的信心马上就会动摇，国外舆论马上就说中国要垮了。所以，无论如何我们要做到明年人民币不贬值，外汇储备要保住1400亿美元不能动摇。我们对明年的国际环境要作充分的估计，明年的外贸出口估计也可能会大幅度下降，今年是零增长，明年肯定是负增长，但希望降幅不要太大，如果太大，国内需求还是像现在这样不振的话，7%的增长速度也达不到。我反复地强调，现在定7%左右的经济增长目标，不是一个指令性指标，这个速度是根据好多因素算出来的，只是一个指导性或者预测性的指标。7%明年也要少说为佳，反正主要是要效益嘛，不是要速度。关键在于税收增加了多少，利润增加了多少，质量提高了没有，品种有没有增加，存货是不是减少了。但是，如果不达到7%也有很多困难，江泽民同志上午也讲了，少一个百分点，就少安排80万到100万人的就业。如果没有一定的速度，那现在这些下岗

分流的职工的收入就难以增加，消费需求也就上不去，而且会造成社会的不稳定。所以，7%的增长速度，不希望勉强，但是能达到最好。

三、要继续扩大内需和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

没有需求就没法生产，也就没有7%的增长速度。怎么扩大需求呢？我们现在已经有了一点经验了，就是要通过扩大基本建设来扩大生产需求，最后间接地扩大消费需求。这个政策是行之有效的，今年已经产生了效果，但看起来今年力度还是不够，明年还得继续扩大这个需求。扩大需求光靠银行贷款是不行的，目前工业生产能力都是供过于求，已经找不到符合贷款条件的工业项目了。因此，只能从扩大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着手。扩大基础设施建设，它的回报率比工业项目更低，那就必须财政拿钱，搞比较长期的贷款，即采取财政部向商业银行发债券的方式，发行八年、十年的长期债券。所以明年还要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

明年主要有几个特殊情况：一是今年已经把基础设施建设的摊子铺开了，光靠今年这1000亿元国债和1000亿元贷款是不够的，特别是因为今年水灾大，水毁工程非常严重，现在谁也不能保证明年的汛期不会发生像今年这样大的洪水，所以必须赶在明年汛期到来之前，修复这些水毁工程，加固长江、黄河以及其他大江大河的堤防。除今年1000亿元的债券中相当大的部分是投在这方面之外，明年至少还要投入300亿元。二是明年军队不再经商要补偿；科技、教育经费要按法定的比例增加；还有再就业工程需要补助等等，明年中央财政支出比今年预计数增加1416亿元，中央财政平衡缺口要达到1833亿元。因此，中央决定明年继续发行1400亿元国债，如果不够，可能还要追加。那么，这有没有危险呢？我们知道，谁都不愿意搞赤字财政，因为你老用这个手段的话，它的前途意味着带来通货膨胀。因此我们一再地讲，我们长期的财政政策还是适度从紧，没有改变这个提法。现在我们处在一个特殊时刻：遭受到世界性金融危机，全世界都是生产过剩。在这种情况下，你不搞基础设施建设没有别的办法，搞基础设施建设，财政不拿钱搞不了啊。财政没钱只好向老百姓借。那么有没有通货膨胀的可能呢？我认为这种可能性极小，因为经过这几年的宏观调控，我们的国力大大地增强了。首先是农业政策的成功，农民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了，粮食多了。粮食不涨价，与此相关的物价，大概占

整个物价指数的近60%，就涨不起来，剩下的占40%到50%的消费品也都是供过于求的。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通货膨胀、物价高涨的条件并不存在。据测算，明年财政赤字和累计国债余额占当年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分别为14%和10.9%，明显低于国际公认的和60%的警戒线，是可以承受的。



1998年11月，朱镕基在辽宁省大连市考察第三粮库。前排左一为国家计委副主任王春正，左二为辽宁省委书记闻震世，左四为国家粮食储备局局长高铁生。

当然，银行的钱并不是不能用，也可以用，比方说，今天江泽民同志也特别强调了城乡电网的改造，特别是农村电网改造，这是一件大事情。现在我们只喊打开农村市场，怎么打开？人家买了电冰箱、洗衣机就是放在那儿当摆设，它没电啊！即使有电，电价也是1度3元、4元、5元甚至于6元，谁用得起啊？城市电价才4角7分啊。所以要打开农村市场，首先要改造农村电网，把电送过去。中央下定决心花1400亿元用三年时间完成农村电网改造。但是我们有一个条件，首先必须抓改革，电网建成以后，电价要降下来，城乡电网同价。这个意义都是非常重大的，不采取这些措施，没有需求，企业没法生产。当然，也不能完全靠生产的需求，因为生产需求毕竟还是个间接的需求，它到直接的消费需求还要拐个弯。所以还要采取一些政策措施，来扩大人民群众的消费意愿和消费需求。总之，要从生产和消费两个方面扩大需求，这样才能够保证有一个比较快的速度，缓解我们的困难。我们在财政赤字方面一定会非常地谨慎，发行的债券主要是投入基础设施建设，不能把它当成财政的经常费用去开支。基础设施建设到一定的程度，到工业复苏、供求平衡的时候，就可以停止发行国债了。

四、全面发展农业和农村经济

关于农业和农村经济问题，党的十五届三中全会已经有一个很全面的文件，总结了我们多年的经验，我不再重复了。我想讲两个问题：一是必须调整农业结构。现在粮食多了，棉花多了，烟叶也多了，其他农产品也都多了。所以一定要减少南方早籼稻的生产，北方的春小麦、玉米也不能再增加那么多了，要调整种植面积。我们粮食的价格已远远超过了国际市场的价格了，因此，一定要调整农业种植结构，无论如何要考虑向品种优良、市场畅销的方向发展，多了的东西不能再鼓励它搞下去。二是水利建设。我只想强调一点，这是百年大计，一定要保证质量。特别是新修的、重修的堤防，一定要保证质量。中央把基础设施建设放到很重要的地位，我们希望地方也要这样做，不要再花冤枉钱搞什么工业项目了。最近我们发现，水灾地区老百姓房子的重建、退田还湖、移民建镇等，讲好了中央补助建房材料费，基

础设施建设由地方拿钱，但现在有些地方没有按这个“君子协定”拿出基础设施建设的钱，而是从中央补助里扣出一部分钱去搞基础设施建设，那农民的负担就更重了。我讲这个问题就是说，水利建设、水毁工程的建设，牵涉到农村的稳定，地方要把它当做一个很大的事情来办，要舍得花这个钱。

小城镇的建设，我们一直要求建设部加强规划力量。特别是在水灾地区要趁此良机，把小城镇规划好、建设好。不要搞得农村像城市、城市像农村。

五、切实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

现在最大的风险是金融风险。当前不良贷款比例的上升使人害怕，而且逐月增加。这个原因很简单，因为过去许多欠银行的账都变成呆账了，但还没有把它冲销掉，发生的利息还得计算在账面上，都变成不良贷款，越滚越大。现在不良贷款的比例是多少呢？戴相龙①同志今天给了我一个数：四个国家银行，1997年年底不良贷款比例为28.66%，到今年9月份上升到31.38%。当然不良贷款跟呆账、死账还是有区别的，现在这四个银行呆账、死账的比例约占7%到8%。按数量来分，不良贷款最多的是广东省，占全国不良贷款总数的15%；第二名是辽宁，占全国不良贷款总数的7%。按不良贷款比例的高低来排，海南省名列榜首，不良贷款比例是54.28%，一半以上是不良贷款；我的老家湖南也不落后，第二，49.63%；广西第三，46.86%；黑龙江第四，43.44%；湖北第五，42.86%；以下是贵州41.52%、辽宁40.6%、广东40.23%。今年1到9月份比例上升最快的是谁呢？是广东、广西、海南。我希望大家要注意一下，不要再干预金融机构的经营了。现在国家银行的不良贷款比例这么高，将来都收不回来，怎么得了？！更可怕的是地方金融机构，它的不良贷款比例更高。最近，经中央同意，关闭了广东国际信托投资公司。不关不行啊！原来说是到期不能支付的债务为18亿美元，后来变成了19亿美元，再过两天变成24亿美元，现在还没有搞清楚究竟有多少美元债务。宣布关闭广国投以后，震动很大，但主要的反应是正面的，都认为这显示了中国政府整顿金融秩序的决心。如果没有这一招，全国200多个国际信托投资公司，金融风险很大，不趁这个机会好好整顿一下，不得了。所以无论如何要整顿金融秩序，防止金融风险扩大。

① 戴相龙，当时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

去年中央决定成立金融工委，加强金融行业党的领导，主要就是为了保证国家银行有一个能够自主经营的环境。今年我们搞改革，把30个人民银行分行缩并成为9个地区性的分行，也是为了加强监管力度，希望同志们能够谅解和理解中央的政策措施。最近我们准备要举办省区市党委书记和省长(主席、市长)的金融培训班，因为我们举办过党委副书记和副省长(副主席、副市长)的金融培训班，效果很好。现在举办主要领导的金融培训班，是因为我们许多领导同志没有做过金融工作，如果再不去了解这个工作，我们会犯很大的错误，后果难以挽回。最近我们发现一些地方，把过去的城市合作银行改成商业银行后，市委书记、市长就发文件命令大型企业都把存款存到市里的商业银行里去，结果大家都从国家银行里把存款提出来，存到市里的商业银行去。特别是有一个城市，不是城市商业银行可以实行股份制吗？它就拉了一个电力公司去入股，电力公司一入股就要求把所有电力企业的存款都抽出来存到这个商业银行里去。这个怎么行呢？这样搞会发生金融危机的啊！用政府行为来干预企业和银行的行为是不行的！必须按照既定的法律来开展工作。所以，领导干部还是要学习一点金融知识。

六、千方百计地扩大出口，有效地利用外资

我们一方面要扩大内需，同时还要千方百计扩大出口。对欧洲、美国增加出口有一定的困难，因为它们采取很多反倾销的办法，因此，就要求我们出口的结构要多元化。发展中国家，偏远的地方，穷的地方，只要它们有外汇，我们就得想办法去出口。另外，我觉得我们扩大出口也不能单纯地靠出口商品。前不久摩洛哥首相来中国访问，跟我谈要我们买它的磷酸盐、磷铵。但是它的磷铵、磷矿价格贵得要死，我们受不了啊！因此我就向他提议，说我到你那儿去办厂，我们中国就是靠“三来一补”①起家的，对我们有很大的好处，我到你那儿去搞“三来一补”，你需要什么消费品，我们把生产设备运去，在你那边生产，可以扩大你的就业，你还可以顶替进口，节省了外汇，甚至于还可以把加工的产品出口到其他国家去。我们要提倡搞加工贸易“走出

去”，因为我们的发展阶段已经超过了一些发展中的国家，我们出设备，对方出土地，搞合资经营，这个路子行得通。

---

① “三来一补”，指来料加工、来样加工、来件装配和补偿贸易。

关于利用外资，我强调一点就是有效地利用外资，不能再引进多余的生产能力搞重复建设。现在外国人向我们积极推销他们的剩余产品，全世界过剩的东西，他们到这儿来搞合资经营，就是想占领我们的市场。因此，无论如何要提高警惕，一定要研究市场，要有全局观念，不要只考虑局部利益。不要你一搞合资，生产的产品占领了市场，结果就把别的省的国有企业挤垮了。所以现在引进外资，如果不是真正带来新技术、新品种，就不要再搞合资经营了，没有什么好处。

最后，关于积极实施科教兴国的战略。我想强调一点，就是一方面，企业要更加重视技术开发，不要单纯地搞扩大生产能力，要把钱花在技术开发上面，同时延揽人才，跟科研、教育机构能够密切地结合。只有当我们做到了这一点，中国的工业才能够翻身。另一方面，我们也要重视基础科学的研究。最近李政道①先生来了，对我们有意见，说邓小平同志对高能物理研究都很重视，我们现在不够重视，钱给得太少。我看，我们的基础科学研究确实应该加强。

---

① 李政道，美籍华人物理学家，在1957年与杨振宁共同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

总之，明年改革、发展和稳定的任务十分繁重，我们要振奋精神，同心协力，把明年的经济工作做得更好。

审计工作任重道远

(1998年12月15日)

这是朱镕基同志在听取审计署工作汇报时的讲话。

今年以来，审计署和地方各级审计机关做了大量工作，成绩明显，效果不错。在这里，我向全国审计工作者表示亲切的问候。

审计工作很重要。当前，我国经济领域中造假和犯罪的情况比较严重。由于缺乏法制的制约，有些方面甚至比资本主义社会更严重。现在这种状况，如任其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建不成的。必须加强国家审计和会计监督，这是个历史性的任务。这件事情现在讲得还是不够。不仅要实行国家审计监督，还要发挥社会中介组织的监督作用。资本主义国家就是靠这个制度，利用会计师事务所和律师事务所等社会中介组织帮助国家监督的。而我们有些社会中介组织却帮助犯罪分子造假，这怎么行呢?

一、全面审计，突出重点

国家审计的对象究竟应该是什么?凡使用国家财政拨款的，都在审计监督范围之内，都得审计，就是要全面审计。只要使用国家的钱，就不能逃脱审计的监督。对所有花国家钱的单位，都要盯住。包括地方财政的钱也是国家的，不能放过任何一个。全面进行审计，又要突出重点，就是要重点抓问题最多、金额最大的案件。为了推动国民经济快速发展，目前国家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特别是水利建设方面，投入了大量的财政资金。这些资金不是银行的钱，银行监督不了；国家计委也想监督，但是不容易监督。因此，只能靠审计来监督，这是一个最大的重点，你们审计要跟上。你们对水利建设资金的审计，反映的问题很重要，你们的审计报告要改写成一个通报，通报全国，登报公布。通报和登报，都不要泛泛地说挪用了水利建设资金多少亿元，要点名是哪个省、什么项目，这样才会有威慑力量。宣传工作强调以正面宣传为主，这是没错的，但舆论监督也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在政治上不允许搞自由化，但在经济上应该是公

开的、透明的，这样才有利于监督，犯罪分子才惧怕，这里绝不存在什么给社会主义制度抹黑的问题。其实有些事情你不讲，老百姓也知道，所以我是从来主张登报的，否则，犯罪分子根本不怕。如果审计完了，仅在内部通报一下挪用了多少钱，下次要注意，一句话了结了，不撤职、不抓人、不坐牢，有的人甚至照样易地做官，这怎么能纠正？对电力建设基金的审计情况，也要发通报。对社会保障基金的审计很重要，这个基金很大一部分是国家财政拿的钱，这是保命钱，挪用是绝对不行的，审计结果必须通报。证券公司花的虽然不是国家财政的钱，但为了保护群众利益，维护社会稳定，审计部门也应该协助中国证监会进行监督。粮食企业，说是用银行的钱，实际上是财政的钱，数量很大，要继续进行审计。对国有企业的审计，今后要同实行稽察特派员制度结合起来。国务院实行稽察特派员制度就是为了查账，就是审计。审计部门可以提供一些线索，参与一些重大案件的查处。对国有企业，审计部门是可以监督的，因为它是国有资产嘛；对重点企业可以采取抽查的方法，不要搞过去那种全面审计。稽察特派员制度刚建立，审计部门怎么同稽察特派员配合，现在还没有经验。审计部门可以根据举报，重点抽查几个企业，抽查以后把线索提供给稽察特派员，让他们去查。这样，你们的重点就比较明确了，就是要集中精力对有国家财政拨款的，特别是有大量拨款的项目进行审计。

二、点面结合，突出大案要案

审计结果要有总体概念，但更重要的是要查处几个大案要案。只有查处几个大案，严惩一些人，才会起威慑作用。如果只是泛泛讲些概念，即使通报全国，也不会有多大威慑力。毛主席讲过，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你审计了“十个指头”，但对问题一个也不处理，不如抓住要害问题，严肃处理，砍他“一个指头”，审计都要采取这个办法。比如说粮食审计，查出挪用多少收购资金，这些数字是必要的，但最主要的是查出几个大案要案来，一查到底，在报纸上公开披露，引起震动。这样，审计工作才有成绩，审计署的牌子才亮，犯罪分子才会闻风丧胆。

三、执法必严，违法必究

现在社会上讲情风和姑息、包庇现象非常严重。我们无论做什么工作，要想作出一些成绩，都要跳出人情网，站在国家利益的立场上，依法办事，这样国家才有希望。你们什么人也不要怕，这一点非常重要，没有这点精神，那是绝对不行的。你们讲对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贷款项目的审计受到干扰，这一点不能让步，否则是要砸牌子的。你们干你们的，谁也不要怕。审计部门要站在国家和法律的立场上，如实对外公布和报告，谁干预就处理谁，不管是省长还是省委书记，包括我在内，谁违法就得下台。我经常讲，要少吃吃喝喝，多长点骨头，少长点脂肪。审计部门更要有硬骨头。

地方审计部门在业务上要听审计署的。地方审计不真实、不合法的，审计署要纠正。对其中的大案要案，审计署要直接介入，直接处理。

四、加强机关内部建设

审计部门要把机关内部建设抓好，坚持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领导干部要公正廉明，审计人员要公正廉洁。东方锅炉集团的案件，涉及很多部门的领导和干部。你收了人家的股票，“吃人家的嘴短，拿人家的手软”，怎么能下得了手呢？要提倡公正廉洁，做到邪不压正。你们现在人比较少，这没有关系，关键是要提高素质，加强培训，学历不够的可以轮流去学习。同时，要提高办事效率，少扯皮。

五、加强对会计师事务所业务质量的监督

我对会计师事务所当然也包括审计事务所的工作是不满意的，要下决心进行整顿。事务所不整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没希望。审计部门要加强监督。你们只管监督，只管挑毛病，不要参与管理。既要有经常性的监督，又可以去突击抽查。对造假账的要大胆地揭露，查出问题向国务院报告，吊销执照，永远不准他再从事事务所工作。我想，如果有条件，要鼓励财政部、审计署机关里懂业务、政治素质好、比较廉洁的年轻干部、司局长和一些副部长，再吸收一些从国外回来的留学生，办一批真正有信用、比较公正、有一定知名度的事务所。

海南要保持青山绿水

(1998年12月19日)

1998年12月18日至22日，朱镕基同志在海南省考察工作，先后考察了三亚、海口等地。这是朱镕基同志与中共海南省委书记杜青林、海南省省长汪啸风谈话的主要部分。

海南发展经济，我认为首先是发展农业，海南发展农业很有前途。海南是个宝岛，保护生态环境太重要了，不能上有污染的项目。海南就应该是青山绿水，红砖绿瓦。全世界的工业都过剩，全世界争夺的就是市场，海南不要再搞一般性的工业了，要搞好农业，搞好旅游业。

洋浦就是要搞几个像样的好项目，上无污染、高附加值的高新技术项目。如果能搞成高附加值的加工区，也是一种选择，问题是东南亚的竞争很厉害。如果美国、日本的投资者能到洋浦来办加工项目，然后将产品销售到东南亚，那是最好不过了，但是这很难做到，问题在于现在可搞的项目不多。深圳有高科技企业集团，如华为集团就是有高新技术，有掌握高新技术的人才，所以发展很快。没有人才，怎么能够把高新技术搞起来？海南从长远看，还是要搞高附加值、高技术、无污染的项目。

我没有说过外商投资项目都不上。如果这些外商投资项目不是重复建设，不用我们银行的配套资金，也可以安排。但乙烯不能搞，全世界的乙烯都过剩了，我们绝不能再上乙烯项目。洋浦已经有了纸浆厂项目，还将上面粉加工、光纤光缆等几个项目，要再找几个好一点的项目。石油加工项目的关键是市场问题，没有市场就不应该上。船舶修造项目有污染，不能搞。

海南把电网建设与电力管理体制改革相结合，这很好。电网建设一定要与电力管理体制改革相结合。电网改造一定要抓好，做到同网同价。这是振兴海南的大事。农业的发展要靠电，贫困地区脱贫也要靠电，要让更多的农民能够用上电，能够用上便宜的电。

关于解决企业亏损问题。对有些企业，就是要消灭亏损源。那些没有市场，有污染、又养不了人的企业，怎么能不关门呢？这样的企业关门，利大于弊。



1998年12月19日，朱镕基在海南省三亚市天崖镇上文门村黎族农家考察庭院经济。前排左四为三亚市委书记王富玉；第三排右一为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王忠禹，右二为海南省委书记杜青林。

海南的建设要体现高水平，宁可慢一点，也不要搞乱了。政府不要把主要精力放在搞工业项目上，不要再去搞重复建设的工业，不要再去抓没有市场的项目。政府要抓的是改善投资环境，吸引投资者来投资，政府收税。海南的基础设施建设一定要抓好。环境搞好了，外国人就来了，人才就来了，千万不要舍本求末。基础设施建设是百年大计，要科学规划。我们现在只剩下海南这个宝岛了，太宝贵了。这个地方很特殊，是非常宝贵的地方，你们要把宝岛建设好。

像三亚这样的城市不能自己管规划，城市规划不拿到省里管是不行的。对三亚的城市建设，我就担心乱盖房子。这么好的气候，这么好

的条件，这么好的环境，不管好规划怎么行？城市规划，省政府一定要管好，而且要强化监督；市政府主要是执行规划。省政府要更加关注全省的基础设施建设，什么地方建港口，什么地方修公路，对整体规划省长要心中有数。我有一句忠告请记住：不能把城市建设得像农村，也不能把农村搞得像城市。

确保三峡工程建设质量，妥善安置三峡移民

(1998年12月30日)

1998年12月28日至30日，朱镕基同志考察三峡工程和三峡库区，并先后考察了重庆、宜昌等地。这是朱镕基同志在三峡库区听取湖北省移民工作和坝区建设情况汇报后的讲话。

这次来三峡，主要是考察三峡工程建设质量和库区移民工作，为开好明年的移民工作会议做些准备。三峡工程是具有世界意义的跨世纪特大型工程，是千秋大业，举世瞩目。党中央、国务院十分重视，作过许多决定。我们一定要按照中央的决定和指示，采取有力措施，千方百计，确保工程质量，丝毫不能懈怠。当前，三峡工程建设正处在第二期施工的关键阶段，要认真总结经验，完善政策，妥善安置库区移民，改善生态环境，办好这件千年大计、国运所系的大事。最近，我看了一些关于三峡工程建设的材料；这几天，又实地察看了工程建设质量，了解了库区移民工作情况。下面，我讲几点意见。

一、要十分重视三峡工程建设质量

近几年来，全国工程建设质量总体上是比较好的，但也有一些地区、部门和单位，由于忽视工程建设质量，违反建设程序，执法监督不力，建筑市场混乱，腐败现象严重，发生了一些恶性工程建设质量事故，给国家利益和人民生命财产造成很大损失。对这些问题必须采取强有力的措施，认真加以解决。三峡工程在水电工程方面堪称世界第一大工程，建设的成败在于质量。三峡工程建设，在技术上可以说没有不可克服的困难。只要把质量问题抓住了，三峡工程建设就成功了。“千里之堤，溃于蚁穴”。质量是三峡工程的生命，质量责任重于泰山，任何一点马虎都会遗祸子孙。确保三峡工程建设质量的重要性还在于，如果大坝出了质量事故就难以挽救。因为大坝用混凝土浇筑，外边什么也看不见，如果出现很多空洞，形成“豆腐渣工程”，又没及时发现，就会埋下隐患，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因此，一定要高度重视建设质量问题。目前，正在进行的第二期工程施工是非常重要的阶

段。每一个参加三峡建设的人，都要有历史责任感，以对国家、对人民、对子孙后代高度负责的精神，牢固树立“质量第一”的思想，确保三峡工程的一流质量。要从设计质量、设备质量、原材料质量以及施工质量等各个环节，实行全方位、全过程的有效控制。每一个工程环节，都要充分准备，精心组织，精心施工，严格监督，一个螺丝钉也不放过，务必做到万无一失，不留隐患。

为了确保三峡工程的建设质量，必须认真实行项目法人制、工程招投标制、工程监理制与合同管理制，把工程建设质量管理纳入规范化、制度化、法律化的轨道。

第一，建设项目法人单位要加强责任心，要负全责。三峡工程开发总公司是三峡工程项目的法人单位。中央把这个工程交给你们，由你们负责工程的筹划和建设。你们的责任重大，要对党中央负责，对国务院负责，对历史负责，对子孙后代负责，确保工程建设质量和工期。一是总公司的各级领导干部要有高度的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要从讲政治、顾大局的高度，切实负起责任，做好三峡建设的各项工作。尤其对工程建设质量，要百倍小心、千倍注意、毫不放松。二是要不断提高建设队伍的整体素质。工程建设质量取决于建设队伍的素质。要加强对职工队伍的教育和培训，加强政治和技术学习，为三峡工程的一流建设质量提供可靠的组织和人才保证。三是要加强对施工单位、监理单位以及其他参加工程建设单位的检查和管理。对于监理单位，如果违反规定、弄虚作假、徇私舞弊，要严肃查处；情节严重、触犯刑律的，要绳之以法。对于其他相关单位也要加强监督，防止发生腐败案件。四是要严把设备、建材质量关。供应三峡工程的建材应是我国最好的，三峡工程需要的设备也应是最好的。如果哪个单位在工程建设上弄虚作假，造成重大质量事故，就依法严厉惩处那个单位的责任人。工程建设质量直接关系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啊！今年保荆江沿江大堤，就是保洪湖地区100多万人的生命财产、江汉平原800多万人的生命财产。三峡大坝如果出现质量事故，后果不堪设想。所以，参加三峡工程建设的每一个单位、每一个人，哪怕只做了一个螺丝钉，也要对国家、对民族负责，这是你们的责任、你们的光荣。把三峡工程建设好，不仅是中国综合技术、管理水平的反映，也是世界综合技术水平在某种程度上的反映。三峡工程使用的设备是采取国

际招标办法在全世界选购的，不敢说是世界上最好的，至少也是比较好的。



1998年12月29日，朱镕基在三峡工程施工现场看望技术人员。右一为中国长江三峡工程开发总公司总经理陆佑楣。

第二，要强化工程建设监理。要选择资质合格、认真负责、严格执法的监理公司，对工程的建设质量、进度进行不讲情面的全面监督和检查。对于工程的某些关键部位，可以聘请国际知名度高、有信誉、有经验的监理公司来参与工程的监理。他们的经验比我们丰富，责任心强，不讲情面。当然，主要是培养我们自己的监理队伍，依靠我们自己的力量，加强质量监督工作。工程监理要忠于职守，认真履行职责，切实对工程项目负责。必须实行旁站制①，对工程的每一个环节都要进行监督，哪一个环节都不能放松。要制定严格的规程，实现法制化、规范化，确保工程万无一失。我是工程监理部门的后盾，你们有什么问题，可以直接给我写信。我相信，外国人能做到的，我们只要认真做，也能做到。

① 旁站制，指在关键部位或关键工序施工过程中，由监理人员在现场守候，监督施工操作。

第三，要坚持招投标制度，按合同办事。现在，国家已经明确规定，建设项目的勘察设计、施工和主要设备、材料的采购都要实行公开招标，确需采取邀请招标和议标形式的，要经过项目主管部门或主管地方政府批准。招标、投标活动要严格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进行，体现公开、公平、公正和择优、诚信的原则。对未按规定进行公开招标、未经批准擅自采取邀请招标和议标形式的，有关地方和部门不得批准开工。工程监理单位也应通过竞争，择优确定。三峡工程必须严格按照国家招投标的规定去做，绝不能搞假招投标。去年年底，云南昆禄公路出了问题，就是为了照顾地方利益，搞假招标，让根本没有二级以上公路施工经验的队伍“中标”，搞成了“豆腐渣工程”。今后，如果查出哪个地方的工程有这样的问题，一律停止拨款，也不再审批这个地区的项目，并且给它曝光。绝不能把全国纳税人的钱当做“唐僧肉”糟蹋掉，那样，我们对不起国家，对不起人民。

必须实行合同管理制。建设工程的勘察设计、施工、设备材料采购和工程监理，要依法订立合同。各类合同都要有明确的质量要求、履约担保和违约处罚条款，违约方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经济责任。此外，要继续搞好科研攻关和试验，依靠科技努力提高工程建设质量。

二、做好库区移民工作，是关系三峡工程建设进展的关键

几年来，库区移民工作认真贯彻中央关于资金和任务“双包干”的原则，取得很大成绩，也积累了一些经验，顺利完成了第一期移民任务，保证了大江截流如期实现。从1998年到2003年，是实施第二期移民的攻坚阶段，要完成55万移民的搬迁安置，确保2003年三峡工程如期蓄水、发电、通航，时间很紧，任务更加繁重艰巨。要坚定信心，加强领导，拓宽思路，完善措施，确保移民目标的实现。

要完成库区农村40.5万人的移民任务，究竟采取什么方式安置？如何开拓他们的生路？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既创造了很多成功的经验，也有很多的教训和不足之处。三峡库区人多地少的矛盾较为突出。库区移民要避免造成新的水土流失，还长江两岸的青山绿水。要采取有

效措施，使农村移民在搬迁后不降低生产、生活水平，并能有逐步致富的门路。一句话，就是要使农村移民搬得出，稳得住，能致富。因此，今后我们要坚持多种方式安置农村移民的方针，因地制宜，把本地安置与异地安置、集中安置与分散安置、政府安置与自找门路结合起来。特别是要制定鼓励外迁的政策。外迁首先最好是在本省、本市解决，鼓励农民自己去投亲靠友。当然，政府要通过宏观调控来管理。对到外地投亲靠友的移民，当地政府应当予以积极接纳；对集体搬迁到区外、省外的移民，有关地区政府应当热情欢迎，协助定居、开发，而不应层层收费。集体外迁要有组织、有计划地进行，不能形成盲流，那将会引起社会治安问题。接收地政府要支持这件事，这叫“带资移民”，带着资金来的，任何一个地方都应当欢迎。把部分移民迁到新疆、黑龙江等地去安置，这是一条门路，但要慎重考虑，周密安排，不能强迫。我讲要鼓励外迁，不是不重视就近移民，农村移民中恐怕大多数还是要就近安置，熟人熟土，容易接受。但是，有一个大前提，就是不能再破坏环境、破坏山林、破坏水土保持。国家对库区投入了一笔钱，用于修公路、植树造林、搞基础设施建设、护坡护岸。搞这些工程，可以保护环境，也可以大量吸引农村劳动力，就近安置一部分移民。库区各级政府要从这些方面多想办法，多开辟些门路，既把移民安置好，又不破坏生态环境。

三、城镇搬迁建设要合理规划，量力而行，分步实施

新城镇建设不能突破规划，随意扩大规模。按照水利部长江水利委员会编制的湖北省、重庆市政府批准的移民迁建规划，新县城规模平均扩大2.4倍。按这个规模建设，也要分步实施，逐步到位。但是，有的地方并没有按照移民迁建规划建设新县城，而是按自己定的实施规划把新县城规模扩大到老县城规模的4倍或5倍。新县城规划规模本来就已经相当宽余，实际操作中又随意扩大，这要犯历史性的错误。对这种情况要坚决纠正。随意扩大新县城面积，不仅财力难以承受，而且势必破坏长江两岸生态环境，贻害无穷。按照有关规定，25度以上坡地不许开垦，不许毁林开荒，已经开垦的要有计划、有步骤地退耕还林；25度以下的坡耕地要改造成避免水土流失的高标准梯田。这样，库区余下可用于城镇建设的土地没有多少了，还有多少地方有条件去扩大新城镇规模呢？如果不从实际出发，贪大求全，随意扩大新

城镇规模，就要多占耕地，就要挖山毁林，破坏植被，造成水土流失。为此，我再次强调，库区移民搬迁建设必须合理规划，量力而行，绝不能脱离库区实际，不顾自身的财力、物力，盲目提高标准，乱铺建设摊子。库区各级政府要把这项工作作为一项重点工作来抓。对新城镇建设规划超规模、超标准的，必须坚决予以纠正；即使是符合规划的建设，也要分步实施，逐年到位，不能急于求成，不能企图把多少年以后的事情一下子都办完。



1998年12月30日，朱镕基在湖北省秭归新县城银杏沱移民新村考察，与移民户交谈。

农村的移民建房，要由农民按自己的经济实力自主决定。政府要周密规划，但不得强令农民按统一标准建房，不许强行规定房子的层数和外观。可以划定农村居民点的区域，可以有一个全局规划，划定每家在哪里盖，不准乱盖。不要引导农民把移民资金完全用在建房上，而要引导他们去发展生产。

三峡库区的新城镇建设和各项移民工程建设，一定要切实搞好地质环境的调查评估，加强工程地质勘察工作，预防各类地质灾害发生。要妥善处理移民建设与环境保护的关系，努力实现库区经济建设、移民安置、生态环境建设的协调发展，为中华民族留下青山绿水，把库区建设成经济繁荣、环境优美、人民安居乐业的新型经济区。

四、库区企业不能搞原样搬迁，要与经济结构和企业结构调整紧密结合

三峡水库淹没区内的工矿企业搬迁，要下决心淘汰那些产品落后、设备陈旧、污染环境、破坏资源、资不抵债的企业，不能搞原样搬迁。不然，又会形成新的亏损源、污染源。同时，考虑到全国工业产品生产能力供过于求的情况，除生产名特优产品和确有竞争力产品的企业外，一般不再搬迁、重建。

三峡工程建设为库区工业结构调整提供了难得的机遇。要抓住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着力调整经济结构，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提高整体经济效益。库区有好的企业，但不多，绝大部分产品老化，技术落后，管理薄弱，亏损严重，是国家的包袱，应当关停并转。如果不抓住这个机遇进行调整，还是把小水泥厂、小化工厂、小纸厂等原样搬过去重建，就会继续污染环境，破坏资源，对国家没有好处。库区各级政府一定要把工矿企业搬迁与经济结构、企业组织结构调整结合起来。趁库区搬迁这个机会，关掉一批“五小”企业①。这样，才能避免重复建设，使库区经济结构更加合理，才能不再往长江排放工业废水，有效保护库区生态环境，促进库区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

① “五小”企业，指技术落后、浪费资源、产品质量低劣、污染环境、不符合安全生产条件的小炼油厂、小火电厂、小钢铁厂、小玻璃厂、小水泥厂。

当前，全国的市场是买方市场，供大于求，大多数工业产品都过剩。国务院已经不再批新的工业建设项目。全国的文章要做在经济结构调整上面，库区更应如此。这是唯一的出路。国家在三峡库区有大量的资金投入，如果不把工作重点放在调整结构上，库区企业还搞原样搬迁，马上就要背上新的亏损包袱，那是对国家、对人民、对子孙

后代不负责的态度，是不允许的。这个问题要引起各级政府的高度重视。

五、进一步加强对三峡工程建设资金和移民资金的监管

三峡工程建设资金和移民资金来之不易，每分钱都要用在工程建设上，用在移民上，绝不能层层挪用或侵吞。对这些资金的使用，一定要加强监察和审计，提高资金使用效益。国家审计部门、三峡建设委员会的监察局要加大查处力度，层层稽核。要派一批正直的、大公无私的同志不断地去稽核，对稽核出来的问题要严肃处理。要提高透明度，对重大案件要公开曝光。现在个别干部目无党纪国法，腐败行为触目惊心，必须严肃处理。三峡建委移民开发局下属的三峡经济发展总公司已经发生一些腐败案件，一定要严肃、认真处理。今后各级移民开发局不准再办公司，已经办的都要尽快和它们彻底脱钩。三峡建委是政府机构，是三峡工程建设的最高领导机构，要抓规划的实施，抓政策的落实，抓稽核，不能办企业。

要建立严格的稽核制度，使稽核工作制度化、规范化。按照限额包干的原则，加强资金管理，增强资金使用透明度，确保专款专用。相比之下，移民资金使用分散，层次多，比工程建设资金更容易出问题，因此，移民资金的管理工作更要细心、认真。对于移民迁建项目，要严禁层层转包，建设用地严禁转卖，绝不能造成移民资金的变相流失。

水利工程建设要保证质量

(1999年1月7日)

1998年12月30日，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主任盛华仁《关于进一步抓好土工布(土工合成材料)推广应用工作的报告》反映，国家经贸委根据朱镕基同志的“百年大计，质量第一，标准就高不就低”的批示精神，组织有关部门，参照国际标准制定了土工布产品标准和设计施工规范，确定了一批土工布应用示范项目，在示范的基础上尽快全面推广土工布应用。这是朱镕基同志在该报告上的批语。

此件请送汪恕诚①同志阅。

① 汪恕诚，当时任水利部部长。

可由经贸委、水利部共同发布文件，通报各省、市、区负责同志和有关厅、局。推广土工布①一定要符合规范，保证质量，不得强行推广。我现在最担心的是目前开展的大规模水利建设，由于各地的保护主义，施工队伍并未经过资格审查和公开招、投标，而是层层转包给一些农民队伍，搞什么都不能保证质量。我提醒各地领导同志注意，不要只满足于多少万人上堤，只注重堤修得多高，而不管基础工程和防渗处理，结果是“千里之堤，溃于蚁穴”，花了几百亿，换来一堆“豆腐渣”。今年汛期一到，立见分晓，莫谓言之不预。

朱镕基

1.7

① 土工布，是主要用于水利、交通、民航、城建等项目基础工程的一种土工合成村料。

加强对金融工作的领导与监督

(1999年1月8日)

这是朱镕基同志在中共中央举办的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金融研究班上的讲话，曾发表于《金融工作文献选编(1978～2005)》，原标题为《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金融研究班上的讲话》。编入本书时，对部分内容作了删节。

一、关于我国当前金融形势的基本估计

我认为，对我国当前金融的状况，可以概括为两句话：成绩很大，问题不少；风险要足够估计，信心切不可动摇。

不久前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我国去年的经济、金融形势已作出全面的估量和分析，充分肯定了来之不易的成绩。特别是在亚洲金融危机继续蔓延和世界金融市场剧烈动荡中，我国金融运行平稳，巍然不动。金融改革迈出关键性步伐，金融整顿和监管力度加大，金融在支持经济发展和保持社会稳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尽管不少金融机构暴露出了一些问题，但没有出什么大事。可以说，我国金融总体形势是好的。



我们既要充分肯定金融工作的成绩，又要清醒地看到问题相当大。金融领域的风险是我国当前经济运行中的重大隐患，有些金融机构的风险已是一触即发。金融风险的一个重要表现，是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贷款比例不断上升，数字惊人。什么叫不良贷款？现在我国的计算方法与国际上通行的标准有很大出入。我国银行不良贷款包括逾期贷款、呆滞贷款和呆账贷款，主要是以贷款期限来划分的，逾期贷款是指借款合同到期未归还的贷款，呆滞贷款是指逾期满一年及超过一年未归还的贷款(去年修订标准以前是指逾期满两年及超过两年未归还的贷款)，呆账贷款即为损失贷款。而国际上通常是按贷款人的综合还贷能力来划分不良贷款，一般分为五级。如果按照国际上的标准计算，我国银行的不良贷款比例要比现在的数字高得多。由于不良贷款比例高，应收未收利息大量增加，银行收益风险加大，经营面临严重困难。有些政策性银行和城市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比例也很高，而且都呈不断上升趋势。相当多的信托投资公司等非银行金融机构资不抵债，濒临破产；不少城乡信用社等中小金融机构支付出现危机，挤兑风波时有发生；股票期货市场违法违规行为严重，许多证券机构弄虚作假，挪用客户保证金；保险业的风险也不容忽视。金融领域大案要

案不断增加。现在各地群体闹事最多的，就是金融风险事件。尽管我国目前的金融风险是局部性的，还不是系统性和全局性的，但大量的问题确实是触目惊心，需要引起我们高度警觉。

有的同志问，金融领域问题这么严重，为什么不及早采取措施？事实上，从1993年到现在，中央一直非常重视这个问题，并不断采取一系列措施，致力于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维护金融安全。1993年6月，针对某些经济领域过热，造成金融管理失控、秩序严重混乱的问题，中央及时果断地采取深化改革、加强宏观调控的措施。在《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当前经济情况和加强宏观调控的意见》中提出的十六条政策措施，有十二条是直接或间接与解决金融问题相关的。当时我们提出了“约法三章”①，严厉整饬金融秩序，才迅速地刹住了许多地方刮起的房地产热、开发区热和炒股票热这股风。1994年、1995年，中央进一步出台了多项金融改革举措，颁布了一系列重要的金融法律、法规，并实行适度从紧的财政货币政策，运用利率杠杆等手段进行宏观调控，有效地治理了严重的通货膨胀。早在亚洲金融危机发生一年前，中央就明确提出，要认真吸取墨西哥等一些国家金融危机的教训，重视防范和化解我国金融风险。1996年8月，江泽民同志主持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专门听取国务院有关部门关于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的工作汇报，并作了重要指示。1997年2月，中央决定组织力量，深入调查研究和起草文件，抓紧筹备召开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全面部署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工作。在做好充分准备的基础上，党中央、国务院于1997年11月召开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会后下发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金融改革，整顿金融秩序，防范金融风险的通知》，明确提出了解决金融领域问题的主要任务、基本原则和政策措施。在这以后的一年多来，进一步加大了金融改革、整顿的力度，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的工作有步骤地展开。依法处理了一些问题严重的金融机构，查处了一批金融大案要案，严厉惩治金融犯罪分子。近几年，金融系统查处了4万多人，其中开除公职的1.5万人，71个司 局级干部被撤职。总之，为了解决金融领域的问题，我们坚持不懈地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从而使我国得以避免亚洲一些发生金融危机的国家那样的命运。如果不是这样，不但金融系统，而且整个经济社会形势就不可能有今天这样好的局面。当然，金融领域的问题十分复杂，解决起来需要有一个过程，不可能一下子完全解决。

① “约法三章”，指朱镕基同志在1993年7月7日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提出的“约法三章”，见《金融工作“约法三章”》(本书第一卷)。

我国金融领域风险究竟是怎么造成的？其中原因很多，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

首先是历史遗留的问题。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渡中，许多长期积累的深层次矛盾集中反映在金融领域。仅从房地产看，1992年、1993年的房地产热，就造成银行不良贷款几千亿元。目前，全国闲置的商品房多达7000多万平方米，价值在4000亿元左右；光是海南省就闲置1600万平方米，占压银行资金460亿元。原来占用的那些贷款，连本带息，现在要翻一番。同时，建起来的房子质量差、价格高，地理位置也不好，很难处理掉。这些绝大部分已成为银行的呆账、坏账。目前政策性银行的风险也很大。粮棉收购贷款长期被严重挤占挪用，大量的亏损在银行挂账。国家开发银行一个报告反映，煤炭建设项目所形成的不良贷款，不但使煤炭行业陷入困境，也对开发银行的生存和发展构成严重威胁。

二是重复建设。多年来盲目上项目，搞了大量的重复建设，又主要是靠银行贷款，许多企业借银行钱的时候就根本没有想到要还。前些年银行固定资产投资贷款利率在10%以上，什么项目有这么高的回报率？不少项目建成之日就是亏损之时。例如，90年代初期，全国一下子上了十几套小乙烯项目(年产11.5万吨)。小乙烯成本高，产品单一，没有销路。广州小乙烯投资花了80多亿元，投产后一年就得亏损几亿元。重复建设不仅形成了巨额银行不良贷款，也造成大量的重复生产，而靠银行流动资金贷款生产出来的产品没有市场，积压在仓库里，企业亏损又都挂在银行账上。

三是行政干预。一些地方和部门的领导干部，缺乏金融知识，不懂金融法律、法规，随意干预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的正常经营活动，把金融机构贷款当做财政的钱来花。前些年，许多地方搞“现场办公会”、“资金调度会”，往往都是指令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贷款。缺乏市场调查，缺乏科学决策，结果不少贷款都投向了没有市场、没有效益、没有还贷能力的项目，大都是有去无回；甚至还有相当部分资金被用于

盖办公大楼、发奖金和政府行政开支，最后都形成了金融不良资产。广东省恩平市原领导班子肆意干预金融活动，造成80多亿元的金融资产损失，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事例。最近一个时期，一些地方刮起出售国有小企业之风，搞所谓“一卖了之”。名义上卖，实际上是半卖半送，甚至是明卖暗送，许多银行的贷款都被冲掉了。工商银行去年搞了一次检查，发现在企业“改制”中悬空和逃废该行债务有1000多亿元。

四是金融系统腐败现象严重。许多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严重违法违规经营，高息揽储，搞账外经营，谋取小团体甚至是个人私利，造成许多资金收不回来。一些金融从业人员素质不高，以权谋私，内外勾结，营私舞弊，腐化堕落，使大量金融资产流失。对金融系统中的腐败行为，我们虽然一直采取严厉的惩处措施，但这些年金融案件仍屡屡发生。

当前我国金融领域的问题确实比较严重，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的任务也十分艰巨，但信心绝不可动摇。我们完全有条件、有办法、有能力解决所面临的问题。20年来的改革和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经济实力比较雄厚，当前宏观环境比较宽松，重要产品和外汇储备充足，党中央有驾驭复杂局势的能力，我们也积累了一些化解金融风险的经验。正确认识问题所在，也是解决问题的必要条件。充分运用这些有利条件，我们就能够抵御任何风险，战胜任何困难。因此，我们在看到问题和困难的时候，更要看到光明，鼓起勇气，增强信心。当然，从根本上解决金融领域的问题，绝非轻而易举，需要全党、全国上下齐心协力，同舟共济。

二、关于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的主要原则与措施

在讨论中，不少同志提出，这次研究班既要学习金融知识，还要进一步明确解决金融领域问题的办法。这个意见是好的。我们不仅对金融风险要有足够的估计，而且还要明确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的原则，措施也必须具体细致。根据中央的精神和部署，结合大家讨论的意见，解决金融领域问题的主要原则和措施，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 深化改革，标本兼治。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和《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金融改革，整顿金融秩序，防范金融风险的通知》下发以

后，中央立即成立了12个专门小组，分别负责研究制定解决有关金融问题的具体方案和措施。现已下发了14个文件，包括中国人民银行省级机构改革实施方案、国有独资商业银行分支机构改革方案、整顿乱集资乱批设金融机构和乱办金融业务实施方案、整顿银行账外账和违规经营实施方案、清理整顿场外非法股票交易场所和证券交易中心的方案、清理整顿证券经营机构和期货市场的方案、整顿城市合作信用社和清理整顿农村合作基金会的方案等。还有一些实施方案和措施正在制定，例如整顿信托投资公司、金融机构关闭办法等文件，也即将下发。这些文件都是针对当前金融领域存在的突出问题，经过大量调查和反复研究后制定的，充分体现了把深化改革与严格整顿结合起来、把治标和治本结合起来的原则，有关措施也比较具体。现在的关键，是各地区、各部门要认真学习，坚决贯彻，狠抓落实。中央还将根据新的情况和问题，研究制定一些新的办法。

(二) 区别对待，分类处置。要按照市场准入条件和经营状况，依法清理整顿各类金融机构。坚持高标准、严要求，该保留的保留，该合并的合并，该解散的解散，该关闭或破产的要坚决依法关闭或破产。各地方要对存在的问题分类排队，突出重点，有针对性地采取措施。对那些问题十分严重、已经“病入膏肓”的金融机构，想保是保不了的，保的结果只会造成更大的损失，最终无法收拾。因此，必须下大的决心，果断处置。这几年我们有过深刻的教训。例如，处理海南省的金融风险问题，原来发现该省有34个城市信用社资不抵债，纷纷发生挤兑现象，本应及时采取关闭措施。可当时怕出事，心太软，就让海南发展银行去兼并这些信用社，后来发现，海南发展银行自己的问题也很大，“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结果，海南发展银行兼并一部分信用社后，包袱更重，严重资不抵债，最后只好把这个银行也关闭了，损失更大。但由于后来措施得当，问题处理得还比较顺利。再如，不久前，中国人民银行对广东国际信托投资公司采取了关闭清算措施。当时也有人说，对这个公司应该抢救，关了会不得了，不主张关闭。问题是这样大的金融机构怎么救得了？管理极为混乱，好多东西根本就没有账；无力支付到期巨额境内外债务；亏损非常严重，可以说是一个“金融黑洞”！这种机构非关闭不可。关闭这种机构，要付出巨大的代价，承担很大的信用损失。但绝不能再拖下去，拖得越久，陷得越深，包袱越重。关闭这个公司是完全正确的。这个公司还将依法破

产，我们要按照国际惯例和法律程序办事。关闭广东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是一件好事。这件事引起的冲击，使许多非银行金融机构的问题都暴露出来了，使我们能够及时、主动地采取处置措施。对这件事的处理，外界舆论反映总的是好的，认为这反映了中国政府彻底解决金融领域问题的决心和魄力。

这几年，我们在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中，针对不同情况采取不同处置办法，取得了很好的效果，积累了一些成功经验。比如，关闭中国农业信托投资公司，采取在清产核资后，由建设银行托管保支付的办法，没有引起大的社会震动，善后处理比较好。问题是国家损失太大，财政补贴了68亿元，今后再这样保支付是保不了的。再如，光大银行国际信托投资公司连续严重亏损，本来要关闭或破产，由于它的主要债权人是国有大企业，所以，通过采取债权转股权和改组领导班子的办法，化解了支付危机。又如，福建省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湖北省国际信托投资公司严重亏损，出现偿债危机，分别由省政府出面组织，采取地方财政注资和划拨优质资产的办法进行救助，缓解了矛盾。对中国新技术创业投资公司等有严重问题的金融机构，则果断实施了行政关闭。总之，根据不同情况，分别采取了增资扩股、债权转股权、托管、收购兼并、合并、关闭、破产等多种办法，及时、坚决、稳妥地化解了一些金融机构风险。当然，这些办法还要进一步完善，特别是要依法规范金融机构的关闭和破产。同时，要借鉴国际经验，积极探索新的办法。例如，对四家国有独资商业银行，将采取分别建立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积极稳妥地剥离和处理不良资产的办法。先在建设银行试点，取得经验后，再在其他三家国有商业银行推行。

处理各类有严重问题的金融机构，绝不能手软。但要做好充分准备，周密部署，精心组织，慎重从事，特别要依法妥善处理有关债权债务，注意保持社会稳定。

(三) 各负其责，通力合作。对解决金融机构的问题，大家都赞成“谁的孩子谁抱走”的原则。中央、地方的金融机构发生的问题，分别由中央、地方负责解决。在讨论中有的同志说，有些金融机构到底是谁的“孩子”还说不清楚，需要进行“亲子鉴定”。我看搞“亲子鉴定”也没有用。首先，前几年金融秩序混乱，很多地方猛然增加了许多信托投资公司、证券公司、城市信用社等金融机构，人民银行审批不严是有责

任的，但实事求是地说，很多金融机构也是在当地积极要求和干预下批设的。第二，一些机构批设时也许还是合格的，但后来它们自己胡来，亏了很多钱，现在说你是我的“父亲”，你得给我还债，这也没有道理啊！第三，城市商业银行、地方信托投资公司和城乡信用社是地方的金融机构。这些机构成立时，在股本金构成、经营者任命和机构审批等方面可能有不同情况，涉及不同部门，现在也确实分不清是哪一个方面的责任。第四，对银行自己单独成立或注资入股、派人经营管理的一些金融机构，银行要负责清理、整顿、处置。国家早已明令银行与自己所办的信托公司、证券机构、保险公司和其他经济实体在人、财、物等方面彻底脱钩，这方面已做了大量工作，要坚决、彻底完成，对所涉及的债权债务问题，有关银行要认真负责处理。总之，既要各负其责，又要齐心协力，共同把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这件大事抓好。

(四) 强化金融法治，健全信用制度。要保证金融安全运行和健康发展，从根本上说，必须靠法治。要进一步健全金融法制，依法加强金融监管，把一切金融活动纳入规范化、法治化轨道。当前，确实普遍存在有法不依、执法不严、对违法违规金融机构和人员查处不力的现象，而在这些现象的背后，往往隐藏着很大的金融风险。既要继续抓紧完善金融法律、法规，更要坚决依法办事，加大执法力度。当前要突出抓好三个方面：一是依法借贷、依法清贷，坚决杜绝“人情贷款”和不按程序个人决定发放贷款，大力提高收贷率和收息率。二是在企业改革中，严禁以任何形式悬空和逃废银行债务。如果让所谓企业“改制”逃废银行债务之风蔓延下去，后果不堪设想。各银行都要严格把关。今后哪个企业出了这类问题，不仅要严肃追究企业的责任，还要坚决追查有关银行失职的责任。三是强化金融执法。根据人民银行最近的调查，工商银行和交通银行的两个分行告到法院里的案子，胜诉率为90%到99%，但执行率仅为3%到5%，很多案件判决了不执行，执行了也很少收到钱。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中央对此正准备采取有力措施。要结合整顿和规范经济秩序，建立健全金融信用制度。要通过经济的、法律的、行政的和宣传舆论等多种手段，增强全社会金融法治意识和信用观念。

三、关于改进和加强对金融工作的领导与监督

中央举办这期金融研究班，目的在于要求我们的各级领导干部，首先是高级领导干部带头学习和掌握金融知识，自觉理解和支持金融改革、整顿，切实加强金融风险防范工作。我们要通过学习，总结经验教训，努力改进和加强对金融工作的领导，在这方面，我认为以下三点至关重要。

第一，必须遵循经济规律和金融法则办事，绝对不能按主观意志搞行政干预。亚洲发生金融危机的一些国家的教训和我们自己前些年的教训很多，十分重要的是，千万不能搞泡沫经济，不能搞重复建设；金融机构的发展规模必须与金融监管能力相适应，不能乱办金融机构；金融市场的开放程度要从本国的实际情况出发，不能贸然行事。任何人无视和违背客观规律，肯定会碰得头破血流，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现在有些领导干部，特别是一些年轻干部，不懂得经济规律和金融法则，缺乏起码的宏观经济知识，一上台就是盲目搞项目，而又热衷于上工业项目，搞重复建设，根本不讲效益。这是十分错误的。我们要坚决摒弃一种旧的观念，即以为上项目就是政绩，项目上得越多政绩越大。实际上，盲目投资、搞重复建设，不但不是政绩，而且遗祸后人，要负历史责任。银行对制止重复建设也要切实负起责任。不管是谁干预，没有银行的同意，也不能拿到资金。因此，我多次讲，银行的同志要少长点脂肪，多长点骨头，要有骨气，要讲原则，不能请吃请喝之后，什么项目贷款都批。不能支持重复建设，不能对无市场、无效益、无还贷能力的项目贷款，否则，就是助纣为虐。通过这次学习，作为一个地方和部门的主要领导，要以身作则，切实按经济规律和金融法则办事，按中央的方针、政策和国家的法律、法规办事。做到了这些，就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第二，必须按照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正确处理政(府)银(行)关系和银(行)企(业)关系。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同志多次强调，要把银行办成真正的银行，银行不是金库。根据邓小平同志这一重要思想，我国金融体制改革的重要任务，是致力于把中国人民银行办成真正的中央银行，把国有专业银行办成真正的商业银行。这方面的改革取得了突破性进展。问题是，时至今日，不少人仍然政银不分，把银行的钱当做财政的钱来花。必须明白，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银行是经营货币这种特殊商品的独立企业法人，不能把它当做政

府的“第二财政”。政府与商业银行的关系是政企关系，要按照政企分开的原则，处理好政府与银行之间的关系。各级政府和部门要充分尊重银行的经营自主权。同时，银行与各类企业的关系是信用关系，要建立新型的银企关系，绝对不能以为银行是国有的，就可以借钱不还。银行的钱主要是老百姓的钱，必须有借有还。政策性银行的贷款也必须有借有还。银行对信贷资金一定要把住关，绝对不允许敞开大门随便花钱。银行也要按照建立现代金融企业的要求，转换经营机制，加强内部管理，大力改进金融服务，拓宽服务领域，增加金融产品品种，提高服务质量，积极支持经济发展。

第三，必须明确中央与地方领导金融工作方面的职责和权限。各地方、各部门都必须坚决贯彻执行中央统一的金融工作方针和政策，遵守国家的金融法律、法规。国家对银行、证券、保险业实行分业经营、分业管理，人民银行、证监会、保监会按规定分别对各类金融机构实施统一监管，并跨省设立分支机构，实行新的管理体制。中央金融工委和各全国性金融机构党委已成立。这些都是为了改进和加强对金融工作的领导，从我国现阶段国情出发所采取的重大措施。中央金融工委、各类金融监管机构和各全国性金融机构党委要切实履行责任。各地党委和政府要正确理解、自觉支持中央金融工委和各全国性金融机构党委的工作，积极支持银行、证券、保险等系统的体制改革和统一监管，主动帮助他们解决需要由地方解决的问题。虽然成立了中央金融工委，但地方党委和政府还是要对各类全国性金融机构的分支机构进行严格监督，发现问题可以直接向中央金融工委和中央银行、证监会、保监会反映。由于人在当地，熟悉情况，在有些问题上地方党委和政府的监督往往比中央金融工委和金融系统自身监督更有效。银行、证券、保险系统实行垂直领导和统一监管后，要主动加强与地方党委和政府的联系，及时向当地党政领导反馈监管及其他工作的情况和信息，为他们决策提供依据。人民银行也要依法加强对地方金融机构的监管。地方党委和政府要对地方的金融机构改革、整顿和化解风险，承担领导和管理责任，共同维护一方金融平安。

最后，有些同志提出，春节前金融机构要保支付，希望中央给予支持。保支付是应当的，任务也很艰巨，中央银行应该为社会稳定尽自己的责任，给予必要的支持。但是，主要还得靠各地方自己想办法。

现在一些地方发生挤兑现象，往往是由于涉案机构非法集资、长期乱贷乱花、内部极端腐败造成的支付危机。只要当地党委和政府采取坚决措施惩治腐败，依法整改，对群众做过细的思想工作，安定人心，一般不至于发生大的挤兑风波，是能够做好保支付、保稳定工作的。

会见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格林斯潘时的谈话

(1999年1月12日)

这是朱镕基同志在北京中南海紫光阁会见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艾伦·格林斯潘时的谈话。

朱镕基： 现在格林斯潘先生在美国经济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已经从人变成神了。去年12月，英国《金融时报》发表了一篇文章，说格林斯潘先生纵容美国股市泡沫继续扩大，指出暂时的成功可能引发今后金融市场的大崩溃。不知你对此有何评论？

格林斯潘： 中国经济得益于朱总理坚持不懈的努力，发展非常成功，取得了比较高的增长率。美国经济增长势头也很好。中国现在已经发展成为世界上一个举足轻重的国家。如果中国保持现在的发展势头，21世纪的中国将不仅成为世界上重要的文化大国和政治大国，而且也将成为重要的经济大国。

过去的两年对世界各国来说都是比较困难的年份。有些中国的周边国家受金融危机的影响经济发展情况不好，对中国的经济发展产生了负面影响，中国经济的表现也对美国经济的发展产生了影响。这种情况迫使我们对国际金融体系进行改革。昨天，我和戴相龙行长以及一些中央银行的行长们在香港参加国际清算银行行长特别会议，探讨了许多问题，包括应采取哪些手段稳定国际金融秩序，以及如何才能建立稳定的、面向21世纪的全球金融经济体制问题。

科技的发展不仅使经济的许多部门之间的联系更为紧密，而且对国际金融体系也产生了革命性的重要影响。在美国，计算机和通信等技术的快速发展导致了金融系统的革命，提高了生产力，改善了资本的有效利用，并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科技日新月异的发展超过了几年前我们能够预料到的水平。同样，影响美国的科技因素也影响了其他国家。金融机构和金融产品迅速发展，资产可以以最佳方式由消费者不需要的产品向消费者需要的产品转移。复杂的国际金融体系在给人们带来益处的同时，也带来了潜在的危机。

美国现在十分想要了解清楚这样一个问题，就是东南亚国家在过去20年到30年中能够取得高速的经济发展，为什么金融危机一来临，这些国家就无法应付，使经济处于崩溃境地？我们认为，这与现行的国际金融体系有关。目前，世界上相当多的国家过于依赖银行系统，只通过银行系统进行融资，银行成为这些国家唯一的融资源泉。这是一种不灵活的体制，危机来临就不能化解，就像俄罗斯目前的情况一样。美国的情形与其他国家不一样，遇到金融危机时，由于有除银行体系之外的替代性融资方式，可以很好地克服和化解危机。

美国目前经济形势非常好，比过去50年来我每天观察到的美国经济的任何时候都好，但是需要谨慎，因为我们不能确定这种良好的经济形势是否会延续下去。美联储会密切关注高科技带来的变化，关注我们是否能够驾驭科技力量带来的新的金融产品。高科技对金融体系、制造业和服务业会继续产生重要的影响。美国将深入了解科学技术的力量、科技产生的影响及其对全球经济稳定的影响。



1999年1月12日，朱镕基在北京中南海紫光阁会见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艾伦·格林斯潘。

朱镕基： 全世界都关心美国经济发展情况，美国是世界经济的火车头。目前美国经济形势很好，好得不能再好了。有人认为，美国股票价格被大大高估了，今年道琼斯指数可能突破一万点，然后可能出现大萧条。你在许多场合发表过对美国经济的看法，我现在想请你面对面地谈谈对此的看法。

格林斯潘： 目前股市的杰出表现，股价异常扬升，是真实反映美国经济的实际情况还是泡沫现象，不好说。日本1996年股市高峰过后，泡沫就破灭了。有些人过分乐观地估计了科技发展带来的潜在益处。他们认为，计算机、互联网等科技进步，大大提高了劳动生产力和资本生产力，提高了公司收入和潜在价值。持乐观观点的人们认为，由于科技的发展，美国经济发展已经上了 一个新的台阶，而股市反映的正是这种实际情况，反映了公司的效益比较好。我个人对此持怀疑态度。我认为还是应该谨慎一点好。根据历史经验来判断，目前股市的状况是一种不正常现象，是异常现象，没有反映美国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不属于正常现象。按常规标准判断，现在股票价格与公司收益、收益前景相比较已经过高。尽管如此，我个人认为，如果是过高估计股价，以后会发生股票价格的调整，但是美国股价上涨速度放缓或价格一定程度下跌，并不一定意味着美国经济进入衰退，只是表明美国经济增长速度放慢或者减缓。

朱镕基： 去年香港遭受国际对冲基金的冲击，香港政府先是提高利率抵御冲击，但遭受了很大损失，后来不得不动用外汇基金托市，你当时提出批评意见，任志刚①说要当面向你解释清楚。不知此次他和你会面时做何解释？你的观点又如何？对于大量投机资金流动对国际金融市场的危害，美国是否打算加强监管，准备采取什么样的措施进行监管？我刚刚会见了澳大利亚驻华大使，他向我递交了一封霍华德总理致我的亲笔信，信中建议二十方会议②研究如何对国际金融市场进行监管，你对此有何看法?

---

① 任志刚，当时任香港金融管理局总裁。

② 二十方会议，即二十国集团会议。参会各方包括中国、阿根廷、澳大利亚、巴西、加拿大、法国、德国、印度、印度尼西亚、意大

利、日本、韩国、墨西哥、俄罗斯、沙特阿拉伯、南非、土耳其、英国、美国和欧盟。

格林斯潘： 我与任志刚在香港进行了很好的交谈。我们两人都认为，短期流动资本既带来利，也带来弊；但是，任志刚更加关注短期流动资本带来的弊端。我说过反对香港特区政府使用外汇基金支持股票价格。我认为这样做，短期内有效，但长期会造成价格扭曲，阻碍资本市场的合理运作。上市公司的价值不在于谁拥有公司或人们花多少钱购买股票，而在于公司的生产力。干涉的结果是香港金管局持有很多公司股票，这样做对资本有效配置非常不利。任志刚认为，一个运行良好的经济体不应面临这种投资性资本流动问题。

香港遭受短期流动资本冲击事件，使我们联想到国际金融体系的许多问题。目前的国际金融体系与10年到15年以前已截然不同。现在的国际金融体系更加复杂，涉及面更广，更加敏感，信息传导速度更加迅速，同时，错误信息也传播得更加迅速。问题在于如何使国际金融体系的优势更好地发挥，并使其复杂的不利因素最小化。主要问题涉及两个方面：一是，许多国家或地区从国际金融市场借款，但没有采取必要的预防汇率风险的措施，因此在市场波动时遭受损失。二是，应该确定哪些金融机构的放款对金融稳定起反作用，然后加以必要的监管。目前争论的一个主要问题是，金融危机使人们更为谨慎，应该采取什么措施对国际金融体系进行监管。我预料在未来一到两年时间内，我们将会仔细回顾、研究现存国际金融体系的发展过程及其利弊，并对之进行改革。我个人认为，如果我们能够渡过目前这场危机，而实际上我们已经基本上渡过了危机，这一到两年时间内不太有可能产生更大的危机因素。如果现在不做好这项工作，四到五年后如果危机再次发生，可能会更猛烈，影响涉及面会更大、更广。我认为，各国的中央银行都应该为此目标努力。我希望中国在对金融机构进行更严格监管时，也要慎重，不要阻碍金融市场的积极发展。

朱镕基： 中国关注美国在银行改革方面的经验和做法。我们已把中央银行原来每省一个省级分行的格局改为设立九家大区分行，旨在加强中央银行的监管，排除地方政府的不当行政干扰。我们正在遵循商业信贷的原则，对商业银行进行改革。中国的问题在于银行不良贷款

率比较高，这是个遗留问题，产生于1992年到1993年那段经济发展过热时期。当时房地产开发过热，各地设立了太多的开发区，都是从银行贷的款，现在还不了。为此，中国想借鉴美国成立资产管理公司的经验和做法，成立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先把不良资产从商业银行剥离出来，然后进行商业银行改革，使商业银行更好地运作。美国这方面的经验是否对中国有借鉴意义？你对此有何看法？

格林斯潘： 当商业银行有很多不良贷款时，银行通过有效的运作来促进经济发展的能力就受到很大限制。日本的问题是大量的不良贷款使银行业务收缩，而且在世界范围内也受到影响。现在日本在欧洲市场筹资成本就比较高。不良货款使银行不易从私营部门获得资金，即使得到也要付出更高的代价。只有解决这一问题后，银行才能发挥更好的作用，促进经济复苏。中国人民银行的结构变化和商业银行的改革非常重要。目前中国的商业银行不需从市场直接筹资，只做存款放贷业务；但是当银行发展到一定阶段，需从市场融资时，不良资产问题将是一个严重问题。在走到这一步之前，中国先成立资产管理公司，解决商业银行的不良资产问题，这将是非常有益的。我认为是一个好办法。我们现在认识到，不良资款对银行运作产生的不利影响大于我们十年前的认识水平。

朱镕基： 今天美国驻华大使不在，临时代办在座。我现在讲一个问题不是给格林斯潘先生听的，而是给美国使馆临时代办听的。最近美国国内出现了一股反华的言论和舆论，有攻击中国人权状况的，也有造谣说中国窃取美国军事机密的，在此，我不想一一加以评论。我只想说说中美间的贸易逆差问题。美国公布的数字显示，1997年美国对中国贸易逆差是500亿美元，1998年高达600亿美元。美国公布的上述数字表明，美国对中国的情况了解太少。去年，中国向全世界出口的总额是1800亿美元，其中60%是加工贸易出口。也就是说，约1100亿美元是在中国的外资企业，包括美国与中国的合资企业，向包括美国在内的国家出口，而这1100亿美元的出口产品大概需要用900亿美元从包括美国在内的国家进口原料。就是说，中国只有200亿美元的贸易顺差。但是，这200亿美元也不在中国手里，而在中国的外资企业包括美国投资的外资企业手里。由于存在种种贸易限制和贸易保护主义措施，中国的出口，去掉加工贸易的话，只有700亿美元，不可能有更多

的出口。如果说美国1998年对中国的贸易逆差是600亿美元，那么中国只向世界上别的国家出口100亿美元，这是绝对不可能的。我认为，必须合理地看待中美贸易间存在的问题，实际上，中国对美顺差只有200亿美元。我说上述话的意思是，要维护中美两国的友好关系，任何破坏中美关系的言论或行为，对中国没有好处，对美国也没有好处。美国公布的中美贸易逆差的数字是毫无根据的，也是不符合事实的。

我将接受克林顿总统的邀请，于今年4月份访问美国。我希望在我访美期间，两国能就中国加入世贸组织问题达成协议。我已经要求外经贸部部长石广生和美国贸易代表巴尔舍夫斯基进行谈判。如果巴尔舍夫斯基开出的条件合情合理，我们将接受，但是必须有时间表。我说必须有时间表，并不是为了拖延。时间表的概念也许是一年，也许是三年，最长不超过五年。最棘手的问题需要五年的时间，比如说全面开放资本市场问题。亚洲金融危机的教训告诉我们，金融市场开放得快没有什么好处。金融市场的全面开放必须循序渐进，必须条件成熟，必须监管水平跟得上才行。(转向格林斯潘)我很抱歉在会见你时说和你没有关系的话。

格林斯潘： 恰恰相反，朱总理刚才的讲话跟我很有关系。我期待着朱总理今年对美国的访问。你是一位非常好的演说家，在美国演讲一定能将中国的政策阐述透彻。由于中国不仅是国际政治领域的重要成员，也是国际经济大家庭中的重要一员，美国政府认为，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对美国至关重要；包括我在内的美国经济界人士，也希望中国尽早加入世贸组织。我同意总理的看法，东南亚国家没有做好充分准备就开放金融市场，也没有做好充分准备迎接国际金融市场上越来越复杂变革的挑战。总理先生对美中贸易的看法，如同对金融问题的看法一样深邃，这样的看法对我们艮有启迪，而我们需要这种启发。

朱镕基： 我非常高兴与你再次会面。每次与你会晤我都有收获。我希望你能更多地访问中国。

把“两个确保”落到实处

(1999年1月13日)

1999年1月12日至13日，国务院在北京召开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和再就业工作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和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的主要负责同志。朱镕基同志在会议闭幕时的总结讲话，曾发表于《新时期劳动和社会保障重要文献选编》，原标题为《关系国有企业改革成败的一项大政策》。编入本书的是讲话的主要部分。

做好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和再就业工作，是由我们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所决定的，直接关系到广大职工群众的切身利益，关系到保证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稳定发展的大局。各级党委、政府和有关部门要高度重视，坚定信心，扎实工作，继续狠抓落实，确保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确保企业离退休人员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以下简称“两个确保”)。下面，我讲几点意见。

一、做好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和再就业工作，是实现国有企业改革和脱困目标的重要环节。

关于国有企业改革的方针、政策，党的十四大、十五大都作了明确的决定。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五届一中全会上明确指出，要用三年左右的时间，通过改革、改组、改造和加强管理，使大多数国有大中型亏损企业摆脱困境，大多数国有大中型骨干企业初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这个目标不能动摇。去年是国有企业三年脱困的第一年，由于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又遭受历史罕见的洪涝灾害，给国有企业的生产经营造成不利影响，但从总体上讲，国有企业的税收还完成得不错，国有企业开始走出困境。现在，国家经贸委会同各地区和有关部门，正在拟订脱困的企业名单，名单一经确定，上下要狠抓，国家的扶持政策要向这些企业倾斜。只要我们共同努力，这个目标就一定能够实现。考虑到公用事业、资源枯竭的矿山、军工企业、森工企业，以及“七五”、“八五”时期国家批准兴建的资本金投入严重不足企业的特殊情

况，不将这些企业纳入国有企业三年脱困目标的考核范围之内，可以单独考核、比较。

实现国有企业改革和脱困目标，重点要抓好三方面的工作：一是制止重复建设，特别是工业的重复建设，继续调整压缩多余的、落后的生产能力。二是建立社会保障体系，把下岗职工的基本生活保障和再就业工作搞好。三是政企分开，强化对企业的监督，加强领导班子建设。这里，我着重讲一下社会保障问题。

目前国有企业普遍人多，不解决这个问题，就无法进行现代企业制度改革。减员增效，这是国际上的通行做法。办好企业必须严格控制人工成本。我们实行劳动合同制十几年了，绝不能再吃“大锅饭”。只有把企业富余人员减下来，才能减轻企业负担，降低生产成本，加快技术进步，提高生产效率，增强企业的市场竞争能力，从而为扩大就业提供更强大的物质基础。但是，减人必须有社会保障体系。职工在企业工作了多年，对企业很有感情。企业对下岗职工不能撒手不管，要考虑他们的生活问题，解决其后顾之忧，不能让职工感到前途未卜。减下来的人不安置，就会引发社会不稳定。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和再就业，是根据我国目前国情建立的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保障制度，与失业保险、养老保险、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以及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制度等一起，共同组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保障体系。当然，这只是一种过渡性的保障体系，将来还要进一步规范化，方向是要扩大到全民保险。我们既不能照搬国外的做法，也不能沿用计划经济的办法，只能根据现阶段的实际情况，制定适合中国国情的政策措施。因此，党中央、国务院确定的国有企业职工下岗分流、减员增效和实施再就业工程是一项大政策，是国有企业改革成败的一个重要条件，也是保持社会稳定的重要举措。



1999年1月13日，朱镕基在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和再就业工作会议上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右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钱其琛(右四)、吴邦国(右一)等出席会议。

二、地方财政要在预算中打足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资金。

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资金，要坚持实行企业、社会、财政各负担三分之一的办法。企业要对下岗职工负责到底，绝不能对减下来的人撒手不管。对于有困难的企业，要调查它的负担能力。中央企业由中央查，地方企业由地方查。确有负担能力但拒绝出资，经过教育仍不改正的，要撤企业主要负责人的职。社会筹集部分，主要是依靠失业保险金。各地要加强失业保险费的收缴，保证社会筹集资金到位。地方财政负担的三分之一，以及对企业、社会筹集不足的部分，地方财政要给予保证，不保证就是不落实。去年中央在这方面补助地方110亿元，今年中央财政要继续通过增加财政投入，扩大基础设施建设，拉动经济发展，不可能再在这方面对地方给予补助。因此，各地财政一

定要调整预算支出结构，优先、足额安排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资金。从现在了解的情况看，一些地方的资金安排与实际需要相差很大，这要引起高度重视。社会保障体系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做好社会保障工作是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的重要职责。什么叫政府转变职能？转变职能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政府不能再热衷于上项目了，那不是政府要抓的事情。政府的主要工作、主要财力，都要放在公共事业和公众利益上，为企业的公平竞争和社会的健康发展创造一个稳定和有利的环境。对于少数困难地区，按此规定执行后确有困难的，中央财政可通过转移支付的办法给予一定的支持。

三、下岗职工必须进再就业服务中心，再就业后必须解除与原企业的劳动合同。

现在下岗职工的劳动关系非常复杂：有的职工下了岗，却不愿意进再就业服务中心(以下简称“中心”)；进了中心的，还有人不与中心签协议；有的职工下岗后找到了稳定的工作，却不与原单位解除劳动合同，一方面干自己的活，一方面到中心领生活费。这些问题必须解决。

下岗职工进了中心以后，在中心期间不解除劳动合同，但必须按现在的文件规定与中心签订基本生活保障和再就业协议，明确双方的责任、权利和义务，并相应变更劳动合同。

国有企业下岗职工要随下岗随进中心。凡是进了中心的，就要发给基本生活费，由中心代缴社会保险费；不进中心的不能享受这种保障。下岗职工实现再就业的，“两不找”人员①有了稳定职业的，都要与原企业解除劳动合同，与新单位重新签订劳动合同。下岗职工在中心三年期满后仍未就业的，也要解除与企业的劳动合同，领取失业保险金。

---

① “两不找”人员，指因用人单位生产经营不景气，单位与职工约定或未经协商自然形成，单位不找职工发工资、职工不找单位要求安排工作的不规范劳动关系中的单位职工。

四、确保企业离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不准再发生新的拖欠。

目前只要求不准发生新的拖欠，对过去拖欠的养老金，能补发多少就补发多少，根据承受能力，逐步予以补发。关键措施有以下三条：

第一，必须扩大覆盖面。现在，大多数外商投资企业、私营企业都没有纳入养老保险的统筹范围。今年扩大覆盖面的重点是外商投资企业、私营企业，各种所有制企业都要参加养老保险，不能例外。必须明确，在社会保险方面不能有不缴费的所谓“优惠政策”，要一视同仁。社会保险覆盖外商投资企业，这是国际惯例。各地要认真抓好这项工作，每个城市都要去落实。劳动保障部今年要着重检查这一点，这项工作上半年力争到位。

第二，努力提高收缴率。各级政府要像抓税收一样抓社会保险费的收缴。要坚决清理和追缴企业的300多亿元欠费，社会保险费不允许缓缴，要依法办事、严格执法。对有钱不缴的企业要予以新闻曝光，谁不缴就公布名单，第一年“黄牌警告”，第二年再不缴要惩罚企业主要领导人。当然，对亏损严重、尽了最大努力而确实无力缴纳的企业，也得酌情处理。

第三，积极稳妥地推进省级统筹。建立省级统筹、进行基金的适度调剂，是为了解决地市之间基金结余不平衡问题，确保省级范围内养老金的按时足额发放。但是，要特别强调，省级统筹绝不能搞一平二调、鞭打快牛。省里要制定科学合理的基金调剂使用的考核指标体系和考核办法，严格考核地市的覆盖面、收缴率和控制待遇水平的情况。考核指标完不成的地市，即便资金有缺口，也不能进行调剂，不能自己不努力工作，坐等吃省里的“大锅饭”。除此之外，地市还有资金缺口的，可以采取地市间借款、有偿使用的办法解决。省级统筹要发挥省和地市两个积极性，鼓励地市多收缴、多结余。当年地市上缴调剂金后的结余基金，由地市管理和使用。同时，对省一级来讲，也不能一方面留着大量结余资金，另一方面又向中央要钱。

五、做好养老保险行业统筹移交地方管理后的有关工作，坚决制止和纠正提前退休。

去年8月，养老保险的行业统筹如期移交地方管理。行业统筹下放地方管理的目的之一是为了解决地方的困难。当前要做好三方面的工作。一是尽快将下放前行业结余的基金移交到位。按1997年年底的决

算数，结余基金该上缴中央财政专户的要全部上缴；该移交给地方的，要全部移交；应移交地方但已上调的资金，要如数退还给地方，不能让地方吃亏。对原行业结余基金的使用、移交情况，审计署要组织一次专项审计，财政部、劳动保障部参加，清查核实，查出问题的，要分清责任，严肃处理。二是原则上不降低行业统筹下放的企业离退休人员的待遇。行业所属企业离退休人员的待遇比地方的高一些，是历史原因形成的，要承认这个现实，原则上不降低这些人的待遇。高出的这部分待遇，属于统筹项目以内的，由地方养老保险基金支付；属于统筹项目以外的，由企业负责支付，不能增加地方的负担。三是坚决纠正提前退休。有少数行业在下放之前，突击组织职工提前退休，据说最年轻的只有24岁就退休了，这简直到了荒唐的程度。提前退休问题，不只是中央这几个行业有，地方也有。这样大规模地提前退休，把退休制度都搞乱了，后患无穷。要根据国家关于企业职工退休条件的规定，各地、各有关行业主管部门对1998年1月1日以后突击提前退休的情况进行认真清理，分别妥善处理。各地和各有关行业主管部门要严格按照国家的规定执行，地方搞的地方自己纠正，中央行业搞的中央行业纠正，即使现在企业已经下放了，也要纠正。

今年的社会保障工作任务艰巨，责任重大，难度不小。现在，中央关于“两个确保”的政策已深入人心，得到社会各界的普遍关注和广泛支持，受到企业广大职工和离退休人员的拥护。各级党委和政府的领导要继续把“两个确保”工作当做一件大事，抓紧抓好。主要领导要亲自抓，负总责，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把中央对“两个确保”的政策落到实处。劳动保障部门要加强与经贸、财政和工会等部 门的密切合作，不推诿、不扯皮，加强协调，共同做好工作。

信访工作是联系群众的重要渠道

(1999年2月5日)

这是朱镕基同志看望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信访局工作人员时，听取信访局负责同志工作汇报后讲话的主要部分。

信访工作很重要，信访工作很繁重。信访局的同志们很辛苦，你们做了大量的工作。所以在春节前，我和王忠禹、王刚①等同志来看望大家，向同志们表示慰问，表示感谢！

① 王刚，当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

信访工作是各级党政领导机关与人民群众联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渠道。我们有各种渠道，各种民主的、法制的渠道，但是由于种种的原因，正常的渠道不能够充分利用，需要有信访工作这样一个重要的渠道。如果我们不重视这个渠道，很可能听不到任何真正的声音，只有歌功颂德，没有批评监督。首先，信访工作能帮助检验党中央、国务院的政策在执行过程中发生了什么问题，是不是符合实际。其次，我们也可以通过信访渠道，让人民群众提出各种建议，有时候在会议上不好提，可以通过信访来提，这可以调动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再次，信访工作是对我们各级党政领导干部的一种非常重要的检验和监督，特别是对违法违纪干部的一种揭露。我过去在国家计委、国家经委工作，没有直接联系信访工作，但也很重视牵涉到我分管的工作中的群众来信。我接触人民来信比较多是到上海当市长以后。从那时起，我就非常重视信访工作，直接批出去的人民来信数量很大。当时，收到的信件虽然没有现在多，但是我批出去的信件比现在要多得多。那时一年只收到四万件，现在有几十万件，当然，我不可能看那么多。尽管我看的仅是其中很少的一部分，但对我也有很大的教育和启发。来信不一定都是符合实际的，但写信的方法和反映的情况，也足以引起我的深思。我今天来信访局，是希望各级信访干部能真正地认识到信访工作的重要性。它确实是各级党政机关和领导干

部联系人民群众的一条非常重要的渠道，一定不能忽视这一渠道，不能马马虎虎地对待，要认真地对待。说老实话，我也确实从这些信件里面，获得了一些新的工作思路。现在人民来信中，有将近60%是反映农村中的问题，是牵涉到农民利益的问题，如土地承包中的乱占地、乱收费，农民负担沉重不堪，干部违法乱纪等；有30%是反映城市中的问题，大部分是国有企业的问题，主要涉及下岗职工的生活和离退休人员养老金问题；还有10%主要是反映干部问题。当然，城市、农村中的问题也牵涉到干部问题。从这里也可以看出，目前我们党的政策在执行过程当中哪些方面出了问题，很值得我们深思。

第一，有这么大分量的来信反映农民的负担、土地承包、乱收费等牵涉到农民切身利益的问题，如果不引起足够的重视，农业这个基础就会动摇。想当年我们是靠农村包围城市起家的，农村工作，不是光喊口号、下发文件就行，要把中央的放村政策贯彻落实到底。

第二，城市的问题，主要是下岗职工问题。不是我们叫他们下岗，而是过去的政策出了点问题，搞重复建设没有资本金，借银行贷款乱上项目，一些国有企业生产出的产品根本没有市场，无法继续生产，只得给职工“放假”。1997年年底，下岗职工达到1000万人。那个时候，中央就提出政策：鼓励兼并，规范破产，下岗分流，减员增效，实施再就业工程。干什么呢？就是把他们安置起来。到去年年底，90%以上的下岗职工进了再就业服务中心，拿到了基本生活费，尽管比过去的工资要少得多，但他们能生活下去。还有离退休人员的养老保险金问题。去年上半年，离退休人员闹事比下岗职工要激烈得多，这些人心态更不平衡，“青春献给党，老了没人养。要我靠儿女，儿女都下岗”。他们一肚子气啊！离退休人员养老金是非保不行的。中央财政今年拿了122亿元补贴给地方，保下岗职工基本生活费和离退休职工养老保险。

第三，干部队伍的腐化相当严重。有些事情是前所未闻的。县长买通杀手去杀县委书记，他好当书记；副县长买通杀手杀县长，他好当县长。这类案件不是一起，起码有五起之多。我们只听说过跑官、买官、要官的事情，没有听说过有杀人升官的事。居然腐败到这个程度！



1999年2月5日，朱镕基到中办、国办信访局看望干部职工。

从这些情况看，我们确实是要认真地听取群众的意见，联系人民群众。光看报纸、报告，那是根本无法工作的。不久前我到安徽省南陵县去察看粮食仓库，在我没去之前粮库都是空的，后来他们把一些粮站的粮都搬过来，摆得整整齐齐。连我都敢骗，真是胆大包天！还有一件事情，我到某省会城市考察下岗职工再就业服务中心。原来是一个大仓库，空空荡荡的，他们在几天之内把许多个体户都搬进去，里边人山人海。我去参观的时候，那欢呼啊！人人都想跟我握手，挺有劲儿的，热情得很。我一回到北京，就收到一封人民来信，说那些都是假的，不信现在你再去看看，一个人也没有了。我就派国务院办公厅的同志去微服私访，果然来信反映的情况属实。现在，你要下去视察工作，都事先安排好了。固定的点，都是笑脸相迎，热情招待；汇报的人都挑好了，都是对答如流。这些你能相信吗？所以，你听不到真实的意见，怎么为政呢？政策怎么出来啊？

同志们一定要意识到，你们的岗位是一个很重要的岗位，你们的工作是非常有意义的工作。你们工作的成绩，不仅仅表现在进了多少万件群众来信，出了多少万件群众来信，而在于这些来信将在我们各级党政领导干部中发挥很大的作用。很明显，我们很多的政策是根据群众这些意见，做了更好的修订。通过人民来信，我们对干部增加了了解，也处分了很多人。我最关心的是财政和银行系统的干部。凡是国家信访局转来的反映干部问题的信，我没有不处理的。而且处理以后，我还得督察结果。来信诬告的不是很多，夸大事实的有。要充分认识到信访工作是一项十分有意义的工作，绝对不是一件事务性的工作。

确实也有很多官僚主义者、所谓的“领导人”，报纸也不看，文件也不看，电视只看娱乐节目。让他们重视人民来信，那不是对牛弹琴吗？他们会去看人民来信吗？但是也应该看到，我们绝大多数领导干部还是为人民服务的。我相信，只要党中央、国务院倡导这件事情，并且持之以恒，风气是会改变的。希望大家充分认识信访工作的重要性，把这件事做得更好。

另外，我们也要做一点宣传，引导群众不要只从一个信访渠道来反映问题，我们还有各种民主的、法制的正常渠道。只是那些被包庇、掩盖了的问题，如不通过信访渠道往往难以解决的问题，才应通过信访渠道，不能什么都走信访渠道。去年，国家信访局收到群众来信46万件，比前年增长17%，这个事情越来越大，办案的成本太高了。当然，我们还是要号召大家通过正常的渠道反映问题，不要什么事情都告到国务院来。实际上，许多事情反映到上一级就可以了。比如说乡村干部的问题，就可以送到县或地市；县的问题，你觉得地市不可靠，就送到省里。那里没有解决问题的时候，再送到中央来。我们批下去的东西，最终还得通过主管部门、省里来办。我们不可能每一件案子都派一个工作组下去查，这是不可能做到的事。

我们还是要提倡来信署名。要严格规定，对打击报复的，不但要让他丢官，还要追究他的法律责任。要提倡民主的作风，打击报复是不允许的。写匿名信有一个问题，诬告的出来了，夸大事实的增加了，但现在匿名信反映的情况恐怕大部分还是确有其事。所以，我们如果能够逐步建立民主法制的秩序，严厉地处置打击报复，还是要鼓励人

民群众写署名信。这有个好处，就是比较实事求是，我们查的时候效果要好得多，成本也少得多。为什么从长远来说一定要这样？就是要养成民主风气。有问题不能揭发，那还得了！目前，对匿名信我们还得同样重视，这是个过渡时期。另外，还要加强宣传，让上访的、写信的人员遵纪守法。我现在每天乘车上班，不断地发生险情，有时上访的人一下子就蹿到车前边，拦车上访。我一再地告诉司机，一定要注意车不能开得太快，别伤了他们。最近有一件事，震动了中南海，有50多名上访人员冲进中南海，冲到怀仁堂那个地方了。这是不行的，是违法的。他们的激愤情绪可以理解，但做法是不对的。我们还是要维护一个正常的法律秩序。

新疆经济发展要解决好“一黑一白”的问题

(1999年3月8日)

这是朱镕基同志在九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代表团讨论会上讲话的要点，曾发表于《新疆工作文献选编(1949～2010年)》。编入本书时，对个别文字作了订正。

新疆是少数民族地区、边疆地区，也是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地区。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十分关心新疆。江泽民同志经常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通报有关新疆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方面的情况。国务院对新疆的工作也给予了全力支持，力所能及地予以特殊照顾。

新中国成立以来，新疆在历届党委、政府的领导下，各族人民紧密团结，经济建设、社会发展等各方面都取得了很大成绩。我多次到新疆，每次都感到变化很大，如阿克苏、和田、喀什等地，比我原来想象的要好得多，这是来之不易的。当然，这个成绩与驻疆部队、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所发挥的特殊作用是分不开的。我相信，新疆的发展前途无量。

去年新疆的发展遇到一些困难，主要是因为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也是全国经济结构调整过程中一些问题的必然反映。具体讲，就是“一黑一白”遇到了阻力。

“一黑”就是石油。根据目前探明的资源，新疆的石油、天然气资源丰富。随着油田、气田的开发，管道的建设，可以有力地带动新疆经济发展，新疆将成为我国的一个最重要的石油天然气基地。亚洲金融危机发生后，油价一降再降。受此影响，去年8月份以前，石油、石化全行业亏损，油田关井限产，石化产品压库。在这种情况下，中央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特别是加大了打击走私的力度，收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扭转了亏损局面。这说明困难是暂时的，新疆石油、石化产业的发展是有前途的。当然，我们也要看到国际市场的严峻形势，进一步在深化改革和加强企业内部管理上狠下工夫，降低生产成本，提高市场竞争力。

“一白”就是棉花。我们要把新疆建设成为国家商品棉基地，这是没有疑义的。但是，我们也应看到，国际、国内纺织工业正在调整，化纤比重越来越大，某些西方国家又对我国采取贸易歧视政策，对我国出口的纺织品实施所谓“反倾销”。这种情况下，棉花种植规模目前不宜再扩大。近几年，新疆棉花面积逐步扩大，产量不断提高，为全国纺织工业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但国家为此背上的包袱也一天比一天重，我心里十分着急。因为新疆棉花收购后并没有完全销出去，而是存放在仓库里，仓储费用、利息负担相当沉重。可是，新疆棉花不收购也不行。这就造成了我们原先没有预计到的矛盾。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要稳定新疆棉区种植面积，调减其他棉区种植面积。坦率地讲，调减其他棉区种植面积，说起来简单，真要做起来也不容易，但再难也只能这么做。事实上，《政府工作报告》原来准备写“稳定新疆棉区的产量”，但强调稳定产量可能会直接导致农民收入减少，所以经过再三考虑，改成了“稳定新疆棉区种植面积”。刚才听新疆的同志讲，今后要调整种植结构，不太适宜种植棉花的地区就不种棉花了，总产量还可以基本维持不变，那我就谢天谢地了！解决新疆棉花发展的问题，最重要的是打开销路，打不开销路，棉花压库是不行的。当然，打开国际市场的难度很大。我们近几年为提高农民收入、鼓励农民种植棉花，收购价格定得很高；现行的营销体制和手段也存在一些问题，国外都是包装、运输、销售一条龙，中间环节很少，但我们目前还做不到。这样一来，致使新疆棉花的国际市场竞争力不高。但是，即使难度再大，也一定要想方设法打开国际市场。新疆棉花的销售不能过多地寄希望于国内市场，必须“走出去”。为此，国务院下定决心把外经贸部所属的棉花出口公司划给新疆，专司其职，帮助新疆出口棉花。要尽量减少中间环节，撤销一级站、二级站、三级站，一竿子到底，按照国际标准组织棉花货源，直送港口，降低费用；要建立长期的用户关系，稳定价格，保证质量，做到长期供应，这样才能真正打开国际市场。另外，要尽可能地用新疆棉顶替进口棉。现在一方面，我们的棉花销不出去；另一方面，棉花还大量进口，其原因主要是外资企业进口棉花享受优惠政策。这种局面要尽快改变。要给予政策优惠，鼓励采用新疆棉花。对于中央制定的政策必须落实，中央的政策老是不落实，困难怎么克服？国家对新疆棉花给予了很大的补贴，远不止40多亿元，还有仓储费、利息费等，简直

是不得了，不采取措施把棉花销出去怎么行？我反复讲，对新疆的棉花，不能采取强制减产的方法，那样，农民收入就会下降, 民族团结就会受到影响；单纯靠降低收购价格也不行，会使农民增产不增收，所以必须想办法把棉花销出去。当然，新疆也要大力调整农业结构，不能单搞棉花，单打一是不行的，要全面发展。



1993年9月27日，朱镕基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石河子垦区考察棉花生产情况。

前几年，我们粮食供不应求，价格不断上涨，经过近几年的发展，现在粮食也多起来了，大量积压在仓库里。是不是真的多了？我看并不是。如果大家仅吃粮食，可能是多了，但要吃肉，就远远不够。我国人均肉食消费量与国外发达国家相比差距很大，应该适当提高，这与全民族身体素质的提高也很有关系。不知道大家注意到没有，这次《政府工作报告》中还特别讲到了要逐步提高国民的营养水平。那就是要多吃肉、多喝奶。所以，要加快粮食的转化。当然，同时也要适当调整国民的工资水平，提高城乡居民的购买力。我看新疆发展畜牧业、食品工业，是完全有条件的，也是大有前途的。问题是产品的成本要降低，加上现代化的饲养、管理和现代化的包装、冷藏等技术手段，才能运到内地来，才能参与市场竞争。随着人民生活的改善，健康食品日益受到重视。新疆生态条件好，发展天然畜牧业，产品是绿色食品，有利于健康，符合消费方向，在此基础上做好包装，我相信会有销路。通过这个路子调整经济结构，农民收入就会提高。现在进口食品占有相当大的比例，连牛奶都要进口，真是莫名其妙！我们这么多粮食，还不能生产一些符合群众喜好的健康食品吗？只要新疆采取得力措施，大力发展食品工业，多生产一些牛奶、牛肉等食品，直接空运到北京等地，或用冷藏车通过铁路运输，绝对比那些层层周转来的产品便宜。我看要从这个方面多动点脑筋。

“一黑一白”的问题希望你们很好地考虑。“黑”、“白”这两个字对新疆生命攸关，一定要把这两个问题解决好。如果棉花能够打开销路，农业经济结构加以调整，大力发展畜牧业、食品工业，我相信新疆的前途是很好的。当然，也要适合市场需要，管理、销售、运输都要跟上去，盲目发展也是害人的。

总之，中央是新疆的坚强后盾，一定会做好工作，加大对新疆的支持，帮助新疆加快发展。新疆的地位非常重要，我们这么多的少数民族同胞生活在那里，国外许多敌对分子又企图破坏我们的民族团结，所以，一定要把经济工作搞好，提高各族人民的生活水平，让新疆各族群众心向祖国、心向共产党。当然，要做到这一点，各级干部的作

风也十分重要。各级领导干部都要牢记自己是人民公仆，一定要做到为群众着想、为群众服务，解决群众的实际困难。这样，人民生活一天天改善，民族大团结的局面就会保持和发展，反过头来促进新疆的经济蒸蒸日上。

国务院办公厅要为各部门树立好的榜样

(1999年3月25日)

这是朱镕基同志在接见国务院办公厅机关第八次党代会代表时的讲话。

你们是我们的代表，我是国务院办公厅机关党组织中的一员，我代表国务院各位副总理和国务委员向大会和同志们表示祝贺！

国务院办公厅机关党的组织是健全的，是有战斗力的。在保证国务院各项工作任务的完成，特别是在去年进行的国务院机构改革中，我们的党员确实起到了核心和骨干作用，为促进机构改革这件大事顺利完成作出了重要贡献。在这里，我代表各位副总理和国务委员向你们并通过你们，向国务院办公厅机关全体党员表示感谢！

我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对政府机关工作人员提出了要求。首先是要廉洁，这是最起码的要求。别伸手，别贪污，要清清白白做人。其次是要勤政。不管能力和水平如何，都要勤勤恳恳、老老实实地工作。第三是要务实。要办实事，为人民群众办实事。最后是要高效。能做到高效更好，做不到也要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做好工作，一天到晚心里想的都是工作，这样才能对得起人民、对得起党。我想，这些方面国办机关的干部还是基本做到了。特别是在去年精减了人员以后，一个人要干过去两个人的工作，确实很不容易，很辛苦。有时候我还老是批评你们，我自己也感到很惭愧。我在九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的记者招待会上讲了，我对自己的工作也很不满意。所以，我愿意与大家共勉，把我们机关的工作、把机关党的工作做得更好。

现在全国正在按照中央的部署开展“三讲”教育活动，要搞好国务院办公厅的“三讲”教育活动，我想上面讲的这几条还是要强调。第一是要廉政，这一点不能出任何问题，要带这个好头。现在基层有些地方腐败得很，不是个别的现象，贪污、买官卖官，不得了。第二是要树立公仆意识，为人民群众服务，为国务院领导服务，为各级政府机关服务。我们要把服务工作做好，不能被下面的同志指责我们对他们态度

不好，官僚主义，专横跋扈。这关系国务院的声誉，大家要起好这个带头作用。另外，我们要尽量把工作做得扎实一点，效率高一点，以符合党中央、国务院的要求。

最近我在批评一件事，这件事实际上也反映了国务院一些部门的作风。1997年9月，我和当时的冶金部负责同志商量要"以产顶进"。从那次说了以后，我在一年半之内作了差不多十次批示，到现在还没有落实。因此那天开总理办公会议，我做了非常严厉的批评。可到现在也还是没有结果，认识还没有完全统一。一件明明是非常正确的事情，一年半也办不动，批示了十次之多也贯彻不了，我感到国务院的工作效率太差了。就这件事情你问哪一位领导都说正确，可就是不办。为什么？就是有些人凭自己的想法办事，管你是总理讲的还是副总理讲的，他都不当一回事，随随便便就给你否了或者是给你拖延。这么下去怎么得了！我一想到这件事就非常痛心。如果这样搞下去，五年一晃就过去了，我们给老百姓办不了几件事情。这件事情说明，所有好的思想、好的思路、好的政策都会在官僚主义中被埋葬，这太可悲了。我希望国务院办公厅的工作人员一定要抓大事，提高工作效率，反对官僚主义，为各部门树立一个好的榜样。

本届政府为了做好工作，办了《昨日要情》，下发国务院各部门。你们都能看到吗？要给大家看，怕什么？你们不掌握领导的意图，怎么办事？问题是不要传播得很广。每一个业务工作人员都要看，看了以后才能知道我们在想些什么。我们作批示的时候脑子里也在构思，尽量少说废话。你批得越长越没人看，不超过50个字，我有这个经验。所以，我们批东西往往比较简略，而且有操作性，你们就按照我们批示的去做。可能有的人不看，他们不看你们帮我们看，你们看了以后帮我们下去贯彻，给他们讲一讲总理、副总理都批示了，要怎么做。所以，希望你们以后多抓这些事。



1999年3月25，朱镕基与国务院办公厅机关第八次党代会代表合影。前排左一为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王忠禹，左二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国务委员吴仪，左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部长迟浩田，左四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吴邦国，左六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左七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温家宝，左八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罗干，左九为国务委员司马义·艾买提。

今天我又看到一个文件，看了一下附件，我至少批过四次，算起来也有半年多的时间了，有关部门就是不办。现在说办了，结果拿来一看，他们的报告我还是看不懂，还要我表示同意。我还没有看懂，怎么表示同意呢？你们说把不同意见反映上来让我作决定，可不同意见是什么呢？你们惜墨如金啊，连我这个懂业务的人都看不懂，谁还看

得懂？实际上这个文件根本不解决问题，让我批也没什么用，我再批十次，问题也解决不了。

总之，我觉得你们的工作非常重要，你们多费一点脑筋，我们就少操一点心。你们的工作做得好，就为各部门树立了好的榜样。所以，同志们，你们的工作是非常重要的。我再一次代表国务院领导同志对你们付出的辛勤劳动表示衷心的感谢！

给郑惠等同志的信

(1999年3月25日)

郑惠①、信传①、道晖①同志：

最近，有老同志郑重相告，说兄等正在收集材料，准备为我编写传记，并说我已表示同意。无论事实如何，我必须明确表态：请千万不要这么做。国事维艰，舆论纷杂，飞短流长，诚惶诚恐。如再授人以柄，树碑立传，罪不可逭。千祈停止撰写一切涉及我的回忆或评论材料，并代我广告亲友，不胜感激之至。敬祝身体健康。

朱镕基

1999年3月25日

---

① 郑惠，曾任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信传，即张信传，朱镕基同志大学同学。道晖，即郭道晖，朱镕基同志大学同学。

会见美国国会议员代表团时的谈话

(1999年3月31日)

这是朱镕基同志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美国国会议员代表团时谈话的主要部分。

朱镕基： 首先，很抱歉让各位等了10分钟，因为我会见的前一个代表团也是美国国会议员代表团，人数比你们少，争论得很热烈，所以控制不住时间，对不起。我这是第一次接待这么庞大的美国国会议员代表团，但并没有打破我一天会见24位国会议员的纪录。1990年5月，应兰普顿①的邀请，我作为上海市市长参加中国市长代表团访问美国时，在国会一天会见了24位议员。那是最高纪录。我原来听说你们有11位众议员和10位参议员，但现在参议员只来了6位。刚才我会见的代表团有3位议员，原来说是4位，所以加起来只有20位国会议员，没有打破我的纪录。在美国目前时兴一股反华潮流。在这种时候，有那么多议员克服困难来华访问，我认为你们是真朋友，非常感谢你们来访，我很愿意听听你们的意见。我认为你们是美国人民的使者，你们这次来访对中美两国人民沟通信息、加强交流，都是一个推动。因此，如果你们有任何问题，请提出来。你们提出的任何问题，我都可以回答；你们有任何中肯的意见，我都可以接受。所以我请你们先讲，然后我做回答。总之，希望你们多听一听、看一看，相信你们会得出结论，中国不是美国潜在的对手和敌人，中国是美国的朋友。

---

① 兰普顿，即戴维·兰普顿，当时任美国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主席。

参议员威廉·罗思： 总理先生，首先感谢你今天抽出时间会见这么庞大的代表团。在北京今天应该是“美国国会日”，我们深感荣幸你能会见代表团。美中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我们在一个重大的挑战和机遇共存的时刻来到这里。之所以说是重大的挑战，是因为两国关系由于发生了某些事情而不幸有所恶化。但同时也存在着机

遇，即我们要讨论的一些感兴趣的事，如中国加入世贸组织问题。我们非常有兴趣也愿意与你讨论这方面的问题。在你的领导下，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谈判已取得很大进展，但要取得最后成功，还需要取得更多的进展。现在我想把机会留给我的同事提问。

众议员吉姆·奥伯斯塔： 很高兴能再次见到你。上次见到你时，你还是上海市市长。你比我走运得多，你现在地位已经上升了，而我仍在原地踏步。我们这次访问的主要目的是更多地了解中国情况，与美中学者进行讨论，了解中国的经济情况和推动中国目前前进的动力。我还期待访问世界上最大的水电站——三峡水电站。我们两国目前正在谈判更新美中双边民航协议，我希望在今后谈判中，中方能再指定一家美国航空公司，当然我更希望是两家，这样可以有更多的服务，有更多的美国航班往来于美中之间。同时希望中方能允许其他非指定的航空公司能在它们选择的城市设立办事处。我希望你能促进这一进程，这样可以加强美中人民的了解和沟通。

朱镕基： 我们愿继续积极考虑你的意见并给予积极的回应，希望有更好的结果。

参议员保罗·萨班斯： 总理先生，很高兴有机会和你见面。这次访华，是因为对美中关系感兴趣。你能否说明哪些问题导致美中关系更加复杂和困难，你认为在美中交往中什么是困难的问题?

朱镕基： 这个问题不在于中国。中美两国有很好的条件来致力于建立一种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很多问题都是支流，如果把支流当做主流，就会阻碍中美关系的发展。如果我们双方都从中美关系和世界形势的大局出发，中美关系就会顺利发展。

萨班斯： 我认为，美国人民对美中关系的看法受到人权问题的影响很大。中国在人权问题上的进步或倒退都对美国舆论影响很大，同样也影响到国会。

朱镕基： 我想，美国舆论对中国人权的报道与实际情况有很大差距。中国在人权方面取得了日新月异的进步。中国有近13亿人口，抓几个刑事犯罪分子，与人权问题无关，不应成为影响中美关系发展的

问题。我对现在的发展表示遗憾。我们愿意就人权问题进行对话，缩小分歧，不要搞对抗。越是对抗，越影响中美关系的大局。

众议员道格·贝罗伊特： 非常感谢你能抽时间会见我们。我期待你两周以后到国会山来访问。两个月前，我和其他50位参议员写信给克林顿总统，要求他与中国达成的关于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协议不是出于政治动机的协议，而是在商业上确实有意义的协议。现在美中贸易赤字每周增加10亿美元，这引起美国商界和农业界的不满。我是众议院国际关系委员会副主席，中国在商业上有意义的基础上加入世贸组织后，我愿意推动给予中国永久性正常贸易关系的进程。我们认为在这方面中国需要更多地开放金融市场，给银行、保险等投资者更多的市场准入。我们希望在市场准入方面更加开放。在我看来，中国要想在商业上有意义的基础上加入世贸组织，需要在不很长的时间内降低关税。这不仅有利于你领导下的国内改革，也有利于中国加入新一轮世贸组织在西雅图的谈判。请你谈一下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对中国有多重要?

朱镕基： 从去年下半年以来，中美关系出现了很大的困难，主要是很多美国人在许多问题上存有很大的误解，我愿意通过这次访问向美国人民解释一下实际情况，使美国人民对中美关系有正确的了解。中国在恢复关贸总协定缔约国地位和加入世贸组织的谈判上作了很大让步，连美国贸易代表都认为这些让步三五年前是不可想象的。中国就加入世贸组织问题已谈了13年。这些让步对于美国贸易代表已经是足够了，他们认为是可以接受了。但受到国会的压力，指责他们用原则做交易，所以他们又变得很强硬，越谈越难，用中国话来讲叫“得寸进尺”。因此不是中国，而是美国方面把经济问题变成了一个政治问题，因此很难达成协议了。你们的谈判代表巴尔舍夫斯基是部长级，而代表我方谈判的吴仪，相当于国务院副总理。在短短几天内，我见了巴尔舍夫斯基两次，每次会谈都超过两个小时。我是很少会见代表团达两个小时的，今天与你们这么重要的代表团会谈也不会超过两小时。昨天，我和巴尔舍夫斯基谈了一下午，原来想会很快达成协议，但昨天下午她的调子改了，又变得很强硬。为什么？我想你们国会给她的压力太大了。我方在市场准入、农业方面，如小麦矮腥黑穗病、柑橘和肉类检疫等方面都作了很大让步。你们的谈判代表也认为让步

已经够大了，但就是不肯签署这个协议。我今年70岁了，会见过无数外宾，从来还没有碰到过这么一个难对付的谈判对手。我想这已不是一个经济谈判，而是政治谈判。我希望美国人不要以为中国不加入世贸组织就活不下去了，不要有这样的想法。谈了13年，中国活得很好，而且活得越来越好。如果这次达不成协议，中国和世贸组织在3到5年内就再见了。这对中国影响不会很大，因为我们将继续发展与世界各国的双边贸易关系，但对美国是错失良机。在农业问题上，我们以前把进口小麦产地分为疫区和非疫区，现在可以不分了。这是一个极大的让步，已经冒了很大的风险了。电信业我们以前根本不开放，现在我们开放了，只设了投资比例的限制。即使美国的许多行业如民航也有投资比例的限制，不允许外国公司控股。中国在通信领域同意采用美国的CDMA①标准，大家都知道世界上大部分国家现在采用的是GSM②标准，只有几个国家采用CDMA标准，但我们仍同意采用。在这方面以及其他几个方面包括环保、能源、信息产业等的合作，有几千亿美元的生意。如果这些开放了，可以解决美国对华贸易逆差问题。如果美国不在出口方面进行限制，现在情况就不一样，中美贸易情况就会有很大改观。也许你们要问为什么中国要作这么大的让步，不是说中国不加入世贸组织也活得下去吗？原因是我们看到中美两个大国的合作对世界和平与发展有利，我们为此作出了牺牲。

---

① CDMA，是英文Code Division Multiple Access的缩写，意为码分多址，是一种数字通信技术。

② GSM，是英文Global System for Mobile的缩写，指全球移动通信系统。

美国去年统计对华贸易逆差是570亿美元，是否准确我也不想去争辩了。我们两国在统计方法上有区别。我只谈两点：第一，中国出口到美国的商品大多是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的消费品，这些产品在美国15年前就不生产了，进口这些商品有利于美国的产业调整。你不从中国进口，也得从别的国家进口，不然美国消费者就买不到价廉物美的商品，会通货膨胀。比如你们现在不从中国进口纺织品了，而从墨西哥进口，进口越多，普通美国人就得付出越多的钱。第二，中国出口的60%是加工贸易产品，也就是说，境外的企业家包括美国企业

家在华开设工厂，进口原材料，然后加工成制成品出口。原材料进口需要大量外汇，而中国只拿到出口商品所得的外汇的一小部分，没有得到很大的好处，要是这些都算到中国身上，那中国的外汇储备到年底也许就不是1450亿美元，而是3000多亿美元，成为世界第一了。但去年我一块美元也没拿到，都到日本、韩国和美国的企业家口袋里去了。所以，美国的对外贸易逆差是1690亿美元，变化不大，对韩国、对日本的贸易逆差减少了，对我们的增加了。这实际上是把这些国家的贸易顺差转到我们身上来了。所以我认为，解决贸易逆差问题对我们双方都有利，解决的方法是中美在信息、能源、环保等广泛领域开展合作，这里有几千亿美元的生意。如果美国放宽限制，中美贸易逆差问题很快就解决了。

众议员玛格·罗克玛： 我和贝罗伊特众议员有同样的问题，我很关注中国与巴尔舍夫斯基女士的谈判，希望你就贸易和关税壁垒以及商品倾销问题具体谈一下。大部分议员要求巴尔舍夫斯基女士就解决美中贸易逆差问题提出具体办法，但我目前还没看到能解决这一问题的证据。

朱镕基： 因为他们没有把谈判内容向你们公布，只是向你们吹了吹风，没有告诉你们我们作了多大让步。只要公开协议内容，美国人民会高兴的。

罗思： 总理先生，时间不多了。你对谈判作出了很多贡献。我想就谈判的重要性说几点我的看法。我认为你对推动美中关于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谈判作了很大的贡献。美国所要的是美国产品在中国市场的准入程度能和中国产品在美国市场的准入程度相同。我们之间的谈判很复杂，覆盖了很多领域，包括农业、电信工业、信息产业等。很重要的一点是，我希望在你领导下，继续这一谈判，使谈判继续取得进展，希望会有更多的进展。最终达成协议后，在美国，商业界和工会会逐条逐款地进行仔细审议。我认为今后谈判能有更多进展，最终取得成功，中国会加入世贸组织，这符合双方的利益。

众议员霍华德·伯曼： 你刚才谈到双方的谈判不是政治问题而是经济问题，但在美国国会变成了政治问题，你说得对。谈判是为了在经济领域方面达成协议，但许多议员把正常贸易关系或最惠国待遇和其

他一系列问题如核不扩散、人权、地缘政治等，加以综合考虑，那就会影响到最惠国待遇的问题。如果要使国会通过给予中国永久性正常贸易关系，这将是一场困难的斗争。因此，你对美国访问的重要性，我怎么强调都不过分。大部分美国民众不认为中国是潜在对手，不应和中国对抗，但他们的确很关心这些实实在在的事情。

朱镕基： 我同意你的意见。你们国会把经济问题变成政治问题了。中国也有人民，也有国会。由于美国在科索沃问题上对南斯拉夫动武，在联合国人权会议上提出反华议案，中国人民群情激昂，纷纷要求我不要访问美国。我不同意你们国会的一部分人，把人权、核不扩散与世贸组织和正常贸易关系等联系起来，这不符合世界和平与合作的潮流。

在美国总统克林顿举行的欢迎仪式上的讲话

(1999年4月8日)

应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威廉·杰斐逊·克林顿邀请，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朱镕基于1999年4月6日至14日对美国进行正式访问。4月8日，克林顿总统在白宫南草坪举行欢迎仪式。这是朱镕基同志在欢迎仪式上的讲话。

总统先生，

克林顿夫人，

女士们，先生们：

在这春光明媚的季节，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应克林顿总统的邀请来到你们美丽的国家，进行正式友好访问，我感到十分高兴。我受江泽民主席的委托，带着十二亿五千万中国人民的嘱托，向伟大的美国人民致以最诚挚的问候和最美好的祝愿。

过去18个月以来，江泽民主席和克林顿总统实现了成功互访，决定致力于建立建设性的战略伙伴关系。这种友好合作关系符合中美两国人民的利益，符合世界人民的利益，符合世界和平与国际合作的利益。中国人民将坚定不移地巩固和发展这种关系，世世代代地奋斗不息。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达国家，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我们同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我们两国的合作将为维护世界和平、防止战争和解决争端奠定稳固的基础。美国是世界上最繁荣强盛的国家，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潜在市场。我们两国在经济、贸易、科技等领域的紧密合作，将为世界人民的团结合作，为我们这个地球的繁荣昌盛带来美好的希望。美国是一个热爱自由、开放自强、充满活力的国家，中国是一个热爱和平、勤奋智慧、诚信自守的国家。我们两国建立在三个联合公报和政府联合声明的相互庄严承诺基础上的友谊是牢不可破的，是任何人离间不了的。在中美两国之间，没有任何问题不能通过友好协商得到解决。我们之间会有不同意见，只有能说不同意见的朋友，才是最好的朋友；只有诤友，才是挚友。

春天是播种的季节，是希望的季节。当我们到达你们的“阳光之城”洛杉矶的时候，是春雨连绵；当我们离开洛杉矶的时候，是雨过天晴；当我们到达华盛顿的时候，是阳光灿烂。当我们共同在这片美丽肥沃的土地上再次播下中美友好种子的时候，我们不能不缅怀缔造中美友好关系的先驱们、中国的和美国的先驱们。他们有的已经过世，有的仍然健在，我不能不对他们历史性的远见、英明果断的决策和始终不渝的努力，表示崇高的敬意和深切的怀念。

I love Chinese people, I love American people. Thank you. (我热爱中国人民，我热爱美国人民。谢谢！)


SEAL OF THE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1999年4月8日，朱镕基在美国总统克林顿举行的欢迎仪式上讲话。

在美国总统克林顿举行的欢迎晚宴上的讲话

(1999年4月8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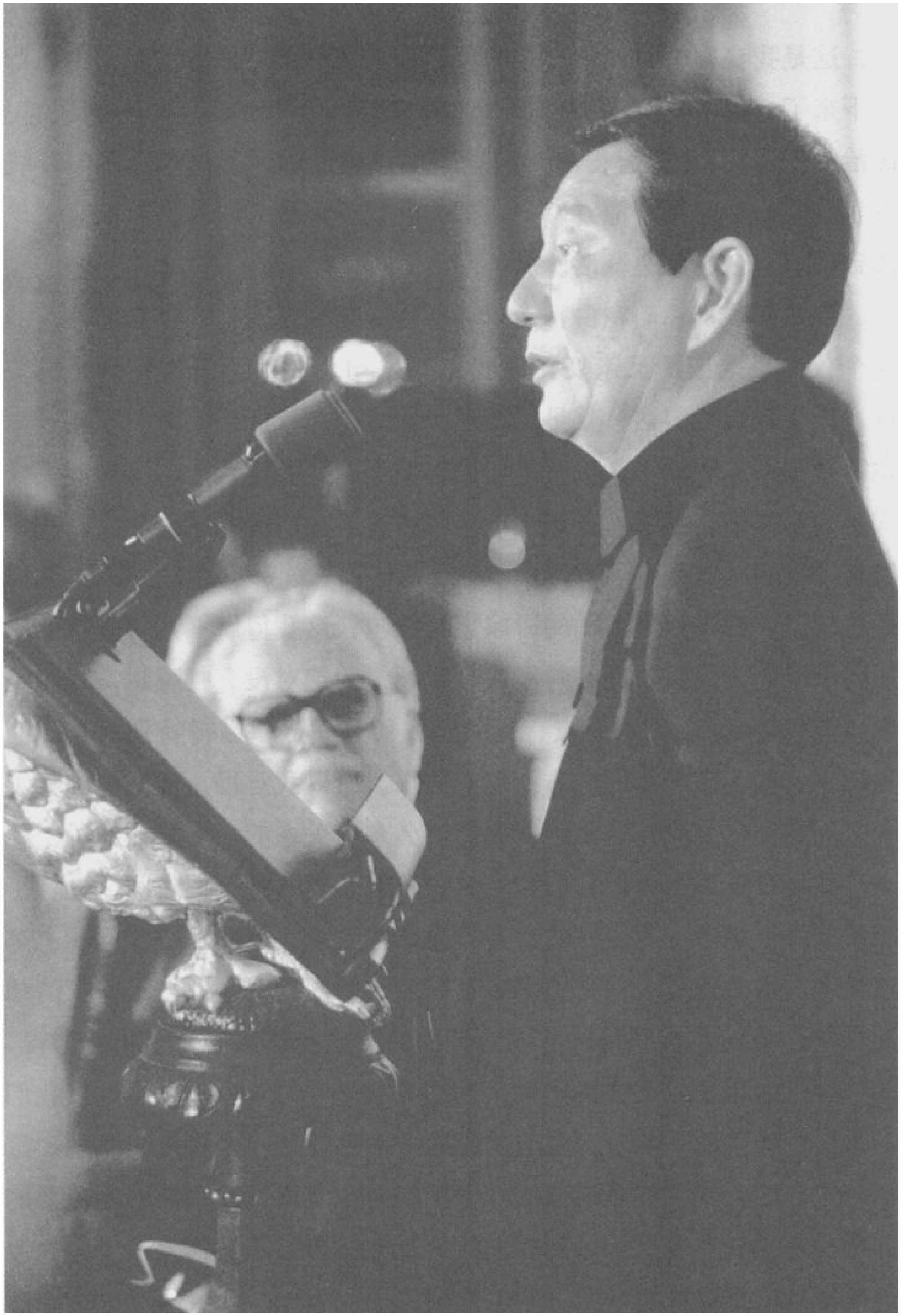
总统先生，

克林顿夫人，

女士们，先生们：

我和我的夫人以及我的同事，衷心地感谢克林顿总统和夫人为我们举行如此盛大的宴会。同时，我借此机会向美国政府和美国人民对我们盛情的款待，特别是我的美国老朋友们对我的热情支持，表示诚挚的感谢！

今年是中美建交20周年，我们两国之间的关系风风雨雨地走过了20周年。但是，我始终认为中美两国之间的友好合作关系，它的深度越来越深，它的广度越来越广，它的质量越来越高。尤其是当克林顿总统和江泽民主席实现了历史性的成功互访以后，中美两国正在致力于建立建设性的战略伙伴关系。这个关系是符合中美两国人民利益的，也是符合世界人民利益的，我们应该坚定不渝地坚持下去。我们任何朋友之间都会有不同的意见，但是我完全相信，中美两国之间的任何问题都是可以通过友好协商来得到解决的。我们的责任就是促进相互的了解，加强我们之间的交流。这样，我们就可以把中美两国的友谊发展得更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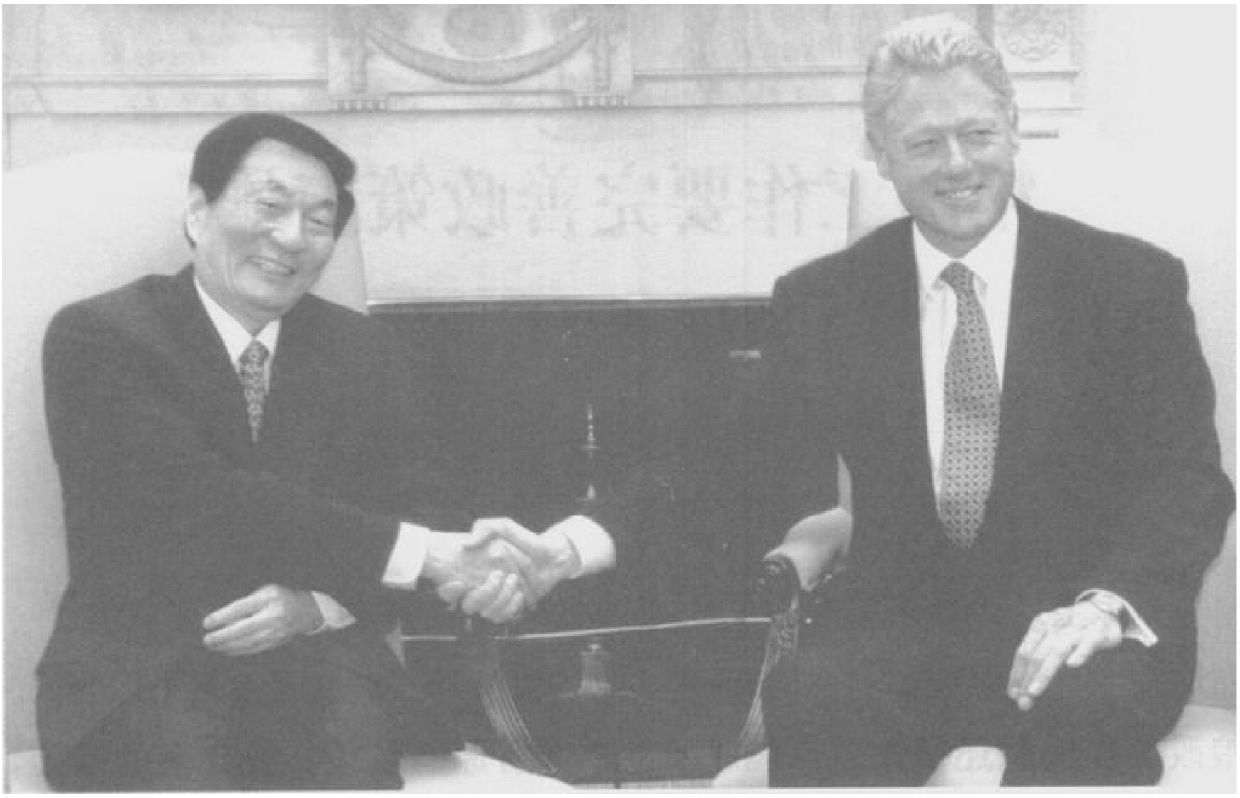


1999年4月8日，朱镕基在美国总统克林顿举行的欢迎晚宴上讲话。

刚才，克林顿总统谈到中国的文明，我今天在白宫就学习到了很多美国的文明。今天，我参观了林肯总统的卧室，看到了葛底斯堡演说，这是我在中学时代就读过的。我在那个时候可以背下来，现在背不下来 了，但是，of the people, by the peopleand for the people (民有、民治、民享)，还是背得出来的。同时，我也看到了当年罗斯福总统发表炉边谈话的那个地方。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就很高兴地读到了他著名的炉边谈话。

我尤其欣赏你们在白宫南草坪举行的欢迎仪式，在宴会前举行的这个仪式，既庄严又亲切，但我也要说句老实话。刚才克林顿总统讲，我喜欢说老实话。就是站在那个地方跟大家握手的时候，我一直站得腿都不能够动了。把我累坏了！但是，我始终认为，这种握手仪式是非常好的，能够增进每一个来宾和客人之间的联系。其实，我说累坏了是因为我已经70岁了，不像克林顿总统那么年轻。刚才克林顿总统讲，我看西方歌剧的时候想打瞌睡，这我得解释几句。请大家不要误以为，我听歌剧的时候在打瞌睡，我绝对没有打瞌睡，我只是说“想打瞌睡”。我不但没有打瞌睡，而且我鼓掌鼓得特别起劲，倒是恐怕有些不该鼓掌的地方我也在鼓掌。所以我觉得，加强中国和美国之间的文化交流，这是建立我们持久友谊关系的一个必要途径。

我可以告诉大家，我们和克林顿总统及他的同事们之间，进行了非常友好、坦诚、建设性的、富有成果的会谈。我们在很多问题上都达成了一致的意见，并在很多有不同意见的问题上，取得了一定的相互理解。我们在有些可以达成协议的方面已经达成了协议，比方说，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方面，我们将要发表一个联合声明；同时，我们对于这个谈判的一部分，也就是农业方面要签订一个协定。我想，这个协定一定会受到在座诸位的欢迎。但是我觉得，这次访问最重要的部分，还是我在今后陆续到你们的好几个城市去跟美国人民进行直接的接触，来加强中美两国之间的友谊。



1999年4月8日，朱镕基在华盛顿白宫与美国总统克林顿举行会谈。

我应该遵从克林顿总统的忠告。他告诉我，你们的一位前总统在讲演两个小时以后，就得病死了。所以，我不能再讲下去了。我学习林肯总统还是学习得不到家。他最短的一篇演说也就是在葛底斯堡发表的演说，只有两分半钟，但是直到今天仍然广为传诵。我相信，今后世界各国人民仍然会记住他的演说。

最后，我提议：

为中美两国人民的友谊，

为总统先生和夫人的健康，

为在座各位朋友的健康，

干杯！

粮改工作要完善政策措施

(1999年4月22日)

这是朱镕基同志在《国家计委、国家粮食储备局关于当前粮食流通体制改革情况的报告》上的批语。

请家宝①同志批转王春正①、高铁生①、陈耀邦①、王众孚①、谢旭人①、楼继伟①同志研究，要尽快召开一次全国粮改工作会议。粮改工作问题还很大，不能放松。要完善原有政策，提出新的措施，狠抓几个重点。例如，春小麦、早籼稻不能一律敞开收购，要大幅度降低收购价。要结合结构调整，拉开收购价质量档次；不能让粮食企业坐拿超储补贴，不积极销售粮食(要有组织措施)；工商管理局要狠抓粮食市场管理，不能有松懈情绪；要制订销售陈化粮的降价措施，下决心甩掉包袱；要研究发展饲料、畜牧业一条龙的配套措施。力争在夏收前(最好5月上旬)召开会议，请速提出政策性方案报国务院。

朱镕基

4.22

---

① 家宝，即温家宝。王春正，当时任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副主任。高铁生，当时任国家粮食储备局局长。陈耀邦，当时任农业部部长。王众孚，当时任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局长。谢旭人，当时任中国农业发展银行行长。楼继伟，当时任财政部副部长。

加强对非法集资的监管

(1999年4月24日)

1999年4月24日，中共中央办公厅《综合与摘报》第54期《今年以来因非法集资等问题引发的群体性事件突出》一文反映，据不完全统计，截至1999年4月15日，各地因非法集资、高息揽储及企业债券不能兑付等问题引发的群体性事件124起，参与人数3.2万人次，事件起数和参与人数呈逐月递增趋势。这是朱镕基同志在此文上的批语。

请相龙①、海旺①、明康①同志阅。抄报家宝①、罗干同志。非法高利集资屡禁不止，一方面是人行监管不力，要汲取教训，严明责任，切实加强监管。另一方面，要加强非法集资危害性的宣传，对过去发生的大案可公开披露，教育群众，指出贪图高利，必然血本无归，法律亦不能保护，国家不可能代偿。请作具体部署。

朱镕基

4.24

① 相龙，即戴相龙，当时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海旺，即阎海旺，当时任中共中央金融工作委员会副书记、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明康，即刘明康，当时任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家宝，即温家宝。

彻底整顿信托投资公司

(1999年5月8日)

1999年4月19日，中国人民银行向国务院呈报了《关于整顿信托投资公司工作进展情况的报告》，汇报了落实《整顿信托投资公司方案》的进展情况、主要问题及解决意见。国务院办公厅根据国务院领导同志批示，经与中国人民银行共同研究，就有关问题提出了建议。这是朱镕基同志在国务院办公厅签报上的批语。

对各地信托投资公司，要彻底整顿，坚决撤并。不是主观设定保留多少家(85家太多了)，而是要根据资产、负债情况和有无合格经营者等来确定，凡不符合条件的，一律撤牌。不要使此项改革半途而废，留下隐患。

朱镕基

5.8

尽快制订和颁布上市公司管理条例

(1999年5月12日)

这是朱镕基同志在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进一步规范和推进证券市场发展若干政策的请示》上的批语。

原则同意证监会的《请示》，要抓紧实施，有关部门要密切配合。采取分配指标、行政推荐的办法来确定上市公司，过去难以避免，现在看，弊端很大，还是要按市场经济的办法进行改革，要尽快制订和颁布《上市公司管理条例》，完善股票发行、上市制度，让经济效益好的符合上市条件的企业上市。股票市场要为国有企业三年脱困和推行股份制服务。

证券公司融资要严格防范风险，千万别为那些大量挪用客户保证金和亏损累累的“证券公司”大开方便之门，转移风险，加深隐患。应制订一系列的严格审查制度。关键是对证券公司要彻底整顿，该关的要关，决不徇情，消除隐患。

进行B股、H股回购和设立B股基金，可以试点，胆子可以大一些，总体风险不是很大。当然，也要周密考虑，谨慎行事。先立法(条例)，再试点，密切注视和加强监管。

朱镕基

5.12

原则同意证监会的《请示》，要抓紧实施，有关部门要密切配合。

采取分配指标、行政推荐的办法来确定上市公司，过去难以避免，现在看，弊端很大，还是要按市场经济的办法进行改革，要尽快制订和颁布《上市公司管理条例》，完善股票发行、上市制度，让经济效益好的符合上市条件的企业上市。股票市场要为国有企业三年脱困和推行股份制服务。

证券公司方面还要严格防范风险，千万别为那些大量挪用客户保证金和亏损累累的"证券公司"大开方便之门，转移风险，加深隐患。应制订一系列的严格审查制度。关键是对证券公司要结合整顿，该关的要关，决不徇情，清除隐患。

进行B股、H股回购和设立B股基金，可以试点，胆子可以大一些，这件风险不是很大的事，也要周密考虑，谨慎行事。先立法（条例），再试点，要密切注视和加强监管。

朱镕基

5.12.

彻查逃废银行贷款事件

(1999年5月27日)

1999年5月25日，《审计署关于审计唐山豪门集团公司1998年度财务收支及有关情况的报告》反映，豪门集团公司存在资产负债不实，亏损严重，拖欠大量贷款，无力偿还，巨额资金去向不明，有关人员涉嫌犯罪等问题，建议由中央金融工委牵头，采取果断措施，对其贷款进行清理，由检察机关立案侦查，并由有关部门对丢失档案问题进行调查。这是朱镕基同志在该报告上的批语。

如此巨额贷款，糊里糊涂借给私人公司，不闻不问，任其逃废，工、农、建、交等商业银行领导实应深刻检讨，还能无动于衷吗？！请阎海旺①同志负责会同有关部门查处到底。请罗干同志批示政法部门配合，要抓人。不管什么背景，都要抓出来法办。

(抄报家宝①、忠禹①同志)

朱镕基

5.27

① 阎海旺，当时任中共中央金融工作委员会副书记、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家宝，即温家宝。忠禹，即王忠禹。

科学的未来在于青年

(1999年6月10日)

这是朱镕基同志在纪念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实施五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经国务院批准于1994年设立，旨在促进青年科技人才成长，鼓励海外李者回国工作，培养和造就一批进入世界科技前沿的优秀学术带头人，1998年增设海外青年学者合作研究基金和香港青年学者合作研究基金。

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从1994年实施五年来，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一共资助了400多位杰出青年科学家，其中80%是海外留学回来的。这些科学家许多已经成长为学术带头人，有的成为中国科学院院士或中国工程院院士。我们为此感到非常高兴。这证明，科学基金制于选拔、培养、吸引和稳定科学家队伍能够起很大的作用。基金制是我国科技体制改革的重要成果。今天听了几位青年科学家的发言，说明新的一代科学家成长得很快、很好，我们很受鼓舞。从你们身上，我们看到了中国的希望、中华民族的希望。

目前我国与发达国家的最大差距，在于科技相对落后。我们要振兴中华，不甘落后，就必须尽快把科学技术搞上去。而要显著提高科技水平，就必须培养能够进入世界科技前沿的优秀带头人。发展科技的基础在教育，归根结底还是要发展教育。要提高教育质量，在普遍提高素质教育质量的基础上，科技才能发展起来。最近中央将要召开第三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对面向新世纪的教育改革和发展问题做出重要部署。中央决定增加对教育的投入。自1998年起至2002年的五年里，中央本级财政支出中，教育经费所占的比例每年要提高一个百分点。增加的钱是不少的，一定要把它用好。同时，要动员社会资源发展民办非义务教育，提高国民的素质。



1999年1月18日，朱镕基在福建省莆田市仙游县与枫亭麟山小学的老师亲切交谈。

科学基金制是一种很好的办法，有利于吸引人才、培养人才。我在前两天收到一封人民来信，说现在我们国家的技术移民大量流出，好多大学本科生，好多硕士、博士都跑到外国去了，那里工资高啊！因此，他建议国家应该制定出一个政策，凡是到外国去的技术移民，都要先收50万元的培养费。我看这个建议出发点是好的，但是并不一定有效。你收他50万元，他要走还是走，不会因为要交这50万元就不走了。积极的办法是要创造一个能让人才留在国内的机制，他们并不一定要追求像美国那样高的生活水平，他们追求的主要还是自己的事业嘛。应该让他们能够好好地工作，有充足的经费以及其他工作条件，使他们可以发挥长处；当然，也应该保证他们一定的生活水平，起码高于国内平均生活水平。我们应该做到这一点，这样才能够留住人才，中国才能发展。中国的发展需要人才，许多方面需要引进人才，但是，我们自己这么多人才却不培养，不发挥他们的作用，这怎么行呢？所以，我觉得应该有一套吸引人才、稳定人才、培养人才的办法，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创造了这种经验。

我很同意李政道①博士的结论，科学成就出于青年。他本人31岁就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嘛！爱因斯坦发表关于相对论的第一篇论文时也只有26岁。大量的事实证明，科学家成名都是在青年时代，特别是在物理学领域。解决21世纪科学技术的重大问题，当然也要依靠年轻人。科学的呆来在于青年。青年一代的茁壮成长，是我们事业兴旺发达的希望所在。

---

① 李政道，美籍华人物理学家，在1957年与杨振宁共同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

党和国家对青年科学家寄予厚望。大家都要有一种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要在世界科学前沿敢于拼搏，勇于创新，博采众长，提高学术水平。要牢记和发扬我国老一辈科学家“献身、创新、求实、协作”的精神，为祖国科技事业的腾飞作出更大贡献，成长为新世纪杰出的科学家。希望你们要争气，志存高远，自强不息，为全国青年科技工作者做出榜样。目前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许多领域都有重大课题需要研究和攻关，正是科技人才大显身手的好机会。

刚才，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的同志要求，希望增加一些杰出青年科学基金。他们说现在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一年可以动用7000万元，要求增加1.1亿元。我们原则同意。我担心你们这个钱用不出去，不要钱多了，就降低人才标准，这就不好了，那我这个钱加的冤枉啊！你们还是要坚持标准。江泽民总书记说过，要目光远大，筹划未来，综观全局，突出重点，有所为有所不为。我们要按照江总书记的指示，把基金的评选工作做好。

最后，我对过去获奖的杰出青年科学家表示祝贺！希望所有青年科学家都能更快地成长！希望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能够办得越来越好，为中国现代化事业发展和中华民族振兴作出更大的贡献！

海关要从湛江走私案中吸取教训

(1999年6月17日)

1998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一场打击走私犯罪活动的专项斗争，破获了湛江特大走私案，一批案犯被依法严惩。湛江海关在走私分子的糖衣炮弹攻击下，从关长到一些重要岗位的干部，乃至湛江市委、市政府一些主要负责人，都被走私集团所收买，沦为走私集团的保护伞，给党和国家造成了巨大损失。案件结束后，中共海关总署党组向中共中央、国务院做了检讨。这是朱镕基同志在《海关总署党组关于湛江案件问题的检讨》上的批语。

湛江一案的查处，既是坏事，又是好事，既纯洁了内部，又促进了海关税收的猛增。关键是要吸取教训，提高认识，振作精神，廉洁治关。公生明、廉生威，雄关如铁，祖国增辉。全国海关都要反求诸己，腐败决不止于湛江一案。

朱镕基

6.17

加快住房制度改革

(1999年6月22日)

1998年7月3日，《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加快住房建设的通知》指出：停止住房实物分配，逐步实行住房分配货币化，建立和完善以经济适用住房为主的多层次城镇住房供应体系。对不同收入家庭实行不同的住房供应政策。最低收入家庭租赁由政府或单位提供的廉租住房，中低收入家庭购买经济适用住房，其他收入高的家庭购买、租赁市场价商品住房。同时提出，要调整住房投资结构，重点发展经济适用住房(“安居工程”)，加快解决城镇住房困难居民的住房问题。新建的经济适用住房出售价格实行政府指导价，按保本微利原则确定。为了进一步推动住房制度改革，1999年6月22日，朱镕基同志在浙江省主持召开住房制度改革座谈会。这是朱镕基同志在座谈会上讲话的主要部分。

大家都知道，现在国民经济的主要问题是生产能力很大，需求不足，供需矛盾变得越来越尖锐，推动消费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推动消费，说起来是件好事情，但做起来很不容易。对农村来说，目前最重要的是通电、通公路，这样才能够启动农村的需求。对城市来说，首先要解决的是住房问题，特别是住房制度改革进行这么久了，人民群众还是不大了解改革要走向何处去，所以存了很多钱，现在还没有到大量地把钱拿出来买房子的时候。其次是教育，老百姓存的钱，很大一部分是为了自己的儿女将来能够受教育。

今天就把题目放在住房问题上，因为我始终认为对住房的需求还是最大的需求，也是最符合人民群众要求的。最近，我们对北京市包括中央机关住房制度改革的政策，做了进一步的研究，准备发一个文件，给大家通报一下，以供参考。同时，我们也想了解一下，各个省区市进行的住房制度改革目前究竟是怎么样一个状况，存在什么问题，应该采取什么政策，才能够推动住房需求的发展、住房产业的发展。今天请大家来谈一谈，畅所欲言。住房制度改革全国统一的政策就是住房商品化，在这个前提下，各地可以有自己具体的办法。我们

这里讲的房改，是指机关和事业单位的房改。企业的房改，主要推行国家规定的住房公积金制度就可以了。



1999年6月22日，朱镕基在浙江省杭州市主持召开住房制度改革座谈会并讲话。右为浙江省委书记张德江，左为浙江省省长柴松岳。

刚才，听了大家的发言，我概括一下：

第一个问题，就是要加快房改进程。浙江省的房改潜力很大，从机关和事业单位来看，起码三分之二还没有房改。机关现在还是靠分房子，真正买得起房子的人还是少数。这就证明房改还要大规模地推进，把实物分配变成货币分配，这样才能拉动住房及相关产业的发展。

第二个问题，就是要提高房租，使群众买房子有内在要求。如果分到的房子租金很贵，还不如自己去买一个，大家就会有买房的积极性。这一点杭州做得比北京好，还要继续坚持进行。从北京市来看，我们觉得要大规模地提高房租，每平方米1.5元还不够，恐怕要3元、4元、5元甚至10元钱才能鼓励大家买房。这样大规模地提高房租，不给

补贴是不行的。现在大家为什么只存钱不消费？就是对改革的预期心理，总觉得出台的改革措施，都是要自己花钱，孩子的教育费用、房租的提高，各种生活服务设施收费的提高，都要增加个人支出，所以先把钱存着。我们现在开始注意这个问题，不能使大家认为改革就是让大家多出钱，那他们就越来越不敢消费。另外，在目前房价很高的情况下，买房子靠工资是绝对不够的。所以，还要把原来搞实物分配时投资住房的钱拿出来补贴给个人，这样，财政开支没有增加，只是转换了一个形式。这也是一个办法。但是，究竟补贴个人多少，需要根据各个地方的不同情况进行研究。我刚才讲的北京市的情况，大概在三环路以外适中的地区，按房价每平方米4000元估算，一个中等工龄的人，七折八扣，每平方米可以补贴1300元，如果是双职工就补足2600元，剩下的1400元由他们自己出。如果个人拿房价的三分之一，要给他提供长期住房消费信贷。比方说，贷款年限20年到30年，利息比较低。现在住房贷款6%的利率太高，要允许每个银行在规定的利率基础上向下浮动30%，银行之间可以竞争，薄利多销嘛。

第三个问题，就是发展住房二级市场。要尽快建立住房二级市场，最大的问题就是“级差地租”。土地的增值，主要是指随着城市发展起来以后，不同地段的地价会有不同程度的提高，而且很可能占了房价的很大一部分，这一部分利润不能够完全归个人，因为它主要是靠国家投资的城市建设而增值的。要根据历年地价的涨落情况，以及“级差地租”变化情况，把一个城市分成几个地段，规定不同的税率。对这个事情要很好地研究。同时，随着住房二级市场的开发，一系列的产业都会形成。比方说，住房的经纪人，这是一个很大的行业，可以容纳很多人就业。请大家要抓紧研究住房二级市场的问题。

第四个问题，就是房改房的房龄问题。我看，房龄达到15年、20年以上的，只要不是别墅、四合院，就卖给个人算了。这一批房子的折旧差不多已经折光了，可以便宜一点卖给个人，实际上是作为一种干部福利。因为有这种房子的人，工龄一般比较长或者贡献比较多。部级干部的住房也可以卖，但是要有个限制，单独的别墅、单独的四合院不行。房龄要有一定的限制，如果是最近盖的房子，你七折八扣卖给个人那不得了。几千元钱一平方米盖的房子，几百元就卖给个人，这是分配不公啊！对这个问题要再研究一下。

扶持中小企业要有选择

(1999年6月24日)

这是朱镕基同志在浙江省考察工作期间，听取省委、省政府工作汇报时的一段插话。

扶持中小企业要明确扶持什么、达到什么目的，这是个非常重大的问题。现在我们很多中小企业是乡镇企业，过去上的时候是一哄而起，当时产品是有市场的，但现在它们的很多产品已经没有市场了。国有企业的东西都销不出去，现在要把这些中小企业扶持起来，是扶不了的。

那天我看电视，报道浙江省有4300万吨水泥的生产能力，显然没有那么大市场，而且都是小型的生产企业，污染环境非常厉害。我记得1995年来浙江，到过金华，沿路都是乌烟瘴气，水泥厂把青山绿水都给变色了。那些也是中小企业，你能扶持吗？不能扶持啊！你们要搞嘉兴电厂二期，但要压小电厂。小电厂长期污染环境，效率不高，煤耗很高，也不能扶持。小化工厂、小造纸厂能够扶持吗？它们也都是大量地污染环境，又没有效益，借钱给它们也是白搭。所以，一般地讲扶持中小企业，指导性不强，太抽象，太一般。扶持中小企业要有选择，要向知识经济型发展，要有新的产品，有新的工艺，能够提高质量，提高效益，满足市场的一些需要。发展知识型中小企业、科技型中小企业，应该鼓励。印度等国家有很多政策鼓励发展信息产业、软件产业，它们实际上是一种知识型产业，不需要有很多设备，但是搞起来以后是很有前途的。我现在让四大国有商业银行都成立中小企业信贷部，就是扶持中小企业的。但是非常明确的一点，是要扶持知识型的、科技型的中小企业，不是像过去扶持乡镇企业那样去搞中小企业。在目前情况下，在整个经济结构进行大调整的时期里，怎么扶持中小企业是一个值得很好研究的问题，需要具体化。银行也要想得通，如果它这几个人组成的中小企业是真正有技术、真正懂市场的，即使它没有一点资产来抵押，你也应该冒这个风险来支持它。当然，

银行的贷款利率可以浮动，可以提高，因为它风险很大。有些有风险的中小企业，因为它们有人才，愿意付这个高利息，一旦成功以后，它们的回报足以偿付银行的高利息。这个问题很值得研究，特别是浙江省是以中小企业起家的，没有多少大型企业，国有企业只有10%。究竟怎样扶持中小企业，我觉得省委、省政府可以组织银行一起来研究这个问题，要有一些突破。

推进国防科技工业的改革和发展

(1999年7月1日)

这是朱镕基同志在国防科技工业十大军工集团公司成立大会上的讲话。

今天是党的生日。五个军工总公司①经过改组，十大军工集团公司②今天正式宣布成立！这是国防科技工业体制改革的重大成果，也是我们国家的一件大事。我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向原五个军工总公司和新组建的企业集团广大干部职工表示祝贺！

---

① 五个军工总公司，指原中国兵器工业总公司、中国航空工业总公司、中国航天工业总公司、中国船舶工业总公司、中国核工业总公司。

② 十大军工集团公司，指中国兵器工业集团公司、中国兵器装备集团公司、中国航空工业第一集团公司、中国航空工业第二集团公司、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中国航天机电集团公司、中国船舶工业集团公司、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中国核工业集团公司、中国核工业建设集团公司。

国防科技工业非常重要，是一个战略性产业，是国防现代化的重要物质技术基础，也是综合国力的重要体现。没有国防科技工业就没有国防，没有国防就没有国家的安全。近50年来，在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的正确领导下，我国国防科技工业坚持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为巩固国防和壮大国力作出了巨大贡献。改革开放以来，军工战线广大干部职工认真贯彻邓小平同志提出的“军民结合、平战结合、军品优先、以民养军”的16字方针，在确保军品任务的前提下，大力发展民品和高新技术产业，成为经济建设中一支重要的有生力量。没有国防科技工业取得的成就，我们国家在国际上就不可能有今天这样的威望。对于各军工总公司所做的大量工作和取得的成绩，应当予以充分肯定。但是，由于多方面的原因，当

前我国国防科技工业还很不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科技基础薄弱，武器装备发展与部队的需求相比差距很大；力量分散，重复建设严重，结构很不合理；企业改革滞后，机制不活，冗员多，效益差。这些使得国防科技工业成为全国最困难的行业之一。

这次国防科技工业体制改革，是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根据国际、国内形势发展和国防科技工业的现状，反复听取各有关方面的意见后作出的重要决策。各军工总公司改组为若干集团公司，要着力解决五个方面的问题：一是政企分开；二是建立适度竞争的机制；三是科技力量适当集中，确保武器装备的生产和发展；四是促进国防科技工业的合理布局和结构调整；五是有利于企业搞活和脱困。通过改革，建立起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政企分开、产研结合、供需分离、精干高效的管理体制，为跨世纪长远发展打好基础。

国防科技工业的改革和发展任重道远，还需要付出极大的努力。下面，我对下一步的工作讲几点意见。

第一，进一步解放思想，更新观念，转变职能，真正把政企分开这件事情做好。国防科工委是国务院的职能部门，要切实加强行业管理，主要职责是搞好行业规划、行业政策、行业法规、行业标准和行业监督，加强宏观调控和组织协调。其他事情少管一点。集团公司和过去的总公司不一样，总公司带有一定的行政管理性质，现在政企分开了，要把集团公司真正办成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经济实体。集团公司要严格按照经济规律办事，自己负责，亏损了自己想办法。集团公司下面的企业都是独立的经济实体和市场主体，集团公司要满腔热情地支持它们搞活，把应该管的事情管好，把不应该管的事情坚决放下去，不要干预过多；干预越多，企业越难实行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处理好这几个环节的关系，是这次国防科技工业机构改革成功的一个关键。要使企业集团真正搞活了，而不是搞死了，既要有竞争、有压力，又要有配合、有协调。

第二，加快武器装备的发展，千方百计满足部队的需要。企业集团组建以后，国防科工委和各集团公司都要牢固树立“保军”、为国防现代化服务的思想，坚决完成武器装备研制、生产、保障的任务。“保军”就是保军队的需要，这是国防科技工业的首要任务、头等大事，要

认真抓好，特别是要把具有战略意义的“杀手锏”武器装备搞上去。同时，要不断提高武器装备的科研水平，增强国防科技工业的发展后劲。部队也要支持国防科技工业。我一直主张，部队买国防科技工业的武器装备，价格应该是成本加一定的利润，要让国防科技工业的企业能够活下去。如果国防科技工业企业赔本卖产品，就无法进行经济核算，无法考核，无法比较，也无法促进国防科技工业的进步。总之，“保军”是我们最重要的任务、首要的任务、全力以赴的任务，同时希望部队也要支持国防科技工业企业的发展。

第三，采取坚决措施，加快国防科技工业结构调整和企事业单位战略性重组步伐。当前国防科技工业的种种矛盾，很多是由于结构不合理造成的。各级领导干部都要提高对结构调整紧迫性的认识，统一思想，下定决心，切实打好结构调整的攻坚战。要通过军、民品分线和关停、转产一部分企业，尽快把那些不需要的而又落后的生产能力压下来；广泛采用先进技术，加强技术改造，把真正需要的东西搞上去。要通过适度竞争、优胜劣汰，进一步搞好军工企事业单位的战略性重组，从而达到浓缩、精干军工的目的。

第四，坚持“军民结合”方针，大力发展军民两用技术。要在确保军品任务的前提下，真正按照市场需求，加强科技开发和产品开发。要充分发挥人才、技术、设备优势，着力开发军民两用技术，发展高新技术产品和高新技术产业，推动军工技术向民用技术的转移。这是“保军促民”的一个重要方面。只靠“保军”，还不能满足国防科技工业自我发展的要求，必须搞民用产品。在别的一些国家，例如美国的通用电气、通用汽车、波音公司，都是既生产军品，又生产民品；没有只生产军品而不生产民品的企业。发展民品，不仅是为了使国防科技工业企业不亏损，能够发展自己，加强科研，更好地“保军”，而且也是为了促进民用工业的发展。国防科技是最先进的科技，是能够促进民用工业发展的，是能够给民用工业带来活力的。国防科技工业企业的领导和职工都要明确，这次成立的十大集团公司，“保军”是首要任务，同时必须大力发展民品。要把军事工业技术移植到民用工业上来，把保证军事工业产品的那种严格的管理、严格的质量要求、严格的工作态度转移到民品的生产方面来，给所有的民用工业带一个头，树立一

个榜样。要真正做到，从国防科技工业企业出来的民用产品都是顶呱呱的，技术是先进的，产品质量是优良的。

目前，国防科技工业的军民结合还没有达到很好的状态。“保军”当然是首要的、重要的，但民品也要做好，民品做不好也有损企业的信誉，使企业活不了。特别是船舶企业，不搞民品怎么行？不搞出口就活不下去。我们有这么大的船舶生产能力，要把订货拉进来，把民用船舶打出去，打到国际市场，为船舶企业的生存和发展积累后劲，这样才能够更好地“保军”。所以，国防科技工业企业无论如何要把民品生产搞上去，采取与军品生产同样的态度，抓得紧，抓得严，否则就没有信誉，没有市场。

第五，深化企业改革，加快国防科技工业企业脱困的步伐。要从国防科技工业的实际出发，按照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方向，把企业改革、改组、改造和加强内部管理紧密结合起来，转换经营机制，增强企业活力，提高经济效益，千方百计搞好企业扭亏脱困工作。要把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国有企业改革的各项方针、政策、措施落到实处，知难而进，扎实工作，力争用三年左右时间，使大多数国有大中型亏损企业摆脱困境，为21世纪的更好发展奠定基础。

促进我国国防科技工业的发展，既需要这条战线的广大干部、职工艰苦奋斗，积极进取，也需要各方面的大力支持。国务院有关部门和各地人民政府要充分认识加强国防科技工业建设的重要性，认真研究解决国防科技工业改革、调整和发展中的问题，共同完成振兴国防科技工业的历史使命。

搞“豆腐渣工程”公理难容

(1999年7月7日)

1999年7月6日，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节目报道，湖北省荆州市燕窝镇长江提段新修建的提坝加固工程有一段是“豆腐渣工程”。这是朱镕基同志关于此事件的批语。

请国办通知湖北省委、省政府、计委、水利部、财政部：请志杰①、祝平①同志看一下7月6日的《焦点访谈》。并请培炎①、恕诚①、怀诚①同志组织机关干部看看。如果千里长江大堤，质量大抵如此，则中国危矣，而我等均该骂名千古。曾记去年今日，解放军牺牲生命保卫洪湖大堤，而今一撮蛀虫公然克扣国库公帑，置百万人民生命于不顾，政府诸公视而无睹，国法何在，公理难容。请岚清①、忠禹①同志核示。

朱镕基

7.7

---

① 志杰，即贾志杰，当时任中共湖北省委书记。祝平，即蒋祝平，当时任湖北省省长。培炎，即曾培炎，当时任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主任。恕诚，即汪恕诚，当时任水利部部长。怀诚，即项怀诚，当时任财政部部长。岚清，即李岚清。忠禹，即王忠禹。

克服麻痹思想，做好防汛准备工作

(1999年7月13日)

1999年7月12日至13日，朱镕基同志在发生燕窝镇事件以后，到湖北、江西两省考察防汛抗洪工作，先后考察了汉口长江干提、九江永安大提的综合整治情况，并于考察期间在湖北省武汉市主持召开了长江沿江五省一市(湖北、湖南、江西、安徽、江苏省及重庆市)负责同志参加的长江防汛工作座谈会。这是朱镕基同志在座谈会上讲话的主要部分。

关于今年的防汛工作，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已召开会议做了部署。为什么今天我们还要来湖北省召开长江防汛工作座谈会呢？因为最近出现了许多情况，使我们十分忧虑，我也向江泽民总书记报告了。我们都觉得有必要到这里来召开一次长江防汛工作座谈会，以引起大家的注意，防患于未然。第一，今年的汛期来得早，雨量比较大。长江下游的杭嘉湖平原和太湖流域暴雨灾情很严重，湖南省、安徽省的部分地区都是强降雨天气，造成了很大的灾害。湖北省今年的内涝、雨量比去年严重得多，现在受灾的就已达2200多万人。这种来势汹汹的情况使我们十分忧虑。第二，去年遭受特大洪水来袭以后，我们加强了水利工程建设，修复了水毁工程，但是堤防的标准仍比较低，施工的强度比较大，期限很紧。到现在，很多工程没有作防渗处理，迎水面也没有处理，堤防能不能经得起这次洪水的考验，令我们十分担忧。而且就在我们刚修的工程里，已经发现质量不好的情况，出现了很多险情。第三，在我们领导干部中间，存在一定的麻痹思想和自满情绪，这是非常危险的。

麻痹思想和自满情绪来自于何方呢？主要是三个方面：一是去年经过了一个大汛，今年是不是还会来呢？大风大浪都经过了，还有什么可怕的呢？历史上连续两年的大水比较少，但是自然界的规律是很难讲的，不是有人讲“姊妹水”吗？就是第一年水来了第二年又来，这个情况还是有的。我们恰巧遇到了概率小的一面，因而如果侥幸认为今年可能不会来那么大的水了，这很危险。二是对于堤防质量的盲目自满

情绪。以为花了这么多钱，堤就一定修得好，能够经得住考验。实际上，由于我们从设计、施工到监理、监督，这一系列的机制不健全，有再大的本事也不能保证堤防的安全。“千里之堤，溃于蚁穴”。99%的堤防修得好，只要有一处修得不好，堤防就全部溃败了。因此，这种自满的情绪是非常有害的，要实事求是地看待问题。三是我们今年的工作任务比较重，各种中心工作都压下来了。而且，今年的经济情况还存在隐患，下岗工人比较多，社会不是那么稳定，又加上机构改革，特别是当前的中心任务“三讲”教育，要花掉领导的很多精力。

我们要统筹安排，把精力集中在防汛这个重要任务上。如果精力分散，稍有麻痹自满，就抓不到点子上去。现在非常有必要寻找麻痹思想和自满情绪的这三种根源，并把它们一扫而光。最重要的，是要抓紧统一认识，加强措施，做好准备，避免出现大决口。一定要教育各级干部，首先是领导干部要端正认识，做好防大汛的准备，做好和去年一样的防大汛的思想准备，如果侥幸麻痹，将来要吃大亏。要告诉人民群众，整修的堤防现在没有经过考验，是匆匆忙忙搞起来的，成绩很大，但问题不少。要批评那种以为没有大汛，又有堤防，可以高枕无忧，甚至于固若金汤的思想。今年防汛工作的立足点，就是要防住跟去年一样大的汛，要做好这种准备。刚才我还和广州军区的领导同志打招呼，向陶伯钧①司令员问个好，恐怕今年我们还得麻烦他们，但是我们有责任今年不能再牺牲解放军将士，否则对不起这些最可爱的人。

---

① 陶伯钧，当时任广州军区司令员。

堤防能不能经得起洪水的考验，还不知道，要进行一次全面的质量大检查。大家都要到堤上去走一走，主要领导要亲临堤防现场走一趟。群众监督是好事，他们最了解堤防的质量，要听取他们的意见，不能把提意见的人抓起来。关于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节目7月6日反映湖北省荆州市燕窝镇提段的问题，我始终认为是符合事实的，没有夸大，没有失实，是根据事实讲话，没有作任何推论，大家可以再把录像带调出来看看。我认为，应该欢迎舆论，欢迎群众对我们的工作提出意见。有什么可怕的？瑕不掩瑜！湖北省1577公里的长江堤防经过短短的时间整修了1477公里，其中1100多公里是干堤，这么大的

工程，这么伟大的成绩，只有1公里出了问题，难道能够否定成绩吗？一定要从严要求，通过把这个事情查到底来教育干部群众，而不是掩盖它的真相。检查组的报告我看了，有好多专家签字，但是你们知不知道，这个事情暴露以后，你们过了一个多星期才上堤。只要有一天的时间，就可以把质量问题全部掩盖。你们从技术上看得多，但是对当前基层干部的作风情况估计不足。如果昨天讲的那些反证，足以推翻《焦点访谈》报道的话，为什么不保留现场？钎子一插进去两米多深、松松垮垮的地方怎么不保留？雨水冲刷出一道道的沟为什么不保留？匆匆忙忙把它碾压起来干什么？我在出问题的堤段查看时，一个当地干部对我说，您拿钎子再插插看，您插得动吗？把我当傻瓜呀，你都精心准备好了向我汇报，让我去插钎子，我能插得动吗？我没看见揭发质量问题的个体户李伟，是不是被抓起来了？不要抓人，反映情况的群众不是别有用心，也不是神经病，他们出于对自己生命、财产安全的考虑，要欢迎他们提意见。当事人都不在，不足以反证，不足以推翻《焦点访谈》的报道。荆州市委书记说他去了五次，五次不算多。这么重要的洪湖大堤，去年这儿还牺牲过人，你去五次算多吗？我就不相信你是天天站在燕窝镇看着他们施工的，你能拍胸脯吗？不要过分相信自己，恐怕你和我一样受蒙骗了。哪怕只是千分之一的缺点，但是它的政治意义很大，还是要查到底。第一，不把这件事情查清楚，如果堤防里面都是“豆腐渣”，只是在上面碾两下子，将来洪水冲垮大堤的时候，损失得有多大！第二，如果这里面有干部在徇私舞弊，你放过了他，你是害了他。我们干部的作风如果都是这个样子，就太可怕了。我觉得，从爱护干部、整顿我们党内的作风来讲，要把这个事情查到底。我希望长江流域各省市领导不要有盲目自满的情绪，你们那里绝对不只1%的问题。你们要查，亲自去查，发动群众来揭发。干部层层汇报是没有用处的，他们都是当事人，都牵扯在里面，能跟你说得清吗？只有听群众的意见。特别是那些堤防险段，你们要下工夫去查。这就是这次开防汛工作座谈会的意义所在。我们要统一认识，下去检查，准备防大汛。



1999年7月12日，朱镕基在湖北省洪湖市长江干堤七家垸与防汛人员亲切交谈。

当前应该赶快采取以下几条防汛的具体措施：第一，统一认识，前面已经讲过了。第二，明确责任制。要层层落实责任制，上面是省委书记、省长责任制，下面也得是市委书记、市长及县委书记、县长责任制，而且是终身的责任制，不管你将来调到哪儿，都要追究你的责任。同志们，今年绝不允许长江决堤，今年是新中国成立50周年大庆，如果我们这里是汪洋泽国，那怎么得了！特别是今年已经投进去几百亿元，假如结果还是决口一大块、汪洋一大片，我们怎么向人民交代？ 一定要把工作做在前面。第三，汛前大检查。前面已经说过了，拜托大家亲自出马，长江流域各省市主要领导要对几千里长江大堤进行全面的大检查。当然，要着重于重点险情地段，发动各种监督，包括群众监督，找出问题，及早补救。第四，今年的防汛抢险队伍和器材要及时到位，准备工作要超过去年。防汛队伍的组织、防汛器材的储备，要超过去年的水平。希望你们现在先自力更生，赶快准备起来，该补什么，做个计划，自己能解决多少，然后如实向中央报告，这笔钱中央还是得拿。第五，密切配合、分工合作，加强科学调度，错开洪峰，确保大堤安全。去年，湖北省这方面工作做得比较

好，利用隔河岩水库、宜昌葛洲坝蓄水放水，严格按照科学规律办事，错开洪峰，对确保大堤安全有很大好处。长江水利委员会应该在这方面发挥作用。各部门、各地区都要分工配合，密切协作，统筹协调，有时候要牺牲局部，服从大局。特别是湖北省要把此项工作及早抓起来。第六，已经受灾的地区的救助工作要加强。今年与去年同期相比，受灾人口大大增加，受灾区域更广。现在要加强救灾工作，中央拨了少数的救灾补助资金，还得靠大家把这个工作做好，以免将来困难越来越大。趁着现在还能腾出手来，赶快抓紧准备。



1999年7月13日，朱镕基在江西省九江市城防大堤考察长江防汛工作。

关于如何保证堤防的建设质量问题，我想强调几点：第一，堤防质量实行行政首长负责制，工程由谁负责、谁设计、谁施工、谁监理，都要签字画押，以便将来出现问题能够追究责任。第二，提防工程的设计一定要由国家认定的合格单位来做，而且要进行招投标。但是谁来认定，有关文件里没有规定，至少得由水利部来认定。要有严格的规定，没有严格的规定，质量怎么保证？设计可以招投标，但一定要

由长江水利委员会抓总，长江水利委员会要制定一个设计标准，不符合标准的，设计就不能通过。第三，施工的招投标。现在要赶快认定一些合格的施工单位，除此之外，其他单位不许参加投标。严禁转包，措施要细化，要加强防范。第四，工程监理与施工单位要严格分开，不能搞一条龙。没有任何亲疏关系，才能保证它的公正。监理单位的资格也应该由水利部来认定，建设单位通过竞争择优选定监理单位。监理的形式有多种，包括旁站监理，即重要堤段监理人24小时站在旁边监督。治理长江绝不是一年两年，也不仅是我这个任期的事情。我估计每年都得有这么大的投入，一年250亿元还得往里投。如果仅仅需要1200亿元就好办了，五年就投完了，但我估计五年完不了。汪恕诚①同志，你考虑一下，长江水利委员会如何参加长江整治中间的监理工作和全线的监督工作，最后还要全线把关。总之，我认为要建立这个机制，必须有一套非常严密的规定。

---

① 汪恕诚，当时任水利部部长。

完善宏观调控政策措施，制止经济增长下滑趋势

(1999年7月15日)

1999年上半年，我国经济出现了通货紧缩的趋势，经济增速逐步放慢。为及时扭转这种形势，保持经济的较快增长，中共中央、国务院转发了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关于当前经济形势和对策建议》，并于7月15日在北京召开了省、部长经济工作座谈会。这是朱镕基同志在座谈会上的讲话。

这次省、部长经济工作座谈会，是根据江泽民同志的意见，由党中央、国务院召开的。主要任务是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转发〈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关于当前经济形势和对策建议〉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精神，进一步统一思想，做好今年下半年经济工作。为了使大家深入理解中央关于经济工作的决策和部署，我讲几个问题。

一、中央决策的形成过程和依据

《通知》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文件。这是中央为解决当前经济生活中的突出问题，保持经济发展良好势头做出的重大决策和部署。这一决策和部署经过反复研究，是建立在全面估量和分析当前经济形势的基础上的。

今年4月以来，党中央、国务院多次研究了我国经济形势。总的看法是：今年的经济发展开局是好的。国民经济保持较快增长，生产建设各方面都比较好，财政收入增幅较高，金融运行平稳。这些成绩的取得，说明去年以来中央针对亚洲金融危机和国内特大洪涝灾害所采取的扩大内需和积极的财政政策是正确的，效果是明显的。同时也应清醒地看到，我们在前进中遇到了许多新情况、新问题。特别是今年3月份以后，国际、国内形势又发生了一些新的变化，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外部环境更加复杂，国内经济生活中的一些深层次问题更加明显地表现出来，有效需求不足的矛盾尤为突出。外贸出口和外商直接投资下降，消费需求不振，固定资产投资增长放慢，物价总水平持续下降。因此，经济增长速度出现了下滑的趋势。



1999年7月15日，朱镕基、胡锦涛、李岚清等中央领导同志出席省、部长经济工作座谈会。

经济情况的变化，集中地表现为经济增长速度逐步放慢。今年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比去年同期增长7.6%，其中第二季度只有7.1%，低于第一季度的8.3%；工业增加值在第二季度同比增长9%，也低于第一季度的10.1%。考虑到去年第二季度经济增长速度基数较低，今年上半年经济增长速度回落更值得注意。而去年下半年经济回升快，基数较高。如果不采取有力措施，今年国民经济就难以保持较快增长的势头，全年很有可能低于7%的预期目标，整个经济形势就会越来越严峻。这并不是说我们硬要去保7%的预期目标。绝不能压指标、搞虚夸，那样做不仅于事无补，而且遗患无穷。问题是如果经济增长速度过低，将会带来一系列困难。例如，大量职工下岗、财政收入减少、金融风险加大、社会不稳定因素增加等。因此，必须采取有力措施，保持经济的较快增长，这关乎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是当前经济工作的当务之急。

目前这种经济形势引出了一个问题：是不是中国出现了通货紧缩？按照国际通常的看法，通货紧缩就是价格总水平持续下降，货币供应

量和经济增长率连续下降。巴塞尔国际清算银行认为，价格总水平连续下降两年就是通货紧缩。从我们自己的情况看，并没有出现货币供应量和经济增长率的绝对下降，这两方面都是在增长的，只是增幅在降低。所以，还不能说中国经济已经处于通货紧缩状态，只能说出现了通货紧缩的趋向。但是对这种趋向的发展，我们应当引起高度警惕，并切实加以防止。我们有治理通货膨胀的经验，而对付通货紧缩则是一个新课题。在这方面，国际上可资借鉴的经验也不多。我国去年采取的一系列政策措施收到成效，避免了经济增长的大滑坡及其可能带来的社会震荡。我们应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认真总结去年的实践经验，在此基础上继续前进，完善宏观调控的政策措施。

有的同志问，为什么在成功地治理了前些年严重的通货膨胀之后又出现了通货紧缩的趋向呢？实际上，现在的这些问题，从根本上说，与前些年的通货膨胀是一脉相承的，那就是重复建设严重，经济结构失调，经济效益低下。如果不是那几年搞那么多的房地产、开发区，搞那么多的重复建设，就不会有目前这么严重的供过于求，就不会有这么多的银行不良贷款，也就不可能出现物价总水平的持续下跌。

总之，我们要全面地、辩证地看待当前的经济形势，对于我国经济发展的主流和成绩，应当有充分的估计和认识。同时，对于前进中存在的问题，要给予高度重视，及时加以解决。中央根据经济形势出现的新变化，果断采取了宏观调控的综合性对策。这对于有效克服当前困难、保持改革和发展的良好势头，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二、贯彻中央的决策和部署需要把握好的几个问题

《通知》的主要精神是：进一步加大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的力度，重点是从投资和消费两个方面增加社会需求，还要努力扩大出口，积极利用外资；同时，加快结构调整，稳步推进改革，确保社会稳定，以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

(一) 采取有力措施，促进投资需求较快增长。

通过增发国债，扩大投资需求、拉动经济增长，是去年的成功经验。到今年3月底，去年增发的国债资金已经用完，目前对投资需求的拉动作用明显减弱。现在看来，今年预算安排的国债投资还不够。国外经验说明，运用财政政策解决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往往不是一两

年就能奏效的，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有一定的连续性。因此，考虑今年再增发600亿元的国债。这600亿元国债加上今年年初预算安排的500亿元国债投资，大体上相当于去年投资增加的水平。没有这样的投资力度，就弥补不了今年出口和外商直接投资减少所造成的需求缺口，很难拉动经济增长。

增发一些国债，既有必要，风险也不大。目前，我国财政赤字和国债规模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都低于国际公认的警戒线。今年再增发600亿元国债，全年国债发行总规模只比去年多124亿元，这不是很大的问题。现在金融机构的存款越来越多，6月末全部金融机构存差余额为12168亿元，其中国有商业银行存差余额为9734亿元。向银行增发一部分国债，可以用活一部分沉淀在银行的资金，也可以减轻银行利息负担。同时，通过增加国债投资、促进经济发展，可以增加税收，创造更多的财源，财政将来是有能力偿还债务的。

这次增发国债的资金在使用方向上作了较大调整。一方面，继续增加基础设施投资，主要是用于在建项目，使这些项目尽快建成投产，及早发挥效益。另一方面，较大幅度地增加企业技术改造投入，大力促进技术进步。初步考虑，从增发的600亿元国债里拿出150多亿元，用于对企业技术改造贷款的贴息。这样，可以带动2000亿元左右的技术改造贷款投资。企业技术改造要以市场为导向，紧紧围绕增加品种、改进质量、降低成本、提高效益进行，要有利于调整产品结构和替代进口。特别要抓好重点行业、重点企业、重点产品的技术改造。技术改造投资绝对不能变相搞基本建设，不能再花很多钱盖厂房；也绝不能搞低水平重复生产建设，单纯追求数量扩张。增发的600亿元国债资金，不管是用于基础设施建设还是企业技术改造，都要注意向中西部地区和老工业基地倾斜。

国债资金一定要管好、用好。一是在项目安排上，各有关部门要密切合作。要总结和完善去年国债资金安排工作中的好做法，对重大项目实行联合办公、集体评审，选准、选好项目，提高资金安排的效率和水平。二是地方要真正落实配套资金。如果配套资金落实不了，就要取消项目，绝不能再搞“钓鱼工程”、“胡子工程”和“半拉子工程”。三是严禁挪用国债资金。在这方面，尽管中央已经三令五申，有关方面也加强了检查，但是去年仍然出现不少问题，有的甚至很严重，今年

要更严格、更坚决地查处这类问题。四是确保工程建设质量。坚持质量第一，杜绝“豆腐渣工程”。工程建设一定要选择资质合格、技术和装备过硬的工程队伍。对国债资金使用的管理和监督，一定要尽快做到规范化、法治化。

(二) 增加城镇居民收入，扩大消费需求。

这次中央决策一个很重要的方面是，通过增加居民收入，扩大消费需求。这是因为，消费需求占社会总需求的比重高，目前为60%左右；消费需求又是最终需求，拉动经济增长的作用更大、更为直接。增加居民收入，也有助于改变居民的收支预期，增加即期消费。现在居民花钱比较谨慎，储蓄意愿很高。主要原因是，他们对住房、教育、医疗等改革的目标和方案不甚了解，对支出增加的预期提高；同时，不少企业效益不好，下岗、失业人员增多等现象又降低了群众对收入增加的预期。这种心理状况一形成，居民的即期消费就减少了。所以，各项改革都要考虑到对群众心理状况的影响，宏观调控也要有针对性地采取措施。现在给群众增加一些收入，有助于改变这种心理预期，对拉动即期消费有利。特别是增加中低收入阶层居民的收入后，他们马上就会去买东西。增加低收入居民的收入，还有利于调节收入分配，保持社会稳定。因此，尽管目前财政相当困难，还是要想办法增加居民的收入，这是一个关系社会经济全局的决策。

这次增加城镇居民收入的范围比较广。一是将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失业保险和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等三条社会保障线的水平提高30%。二是提高机关事业单位职工的收入，相应提高离退休人员的离退休金。三是提高企业离退休人员待遇。对各地拖欠国有企业离退休人员的养老金要一次性予以补发。这几个方面直接涉及的人员达8000万左右，体现了向低收入者倾斜，统筹兼顾了各方面的清况。

有的同志说，这次增加工资是靠多打财政赤字。这种说法是不对的。增发国债而增加的赤字都是用于搞建设的，今后是要还的。增加工资主要是靠财政增收节支。今年财税工作做得比较好，上半年财政收入增加较多。虽然下半年不太可能再有很多的增收了，但超预算是肯定的。超预算增收较多，增加工资就有物质基础。上半年税收增

加，主要是关税和进口环节税增加了一倍多，这是坚持不懈地严厉打击走私的结果。

今年提高职工收入水平，必须有稳定的资金来源。一个很重要的措施，就是对居民储蓄存款利息恢复征收个人所得税。1980年全国人大颁布的《个人所得税法》中就把存款利息作为应税项目，但是一直没有实施。世界上很多国家都对个人利息征收所得税，税率低的为3.5%，高的达到50%，大部分为10%以上。我国现在有必要，也有条件对个人利息征收所得税。有些同志认为，征收利息税不如降低利率。应当看到，这两种措施的作用不同，不能用减息代替征收利息税。利息税是调节社会收入分配、维护社会公正的一个措施。降低利率对改善银行和国有企业经营有好处，但财政拿不到钱。所以，还是要开征利息税。现在的银行存款中，绝大部分是少数人存的钱，征收利息税，对绝大多数的居民影响不大。存钱多的人，就应该多交税。利息税作为中央税，主要用于增加低收入居民的收入和补助财政困难的地区。

国有企业在职职工的工资怎么增加？主要是靠提高企业经济效益。国有企业职工的工资已经实行工效挂钩，企业有权根据经济效益状况自主决定职工的晋级加薪。今年国家采取了降低贷款利率、提高出口产品退税率等措施，都有利于企业降低成本、增加利润。国家采取进一步扩大内需的措施，也是为了使企业能够增加生产，提高经济效益。只要企业经济效益好，职工的工资就能够增加。

努力增加农民收入，是扩大农村消费需求、调动农民积极性的大问题，中央也做了部署。当前粮食、棉花、糖料都相对过剩，再提高价格是不可行的。增加农民收入最现实的途径，是切实减轻农民负担，减轻负担就等于增收。现在各种名义的乱收费、乱罚款、乱摊派使农民不堪重负，必须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加以制止。乡镇政府要紧缩开支，精简机构，清退编外人员。各地方和有关部门要抓紧研究从根本上减轻农民负担的措施。同时，要引导农民优化和调整农业生产结构，生产质优、价高的农产品。国家在农业技术推广、生态环境建设、农村电网改造和扶贫攻坚方面，都加大了资金投入力度，一定要把这些资金用好。各地要千方百计地增加农民收入。

这次中央经济工作部署中，把发展教育事业和扩大居民住房消费作为扩大消费需求的重要措施。在发展教育事业方面，要按照实施科教兴国战略的要求，在切实保证义务教育健康发展的同时，大力发展高中阶段、职业教育和大学等非义务教育。从近期看，这可以增加居民消费；从长远看，能够提高全民族的整体素质。不久前，党中央、国务院召开第三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对这项工作进行了部署，提出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各地要认真落实。住房的消费需求潜力很大，对整个经济的带动作用很强。要加快城镇居民住房制度改革，促进居民购房。现在的问题是，房价太高，一般居民买不起，国家也补贴不起。解决问题的一个办法，是免收或减收土地和相关配套设施费，把房价降下来，使广大群众买得起住房。这样，银行就可以多增加一些住房信贷，搞抵押贷款、分期付款。同时，要在加强规范管理的基础上，尽快开放住房二级市场。住房市场活跃起来了，对经济的拉动作用很大。各地方住房改革要根据自己的情况来决定。希望省长们能亲自抓一下这件事情，大力推动住房改革和建设。

(三) 继续推进国有企业改革。

搞好国有企业，既有利于扩大社会需求，也有利于改善有效供给，这在很大程度上关系到扩大内需和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成效。必须把加快国有企业改革步伐放在重要位置。最近，江泽民同志连续召开了几个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的座谈会，并发表了重要讲话。我们一定要认真学习和贯彻落实，务必努力实现中央提出的国有大中型企业三年改革和脱困的目标。这是一个重要的阶段性目标，一定要坚定信心，不能动摇。要全面贯彻中央关于国有企业改革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和措施，坚持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方向，积极推进国有企业的战略性改组。当前，还要着力抓好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做好债权转股权的工作。债务负担过重，是一部分国有企业长期难以摆脱困境的原因之一。要结合国有银行处理不良资产、组建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对一部分产品有市场、发展有前景，仅由于负债过重而陷入困境的企业，在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同时，通过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将银行的债权转为股权，降低企业资产负债率，减轻贷款利息负担，为企业增强活力创造条件。这件事情要抓紧做，但对债权

转股权的范围和操作程序，必须严格把关，绝不允许变相逃废银行债务，要防止一哄而起。

第二，加大企业技术改造力度。今年增发的国债资金中，要拿出相当一部分支持企业技术改造和技术进步。这不仅可以扩大内需，而且对增强企业的竞争能力和发展后劲有重要作用。这个措施，是搞好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的重要手段。增加企业技术改造投入，绝不只是今年一年的事，今后还要坚持这样做。要把企业技术改造同调整结构、压缩过剩生产能力结合起来。近期要以纺织、煤炭、石化、机械、冶金等行业为重点，努力实现已经确定的行业调整目标。

第三，利用证券市场直接融资。要充分发挥证券市场的积极作用，提供多种融资渠道，支持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要完善股票发行、上市制度，使更多的符合条件、经济效益好的企业上市，增加企业资本金。选择一些信誉好、发展潜力大的国家控股上市公司，在不影响国家控股的前提下，通过配售一部分国有股筹集资金。发展股票市场，要认真贯彻执行“法制、监管、自律、规范”的方针，坚持公平、公开、公正的原则，不要搞行政干预，不要搞政府托市，引导和促进证券市场健康发展。

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是搞好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的必要条件。国有企业要增强活力和竞争力，必须把目前过多的冗员减下来，走下岗分流、减员增效的路子。而要减人就必须解除职工的后顾之忧，最重要的是保障他们的基本生活。这就需要建立一整套社会保障体系，并使之规范化、法制化。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最重要的是开辟资金来源渠道。一是从现在开始就要适当调整财政支出结构，使社会保障支出逐步增加。二是要开辟专门的税源，例如开征个人利息所得税、遗产税等，这些钱要进入社会保障基金。三是配售一部分国有企业股权，通过股市筹集的资金，要拿出一部分来补充社会保障基金。这些措施具体怎么搞，还要认真研究。

(四) 努力扩大出口，积极有效地利用外资。

在扩大内需的同时，绝不能放松出口。今年出口少下降一点，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就会减少一点。吸收外商投资，可以直接增加投资需求，可以带动增加配套人民币投资。面对竞争加剧的国际经济环

境，我们要继续振奋精神，知难而进，力争在增加出口和利用外资方面有积极的作为。需要强调的是，要进一步优化贸易方式，大力推动和扶持一般贸易出口。要做好提高出口退税率工作。同时，要尽量减少不必要的进口，并加强“以产顶进”工作。利用外资要有危机感和紧迫感。亚洲遭受金融危机影响的国家采取了更加优惠的政策吸引外资，这对我国利用外资造成了不利因素。如果我们不采取更加有效的措施，外商直接投资下降的趋势还将进一步发展。有关部门要尽快提出适当放宽外商投资领域的具体措施，调整不利于利用外资的规定，改进对外商投资企业的管理和服务，进一步改善我国投资环境。

三、对落实这次会议精神的几点要求

一是要统一思想，齐心协力。贯彻好《通知》精神，首先需要统一思想。各地党委、政府和中央各部门都要把思想统一到中央对经济形势的判断上来，统一到中央决策和部署上来。只有统一思想，才能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有些问题从局部上一时难以看清，只有站在全局的高度才能够看清楚。要正确认识和处理全局利益和局部利益的关系，做到局部服从全局，坚决贯彻执行中央确定的政策措施。各个方面要围绕贯彻落实中央的决策和部署，密切配合，相互支持，协同动作。

二是要振奋精神，增强信心。我们面临的困难虽然不少，但也有很多有利条件。现在整个经济还在以较快速度增长，国家的物质基础比较雄厚。不少国有企业的经营状况在好转。我们已积累了在不同情况下战胜困难的经验。目前政治、社会稳定，只要我们充分运用各种有利条件，就一定能够很好地解决前进中的矛盾和问题。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领导干部一定要有良好的精神状态，坚定做好工作的决心和信心。

三是要精心部署，过细地做工作。中央这次提出了不少新的措施，有的政策性很强，实施起来需要算细账，不能似懂非懂、粗枝大叶。同时，各地清况不同，经济发展水平也不平衡，各有自己的一些矛盾和困难。希望大家按照中央的决策和部署，结合本地的实际情况，吃透中央文件精神，制定具体的实施方案和办法。无论是扩大投资还是增加消费，都要统筹兼顾，周密安排。一定要把工作做实、做细，把好事办好。

四是要把握大局，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今年改革和发展的任务很重，影响社会稳定的因素也不少。各地区、各部门在贯彻中央决策和部署的工作中，要把改革、发展、稳定三者的关系处理好。如果有些政策措施把握不好，就有可能产生一些负面作用，甚至出现偏差，影响社会稳定。对于这一点，大家务必高度重视，不可疏忽大意。

地方政府机构改革势在必行

(1999年7月23日)

1999年7月23日，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在北京召开全国地方政府机构改革工作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副省级市党委或政府负责机构改革工作的负责同志、编办主任，以及中央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这是朱镕基同志在会上讲话的主要部分。

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召开这次会议的主要任务是，研究和部署地方政府机构改革工作。这是落实党的十五大精神的一项重要任务。今年年初，中央印发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地方政府机构改革的意见》，对这项工作做出了明确部署。下面，我讲几点意见。

一、地方政府机构非改不可。

国务院机构改革已经基本完成。为了同国务院机构改革相衔接，保证政令畅通，地方政府机构改革必须抓紧进行。去年，国务院进行了机构改革，经过各部门共同努力，这项工作进展顺利，取得了重大成果。国务院组成部门从40个减少到29个，部门内设机构精简200多个，移交给企业、社会中介机构和地方的职能有200多项，人员编制总数减少一半，司局级职数减少500多个。机关建设和工作作风出现了新的气象。部门之间相互推诿和掣肘现象减少，促进了办事效率的提高。这个成绩，是全国推进政府机构改革的良好开端，我们也从中取得了宝贵的经验。同时，也再次证明：机构改革是非常必要的，中央提出的指导思想、原则和方法、步骤是完全正确的。

推进地方政府机构改革，是建设廉洁、勤政、务实、高效政府，促进地方经济发展和维护社会稳定的需要。地方各级政府是整个行政管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现在，地方政府机构和职能与形势发展不相适应的矛盾越来越突出。政企不分、政事不分，机构职责交叉、互相扯皮，人浮于事，造成效率低下、财政负担沉重，尤其是贫困、边远地区的财政更是难以为继。因此，地方政府机构改革势在必行。

二、切实完成精简任务。

这次地方政府机构改革的重要任务，是精简机构、精减人员编制、减少领导干部职数。中央已经提出了明确要求：

第一，省级政府工作部门由现在平均设置53个精简为40个左右，经济不发达、人口较少的省(区)精简为30个左右。直辖市的市级政府工作部门，由现在平均设置61个精简为45个左右。

第二，切实精减人员，不能走过场。地方各级政府系统现有行政编制518万人，实有548万人。地方各级政府人员要严格按核定的编制数精减，重点是精减各级机关人员。省级政府机关人员编制精减幅度原则上参照国务院的精减比例进行，逐步、分期达到精减一半左右。省级政府机关(不含公安、安全、司法机关)的行政编制由现在的15.2万人，精减到7.6万人左右。

第三，领导职数也要减少。现在有的地方设了十几个副市长、副秘书长，还有几个市长助理，一把手的精力都放在协调副职的关系上了，还有什么精力抓工作？机关人员减少50％以后，用不了那么多“官”。

精简机构和人员是个硬任务，各地必须严格按照中央的要求制定方案，组织实施。

政府机构改革不是单纯的精简问题。在政府机构改革的过程中，要注意把握以下几点：一是着眼于全面提高机关干部的整体素质，把人员定岗分流同干部结构的优化结合起来。二是着眼于建立干部能上能下和岗位交流机制，把人员定岗分流同改革干部人事制度结合起来。三是着眼于从严治政，把人员定岗分流同加强机关建设和法制建设结合起来，提高依法行政能力。这几点，是国务院机构改革的成功经验，地方各级政府也要这样做。

要正确对待政府机构改革中的困难。邓小平同志讲过：精简机构是一场革命。当然，这不是对人的革命，而是对体制的革命。既然是革命，当然会有困难，但必须迎难而上，不折不扣地贯彻下去。不改革或推迟改革进程，是没有出路的。

地方政府的干部如何分流？一是要加强企业，把优秀人才派到企业中去。二是要加强基层，现在一些基层干部素质太低，要用合格的干部把他们换下来。三是要进行定向培训，特别是进行经济管理和法律知识的培训。对分流的干部进行培训，是加快培养人才工作步伐的重要一环，要通过培训的办法提高分流人员的整体素质，适应社会需要，做到人尽其才、各得其所。

人员分流，涉及广大干部的切身利益，地方各级政府和各部门要发挥党的政治优势，有针对性地做好思想动员。要给大家讲清楚，机关干部是国家的宝贵财富，无论是留在机关还是分流，都是改革的需要、工作的需要，没有高低之分、优劣之别。只靠开会不行，要一个人一个人地做细致的思想工作，普遍进行个别谈心，使每个干部都能感受到党组织对他是关心爱护和认真负责的。只要工作做到家，我们的干部是有觉悟的，是通情达理的。

三、大力转变政府职能，推进政企分开。

要下决心撤销工业管理部门。这个问题大家议论较多，也有难度，但是决心不能动摇。要彻底改变工业部门与国有企业的行政隶属关系，政府不能再干预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事实证明，靠工业管理部门直接管企业的办法是管不好企业的。这次国务院机构改革，下决心把工业管理部门撤掉，改成国家经贸委管理的国家局。这只是一种过渡措施，这些国家局的职责和任务就是搞行业规划、行业政策，防止重复建设。从省里来看，搞行业规划、行业政策的任务要比国务院少多了，综合部门完全能够承担起来，没有必要搞过渡。

保留的部门也要转变职能，做到政企分开、政事分开、政社(社会中介组织)分开。各部门的职责要界定清楚，该哪一个部门负责的事，哪个部门就要承担起责任来。责任交给哪一级，权力也要给它，权力和责任一定要一致起来。不该管的事要坚决交出去。

要规范政府的审批职能。审批权限必须以国家和地方有关的法律、法规或政府的文件、规章为依据。各级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在拟订部门“三定”方案时一定要把这件事情抓好，不要怕得罪人。

要转变工作方式和工作作风。我在本届政府第一次全体会议上提出的“五条要求”①和“约法三章”②，就是要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建设一个廉洁、勤政、务实、高效政府。地方各级政府也要制定行为规范，公之于众，接受监督。

---

① “五条要求”，指朱镕基同志在1998年3月24日国务院第一次全体会议上提出的“五条要求”，见《在国务院第一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本卷)。

② “约法三章”，指朱镕基同志在1998年3月24日国务院第一次全体会议上提出的“约法三章”，见《在国务院第一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本卷)。

四、加强对地方政府机构改革的领导。

地方政府机构改革任务艰巨、时间紧迫，改革既要坚定不移地进行，又要周密布置，精心组织，责任非常大。这个责任，各级党委、政府的主要领导要承担起来。

要认真制定方案，精心组织实施。制定改革方案和相关政策要实、要细。对人员定岗分流、干部安排、国有资产管理等，都要有具体的办法。特别是人员定岗分流，涉及每个干部的切身利益问题，一定要做到公平、公开、公正，一定要把适用的原则、步骤、方法规定得具体一些。方案酝酿要坚持党性原则，充分发扬民主，走群众路线。要慎重，谋定而后动，实施要果断。

另外，上级部门不得干预。很多地方反映，地方政府机构改革工作难做，上级部门干预太多。我要强调一点，国务院各部门不得干预地方政府的机构改革方案。各地区都要按照中央的精神，根据本地实际，通盘考虑，顶住压力。

加强长江中游的整治刻不容缓

(1999年7月28日)

1999年7月23日至28日，朱镕基同志先后在湖南、安徽省考察长江防汛工作。朱镕基同志在安徽省考察工作期间，先后考察了广济疔长江干提填塘固基工程和黄湓村灾民安置点等地。这是朱镕基同志在听取安徽省委、省政府工作汇报后讲话的一部分。

我们这次来主要是督促检查长江的抗洪抢险工作。在安庆，我们已经和省里的同志交换了意见，主要是三条，现在向大家通报一下。

第一条，确保长江大堤的安全，绝对不发生决口。今年是国庆50周年，澳门回归祖国。长江如果在这个时候决口，不光是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遭受损失，在政治上的影响也不好。要采取一切措施，昼夜地巡提查险，绝对不能够松懈。对于险情，要及早发现，及早处置。要不惜一切代价保住大堤安全。现在，就要把这些抢险的物资储备好。

第二条，必须重新修订长江的整治规划。我在湖南的时候，凤凰台的记者问我，你年年跑到这里救灾，有何感想？这个话问得很尖锐啊！长江的防汛工作，年年像现在这么搞下去是“民穷财尽”啊！现在就要着手长江整治规划的实施。今年长江的汛情也很严峻，从湖北、湖南、江西到安徽，我们都现场体会了一下，感到长江中游地区的整治已经刻不容缓。这四个省本来是富庶的地方，“湖广熟，天下足”啊！江西、安徽过去都是鱼米之乡啊！可现在搞得“民穷财尽”，不就是水灾吗？现在决定要加大长江中游整治的力度和强度，这四个省是整治的重点。当然，长江中上游封山育林、退耕还林、环境整治去年已经开始，这个决策是正确的，也要加大力度，但那是一个长期的、世世代代搞下去才能见效的事情，现在不能再放松，而长江中游的整治则是刻不容缓了。我们估计如果加大投资力度，要比现在加一倍。去年到今年，投资已经加了很多了，相当于过去的三到四倍。明年的投资要在今年基础上再加一倍，这样连续干五年，长江的大堤才能永

固啊！水利部长江水利委员会要加强统一规划和设计，按照它们的重要性，一、二、三级堤都要高标准达标。这三级堤都应该纳入国家计划，中央财政要给予补贴。你们省界内长江北岸500多公里、南岸200多公里的干堤，都要按不同的标准来进行整修，这项工作用三到五年时间把它完成。今年，为了整治长江中游四省堤防，包括中上游地区森林保护计划的落实，我们准备在原来的计划加上增发的600亿元国债之外，再加100亿元。希望大家赶快做好准备，全力以赴，设计、规划、招标、施工都要跟上。国家要下很大的力气，舍得花钱，确保长江堤防长治久安。严禁挪用挤占整治长江堤防的资金。

第三条，长江支流的整治。这项工作主要还是靠你们自己了。支流的整治最重要的是保护森林，不能再那么砍树了。不然水土流失，支流好不了，干流也好不了。农民有个增加收入的问题，要引导他们，开辟别的生路。需要木材，国家可以进口。这个问题，省里还要研究并作出规定。现在，移民建镇只能集中于洞庭湖、鄱阳湖地区以及湖北长江干流上的一些圩子。在安徽，因为整修长江大堤的任务很重，还没有力量来做移民建镇、平垸行洪工作。但是，可以搞试点，比方在池州的升金湖以及淮河地区搞些试点。巢湖的整治是一个重要项目，对巢湖的挖泥清淤，中央将从资金上予以支持。另外，有的地方要防内涝，要提高排涝能力，中央也可以给予补助。

关于水利方面，我就说这三件事情了。最主要的、压倒一切的是别让长江大堤垮了，绝对不能垮！

治理黄河必须搞好上中游水土保持

(1999年8月6日)

1999年8月5日至9日，朱镕基同志先后在河南、陕西省考察治理黄土高原水土流失、黄河防汛等工作。朱镕基同志在陕西省考察工作期间，先后考察了延安和杨凌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等地。这是朱镕基同志在延安听取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和延安市委、市政府工作汇报后讲话的主要部分。

我们这次到陕西来，是为了落实江总书记关于把黄河的事情办好的指示，跟大家一起研究怎么样把黄河的事情办好。黄河是中国最难治理的一条河，但是治理黄河的经验和基础要比治理长江好。早的不说，从清朝以来，治理黄河就是实行统一领导的，比治理长江那样“铁路警察各管一段”要好得多。“千里长堤，溃于蚁穴”。长江各段都是分散的管理，管理标准又不一样，这里面问题就很多。上个月我去看了长江，感触很多，感到有些地方危险得很。它的管理体制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不是统一管理，而是各搞一段。去年以来投入几百亿元加固长江堤防，这在历史上是空前的。但像湖北那个做法，一公里一段，包给一个单位或者个体户，那样做是非常危险的，那怎么能保证长江大堤的质量呢？到了江西九江，我一看去年决口的那段堤防是中国水利水电长江葛洲坝工程局修复的，十分高兴，说这是个样板工程，大规模的机械化队伍上去了。设计是水利部长江水利委员会做的，施工单位是通过投标的，我很放心。回到北京以后，就在离我看着很高兴的那个地方不远的江西九江永安段，出现了大面积的管涌，上了几千解放军战士才免于溃堤，这是最近的事情。这一段是谁修的呢？是葛洲坝工程局委托它下属单位的一个队修的，这个队根本没有工程资质认证书。结果就在他们修的那个地方发生了管涌。刚表扬完了葛洲坝工程局就出了这件事，让我非常伤心。长江这个管理体制不行，将来要出大乱子。你给他多少钱，人人都来吃“唐僧肉”，这怎么得了啊！有几个钱真正用到修堤上面去了？有多少钱给挪用了？大堤的工程质量没有保证。黄河就好一点，集中管理。但集中管理也有集中管理的坏

处，如果是一个地方溃一个点，还可以去抢修；如果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的责任心差一点，全面溃堤那就更难办了。



1999年8月9日，朱镕基在河南省考察小浪底水利枢纽工程。右一为水利部副部长兼小浪底水利枢纽管理局局长张基尧。

黄河的治理有很长的历史。新中国成立以后，从政务院到国务院对治理黄河都非常重视。当前就是要加强工作的力度，加大投资的强度，把治理黄河的事情搞得更好。但是，我有一个感想，我们在治黄的指导思想上恐怕要有一个调整。这就是：如果黄河上中游的水土保持、生态环境不改善，继续水土流失，黄河下游再修多少个水利工程也没有效果；或者说即使有效果，也是事倍而功半。就是说，你老是去修“沙库”，你那个水库实际上是“沙库”，敞开口子让上游的泥沙来，它就不断地来，把黄土高原冲得一塌糊涂。你把泥沙迎进来，这固然可免于水患，但你要花多少钱？尽修这种“沙库”，淤了再修，修了再淤。这个办法是个救急的办法。因为现在还没有办法在很短时期内把黄河上游的水土治理好，要它不来泥沙不知道要过多少年，所以不修

水库不行。但是，如果不把注意力放在根本问题上，放在治理黄河上游的水土流失上，将事倍而功半、民穷而财尽啊！上面的水土流失了，人们没法生活；下游泥沙淤起来了，还会造成水患。因此，我这次来，就是想更加强调，一定要把更多的力量放在改善长江和黄河上中游的生态环境和水土保持上。



1999年8月6日，朱镕基在陕西省延安市考察生态综合治理工作。前排右一为延安市委书记高宜新，右二为陕西省委书记李建国，右四为陕西省省长程安东。

陕北这个地方，这么一小块的山沟里边，曾经养活了中国共产党的几万军队，最后夺取了全中国的胜利。但是，军队要吃饭，不吃饭怎么革命？所以就开荒种粮，砍树烧炭。为了夺取全国胜利，陕北人民是作了巨大贡献的。现在你们看看，满山遍野都是光秃秃的，看了以后心里不难受吗？今天我们刚到延安郊区考察，就在上山拐弯那个地方，山全是光的，有的坡地还种了庄稼。这个不行呀！我说别的事情做不到，把这么一小块地方绿化了、把这个郊区绿化了行不行？你们做得到做不到？我给你们全包了，我拨款过来。你们这里有下岗职工没有？有就让他们种树去，这是光荣的任务，这就是革命。沿途我们看到，确实有些树长得不错，是灌木林，但也有一些山顶上还在开荒。你们这个地方降雨量还不少，但是下雨后水一下子就流掉了。归根结底就是要种树，山川秀丽就是要靠种树，不能再在山上种庄稼了。我不要你们再种庄稼，因为现在全国的粮食多得不得了，放在仓

库里要发霉了。黄河下游种庄稼的成本比你们这个地方要低得多，效益要高得多。所以说，我希望你们不要再去种粮食了。过去“以粮为纲”，没有饭吃，不这样不行。如今粮食多了，粮价不断在降，农民的收入也在减少。我现在希望你们山川秀美，如果上中游的泥沙不下来，黄河下游增产的那部分粮食比你们种的还要多。我说老实话，你山上不就一亩地产一二百斤粮食吗？下游可以产几百斤。我原来很担心这里山上没有水，不能种树。但据汪恕诚①同志讲，在雨季种树，种下去就可以活，那不挺好嘛！我看也可以来个飞播，长不起来再补种。这是治理长江、黄河的根本措施，是为子孙后代创造一个山川秀美的新中国。靠修几个“沙库”似的水库不能解决长江、黄河的问题。我没有说不修水库，在树没有长起来之前还得修，但那不是一个根本的措施。现在延安还是缺水，如果把山上都种了树，还可以修水库，把水都聚住了。延河断流，我们看了很心酸。电影《延河战火》那首插曲唱的“滚滚延河水”，现在也“滚”不起来了，像个小沟一样，里面有一点脏水。所以，你们不搞生态环境建设、水土流失治理，不种树是不行的。我希望从现在起，做好陕北地区的水土保持和生态环境保护工程规划，你们的规划做得越快，我的钱给得越快。

---

① 汪恕诚，当时任水利部部长。

我讲了16个字：“退耕还林(草)、封山绿化、以粮代赈、个体承包。”中国大部分地方应该是绿树覆盖，不应该都种地。如果再种下去，那将来是会变成沙漠的。我们现有耕地增产的潜力还大得很，不需要你种这个地。据说航测你们这里人均有八亩地，要那么多地干什么？在南方有几分地就可以养人了，要八亩地干什么？大部分地要种树，种了树以后，由林业衍生出来的行业活路还是很多的，你们去调整经济结构嘛。还有封山育林，别再上山开荒了。我今天在山上讲把“兄妹开荒”①变成“兄妹造林”，你们延安的文艺工作者可以写一个剧本，引导大家把我们革命战争时期“兄妹开荒”的精神变成“兄妹造林”的精神来绿化荒山。老百姓没有粮食吃，怎么办呢？我们从仓库里给你们调。你们不就是200万人吗？一年能吃几亿斤粮？ 我们调给你们，以粮代赈。只要你种了树，我们就发给你一个粮本子，你就去领粮，不要你出钱。“个体承包”就是这块林地要包给你，你要管护、维护这块林地，将

来围绕林地搞副业，但是不能砍树，绝对不能砍。有些速生林可以间伐，但要规定一些办法。这个事情请王志宝②同志主持制订一个陕北地区整治水土流失的规划，把这些办法给予细化，跟地方商量。

---

① “兄妹开’荒”，指1940年2月，中共中央号召在延安开展大生产运动后，在延安秧歌运动中产生的秧歌剧《兄妹开荒》。

② 王志宝，当时任国家林业局局长。

国家计委、财政部、国家林业局等部门要在最快的时间内密切配合，把这个规划做出来。这是一个总体规划，不是光讲一个延安地区。但是，延安地区是一个重点，你们要尽快动手，作为全国先行一步的试点。要有一个总体规划，10年、20年的规划，要测算花多少钱，把荒山都绿化起来，要保持一个相当的投资强度。在水土保持、绿化荒山、生态工程建设方面，我们一定要投入，一定要保证，首先把延安的郊区绿化起来。希望三年以后我再来时，没有山头是秃头秃脑的。你们能不能保证三年以后在山上都把树种起来？我这个要求不高吧。

我在1992年来过延安，这次再来看到延安的工作确实有很大进步，环境有很大改善，生产有很大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有很大的提高。我向你们表示感谢，充分肯定你们的成绩，希望你们做得更好。

坚决停止砍伐天然林

(1999年8月14日)

1999年8月11日至16日，朱镕基同志在云南省考察工作，先后考察了昆明、丽江、大理等地。这是朱镕基同志在丽江听取部分地州党政负责同志工作汇报后讲话的主要部分。

我这次到丽江来，感到丽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丽江地震①以后，在全国人民包括海外同胞的支持下，但主要是你们自身的努力，丽江面貌比几年前有了很大的改变。这说明只要我们党的方针政策正确，充分发动群众就能办很多事情。

---

① 丽江地震，指1996年2月3日在云南省丽江地区发生的7级强烈地震。丽江、大理、迪庆、怒江4个地州的9个县51个乡镇受到破坏，死亡309人，重伤3925人，直接经济损失达40多亿元。

关于天然林保护问题，停止砍伐天然林，已经到了迫在眉睫的地步，或者叫刻不容缓。再耽误下去，长江、黄河给国家、人民所造成的灾害将会越来越大。现在已经到下定决心，彻底停止砍伐森林的时候了！停止砍伐森林会带来一系列的矛盾，主要是经济结构调整的问题。当前，我们国家进入了一个经济结构大调整、经济改革大深入的阶段。如果经济结构不进行重大的战略调整，我们这种发展速度就保持不下去。云南要进一步发展，就必须对经济结构进行大的调整，不能再完全依靠“烟财政”，更不能再搞“木头财政”，而要从发挥自己的优势出发来进行经济结构调整。国务院去年就作出了停止砍伐天然林的决定，但是，是不是像你们讲的那样都停止砍伐了呢？我绝对不相信完全停止了。不是不相信你们，而是你们说的不也是根据层层汇报上来的吗？根据你们的汇报，这里面一系列的问题都没有解决，它怎么可能停止呢？千万不要说：“我们执行国务院的决定是十分坚决的，现在已经停止了一切天然林的砍伐。”我从来不相信这个调子，因为我还没有能力把那些问题都解决了。我只相信滥砍滥伐天然林的现象大大

减少了，但没有停止。今天我们有同志去看“长江第一湾”，去的时候就碰到了六辆拉木头的专用大卡车，拉着很粗的木头，回来的时候又碰到了六辆，也都拉着很粗的大木头，一下就碰到了十二辆车。停止砍伐天然林已经有一年多了，怎么还没拉完？不砍才怪呢！所以，我是绝对不相信你们说的停止了天然林的砍伐。希望你们的工作要扎实深入一些，不要相信层层干部的汇报。要深入到林区、林场、木材交易市场去看看，千万别低估这个问题。所以我一再讲，保护森林资源要有愚公移山的精神，就是子子孙孙保护下去。



1999年8月13日，朱镕基在云南省丽江地区考察震后重建的农民新村。

我们已经考察了很多地方，提出了一些保护生态环境的政策设想。实际上，去年已经在一些地区开始试行，但还不够，现在正要修订这些政策。这次来，就是要跟大家商量怎么修订好这些政策。现在有个初步意见跟大家商量，根据大家的意见，修改后要尽快出台。



1999年8月12日，朱镕基在云南省考察中国’99昆明世界园艺博览会时在长青园植树。

第一条，首先要调动干部的积极性。一些地方是“木头财政”，停止砍伐天然林对财政收人影响很大。如果不给一定的补助，这些地方就没有停止砍伐天然林的积极性。中央财政要给予一定的补贴，补贴数额由省里来核定。确实是对财政收入影响大的地县，禁伐后减少了收入，要给予一定的补贴。但不能完全补贴，这些地县也得付出一定的代价。要精简机构，节约开支。停止砍伐天然林以后，经济结构的调整、效益的提高、长远的发展，也得付出一定的代价。对这个问题，我们没法一个州一个县地审定，只能认省里的账。中央财政给予的补贴，采取转移支付的办法返还给地方。总之，不付出这个代价，换不来青山绿水。但是，我也跟你们的省委书记和省长讲了，这个时候不能“趁火打劫”，中央财政也是很困难的。大家都要实事求是，不要想趁此机会解决你们的一切问题，那是解决不了的。

第二条，就是要实行我在陕西考察时提出的16个字："退耕还林(草)、封山绿化、以粮代赈、个体承包。"一定要封山，不封山是不行的。你们原来砍伐森林是为了种粮食，在那么高的山上种粮食，成本太高。现在全国的粮食有余，你何必再到山上种呢？所以，把山坡上的田地退耕还林，原来收多少粮食，现在国家无偿补给你。必须有这个政策才能够退耕还林，不然，强迫农民退耕，没饭吃怎么办？现在要执行的就是不准砍林子的政策，既然无偿补粮，退耕的农民就要无偿地把林子种起来，国家提供树种、化肥或者飞播，只是要你们去看护。农民的利益没有受到损失，根据每亩地核定产量，确实退了那么多田，种了那么多树，按照平均水平补偿给你粮食，这就叫"以粮代赈"。我相信实行这个政策，农民是愿意的，因为有了粮食，将来这个树林长起来，还会有一定的收益。这样，山青水绿了，水土保持了，平川地、沟坡地的粮食产量会更高。但一定要坚持搞个体承包。现在已经不是过去那种吃饭都成问题的时候了，党的农业政策的成功、农业技术水平的提高，使今后粮食供应不会成问题。当然，我不是说要放松粮食生产，也不是说粮食不重要，而是情况有了很大改变。随着生态环境的改善，将会大大地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粮食更不会成问题。这就叫经济结构的调整。

关于如何实行这一政策的办法，需要具体化。这就是粮食怎么到种树人手里？怎么个体承包？怎么以粮代赈？怎么检查？怎么飞播？怎么封山？有一系列问题要研究。省里要派大量的人下去调查，研究制定标准，确实把钱和粮补到个人手里。森工企业的职工怎么从砍树人变为种树人？企业本身要进行调整，并不是说不砍树了就得把职工都养起来，那不行。森工企业也要实行下岗分流、减员增效，然后给他们创造一定的活路。下岗的森林工人没有收入了，还得给他们饭吃，无偿提供粮食的政策也同样适用于他们。同时，要把砍树人变成种树人，要给他们事业费，也就是造林的费用。这要合理地核定，由省里提出来，我们下去检查，看这个标准定得合适不合适。有了这个造林费用，森工企业就有活路了。刚才有个州汇报时讲到管护林区要设站点，还要搞基础设施建设。为了保护天然林，刚把森工企业的包袱卸下来，这样做又会背上新的包袱，这怎么得了！还是要搞个体承包。要封山，每块山林封了山就不能随便使用，更不能砍伐。养着那几个人，还在那里设多少个站点，啥用也不顶！想完全把森工企业的人员

都养起来是不行的，还得用下岗分流的办法，让多余的人员逐步发展其他各种产业，逐步再就业，但是一定要保证他们的基本生活。森工企业的债务，还不能马上就把它冲销，我们回去要跟银行商量，制定一系列的政策，先停息挂账，然后清产核资，最终这个债务要给免掉。不叫他砍树，他还能还钱吗？不能的。

森工企业不要随便转产，开发一个产业、一个新产品非常难，现在转产干什么呢？没有人才，没有知识，你想调整产业结构怎么可能？所以我想，转产需要时间，要下本钱、下工夫，不要马上就确定什么转产项目，否则，将来都会变成包袱，要下一任领导来擦屁股。还有一个就是林业资源的保护问题。对于以木材为原料的工厂，我同意你们提出的对那四个小纸厂实行关闭，企业债务问题要列入破产计划，按照破产程序冲销债务。至于说对七万吨的思茅纸厂和三万吨的大理纸厂，我估计还不止这两个厂，别的省可能还有，由国家计委、国家经贸委牵头，国家林业局、国际工程咨询公司、国家轻工业局等部门参加，组织一个调查组进行调查后确定如何处置。是不是真正可以发展速生林？能不能真正保证原料？然后要考虑成本、效益，最后再决定是继续干下去，还是关闭处理。

你们觉得停止天然林砍伐和退耕还林能不能搞下去？还要什么政策？我想，我都给你们想到了。第一，中央财政给予补助，由省里核定，不要虚报，但也不能百分之一百地补助，这做不到；第二，让农民退耕还林，我保证无偿提供粮食；第三，森工企业变砍树为种树，给它管护费、造林费，给它粮食，富余人员下岗分流，将来逐步地转产。

四川省要成为天然林保护工程的尖兵

(1999年9月12日)

1999年9月6日至12日，朱镕基同志在四川省考察工作，先后考察了阿坝、绵阳等地。这是朱镕基同志在听取省委、省政府工作汇报后讲话的一部分。

时隔一年再次来到四川，这次我们主要是看贫困地区和天然林保护工程，在阿坝等地转了一圈，走了1000多公里，其中有让人开心的地方，也有让人伤心的地方。开心的地方是从成都到卧龙、从卧龙往茂县走的沿途，植被比较好，青山绿水。从茂县再往北走，情况就令人伤心了，天然林被砍得一塌糊涂。从松潘、九寨沟出来到平武，是海拔3000多米的黄土梁子，那里植被也比较好，还有些原始森林。从平武黄土梁子下来之后的植被也还可以，但是坡耕地还是很多。原来出发时天气很好，我们一直沿着岷江走，河水是很清的，但从绵阳回来，天下大雨，水就是浑的了，还相当浑，可见水土流失还是比较严重的。我们最先看到的，就是四川省委、省政府贯彻中央的决策，提出建设天然林保护工程，停止砍伐天然林。我看贯彻得是比较好的，不讲深入人心，至少已经落实到了基层，各个地方都停止了采伐。另外，你们也采取了很多措施，植树造林，我们看了很高兴。像实施天然林保护工程这样一个中央的重大决策，在四川能得到落实，那么在全国也一定能得到落实。

实施天然林保护工程是去年特大水灾以后，中央作出的重大决策。尽管天然林保护我们已经喊了多少年，但是，还没有形成全国的共识。说老实话，如果财政支出结构不调整，就没有钱来干这个事情。另外，如果不是粮食连续四年丰收，粮食过剩，也没有这个条件，谁也不敢提出来“退耕还林，以粮代赈”。正因为我们国家有了实力，大水一来统一了我们的认识。去年，中央及时地作出了保护天然林的决策，包括退耕还林、移民建镇等，看来很有效。比如移民建镇，我这次到长江中下游几个省一看，差不多移民100多万。原来人都是到堤内去种地，现在大多搬出来了，另外建一个镇。有的地方已经全搬出来

了，有的地方是大水丢、小水收，还可以收一季庄稼。今年汛期来水比去年同期还要凶，但是到目前为止基本上没有出现很大的水灾。所以，关于实施天然林保护工程的决策在去年能够出台，是有各种条件的，主观认识的统一和客观条件的具备，才可能提出这样一个关系子孙后代的方针。这个方针，江总书记在很早以前就提出过，他对陕北有一个批语：再造一个山川秀美的大西北。最近他到西北地区又发出了一个战略号召：重建大西北。我看这个“大西北”也可以包括西南，中西部嘛，这是个战略方针。不把中国中西部地区的问题解决好，中国的长远发展问题是解决不了的。现在我们已经有条件了，“退耕还林(草)、封山绿化”，这是去年中央提出的；后面加了一个“以粮代赈、个体承包”，是我们根据中央的方针进一步提出的具体措施。老实说，这个“以粮代赈”的发明人是谢世杰①、张中伟①。今年6月份，在京西宾馆他们给我提这个建议时，我还体会不 深，觉得农民的粮食多得不得了，还用粮食去赈济干什么呢？给钱就 行了，哪里都能买粮食嘛。后来我到陕北地区一看，觉得这个“以粮代赈”还真是一个很重要的措施，这跟我原来的设想不一样。不是让农民拿钱买粮食，而是无偿地给他提供粮食，以粮换林，现在有这个条件。这样做，农民的积极性就可以调动起来，只有他不愁没粮食吃，才可能把坡耕地和山上种的地退出来育林。而且，这个政策要稳定，不是搞一年两年，起码搞五年以上，要使农民安心啊。我到河南去，河南粮食长势好极了，他们希望陕北地区的黄土不要流下来，河南粮食就能增产，增产的粮食比在陕北地区山头上种的粮食要多得多。现在形势和条件已经改变了，我们的思想再不跟着转变的话，我们就犯傻了。我们有的是丰产的地方，还跑到山上去种地干什么？山上地一种，水土一流失，一年16亿吨泥沙全下来了，这不是要命吗？河南一带的黄河已经是“地上河”了，最高的地方高出地面19米，一垮提就全部给淹了。所以，陕北地区的任务不是跑到山上去种地，而是搞绿化，把泥沙留住。这样以后所有的河流上都可以修水库，平川地就变成水浇地，粮食就能够增产。我们这几年粮食丰收，仓库现在有5500亿斤粮食，加上农民手里的粮食，差不多是1万亿斤，相当于全国一年的产量，这给了我们一个很大的回旋余地。拿粮食去换树林，让树林反过来给我们增产粮食，解决我们长远的问题。我们一定要看到它的战略意义，这是生态的良性循环呀，伟大的意义就在这个地方。今年我到安徽、湖北、江西考察，沿江的

城市都搞得穷透了。我说句不好听的话，叫“民穷财尽”，年年遭水淹，一下就把房子冲掉。没几个钱，一年却要花大半年在那里修房子，或者是防洪、抗洪，最后又来灾后的重建，钱都花在这些上面了。湖广、安徽、中原一带都是很富的地方，只要把水土保持搞好了，下游的增产潜力是很大的。所以，我认为天然林保护工作的重大意义在这个地方。希望大家一定要很好地领会中央的决策精神。我们只是做了一点具体工作，把它具体化了一些，但是更具体的措施还得靠大家。这不是哪一个人想出来的，而是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集中了全国人民的智慧提出来的。我们非常赞成你们先行一步，创造一个样板，走出一条具体化的路子来。我相信，这对四川的振兴是非常重要的。如果到处都是青山绿水，到处都是九寨沟，那你们还富不起来？加上修机场、修高速公路，这就发展起来了。你们还用得着搞什么重复的工业建设呀！搞高科技的可以，传统的工业不能搞了，那些小煤窑、小化纤厂、以木材为原料的小造纸厂等等，都统统关掉。

---

① 谢世杰，当时任中共四川省委书记。张中伟，当时任四川省代省长。

到了四川以后，增强了我们的信心。这次我们到阿坝看了大沟人造林工程，6万亩荒山，林业部门加上一些农民，无私奉献种了四年，又经过八年，十二年时间就造成了很好的森林。看了以后我们就有了信心，这件事情不是那么难搞呀！所以，我敢于提一个口号：“五年初见成效，十年大见成效。”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嘛，十年见成效没有问题。若干年后，树木真正长起来，变成森林，水土流失的问题就基本解决了，长江、黄河的隐患就消除了。当然，真正地消除隐患没有五十年、一百年是不行的。这是世世代代的工程，但在我们这一代是可以大见成效的。希望四川，特别是阿坝、甘孜、凉山三个州，致富就从造林开始。山只要封起来，很快就能绿化，就是青山绿水，旅游业就可以发展啦。三个州务必要看到新的经济增长点在什么地方，在造林！现在到了退耕还林的时候了。我们刚才算了一笔账，四川全省能种林的地方就是2600万亩，一年用50亿斤粮食也就差不多了。五年以后就不要无偿提供粮食了，因为农民自己的收入也上去了，富了。我们的仓库正好多了两三千亿斤粮食，换一大片森林，换一个青山绿

水、锦绣中华呀！无论如何，我对你们寄予很大的希望，希望你们在全国先走一步，成功了以后，在历史上要给你们写上一笔。



1999年9月7日，朱镕基在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茂县农村考察退耕还林情况。前排右二为国家林业局局长王志宝，右三为阿坝州州长王雨顺。

林业系统、国有林场如何停止砍伐天然林，把砍林人变成造林人，如何管护，这个由王志宝①同志来负责，要有一整套政策，国家财政预算已经把这方面的投资打进去了。停止砍伐天然林之后，很重要的任务是育苗种树。要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选择树种，飞机播种跟人工造林相结合，这些问题都由林业系统来解决。另外一部分就是群众造林，也就是退耕，把田退掉，要补足粮食。先搞试点，你们第一步先搞300万亩，我赞成。不要搞得太多，搞得太多、战线太长，顾不过来。干部的作用很大，要挑选干部素质好的地区先开始。我们先按300万亩的数字，每亩补200斤粮食，现在就开始调拨。但是真正要补多少

粮食，应该实事求是，经过调查研究，根据实际情况确定。一家一户究竟种了几亩地，一年打多少斤粮食，平均打多少，既不能完全按丰产的时候算，也不能完全按低产的时候算。要按一个平均数，一户一户核对，最后需要多少粮食，我们就给多少粮食。这个粮食怎么发到农民手里，也是要很好研究的。乡镇干部只能够管事，不能由乡镇干部去发粮食，那容易滋生腐败，会有很多问题。发粮、发款还是通过粮食部门，可以采用票证还是别的什么办法直接把粮发给农户，这就要你们创造经验，怎么使粮食真正发到农民手里而不是被干部截留、虚报冒领。我们先定五年全面的补助，五年以后补助要减少，现在先不要说减少多少，将来再根据你们的实际经济情况作出调整。由于是无偿提供粮食，农民除了要把退出的田种上树以外，还得为国家多造一点林。想不造林先领粮食，那是不行的。



1999年9月9日，朱镕基在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考察原始森林的保护情况。左一为国家林业局局长王志保，右一为四川省省长张中伟。

林权也要稳定，这个问题也得请你们来探索研究。我们的初步意见：坚持个体承包非常重要，否则不落实。这个山林承包给个人，应该说这个使用权是他的，管理权也是他的。但是，恐怕还得规定一条：没有国家的批准，树是不能砍的。因为国家出了钱。至于说用材林，那是另外一回事，应该分开来考虑。比如房前屋后啊，种一点速生林当做柴火，那就另当别论。大片的林地要封山育林，这个林权怎么确定，是个很大的问题。如果不明确林权，恐怕个体承包不会落实。要使农民感到这个林子是他的，是要靠它来致富的，是要靠这个林子来发展他的生路的，但是又不能让他乱砍。希望你们对这些问题研究出一点办法、措施来，那么全国都可以按照这个办法、措施来做。

财政补助，是必须采取的办法，凡是由于停止砍伐木材所减少的财政收入，国家按实际情况给予补贴。由中央和地方财政来负担，中央拿大头。让我们共同努力，使四川省成为天然林保护工程的尖兵。

坚持不懈地打击经济犯罪

(1999年9月25日)

这是朱镕基同志在《罗干同志在全国经济犯罪侦查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99年9月23日送审稿)》上的批语。

同意罗干同志的讲话。打击经济犯罪工作很重要，这次全国经济犯罪侦查工作会议一定要开好，各级党委、政府和有关部门都要热情支持各级公安机关的工作。我们不能看着成千万、上亿的国有资产和人民的血汗钱流入犯罪分子手中而熟视无睹。一定要保证公安机关的办案经费(财政部应有专门规定和专项渠道)，这是必须付出的代价，要从政治上，而不只是经济上看到打击经济犯罪的重要意义。

最近一个时期，各级公安、政法机关打击经济犯罪很有成绩，把一些大案、要案的潜逃主犯，一个一个抓了回来，大快人心，增强了对犯罪分子的威慑力量，我代表国务院对公安、政法战线的同志们表示衷心的感谢，并予嘉奖。今后对破案有功的单位和个人，应有奖励制度和奖励办法。希望你们继续贯彻江泽民同志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不懈地重重打击经济犯罪，以取信于民，并保卫国家利益。

朱镕基

9.25

加快民族地区发展的几点意见

(1999年10月3日)

1999年9月29日至10月3日，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暨国务院第三次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在北京召开。出席会议的有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负责同志，中央有关部门负责同志以及受表彰的模范集体和模范个人代表。这是朱镕基同志在会议闭幕时讲话的一部分。

加快民族地区的发展，特别是把经济搞上去，对于逐步缩小各地区发展差距，促进全国经济的振兴和发展，实现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富裕，巩固和推进我国民族团结进步事业，都有重大而又深远的意义。

因此，我们对加快民族地区的发展，既要有高度的历史责任感和紧迫感，又要从实际出发，按客观规律办事。从现在起，就要抓紧研究和制定规划，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有计划、有步骤地实施，分阶段达到目标。我就加快民族地区发展问题讲几点意见。

一、加强民族地区基础设施建设。

基础设施落后，是制约民族地区发展的一个主要因素。中央对民族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历来是重视的，多年来在民族地区陆续建成了一大批重点项目。比如，改革开放以前建设的兰新铁路、成昆铁路、青藏公路等，改革开放以来建成的南昆铁路、新疆塔里木油田、西藏拉萨机场、兰西拉(兰州－西宁－拉萨)光缆工程等。近两年，国家在实施扩大内需和积极的财政政策过程中，较大幅度地增加了对中西部地区特别是民族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目前还有一批在建的国家重大项目，比如内昆铁路、川藏公路、宁夏扶贫扬黄灌溉工程、新疆引额济克工程等。这些建设已经并将对促进西部地区的发展发挥重大作用。在西部地区和民族地区搞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很大，许多项目本身在一定时期内不可能发挥经济效益，但也一定要搞。没有基础设施的建设，就没有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发展。

今后，必须下更大的力量把民族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搞上去。一要加快交通运输体系的建设，加强新疆、西藏、西南和东北边境地区的铁

路建设，全国公路交通纵横主干线要覆盖更多的民族地区，还要因地制宜地发展水路、空运和管道运输。二要坚持把水资源的开发和综合利用放在突出位置，特别要抓紧解决农牧区人畜饮水困难的问题。三要继续加强能源特别是电力建设。四要加快通信建设，推进民族地区的信息化进程。这些不仅有利于民族地区当前的经济发展，而且能够为它们的长远发展创造条件。

二、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发展各具特色的民族地区经济。

这几年，我到过一些民族地区，深感民族地区自然资源丰富，有的地区有多个气候带、多种生物物种资源，发展各具特色的区域经济大有可为。要坚持以市场为导向，发挥当地资源优势，扬长避短，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一是要大力调整种植业结构。充分发挥多种生物资源的优势，发展生态型的高产、优质、高效农业，因地制宜地发展多种经济作物。二是要加快牧区建设。切实把草原建设摆到与农田基本建设同等重要的位置，从根本上改变重农轻牧、重粮轻草的做法，促进畜牧业与农业协调发展。三是要充分发挥矿藏资源丰富的优势，建成一批国家重要的能源基地、有色金属基地、稀土基地和石油化工基地等。四是要大力发展旅游业等第三产业。总之，各地一定要从实际出发，着力培育能够发挥本地优势的各类产业，特别是支柱产业，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



1999年10月3日，朱镕基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暨国务院第三次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讲话。右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

三、切实抓好天然林保护工程与生态环境建设。

这是中央从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和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出发作出的一项重大战略决策。近些年来，我国南部一些地区水患频繁，险情加重，除了气候变异原因外，主要是因为大江、大河的上中游地区滥砍乱伐森林，植被遭到破坏，造成严重的水土流失。因此，如果不把江河上中游地区的天然林保护好，并通过植树造林恢复生态、保持水土，就不可能根治水患；同时，我国西北部地区日趋严重的干旱和荒漠化问题也不可能得到有效解决。去年长江流域发生特大洪涝灾害之后，中央就果断作出决定，停止长江、黄河上中游地区天然林砍伐，植树种草，防治水土流失。今年以来，我几次到西南、西北地区的一些地方，都反复强调了这个问题。搞好天然林保护和生态环境建设，也是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加快民族地区发展的重大步骤。一定要全面规划，综合治理，标本兼治。长江、黄河上中游地区治理水土流失

和实施天然林保护工程，要采取“退耕还林(草)、封山绿化、以粮代赈、个人承包”的措施，恢复林草植被。半农半牧地区要以水定耕，没有水源保证的必须退耕还草。禁止天然林砍伐、退耕还林还草之后，中央和省级财政对有关地区与群众要给予应有的补偿或补助。现在粮食总量供过于求，全国粮食库存达5500亿斤，加上农民手里的存粮，全社会存粮达1万亿斤，相当于全国一年的粮食产量。这是以粮食换森林、换草地的极好时机，一定要抓住而不能错过这个历史机遇。有关部门和地区一定要下更大的决心，抓紧制定和实行有效的政策措施，持之以恒地把实施天然林保护工程这项工作抓紧、抓实、抓好。植树造林、恢复生态，需要子子孙孙持久奋斗，但现在已经刻不容缓。“十年树木”，若干年后森林长起来，我国的生态环境就会有很大改观，就会为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创造十分重要的条件。

四、集中力量加大扶贫攻坚力度。

这几年，民族地区的扶贫工作取得了很大成效。1994年到1998年，民族地区有850万人解决了温饱问题。现在，我国扶贫攻坚已经进入关键阶段，全国农村还有约4000万贫困人口，主要分布在西南、西北少数民族地区。我们要从全局的、政治的高度，加大对少数民族贫困地区的扶贫力度。坚持以解决温饱为中心，以贫困村为主战场，以改善基本生产、生活条件和发展种养业为重点，多渠道地增加扶贫投入。一定要把扶贫攻坚的目标和措施落实到贫困村、贫困户。对解决灾害多发地区贫困人口、生态环境恶劣地区贫困人口和牧区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必须采取一些特殊的政策措施。

前面讲到的实施天然林保护工程，也是帮助少数民族群众脱贫致富的一个措施和途径。居住在山区的少数民族群众要跑很远的路到山上种地，收的粮食往往不足以维持温饱。通过实行退耕还林(草)、以粮代赈、个体承包的办法，无偿供应粮食，鼓励植树种草，既可以很快解决群众的温饱问题，还可以改善生态环境、吸引众多游客，使旅游业和其他第三产业发展起来，一举多得。

五、实施科教兴国战略，积极推进民族地区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

民族地区的发展要提高起点，走出一条新的路子，必须科教先行。要加强民族地区的科技投入，促进科技成果向民族地区转移，提高民

族地区的科技成果转化能力和科技创新能力。现在少数民族的教育存在一个很大问题，就是一些少数民族和贫困地区的学生要上高中、上大学很困难，一个重要原因是交不起学费。如果青少年不能够上学，没有知识，那么，改变民族地区的落后面貌就缺乏必要的基础条件，也就不可能实现。国务院已经把这个问题作为一个专题，研究解决的办法。要采取多种措施加快民族地区教育事业的发展，积极探索适合民族地区特点的办学机制和办学形式，鼓励和提倡多种方式的联合办学，切实解决一些民族地区办学难、上学难的问题。要加快医疗卫生事业发展，提高少数民族群众的健康水平。要结合少数民族的实际，搞好计划生育和优生优育工作。积极发展民族文化事业，保护和开发少数民族文化资源，结合时代精神，继承和弘扬少数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

加快民族地区发展，必须继续培养少数民族各级各类高素质人才。要努力造就德才兼备的少数民族干部队伍，既要注意扩大数量，更要注意提高素质、改善结构；同时，要大力引进人才。只有实行“人才加科技”，才能把自然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发展的优势。要建立有利于各类人才到民族地区工作的激励机制。国家要采取有关措施，鼓励大专院校毕业生到西部地区和民族地区工作，民族地区也要努力创造条件吸引各类人才，使人才愿意来，留得住，扎下根。

进一步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的几个问题

(1999年10月15日)

1999年10月15日，朱镕基同志主持召开国务院总理办公会议，研究如何贯彻落实党的十五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这是朱镕基同志在会上讲话的主要部分。

在昨天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江泽民同志特别交代，党的十五届四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国务院要组织贯彻落实、督促检查，明年适当时候向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汇报落实的情况。

今天我们已就如何分工协作，组织贯彻党的十五届四中全会精神，进行了讨论，同志们发表了很多很好的意见。从现在到明年年底，国务院工作的重点，就是使大多数国有大中型亏损企业三年脱困，并且在大多数国有大中型骨干企业初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刚才大家把分工讲得很清楚了，我更要强调协作。国务院实行集体领导，国务院每一个领导成员，都要对党的十五届四中全会《决定》的贯彻负责，分工协作，密切配合。

现在，我讲讲贯彻《决定》精神比较难办的，也就是当前要重点抓的几个问题。

第一，国有企业的监管问题。监管本身包括三个部分：一是企业领导人的任免、考核；二是企业党的工作，包括纪律检查工作；三是对企业国有资产的监管、监督，保证国有资产不流失。这三项工作应该统一于一个机构，就中央直接管的企业来说，这个机构就是中共中央大型企业工委。我和胡锦涛同志初步交换了意见，中央国家机关工委今后不再管这些事了，光靠中央纪委和中央组织部也不行，恐怕还是统一由大型企业工委管理比较好。大型企业工委管理不包括金融企业在内的企业，也只是挑一部分企业来管，其他企业让地方按照我们的办法管。我不主张这个问题搞很多试点，各行其是，还是统一比较

好，逐步统一。请吴邦国、王忠禹同志多考虑，同胡锦涛、曾庆红同志商量，看这么一个监管形式行不行。这与中组部管特别重要的大型企业的人事任免并不矛盾，其中一些还要通过中组部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讨论决定。大型企业工委同人事部分开，并且要加强，比方说中央国家机关工委的企业部可以合并过去，国家经贸委的国家局也可以把一些精明强干的人调过去。国家经贸委将来就是管行业规划、行业管理、行业标准，定政策，就不要再管企业了。我赞成稽察特派员将来向监事会过渡，但这个监事会一定是以国务院名义派出的(实际上是由大型企业工委管)，人员可以加多一点，也不要搞得太大，查账应当利用中介组织，不可能都自己去审计。这是监管的问题，今年必须有一个办法。



1999年9月13日，朱镕基考察邯郸钢铁集团。右二为河北省委书记叶连松。

第二，现代企业制度规范化问题。江泽民同志多次强调建立现代企业制度问题，《决定》也是把大多数国有大中型亏损企业三年脱困和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放在一起提的。什么叫建立了现代企业制度、如何规范化、有什么标准，要早点研究并提出一个意见，使每一个国有大中型企业都朝着一个很明确、具体的目标去努力。

第三，建设社会保障体系问题。现在对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实行发放基本生活费制度，资金来源实行“三三制”，这是个过渡办法。应该赶快结束这个过渡，真正建立社会保障体系，与企业分离。就是说，因减员增效、下岗分流或者企业关闭而出来的职工，都到社会保障机构去领钱，跟企业脱离关系。企业也可以辞退不合用的人，被辞退的人不是没有生路，而是享受社会保障待遇。现在就要开辟社会保障基金的来源，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但是这个代价一定要付。财政要调整支出结构，预算中要按一定比例拿出这个钱来。另外，把国有资产卖掉一些，在股票市场上市，还有其他种种资金渠道，筹集社会保障基金。总之，要变成一个社会的保障体系，而不是企业各自为政。如果企业各自为政，资金没有保证，好多人还是流离失所，引起社会不稳定。资本主义国家为了缓和阶级矛盾，在社会保障方面也付出很大代价。我们社会主义国家保障工人阶级的根本利益，对这个方面更不能忽视。这件工作还是以吴邦国同志为主，我也要参加。



1999年2月26日，朱镕基考察武汉钢铁公司。

上面讲的这三个问题是我认为最重要的，这里强调一下，其他还有很多重要问题。希望大家按分工负责、互相配合的原则，把《决定》贯彻好。明年3月前就要进行一次大检查，因为3月份要作《政府工作报告》，对国有企业的改革和发展、对党的十五届四中全会《决定》贯彻落实的情况，必须在向全国人大作《政府工作报告》以前向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作汇报。

刚才大家讲到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问题，我们现在讲积极的财政政策，实际上是一种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为了不引起争论，就说积极的财政政策。我认为，实施这个政策必须有相当长的时间。我看，明年发国债可能要超过1000亿元人民币，不然拉不动经济。今年的外国直接投资可能只有350亿美元，也就是说，比去年少100多亿美元，这个影响在明年会显现。如果不从扩大内需来弥补，经济发展就会慢下

来，社会稳定的问题也会突出。请李岚清同志组织人研究多发国债的风险有多大。有人怕年年发这么多，将来财政是否承受得了；有些同志担心发生风险，把问题留给下一届政府。我认为不会发生这种问题，不会有多大风险。还有人说发了那么多国债，还是拉不动社会投资，作用有限。1998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28406亿元，主要是国家财政拨款、银行信贷资金和国有企业的自有资金。现在企业很困难，这部分投资肯定下降，企业不脱困，拉也拉不动，所以才要发国债。银行也不像过去了，没有效益就不会给贷款。因此，社会投资必然减少，但国有企业脱困以后，情况就会改变。我是担心国债发少了投资不足，影响国民经济稳定增长。今年就有一段脱节，7月份投资增幅出现较大下降，8月份零增长，9月份成了负增长。积极的财政政策要坚决执行，国务院要研究的是这样做风险有多大？能不能承受？让大家放心。

关于发挥货币政策的作用问题。我们始终没有提实行积极的货币政策，因为怕影响金融体制的改革。如果现在大量投放贷款，又会像1993年那样，后果是很严重的。因为现在投资方向很难找，只有基础设施比较可靠，但基础设施又不能单靠银行贷款搞。所以，如何发挥货币政策的作用，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我不主张提实行积极的货币政策，还是提进一步发挥货币政策的作用为好，在稳健的经营原则下发挥它的作用。怎么发挥呢?

第一，银行要积极配合国债安排的项目，充分地投资，不要有任何犹疑了。国家选定的项目，经过国务院讨论，银行就要积极配合，加大投资力度，哪怕回收期长一点，也得投进去。

第二，银行应该保证国有企业有效益的生产的流动资金需要。现在，国有商业银行收权收得太厉害，把流动资金的贷款权集中到省行来，甚至集中到总行来，这是不行的。只要生产是有市场、有效益的，就要让下面的分行去贷款、支持。上面要做好监督、检查工作，而不是去收权。不然的话，有效益的生产所需流动资金不能保证，经济就不能正常运转。

第三，注意对中小企业贷款。我一直强调银行要成立中小企业信贷部，现在虽然成立了，但银行强调风险大、没有担保，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风险确实有，但有时一些必要的风险也是要付出一点代价

的，不然的话，一律收紧，风险没有了，生产也停滞了。就业最多的是中小企业，它们能不能生产，是影响社会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

第四，人民银行要发挥再贷款的作用，化解金融风险。这一两年的实践证明，为消除过去金融扩张时期形成的金融风险，现在是付出代价的时候了。这是一个最好的时机，因为没有通货膨胀，物价下降，银行能承受得了这个风险。这个风险现在不解决，遗留给下一届政府，解决起来难度更大。必须现在就把问题解决。靠什么解决？发票子。在目前情况下，发点票子没有风险，不会引致大的通货膨胀。现在要抓紧解决以下几方面的金融风险问题：一是农村合作基金会，现在的烂账在全国恐怕有上千亿元，不少是被地方基层政府乱花掉了，或者是花在乡镇企业上，或者是发了奖金、盖了大楼等等，这些钱就根本回不来了。但这钱是从农民那里集资的，现在要由中央银行给予由地方政府保证的、有信用的金融机构再贷款，让它们能把钱还给农民。目前农民是增产不增收，拿回这个钱等于增收。已经有几个省市开始这样做，四川、重庆、湖北、湖南、河北，一个一个批给它们再贷款，就是这个办法。归还这个再贷款的责任在地方政府，但要有思想准备，这个再贷款不能完全收回来。我们需要一点点通货膨胀，通货紧缩不好办，有点通货膨胀有好处。二是1992年以来乱批设的信托投资公司，多数是“败家子”，亏空严重。现在也要采用再贷款的方式，解决它们的债务问题，把钱借给地方政府指定的商业金融机构，还给投资人，把这些公司关闭。三是城乡信用社，也是问题很多。那些经营管理很差的、资不抵债的城乡信用社，都要关闭，用再贷款替它们还债。

第五，发展消费信贷。银行通过消费信贷来拉动生产，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是教育，一个是住房。现在好多贫困家庭的子女不能上大学，连高中也不能上，为此要开展教育信贷，让他们工作以后再还钱。当然，这会有风险，很可能将来有的人大学毕业了找不到工作，还不了钱，但多数的人是能找到工作的。“担保”就是看他是不是考取了学校，由学校给他出个证明；当地政府也要出个证明，证明他确实没有收入，交不起学费，这就行了。住房建设是中国经济新的增长点，住房信贷开展起来很有前途。有固定工资收入的人，都是有担保的，是可以还钱的。房子也跑不掉，房子本身就是抵押物，还不了钱，银

行收回房子就完了。所以，教育信贷、住房信贷、大件商品的信贷，要大力开展。现在，积极的财政政策还可以进一步做文章，再扩大一点，货币政策也可以大做文章。现在不是通货膨胀的情况，不要过分地顾虑。当然，我不主张违反商业原则，破坏信贷制度。商业银行的经营方针还是需要稳健，不能随便贷款。现在金融系统出现的好多案子，都是贪污、腐化、诈骗、席卷巨款潜逃，损失惨重，令人痛心。银行在这方面的监管放松了，而对具体的经营业务又卡得那么紧，该研究的不研究，该支持的不支持，这就很不应该，一定要注意这个问题。明年要加大货币政策的作用，光靠财政拉动还是有一定的难度。

开发西部地区主要从三个方面着手

(1999年10月29日)

1999年10月21日至30日，朱镕基同志先后在甘肃省、青海省、宁夏回族自治区考察工作。朱镕基同志在宁夏考察工作期间，先后考察了扶贫扬黄灌溉工程的泵站、灌区及移民点等地。这是朱镕基同志在听取自治区党委、政府工作汇报后讲话的主要部分。

这次我到西北地区来，跑了甘肃、青海、宁夏三个省区。前一个时期，我也跑了陕西、云南、四川等好几个省。主要是贯彻江泽民总书记提出的西部大开发这个大思路，落实这个大战略。

根据多次的调查研究，我认为，现在开发西部地区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着手：

第一，加强西部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这是一个基础。西部地区都是山区、干旱的地区等等，如果没有发达的交通，不首先解决这个问题，就没办法赶上全国前进的步伐。这次我到西北地区，从甘肃、青海到宁夏，一直强调，起码先把公路都修通、修好，村村、乡乡、县县都得通公路。至于说路面达到什么级别，三级路、二级路、一级路还是高速路，这要根据各地的具体情况来做出规划。因此，我这次来宁夏以后，也向毛如柏①同志和马启智①同志提出，请你们赶快做个规划。国家要把西部地区的公路交通问题，作为一个特别的项目给予特别的支持，赶快修通。回去后，我还要跟黄镇东②同志讲一讲，希望交通部特别重视西部地区的公路建设问题，要来审查西部地区各个省区市提出来的规划。交通部不仅要考虑几纵、几横和国道问题，还要考虑村村、乡乡、县县都要通公路。对宁夏特别是南部地区来讲，这是扶贫的重点，不把公路修通，有粮食也运不进去，要赶快做一个规划。你们刚才提出修中卫－太原铁路，我支持，请铁道部门加快前期工作。对建设农村电网、村村通电等，国家下了很大的决心。去年，我们开始筹划这件事情，原来我说拿1800亿元，现在恐怕要拿2600亿元。要在三年以内在全国实现村村通电，改造农村电网。电都

不通，怎么打开农村的市场？农民怎么脱困呢？宁夏的进展如何？(李荣融③：“不算太理想。”)不算太理想！希望你们认真抓一下，一定要成立一个领导小组，必须有统一的领导，不然的话，这个事情很难推动。不要放任自流，那样就搞得慢。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基础设施建设，希望把你们目前不太理想的状况，变成一个比较理想的状况。

---

① 毛如柏，当时任中共宁夏回族自治区委书记。马启智，当时任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

② 黄镇东，当时任交通部部长。

③ 李荣融，当时任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副主任。

另外，村村通电视、广播，这个事情也在做了，这不但是物质文明建设，也是个精神文明建设。我顺便问一句，你们是不是每个市、县都有电视台？(马启智：“没有，只有银川有。”)我很明确地讲，除了省级电视台以外，其他的地市县都不要搞自己的电视台。搞了干什么？你就转播中央电视台、自治区电视台的节目，不就够了吗？你能搞的节目，我估计就两样：第一，为那些县长、市长树碑立传，一天到晚报道他们今天到这儿视察、明天到那里去剪彩。第二，就是播一些香港地区、外国那些又是打、又是闹的东西，就转播那些电影，你办这个电视台干什么呢？劳民伤财，特别是对青少年一代起不到什么好的作用。

发展旅游业，也是经济结构的调整。西北地区是我们民族的发源地，它有很多的历史文化古迹，很值得参观，而且对下一代的教育意义特别大。昨天，我到西夏博物馆，就受到非常生动的、历史的、传统的爱国主义教育。所以，这方面还有发展的余地。

第二，改善生态环境，实行退耕还林还草的政策。西部地区一个很严重、很大的问题，相当可怕的问题，就是生态环境的恶化。不解决生态环境建设的问题，谈什么西部大开发呢？人才也不来呀！所以，我们现在要认真地执行中央已定的退耕还林政策。改善生态环境，保持水土，别把泥沙带到下游来，要把黄土给固住，这是造福全国人民啊！

昨天，看了扶贫扬黄灌溉工程，这个工程在确定上马时跟现在的情况已经不一样了。那个时候，粮食还不够吃，要的就是粮食。所以，这是做了一件好事，把西海固地区贫困的农民异地搬迁过来种粮食。但现在看，就种不起这个地了，这个项目就是个很大的包袱了，这不是否定过去，而是历史的评价。昨天，我们初步算了一下，光每年抽水用的电费就要几千万元。你们花了30亿元，才搞了200万亩地。1亩地得1500块钱吧？每年的水费几千万元，而打的粮食根本不值这么多钱，那么这粮食卖不出去，只能放在仓库里。宁夏也是粮食自给有余，再增加粮食，它卖不出钱来，你说这怎么办？将来，这灌区没有政府财政的补贴就没法维持。现在看起来，就是昨天马启智同志讲的，再像这样搬迁是搬不起了。搬不起，就别搬了嘛。西海固地区为什么贫困呢？因为那个地区粮食亩产很低，缺水啊。那就别种了，把粮食运进去，无偿地给当地农民吃，这不就是扶贫吗？然后，请他们退耕还林，种草种树，或者乔、灌、草相结合，改善那里的生态环境，尽管雨量很少，它还能涵养一点水分。另外，把黄土固住了。刚才我一问，这里黄河的泥沙主要是从西海固地区流下去的，把黄沙给固住就好了。要是种了树，把黄土固住了，就能够修水库了，那个平川地的粮食产量也就能够提高了。而且，增产的粮食比山上生产的粮食要多得多，这就叫以粮食换森林。



1999年10月28日，朱镕基在宁夏回族自治区扶贫扬黄灌溉工程红寺堡灌区大河乡四村移民家了解生产、生活情况。左二为宁夏回族自治区政府主席马启智。

我讲这个话，是有科学根据的。现在粮食确实是多了，全国一年多几百亿斤；并且，今后也不会少，因为生态环境改善后，中下游地区增产的粮食会越来越多。而你们这里由于上游地区生态环境改善，平川地的粮食也会增产。所以，山坡地不要种粮是完全应该的，绝对不会造成粮食的缺乏。原来我们设想，无偿给退耕还林的农民提供粮食五年。现在，我们可以斗胆地说一句，需要无偿提供几年，就提供几年，八年、十年、二十年都可以。刚才，段应碧①同志讲得很形象，你现在说无偿提供粮食五年，五年后如果农民的生活还没有改善，收入也没有增加，你如果不供粮食了，他不就把树砍掉了，再退林还耕啊！所以，必须等农民把树林种起来，然后各种副业、产业能够发展，他有了收入，那时候，再改变无偿提供粮食的政策，让他拿钱来买粮食。这个时间需要五年就五年，六年就六年，十年就十年，或者

需要更长时间。我们有把握可以无偿供应粮食，从国家财政来讲，也负担得起。因此，这个政策是一举多得，既改善生态环境，也改善粮食的平衡。

---

① 段应碧，当时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



1999年10月28日，朱镕基在宁夏回族自治区扶贫扬黄灌溉工程红寺堡灌区与移民交谈。左三为宁夏回族自治区政府主席马启智，左五为国土资源部部长周永康，左六为国务院研究室副主任魏礼群。

实行退耕还林要因地制宜，各个地方政府要调查研究，制定适合于当地情况的政策，宜林则林，宜草则草。也不是什么地都不种粮食了，平川地产量很高，一亩地可以打七八百斤粮食，为什么不让种？我讲的是山坡地，不管是25度还是15度，都可以退耕还林。但是，退了以后应该种什么东西，是要很好地研究，而且要尊重农民群众的意愿。苗木还是国家出钱，由我们林业系统无偿提供。

这个政策如果让农民一掌握，马上就可以铺开，但是起步要稳，一开始不要搞得太多，你们提出一年退耕还林50万亩吧，不要搞那么多，搞10万、20万亩都不少，因为农民还没有掌握你的政策，对你还没有信心，你供不供他粮食，现在还没有一套制度。同时，还要有一套检查制度，农民不能拿了粮食不种树，那也不行。在办法还没出台前，如果搞得太急了，很容易造成中间挪用、侵吞，干部不给农民粮食，就怕发生这种情况。所以，一开始应该选择那些干部素质好、农民觉悟高的地方，土地还比较肥的地方，起到一个示范的作用。宁愿慢一点起步，不要搞得太快了、搞坏了，把这个政策搞臭了。

另外，这个退耕还林还不单是在山区搞。我昨天走了几百公里，就感觉你们宁夏的树还是种得不够，公路、铁路旁边都可以大力地种树嘛！房前屋后，每家每户的宅前宅后都应该种树。城市里面，要加强绿化，树种得也不够。要改变这个生态环境，西北地区必须来个全民动员，开展一个绿化运动，大家动手植树造林，不单是退耕还林，这个意识一定要非常的清楚。

我们回去以后，马上召开国务院的会议，来讨论这个“退耕还林、以粮代赈”政策。同时，也希望你们把意见和具体规划尽快报给我们。国务院讨论以后，还要向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汇报，经过批准后，我想差不多今年年底就可以下发正式的文件。这样到明年春播的时候，就可以开始实施退耕还林了。

第三，调整经济结构。现在是经济结构调整的一个决定性时期，西部各省区市都要根据自己的不同气候特点、资源特点、市场特点，来调整自己的经济结构，建立有自己特色的产业结构，不调整结构是等死啊！今天上午，我们召开了宁夏国有企业座谈会。像宁夏化工厂就有很好的发展条件，有天然气，有很好的管理基础，有公用设施，可以进一步地发展。但是，你们汇报稿提出还要搞高密度聚乙烯、聚丙烯，这些就不要搞了，就搞化肥吧。搞那些东西，你们没有竞争力，原料路线也不行，生产化肥才是你们的优势。应该结合你们的资源优势，发展一些新型产业。这个问题是个大题目，确实需要很好地研究，在没有把市场摸透以前，不要轻易地上马。现在亏损又扭亏无望的企业，宁肯让它破产，也不要去救它。如果又去上一个项目，投资好几个亿，背上了包袱，不但救不活，而且包袱更重。就是把它关

掉，把职工很好地安置了就行了。集中力量去发展一些新型的产业、有市场需要的产业。

高度重视质量技术监督工作

(1999年11月2日)

这是朱镕基同志在《加大质量工作力度提高产品质量总体水平——吴邦国副总理在全国质量工作会议上的讲话(送审稿)》上的批语。

完全同意邦国①同志报告，并请代为转达：祝贺全国质量工作会议的召开，向工作在质量技术监督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亲切的问候。要充分肯定全国质量管理和质量监督工作取得的成绩，不能过高估计，但确实来之不易。各部门、各地方的负责同志应该高度重视和热情支持质量技术监督工作，切实保证质量标准建设、计量检测体系和质量监督抽查所必需的投资和经费，促进质量工作再上新水平。当前，我们面临经济结构调整的关键时期，质量工作正是主攻方向。没有质量就没有效益。放任假冒伪劣，国家就没有希望。

朱镕基

11.2

---

① 邦国，即吴邦国。

要热爱机关事务工作

(1999年11月5日)

1999年11月5日，全国机关事务工作协会第二届代表大会暨机关后勤改革座谈会在北京举行。这是朱镕基同志在接见与会代表时的讲话。

党中央、国务院的领导历来十分重视机关事务工作。过去打仗时期，我们的部队有“司、政、后”——司令部、政治部、后勤部。没有后勤部，打不胜战争。现在虽然是和平建设时期，但是如果没有后勤工作的话，机关的队伍就不能稳定，机关的工作也不可能搞好。所以，机关事务工作是非常重要的。但这项工作又很不好做，众口难调，有时费力不讨好。当然，我们是为人民服务、为党工作，无所谓讨不讨好。机关事务工作很光荣，做这项工作的人应该说是品格高、修养好、最没有低级趣味的人。如果不具备这种优良的品德、良好的修养和任劳任怨的精神，谁愿意在这个岗位上待着？同志们几十年辛辛苦苦、默默无闻地干这个工作，这一点值得我们学习。

机关事务工作也要深化改革，要坚持管理科学化、保障法制化、服务社会化的方向，逐步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和新时期机关建设需要的后勤保障机制。但是，改革也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需要一个逐步提高认识和统一思想的过程。去年，根据全国人大代表的提案和群众来信的建议，搞了一个公务用车改革方案，由于情况比较复杂，这项工作还需要进一步认真研究，所以没有实施。这说明干好机关事务工作不仅要有积极进取的开拓精神和改革意识，还必须有很好的工作方法，广泛听取大家的意见。住房制度改革更是一件很难办的事情，涉及广大干部职工的切身利益。中央国家机关住房制度改革主要由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来实施。我看到很多人民群众来信，对住房制度改革有这样那样的意见，有要求购买现住房的，有要求调整住房的，情况很复杂，我批给了王忠禹、焦焕成①同志处理。当然，处理起来有很大的难度，但一定要积极稳妥地做好。

① 焦焕成，当时任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局长。

我希望做机关事务工作的同志们，要深刻认识自己工作的地位和作用，热爱机关事务工作。要有一种敬业精神、奉献精神、务实精神、创新精神，努力把机关事务工作做好。



1999年11月5日，朱镕基在北京接见出席全国机关事务工作协会第二届代表大会暨机关后勤改革座谈会的全体代表。右一为国管局局长焦焕成。

会见美国贸易代表巴尔舍夫斯基等时的谈话

(1999年11月13日、15日)

1999年11月13日上午10时30分，朱镕基同志在北京中南海紫光阁会见了美国贸易代表查伦·巴尔舍夫斯基和美国国家经济委员会主席吉恩·斯珀林率领的前来参加中美关于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问题双边谈判的美国政府代表团。11月15日上午9时50分，朱镕基同志率副总理钱其琛、国务委员吴仪到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再次会见了美国政府代表团，并亲自与美方进行了谈判，达成了中美关于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协议。这是朱镕基同志与美国政府代表团两次谈话的记录。

一

(1999年11月13日)

朱镕基： 首先我要对来自美国的朋友们，对双方代表团表示诚挚的慰问。你们虽然很辛苦，夜以继日，但都是为了世界和平、为了国际合作和人类进步而工作，当然也是为了中美友好合作关系而奋斗，意义是重大的。

我向你们表示道歉，因为我今天凌晨才通知你们来会见，太晚了。但是我也要说明一个情况，最近两天的谈判，我跟你们一样忙，你们的发言我都得看，连斯珀林先生说了六个“不”我都知道。

斯珀林： 我记得只说了四个。

朱镕基： 我把所有文件都看了。昨天麦克海①先生8点半见龙副部长②，根据你的信，我们开了会，半夜开的，凌晨3点才结束。我睡了几个小时，你们可以算得出来。但请记住一点，我70多岁了，比你们都大得多，你们在座的比我的女儿都还年轻。

① 麦克海，即威廉·麦克海，当时任美国驻华使馆临时代办。

② 龙副部长，即龙永图，当时任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首席谈判代表。

现在，在说明我们的立场之前，是不是请我们尊贵的客人先讲一讲？但我提醒你们，你们讲得越长，我讲得越短。

巴尔舍夫斯基： 只说“是的”就太短了。我们会讲短的。我清楚地记得我们上次在这里见面的情况。我觉得今年4月我们没有达成协议十分令人失望，我甚至将此形容为“痛苦的”。但我确实认为，要纠正当时的问题。这次斯珀林先生陪同我来华访问，这是具有非常意义的，是前所未有的。我只是说，他来是有诚意的。

我上次见你，当时我没有被授权与中方结束谈判。而现在，我与斯珀林有结束谈判的全部授权。我们面临的谈判的时间窗口只有一天。我认为，克林顿总统和江泽民主席理解我们的使命和任务。如你从两国元首通话的记录所知，如果不是要结束谈判，如果不是要达成协议，总统是不会派我们来的。克林顿总统付出了很多努力，表示有决心达成协议。他对中方的问题作出了立即和积极的回应。他在给江主席的信中表示，要收回一般保障措施、纺织品十年配额的要求。他在建议中还进一步显示了灵活性。我和斯珀林在这一基础上显示了更多的灵活性。总统不仅领导而且亲自起草了建议，但我们认为美方的灵活性未得到中方相应的反应。我认为你我面对的任务不太困难。只要我们有一个双赢的计划，最终达成协议是很自然的。

电信、保险、汽车三个领域，我们已采取了灵活的态度，在信中，美方表示可以与中方在这三个领域继续进行合作。

我们相信，中方深知美方的政治敏感性。我们必须保持4月10日减让表和文件的完整性，在议定书方面必须完全满意，同时也要认识到贵方表示出的对上述三个领域的全部关切。对于4月没有解决的问题，我们认为相对容易解决。对中国来讲，双赢是显而易见的。美国收回一般保障措施、纺织品十年配额的要求对中国来讲是巨大的胜利。我们甚至愿意前进一步，继续合作，这本身就表示我们是基于善意在磋商。我宁愿这样想，任何人都不能接受失败。

谈到这里，我想世贸组织协议已远远超过经济协议，它包括某种政治谅解，这种政治谅解是中美关系中缺少的东西，而且也会提供一个联结点。

如果你允许，请斯珀林讲几句。



1999年3月4日，朱镕基在北京中南海紫光阁会见美国贸易代表查伦·巴尔舍夫斯基(右二)。右四为美国驻中国大使尚慕杰。

斯珀林： 感谢你的接见。你有非常好的、出色的谈判代表，这几天虽然争论不休，却是良好的谈判。总统让我来有三个原因：一是显示他本人对今年中国以好的条件加入世贸组织的承诺；二是表明美国政府是以一个声音在说话；三是他想让你知道，我们有结束谈判的授权。我们认为今天非常重要。我确信应当有一个双赢的局面。如果达成协议，我们全体内阁成员会为通过中国永久最惠国待遇而尽我们全部所能。即使接受现在的建议，我们也面临国内非常严重的反对，工会不会支持放松纺织品配额。但我们相信，我们全力以赴达成一个强有力的协议，一定能使中国获得永久最惠国待遇。我告诉你，如果不解决议定书的关键条款，不解决汽车、音像、保险等问题，就会受到这些产业的反对，如果它们失望，那么即使全力以赴，也不能赢。失败了不仅对总统有害，对双方都有害。

我强烈地感到，双方达成协议能够在各自国内获得支持。我本人原来认为，总统在获得中方让步前，不应在纺织品、一般保障条款上让步。但总统说服了我们，说需要作出例外的让步，使中国看到，我们愿意达成一个中国人民能接受的协议。我认为，应在今天达成一个双赢的协议。今天，历史要求我们达成一个双赢的协议。我们希望中方对美方提出的敏感问题也同样理解。

朱镕基： 首先，我表示非常赞赏克林顿总统主动与江主席通电话，并派出有授权的强大代表团来北京，这表现了克林顿总统对达成协议的诚意。我非常赞赏克林顿总统在这三个问题上所作的承诺，这体现了他在这样一种政治环境下作出政治决断的能力。关于年度审议最惠国待遇和一般保障条款，我们从来认为是一种歧视性的条款，不符合世贸组织的原则。美方实际上接受了我们的说法，但一直未作出表示。这次作出了明确表示，是一种很大的进步。

关于纺织品配额问题，这次是美国主动作出的让步，当然是一个比较大的让步。但是也要看到，过去几年，由于美国歧视性的态度，使中国这样大的纺织品出口国，落在了墨西哥和加拿大之后，现在连世界第三的位置都保不住了。我们销毁了1000万纱锭，120万人失业，给我们造成了很大困难，现在国有企业中最困难的就是纺织企业。美国

采取放弃配额的让步，能否使中国扩大对美出口，不一定！因为你们还有其他手段限制中国的出口。我们并未对此寄予更多的希望，因为现在纱锭砸掉了，工厂关闭了，也设法安置了120万下岗工人，但政府为此花费了巨大财力。当然，这一点并不影响我们对克林顿总统为此所表现的政治意愿和政治水平的看法，但实际上对我们没有什么经济意义。

为了回应美国的让步，中国是不是没有让步呢？请不要忘记，在这之前，甚至在4月之前，中国为加入世贸组织作了很大的让步。我相信你们应该记得。

我记得很清楚，4月7日到达华盛顿时，当晚克林顿总统与我谈到夜里12点，斯珀林先生也在。克林顿总统的判断是，双方不能达成协议，即使达成了，美国国会也不会批准。实际上，对中国在农业方面的让步，各界人士都是支持的。由于这一支持，克林顿总统改变了判断，并不是所有国会议员都不同意，尤其是来自农业发达州的议员。在当时，国会确实表现了实质性的让步。我也记得很清楚，加州的范因斯坦参议员每年都来中国，每次都谈水果出口，都不满意。4月以来，她对中方在农业方面的让步十分满意，表示支持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这是她亲口跟江主席讲的。

所以你们这次来，说美国作了前所未有的让步，而中国没有作出相应反应，你们就大发脾气。我提醒一点，你们不知道我们在农业上作了多大让步。我为此而受到全国人民的指责，你们知道不知道？

我现在可以重申，我们4月在农业上的让步，我基本上不会后退，但如果这次不达成协议，那我们永远永远不会在农业方面让步！

关于“两个51%”的问题，就是增值电信和人寿保险的外资股比，我们坚持不能达到51%的问题。早在3月30日，我就在这里跟你讲：“你要求51%，如果你在其他方面都同意我们的条件并达成协议，我可以同意51%。”我确实这样说过，前提是其他问题你都同意我们的条件。我当时问巴尔舍夫斯基大使，你敢不敢现在就签字？你当时说：“我没有得到授权，不能签字。”我后来到华盛顿，克林顿总统说不能达成协议，因此“两个51%”就没有任何法律意义了。

我现在还认为，“两个51%”的问题不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我一再讲，我与萨默斯①先生也讲了，为了一两个百分点不达成协议，是非常愚蠢的。我们现在批准的保险业外资比例，有49%的，有50%的，也有51%的，你可以了解一下，有什么区别？没有区别！即使49%，也可以由外方管理。所以，一两个百分点没有实际意义。但为什么我们要坚持？不是出尔反尔，是环境已经变化了。这首先是因为，你们不应该轰炸我们驻南斯拉夫的大使馆。从那以后，整个大环境都变化了，你们有国会、有舆论，我们也有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也有舆论。即使报纸上反映不出来，还会在互联网上反映，影响大得不得了。中国人从来就认为，一个信息产业，一个保险行业，是利益攸关的行业。他们认为我同意了51%，就是出卖了中国的利益，尽管我不那么认为。所以从那以后，国内外就有一种谣言，说“朱镕基要辞职，要下台了”。这是彻头彻尾的谣言，根本没这回事。但事实上，我是受到普遍批评的。这种批评来自于民间，他们不了解实际的情况。你们也不了解这种舆论。如果我不是在中国，而是在你们美国，那我早就下台了。我现在坚持这“两个51%”，就是向全国人民有所交代。所以，我很高兴你们不再强调51%了，虽然没什么实际意义，但你们帮了我们的忙。你们可以对保险业人士说50%或51%没什么大区别，在美国保险界，我认识的朋友比你们多，大的保险公司我没有一个不认识的，他们都找过我。他们会理解的。

---

① 萨默斯，即劳伦斯·萨默斯，当时任美国财政部部长。

我想江泽民主席等中国领导人，都是一贯积极地支持与美国达成世贸组织协议的，并未改变这一初衷。只要中美达成协议，我们就可以与其他国家解决遗留问题，我们与澳大利亚、日本等国已结束了双边谈判。这次江主席访问的所有国家，包括英国和法国，没有一个不赞成我们早日加入世贸组织的。所以请你们相信，今天我们非常希望与你们达成协议。

我得到江泽民主席的全部授权，但我也回忆起4月见到克林顿先生的情景，他当时很诚恳地讲，今天不能达成协议。我今天同样诚恳地讲，希望达成协议，也请你们考虑中方的情况。

那天晚上克林顿先生所表现的诚恳，我永远不会忘记，不管他是不是总统。

我认为，世界上所有国家都在看着我们能否达成协议。为了表示诚意，经过深思熟虑，我把主要的方面向你讲一讲，但不希望总有一种提法，即以4月10日的文件为基础。大家都知道，4月10日的文件，龙永图先生虽然签了个字，但并不是草签，如果要把这份文件当成法律文件，是没有道理的。因此，我们可以提4月10日的文件，因为其中一些是我们可以同意的，但只能参照，不能作为基础，这不是法律的文件。

我现在不按4月10日的文件讲，而按有分歧的地方讲，我们彼此清楚分歧是什么：

一、汽车。你们这次说这是克林顿总统的政治基础。斯珀林先生，我尊重你的意见，我让步，因为我尊重克林顿总统，即到2006年7月1日把进口关税降到25%，同意汽车信贷和汽车分销。这对我们来讲是重大让步，因为很多汽车厂商都向江主席投诉，不让我们同意这一条。具体问题上，2006年25%的税率怎么降法，这里你们使了一点花招，是不是卡西迪①先生出的主意？要求前两年几乎全部降完，我看六年平均减让比较能服人吧？我也不是坚持，小事情何必那么坚持呢！

---

① 卡西迪，即罗伯特·卡西迪，当时任美国助理贸易代表。

二、特殊保障条款①保留年限问题。斯珀林先生，你发了那么大脾气，必须得到“回报”，我也准备让步，但15年是不是一点都不能少？我们回应3年是太少了。是不是还可以商量？是不是一年也不能少了？10年行不行？我看很够了，那时中国如果还不是市场经济，那我也很悲观了。正如你说的15年不是一锤定音，我说10年也不是一锤定音，可以商量。反倾销条款也应该有一个时限吧，你们商量商量，说老实话，我不是反对“反倾销”，但不要有歧视性条款。

---

① 特殊保障条款，指《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议定书》第16条“特定产品过渡性保障机制”。该条规定：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之日起12年

内，如果原产于中国的产品在进口到世贸组织成员领土时，对该地生产者造成或威胁造成市场扰乱，受此影响的世贸组织成员可请求与中国磋商。如60天内未达成协议，则受影响的世贸组织成员有权撤销减让或限制进口。

三、音像。我看了4月10日的文件，就把4月10日的文字写在协议中不就可以了吗？4月10日的文件讲得很清楚，音像分销是可以的，这次你们又要求的合资控股就不要加上了，按4月10日的办，不就可以了吗？我想我们中美关系中那么多重要问题，为了一个电影院、一个音像公司达不成协议，值得吗？是否就按4月10日的文件办，这个问题原则上就解决了吧。

分账电影，第一年进口17部，4月10日的文件中没有，也是你们这次新提出来的。我还是搞不清楚，是配额吗？我们现在没有配额，我们不限制，但我想任何一个国家都规定进口电影不能超过国产电影的比例，亚洲许多国家，像新加坡就有严格的规定。我们没有这种配额，但要按比例。每年可以进口那么多，但每年实际进口多少要取决于电影拍得如何、电影公司是否会买，在中美协议中规定那么详细是否有意义？

四、银行。4月10日文件，把外国银行的国民待遇包括在内了，讲得很清楚，除了地域限制和客户限制，对外国客户不作任何限制。同时我们也承诺，外国银行在两年内可向企业提供人民币业务，五年内向个人提供人民币业务。我想银行没有什么问题了，我们的出价够了！

五、证券。很明确，允许外资证券公司与中国公司做的是一样的，这就是国民待遇。但你们这次附加了中国公司都不能做的业务，那就不行了。

所有这些问题，是有分歧的最大问题，我基本上或原则上作了让步，我也只能作这些让步了。只有一个问题，今后也不会让步，那就是电信的国际出入关口的问题，一定请你们谅解。包括所有人士，甚至军方人士都不会同意。

就这么多了，感谢你们的耐心。

巴尔舍夫斯基： 我想问你谈判如何进行下去？我可以提出初步的看法，或是在内部协商后，提出全面的看法。不知时间如何安排，是否今天就想结束谈判？

朱镕基： 建议你不要马上答复我，好好研究，再来回应我，然后与石部长①会谈，石部长是江主席和我授权与你们谈判的。我今天讲的是我们方面的意见，应该说是最终的，但不要误会，并不是说不能再谈判，不过原则上不能让，但我不搞一言堂。

---

① 石部长，即石广生，当时任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部长。

还要补充一点，我向萨默斯先生提出了三个要求：一个是永久最惠国待遇，一个是一般保障条款，还有技术出口的问题。关于技术出口这个问题，谈判的弹性是很大的，但如果你们没有表示的话，我们也无法向全国人民交代。建议考虑一下，是否以石部长与戴利部长①换文的形式，作出一定表示，是否可以这样做？

---

① 戴利部长，即威廉·戴利，当时任美国商务部部长。

巴尔舍夫斯基： 可否澄清几个问题？

朱镕基： 我不是不礼貌，不是不让你回应，我认为你们应该商量以后再回应比较好，因为你现在提出问题，我也很难回应，也要问江主席。还不如你与石部长谈，石部长向我报告，我向江主席报告。

巴尔舍夫斯基： 可否提最后一个问题？如果我们认为陷入了僵局，是否可与你再见面，最后达成协议？

朱镕基： 当然可以。

巴尔舍夫斯基： 可否澄清一下银行的国民待遇问题？

朱镕基： 我认为我讲得相当明确，我们同意两年内允许外国银行向企业提供人民币业务、五年内允许向个人提供人民币业务，很明确了。同时，我们同意按4月10日文件讲的，除地域和客户限制以外，外国银行进入中国市场没有任何其他限制。

巴尔舍夫斯基： 好。我能不能问一个问题？你把关键性的问题分离出来了，我们昨天提交的文件是同意以4月10日的案文为基础的。这一理解很重要，如果问题不断出现，时间会很长，永远得不到解决。主要问题是重要的，可否将其他问题确定后放在一边，而解决大的问题，就可以达成协议了？

朱镕基： 我刚才已经谈过，现在再重复一下。我们不同意以4月10日文件为基础。我已经把我们有不同意见的主要部分和中方的立场阐明了，对于其他还有不同意见的地方，请大使与石部长商量，在双赢的基础上，这些问题也能解决达成协议。我是认为双方最主要的问题都已解决了，其他问题本着互谅互让的精神，都能够解决。我想知道，大使什么时候与石部长会面？

巴尔舍夫斯基： 今天下午两点之前，建议双方尽快抓紧建设性的工作。

二

(1999年11月15日)

朱镕基： 你们很辛苦，我也很辛苦，昨晚一夜没睡。你们的奥尔布赖特国务卿在凌晨3点半要跟我通电话。现在，我们正在开一个非常重要的会议，江主席正在讲话，而我和钱其琛副总理、吴仪国务委员来到了这里。这个会议是由我主持的，江主席正在讲话，可主持人走了。会议是全国各地区负责人的会议，当然不是讨论世贸组织，是比世贸组织重要得多的问题。而我为什么要来？因为我昨天答应了你，你昨天要求见我。我已经研究了前天我与你谈话以后你们谈判的情况，石广生部长向我作了汇报。我们召开过一次最高层的会议，江主席作了指示，我们同意对你们的要求作出答复，并且授权石部长在会谈中将这些答复告诉你们。但是昨天上午10点钟找不到你了，下午4点钟才见面，但与石部长谈了半小时又中断了，你说要接克林顿总统的电话，此后你们就失踪了。我非常担心，我怎么向克林顿总统交代呀？看过电影《人间蒸发令》吗？你们蒸发了。我们很着急啊，我就请外经贸部、请外交部与我的老朋友麦克海先生联系，但你(指麦克海)也找不到人了。

麦克海： 后来他们找到了我。

朱镕基： 但你告诉我们，巴尔舍夫斯基大使明天早上8点就要走了，忽然消失，第二天早上又不辞而别，这是很不礼貌的！公使先生，你是有外交工作经验的啊。江主席到昨天晚上12点以后还给我打电话，问人找到了没有。他是持乐观态度的，本来还打算达成协议后会见你们。你们却打电话说，巴尔舍夫斯基大使在今早7点准备来见石部长，8点45分就要离开，10点钟的飞机。说句不好听的话，很像是一个最后通牒。到现在我还是莫名其妙，好像这不是谈判，是在捉迷藏。所以，我今天必须来见你，因为这是必要的！不然，我怎么向江主席交代呀？也不说达得成，也不说达不成，忽然就消失了，这在政治上是严肃的吗？因此，我就想当面问问你们，你们究竟想怎么办？谢谢。

巴尔舍夫斯基： 我代表斯珀林、代表克林顿总统，向你们表示感谢。今天非常荣幸，看到这么多高明的中国领导人来接见我们，这是难能可贵的，真想照张照片放在相框里。

昨天是发生了误解。有两件不相干的事情同时发生了：第一件是石部长离开谈判桌处理与世贸组织有关的事，第二件是总统出访前要与我和斯珀林通电话。

朱镕基： 他(指石广生)离开谈判桌，是给我打电话，把谈判情况告诉了我，我告诉了石部长我的看法，花了一些时间。

巴尔舍夫斯基： 那时我们与总统通话时间很长。麦克海先生告诉外经贸部的官员，说我要回使馆等总统的电话。我回到饭店等了一个晚上。

朱镕基： 石部长也把电话打到饭店去了，可电话打不通。

巴尔舍夫斯基： 看起来我们认为你们要做的与你们真正做的脱了节，这不是有意的。这再一次说明，美国和中国并不总是一致的。

石广生： 我要澄清一下，当时我在谈判间等你谈判，我们的司长追了出去，那时候你们马上要走，你(指麦克海)说要去接总统的电话，一会儿就回来。

巴尔舍夫斯基： 我想发表一个最基本的看法，昨天发生的事与谈判策略无关。

朱镕基： 坦白地讲，我们方面的谈判者认为，这是最典型的美国式的边缘战术。

巴尔舍夫斯基： 我和斯珀林来此谈判，有达成协议的全部授权，但必须在一定的范围内达成协议。美国两个内阁成员为达成协议在一个外国待一周是很少见的，我们的机票改了四次，因为要全力以赴来达成这个协议。上次我见你时讲过，我们两人有共同的感觉，我对4月未达成双边协议，感到非常后悔，而且有些惊讶。自那时以来，我时刻想着这个问题，当然是我没有能说服总统向前进。他当时的所作所为是基于诚意的，他是100年以来美国最好的政治家。他当时觉得，除非有一个最强有力的协议，否则他不能向国会交代。他当时对协议成功的关切，使他处于政治压力之下，当时是无法达成协议的。我后来接受了他的判断，但那是极为不情愿的。所以在过去的五个月里，我个人花了相当多的时间，努力想如何能够达成协议。斯珀林在这些努力中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通过他和总统办公厅主任的努力，整个美国政府统一了口径， 从同一个出发点出发。如果这几天我们有不得体的地方，你们可能不理解，但那不是我们不礼貌，也不表示我们不认真，更不表示我们现在不想达成协议。我们在此已经一周，正如我们所表明的，我们希望达成一个历史性的协议。

斯珀林： 参加此次会见非常荣幸。克林顿总统派我来此，是为了不重蹈覆辙，不像在4月那样有任何误解。尽管如此，昨晚还是发生了误解。你可能不太了解我，我个人向你保证，我们是在真心真意地等待你们的电话。在那种情况下，使用任何谈判的战术都不是明智之举。你可能不相信，那么晚了，我11点半还在寒冷的夜里在外面散步，给在“空军一号”上的伯杰①和奥尔布赖特打电话。我非常的不高兴，我们没有得到你们的通知，不明白为什么，所以，我给奥尔布赖特打了两个电话。

---

① 伯杰，即桑迪·伯杰，当时任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

朱镕基： 那我就要抱怨你了，让奥尔布赖特给我打电话，半夜叫我起来，睡不着觉。

斯珀林： 这全怪我，我得向你道歉。

朱镕基： 既然是个误会，那我们就向前看吧。

斯珀林： 我最后想说，在谈判的时候我有些立场没有亮明，我现在一定要说一说这些立场，因为外部的政治压力要求我必须这样做。有了协议，我们会替你们争取正常贸易关系，不久你就会在报纸上读到，有人希望这种努力失败。但是你知道，我们是非常有诚意的，而且将竭尽全力解决任何遗留问题，因为我们不想失败。我们不会夸大政治压力，以此作为最后的谈判战术。我们会真实地告诉你们，总统面临的政治上的限制有哪些。达成协议是一个正确的办法，是符合两国长远利益的。

朱镕基： 下一步怎么办?

巴尔舍夫斯基： 我们昨天提出了有六个未决问题的单子，每一个问题在政治上都非常敏感，还有减让表的问题，其中农产品减让表已经全部解决。我们都强烈认为，总统也坚决认为，这次达成的是一个最终的双边协议，虽然还要经过在日内瓦的世贸组织秘书处核对。我们所列出的是实质性的未决问题，是在美国作出极大让步以后，我们最大限度缩短的一个清单，都是政治上敏感的问题。这不是假造的，也不是谈判战术的产物，我们认为解决这些问题将有助于总统在一般性保障条款、纺织品配额和对中方的三个额外要求作出让步后，达成协议。美国的让步已经反映在总统自己的建议中，并且还表明美国仍有灵活性，在一些方面，我们直接接受了中国的立场。在中国的一周时间内，我们提出了三份文件，要么进一步接受了中方的立场，要么在谈判那些未决的问题中表示了有灵活性的意愿。现在我们就剩几个问题了，但是我们不能低估它们对中国的困难程度，我们也真诚希望中国不要低估这些问题对美国的困难程度。对于减让表的问题，中方提出的实质性反对意见越多，美国越不可能与中国达成协议。我们绝对不是向中国提出最后通牒。发出最后通牒绝对不会取得进展，反之亦然。这并不意味着在每一个方面都绝对没有灵活性了，只是敦促中方认真研究这些问题和议定书的立场，以便能让我们达成一个最后的双赢的协议，在这里签署。

朱镕基： 在前天的会见中，我对我们之间有重大分歧的问题作了明确的表态，只能到这个程度了，我们能作的让步就那么多了。在我看来，除了那些问题，其他的都没那么重要，至少不应该影响协议的签

署。你们根据我的讲话又提出了要求，昨天中国的最高层领导人召开会议，作出了让步，现在不可能再作让步了。我看不出来你们有什么困难，我充分理解美国工商界和国会议员的要求，我每天都关注着他们的反应。如果今天因为这些小问题达不成协议，就是放弃了一个历史性的机会，今后不可能再有了。

音像方面，昨天我委托石部长告诉你们，首先在分账电影数目上，我们同意你们要求的每年进口20部。关于音像制品的分销，我们尊重4月10日的案文，“出版、制作、发行”是你们后来加进去的，我们只能接受4月10日的案文。我认为这对你们来说没什么困难，希望你们不要从4月10日的案文后退，我们也不后退。实际上，我们根本没有从4月10日我们承诺的立场上有什么后退，而且还前进了。分销问题就留待以后再解决好吗?

电影院你们要控股，我们同意成立合资企业已经很不容易了，谁都知道意识形态有多么敏感，控股就留着以后再说吧！这次就不包括在最后的协议里了。当然建立合资企业，也没有完全打消控股甚至独资的希望，我们没有把门关上。

关于“两个51%”的问题，我们昨天又作了让步，增值电信可以到50%，可你们又要求“管理控制权”，还要写成文字。我早就说过，49%、50%、51%在管理权上没有区别，但写在条文中是不可能的。要这么写就太荒唐了，这不符合国际惯例，不符合中国的法律，也没有实际意义。现在的合资企业在实践中可以有管理控制权，但写在条文里就是个大笑话了！

除了这些问题就没有别的问题了，不会影响公众的看法和利益，不存在什么主要的问题了。至于那些次要问题，双方代表团可以根据江泽民主席和克林顿总统通话的精神，本着互谅互让的原则，达成双赢的协议。让那些不重要的问题，成为我们达成协议的障碍是非常不明智的。巴尔舍夫斯基是我的老朋友。斯拍林先生我上次见面了解不多，这次了解更多了，印象也更深了。我现在没有时间跟你们谈判了，我必须在会议结束前赶回去继续主持会议。现在是不是可以达成协议了？双方发表新闻公报。如果能接受我们的条件，就可以达成历史性的协议，实现双赢，其他问题本着互谅互让的原则解决。能不能

签字，希望明确表态，这不是最后通牒。我与斯珀林先生相比，平常脾气要大得多，但我没有对你们发火，可江主席也没有这个耐心了。

石广生： 我昨天晚上离开就是为了搞新闻公报。

巴尔舍夫斯基： 我不想再占用你的时间，但在回答你的问题前，我可否提几个问题做些澄清？希望你理解，先把丑话讲在前面。你记得关于分销的4月10日的文字我们是有保留的，是写在方括号里的，因为我们知道产业界是不会满意的。当时，我们要求允许百分之百的独资子公司从事音像和分销。今天在谈判中我们已经表明，我们不要求独资子公司，只要求51%的股权。

朱镕基： 我讲得很清楚了，合资企业股比50%，不排除控股的可能性，但不能写成文字。

巴尔舍夫斯基： 我不想就你刚刚澄清的这个实质性问题争论，但我们是有诚意的，没有提出新的要求。石部长已经同意讨论解决办法，如何用文字表述，现在还没有研究出来。关于寿险，我们想商量写一段文字，反映我们对持股50%的合资企业具有管理控制权的可能性。

朱镕基： 无论如何不能写成文字，写上那就成了一个笑话，但实际上可以有这种做法。

巴尔舍夫斯基： 寿险也不谈管理控制权？

朱镕基： 一定不能写进去，要写进去，我无法向中国人民交代。具体的东西是不是就不要写了，让中国自己来定。

巴尔舍夫斯基： 关于保险、电信取消地域限制的问题，石部长和我同意加快取消地域限制，这在我们放弃了管理控制权以后尤为重要。

朱镕基： 可以，但不要写明，具体地点由中国政府决定。何必写得那么具体呢？

巴尔舍夫斯基： 这样的话，就没有保证得到政治支持所需要的平衡。

朱镕基： 我是搞技术出身的，现在就是跟你谈政治。我搞技术的知道，不管把技术谈得多么具体，都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

巴尔舍夫斯基： 我不得不说，这是从4月10日单子的又一个后退，我不能同意这个。

朱镕基： 如核实是我们承诺过的，我们不会收回。增值电信和寻呼的股比是50%，不能写上管理控制权。

巴尔舍夫斯基： 另外还有两个问题，一个是音像，一个是非市场经济反倾销条款的取消时间。石部长表示，还可以谈海关估价。

朱镕基： 在音像的分销上明确表示没有包括“出版、制作、发行”，音像的合资企业没有控股权。

巴尔舍夫斯基： 这太困难了，也许政治上同样困难的是非市场经济反倾销条款的取消，石部长提出12年。我与克林顿总统进行了长时间的讨论，因为美国的法律没有规定明确的取消时间，斯珀林和我都认为音像谈得不好，你们只提出了估价问题，但是分销中的出版你们坚持用4月10日的案文。我们告诉总统，你们提出12年取消反倾销条款，他建议15年，如果能接受，我们在音像上就采取4月10日的文字。为了能把这个协议推销出去，他将单独会见音像产业的代表和国会的议员，因为20年是他与国会进行谈判的结果。

朱镕基： 那么，是不是音像的分销你同意按4月10日的案文，电影院的股比取消51%的要求，取消反倾销条款我同意15年，就可以签协议了？

巴尔舍夫斯基： 条件是减让表不后退，也不增加新东西。

朱镕基： 我们现在没有后退。

巴尔舍夫斯基： 我赞赏这种诚实的交换意见。那取消反倾销条款是不是就是15年？

朱镕基： 是的。

巴尔舍夫斯基： 那就能达成协议！

朱镕基： 我也必须讲，中方同意的不会再撤回。补充一句，关于取消化肥专营权的问题，你们4月10日的单子里没有，这次是不是不坚持了？

巴尔舍夫斯基： 这是个大问题！我理解不是额外的要求。

朱镕基： 你们4月10日的单子里没有嘛！

巴尔舍夫斯基： 这会失去美国整个化工行业的支持。虽然不了解细节，但是我知道我们将失去整个化工业，我不能这样做！我不能这样做！

朱镕基： 是不是为了这一条，就不能签协议了？

巴尔舍夫斯基： 这可是个大问题！化学工业是我们的第三大产业，数量级很大，这将影响到整个化工行业。如果规定具体的取消时间，哪怕多几年也好。这是一个很大很大的问题。

朱镕基： 取消不取消专营要看以后，专营是现行体制的结果，在现行体制改变之前，我们就要保留。这与中国以后成为市场经济国家是一样的。粮食专营，但也同样从美国进口粮食，而且得到了美国农业界的支持。难道化肥的重要性比粮食还大？

巴尔舍夫斯基： 这是个非常大的产业，与粮食的政治影响力一样大，情况就是如此。

朱镕基： 反倾销条款也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问题，我这样尊重克林顿总统，难道你就不能尊重我一下？

巴尔舍夫斯基： 我们已经把音像给了你们！

朱镕基： 我们已经把农业给了你们！

巴尔舍夫斯基： 我坐在这里，真是不知所措。我们的人要讨论一下，否则无法作出这个承诺。

朱镕基： 请你们考虑，专营不止是一个化肥，还有其他七种，化肥并不比其他七种更重要。大家都应向前看，中国不可能承诺取消专营。

巴尔舍夫斯基： 这是一个巨大的政治问题(美方译员误译成“节外生枝”)，而且我一点准备没有。

朱镕基： 4月份的单子里没有这个要求，你这次才提出来的。我没有节外生枝，是你们节外生枝。

龙永图： 今早5点半才提出来的。

朱镕基： 补充一条，克林顿总统给江主席的信中说，要给予中国永久最惠国待遇、收回一般保障条款和纺织品配额的要价，我们希望以某种形式的书面确认。

巴尔舍夫斯基： 这个问题要请示总统。减让表能够反映出来双方的这个协议，没有十年的纺织品配额，但总统不可能宣布取消十年配额这件事，这在政治上是不可能的，虽然在法律上情况的确如此。我们可以在声明中称放弃十年配额，但要求适用于双边的纺织品协议。

朱镕基： 我们不坚持写在协议文本中，不要求克林顿总统公开宣布，但这三条光凭嘴讲不行。我们可以换文，但不对外公布。

斯珀林： 我愿意尽可能地找到一种方式，既可以帮助你们，也可以不使总统面临政治上的窘境。能不能趁我们还在北京期间，对中国的新闻界表示一下？

朱镕基： 可以不一定对新闻界说，但必须有文字。

巴尔舍夫斯基： 总统现正在欧洲，我们现在必须回去请示他。他在给江主席的信以及建议中已经说了这三条。

朱镕基： 我不是不相信你们说的，但还是要找一个方法把它落实到文字上。

巴尔舍夫斯基： 能不能搞一个不对外公开的书面记录？

朱镕基： 可以，足够了。

巴尔舍夫斯基： 化肥的问题我一点儿也没想到。

钱其琛： 中国的专营商品有八种，但进口都不会受影响。在这个规定被取消之前，我们只能对八种商品保留国营贸易。在这个前提下，中美仍然可以进行化肥的贸易，美国的大公司也可以设立生产的合资企业，但在我们的法律改变之前，不能改变国营贸易的做法。

巴尔舍夫斯基： 我提出以下建议，我们回到使馆，给总统打电话。这两个都是能破坏这一协议的问题。我实在弄不清时间了，现在希腊应该是几点？

钱其琛： 时差是六个小时。

朱镕基： 同意你的意见。我补充一点，三个让步写成文字的问题，不是一个大问题，这已经在日内瓦的议定书里写进去了，你们也参与了。现在以什么形式表达一下，由你们决定，我们并不坚持。

巴尔舍夫斯基： 我表示感谢。建议与总统通电话，仅仅请示这两个问题。请示之后是直接跟你讲，还是跟石部长讲?

朱镕基： 第一个问题很简单，关于化肥的讨论，已经写到议定书里，你们也同意，你们跟克林顿总统说一下，这个问题就结束了。至于这三个让步如何反映，我们完全尊重克林顿总统的意见。如果这两个问题能够解决，我们什么时候能够签字?

巴尔舍夫斯基： 尽快签署。今天必须在下午6点钟之前离开北京，我们需要赶回去准备西雅图会议，现在只有十天了。斯珀林和我一直留在这里，就是因为要核对，我们现在不可能这样做了，这只能使美国看上去很软弱。我们需要一个根本的谅解，不能从4月10日的案文后退。龙先生已经进行了核对，暗示有一些改变，我们不能根据这样的参数达成协议。

朱镕基： 那就是以4月10日的文件为基础吗?

巴尔舍夫斯基： 对。只要中方不再要求重大的实质性的变更，我们就签。

朱镕基： 4月10日的文本我们从来没有承诺过，现在我们双方又作了新的让步，怎么能说以4月10日的文本为基础?只要你认账、我们认账，问题就解决了。

巴尔舍夫斯基： 这个协议包括你和我谈的这些内容，还有减让表和议定书，除此之外没有其他的记录。

朱镕基： 我再一次重申，中国代表团作出的承诺一概不后退。

巴尔舍夫斯基： 我赞赏你的建议。我希望我们在此进行的不是理论性的辩论。

朱镕基： 世界上哪一个总理能跟你讲得这样具体?

巴尔舍夫斯基： 唯一的人是美国总统。他也了解很多细节。

朱镕基： 他很聪明，但他与我辩论中国加入世贸组织问题，他不一定能赢。我刚才问你们几点签字合适，不是非签不可，而是我想在你们离开中国前，请江主席会见你们。你要告诉我个时间。

巴尔舍夫斯基： 感谢你的礼遇。签字不要晚于下午1点半。有一班6点的飞机，如果有警车开道，我们最晚要在4点45分离开。

朱镕基： 警车没问题，我就可以下命令。那就下午4点见江主席，在中南海。

巴尔舍夫斯基： 感谢你、钱副总理、吴仪女士和石部长。

斯珀林： 我们很幸运，能够在一周之内见到两个最强硬的谈判对手交锋。没有多少人能够近距离地看到这些。

朱镕基： 她(指巴尔舍夫斯基)很能干，但是她和我谈了这么长时间都没达成协议，你一来我们就达成了。

斯珀林： 我是“和平缔造者”，我一定告诉克林顿总统你对我们有多友好，以及你本人的领导才能。

朱镕基： 我还要告诉你，你惹的麻烦，把我半夜叫起来，昏昏沉沉，没法接奥尔布赖特的电话。你要打个电话告诉她，说我很抱歉。

巴尔舍夫斯基： 这是斯珀林的问题。

朱镕基： 他不是“和平缔造者”，你是“麻烦的制造者”。

斯珀林： 我会给奥尔布赖特打电话。本来要让萨默斯明天凌晨3点给你打电话，现在可以告诉他不用了。

在一九九九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1999年11月15日)

1999年1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北京召开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党政主要负责同志，中共中央有关部门、国务院各部委和有关单位的主要负责同志，解放军四总部和武警总部负责同志。这是朱镕基同志在会上的讲话。

江泽民同志上午的重要讲话，对当前国际国内形势作了深刻的分析，全面总结了今年的工作，系统阐述了明年经济工作的指导思想、主要任务和要求，我们要认真地学习和贯彻。现在，我就上午江总书记的报告作一点补充。我有一个稿子，这个稿子经过国务院所有的领导成员审阅和修改，同时也经过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审查和修改，江泽民同志亲自看过而且批了很多很重要的意见，会后印发给大家。我在这里就不念这个稿子了，就几个问题作一些补充和说明。

第一个问题，对今年经济形势的基本估计和明年宏观调控的预期目标。

今年是亚洲金融危机的第二年。去年好容易度过了，基本上没有伤筋动骨。今年，暴露出来的问题更多、更明显了，当然这是在去年基础上发生的。目前我们取得这样的成绩，确实很不容易。今年经济增速估计超过7%，主要不在于速度，而在于效益确实提高了。国有企业可以说已经度过了最困难的时刻，一些行业已经全行业扭亏为盈；财政收入有很大的增长；外贸出口去年是零增长，今年上半年是负增长，但从7月份以后，就扭转过来了，出口变成正增长，现在1到10月份全国的出口比去年同期增长4.4%；物价还在继续下降，但是降幅有所减小；外汇储备在这么困难的情况下，依然是上升，现在是1528亿美元。1998年我们采取了宏观调控措施，增发了1000亿元的国债，对拉动国民经济增长起了决定性作用。在1999年计划里面，也安排了500亿元的国债，但是到今年4月份，我们看到国债投资的拉动作用已经快

要结束了，固定资产投资的增幅不断降低，到第三季度已经是零增长了，9月份单月是负增长，比去年9月份下降2.8%。中央在4月份及时发现了这个问题，同时倾听了各方面的意见，决定今年再增发600亿元国债。这600亿元投下去，包括银行配套贷款，实际上相当于2000亿元，到今年第四季度的末期一定会推动国民经济增长，在明年会进一步发挥作用。吸取这个教训，我们决定明年继续发行1000亿元国债，而且及早地动手安排。通过这个措施，明年经济增长7%的宏观调控目标完全可以实现。但是我并不认为这个7%是主要的，效益和质量才是主要的，结构调整才是主要的。当然，不要速度也不行，没有速度就意味着生产水平要下降，下岗职工要增加，社会稳定也可能发生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是，必须是有效益的速度才能够达到解决问题的目的；没有效益的速度，仓库里积压的产品越来越多，重复建设越来越严重，刚才讲的这一切问题都解决不了，而且麻烦会更多。所以，加工工业的重复建设不能再搞了，再搞还会有更多的人没有饭吃。我们去年这1000亿元完全是投入基础设施建设，同时，我们今年总结了去年宏观调控的经验，吸取了世界上其他国家对付通货紧缩的经验，不单是从基础设施建设、从生产方面来拉动需求，而且注意了从消费方面来拉动需求。为此国家花了540亿元，用来增加工资、还欠账，特别是增加低收入阶层的收入，有8400万人受益啊，其中绝大多数是低收入阶层的群众。我想这个措施是非常得人心的，同时又极大地推动了市场需求的扩大。我们还了低收入群众离退休费的欠账，提高了基本生活费标准，他们都得到了好处。这一方面提高了他们的生活水平，另一方面，促进了消费，拉动了生产。但有一点要搞清楚，我们不能靠发国债、发钞票来增加消费，那是不行的。我们发国债不管是去年1000亿元也好，今年计划500亿元，后来又增加600亿元也好，全是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包括今年有一部分用在科技、教育上，这也都是基础设施，没有用于发工资。540亿元增加工资的钱完全是靠增收节支来的，请同志们放心。



1999年11月15日，朱镕基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讲话。

有些同志担心，去年发1000亿元国债，今年发500亿元不够，又增发了600亿元，明年预计还要发1000亿元，这样年年发国债，增加赤字，有没有危险啊？没有什么危险，同志们。首先，我们国家发国债，绝对数是很少的，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是没有超过国际警戒线的。其次，目前我们还处在经济结构的调整期，老百姓看到社会的种

种问题，对改革的预期也有不正确的理解，认为每一种改革都在使他们增加支出，所以不敢大胆地消费，把钱都存在银行里了。另一方面，银行要付给他们利息，那银行利息从哪里来？它必须用贷款获得的利息来弥补，但它又贷不出去，没有什么好项目可以贷。因此，存贷差不断地扩大，银行大量地亏损，这种亏损也还是挂在财政的账上，是国家的亏损。这就是说，银行里的钱你是不用白不用。现在国家通过发国债的形式，把这个钱用在发展国民经济上面，一点没有增加日常消费支出，相反，进行基础设施建设拉动了国民经济，增加了国家税收。国家增加了财政收入，就有能力还国债。这没有通货膨胀的危险啊！目前是中国历史上最好的、物资丰富的时期，不但生产能力富余，而且库存充足，大搞基础设施建设，没有物资匮乏的危险，不会发生通货膨胀。有的同志又问了，这么年年靠发国债，还不如拉动其他的投资呢？同志们，不是永远的要靠发国债，这几年是不靠不行啊。为什么呢？同志们查查每年固定资产投资规模的构成就知道了。去年是2.8万亿元，第一是国家拨款，发国债就是国家拨款的性质；第二是银行贷款；第三是企业的自有资金，主要就是这三个部分。现在的问题就在于第三部分，目前国有企业大部分是亏损，工资都发不出去，它哪有什么自有资金投资啊。怎么才能拉动国有企业投资呢？要在国有企业改革见效以后。所以，国有企业改革和脱困的目标没有实现以前，你不用国家拨款和银行贷款来弥补的话，那么固定资产投资就要大幅度下降，并且会导致生产速度下降。生产速度下降，下岗工人增加，社会就会不稳定。银行贷款要增加是很容易的，无非就是多发票子，但后果严重得不得了。同志们，所有的部长都知道在银行贷款问题上，我是抠得最紧的，因为我知道这里面风险最大。银行贷款一撒开后果不得了，你别看现在是通货紧缩，要变通货膨胀也容易啊。因此，只有通过发国债来增加投资。当然，发国债说到底也是利用银行贷款，也是利用银行里闲置的存款，但我认为这样做没有什么风险。

随着国有企业状况好转，它的自有资金投资就会增加，国债就可以少发。但是现在看起来，国有企业脱困还需要一段时间的努力。所以，发国债的政策我看还要继续。

外资的投入是个很大的问题。邓小平同志改革开放的政策大家看得很清楚，特别是沿海地区这么富裕，应该感谢邓小平同志改革开放的政策。外国的直接投资去年是458亿美元，很不容易啊！458亿美元乘上8.2，就是3700多亿元人民币，投到了中国。相当于我刚才讲的要发国债1000亿元，加上银行贷款2000亿元，共3000亿元，差不多啊。但是去年外资投入已经开始有减少的趋势，今年可能只有350亿美元，这和整个国际经济形势有关，但也有些政治的因素。减少了100多亿美元，差不多相当于减少了1000亿元人民币啊，正好把增加的1000亿元国债给抵消了，这也是今年4月份以后生产往下降的一个原因。所以，我们现在不能不有所防备啊！

我觉得今年这一年很不平凡，这证明了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掌握经济的宏观调控方面可以说是成熟的。比方说，去年发生那么大的水灾，如果没有向银行发国债搞基础设施建设，拉动国民经济，真不知道会是什么样子。今年我们在去年的基础上，又增加了宏观调控的内容，不但从生产上拉动，也从消费上拉动，不但搞基础设施建设，而且搞技术改造。宏观调控的内容大大丰富了。因此，我相信在总结了这两年的经验以后，我们在明年一定会搞得更好。大家要有信心，坚信中央的政策是正确的。

第二个问题，坚持实行扩大内需、促进发展的宏观经济政策。

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一定要选准项目，用好资金。这不仅对增加国民经济发展的后劲有重要意义，而且对避免扩大财政赤字和国债规模带来的风险也具有重大意义。如果项目没有选好，重复建设或者建设质量不高，管理不善，就会带来新的矛盾和负担，将来也会影响财政偿还债务的能力。回顾这两三年搞的基础设施建设，是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成绩是巨大的。花了2100亿元，还没有完全花完，完全可以报得出账来的，这个账都是为了子孙后代的，它的社会效益是很大的。

货币政策我们没有讲“积极的货币政策”，我们从来也不提“积极的货币政策”，积极的货币政策就意味着大发票子，实际上就是停止我们的金融改革，那不得了！我们只讲进一步发挥货币政策的作用，这包括一些什么内容？第一，国有商业银行应该配合国家的积极财政政策，配合国家安排的这些国债项目进行贷款。刚才讲1000亿元国债资金可

以带动2000多亿元银行贷款，没什么犹豫的。这些项目都是经过严格的审查，都通过国际工程咨询公司各级咨询机构、国家计委把关，在这个基础上，国务院非常慎重地确定这些项目，银行就得配合贷款，没有多大的风险。第二，保证企业有效益的生产对流动资金贷款的需要。保证流动资金，这是银行的任务，一定要把这个工作做好。现在有些银行把流动资金的贷款权收得过紧，这个不好。不能收权收得过大，还是要发挥基层银行的作用，供应流动资金。当然，流动资金绝对不能挪用去搞基本建设，而且只能搞有效益的生产，不能增加积压。现在我们对某些亏损企业采取封闭贷款的办法，其目的也是要增加有效益的生产。但是，我要提醒银行的同志注意，这个问题还没有解决好。你们坐在北京的同志要下去调查调查，要把这个问题抓好，这是个很重要的任务。第三，特别要注意增加对中小企业的贷款。我一直强调每个银行都要设立中小企业贷款部，也确实设立了，但是没有搞好，强调要担保。只要生产的产品有销路，就有担保了。中小企业对安置人员就业还是有很大好处的。特别要扶持科技型的中小企业。我们对中小企业的理解要放宽。过去那种乡镇企业尽搞一些市场多余的产品、非常初级的产品，现在很多大型企业都已经在搞了，你能跟它竞争吗？很显然是没有出路啦。所以，要向科技型、向配套型、向有特色的方向发展。银行在这方面要大力支持，即使有一点风险，也应该去支持。第四，就是大力发展消费信贷。住房信贷一定要大力开展，我讲过多次这是一个新的经济增长点，真正的需求是要靠这个东西。要大力开展住房信贷，使房屋商品化。大件商品也都可以搞消费信贷。我想，商业银行把刚才讲的这几方面的工作做好，就是进一步地发挥了货币政策的作用。

还有一个大的方面，就是由人民银行出面，利用货币政策来消灭或者解除金融的隐患。什么叫隐患？就是过去乱设金融机构、乱集资、高利吸储，把这个钱都贪污了或者搞了重复建设，现在一个钱都收不回来，因此老百姓起来挤兑，要还钱，天天在那里闹。我们伤脑筋，每天不知道看多少简报，好消息不多，全是闹事啊。这个问题趁着我们现在宏观经济形势比较好的时候，赶快把它解决了，消灭这个闹事的根源、社会不稳定的根源。不要留到下一届政府啦。有这样几种情况：第一，农村合作基金会乱集资，基层干部、农民把钱存进去，到现在都花光了，现在他们都来挤兑啊！第二，信托投资公司，1993年

一年就批了好几百个，乱七八糟，一亏就几十亿元，现在还不关它怎么办啊？第三，城乡信用社，这个问题也是比较复杂的。有些是地方搞的，有的是中央银行直接管的，情况很复杂。也是高利吸储、乱贷款，最后一塌糊涂，现在不断地闹事。还有城市合作银行，这完全是地方办的，现在刚办了几年就出现大量的亏空。现在我们已经确定了一系列的政策，消除这些隐患。首先从农村合作基金会开始，由人民银行借钱给地方政府所保证的一个金融机构。它根据地方政府的指示，把这个农村合作基金会的账都给还了，保证支付。把农民的本钱还了，但利息不能够完全按照高利息支付，那是不可能的，高利息是违法的，只能保证它的合法权益。这个事情已经全面地铺开 了，从四川、重庆开始，然后一个一个省搞。这项工作进行得比较顺利。国际信托投资公司也是要关闭的，它欠老百姓的钱也是由中央银行把钱借给地方，然后由它再了结。这样也就保证了支付，防止了闹事。我估计为了解决金融的隐患，主要是地方商业银行、地方金融机构，要花几千亿元。我认为这几千亿元要花，不花的话老百姓一天到晚闹事，最后还把这个问题留给下一届政府，问题会越来越严重。花了这几千亿元，把这个问题解决了，不会发生通货膨胀，取得一个很好的教训，把那些乱七八糟的机构都关闭了，把人员都遣散了，消灭了很多隐患，那么金融改革才能够顺利地进行，这就叫积极发挥货币政策的作用。

第三个问题，大力推进国有企业的改革和发展。

对这个问题，我想讲一句，就是我们必须坚定实现国有企业三年改革和脱困目标的信心。我过去曾说，如果三年后大多数亏损的国有企业不能够摆脱困境、扭亏为盈的话，我就下台。谁知道这个话说得过火了，结果到处都说我要下台了。其实，我这样说是表示我的决心，我学项羽，叫破釜沉舟啊！我现在有把握地说，我不会下台，因为到明年年底，国有企业三年改革和脱困的目标可以实现。纺织工业给我们树立了一个榜样，纺织工业全行业亏损很明显是由于重复建设。我在1991年调到北京来当副总理，管工交，当时有3000万纱锭，我就提出压锭改造，压掉1000万锭。但可惜的是，他们都不听我的。最后1000万锭不但没有压掉，还增加了1000万锭，变成4000万锭了，那才有今天这个困难的局面。现在提压1000万锭，到今年年底能压减920万

锭，分流人员110万。通过压锭再加上改造，到今年年底就可以实现全行业转亏为盈，三年目标两年完成。纺织工业是最困难的吧，我相信只要我们下定决心，坚定信心，三年脱困目标是能够实现的。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措施就是债转股，对于有些企业，它们的资本金很少，大都靠银行贷款，负担很重，但是它的产品有销路，设备还不错，管理也不错，那我们现在吸取外国的经验，由银行成立资产管理公司，把这部分贷款变成股权，也就是企业可以不付利息了，变成银行的投资了，这样马上就可以扭亏为盈。这个工作经过两年的筹备，现在已经开始了。但这种做法绝对不能搞滥了，一哄而起那是不得了的，要发生道德危机。我上次在石家庄、邯郸开会，参加座谈会的十个企业都不亏损，但这十个企业都要求债转股。我说你们甭想了，你们都已经脱困了，都扭亏增盈了，还想债转股，这个怎么得了啊？如果全国的企业都可以把债权转成股权，都大赚其钱，赚了谁的钱？赚了银行的钱，赚了老百姓的钱，那我们中国政府就要垮台了。这绝对不行！我希望各省区市领导同志要向下面讲这个精神，我们要靠自力更生，要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这是最主要的。还要很好地选拔企业领导人员。把企业办好，还得靠自己，而不能依赖债转股。

另外，强调一下，结构调整是非常重要的。今天，我们已经面临一个经济结构大调整的时期、一个转型期、一个过渡期。如果我们不抓紧这个时期，大力地调整经济结构，中国没有希望。“发展是硬道理”也会变成一句空话。现在东西都多了，你还要拼命去发展，你怎么发展呢？必须调整结构。产品要调整，要搞市场需要的东西；质量要调整，那些低质量的、假冒伪劣的东西，不能让它们在社会上存在；技术含量要调整，尽搞那些粗放型的、劳动密集型的产品没有前途。一定要搞知识型的、技术型的产品。

第四个问题，加大农业结构调整的力度，努力增加农民的收入。

现在中国的农业特别是粮食生产，已经达到了一个阶段性的、相对过剩的阶段。这本来是件大好事，大家都吃饱了，多年以来想做到而没有做到的事情，现在做到了。但是粮食多了以后，粮食价格不断地下降，农民增产不增收，有的地方甚至减收，国家的负担越来越重，这就变成问题了。所以，现在必须调整结构。常规早籼稻不能再种了，没人要了，放在仓库里都陈化了。有些粮食品种不能再种了，再

种的品种一定要是优质的。原以为新疆是发展棉花最好的一个地方，它是少数民族地区，又没有别的产业，为了让新疆的农民富起来，让他们多种棉花。结果产量上去以后质量并不好，有相当一部分糖分很高，掺杂纤维的问题也没解决，现在卖不出去。无论如何，棉花不能再这么种下去了，要调整结构，扩大优质棉花的产量，大大地缩小不好的棉花、劣质棉花的种植面积，总体上是只能减少，不能再扩大了。糖也是多了啊，价钱越来越便宜，特别是甜菜糖，甘蔗糖都销不了，你还种甜菜呢，你这种了有什么用啊？所以，如果我们的农业不朝改良技术、改良品种、优质的方向发展，也是没有出路的。农业也进入到结构调整的关键时期了。

第五个问题，抓住时机，着手实施西部大开发的战略。

西部大开发，这是邓小平同志的一个重要战略思想。两个大局：第一个大局，沿海地区先富起来；第二个大局，再让西部地区富起来。现在这个贫富的悬殊越来越大，沿海跟内地的差距越来越大。西部大开发的时机已经成熟，条件已经具备了，一定要开始干了。所以，我们这两三年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是向西部地区倾斜的。今后每年发的1000亿元国债，让西部地区多搞基础设施建设。公路、铁路、农村电网的改造，城市的基础设施建设，特别是新疆的油气资源到了要开发的时候，但是要开发新疆的油气资源，不把它送出来是没有前途的。所以，我主张把新疆的油、气都送出来，收资源税，这个能源就是清洁的能源，老百姓受益，城市空气好了，那么西北地区不也富了吗？这一修管道，经济马上就繁荣起来了。基础设施建设向西部地区倾斜，国务院各有关部门要认真地贯彻落实。

我对退耕还林问题有点发言权，因为我最近跑了六个省区，来研究退耕还林、改善生态环境问题。切实地加强生态环境建设，到时候了。我到四川、甘肃这些地方去看了，那里过去因为没有饭吃，把山上的树砍了种地，一直种到山巅上。一下雨，水一冲全是黄土，所以长江、黄河的水灾是越来越严重。我也到了陕北，延安地区那些黄土高原，都没树。有一些梯田，根本承受不住冲刷啊，一下雨黄土跟着就下来了。这次我跑了西北几个省区，包括宁夏、青海、甘肃，他们的粮食不但是自给而且是有余。我们全国是个什么概念呢？最近几年，年粮食产量都保持在1万亿斤左右，据国家计委的估计，每年消费

不了这么多，年年有些富余，现在大量地补贴出口也出不去。所以，现在是调整结构的大好时机，西部少种，东部支援西部。1929年，美国当时也是粮食多了，它是烧掉了、倒掉了。我们不能干这个事。美国当时采取休耕制度，我认为可以借鉴，就是你不要种了，一亩地每年给你补贴多少钱。现在我们最好的办法就是退耕还林。只要我们以愚公移山的精神把这项事业搞下去，我相信有10年到20年，中国的森林覆盖率可以提高一倍，中国的生态环境会发生很大的变化。同时，我们东部的产品也有市场、有销路啦，然后就能够共同富裕啦。所以，我们希望有关省区市把这个事情好好抓一抓。



1999年10月22日，朱镕基在甘肃省定西县考察九华沟小流域治理工程。右三为甘肃省委书记孙英，左三为甘肃省省长宋照肃。

下面，有两个部分我不念稿子，也不再讲了，一个叫做积极扩大出口和利用外资，一个叫做加快实施科教兴国的战略。我不讲不是因为它们不重要，相反的，这两个问题非常重要。我们中央领导同志从总

书记开始到李岚清同志、温家宝同志都讲得很够了，我也讲不出新东西来。我只能说这两个部分是非常重要的。

我再强调一下搞好社会保障体系建设问题。这个问题太重要了，国有企业能不能改革得好，关键还在于社会保障体系能不能很好地建立起来。现在我们搞下岗职工再就业服务中心，保证下岗职工的基本生活费，是一个过渡的办法。在新的制度没有建立以前，“三三制”一定要搞好，财政要兜底，地方兜不了，中央要兜，这个代价不付出，会整天闹事，以后谁还敢改革呢？谁敢减人增效、下岗分流？但从长远来讲，要建立一个完全独立的社会保障体系。也不能够太长远，要马上动手。也就是说，企业可以根据生产需要，精减人员，提高效率，保证效益。而这些精减的工人，只要是离开工厂，他们就能领到社会保险金，这样社会就稳定了。我们一定要做到这一点。这个体系是不依附于企业的，而是社会的，是国家资助的。

最后，讲一下加入世贸组织问题。

我跟大家宣布一个刚刚收到的消息，今天下午三点半，中美关于中国加入世贸组织问题的谈判已经签订了协议，宣告成功地结束了。四点钟，江主席会见美国的巴尔舍夫斯基大使和总统特别助理斯珀林，会见后他们就打道回府了，这个问题就算告一段落了。我昨天一个晚上没有睡觉。今天上午江主席讲话的时候，我开小差了，开小差到哪儿去了？到外经贸部去了。可以说我去了以后就“强迫”他们签字，也可以说是水到渠成。

我国加入世贸组织的谈判，始终是在中央特别是江主席的亲自领导下进行的，是按照有理、有利、有节，针锋相对的原则来进行这次谈判的，在原则问题上我们没有作任何让步。我发现有很多省区市的同志，包括各部门的同志有误解。

第一，认为在农业方面作了太多的让步，美国的农产品会向中国倾销。完全不是这个情况。我们作的是什么让步呢？过去我们买粮食，因为美国的小麦有矮腥黑穗病，因此我们就限定粮食只能够从几个没有矮腥黑穗病的州进口。这个限定本来也是没有什么道理的，因为矮腥黑穗病发生在美国，怎么能够保证这个州有、那个州就没有啊？我们坚持检验和索赔就可以。我只要检验出你有矮腥黑穗病，我就拒绝

进口，而且对这批小麦，我们完全可以运到海南岛那个不种小麦的地方加以处理，或者在秦皇岛加以烘干，高温消毒，就可以解决问题。我们作了这个让步以后，那些原来不许它们出口小麦的州高兴得不得了，都拥护了。水果同样是这样的，因为有地中海果蝇，不许进口，结果也是加强严格的检验，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进不进口的主动权完全在我们这边，并不是说我们非要进口不行。所以这一次我们提高了进口的关税配额。比方说小麦，关税配额是700万吨，也就是在700万吨进口量之内，使用一种关税；超过700万吨，那关税是高的。很多同志就误会了，以为我们定了这个关税配额就是每年必须进700万吨，不是这样的。这个配额是一回事，你买不买是另外一回事。我们去年才买了几十万吨小麦。而且我们规定得非常清楚，粮食、棉花、植物油、糖、化肥、成品油、原油、烟八种产品实行专营。什么叫专营？就是只允许国家的贸易公司进口，不但你外国的贸易公司进不来，中国的私营贸易公司也不允许它经营，粮食进口就中国粮食进出口公司一家。买不买都得听我们的，不是说关税配额多少就是一定要进口多少，我也可以一吨也不进口啊。而且我们保留了专营，进不进在我，对这一条我们是抠得紧紧的。

第二，我们降低了一些产品的进口关税，汽车的关税降低了一点，还有其他工业产品的关税也降低了一点。一些省区市党政领导同志就讲了，现在，我们的企业一定要自力更生，否则一参加世贸组织，外国产品一进来，我们都垮了。如果是这个情况，我们还参加世贸组织干什么？一参加世贸组织，外国东西全进来，我们都垮了。不是这么个情况，没这么可怕。但是从另一方面讲，我们自己的企业也确实应该自强，应该改善经营管理，提高自己的竞争力，加入世贸组织是通过竞争促进我们进步，这个是完全对的。其实，参加世贸组织是很好的一种良性作用，就是有些外国产品进来，它们价廉物美，我们比不上它，这样就促进我们改进。

所以，我认为参加世贸组织有利有弊，但是利大于弊。参加进去是有好处的，对吸引外国的投资、提高我们的国际声誉、参加制定国际贸易的游戏规则，都能发挥我们的作用。总之，这一次中美签订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协议，是我们外交政策的一次胜利。至于大家的一些

顾虑，我们会尽量地想办法来减少这种弊端。我们估计这种弊端是不会影响我们国家发展的。

在一九九九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的总结讲话

(1999年11月17日)

这是朱镕基同志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总结讲话的主要部分。

这次会议开得很好。经过热烈讨论，大家的认识达到了新的高度一致。同时，大家也提出了很多好的意见和建议。根据会议讨论中提出的问题，我再讲几点意见：

第一，关于坚持实行扩大内需的方针。明年的经济工作搞得好不好，很重要的是看我们如何启动国内需求。当然，现在中美关于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谈判已经达成了协议，如果没有什么重大变化，今年或明年上半年我们就可以加入世贸组织。这样，对于整个的投资环境会有好的影响，外国直接投资可望有所增加，至少不会减少。但是，我们不能对这方面期望过高，因为国际形势，包括美国本身的经济，都还存在不确定因素。我们还是要主要立足于国内，立足于自力更生。可以说，当前需求就是速度，需求就是效益，需求就是稳定。没有市场需求，国民经济就不能发展，只会造成祸害。如何启动需求？中央有明确的方针政策，并且在近两年经验的基础上不断地改进，这在江泽民同志的讲话中都已讲清楚了。

我想补充强调一个问题，就是如何影响人民群众的心理预期，这对刺激需求有很大作用。现在人们并不完全是因为没有钱来消费，不少人是把钱存在银行里不消费或少消费，原因是他们总觉得不知道哪一天可能下岗，也不知道医疗、住房改革要增加多少支出等等。如何把人们存在银行里的钱动员出来，是启动内需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我再一次提醒各地负责同志要关注这个问题，多做一点调查，去了解民间疾苦，分析群众心理，引导居民的心理预期，让他们敢于大胆地去消费。我看，要注意抓好以下几点：

一要保障低收入阶层居民的收入稳定增长。今年下半年，我们做了很大努力，明年要继续把这项工作做下去，而且要做得更好。比方说，下岗职工的基本生活费，一定要发到个人的手里，今年增加的

30%明年要保证发，要代他交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这个钱是必须花的。在还没有建立一个独立于企业之外的社会保障体系之前，国有企业下岗职工的基本生活保障还是要按照现行的规定切切实实地保证。按“三三制”原则筹措资金，企业和社会那部分没有保障的，财政一定要补上，一定要兜底，绝对不能对这部分职工的生计不管；否则，会影响社会稳定，也是对人民不负责任。所以，财政要大大压缩一切不必要的开支来保支付，一定要兜底。我再次说明，原来由中央统筹的11个行业下放给地方后，遗留的养老金问题由中央负责，这个钱经过审查核实后由中央财政解决。欠发机关和事业单位职工的工资，统统都要发。这个钱无论如何都应该挤出来。绝不要再拿去搞重复建设了，可以拿那个钱先保发工资，保障社会稳定。

二要改变群众对改革的心理预期。我们已经宣布，推进改革要考虑不致影响大多数群众的生活水平下降。比方说住房制度改革、医疗体制改革，中央已有了明确的政策、原则，具体做法由地方分散决策。由于各地情况不同，全国出一个统一的办法是不可能的。拿住房改革来说，住房商品化、货币化，停止福利分房，这都早已宣布了。至于怎么个做法，由各地决策、分散实施。不少地方搞得不错，要总结经验继续搞下去，特别是银行贷款分期还款，要大力地搞下去。住房商品化是一个很大的市场，是推动国民经济发展的一个很大的动力。医疗改革，总的政策该讲的都讲了，各地要根据本地区情况组织实施。医疗改革包括医院的改革，医院不改革，人员臃肿，开方子必须在医院买药，那个药又贵得很；患者不需要照CT的，非要你照，一照就是几千元。这样搞下去，医疗公积金再多也不够。每一项改革都要考虑原来由国家负担的不要转嫁到群众身上，需要增加负担的要相应增加工资，这样人心就稳定了。

三要减轻农民负担。现在农民负担过重，我问了好多省份的负责同志，他们都赞成尽快实行农村税费改革，变费为税，就收一个规范的农业税，取消各种收费。这对农民是一大福音，对于启动农村需求也是一件好事。国家提出农村“费改税”的原则性要求，至于如何有计划、分步骤地实行，由地方决策。通过“费改税”，实行“收支两条线”，把农业税收上来，然后，乡干部发工资、村干部发补贴都从财政出。对这个问题国务院还要研究，经党中央批准后，再发文件。关于公路税费

的改革，国务院本来把它当做“费改税”的突破口，做了大量工作。最近，全国人大常委会已经通过修改后的《公路法》，将公路收费改为收税，法律方面的障碍消除了，可以进行这项改革了。但是现在时机不好，就是石油涨价。前几天国际市场的原油价格还是23美元一桶，这几天是25美元一桶，预计到年底可能是30美元一桶。国内的油价已同国际接轨，当然也要跟着涨。在石油大涨价的时候收燃油税，把已经很高的油价再加高，我们担心老百姓承受不了。我们更担心的是，收了税以后，原来那些费还照旧收，这在一些基层干部素质和我们监管水平不高的情况下，是完全有可能的。如果石油大涨价，又加燃油税，那边公路还收费，影响就大了。同时，加税之后燃油价格还这么高，也会增加打击燃油走私的难度。所以，这项改革如何实施和什么时候出台为宜，国务院还要慎重研究。但是，我们认为，农村“费改税”已经到时候了，不会有多么大的风险，但改税之后必须坚决取消摊派、收费。当然，我们还是要谨慎从事，就是刚才讲的有计划、分步骤，先试点，再推开。

这里，还要讲一下进一步发挥货币政策作用的问题。我在前天的讲话中说过，现在不少地方金融机构面临着不能保支付的风险，中国人民银行可以利用再贷款的方式，把钱借给地方金融机构，来解决保支付的问题。大家听了很高兴，说这样做可以缓解金融危机，稳定社会。但你们恐怕有一点误会，就是我说的是中央银行把钱借给你，而不是替你还债。地方政府应该承担的债务，不能让中央来承担。一定要明确债权、债务的关系，否则就会发生道德风险，如果借银行的钱可以不还，那要出大问题。中央银行是把钱借给你所指定的、保证的金融机构，今后你是要把这笔钱还给中央银行的，是要付利息的。农村合作基金会也好，信托投资公司也好，城乡信用社也好，城市商业银行也好，凡是不能保支付的，经过一定程序的审核批准可以用向中央银行借债这个办法来处理，但是都要还钱的。考虑到地方目前财政的困难，再贷款的利息可以降低一些，还本的期限根据各个省的财政状况可以放宽一点，但是钱一定要还。这就是契约，没有契约就没有社会秩序。如果从中央借钱不要还，地方花钱没有压力，金融机构不整顿，金融犯罪不追查，亏损源不取缔，管理依然落后，腐败更加盛行，那就是把钱扔到了水里。债权、债务关系绝不能含糊，这一点我

再次说清楚，别误会了，以为过去地方金融机构欠的债务都由中央还了，这不可能。

第二，关于国有企业的改革和发展问题。国有企业三年改革和脱困的目标是不能动摇的，实现这个目标是明年经济工作的重中之重。我们讲发国债不是一年两年的事，但我们发的是能把国有企业振兴起来的国债。国有企业的经营状况好转了，企业增发工资和扩大投资的自有资金多了，财政国债就可以少发了。中央提出的国有企业三年改革和脱困的奋斗目标，并没有给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下达硬性的数量指标。只提出“大多数”，并没有规定具体比例；要求“摆脱困境”，并不都要求“扭亏为盈”。我这并不是说全国大多数国有大中型亏损企业不能扭亏为盈，我相信可以扭亏为盈。我只是要指出，中央提出的目标是有弹性的，有利于调动群众的积极性。现在有个别地方提出这个目标三年完不成，要改为四年，这个提法不妥。我们理解有些地方困难很大，遗留问题很多，任务确实艰巨，但还是要服从全国的目标。只要你们工作有显著起色，困境比以前有所改善，就说明你们已尽了力，为实现中央提出的国有企业三年改革和脱困目标作出了贡献。各地要对国有企业进行分类、排队，摸清情况，找出亏损的原因，有针对性地进行工作。关键是要认真实施现代企业制度，加强对国有企业的监督，整顿领导班子。工作要做细，信心要坚定。

另外，企业扭亏不能依赖债转股，而要靠自己主动开拓市场，转换机制，加强管理。对境外企业尤其如此。经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为了加强党的领导，中央管理企业的体制要改革。中央直接监管163个大型企业，其中39家的领导班子由中组部管，这些企业的党政一把手，要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决定。为了加强对国有大型企业的领导，中央决定成立中央企业工委，从人事部完全脱离出来。它主要有三项任务：一是决定国有大型企业领导班子的任免，二是加强国有大型企业党的建设和党的工作，三是监督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和经营管理。根据党的十五届四中全会的决定，稽察特派员要向监事会过渡。国有独资企业的监事会，履行出资人的监管职能，要以国务 院的名义派出，由中央企业工委管理。国务院已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修订《公司法》，明确国务院派出的监事会的法律地位。163个大型企业以

外的国有企业由地方管理，希望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参照中央的办法设立机构，管好企业。



1999年10月17日，朱镕基考察天津钢管公司，并就债转股问题听取汇报。右一为国家经贸委主任盛华仁，右三为天津市委书记张立昌，右四为天津市市长李盛霖。

第三，关于农业问题。我想再次强调农业的重要性。现在粮食确实是多了，其他农产品也都是供过于求。粮食的库存包括社会库存足够一年的产量，如果没有特大的自然灾害，每年还会继续增加。粮多价跌，谷贱伤农，现实的困难摆在这里。但是，我们必须认识到粮多是好事，12.5亿人的吃饭问题，我们终于解决了，这是多少年梦寐以求的目标，是了不起的成绩。当然，这种解决还是低水平的，叫做“阶段性的相对过剩”，因为我们蛋白质的消费水平还是比较低的。粮多是好事，但粮多也带来了困难，每年要补贴几百亿元，粮食放在仓库里，陈化粮越来越多。但这是我们必须负担的，不负担就没有今天的大好形势，忽视了这个问题，大好形势就可能逆转，对这一点一定要认识清楚。现在有些地方粮食丰收了，头痛得不得了，认为这是坏事，绝对不能这么看。我们宁愿多修仓库，把粮食储存起来。我担心由于年

年丰收，农产品供大于求，会导致大家忽视和放松农业，现在已经有这个苗头。我还很担忧谷贱伤农，农民收入下降，那还能扩大什么内需？中央规定的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的三项政策，即按保护价敞开收购农民的余粮、顺价销售、收购资金封闭运行，是完全正确的。问题是粮食供过于求会给这些政策的贯彻带来相当大的难度。有些地方由于放松对农业的领导，对这三项政策贯彻得很不好，那里的粮食购销企业在收购粮食的过程中，压级压价、限收拒收，这是完全错误的。东北地区经过协调，今年降低一点玉米收购的保护价，这是给农民一个信号，告诉他们玉米太多了，让他们多种点大豆，用价格手段推动调整种植结构，这是可以的。但有些地方不是降几分钱，而是降了一角到两角，这就不得了啊！我们有今天这样好的形势，就是靠农业政策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五年中曾三次提高粮价、两次提高棉价。你现在一下子把价格降下来，人家就不种粮食了。农民的积极性一下来，粮食供应就会出问题，就会造成全社会恐慌。这是我几十年搞经济工作的体会。我再一次呼吁大家，一定不要放松对农业和农村工作的领导，当前一定要贯彻按保护价敞开收购余粮的政策，不能打折扣。这并不是说不要优质优价，玉米的水分高就得扣水分，早籼稻就得降低价格，优质稻就得加一点价，以鼓励调整结构。但一定要按保护价敞开收购，关键是对粮食购销企业的财政补贴一定要到位，希望各地领导同志充分重视这件事。请国家计委会商财政部等有关部门后，通知组织一次全国性的大检查。

现在解决粮食供过于求的主要出路，一是调整农产品种植结构，二是加大粮食的转化力度。这都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在这个过程中，就得把该收的粮食收购进来，储存起来，这个代价必须付出，我们这一代人要把这个愉快的负担背起来。大家回去以后要开展全面大检查，补贴到位，敞开收购余粮，一定要把这个政策贯彻到底。然后再想办法调整结构，别再去种早籼稻了，玉米别种那么多了，要多种大豆；同时，加快粮食的转化，我到很多省区调查都有这个经验，就是以公司带农户。日本人喜欢吃芥末，原料是辣根。云南一个公司就跟日本人做生意，供给日本辣根，从而带动农民种辣根，收入要比种粮食多好多倍。利用这种公司带农户的办法，促进种植结构调整。这样，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粮食转化越来越多，这个供过于求的

问题就解决了。在这个过渡时期，我们要背上这个沉重的负担，绝对不要把它当成一个坏事。同志们，中央全力支持你们做好这件事情。

第四，关于西部大开发。在讨论中，大家都说拥护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但是东部和中部地区一些同志的认识还是不太统一，我觉得确实还要提高认识。我们要更好地学习邓小平同志的战略思想和江泽民同志最近多次关于西部大开发的讲话。最重要的问题是，中国经济正面临结构调整的关键时期。结构不调整，经济不能再前进。如果还发展那些落后的东西，好多都积压在仓库里面，这种增长速度有什么用？但结构调整需要时间，现在要拉动经济必须开拓新的市场，有了市场，市场经济才能发展。东部地区的经济要再上一个台阶还需要一定时间，而东部地区的产品现在的最好市场是在中西部地区。中西部地区的大开发，将为沿海地区提供广阔的市场和发展的余地，这是一举几得，大家都得益。

为什么要向西部地区倾斜呢？第一，西部地区是少数民族地区。西方敌对势力总是想利用少数民族地区的问题来颠覆我们的国家。第二，它是边疆地区，有些还是很敏感的涉外地区。第三，它是贫困居民比较多的地区。我们不能让地区经济发展的差距越拉越大，那样会出大问题。现在向中西部地区倾斜，尤其是向西部地区倾斜，已经成为东部地区发展的一个必要条件。东部地区支持西部地区，实际上是促进自己更好、更快地发展。尤其是基础设施建设，也到了该向西部地区倾斜的时候了。对西部地区有优势、有市场的那些产业，也要支持其发展，形成各有特色的支柱产业。当然，对东北地区的老工业基地也应该倾斜，这是另外一个问题。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要成立一个西部大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国家计委，准备近期就要开会，把西部大开发落实好，包括退耕还林等等。关于退耕还林，最近准备发个文件，希望同志们抓紧落实。要按照江泽民同志讲的，有计划、分步骤地进行，要因地制宜，一开始要稳当，试点范围不可过大，要贯彻农民自愿的原则。

最后，希望大家从现在至年底前的40多天里，继续抓紧抓好今年的各项工作，不能放松。第四季度是投资的高峰期，对资金拨付、工程质量、工程进度都要加强督促检查。要进一步组织好工农业生产，不能有丝毫松懈。要强化税收征管，今年的财政和税收工作是做得不错

的，但还要继续努力，千万不能大意。同时还要提醒一下，接近年终，绝不要为了追速度，不顾市场需求，盲目突击生产。煤炭、钢材、水泥、玻璃、一些化学产品都大量积压，必须坚决控制总量。关于“千年虫”①的问题，大家也要注意。本来，我们今年12月31日是不放假的，现在准备调一下，提前在12月31日放假，避免电脑系统在这一天出毛病。这个工作一定要做好，做到万无一失。要更好地关心群众生活，特别是关心困难企业职工、城乡贫困居民和灾区群众的衣食冷暖。国有企业下岗职工的基本生活费、企业离退休人员的基本养老金，以及城镇居民的最低生活保障金，一定要按时足额发放。一些地方拖欠教师和机关干部的工资，要抓紧补发。要认真解决群众过冬取暖和看病就医等实际困难，帮助他们过好元旦、春节。要做好拥军优属工作。

---

① “千年虫”，指轩算机当时使用的年份是用两位十进制数来表示，因此当系统进 行（或涉及）跨世纪的日期处理运算时，就可能会出现错误的结果。

同志们，做好明年经济工作的意义重大。让我们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坚定信心，振奋精神，齐心协力，开拓进取，把明年的经济工作做得更好。



1999年9月17日，朱镕基参观’99中国国际金融(银行)技术暨设备展览会，了解金融行业如何应对计算机“千年虫”以及“金卡工程”的情况。前排左二为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尚福林。

致出席全国计划会议全体同志的信

(1999年11月18日)

请培炎①同志代我向出席全国计划会议的全体同志表示亲切的问候。

我对国家计委和计划工作是有感情的，这是我参加工作四十八年的起点和教育、陶冶我时间最长的熔炉。我祝愿同行们更快成长。

一年多来，你们认真贯彻中央的各项决策，因应形势变化，自觉转变观念，丰富了宏观调控的经验，促进了国民经济发展，确实取得了显著的成绩，我向你们表示衷心感谢。

我对你们的希望是：对中央已定的经济工作方针、政策，要坚信不疑，坚定不移，贯彻到底，不为风言风语所惑，众志成城，金石为开；对工作进度要抓得更紧、更具体，不要拖拉，不要怕得罪人，正气凛然，鬼神辟易；对工作方法要更加讲究，深入实际，调查研究，虚心听取不同意见，如实反映民间疾苦，一切决策方案都要考虑群众利益，妥善处理各种矛盾，实事求是，讲求实效，力戒浮夸，切莫弄虚作假。我愿与各位同行共勉之。

朱镕基

11.18午夜

---

① 培炎，即曾培炎，当时任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主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办公厅

请培炎同志代我向出席全国计划会议的全体同志表示亲切的问候。

我对国家计委和计划工作是有感情的，这是我参加工作四十八年的起点和教育、陶冶我时间最长的熔炉。我祝愿同行们更快成长。

一年多来，你们认真贯彻中央的各项决策，因应形势变化，自觉转变观念，丰富了宏观调控的经验，促进了国民经济发展，确实取得了显著的成绩，我向你们表示衷心感谢。

我对你们的希望是：对中央已定的经济工作方针、政策，要坚信不疑，坚定不移，贯彻到底，不为风言风语所惑，众志成城，金石为开；对工作进度要抓得更紧、更具体，不要拖拉，不要怕得罪人，正气凛然，鬼神辟易；对工作方法要更加讲究，深入实际，调查研究，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办公厅

虚心听取不同意见，如实反映民间疾苦。一切决策方案都要维护群众利益，妥善处理各种矛盾，实事求是，讲求实效，力戒浮夸，切莫弄虚作假。我愿与各位同行共勉之。

朱镕基

11.18.午夜

钢铁工业要控制总量、调整结构

(1999年12月6日，2000年2月27日、4月8日)

这是朱镕基同志关于钢铁工业要控制总量、调整结构的三次批语。

一、这是朱镕基同志在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副主任王万宾、国家冶金工业局局长蒲海清《关于落实国务院领导对宝钢发展问题批示的情况汇报》上的批语。

二、这是朱镕基同志在《冶金工业情况》第5期《国家冶金工业局召开6家超产严重企业经理座谈会》上的批语。

三、这是朱镕基同志在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副主任石万鹏、国家冶金工业局副局长单亦和关于钢铁工业控制总量、调整结构的情况汇报上的批语。

一

(1999年12月6日)

完全同意邦国①同志意见，要认真落实。这两年，每年生产1.1亿～1.2亿吨钢，还进口一千几百万吨钢材，我是不相信都用上了。钢铁工业重产量轻质量、重生产轻效益的偏向应该纠正了。大项目现阶段不要搞了，技术改造也应该立足于改善质量管理，少花钱多办事。替代进口搞了这么多年，进口钢材反倒越来越多，经验教训值得总结。关键是在品种、质量、技术水平上要达到国外先进水平，尤其是成本价格要低于进口，否则想替代也替代不了。至于数量，不一定都由国内满足，那样，外贸也没得生意做了。高估需求往往是项目投资不能回收、成本降不下来的重要原因，也是我们搞计划经济的老毛病，该改了。多唠叨了几句，因为宝钢“财大”，希望警惕“气粗”。

朱镕基

12.6

① 邦国，即吴邦国。

二

(2000年2月27日)

邦国同志：

总量控制方针是对的，但着重行政办法，下限产指标，办法不好，也不一定有效。我已对华仁①、海清①同志讲了。此件可不下批。

(还是要加紧市场调查，同银行合作对产品积压企业，从生产资金源头上限制)

朱镕基

2.27

---

① 华仁，即盛华仁，当时任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主任。海清，即蒲海清，当时任国家冶金工业局局长。

三

(2000年4月8日)

请培炎①、华仁、怀诚①、相龙①同志阅。大厂限产，小厂增产，这不符合产业结构调整的精神。财政、银行应该支持冶金工业部门的调整工作，支持地方关停小企业，对消耗高、质量不合格、积压滞销的产品应从信贷资金上限贷、停贷。(抄报国务院领导同志，抄送各商业银行行长)

朱镕基

4.8

---

① 培炎，即曾培炎，当时任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主任。怀诚，即项怀诚，当时任财政部部长。相龙，即戴相龙，当时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

请培炎、华仁、怀诚、相龙同志阅。大厂减产，小厂增产，这不符合产业结构调整的精神。财政、银行应该支持冶金工业部门的调整工作，支持地方关停小企业，对消耗高、质量不合格、积压滞销的产品应从信贷资金上限贷、停贷。（抄邦国、[illegible]同志阅，抄送各有关银行总行）

3/4阅

邦国副总理并镕基总理：

4.8.

去年钢铁工业未能实现较上年减产 10% 的目标，钢产量由 1998 年的 1.14 亿吨增加到 1.24 亿吨，钢材价格平均每吨下滑 150 元。根据镕基总理和邦国副总理的指示精神，国家经贸委把钢铁作为今年总量控制、结构调整的重点，力争钢产量控制在 1.1 亿吨，钢材产量 1 亿吨以内。

从 1 月份总量控制实施结果来看，钢产量增长过快的势头有所遏制，大企业控制产量目标完成较好，但仍有一些地区和企业超过控制目标，其中河北、山西、江苏、浙江四省超过目标 8% 以上。根据经贸委党组决定，我们于 2 月 28 日主持召开了这四个省副省长、经贸委和冶金主管部门负责人参加的座谈会，要求明确责任，制订措施，确实做好总量控制工作。从 3 月 22 日开始，我们用了近 10 天的时间，又到浙江、江苏两省

关于当前的财政政策

(2000年1月14日)

2000年1月12日至19日，中共中央在中央党校举办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财税专题研讨班。参加研讨班的有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书记、省长(主席、市长)，军队各大单位的负责同志，中央有关部委的主要负责同志。这是朱镕基同志在研讨班上讲话的主要部分。

我今天要讲的话，中心思想是大家要有忧患意识，在大好的形势下要看到风险。不能再去大把地花钱，要树立勤俭的观念。

昨天，我看了《焦点访谈》节目。那个题目选得非常好，叫做《穷吃，吃穷》。我看了以后，心里有无限感慨，别穷吃了！现在农村时兴做寿、办红白喜事。孩子满十岁也要做寿，请一帮亲友来吃喝。我很佩服《焦点访谈》，那些吃喝的场面是怎么拍到的？种种的庆典，把亲戚朋友都请来吃喝。农民现在很穷呀！你去问农民，谁都说不愿意这么干，一年花几百、几千元在这个上面，但是我们已经形成这个习惯了，不这么干已经不行了。“我已经吃了别人的，轮到我的时候，我不请对不起别人”，农民讲的都是心里话。这种陋习再不改革，就不是共产党领导的天下了。这里讲的都是老百姓，不是讲我们的官员。我们官员吃的那就是“高科技”了，不能比了。这种奢靡之风不改，怎么得了啊！国家这么搞下去怎么得了啊！

再看看县市以上办的种种的“节”，广东有“荔枝节”、海南有“芒果节”、北京有“西瓜节”、四川自贡要办“国际灯节”等等。到时候，美籍华人可能会来两个，来了还得要县长给他们优惠，“先征后退”，把税都退给他们，然后他们赞助你搞这个节。那你还不是花自己的钱吗？此风不可长！我们不能跟外国人比，比这个东西干吗？你以为这样搞，人家就看得起你呀？你手上有“杀手锏”，人家才看得起你。大型的、综合的文艺晚会更是不得了，人海战术，搞那个东西干什么？还有印书，印纸的不行，要印金箔的、竹简的、丝绸的，谁买得起呢？还不是送

人吗？什么人都可以出书，我就不相信能卖得掉。还是要提倡朴实无华，埋头苦干比较好。

总之，我希望大家增强忧患意识，树立勤俭观念，加强廉政建设，打击贪污腐败。



2000年1月14日，朱镕基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财税专题研讨班上讲话。左一为中 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组部部长曾庆红，左二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贾庆林，左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李长春，左五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左六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山东省委书记吴官正，左七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黄菊，左八为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王忠禹。

关于财税问题，我想讲三点：

第一，要坚定不移地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

财政属于分配的范畴。经济是财政的基础，经济决定财政，反过来，财政也促进经济。对不同的情况，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要采取

不同的财政政策。在当前国内需求不足的时候，就需要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这种政策不是从我们开始的。人家说我是凯恩斯主义者，是“罗斯福新政”的崇拜者，可见早就有这种主张，也早有这个实践。现在日本也实行这种政策，但是实行得不连贯，决心也不大，效果还看不出来。

我们实行的积极的财政政策，成效明显。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拉动了经济增长。据有关部门估计，1998年，积极的财政政策拉动经济增长1.5个百分点，1999年是两个百分点，如果没有积极的财政政策的拉动，去年和前年的经济增长速度仅为5%到6%，如果再扣掉水分，那就很困难了。

二是基础设施在这几年得到了迅速的发展。据统计，国债投资共2100亿元，即：1998年1000亿元，去年500亿元，后来又追加了600亿元；再加上银行贷款配套4200亿元。尽管有一些项目还没有完全建成，但从已完工的情况看，加固长江、黄河、太湖堤防6200多公里，这是历史上没有的。新增公路通车里程8万公里，其中高速公路5500公里，这是我国修公路的高峰期。投入运行的铁路新线1900公里、复线1796公里，这是很大的成绩。城市基础设施和环保建设也大大加快，很多城市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400多个县完成农村电网改造，建设和改造高、低压线路50万公里，平均1度电的价格降低了1角钱，农民得益200亿元。降低电价是稳定农村、开拓农村市场一个非常重要的措施，我们是下了决心的，三年要完成这个任务。建成中央粮食储备库容约500亿斤，准备再修库容200亿斤的粮库。

三是促进了消费需求的增长。去年，国家财政花了540亿元，用于提高低收入阶层人民的生活水平，有8400万人得益。另外，降息、提供消费信贷、延长假日等措施，对刺激消费需求也发挥了积极作用。

四是支持了外贸。我们三次提高了出口商品的退税率，使出口能够大幅回升。

五是促进了产业结构的优化和调整。

同时，我们也注意配合积极的财政政策，发挥货币政策的作用，但我们始终不提积极的货币政策，那样做风险太大。我们按发行1000亿元国债、银行配套2000亿元贷款的比例，把基础设施的国债项目搞上去。目前，银行很难找到有效益、能还款的项目，如果银行不给国债项目贷款配套，就搞不出什么名堂来。对流动资金，特别是有效益生产的流动资金，银行要保证。钢铁行业必须压缩，许多是无效劳动，但压缩不能采取行政手段关门的办法，首先由国家冶金工业局和银行配合开展全国大检查，跟踪调查，出厂的钢铁到哪儿去了？积压在哪个环节？用事实来证明钢多了。然后就挑出那些效益不好的、还不了款的、产品积压的工厂，银行停止给它们贷款，这样才能达到压缩总量的目的。你用行政命令，说什么255立方米以下的高炉都得关闭，没有达到生产规模的钢材设备都得把生产停下来，这种行政命令手段是不行的。现在是搞市场经济，你就看它生产的钢材销售掉没有？能不能给银行还钱？不能还钱，就不要给它贷款，让它根本没法生产，非关不行。然后再辅之以财政政策，比如工厂关门以后工人怎么安置等一系列的问题，要帮助它解决，要给政策，并不是简单地一关了之。

另外，银行要支持科教兴国，这方面虽然有点风险，但不支持不行。现在很多人下岗，还有很多人退休，身体还挺好，又有知识，就支持他们去发展中小型企业。不分所有制，只要是填补市场经济的空白，能够提高产业的技术水平，就给予贷款支持，冒一点风险也要贷。别往那些生产过时的、没有人要的产品的企业里投，就支持科技型的、以知识分子为主的中小企业的发展。当然，劳动密集型的、符合社会需要的企业都可以发展，银行信贷都可以支持。就是绝对不可以支持盲目重复建设和生产积压产品的企业。

这几年的实践，使我们积累了两种经验。在此以前，我们积累的是治理通货膨胀的经验，可以说我们已经有一套成功的经验。这两年，我们又学会了如何防止通货紧缩，但现在还没有到总结的时候。我认为积极的财政政策至少还要搞三年，因为国有企业扭亏为盈，盈得不多，如果不靠国家的拉动，还是搞不上去的。现在来总结治理通货紧缩的经验言之过早，但是关键的四点我们是可以总结的：第一点是取向。就是究竟是采取从紧的财政政策，还是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首先要看清形势，什么时候采取适度从紧的政策，什么时候采取积极的

政策，我们已经有了一定的经验。第二点是力度。发多少国债，我们是经过反复考虑的，开过好多座谈会。经济学家们对发1500亿元、2000亿元，还是发1000亿元，意见不一致。我们始终采取谨慎的态度，哪怕是拉动的力量不足，也不要过犹不及，不想搞得太厉害。现在看来，发1000亿元的力度差一点。第三点是来源。用国家投资拉动国民经济，不能采取财政透支的办法。在1993年以前，我们采取透支的办法，每年都要从银行无偿地拿200亿元来弥补赤字。从1993年以后，我们作了规定，不能从银行无偿透支，现在采取的办法是由财政部向银行发行国债。因为银行的钱贷不出去，那就让财政来用，财政给银行付利息，这就改善了银行的经营管理。而对国家来说，这肯定是一个风险，因为这些基础设施项目最后能发挥多大的作用，谁也无法预料。但是，我想这不会失败，因为它们不是重复建设，是能够发挥作用的，是会促进财政收入增加的。第四点是投向。钱投到哪儿去？一定是投到基础设施建设上。基础设施绝对不搞重复建设，也不搞竞争领域的建设，因为在竞争领域，如果国家支持你这个企业，对别的企业的发展就不公平。基础设施建设是为整个社会谋福利的，一般商业贷款不会去搞，就得靠政府来搞，所以，投向也是非常重要的。比方说，去年和今年增加工资，是靠财政收入的增长实现的，不是拿1000亿元国债来发工资，如果用国债作为增加工资的来源，那是非常危险的。

关于财政风险问题，我也要说一说。对风险绝对不能否定，必须有点忧患意识。我认为，这种风险在平常时期，是在可控制的范围以内的，可以说基本上不会出什么问题；但是一碰到突发事件，一有风吹草动，这个风险就相当大。1997年，我们的赤字已经缩小到500多亿元，本来想把这个赤字分几年消灭，打算一年减100亿元，但由于发生了亚洲金融危机，出现了通货紧缩的趋势，使我们转而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国债增发了1000亿元，赤字就增加了，1998年增加到1500亿元，1999年达到1800亿元。现在，对这个风险作些分析。去年全国财政总收入是11000多亿元，其中中央财政近6000亿元，占50%多一点。这6000亿元中有2000多亿元返给地方，中央可支配的不到4000亿元。财政支出包括国防、外交、公务员工资、国家拨款搞建设等等，都在这里面了。现在赤字一年是1800多亿元。国债的余额是多少呢？去年是1.3万亿元，其中1.2万多亿元是内债，近700亿元是外债。这些债是

每年要还本付息的，因此1800多亿元赤字加上过去国债的还本付息，一年要多发4200亿元的国债。也就是说，去年整个中央的财政开支4000多亿元，全是靠发国债，要是这个国债发不出去，我们大家就只好回家吃库存了，吃电冰箱里的东西。这不是危言耸听，事实上摆着的就是这种情况。如果有突发事件，有风吹草动，人心会不会动摇呀？可见，不能不说潜在的风险还是存在的。问题在于这种情况还要延续三年，不然缓不过来。一年4000多亿元国债发下去，还要还本付息，大体三年后国债是2万亿元，比现在增加一倍，发国债的数量越来越大，风险也越来越大。我们希望在这三年中间，国有企业好转得更快一些，不需要再发这么大的国债来拉动经济增长，风险就可以减下来。

第二，财政政策应该更好地为经济结构的调整、国有企业的改革等重大任务服务。

目前，财政和银行对国企改革的支持主要应体现在债转股。其他如兼并、破产等政策都已经有了，兼并政策的执行效果不好，基本上没有改变企业的经营状况；破产的效果比较好，但代价也不小。现在搞债转股是怎么回事昵？就是好多国有企业，它们根本没有资本金，完全靠借钱搞建设，投产以后所赚的那点利润，根本不足以支付借的钱的利息，原因是这些企业在建设的时候没有按照规定办事，既没有自有资金，又不可能有那么高的利润回报率，因此还不起银行的贷款。现在只好承认现实，让国家来承担历史的欠账，把一部分银行贷款转化为国家银行对它的持股，不要它付利息了，等它盈利，有股息了，银行再收回一部分钱。这就是债转股。但是，我们不希望这个政策变成“免费的午餐”，实行这个政策必须有条件：企业领导班子是比较健全的，企业的设备、技术、工艺是先进的，产品是有销路、有竞争力的，不付利息后能够转亏为盈。如果那个企业根本是不可救药的，把它债转股，钱还是等于扔到水里面去了，我们不能这样做。这个工作，建设银行走在了前面，去年年底前就把该转的转过来了。中央定了一个数，债转股1万多亿元，把贷款转为股权。其他三个银行，看看今年第一季度能不能完成核定的债转股工作。希望这个工作能够顺利地完成，相信这对国有企业脱困是很有帮助的。

关于财政支持结构调整问题。首先是产业结构调整，我这里不准备详细讲，只想着重讲讲地区结构调整，就是西部大开发。首先应加强西部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一定要有倾斜政策。比方说新疆，它是多民族聚居又与诸多国家相邻的地区，由于周边国家一些势力的支持，民族分裂活动越来越严重，甚至出现了武装劫持等破坏活动。稳定新疆历来是一个很难的问题。没有解放军，没有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新疆根本不可能稳定。过去我们曾想把发展棉花作为新疆发展经济的一个支撑点，暂时看来还不行，生产的棉花许多积压在仓库里，离内地又那么远，质量也不见得比内地的好，没有竞争力。新疆有石油、有天然气，原来想在那里生产化肥，现在化肥也多了，把化肥从新疆运过来，更卖不出去。现在只好修天然气管道，把气输送到东部地区。塔里木盆地现在至少已勘探出1万亿立方米的天然气，将来可能达到10万亿立方米或者更多，就能保证一年输送250亿立方米给东部沿海地区。我们要下决心修这条管道，修了管道可以部分解决东部的能源供应和环境污染问题。修这条管道要花1000亿元，不花不行，要赶快动手，这对稳定新疆意义非常重大。最近我们已经决定动手，先从青海的西宁把管道修到甘肃的兰州，这一段距离短一点，但是作用很大。兰州已经污染得一塌糊涂，如果用上了天然气，污染就可以减少。西部大开发的第二项任务是退耕还林。现在粮食多，我们完全可以把粮食无偿补偿给那里的农民，让他们去植树、种草，改善生态环境。做这件事情一定要有计划、分步骤，而且要尊重农民的意愿，完善补偿政策，先试点、后铺开。西北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发展起来了，生态环境改善了，这本身对东部地区就是支援。东部地区当然有很大一部分产品要出口，但是还有很大一部分常规性产品现在没有市场，只有西部地区大发展起来，这些产品才能找到市场，这是一个战略性措施。很多同志提出西部大开发还要在科技方面、教育方面、人才方面努力，这是对的，也要采取一些积极的措施。

关于社会保障制度问题。现在社会保障制度还很不完善，覆盖面太小，缴费率很低。这是由于国有企业困难，缴纳不起，因此欠账越来越多。这个问题不解决，国有企业改革是无法完成的，社会也无法稳定。现在“三三制”是不落实的，对这个问题要下很大工夫来研究，最重要的是开辟资金来源，没有钱，空话一句。要提高收缴率，不管是合资企业、私营企业，什么企业都得缴。建立社会保障的资金来源无非

是这几条：第一条，财政要在预算里拿钱；第二条，收税，收利息税等就是为了建立社会保障基金；第三条，通过股市来筹集资金，就是把好的国有企业的股份，在股票市场上去变现，把这个钱拿回来补充社会保障基金。比如说，国有企业上市，原来是把25%的股份卖给大家(上市)，筹集资金来改造和发展自己；现在允许卖30%，把那个5%交给财政，用于充实社会保障基金。我希望这样经过几年的努力，如果能够把国有资产变现5000亿到1万亿元，用以建立社会保障基金，就可以基本解决社会保障基金问题了。

关于调节收入分配、增加工资问题。“十五”计划即将编制，要考虑工资的增长。增加工资，不是今年就增加，最快也要到明年。我们不是只靠工资、靠物质刺激来提高公务员的积极性，还要强调提高大家的事业感、荣誉感和历史使命感。作为人民的公仆，应该发扬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应该廉洁奉公，应该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古代的范仲淹说过“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①，《史记》上讲“周公吐哺”②的故事，我们大家应该学习和发扬这种精神。我曾经讲到“薪以养廉”的重要性。我们现在讲“高薪养廉”还言之过早，没有这个实力，但是总要使我们的“薪俸”有助于公务员保持廉洁的作风吧。我们虽然不能要求每个人都有共产党员的高尚品质，但是总得有一个机制来保证、促进他们养廉吧。现在的工资水平是不足以养廉的，特别是分配差距的悬殊现象越来越严重，很多高官有各种补贴的途径、额外收入的来源，很不规范。我到新加坡访问，原来以为新加坡的工资比香港高得多。但是李显龙③对我说，新加坡的实际工资并不比香港高，因为新加坡只有这个工资，其他补贴都没有，而香港还有很多补贴。比如香港的领导人退休以后，要发给他好多钱；他还可以出国旅游，费用由公家报销。李显龙说他们没有这些，新加坡绝对不给公务员配备房子和汽车，这些都打在工资里边了。我觉得这个做法对养廉是很有好处的。我们原来有个专车改革方案，后来误传说要把专车全取消了，就给一点钱作为补贴，引起议论纷纷。有的老同志说，我上车还得要人扶，没有人扶，我怎么打出租车呢？这一下子惹起“公愤”了，后来我们只好不搞了。实际上，我们根本不是这个意思。我们提出两种方式任你选择：你要保留专车，你就保留专车，司机还给你配；你要选择拿钱，一个月给你增加几千块钱。我们是想通过规范的办法来消灭浪费，这里面有许多需要改革的东西。现在公务员的工资水平太低了，

不足以调动干部的积极性，以致他们该管的不管，大笔的钱从他们手中流失了。要增强干部的荣誉感、使命感，就要有点措施，使他们有这种感觉。如果他们觉得低人一等，哪有这种感觉？！所以，我觉得提高工资是非常必要的。当然，问题也来了，钱从哪里来？我想，只要我们把这个改革目标确定了，把这个改革的理由搞清楚了，钱总是能够找出来的。举个例子说，北京出租汽车司机每天要向公司交150元钱的车份儿。照这样下来，公司两三年就可以把买车子的钱收回来了，但司机还要继续交下去。出租汽车公司还老是给他们摊派，叫他们装这个装那个，卖给他的东西又贵得要命。而且，所有这些交给出租汽车公司的钱只打一张“白条子”，这意味着出租汽车公司根本不交税。说得难听一点，出租汽车公司那帮人简直就是“把头”，是上海解放前戴墨镜、穿香云纱的那种人。偷税、漏税，这里面有多少钱呀！可见，加强征管就可以出钱。另外，少搞重复建设。国务院对防止重复建设是尽责的，凡是国债项目和要通过国家计委审批的限额以上项目，都要经过中国国际工程咨询公司评估，最后由国务院会议一个一个地通过。到目前为止，这几年国务院没有批准过一个加工工业项目，批的全是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但是，地方就很难说了。搞了一些虽然在你们那里是缺门，但在全国是能力过剩的重复建设项目，其结果是事与愿违，不但没有效益，还背上了包袱。重复建设浪费几百亿元你们也不心疼，现在我们想给大家加工资，你们就觉得困难了。我相信大家都主张加工资，加工资的钱从哪儿来？还不是主要从你们那儿来！我看还是要先吃饭后建设，先把发工资的钱扣下来，然后才谈得上搞建设。刘仲藜④同志提了个意见：以后发工资，年初就把它留下来，存在银行账户里，到时大家自己去银行取，就不会有发不出工资的情况了。总之，大家要下这个狠心，加工资。加多少？我冒叫一声(这不是政策，也不是要求)，三年翻一番，而且不是像去年那样基础工资加30%，而是全部收入加30%。当然，有些人工资高，不需要加那么多，那我们也不要一刀切。其实，这个钱不是很多，全国的机关干部也就是五六百万人，不需要很多钱。事业单位人多，有5000多万，其中2800多万是教育系统的。好多乡村民办教师不合格，要整顿，不合格的让他们回去种地，不然真正的教师不能得到应有的待遇。整个工资改革有很多问题要研究，但还是要比较大幅度地增加工资，这对各方面都有好处，工资差距可以缩小一点，也有利于引进人

才。特别是参加世界贸易组织后，如果没有一批熟悉国外做法的人，我们要吃很大的亏。银行、证券、保险系统必须大量吸引从外国回来的人才，在这种情况下，工资不增加也不行。

---

① 见范仲淹《岳阳楼记》。

② “周公吐哺”，见《史记·鲁周公世家》：“周公戒伯禽曰：‘我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我于天下亦不贱矣。然我一沐三捉发，一饭三吐哺，起以待士，犹恐失天下之贤人。子之鲁，慎无以国骄人。’”出自东汉曹操的《短歌行》：“周公吐哺，天下归心。”后用做在位者礼贤下士的典故。周公姓姬名旦，是周文王第四子，曾两次襌佐周武王东伐商纣王，并制礼作乐，使天下大治。因其采邑在周，爵为上公，故称周公。

③ 李显龙，当时任新加坡副总理。

④ 刘仲藜，当时任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主任。

第三，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加强财政税收管理。

财税体制改革，在1994年做了两件大事：一件是实行中央和地方分税制，这已证明是非常有效果的；另一件是建立以增值税为核心的税制系统，但现行增值税太复杂了，伪造增值税发票也是个很令人头痛的问题。要进一步改革和完善增值税制度，并利用高新技术来防止仿造税票。当前财税体制改革的重点是“费改税”。现在收费太厉害了；特别是在农村。据统计，1997年，全国行政事业性收费和政府性基金共有6800多项，收费金额达4200多亿元，相当于整个中央财政的预算开支，其中大部分是乱收费。它的危害是挤占了财政，助长了贪污腐败，加重了人民群众的负担。过去我们曾就农业收费开了一个单子，明确哪些项目不能收，但没有用，下面改一个名字再收。现在必须明确，一切费用都不许收，就只收一个农业税，这就好检查。为此，我们最近开了一些座谈会，希望有自告奋勇的省来试点，但大家都觉得这件事情的难度太大了，积极性不是太高。安徽和甘肃的积极性高一点，我们初步想在这两个省试点；其他各省可以指定一两个县市，搞地区性的试点。经过测算，我们设想，各种费用都不收了，将农业税增加到5%。座谈会上大家说不够，要增到7%，附加税再加20%，对

此我们也同意。现在有个问题要研究，就是费用都取消之后，由种地的人来全部负担村、乡镇政府的各种开支，这不公平。这样做，起码有三种人没有考虑进来：一是搞副业、搞农林特产的人，你没有收他们的税，只收农场、农田的税；二是在乡镇企业工作的人，他们的收入已比种地的农民高，却把他们应承担的税款转嫁给种地的人；三是外出打工的人，他们一年汇回去好多钱，都没有缴税，这也不合理。所以，搞试点时应该把这几种情况都考虑进去，不能只收一个种田人的农业税。如果有办法把上述三种人的税收上来，农业税也用不着提高到7%，附加税也不用再加20%。希望这项改革今年在安徽和甘肃试点，取得经验后，明年或后年就能够全面推开。这是保持社会稳定、开拓农村市场、发展农业经济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措施。至于公路“费改税”，全国人大常委会已通过《公路法》修正案，同意将收费改为收税。我们正积极修订改革方案，准备实行，但有一个出台时机的选择问题。

最后要指出，财税工作应该加强管理，加强征管力度，反对偷税、逃税、抗税、骗税、欠税；还必须加强支出管理，进一步强化财政的监督职能。现在什么资金都敢挪用，扶贫经费敢挪用，水利资金敢挪用，粮食的储备资金也敢挪用，把这些钱都挪用去盖大楼，简直是天良丧尽，不严肃处理是不行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在去年12月份通过《刑法》修正案，对隐匿或故意销毁依法应当保存的会计凭证、会计账簿、财务会计报告等，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就是要严格监督，不准造假账，不准销毁会计凭证。今年国有企业加强管理的措施之一是派总会计师，总会计师不受企业一把手指挥。如果总会计师听了一把手的话做假账，将来出了问题，他终身不得在会计部门任职，还得接受刑事处分。严格财政监督制度，才能把国有企业搞好。

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意义重大

(2000年1月22日)

2000年1月19日至22日，国务院西部地区开发领导小组在北京召开西部地区开发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负责同志，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的负责同志。朱镕基同志在会上的讲话，曾发表于《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册，原标题为《统一思想，明确任务，不失时机实施西部地区大开发战略》。编入本书的是讲话的一部分。

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加快中西部地区发展，是党中央根据邓小平同志关于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战略思想，统揽全局、面向新世纪作出的重大决策。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邓小平同志多次深刻论述我国现代化建设“两个大局”的战略思想。“一个大局”，就是沿海地 区要充分利用有利条件加快对外开放，较快地先发展起来，从而带动内地更好地发展，内地要顾全这个大局；“另一个大局”，就是发展到一定的时候，可以设想在本世纪末全国达到小康水平时，就要拿出更多的力量来帮助内地加快发展，沿海地区也要服从这个大局。这“两个大局”的思想，是根据我国各地区条件不同和发展不平衡的实际情况提出来的，是邓小平同志关于我国现代化建设战略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江泽民同志十分重视加快中西部地区发展问题，并明确提出了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1997年8月，他在一份关于西北地区治理水土流失、改善生态环境的调查报告上作出重要批示：对“历史遗留下来的这种恶劣的生态环境，要靠我们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发扬艰苦创业的精神，齐心协力地大抓植树造林，绿化荒漠，建设生态农业去加以根本的改观。经过一代一代人长期地、持续地奋斗，再造一个山川秀美的西北地区，应该是可以实现的”①。1999年以来，江泽民同志又多次提出实施西部大开发，加快中西部地区的发展。他明确指出：实施西部大开发，是全国发展的一个大战略、大思路，是我国下个世纪发展的一个重大战略问题；加快中西部地区发展的条件已经基本具备，

时机已经成熟；在继续加快东部沿海地区发展的同时，必须不失时机地加快中西部地区的发展；从现在起，要作为党和国家一项重大的战略任务，摆到更加突出的位置。在党的十五届四中全会上，他再次强调：实施西部大开发和加快小城镇建设，都是关系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大战略问题，应该提上议事日程，进行全面的调查研究，拿出方案，加紧实施。

---

① 见江泽民《再造一个山川秀美的西北地区》(《江泽民文选》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659～660页)。

世纪之交，我国现代化建设即将全面实现第二步战略目标，并向第三步战略目标迈进。在这个时候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加快中西部地区发展，具有重大的经济意义和政治意义。第一，这有利于逐步缩小地区之间的发展差距，促进各地区共同繁荣、共同富裕。避免两极分化，逐步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本质的要求。没有西部地区的现代化，也就没有全国的现代化。第二，这有利于对整个经济结构实施战略性调整，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西部地区拥有丰富的资源和巨大的市场，发展潜力很大。实施西部大开发，是扩大国内需求，加快我国经济结构调整的重大举措，可以为全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增加新的活力和后劲。第三，这有利于增进民族团结，维护社会稳定和巩固边防。西部地区是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又是边疆地区。国外敌对势力一直利用我国西部地区的民族和宗教问题，搞渗透和分裂活动。加快西部地区的发展，也就是加快民族地区的发展。这些地区经济发展了，人民生活改善了，就能够增强整个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实现国家长治久安。

有的同志提出，现在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条件是否具备、时机是否成熟？对此，应当给予肯定的回答。第一，新中国成立50年特别是改革开放二十几年来，我国综合国力显著增强，全国人民生活接近小康水平，东部沿海地区有了很大的发展。国家有能力加大对西部地区发展的支持力度。特别是当前正在实施扩大内需的积极财政政策，国家可以通过安排建设项目，用更多的财力直接支持西部地区发展，把扩大内需与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结合起来。第二，由于党的农业政策的成功、科技的进步，我国的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明显提高，不仅基本

解决了全国人民的吃饭问题，而且出现了粮食总量阶段性的供过于求。这是在生态脆弱地区有计划、分步骤退耕还林(草)，改善生态环境的大好时机。我们一定要抓住而不能错过这个时机。这样做，既可以改善生态环境，又可以缓解粮食供求的总量矛盾，还能带动经济结构的调整，加快贫困地区农民脱贫致富，一举多得，利国利民。第三，随着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进程的加快，对外开放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西部地区也将像东部沿海地区一样更加开放。这为西部地区引进资金、技术、管理经验和人才，加快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机遇。第四，经过多年的建设，特别是近几年国家用于建设的投资逐步向西部地区倾斜，已经建成或正在建设一批重大基础设施项目，为加快这些地区的发展创造了更好的条件。总之，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加快中西部地区发展，现在是恰逢其时，机遇难得。我们必须充分认识和抓住当前的有利时机，增强历史责任感，坚定不移地贯彻落实党中央的重大战略决策。

有的同志认为，西部地区基础差，投入产出率低，国家对西部地区投入5元的产出效益，不如对沿海地区投入1元的产出效益。这里需要指出，强调投资效益和经济效益是对的，但要全面地、辩证地看待效益问题。一是不能只从单个项目看效益，还要看实际综合效益。就建设一个项目来说，东部地区的成本可能低一些，但现在东部地区产业结构矛盾已经相当突出，国家如果不增加对西部地区的投入，东部地区传统产业的产品，如钢材、水泥、玻璃等就没有市场，哪里还有效益可言？二是不能只看当前效益，还要看长远效益。在西部地区投资，有些是近期就可以有明显效益的，有些是需要一定时间效益才能充分发挥出来。三是不能只看局部效益，还要看整体效益。国家对西部地区增加投资，不仅有利于西部地区的发展，也为全国经济协调发展创造了条件，应当从经济发展全局看效益。四是不能只看经济效益，还要看社会效益。加强西部地区的基础设施和生态环境建设，对改善全国的投资环境和生态环境都是很重要的，有利于促进全国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五是不能只看到西部地区的薄弱环节和不利条件，还要看到它们的优势。比如，有些地方自然和地理条件得天独厚，能源、原材料资源丰富，有些地方也拥有雄厚的科技和人才力量，有不少当地特色产业。在这些有优势的地方投入同样的资金，经济效益不

见得比东部地区差。当然，推进西部地区开发，也要重视提高投入产出效益，合理使用建设资金，用较少的钱办更多的事。

有的同志担心，实施西部大开发会不会影响东部沿海地区经济进一步发展？对这个问题也应作出明确回答：不会的。这是因为，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加快中西部地区发展，不是要改变对东部沿海地区的政策。东部沿海地区仍然要继续发挥自身优势，推进改革开放，加快发展，有条件的地方要率先实现现代化。同时，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加快中西部地区发展，是振兴全国经济的大战略，不仅对中西部地区有利，而且为东部沿海地区提供了更加广阔的市场和更多的投资机会，也是沿海地区经济进一步繁荣和发展的新机遇。还要看到，东部沿海地区支持西部地区，是扬长避短，优势互补，相互促进，共同发展。东部沿海地区可以利用这个机遇，更好地发展和壮大自己。

总之，我们要用全局的观点、战略的观点，从振兴整个国家经济、实现现代化建设宏伟目标的高度，充分认识西部大开发的重大意义，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的战略决策上来，协调步伐，不失时机 地推进西部大开发。

化解和防范金融风险，加强金融管理和监督

(2000年1月25日)

2000年1月25日，朱镕基同志出席全国银行、证券、保险工作会议并发表讲话。参加大会的有全国银行、证券、保险工作会议部分代表，以及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等有关单位的负责同志。朱镕基同志在会上的讲话，曾发表于《金融工作文献选编(1978～2005)》，原标题为《继续推进金融改革和整顿，突出抓好金融管理和监督》。编入本书的是讲话的一部分。

一、抓紧化解和防范金融风险

我们对防范金融风险的极端重要性和长期性、艰巨性，务必保持十分清醒的认识。应当充分利用现在的好时机，积极做好以下一些工作：

(一) 采取切实有力措施，减少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资产，加快减亏增盈。国家将继续逐步补充国有商业银行资本金，制定符合国际通行做法的呆坏账准备金制度。更重要的是，银行自身要努力。一方面，要积极消化已经形成的不良资产，依法加大清欠、回收力度，大力提高收贷率和收息率。另一方面，要努力提高新增贷款质量。国有商业银行在剥离了不良贷款后，从今年起，必须使不良贷款比例不再上升，并做到逐年有所下降。对今年起发放的贷款，要参照国际标准和根据我国实际情况所确定的每类不良贷款控制比例，按季监测，按年考核。国有商业银行要千方百计改善经营，努力减亏增盈，提高经营效益。人民银行要抓紧研究全面考核商业银行的办法，制定一套科学的指标体系，对各个商业银行的经营状况作出正确评价，真正做到奖惩严明。



2000年1月25日，朱镕基在全国银行、证券、保险工作会议上讲话。

这里需要强调，国有商业银行无论如何不能发生挤兑。一旦发生挤兑，各级领导干部都要迅速赶赴现场，发布安民告示，做好工作。应该说，我们现在有足够的实力解决好这类问题。但千万不能因为思想麻痹和工作疏忽，而让挤兑事态扩大，酿成大祸。

(二) 抓紧化解中小金融机构和非银行金融机构的风险。这方面的清理整顿工作绝不可半途而废。对有严重问题的中小金融机构和非银行金融机构，特别是地方的信托投资公司，该撤并的要坚决撤并，该关闭的要坚决关闭。这两年，一些地方对于清理农村合作基金会、处理城市非法金融活动、化解有严重问题的金融机构的风险，已探索了一些好的做法，要认真总结经验。在处理非法的和有严重问题的金融机构过程中，一定要多方面紧密协调配合，做好过细的工作，及早防止

偏差，保持社会稳定。这两年来，整顿地方中小金融机构工作取得了阶段性成果，但各地方进展不平衡，在整顿中存在失之于宽、处理偏轻等问题，有些难点还有待突破。国务院将对进一步清理整顿工作进行具体部署。

人民银行采取发放再贷款的办法，帮助地方化解金融机构的风险，是为解决历史遗留问题而采取的迫不得已的措施，一定要正确加以运用。一是必须专款专用，严禁挪用。例如，用于解决农村合作基金会问题的再贷款，绝不能用在其他方面。如果发现挪用资金的情况，一定要严肃惩处。二是严格控制再贷款的使用范围，把握好时机，避免出现严重挤兑现象。在处理问题时，要根据情况，区别对待。对从事正常金融活动的，要尽可能使群众的合法利益不受损害；对参与非法金融活动的，群众也应依法承担风险损失。三是依法严惩违法犯罪分子。在清理整顿工作中，必须依法彻底查处违法犯罪分子，绝不能让他们趁机“解套”溜掉。涉案人员不论跑到什么地方，都要缉拿归案、依法查办。同时要明确，借给地方的再贷款是要偿还的，期限虽然可以长一点，但要按季付息，按年还本。各地要毫不松懈地做好这方面清理整顿工作，不能有松劲情绪，更不能单纯依赖向人民银行申请再贷款。要抓好清产核资、催收清欠和组织后期兑付资金等工作。

股份制商业银行也要高度重视化解风险。坚决防止和纠正银行股东分光利润、“竭泽而渔”的错误行为，强化银行股东责权利的统一，及时补充银行资本金。人民银行要严格把好设立商业银行的审批关。

(三) 努力办好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切实做好债转股工作。债转股工作既要帮助符合条件的国有重点企业减轻债务负担，促进企业转换经营机制，推动国有企业改革和脱困；又要减少银行不良资产，化解金融风险。有关方面要密切配合，严格执行国家的有关政策。实行债转股的，应该是那些减轻了利息负担就能转亏为盈的企业。这就要求企业产品是有销路的，设备、技术、工艺是先进的，领导班子是比较健全的。如果那个企业产品无市场，扭亏无望，就不能实行债转股。一定要防止形成新的“道德风险”和赖账机制。要完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政策和制度，加强对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监管，建立健全资产回收和经营效益考核制度，争取尽可能多地回收金融资产。

(四) 认真防范证券、保险市场风险和涉外金融风险。要进一步采取措施，彻底解决证券公司挪用客户保证金的问题。严厉查处虚假包装上市和其他“暗箱操作”等严重违法违规问题。进一步改进保险资金运用办法，逐步解决人寿险的利差亏损问题。允许符合条件的股份制保险公司增资扩股或上市。近几年一些地方出现很大的结售汇逆差，很大程度上是进口高报、出口低报和其他逃汇、套汇、骗汇等各种违法违规行为所造成的，这暴露了外汇管理方面存在的问题。要尽快完善外汇管理体制，加强各有关部门之间的合作，建立外汇管理协调机制。要健全规章制度，进一步加强海关与外汇管理部门以及银行之间的电子网络建设，加强对银行结售汇业务真实性的审核。加大对违规外债的查处力度。密切注视和防范国外游资和各种金融衍生产品对我国金融市场的冲击。

二、切实加强金融管理和监督

要继续按照中央既定的部署，把各项金融改革推向前进。银行、证券、保险方面的重要改革措施都已出台，今年要狠抓落实并不断完善。为了把中央确定的各项方针政策和任务真正落到实处，各行各业和各个方面都要突出抓好管理。银行、证券、保险在国民经济中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同时又是高风险行业，尤其应当强化管理和监督，一定要在这方面下大工夫、硬工夫、真工夫。关键是要严字当头，从严治行，从严治市，进一步整顿和规范金融秩序。既要从外部加强管理和监督，又要健全金融机构的内控机制。要按照建立现代金融制度、显著提高金融竞争力和抗风险能力的需要，坚持高标准、严要求，建立严格的制度，实施严格的管理，进行严格的监督，实行严格的奖惩，使整个金融系统的每一个机构和岗位、每一项工作和程序、每一道步骤和环节，都真正体现从严治理的精神，都符合金融法律、法规、规章和纪律。当前，要突出抓好以下几项工作：

一是抓紧成立国有重点金融机构监事会，加强对国有重点金融机构的监管。监事会由国务院派驻，对国务院负责。监事会不代替人民银行、证监会和保监会的职能和作用，而是代表国家对国有金融机构的资产质量及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状况实施监督。监事会以财务监督为核心，对金融机构的财务活动及经营管理行为实施监督，确保国有资产

及其权益不受侵犯。国务院已原则通过《国有重点金融机构监事会暂行条例》，有关方面要抓紧组织实施。

二是银行、证券、保险系统的所有机构，都要加强内控制度建设。特别是要加强和完善信贷、会计、结算、重要凭证和现金管理等方面内控制度和机制的建设，建立健全和严格执行复核制度，真正恢复“铁账本、铁算盘、铁规章”的“三铁”信誉。各金融机构要全面认真地查找管理漏洞和薄弱环节，制定和落实相应措施。人民银行、证监会和保监会都必须把金融监管的重点，放到更有效地指导、推动和监督金融机构加强内控制度建设上来，包括督促和指导金融机构建章立制、严格监督金融机构按照审慎原则和规章制度开展业务、加强和完善对金融机构内控制度落实情况的全面考核。对管理松懈、内控制度不健全或不落实的金融机构，要及时采取警告、限期整顿、停办有关业务和停止审批新的机构等处罚措施。要加强对上市公司和证券机构的有效监管，坚决查处各种扰乱证券、保险市场秩序的行为。进一步加强外汇市场监管，严厉打击各种逃汇、套汇、骗汇的行为。要重视和加强对境外中资金融机构的管理和监督。

三是人民银行、证监会和保监会系统首先要管好自己，实行严格的管理和监督责任制。要加强对金融监管人员的考核，奖惩分明。对责任心不强、缺乏监管能力、严重失察失职的监管人员，要离岗培训或及时撤换。今后金融机构出现问题，不但要依法查处该金融机构有关人员，而且要严肃追究有关监管人员的责任。财政、审计等部门要加强对国有金融企业的财务监督和审计。同时，要充分运用社会中介机构，加大对金融机构的外部监督力度。

四是大力整饬社会信用，严肃结算纪律。银行要依法催收到期贷款本息，依法维护金融债权。对各种逃废银行债务的行为，要坚决抵制和防范，并予以曝光。现在仍然有不少企业多头开户，逃废银行债务，逃避银行信贷监督，一定要进一步清理和规范账户管理。

加强金融管理和监督，最重要的是，要以对党和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敢于坚持原则，动真格的，不怕得罪人。要坚决反对庸俗作风、好人主义，严肃查处各种违法违规案件和人员。要通过强化管理和监督，明显提高我国金融系统的整体素质和经营管理水平。

在国务院第五次全体会议上的讲活

(2000年1月26日)

2000年1月26日，朱镕基同志主持召开国务院第五次全体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国务院全体会议组成人员，有关部门、单位的负责同志列席了会议。这是朱镕基同志在会上讲话的主要部分。

一、严字当头，把工作着重点放到加强管理上来

前不久召开的国务院第56次总理办公会议确定，今年各部门、各单位都要把工作重点放到加强管理上来。这里说的管理，包括加强监督和进行整顿。不仅企业要加强管理，工业、农业、财税、金融、贸易、科技、教育、文化、卫生等各行各业都要加强管理。政府机关更要突出抓好管理，进一步转换职能，转变工作方式和作风，大力提高服务水平和工作效率。总之，各部门、各单位必须在加强科学管理上下大工夫、真工夫、硬工夫，向管理要效率、要质量、要效益，通过加强管理，切实贯彻落实中央的方针政策和各项改革措施，促进经济和社会事业健康发展。

应当充分认识到，全面加强管理是当务之急。这是因为现在在生产、建设、流通以及其他各个领域，普遍存在着管理松懈、纪律松弛、制度形同虚设、工作秩序混乱的现象，严重影响到中央方针政策的贯彻落实，阻碍着各项改革的顺利推进，已到非下决心整治不可的时候了。更要看到，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对外开放将进入新的阶段，我们面临着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环境，如果不在管理上高标准、严要求，就难以提高我国经济的竞争力和抗风险能力。也就是说，无论是认真贯彻落实既定的方针、政策和措施，还是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我们都必须狠抓管理，并且尽快取得明显成效。

根据大家讨论中提出的意见和建议，今年需要突出地抓好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切实加强企业的科学管理。我在几年前讲过，我国国有企业的改革和发展没有轻巧的道路可走，只能眼睛向内，从严治企，老老

实实地改善和加强经营管理，建立一套现代企业制度，实现改革和脱困的目标，否则就无法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企业管理要重点抓好以财务成本管理和质量管理为中心的各项管理。在推进政企分开的同时，抓紧做好国有大中型企业监事会和总会计师的委派工作，切实加强对国有企业的监管。要进一步整顿企业领导班子，特别要选择一些德才兼备的年轻干部充实到企业领导班子里面去。最近，重大安全事故时有发生，根子也在管理不严。必须高度重视和切实加强安全生产管理，及时消除各种事故隐患。

第二，突出抓好财经管理，严肃财税和金融纪律。要坚持依法治税，维护税法的统一性和权威性。要加强预算外资金管理，认真实行执收执罚部门“收支两条线”的规定。要继续清理和整顿各种名目的乱收费、乱罚款、乱摊派，特别是要清理整顿农村、企业、教育等方面的“三乱”。要切实加强金融机构的外部监管和内部监控。国有大中型企业和重点金融机构设立监事会的工作要抓紧进行，监事会由国务院统一派驻，对国务院负责，并代表国家对国有金融机构的资产质量及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状况实施监督。人民银行要抓紧研究全面考核商业银行的办法，制定一套科学的指标体系，对各个商业银行的经营状况作出正确评价，以真正落实责任制，做到奖惩严明。要大力整饬社会信用，严格结算纪律。认真清理和整顿经济鉴证类社会中介机构，切实解决乱办、乱管、乱执业等突出问题。要更好地发挥行政监察和审计部门的监督作用。



2000年1月26日，朱镕基主持召开国务院第五次全体会议并讲话。右一为国务委员司马义·艾买提，右二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罗干，右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温家宝，右四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

第三，进一步整顿、规范流通秩序和建筑领域秩序，强化市场监管。要依法严厉打击制售假冒伪劣商品、走私贩私和其他商业欺诈等违法活动。要坚决制止各种分割、封锁市场的地方保护主义和不正当竞争行为。现在，建筑领域的问题相当严重，非大力整顿不可。要健全和规范有形建筑市场，严肃查处建设单位规避招标或搞假招标的行为，坚决制止勘察、设计、施工、监理等单位转包工程和违法分包的做法。今年要在整顿建筑市场方面取得明显成效。要加强对建设工程全方位、全过程的监督管理，确保建设工程质量，建设单位和勘察、设计、施工、工程监理等各单位都要对建设工程质量负责，对违反工程质量规定的，必须坚决依法惩处。

第四，各行各业、各单位都要大力整章建制，标本兼治，建立健全严格的责任制。不以规矩，无以成方圆。必须做到有章可循、有章必循、违章必究。这样，各项管理也才能落到实处。加强管理，最重要的是要以对党和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敢于坚持原则，敢于碰硬，坚决反对庸俗作风、好人主义。否则，加强管理就只会成为一句空话。

二、进一步加强廉政建设，深入开展反腐败斗争

江泽民同志前不久在中纪委全体会议上发表了重要讲话，强调“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国务院各部门、各单位一定要认真贯彻中纪委这次会议和江泽民同志重要讲话的精神，把加强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作为从严治政的一项重要内容。春节以后，国务院将专门召开廉政工作会议进行具体部署，这里着重强调以下几点：

第一，切实把反腐倡廉作为政府工作的重要任务。加强廉政建设，惩治腐败，事关国家兴衰。本届政府一开始就提出了建设廉洁、勤政、务实、高效政府的要求。廉洁是第一位的，首先是廉政，其次才是勤政，没有这两点，就根本对不起人民。没有廉政，也就谈不上勤政、务实、高效。今年要加大工作力度，全面贯彻《廉政准则》①，继续执行“约法三章”②和“五条要求”③。我们的政府是人民的政府，人民政府的根本职责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廉洁从政是最起码的要求。古人早就说过：“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④各级政府机关和每个工作人员，都要做到清正廉明，恪尽职守，不辜负人民的殷切期望。

---

① 《廉政准则》，指中共中央于1997年3月28日印发的《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试行)》。

② “约法三章”，指朱镕基同志在1998年3月24日国务院第一次全体会议上提出的“约法三章”，见《在国务院第一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本卷)。

③ “五条要求”，指朱镕基同志在1998年3月24日国务院第一次全体会议上提出的“五条要求”，见《在国务院第一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本卷)。

④ 见《论语·颜渊》。原文是："季康子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

第二，坚持突出重点，务求实效。各部门、各单位都要抓紧反腐倡廉。特别是财税、金融、证券、房地产、土地批租、物资采购、审批项目、进出口配额和医药制售等管理方面，更要加大工作力度。这些都是腐败现象发生频率较高的地方，群众的意见很大，必须作为重点领域来抓。对群众反映强烈、确有问题的，必须一个一个地揭露出来，一个一个地严肃查处。要抓紧查处大案要案，特别要坚决查处内外勾结作案、诈骗、走私、偷税、骗汇等违法犯罪活动，对腐败分子要严惩不贷。

第三，国务院组成人员和各部门的领导干部，要做出表率。"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①自身不正，谁会听你的？所以，各级领导干部要做到高风亮节，廉洁自持，带头遵纪守法，抵制腐败现象；同时，要管好自己的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

---

① 见《论语·子路》。

反腐倡廉也必须从严格加强管理抓起。腐败现象之所以屡禁不止，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有些部门、单位对干部失于教育、失于管理、失于监督。必须进一步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强化监督制约机制，严格执行各项规章制度，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

三、大兴勤俭节约之风，反对奢侈浪费

各级政府机关和工作人员特别是领导干部，都要有忧患意识和勤俭观念，时刻把国家利益和人民群众的疾苦放在心上。一些机关、单位不顾中央三令五申，还在违反规定扩建、新建办公大楼和其他楼堂馆所，并且进行豪华装修；还在用公款请客送礼，大吃大喝；还在用公款旅游；等等。这些行为已引起人民群众强烈不满，必须采取切实措施，坚决加以制止。挥霍浪费国家资财是一种犯罪行为，要抓住典型，严肃处理，公开曝光。

要大力精简会议和文件。前几天，国务院征求各部门对今年政府工作的意见和建议时，反映比较多的问题就是各种会议太多、文件太

多。这个问题确实需要认真对待。国务院办公厅要认真研究精简会议的问题，要立个规矩：今后各部门能不开的会议坚决不开，部署工作要尽量利用现代通信和传播工具；不得召开没有准备、没有明确主题、不解决实际问题的会议；必须召开的会议，也要尽量缩短时间、减少与会人员。国务院办公厅和各部门要严格把关。这里重申，国务院领导同志今后原则上不参加部门召开的会议，也不给部门的会议写信、作批示，希望大家共同遵守。今后国务院开会，尽可能少请部门的同志参加，使大家可以省出时间来研究、思考和解决实际问题。

农业结构调整必须贯彻“三为”

(2000年2月12日)

2000年2月12日，新华通讯社《国内动态清样》第77期《部分干部对农业结构调整有“三种担心”》一文反映，中共中央提出做好2000年的农业和农村经济工作关键是抓好农业和农村经济的战略性调整。有的农业干部对此存在一些顾虑：一是担心农业基础地位受削弱；二是担心农民受折腾；三是担心资金、政策不落实，结构调整成空话。这是朱镕基同志在此文上的批语。

请陈耀邦①、段应碧①同志阅。农业结构调整必须以市场为依归，政策为导向，农民意愿为归宿，行政命令是不行的。

朱镕基

2.12

① 陈耀邦，当时任农业部部长。段应碧，当时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

让优秀文化艺术世代相传

(2000年2月13日)

这是朱镕基同志在听取文化部部长孙家正工作汇报时的谈话。

中华民族有着悠久的、灿烂的文明，我们要十分珍惜和爱护。比如四川的三星堆文化遗址，我去看过，真是赞叹不已。对这些文物要切实保护好、管理好。这不但是对人民群众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课堂，也可以成为展示中华文明的文化中心和旅游中心；既会有很高的社会效益，又会有很高的经济效益。总之，文物工作很重要，一定要把它做好。

目前，我们正在研究编制“十五”计划，要对未来五年或者更长一段时间的国民经济和社会的全面发展做出规划，其中就包括了文化事业建设。很多人参观了埃及的博物馆，都赞叹不已。我们国内有些博物馆也办得很好，如陕西历史博物馆、上海博物馆，虽然规模不算很大，但很有自己的特色。我国文物很多，要有地方集中展示出来。现有的中国历史博物馆、中国革命博物馆、故宫博物院还不够，还要考虑建一个能够展示我们五千年灿烂文明的国家博物馆。这件事在本届政府任期内要做好准备工作。一定要招标聘请世界一流的设计师(包括中国人)来设计。我们已经着手建造国家大剧院，而建造国家博物馆，在某种意义上讲，有其更重要的意义。



1999年12月30日，江泽民、朱镕基、李瑞环、胡锦涛、尉健行等中央领导同志在北京中南海怀仁堂观看新年京剧晚会后与演员合影。前排左二为刘长瑜，左四为李维康，右二为叶少兰，右四为耿其昌。

现在，音像制品走私、盗版很严重，打击仍嫌不力。有关部门要密切配合，集中力量打击走私、盗版。同时，要形成强大的舆论，向世界表明我国在保护知识产权方面的立场和态度；否则，对国家的形象很不利，对扭转社会风气很不利。很多黄色的、低级下流的东西是通过走私、盗版进来的，不能让这些东西毒害社会风气，影响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有些人认为盗版可以节省引进国外科学技术的费用，这是一种短视行为。不保护知识产权的国家，不可能有知识的创新。

要下决心促进各种艺术门类的繁荣，不要再一窝蜂地搞综艺晚会了。一些大杂烩式的综艺晚会，形式是从外面传进来的，带有很浓的商业色彩，我们不要去效仿。春节前，中央政治局常委观看了解放军总政治部组织的晚会，一改歌伴舞、舞伴歌的流行做法，唱歌时一般

不伴舞，跳舞时一般不唱歌，给人以欣赏艺术的空间。当然，歌舞结合也是一种表演形式，不是不好，但是不宜流于时尚，何必逢歌必舞呢？若说不足，就是有时台上的演员偏多，令人目不暇接，精彩的艺术湮没在人群中了。当然也并不是说，综艺晚会一概都不能搞，如去年国庆50周年，搞一点大型晚会也是必要的，能够形成热烈的气氛。现在的问题是综艺晚会太多太滥了。老演员受到观众的热烈欢迎，但也不能总是老面孔，艺术要创新，要不断地推出新人。

我们仍处于艰苦奋斗的建设时期，文化艺术应该激励人民为国家的富强、民族的振兴，同心同德地艰苦奋斗。文艺活动本身也要体现勤俭节约精神，提倡清新简朴的风格，反对讲排场、比奢华的风气。现在有些社会风气不健康，老百姓对这种腐败现象深恶痛绝。你们一定要把各种艺术门类真正繁荣起来，引导、鼓励文艺工作者创作更多充满真情的优秀作品，反映时代精神，传递高尚情操，扭转社会风气，振奋人民精神。如对电视连续剧《渴望》、《孽债》，虽有不同的评价，但它们反映了那个年代的社会矛盾，刻画了一些典型人物，激发观众的真情，确实很有感染力。

文化工作不仅要重视专业艺术创作，还要关心群众的文化生活，眼光不能老是集中在城市，要关心农村，关心农民的生活。农村电影放映队很重要，农民欢迎，应该办好。电影发行、放映均在文化系统，文化部门与广电部门要密切配合做好这方面工作。总之，一定要使基层群众的文化生活丰富起来，精神振奋起来，充满理想和热情地去建设自己的新生活。

关于这两年对外文化交流的总体思路，我是赞成的。既要引进一些高水平的文化艺术，让人们了解世界优秀文化；同时，也要花大力气繁荣我们自己的民族艺术，把我们民族真正优秀的东西介绍给世界。如京剧，要把京剧的经典剧目和优秀唱腔介绍到国外，不能老是演《三岔口》，更不要使外国人误以为京剧像杂耍和杂技。艺术当然要创新，要有新的表现手段，要利用高新技术手段和多姿多彩的舞台效果来丰富艺术的表现力，但千万不能丢掉优秀传统。京剧也要创新，否则青年人很难接受。但改动太大就不是京剧了，比如京剧不用京胡而用交响乐伴奏，就不大像京剧。京剧要重视唱腔，特别是一些中老

年的观众，喜欢听京剧的唱腔，所以人们常说听京剧而不是看京剧。把民族艺术好的传统、好的特色保留下来，这与创新是不矛盾的。



1996年9月1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乔石，朱镕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丁关根(第一排左二)，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王光英(第一排右二)，全国政协原副主席谷牧(第一排右一)观看京剧名家名段演唱会后与演员合影。第一排左一为李世济，左三为袁世海，左五为张君秋，右三为吴素秋；第二排从左至右依次为：景荣庆、马长礼、杜近芳、梅葆玖、谭元寿、尚长荣、张学津、刘长瑜、叶少兰、孙疏敏、李崇善；第三排左一为赵葆秀，左二为王晶华，左三为杨秋玲，左四为冯志孝，左五为杨春霞，左七为于魁智，左八为孟广禄。

要把优秀传统文化向青少年推广，例如，学一点古文，读一点古诗词，对于了解历史、增长知识、提高修养，很有好处。中国的成语典故，言简意赅，意味深长，准确、鲜明、生动，充分反映出我们民族语言的优美，对青少年这方面的教育应该加强。如果不注意继承和发扬民族文化传统，那么，赖以维系中华民族五千年的精神纽带和凝聚力就会被削弱了。

国家级院团要下大力气办好，财政上要拿出一点钱来，每年拿2000万元支持艺术创作，支持优秀作品，支持民族文化精粹，把这个钱花好是值得的。如果不搞那些综艺晚会，也可以把钱省下来，支持真正的艺术创作。要帮助艺术院团适当改善条件，同时鼓励它们大胆改革，走向市场。这方面，国务院是支持你们的。

对老艺术家要关心爱护。艺术家和科学家都是国家、民族十分宝贵的财富。要发挥他们传帮带的作用，让优秀的文化艺术世代相传；同时，要对他们的生活给予适当的照顾，对各类老艺术家给予适当补贴，此事由文化部拟订具体方案。文化建设很重要，文化事业经费原本就不多，增加一点钱是应该的，我原则上赞成，可以按程序申报。

对政策研究工作的几点要求

(2000年2月13日)

这是朱镕基同志在看望国务院研究室全体工作人员，并与他们座谈时的讲话。

我今天来看望大家，给同志们拜个年，希望大家在新的一年里取得更好的成绩；同时，也通过你们，向你们的家人拜年，转达我的问候。你们的家属都很支持你们的工作，平时多承担了一份家务，确实辛苦一点、累一点。这是一种贡献，也是一种奉献。我除了对他们表示感谢外，更希望他们能更多地理解、谅解和支持你们的工作。

过去一年，同志们做了大量的工作，完成了大量的文稿起草任务。每一篇讲话、每一份文稿，你們都是很认真起草，一级一级地审核。每当看到你们起草的那么厚一本文稿，我就感到你们要付出多大的劳动啊！我刚才看到你们办公室里都摆着床，就体会到你们的生活是很不规律的，经常加班加点。你们工作非常辛苦，完成了国务院领导交办的各项任务，作出了应有的贡献。在这里，我代表国务院向你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下面，我对大家提几点希望和要求：

第一，思想要新，要赶得上时代的潮流。要多看东西，拓宽信息渠道。我平时非常注意多看东西，不管是外国的新闻，还是各方面的报纸、材料都要看。我最希望的是文稿中有新思想、新见解、新材料，因为对一般性的问题我都能够想得到，我脑子里面都有数，我需要的是新观点、新见解。你们提供的那些新的东西，我都是吸收的。我很赞成加强信息网络建设，这是非常重要的。我建议大家都要上网，对信息非常灵敏，注意学习，开拓思路。希望你们帮助我收集各方面的信息，用新的思想、新的观点来研究新的问题和新的情况。

第二，要加强自己的语言文字修养。大家要注意学习一些中国语言文字的基础知识。我在家里跟孩子们说话有时喜欢用成语。他们说，我们现在还勉强听得懂，因为小时候受过熏陶，读过一点古文、古诗

词，可是再过几年，就没有人听得懂您的话了。不要把语言文字看成是次要的东西，语言文字是维系一个民族存在和发展的重要手段。中华民族有丰富的文化遗产，应该一代一代传下去，这特别需要加强语言文字方面的修养，没有这方面的修养就写不出好文章。写文稿不仅要把问题提高到理论的高度，而且要有文采，这一点我对大家寄予很大的希望。当然，也不是只靠一个人就能做到的，要靠大家集体创作，才能够把它提到更高的水准。在这方面，我对大家的要求很高，但我相信这对大家有好处，有压力就更有利于提高。



2000年2月13日，朱镕基与国务院研究室工作人员座谈。前排右一为国务院研究室主任桂世镛，右三为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王忠禹，右四为国务院研究室副主任魏礼群。

第三，要紧密围绕本届政府工作和当前急需解决的问题，多思考和研究一些重大问题。例如，今天上午，我同孙家正①同志谈了加强文化市场管理和文化设施建设问题。当前，盗版问题严重，必须加大打击力度，切实加以解决。可是有的人却认为盗版对我们有好处，不盗版就要花很多钱去买专利。这是非常短视的。通过盗版进来的东西并

不见得是好的东西，很多是坏的东西。好的东西不花钱去买，自己没有知识产权，国家是不可能兴旺发达起来的。这件事情现在宣传 得还很不够。要大力宣传，把保护知识产权作为一项国策。当然，任何一个国家也难以完全消灭盗版问题，但是政府必须有明确的态度，严厉打击盗版行为，切实加强文化市场管理，促进文化事业健康发展。同时，要搞好重要的文化设施建设。我国是一个有五千年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但我们的博物馆建设还不如埃及，更谈不上与巴黎相比。五千年的中华文明史值得我们骄傲啊！应该展现出来，以此教育我们的后代，树立爱国主义情操和历史使命感。本届政府要作出决策，修建一个国家博物馆。这是一件必须办好的事情。

---

① 孙家正，当时任文化部部长。

在改革方面，国有企业改革必须进一步深化。党的十五大提出，要积极探索公有制的多种有效实现形式。这需要进一步贯彻落实。国有大中型企业尤其是优势企业，宜于实行股份制的要通过规范上市等形式，改为股份制企业，其中重要的行业和企业由国家控股，其他不一定都要国家控股。为此要大力发展股票市场。现在的股票市场还很不规范，老百姓对它没有信心。因此，在通过发行股票集资方面要做极大的努力。企业要上市，首先要盈利，现在很多国有企业都亏损，它们怎么上市？这就要进行企业重组，把一部分不良资产划出来，因为这是历史原因形成的。通过重组，把包袱卸下来，使企业变成盈利，就可以上市。但卸下来的包袱怎么解决昵？那就要建立社会保障体系。建立社会保障体系的资金从哪儿来呢？包括从股票交易中收税，或者是减持部分国有股份等，从这些钱里拿出来一部分来补充社会保障体系所需的资金，把那些下岗、分流的人养起来，并帮助他们再就业。今后三年必须解决这个问题，否则，国有企业改革是很难深化的。

对国有企业特别是重要行业的国有企业，要实行严格监管。办法一个是由国务院向国有企业派出监事会，另一个是由国家指定总会计师。这样，才能真正地对国有企业实行有效的监督。党的十五届四中全会在这些方面作了一些规定，确定了一些原则，但如何具体地实行，还有一定的困难，需要进一步研究和落实。对每一个商业银行，

国家都应派出监事会。从这一任开始，对每一任行长都要进行考核。现行的商业银行考核体系是极不科学的，一定要建立一个完善、科学的考核体系。如果银行的不良贷款的比例还在连续上升，亏损还在增加，行长就得换人，不能让一个行长在连续亏损的情况下还一届两届当下去。不然，这还叫什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啊？还有什么监管啊？这是不行的。这些基本制度都要逐步建立健全起来。

税收制度也要改革。增值税税制要进一步完善，防止偷税漏税。银行和税务部门应该联合起来，建立和推行存款实名制度，使银行掌握是谁存的钱，才能避免偷税漏税，才能实行利息税的累进税制，税收才会有很大的增加。信用卡必须实行全国联网。不然，这个银行发的卡，在那个银行用不了，信用卡就没法全面推行。

还有其他急需解决的问题，希望大家多做深入的调查研究，提出有情况、有分析、有观点的建议来。

同志们，你们的工作是很光荣的，也是很繁重的。希望你们在新的一年里，再接再厉，加强学习，改进自己的工作，提高工作效率和水平，把国务院研究室的工作做得更好。

发挥好信访工作的三个作用

(2000年2月13日)

这是朱镕基同志看望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信访局工作人员时，在处级以上干部座谈会上讲话的主要部分。

过去一年，信访局的同志们没有辜负党中央和国务院的信任，非常努力，工作很出色，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全年共收到人民来信48万多件，都做了处理，其中很多都给予了回复。这对党中央、国务院的工作是很大的推进。所以，我上次在你们的文件上批了几句话："信访局任务繁重，工作辛苦，办事得力，成绩很大，特表慰问和感谢!"

今天我还要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中央已经批准，你们局升格为副部级单位，名字改为"国家信访局"。这也是对同志们工作的一种肯定。向大家表示祝贺！

党中央、国务院对信访工作非常重视，当然，这也是我们党的一贯传统。信访工作起什么作用呢？我归纳为以下三点：

第一，信访工作是民意的"寒暑表"。通过人民来信来访可以看出，我们党和国家的政策产生了什么样的效果、人民群众有什么反应，工作做得好做得坏都有人在评判。我记得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有的同志讲，现在人民群众意见最大的是经济问题，如下岗职工、离退休职工的养老金等等。我当时就根据你们的分析说，情况已经发生了变化，第一位的是干部作风，特别是农村干部的作风问题，下岗职工、离退休职工的养老金等经济问题已经退居第二位。"寒暑表"的升降，说明我们对离退休职工养老金、职工下岗等问题已经采取了一些措施，产生了效果，所以这方面的反映就少了些。它曾经是第一位的问题，但是如果还停留在老概念上，就可能没有看到当前干部作风问题很严重、危害很大。刚才我看你们对来信来访的分类，第一类是农村干部作风问题；第二类是下岗职工、离退休职工等经济问题；第三类是治安问题；第四类是社会各方面和政府的不正之风问题，这也是个作风问题。第四类和第一类加起来，占了绝对多数。原来我记得是经济问

题居第一位，约占三分之一，现在它已经下降了。当然，我没有认为经济问题不重要的意思，它还是很重要的，也还是老百姓关心的一个重大问题。我们这方面的工作做得还不够，还要继续努力。我们就是要根据人民群众对我们的政策产生效果的一些反映，来评估我们自己的政策。看民意，就要听真正的民意，不要去听那些基层干部给你歌功颂德。人民来信来访可以不同程度地真实反映人民群众的意见，当然有的时候可能讲得过火一点，有的时候也不完全是事实，但总的说起了个“寒暑表”的作用。



2000年2月13日，朱镕基看望中办、国办信访局干部职工。左三为中办主任王刚，左五为国务院副秘书长崔占福，右一为中办、国办信访局局长周占顺。

第二，信访工作是政策的“调节器”。例如你们刚才讲的粮食收购体制问题，说老实话，我很重视这个问题。这几年我反复地思考，做了很多调查。农业从来都是一个最重大的问题，大家议论最多的是粮食收购体制，很多人提出过不同意见。我认为，如果把粮食收购完全放开，在当前粮食供过于求的情况下，农民的利益根本不能得到保证。

当然，粮食统一收购不可避免地会带来补贴增加、吃“大锅饭”思想上升，导致没有竞争。但是，实践证明这种补贴是必要的，因为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始终是存在的，就是要对农民给予补贴嘛。如果不采用这种办法而采用别的办法，就不能保证粮价不下降；粮价一下降，农民利益都要受到损失，种田积极性就降低了。如果放开收购，就等于不收购，谁去收购啊？粮食这么便宜，无利可图嘛。这种带倾向性的问题，你们反映了以后，我们马上就警惕起来，采取措施，调节政策的松紧度。就好像高压锅炉，里面气太足的时候，从压力表一看快要爆炸了，那个调节阀门的弹簧一压缩，气马上就冒出去了，锅炉就减压了，不至于爆炸了。我们的政策力度是太大了还是太轻了，都要直接听人民群众反映的意见。如果完全相信干部一层一层的上报、汇报，那是不可靠的。通过人民来信来访来检验我们的政策正确与否，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渠道，它起了个政策“调节器”的作用。它告诉我们，政策不能绷得太紧，也不能太松，要适度。

第三，信访工作是我们与人民群众联系的“民意窗”。我们通过这个窗口接近群众，听取群众意见，也为他们申冤。群众往往投诉无门，我们不开这个窗口怎么行啊？“民意窗”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民主渠道，它一方面说明我们工作中的问题越来越多，另一方面说明群众敢说话、敢来揭露问题了，因为我们过去帮他们解决了一些问题。特别是人民群众的积极建议越来越多，更增强了我们的信心。

现在，我上下班的路上常常遇到“拦轿喊冤”的事。有一次很危险，从这边跑过来一个人，我的司机一转方向盘避开了他。这时从另一边又跑出来一个人，差一点儿把他撞倒。后来，我就对司机讲，遇到这种情况你就停车，接他的“状子”嘛。没有什么可害怕的。包公还接“状子”呢，何况我们还是共产党员哩！

因为发生过这种情况，警卫系统就加布了岗哨，又是武警、又是交警，还有便衣，三步一岗，五步一哨，车还没有到就提前封了路，这样造成人民群众很大的不方便。很多同志提出来，这是扰民啊，在群众中的影响是很不好的。所以，我下定决心，一定不要封路。但是公安警卫系统不同意，说这都有规定的，他们做不了主。后来，我亲自到公安分局，同公安、武警、交通管理等人员开会。我说，同志们，你们负责保卫中央领导同志的安全，工作是很辛苦的。你们非常有责

任感，做法也是正确的，但你们也要考虑我是总理，我不能够老扰民啊！老封锁街道是不行的。对告状的人，你们不要怕。告状的人一拦，我就停车，但我不打开车门，安全没有问题。后边警卫车过来，把他的告状信接下，我再走。我说通过这个事情表现一下我们亲民的作风嘛！老百姓有冤屈，好办，我停车了，我接你的信，回去批。我还讲过几次，对待这些“拦轿喊冤”的人，一定不要打他们，不要推他们，他们是人民群众，要礼貌地对待；另外，他们的状子一定要交给我批。凡是“拦轿喊冤”的人的告状信，我都作了批示。后来有人对我说，你老是批，批了又见效，这样拦车的人就会越来越多。我说，越多就越多嘛。别的事我办不了，批几个字总还可以吧。就怕批了这几个字下去，人家也不当回事。如果我批下去真正起到了作用，为老百姓，哪怕是为个别的老百姓办了一件好事，也算是我的一点贡献吧。现在问题很多，完全解决是不可能的。解决一件算一件。如果这成了一种作风，代代相传，我相信法治还是有希望的。

我这次来，不仅是向同志们道个辛苦，表个慰问，表示一下我心底里对同志们的感激；还希望能够使各级党委和政府的领导都来重视信访工作，都来做信访工作，都像党中央、国务院一样重视人民群众的来信和来访。这样，我们就能够逐步地、比较好地走上法治的道路。信访工作是我们联系群众的纽带，是发扬民主、了解民意的一个窗口，我们要十分重视。要保证我们的政权不变色，保证我们的党始终与人民群众联系在一起，没有信访这个渠道是不行的。所以，我希望同志们在机构升格、信访工作的地位提高以后，更加热爱这个工作，把这个工作做得更好。我去年来了，今年又来了，明年还想来听你们的意见。

海关要重振雄风

(2000年2月20日)

2000年2月20日至23日，海关总署在北京召开全国海关关长会议。这是朱镕基同志与会议部分代表座谈时的讲话。

现在海关总署正在召开全国海关关长会议。本来部门召开的工作会议，我们国务院的领导同志是不参加的，这是我们的规定。但是，考虑到海关目前所面临的形势，暴露了海关在打击走私方面的一些重大问题，社会舆论和各方面有许多看法，面临着如何继续鼓足干劲建设好海关这样一个非常艰巨的任务。所以，今天，国务院的领导同志采取座谈会的形式，和同志们谈谈心，是想向大家表明：国务院是信任你们的，是肯定你们的工作成绩的，是正确评价你们工作中的缺点的。我们希望你们重振雄风，再创新高，把海关工作搞得更好，完成把守国门的任务。



2000年2月20日，朱镕基在北京中南海与出席全国海关关长会议的部分代表座谈时发表讲话。右一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右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罗干，右四为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王忠禹。

我想讲四点意见。

第一点，1998年以前，走私活动越来越猖獗，直接地影响了国民经济的发展，造成了重大的损失。据估计，直接损失每年可能有几千亿元人民币。1998年上半年，对外贸易的顺差为435亿美元，但是真正结汇拿回来的只有47亿美元，差不多有300多亿美元流失了。也可能不一定流失这么多，因为有虚报出口的因素，但是大量骗取了出口退税。下半年大张旗鼓打击走私，情况就有很大的好转。这可以从1999年的情况来反证，1999年的贸易顺差为293亿美元，实际结汇达到235亿美元，两个数字比较接近了。这说明打击走私的成绩是很大的，同时也说明以前的问题是非常严重的，白白地流失了上千亿甚至几千亿元人民币的国有资产。这个计算方法对不对，希望你们总结经验时好好研究一下。记得1995年，江泽民同志叫我同谢非同志、朱森林①同志谈过一次话。当时，我们进行了外汇大检查，我们原来的印象里广东是创汇大省，但外汇大检查表明，广东实际上是一个用汇大省，半年时间外汇逆差达到55亿美元之多，不但没有创汇，还把国家的外汇套走了。我说了这个问题以后，他们两位都表示很震惊，但是他们又说，海关是中央管的，外汇管理局也是中央管的，我们没有办法。如果中央不严厉打击走私，地方确实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1996年、1997年，问题越来越严重。经过1998年严厉打击走私，1999年广东省就有60亿美元的顺差了。这是一个很大的变化。从过去近60亿美元的逆差，变成60亿美元顺差，可以看出打击走私的重要性。

---

① 朱森林，当时任广东省省长。

从现在揭发出来的问题看，更严重的是已经形成了一条走私的链条，或者说一张走私的网络。在这个网络或链条上面，只要有一个环节坚持原则，走私就走不成。但是从湛江、厦门的情况看，问题的严重性在于，这个链条上的每一个环节都被走私分子打通了，都有人掉

进去了，以致走私通行无阻。这是很可怕的。走私货物进来，先要经过运输环节和港务理货，这是交通部门的事。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关口啊，一条船上明明装了1万吨钢材，他报成1000吨，这不就是走私吗？！然后是商检。商检原来由外经贸部管，现在归海关管。海关的“三检”人员被买通了，一上船，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过去了。下面到税务部门，要有增值税发票，发票是造假的！再到中国银行去骗汇。外汇管理局不是一个必经的环节，情况稍微好一点，也不一定没有问题。最后是到工商部门，开的是假发票。在整个链条上如果有一个环节、有一个好人，就打不通。如果链条上面都有坏人，就会全给打通了。这是一个很深刻的教训，是很典型的腐败，我们要很好地警惕呀！

这个腐败的面有多大呢？相当的大。从出问题的湛江、厦门这些关口来看，大约百分之二十几的人陷进去了，而且确实造成了重大的损失，这还不值得我们海关的同志们警惕吗？我们要看到问题的严重性，要正确地对待，吸取教训。如果再不打击、不治理，就像江泽民总书记讲的会亡党亡国。

第二点，党中央、国务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打击走私腐败犯罪活动。特别是在1998年，我们看到问题越来越严重，因此，党中央、国务院在北京召开了全国打击走私工作会议。7月13日，第一天上午，江泽民总书记作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讲话。他很激动地指出，打击走私的斗争，不仅是重大的经济斗争，而且是严肃的政治斗争。他要求我们决心要大、行动要快、措施要硬、惩治要严，依法打击走私、腐败等犯罪活动。他还特别强调，军队、武警部队、政法机关必须一律停止一切经商活动。当天下午，吴仪同志在会议上讲话。7月15日下午会议结束时，我去讲了话。在党中央、国务院强有力的领导和组织下，全国打击走私活动的斗争迅速开展起来了。当时我形容打击走私斗争的形势是“势如破竹”，接连地把一个个案子揭露了出来。统一指挥，联合作战，工作很得力，哪一点问题都不放过，凡是违法犯罪的人，都抓了起来。要是没有那一次“廉政风暴”，今天的问题不知道会严重到什么地步，我们在经济上也不可能取得这样好的成绩。去年一年海关的税收就增加了711亿元，差不多增加了一倍。这是对财政增收和经济发展的极大支持。

所以，我们应该全面、正确地看待这个问题：第一，我们揭露出海关的问题是很严重的，这个链条上各个环节揭露出的问题也是很严重的。第二，海关在严重的问题面前，坚持工作，坚持斗争，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对这一点也必须充分肯定。我们全力以赴地把案件查清楚了，把罪犯抓出来了，说明海关队伍的主流是好的。你们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下，坚持工作，把税收上来，这是了不起的。要从这两个方面来看，辩证地来看。要把思想上的压力，变成继续搞好我们海关工作的动力。

第三点，要继续查办海关的大案要案，彻底粉碎走私网和走私链，毫不留情，绝不松懈。大家一定不能松劲！问题还会有，更大的问题还可能发生。务必请各位关长把这一点当做当前的首要任务。一定要查到底，这是一个关系到国家和民族生死存亡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如果我们放松的话，后患无穷呀！大家不要抬不起头，不要没劲啊！应该站起来，站得坚挺一点，振奋精神，理直气壮，坚决把那些大案要案查下去。

为了把这项工作做好，我们要争取大多数，集中力量打击主犯，把主犯的问题查得清清楚楚。对于从犯，要讲政策。如果他彻底坦白交代，应该减轻处分；如果他不但彻底坦白，还揭发了别人，就是立了功，可以免予处分。有的人是初犯，如有的关长，在黑白两道的威逼利诱之下犯了错误，这当然是不应该的。但也要分析当时特定的历史环境和条件，在他有悔过、立功表现的时候，就立即解脱他。我想这一点我们要注意，不要什么人都怀疑，把自己的圈子收得很窄，那是不可能彻底把问题搞清楚的。但是这要有一个前提，就是一定要把主犯打击了，把这个案子揭穿了。没有这一条，自查是查不彻底的。问题并没搞清楚，主犯还没有抓出来，从犯的坦白一定是不彻底的，他也一定不可能彻底揭发别人。只有把案子基本上查清楚了，主犯抓出来了，才能够解放大多数。我想，这件事情要请中纪委、中央政法委、海关总署共同来研究，一起制定明确的政策。你们刚才讲，实际上已经这么做了，已经体现了这个政策的威力了。但是要把政策搞明确一点，否则不能团结大多数。“左”也不行，右也不行，政策明确了，工作时心里有底，就不会搞错啦。

第四点，要从法制上、体制上、政治思想上和技术手段上加强海关的建设。首先，要加强领导干部廉洁自律，加强思想政治工作，这一条是非常重要的。海关揭发出来的问题，反映了我们过去的思想政治工作是薄弱的，是业务挂帅，不是政治挂帅。政治挂帅，现在好像很少讲啦，但是我觉得还是要讲的。“三讲”的第一讲就是讲政治。讲政治，第一位的是领导干部要廉洁自律。本来我们这些领导干部，在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时候，就已经确立了自己的无产阶级世界观和人生观。我们都宣过誓，要为解放无产阶级和全人类而奋斗，要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除了这个目的以外，我们还有什么别的目的呢？山珍海味，一天无非是吃三顿嘛；高档宾馆，晚上无非也就是一张床嘛。你现在究竟图的什么东西呢？刚才有同志讲，是嘴巴害的，一天到晚吃吃喝喝。同志们，那样吃吃喝喝，血管是要硬化的。最近，我看到台湾报纸上登的王永庆①的养生之道。他说，养生之道就是简单，越复杂越活不长。他吃饭时，不吃山珍海味，以小菜为主，有时候吃一个鱼头，吃几片藕、一碗稀饭。一天到晚，这里赴宴，那里赴宴，究竟有什么好处？自己跟自己过不去呀，帮助自己加速死亡呀！

---

① 王永庆，中国台湾地区台塑集团创办人。

同志们，把这个事情想开一点，还是回到我们的无产阶级世界观、人生观上来。常言说：“赤条条来去无牵挂。”你来的时候赤条条，你走的时候不也是赤条条吗？你还能带什么东西走呢？只有当你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的时候，才真正感到生命的意义嘛。现在，无论你干什么事情，不要说是干坏事，即便是干的不那么恰当的事情，后面都会有人议论你。也不管你是什么领导干部，背后总会有人评说你、检验你的行为对不对、好不好。不要以为人家看不清楚，你做一些非分的事情，惹来的是后面的一堆骂名，你干什么呀？！我想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我们确实应该端正自己的世界观、人生观。特别是我们现在是人民的公仆，总要想办法多为老百姓办一点事情，多为国家争取一些利益。至于待遇高一点、低一点，官位提得快一点、慢一点，有什么意义呢？党政一把手，只要你们端正了自己的世界观、人生观，站稳了立场，那就腐败不起来，至少不会发生严重的问题。这一点是最重要的。所以，我觉得海关应该极大地加强思想政治工作。

海关经过这一次大的整顿，有些人落马了，恐怕应该大力地补充一些干部。在这次斗争中，不少同志站稳了脚，经受了考验，要从这里把年轻干部特别是业务干部提拔上来。但是这还不够，不能够只考虑业务干部，还要从外面挑选一些优秀的、政治思想水平比较高的、经过一些考验锻炼的同志，成为海关的骨干，一开始可以着重做思想政治工作，当副关长、党委副书记，逐渐熟悉业务以后，再提拔或者轮换。我想这是很重要的，应该赶快采取措施。各个部门要支援一些同志来加强海关。

其次，要从法制上、体制上帮助这些领导干部避免犯错误。这就要建立一系列制度，例如复核制度。新中国成立以前的银行都是有复核制度的，现在用了电子计算机就不复核了，这是不行的。过去提要有“三铁”：铁账本、铁算盘、铁规章。我一再要求银行一定要坚持这个好传统。现在强调得很不够，始终没有很好地重视这个问题，连一些领导干部都不知道“三铁”。现在造假账的很多呀，这里面就有贪污腐败的现象。一个银行行长手头可以随便支配的钱很多，不入账，个人说了算，这不是造成他腐败吗？最近我从互联网上看到农业银行杭州分行发生了一个笑话，后来一问果然是真的：一个打工的人到这个分行用一个信用卡存进去几百块钱，再一查，卡上面的数字是6.2亿。他想，这是真的还是假的，试试看。先提几百块钱，果然就提出来啦。于是，他就大买什么金银首饰等贵重物品，后来当然被发现了。怎么回事呢？本来，使用信用卡第一次是输入账号，第二次是再输入多少钱，有这么一个程序。银行的操作员第一次把账号输了进去，第二次又把这个账号输入一次，账号的数字就是6.2亿，他根本就没有复核。结果就出了这个问题，这说明没有复核制度是不行的。最近，香港联交所发生了一次停电20分钟的大事故，造成几百亿元港币的损失。什么原因呢？本来这个系统是自动切换电源的，如果主电源停电，备用电源就马上自动切换上去。但是，操作人员没有仔细看过设备说明书，当停电时，他马上按了一下切换按钮，把本来自动切换变成了不能切换，于是就一直停电了。报纸上说，这使香港好蒙羞啊，一个世界级的经济中心，居然工作人员连设备说明书都没有好好看。后来他们就制定了一个制度：按下按钮的时候一定要两个人，不能一个人按。海关的业务是不是也应该有个复核制度呀？总是要有人监督，要两个人相互制约，才能少犯错误。

另外，我认为还要坚持离任审计制度。最近对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行长进行调换、交流，干部的年轻化大大加强了。这样做，可以帮助这些同志不犯错误。一个领导干部，在一个岗位待久了，周围“抬轿子”的人太多啦，会促使他犯错误。这次调动工作的同志，还要进行认真的离任审计。这不是对谁不信任的问题，而是国家的一项制度，必须这样做。

我已经要求人民银行赶快设计一套对商业银行工作的评价指标体系出来，从现在就开始考核行长的政绩，谁搞得好、谁搞得不好，通过指标来说明问题。那就不能造假账了。要明确地对这些行长讲，你们必须配合审计署，把前任行长的离任审计做好。如果你不做，将来他的问题全算在你的账上，这一点要说清楚。这绝对不是信任谁、不信任谁的问题，你审计前任行长的账，你原单位审计你的账，都要审计，这样才能从体制上面保证你不犯或少犯错误。这个制度一定要坚持。审计署要集中力量突破重点，面不要铺得那么开，一下子审计多少万个单位，那样虽然能抓出一点东西来，但不解决问题，意义没有这个大。对这些领导干部，特别是有影响的领导干部，一律要进行认真的离任审计，这是国家的一项重要制度。对海关关长要进行离任审计，对副关长也要进行离任审计。不是只有对第一把手才进行离任审计，也不是干部级别越高就越不需要审计。今后对每一个领导干部特别是对副部长以上的干部都要进行离任审计，这很重要，否则责任不清。这是从法制上、体制上帮助领导干部不犯或少犯错误的措施。当然，领导干部自己首先要提高觉悟，提高政治思想水平，提高修养，廉洁自律，这样才能保证我们队伍的纯洁、廉洁。

此外，我们要从各个方面加强打击走私的工作。比方说，海关缉私警察怎么跟公安部密切配合去打击大案要案？今后要从体制上想办法。打击走私抓了那么多人，海关没有那么大的力量，没有公安部门的配合是不可能取得这么大的成绩的。现在要打击的腐败案件主要是这么几个方面：一个是走私，一个是银行的金融犯罪，还有是涉税的犯罪，要采取措施把这几个方面问题处理好。海关的缉私警察，需要增加一些服义务兵役的，可以轮换。这可以从制度上保证缉私警察总是充满斗志，是一个比较好的做法。过去缉私，没抓几个人；去年缉私警察3000人抓了走私分子3000人，这是了不起的成绩。

最后一点，是要加强技术手段。我在1998年到广州，看到他们的联网系统，海关同外经贸部、国家外汇管理局共同联网。报关单一核对，马上就能够知道是假的还是真的。我听说，你们正在研究更先进的计算机体系和网络。这要攻关，完全靠人有时查不出来或者难以核对出来，就得靠这些最先进的技术。1998年上半年查出的假报关单，货值达110亿美元。这个网络建立以后，侦破率就大大地提高了，很多问题在还没有作案以前就被消灭了。所以，海关一定要采用高新技术，建立一个高技术的、非常严密的计算机体系，要吸收一些懂技术的人才进来。先进的手段加上懂技术的人，这样才能把海关工作搞好。海关透视集装箱用的检测仪，是清华同方股份有限公司试制成功的，是我们自己研制出来的，你们可以提出意见让他们改进，将来要给予他们奖励。汽车一经过集装箱检测仪，马上就能看出里面有没有东西，手枪、毒品都能看出来。现在走私，从香港出关时账是真的，要瞒骗香港海关比较难一点；但一上我们的岸就变了，1万吨变1000吨了，因此必须跟香港海关核对一下，一联网，这个问题不就解决了吗？香港现在已经回归了，很多事情都可以通过技术手段来解 决了。

最后，我衷心希望我们海关的全体同志，特别是领导同志，一定要振奋精神，重振雄风，再创新高，把海关工作提到一个新的水平。党中央、国务院是信任你们的！我们认为，海关这支队伍是经得起考验的，尽管犯了严重的错误，它的主体还是好的；绝大多数领导干部是立场坚定的，也是廉洁的。虽然有一些蛀虫，有一些不法之徒，但现在把他们抓出来了，海关更加纯洁了。我们不能因为发生了严重的走私案件，而否定改革开放的成绩。在任何一个国家都会发生这些问题的。我们很庆幸比较快地发现了这些问题并解决了这些问题。不能因为厦门出了一个这么大的走私案子，就否定经济特区的开放政策；更不能因为有一小撮蛀虫和不法之徒，就否定整个海关队伍的性质。海关队伍的主流是好的。同志们，希望你们振奋起来，头要抬起来，胸要挺起来，站得稳稳的，把工作抓起来。我们对你们去年打击走私所取得的经济成绩、经济效益，表示感谢。你们要坚持工作，不能够松懈。据说因为现在受到严重的压力，有些人对你们的看法不好，有的同志心里有委屈，服务态度就差了，就向客户和过关的人发脾气。这样不好，一定要严格地杜绝这种情绪，要对这些同志进行正面教育，不要有委屈。中央是讲政策的，对犯了错误的同志的处分是宽严有度

的，对主犯，该枪毙的一定要枪毙；对从犯，坦白得好的从轻处理；对揭发有功的人，免予处分。希望大家振奋精神，吸取教训，把全体海关的同志们团结起来，把工作做好，共同完成党中央、国务院交给你们的任务。

搞好农村"费改税"试点工作

(2000年3月13日)

这是朱镕基同志在九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安徽省代表团全体会议上的讲话。

目前，粮食出现了阶段性的供过于求，价格下降，以粮食生产为主业的农民的收入受到了影响。要保证农民的基本收入，就必须敞开收购，而敞开收购需要财政补贴保管费用和占用资金的利息，这方面的负担是很重的，去年中央财政就补贴了600多亿元。当然，从全国来看，由于地区不一样，农民所从事的产业不一样，打工的人数不一样，乡镇企业发达程度不一样，离城市远近不一样，各地农民收入增长放慢的程度也不一样。前几年，为了保护农民种粮的积极性，国家先后三次提高了粮食收购价格，粮价已经高于国际市场的水平。尽管现在市场粮价在下降，但与国际市场相比还保持在较高的水平。不管怎样，与前一两年相比，农民收入的增长比较慢。这个情况要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怎么办？第一，还是要坚持既定的粮食购销政策，国家还是要给补贴，否则种粮的农民受不了。第二，要调整农业的种植结构，鼓励农民去种那些优质的品种、适合市场需要的品种。为此，要调整按保护价收购的粮食品种，东北地区准备少种玉米、多种大豆，可以鼓励全国中小学生都来喝豆奶。但这个事情不能着急，不能盲目地搞，强迫命令是绝对不行的。要根据市场发展的需要，帮助农民开辟增收的门路。第三，除了执行党中央、国务院一系列的农村政策外，减轻农民负担就是最大的政策措施。减轻农民负担就意味着增加农民收入，这是目前能使农民真正增加可支配收入的有效办法，全国都要认识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

现在不少地方收费名目繁多，农民的负担绝对不是只占其收入的5%。我们曾经想过很多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把农民的各种不合理负担开了个单子，有二百几十种之多，然后在电视、广播上公告，宣布

取消。但事实证明这种做法的作用不大，你取消了200种，地方又加了300种，名目和以前的不一样就是了。可见，用行政命令规定什么费不能收，即使发了几十份文件，还是没有多少用。不下最大的决心，从法制上加以根本治理，这个问题就解决不了。这不是说干部都是贪官污吏，而是一个风气问题、法制问题。首先是政府机构臃肿，招进了那么多人，他们要吃饭，有的还要讲排场，不精简政府机构，农民负担不可能减轻。所以，本届政府从国务院系统开始精简，减少了50%的人员，这样财政开支就减少了。现在各省区市的政府机构改革方案也已经批准了，省级政府机构的人员编制大体上也要减少50%，我相信这是能够执行的。问题在于县以下的机构，精简起来很不容易，但不容易也得精简。精减下来的人员如果分流不了可以养起来，这总比占着职位花钱少，还可以提高工作效率。乡镇干部也要精减，有的人可以回去种地，不能种地的人想办法给予安置。总而言之，政府工作人员不能太多。还有，事业单位包括学校的人员也很多，在有的地方的学校里，小学程度的甚至文盲也能当教师、领工资；还有的弄虚作假，吃空额。县和乡镇的干部精减工作，要结合整顿事业单位和教师队伍，把那些不合格的人调整出去，让从乡镇干部 里减下来的合格人员去当教师。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不当干部了去当教师是很光荣的。总之，精简机构、减少农民供养的人员，是从根本上减轻农民负担的必要条件。

减轻农民负担最重要的一条措施，是实行“费改税”，来个一揽子解决。不管有多少种费，只要是收费就一律不允许。只收农业税及其附加，其他所有费都取消。制定农业税的征管办法，千万要注意不要让种田的人吃亏。外出打工的人、搞家庭副业的人、做买卖的人，他们都不种田。如果对他们都不收税，让农业税都落到老老实实种田的人身上，那不行，，那样种田人的税负就会很高。所以，一定要严格区分这些情况，对不种田的那几种人也要采取适当形式收税，这些人在农村还是比较富裕的。这项工作一定要非常细致地去做。

农村的“费改税”是涉及九亿农民的大事，是减轻农民负担的一个根本性的政策。要慎重行事，先搞试点。我们组织力量调查了一年多，制定了方案，开了全国性会议，原先想请四个省在全省试点，其他省区市自己找一两个县试点。但这四个省把试点任务领回去以后，只有

安徽省坚持下来，其他三个省都打了退堂鼓。我们总得走这条路，总得这么干，要干就得有人先来试点。安徽省愿意承担这个任务，有这个勇气，我认为是好的，应该表扬。这次我的年度《政府工作报告》，文字一再压缩，但安徽省搞“费改税”试点这个事，非要把它写进去不可。大家都记得，万里同志当安徽省委书记的时候，搞包产到户，成为中国农村改革历史上的一件大事，开创了全国农村生产关系的变革。农村“费改税”这件事情的意义，不亚于“包产到户”。如果安徽省把这件事搞成了、搞好了，就是对历史作出了又一项重要的贡献。我们必须认识到这个问题的重大意义。但是，说老实话，我也有些担心。安徽省在历史上发生过浮夸风，1998年我到南陵县就有过亲身的体会。因此，你们必须谨防浮夸，扎扎实实地搞试点，为全国农村进行税费改革积累经验。中央一定支持你们。

农村“费改税”以后，税负不要搞得太重了。如果把税负搞得和原来收费一样重，那又何必改革呢？因此，这里面就包括了要搞精简机构，从源头上减轻农民负担。如果不从源头上下大力气抓精简机构、抓干部作风的转变，不刹住干部铺张浪费乱花钱的风气，不整治贪污受贿，“费改税”就搞不下去，就不可能取得成功。所以，这个任务是很艰巨的，要做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谨防说假话、虚报。中国共产党经历了几十年各种风浪和斗争的考验，最根本的成功经验就是实事求是。我们要按照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来办事，不搞虚夸，不说假话，不铺张浪费。我希望安徽省委、省政府首先自己要改进领导作风，深入实际，深入基层，深入群众，多搞调查研究，好话坏话都要听，不要只听那些好听的话，这样才能够把事情办成。这个事是有风险，但风险也不是太大，就怕不去好好办实事。全国只有安徽一个省试点，如果搞不好，“费改税”在全国推行就得拖后几年，农民就得多受几年苦。做好这项工作首先要解决思想认识问题，一定要把各级干部特别是基层干部的思想搞通，这是第一位的。具体办法是第二位的，是可以改进的。我衷心地希望安徽省上下齐心，团结一致，勇敢地承担起党中央、国务院交给你们的任务，真心实意地去为农民办好事。一切个人得失都要置之度外，一心一意去想怎么减轻农民负担，把这件大事办好。

安徽省有个很不利的条件，就是灾害频繁。去年7月汛期时，我到过安庆、池州，从长江北岸到南岸，站在高处看洪水滚滚的长江，顿时触景生情，想起了苏东坡的《念奴娇·赤壁怀古》：“大江东去，浪淘尽……”但是，当时想的不是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我不考虑什么千古风流人物，我考虑的是“大江东去，浪淘尽万民的血泪、黎民的生计”呀！我说了这样一句话：这么多年受灾，真是搞得民穷财尽哪！安徽省地处中原，是一个非常富庶的地方，文化也非常发达，但频频的水患把沿江群众搞得这么苦。所以，现在要下定决心，在几年之内把长江堤防治理好，沿江的堤防无论如何要达到规划的标准，一定要办成这件事情。水利建设绝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不能总是来水灾就多投资、没水灾就不投资，这样不行。水利建设的力度只能逐年加强，不能减弱，一定要保持很强的投资力度。那些铁路、高速公路建设都很重要，但是比起水利建设还是第二位的。如果农民一年有一百多天上堤抗洪，那还种什么地呀？湖南、江西、湖北省都有这种情况。大江大河大湖治理、退田还湖、移民建镇等工作的力度，绝对不能够降低。国家发那么多国债，不首先搞水利搞什么！国家加大治理水患、兴修水利的投资力度，就是为了减轻农民的负担。我一直主张不要向农民摊派义务工、劳动积累工。农民实在是太苦了。国家多拿出一点钱，把其他的基本建设项目资金挤掉一点，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安徽省搞试点最好把这“两工”去掉。你要农民干活，就要给钱。标准可以稍微低一点，但当场就要给钱。水利工程建设一定要用机械化的队伍施工。由一家一户去承包，光靠人挑肩扛、手提车拉是不行的，不仅不能保证施工质量，也不利于实行监理制度。

我还希望中央各个部门，都要想方设法来支持安徽省的试点工作，切实地减轻农民负担。在党中央、国务院的正确领导下，只要安徽全省上下坚决贯彻中央的方针政策，精心组织，周密安排，加上中央各部门的大力支持，税费改革试点工作就一定能够成功，一定能够为安徽省的农民真正办一件实事，安徽省的各项工作也一定会做得更好。

粮食保护价必须高于种粮成本

(2000年3月19)

2000年3月18日，新华通讯社《国内动态清样》第696期《吉林农村出现“弃耕”苗头》一文反映，不少农民因粮价下调，觉得种地不合算，准备在2000年放弃耕种。这是朱镕基同志在此文上的批语。

家宝①同志：

要十分警惕这个苗头。可否请农村领导小组办公室、农业部、计委等有关部门组织几个省的调查，检查粮食购销和价格政策的执行情况和备耕准备。要告诫各级党政领导，农业始终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任何政策措施都不能影响农民种粮的积极性，否则后果严重。保护价的制定必须高于种粮的成本，也不能只实施“劣质低价”，而不实行“优质优价”，使农民的总体收入过多下降。

朱镕基

3.19

① 家宝，即温家宝。

在陈祖涛同志来信上的批语

(2000年3月23日)

陈祖涛同志转送的一封群众来信反映，有人打着朱镕基同志的旗号，干扰地方司法工作。这是朱镕基同志在陈祖涛同志来信上的批语。陈祖涛，曾任中国汽车工业总公司总经理等职。

陈祖涛同志并告春旺①、丽兰①、广生①、家旋①并肖扬、柽滨①同志。经查，我跟此事毫无关系，一无所知，同原被告均不认识。我们共产党员应该有一个基本行事准则，实事求是。凡是打着我的旗号办事的人，如果你没有看到批语，你就不要相信，而且要追查。其实很简单，打个电话给我的秘书就查清楚了。大家知道我的为人，我最痛恨的是逢迎，我最敬重的是抵制我的错误缺失的人。(抄送长春①、瑞华①同志)

朱镕基

3.23

---

① 春旺，即贾春旺，当时任公安部部长。丽兰，即朱丽兰，当时任科学技术部部长。广生，即石广生，当时任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部长。家璇，即唐家璇，当时任外交部部长。柽滨，即韩柽滨。长春，即李长春。瑞华，即卢瑞华，当时任广东省省长。

会见欧盟贸易专员拉米时的谈话

(2000年3月29日)

这是朱镕基同志在北京中南海紫光阁会见政盟委员会贸易专员帕斯卡尔·拉米率领的欧盟代表团时的谈话。

朱镕基： 非常高兴与拉米先生见面，过去我跟布里坦①爵士打过多年的交道，现在又碰上你了。我想我们是谈判的对手，也是合作的伙伴，同时也会成为亲密的朋友。

① 布里妲，即利昂·布里坦，曾任欧盟委员会副主席、贸易专员。

我一看就知道你是一个很难对付的谈判对手，因为你跟我们的石部长①一样，谈判都把头发谈光了。我想这预示着你会比布里坦更厉害一点，但是我想越是这样，越能成为更好的朋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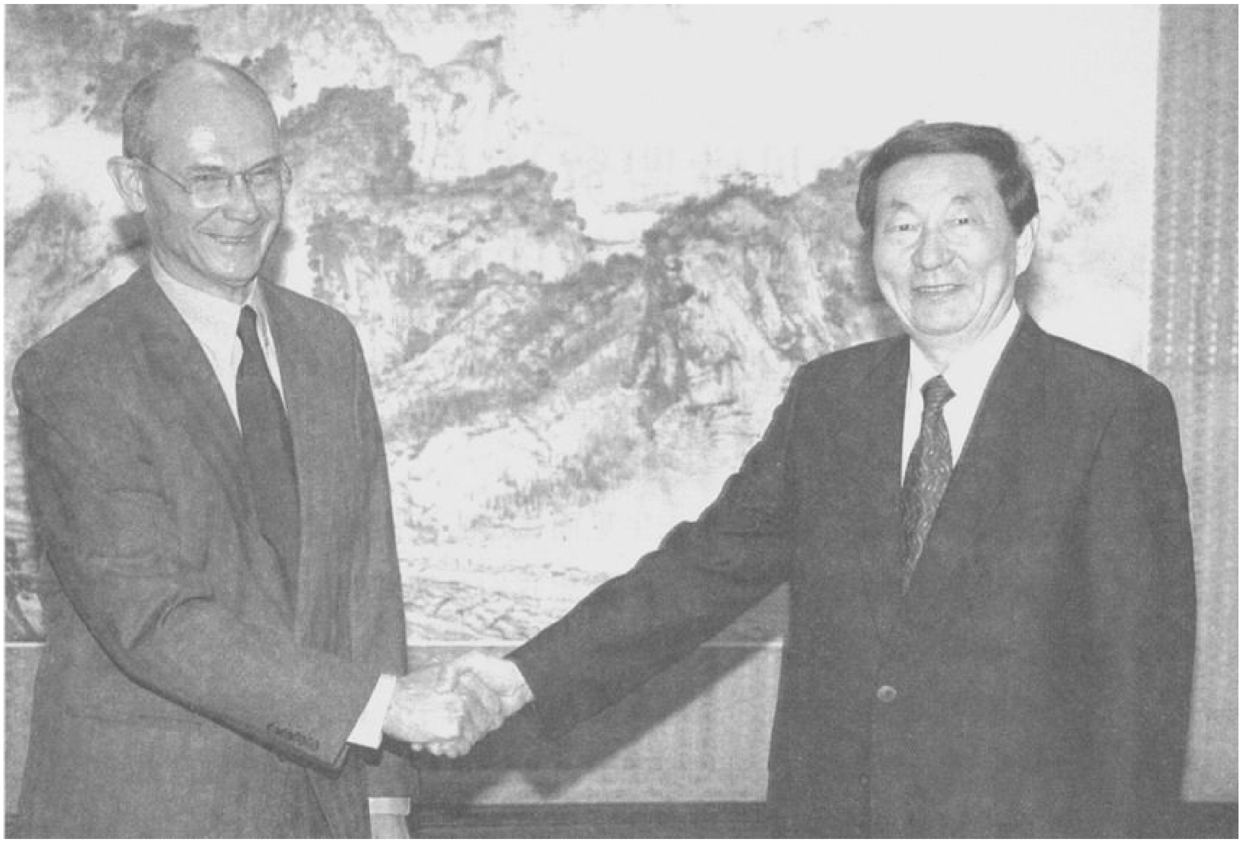
① 石部长，即石广生，当时任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部长。

我想先说几句话，把气氛缓和一下，然后我们再进行激烈的谈判。

拉米： 总理，谢谢你能够说这番友好的话，而且能够抽出时间来见我们。

你提到了我的前任布里坦爵士，我要说他为了使中国能够加入世贸组织做了很多工作，在这方面我们要对他表示敬意。如果在过去的那些年间他没有朝着这一方向亲自作出努力的话，就不可能达到今天这个地步。

朱镕基： 打扰你一下，你讲得非常好。我刚才只是想开一个玩笑，没有提到布里坦先生所作出的贡献。我完全同意你的看法，只是开个玩笑。



2000年3月29日，朱镕基在北京中南海紫光阁会见欧盟委员会贸易专员帕斯卡尔·拉米。

拉米： 总理，我想我们已经很接近通向正确方向的那一个地方。在两年之后我又能重新来到中国，看到这里一派繁荣、信心很足，这是一个很好的征兆，预示着你们能够发挥很好的领导作用。我们看到中国所制定的内部政策使人们能够凝聚在一起，同时我们也看到你们为了加入世贸组织所发挥的作用。

正如你所知，在我们双边谈判中还有一些问题需要解决，我想简单地跟你讲讲谈判的主要精神。我们非常希望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因为我所提到的这些原因，还需要我们进行多轮的双边谈判。在去年11月你们与美国达成双边协议，给这个进程开了个好头。我们非常欢迎这个协议，因为它极大地推动了事情的发展。但我们之间仍有一些问题需要共同解决。对于我们来说，你们与美国的双边协议不应该成为唯一的参照物。这主要有两个根本原因：一个是政治原因，一个是技术原因。政治原因是基于中国与欧盟之间的一种共同谅解，也就是关于

世界政治体制应该是什么样的，世界应该是多极化的，而中国与欧盟的关系同中国与美国之间的关系是不一样的。这对于欧盟成员国和欧盟国家的公众舆论来讲都是不一样的。我们朝着这个方向前进，也是由于有更多的技术上的问题。正是由于这样一个基本的事实，你们在与美国进行谈判过程中有些重要的问题，对于我们来说就不那么重要了。在谈判中，中方接受了美国可以在更长的时间内保持它的贸易保护措施，而这对于我们来说就不需要那么长时间。你们与美国之间达成的平衡影响到我们，这种平衡对我们来说不太方便。在一些具体的领域，我们也理解中国在这个过程中有必要渐渐地引入一些东西，渐渐地取消一些东西，主要是汽车、电信、保险、国营贸易。我准备在这些问题上表现一些灵活性，以适应中国的关注，也就是逐步取消或逐步放开。

总理先生，如果你同意，我可以与你或在下午与石部长会面，共同探讨解决办法。我们是现在谈，还是以后谈，还是今天下午与石部长谈，我都听你的。关于剩下的问题的解决，我有一些想法。

朱镕基： 关于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问题，我们需要与37个成员进行双边谈判。现在剩下8个成员还没有达成协议，其中有5个成员实质上已接近签字的程度；余下3个未达到结束谈判的程度，欧盟是其中主要一个。

鉴于欧盟与美国一样，是我们最大的贸易伙伴之一，我们不希望看到欧盟是最后一个与我们结束谈判的，也不想看到欧盟不愿签署协议。因此与欧盟的谈判虽然是很激烈的，但也是很友好的。

我同意你的想法，就是不把中国与美国达成的协议作为唯一的参照，我们知道欧盟关心的问题与美国关心的问题不同，各自有各自的特点。比方说，美国关心小麦、柑橘的出口，你们大概关心葡萄酒和橄榄油的出口，是这样的吧？还有什么东西？

我们充分理解欧盟的成员组成，我们作了很大的让步。石部长说，我们对150个税号中的125个已经作了很大的改善，在降低关税方面作了大量的让步。我们并没有向美国作出这种让步。当然，我也要对你的话作一个补充。尽管各个国家有各个国家的特点，但是我们对一个国家作出的让步，也是对所有国家的让步。也就是说，我们对美国作

出的让步也是对你们的让步，我今天向你们作出的让步也是对美国的让步。我们不能出现两种政策。

你提到的汽车关税、电信和保险的控股比例问题，这些问题既是今天你们提出的问题，也是当初我们与美国争论最激烈的问题，我看不出来你们之间有什么区别。

我记得去年我们跟美国的协议，几乎是在边缘上达成的。最后一次谈判，他们四次改了机票、退了房子。是不是真的要走，我也不知道，但确实是四次改了机票、退了房子。最后一次，也就是达成协议的一次，早上告诉我说他们10点钟就要走了，因此我9点钟就赶到他们谈判的会场。他们坚持的几个问题就是你们今天所坚持的几个问题：第一是汽车关税的问题，第二是电信股比的问题，第三是保险股比的问题，第四是八个产品国营贸易的问题。现在你们坚持的是四个产品，美国当时坚持的是八个产品。就是在他们要走的那一天，我9点钟到他们的会场上去，跟巴尔舍夫斯基、斯珀林谈判，在这四个问题上，我没有让步。我让步让的是什么呢？就是特殊保障条款和反倾销条款，我们同意延长了几年。而在这四个问题上面，我没有作任何让步。

这是因为，这都是我们各部门统一的意见，全国一致认为应该坚持的意见，所以我也不能让步。允许我开个玩笑，拉米先生，你再改五次机票、五次退掉房子，我也不会让步！

拉米： 我可不是这样的人。

朱镕基： 我还没有讲完，你就接下去了。我要讲的那句话就是你要讲的。你作为欧洲人，与美国人的性格是完全不一样的，你不会这样做的。我只是开个玩笑。

但是我也要说明一点，我们在这四个问题上也不是永远不让步，而是要给我们一个过渡的时间。也就是说，等我们自己的监管能力能够到位，中国自己的企业能够具备一定的竞争能力，我们一定会在这些问题上作出让步。我本人认为，在这四个问题上过一段时间以后作出更大的让步是完全有可能的，对中国也没什么威胁。但是在目前只能做到这一点，这是目前中国人所能接受的限度。请你允许给我时间，不要马上要求这样做，如果一定要求这样做，那么我们在这个问题上

就卡壳了。这也是1999年11月15日我给巴尔舍夫斯基讲的：我们何必为了这几个问题，而使中美两国的关系、使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谈判就这样不愉快地结束了呢？我们大家都应该顾全大局，这四个问题不是什么了不起的问题，只是一个时间的问题。

请你帮我想一想，当时我们对美国都没有让步，这些问题并不是像葡萄酒和橄榄油一样，如果我们今天对你们让步，那我们岂不是自己打自己的耳光吗?

这些问题不要看得太严重了，根本就不是葡萄酒和橄榄油的问题。我可以说，这些问题属于一般性质的问题，对任何国家都是同样关心、同样重要的问题，不能再开任何口子了。其他问题都可以作出让步，我们授权石部长与你们谈判。我们一定会顾全大局！请你把其他方面要谈的问题也谈一谈。

拉米： 总理，谢谢你所作的说明。我有两点评论：

第一，这四个问题是政治性非常强的问题。中国在这四个问题上一点都不能让步是因为对美国没有让步，对这个理由我们在政治上是不能接受的。据我们看来，欧盟与中国的关系并不是这样一种关系。我们已经充分考虑了中国与美国在讨论这四个问题时遇到的困难，因此，我们的要求不同于美国的要求，我们所提出的要求更为具体、更有针对性、时间更长。比如保险业，我们只要寿险，在这方面欧盟的竞争力大于美国。对于电信，我们只要移动通信，而不要固定电话、卫星电话和国际互联网服务，这是因为我们欧洲的手机很好用，我就有一个，在北京打得很好，在华盛顿就不行。我们提出的问题是不一样的，我们在看到你们与美国谈判的内容之后，就没有提出同样的要求。这就是为什么我请你允许我们在与石部长讨论的时候，再看一看我们的立场，并且发挥灵活性。当然，你刚才说你们由于要对等的原则，不能作出进一步让步，但是我们所要求的并不是非常大的让步，而是出于政治和技术上的一些原因，要求来照顾一些欧洲的个别的利益。我要对欧洲议会和欧盟理事会负责，如果我没能够让你们清楚地注意到我们的立场的话，我就无法交代。我可以显示灵活性，但是需要能够解决这几个重要问题。

朱镕基： 拉米先生，我们是第一次见面，我本来想用诚恳的、坦率的、非常轻松的态度，同你做朋友，但是你把属于经济的问题提高到政治高度，使我提高了警惕。我希望你更用心地听我的讲话，并且不要曲解我的讲话。我没有讲对美国没有答应的东西也不能够对欧盟答应，我们答应你们改善的125个税号，不是作出了让步吗？我们没有向美国作出的让步，不也向你们让步了吗？怎么能说我们在政治上面对欧盟有什么歧视呢？

我刚才是这么讲的，关于电信、保险等等这四个问题，这是我们对任何国家都设立的底线，不是对美国，也不是对欧盟设立的底线，而是对所有国家设立的。因此既不能向美国让步，也不能向欧盟让步。这不讲得很清楚了吗？没有任何的政治上的含义。我希望拉米先生你要注意，中国现在与欧盟的关系是非常好的，在政治和经济领域各个方面都是非常好的，不存在任何政治问题。

关于这四个问题，我看不出来欧盟和美国有什么区别。你说你们在保险、在移动通信方面比美国的竞争力强，我就不相信。当然，我也不相信美国对你们有优势。是的，目前欧洲的移动电话在中国市场上占有优势，这主要是当时美国对我们封锁，我们跟芬兰的诺基亚公司进行合作而造成的结果。在寿险方面，主要是美国国际集团，它最先是在中国的上海创立的，后来到美国去了，当时它提出进入中国市场时还没有欧洲公司提出申请，我们批准了美国的公司，因此，美国的公司占了中国市场的优势。但是，我们从来没有说美国的公司一定比欧洲办得好，欧洲的公司一定比美国办得好，我从来不这么认为。不按国家来划分、不按地域来划分，而是按公司来划分。因此，你让我判断哪一个是美国的优势、哪一个是欧盟的优势、哪一个是日本的优势，来制定出相应的条款，来满足大家的要求，我们做不到这一点。所以，我们目前只能是这样，就是只能在几个最关键的问题上确定一般的原则，对任何国家都适用。同时，我们针对每一个国家的特点，可以给一些特殊的照顾，但是这种照顾，话说回来，也适用于所有国家，不能单独对某一个国家。

不知道我讲清楚没有，你听清楚没有？希望你有不清楚的地方提出来，不要造成误解。

拉米： 我非常认真地听了你的讲话。对不起，如果我讲得太直白了的话，只能证明我没有经验。我想讨论的主要有这样几点：汽车、寿险、移动电话和国营贸易，在这些领域，你们是不是能够有针对性地以过渡期非常长的方式来满足欧盟的要求?

我同意你讲的，这些是敏感的问题。这是为什么我们允许你们有一个很长的过渡期，而且很高兴有机会与石部长进行讨论。

讲到保险业，美国在中国的市场份额要大一些，美国国际集团设立的时间较长、市场份额大。这是为什么要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之前，我们在保险公司数目上要与美国保持平衡。

关于国营贸易，欧盟不是要求取消这种做法，而是希望以平稳的、渐进的方式引入其他的从业者。我想你能理解我们的立场，也希望能够把话讲得更清楚，就是不要求让中国政府作出一些承诺而使它处于困难的境地。我希望你们也显示灵活性，也不要使我们处于不利地位。

我想请求你同意指导我们下一步谈判的一般性原则，即中国与欧盟之间的协议要明显地有欧盟的特征。

而这一点只有在我们没有任何先决条件的情况下，讨论了所有的议题、分析了双方的立场之后，才能做到。我希望能够结束谈判，但谈判达成的结果必须有欧盟的特征；否则，鉴于欧盟的成员国、鉴于欧洲的议会，我的授权是不足以完成这一任务的。

所有我对你的请求就是在你给石部长指示的时候，不设先决条件，没有不能谈的问题，在讨论每一个问题时都要看欧盟方面是不是取得了一些平衡。

朱镕基： 如果你一开始就像刚才讲得这样清楚的话，也许我们谈判的气氛就会更加轻松一点。我也很抱歉，我对你的话也产生了一些误解。但是因为我们对于“政治”这个词是非常敏感的，我们是很害怕把一个经济问题变成一个政治问题，而使事情复杂化。正如你刚才讲的，我想我们在这四个问题上是可以趋于一致的。

比方说，关于寿险的问题，我讲得很清楚，股比的问题，现在不能让步，但是将来一定会改善。保险公司的数量问题，我们从来没有说

美国保险公司的数量一定要比欧洲多，因为什么？美国是一个国家，你们是15个国家，你们应该比美国多嘛。现在是美国的多，那么我们继续批欧盟的嘛。继续增加！符合条件的我们就批。

关于专营的问题，这个问题在1999年11月15日我们最后一次跟美国谈判的时候，巴尔舍夫斯基说，克林顿总统与她通电话说，一定要我们取消对化肥的专营，如果不取消的话，那么克林顿总统不好向美国企业界的人士交代。我没有同意。我对巴尔舍夫斯基说，你去跟克林顿总统解释，我不能让步，现在先签字，以后再谈。正如你刚才讲的一点，我完全同意你的意见，在今后一定会逐步考虑这一问题。我们甚至可以在配额的问题上面，向欧盟作某种程度的让步。至于说，你刚才讲，中欧协议没有欧盟的特征，你就回不去了，不好交代了。不过我想，拉米先生，我们现在谈判的成果已经具有相当大的欧盟特征，我们没有对美国作出那么多降低税号的让步。当然在汽车关税上，我们不能再作让步了，如果再让步，美国的工业会把我们冲垮的。现在不是我们自己担心，包括你们德国的大众汽车公司也很担心，美国的通用汽车公司也担心呀！

石广生： 欧洲的企业在中国最多。

朱镕基： 但在其他问题上面，授权石部长与你们进行坦诚的谈判，尽可能地作出让步，使我们这个协议能够带有更大的欧盟特征。但是也请你们谅解我们，我们不能一次作出这么大的让步，因为我们作出的让步，不仅要适用于你们，也要适用于美国。你们也要帮我们考虑能不能承受。如果中国的经济由于参加世贸组织而受到负面的影响，我想对世界、对任何跟我们合作的伙伴都是不利的。

拉米： 总理，有一点欧洲是认同的，就是中国的经济正处于转轨过程中，中国做得很成功。

欧盟委员会把中国不仅仅看做是一个市场，而且看做一个未来重要的伙伴，但这种伙伴需要培养、需要呵护，这是为什么最后达成的协议要清清楚楚地有欧盟的特征。你提到了关税出价，中国的确作了改善，但是中国对美国出价的加权平均税率要比对欧盟出价的加权平均税率明显低得多。

朱镕基： (问石广生)是这样吗?

他(指石广生)没有计算过，那我们再交换资料吧。

你还是很精明的，我没有看到布里坦爵士提出这样的问题。

石广生： 因为他当过银行家。

拉米： 布里坦当初是个律师，而我是一个商人；布里坦是自由派，而我是社会党人。

在欧洲、在法国，我发现社会党人有两种：一种知道数字是什么，一种不知道数字是什么。你刚才讲到汽车这一点，我也是完全同意的。对中国的一些汽车厂，如欧洲公司投资的大众和雪铁龙，它们对降低关税和逐步放开合资企业并不特别热心。具体地说，我要跟石部长把具体的问题都讨论一遍。在讨论的时候，有必要的话，我们也请你来作一下判断，看我们要求得是否平衡。

朱镕基： 我看你们可以进行全面的、坦诚的、诚恳的谈判，什么问题都可以谈，但我还是希望你能够在这一次历史性的谈判之中完成你的任务。

最后还是要说一下，我们和欧盟各个国家的关系是非常好的，特别是在政治上非常好。我们一定把欧盟作为和我们最友好的地区之一。如果说我们的关系不是比中美关系更好的话，至少不比中美关系差。我可以举出事实，我们与美国的关系也是时好时坏，过程是曲折的，但我们与欧盟的关系不一样，从建交以来，与欧洲国家的关系就是好的。在这次中国台湾地区所谓的“选举”当中，只有克林顿总统一个人发表声明，向台湾地区领导人表示了祝贺，而没有一个欧洲国家表示祝贺。所以，我们感谢欧盟支持我们在一个中国问题上的立场。我们既是政治上的好朋友，也是经济上的好伙伴。我们不愿看到欧盟成为最后一个与我们签署关于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双边协议的地区。因此，我们对拉米先生寄予很大希望，希望你在争辩的同时，也表现一点灵活性，把这项任务完成好。谢谢。

经济上要防范三个风险

(2000年4月18日)

2000年4月12日至19日，朱镕基同志在江苏省考察工作，先后考察了徐州、淮阴、扬州、南京等地。这是朱镕基同志在听取省委、省政府工作汇报后讲话的主要部分。

在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全国各地闹事的情况大量增加，示威游行啦，阻断铁路、公路啦，煤矿死人啦，等等。江泽民总书记和我都非常着急，连着几天晚上都睡不好觉。我向江总书记汇报和商量时，提出要很好地防止三个风险：一是国有企业的风险，或者说社会就业的风险；二是潜伏着的金融风险；三是农村和农业的风险。我是从经济上来讲，而不是从政治上来讲这个问题的。带着这个问题，我们到江苏来调查研究，到今天告一段落。我们在江苏得到了很大的启发，也印证和丰富了我们原来的一些思路。

一、关于国有企业的风险

国有企业三年脱困的目标，应该说今年可以实现，但是脱困并没有解决国有企业的问题。国有企业问题的根本解决，要有三个东西才能到位：第一个是要有一个好的机制，主要是实现公有制的多种形式。根据党的十五大精神，要实行股份制，让企业的产权明晰，政企分开，经营管理公开透明，走向市场，接受市场的监督。不然的话，吃“大锅饭”的机制很难改变。第二个是要有一套好的管理制度，即现代企业管理制度。第三个是要有一个好的、成熟的管理方法，即科学选拔和监督企业领导班子的方法。现在我们的国有企业还没有做到这三条，还要经过好多年的努力。做到这三条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是建立社会保障体系。1997年，我们曾提出“规范破产，鼓励兼并，下岗分流，减员增效，实施再就业工程”，但我们实际上并没有主动地去做“下岗分流，减员增效”这个事情。现在仍然是三个人的饭五个人吃，甚至十个人在吃。为什么？因为还没有建立社会保障体系。企业只有能够随时根据生产的需要、管理的需要精减人员，才能办好，没有这个

机制就办不好，这就必须有一个社会保障体系。现在再就业服务中心实行的“三三制”，是过渡性质的措施，因为企业负担不了，失业保险金也不够，财政鹿底也有困难，实际上也没有真正到位，特别是一些经济比较困难的省。所以，必须建立一个独立于企业之外的社会保障体系，社会化地来发放救济，否则就不能保持社会的稳定。而要建立这样一个社会保障体系，首先要解决资金问题。现在就准备争取在今年内解决建立体系的前提，在明年内建立起这个体系。这个社会保障体系是低标准的、中国特色的，让下岗工人有饭可吃，生活过得去，但还不能吃得很好。过去提出再就业服务中心对下岗职工只管三年，这恐怕不行，得把他们养起来，一直到他们重新找到工作为止。所以，必须有一个全国统一的标准、统一的发放制度、统一的筹集资金的办法。首先，省一级要统筹，省内要赶快做好这个基础工作。现在的“三条保障线”(基本生活费保障、养老保险制度、城市的最低生活保障)一定要搞好，要保证。然后，要把逐步纳入省级统筹的一系列办法搞好，提高收缴面，提高征缴率。如果这一套制度能够完善，而且做到百分之百的社会化发放，那么实行全国性统筹、解决资金问题，就比较好办了。解决资金问题，只要中央下决心，也不是不可以做到的，无非是以下几个途径：第一个是财政预算，把社会保障基金打够；第二个是完善现行的社保资金的征缴办法，把这个钱收够；第三个是可以把一部分税收比如利息税等划给社会保障基金，建立全国性的社会保障基金，保证基金有固定的收入；第四个是减持或者变现国有资产，企业无论到境外上市还是在国内上市，募集的资金都要拿出10%交给国家，建立社会保障基金；最后一个是对社会保障资金实行经营管理，许多国家都有这方面的成功经验。所以，我们相信这个社会保障基金是能够建立起来的，我们现在有这个能力来建立这个基金。我们有了这个基金，不但能够保证国有企业获得一个好的机制，根据需要来减员；同时也能保证社会稳定，减少闹事。镇江发生闹事以后，我曾经指出，现在阻断交通已经成风了，这不行，我们应该把问题分开。你们闹事一定是由于我们工作有缺点，我们要改进工作。比如农村合作基金啦、供销社股金啦，如果没有兑付，我们出个安民告示，保证兑付，把你们的问题解决。但是，你们不能阻断交通。如果阻断交通，就毫不客气地法办，并且要查清幕后策划者。不然的话，一天到晚到处交通阻断，秩序怎么维持、经济怎么发展？问题归问题，我

们一定给你们解决；但你们阻断交通、破坏公共秩序，就应该予以刑事处理。

我们这次到江苏来，在这个问题上得到了一个启示。就是国务院今年作的决定，《政府工作报告》里也讲到，下岗职工由企业再就业服务中心保障基本生活逐步转向享受失业保险，逐步并轨。现在看起来马上开始试点的条件还不足。还没有解决资金来源问题，怎么能并轨呢？当时决定在东部一些省和某些城市进行试点，不够慎重。但在个别地方，比如说在深圳、厦门这些经济实力雄厚的地方，也许有这个可能，不过这样的地方不会太多。所以，现在我们决定先不马上搞试点，有条件的省自己也可以试，主要是完善现有的社会保险制度，把“三条保障线”真正落实到位，这就很不错了。然后，着力扩大覆盖面，提高征缴率，加大管理的力度，实现社会化的发放，搞清楚养老金拖欠多少，不要虚报等等。把这些基础工作做好，为明年实施国务院统一的社会保障体系做准备。明年恐怕也要先在几个省进行试点，马上要在全国推开恐怕还有一些困难，因为全国的经济发展程度不一样。国务院统一作了规定以后再实行并轨，才能逐步建成一个社会化的保障体系。



2000年4月15日，朱镕基在江苏省高邮市武安乡向农民了解当地农民负担情况。

二、关于潜伏的金融风险

金融风险恐怕是最大的风险，因为我们有几十年的欠账，特别是1993年经济某种程度上的过热所留下来的乱摊子。全国银行有10万亿元的存款、9万亿元的贷款，其中有40%到50%是不良贷款，这是一个很大的风险。你怎么能把老百姓的存款都花掉呢？老百姓如果都要提款，你拿什么来兑付呢？就是印票子也印不过来呀。当然，问题还没到马上就要爆发那么严重，因为现在我们的经济还能稳定地发展，老百姓对我们党、我们政府还有信心，不至于都拿着存款折子来挤兑。但是，如果不注意这个问题，不良贷款的比例还在升高，就很危险了。这个问题，我们将分层次地解决。

首先是国有商业银行的问题。国有商业银行的贷款占到全部贷款的80%。它的不良贷款率高的问题不解决，一系列现代金融管理的机制和制度、考核和监管，包括领导干部的调任、离任和在任的审计等就很难进行，银行就办不好，而且非常危险。农业银行的不良贷款率最高，达到47%。中国银行也高达45%，我觉得很惊奇，中国银行怎么也这样胡搞？要好好地查一查，总结一下经验。这些不良贷款的形成，行长有责任，在座诸公也有一定责任哪！我们不能光怪银行，政府对银行的干预也很厉害。银行的素质差，没有一套风险管理的制度，又不懂经济、不懂生产，就银行论银行，不知道什么是重复建设，不知道什么东西投进去就变成不良贷款，我觉得这是银行最大的缺点。再加上地方领导频频打电话来要贷款，银行只好照贷。成克杰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给当地银行行长打电话，要银行给他指定的公司贷款，这些公司差不多都是私营公司，公司拿到贷款后，回扣就进了成克杰的腰包。

一般说来，地方党政领导的干预是从发展本地的经济出发的，是好意，当时也认为是有效益的，事后才知道好多是重复建设，钱都收不回来，结果好心办了坏事。所以，银行一定要建立风险评估制度，绝对不能接受外来的干预，对此行长要负责任。这次银行行长大调动，要进行离任审计，追究责任。一笔贷款几十亿、几百亿元，谁拍的板？有别人的责任，也有行长的责任。

金融风险还表现在乱集资。问题主要是来自农村合作基金会、供销社的股金部，还有各种信托投资公司、证券公司等。证券公司现在有90个，整顿了28个，剩下60多个，基本上都是各个银行系统自己搞的。不少证券公司污七八糟，有问题你找鬼去啊！我们现在尽量把一些风险在本届政府内解决掉，不然遗留下去，问题会越来越大。我们决定采用再贷款的方式，帮助地方解决农村合作基金会的问题，第一家是四川。最近开始解决供销社股金部的问题，你们江苏是第一家。最近对股金部做了一个调查，我冒估了一下，中央不拿出100亿元，江苏供销社股金部的问题就解决不了，你们得有思想准备。全国为此付出的代价要上千亿元，那就只能印票子。我们以后绝不能再干这种傻事了，100个亿可以干好多事嘛，长江大桥都可以修八九座了。你们用30亿元修长江二桥，其实拨款也就只有10亿元，还包括国债和各种基

金，其他用的是国家开发银行的贷款。所以，大家今后再不要搞乱集资了。昨天，我看了一份材料，有一个省，各级政府负债之多使我大吃一惊，村和乡政府、县政府向农民摊派，平均一个村欠债50万元，一个乡欠债400万到500万元。对这个问题，现在许多“县太爷”还不太清楚，好多是他前一任干的，到了有一天风吹草动、老百姓要来挤兑的时候，他才能发现呢。江苏省的金融状况一点不比其他地方好，你们地方搞的乱集资，严重程度也不比别的地方差。今后一定要充分注意到这个问题。我们过去这么多年，干了很多傻事，现在要为此付出代价。付出这个代价买点教训，今后不要再搞了！正规地搞嘛，那就能多快好省；搞邪门歪道，是花冤枉钱，也搞不出一点名堂。

对农村信用社的改造问题，我们这次在江苏受到了启发，使我们原来的想法更加具体化、更加深刻，就是农村信用合作社是最好的联系农民的金融纽带，应该把它真正办成帮助农民解决生产、生活需要和调整农业结构的金融机构。现在，农民调整产业结构所需要的资金没法解决，缓解生产、生活困难的资金也解决不了，哪一个银行都不肯给农民贷款。农村信用社目前也起不了这个作用，一是它的包袱很重，负债累累，很大一部分是过去跟农业银行分家时甩过来的包袱。我们这次回去以后一定要把农村信用合作社的这个包袱甩掉，实行分账处理，历史问题要分开解决，不能把这个负担加在现在的农村信用社身上，使它不能正常经营。二是农村信用社的信贷方向不应该放在县城里，而应放在农村。它在农村的存款资金不能流入城市，应该从城市流回农村。农村信用社县联社的营业部要改变方向，把钱贷到农村去。在县城里面的存款也应该贷到农村去，不应该在县城里做文章。因为县城里面有的是各银行的分支机构，而农村没有人管。这个改变当然很不容易，但一定要改变。三是把农村信用社县联社办成一个法人，乡村的由它直管，作为它的办事处或分支机构。这样就便于统一调度县里的资金，来帮助农业生产的发展和农村产业结构调整。还可以考虑在地市甚至省里成立一些联社或者协会。这要慢慢来，先把县联社整顿好，改变它的信贷方向，充实它的资金。为此，我们还探讨了一条路子，就是把现在农村的邮政储金统统返还给农村信用社，由人民银行来办。邮政储金只能储款，不能贷款，因为一贷款就跟农村信用社发生矛盾。譬如说，你们江苏的县和县以下的农村邮政储金有10亿元，都上缴给人民银行，上缴以后全部作为再贷款如数返

还给农村信用社，返还利率要降低。县和县以下的邮政储蓄如数返还给农村信用社，城市里面的邮政储金则有其他用途。再就是农村信用社本身要整顿，要减人。现在农村信用社亏损，江苏省累计亏损20多亿元，这是不行的。你是金融机构，就是把存款变成贷款，中间收一道手续费，怎么会亏损呢？毫无理由可讲。问题在于人多，养的人太多了。所以，一定要精简机构、减人，把农村信用社变成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展农村金融的一支主力军，要赋予它这个历史任务。我们回去以后，要经过进一步的调查研究，形成一个文件，报请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审定后发出。国务院决定，在中央文件还没有出来以前由江苏省先行试点。我原来心里一直有一个问题，就是农民的资金需求怎么解决，一直没有想到好的方式。现在认为，农村信用社正好能担当这个历史任务，其他银行就不要再在农村搞了，都从农村撤出来，在县城以上的城市搞，有的县城也不必要搞。农村信用社的贷款对象不是乡镇企业，贷款给乡镇企业，你一定会亏损，因为你没有评估乡镇企业风险的能力。连农业银行也要很慎重，现在农业银行亏损，大部分是由于乱七八糟地支持一些乡镇企业，钱收不回来。我昨天开玩笑说，我甚至于怀疑农业银行还有没有存在的必要，一年亏几百亿元，要你干啥！干脆把这几百亿元分给农民算了。如果农村信用社搞好了，农民需要的资金能解决了，农业银行存在的价值真的就不是很大了，因为你们贷款给工业项目的工作完全可以由工商银行来做啊。但是，请农业银行的同志放心，我绝没有要撤销农业银行的意思，这是我对你们发出的警告。如果你们再不自力更生的话，就有被淘汰的危险！

三、关于农村和农业的风险

解决了吃饭问题，是我们取得的历史性成就之一。美国艾奇逊的白皮书①曾预言，中国人解决不了自己的吃饭问题。如今，我们解决了这个问题，而且粮食供过于求。现在粮食企业的库存粮食有5160亿斤，相当于一年产量的55%。如果加上农民手里的余粮，大体上有1万亿斤。中国人民现在是丰衣足食啊！但是，带来的问题是粮食不值钱，增产不增收，甚至收入下降。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就会影响农民的种粮积极性。农民一弃耕，马上就会发生危险。当然，现在对这个危险还不是那么太害怕，因为我们有了缓冲的余地了。但不可以不

重视，我们在苏北的大量调查证明，现在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还是敞开收购，还是“三项政策，一项改革”。现在粮食价格我们之所以没有控制住，顺价销售也有困难，是因为我们敞开收购的政策没有落实好。根据全国的调查，现在只收了农民余粮的三分之二，还有三分之一在农民手里没有收。江苏好一点，收了80%，这是你们讲的。这次聂振邦②在扬州做了调查，结论是扬州的粮食工作做得 很好，但是他们的汇报有点水分，事实上也没有收购到80%，还差几个百分点，也没有做到常年挂牌敞开收购。我亲自向一些农民调查，他们反映粮食部门压级压价，实际上收不了，农民等着钱用时不得不把余粮卖给私商。在江苏这种商品粮比较多的地方尚且如此，可见在河南、河北这些产区的余粮就更难做到敞开收购了。全国收购了农民余粮的三分之二，真是不错了，这三分之二就稳住了粮价，但是毕竟还有三分之一没收。国有粮站不收，私商就收，他们一收就压价。我在河北调查时，玉米1元3斤；在徐州调查时，小麦3角8分到4角一斤。我怀疑这个价格农民未必肯卖，太低了。之所以市价这么低，关键是国有粮站不收购。在粮食基本上供过于求的情况下，这个问题不是什么“放开收购”所能解决的。放开收购，私商进村，他们会以高于我们的保护价去收购吗？不可能嘛！他们只会压价。为了防止私商压价，解决的办法，就是在国有粮站挂一块牌子，一年365天，天天按保护价收粮食，这样，价格就稳定了。当然，不能压级压价，也要坚持按质论价。在这种情况下，再放开收购就一点危险都没有了，谁去收购粮食都没有关系。为什么呢？因为农民不会傻到那个程度，明明这里敞开收购6角钱一斤，还非要按3角3分一斤卖给私商，那才怪呢！放开收购是我们执行中央粮食政策的一个结果，最后是可以放开收购的，但并不是解决当前农民“卖粮难”的手段，我们不提高收购率就不能放开收购。因此，我们准备在夏收前召开全国粮食工作会议，明确这个问题，进一步落实敞开收购政策，增加财政补贴。国有粮食企业为什么不愿敞开收购呢？它赔不起啊，那就给补贴，这是国家一个“愉快的负担”呀，必须补贴，任何一个国家都补贴，何况中国呢？为此，必须补充粮食风险基金。现在基本上定了一个保护价，小麦大概是每斤5角7分到5角9分，已经有所下降了。有些省要求价格还要下降一些，我们考虑不能下降太多了，否则会影响农民的收入，使农村不稳定。这个价格将影响农民少收入80亿元。我现在初步决定把这80亿元退回去，补充给粮食风

险基金。粮食风险基金现在大概有250亿元，补充80亿元就等于增加了三分之一。这样就可以由现在收购三分之二变成收购90%。如果我们能够收购到90%以上，农村的粮价就不会掉下来了，农民的利益就能够得到保护了；粮食企业顺价销售就比较容易，不会再出现亏损了。这都是很有好处的。这80亿元怎么解决呢？还是采取现在的比例，中央补助多少，地方相应拿出多少。地方确有困难时，中央只好用再贷款的方法借给地方钱。当然，这一系列问题都还要认真研究和落实。比方说，这个补贴能不能到达基层，会不会被层层挪用、克扣，就是个很大的问题。恐怕要由财政搞清楚补贴情况，开出账单，把钱一下子拨到基层，不能层层拨钱、分钱，分到最后也到不基层。只有保证中央粮食风险基金真正拨到基层，才能够真正地增加收购。关于这个问题，我们通过这次在江苏的调查，有了很大的收获，更坚定了对"三项政策，一项改革"的信心。苏北有些地方做得还是不错的，要进一步做好。还是要减人。另外要政企分开，江苏省已经成立了粮食公司。县粮食局应该同粮食公司分开，应该去监督它，不应该"吃"它，"吃"它还得了啊！要监督它敞开收购，不能压级压价。粮食局同国有粮食公司不能搞在一起，政企不分就是垄断，一垄断就会滋生腐败。必须有个政府在旁边监督它。总之，我认为农村和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这个问题不妥善处理，我们的经济发展长久不了，会存在极大的风险。

---

① 美国艾奇逊的白皮书，指美国国务院在1949年8月5日发表的、由国务卿迪安·戈德拉姆·艾奇逊主持编写的、题为《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的白皮书。艾奇逊在这部白皮书编好后，于1949年7月30日致信美国总统杜鲁门。艾奇逊在信中说："中国人口在十八、十九两个世纪里增加了一倍，因此使土地受到不堪负担的压力。人民的吃饭问题是每个中国政府必然碰到的第一个问题。一直到现在没有一个政府使这个问题得到了解决。"转引自毛泽东：《唯心历史观的破产》，《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510页。

② 聂振邦，当时任国家粮食局局长。

我讲的这三个问题，是国务院最关心的三个问题。我们通过这次到江苏来调查研究，受到了很大启发。同志们做了大量的工作，给我们

提供了经验和教训，使我们能够形成一些对全国有指导意义的政策。在此，我向同志们表示感谢。

“三农”问题的严重性不容忽视

(2000年5月4日)

2000年3月22日，国家信访局《群众反映》第28期，以《一位乡党委书记对农村现状的忧思》为题，摘登了湖北省监利县棋盘乡党委书记李昌平就当前农村工作中存在的问题致朱镕基同志的信。信中说：“现在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2000年3月27日，朱镕基同志指示农业部派人调查。经调查，李昌平反映的问题属实。这是朱镕基同志在农业部的暗访调查报告上的批语。

请锦涛①、岚清①、家宝①同志阅示，并请计委主任、财政部长认真看看。抄报贾志杰①、蒋祝平①同志。“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虽非全面情况，但问题在于我们往往把一些好的情况当做全面情况，而又误信基层干部的“报喜”，忽视问题的严重性。

朱镕基

5.4

① 锦涛，即胡锦涛。岚清，即李岚清。家宝，即温家宝。贾志杰，当时任中共湖北省委书记。蒋祝平，当时任湖北省省长。

缅怀李富春、蔡畅同志

(2000年5月22日)

这是朱镕基同志在中共中央纪念李富春、蔡畅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

今年5月22日和5月14日，分别是李富春、蔡畅同志诞辰100周年。李富春同志是我们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奠基者和组织者之一，蔡畅同志是我国妇女运动的先驱和卓越领导者、国际进步妇女运动的著名活动家。这一对同年同月诞生的终身革命伴侣，是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重要贡献。今天，中共中央在这里举行纪念座谈会，回顾他们的生平，追思他们的业绩，以表达对他们的缅怀和敬仰之情。

李富春和蔡畅同志在法国勤工俭学期间，由于共同的信仰和志向产生真挚的感情，1923年结为伉俪。这以后，两位革命家相濡以沫，把深厚的情感融入对真理的孜孜追求和为崇高事业的不懈奋斗之中，成为党内外的楷模。

追思他们的业绩，我们应当学习他们爱国主义的伟大精神，为民族振兴、祖国富强而贡献力量。李富春和蔡畅同志出生在八国联军占领我国首都北京、整个中华民族蒙受奇耻大辱的年代。他们青年时期就爱国忧民，毕生以国家独立、民族振兴、社会进步、人民幸福为己任。为了中国的独立和人民的解放，他们在革命战争的岁月中出生入死，奋不顾身；为了新中国的繁荣和富强，他们在和平建设的年代里呕心沥血，殚精竭虑。我们要以李富春和蔡畅同志的爱国主义精神激励全党和全国人民，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努力把中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在21世纪的伟大复兴。

追思他们的业绩，我们应当学习他们对党和人民的无限忠诚，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的信念，增强对改革开放和现代化

建设的信心、对党和政府的信任。李富春和蔡畅同志很早就接受并信仰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之一。一旦确立了这个信仰，他们就义无反顾，坚贞不渝。无论是反动势力的白色恐怖，还是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艰难困苦；无论是建设时期曾经发生的严重困难，还是“文化大革命”的巨大浩劫，都丝毫没有动摇他们对党和人民的赤胆忠心。即使受到某些误解甚至身处逆境，他们也是既坚持真理，又顾全大局。我们要像李富春和蔡畅同志那样百折不挠，不怕任何困难和挫折，坚定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在改革攻坚和经济发展中，充满信心地完成历史和时代赋予我们的崇高使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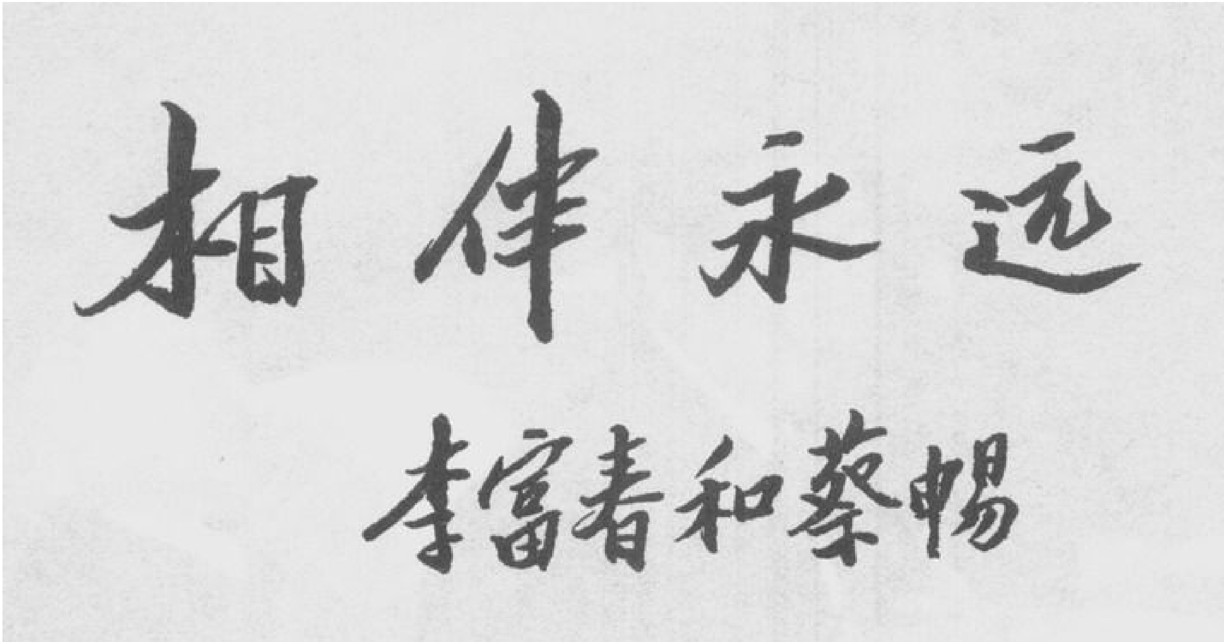
追思他们的业绩，我们应当学习他们实事求是、求真务实、勤勤恳恳的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脚踏实地做好各项工作。在长期领导经济工作的过程中，李富春同志以实干家在党内外著称。他注重实践，深入基层，足迹遍布祖国的大江南北、工矿农村。他从实际出发，不断总结经验，在经济工作中提出许多适合国情的思想和政策主张，对我国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产生了重要作用。蔡畅同志在妇女工作的领导岗位上，多次深入基层调查研究，了解妇女的疾苦和困难，帮助她们解决实际问题。我们要大力发扬这种实事求是、注重实干的作风，在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不断研究来自实际的新情况、新问题，力戒表面文章和形式主义，不务虚名，讲求实效，把中央确定的各项方针、政策和任务落到实处。



2000年5月22日，朱镕基在中共中央纪念李富春、蔡畅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上讲话。右一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原常委宋平，右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温家宝。

追思他们的业绩，我们应当学习他们谦虚谨慎、严于律己、艰苦奋斗、大公无私的崇高情操，保持共产党人的革命气节和高尚品格。李富春和蔡畅同志德高望重，功勋卓著，但待人谦和，从不居功自傲。对于“大跃进”中出现的问题，李富春同志多次从国家计委主任的角度主动承担责任。他们身居党和国家领导的高位，却平易近人，节检朴素，既严格要求自己，也严格要求女儿和亲属，始终保持人民公仆的本色。李富春同志在弥留之际与蔡畅同志相约，在他去世后将生前的全部积蓄作为党费上交给中央；蔡畅同志病中留下遗嘱，后事从简，不举行遗体告别仪式，不开追悼会。他们都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再次表现出共产党人的高风亮节。我们要以李富春和蔡畅同志为榜样，在全党特别是党的各级领导干部中间牢固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按照“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的要求，加强党性修养，倡导廉

洁自律，反对腐败奢靡，自觉抵制各种腐朽思想的侵蚀，进一步端正党风，并带动整个社会形成健康、积极、向上的良好风气。



为了纪念李富春、蔡畅同志诞辰100周年，北京电影制片厂拍摄了反映他们一生坎坷历程的电影《相伴永远——李富春和蔡畅》。图为朱镕基应邀为该片题写的片名。

同志们，缅怀李富春和蔡畅同志的丰功伟绩，我们欣喜地看到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开创的事业已经大大向前推进，前途无限美好。让我们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紧密地团结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忠实地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和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努力落实党的十五大提出的各项任务，抓住机遇，开拓进取，在新世纪继续创造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光明前景。

坚持按保护价敞开收购农民余粮的政策

(2000年5月25日)

2000年5月25日，国务院在北京召开全国粮食生产和流通工作会议。出席会议的有粮食主产区的常务副省长，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丰管粮食工作的副省长(副主席、副市长、副司令员)，计划、农业、财政、粮食、物价、工商管理部门和农业发展银行的负责同志，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的负责同志。这是朱镕基同志在会上讲话的一部分。

自1995年以来，我国粮食连续五年丰收。目前国有粮食企业库存粮食5160亿斤，加上农民自己的存粮，大体上有1万亿斤，相当于全国一年的产量。我们已基本解决了12亿多人口的吃饭问题，这是一个了不起的伟大成就。取得这样的成就，从根本上说，是由于中央制定和实施了一系列正确的农村政策，同时，农业科技进步也对农业生产发展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三年前，中央实施了以“三项政策，一项改革”为重点的粮食流通体制改革。在这期间，针对粮食生产和流通中出现的新情况，又对粮改政策不断加以完善，各地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显著的成效。

粮改政策是否正确，农民最有发言权。最近，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和国务院有关部门组织调查组，做了比较广泛、深入的调查，有些还采取微服私访的形式。在调查中，农民衷心拥护中央的粮改政策，特别是按保护价敞开收购农民余粮的政策。如果没有这样的政策，农业和农村不可能有今天这样好的局面。

当前粮食生产和流通出现了一些新情况、新问题，主要是有些地方农民卖粮难，市场粮价下跌，农民增产不增收。不少地方的农民减少农业投入，放松田间管理，甚至出现了撂荒、弃耕现象，一些种粮大户要求退出承包。

出现这些问题的原因，主要是中央关于按保护价敞开收购农民余粮的政策没有得到完全落实。有的地方只在一段时间内按保护价敞开收

购，其他时间停收、拒收，没有做到农民随时交、随时收；有的地方只按保护价收定购粮，定购以外的部分则按市场价随行就市收购，实际收购价比保护价低得多；还有的地方在收购中压级压价，没有执行优质优价政策。对粮食生产和流通中出现的这些问题，必须采取切实措施加以解决。

关键是要进一步落实和完善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特别是按保护价敞开收购农民余粮的政策。既要解决思想认识问题，又要解决实际困难，概括起来说就是："统一一个认识，完善三条措施。"

首先要统一认识。按保护价敞开收购农民余粮的政策，是中央粮改政策的基石与核心。这项政策不仅符合我国粮食生产和流通的现实情况，有利于解决当前面临的矛盾和困难，而且符合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的方向，是国家保护农民利益和保障农业持续发展的法宝。我们在农村调查时，广大干部群众都说："保护价政策千万不能变。"

只要国有粮食购销企业坚决贯彻这个政策，挂牌标明保护价格，一年365天，天天收购，粮价就不可能下跌，农民就不可能以低于保护价的价格把粮食卖给私商，农民的利益就可以得到有效保护，国有粮食购销企业就可以做到顺价销售，国家财政负担也就可以减轻。因此，一定要把"敞开"与"放开"的关系搞清楚：放开粮食收购市场的前提是，国有粮食购销企业真正做到按保护价敞开收购农民的余粮。对于实行保护价的粮食品种，如果国有粮食购销企业没有做到按保护价敞开收购，就不能"放开"。简言之，只有"敞开"，才能"放开"。对于这一原则，从上到下都必须十分明确。

有的同志说，为什么不利用价值规律呢？粮食多了放开价格，价格下来了农民就少种，市场供求就平衡了，要用"无形的手"，而不要用"有形的手"来指挥农业生产。实际情况并不这么简单。我国有9亿多农民、19亿亩耕地，农民不种地干什么？而且，调整产业结构和农业种植结构不可能那么容易，需要科学技术、市场调查、资金投入和其他许多配套条件，要有一个过程。不是粮食价格一降低，农民就可以不生产粮食而去生产别的东西，就能马上起到调节生产的作用。如果停止按保护价敞开收购农民余粮，粮价继续下跌，农民种地不划算了，他们就会弃耕，农业生产能力就一下被破坏了。这种教训不少，我们是经不起这种折腾的。

按保护价敞开收购农民余粮的政策没有得到很好落实，除了认识上的原因外，也有客观条件的因素，主要是粮食风险基金缺口较大，粮食仓容不足。针对这种情况，国务院决定进一步完善以下三项粮改配套措施：

一是增加粮食风险基金，解决财政补贴不到位问题。粮食生产多了，市场价格下降，就要给农民以补贴，这是世界上许多国家的做法。美国政府用在农业上的补贴在全世界是最多的。我们在农业上的补贴并不算多，即使增加一些补贴，也是值得的。我多次讲过，这个财政负担是一个“愉快的负担”。据有关部门匡算，再增加80亿元，就可以基本满足敞开收购的需要。

二是继续增加储备粮库建设，解决仓容不足问题。1998年，国家决定用国债资金建设500亿斤仓容的国家储备库，已基本完成。今年和明年要再分别安排200亿斤仓容的粮库建设。这项工作必须抓紧，所需资金应尽快全部安排下去，修得越快越好，但要切实保证工程质量。今年已安排的200亿斤仓容建设，争取年内完成；明年200亿斤仓容建设，今年年底以前要把前期工作做好，定好点，做好准备。这样，到明年年底，我们就可以增加900亿斤仓容，这就主动多了。要利用现代化仓库来推陈储新，保证国家储备的粮食都是新粮、好粮。把粮食保管好，需要时能用得上，灾荒时就不怕粮荒了。为缓解当前粮食主产区基层收粮库严重不足的困难，农业发展银行要安排简易建仓贷款给以支持，由省级财政统一贴息。农业发展银行要保证国有粮食购销企业收购粮食的资金需求，并继续做好封闭运行工作。



2000年4月14日，朱镕基在江苏省淮安市考察二堡国家粮食储备库。右一为江苏省省长季允石，右四为江苏省委书记回良玉。

对于如何处理陈化粮的问题，要采取很慎重的态度。去年，有的粮食购销企业把不是陈化粮的粮食以陈化粮的名义低价销售，发生了很多问题。收购来的粮食不一定要马上卖出去，小麦存放两三年后再卖质量可能更好些。要采取推陈储新的轮换办法逐步加以解决，陈粮新价，也算做顺价销售。先不要大规模地处理陈化粮，否则新粮也销不出去，而且会造成大量的国有资产流失，滋生腐败现象。总之，一定要慎重行事。另外，绝不能以处理陈化粮为名，降价销售粮食，套取中央补贴。

三是落实和完善适当“放开”的政策，拓宽粮食购销渠道。上面已讲过，只要国有粮食购销企业真正做到按保护价挂牌敞开收购农民余粮，放开收购市场是没有危险的；但完全放开现在还做不到，只能适

当“放开”。要根据粮食的不同品种，采取不同政策。第一，对仍然被列入保护价收购范围的粮食品种，收购渠道可进一步适当拓宽，允许和鼓励经省级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审核批准的用粮企业、粮食经销企业，直接到农村收购粮食，发挥它们搞活粮食流通的积极作用。这样，有利于减轻财政和粮食部门的压力，有利于粮食的加工和转化，促进粮食生产向优质、专用方向发展，推进国有粮食企业转变经营机制，改善服务。第二，对于退出保护价收购范围的粮食品种，允许经地市或县级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审核批准的用粮企业、粮食经销企业，直接到农村收购粮食，这方面也不要把门槛抬得太高。要注意解决早籼稻等粮食品种退出保护价收购范围的后续问题。国有粮食购销企业要按照“购得进、销得出”的原则，积极组织收购，农业发展银行要给予贷款支持。第三，集贸市场要常年开放，鼓励农民通过集贸市场出售自产的粮食，不受数量限制。经县级以上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批准的用粮企业、粮食经销企业和私营、个体粮商，可以到农村集贸市场批量购销粮食。粮食收购市场适当放开以后，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要加强市场管理，严禁无照和违规经营，维护正常的市场秩序。

调整农业结构，是促进农业和农村经济健康发展的关键，也是增加农民收入的一个重要途径。各地一定要在这方面下很大的工夫。农业结构不调整，农村经济很难有较大发展，农民收入很难有较快增长。当前，我国粮食充裕，为调整农业结构提供了难得的时机和条件。农业结构调整，主要是抓好以下三个环节：一是优化粮食品种结构，二是优化农业产业结构，三是优化农业和粮食生产布局。

调整农业结构、优化粮食区域布局，关键是要坚持面向市场，适应市场需求的变化，充分尊重农民的生产经营自主权。各地要加强对市场需求的预测，引导农民适应市场变化，调整生产结构，防止一哄而起、形成新的产品积压。特别是绝对不能搞行政干预和强迫命令。昨天晚上，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节目报道了重庆市巫山县部分乡镇“铲苗种烟、违法伤农”的事件，我看后心里久久不能平静。这些地方的农民不愿多种烤烟，尤其反对不留足口粮田、强行烤烟净作①的做法，而县、区、乡镇为了多收农业特产税，也不管烟叶销路如何，层层下达烟叶种植任务。农民不愿意铲青苗(粮食)，区、乡镇领导就带领包括武装部干部、治安人员在内的工作组进村入户突击铲苗，还对阻

止铲苗的农民进行殴打和体罚。有个农民逃走了，镇干部将他抓回来，揍了一顿后还是强迫他种烟叶。这是一起违反党在农村的基本政策、侵犯农民合法权益、危害农民人身安全的严重事件。我已责成国务院办公厅尽快组织有关部门前去调查处理。历史上曾多次发生强迫农民种这种那的现象，造成了十分严重的后果。殷鉴不远，教训深刻，绝不允许再干这类荒唐的事。

---

① 烤烟净作，指在规划种植烤烟的区域内不准种植其他作物。

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的几个问题

(2000年5月26日)

2000年5月26日，朱镕基同志在北京中南海主持召开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座谈会。出席会议的有国务院有关部门和北京、河北、内蒙古、辽宁、陕西等省区市有关负责同志。朱镕基同志在会上的讲话，曾发表于《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册；原标题为《加快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切实保证国家长治久安》。编入本书的是讲话的一部分。

建立统一、规范和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一项带有根本性的制度建设，也是一个开拓创新性的重大改革任务。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党的十五大和十五届四中全会已经提出了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的目标、原则，我们要坚决贯彻落实。

一、明确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的工作重点和范围。

社会保障体系包括社会保险、社会福利、社会救济和社会优抚等项内容。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的工作重点是：搞好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和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建设。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范围要覆盖城镇各类企业，实行企业化管理的事业单位也要包括在内；失业保险的范围除了要覆盖城镇的各类企业外，还要覆盖各类事业单位；基本医疗保险的范围要覆盖城镇全部企业、事业和机关单位的所有职工。公务员的养老保险办法有别于企业事业单位，但也要同时抓紧进行研究。

对农民的社会保障办法应该不同于城镇居民。目前，我国农村尚不具备普遍实行社会保险的条件。农村实行家庭承包责任制，承包到户的土地是农民的基本生产资料，也是农村居民基本生活的重要保障。农民养老以家庭保障为主，与社区扶持相结合。有条件的地方，根据农民自愿，也可以实行以个人储蓄为基础的商业养老保险。

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的目标和要求。

建立统一、规范和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必须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有利于保障劳动者的合法权益，有利于推进改革和发展，有利于维护社会稳定。总的目标是，建立独立于企业事业单位之外、资金来源多元化、保障制度规范化、管理服务社会化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保障体系。基本内容应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必须建立真正独立于企业事业单位之外的社会保障体系。企业事业单位只履行依法缴纳社会保险费的义务，不再承担发放基本社会保险金和管理社会保障对象的工作。

第二，社会基本保障的标准要与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各方面的承受能力相适应。要借鉴和吸取国外的经验教训，合理确定社会基本保障的标准。我国现在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发展水平比较低，社会基本保险的缴费水平和待遇水平都不能过高。否则，各方面承受不起，也会影响国家经济发展和企业竞争力。欧洲有些国家一度把社会福利水平搞得过高，使国家财政出现巨额赤字，最后被迫降低标准或加税，引起了社会公众、企业的不满。当然，标准也不能太低，否则社保金领取者就难以维持基本生活。具体来说，基本养老保险的标准，要使职工在退休以后能够维持中等生活水平；失业保险的标准，要使失业人员能够维持基本生活，过高就会形成养懒汉机制，不利于激励他们积极寻求再就业；基本医疗保险的标准，要能够满足职工一般的基本医疗需求；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的标准，要能够保证贫困居民的基本生存条件。高层次的社会保障需求，应通过补充保险和商业保险来解决。要制定全国大体统一而又有地区差别的社会基本保障支付标准、项目和范围，以利于促进劳动力的合理流动。

第三，由近及远，首先完善和规范“三条保障线”，即完善和规范社会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和失业保险制度、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要结合我国国情，进一步规范、完善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企业事业单位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今后，企业事业单位职工退休后，养老金的待遇水平要与他们在职期间的缴费情况挂钩。目前，在国有企业建立再就业服务中心，企业为下岗职工发放基本生活费和缴纳社会保险费，是一个过渡的办法。要进一步加强失业保险制度建设，逐步使下岗职工由现在先进入再就业服务中心领取基本生活费，转为领取经济补偿金并与企业解除劳动关系，直

接享受失业保险。失业保险期满后未实现再就业的，可以进入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是保证生活困难人员得以温饱的“最后保障线”。没有进入再就业服务中心，以及没有参加社会保险的各类企业职工下岗或失业后，凡是符合规定标准的，都可以进入这条保障线。要改进和完善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例如，保障对象不能只限于鳏寡孤独，要扩大到所有下岗职工和失业人员。对保障对象实际收入水平的了解要准确，申请、评审和发放最低生活保障金的程序要规范。要严格审查，张榜公布，接受监督，做到公开、公平、公正。



2000年4月24日，朱镕基在辽宁省大连市桂林街道社区服务中心了解社会保障工作的情况。左三为辽宁省委书记闻世震。

第四，实现社会保障对象管理和服务的社会化。退休人员、失业人员要与企业事业单位脱钩，由社区组织统一管理，社会保险金实行社会化发放。社会保障管理和服务的社会化工作，应当依靠街道办事

处、居民委员会和社区组织来做。这些基层组织可以发挥很重要的作用。例如，为退休人员提供生活和其他服务，帮助下岗职工和失业人员实现再就业，落实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以及社会救助责任等。前不久，我在辽宁省本溪、抚顺、鞍山和大连市召开社会保障工作座谈会时，专门请了街道办事处、居民委员会负责人介绍他们做社会保障工作的情况，听取他们对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的意见，在大连市还实地考察了社区服务中心和居民委员会。这些基层组织贴近群众，对每个家庭的情况都很了解，不仅帮助贫困居民解决生活困难，而且千方百计帮助下岗职工推荐工作，还通过发展社区服务创造了不少就业机会。他们组织严密、工作细致、服务周到、待人体贴、效率很高，群众很欢迎，称他们是小巷“总理”。他们的工作，体现了社会主义的社会准则和道德风范，也符合中华 民族的传统美德。古人说：“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①扶贫济困、抚老恤幼、家庭和睦、邻里互助的风尚，应该大力弘扬。要大力加强社区的组织建设和基础设施建设，强化社区服务功能，提高社区管理和服务水平。在这方面，民政、劳动和社会保障以及财政等有关部门，要给予更多的帮助和指导，积极支持基层组织搞好社会保障工作。

---

① 见《孟子·梁惠王上》。

第五，健全社会保险基金的监管和保值增值机制。社会保险基金收缴、支付及营运要规范化、制度化，做到公开、透明、安全。同时，还要考虑如何使社会保险基金通过投资运作实现保值增值。在这方面，国外有不少经验，要抓紧研究。根据我国国情，借鉴国外成功经验，提出切实可行的办法。

第六，广泛运用现代信息技术手段，建立覆盖全国的社会保障服务信息网络。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必须实行现代化管理，用传统的管理手段和方法不能保证社会保障体系的顺畅运行，也不利于实施有效的监管。比如，现在各地企业拖欠的基本养老金到底有多少，就很难说清楚，影响正确决策，对漏报、误报甚至虚报冒领的现象也难以发现和纠正。因此，大力采用现代信息技术手段，实行现代化管理，是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环节。要建立一个功能齐全、覆盖面广、规范透明的社会保障信息网络。社会保险资金的缴纳、记录、核算、支付

以及查询服务，都要纳入计算机管理系统，并逐步实现全国联网。这样，既能方便保障对象，又能做到有效管理和监督。

第七，加强社会保障体系法制建设。要依法规范和管理社会保障工作。这几年，国务院已经出台了一些有关社会保障的行政法规和规章，比如《失业保险条例》、《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条例》、《社会保险费征缴暂行条例》等。现在的问题是有法不依，执法不严。例如，不少地方不按规定向外资企业、私营企业征收社会保险费，对欠缴户追缴不严。要加大执法力度，同时要进一步加快社会保障立法进程，将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纳入规范化、制度化、法治化的轨道。

加紧培养科技人才

(2000年6月7日)

2000年6月5日至9日，中国科学院第十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五次院士大会在北京召开。这是朱镕基同志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为两院院士所作形势报告的一部分。

为适应新形势的挑战，当前一个重要问题是人才培养。没有人才，一切等于零。国有企业的问题，固然与机制不健全、制度不完善有关，但很大一部分原因是一些企业领导人的无知，他们不知管理为何物。我讲过“管理科学是兴国之道”，而有的人连什么叫企业管理制度都不清楚。现在科技人才的竞争非常激烈，虽然我们加大了对教育和科技的投入，特别是加大了在人才培养方面的投入，但是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培养出来的人才许多出国了。有一个统计说，微软公司60%的员工是亚裔，而亚裔员工的70%来自于中国，其中大多数是北大、清华的毕业生。也就是说，微软公司全部技术人员中有42%是中国人，等于我们从小学一直到大学无偿地替它培养人才。据说清华、北大的学生出去以后许多人都不回来了，即使回来也是以外国公司驻华代表的身份回来的。这些和我们打交道的人，早就把我们的情况了解透了，跟他们打交道时我们往往会吃亏，因为他们是最优秀的，而且他们最了解中国。听说现在有些外国大公司又在打你们院士身边的秘书和助手的主意了，你们要小心呀。



2000年6月7日，朱镕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接见出席中国科学院第十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五次院士大会的科学家。

但是，我们不能因此就不鼓励留学，问题的关键是我们在鼓励留学的同时，也要有适当的政策能够把他们吸引回来。我们从去年开始就在研究这个政策，最近要发一个文件，搞一些试点。文件内容大体包括两个方面：其一，对于银行、证券、保险行业和国有大中型企业，允许它们吸引在国外的中国留学生回来，工资待遇由它们自定，国家不加控制。一是根据留学生本人的真才实学，二是根据行业、单位的承受能力，你觉得应该给多少工资就给多少工资。没有这一条，人才吸引不回来。特别是银行、证券、保险等部门，业务人员不熟悉国际金融那一套就会老吃亏。这些方面不培养出一批国际的、顶尖级的人才，我们休想在国际社会立足。所以，得付出一点代价，花钱把人才请回来。国有企业也是这样。这方面我们将要完全放开。其二，科研和教育部门同样要吸引人才回来，这也要根据真才实学，应该给多少工资就给多少工资。但是，因为科教部门是吃“皇粮”的事业单位，需要按程序报批。花国家的钱不报批不得了，一个研究所所长或者一个研

究院院长随便就决定给某个科学家年薪100万美金，这恐怕不行，因为这100万美金不是这个单位自己创收的，而是从国家财政口袋里拿出来的，要按照一定的程序报批。当然，我们也可以采取其他形式提高待遇，比如企业可以给管理人员一定的股份，可以试行年薪制等等。再者，我们一定要注意平衡。就是说，虽然现在可以给新回来的留学生比较好的待遇，但不能让早先归国的留学生觉得早回国的不如晚回国的。还是要根据他们对国家作出的贡献，给予相应的待遇。

在我去年12月访问新加坡时，李光耀①对我说，不一定要花那么多钱才能把留学生吸引回来，工资只要比国内高两倍就可以了。他讲的还是有一定道理的：首先，在外国工作，毕竟不像在国内，总会受到各种各样的歧视。即使你的地位很高，但人家看你的眼光也不一样，谁也不愿意一直在那样的环境里工作和生活。一般来说，如有机会，留学生还是希望能回来为祖国效力。其次，国内外的生活水平不一样，同样的生活所需要花的钱是不一样的。比如说，质量完全相同的房子，在深圳只要100万元，在香港地区就要1000万元。再者，出国时间稍久一点的留学生，在有了一些存款能保证基本生活的情况下，更重视的还是事业和归宿感，所以，一般还是愿意回国的。因此，我们可以考虑利用国内的各种有利条件来吸引国外的人才，而不一定要给予像在外国那样高的待遇。

---

① 李光耀，当时任新加坡内阁资政。

所以，要稳定人才，我看归根到底还是应该提高工资。现在的工资虽然还很低，但保证大家的基本生活是没有问题的，当然生活确实还不富裕。特别是国家公务员、知识分子，如果不给他们相应的待遇，跟外国人一比差那么多，好像中国人比别人矮一头，那也不太好。虽然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不可比的，但是确实也应该提高工资。

电力体制必须改革

(2000年6月13日)

二滩水电站位于四川省攀枝花市，是为满足川渝地区电力增长需要而建设的，1999年12月全部建成投产。由于电力市场的变化和管理体制的原因，二滩水电站从1998年8月第一台机组投产以后，发电效益一直未能得到有效发挥，电站被迫大量弃水，二滩开发公司正常经营受到了严重影响。这是朱镕基同志在《二滩水电站有关情况》一文上的批语。

请泽民①同志参阅。二滩电站大量弃水，并不是由于电价高(发电成本低，由于投资贷款利息高，导致还本电价高)，因核定电价0.31元/度，实际上网电价只执行0.18元/度，这样便宜也不让发，1998年弃水电量15亿度，1999年弃水81亿度，今年可能弃水120亿度。造成如此大的浪费，主要是电力体制改革滞后，必须改变省为实体的现状，实行跨区设公司，厂网分开，竞价上网，多发水电，限制火电，关停小电厂，这样每年可能节约发电成本以百亿元计。

朱镕基

6.13

① 泽民，即江泽民。

请泽民同志阅。二滩电站大量弃水并不是由于电价高（发电成本低，由于投资贷款利息高，导致还本电价高），因核定电价0.31元/度，实际上网电价只执行0.21元/度，这样便宜也不让发，1998年弃水电量15亿度，1999年弃水81亿度，今年可能弃水120亿度。造成如此大的浪费，主要是电力体制改革滞后，必须破除省为实体的现状，实行跨区设公司，厂网分开，竞价上网，多发水电，限制火电，关闭小电厂，这样每年可节约发电成本以百亿元计。

朱镕基

6.15

二滩水电站有关情况

二滩水电站位于四川省攀枝花市，是雅砻江上建设的第一座水电站，总装机容量 330 万千瓦(6 × 55 万千瓦)，多年平均发电量 170 亿千瓦时，是我国目前已建成的最大的水电站。现将二滩电站的概算、上网电价及有关情况汇报如下：

一、关于概算问题

二滩水电站于 1991 年 9 月正式开工建设，1999 年 12 月全部建成投产，但二滩水电站从 1986 年最初审查初步设计以来，工程概算几经调整，投资总额增幅很大。具体情况是：

(一)1986 年初步设计概算审定工程投资为 37 亿元，当时是按 1985 年价格水平计算的，且按全部内资拨款建设，未计人建设期利息。1987 年决定利用世行贷款后，于 1990 年编制了利用世行贷款的项目概算，按 1989 年价格水平，其静态投资为 63.5 亿元(含外资 6.28 亿美元，按 3.7314 汇率折合人民币 23.4 亿元)，计人价差预备费后总投资为 75 亿元(未计人建设期内资利息)。

(二)1993 年二滩水电站在土建工程国际招标并主体工程全部由外国承包商中标后编制了内外资概算，当时按 1991 年价格水平计算，其静态投资为 105 亿元(其中内资 63.11 亿元，外资 7.77 亿美元，按 5.4478 汇率折合人民币 42.33 亿元)，动态总投资为 210 亿元。动态投资比静态投资高出一倍的原因是 93 年正是物价和银行贷款利率的高峰时期(物价上涨指数为 10%，贷款利率为 9.9%)，仅建设期还贷利息就达 66 亿元，价差预备费 39 亿元。

农村合作基金会等机构的债务主要由地方偿还

(2000年6月25日)

2000年6月，农业部、中国人民银行、财政部《关于锁定地方政府清理整顿农村合作基金会借款和审批四川省兑付农村合作基金会个人存款再借款的请示》反映，2000年以来，四川、山东等农村合作基金会融资规模大的省市为解决个人兑付问题，要求中央再次给予借款支持，并建议再安排一批专项借款，借款总额锁定在150亿元。这是朱镕基同志对此事的批语。

要严加控制，绝不能挪用。也要明确告诉地方，农村合作基金会、信托投资公司、供销社股金部、城乡信用社的债务主要应由地方自力更生偿还(尽管人民银行失于监管，也有一定责任)，并且认真清理、整顿，追究责任，追捕罪犯。绝不能靠中央发票子来替贪污腐化分子补窟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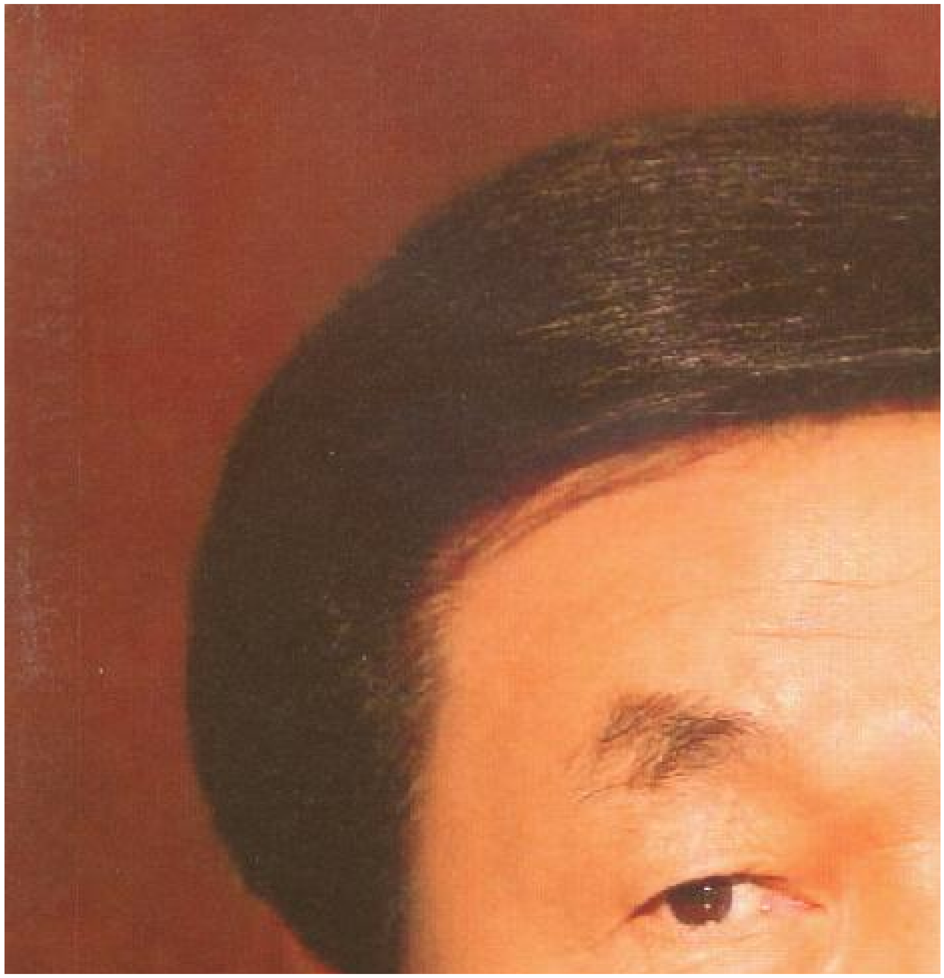
(最近看到一个简报，恩平事件①中的犯罪分子又跑到其他县诈骗，后患未除，鲁难未已)

朱镕基

6.25

---

① 恩平事件，指20世纪90年代，广东省恩平市的主要领导为了筹集资金上项目，擅自制定引资奖励办法，鼓励单位和个人引资，从而引发大规模的引资活动。为了保证兑付，恩平市领导又出面干预，令银行高息吸存、高息放贷，造成恶性循环。1997年4月，国务院派出工作组进驻恩平市调查处理此案，整顿金融秩序，事件的主要责任人均受到法律惩、处。



封面一

朱镕基讲话实录

第四卷

人民出版社

封面二

责任编辑：崔继新　毕于慧　陈　登
责任校对：吴海平　周　昕　张　红
装帧设计：曹　春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朱镕基讲话实录．第四卷／《朱镕基讲话实录》编辑组 编．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9
ISBN 978－7－01－010125－5

I. ①朱…　II. ①朱…　III. ①朱镕基－讲话　IV. ① D2－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155456 号

朱镕基讲话实录

ZHU RONGJI JIANGHUA SHILU

第四卷

《朱镕基讲话实录》编辑组 编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北京画中画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1 年 9 月第 1 版　2011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00 毫米 ×1000 毫米 1/16　印张：31.75
字数：380 千字　插页：2

ISBN 978－7－01－010125－5　定价：49.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010）65250042　65289539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参与发行

图



2000年3月5日，九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开幕。图为江泽民和朱镕基亲切交谈。



1997年9月12日，中共十五大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开幕。图为朱镕基和胡锦涛亲切交谈。



2003年1月27日，国务院全体领导同志合影。从左至右依次为：司马义·艾买提、罗干、温家宝、钱其琛、朱镕基、李岚清、吴邦国、迟浩田、吴仪、王忠禹。



2001年4月7日，朱镕基在湖南省吉首市考察吉首大学。

编辑说明

《朱镕基讲话实录》选入的是朱镕基同志担任国务院副总理(1991年4月至1998年3月)、国务院总理(1998年3月至2003年3月)期间的重要讲话、谈话、文章、信件、批语等348篇，照片272幅，批语、书信及题词影印件30件。

《朱镕基讲话实录》分为四卷，其中，前两卷为朱镕基同志担任副总理期间的文稿，后两卷为他担任总理期间的文稿。各卷文稿均按时间顺序编排：第一卷为1991年5月至1994年7月，第二卷为1994年8月至1997年12月，第三卷为1998年3月至2000年6月，第四卷为2000年7月至2003年2月。

编入本书的文稿，均根据音像资料、文字记录稿和手迹编辑而成，绝大部分是第一次公开发表。有些曾经公开发表过的文稿，编入本书时为突出重点或避免重复，作了删节。有些过去曾经公开发表过的书面讲话稿，此次未编入本书，编入的是当时即席讲话的录音整理稿，其内容是对书面讲话稿的重点阐释和补充。编者对正文中涉及的部分人物、事件和专有名词等，作了简要注释。对专有名词在每卷首次出现时作注释，再次出现时只注明首次注释的页码。对担任党和国家领导职务的同志不再注释。本书文稿的多数标题为编者所加。

朱镕基同志逐篇审定了编入本书的全部文稿。

中央领导同志对本书提出了宝贵意见。中央有关部门和有关省、自治区、直辖市负责同志对本书的编辑工作提出了指导意见。中央有关部门，有关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有关单位提供了部分资料和照片。人民出版社对本书出版给予了大力协助。在此，一并表示谢忱。

参加本书编辑工作的有：李炳军、廉勇、张长义、谢明干、林兆木、鲁静、侯春同志。马东升、李立君同志参与了有关资料的收集整理等工作。

本书编辑组

2011年5月25日

做好退耕还林还草试点工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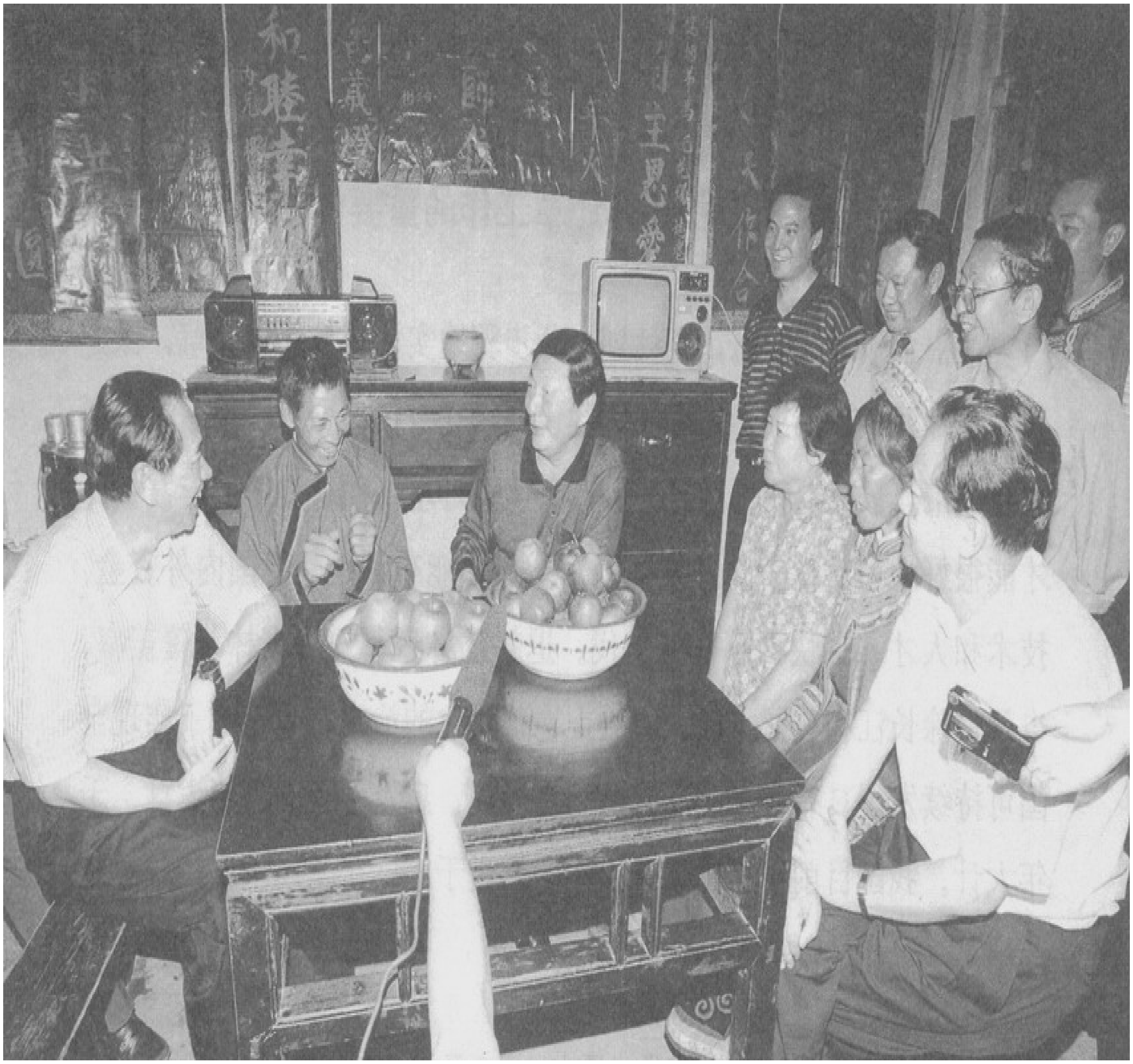
(2000年7月27日)

2000年7月26日至27日，国务院西部地区开发领导小组在北京召开中西部地区退耕还林还草试点工作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实施退耕还林还草试点工作的1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及国务院有关部门的负责同志。这是朱镕基同志与会议代表座谈时的讲话。

这次会议讨论了《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做好退耕还林还草试点工作的若干意见》(征求意见稿)，会后将根据大家提出的意见，对这个文件作进一步修改，经国务院总理办公会议讨论后正式下发。根据会议讨论的情况，我讲几点意见。

一、充分认识退耕还林还草工作的重要性和艰巨性

在生态脆弱的地区，有计划、分步骤地实施退耕还林还草，保护和恢复林草植被，加强生态环境建设，是党中央、国务院作出的一项重要决策。只有退耕还林还草、改善生态环境，西部地区的丰富资源才能很好地得到保护、开发和利用，也才能有利于引进国内外资金、技术和人才，加快西部发展步伐。退耕还林还草、提高林草覆盖率，也是根除长江和黄河水患、防治土地荒漠化的治本之策，对于实现全国可持续发展具有重大意义，是利在当代、惠及子孙的百年大计、千年大计。我国目前粮食出现阶段性的供过于求，正是以粮食换林草的有利时机。现在，各方面对做好这项工作普遍增强了使命感和紧迫感，有关地区的试点工作也进展得比较顺利，得到了广大干部群众的拥护和支持。但是我们也要看到，这是一项非常艰巨和复杂的工作，需要几代人持之以恒地进行不懈努力，必须做好长期奋斗的思想准备。同时，这项工作的政策性、技术性很强，涉及广大农民的切身利益，各地区的地理环境和气候条件又差异很大，需要搞好调查研究，周密筹划，精心组织，做过细的工作，才能真正取得实效。



1999年9月7日，朱镕基在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茂县宗渠村看望羌族农户。前排左一为四川省委书记谢世杰，右一为四川省代省长张中伟，右三为朱镕基夫人劳安。

现在的问题是，有些地方对这项工作的艰巨性、复杂性认识不足，在试点工作中存在着贪多求快的倾向，有的地方试点面积过大，有的地方没有经过试点就盲目铺开。这种一哄而起、不重实效的做法，是一定要吃苦头的。昨天，我收到一份关于宁夏西吉县“世界粮食计划署援助2605项目”的调查报告，看后痛心不已。这个项目是80年代初世界粮食计划署在我国的最大援助项目，主要是在荒山坡地植树种草、退

耕还林还草。这个项目开始时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后来却是昙花一现。项目结束之日，就是砍树毁草之时，种植的草场在90年代初就不复存在。导致这个项目失败的原因固然很多，但最重要的是对生态建设缺乏持久奋斗的思想，对退耕还林还草和在荒山坡地植树种草的困难程度估计不足，政策执行又走了样。这是一个非常生动而又痛苦的教训。“前车之覆，后车之鉴”，我们不能再重复这样的历史错误了。

实施退耕还林还草，必须坚持“全面规划、分步实施，突出重点、先易后难，先行试点、稳步推进”的原则，有计划、分步骤地进行。务必注重实效，切忌一哄而起、一哄而散。当前的重点，是集中力量搞好试点，试点的关键是认识到位、政策到位、领导到位、工作到位，不求快、但求好，确保质量。各地的试点任务，应根据领导力量和客观可能，实事求是地加以确定。你那里的领导力量不够，没有那么大的精力，就少搞一点；你那里的领导力量比较强，条件好一些，就多搞一点。各地要很好地总结前段试点工作，认真贯彻落实中央确定的有关政策，改进和完善具体办法，做深入细致的工作，务必取得试点成功。试点搞好了，哪怕只是一个村、一个乡真正搞好了，就可以积累经验，发挥榜样的示范效应，更好地推动这项工作的全面开展。

二、进一步完善和贯彻退耕还林还草政策

中央的政策很明确，就是“退耕还林(草)、封山绿化、以粮代赈、个体承包”。这一政策，着眼于充分调动广大群众的积极性，保护农民利益，一定要认真贯彻落实。特别是要把国家无偿向退耕户提供粮食、现金、种苗的补助政策具体落实到户，这是保证退耕还林还草政策得以顺利实施的关键环节。绝不能让农民饿着肚子去退耕还林还草、建设生态环境。这次会议明确了以下几点：

(一) 关于粮食、现金补助标准问题。必须强调，退耕还林还草一定要充分尊重农民的意愿，绝不能搞强迫命令，这是一条重要原则。要使农民自愿不种粮食，改为植树种草，就要相应地给予补助。补助标准的确定，要有利于调动农民的积极性。我从去年以来一直在考虑这个问题，每到一地考察，都反复征求当地农民和干部的意见。经过反

复讨论，最近国务院总理办公会议把补助标准明确下来了。这就是：每亩退耕地每年补助的原粮，长江上游地区为300斤，黄河上中游地区为200斤；每亩退耕地每年补助现金20元。我们认为，亩产低于这个补助标准的，农民会自愿退耕。即使是亩产略高于这个补助标准，农民也还会自愿退耕，因为农民自己生产粮食要有种子、化肥、农药等成本支出，还要上缴各种费用和付出劳动力，算总账还不如退耕拿国家补助划算。但是，如果退耕地实际亩产超过粮食补助标准，而农民不愿退耕的，也绝不可强迫，不要搞一刀切。当然，在水土流失严重的地区，需要退耕而实际亩产粮食超过补助标准的，你一定要农民退耕，那你就要相应提高补助标准。定这个补助标准，还有利于保护基本农田。农民自己会算账，按亩产200斤到300斤的标准补贴，只要坚持农民自愿原则，退下来的就不会是基本农田了。从总体上看，如果江河上游水土流失减轻了，下游洪涝灾害就会减少，粮食也就能增产，全国粮食生产能力不会受到损失。

(二) 关于粮食、现金补助年限问题。通过讨论，现在可以确定一个具体年限，就是粮食和现金的补助，先按经济林补助五年、生态林补助八年计算，到期后根据实际情况还可以继续补助。总之，这方面也不会让农民的利益受损失。补助农民的粮食，要按就地就近的原则供应，减少中间环节，降低供应成本，由当地政府负责组织粮食到乡到村，保证农民拿到手。要确保提供粮食的质量，不能给农民陈化粮。粮食调运费用由地方财政支付，绝不能向农民转嫁负担。要坚持主要造生态林，而且不许自行砍伐。如果经济林比重过大，就难以达到退耕还林的目的，既无助于改善生态环境，又不利于维护农民的长远利益。在保持水土、保护生态环境方面，经济林远不如生态林；同时，如果造经济林过多，以后林产品的销售市场也会成问题。据反映，目前一些地方造经济林的比重过大，这种现象必须加以纠正。各部门、各地区要抓紧进行调查研究，对种生态林和种经济林的比例作出科学的规定，一般可按生态林占80%的比例考虑。对超过规定比例而多种的经济林，只补助种苗费，不补助粮食和现金。

(三) 关于责、权、利相结合问题。对种树种草实行承包到户、到人的办法，采取“谁退耕、谁造林(草)、谁经营、谁受益”的政策，将责、权、利紧密结合起来。特别是退耕农民要负责种活林草、管护好林草。粮食和现金补助一定要与林草的成活情况挂钩。要严格检查监督，不符合要求的不能给予补助；如果采取了补救措施，合乎要求了，再给予补助。退耕农民有绿化荒山的义务。退耕以后，第一年就能栽上树、种上草，第二年起就只是管护了，农民的劳动量小多了，而国家仍要按规定的年限补助粮食和现金，因此退耕农户还应继续为国家种树。要把这些劳动力利用好，多造林种草，绿化荒山。有的地方，可以把种粮专业户转为造林种草专业户。

下面，再讲讲会议讨论中提出的几个具体政策问题。一是退耕地的农业税问题。考虑到县级财政的困难，对应税的退耕地，按补助粮征收农业税。自退耕之年起，对补助粮达到原收益水平的，国家扣除农业税部分后，再将补助粮发放给农民；待以后停止粮食补助时，再停止对退耕地征收农业税。实施退耕还林还草试点的县，其农业税等收入减少部分，由中央财政以转移支付的方式给予适当补助。二是对去年部分地方进行退耕还林还草兑现补助政策问题。一些省区在去年未兑现补助政策的退耕还林地，经核实后按统一政策兑现。因自然灾害原因，树木未成活的，要求补栽成活，同时也要给以补助。三是是否保留口粮田问题。我相信，如果补助政策真正落实的话，不会有多少农民要求保留口粮田。

这里还要强调，在退耕还林还草工作中，一定要充分考虑和妥善安排退耕农民的生活出路，把退耕还林还草与解决农民的长远生计以及合理调整农业结构结合起来。这是各地退耕还林还草工作得以顺利进行，并能够巩固和发展的重要保障。同时，无论是粮食、现金补助政策还是个体承包政策，都必须不折不扣地执行，绝不能走样。只要把农民的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很好地结合起来，把中央的各项政策措施真正落到实处，就一定能够保证退耕还林还草退得下、还得上、稳得住、能致富、不反弹。

三、做好退耕还林还草试点工作需要把握好的几个方面

一是切实做好退耕还林还草的前期工作。要认真搞好试点规划和作业设计的编制。坚持因地制宜，按自然规律和经济规律办事，对当地的历史条件、自然环境等多种情况，要进行全面、详细的调查和分析。什么样的地退耕，什么样的地不退耕，退耕后是种草还是种树、种什么林草品种，都要进行科学论证，认真听取农民和专家的意见。各地区都要尽快制定退耕还林还草的具体措施和办法，促进整个工作的规范化。

二是认真做好种苗生产和供应工作。前段时期，一些地方由于工作衔接不够，导致种苗供需矛盾突出、价格猛涨，树种结构也不够合理。这个问题必须抓紧解决。退耕还林还草工作，供应种苗必须先行，一定要保证按数量、质量和品种要求生产和供应种苗。林业部门和农业部门要做好对种苗生产和供应的指导、管理工作，切实抓好种苗基地建设；加强苗木生产全过程的质量管理、检查监督、检验检疫，及时发现和制止生产、销售不合格种苗的行为，杜绝用伪劣、带病虫害等不合格苗木造林；加强种苗调剂工作，坚决制止垄断种苗市场、哄抬种苗价格的行为，严厉打击种苗销售中的不法行为，维护农民合法权益。同时，种苗生产和供应必须遵循市场经济规律，把政策引导和市场机制作用很好地结合起来。原来考虑国家按照每亩补助50元的标准，由林业系统给农民提供树苗，现在看来弊端不少，容易出现林业系统对种苗生产、供应的垄断现象，农民对种树是否成活也不负责任。因此，要改变行政划拨、硬性分配的做法。种苗费补助标准按退耕还林还草和宜林荒山荒地造林种草每亩50元计算，直接发到农民手里，由农民直接通过市场选购种苗，以明确责任，提高树木成活率。要鼓励农民采取多种形式培育种苗，扩大种苗生产能力，使苗木生产成为促进农业种植结构调整、增加农民收入的一个新的产业。苗木行业是一个非常有希望的行业，不仅退耕还林还草需要苗木，今后城市都要搞绿化，所有的堤坝、公路和铁道两旁都要种树，农民生产的苗木一定会有广阔的市场前景。

三是建立有效的科技支撑体系。要大力推广先进、适用的科技成果。特别是要推广应用耐旱树草种以及良种壮苗繁育技术、集水保墒

技术、植物生长促进剂、干热河谷造林种草技术等，提高试点项目的科技含量。各地要研究确定科学的乔、灌、草植被结构模式及其相应的科技支撑措施。同时，要加强技术培训，使技术措施落实到每个退耕农户。

四是加强领导，狠抓落实。这是搞好退耕还林还草试点工作的关键。各有关部门和地区要深刻领会中央关于实施退耕还林还草、加强生态环境建设决策的重大意义，进一步提高认识，切实把退耕还林还草试点工作列人重要议事日程，及时研究解决实施中的问题，保证这项工作健康、有序地开展。要明确责任，实行省级政府对退耕还林还草试点工作负总责和市(地)、县(市)政府目标责任制。国务院各有关部门要根据职能分工，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加强协调，密切配合，共同做好退耕还林还草工作。

关于用再贷款帮助地方金融机构还债保支付问题

(2000年8月1日)

这是朱镕基同志写给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戴相龙的信。1997年11月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后，全国加大整顿金融秩序的工作力度，决定撤销一批严重资不抵债的地方金融机构。为了维护社会稳定，1999年11月，国务院同意由中国人民银行发放再贷款，用于兑付地方性高风险金融机构的自然人合法债务与合法外债。再贷款由合格地方性金融机构承贷，地方政府承担偿还责任。朱镕基同志认为，利用中央银行再贷款帮助地方金融机构还债保支付，是一种财政性再贷款，存在金融风险和通货膨胀隐患。为此，他致信戴相龙同志，要求人民银行从严控制、把握好尺度。根据国务院规定和朱镕基同志这封信的要求，人民银行会同财政部等部门对借用再贷款的有关条件、程序等作了严格规定。

相龙同志：

昨天，我们就当前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的问题交换了意见。关于运用中央银行再贷款帮助地方金融机构还债保支付的政策，是十分重要而复杂的。这项再贷款实际上是一种财政性再贷款，因为除极少数省外，大都不可能有能力还债，等于是中央发票子替地方还债。如不认真而谨慎地掌握好宏观调控，将埋下金融风险和通货膨胀的隐患。这个问题我已考虑很久了，昨夜思之再三，觉得还有必要再次阐明我的意见。

根据你们提供的材料，截止到今年7月26日，已经和将要用中央银行再贷款解决各类金融风险累计达2300亿元左右。其中：

(一) 为解决地方金融风险发放再贷款已经批准838亿元，其中：农村合作基金会374亿元，城市信用社156亿元，信托投资公司281亿元，供销社股金服务部15亿元，整顿金融“三乱”①12亿元。根据地方要

求，预计还需增加1010亿元。两者合计需要1848亿元。据说，财政部的预计数还要大，约需2200亿元。

---

① 金融“三乱”，指一些地方、部门、企事业单-位和个人乱集资、乱批设金融机构和乱办金融业务。

(二) 用于救助中小金融机构和在港澳中资企业再贷款、退还商业银行利息、偿债垫款共计450亿元。

中央银行给地方政府的这类再贷款，说到底是一种财政性再贷款，基本上收不回来。为化解这类主要是历史原因形成的金融风险，以维护社会稳定，创造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良好环境，当前采取用中央银行再贷款有条件保支付的政策是正确的，也是必需的，这个代价看来不花不行。但从目前宏观经济发展的形势和这一政策具体执行的情况来看：一是地方和金融机构对中央再贷款的需求量太大；二是不少经济界人士认为我国通货膨胀的迹象已经开始显露端倪；三是在一些地方政府、国有企业出现有意识地逃债、赖债的现象，金融道德风险增加。因此，如果不严格执行政策，不严格控制再贷款总额，不仅达不到防范金融风险的预期目的，而且很可能把好事办坏，既掩盖了各级责任人的决策错误和贪污腐败分子的劣迹，又不利于增强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防范金融风险的意识和能力，同时，还为将来的国民经济发展留下隐患。

所以，从现在开始，对用于解决金融风险的财政性再贷款，要比以前更加从严控制，要比以前更加切实收紧。但这并不是要“关闸”，不是要改变此项政策，而是要以对党、对历史高度负责的精神把握好这个度。不管是中央企业还是地方引起的金融风险，我们都要管。但是，要分清责任，不能没有区别。现在实行的是中央、地方分税制和中央、地方两级财政预算，地方政府、地方企业的金融风险，要明确主要由地方负责，要由他们想尽一切办法自筹资金，努力加以解决，不能都压到中央银行(最终还是转到中央财政)身上。当然，中央银行也有失于监管的责任。如果地方确实做了最大努力，还难以最终解决

支付问题，甚至发生社会不稳定的情况(金融风险已严重至此，要求一点“闹事”的情况都不发生，也是不可能的)，中央当然有责任助他们一臂之力。但是，也应有个度，现在中央财政也已经是疲于应付了。

还有，“保支付”也只能是有条件的保，不可能是无条件的、不打折扣的“保支付”。群众参加集资既有被强迫命令的因素，也有本身企求高利的因素，债权人(储户)自己也应该承担一部分风险，分担一部分损失，不能完全由政府还债。

至于地方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的国际债务，同样也不能完全由政府承担风险。要推广广东粤海、大连国投减债的成功经验，采用债务重组等方式，逼外方减债。不要怕所谓“影响国家信誉”，地方金融机构的债务并没有都由地方政府担保，更不能都要由中央政府来偿债，没有这个道理！按国际惯例，债权人(外资金融机构)也要承担经营风险嘛！

朱镕基

2000年8月1日

淘汰过剩产能要采取经济手段

(2000年8月3日)

这是朱镕基同志在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关于关闭“五小”、淘汰落后、压缩过剩生产能力进展情况的报告》上的批语。

两年多来，国家经贸委积极组织实施产业结构调整工作，取得显著成绩。经验证明，对污染环境、破坏资源、质量低劣、不符合安全生产条件的企业，必须依法采取行政关闭的措施，不如此，这些企业不会自动退出市场。但是，压缩、限制供过于求的长线产品生产的企业，只能采取经济手段，通过市场淘汰迫其退出。所谓“经济手段”主要是指银行对那些成本高于市场价格、经营亏损的企业要停止贷款。地方财政更不能以补贴等手段来保护这些落后企业。当前，防止那些被淘汰企业死灰复燃的最好办法，仍然是利用市场机制和价格杠杆。例如，糖价现已从每吨2000元涨到3400元，已实现顺价销售，部分地区已涨到3700元，应该及时抛售过大的食糖库存以平抑糖价，否则，必将鼓励已淘汰的小糖厂和甜菜糖厂重新恢复生产。

朱镕基

8.3

两年多来，国家经贸委积极组织实施产业结构调整工作，取得显著成绩。经验证明，对污染环境、破坏资源、质量低劣、不符合安全生产条件的企业，必须依法采取行政关闭的措施，不如此，这些企业不会自动退出市场。但是，压缩、限制长线产品生产的企业，只能采取经济手段，通过市场淘汰使其（供过于求的）退出。所谓"经济手段"主要是指对那些成本高于市场价格、经营亏损的企业要停止贷款，地方（银行）财政更不能以补贴等手段来保护这些落后企业。当前，防止那些被淘汰企业死灰复燃的最好办法，仍然是利用市场机制和价格杠杆。但糖价现已从每吨（2000元涨到）3400元，已实现价顺销售，部分地区已涨到3700元，应该及时抛售过大的食糖库存以平抑糖价，否则，必将鼓励已淘汰的小糖厂和甜菜糖厂重新恢复生产。

关于关闭"五小"、淘汰落后、压缩过剩生产能力进展情况的报告

2/8 8.3

邦国副总理并报镕基总理：

长期以来，相当一部分国有企业之所以陷入困境，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多年来的重复建设，造成了生产能力低水平的过剩。特别是"五小"企业污染环境、浪费资源、质量低劣、技术落后、不符合安全生产条件，不关闭，不让它们退出市场，就无法实现结构调整。不淘汰落后的工艺和设备，就无法实现产业的升级，就无法应对加入 WTO 后所面临的挑战。根据市场需求实施总量控制，把过剩的产量压下来、关闭"五小"、淘汰落后的生产能力，是改善企业经营环境和市场环境的重要措施，也是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重要步骤。

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统一部署，我们用了两年的时间，基本完成了纺织压锭、减员和整体扭亏的突破口任务。到 1999 年底，全国累计压锭 906 万，分流安置职工 116 万人，国有

国税局要杜绝营私舞弊行为

(2000年8月6日)

2000年7月28日，财政部向国务院报送的《关于检查中央预算收入征管情况的报告》反映，2000年2月至5月，财政部组织驻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财政监察专员办事处在全国范围内对部分地(市)县国税、国库机关征收、划分、留解、退付中央预算收入情况进行了检查，查处违规金额164亿多元。这是朱镕基同志在该报告上的批语。

请岚清①同志批转金人庆①同志阅。地方某些国税局拿中央财政收入做好人，吃里扒外，对这些人要严肃处理，直至开除。同时除完善税制、加强稽核外，应该迅速实施“金税工程”②，全国联网，强化技术手段，杜绝营私舞弊。

朱镕基

8.6

① 岚清，即李岚清。金人庆，当时任国家税务总局局长。

② “金税工程”，是将一般纳税人认定、发票领购、纳税申报、税款缴纳的全过程实现网络运行，加强增值税征收管理的信息化系统工程。

对商业银行违规贷款要严厉查处

(2000年8月6日)

2000年7月21日，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第8期通报了中国人民银行对四家国有独资商业银行湖北、湖南、广东、广西分行本部所办理的贷款业务进行现场检查的情况，以及对违规违法人员的处理意见。检查发现部分分行存在信贷资产质量账面反映不真实，信贷管理松弛，风险意识淡薄，内控机制不健全，向自办实体大量贷款、违规经营等问题。这是朱镕基同志在该报告上的批语。

中国人民银行对四个商业银行四省区(湖北、湖南、广东、广西)部分分行贷款业务进行现场检查，效果很好，查出的问题令人触目惊心。如果我们的国有商业银行领导仍然只是把建立现代金融制度、防范金融风险、严厉查处违规贷款等放在口头上，不去认真贯彻，中国的商业银行前途实在堪忧。请国办将此件通报各部门、各地区并各金融单位。现在令人更加忧虑的问题是各级领导大都不愿得罪人(违规、犯法的人)。人民银行提出要处理129人，有关各总行“核实”后，只处理78人，其中记过、警告的54人。这样姑息不能以儆效尤。我看对那些违规者(就像本文所述的事例)，不予以降级(职)、撤职、开除公职的行政处分(违法者必送司法机关)，是镇不住当前这股歪风的。

朱镕基

8.6

加快政府信息网络建设

(2000年8月31日)

2000年8月31日，国家科技教育领导小组在北京中南海举办科技知识讲座。国务院领导同志及国务院办公厅，国务院各部委、直属机构、办事机构、直属事业单位的负着同志听了讲座。这是朱镕基同志在听取科技知识讲座后讲话的主要部分。

国务院办公厅最近举办的几次科技知识讲座对我的启发很大。国务院领导同志是非常重视这个讲座的。我们认为，大家都要重视这种讲座，特别是国务院各部门的一把手应该来听，不要以为这个题目与本部门的业务没有很大关系，实际上不是这样。现在是新经济时代、知识经济时代，作为部门的一把手，必须了解世界科技知识发展的动向，不然你的工作很难打开新的局面。特别是现在信息产业的发展、信息技术的应用，对我们政府部门非常重要。一把手不来听这个讲座，没有一把手的推动，你那个部门、那个系统是很难实现信息化管理的。每一个部门都要考虑信息技术的应用，提高工作效率，改进政府的管理，摆正政府的角色，不能“角色错位”，管一些不该管的事情，而该管的事情却没有管好。根据我亲身的体会，每听一次科技知识讲座，我就增长了很多知识，有很多想法。我建议同志们重视这个讲座。现在每次科技知识讲座活动，正部长来参加的比例正在减少，我担心到我卸任的时候，只剩下我带一些副部长来听了。要鼓励大家一定要来，正部长要来，把科技知识讲座搞得更好一点、更红火一点。



2000年8月31日，朱镕基在国家科技教育领导小组举办的科技知识讲座上讲话。前排左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吴邦国。

通过刚才海关总署、税务总局的汇报演示，我们认为，加快“金关工程”①和“金税工程”建设，是防范和打击走私、逃套汇、骗税行为，堵塞税收漏洞，增加财政收入的迫切需要。走私、逃套汇、骗税的重要手法，就是在单证上弄虚作假，钻有关管理部门之间甚至部门内部管理脱节的空子。过去，我们把防伪的重点放在纸面单证上，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总是治标不治本。口岸电子执法系统采用电子底账加联网核查的管理模式，使有关管理部门之间可以通过计算机网络直接核查对方的执法电子数据，这就从根本上防止了不法分子有造假机会。“金税工程”通过防伪税控、交叉稽

核等方式，可以有效防范和打击犯罪分子伪造、虚开增值税发票及偷骗国家税款的违法犯罪行为。

---

① “金关工程”，是一项推动海关报关业务电子化的国家信息化重点工程，核心是海关内部通关电子化系统、外部口岸电子执法系统。

去年，我们坚决贯彻党中央的决定，对一些走私进口犯罪集团进行了毁灭性的打击，取得了重大成果，政治上显示了党和政府“反贪灭罪、执法如山”的形象，经济上取得了破获走私案值近800亿元、海关税收比上年增收710亿元的成绩，组织上清理、整顿、锻炼了政府机关的执法队伍，充实了各级海关的领导班子。当然也应看到，今年虽然走私大案没有过去那么多了，但还是不容忽视，特别是油品的国际价格猛涨，国内也相应地涨价，走私的诱惑力更大，走私问题并没有完全解决。如果不保持反走私犯罪活动的强大压力，不继续完善“金关工程”，特别是口岸电子执法系统，大规模走私犯罪仍有可能重新猖獗起来。海关和有关部门不可以有丝毫自满，不可以有任何松懈。

当前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新的重要任务，就是坚决打击骗取出口退税的违法犯罪行为。今年上半年出口增长38.3%，但我们什么外汇也没拿到，这与去年相比形成一个极大的反差。去年外贸顺差290多亿美元，结汇262亿美元，成绩很大。今年出口猛涨，进口也跟着上来了，但到7月份时，外汇储备却第一次出现下降，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信号。怎么会进口那么多东西？哪有那么大的需求呀？去年下半年，我们提高了出口商品退税率，出口退税预算为400多亿元，实际退税高达600多亿元。今年因为全年都提高了出口退税率，预算退税800亿元，但到现在已经退了500多亿元，仅7月份一个月就退了102亿元，预计全年要退税1100亿元。虽然退税刺激了出口，但外汇没拿回来，这个代价太大了。我想这里面一定有猫儿腻，就是说，出口没有那么多，是虚报的。没有出口那么多，却骗取了退税。广东、广西、福建某些地方的出口，比去年同期增加了十几倍、二十倍，可能吗？而且出口的主要是服装、家用电器，这些东西出口一下增加那么多是不可能的，很可能是假的，许多并没有真正出口。我们 已经发现“捞了就跑”的出

口企业，就是“皮包公司”，它们申报收购了多少产品，要出口，什么“两单两票”①都是假的。你把增值税退给它们，再去查这些企业时，它们已经跑了。

---

① “两单两票”，指出口退税企业办理退税时需提交的出口货物报关单、出口收汇核销单和出口发票、增值税专用发票。

国务院几经研究，决定在继续打击进口走私的同时，把主要精力转到打击骗取出口退税上来，成立了打击骗取出口退税领导小组。打击骗取出口退税，第一，决心要大。党中央、国务院决心很大，各级党委、政府要统一认识，各部门要齐心协力，对问题的严重性绝不可以低估。第二，完善法制，堵塞各种漏洞。要建立一系列的规章制度，要立法，谁违反就要严厉处置。这次查出来的大案要案，依法该杀的就要杀，该关的就要关，毫不姑息。第三，根据去年反走私的经验，没有先进技术手段和现代信息技术的完善和运用，就不可能有效打击狡猾的犯罪集团，维护经济法制和国家利益。

当前必须加快完善“金关工程”和“金税工程”建设。一要抓紧实现部门内部和各部门之间的联网。今年内要完成“金关工程”各部门的内部联网，海关、出入境检验、外汇、银行、外经贸、税务等部门之间也要尽快实现联网。“金税工程”要加快“防伪税控系统”、“认证系统”、“交叉稽核系统”和“协查系统”的建设及全面覆盖。二要集中精力搞好应用项目开发。在口岸管理信息化建设方面，要着力抓好加工贸易、进出口报关、配额许可证和结售汇管理等重点项目。“金税工程”要尽快将出口专用税票纳入“增值税计算机稽核子系统”监控，将进口货物增值税完税凭证纳入“金税工程”管理。对一些应用项目开发中的疑难问题，要组织力量攻关，力争尽快取得突破。所有应用项目的开发，既要加快进度，又要确保质量。三要充分利用国家电信公网，不搞重复建设。国家已经建立了覆盖全国县以上城市的电信公网，应该加以充分利用，发挥其优越性。任何部门和单位绝不能一说联网就要自建一套网络，搞重复建设。四要坚持高起点、高标准。既要突出现实性、应用性，

又要有一定的超前性，充分考虑到未来发展的需要。同时，还要高度重视和切实保障各个信息系统的安全。

现在打击骗取出口退税，薄弱环节在税务系统。虽然税务系统的网络在1992年就开始应用了，但是进展缓慢。出口报关单、外汇核销单、增值税发票、专用税票没有与有关部门联网，自己内部也没有联网。刚才汇报演示时说“防伪税控系统”刚覆盖了1.8万户，整个需要覆盖的是120万户，差得老远呢！取得的成绩与花的钱是不相称的，钱都花得差不多了，这个网还联不起来。海关的公共数据中心已经建立起来，税务部门应尽快联上，工作一定要跟上去。为这个事，我已多次对有关部门提出批评，批评是为了推动这项工作。“金税工程”是我们当前以增值税为主体的税制的生命线。我们的税制有很多好处，但防伪是最大的问题。因为每一个环节都要抵扣，只要出现假增值税发票，大量税款就流失了。最近公安部搞了几次突袭行动，一是打击盗版犯罪，二是打击伪造人民币犯罪，还有一个是打击伪造增值税发票犯罪，这几个行动打得好。我到上海考察，上海市公安局拿出最近打击行动中收缴的假造人民币给我看，那完全跟真的一样，什么防伪标志都仿造得出来，不是十分内行的人、没有十分精密的仪器是辨不出真伪的。不搞电子化信息系统，不加上安全措施，是对付不了这些犯罪分子的。如果不能够实行全国联网，不建立“金税工程”，我们国家的增值税税制就搞不下去了。各种交叉稽核从1994年喊到现在还没有实现，不加紧进行这项工作，增值税税制就没有生命力了。刚才听了税务总局的汇报演示，可见你们人才还是有的，工作还要加紧，要看到自己的不足。还有“金卡工程”①也要抓紧搞。现在各大商业银行都在发信用卡，都不联网，更不能通用，各搞各的系统，成本很高。银行很多劳动花在点票子上，工作人员一出去办事就带大量现金，这明摆着让坏人去偷、去抢嘛！现在信用卡在国际上已非常普遍，我们在这方面太落后了。这个工程也要加快，要降低成本。像现在这样各搞各的是不成的。

① “金卡工程”，是以计算机、通信等现代科技为基础，以银行卡为介质，通过计算机网络系统，以电子信息转账形式实现货币流通的信息化工程。

要为加快“金关”、“金税”、“金桥”①、“金卡”等工程的建设和应用，创造良好的条件与环境。有关部门要密切配合，通力协作，积极支持这些工程的建设，保证必要的经费投入。电信部门也要提高信息通道技术，改善服务态度，提高服务质量，降低服务收费。各部门要做到数据相互交换，信息资源共享。要规范信息的采集和处理，实行国家的统一标准、统一代码和统一计量单位，以提高信息共享和利用水平。要加强法制建设，修改相关法律、法规，为实施“金关”、“金税”等工程提供法律、法规保障。同时，要加强队伍建设和人才培养，无论什么先进技术都要靠人来掌握和应用。加快“金关”、“金税”等工程的建设和应用，以至于实现政府行政管理信息网络化，关键是要有掌握信息技术的高素质人才队伍。必须抓紧业务和技术培训，全面提高干部队伍的素质。

---

① “金桥”，即“金桥工程”，指国家公用经济信息网工程。

政府的任务和职能主要是执法和管理，而不是搞什么“形象工程”和干预经济。现代政府要求人员少、效率高。人多、工程多、开支大，于是就乱集资、乱收费，农民负担不堪，企业齐声叫苦。这是我们很多政府机关的通病，必须下决心改革。改革的一个重要办法就是信息化、网络化。政府行政管理信息网络化是一场深刻革命，势在必行。各级政府、各个部门都要充分认识加快政府行政管理信息网络化建设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要自觉地从思想观念、管理方式等方面适应加快信息网络化发展的要求，采取切实有力的措施，积极利用网络技术、数字技术，加快行政管理信息化、网络化的步伐，以适应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新形势的需要。国务院各部门的主要负责同志要亲自抓本部门、本系统的信息化、网络化。“十五”计划提出要调整产业结构，调整产业结构很重要的就是发展高新技术产业，首先是信息技术产业，

这个市场很大。问题是我们领导干部要好好学习，在各自的部门大力推行信息网络化。只有运用先进的信息技术手段，我们的政府才能真正做到廉洁、高效。

关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工作的几点意见

(2000年9月8日)

2000年9月4日至10日，朱镕基同志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考察工作，先后考察了喀什、伊犁、阿克苏、乌鲁木齐等地。这是朱镕基同志在考察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一师一团七连时讲话的主要部分。

几次到新疆来，到过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总部，1995年来阿克苏时去了农一师总部，今天来到农一师一团七连，来看望同志们。昨天一天是在沙漠、戈壁中旅行，今天来，看到了沙漠中的绿洲，一看确实与南方没有多大的不同，有水、有树、有地，家家户户有液化气、有自来水，门口都是葡萄、砀山梨、水蜜桃。我看这日子过得蛮好的，说明兵团这个建设政策是正确的，而且确有成绩，这几年进步也很大。我代表国务院向全体兵团职工表示问候和感谢！

刚才张庆黎①同志提了两条要求，我觉得到点子上了，提得很好。

---

① 张庆黎，当时任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司令员。

第一，要把新疆边境地区建设好。 新疆毗邻很多国家，要巩固我们国家的边疆，巩固我们的民族大团结，维护我们的社会稳定，建设好新疆是非常重要的。你们提出要把边境团场建设好，这非常正确。你们说要搞一个“形象工程”，我建议不要叫这个名字，因为“形象工程”往往是“面子工程”，死要面子，花花哨哨，也是“劳民伤财工程”，我们已经领教过很多了。我想了半天，初步想了一个名字，叫“金边工程”，是“固若金汤”的意思。加强边境团场的基础设施建设，党中央、国务院都是会支持的。国家计委已经到这里做过一些调查，需要我们怎么支持，具体再商量。

第二，要搞节水工程。 我认为这也是非常重要的。新疆水资源丰富，人均5700立方米，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两倍多，但是需要开

发、治理。目前新疆本身缺水，节水的任务非常重。我看了一些材料，昨天又到塔里木河中下游看了看，最近20年，生态环境变坏了，而且坏得很快。那里的胡杨树一片一片地死了，因为地下水位越来越低，塔克拉玛干和库姆塔格两个沙漠就快要合龙了。塔里木河水是很丰富的，有300亿立方米，但是如果在上中游，在阿克苏的地域里大水漫灌，那中下游就只能仰首翘望，还能有什么水？如果沙漠一合龙，还要危及阿克苏。现在要把塔里木河中下游救活，恢复它的生态环境；要把大水库、山谷的水库修起来蓄水，把平原的水库关掉。山谷的水库是能够蓄水的，蒸发量小，能把水留起来，然后让它流到中下游去。我们希望整个塔里木河的水一直流到罗布泊，周围都能种上树，都是一片绿，到那时生态环境才算真正改善了，新疆才真是世外桃源了。生态环境改善的时间很长，需要一代、几代甚至几十代人的时间。要取得突破性进展，前五年非常重要。如果不在前五年抓几个大工程，那是不可能有突破性进展的。所以，大家要抓紧塔里木河流域的治理和开发，这是一个重要的题目，其中包括节水。兵团已经做了许多工作，要继续做下去，而且给予更大的重视。

另一方面，种植结构要调整，要种节水的农业品种。农业再不能搞大水漫灌了，要搞节水工程，这关系到整个新疆的大局、新疆的生态环境。刚才我们看了水稻，一亩地用1500多立方米水，产量是800多公斤，平均一公斤的大米要用两个立方米水，很厉害。因此，水稻不能太大量地种。用水要收费，不收水费绝对不能节水，这是事实证明了的。光靠行政命令、思想政治工作不行。将来整个河流治理恐怕也要考虑收费，投资也要分摊。不收水费，水库的维护都做不到。收水费，利用价格杠杆，是节水最重要、最主要的措施。逐步提高水费，才能促使大家节约用水。

第三，工业企业要扭亏。 上面两条是你们向我们提出的要求，我们都支持。现在我也向你们提出一个要求，就是工业企业要扭亏。兵团亏损那么多，主要原因是办工业。这当然是机制的问题，当初建设时对市场需求考虑不够。全国的工业都是这种状况，搞得太多，供过于求，规模又小，没有竞争能力，所以就亏损。你们工业每年亏损5亿

元，不要以为亏损就是到银行“挂账”，银行的亏损最终还要到财政部报账，实际上还是等于国家财政每年补贴给你们5亿元。你们何必办那些工业呢？现在给你们5亿元，你们把亏损企业关了，可以让职工去种地，比较好安排。这件事要趁早，没有市场就关门，早关早得利。我希望兵团能够把工业企业扭亏放在重要的地位，而且请你们以后吸取教训，不要乱上项目。更要注意，不要搞那些花花哨哨的项目，别轻易相信那些招商会、洽谈会。人家并没有经过很好的可行性研究，就说服你们上一个项目，最后没有市场，企业一关门，职工要你们安置，把包袱丢给了你们。现在的西部大开发与过去深圳、珠海的开发有很大程度的不同，不能像深圳、珠海那样的搞法，那里开始时搞加工工业、“三来一补”①，都是用外面的原材料、元器件，用我们的廉价劳动力、免税政策，加工出口，逐步像滚雪球那样越滚越大。你们新疆也好，西部地区也好，那么远的运输，搞什么加工贸易？基本不能搞。如果乱上项目，搞加工工业，生产的东西没人要，不是背包袱嘛！希望兵团在整顿工业企业时要狠心一点，关停并转，调整结构，不要再亏下去了。你们少亏一点，我们就有能力多支援你们，上面说的“金边工程”就可以搞得更好一些。

---

① “三来一补”，指来料加工、来样加工、来件装配和补偿贸易。

关于新疆发展的几个问题

(2000年9月10日)

朱镕基同志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考察工作期间讲话的要点，曾发表于《新疆工作文献选编(1949～2010年)》，标题为《西部大开发中的新疆发展问题》。编入本书的是朱镕基同志在听取自治区党委、政府工作汇报后讲话的主要部分。

新疆的战略地位非常重要。中央对新疆工作非常关心，特别是江泽民同志多次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谈到新疆的问题。

从1987年至今，我到新疆来过四次。这次到新疆来，我们先后到了北疆的伊犁，南疆的阿克苏、巴音郭楞等地，看了油田、气田，对新疆的认识更深刻了。同时也看到，几年来新疆的变化很大，经济有很大的发展，产业结构有很大的调整，基础设施建设也有很大的发展，财政收入有很大的增加，人民生活有很大的改善，民族团结有显著的进步。新疆是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存在来自多方面的对新疆民族团结的干扰破坏因素，你们克服了种种困难，取得了这么大的成绩，很了不起。这次到新疆，是想和新疆的同志们一起，加深对中央西部大开发战略思想的认识和体会，研究如何进一步贯彻好这一战略思想。

新疆土地面积占全国总面积的六分之一，周边的相邻国家最多，战略地位很重要，所以，开发新疆是西部大开发的一个最重要的组成部分。经过这次考察，同新疆的同志不断地交换意见，我们对在新疆如何贯彻这个战略思想有以下几点认识。

第一，加快资源性工程的开发。主要就是石油、天然气的开发，当前最重要的工程是西气东输。现在看起来，新疆的石油开发很有远景，天然气开发希望更大。根据目前探明的资源，现在修建从新疆到上海4200公里的输气管道，条件已经成熟。尽管这个工程浩大，需要投资1200亿元，但我们还是下决心要干，而且越快越好。天然气埋在地下没有变成财富，只有把气用掉才变成财富啊！在新疆全部用掉可

以不可以呢？你用不了嘛！你得把气送出去。送出去你得到的好处是，不但新疆境内沿线的经济可以发展，而且可以获得税收。王乐泉①同志跟我说，现在天然气的资源税太低了，石油的资源税是一吨20元。这是平均数，各个地方不一样，是根据成本来确定的，而天然气的资源税是1000立方米4元。这件事需要很好研究，请大家放心，不会让你们吃亏的，一切都是为了支援新疆，但是也要合情合理嘛。我想，新疆增加的税收是不少的，这个账要很好地算一算。随着气田的开发、油田的开发、输气管道的建设，可以有力地带动新疆经济的发展。我相信新疆将逐渐成为中国一个最重要的石油、天然气基地。

---

① 王乐泉，当时任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书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一政委。

第二，集中力量开发新疆的水资源。新疆土地面积166万平方公里，沙漠、戈壁占一半以上，但是只要有水就有绿洲。如果不开发，随着生态环境的日益恶化，前途堪忧。开发以后，效益会很好。新疆有古老的文明，外国人都想来看一看，就是距离太远了。我昨天在乌鲁木齐会见了美国财政部前部长鲁宾。他是我请来的。他说他很想来新疆，但太远了，在路上走的时间比在这里待的时间还长，划不来。我不是讲交通是关键吗？如果搞了绿洲开发，好好地整理、保护古代文明和古迹，改善交通和服务，我相信新疆会成为一个大家都想来的很好的旅游区。

新疆人均水资源5700立方米，但没有开发，没有充分地利用，让水都流掉了，或者垦荒搞大水漫灌，把土地搞成盐碱化了。中央领导同志对新疆水资源的开发非常关心，新疆应该加快水资源的开发。我们反复地交换意见，认为：第一，应该赶快把已经立了项的额尔齐斯河的开发完成，现在“引额济克”的工程已经完成，“引额济乌”以及全流域的规划应该加紧进行。第二，从重要性上看，还是塔里木河的规划治理和开发更重要。南疆可能是一个很富庶的地方，但是不解决水的问题，光解决交通问题，还是不行的。塔里木河有300亿立方米的水，但

没有很好地利用，现在都是平原水库，大水漫灌，在上游就把水用光了，下游逐步干涸。20年来，生态环境不断恶化，胡杨林都死了，塔克拉玛干和库姆塔格两个沙漠也快要合龙了。我们这次到塔里木河的中下游看了一下’感到塔里木河确实应该很好地规划、治理，应该恢复它的原貌，应该把水送到罗布泊去，水是足够的。这个工程一定要搞，南疆有了水、有了交通以后，把旅游事业发展起来，会比现在富裕得多，那真是沙漠里的绿洲啊。第三，伊犁河的开发也迫在眉睫。伊犁气候好、日照时间长，种什么长什么，应该加快开发伊犁河。

水资源开发不能一拥而上，因为财力有限，而且这不单是一个财力问题，还有一个把水留住了如何利用的问题。比如说，在塔里木河上游修建山区水库来代替那些平原水库以后，水怎么用呢？伊犁河恰甫其海水利枢纽修起来以后，用这些水去干什么呢？你们要认真研究。动不动就是百八十亿元投资啊，花了这么多钱，水是留住了，然后让它大水漫灌吗？不但无益，而且有害，没有经济效益，国家能花这个钱吗？不行。所以，如何利用这些水是最主要的问题，规划里一定要充分考虑。

伊犁河的水怎么利用？你们说是可以开发570万亩地，这570万亩地干什么呢？伊犁地区汇报说是6∶2∶2，就是用60%的土地去发展畜牧业，20%造林，20%种粮。我说如果这样搞的话，这条河流将很长时间没法利用。修了恰甫其海水利枢纽，水是留住了，但还是没法利用。按照我的想法，你们最好是把70%的土地用来造林，这是最快的利用方法。我说了不算，因为我没有经过科学的调研。但我这个想法有实践的根据。这个根据就是后来我们到阿克苏看到的城西北的柯柯牙造林工程，长25公里，宽几公里到15公里不等。这是1986年颉富平同志当地委书记时开始干的，是他倡议建造这个人工林。在到处都是沙漠、沟壑纵横、又没有水利设施的情况下，从他那一任开始，四任书记下来，奋斗了14年，现在青杨都长成材了，果树成林。谁看了那个“绿色长廊”，都要惊叹不已，这就是人定胜天啊！在那样困难环境下能够经过十几年的努力，取得这样大的成绩，真是了不起！我看了以后非常感动，如果这次没去看，那真要遗憾终生了。看了以后我就

感到，伊犁河开发拿这个当样板不就行了吗？所以，我就冒叫一声，你们70%种林，20%种草，发展畜牧业。畜牧业发展太多不行，产品卖到哪儿去呀？羊肉是运不出去的，要用冷藏车才能运。搞羊毛呢，我赞成，但一定要搞澳大利亚那种细毛羊。我们一年进口50多万吨细羊毛，新疆如果能够生产，我们就不需要进口了，可以省下几十亿美元。可是，你们现在还搞不出来呀，那些配套的设施都是高科技的，这要有个发展过程。畜牧业一般的搞多了不行，没地方用，牧民仍然很穷。我在伊犁看到，那个地方气候好，各种资源很丰富，但是老百姓并不富裕，盖的房子也不是太好，也许将来粮食堆积成山了，牛羊也很多，但是因为运不出去，找不到市场，不能把它们变成商品、变成钱，老百姓还是富不起来。所以，必须开发市场所需要的东西。一定要把新疆变成细毛羊的基地、优质羊毛的生产基地，要下定这个决心。要吸取搞棉花的教训，不要数量要质量，有了质量后就有数量，因为有了质量说明一切设施都配套了，在这个基础上发展数量是很容易的事情。因此，现在草地不要搞得太多，有20%就够了，而且要集中力量有意识地引进外资，引进外国的技术、良种以及管理，来发展细毛羊，生产优质的羊毛。伊利的同志还告诉我，树叶子可以喂牛羊，那么造林不是也可以发展畜牧业嘛！就是说，你们可以只用20%的草地，就可以使畜牧业的产值有可能占到总产值的50%到60%。相反，如果利用60%的地来种草，你们不会取得这么好的效果。粮食用10%的地去种就够了，够吃就行了，多了也运不出来；而造林还可以改善生态环境，有很好的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

搞水利工程、开发水资源，关键不在于你们向中央要多少钱，要求哪一年必须开工。中央既然决定开发新疆、开发西部，就不惜拿钱，问题在于如果你们花了钱以后没得到效益，那财政不就垮了吗？关键是你们要出效益才行，要让新疆人民得到好处才行，而且要使他们感到每年都有好处，这样他们才有积极性去搞啊。

项目要科学论证，按审批程序来办；指导思想还是有先有后，不要一拥而上。只要你们做好了准备工作，项目上起来是很快的。如果你一拥而上，结果什么也搞不成，时间会拖得很长。

上面说的这些，有些已定了、立项了，可行性研究和准备工作就绪，审批以后就开工；还没有定的，我们回去再研究，但是我们会采取很积极的态度来对待这个问题。

第三，大力调整产业结构。调整产业结构是“十五”期间的关键任务。新疆要集中力量开发油气资源，搞西气东输；积极开发水利资源，使新疆变成绿洲；交通基础设施建设要配套，带动整个新疆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带动旅游业的发展。同志们一定要考虑到，新疆离内地很远。全国的工业产品现在都是供过于求。进口商品又那么多，你新疆现在还搞加工工业没有前途。再搞钢铁工业？再搞石化、搞石化下游产品？运距远，没有竞争力。再搞轻纺？全国纺织行业压缩了1000万锭，形势才刚好一点，你们还能增加吗？过去，纺织部主张把内地的纺纱锭子搬到新疆来，我一直反对。全国的纺纱锭子那么多，把那些破破烂烂的东西搬到新疆干什么？总之，加工工业上新的项目一定要慎重。

这次在各地、州看了当地的报纸，感觉到好像你们对开投资洽谈会、贸易洽谈会的兴趣特别大。同志们，这些洽谈会，我也不是说不要开，少开一点行不行？搞投资、搞贸易都要经过深思熟虑、充分论证，怎么可能通过一个会就签订合同？成交额越大，这个地区的成绩就越大？专员、书记就应该升官？这样的逻辑应该打破。成交额能代表政绩吗？能代表对群众的好处吗？我看很多将来都会变成包袱。如果说你们有自己的特色，有自己的优势资源，别的地方没有，生产出的产品别人做不了，我同意你们发展，并不是一概不许搞工业、不许搞加工工业。但是，你们生产出来的是“大路”产品，你们运距又远，能卖得掉吗？所以，我的意思是希望大家要集中力量，在基础设施建设和生态环境改善方面来一个突破性的进展，搞点实实在在的工程，少搞些花花哨哨的工程。

讲到这里，我想提出一个政府职能转变的问题。最近，我在国家科技教育领导小组举办的讲座上讲到，政府人员要少，效率要高，要管你自己该管的事情，不要管你不该管的事情。我们现在政府工作人员

的比例太高，吃“皇粮”的人多，老百姓的负担就重啊，搞乱收费、乱集资啊，群众不堪重负不就会造反吗？新疆的政府机关也要精简，现在你们政府工作人员的比例接近全自治区人口总数的5%吧，比全国平均数要高两个百分点。你们是少数民族地区，干部比例是应该高一点，但是也应该精简一点嘛。我到陕西去，特别是陕北，发现那个地方的干部比例太大，农民负担不堪，这是穷的一个原因。关键还不在于负担不起这么多的人，而在于人多就主意多，如果都是好主意那还谢天谢地，可惜坏主意也不少，有些人尽出些馊点子。人多就要搞事啊，一搞事就要搞项目，“形象工程”、“面子工程”都来了，没钱就乱收费、乱集资。这叫做角色错位。本来，政府机关应该非常公正地管你该管的事：管理市场，谁也不许违法；管理治安，谁也不许犯法。政府主要管这些嘛，但有的机关尽去管“上项目”，比厂长管得还具体，一天到晚洽谈，一洽谈就受骗，几千万元被骗走了。少管点事，少一点人，达到什么目的呢？先吃饭后建设，先把工资发了。现在工资都欠发，职工吃饭都吃不上，你建设什么东西？社会也不安定嘛。 要么你就精简，如果你有困难、有具体情况，暂时精简不了，那你就先保证职工吃饭，把工资发足了，剩下有多少钱你搞多少建设。我一直坚持这个思想，这个思想不是我一个人的思想，过去老一代的领导同志也都是这个思想。搞建设如果马上出效益，就可以多发工资；问题是搞的那些项目，好多都不出效益。我具体讲一个项目，中石油在库尔勒修了一个250万吨的炼油厂，花了30多亿元，建成了却关门大吉，没有原油啊。连乌鲁木齐炼油厂、克拉玛依炼油厂都没有充分利用，你哪有原油啊，你再修个炼油厂干什么呢？这是中国石油天然气总公司的决策失误，但这是经国家计委、国务院同意建的，也是我们的失误。如果不搞这个项目，把这30多亿元捐助给新疆，你们的工资问题不就都解决了吗？如今把这30多亿元设备放在那里，年年得花钱维护，还要付贷款的利息，受得了吗？教训哪！再不要乱搞项目了。同志们，上一个要成一个，搞成一个就要出效益，我希望是这样。

最后讲讲财政问题。你们刚才讲，新疆去年财政收入122亿元，其中47亿元是上缴中央的，75亿元留给了你们自己。任何一个同志看了

都觉得这怎么得了啊！把财政收入的三分之一多都上缴中央了，这像什么话？支援新疆，中央怎么还拿走47个亿？问题在什么地方？问题在你没有提去年中央给新疆补助了近100亿元，还不算去年给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补助的39亿元。也就是说，中央补助了130多亿元给新疆，比你们上缴中央的47亿元多得多，比你们留的75亿元多得多，比你们整个财政收入122亿元也要多得多啊。我今天特别要把去年这个账讲清楚：定额补助19.37亿元，税收返还21.05亿元，转移支付7.04亿元，困难补助5亿元，各种专项补助29.5亿元，等等。去年你们增加工资、下岗职工基本生活费、养老金，都是中央财政补贴的。这不是中央对少数民族地区极大的关怀，对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极大的支持吗？今年给新疆的补助肯定超过去年，为什么呢？因为去年给新疆的工资补贴、下岗职工基本生活费、养老金的补贴是半年的，而今年是补贴一年，光这笔钱就增加一倍，再加上其他补贴的增加，今年是一百好几十亿元。这个钱是从哪儿来的？是从沿海地区收来的，从上海、广东等省市收来转移支付给你们的。如果说要修改税制，这个事就麻烦了。我们昨天到昌吉州去考察，看到那里的一个特种变压器厂一年可以出口3000万美元的产品，一个18万吨的番茄酱厂出口也不少，两个企业应该说很富了。他们却说最好是把75%的增值税都留给他们。我说，如果把75%的增值税留给你们，那上海、广东的也要留，那里一个百分点就顶你们几十倍。他们要是少交一个百分点，中央就没有钱给你们了。所以说，分税制是不能改的。中央维持这个制度，才有理由把东部地区的钱送到西部来，否则你们就受不了啦！

这次西部大开发，与1979年开始搞的经济特区有很大不同。那些经济特区临近香港、澳门等地，它们可以搞加工订货、“三来一补”，进口元器件，出口成品，赚取外汇，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现在，它们已经开始转入搞高科技产业了。新疆远在西部边陲，谁到这里来加工订货呀？你们生产出了产品怎么运得出去？所以，沿用过去搞经济特区的政策是不行了，何况那个政策在1993年已经吃过一次大亏。那时全国都在搞加工工业、搞房地产，搞得经济过热，遗留了一大堆债务没有还清，现在还有七八千亿元当时搞房地产的贷款在银行里变成

死账。我们这次不能再用这个政策，我们用的是建设倾斜政策。西部地区要的是基础设施的建设、生态环境的改善和科技教育的发展，主要靠财政投入，单靠银行贷款不行。如果我们安排开发西部地区的项目，要地方政府来出配套资金，那就行不通。我们讲先吃饭后建设，地方连工资都发不出来，哪有钱来配套搞建设呢？因此，我们这次定下的最大的、最重要的政策，就是今后在西部地区，国家安排的项目全部由中央安排投资，包括中央财政拨款、国债拨款，还有银行贷款，但也不是说地方一点也不能配套。我对自治区的党委书记、主席都讲了：第一，你们不能敲中央的竹杠，收好多配套费，这个你们要给免了。第二，你们的土地征用费不能很高，这是沿海有些地方最常用的手法，你们千万不要去学，中央在那里投资搞个项目，土地贵得要命。在别的地方搞一个14万吨的乙烯工程，40亿元就够了，在广州却要80亿元。你们可能想象不出来为什么会这么贵，不就是那些地方的各种费用，再加上土地补偿金吗？贵得要死！就是说国家安排的项目不要你们出钱，你们也不要收中央的钱，我看这是最大的支援。其他政策都不要乱来，搞得不好就会鼓励重复建设，小工厂遍地开花，将来都是包袱，都得关门。今后还将加大中央的投资力度，尽量减少你们的配套资金。中央在大项目上，像铁路、河流开发等方面，对新疆是很支持的。我们今后要沿着这条路走下去，继续加大支援的力度，加大倾斜政策的力度。

总之，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确实是非常重视的。我们国务院执行党中央的决定，对新疆给予了最大的支持。我们希望这些支持能够变成效益，能够真正使新疆的经济繁荣起来，使人民生活得到改善，民族团结得到巩固，这是我们最大的愿望。

重视基础科学研究

(2000年9月25日)

这是朱镕基同志在考察中国科学院知识创新工程试点工作时讲话的主要部分。

现在，我们越来越体会到，国与国之间或者说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差距，并不在于国内生产总值或者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多少，也不在于拥有多少核武器，关键是科技实力的强弱和人才素质的高低。特别是进入新经济时代后，科技实力决定国家经济发展的走向和前途。这也是可持续发展的一个最重要条件。只要有了这个条件，国民经济就一定会发展上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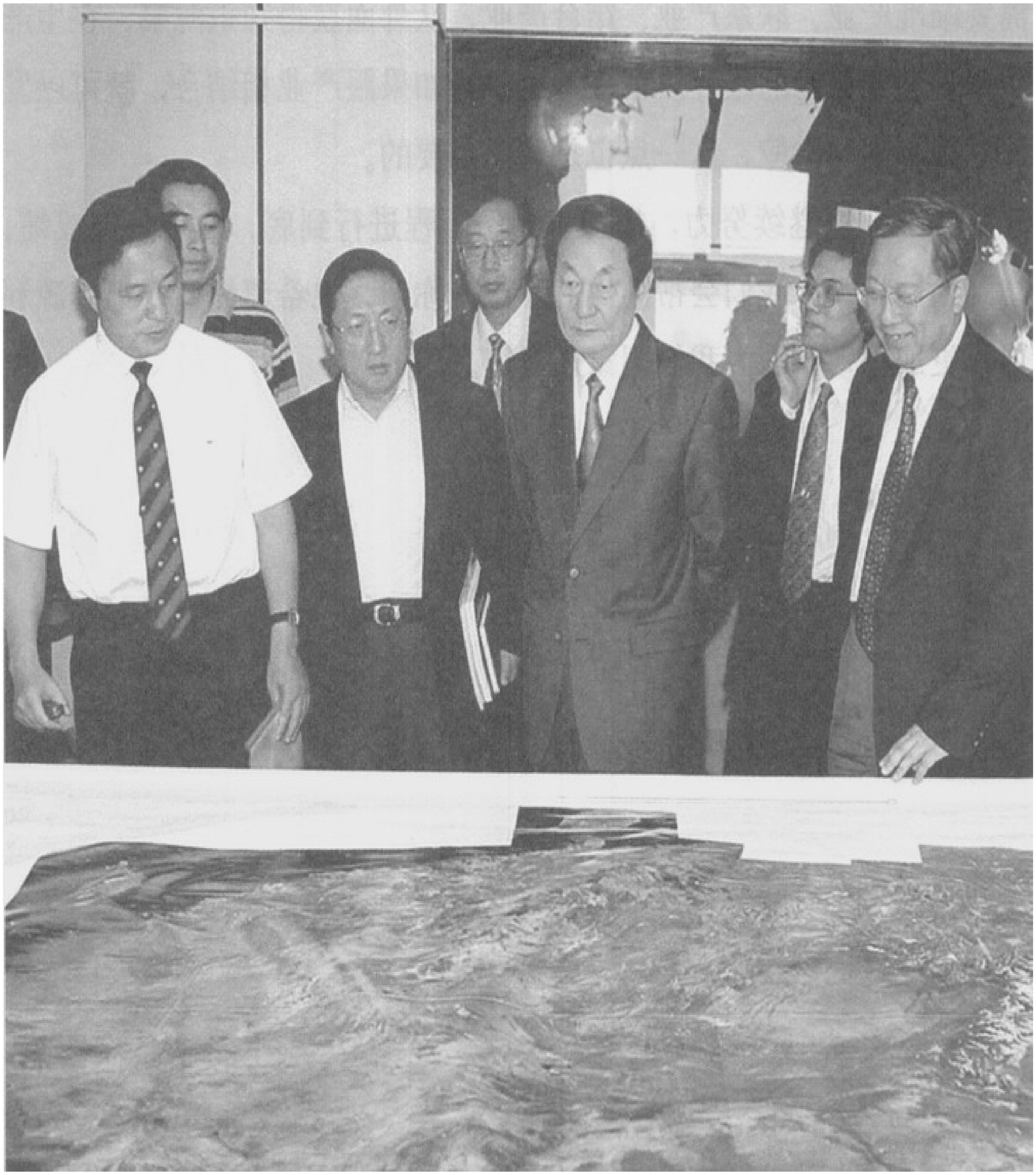
科技实力首先取决于基础研究的实力，基础研究搞不上去，科技实力也很难提高。比如，俄罗斯的经济虽然暂时破败了，但它的基础研究的实力还在，人才还在，所以它仍然是世界第二强国。我们首先也要搞好基础研究。国家的基础科学研究达不到国际水平，就不可能成为一个国际强国，即使国内生产总值超过其他国家也没有用。中国科学院在基础研究方面担负着重大任务，是使我们国家富强、能够成为国际一流强国的重要力量。

1998年2月，江泽民主席批准中国科学院开展知识创新工程试点工作。两年多来，在国务院和国家科技教育领导小组的支持下，中国科学院的试点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

第一，抓了组织结构的创新，建立了吸引人才的机制，这是非常重要的。人才可以从国外引进，我刚才看见神经科学研究所就有一个美籍华人嘛。中央已经讨论过这个问题了，在证券、保险、银行三个行业可以大胆地吸收境外的人才，特别是台湾、港澳地区的人才。最近就准备聘请香港的证监会副主席史美伦女士来中国证监会当副主席，副部级待遇。她在香港一年能拿570万港币，我们照付。我们对她建议：你要当了副部级干部就要跟我们的副部长一样，拿一样的钱，你

可以把多下来的钱，用来建立一个培养证券人才的基金，以你的名字来命名。她很愿意。吸引人才总要有一个过渡期，人才不可能一下子都蹦出来。国有大中型企业，特别是大型企业集团，只要经济效益好，用得起这样的人才，也可以放开引进国外人才。在科技教育方面，因为是国家拿的钱，要经过审批；但我还是主张政策放宽一点，为了吸引海外人才，可以给他们一些高的待遇，也不一定就按他们在国外那个待遇，因为他们愿意来，主要是想发展自己。中国科学院就是要创造这样一种能够吸引人才的机制，我看你们现在确实是有这种机制了，很多年轻人才都能脱颖而出，确实很有希望，这是可喜的现象。当然，对老专家也一定要非常重视，因为他们几十年积累的经验也不是一朝一夕之功。但是，中国科学院的发展毕竟需要人才辈出。

第二，新机制要能够发挥人才的作用，能够留住人才。吸引进来 还要留得住，这需要建立一系列科学、合理的考核评价制度。我很关心这个评价制度，谁来评价、如何评价？不能完全看论文发表了多少，要进行综合考察。要使人才感到心情舒畅，感到在这个地方只要努力，就能够创造自己的辉煌，建立自己的事业。一个人总是希望有所成就的，我们就是要创造这种机制，使各种人才都能够有所成就。过去我在清华大学学习的时候，就感到清华大学有一种宽松的学术环境，各种流派，留小辫子的、研究甲骨文的、提倡新文学的，都可以在清华大学找到他们发展的空间，不同的学术观点都可以在那里存在，并且能够自由地发表，我想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机制。中国科学院在这一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有了很大的进步。



2000年9月25日，朱镕基考察中国科学院知识创新工程试点工作。前排左二为国防科工委主任刘积斌，右一为中科院院长路甬祥。

第三，基础研究既要密切注视国际先进水平，加强国际交流，又要面向国内的产业。当然，不是所有的基础研究都能够产业化，但是我

们还是要加强基础研究，不然就没有国际水平。同时，基础研究也需要瞄准产业、联系产业、结合产业，从外面获得知识源泉，在生产实践中拓宽自己的眼界。很多基础研究如果跟产业相结合，就可以发挥意想不到的效应，这一点也是非常重要的。

希望你们继续努力，把知识创新工程进行到底，取得辉煌成绩，达到预期目标。我们会帮助你们、支持你们，也希望你们要把资源利用得更加有效，因为我们国家还很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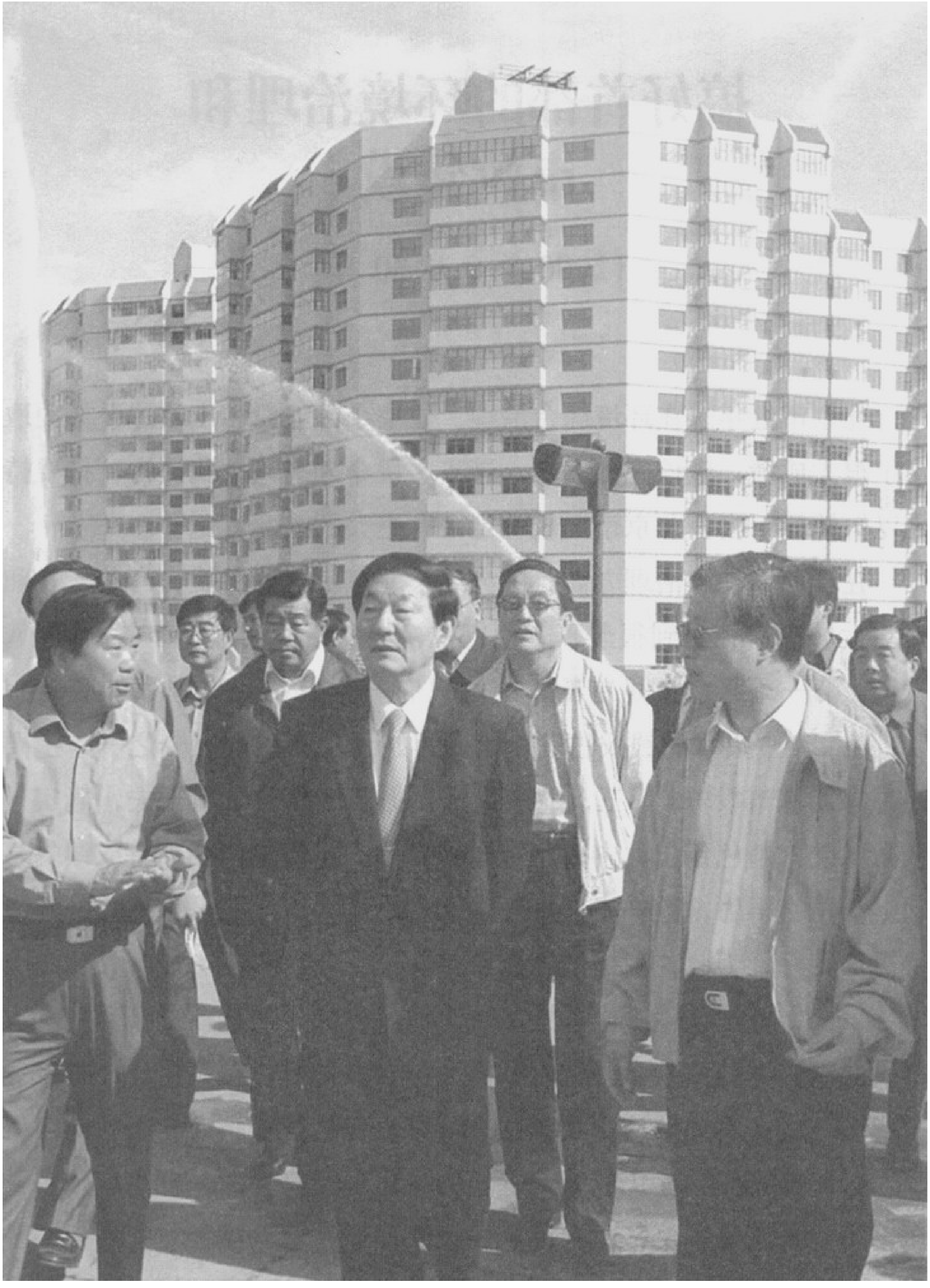
搞好首都的环境治理和市政建设

(2000年9月30日)

这是朱镕基同志在北京市考察工作时讲话的主要部分。

北京市近年来在环境综合治理、住宅小区建设和市政建设方面取得了很大成绩，应该充分肯定，进步之快令人高兴。我认为，只要持之以恒地抓下去，北京市面貌一定会有更大的改变。

在环境保护和治理方面，中央给了北京市一些支持。有些省长和一些大城市市长感到很羡慕。他们说，要能给我们那么多钱就好了。我说：第一，北京市是首都，中国只有一个首都，是国家的政治中心；第二，中央拿的钱仅占北京市项目建设总投资的五分之一，主要还是靠北京市投资；第三，北京市认真抓了工作，下了工夫，确实是全力以赴、角色到位，中央支持是必要的。希望你们在现有成绩的基础上，再接再厉，进一步抓好环境综合治理和市政建设，把首都建设得更加美好。为此，我提出三点希望：



2000年9月30日，朱镕基在北京市鲁谷小区半月公园考察。前排右一为北京市副市长汪光焘，左一为北京市石景山区区长陈文占；第二排左一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贾庆林，左二为建设部部长俞正声。

第一，要把绿化工作坚持不懈地抓好。绿化是造福子孙后代的大事。北京这样的城市要坚持以种树为主，多种树，种大树，让首都绿树成荫。我在不久前访问欧洲几个国家，包括德国、卢森堡、荷兰等国，很羡慕它们的绿化成就。它们的绿化主要靠种树。北京应该多种树，不是说不能种草，而是说不要大面积地种草，因为它很难代替种树的效果，而且既费水，维护费也很高。北京过去留下来的几十年、几百年的大树，现在看起来非常好。今年上半年，我到江苏考察，看了南京的市政建设，他们的城市绿化搞得不错，那也是八十多年历史积累的结果。你们一定要以愚公移山的精神种树，动员广大群众大搞绿化，把北京真正绿化好。

第二，要加强城市节水工作。刚才讲为什么不能大面积种草，是因为种草耗水太多。北京是个缺水城市，将来会长期缺水，水会越来越少，南水北调现在还靠不上。我想最近找水利部，研究如何把官厅水库维护好，大力治理污染。官厅水库应该是北京供水的一个来源，北京不能只靠一个密云水库。现在官厅水库污染得相当厉害，那里的水无法利用。如何节水呢？要把市政建设、住宅建设、环境治理同节水工作统筹考虑，结合起来进行。抓节约用水，最有效的手段就是提高水价，不利用价格这个杠杆，节水就是一句空话。北京市一定要认真抓好节水工作。

第三，要搞好城市整体规划和建设。我们刚才看到了北京市几个住宅区改造后的面貌，远郊区都改造得很优美，但也不能忽视中心区。既要注重郊区的美化、绿化，又要抓紧城市中心区的治理。比如中南海、故宫周围，都是很宝贵的地方，也应当治理一下。我在当上海市长的时候，一到任就碰到马桶问题，上海有60万个马桶，据说现在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北京没有马桶问题，但平房几乎没有厕所，都要到公共厕所去。一个星期有几天淘粪，弄得满街异味很大，这与首都

中心区太不相称了。上海的步行街是很不错的，北京市中心区即使不能盖大楼，改造一些步行街也是可以的。总之，要加快中心区的规划和改造步伐，至少要消灭平房没有下水道、都用公共厕所的现象。交通越来越重要，在市政建设中一定要高度重视，特别要抓好立交桥的建设。国务院有关部门都要继续支持北京市搞好环境整治和市政建设，争取使首都的面貌有更大的改观。

给袁宝华同志的信

(2000年10月30日)

宝华①同志：

承告袁公诗集拟收录拙作和诗，自当从命。唯望弗加突出，以免喧宾夺主。何况诗意不多，唯有真情，知我者公，得附骥尾，足矣。

此问

大安

朱镕基

十月卅日

---

① 宝华，即袁宝华，曾任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

附：

八十述怀

袁宝华

盛世风光满眼新 耄耋之年几度春

少壮常怀济民志 垂暮犹存报国心

征途险阻鼓剩勇 正气张弛系念深

岁月不居廉颇老 宜将清白贻子孙

敬和八十述怀

朱镕基

奉天初识韩荆州 亦师亦友五十秋

廉颇跨鞍情未老 赤臣谋国志不休

企改运筹功绩著 公正廉明口碑留

我学袁公高格调 无愧于心复何求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办公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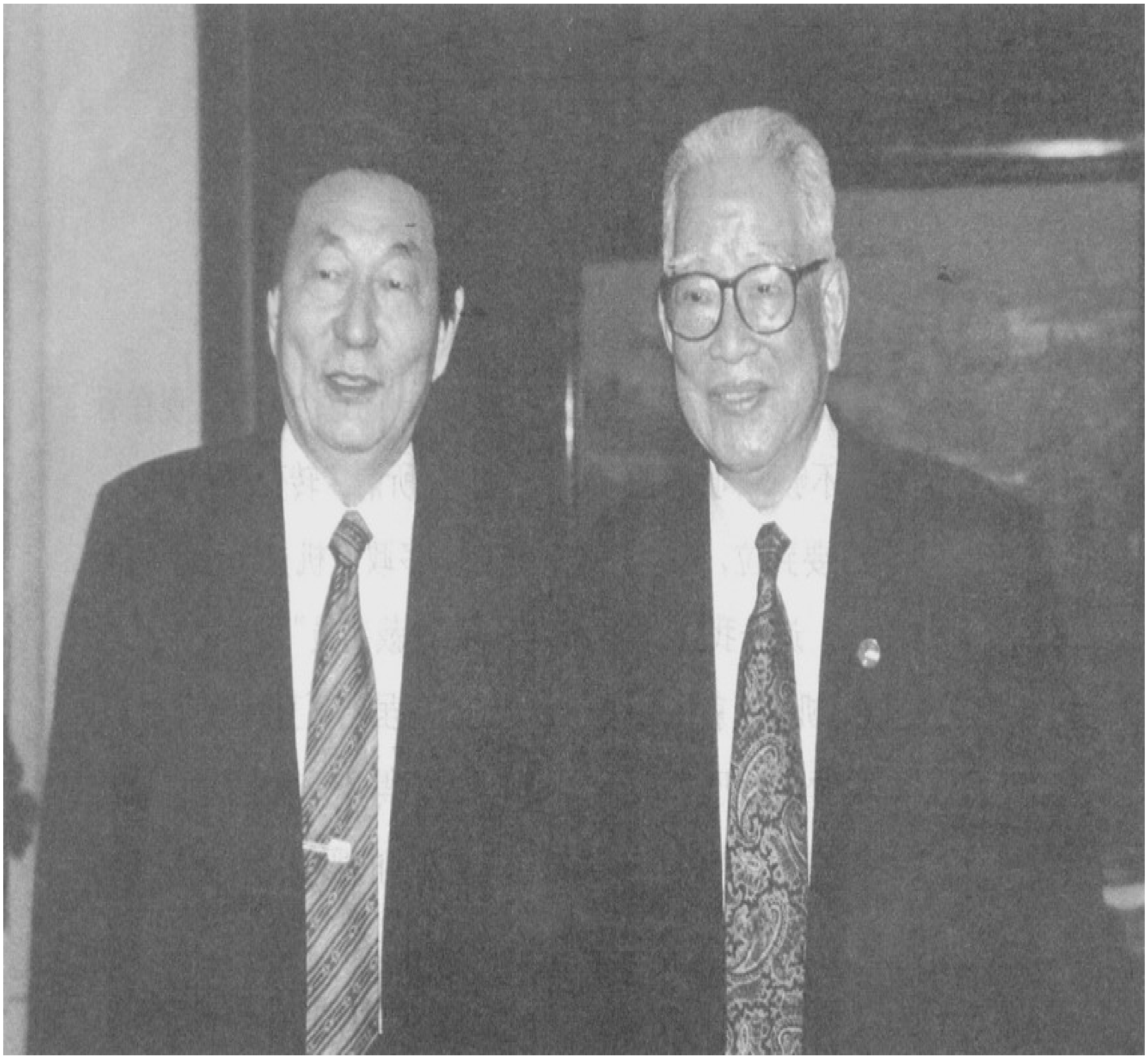
宝华同志：

承告袁公诗集拟收拙作和诗，自当从命。唯望弗加突出，以免喧宾夺主。何况诗意不多，唯有真情，知我者此，得附骥尾，足矣。此问

大安

朱镕基

十月廿日



1999年4月23日，朱镕基在北京中南海紫光阁与袁宝华合影。

转变政府职能，改进工作方式

(2000年11月7日)

这是朱镕基同志在接见全国政府系统秘书长、办公厅主任会议代表时的讲话。

我讲三点意见：

第一，要切实转变政府职能。本届政府提出的这个任务，现在看来，完成得还很不够，同志们还要继续努力。所谓“转变政府职能”，就是政府的角色要到位，不要错位。现在许多政府机关，忘了政府机关是干什么的。过去我们讲过，政府要当“裁判员”，就别当“运动员”；你是政府机关，就别办企业。现在政府虽然不直接办企业了，但有的政府机关对企业仍然非常“关怀”，关怀得“无微不至”。这就容易丧失政府机关公平、公正的执法地位。政府的职能应该主要是创造一个法治的环境，让企业去公平竞争。

实际上，政府该干的事情很多。现在，全国究竟有多少地方的机关和事业单位发不出工资？当然，省政府不会有这种事情，但在县乡一级还不在少数。有一种拖欠是季节性的，拖欠了几个月的工资，到过春节或是到年底就补发了。有的根本发不出来，长期拖欠。为什么造成这种情况呢？不是没有这个钱，要么是把钱挪用去办企业，钱投进去回不来，要么盖了楼堂馆所，要么用于吃喝招待。我们一再讲，要“先吃饭后建设”。先吃饭的意思就是保证给公务员按时发工资，如果不能够保证给每一个公务员按时足额发工资，这支队伍是不能够巩固的，政府就是失职的。我想请同志们调查一下这个问题，你们那里究竟有多少个县、乡镇的机关和事业单位发不出工资？如何确保？我们考虑明年还要涨工资，但是涨工资的前提是不能拖欠工资。

政府机关要角色到位，不要错位，特别是不能直接去管收费，这很容易诱发政府的腐败和贪污。我们政府机关应该处在一个公正的、客观的地位，去实施监督。如果一个政府机关在行使职权时有自身利益

的话，就有可能利用职权为本部门、本单位谋利益，从而丧失了公正、公平的地位。

另外，执法机关的执法往往不得力。法院判决的案子，相当一部分不能执行。如果案子中的“苦主”是老百姓，本应得到赔偿，可总是执行不了，人家就可能连饭都没得吃，甚至流离失所。我觉得，如果政府机关不能够公正执法，不能维持一个正常的社会秩序和一个公平竞争的环境，经济就发展不上去。

现在有的地方热衷于搞各种投资洽谈会、贸易洽谈会。这不是政府的任务，而是政府工作错位的一种表现。发展经济，包括西部大开发，不能刮风，不能搞形式主义。西部大开发的重点非常明确。首先，就是搞基础设施建设，建公路、铁路、机场、水利设施等等，这些项目同开“洽谈会”关系不大。如果搞加工工业项目，运距那么远，产品根本没有竞争力，只会背上包袱。其次，就是加强生态环境建设，当前应利用粮食库存相对富余的机遇，做好退耕还林、还草、还湖等工作。生态环境改善了，自然会有人去投资。现在需要的是扎扎实实的工作，把精力花在开会、洽谈上无济于事。

第二，政府机关的工作方式要改进。具体地讲，就是精简会议，精简文件。现在我们的会议、文件还是太多。似乎不发文件，事情就办不成；其实，发了文件，很多仍然不能落实，等于没发。还不如多抓点实事，多下去了解一点民间疾苦。

国务院有两个刊物办得不错。一个叫《昨日要情》，把国务院所有领导同志前一天的批语全部登出来，起到了沟通情况、指导工作的作用。目前只发给国务院各部门的负责同志。那些批语，有的对，有的不一定很对，供同志们参考。另外，《昨日要情》还有一个内容，就是把国务院每天的办文情况和一些地方、部门报送的重要信息刊登出来。每天看这么一份，对国务院的工作就大体清楚了。第二个叫《值班快报》，刊登的是各地区发生的一些较大的事件。比如，哪里把铁路堵了、把公路断了，哪里发生围堵政府的事件了，等等，我们都能很快知道。

我们在办文方式上也做了一些改进，就是实行部门负责制。国务院每一件事情，都有一个部门牵头。主管部门报到国务院的文件，请求批准、批转或转发，必须在报来之前征求各有关部门的意见，把所有的意见协商一致。如果意见不能达成一致，在哪一点上某某部门还不同意，理由是什么，你要写出来。过去，有些部门报来的文件，根本没有跟有关部门商量过，让我们一件一件地去协调，当时国务院十位秘书长(一正九副)还忙不过来。现在只有五个秘书长(一正四副)，我们不直接协调，只有在主管部门协调不下来的情况下，把他们协调的结果报国务院后，再由有关秘书长协调，最后由国务院仲裁。这几年，国务院办公厅的工作确实大有改进。最近，我们研究社会保障体系建设问题。我要求把1991年以来党中央、国务院关于社会保障体系的文件、会议记录和我所有的讲话，都整理出来。结果，国务院办公厅一天就拿出来了，效率还是很高的。本届政府提出要“廉洁、勤政、务实、高效”，其中廉政是最主要的，不廉政什么都谈不上。要做到高效，必须提高政策水平和业务能力，还必须有一支高素质的队伍和一套科学、规范的做法。

第三，要搞好政府机关的信息化建设。我们政府机关办事的手段，要不断地革新、不断地完善，实现信息化。政府机关的信息化是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今年7月份，由德国牵头，14个西方国家的元首聚会柏林，专门研究面向21世纪的现代政府管理问题。我对这个题目很感兴趣，把有关文件调来看了一下，其中许多观点很值得重视、思考。在这次会议上，就整个政府机关面对信息化的时代，怎样利用电子手段进行政府管治的一些主要原则进行了讨论。我想，如果我们所有的政府机关都能够实现信息化，然后通过互联网络联结，形成政府的信息网，将会大大改进我们的工作。

深入开展打击骗取出口退税的专项斗争

(2000年11月17日)

2000年11月17日，国务院在北京3开全国打击骗取出口退税工作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十个重点检查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主管负责同志和有关部门负责同志，以及其他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秘书长，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同志、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和武警总部等方面的负责同志。这是朱镕基同志在会上的讲话。

国务院召开的这次在全国范围内深入开展打击骗取出口退税犯罪活动的动员会议，是1998年、1999年开展打击走私专项斗争以后，又一次打击进出口环节犯罪行为的重大行动。下面，根据会议讨论情况，我讲几点意见。

一、统一思想，提高认识，严厉打击骗取出口退税犯罪活动

今年的外贸进出口形势很好。1到10月，出口2051亿美元，同比增长32.2%；进口1820亿美元，同比增长38.6%；贸易顺差231亿美元。预计全年进出口总额可达4000亿美元以上，超过我们的预期。外贸出口从两年前一度负增长到正增长，又出现今年这样大幅度的增长，主要是由于各方面的共同努力，中央关于出口退税的政策也发挥了明显的作用。从1999年下半年开始，综合出口退税率由12.5%提高到15%，其中有些商品的出口退税率提高到17%。实践证明，这是完全正确的政策。

但是，从去年11月份开始，外贸出口出现异常猛增，特别是在有些地区，服装等商品的出口额一下子增长十几倍，甚至几十倍。这无论是从生产、供货的准备来看，还是从市场需求的容量来看，都不可能增长得这么快。今年1到6月，全国外贸出口1144亿美元，比去年同期增长38.3%；同期办理出口退税432亿元，同比增长130%。到10月底，全国已办理出口退税763亿元，同比增加347亿元，增加近一倍，

退税增幅大大高于同期出口增幅。同时，在出口大幅增长、外贸保持较多顺差的形势下，国家外汇储备却增加很少，1月到10月只增加50多亿美元，这也是很不相称的。这些迹象都说明，出口退税方面存在着严重问题。

今年8月初，国务院经过多次讨论，决定开展打击骗取出口退税的专项斗争，成立了以吴仪同志为组长的领导小组，并从税务、公安、监察等部门抽调200多人组成工作组，选择骗税多发地区——广东省潮汕地区的潮阳、普宁两个县级市作为打击骗取出口退税的试点地区，对出口货物税收情况进行了重点检查。我原以为动手的时间可能有点晚，难以查到真凭实据了。但是，仅两个月时间就查出，这两个市从1999年以来涉嫌偷税、骗税12.8亿元，其中涉嫌骗取出口退税8.55亿元，猖狂之极。骗取出口退税犯罪活动不仅是专业化团伙作案，量大面广，而且是一条龙作业，畅通无阻。骗税分子明目张胆地用假名、假身份证开办各类虚假企业，肆无忌惮地制贩、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国务院工作组在潮阳、普宁两市检查了416户供货企业，其中竟有264户是虚假的，占检查总数的63.5%；查出了通过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进行偷、骗税的犯罪团伙100多个，可见问题十分严重。经过国务院总理办公会议讨论，并向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汇报，决定在全国范围内深入开展打击骗取出口退税犯罪活动的专项斗争。

骗取出口退税违法犯罪活动有什么特点昵？看来，既有与走私进口相同的特点，也有不同的特点。相同的方面，都是专业团伙作案，打通海关、银行、税务等各个环节，即所谓“打通关”，形成一个犯罪链条。他们用金钱开道，通行无阻，横行无忌。这在湛江、厦门走私案中看得非常清楚。出口骗税团伙也是靠打通一切环节，构成一个骗税链条。所不同的是，骗取出口退税还有基层政府工作人员参与，内外勾结，政企勾结，编织了一张骗取出口退税的犯罪网络，而不只是一个链条。例如，普宁市检察院一个工作人员自办27家虚假企业，私自刻制294枚印章，在上海等16个省市设立提供虚假增值税专用发票的网点，1998、1999两年共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价款4.95亿元，涉及税款8425万元。潮阳市铜盂镇有一家饭店，共有37个房间，每个房间都是

一家专门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公司。有些乡镇政府还直接参与骗税，这一点比走私还严重。走私得逞的关键环节在海关，骗取出口退税得逞的关键环节在税务部门。潮阳、普宁两市的国税局局长都参与骗税。税务部门既管增值税专用发票，又管退税，如果直接参与骗税，其后果是非常严重的。这两个市的税务部门管理混乱、违法乱纪，擅自降低税率，搞定率征收①、包税②，为犯罪分子大开方便之门。

---

① 定率征收，指按照核定的税收征收率征收相关税收的一种办法。

② 包税，也称“包税制”，指不按税法规定的税率和计税方法计算缴纳税款，而由税务机美与纳税人或企业主管部门商定一个在一定时期内缴税的固定数额。这种做法早已明令禁止。

骗取出口退税违法犯罪活动的另一特点是，骗税往往和套汇、骗汇交织在一起，大量非法买卖外汇。检查发现，在潮阳市就存在一个极不寻常的资金周转网络，大部分骗税资金通过几个化名的个人账户，汇入新疆，到非法外汇市场去购买外汇，再将外汇现钞运回广东，然后从各种渠道流到境外，用以直接支付给假出口企业做所谓的“出口收汇”。他们就这样通过假出口和真、假两种结汇骗取出口退税，使国家蒙受巨大损失。

骗取出口退税犯罪活动的危害是很大的。一是直接破坏国家出口退税政策的实施，造成国家税收大量流失。二是严重扰乱正常的经济秩序，特别是破坏进出口市场秩序，败坏国家改革开放的形象。三是腐蚀政府机关，毒化社会风气，损害党和政府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因此，必须像打击走私进口一样，再出重拳，严厉打击骗取出口退税的违法犯罪活动。

从这次会议讨论的情况看，要搞好打击骗取出口退税的专项斗争，必须进一步统一思想认识。

有些同志认为，我们那里出口额不大，又没有发现骗取出口退税大案要案，何必作为重点检查地区呢？这种认识是不对的。即使你那里还没有发现骗取出口退税大案，也很难说就没有大案，不要过早打保票，更不能不去认真检查。试点情况证明，骗取出口退税的犯罪活动，往往是通过众多犯罪分子相互勾结，形成骗税环节交织的庞大网络进行的，绝对不能掉以轻心。你那里出口额虽然不大，但也可能属于这个网络的一部分，会有很多线索。你那里要是工作使了劲，就可能从你那里突破，就有助于其他地区破案。而且，只有各地同时行动，才有利于一举粉碎这个犯罪网络。广东省的同志在国务院工作组的领导下，全力以赴，取得了试点成功，也为其他地区开展这一专项斗争提供了经验，但是绝对不能松懈。其他出口大县恐怕问题也不少，都得去查一查。希望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同志们都要充分认识开展这场斗争的重要性，不要轻易下结论，低估了问题的严重性。

还有一种思想，是担心打击骗取出口退税犯罪活动会影响出口的增长。我认为，绝对不会影响外贸正常出口，相反，只会巩固和发展外贸出口的好形势。外贸出口增幅暂时可能因此会下降一些，而下降的只是“假出口”。这种为了骗税的“假出口”减少了是一件好事。只有坚决打击出口骗税犯罪活动，才能维护进出口的正常秩序，创造外贸持续发展的好形势。企业的正常出口不但不会受到影响，而且出口条件还会更好。根据潮阳、普宁一些守法经营企业的反映，它们在那里活不下去，因为骗税企业、虚假企业太多，退税指标难以分到它们头上，守法企业没法正常发展。需要指出，打击骗取出口退税犯罪活动，绝不是要改变出口退税政策。我们将保持出口退税政策的连续性，只要真正出了口，就会按规定退税，绝不含糊。对守法户、信誉高的出口企业，一定要按政策退税，并且予以优先安排。对那些一直保持良好出口纪录的大中型国有企业，只要各种单据齐全，经过检查没有问题，就要抓紧退税。当然，在开展检查期间，退税进度受一点影响也是难以避免的，但不能因此就不开展检查。我们要对人民负责，退税花的是中央财政的钱，是纳税人的钱，绝不能让它进入骗税犯罪团伙的腰包。

我估计，骗取出口退税的额度可能是相当大的。通过打击，虽然难以追回全部损失，但只要把犯罪团伙打掉了，有了一个良好的进出口秩序，明年的出口退税额就会减下来，或者说，用同样多的退税额可以支持更多的出口。

总之，希望同志们通过这次会议，要统一思想认识，紧急行动起来，按照中央的部署，雷厉风行、扎扎实实地开展打击骗取出口退税犯罪活动的专项斗争。

二、周密部署，穷追猛打，力争打击骗取出口退税专项斗争的全面胜利

(一) 全面铺开，突出重点。全面铺开，就是每一个涉及出口退税的税务局都要检查。开展这次打击骗取出口退税的专项斗争，要像打击走私、骗汇一样，在全国形成强大的攻势。为此，各地区、各部门都要迅速行动起来，布下天罗地网，哪里存在出口骗税活动，就在哪里予以打击，使骗税活动无可遁匿，使犯罪分子无处藏身。各地方都要认真进行自查，无一例外，不留死角。

要注意点面结合，突出重点。从地区看，重点是广东、广西、福建、江苏、浙江、北京、上海、陕西、湖北、山东等十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这些是出口退税额较大的地区，或者是存在问题线索较多的地区。从出口货物看，主要是服装、纺织品、电器、电子产品、化妆品、小五金等商品。这些商品退税率高，骗税获利较大，问题也相对严重。从对象看，重点是打击专业化骗税团伙。对于骗税的重点地区、重点货物、重点对象，要加大检查力度。国务院打击骗取出口退税工作领导小组将派出工作组，对上述十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进行重点检查，但主要还是靠各地自己组织力量开展检查，特别是税务部门要把这项工作当做一件大事抓紧抓好。其他地方主要是自查，在此基础上，国务院打击骗取出口退税工作领导小组还要进行抽查。

(二) 集中力量查处大案要案，依法严惩骗税犯罪分子。从以往打击走私、骗汇的经验看，只有彻底查处大案要案，严厉打击犯罪分子，才有强大的震慑力量。1998年全国开展反走私专项斗争以来，先后查

处了湛江、厦门等特大走私案件，给一些走私犯罪集团以毁灭性的打击，既有效地遏制了走私猖獗的势头，又在政治上显示了党和政府“反贪灭罪、执法如山”的形象。同样，要把打击骗取出口退税犯罪活动的专项斗争引向深入，并取得显著成效，也必须集中力量重点突破一批骗税数额巨大、情节严重的典型案件。要坚决打掉骗税犯罪团伙，要把政府内部的犯罪分子都揪出来。潮阳、普宁已经基本查清楚的案子，要依法快判。要加大查处骗税大案要案的工作力度。国务院派下去的工作组要加强对办案工作的指导和检查。查处案件要坚决排除一切阻力和干扰。各级政府和各有关部门要支持执法机关依法办案，敢于碰硬。不论案件涉及什么单位、什么人，都要一查到底，绝不姑息。对那些性质恶劣、情节严重的骗税犯罪分子，要依法给予最严厉的制裁。无论犯罪分子逃到哪里，都要不惜一切代价缉拿归案，绳之以法。要切实奖励办案有功人员。要加强群众监督和舆论监督，对典型案件的查处结果要及时曝光，以增强打击骗税的威慑力。

在查处大案要案中，特别要着力抓好两个关键问题。一是彻底打击骗税团伙，特别是严厉打击那些与地方政府和执法机关的败类内外勾结的骗税团伙，严惩团伙骗税的组织者、策划者以及幕后支持者。坚决捣毁犯罪窝点，砸断犯罪链条，粉碎犯罪网络，以绝后患。二是狠狠打击造假骗税，要抓住一切造假的蛛丝马迹，以检查各种虚假凭证为突破口，跟踪追击。

(三) 联合作战，各负其责。税务总局虽然多次派检查组对广东潮汕地区出口骗税活动进行检查，但都收效不大，其原因之一是没有形成合力，执法手段不够。由于查处涉嫌骗取出口退税案件，涉及企业资金往来、工商登记、报关出口、外汇核销等各个环节，对于骗税网，仅靠税务部门无法查深查透，如果政法机关不介入，也难以排除办案阻力。因此，税务、海关、外汇、银行、财政、公安、纪检、监察等部门和检察院、法院要联合起来查案办案。税务部门要发挥好打击骗取出口退税的主力军作用，彻底查清骗税的来龙去脉，并把涉案线索及时反馈给有关部门。银行、国库部门要负责查清骗税企业开户、资金往来和税款入库、退库等情况。外经贸部门要对外贸企业和有进出

口自营权资格的生产企业加强管理与检查，对有骗税劣迹和不符合要求的企业要坚决查处。公安、检察院、法院等有关部门要提前介入，掌握主动。只要犯罪证据确凿，就要从快判决。

三、标本兼治，堵塞漏洞，从根本上遏制骗取出口退税犯罪活动

(一) 加快“金税工程”建设，尽早实现各部门联网。综合运用现代化信息技术，加快信息化建设步伐，实现综合执法数据的联网审核，是防范和打击骗税的基础性工作。

(二) 执行税法，强化管理。要把各项制度建立和完善起来，切实加强对出口商品征税、退税全过程的管理。税务机关要严格依法征税，严禁擅自降低增值税税率和其他违反税法的行为。要加强对增值税专用发票和专用税票的管理。要建立健全出口退税岗位责任制和过错追究制，严格出口退税审核审批制度。对出口企业实行分类管理，对违规经营的企业实行劣迹追溯制，严格控管。海关、银行、外汇、外经贸等部门也必须加强和改进管理，堵塞各种漏洞。

(三) 深化改革，健全机制。从近几年的实践看，现行的退税机制有缺陷。要针对出口退税过程中暴露出的问题，抓紧改革和完善出口退税机制。要把纳税的环节向前移，改进增值税的征收管理。要进一步健全和完善出口退税的相关制度和办法，做到每一步都严格按程序运行、按规定办理，环环相扣，严密规范。

四、加强领导，狠抓落实

为加强对打击骗取出口退税工作的领导，国务院已成立打击骗取出口退税工作领导小组。其主要职责是：领导并组织实施全国打击骗取出口退税的各项工作，部署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对出口货物税收情况的全面检查和重点检查，指导监督检查工作的顺利开展，协调解决打击骗取出口退税工作中的重大事项和突出问题等。

各地区、各部门要把打击骗取出口退税工作，列入重要议事日程，切实加强领导，主要领导要亲自抓，并由一位领导具体分工负责。税务部门在打击骗取出口退税斗争中负有重要责任，希望税务部门的同

志，尤其是各级领导一定要下大决心，坚持原则，站在斗争前列，并认真吸取教训，进一步把好退税关。

要从根本上防止和减少涉税违法行为的发生，关键是要真正把税务、工商、海关、外汇、金融、外经贸等执法部门和管理机关的队伍建设好。总的来看，我们的税务队伍是好的，作出了很大的成绩，但是暴露出来的问题也相当严重。税务部门是打击骗退税的主要力量。正人必先正己，“己之不正，焉能正人”？要做到廉洁自律，严厉惩治腐败，坚决清除队伍中的害群之马。特别要整顿和加强税务系统的领导班子，不断加强税务队伍的反腐败教育和职业道德教育，全面提高人员素质。海关、工商、外经贸、外汇管理、银行等部门也要不断加强自身建设，以适应新形势、新任务的需要。迅速而严厉地打击骗取出口退税违法犯罪活动，是当前经济工 作中一项重要和紧迫的任务。各部门、各地区一定要按照国务院的统一部署，统一步调，齐心协力，扎实工作，夺取打击骗取出口退税专项斗争的全面胜利，把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更好地推向前进。

在二〇〇〇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2000年11月28日)

2000年11月28日至30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北京召开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党政主要负责同志，中共中央有关部门、国务院各部委和有关单位的主要负责同志，解放军四总部和武警总部负责同志。这是朱镕基同志在会上讲话的主要部分。

我刚从新加坡回来，去的时候从冬天走向夏天，回来又从夏天返回冬天，所以昨天晚上就扛不住了，感冒发烧。今天讲话可能上气不接下气，请同志们原谅。我主要对明年经济工作的几个重要问题，作一点具体的阐述。

今年的经济情况，确实是历年以来最好的，我讲的“最好”是指效益最好。今年1到10月，全国财政增收差不多2000亿元，这是一个很大的突破。这里面一个主要原因是国有企业的复苏。增收主要来自增值税和消费税，都是企业交的税。这就反映国有企业的情况有好转，它的脱困是真有其事，不然它就交不了那么多增值税、消费税、所得税，国有企业本身的利润比去年增加了一倍。另外一个原因，是出口形势好转。前几个月我们的出口增长都达到了30%以上，进口也相应地大幅度增加，因此，海关的税收虽然没有像1999年增收700亿元那么多，但增加得也不少。这说明，今年国民经济确实是有了重要的转机，在效益方面有一些突破性的进展。在这种欣欣向荣的情况下，就是说在经济有所好转，或者说出现重要转机的情况下，我们应该注意什么问题呢？第一，在抑制通货紧缩趋势的情况下，要警惕和防止通货膨胀。第二，在继续扩大内需的条件下，要注意防止经济过热和重复建设。第三，在产业结构调整的过程中，要特别重视加强农业，绝不能忽视农业这个基础。第四，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要切实加强市场管理，打击制售假冒伪劣商品和偷税漏税等不法行为，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

现在究竟是通货紧缩还是通货膨胀，还有不同的看法。我在1998年就讲过，我们所表现出来的通货紧缩并不典型，因为我们说的通货紧缩主要指一点，就是市场需求不足、市场价格下降。这几年都是这个趋势。很多经济学家认为，只要具备这个条件，就叫做通货紧缩。但是也有很多经济学家主张不只是一个条件，而是三个条件、五个条件，或是更多条件。比方说，你真要叫通货紧缩的话，那生产要下降呀，但是我们的生产并没有下降，速度虽然有所降低，绝对数还是增长的。还有，货币的供给量应该减少，但是我们这几年，无论狭义货币供应量M1或广义货币供应量M2，增长速度都是超过百分之十几，增幅也是很高的。现钞的发行虽然有所减少，但是现钞发行没有包括一些隐性的发行。例如我们今年拿了差不多1000亿元，借给各省区市政府去解决农业合作基金会、城乡信用社、供销社股金部、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的挤兑和欠账问题，这实际上就是由中央政府发票子。就是拿物价的降低来讲，我们的计算方法也有很多问题。价格构成有400多种产品，过去以农业为原料的产品占物价指数的比重在60%左右，现在年年调整，还有47%是与粮食有关系的产品。大家都知道粮食相对性过剩，粮价不断降低，因此这部分产品价格有所降低，但是，大量生产资料性质的产品、工业消费品和房价都是在不断地攀升，这是一种倾向掩盖了另一种倾向。所以我讲，要注意防止通货膨胀，不要因为农产品相对过剩，掩盖了目前已经出现的某种程度的过热现象。这种过热的现象，主要表现在大量的重复建设上。前一段时间的“彩电大战”，售价降低到成本价以下；现在又是“保暖内衣大战”，大家来看这个广告，什么“南极人”、“北极绒”等等，据说现在盲目发展，保暖内衣产量已经超过需要两倍以上。现在钢的生产能力有1.4亿吨，产量已达到1.3亿吨，居世界第一，好多都是产自小型的、落后的钢铁企业，真正管用的产品又生产不出来，每年还进口1400万吨钢材，这么搞下去怎么得了！

下面，我就明年经济工作讲十个问题。

一、加强农业的基础地位，努力增加农民的收入

我们把这个问题摆在明年经济工作的第一位，也就是我们明年最重要的工作、首要任务，因为它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很突出的就是粮食的市场价格年年下跌。原来据农业部门估计，今年粮食要减产900亿斤，差不多相当于总产量的9%啊！但减产以后粮价还在下跌，一点也没有引起恐慌。我们希望减少一点粮食产量，把粮价提高一点，可它就是提不上去，农民的收入在不断减少。过去说增产不增收，现在实际上增产减收，我不是讲全国，是讲粮食主产区，这就是个很大的问题了。粮食价格不断下降，一亩地赚不了几十块钱，农民的负担还在继续加重，农民的收入特别是粮食主产区农民的收入在减少，他怎么种粮食呢？我就很担心农村要出事。根据农业部对全国28个省区市、67个自然村、5800多个农户的调查，算了一笔细账，今年农民的人均纯收入预计为2147元，比去年增长1.8%，总体上是增加 了，但是增加的都是东部沿海七个省，西部欠发达的几个省区只增长1.4%，而粮食主产区九个省减少了3.8%，这个数字是很严重的！同志们，已经到了要解决这些问题的时候了。

第一，继续推进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的调整。农业种植结构的调整，还是要采取公司加农户的办法，用市场来引导农民，保证他们的经济效益。我们从《焦点访谈》上看到，好多乡镇干部在那里瞎指挥，今天扒了粮食种大蒜，明天又扒了种烟叶，我看这些做法都是犯罪！你有什么权力啊！要农民扒了这个种那个，你又不能保证他们的收入，你也不去种，瞎指挥！这是个商业行为、企业行为，要研究市场，企业要去带动农民种植。你要他们种什么就跟他们签合同，保证收入。在这个问题上，我希望粮食主产省能作出一点成绩，不是瞎指挥的成绩，而是真正用市场引导农民的成绩。



2000年4月15日，朱镕基在江苏省高邮市武安乡考察农业种植结构调整情况。左三为江苏省委书记回良玉，左六为国家计委副主任汪洋，左九为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戴相龙，右二为江苏省省长季允石。

第二，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这几年我们不断地讲粮食流通体制的问题，我在这个方面花的时间最多。现在粮食多了，怎么办？有的同志说放开，你敢放开吗？在粮食已经过剩的情况下放开，价格不是比现在更低吗？还有同志说我们还是恢复到以前吧，就是只收购1000亿斤定购粮。现在情况已经完全不一样了，那个时候农村的粮价是很高的，我们收定购粮的价格比市场要低两毛钱，等于要农民来为国家作贡献。我们收了1000亿斤定购粮，到城市来供应市民，保持粮价的稳定。你现在是反过来了，用收定购粮的办法解决不了粮价低的问题。所以，想来想去，从1997年到现在，考虑了这么多年，只有国有粮食企业用保护价敞开收购这个办法！用保护价敞开收购，就基本上保护了农民利益，保证了农民的基本收入，种地还不至于亏本。中央财政也包括地方财政，粮食风险基金加利息补贴，一年是好几百亿元，是补贴给农民的。不补贴，农民没法种地啊！现在看起来问题还在于财政补贴还不够，没有敞开收购，因此农民的利益受到损失。我们今年上半年做了大量的微服私访调查，各个地方大体上用保护价收购农民三分之二的余粮，三分之一没收上来，农民要以远远低于保护价的价格卖给私商。我们在河北调查了，保护价4毛钱或者4毛多1斤，旁边那个私商收购1块钱3斤。我们国有粮食企业是吃“大锅饭”的企业，改革非常缓慢，几十年的观念难以改变。我最近到一个省调查，我说去看看粮站。第一站我去了，他们都事先做好了准备，一到这个粮站就是车水马龙，农民都在交售粮食。粮站收购员非常地熟练，扦子一插，马上就能判断是几级质量，然后电子计算器拿出来噼里啪啦一按，多少钱，扣水扣杂，一口清，那比电子计算器还快啊！我当时就说真好，如果粮食企业都这样就好了。我问这个站长，是不是敞开收购？他说完全敞开收购。我说天天车水马龙啊？他说是。我就蛮放心了。但是第二天我就改一个办法，走到半路上，我说拐一个弯，到镇里粮站去看看，这一看就生气了。粮站里冷冷清清，没有人交售粮

食。一了解情况，这个粮站有59个人，那天留在粮站的只有十几个人，其他人到下面收粮食去了。他们不是替公家收粮食去了，他们是变成个体户去收粮食了，拉着小板车，在那里跟农民压价，玉米1块钱3斤，拉回粮站又按保护价(4毛钱1斤)卖给粮站。同志们，这个情况一点都不假，是我亲眼看到的。我到玉米仓库里看了看，粮食质量很差，这种粮食再放几年都得变成废料。同志们！希望你们重视一下粮食问题，民以食为天啊！如果粮库的粮食都不能吃了，将来怎么得了啊！国有企业都变成私商来压价收购粮食，那么，党和政府不都变质了！其实，我认为用保护价敞开收购农民余粮并不难，就是领导要重视，要抓粮食企业。要求也不高，就是要求 国有粮食企业按保护价收购农民的粮食，亏损由国家补贴；顺价销售其实将来也不是很难，如果大部分粮源都在国有粮食企业手里面，而不在私商的手里，那是可以做到粮食顺价销售的。我们的目标，还是要把农民手里的余粮，至少80%左右要收到国家的手里，用保护价收进来，这样农民的收入就能稳定增加，由此增加的财政补贴，我们愿意补贴。这个农民问题太重要了，所以，要提请同志们注意。

第三，推进农村的税费改革。农民增收不了，至少也不要给他增负，得减负，减负就是增收嘛，现在农民负担确实是受不了。经过专题小组一年多的研究，我们提出了一个办法，已经在安徽全省试点，就是把农村的各种收费都取消，因为你光写个清单取消多少种收费，那没什么用，你今天减了180种，他第二天就换一个名字，把它改为360种，有什么用啊！现在就是所有的收费包括“三提五统”都不准收，便于监督、便于投诉。你也不要再去想什么名目来收费了。不收 费以后，政府没有收入怎么办呢？提高农业税和农业特产税的税率，就是提高农业税及其附加，比现在提高一点，但这个收入不够，还养不起乡镇干部，还要通过精简机构、取消一些不合理开支以及中央财政给予补贴来解决。中央根据安徽试点的经验，明年从中央预算里拿出200亿元来补贴。明年大家能否推行，各省根据自己的条件来决定，如果没有条件在全省实行的话，也可以挑一两个地市先试行。你们什么时候实行，中央就什么时候补贴，大概平均一个省每年补十来个亿，这

要进入财政基数。这个都经过中央政治局常委讨论了，中央下了最大的决心为农民谋利益，必须付出这个代价，不然乱收费难以取消。

第四，深化农村金融改革。农村金融体系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它的重点都摆在乡镇、县城，它的信贷主要用于搞乡镇企业。而真正的农民、农户，他需要调整产业结构，搞大棚种植或者干别的什么，他没有钱，没人给他贷款。我们今年在江苏考察，得出了一个结论：现在必须有为农业、农村、农民服务的金融机构，把现在的农村信用合作社加以改造，让它来承担这个任务。为此，要对农村信用社进行改革，不能够再像过去那样，农村信用社法人在县里，存款主要在县里，贷款主要贷在县里，听“县太爷”的，都用来搞建设，面向农村的贷款很少。我们这一次提出搞农村信用社改革试点，就是使它的服务对象面向农村、面向农业、面向农民。当然，农村信用社的改革也并不只是机制的转变、服务对象的转变，还有一个监督管理的问题。现在农村信用合作社在全国都以县为单位，全国有2000多个，谁来管呢？人民银行管不了呀，人民银行对它只是监管。它的经营管理怎么搞呢？需要进一步考虑。改革方案正在制订，准备在江苏省试点。总之，这项工作一声要谨慎从事，经过试点，然后再在全国推行。解决为农业、农村、农民金融服务的问题，这个事情很大，不能乱来。

第五，加强农业和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最近几年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对农村给予了很大的支持，包括农村电网改造，实行同网同价，加强农村的道路和通信设施建设等。但另一方面也不能什么都是村村通，还要根据条件。有些村子里面村民生活、居住条件非常恶劣的话，从长远看应该搬出来，如果现在硬要让它“通”，花的钱很多，也划不来。

二、大力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

最近几年，我们对纺织、冶金、煤炭、制糖等行业的结构调整，取得了明显的成效，特别是纺织行业，压了1000万锭子。国家有六项政策，这1000万锭确实都砸掉了、回炉了，现在纺织工业出现了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好局面：出口大幅度上升，品种、结构、技术水平都有

很大的提高，全行业两年实现扭亏为盈。制糖行业关闭了甜菜糖厂、小糖厂，扶持大的糖厂，情况也好多了。糖价也上来了，原来市价降到2000元1吨，现在是3600元1吨，甚至有的地方是3900元1吨。但这个事情我也告诉国家计委，还是要调控糖的价格，国家的储备糖还是蛮多的，要抛出来，使糖价稳定在3600元1吨左右，不能太高，太高的话，那些小糖厂和甜菜糖厂就会死灰复燃。电信、石油和石化、有色金属、军工等行业，都进行了比较大的改组。从总体上来看，还是比较成功的，创造了一定的竞争机制。但结构调整的任务还是非常繁重的，特别是小企业关不了。小煤井、小水泥、小糖厂、小纸厂、小电厂、小化工厂制造污染，也关了一部分，还是有大量的没有关，这方面我们还要继续努力。

三、进一步深化国有企业的改革

经过全国上下共同的努力，国有企业改革和脱困工作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实践证明中央的决策和采取的措施是完全正确的。但这只是一个阶段性的成果，总的看来，国有企业经营机制转换还是滞后，竞争能力和盈利能力不强，还有不少企业生产经营仍然很困难。三年以前，1998年，在一万多户国有大中型企业里，亏损户有6599户，亏损面为40%左右。经过这几年的各种脱困工作，现在应该说三分之二的困难企业已经脱困了。初步统计，亏损面降到15%，但是又有一些原来不亏损的企业现在变成亏损了。像煤矿，在原来6599个亏损企业里没有煤炭企业，煤矿都是盈利的，但后来一查，发现不少企业是虚盈实亏。所以，要从根本上解决国有企业的问题，还是要做长期艰苦的努力，任重道远。

这里，我想讲一下股份制改造的问题。我讲股份制改造，主要是鼓励国有大中型企业，通过重组、中外合资、上市等形式，改组成为股份制公司。上市的企业，要建立信息披露制度，提高透明度，接受群众的监督，使经营管理有明显转变。从1998年到现在，我们国有企业到境外上市的公司已经有22家，一共筹资267亿美元，就是2000多亿元人民币。我们制定了一条规定，从境外上市企业筹集的资金中提10%作为全国社会保障基金，今后在境内上市的公司也要这么做，这样就

可以补充社保基金的不足。在境内上市的公司有307家，筹资2700多亿元，这样加起来差不多有5000亿元。总体来看，上市公司的经营机制和经营成果明显优于其他国有企业。但是，我们也要转变观念，这些上市公司，特别是在境外上市的公司，它们面对的是中外股东啊！我们可不能用计划经济的一套办法来管它们，什么都服从国内这一套管理办法是不行的，不能对它们随便“一平二调”，也不能搞垂直的管理。它们是独立的法人，是对股民负责的，一定要使它们的经营管理向国际水平看齐。同时，对这些上市公司的领导层也必须按照国际惯例建立激励机制，不建立这种激励机制，股民还是不会相信你能办得好。

四、加强并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努力扩大就业

今年年初我们就讲了，要研究建立一个规范的、独立于企业之外的全国社会保障体系，明年开始在一个省试点，然后再考虑在全国推行。这个方案我们已经制订出来了，并且向中央政治局常委、向中央政治局汇报通过了，明年准备在辽宁省全省试点。其他省也可以在一两个地市或者某些地区来进行试点。当前，全国首先就是一定要做到“两个确保”：第一，确保企业离退休人员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第二，确保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费按时足额发放。目前社会保险基金的收缴和支出，从全国范围来讲，是基本平衡的。但地区之间不平衡，沿海地区保得好，中西部地区差一点。根据我们了解，北京、上海、江苏、山东、浙江、福建、广东等七个沿海省市在中央财政不给补助的情况下，依靠自己的努力，今年可以基本实现“两个确保”。所有中西部地区和老工业基地，如辽宁、陕西、湖北、广西、新疆等省区，经过艰苦的工作，我们认为也基本上能做到“两个确保”。但是还有少数地方有新的拖欠，不能做到“两个确保”。我们一再讲了，老的拖欠目前还不能一次性地还清，历史的欠账还暂时挂账，将来逐渐地还，当年不要新欠。像吉林、山西这些地方还有新的拖欠，需要继续努力。我们希望这些地区的各级财政要提高社会保险基金在财政支出里的比重，务必做到“两个确保”。如果各项工作到位，仍然是入不敷出，中央财政酌情给予补助，一定要做到“两个确保”。根据现在经济发展的情况、效益的提高，只要我们认真地去做，应该说是可以确保的。

关于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方案，我想主要讲这么几点：

第一是个人账户问题。因为我们在1998年制订方案的时候，把社会保险缴费账户分成两个，一是统筹账户，一是个人账户。企业拿每个人工资20%的资金来进入统筹账户用于支付统筹的部分，有人退休就把这个作为支付退休金的资金来源。另外，企业为每个人建立个人账户，把自己工资的5%进入个人账户，企业也拿6%进人个人账户，都算做你个人的。这个钱现在不能用，等你退休了以后才能用。现在出现了一个问题：因为分成了个人账户和统筹账户，从全国来讲，整个的统筹账户加个人账户一年收支基本平衡，还略有节余，没有新的欠账。但问题是，这是建立在把个人的钱都动用了的基础上，就是个人账户记了账，但钱没有了，已经发当期养老金了，个人账户变成了空账。现在个人账户建立三年以来已经欠了1900亿元，如果这么欠下去，数量会越来越大。所以我们初步考虑，明年在辽宁省进行试点做实个人账户，就是发工资的时候，企业就把你工资的一部分实实在在放在你个人账户里头。原来是放5%，我们现在想提高到8%，这个钱退休时给你。企业原来要拿工资的6%进入个人账户，现在把这6%用于统筹，进入统筹账户，这样统筹账户每年就平衡了。

第二是下岗职工进入再就业服务中心问题。我们觉得这是个过渡的办法。在下岗职工再就业服务中心的下岗职工基本生活费，原来我们的设想是“三三制”：中央财政拿三分之一，地方财政拿三分之一，企业本身拿三分之一。事实证明，企业拿不出这个钱来，只好由中央财政拿。结果是中央财政拿70%，那么其他30%呢？就是把失业保险金动用了一部分。所以我们想，今后还是实行下岗职工基本生活费跟失业保险并轨，就是企业精减下来的职工不再进入再就业服务中心，就按照你已经失业了，给你发失业的安置费。比方说，你有一年的工龄，给你发一个月的工资；然后，你就向社会保险机构领取失业保险费，大概相当于工资的百分之六七十，领两年；两年失业保险期满以后，你就进入最低生活保障线，这样比较规范一点。对这个办法也有同志有不同意见，我们想选择在辽宁试点。我们还是希望，再就业服务中

心在差不多三年时间里，逐步地把它结束了。对这些原来的下岗职工，都能够引导他们就业，或者是进入失业保险加最低生活保障线。

第三是公务员的养老保险问题。现在公务员的养老保险完全是由国家财政拿钱，吃“大锅饭”的，保证率或是替代率达到90%以上。也就是说，他离退休以后平均每个人拿的钱，相当于他原来工资的90%。企业的替代率在80%左右，因此，机关的人员就不愿意到企业里去，这不利于职工的流动。有人提出怎样把这两个东西并轨，有些地区已经在进行一些试点。我们的看法是在目前这个时期还是以稳定为好，先不去改革机关干部社会养老保险，实行社会保障试点的地方可以试。总之，我们希望社会保障体系问题在明年经过辽宁的试点，后年能够在全国推广，能够逐步建立一个规范的、独立于企业之外的社会保障体系。

五、继续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

积极的财政政策对于克服亚洲金融危机、促进经济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如果没有这个政策，我们今天就没有这个局面。这三年，累计发行了3600亿元国债。大体上，1000亿元的国债带动了4000亿元的贷款和其他来源的资金。3600亿元国债带动的项目总投资规模大概是2.4万亿元。累计到今年年底，已经开工项目可以完成1.5万亿元。这些工程，报告一个小账：加固大江大河大湖的堤防1.64 万公里，主要在长江；完成了75座重点大型病险水库的除险加固工程；投产的铁路新线3000公里，复线2560公里，电气化里程3000公里；新增公路通车里程17.4万公里，其中高速公路10230公里；新增城市日供水能力946.8万吨，日处理污水能力270万吨，日处理垃圾能力9929吨；新建和改造农村电网高、低压线路近170万公里；新建国家储备粮粮库的库容517亿斤。还用195亿元的国债作为技改贴息资金，来支持重点行业、重点企业的技术改造。经过中央政治局常委讨论，明年继续发行1500亿元的国债，其中1000亿元分两年把现有的工程搞完；500亿元主要是用于西部地区大开发的新项目，包括西电东送、西气东输、青藏铁路等等。

关于财政问题，无论如何要保证发工资，请各省区市的主要领导同志要亲自关注这件事情，因为我们接到的这方面人民来信实在是太多了，反映领不到工资。当然，在东部沿海地区好一点，但也不是没有，在每一个省都有一些相对贫困的地区，工资没有保证。今天上午江总书记讲了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由于县以下的财政收入有季节性，工资可能拖欠，但拖欠到年终总还能把工资发下去，这个情况就不算了。另一种是一年就发十个月甚至九个月工资，这种情况在每个省都有，这无论如何讲不过去的。公务员的工资都发不出去，那怎么能够保证机关的工作效率呢？那就没有人给你把关啊！很多钱都跑掉了，或者很多违法的活动没有人监管了。郑天翔①同志写了一封信给我，说河北省阜平县发不出工资。我们派人去调查了一下，果然是，工资一年差800万元，县财政就是入不敷出，不能保证工资的发放。像一些有特殊困难的县、粮食主产县，或是自然条件十分恶劣的县，必须由省级政府给予转移支付。我衷心地希望社会保障方面做到“两个确保”，对在职职工无论如何按时足额给他发工资，不要再拖欠了！不管你这个省多么穷，这个决心是必须下的，当然要结合精简机构、提高效率。

---

① 郑天翔，曾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

关于明年工资的政策。我们觉得首要的还是要确保工资的发放，在你没有确保发放工资之前，你就别加工资了。中央定了这样一个政策，明年增加工资的幅度稍微小一点，就是考虑到还有一部分人没有能够及时给他们发工资。明年加工资，内容包括三个方面：第一，就是基本工资加100元，差不多加了20%。第二，边远地区要实行艰苦地区津贴，过去有规定，但一直没有兑现。我们觉得在当前西部大开发的时候，实行这个政策，便于人才的交流。准备给600多个县补贴，这叫艰苦地区津贴。第三，国务院过去也作过决定，每年应该加发一个月的奖励工资，但是一直也没有兑现，明年准备兑现。至于增加工资的资金来源，我们还是按照去年那个办法，就是东部地区加工资，中央财政不补贴；中西部地区按照一定的比例由中央财政给予补贴，比

方说西藏，加的工资全部由中央拿钱；艰苦地区津贴全部由中央财政补贴。但是我们有个前提，你要确保现有工资的发放。

六、继续实行稳健的货币政策，切实加强金融机构监管

明年要继续实行稳健的货币政策。我们觉得现在的银根还是太松了，间接地鼓励了很多重复建设、没有效益的建设，所以银行无论如何在这方面要有风险意识，采取各种机制和措施来减少不良贷款。今年我们对各个银行进行了一次全面的稽查，发现所有银行的不良贷款比例都在上升。最近我们准备把稽查结果发给每一个商业银行。同时警告他们，已经有一年不良贷款的比例上升了，如果明年不良贷款的比例继续上升的话，那就要改组你的领导班子，撤换行长。我也呼吁在座的各个部门和地方的领导同志，请你们不要干预银行的业务，什么项目该贷还是不该贷，由银行自主决定，不要强迫他们贷款。强迫他们把钱贷给哪一个大户，最后这个钱都是收不回来的。

七、扎扎实实地推进西部大开发，促进地区协调发展

西部大开发一项很重要的政策，就是进行基础设施建设。中央决定，凡是在西部地区由国家决定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全部的资金由中央来筹措，不要地方配套。很多配套资金到事后证明地方是拿不出这个钱的，要么就加重农民的负担，要么最后还是欠了这个钱。第二项是生态环境的改善，就是退耕还林、还草工作要抓紧进行，政策要落实。关于西部大开发，人民群众有强烈的反映，就是要务实。现在各种名目的研讨会、洽谈会、招商会、这个节、那个节接连不断，花钱不少、效果不大，我们认为应该刹车。开发西部地区是要靠扎扎实实的工作，靠耍嘴皮子不行！

八、把对外开放提高到新的水平

加入世贸组织以后，对我们也是个严重的挑战，竞争会更加激烈，可能会有一批国有企业倒闭，要有足够的思想准备。所以，我们要有一批专业人才专门研究新形势下的法律、法规，对外法规要尽量完善，使我们立于不败之地。美国和欧盟对所谓的“倾销调查”、“配额”会

越来越收紧，不要光看加入世贸组织以后会扩大市场，也有限制市场的一面，所以，我们还要努力。

九、推进科技进步，加强人才培养

这里我只讲一个问题，就是农村教育收费确实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最近《焦点访谈》到湖北的赤壁市调查，农村的乱收费里面，教育的收费是重要的一项。本来义务教育是国家拿钱的，国家拿了很多钱，结果教师队伍倒是搞得很庞大，但里面没有几个合格的教师，还向农民乱收费。我希望在座的各位领导同志，在整顿乱收费过程中，特别要把教育的乱收费好好地整顿一下。你光是那么问一下是问不出来的，要仔细地去调查，切实解决这个问题。

十、切实加强管理，整顿和规范市场秩序

现在市场经济秩序是相当的混乱，假冒伪劣产品横行，特别是医药产品能害死人，不得了！最近我们打击骗取出口退税，在广东普宁发现一个检察院的干部，他开了几十家工厂，假造各种增值税发票，在全国16个省市都有分销点。这样搞下去，经济就根本没有秩序，太败坏国家的名誉了！最近国际上查假烟，企业界出口的假烟里面，中国上升到第一位了，第二位是希腊。中国造的假烟出口量占全世界假烟的15%，这都“遗臭国际”了。前天晚上看《焦点访谈》，河南省一个供销社的棉花加工厂，打包车间里面专门有一个弄虚作假的车间，把那些废棉花、棉子、乱七八糟的纤维，甚至滑石粉、鸡毛等什么东西都塞到棉花包里，大概体积占整包棉花的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你要检验的话，在它表面上抓一两把出来都是合格的，但中间全是假的。当时，我就给李克强①同志打电话，我说你赶快派人把他们先抓起来，这不抓起来还得了吗？！他们连夜行动，马上开会，马上派人，马上进行处理。昨天我要求盛华仁②同志牵头，召集有关部门研究，下发一个紧急通知，整顿棉花收购秩序，对供销社的加工厂要严格整顿，狠把质量关，宁可十天半个月不收购，也要先整顿好市场秩序。我们过去搞计划经济，特别重视加强计划管理的经济部门，现在恐怕要加强一下市场管理的部门，要利用法制来整顿市场秩序。工商行政

管理、质量技术监督、海关、建设部门、物价部门应该切实地负起这个责任，财政、金融、税务、统计这些部门也应该健全对各个环节的监控，强化管理和监督，来堵塞这个漏洞。我希望各地负责同志，大家都来支持这个工作，共同努力，使市场经济秩序在明年有一个大的转变。

---

① 李克强，当时任河南省省长。

② 盛华仁，当时任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主任。

在二〇〇〇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的总结讲话

(2000年11月30日)

根据会议讨论的情况，我再强调几点。

一、关于加强农业、增加农民收入问题

大家一致同意把这项工作放在明年整个经济工作的首位，赞成中央提出的有关政策措施。当前，农民收入增长缓慢，粮食主产区农民甚至减收，对国民经济发展的制约越来越突出。如不采取进一步的措施，这将会成为一个严重问题，务必引起我们高度重视。

第一，调整农业结构，要尊重农民意愿，不搞强迫命令。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一些地方的教训证明，背离这个原则，只会事与愿违、劳民伤财。不少地方在引导农民调整结构方面，有很多成功经验。海南省搞“绿色通道”很有成效，大量种植适销蔬菜、水果，改善了种植结构。政府的工作，就是要为农民调整结构创造条件，包括加强农业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和加强农村金融服务，以及向农民提供市场信息和技术咨询等方面的服务，让农民自己来考虑如何调整种植、养殖结构。这样，才能适应市场需要，提高产出效益。

第二，坚持按保护价敞开收购农民余粮。这是当前情况下增加农民收入最直接、最现实的办法。从1997年以来，我们年年都强调三条政策：第一条，用保护价敞开收购农民余粮，这是最重要的；第二条，国有粮食企业顺价销售；第三条，粮食收购资金封闭运行。特别是第一条，我们反复强调要落实，但始终没有贯彻好。根据典型调查，大体情况是，农民的余粮用保护价收购了60%左右，基本上保护了农民的利益，使农民没有吃很大的亏。但是，还有三分之一的余粮没有收起来，农民增产还是不增收，甚至减收。我们既然已经收了农民余粮的三分之二，再努一把力，把其余的三分之一收进来不就行了吗？只要思想认识统一，就一定能够克服执行中的各种困难。中央和地方财政拿钱建立了粮食风险基金，农业发展银行的粮食贷款由中央财政补贴利息，这几年国家又建成了500多亿斤仓容的粮库，其他必要条件都

是具备的。只要把农民的余粮基本收购到国家手中，使粮价稳定在合理水平上，就可以增加农民收入，可以实现顺价销售，粮食企业也应该不会亏损。中央已经决定，今年收购的粮食比去年多的那一部分，保管费和占用流动资金的利息补贴，全部由中央财政承担。希望各地真正按保护价敞开收购农民余粮，粮食企业做到一年365天收购粮食，这样就能保护好农民的利益。

第三，积极稳妥地推进农村税费改革。这是明年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是造福于民的重大举措。中央财政准备在明年拿出200亿元，支持这项改革。中央对这项工作是非常慎重的，不搞强迫命令，也不搞什么达标，不要求大家在明年都进行农村“费改税”。各地什么时候搞，由各地根据自己的条件决定。你什么时候开始这项改革，中央财政就什么时候给你补贴，而且作为基数年年补。

进行农村税费改革，必须精简机构、精减人员，不然光补贴也补不起。明年要同时推进市、县、乡镇的政府机构改革，精减人员。中央编委初步确定的目标，编制要减20％。这个比例不算小。现在市、县、乡镇的机关在职干部为467.7万人，其中超编的就有43.4万人。清退超编人员再加上减少编制20％，就要精减120多万人，还有编制之外的临时聘用人员也需要清退，这是一个很重的任务。根据试点经验，我们定了两条政策：一是精减下来的干部，在没有找到新的工作之前，三年以内工资照发。这个代价是要付的，不然不利于稳定，人员也精减不了。即使这样，财政负担也可以减轻，至少可以节省办公费和差旅费。二是这些人员不管分流到哪里去，在机关的这一段工龄还是承认的，在他们退休的时候将给予相应的养老补贴。这样，可以减少精减工作的阻力。

撤并乡镇也是一项很重要的工作，可以大大减少机构和人员，减轻农民负担，提高工作效率。当然，这项工作很复杂，全国各地的情况差别很大，要坚持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有领导、有步骤地进行。在实施中要注意工作方法，做细致的思想工作。



2000年11月15日，朱镕基在山东省济宁市粮管所考察。左一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山东省委书记吴官正。

二、关于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问题

在会议讨论中，有的同志对我强调反对重复建设表示疑虑，他们说如果不搞工业建设的话，经济怎么发展呢？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第一，我们并不是反对加工工业建设，而是反对低水平加工工业的重复建设，在当前一般工业品普遍供过于求、银根比较松的情况下，搞低水平的加工工业重复建设，实在是危险。这方面的历史教训太深刻了。要清醒地看到，虽然目前形势好一点，但经济运行中潜伏的隐患不小，银行还有巨额不良贷款，国有企业脱困的基础还不牢固，绝不能再用银行贷款去搞无效的重复建设。第二，虽然我们反复强调，但实际上重复建设还在搞。不少地方搞的几亿元的项目，都没有按规定上报。有的银行仍然不坚持商业信贷原则，当地领导叫它们贷款它们就贷，这是绝对不能允许的。同时，各级政府领导也不要去干预银行的正常经营活动，否则，后果是严重的。第三，搞工业项目，一定要全面考虑市场需求、规模效益、技术水平和环境保护等各个方面，要科学论证，慎重决策。最近三年，国家确实较少安排加工工业项目，但也不是绝对没有。凡是有利于产业结构调整、提高经济效益的项目，都得到国家的支持。比如说，我们批准建设电站，优先考虑建设水电站，这有利于调整能源结构、改善环境质量。对于火电站建设，前提是，上一个100万千瓦的火电站，就得相应关掉100万千瓦容量的小电站。现在小火电站太多，不但能耗高，而且严重污染环境。我们同意在有的地方建大水泥厂，但同时要求相应关掉一批小水泥厂。前不久，我到韩国去访问，一个非常深刻的印象是，他们搞一样东西像一样东西，浦项钢铁厂年产钢达2700万吨。我国虽然年产钢1.3亿吨，但最大的钢铁厂年产钢也才1500万吨。韩国现代集团的汽车厂年产汽车200多万辆，我们哪个汽车厂能达到这个规模？韩国花10亿美元建成一个0.18微米的芯片工厂，我们还达不到这个水平。在世界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经济竞争日趋激烈的形势下，如果我们还热衷于搞低水平的重复建设，那还有什么前途？！

总之，再不要搞低水平的加工工业重复建设了。当然，高新技术产业也不是所有地方都能搞的，也要防止形成新的结构趋同化。发展新兴产业的路子还是很宽广的，比方说，旅游业就很有前景，交通运输业、绿色食品业、服务业等很多产业，也都需要大力发展。

三、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问题

大家一致认为，国有企业改革和脱困三年目标的基本实现，是一个很大的成绩。但也要看到，一些脱困企业的基础仍不稳固，有些三年以前不亏损的企业现在又亏损了。还应该看到，目前企业利润增加那么多，其中含有银行连续降低贷款利率和债转股等因素，也就是说，企业利润增加的一部分来源于银行利息的减少。所以，我们一定要从两方面来看待这个问题。国有企业改革与脱困的任务还是很重的，特别是建立与完善现代企业制度的任务相当艰巨，需要继续努力。

这里，要特别强调对国有企业加强监管的问题。现在对很多国有企业缺乏必要的监管，厂长(经理)一个人说了算，没有人监督他。为了加强对国有企业的监管，在试行稽察特派员制度的基础上，按照中央的决定，由国务院向一些大型重点国有企业派出监事会。事实证明，如果企业监事会不是从外部派驻而是由内部产生的话，那是什么也监督不了的。现在对建立企业领导者的激励机制讲得多，例如要实行期权制、年薪制等，这些都是对的，但如果没有健全的监督机制，这些措施恐怕也难以奏效。

最近，有些省在对国有企业进行股份制改革时，把股票分给个人，其中大部分分给了企业的领导成员。这种做法很有问题。不要把企业激励制度与职工参股混同。简单地把国有资产量化到个人，不是一种好办法。这在俄罗斯已经被证明是失败了的，即使是在西方发达国家，也不推广这种办法。我们还是要按照党的十五大和十五届四中全会的精神，搞好规范化的企业股份制改革。企业改组上市也是检验企业经营好坏的一个好办法。企业要上市，首先必须进行改组，要有三年盈利纪录；其次，必须实行严格的信息披露制度，向社会如实公布企业经营状况，接受公众监督。所以，企业改制上市不仅是筹集资

金，更重要的是可以让股民来监督企业，推动企业加快转换经营机制。近两年，我国一些大公司在境外上市很成功。现在重要的是，要切实转变思想观念，熟悉和运用市场经济规律和现代管理方法来管理上市企业。如果再用计划经济体制下的那套办法来管理上市企业，行政命令、朝令夕改、随意换人、平调资产，那是绝对不括的，就要受到市场经济规律的惩罚。我们所有的同志特别是各地方、各部门的负责同志，一定要努力学习市场经济知识，提高经济管理水平。

四、关于社会保障体系建设问题

首先要明确，明年的社会保障制度改革试点，只在辽宁全省和其他各省区市的部分城市进行。其他非试点地区，仍然实行现行的社会保障制度和政策。

有些同志反映，对试点方案与现行做法的区别还不是很清楚。这里，我简要概括一下，试点方案的要点是：第一，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中，个人账户和统筹账户的构成有所变化。原来是按职工工资额计算，职工自己出5%，企业出6%，共11%计入个人账户。试点后，企业交给个人账户的6%转入统筹账户，统筹账户中增加这一块后，就可以基本实现当年基本养老金收支平衡。至于个人账户，在原来个人出5%的基础上，个人再多交3个百分点，合起来是8%，计入个人账户，不再用做支付当期支出。这样，个人账户就逐步会有实际积累，变“空转”为“实转”，不再出现新的欠账。第二，逐步推进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与失业保险并轨。试点单位明年下岗的职工，不再进入再就业服务中心领取基本生活费，而直接进入失业保险；原来已在再就业服务中心的，也要逐步转入失业保险。并轨也有个过程，要用三年左右的时间，不是马上统统并轨。这项改革有一定的难度。要下岗职工出再就业服务中心，过去企业拖欠他的工资、医疗费、集资款等要还给他，还得发一笔解除劳动关系的补偿费。有些企业已经破产了，或者很困难，根本拿不出这些钱；要国家偿付，财政也难以承受。究竟怎么处理比较稳妥？要在试点中进行探索。下岗职工进入失业保险后，可享受两年的失业保险；两年后还没有就业的，进入最低生活保障。总之，通过试点，积累经验，完善方案，逐步推广，向新的社会保障

体制平稳过渡。机关公务员(含全额拨款的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的养老保险办法改不改？为了稳定公务员队伍，国务院决定暂时不改。正在进行改革试点的一些地方，允许继续试点。为了有利于政府机构改革和人员向企业流动，要实行一个政策，就是机关公务员调到企业工作后，即按照企业的养老保险办法执行；退休以后，在享受企业社保待遇的同时，还要按他原来在机关工作的那一段工龄，增发一部分养老金作为补偿。具体办法还在制订，也要先在试点地区实行。

关于明年社会保障方面的工作，需要强调：一是明年辽宁全省及其他各省份确定的试点地区，要按照中央的精神，抓紧制订操作方案，抓好试点工作。不进行试点的地区仍然要按照现行办法，继续搞好各项社会保障工作，尤其要做到“两个确保”①。对实现明年“两个确保”所缺资金数额，经过详细核实后上报。只要地方政府真正如实报数，中央政府就如数给钱。这些钱主要来自于最近建立的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的资金来源主要是中央财政拨付、国有资产变现收入和彩票发行等渠道；主要用于补助地方社会保障资金不足的缺口。二是建立健全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把符合条件的城市贫困人口全部纳入最低生活保障的范围。现在最低生活保障的范围还不是那么广，今后有些下岗的职工最后还要进入最低生活保障。这项工作要继续加强。有些地方这方面的工作做得相当好，有比较成熟的经验，要进一步总结和推广。三是完善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积极推进医疗机构和药品流通体制改革。建立社会医疗救助制度。妥善解决特大病的医疗保险费用。这些方面的改革措施，目前大部分省区市已经出台；希望尚未出台的地区，要按照规定的时间抓紧出台，认真抓好这项工作。四是加快推动社会保障管理和服务的社会化。不少地区这方面的工作有了很大进展，并已基本上实现了养老金的社会化发放。希望各地进一步做好这方面的工作。关于社会保险费的征收，有的同志主张由现在的社会保障机构来收；有的同志则主张把它改成社会保障税，或者不改税而由税务局来征收。这两种方式在全国都有，我们认为不要强求一律，两种方式都可以，由各省区市根据自己的情况选择确定。

① 参见《在二〇〇〇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本卷)。

五、关于财政收支问题

去年和今年财政大幅增收，有一些特殊因素，不能期望明年财政收入还有这么高的增长。1999年，财政增收1560亿元，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打击走私取得成效，使海关税收增加了700多亿元。今年1到10月，财政增收主要来自企业的增值税和所得税。由于企业经营状况好转了，效益提高了，这里也包括国家采取降息、债转股等政策因素的支持，所以，增值税比去年同期增加652亿元，所得税增加365亿元，这两项就增加1000多亿元。还要看到，今年增值税和所得税的增加与石油涨价有很大关系，其中很大一部分税收来源于石油、石化工业。由于我们进一步实行出口退税的政策，增加了出口，同时也促进了进口，使进口税收增加512亿元。今年股票市场比较活跃，这与我们采取各种措施引导资金分流有关，使证券交易印花税增加了181亿元。所有这些，构成了增收2000亿元的主要来源。明年很难再有这些超常增收的因素。

那么，今年增加的财政收入是怎么花掉的呢？首先是增加工资的支出。去年增加城镇中低收人人员工资，中央财政补助地方半年支出340亿元；今年要补助全年工资，比去年又增支340亿元。今年落实“两个确保”需要支出近400亿元。去年出口退税退了600多亿元，今年已退税800多亿元。此外，教育等项的法定增支要求、国债付息增加支出、对地方增加转移支付支出等等，增加了好几百亿元的支出。况且，在增收的2000亿元里，中央财政只有1000多亿元，刚才报的账已超出了1000亿元。



2000年11月13日，朱镕基在山东省临沂市沂水县看望农户。

明年全国财政收入估计能增收1400多亿元，就算不错了，而财政支出的刚性却很强。因此，明年中央财政收支矛盾是很大的，地方财政收支平衡也会是相当紧的。在这种情况下，要特别注意以下几点：第一，努力节省开支。坚决反对铺张浪费，大力提倡艰苦奋斗。现在，大吃大喝、大手大脚花钱的现象十分普遍，此风不刹，不仅财力不济，而且败坏党风、政风。第二，积极调整财政支出结构。要区别轻重缓急，该保的一定要保，如按保护价敞开收购农民余粮、实行农村税费改革、落实“两个确保”、增加机关和事业单位人员工资等，财政必

须安排好相应的资金；该压缩的开支一定要压缩，要把调整支出结构与转变政府职能、精简机构和改进工作作风结合起来。第三，在增收方面狠下工夫。加强税收征管，进一步完善税制，推进税收征管改革。明年要完成“金税工程”建设，建立一个交叉稽核的电子网络体系，依法狠狠打击各种偷税、逃税、骗税等犯罪活动，做到依法治税、应收尽收。第四，地方财政要立足于增收节支，自求平衡。不要眼睛向上，依赖中央财政，把财政开支的硬缺口留给中央财政，形成“倒逼机制”。

六、关于维护社会稳定问题

明年改革和发展的任务十分繁重，做好社会稳定工作极为重要。一定要注意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

各项改革措施要充分考虑群众的承受能力，原则上不能损害大多数群众的既得利益。要正确处理新时期的人民内部矛盾。干部要深入群众，深入基层，体恤群众疾苦，做好群众的思想工作，防止矛盾激化。

搞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依法严厉打击危害人民群众人身和财产安全的各种刑事犯罪，使城乡人民群众真正有安全感。各级财政要保证政法部门必要的经费。

对审计特派员办事处执法犯法问题要严肃查处

(2000年12月3日)

2000年11月17日，财政部向国务院报送的《关于对部分审计特派员办事处检查情况的报告》反映，2000年7、8月份，财政部组织部分财政监察专员办事处力量，对审计署七个特派员办事处1998年以来的财务收支和审计“过渡户”情况进行检查，查出七个特派员办事处不同程度存在将收缴的中央预算资金缴入地方金库、向企业高息借出资金、收取地方财政补助、与地方财政结成密切利益关系等问题。这是朱镕基同志在该报告上的批语。

请岚清①、忠禹①同志批转李金华①同志阅处。审计特派员办事处执法犯法，问题不可小视。堤坝穿洞，势将决口。请审计署高度重视，严肃查处，对有关责任人分别情节予以处分。有的要调换地方，以杜绝与地方财政的经济利益关系。

朱镕基

12.3

---

① 岚清，即李岚清。忠禹，即王忠禹。李金华，当时任审计署审计长。

农村信用社改革要因地制宜

(2000年12月8日)

2000年12月7日至9日，朱镕基同志在江苏省考察工作，先后考察了苏州、南京等地；12月8日，在南京市主持召开农村信用社改革座谈会。这是朱镕基同志在座谈会上讲话的主要部分。这篇讲话共分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座谈会开始时的讲话。之后，中国农业银行行长尚福林汇报了农村信用社改革试点方案。江苏省政府及有关农村信用社等金融机构负责同志也发了言，对试点方案提出了不同意见。朱镕基同志宣布休会，并随即与随行的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进行了协商。第二部分是协商之后的讲话。

第一部分

我今年两次到江苏省来，就是为了农村信用社改革，这个事情很大。我们在上半年来的时候，对这个问题商定了一些基本的原则，然后决定在江苏省试点。我们回去商量这个问题时，又考虑到我们已经商定的江苏省试点办法里还缺了一条，就是农村信用社的归属问题，即这个业主是谁、由谁来经营、是什么性质，办法里对此没有讲得很清楚。当时讲的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全国2000多家农村信用社究竟由谁来管？总要有一个经管单位。我们担心将来一旦农村信用社失控了，不知道找谁，全国2000多家，怎么弄？对这个问题我们商量了很久，感到农村信用社的发展有一个过程，一开始是农业银行直接管，后来搞了一大笔烂账，于是跟农业银行脱钩；脱钩以后由人民银行来直接监管，由人民银行来挂钩。再后来又发现找人民银行监管也不得了，直接监管等于找了个“后台老板”，可以获得再贷款，这也是一个“无底洞”。农村信用社与人民银行挂钩，问题更多。但是，总得要找一个监管单位。经过反复商量，大家认为这件事还是离不开农业银行，提出把农村信用社索性改个名字，叫中国农业信贷银行，按股份制银行来办，由中国农业银行来控股，农业银行收缩县以下业务，把这些业务都交给农业信贷银行。我们觉得，这无论从宏观上，还是从

经营管理方面都是比较好的。我们回去后，各个部门经过商量搞出了一个方案。但对这件事，我非常不放心，不知道这个东西行不行，于是又赶快亲自到江苏来跟同志们商量。这倒不是朝令夕改，因为目前还是试点，还没有开始，好多问题没有考虑得那么周到。我建议，现在由中国农业银行行长尚福林同志先把这个方案跟你们讲一讲，然后请基层的同志提提意见。你们可以说三道四，可以挑毛病，可以讲不同的意见。我们根据大家的意见再做修改。



2000年12月8日，朱镕基在江苏省南京市主持召开农村信用社改革座谈会。图为休会时与随行的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同志交谈。左一为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戴相龙，左二为中国农业银行行长尚福林，右一为国务院研究室副主任魏礼群，右二为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理事长刘仲藜，右三为中财办副主任李克穆，右四为国务院副秘书长马凯，右五为国家计委主任曾培炎。

现在讲的中国农业信贷银行，都是以县为单位，不成立江苏省中国农业信贷银行，在北京也没有中国农业信贷银行总行。法人就是江苏省某某县农业信贷银行。这个农业信贷银行，是由上面的中国农业银行集团公司直接控股的，县级银行本身有董事会，有监事会，同时由董事会任命行长。这一点非常重要。绝不是又搞一套中国农业信贷银行的体系。

第二部分

刚才，尚福林同志介绍农村信用社改革方案，与会的农村信用社负责同志提出了一些不同意见。会议休会时，我与同来的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商量了一下，这次到江苏省来讨论这个方案，跟上次的方案没有很大不同，就是加了一个法人管理系统的内容。听了两个基层农村信用社同志的意见后，我感到这个方案不适用于江苏省现在的情况，这一点考虑不周，完全是我的责任。我们考虑的对象是中西部地区比较多，那里的农村信用社负债累累，资不抵债，没有面向农村，大量的贷款都贷给一些乡镇企业，资产质量很差。如何端正它们的经营方向，让它们为农村服务，中央要给予支持。上一次我们在苏北地区考察，苏北地区多少带有一点你们江苏的“中西部”的性质，因此，出台的政策也很受苏北同志的欢迎。但现在看来，那一套办法并不完全适用于比较富裕的地方。从整个江苏省来讲，农民总体来说都比较富裕。所以，这个试点的办法，特别是今天所做的补充，并不一定适合江苏省的大部分情况，这完全由我来负责。农业银行和农村信用社之间的恩恩怨怨几十年了，谁都怕被对方吃掉，谁又都想吃掉对方。现在要让农业银行和农村信用社发生关系，很容易引起反感，起码刚才两个基层来的农村信用社主任就很反感，我可以体会到他们的心情。对这一点我估计得不够。刚才，俞兴德①同志汇报讲，张家港农业银行和农村信用社都强，在两家还要一争高低之时，我们让农业银行去控农

村信用社的股，是冒天下之大不韪；赣榆县是农业银行很弱、农村信用社很强的地方，用弱的去吃掉强的，农村信用社当然很反感，所以它反过来提出要控股农业银行，讲得也很有道理。

① 俞兴德，当时任江苏省副省长。

中国各地的情况千差万别，尽管我们搞了几十年经济工作，但往往对中国情况的千差万别考虑得不够，总想搞一个模式，一个模式“安天下”看来不行！因此，恐怕应该这样来考虑，就是从江苏省来看，苏北地区和苏南地区情况不一样，我们的方案是按照苏北地区情况考虑的，跟苏南地区的情况不太符合。我的意见，江苏省还是要试点，是另一种类型的试点，你是作为富裕地区的试点，贫困地区的试点还要另找对象。富裕地区的试点，我看是把农村的信用社变成县的地方金融机构，也不一定再搞省联社、市联社，它就是一个地方的金融机构。但是也要进行研究探索，现在问题还是有的，就是它的法人地位并不明确。根据刚才乔宗君①同志讲的80%的农村信用社都是农民做股东，但是究竟谁是老板搞不清楚啊！增值的部分利润变成股本，股本是谁的也不明确，法人治理结构不明确，钱究竟是农民的还是国家的，都搞不清楚。这还是要明确，否则到最后要出问题的。法人地位不明确，风险也不明确，由谁来承担这个风险啊？所以，你们在这方面还是要进一步明确法人治理结构，将来可以逐步地走向股份制的农业合作银行，要朝这个方面去试点、去发展。因此，我现在非常明确，以后你们这些农村信用社就是地方的金融机构，一切风险由法人自己来承担，中央不承担责任。今后试点的方向，要明确法人治理结构，明确股份制，明确风险承担的责任。当然，既然叫农村信用社，还是应该为农民服务、为农村服务、为农业服务。我们在今年上半年定的那些思路还是正确的，还是要朝这个方向努力，因为在城市里服务的金融机构多得很呢！至于苏南地区的情况有所不同，但也不可以一概而论，也有一些比较困难的县，我们在今年上半年提到的一些政策还是适用的，可以继续给予支持。至于将来在一些中西部贫困地区，那里的农村信用社的法人治理结构恐怕跟江苏省的还不一样，因

为它们的乡镇企业不发达，地方政府没钱，农民也很穷，究竟那里的农村信用社向何处去、如何支持“三农”，恐怕要继续深入地调查研究。今天我们提出的方案不适合江苏省的情况，这个方案到此为止。另外，希望同志们不要以讹传讹，不要说中央出了一个方案，把农业银行和农村信用社合并了，不要去散布这个东西，搞得人心惶 惶，那很不好！我为什么这么急地赶到江苏省来，也是怕造成误会。因为在互联网上有人攻击我，主要说我三点：第一点，要把农村信用社变成农村金融的主力军，认为我这是空想。说信用社已经是不可救药了，我找错了对象，找了个坏账那么多的机构。这当然不对了，你们这里农村信用社都办得很好，怎么是不可救药了呢？第二点，也有人担心，一听说农业银行控股、农村信用社升格为农业信贷银行后，到处去加人，许多人想乘此机会进去吃“大锅饭”了。第三点，有些地方一提要支持“三农”，就是要财政补贴，就放松了农村信贷，我们在山东省确实也发现存在这种情况。

---

① 乔宗君，当时任江苏省连云港市赣榆县农村信用联社主任。



2000年12月8日，朱镕基在江苏省南京市主持召开农村信用社改革座谈会并讲话。右一为国家计委主任曾培炎，右三为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戴相龙，右四为财政部副部长高强。

我看，可以明确这样三点：第一，在江苏省进行农村信用社改革的试点没有变，试点的方向还是要为“三农”服务；第二，今年我们在苏北地区商定的江苏省农村信用社改革试点方案也没有取消，但是要区别苏南、苏中、苏北地区的不同情况，不是所有的政策都适用于这三种不同类型，要根据实际情况来定；第三，今天提出的农村信用社法人治理结构的建议方案不适用，不传达，到此为止。至于你们农村信用社将来的发展方向，就是我刚才提的一点意见，实际上这个东西在1996年的文件上也有，就是逐步明确为股份制农业合作银行，有条件

的农村信用社可以向这个方向转化，致力于明确法人治理结构、明确金融风险的承担责任。



2000年12月12日，朱镕基在浙江省萧山市宁围镇中心信用社考察。

最后，我再强调一点。在今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我两次讲话。特别是后来的总结讲话，我讲农业的篇幅是占得最多的；而且我提出来，明年的首要任务，放在突出位置的是农业。即使在江苏省，也不要轻视农业的问题，它照样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千万别轻视。我在上海市工作时就非常重视农业，那里的农业比重比你们的还小。这一点是要明确的，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是农民问题，国民经济的基础

是农业，我们从来没有改变这个命题。无论经济怎么发展，农村盖了多少房子，外向型经济搞了多少，都没有改变这个现实。我还讲过保持社会稳定，关键是保持农村稳定。所以，无论如何要把农业、农村工作放在首位，刚才几位同志也特别强调了这一点。我担心的就是农民没有人管。要求农民调整种植结构，就要增加他们的收入，但是不给予金融支持，他们富不起来。从全国情况看，不管是农业银行也好，还是农村信用社也好，都是把信贷重点放在乡镇企业上，放在工业上，没有把农民的疾苦、农业种植结构调整放在突出位置。对怎么让农民富起来，这方面的支持事实上是很弱的。当然，也许江苏省的农村信用社做得比较好。实际上，搞一些乡镇企业，搞一些“门面项目”，不见得信贷质量就好，同样造成了很多的不良贷款，特别是重复建设。而给农民直接贷款，也许信贷质量并不是很坏，可以贷款帮他们搞个大棚，帮他们调整种植结构。我们在常熟看棉花加工厂，当地农民很有头脑，账算得很清楚，三亩地里，一亩八分种棉花，还有多少地种菜、种粮，他们心中很有数。农村信用社要是给他们金融支持，他们就能够富起来。为什么我非常重视乔宗君同志的经验呢？如果你们县80%的农村信用社都支援农民的话，你就应该升官，你应该可以当个县委书记或当个县长。但是，我要叫人调查一下，你是不是真正做到了这一点。赣榆县属于苏北地区，如果你能做到这一点，你就是一个典范，我们要推广你的经验。我们要求的就是这一点。农村信用社无论如何要贴近农民，为农民服务。我想从这一点来讲，江苏省农村信用社改革试点没有变。要端正服务的态度，明确服务的对象，改变信贷的结构，向农民倾斜，不是去装门面，不是为“县太爷”服务。优惠政策要区别不同情况，像张家港、赣榆的农村信用社，如果还把优惠政策给他们，就太不公平了，对苏北地区的人太不公平了。政策本身就是区别不同的对象。我这次带来的方案就是对江苏省的实际还是认识不够，对具体情况了解不够。农村信用社的改革还是要多到中西部地区加强调查研究，当然江苏省也有“中西部”，但毕竟不一样，基本上是东部地区嘛！希望你们农村信用社的改革继续进行试点，取得成功，为全国树立榜样。

制定更加具体的粮食购销政策

(2000年12月12日)

这是朱镕基同志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段应碧写的《浙江种粮大户情况调查》一文上的批语。该调查报告反映，近年来种粮大户为了提高经济效益，多次进行了结构调整，拿出一部分土地发展经济作物和养殖业。个别种粮大户全部搞了水产养殖，买粮交定购。从调查情况看，全部种粮食的，收益不高，全靠政府补贴；调整种植结构多的，赚钱就多。

岚清①、家宝①同志：

从浙江省的粮食供求关系来看，可以更快地调整农业经济结构，较快实现粮食购销的市场化。浙江省一年需要粮食320亿斤，其中饲料粮100亿斤全部由省外供应，口粮(包括种子粮)220亿斤全部由省内供应。在220亿斤口粮中，商品粮只有22亿斤(其余近200亿斤均为农民自种自用)，其中用保护价收购农民余粮7亿斤，用保护价加价外补贴(每斤1毛)收购大户承包商品粮15亿斤。这点商品粮完全可以由省外供应，这既可以有利于粮食主产区销售余粮并实现顺价销售，也有利于浙江省更快调整农业结构，改种比较效益更高的经济作物和发展养殖业。这样浙江省就可以逐步实现粮食生产、收购、销售的完全放开，实行市场调节。当然，政府必须保留一条重要的政策措施，即保护基本农田，不许随便将耕地改为非农业用地。建议再对类似地区作些调查，分别不同情况制订更加具体的粮食购销政策。请酌。

朱镕基

12.12

---

① 岚清，即李岚清。家宝，即温家宝。

省情、家宝同志：从浙江省的粮食供求关系来看，可以更快地调整农业经济结构，较快实现粮食购销的市场化。浙江省一年需要粮食320亿斤，其中饲料粮100亿斤全由省外供应，口粮（包括种子粮）220亿斤由省内供应。在220亿斤口粮中，商品粮只有22亿斤，其中用保护价收购（余粮）农民余粮7亿斤，用保护价加价外补贴（每斤1毛）收购大户承包商品粮15亿斤。这些商品粮完全可以由省外供应，这既可以有利于粮食主产区实现顺价销售余粮，也有利于浙江省更快调整农业结构，改种比较效益更高的经济作物和发展养殖业。这样，浙江省就可以进一步实现粮食生产、收购、销售的完全放开，实行市场调节。当然，政府必须保留一定的政策措施，即保护基本农田，不许随便将耕地改为非农业用地。这个意见可对其他地区作些调查，分别不同情况制订更加具体的粮食购销政策。请酌。

（其余均为农民自种自用）（约200亿斤）

浙江种粮大户情况调查

12 月 10~12 日，我和省农办主任王良仟同志分别到萧山市、绍兴县、诸暨市召开了三个座谈会，先后与 19 个种粮大户进行了座谈。简报如下：

一、基本情况

这 3 个县(市)经济发达，农村劳动力大量转移到二三产业，务农的劳动力不到 30%，青壮年劳动力更少。农民收入都在 5000 元以上。各村按照中央土地政策，进行二轮承包，给每户发放了承包权证。但多数农户只愿耕种少数土地作口粮，不愿多种，也无精力多种。在这种情况下，各村与农户协商，自愿转包给少数农户经营，从而形成了一些种粮大户。截止目前，萧山市共有 10 亩以上的种粮大户 4781 户，承包面积 30 万亩，承包面积占总耕地面积的 40%，其中 50 亩以上的 1085 户，承包面积 18 万亩。绍兴县共有 10 亩以上的种粮大户 2644 户，承包面积 12 万亩，占 30%。

司法公正，国脉所系

(2000年12月29日)

2001年1月2日，最高人民法院召开全国高级人民法院院长会议，并对全国100名“人民满意的好法官”、100个“人民满意的好法院”进行表彰。会前，最高人民法院向朱镕基同志报送《关于最高人民法院工作的情况报告》。这是朱镕基同 志在该报告上的批语。

请罗干同志核转肖扬同志：在全国高级人民法院院长会议召开之际，谨对各级人民法院在依法审判工作中取得的成绩表示充分肯定，对膺选“人民满意的好法官”称号的同志们表示热烈祝贺。建设法治国家，任重而道远。司法公正，国脉所系。罚不在重，而在于公，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执法如山，万民称快。判决必须执行，判决而不执行，法律尊严何在？！姑息养奸，国无宁日。关键在全面加强法官队伍的建设，提高法官的素质。培养一支学法有成、执法如山、清廉如水的法官队伍，是中国法制建设的标志。国务院将竭尽全力保证政法队伍教育培训经费的需要。各级政府财政必须保证办案经费，诉讼费要依法收取，不能过高，让广大人民群众打得起官司。

朱镕基

12.29

关于旅游业发展的几点意见

(2001年1月9日)

2001年1月8日至9日，国务院在北京召开全国旅游发展工作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部分副省级省会城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有关负责同志，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有关部门的负责同志。这是朱镕基同志在会上讲话的主要部分。

一、要重视保护旅游资源，因地制宜发展旅游业。

我国地域辽阔，自然、人文景观极其丰富，旅游资源也千差万别，一定要因地制宜，充分发挥自己的优势。一些旅游资源特别丰富的地方，要把旅游业作为支柱产业加快发展。但发展旅游业，一定要从市场的客观需求出发。一些不具备旅游资源优势的地区，就不要盲目发展。要根据因地制宜、实事求是的原则，注意研究国外和国内的经验，做好旅游发展规划，加强重点旅游景区的建设。要建设国家级的旅游区，就要达到国家级标准；要建立世界级的旅游区，就要达到世界级标准。大力开发丰富多彩的旅游产品，为满足不同游客需求提供多种多样的旅游项目。设计好合理的旅游线路，让游客慕名而来，尽兴而归。各省区市特别是邻近省区市要互相协调，衔接配合，充分利用好旅游资源。



2001年1月9日，朱镕基在全国旅游发展工作会议上讲话。右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钱其琛，左为国家计委主任曾培炎。

要深入挖掘旅游景观的人文价值。自然景观、人文景观包括大量文物古迹，都蕴涵着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历史。发展旅游业要与弘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加强爱国主义教育、促进国际文化交流结合起来。我到过四川的三星堆，那里的文化景观真令人惊喜、令人赞叹，我认为可以与玛雅文化相媲美。外国人也对三星堆的文化景观赞叹不已。像这样的景点怎么把它建设好，是个很大的问题，要很好地研究。如果某个景点的文化内涵很丰富，但不把它挖掘出来、整理出来、介绍出来，就会失去它本来的魅力。不能一提开发就是指对自然资源的开发，从某种意义上说，对人文资源的开发更重要。

要特别注意保护旅游资源，合理开发，永续利用。我们一定要吸取各国和我们自己以往的经验教训，决不能做“吃祖宗饭，断子孙路”的事情，要把青山、绿水、蓝天留给子孙后代，把凝结在旅游资源中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给子孙后代。在大力发展旅游业的时候，各地区的决策者一定要慎重，多听听各方面专家的意见，要高度重视对旅游资源的保护。旅游项目建设要很好地论证，不要匆忙上马，如果破坏了再去修复，将会后悔莫及。

二、要加强旅游基础设施建设。

旅游基础设施薄弱，仍然是我国旅游业发展的制约因素。这几年，国家利用国债资金搞基础设施建设，使民航、铁路、高速公路、水利建设都有了很快的发展，电力供求矛盾大大缓和，促进了西部地区、贫困地区的经济发展，社会效益很好，将来也会产生现实的经济效益，对加快旅游业发展也是很大的促进，但目前旅游基础设施建设还有很大差距。主要表现：一是干线公路与旅游区之间连接不畅，使一些有可能形成热点的旅游区无法产生应有的效益；二是旅游区内交通设施薄弱，造成游客观光不便；三是旅游区的环保、卫生、电力等设施不够完善。各地要针对这些问题，切实采取措施加以解决。

加强旅游基础设施和配套设施建设，要从“行、游、住、食、购、娱”这些主要消费环节着手，从游客的需要出发，创造方便舒适、安全卫生的环境，吸引更多客人。要搞好旅游区所在的城市建设 和区内外生态环境建设。与旅游业密切相关的部门和行业，要加快改革步伐，建立适应旅游业发展和国际竞争的市场化运作机制。有关主管部门在简化旅游者出入境手续、适当延长落地签证时间等方面，也要很好研究，采取相应措施。

要多渠道、多方式增加旅游基础设施等方面建设的资金投入。中央财政和各级政府都要增加对旅游业的投入，同时要调动各方面积极性，更多地吸引社会资金发展旅游业。去年，国家安排13亿元国债资金搞旅游基础设施建设，至少拉动了130亿元的海内外资金投向旅游业，效果非常明显，并且使海内外投资者看到中央和地方对旅游业的

重视，增强了投资信心。其他配套的建设资金，还是要由地方、企业来安排。大家要看到，旅游行业的投入产出比还是比较高的，各地一定要舍得在这方面花钱，特别要舍得在创造安全、卫生的环境方面花钱。旅游企业自身也要不断增加积累，增强发展后劲。

三、西部大开发要重视旅游业的发展。

西部地区是我国旅游资源最为富集的地区。西部的大漠风情、溶岩峡谷、高山流水和独特的历史文化景观、深厚的民族文化积淀，富有独特的民族文化魅力，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中外旅游者具有极大的吸引力。中央在关于“十五”计划的建议中明确提出，开发西部地区要加快培育旅游业。西部地区各省区市凡是有这个优势的地方，都要把旅游业作为特色产业加快发展，形成经济优势。西部地区要集中力量培育若干国际化的旅游城市，带动整个地区旅游业全面发展。在布局上，要从现有基础和条件出发，下工夫建设一批比较像样的旅游基地。

扩大西部地区旅游业的对外开放。西部地区要积极吸引外资和港、澳、台资参加旅游资源开发，兴办旅行社，建设旅游度假村。可以把旅游设施建设项目列入《中西部地区优势产业目录》。同时，要积极吸引东部地区的投资。要逐步实现旅游业对海内外投资者全面开放。要加强机场建设，开辟国际航线，尤其是欧洲航线，欧洲游客从我国西部入境可比从东部入境节约三四个小时。要逐步形成国际游客东进西出、西进东出、东西部互相促进的局面。

四、加强行业管理，规范旅游市场秩序，努力提高服务水平。

目前，我国旅游业在服务质量、管理水平、从业人员素质等方面，都远远不能适应旅游业发展的需要。一些旅行社、景区景点的管理者、导游人员违规经营，欺客宰客，损害了旅游者的权益。旅游企业之间恶性竞争，也影响了旅游业健康发展。旅游业是一个“窗口行业”，这些问题的存在不仅严重制约旅游业发展，损害旅游消费者和投资者的利益，也严重影响我们的国际形象，必须大力整顿，坚决予以纠正。

加快旅游业的法律、法规建设。抓紧制定《旅游法》和配套的法规、实施细则。加大法律、法规的宣传力度。加强旅游执法队伍建设，提高执法人员素质。

全面提高旅游行业的管理水平和服务质量。进一步理顺管理体制，加快推进旅游业标准化工作，在旅游设施、产品、服务等各个方面，制定和实施系统的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积极推进旅游业信息化建设，发展旅游电子商务，完善各类旅游预订服务，把旅游服务水平提高到一个新档次。大力开展人员培训，提高旅游从业人员的思想文化素质和专业服务水平。

保护旅游业消费者和经营者的合法权益。进一步规范旅游服务交易，健全旅游者投诉制度，各级价格主管部门要规范旅游价格行为，加强监督检查。有关部门要协同治理旅游消费环境，加大打击“黄、赌、毒”的力度，倡导健康、文明的旅游消费。安全和社会秩序等环节是游客十分关心的问题，各地要采取有力措施，确保旅游者安全。

清理整顿财政部门办的公司

(2001年1月10日)

2000年12月20日，审计署向国务院报送的《关于中国经济开发信托投资公司1999年资产负债损益审计情况的报告》反映，2000年3至10月，审计署对中国经济开发信托投资公司及其19家全资控股公司、14家证券营业部1999年资产负债损益情况进行了审计，查出的主要问题有：资产质量不高，投资效益低下；违规使用财政资金；违规融通资金；违规经营证券业务等。这是朱镕基同志在该报告上的批语。

岚清①、家宝①同志：

财政部自己办的公司，无视财政规定，违规违法，胆子特别大，好像谁也不敢管它。鉴于其一犯再犯，后果严重，我建议请金融工委考虑对其进行清理、整顿，调整其领导班子，甚至可以考虑予以关闭，防止潜在的财政风险。请酌。

朱镕基

1.10

① 岚清，即李岚清。家宝，即温家宝。

更加重视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

(2001年1月11日)

这是朱镕基同志在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听取工作汇报后的讲话。

近几年来，我国在环境保护和治理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可喜的进展，但目前我国生态环境恶化的趋势还没有得到有效控制，环境形势仍十分严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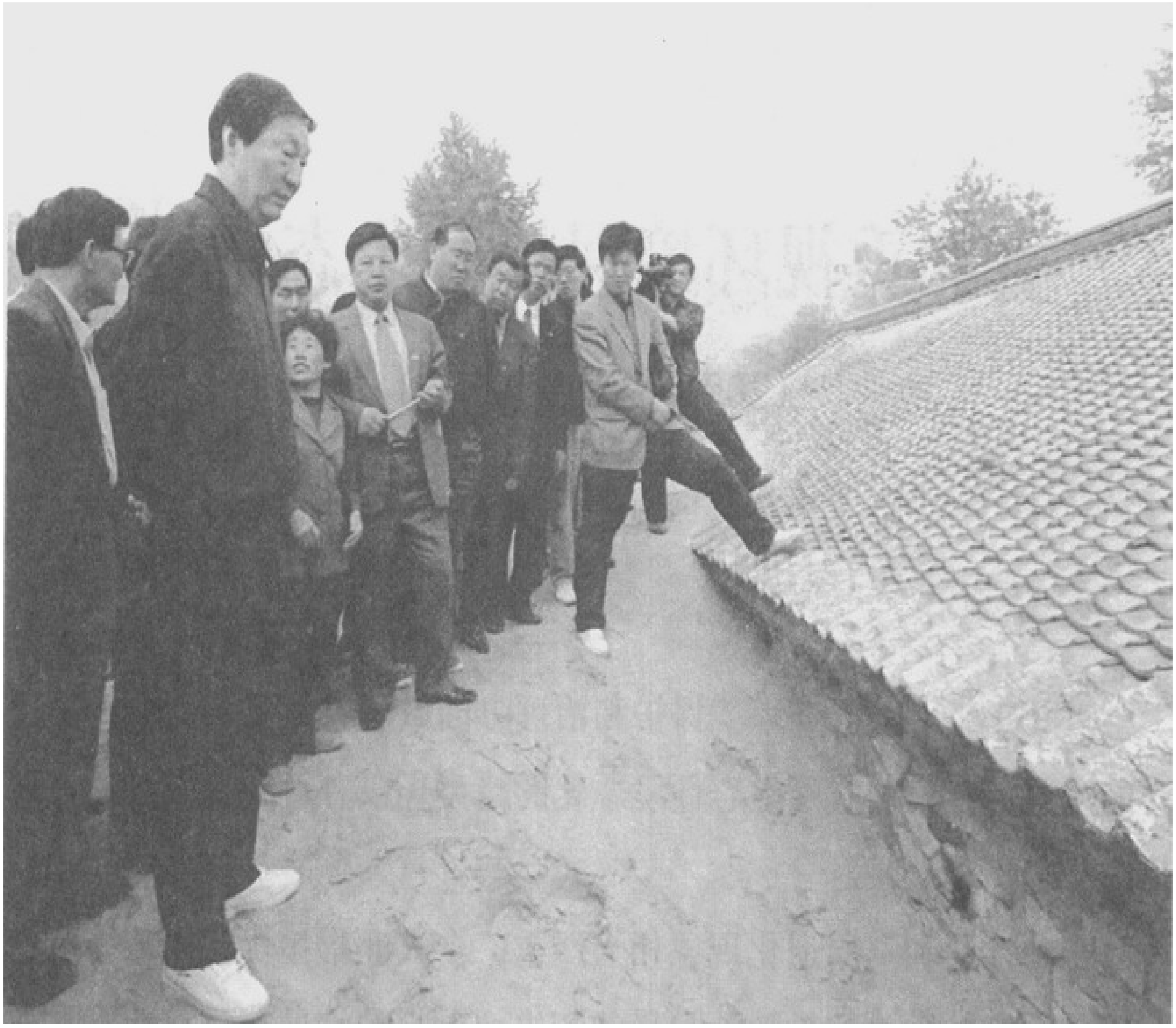
土地沙化和草原退化现象相当严重，令人非常担忧。内蒙古自治区浑善达克沙漠直接导致沙尘暴的产生，对它的治理非常重要。从蒙古人民共和国刮过来的沙尘我们管不了，但可以与他们加强治沙合作。内蒙古自治区我们管得了，要加快治理，防止沙漠化。去年，北京市的沙尘暴相当频繁，据说主要是外部的因素造成的，但不文明的工程建设使市区的扬尘、扬沙加剧，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北京市正申办第29届奥运会，要多花些力气把植被搞得好一点。要加强施工管理，不能挖开一个地方后，地面裸露着几年也没有覆盖起来。必须做到文明施工。

从水污染情况的年度曲线看，海河、辽河原来污染就很严重，经过治理后有所好转，但现在污染又在回升。其他几条河流以及太湖的污染治理也没有看出太大的改善，要很好地注意这个问题，加大治理力度。钱正英同志最近转来钱易①院士给我写的一封信，并附了一篇文章，表示不同意国家环保总局的意见。钱易院士讲：你们认为工业污染问题已解决了，现在应转到解决别的重点环境问题上；其实水污染现在仍然很严重，治理水污染比解决缺水的问题更加重要。我把这封信批给你们了，希望你们认真考虑这些不同意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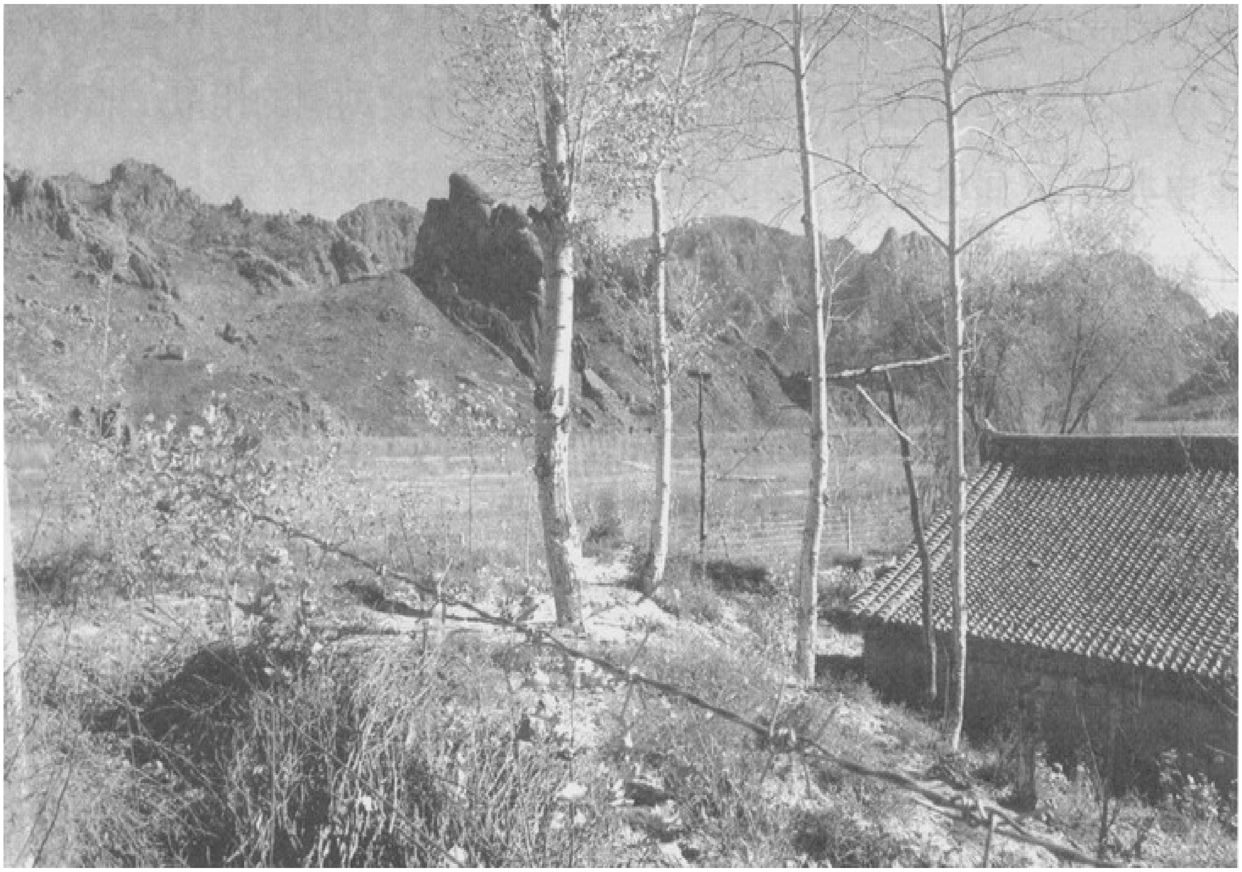
① 钱易，当时任中国工程院院士、清华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系教授。

我希望环境保护专家研究一个问题，就是在城市特别是北方城市适宜多种树还是多种草。我认为种树好于种草，应该多种树少种草，因为种草的环境效果不如种树，种草不仅成本高、耗水多，而且很难维护。不知道你们科学家是不是同意我这个观点？希望你们对此进行科学的研究，这是个很有意义的研究课题。我担心现在追求即时效应，种草成风，不注意种树，将来会走弯路。

环保总局要会同有关部门把环保科研人员的科研成果和生态环境恶化的状况，通过电视等新闻媒体以形象化的方式告诉全国人民，以引起国人警醒，让各级领导干部更加重视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要把刚才你们汇报的情况编写成宣传材料，扩大宣传。把你们研究的结论拍成形象的电视片播放，并送给各地区、各部门的负责同志观看，让大家都知道生态环境仍在恶化，毁林、毁草的速度超过了还林、还草的速度，耕地还在不断地被破坏，水污染还很严重。一定要让各地领导同志明白，只追求一时一地的经济发展，不考虑可持续发展，那是不行的。这样付出的代价太大，古今中外，教训深刻。土地也好，草原也好，一旦破坏了以后，恢复起来是非常困难的。环保总局和地方各级环保局是主管环境保护工作的，要和各级宣传部门、广播电影电视部门一起，宣传我国环境恶化的状况。不要怕，那些没有什么可保密的，也不要护短。这不是否定环保工作的成绩，而是提醒各个方面都要十分注意环境保护。问题已经这么严重，还不向全国人民发出警告，那是我们的失职！环保科学家要和艺术家相结合，要和影视界专家一起，把环保科研成果录制成形象的宣传片，向全国播放。中央电视台的《焦点访谈》节目，要反复播放，以警示广大干部群众。希望各个方面共同做好这个宣传教育工作。



2000年5月12日，朱镕基在河北省丰宁满族自治县小坝子乡考察村民几乎被沙尘埋没的房屋。左六为国家环保局局长解振华。



图为2007年经治理后的河北省丰宁满族自治县小坝子乡。

在新世纪里，我们要认真贯彻可持续发展战略，更加重视环境保护和治理。加强生态建设，遏制生态恶化。大力植树种草，加大防沙治沙力度。强化对城市大气污染、水污染、垃圾污染和噪音污染的综合治理，控制和治理工业污染。广泛开展城市绿化。健全环境、气象监测体系。在实施西部大开发中，要切实加强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有计划、分步骤地抓好退耕还林还草工程。

加强和改进金融监管

(2001年1月14日)

2001年1月14日，朱镕基同志与出席全国银行、证券、保险系统工作会议的部分代表座谈。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单位的负责同志参加了座谈。这是朱镕基同志在座谈会上的讲话，曾发表于《金融工作文献选编(19781～2005)》，原标题为《在全国银行、证券、保险工作会议座谈会上的讲话》。编入本书时，对个别文字作了订正。

一、要十分重视当前金融领域存在的问题和风险

去年我国经济形势是近几年最好的，出现了走向良性循环的重要转机。这集中表现在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明显提高，财政收入大幅度增长；投资、消费和出口需求全面回升，产业结构调整取得积极进展，国有企业三年改革和脱困目标基本实现。这些是全国上下认真贯彻中央正确决策和部署、共同奋斗的结果，金融战线广大干部职工也付出了很大的努力。

过去的一年，金融形势也是好的，整个金融保持平稳运行，人民币币值和汇率稳定。金融系统认真贯彻中央的金融方针和政策，做了大量很有成效的工作。一是积极支持经济改革和发展。去年，金融机构在居民储蓄存款增幅下降的情况下，贷款仍有较多增加。全部金融机构新增人民币贷款1.33万亿元，同比多增2500亿元。特别是配合国债项目建设积极增加贷款。近三年，中央财政发行特别国债3600亿元，银行配套贷款1.1万亿元，形成了1.5万亿元建设规模。同时，积极发展消费信贷业务，去年新增加个人住房、助学和消费贷款2600亿元，同比多增加1700亿元。为了支持国有企业改革和脱困，去年四家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对569户国有企业实行债转股3950亿元，相应减少企业利息负担180多亿元。二是证券、保险业进一步发展，直接融资比例明显提高。去年我国企业在境外证券市场筹资1721亿元，在境内证券市场筹资1528亿元，总计达3249亿元，比上年增长1.3倍。目前我国直接融资

比重已接近30%， 资本市场规模不断扩大。虽然近年来我国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增幅有所下降，但通过境外证券市场筹资不断增加。保险业发展也较快，全年保费收入1600亿元，比上年增长14.5%。三是金融整顿和改革取得较大进展，监管工作力度加大。去年国务院向国有重点金融机构派驻了监事会，这是加强金融监管的一项重要举措。同时，中国人民银行、证监会和保监会建立联席会议制度，加强了对金融机构监管的相互协调和配合。严肃查处了一批金融大案要案，全年金融系统查处案件1687起，处理违法违纪人员4719人，依法严厉打击了金融违法犯罪分子。撤销、关闭了一些有严重问题的中小金融机构，稳妥地化解了支付风险。整顿农村合作基金会的工作基本完成。四是国家外汇储备继续增加，去年年底已达1656亿美元，比上年年底增加109亿美元，进一步增强了我国综合国力和抗风险能力。实践充分证明，中央关于金融工作的方针、政策和部署是完全正确的，金融系统的工作是有成绩的。

在充分肯定成绩的同时，我们对金融领域存在的问题也不能低估，对金融风险隐患绝不能忽视。

(一) 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贷款比例还在上升。近三年国务院三令五申，一定要降低银行不良贷款比例，但实际上，按“一逾两呆”①原有口径统计(含已剥离的不良贷款)，四家国有商业银行合计不良贷款比例每年仍增加三个多百分点，达到38.9%。在不良资产剥离后，目前银行仍有大量的不良资产。据人民银行报告，从去年9月起，四家国有商业银行总的不良贷款比例开始下降，这是一个好消息。我希望，今年能够下降两到三个百分点，但是要真的下降，绝对不能有水分，搞虚假数字。

---

① “一逾两呆”，指逾期贷款、呆滞贷款、呆账贷款，合称不良贷款。

(二) 地方中小金融机构的问题仍相当突出。目前城乡信用社、城市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比例都相当高。城市商业银行虽然成立不久，不

良贷款比例却上升很快。不少中小金融机构支付缺口大，挤兑现象时有发生。这两年，为化解一些地方中小金融机构的支付风险，保持社会稳定，国家已付出了很大的代价。为了支持地方政府解决农村合作基金会和供销社股金服务部的问题，撤并部分城乡信用社和信托投资公司，人民银行已批准地方商业银行再贷款计划1144亿元，实际借 出770亿元，现在一些地方政府还在继续要求增加。这些贷款实际上是财政性放款，如果不加以严格控制，必然会导致货币的过量发行。

(三) 证券市场风险隐患也不少。这几年，我国证券市场发展很快，但很不规范。例如，一些上市公司质量不高，法人治理结构形同虚设，上市公司与母公司在人、财、物上没有分开，蓄意编造、披露虚假信息，随意挪用筹集资金，资金使用效益很差。一些证券公司、基金管理公司同样存在法人治理结构不完善、内部控制机制不健全等问题，肆意违法违规经营，搞机构联手、内幕交易、操纵股价和欺诈客户等。市场信息披露制度不健全，炒作成风。有些地方竟然出现了“证券黑市”，一些非法证券期货交易机构违法进行股票交易，严重破坏证券市场秩序。还要看到，由于我国证券市场监管机制和法制不健全，一些长期有严重问题、连续多年亏损，早就应该退出证券市场的上市公司，仍然留在证券市场，甚至被操纵炒作。这两天，就有几家有严重问题的上市公司股票被疯狂炒作，股价暴涨暴跌，引起证券市场震荡。如果容许那些早就该摘牌的企业还在股市上长期混下去，这样的证券市场还算什么证券市场？证券市场一定要建立健全上市公司退出机制，不然就没有规范、健康的市场经济秩序。据了解，美国纳斯达克股票市场每年都有几百家新的企业进入，又有几百家企业被摘牌淘汰。我国证券市场已建立十多年了，现在境内上市公司已达1088家，至今还没有一家上市公司被摘牌淘汰。这既不符合上市公司的实际情况，也不符合市场经济规律。规范的证券市场应当是公平竞争，优胜劣汰。

这些情况说明，目前我国金融领域存在的问题仍相当严重，对潜伏的金融风险与隐患切不可掉以轻心。在我国加快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的新形势下，我国金融业既有新的机遇，

更面临严峻的挑战。金融系统的同志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一定要有强烈的忧患意识和危机感，进一步增强责任心和紧迫感，努力做好各项工作，确保金融安全、高效、稳健运行。

二、切实加强监管，建立现代金融管理制度

加强和改进金融监管，是今年金融工作的重点，也是解决当前金融领域问题、保证金融健康运行的关键。如果金融监管机制不健全、监管工作不真正到位，不但各项金融业务工作很难做好，而且现代金融制度也难以建立起来。因此，银行、证券、保险系统都要把主要精力放在加强和改进监管上，深化改革也要围绕加强金融监管制度建设和推进机制创新来进行。当前，必须着力抓好以下三个主要环节。

一是建立健全金融机构内部控制机制。各商业银行和政策性银行、证券机构、保险公司和其他金融机构，都要层层加强内控机制建设，狠抓内部管理。特别要加强对金融机构各级主要负责人、重要业务人员和重要业务岗位的管理和监督。现在，人民银行、证监会、保监会都制定了加强各类金融机构内部控制的指导原则，关键是要落到实处。所有金融机构都要全面检查内控机制建设和执行情况，缺什么补什么，及时堵塞各种漏洞。人民银行、证监会和保监会系统先要管好自己，实行严格的金融监管责任制。要充分运用现代金融管理方法和先进科技手段，改进睢管方式，提高监管水平。要把做好监管工作的责任心、发现问题的能力、查处问题的力度，作为考核监管部门和监管人员的重要依据。对责任心不强、监管不力、严重失职的人员，要坚决调离监管岗位。绝对不允许人民银行、证监会和保监会系统的工作人员以任何形式参与金融经营活动，更不得支持金融违法违规行为。一旦发现，要立即从严查处。

二是实行严格的经营管理考核制度和责任追究制度。不但要加强对各银行、证券机构、保险公司和其他金融机构的综合考核，而且要抓紧完善对各类金融机构高级管理人员的考核办法。人民银行已制定和实施《商业银行考核评价办法》，从资产质量、减亏及盈利能力、流动性和资本充足率四个方面，对国有银行进行评估和审查。对证券机

构、保险公司和其他金融机构，有关金融监管部门也要抓紧制订相应的考核办法，并严格执行。这里要重申，成立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剥离银行过去的不良资产，不仅在于尽可能地收回一些国有资产，更重要的是，要建立健全各国有商业银行主要负责人的经营责任制，严格控制新增不良贷款。前面讲过，国有商业银行去年在剥离部分不良资产后，不良贷款还在继续增加。对此，我已经发出警告。今年不论哪一家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贷款比例还在上升，就要坚决调整那个银行的领导班子，有的人要调出银行系统。

三是完善和加强金融系统的外部监管。审计、财政、司法等部门和各级地方政府要与金融监管部门同心协力，密切配合。要加强对国有金融机构的财务监督，加大对问题严重的金融机构的审计力度。国务院派驻各重点金融机构的监事会要切实履行职责，认真检查所驻金融机构的财务活动、资产质量、经营效益、利润分配和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等情况，检查该金融机构主要负秦人的经营行为，并对其经营管理业绩进行客观、公正、准确的评价。所有的监事会和监事会成员都 要敢于坚持原则，忠于职守，不怕得罪人，按规定对所驻金融机构进行严格检查，认真写出检查报告，并要深入实际，对发现的问题及时写出专项报告，充分发挥监督作用。

加强和改进金融监管，还要认真研究借鉴国外经验，紧密结合我国实际情况，进一步深化金融改革，加快建立现代金融管理制度。要深入研究发达国家的金融监管体系和监管制度。在研究国外有益经验和总结我国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根据我国的现阶段国情，进一步改进和完善金融管理制度。

这里需要指出，现在有些做金融工作的同志不是把主要精力放在金融监管上，而是放在了一些今后才可能实施的改革措施上。这里有几个问题，应当统一认识。一是关于利率市场化问题。实行利率市场化一定要有健全、高效的金融监管机制作为基础。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必然要求市场对利率的形成起主要作用。但我们现在还缺乏一套规范和健全的金融监管制度，无论是管

理基础、干部素质，还是市场发育程度、宏观调控水平都还不适应，特别是吃“大锅饭”的机制还没有完全改变。在目前情况下，利率杠杆仍是我国宏观调控的一个重要手段。因此，尽管利率市场化是改革方向，但目前谈这个问题还为时过早。即使是在西方国家，利率也不是完全放开的。例如在美国，美联储就是通过联邦基金利率和再贴现率经常对利率进行调控。二是关于汇率问题。这个问题很复杂。现在世界上有多种汇率制度，各国要根据自己的情况来选择。我国目前实行以市场为基础、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实践证明，这一制度是符合我国现阶段实际情况的，是有效的。目前扩大汇率浮动幅度的条件还不成熟。因此，不要分散精力，过多地去讨论汇率问题。三是关于金融机构混业经营问题。从国际上看，混业经营是发展趋势，但从分业经营走向混业经营有一个较长过程。美国分业经营也经历了很长时间。20世纪30年代初经济大危机以后，美国为稳定金融，立法限制混业经营，直到半个多世纪后，才于1999年取消对混业经营的限制。目前我国银行、证券、保险业实行分业经营，是符合我国实际情况的。当然，从当今国际金融业发展趋势看，金融机构混业经营是个方向，国务院也已部署在个别单位试点，但目前我们还不具备全面实行混业经营的条件。在上述这些问题上，我们不能简单地照搬国外的做法，而应当根据我国实际情况，择机稳步推进。而加强和改进金融监管，就是要为深化改革创造条件。总之，希望大家要把主要精力和工作重点真正放在加强监管上。无论是加强监管，还是深化改革，归根到底，都要进一步降低银行不良贷款比例，其他金融机构也要明显提高资产质量和经营效益。

三、继续整顿和规范金融秩序

全面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是今年经济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继续整顿和规范金融市场秩序是其中的重要内容。尽管前一阶段整顿金融秩序已取得初步成效，但目前非法从事金融活动、金融机构违法违规经营，以及恶意逃废银行债务和逃汇、骗汇、套汇等问题仍比较严重。今年，银行、证券和保险系统都要用很大力气抓好整顿和规范工作。要健全和强化金融法治，严格执法，严肃查处各种金融违法违

规经营行为，严厉打击金融犯罪活动。对多次违法违规的金融机构，必须依法加大监管力度和严厉惩罚，该停业整顿的一定要责令其停业整顿，该撤销、关闭的一定要坚决撤销、关闭。继续认真贯彻“法制、监管、自律、规范”的方针，进一步整顿和规范证券市场。对那些亏损严重和有违法违规行为的上市公司，该处罚的要处罚，该摘牌的要摘牌，该退出市场的必须退出市场，绝不能姑息迁就。只有这样，才能实现上市公司的优胜劣汰，才能有利于投资者理性地选择投资对象，促进证券市场健康稳步发展，积极有效地防范证券市场风险。同时，要依法打击非法证券交易活动，严肃查处“证券黑市”、“基金黑幕”和“庄家操纵股价”的问题，坚决取缔各种非法证券期货交易机构，认真整顿有严重违法违规经营行为的证券公司、基金管理公司和证券中介机构，依法规范和维护证券市场秩序。现在外汇管理方面还有很多漏洞，必须加强和改进外汇管理工作，坚持不懈地打击各种骗汇、逃汇、套汇和非法买卖外汇的犯罪行为。对所有金融大案要案都要一查到底，依法严惩犯罪分子，特别要严惩金融系统中与社会上犯罪分子内外勾结、收受贿赂的腐败分子。大量事实证明，许多经济犯罪大案要案，都有金融机构内部的腐败分子参与其中。在厦门远华特大走私案中，走私犯罪分子就是拉拢腐蚀了一批金融系统干部，从金融内部打开缺口，骗走了巨额银行资金和外汇。因此，必须加大金融系统反腐败斗争的力度。

继续整顿和规范金融秩序，必须严字当头。我们要以对党和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坚持按原则办事。现在令人忧虑的是，金融系统不少领导部原则性不强，不愿得罪人，在处理人时总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这实际上是助长了歪风邪气，放纵了犯罪分子。如果我们对违规者不坚决给予相应的降级(职)、撤职、开除公职的行政处分，对违法犯罪者不依法严惩，是根本镇不住歪风邪气的。因此，对各种金融违法违规行为和金融犯罪分子，一定要毫不留情地予以坚决查处和严厉打击，绝不能心慈手软，养痈遗患。

四、坚持实行稳健的货币政策

三年来，我们在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同时，坚持实行稳健的货币政策。实践证明，这是完全正确的。今年是实施“十五”计划的第一年，改革、发展和结构调整的任务很繁重，要继续实行稳健的货币政策。金融系统要全面落实支持经济发展和结构调整的各项措施，大力改进金融服务。对国债项目要积极增加配套贷款，对有效益、有市场、守信用企业生产所需的流动资金要予以保证。但对固定资产贷款要十分谨慎，注意防止加工业新的重复建设。要继续扩大消费信贷业务，当然，对消费贷款增长过猛等现象也要引起重视。要通过进一步规范和发展资本市场，继续提高企业直接融资比例，以促进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要熟悉国际金融特别是证券市场运作规则，在我国企业境外上市和筹资过程中，自觉按市场经济规律办事，绝不能政策多变，随意干预上市公司的经营活动。当前，我国经济生活中存在着一些值得注意的问题。例如，银根相对宽松，一些基础性产品价格明显上升，货币增发压力加大等。同时，世界经济发展中也存在一些不确定的因素。因此，我们要在抑制通货紧缩趋势的情况下，警惕和防止可能出现的通货膨胀；要在继续扩大内需和支持经济结构调整的条件下，注意防止经济过热现象。中央银行要密切关注国民经济运行特别是物价总水平的变化，灵活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合理调节货币供应量，保持人民币币值稳定。

在九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湖南省代表团全体会议上的讲话

(2001年3月6日)

该讲的话昨天《政府工作报告》都讲完了，今天主要是来听老乡们提意见。刚才几位同志都讲得很好。国务院副秘书长尤权同志来参加会了，请他把大家的意见都转告给有关部门研究。

说老实话，我平常非常关心自己的家乡。我也再说句老实话，我没有在任何的政策、项目、资金方面对湖南省有什么特殊的照顾，因为我是一个国家的总理，我不能够这样做。但是，我还是心系湖南，每一次看到内参反映湖南的进步的时候，我会很高兴；反映湖南所存 在的问题的时候，我心里也确实久久不能平静。我感到，我们湖南，特别要注意干部的作风问题。大家知道，湖南去年出了一些事情，引起江泽民总书记的关心，我想我们在这些方面要更加注意。一个是对我们的干部队伍要求要严，对于贪污受贿、腐败堕落的事情处理一定要严。属于这类性质的问题，不是什么党内警告能够解决的，那不顶用，他不在乎啊！就是要撤销他一切职务，开除他的党籍，送司法机关严办。不然，我们会失去老百姓的支持！另外，在干部中间，特别是基层干部里面，存在一些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作风。乱收费搞得农民没法活下去。粮价这么低，种粮食赔本，你还乱收费，叫人家活不活呀？所以我希望，在座的人民代表要发挥自己的作用，来监督、检举、揭发，帮助我们的党和政府来解决这些问题。作为党政领导干部，要治政从严，依法办事。特别是政府职能要转变，不要一天到晚都忙于一些官场应付、项目审批，而不关心群众疾苦，这样搞下去是不行的。政府的职能要转变，不要错位。我常常讲，我们政府有时做了一些自己不该做的事情。不要什么事情都去行政干预，要依法办事。当政府的公务员，连国务院发了哪些文件、作了哪些规定你都不知道，做什么官呀？！特别是现在新提拔的一些基层领导干部，对国家的法律、法规都不熟悉，如果作风又不好，那真是不得了呀。

我现在想讲一个问题，就是要关心人民群众的生活，提高人民群众的收入，包括公务员的工资。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来的这三年，要不是中央采取了正确的、积极的财政政策，辅之以稳健的货币政策，我们就没有今天这样好的经济形势，1998年就垮了。就在这几年时间里，我们从一个商品短缺的国家，变成了一个买方市场，连外国人都感到惊奇。之所以这样，第一是我们采取了积极的财政政策，扩大内需。因为1997年我们面临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出口出不去，甚至负增长。国内由于多年的重复建设，生产能力都搞得很大，国有企业没法开工，下岗职工达1000万，很困难。老百姓看到这种形势，不敢消费，把钱都存到银行里，银行一年的存款增加8000亿元到1万亿元。如果这个钱我们不用的话，银行也得给老百姓付利息。要用的话，用到哪里去呢？再搞加工工业是不行的，那都是生产能力过剩，供过于求了。因此，最好的办法就是把这个钱用国家财政的名义从银行借出来，付给利息，然后国家拿这个钱搞基础设施建设。基础设施建设一搞，需要的钢材、水泥、玻璃、建筑材料、机械设备，马上都有市场，一下子把整个生产都搞活了。同时，这些项目都是我们多年来想办而没钱来办的事情。这个情况跟1993年是不一样的。1993年不是靠存款，而是靠发票子来搞建设、搞房地产，又没有物资，钢材从每吨1000元涨到4000元，物价飞涨。这三年干了这么多事情，整个的经济搞活了。

很多同志讲去年是“重大的”转机，我说是一个“重要的”转机，不要讲得太满。毕竟我们的市场机制、企业机制还没有转变，但是这个转机是非常大的，“真金白银”收到口袋里来了。财政收入，在“七五”计划时期，也就是从1986年到1990年这个阶段，非常的困难，平均每年增加186亿元。你说能干什么？“八五”计划期间，从1991年到1995年，尽管经历了1993年的经济过热，但是我们采取了有效的宏观调控政策，平均每年增加的财政收入是661亿元，比上个五年增加两倍多，这就比较松快一点了。从1996年到2000年 “九五”计划时期，情况发生了很大的改变，谁都没有料到会转变得这么快。因为这个中间我们经历了亚洲金融危机，出口变成零增长甚至是负增长，国内的生产能力严重过

剩，许多工厂开不了工，又碰到1998年严重的水灾，大家都记忆犹新。由于中央采取了正确的政策，看准了这件事情，坚决地执行，三年就把这个情况给扭转过来了。这五年的财政收入平均每年增加1430亿元，比上一个五年的661亿元增加一倍多。分年来看，1996、1997、1998这三年每年增加1200亿元，很平均。1999年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当年增加1560亿元，这里面一个很大的因素是1998年打击进口走私，1999年进口产品税收应收尽收，海关的税收一下增加一倍，700多亿元。2000年，财政收入增加1950亿元，这是个重大的突破，其中主要的增收是来自于企业。工业企业确实是活了，国有企业搞活了，全国增加的1950亿元里面来源于国有工业企业的增值税增加650亿元，所得税增加350亿元，共1000亿元。其次，因为我们出口以30％的速度增加，进出口环节税收增加500亿元。还有股票市场的发展，印花税等也有200亿元的增收，利息税也超收了100多亿元，所以去年是个很大的突破。但是，我不能说今年也能够达到这个程度，因为国际情况有变化，美国的经济形势不好，我们出口不可能有那么大的增长，今年再增加一两千亿元是很困难的。我们留有余地，打算增收1200亿元，保持“九五”计划前三年的水平，我估计可以完成，甚至于超额完成，主要是国有企业情况的好转。所以，从这里可以看出来，中央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是正确的，不应有任何的怀疑，也没有大的风险。



2001年3月6日，朱镕基在九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湖南省代表团全体会议上讲话。左一为湖南省委书记杨正午，左三为湖南省省长储波，左四为湖南省委副书记兼长沙市委书记张云川。

三年发了3600亿元的国债，一年平均1000亿元多一点，干了多少事情呀！3000多亿元的国债，带动了1万多亿元的银行贷款，加上其他的资金，干了1.5万亿元的工程。出现的结果是经济搞活了。铁路的新建、改建、电气化，差不多1万公里。新修公路17万公里，其中高速公路1万公里。长江大堤都进行了整修，还有退田还湖、退耕还林、停止砍伐天然林，做了多少工作呀。所以，才有今天这么一个繁荣的局面。现在国债的余额，到去年年底是1.2万亿元，按国际惯例的水平来

看并不高；而且从去年的财政收入来看，回收得很快，国债一投进去，工程一干，它马上带动原材料工业、加工工业发展起来，它的税收就交给了国家，还你这个钱还有剩余。去年我们增加了1950亿元 的财政收入，我们预算增收只有1200多亿元，超收了700多亿元，超收的钱我们一个也没有乱花。同志们，我可以给你们报个账，超收的700多亿元中，拿200亿元减少了赤字，这就等于去年的国债又少发了200亿元；拿300亿元放入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准备给各个省用于补贴养老保险、失业保险的缺口。现在成立了一个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由过去的财政部部长刘仲藜任理事长，由他来管着这个钱。财政部历年留的社会保障基金有300亿元，也拨给他了，共有600亿元了。去年我们的国有企业到境外上市，拿回来267亿美元，从中抽10%，就有二十几亿美元，也是200亿元人民币，也都放在社保基金里。这样就能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使社会能够稳定，老有所养，能够保证失业者的基本生活，使他们能够再就业。还有超收的200多亿元，用于去年抗灾救灾，增加粮食风险基金，增加给种粮农民补贴等。没有这个措施，农民更不种地了。你们看！财政状况很好。而且，这种形势是不可逆转的，只会越来越好。这是已经形成的一个良性循环。

现在我要讲另外一个良性循环。今年国际形势有所变化，我们出口可能不会有很大的增长，尽管计划打了8%，我也做了出口零增长的准备。我们依靠内需，也可以带动国民经济的发展。我们出口水平已经很高了，去年出口达到2500多亿美元。现在还需要另外一种拉动，就是从国内消费方面来拉动。刚才我讲，过去老百姓把钱存在银行，是因为没有安全感，不知道何时下岗，也不知道何时会生病。经过这三年形势的发展，特别是去年节日放长假，推动了经济的发展，老百姓看到形势越好，就越愿意花钱。所以，我们就是要增加工资，前年增加了一次，去年增加了一次。这对消费的拉动，比基础设施建设的拉动更直接。投资拉动主要是拉动生产资料的生产，而消费拉动是直接的拉动，拉动力更大。所以，我们一定要不断地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特别是低收入群众的生活水平，每年都得加工资，使大家感到有希望。现在很多大学生，最优秀的被外国公司给拉走了，清华、北大

的一流学生被外国的公司拉走了，外国公司拉走这些人来对付我们呀。他出的是高工资，相当于我们工资的10倍、20倍呀。韩国的工资水平也比我们高10倍，但话说回来，它那个物价比较高，生活也不见得比我们好10倍。所以我一直讲，我希望今后三年，工资每年加30%，三年翻一番，我讲的是公务员、机关事业单位的工资。我不是讲企业，因为企业是要根据它的效益，效益好，你多发工资，谁也不会眼红；效益不好，你就得少发，甚至关门、下岗。国家财政是国家纳税人交的钱，养公务员是为了治理这个国家。我讲的公务员的工资加30%，是说全部工资加30%，因为工资包括两部分，一个是基本工资，一个叫各种津贴、补贴，标准不一样，有的地方高得很，有的地方要低一点。从中央机关的工资情况来看，大体上是基本工资跟各种补贴各占一半。今年我们增加工资的计划国务院已经批准了，党中央也批准了，你们要做准备工作。这一次增加工资，基本工资每月增加100元；另外，今年多发一个月的奖励工资，也就是到12月份时发两个月的工资；还有一些边远地区的补贴等等，总算起来明年全部工资大体加了15%，没加到30%。主要是考虑两个问题：一个问题是形势还没有看得太准。今年国际形势如何发展？比方美国经济是“硬着陆”还是“软着陆”？美国的经济形势对我们关系极大，它是我们出口的主要对象。日本的经济是停滞不前的，日本是我们第二大贸易伙伴。东南亚的形势不太好，各个地方政治风波不断。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是各个省区市的差别太大。因为全部增加的工资都要靠中央财政来拿，中央拿不起，所以我们从1999年开始实施的办法就是东部省市，中央原则上不拿钱，但有个别省(如辽宁)，中央还是给了一点；中西部地区，中央根据不同情况给予补贴，西藏增加的工资全部都是中央拿，新疆增加工资的85%是中央拿的，自己只拿15%。湖南是中央拿65%，也不算少吧。因此，增加工资的钱中央拿一大半。1999年那次提高工资只有半年，500多亿元，中央拿了340 多亿元；去年是加一年的工资，900多亿元，中央要拿700亿元呀。

我们现在就怕一方面你这里加工资，另一方面你欠发工资。那加工资不等于零吗？这个星期四我们要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还要讨论这

个问题。最近，我们初步调查了一下各个省区市的情况。去年我们一再重申不能够欠发工资，历史的欠账一下子也还不清，至少要确保 当年不能够拖欠。结果去年11月份调查，全国欠200亿元；到12月份再调查时，只欠80亿元了，一个月减少欠发不少。我就怕什么呢？你开始调查，地方以为中央要给它钱，因此报得多一点，后来知道不给了，你又调查，地方为了表示自己的成绩，就报得少一点了，我伤脑筋就在这个地方。我不知道储波①你们那里怎么样，章锐夫②你给我报个数，你去年欠发工资多少钱？(答：6.72亿元。)去年以前的慢慢地还，当年就不要拖欠了，6个多亿都拿不出来？还要拖欠人家的工资，叫人家白干活呀？“薪以养廉”嘛，工资不发给人家，你不是叫人家去偷鸡摸狗吗？从哪个地方也可以挤6个亿出来嘛。所以说，后天我们中央政治局常委开完会后要发一个通知，这次加工资，首先保证不拖欠。我们认为是不应该欠的。为什么呢？我们统计过，现在每个省的财政收入中用于发工资的数目，全国平均是40%。只要你贯彻“一要吃饭，二要建设”的方针，保工资是毫无问题的。你们无论如何要保证工资正常发放，你们过去欠的一年还一点，慢慢还吧。当年不要再拖欠啦，从哪里也能把这个钱挤出来。

---

① 储波，当时任湖南省省长。

② 章锐夫，当时任湖南省财政厅厅长。

我认为目前这个好形势，一方面要稳住，要巩固这个发展形势，要继续坚决执行积极的财政政策。我们现在开工了2.5万亿元的项目，已经完成了1.5万亿元。我们如果今年发1500亿元国债，明年再发1500亿元，从这1500亿元里面每年拿1000亿元来干现有的项目，就能带动差不多3000多亿元的银行贷款，两年就把现有的项目差不多都完成了。另外，每年还有500亿元用于西部地区大开发，搞西气东输、西电东送、青藏铁路、南水北调，都把它们干了。有两年的时光，我估计国有企业就能成长起来，那个时候不需要发这么多国债了。现在银行的存款大量增加，国有企业的存款在银行大量增长，这是国有企业好转的迹象。老百姓的存款有所减少，表示他消费了。现在就是外汇存款

也增加了，银行的外汇存款差不多有1300亿美元，其中750亿美元是老百姓的存款，老百姓还是有钱的。另一方面，要千方百计保证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首先，一定要保证政府公务员的工资三年翻一番，我是无论如何要实现这个目标的。希望我们的公务员能够廉洁奉公，维护他们的尊严。本届政府提出的目标第一个就是“廉洁”，然后是“勤政、务实、高效”，政府机关不能保护人民群众的利益那还得了呀，这工资一定要给公务员发的呀。现在好多事情政府没有管，今年我们要把整顿市场经济秩序作为一个大的任务，保证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嘛！现在有些地方搞得实在是不像话了，你看电视那个《焦点访谈》节目，河北衡水猪肉的灌水事件，他不是灌自来水，是灌阴沟里的水，我看了以后都恶心呀。四川有人把那些医院里 的破纱布、破棉花，上面有脓有血，拿机器一轧，就变成了棉花，外面搞一个被套，就卖出去了，都发臭呀！我那天看了以后，就说我们政府都干什么去了？当时《焦点访谈》节目里面那个质量技术监督局局长还说，“我们还没有相应的法律来制裁这个事情”。我当天晚上就给国家质量技术监督局局长李传卿同志打电话，我说那个局长放屁! 还没有法律？保护人民生命健康就是一条法律嘛，还要什么法律呀？！我说你赶快到四川去，跟周永康①同志商量，把那些人依法严惩。后来法办了。人民生命健康，政府不保护，谁来保护呀？现在，各种违法乱纪、假冒伪劣、不顾人民死活的情况太严重了。

---

① 周永康，当时任中共四川省委书记。

政府官员不能一天到晚坐在那里干那些不该干的事情，职能错位。你就是要保护人民的生命健康，保护市场公平竞争。最近中央下决心了，把原来的十个国家局，冶金工业局、机械工业局、石油和化学工业局等撤销了九个，人员一部分到国家经贸委，一部分到企业、协会等等。原来那种行业管理分得这么细的国家政府机构已经不适应市场经济的需要，但是那些维护市场经济秩序的机构要加强。最近中央讨论同意，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升格为正部级。国家质量技术监督局、国家出入境检验检疫局这两个副部级单位合并，成为国家质量监督检

验检疫总局，升格为正部级。要切实加强这个力量，保护人民的利益，保护市场的公平竞争。如果都靠假冒伪劣产品，中国还有什么希望呀?

总之，我今天讲这些的意思，一是希望大家能够统一认识，坚持积极的财政政策、稳健的货币政策；另外一个是要从消费方面推动内需，形成一个良性循环。我相信这个形势会越来越好，今年的经济发展速度原来是8%，我们改成7%，财政收入原来计划增加1400亿元，现在改为1200亿元，都留有充分的余地。我相信今年的形势会超过我们的预料，会一天比一天好。我希望湖南一我的老家的情况一天比一天好。是所厚望!

农民问题的关键是增收减负

(2001年3月7日)

这是朱镕基同志在九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安徽省代表团全体会议上讲话的主要部分。

今天到安徽代表团来，主要是想跟大家商量农业、农村改革的问题。中央提出，当前经济形势出现了重要转机——一个走向良性循环的转机。我们对这个形势是乐观的。当前最主要的问题是什么？是农业问题、农民问题。城市的问题也多得很，但是我们不害怕，都可以解决，也比较容易解决。现在我们经济的综合实力大大增强，什么问题都好解决。过去最担心的是银行挤兑、股民闹事，这些问题如今基本上不存在了。前几年，离退休职工、下岗职工示威游行，阻断铁路，现在也大大减少了。我们在社会保障方面下了很大工夫，党中央、国务院很重视下岗职工问题，目前已不再是很大的问题了。



2001年3月7日，朱镕基在九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安徽省代表团全体会议上讲话。右二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周光召。

现在是农民的问题不好办。我们不能像美国那样，3%的人口搞农业，几百万人管着两亿多人吃饭还有余，还大量地出口粮食。我们是80%的人口在搞农业。现在碰到的问题是粮食多了，粮价不断往下掉，农民增产不增收，主产区的农民收入下降，这是个严重的问题。中国历史上哪一个封建王朝的灭亡不是由于农民起义呢？皇帝的换

代，那可能是由于内部权力的斗争导致“清君侧”，皇室成员之间的斗争导致皇帝换代是有的，但是改朝主要就是由于 农民起义。有些看起来是由于外族的侵入，但实际原因也是民不聊生，农民起义。那么，我们现在农民的收入在减少，大量土地弃耕，不种粮食了，这个问题很值得我们注意。农民的负担又有增无减，这个问题非常严重。农民收入减少，消费缺了一大块，经济无论如何拉动不起来，发多少国债也拉动不起来。今年，中央把农业、农村工作和增加农民收入放在经济工作的首位。今年最大的改 革就是农村的税费改革，尽管我们只在安徽省试点，但实际上这是一个翻天覆地的大改革。所以，我今天非常愿意来听各位人大代表的意见。

农民的问题有两个方面，一个是怎么增收，另一个是怎么减负。关于增收的问题，我觉得应该解除一些思想的束缚，加快农业种植结构的调整，把农村经济搞活。现在强调粮食安全是必要的，任何时候都不要忘记吃饭问题。现在国家专储粮有1100多亿斤，地方储备粮300多亿斤，国有粮食企业周转粮三四千亿斤，加起来是5000多亿斤，再加上农民手里的余粮，全国存粮差不多相当于一年的粮食产量。所以，我们不要成天喊粮食安全，要求确保粮食种植面积不减少，那还怎么调整种植结构呢？所以，同志们，我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里没有那么讲，我讲的是稳定粮食生产能力。稳定粮食生产能力有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就是不能把农用地改成非农用地，基本农田不能破坏，水利设施不能破坏。市场需要什么就种什么，什么赚钱就种什么，为什么非要强迫农民都种粮食呢？粮食一多就降价，一降价农民就减收，他就弃耕不种了。一块耕地种什么都是可以的，只要粮食值钱，他马上就改种粮食了，快得很。

为什么每个地方都要强调粮食自给自足啊？如果都自给自足，黑龙江、吉林、山东、河南、安徽、湖南等粮食主产区的粮食往哪儿销售呀？去年年底，我在浙江、江苏等地开座谈会，上海、福建的领导同志也参加了。在那次会上，我说，不要强迫人家种粮食不行吗？让他们去种蔬菜、种水果、挖鱼塘，什么都可以搞呀！黑龙江、吉林有的是粮食，那里种的大米比你们那里种的好吃得多，价钱也便宜。我开

了个座谈会，这么一讲，大家恍然大悟。西北、西南地区都强调粮食自给自足，粮食不都种到山上去了吗？把树林子都砍掉了！现在已经不是过去了，水利设施建了那么多，化肥供应充足，还出了个袁隆平①，粮食亩产提高那么多！所以，一定要解放思想，加大种植结构的调整力度。但是，绝对不要搞强迫命令，要尊重农民的意愿，根据市场的需要来调整种植结构，把农村经济搞活，不要搞大呼隆，不要千篇一律，大家都种同样的作物就糟糕了。让农民自己搞活，农民比我们那些村党支部书记要聪明，让他们自由发展不好吗？农民该种什么，他们自己清楚得很，不需要你强迫命令。要推广订单农业，由龙头企业出来牵头。像河南“双汇”，就搞得很好，每个省都要培植这样的龙头企业。振兴农村的经济，就是要搞公司加农户的模式，要扶植龙头企业，开拓市场，然后对农民下订单，农民都有稳定的种植养殖方向，他们就富了。不要搞别的名堂，搞别的名堂都是花冤枉钱。

---

① 袁隆平，中国杂交水稻育种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

减负问题是中央一直非常操心的问题，想了各种办法。过去我们的办法是把乱收费的项目清单在报纸、电台上公布，规定这些费不许收。可是地方上再想别的名堂，你这里减掉180种，他那里加了280种，怎么弄呀？想来想去，最后只有这个办法，就是什么费都不要收，只收一个税，便于检查，便于监督。收任何费都是违法的，违法就得法办。实行这样的改革，在农村是翻天覆地的，因此我们很慎重，决定由中央拿钱，先搞试点。原来是四个省愿意试点，后来大概感到难度相当大，有三个省就打退堂鼓了，只有安徽省有勇气决心试点。我们一定支持你们。你们做的这个工作是前无古人的工作！过去的封建王朝也是乱收费呀，哪个皇帝都是喊轻徭薄赋，但没有一个能做到。只收一个农业税或农业特产税，再加上农业税附加，其他一概不收。我算了一下，现在全国农业税包括屠宰税是300亿元，“乡统筹、村提留”是600亿元，再加上对农民的乱收费、“两工”(义务工、劳动积累工)等，差不多1200亿元全是农民负担的呀！现在保留农业税及其附加，原来是300亿元，现在加收一点，也就是加到500亿元，然后中央

再补贴200亿元，地方补贴百把亿元。说句老实话，800亿元能解决那1200亿元的事情吗？很难。当然，我们有很多配套的措施，精简机构，撤并乡镇，市县乡的干部不在编的一律退回，在编的精减20%。这些措施加到一起，也可能勉强平衡。农村税费改革在安徽试点的任务是极其艰巨而繁重的，你们把这件事办成了，成为一个可以推广的样板，那你们就功德无量，名留青史！大家都要有这种责任感、荣誉感，不付出牺牲，想进行这么大的改革，怎么可能！中央非常重视这项工作，当做当前最大的一项改革。在此之前，我们多次开专题会议，反复研究，感到问题还很多，但是非搞不可。我今天讲这么多困难，就是想使安徽的同志感到你们的任务是既光荣又艰巨的，迄今为止没有其他一个省明确地表示愿意试点。我们不搞强迫命令，根据你们的情况，什么时候开始这项改革由你们定，中央财政每年给补贴200亿元。希望安徽同志要有这种背水一战、破釜沉舟的决心。但是我也说句老实话，要实事求是，我最怕的就是虚夸。我经常开玩笑说，很多人说看着我害怕，就安徽人不怕我，敢骗我呀！我不是受过骗吗？芜湖那个粮站本来没有那么多粮，在我去的头几天，花钱把其他地方的粮食都运到那个仓库里，摆在那儿，整整齐齐的。我一看，这个粮站管得很好呀。后来突然收到一封人民来信揭发此事，全是假的。

要注意虚夸的问题，不能勉强，什么事都要实事求是，政策要落实。安徽的试点是举足轻重的，一定要把它办好。我脑子里还有很多问题要解决，准备再到安徽去做一次调查。在去之前，希望有关部门的同志自己先做点调查，微服私访，千万不要听那个一套一套的汇报，预先对很多问题要研究。比方说，如何能够把干部精减下来、把开支压下来，是不是有切实的措施？“乡统筹、村提留”都不收了，用中央、地方财政补贴的这些钱，基层政府能不能维持正常的运转？另外，农业税怎么征收？农业特产税怎么个收法？如果说把这个负担都摊到种粮食人身上，也不是一个公平的办法。外出打工的农民不种地了，什么负担都没有了，这个恐怕也不公平呀。还有，我最担心的就是教育经费没有保证。刚才你们说乡镇财政百分之七八十都是用于教育的开支，县的开支大概有50%是用于教育。所以这样一减了以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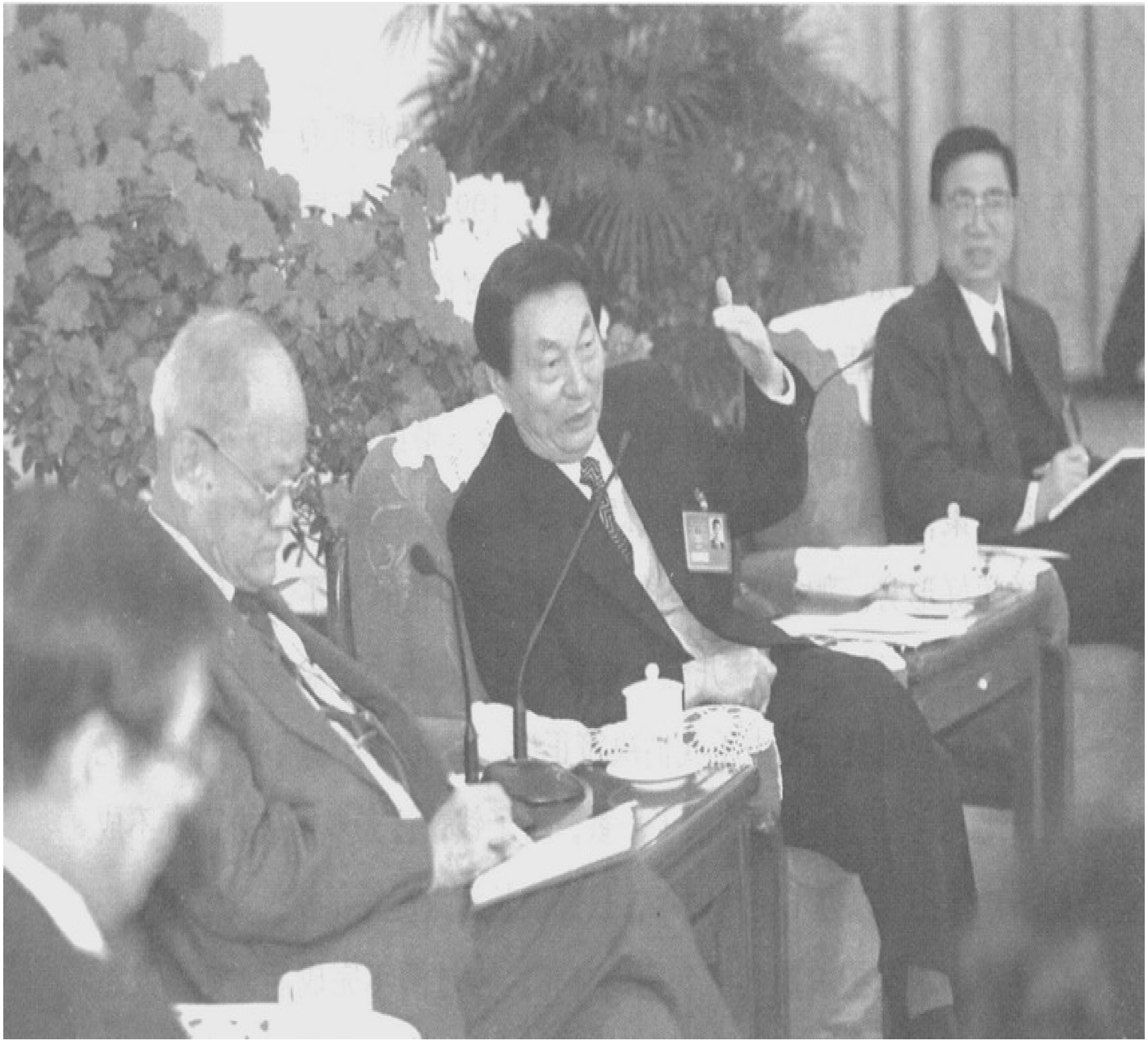
又不许乱收费，义务教育该怎么保？这些都是很大的问题。总之，我希望国务院各个部门和地方上的同志，大家都搞点调查研究，了解实际情况，等心里有底了以后，再决定这个改革在全国要推行多快多慢，务必把这项改革搞成功。所以，我对安徽的同志寄予厚望！

香港应该是稳定第一，团结为重

(2001年3月8日)

这是参镕基同志在九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香港特别行政区代表团全体会议上的讲话。

今天我来香港代表团和大家见面，非常高兴。我今天来的目的，一是报告工作，各位代表对我在大会上作的《政府工作报告》，认为有不清楚、不周全的地方，我来作说明；二是听取批评，大家对中央政府的工作有什么批评意见，我虚心听取；三是听取建议，刚才几位 代表在发言中提的建议都很好，我们要认真研究。现在我讲些意见, 讲错了的地方请大家批评。



2001年3月8日，朱镕基在九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香港特别行政区代表团全体会议上讲话。右一为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主任姜恩柱。

关于曾宪梓①代表提出的在港中资企业负责人轮换过于频繁的问题。在港中资企业有办得好的，也有办得不好的，办得不好的还比较多，其中人才是个大问题。中央规定，中资企业负责人要定期交流，在港任职时间最长不超过七年。这种交流有好处，包括有利于内地与香港企业管理经验的交流。解决人才问题，我认为最好的办法是多用本地人才。内地派的人要融入香港文化不容易，任职久了又容易出问题。最好利用香港本地的人才，这样花费也会小一些。中央也非常欢迎香港的人才来内地服务，特别是进入银行、证券、保险业和国有大

型企业。中央已作出决定，积极聘请境外人才，主要是香港，还有澳门、台湾的人才来内地任职。聘请史美伦担任中国证监会副主席，就是一个大胆的尝试。地方人才到中央做官，这种“上调”是正常的。史美伦担任中国证监会副主席就是副部长，有权力，也有责任。相信有志气的人才会出来，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和经验为国家服务。我现在正在物色，你们也帮我找找，看看哪位香港同胞适合到中央银行当副行长。不是不能当行长，但央行的行长太难当。知识经济中，人才战略是最重要的战略。在这方面，香港能为国家作更多的贡献。我们希望能由此走出一条人才交流的路子，这对香港和内地都有好处。

---

① 曾宪梓，当时任香港金利来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

关于李泽添①代表提出的加强社会保障、扶助下岗职工的问题。党中央、国务院非常重视社会保障体系建设，这关系到国家的稳定。目前中国有12亿人口，其中有8亿多农民，会有大量劳动力从农村转移出来。现在大量国有企业职工下岗，需要帮助他们学习新的就业技能。我国人口越来越老龄化，这方面的压力也越来越大。本届政府在社会保障方面尽了很大努力，除了中央投入之外，社会各方面也都有很多投入。社会保障工作比过去有很大进步，养老保险金当年可以确保按时足额发放，去年95%的下岗职工领到了救济金。中央财政每年拿出几百亿元，建立了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去年企业在海外上市筹资267亿美元，从中提取10%进入全国社保基金。这项工作正在逐步完善。

---

① 李泽添，当时任香港工会联合会会务顾问；1988年至2000年，任香港工会联合会会长。

关于梁秉中①代表提出的应当加大义务教育投入的问题。我们很重视义务教育，提出了具体的目标。这方面需要的投入是很大的。现在，全国县级财政收入平均60%用于办教育、支付教师工资，有的乡这个比例达到80%，有的乡甚至把全部财政收入都拿出来还不够。因此，农村乱收费现象非常严重，农民负担很重。既要达到《中国教育

改革和发展纲要》的指标，又不能加重农民负担，这个问题要认真研究解决。安徽的农村税费改革正在试点，这是其中一项重要的内容。

---

① 梁秉中，当时任香港中文大学教授、香港中医药研究所所长。

前面讲了“一国”，后面该讲“两制”了。香港的行政事务由特 区行政长官和特区政府自行处理。我今天只是作为一名全国人大代表，讲些个人意见。

目前对香港来说，有四句话很重要，这就是：肯定成绩，坚定信心，稳定第一，团结为重。

我每天都看香港的几种报纸，我感到，香港报刊对取得的成绩肯定得不够。香港回归祖国后正好遇到亚洲金融危机，在应对这场危机的过程中，中央政府和香港特区政府都付出了极大的努力，取得了不小的成绩。拿中央来说，对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有一定准备，召开了会议研究防范，但准备还不充分。1997年，我国外贸出口增长20%，而1998年几乎变成了零增长。当时很多企业不能开工，过去积累的许多矛盾如重复建设、产业趋同等都爆发出来，大量职工下岗。面对这种局面，中央参考国外的经验，考虑历史和现实的情况，果断决策，采取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才有了今天这样的好形势。如果不这样做，国民经济可能就垮了。我们看准了就做，结果三年见效。“九五”计划期间，遇上亚洲金融危机，历史积累的问题爆发，但由于我们决策正确，财政平均每年增收1430亿元，比“八五”计划期间翻了一番。有了钱，过去多年想办而办不成的事，现在可以办了。这两年，仅加固长江大堤每年就投入了100多亿元，搞水泥护坡加几十米宽的林带，再过两年完成后，如再发生1998年那样的大洪水也不怕了。政策对头，就干了很多大事情，来访的外国领导人都很称赞。朝鲜领导人金正日到上海访问时，是我陪同。他上一次到上海是在1984年，这次再来，上海变化之大让他非常惊讶，他感到上海确实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每天都会遇到很多很多问题，但还是要看到成绩，这样才有希望，才能感受到人民创造历史的力量。

香港也是一样，取得了不小的成绩。亚洲金融危机给本地区经济造成了巨大冲击，可香港顶住了冲击，经济已经全面复苏。当然，这两年财政有点赤字，但这算不了什么，美国是两年前才消灭赤字的。香港有今天这样的成绩，证明特区政府、特区行政长官、各界人士都干得很好，干得很有水平。这几年出现的禽流感、机场事件、短桩事件等等，与香港取得的成绩相比都是小事，这类事情各国都有。我们应当肯定成绩，对未来充满信心。亚洲金融危机这么大的困难都走过来了，完全可以相信香港人一定能够管好香港。

香港有许多优秀的东西。最近，香港电影《卧虎藏龙》风靡好莱坞，连连得奖，这是中国人的光荣。金庸的小说不断再版，我家里就有两套，一套是我自己买的，另一套是金庸先生送给我的。梁定邦①先生对我说，他带着内地的一个博士生在香港法院看审案, 审了三天。那位博士生对他说，这样的案子在内地半个小时就审完了。我说，内地的法治的确有很多问题，但比过去还是进步多了，想当年“包青天”审案三分钟就开铡了。我讲这个例子，是想说明香港的法治是比较完善的。总之，香港是祖国一颗璀璨的明珠，许多好的东西值得内地学习。

---

① 梁定邦，香港资深大律师，当时任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首席顾问。

我非常重视香港的舆论。在内地的报纸上找不到骂我的文章，香港报纸上这类文章就多了。“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可以针砭自己。批评可以尖锐，这是新闻自由，但最好不要刻薄、谩骂、挖苦。英国首相布莱尔说他每天只看五分钟的报纸，看多了影响信心。去年香港有家报纸说我是“黑手党”的“教父”，我一笑置之。这家报纸说是转引自美国的报道，而美国报纸只是说我不要像教父一样说教，并没说我是“黑手党”。香港应该是稳定第一，团结为重。不要让一些莫名其妙的事情影响香港的稳定。对影响稳定、破坏团结的行为，大家应该口诛笔伐。

我讲得不对的地方，请大家监督、批评。

改善生态环境是中西部地区发展的关键

(2001年4月8日)

2001年4月5日至11日，朱镕基同志在湖南省考察工作，先后考察了张家界、湘西、长沙等地。这是朱镕基同志在听取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负责同志工作汇报后的讲话。

我是1944年至1946年在湘西永绥，也就是现在的花垣念了两年高中。1944年我在新化楚怡高工念高中一年级时，正值第四次湘北会战，长沙沦陷，国立八中到新化招生。被录取后，我从新化出发，步行经过辰溪、泸溪至所里(即现在的吉首市)，然后每天到马路旁去等汽车，“求爷爷，拜奶奶”，总算搭上了过路的便车，一路上提心吊胆，行至矮寨时险些翻了车，经过这么多曲折后，才到了永绥。

这次故地重游，很多东西都记不清楚了，主要是变化太大。如当时的所里只有一条麻石街，我就是站在这条麻石街旁搭乘汽车去永绥的。那时汽车以木炭为燃料，在矮寨那样的陡坡上只要一熄火，是很容易车毁人亡、粉身碎骨的。现在的吉首与过去的所里相比，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到花垣看了也是这种感受，国立八中的老房子——当地的一所孔子庙被烧掉了，小城依旧，但已旧貌换新颜。原国立八中旧址现在是花垣小学，有2000多学生，小学旁的民族中学有1000多学生，这些都是当时无法比拟的。总之，湘西这个令我梦魂牵绕的地方，经济和社会都有可喜的、巨大的发展和变化。但是，生态环境遭到了很大破坏，恐怕一时半会儿还恢复不了。这种人为破坏可能始于1958年的大炼钢铁吧，加上后来人口剧增，为了吃饱饭就毁林造田，现在山上到处都是梯田。所以，我今天要强调的是，湘西(还包括张家界和怀化)发展的关键是要改善生态环境，这是主要和首要的问题；否则，经济是发展不起来的。不从长远考虑，即使得一时之利，有了一时一地的所谓“发展”，那也是不可持续的，那样的行为是短视的，不符合中央的可持续发展战略。

当前湘西地区的最大问题是亟须改善和保护生态环境，这是要集中精力做的工作。要改善生态环境，一项很重要的政策措施就是退耕还林。我们已经商定，湘西、张家界、怀化三个地区退耕还林300万亩，请省里作出规划，中央按有关政策尽力支持，以期尽快改善这三个地区的生态环境。各地要认真领会中央关于退耕还林的有关政策规定，执行好、落实好，并且保证退耕还林的质量，保证树苗的成活率。要把中央退耕还林的政策给老百姓讲清楚。至于中央财政对每亩地给多少补贴，这要根据实际情况来确定，具体政策由省里定。总的要求是要调动农民的积极性。我相信每亩退耕地补偿300斤粮食，是足以补偿山区每亩地的平均产量的。封山育林，退耕还林，使整个湘西地区真正变得山清水秀、草木葱葱，由此带来的发展机会和农民致富的门道就很多了。湘西地区退耕还林后，我相信粮食问题也是可以解决的，生态环境改善后，雨水好，平地的稻田就可以高产。我们不要过分强调都种粮食，粮价上不去，国家赔钱，农民还是不增收。湖南的骄傲是有个袁隆平①，提高粮食产量有潜力可挖，粮食是不成问题的。不要盲目强调粮食自给自足，要教育、引导、帮助农民适应市场需要，市场需要什么就种什么，什么赚钱就种什么，不要再到山上种粮食了。现在的实际情况是农民不缺粮食，缺的是钱，因此，要下大力气调整农业结构。对此，各级领导干部的思想要十分明确。所谓“粮食安全”，更准确的表述应该是食物安全，就是不要破坏耕地。破坏了耕地，粮食就会有危险；只要不破坏耕地，种什么都行，要改变种植结构是很容易的，就不存在“粮食安全”的问题。占用耕地的批准权在国土资源部，各地绝不能随便审批占用耕地，中央没有赋予省区市一级这个权力。各地凡是批准占用耕地建楼堂馆所的，都是不正之风，都是腐败。有些地方私下拿钱买许可证，在地理环境好的耕地上盖宾馆、饭店。这种情况，一定要按政策严肃查处。

---

① 袁隆平，中国杂交水稻育种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



2001年4月9日，朱镕基在湖南省考察溆浦县低庄镇连塘村枣子基地时和镇党委书 记唐逢显(右一)交谈。前排左二为湖南省省长储波。

在搞好退耕还林的同时，要搞好农村能源结构调整，解决农民做饭、烧水等生活用燃料问题。农民只靠烧柴火，就会破坏森林。对这个问题，昨天我们一路上讨论了几个办法：一是城镇如州政府和县政府所在地，完全可以使用液化气。将来高速公路修通了，从岳阳运液化气过来是没有问题的，况且湘西自治州的城市人口只有40多万，这

就更不成问题了。二是看农村是否可以使用蜂窝煤，这要看有没有推广的条件，我不敢主观武断。交通条件发达以后，从外地运煤进来是方便的，每个乡镇搞一个蜂窝煤厂是可以的。而且，烧煤比烧柴要干净、卫生一些，方便一些，农民的生活水平提高以后，不见得不肯花这个钱。三是要发挥小水电的作用。省里有关部门要对湘西地区小水电资源做一些深入的调查研究。大水电一定要搞，这对防洪和发电有双重作用，但大水电的成本太高，还有个生态问题。小水电几十千瓦就可以搞，农民可以贷款集资来搞，还完贷款后用电就不要钱了。我看湘西要因地制宜，重视小水电的发展，而小水电的发展又可以带动机械制造业和建筑业的发展。我觉得，只要有资源而且不破坏资源，这条路子是完全可以走的。四是使用沼气。对使用沼气，原来我有点怀疑，因为我在上海郊区也搞过，也到实地去看过，一到冬天，沼气就不行了。因此，搞沼气还要有电或液化气来做备用才行，冬天没有沼气了，就开备用炉子，上海农民可以搞得起，这里的农民就不一定搞得起了。但据说现在利用沼气的水平提高了，两三头猪的粪便，就可以保证有沼气。解决农民生活用燃料的这些办法和措施，湘西要因地制宜来推广。当然，政府要支持，政府不支持搞不起来。总之，要采取各种方式，通过政策支持，把能源结构调整过来，不去砍树，封山才有效。如果湘西地区能够变得草木葱葱、树木参天，沿途都是青山绿水，那么到凤凰县去旅游的客人就会心情愉悦，去了一次还想去第二次，那旅游业就会有很大发展。现在人们游张家界，按说那里的景色是天然的，非常美，全世界恐怕还找不到第二处，但游客的心情在去的旅途上就给破坏了，途经的城镇破破烂烂，城市建设和管理水平不高。

关于工业发展问题。发展工业一定要贯彻可持续发展战略。我们还是要把生态环境的保护放在首位，工业不要随便搞，这方面的观念要彻底改变。现在已经不是过去那种大办“五小”①工业的时代了。整个加工业供过于求，若没有国家积极的财政政策支持，工业生产早已不能维持，很多大工厂早就关门了。现在大工厂什么都做，乡镇企业萧条得很，有些东西就是生产了也没有人要。因此，绝对不要随便去办“五

小”，包括湘西地区锰矿、锌矿的开发，绝对不要乱来。那样做的结果一是破坏生态和资源，污染环境，破坏自然景观。二是一旦搞起来就是一个包袱，将来拆起来都费劲，工人也没法安置。要搞锰矿、锌矿，就要在资源集中的地方搞，资源蕴藏量没有到一定的程度不能开采。不要去搞“鸡窝矿”，挖得满山遍野都是坑。况且，目前锰、锌都是供过于求。刚才有位同志讲，可以搞深度加工。搞深度加工需要很高的技术，要有规模效益，还要有大量的资金投入，湘西怎么能搞呢？总之，对发展工业要十分小心。但是，如果你们利用农产品的优势，搞一些有地区特色的农产品加工是可以的，不过也要根据市场需求，认真思考特色是什么、优势是什么、究竟适合发展什么。比如，人们现在都讲究卫生，产品一定要符合卫生标准，手工操作的产品人们就不太敢买，那就很难有市场。对发展工业，省里、州里都要严格控制，别花了冤枉钱还破坏环境。我对这个问题真是十分担心啊！我一直反对浮法玻璃厂的重复建设，虽然通过做工作有了一些改观，但前段时间一下子又建起了几十个厂子。很多人都热衷于干这样的傻事，见到有效益的项目，一窝蜂上马，最后大家的产品质量都不行，互相搞垮了。因此，不要随便搞工业。

---

① “五小”，指技术落后、浪费资源、产品质量低劣、污染环境、不符合安全生产条件的小炼油厂、小火电厂、小钢铁厂、小玻璃厂、小水泥厂。

扶贫项目的确定也要十分小心，千万不能扶工业项目，如果搞一个项目背一个包袱，钱就白花了。扶贫要扶到点子上。没有生产条件的地方，村民要搬迁。广西的十万大山地区，庄稼种在石头缝里，一块地几根苗，人是没有办法生活的；宁夏的一些高寒地区，也是没有生存条件的。只能把那里的人迁出来。我说这些的意思是，扶贫不要做傻事，别给自己找麻烦，别花冤枉钱。再一个问题是要加强对扶贫资金的管理，别让扶贫资金落到一些作风不正的人的个人腰包里。要倡导移风易俗。这几天沿途看到好多山上都是馒头包似的坟，上面插个白旗，是招魂纸吧！当然，清明节前后上坟，这是民族习惯，但不好

的民族习惯也要改。改变一些不好的习惯不能搞强迫命令，但党员干部总应该带头吧，不能以尊重民族习俗为借口不做移风易俗的工作。前天晚上，我看吉首电视台的节目，有的干部西装革履去上坟，上坟三鞠躬就行了，却还要烧纸，烧得乌烟瘴气。作为一名党员干部，你究竟是信马克思主义还是信鬼神呢？对这些事，群众的工作是比较难做，但我们作为党员干部不应该来带这样的头，而且还在电视上加以渲染。昨天，我看了海南电视台的节目，有一个村进村只有一条很窄的路，一座坟挡在路上，就是搬不走，进村只能绕过坟墓走，这说明这样的问题发展得已经很严重了。苏、浙、闽一带，这些问题也很严重。我觉得，对这样的问题还是要多做正面工作，倡导移风易俗。不然的话，不仅占用许多土地，而且老百姓做棺材要用好木头，我们苦口婆心讲要封山育林、植树造林，最后种的树被用来做棺材砍伐掉，岂不痛心？



2001年4月7日，朱镕基在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吉首市矮债镇阳孟村与农民杨再保交谈时开怀大笑。

最后讲一讲干部作风，特别是领导干部的作风问题。在新形势、新情况下，我们的干部如何驾驭市场经济，如何带领群众前进？我多次讲过政府职能转变的问题。我们的政府不是过去计划经济条件下的政府，政府职能要过渡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轨道上去，因此，政府的职能不能和企业合在一起，党的职能也不能跟政府完全混在一起，更不能跟企业混在一起。我看今天参加会议人员的名单，湖南湘泉集团党

委书记、董事长由一位湘西自治州州委常委兼任。你是董事长又是州委常委，有谁敢管你的企业，谁管得了你？我绝对不相信这个国有企业能办得好，因为企业领导人的权力没有约束，没有人能管他。总不能要州委书记一天到晚去管一个企业的董事长啊。还有一个问题，我们领导干部的作风应当是实事求是的，要根据党的政策和实际情况来办事，不能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想说什么就说什么，那是不行的，那样就不能贯彻好中央的政策，就会走弯路。昨天我见到的有个镇的女书记，我看她是一位“拳打脚踢”型的干部，干劲很足，应该说是一个优秀干部。今天汇报工作的一位县长，也是“拳打脚踢”型的干部，有雄心壮志，豪言壮语一串串。这些在“大跃进”年代可能很管用，但现在不行了。现在是市场经济，讲究的是科学决策，讲究的是政企分开，不能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要按照经济规律办事，实事求是，脚踏实地做工作。我不是批评这两位同志，没有他们这样的干部，基层工作打不开局面；但要注意提高自己的思想和政策水平，适应新形势的要求，学习市场经济知识，学习政策法规，明了政府职能，这样自己的工作才能做好。

最后我说明一点，我是湖南人，在湖南讲话就不太注意委婉；又因为我的年龄比你们大，有点教训的口吻，倚老卖老，讲得对不对就不一定。但我的心是好的，我希望湘西地区能够富裕，希望湖南能够繁荣，希望湖南人民特别是湘西少数民族地区人民的生活得到改善，消灭个别农民极度贫困的情况。有些情况我们看了心酸啊！大家要脚踏实地，深入基层，为农民群众解决困难办实事。我们政府有能力解决农民的温饱问题，我们完全可以做得到，关键是看同志们的工作。因此，我提了这样一些要求和希望，希望同志们理解我的心情。我是鼓励你们，你们的工作做得很好，希望你们做得更好。

湖南要优先安排治山治水

(2001年4月11日)

这是朱镕基同志在湖南省考察工作期间，听取省委、省政府工作汇报后的讲话。

1998年、1999年，我到湖南来主要是指导洞庭湖区的抗洪工作，这次来到湘西地区看了一下。57年前，我曾经在新化、花垣念高中，这次去看觉得变化很大，有的地方已经认不出来了，看起来人们的生活还是不错的。像吉首原来只有一条麻石街，现在是一个很大的城市，吉首大学建得非常好。我当年念清华大学的时候，学校只有2000多人。那个时候清华大学的礼堂、图书馆都是美国人用“庚子赔款”建设的，每一块砖都是从美国运来的。现在吉首大学的礼堂、图书馆，比我念书时候清华大学的礼堂和图书馆要大得多，有1万多学生，真是翻天覆地的变化啊！虽然湘西地区的农民还没有完全脱贫，甚至有的人连温饱问题还没有解决，但总体看来，农民的生活水平有很大的提高。昨天，我们开了个座谈会，我感到湖南省的工作不错，用三句话进行了概括：“方向对头，工作努力，成绩很大”。确实实现了大多数国有大中型骨干企业基本脱困的目标。湖南省从去年六七月份以来，也做到了“两个确保”①。这些都是不容易的。所以，我认为湖南省委、省政府的工作，从总体说起来，成绩是很大的，应该充分肯定，事实俱在，这是不容怀疑的。但是存在的问题也确实不少，需要我们团结一致，统一认识，认真负责地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去解决，当然，有的问题也正在解决之中，下一步要抓得更实一点。我着重讲讲湖南的工作重点即改善生态环境问题。就是两个字，一个是“水”，另一个是“山”。水就是“一湖四水”：洞庭湖，加上湘水、资水、沅水、澧水，现在还没有变害为利，或者说利还不大，害还很多。这个问题不解决，湖南的经济无法发展，湖南人民的生活无法改善，社会无法稳定。山就是“三山五岭”，大概湘南地区就属于五岭山脉吧。湘西地区属于武陵山区，怀化属于雪峰山区，还有一个罗霄山区，大体可以叫“三山”。“五岭”不

是指全国的五岭都在湖南，而是指五岭山脉的一支在湖南。要搞好湖南的工作，首要的是要治山治水。我在1998年、1999年到洞庭湖区视察抗洪工作，在此以前也去过洞庭湖，感到那里的生态环境确实恶化得很厉害，洞庭湖的面积大大缩小了，防洪、蓄洪能力很弱。党中央、国务院为此制定了治理洞庭湖的方针，具体规划也正在一步一步实行中。要进一步抓紧实施，特别是对湘、资、沅、澧四水，要配合进行治理，防洪整治要跟洞庭湖的治理相配套。这个工程不是一个五年计划可以完成的，也许不是一代人能够完成的，但是一定要锲而不舍地做下去。

---

① 参见本卷《在二〇〇〇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关于山，这次我到湘西地区的三个市州去看了，感觉变化很大，各方面我都很满意，唯独山林破坏得实在太厉害了，跟我在五十七八年前看到的完全不一样，基本上是把树砍光了。我以前只在四川看到过“大字报”田，在那么陡的山上面开垦了田，还不是梯田，就那么在坡上种下庄稼，就像“文化大革命”时的“大字报”。原来我以为湖南的山上没有“大字报”田，现在湘西也有了，不过更多的还是梯田。因为人那么多，没有饭吃，田就一直开垦到山上，这样就把生态环境破坏了。幸亏湖南的气候好，还能够长点草，还有点植被；不然的话，水土流失，那“一湖四水”就真会泛滥成灾，人都没法活下去。因此，我感到湖南保护和治理生态环境的工作，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时候了！



2001年4月7日，朱镕基在湖南省花垣县麻栗场镇考察尖岩山万亩农业综合开发区时和镇党委书记龙翠兰交谈。左二为农业部副部长刘坚，左三为湖南省委书记杨正午，左四为国务院专题办副主任陈耀先，左五为湖南省省长储波，左六为国家计委副主任王春正，右三为中财办副主任段应碧，右五为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史纪良，右七为湘西州委书记 彭对喜。

我们要下很大的力气，作为工作重点，优先来安排治山治水。治水已有规划，现在就是要加速进行；治山还需要更好地规划和落实，当然，治山也包括治水。不解决这个根本问题，湖南好不了。保护生态环境，首先是要停止破坏生态环境’这一点我觉得湖南省委、省政府要下最大的决心，犹犹豫豫不行，畏畏缩缩不行，要断然处置。林木不

能乱砍，水不能污染，环境不能破坏。我们实施的是可持续发展战略，破坏生态环境的事情不能再继续搞下去了！我来湖南的时候，收到一位群众的来信，反映在安化廖家坪水库，一些采金的人在库区内乱炼黄金，水库污染日趋严重，当地政府却视而不见。我把这封信批给杨正午①和储波①同志了。对类似这些破坏生态环境的行为，一定得严肃处理。这次我在湘西也讲了，不管锰矿也好，还是其他什么矿也好，都不能乱开采，现在是要关“五小”。如果要建现代化的冶炼厂、现代化的矿山，那得有集中的资源，那种“鸡窝矿”不能再开，这样才有可能达到国际水平，否则搞什么工业化？搞什么现代化？ 一定要采取严厉的措施，立即停止破坏生态环境的行为。我们在花垣的时候，看到有一块很好的田，可惜那上面正在盖房子，后来听说是在盖一个变电站。变电站是需要盖的，改造农电线路，为农民送电、降低电价，但为什么一定要占那块好田呢？田都种到山上去了，沟底平坦的地方好不容易有那么一块好田，却占用来盖房子，这是为什么？何况审批手续都没有办，这是不对的，对有关责任人该处分的要处分，该罚款的要罚款。

---

① 杨正午，当时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储波，当时任湖南省省长。

所以，首先要停止破坏生态环境，然后才是退耕还林。我支持湘西地区的三个市、州能够退耕还林的地方都退耕还林。粮食不用发愁，不要求他们自给自足，这三个地方的高速公路都快通了，可以运粮进去。不强调粮食自给，就是要恢复秀美的山川。退耕还林的速度，要根据各市州县的实际情况，实事求是、扎扎实实地搞，不要一哄而起，不要搞强迫命令。如果准备不够充分，比如说树苗的准备来不及，就不要搞得太快，速度应该和准备情况相适应。又比如种什么树种，事先要好好研究，这些都需要时间。

退耕还林要与农村能源结构的调整相配套，否则即使林造起来了，还会被砍掉。所以，我在湘西说了这样一句话：不要宣传“一年辛苦，八年阳春”的口号，不要形成一年退耕，以后八年粮食国家给的印象。退耕还林的政策，是要求农民退耕以后，八年内政府无偿给农民粮

食，农民无偿种八年树，把荒山绿化起来。但同时要强调，不能因为政府无偿补贴了粮食，就叫农民去干无偿修路这类事情，因为补偿粮食是为了退耕还林，只能叫农民种树，不能要农民增加义务工。同时，要调整能源结构，要用多种办法来解决农民的生活用燃料问题，不能老烧柴。

以上是讲治理湖南的山，下面再讲治水。洞庭湖治理的步伐要加快。有人向我反映，现在退田还湖的进度太慢了，农民的积极性还不是很高，主要是国家补助的钱太少，每户1.5万元吧，省里加2000元。有人提出来如果每户有3万元的话，那搬迁的速度就可以加快，湖区面积扩大的速度也就可以加快了。请你们做些调查，看能不能增加一些财政拨款(包括中央财政拨款)，加上一点银行贷款，因为湖区发展后，农民还是有一定的还贷能力的。我希望把退田还湖这项工作不停顿地搞下去，一抓到底。你们在湖南做官，如果不治理洞庭湖，那是失职啊！

算是有感而发吧，我在湘西时做了一首诗——《重访湘西有感并怀洞庭湖区》。今天我在这里说一说，以表达我的心情，也是我的希望。诗是这样写的："湘西一梦六十年，故地依稀别有天。吉首学中多俊彦，张家界顶聚神仙。熙熙新市人兴旺，濯濯童山意怏然。浩浩汤汤何日现？葱茏不见梦难圆。"这是说我当年怀着美好的憧憬来到湘西，1943年在新化，1944年到花垣(当时叫永绥)，是57年以前，四舍五入算是60年吧。在脑海中，过去我曾经生活过的地方如今什么都看不出来了，什么都变了，模模糊糊了。到了原来的国立八中，那个地方也认不出来了，原来的房子都烧掉了，现在那里盖了小学；城墙也没有了，都盖了房子。记得岳麓书院有一副对联："惟楚有材，於斯为盛。"这是说湖南有人才啊，借用其意吧，我说吉首有人才啊。教育发达，吉首大学有1万多学生，办吉首大学是杨正午同志在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当州委书记的时候办的一件大好事。张家界的风光有如仙境啊，但可惜现在人太多了，每到一个城市都是人山人海。特别是在新化火车站，那个广场并不小，可人把广场都塞满了，所以说人丁兴旺啊。你看如今那些山呀，像幼童的脑袋，光秃秃的，看到把树砍得那

么光，我心里确实难受啊！北宋文学家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描述洞庭湖“浩浩汤汤，横无际涯”，这种景观什么时候才能重现呢？这是我的愿望，我寄希望于在座的各位啊！湘西地区退耕还林还草，改善和保护生态环境，恢复原来的青山绿水，这是我的美好憧憬和梦想啊，希望同志们努力。我想，要治理湖南也就是要治山治水，“一湖四水”、“三山五岭”，把山和水的文章做好了，湖南就真正有希望了。

重访湘西有感 并怀洞庭湖区

湘西一梦六十年
故地依稀别有天
吉首学中多俊彦
张家界顶影神仙
熙熙新市人民旺
濯濯童山意快然
浩浩汤汤何日现
葱茏不见梦难圆

朱镕基 辛巳春三月

教师是教育的根本推动力

(2001年4月27日)

这是朱镕基同志在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国际顾问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的讲话。

在生机盎然的春天，大家来到绿草茵茵的清华园，共同庆祝清华大学成立90周年，并为如何办好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献计献策， 我表示衷心的感谢！

自从上次国际顾问委员会会议召开到现在，半年的时间已经过去，我们建设一流经管学院的步伐也在各位支持下取得了一定进展。清华大学同美国哈佛大学联合举办的高层经理人员培训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教师水平得到提高，学员反映收获很大，管理上积累了经验，我们也增进了相互了解与共识。这对清华大学经管学院是一个重要的进步，也是我们国际顾问委员会各位同仁共同努力的成果。我和大家一样，为此感到由衷的高兴。特别要感谢在座诸位的直接推动。

在过去的半年中，国际顾问委员会为如何从根本上提高清华大学经管学院的教学水平，做了大量的工作，提出了很好的建议和意见。刚才大家的讨论，为清华大学经管学院描绘了一个很好的蓝图并提出了实现的措施，令人振奋，让我们充满了美好的憧憬。

下面，我就如何建设好清华大学经管学院提出我的想法，供大家参考。

办好这个学院，核心的问题是师资。“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①教师是教育的根本推动力，他们不仅向学生传授知识、技能，提高学生的全面素质，而且也是新的科学技术、新的管理思想的重要发现者、发明者。教师水平是衡量大学水平的最重要指标。清华大学经管学院有一流的学生，基础设施也正在改进，现在提高教学水平的根本就是要提高师资水平。

① 见唐代韩愈《师说》。

提高师资水平，具体地说，一要引进，二要培养。引进，就是要求大胆地、有突破性地吸引国际一流的师资来我们这里任教，我们要尽可能地为他们提供良好的生活条件和研究、教学环境。我们要依靠这些高水平的教授，迅速提高清华大学经管学院的教学和研究水平，同时带动一大批中青年教师好好成长。我们的办学经验表明，一个学科的建设及其人才培养，必须有一位或几位担纲领衔的教授做旗手。清华大学经管学院正在大力推动的讲席教授制度，着眼点就在于此。培养，是更具长远性的措施，特别是培养我们的年轻教师和未来可能做教师的学生。要把我们的年轻人送到国际一流的管理学院去学习，因为“最好的学习方法就是跟最好的人学”。要让我们的年轻人尽早地进入国际学术界的主流，具备同大师对话、交流的能力。这与闭门造车是根本不同的，是建设师资队伍的长远考虑。

当然，要能够吸引大师级的教授加盟，还需要我们进行很大的努力。过去，清华大学经管学院在吸引优秀师资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但是还要继续加大力度，把国际顾问委员会的意见、建议落到实处。除了提高物质待遇外，还应该提供良好的教学、研究环境，给予明确的责任和权利，使我们聘来的教授能够在其事业生涯中有新的、更大的成就。我相信，清华大学经管学院在这方面一定会进一步加强的。



2001年4月27日，朱镕基出席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国际顾问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并讲话。右为高盛集团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亨利·保尔森。

建设好一所高水平的经管学院，能够为我们国家、为人类的繁荣作出巨大贡献，是我的一大宏愿。聆听各位同仁的精辟见解，使我受益匪浅，我对建设好这个学院更加具有信心。感谢各位的光临，并祝愿大家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春天播下美好的种子。

在张维庆同志来信上的批语

(2001年5月28日)

朱镕基同志在一次会议上对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的工作提出了批评。为此，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张维庆于2001年5月10日致信朱镕基同志，表示诚恳接受批评。这是朱镕基同志在张维庆同志来信上的批语。

维庆同志：

我身为总理，实不相称，平生缺失，点滴自知。上次会上失态，并非对您，实为有感而发，然大失分寸，至今歉疚在心。知我谅我，希勿挂怀。自当引以为戒。

朱镕基

5.28

维东同志：我身为总理，实不相称，平生缺失，具有自知。上次会上失态，并非对您，实为有感而发，然大失分寸，至今耿耿在心。知我谅我，希勿挂怀。自当引以为戒。朱镕基 5.28

敬爱的朱总理：

近好！作为本届政府的阁员，第一次这样称呼您，第一次接受您的批评并诚恳检讨，也是第一次提笔写信，向总理说心理的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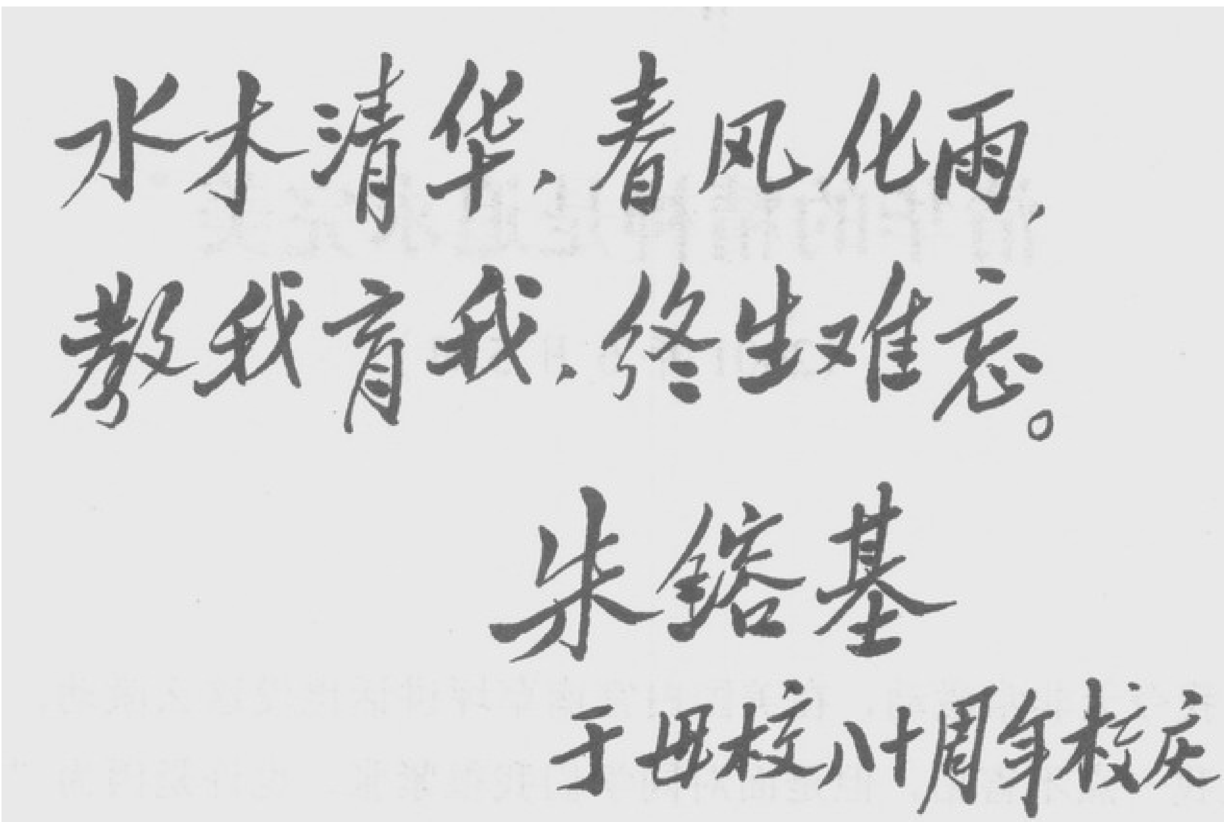
总理的人格、才华、气质，精明、博学、胆识，廉洁、勤政、直言、

清华的精神是追求完美

(2001年6月5日)

2001年6月5日，朱镕基同志应邀在清华大学作报告。这是报告的一部分。

我今天非常激动，在美国白宫南草坪讲话也没这么激动，对外国人我一点不害怕，但是面对同学们我很紧张，也许是因为“后生可畏”吧！



图为朱镕基于1991年清华大学八十周年校庆时的题词。

校长、校党委书记要求我跟同学们讲几句话。我希望我的讲话对同学们有些好处，毕竟这是我的经验之谈，但是不是真的有好处，请你们评论。我讲得对的，你们觉得有道理的，可以研究、可以讨论；觉得我讲得不对的，请你们原谅我，因为我一天要看的文件、要开的会、要讲的话实在太多了，要求我百分之一百不“走火”，实在太难了。

1984年清华大学成立经济管理学院的时候，刘达①同志让我来当这个院长。我那时担任国家经委的党组副书记、常务副主任。当时我也不知深浅，实际上我没有学过经济管理，但对经济管理很感兴趣，就答应来当了。我越当就越感到自己不足、不够格，同时，自己工作也很忙，对于经济管理学院确实没有做很多事情，感到很惭愧。我几次提出来，说我不能当了，但是他们老是说服我："还是很起作用的"。最近，我又向王大中②同志、贺美英②同志谈这件事，说我无论如何不能再当院长了。他们考虑后终于同意我辞去经管学院院长的职务，但是他们要求我担任荣誉院长，我觉得这个也不能当。好多外国的大学要送我一个博士头衔，或者让我去领什么奖，我从来都拒绝。我要得到博士学位，一定要凭我自己的本事念出来，没有念出来也不要他们送来。所以，这个荣誉院长我不能当。后来他们说，你是不是可以当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的荣誉主席呀？这个我倒可以答应。因为荣誉主席的自由度很大，一点不会影响顾问委员会的工作和操作。

---

① 刘达，曾任清华大学党委书记兼校长。

② 王大中，当时任清华大学校长。贺美英，当时任清华大学党委书记。

说句老实话，同学们，这样我以后就不来了，我是"荣誉的"，但是请你们放心，我的心始终留在清华大学，留在经管学院。我今天来辞去这个院长，请同学们见证，我没有离开清华，我的心还在清华。清华大学和清华经管学院的每一点成就，我都会引以自豪；你们存在的每一个问题，我都会关心；你们如果有一点缺点，我也会毫不客气地提出，因为我是清华人。

我在十年前清华校庆时写了四句话："水木清华，春风化雨，教我育我，终生难忘。"清华给我太多了，我为清华做得太少了。我衷心地希望清华越办越好，办成世界一流的大学，我们每一个同学不愧为世界第一流大学的学生，这就是我的心愿。我相信，在座的同学们都已经立定志向，要把清华建成一个世界第一流的大学，把经管学院办成世

界第一流的经管学院，来服务于祖国，使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一流的强国。

下面讲讲我对同学们的希望。

昨天晚上，我没有睡好觉，一直在想应该讲些什么内容。我在九年前为祝贺清华大学电机系成立60周年写过一篇文章，叫做《为学与为人》①，是当时同学们让我写的。这篇文章写的是章名涛先生。我在清华念书时，他是电机系主任，他在1950年的一次集会上，讲为学与为人这个问题。我就用这个题目写了一篇纪念文章。章名涛先生已经过世多年了。他说，为学与为人，为人比为学重要。为学再好，为人不好，也可能成为害群之马；为人，就是要做一个有骨气的中国人。我始终记得“要做一个有骨气的中国人”这句话。清华并不是一个只注意为学的地方，它确实是在教育我们怎么做人。

---

① 《为学与为人》，见本书第一卷。

我回忆自己在清华的成长，清华教我育我并不只是为学，还在于教育我怎么做人。清华有非常好的传统，民主的传统、科学的传统、革命的传统。我记得从湖南来清华的时候，碰到许多很新的东西。当时，我最崇拜闻一多先生、朱自清先生。我虽然学的是电机，但是我最喜欢听朱自清先生的讲话。我现在还很生动地记得他在同方部一个集会上的讲话，他会写文章，不善于言辞，但他讲话很诚恳、很感动人，我敬佩他的为人。我也敬佩吴晗先生、张奚若先生。我记得北京解放以前我们最喜欢到张奚若先生家里去，很多同学坐在地上，听张先生纵论天下形势，大骂国民党反动派，痛快之至。当时，我就在进步同学的影响下参加一些学生运动，做一些工作。特别是北京解放以后，我在清华当班会主席、当学生会主席。我印象最深的是，我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知识都是在那个时期学习的，看了很多书，打下了基本理论的基础。所以说，清华这个地方不是一个专门为学的地方，也是教你如何做人的地方。

为学，我坦率地说，我学得并不是很好，当然社会工作对我有一定的影响，但另一方面，我本性也不是很喜欢工学。我英文比较好，我喜欢外国文学、中国文学，曾经一度想改外文系，没改成。当时，我净看文学方面的书。到图书馆去，本来应该看电机工程的书，但我老想去看曹禺的剧本。我是到清华之后看到他的剧本，才知道曹禺本名万家宝，也是清华大学毕业的。

清华给人们一种传统，使你总是要向上。对学习很好的同学，我就很羡慕他们。有一次，我跟张凤祥同学(他后来当过水利电力部副部长)说，我从小学到中学一直是第一名，为什么到清华来以后就觉得我学习起来比那些学得好的同学要困难？他的一句话，到现在快半个世纪了，我还记得清清楚楚。他说，到清华来的我们班上这些人，在中学的时候有哪个不是第一名啊。可见清华竞争是很激烈的，确实有很多出类拔萃的人才。像我们电机系这一个班就出了三个院士。我 不是学得好的，但是我也没有布什总统的那种幽默。小布什不是耶鲁大学毕业的吗？他到耶鲁大学发表讲话，他说："我对那些学习好的同学表示祝贺，学习不好的同学也不要着急，学习不好也可以当总统。切尼副总统也是耶鲁毕业的，但他只念了一半，因此他只能当副总统。"我今天绝不是跑到这里来说我学习并不好，但我也能当总理，我没有这个幽默感。我的意思就是说，为人比为学还要重要。



1994年3月30日，朱镕基出席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建院十周年庆祝大会。正面第二排右一为国家教委副主任张孝文，右二为清华大学校长王大中，第三排中为清华经管学院副院长赵纯均。

大家都想一想清华的精神是什么。你可以做很多解释，民主的传统、科学的传统、德先生、赛先生、革命的传统等，你怎么解释都可以，每个人有不同的解释。我有一个解释，也就是我的体会：追求完美。在清华这个环境里，使你感到人才济济。每个人都肩负着建设祖国的任务，这是历史的使命，在这里学习就感到自己要追求完美，要做到最好。

做人要做有骨气的中国人，要做顶天立地的中国人；治学要扎实、严谨，绝不沽名钓誉，更不要说剽窃他人的成果，根本不屑这种行为；做事要扎扎实实，真正地为人民。一个人不可能没有缺点，但要力求自己做到廉洁公正，不要留骂名。

我想，就是清华这种精神鼓舞着我。尽管我被错划成“右派”，20年没有党籍，但是我从来没有失掉共产主义的信念，我从来没有对自己的工作和学习有半点的放松，我总是不断地要求自己，不辜负清华老师、清华大学和党组织对我的教育，我总是要做到无愧于心, 这是我最大的愿望。

我也用这一点来要求我的儿女。我的女儿是1954年出生的，儿子是1958年出生的。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他们承受了很大的压力，我自己想到这个事情心里就很难受，但是我对他们的要求始终是很严格的。我记得很清楚，我的儿子还只有十来岁的时候，他要在我们阳台上种菜，有一天，就捡了一块破破烂烂的油毡子放在阳台上，准备搁了土就可以种菜了。我一看见就跟他说，我们再穷也不能拿别人的东西，随手就打了他一个耳光。这是我生平第一次打他，也是最后一次打他。他跟我讲，他没有拿别人的东西，这块破油毡子是从垃圾堆里捡回来的。我当时很后悔打了他，但是也许是因为有点父亲的架子放不下来，我说：“那好，我不应该打你，但是我们要把这块油毡子送回去，不管它是别人的还是垃圾堆里的。”我就陪着他，把这块油毡子扔回垃圾堆上。想起这件事，我心里就很难过。不过我很高兴，他们虽然没有到清华来读书，但是继承了清华的精神。我的女儿和儿子都曾经在国外读书，他们读书的时候，我已经做了上海市市长、副 总理，但是从来没有一个外国人知道他们的爸爸是中国的市长、副总理。他们都是靠自己洗盘子、在学校劳动来求学，现在都学成回来了。我今天讲的也是一些感悟，讲得不是很系统。但是，我衷心地希望大家，在清华不但要为学，而且要学做人，学做事，要追求完美，一定要做到最好。你们一定要树立这个目标。我们要建立第一流的大学，中国成为世界第一流的强国，根本的就是靠科学和教育，教育是科学的基

础。你们完全可以做到这一点。将来在你们中间，不知道要出多少个院士，希望大家努力。

对于清华经管学院，我唯一的希望就是能够跟世界上最好的经管学院比，不管是哈佛或者是麻省理工学院或者是哪个国家的商学院，都能够跟它们比。要比就要有一个条件，就是要重视师资队伍的建设，一定要有第一流的师资，不惜重金到外面去聘请，哪怕只是讲学也要请来。过去清华校长梅贻琦先生讲过一句话："大学者，非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就是说，一个大学并不是因为有大楼才叫大学，是因为有大师，有国学大师、有科学大师、有管理大师，这才叫大学，才叫一流大学。我希望经管学院今后在师资队伍的建设方面要下很大的工夫。

我还提出一个问题，就是希望经管学院今后全部改用英语教学。我绝对不是崇洋媚外，因为现在经济在全球化，你不能跟外国人交流，又怎么能融人全球的经济呢？我们的经济发展就是靠改革开放，不会英语是绝对不行的，特别是管理。我没有到外国去学习过，但是我很得益于当时清华的教学课本，大多是英文的。只有一本《普通物理》，萨本栋先生写的《普通物理》，是一本中文书，其他全是英文书。教授有些是半英半中，教热力学的庄前鼎先生是无锡人，他说："我讲无锡话反正你们也听不懂，因此我讲英文了，对不起。"所以，英语教学是很重要的。如果现在师资的英语水平还达不到的话可以去学，给你一年两年的培训期，到外国去实习一下，不是太难的。所以我开的这两次顾问委员会会议，因为有外国人参加，我们就坚持一律用英语。搞经济管理不能用英语跟外国人讲话，就很难融入世界经济浪潮里。是不是大学其他系都要这样？那不一定，因为好多学工程的能看懂英文就行，不一定非要能说英语，但学经济管理的要做到这一点。

在我告别清华经管学院时一还没有完全告别，还留了一个顾问委员会的荣誉主席，谨对清华大学和经管学院表示我最良好的祝愿，希望你们在座的后生都能够超过我。

关于四川三个少数民族自治州的经济发展问题

(2001年6月11日)

2001年6月8日至12日，朱镕基同志在四川省考察工作，先后考察了雅安、甘孜、成都等地。这是朱镕基同志在听取省委、省政府工作汇报后的讲话。

这次到四川来，第一个目的是来还愿的。原来我答应三个少数民族自治州都要去一下，1996年去了凉山，1999年去了阿坝，这次去了甘孜。同时也考虑到最近中央要召开西藏工作会议，会议结束后，青藏铁路将宣布开工。这条铁路对西藏的发展有很重要的作用。我们一定要把这条铁路修成世界第一，因为这条铁路是修在高原冻土上，在世界上没有先例。铁路修通后，以客运为主，可以让世界各国的人们到西藏去看一看，看看西藏的真实情况。青藏铁路在政治上、经济上都有很重要的意义，对西藏人民的意义也很大。我想借此机会，首先到四川的藏族地区看一看，希望能够帮助解决一些问题。

第二个目的是看一看退耕还林在四川的成果。应该说，退耕还林这个政策的形成，最早还是四川给我的启发。1998年长江流域及嫩江、松花江流域遭遇特大洪水后，我在北戴河向中央政治局汇报，提出了一个32字的工作思路，主要是退耕还湖。后来，谢世杰①、张中伟①同志来找我，说粮食现在比较多，能不能用以粮代赈的办法让农民少种地、多造林。所以，应该说我是受到这个启发后，到全国各地特别是西部几省区去调研，1999年在延安才形成了16字的工作思路，正式提出退耕还林。1999年时，谢世杰同志给我提出四川省要退耕还林300万亩，我表示同意了。我们所有的工作，都是从各个地方的领导包括群众那里得到营养，然后向中央提出思路，由中央来决策。现在，这项工作的意义已经看得越来越清楚、越来越大了。去年遭受了那么严重的旱灾，粮食减产900多亿斤，今年也是旱灾。但现在看起来，并没有改变粮食供过于求的状况，粮食价格并没有上升。所以说，这是一个历史的机遇，是天赐良机，或者说是千载难逢的良机，使我们能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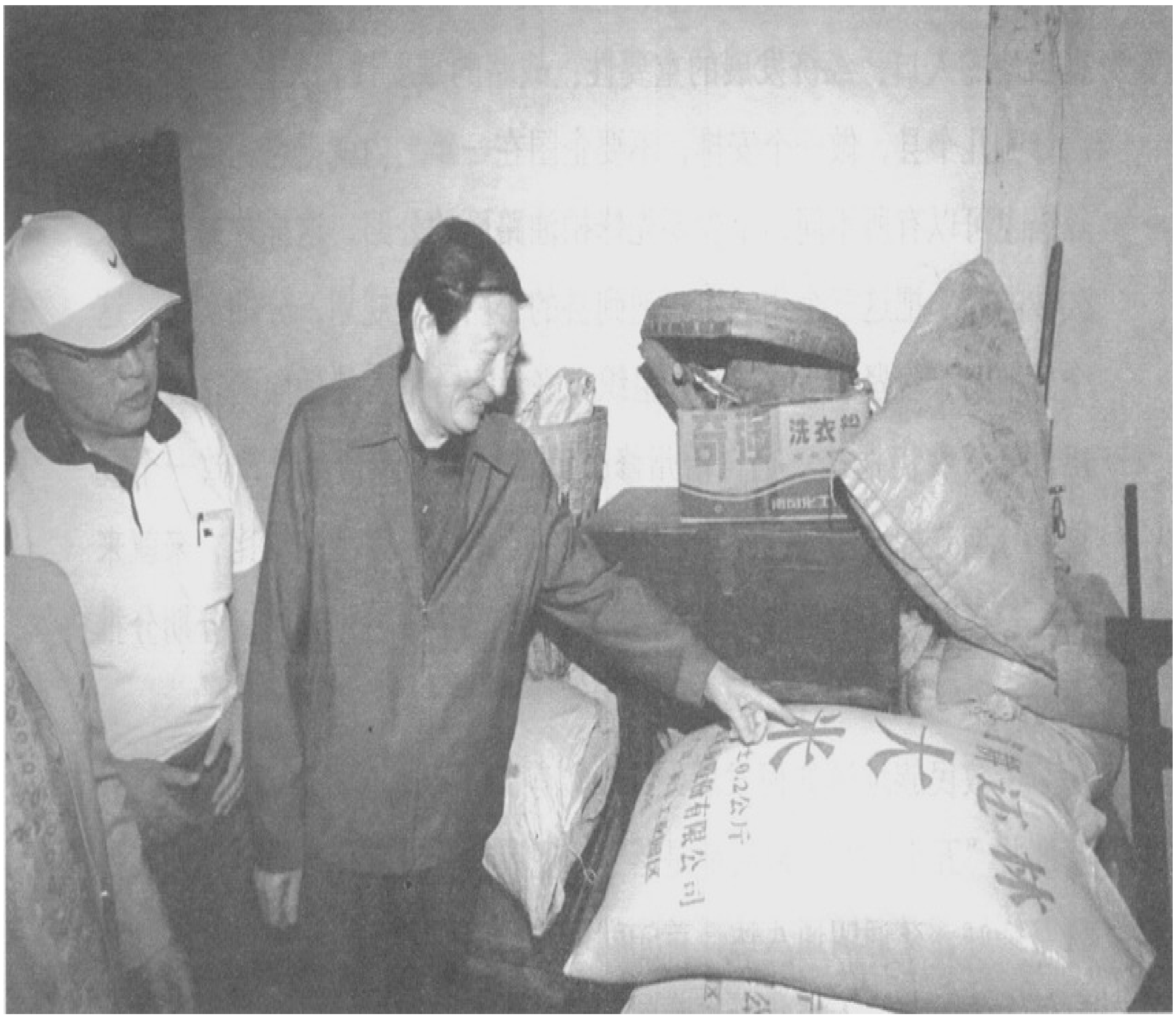
缓一口气，弥补一下我们过去对大自然造成的损失。过去我们对可持续发展战略没有重视，对大自然进行了破坏，破 坏了它自我修复的能力，因此造成今天生态环境的恶化。比如在北京就有这样的顺口溜："北京人真苦，每天一两土，白天吃不够，晚上还得补。"这就是大自然对我们的惩罚。现在我们可以来弥补，这个弥补需要几代人的努力，我们现在就应当开始。

---

① 谢世杰，1993年3月至1999年12月任中共四川省委书记。张中伟，当时任四川省省长。

我们这次来，也可以说是一次工作考察。看了一些地区，看到的成绩是很大的，群众的反映是很好的，但是也不要自满。我们还是看到，羊还在退耕还林的山上跑，还没有圈起来。花这么大的代价搞退耕还林，给粮食、给树苗、给补助，但房子还是盖在山顶或半山腰，说明还是没有封山嘛。好多工作还没有做到家，不要自满。在天全县，那个县委书记是个女同志，很能干。她是把羊圈起来了，但圈在河边。她说这是"发羊财"，养羊能够增加收入。我说，你怎么能把羊圈在河旁边养呢？你"发羊财"，那下游的人就要"喝羊尿"了。羊的屎尿都排到河里面去了，造成了污染。退耕还林还有很多工作要做，比方说，每亩地补助300斤粮食后，有文件明确规定农民还是要交农业税。你们现在为了减轻农民负担，农业税就不收了。如果你们不想办法给财政补助的话，那困难就会更大。同时我们也要看到，一亩地补了300斤粮食固然不算多，但这个粮食是免费的。过去种地，也许收获300斤甚至400斤粮食，但那是要付出很大代价的，需要种子、化肥、劳力。现在一袋袋退耕还林大米，直接给扛到农户家里来了，过去不少地方根本没有办法吃上大米。我们在康定看到粮袋子上都印着"退耕还林大米"几个大字，这是四川一个很好的经验。当地人还说，有了这种袋子运大米，高速公路就不收费，说明大家都很支持这个政策。大家现在都要求扩大退耕还林的规模，要求增加指标。增加指标就是增加粮食，而且是免费的粮食。我希望把增加的指标尽可能地用来照顾三个少数民族自治州，因为它们是黄河、长江的源头啊！它们这些地方生

态环境的改善，对全国的影响是很大的。国家给一亩地补助300斤粮食，不是只补给一年，我们答应的是给八年，到时还可以考虑延长。如果那时农民收入很高，粮食又便宜，要不要补助粮都无所谓了。所以，我们要精心养护，保证成林，我想这个要求不算过分。这方面的政策还需要发展、完善，要严格要求，讲求质量，这方面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2001年6月8日，朱镕基在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康定县雅拉乡新兴村一藏民家中查看国家补助的退耕还林大米。左为财政部部长项怀诚。

我们带着这两个目的来，看了以后感到收获很大，受到很大启发。刚才省委、省政府提出的要求，我们也应该帮助解决一些问题，首先是解决三个少数民族自治州的问题。可以从三个方面来解决这些问题。

第一，扩大退耕还林的规模。 刚才王春正①同志已经作了答复，增加100万亩指标，我完全同意。

---

① 王春正，当时任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副主任。

第二，加强基础设施建设。 首先是交通问题，还有其他所有基础设施建设项目问题。我们对西部大开发有一条最重要的政策，就是尽可能地用国家资金，也就是用国债，加上银行贷款来安排，地方不出，或者少出配套资金。现在有人总说没有看到西部大开发的优惠政策，这就是最大的优惠政策。考虑到西部地区财政困难和人民负担比较重，用国债安排项目时就有这条政策。川藏公路①、南充至广安、雅安至攀枝花高速公路共三个项目，都按我刚才讲的原则来办，通通用国债资金加银行贷款解决。这是对少数民族地区和老区的照顾，也是西部大开发最大的一条优惠政策。

---

① 川藏公路，由四川成都到西藏拉萨。北线全长2412公里，1954年正式通车南线全长2149公里，1958年正式通车。

关于公路，我再加一条。这三个少数民族自治州首府到所属县里的公路，比方说甘孜州从康定到18个县的公路，从现在开始纳入国家计划，由国家资助来修这些路。江泽民同志在1991年来四川时就讲：“稳藏必先安康”。“康”就是指西康，也就是现在的三个少数民族自治州。我再加一句：“安康必先通康”。交通不方便，是不可能发展经济和改善人民生活的。这些公路当然与前面讲的国道是不一样的，我们在康定与州政府商量时说，国家尽可能资助，但第一占地不要收钱，第二地方政府不要敲竹杠，第三需要的劳务不要钱。至于对劳动力如何补偿，由自治州政府来考虑。总之，修这些公路由中央财政来安排资

金，但是你们要认真地配合。这三个自治州加起来有48个县，可能有些县已经通公路了。修公路可以分期分批地来安排，根据当地的人口、经济发展的重要性、战略的重要性，先修哪几个县，后修哪几个县，做一个安排，不要企图在一年之内就把它完成。路面等级也可以有所不同，至少要先修柏油路面的公路，这样才是一条永久性的路。把这三个州的由州通到县的公路列入规划，分期实施。这个事情由张春贤①同志回去组织人来考察一下，然后向国家计委提出计划。我们把这三个自治州修公路的钱纳入国债项目，做一个规划，分期分批地实现。我想别的省区的自治州一定会来攀比，来就来吧，一视同仁，但是要有先有后，先从这三个自治州开始，分期分批安排。

---

① 张春贤，当时任交通部副部长。

少数民族地区如何发展经济？以前走了很多弯路，花了很多钱，搞那些“五小”，最后都是落下一屁股债，没有什么效益。如果把公路修好，交通四通八达，首先就可以发展旅游业。我们这次到甘孜有很大的收获，不虚此行，看到了祖国美丽的河山。还有很多地方我没去，随行的年轻人利用午休时间跑到海拔4300米的地方去探险，去看风景。海螺沟我还没去呢，等你们把这些公路和康定机场修好以后，我再来。我认为，这是支援少数民族地区最好的办法。先帮它们把基础设施搞好，再配套搞两个真正像样的宾馆，外国人就来了。上天赋予我们这么好的资源，是可以赚很多钱的。但是如果没有交通，就没有一切。我想在这儿做一个试点。本来，这个事情按照分工不用国家来管，国家只管到“五纵七横”①，不能管到州以下的公路，我愿意拿这三个自治州做试点。我相信这对于发展经济有很大好处。

---

① “五纵七横”，指由五条南北纵线和七条东西横线组成的国道主干线。

同时也希望你们保护好资源，规划没有做好，没有经过省或国务院批准，就不要乱开发，否则会破坏你们的资源。最近香港凤凰卫视正

在播香港西部访问团西行漫记，我在甘孜看了两个晚上。据他们反映，到西安一下飞机就被拉去谈项目，这给他们的印象不好。而到新疆一下飞机，见到的是民族歌舞，根本不谈项目，可最后在新疆谈成的项目最多。他们谈成的项目大都是旅游项目。很显然，在西部地区搞什么加工工业是没法搞的，所有的消费品基本上都是供过于求，还想拿到内地去竞争吗？距离那么远！乌鲁木齐有一个集贸市场叫“二道桥”，非常出名。跟香港人谈乌鲁木齐他不一定知道，但说“二道桥”他就知道，那是一个很繁华的市场。现在乌鲁木齐要改造那个市场，要搬家，再盖大楼。香港的王敏刚是一个大资本家，他看后说你们不要搬家，绝对不要拆，可以改造，保持“二道桥”市场原来的风貌，前面再修一个文化广场，他来投资。我觉得他这个思路比我们高明。你们把驰名中外的东西随便就破坏了，再去盖一个大楼，那就没有味道了。还有华懋集团的龚如心，她在那里签了八九亿元的项目。我看她签的项目大半是商业项目，其中有一个项目是开采金矿，其他没有工业项目，基本上都是商业项目。对旅游业，他们是非常重视的。甘孜要搞旅游业，当地没有几个符合国际标准的星级宾馆，外国人是不会来的。既要有好的道路，也要有好的旅游设施，特别要有好的厕所。厕所的问题要是不解决，外国人是不会来的。如果只重视“进口”，不重视“出口”，人家就认为你们现在的文明程度还不够。旅游业的“软件”是非常重要的。当然凉山是有工业的，我感到旅游业应是其他两个少数民族自治州最重要的发展方向。九寨沟就在阿坝，把旅游资源保护好了、开发好了，这个州就富了，停止砍伐天然林能把过去造成的损失弥补回来。我们现在就是为你们创造条件，帮助你们把路修通。路一修通，加上你们自己努力，经济一定就会发展起来，所以我加了这个项目。请你们务必体会我这个意思，我作这个决定也不容易。把公路管到州以下的县，是没有这个先例的。这体现了中央对少数民族人民的关怀，希望你们的经济能够发展得快一点。



2001年6月9日，朱镕基在四川省雅安市天全县紫石乡考察天然林保护工程和退耕还林还草情况。左一为四川省委书记周永康，右四为四川省省长张中伟。

水利项目，包括水电，关键是要把可行性研究做好，把前期工作做好，报到水利部、国家计委，分期分批地都可以安排。原则上我们都同意，而且希望加快建设。但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是要研究四川的电究竟往哪里送。如果经过全国的平衡，要往广东送，那就要加快规划和建设。从广西、贵州、云南往广东送电是毫无问题了，他们的规划已经做好，正在加紧建设。二滩①的电现在送不出去，三峡②的第一台机组2003年就要发电，三峡的电要往广东那边送。你们要赶快规

划，赶快决策，赶快建设。所有的项目，都按我刚才讲的原则，主要由中央财政来安排资金。

---

① 二滩，指二滩水电站，是中国20世纪建成的最大水电站，位于四川省雅砻江干流下游段，1991年开工，1999年建成。水库总库容58亿立方米，水电站总装机容量330万千瓦，多年平均年发电量170亿千瓦·时。

② 三峡，指三峡水电站，总装机容量1820万千瓦，年平均发电量846.8亿千瓦·时。

第三，财政问题。 周永康①同志开的这个盘子太大了，恐怕我们做不到。目前根据实际的需要，我们对三个少数民族自治州提一点要求，就是你们自己要研究如何增收节支，如何减少不必要的支出。一要保证工资，绝对不能拖欠。要保证公务员包括教师的工资发放，那就要精简机构。有些地方政府机构庞大得不得了，但干事的人不多。教师队伍中也有好多人不能教书。这些问题都得想办法，要精简机构，提高效率，廉洁、勤政、高效。二要保证公安机关的办案经费，没有法制，怎么能搞建设呢？三要保证市场管理部门的经费，市场经济没有秩序，那经济能发展吗？不打“假”就是打“真”，不打“劣”就是打“优”。工商局、技术监督局要加强，经费要保证，但要节约。总之，你们刚才讲的这些缺口，也要靠自己增收节支来弥补才行。

---

① 周永康，当时任中共四川省委书记。

刚才，项怀诚①同志讲了，他也给我汇报过，对三个少数民族自治州中央财政从今年开始每年补助4个亿。我再加1个亿，每年补助5个亿。不让项怀诚一个人做好人，我也做一个好人。当然，这个事不能光是我们说了算，回去以后要会同有关部门商量一下，再给国务院打报告，经国务院领导讨论后作决定。定这5个亿，也是有根据的。这次在甘孜听汇报是比较清楚的，财政收入5个亿，开支7个多亿，缺口两亿多元都是挪用的专项资金。我建议你们还是要抓财政，你们的第

一、二把手对财政要了如指掌，要知道钱从哪里来、花到哪里去了。我在上海当市长，后来兼市委书记，这是我最重要的经验。现在我当总理，财政在我肚子里都有一本账。我估计阿坝的人口、面积与甘孜差不多，缺口也都是两亿多元。凉山自治州毕竟还是有工业呀！西昌有工业，工业人口比甘孜、阿坝的还是多一点，财源也要多一点，人员工资基本上能保证。5个亿主要是考虑甘孜、阿坝两个州，对凉山的支持，就在增加烟厂生产香烟的指标上。这5个亿主要还是考虑甘孜、阿坝，当然凉山也要给一些，至于分别给多少由省上安排。要跟同志们讲，我们是尽最大努力了。

---

① 项怀诚，当时任财政部部长。

把基础教育放在更加重要的战略地位

(2001年6月12日)

2001年6月11日至12日，国务院在北京召开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的主要负责同志，分管教育工作的负责同志以及教育、财政部门的负责同志，部分中央和国家机关、群众团体的负责同志以及各计划单列市人民政府、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负责同志等。这是朱镕基同志在会上讲话的主要部分。

这次会议是进入新世纪以后国务院召开的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专门研究基础教育工作。下面，我讲几点意见。

一、必须把基础教育放在更加重要的战略地位。

教育是科技的基础，基础教育是教育事业的基石，对于提高国民素质、培养各级各类人才，对于实施科教兴国战略，都具有基础性、先导性和全局性的重要作用。目前，我国有两亿多中小学生，再加上学龄前儿童，占全国人口的六分之一。他们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把基础教育搞上去，就可以显著提高未来的国民素质，为培养大批优秀人才打下坚实基础，这是具有战略意义的大事。

切实加强基础教育，加快基础教育的改革和发展，既是教育工作的当务之急，也是推进我国现代化建设的一项紧迫而艰巨的任务。新中国成立50多年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基础教育工作取得了巨大进步，基本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和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以下简称“两基”)的目标已经初步实现，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但基础教育总体水平不高，发展不平衡，问题还不少。目前，全国尚有15%的人口地区没有完成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的任务，还有近5%的青壮年没有脱盲；已经实现“两基”目标的地区，教育质量参差不齐，有的没有真正达到标准；有些地区成果不巩固，中小学辍学率有上升趋势；农村义务教育管理体制不顺，教育经费不足，并由此带来一系列问题。

跨入新世纪，我国进入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的发展阶段，各项任务非常艰巨。我们要抓住世界经济和科技发展的机遇，迎接国际竞争的挑战，要对国民经济进行战略性调整，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实施西部大开发，进一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这些都迫切需要显著提高劳动者的素质和加快培养大批人才。相对而言，我们现在最紧缺的不是资金和资源，而是人才。中国人是很聪明的，只要从小抓起，普及教育，在许多科技领域，特 别是在计算机技术、信息技术领域，完全可以较快地赶上世界先进水平。总之，不加强基础教育，就不可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更不可能把我国建成强大的现代化国家。我们必须把基础教育作为教育事业发展的重点，放在更加重要的战略地位。

二、完善基础教育管理体制，确保义务教育经费的投入。

加强基础教育的一个重要方面，是要完善教育管理体制，确保经费投入，特别是保障义务教育投入。现行基础教育体制特别是农村义务教育体制的最大问题，是既无法保证义务教育经费的稳定来源，又为乱收费、乱摊派敞开方便之门，造成农民负担过重，到了非改不可的时候。

中央最近研究决定，农村义务教育管理体制“实行在国务院领导下，由地方政府负责、分级管理、以县为主的体制”①，明确划分了从中央到省、地(市)、县的职责，特别是明确了县对本地农村义务教育负有主要责任。这里需要强调以下三点：第一，举办基础教育特别是义务教育，主要是政府的责任。这在世界各国都是如此，我国也应当这样做。政府要保证对义务教育的投入，不要把这个钱摊在老百姓身上。宁可少上几个建设项目，宁可把盖办公大楼的标准降低一点，也一定要千方百计保证基础教育经费。第二，省、地(市)、县人民政府都要加大对基础教育的投入。在现行财政体制下，财政的大头在地方。2000年的国家财政收入共13380亿元，包括地方财政收入6394亿元、中央财政收入6986亿元(其中，中央返还给地方4668亿元，包括增值税的返还、补发工资和其他各种补贴，还有转移支付等)。也就是

说，80%以上的财力在地方，中央只有2300多亿元，用于维持外交、国防和政府的正常运转。同时，地方也是发展基础教育的直接受益者。因此，希望大家进一步认识加强基础教育的重要性，拿出更大的积极性和实际行动支持基础教育。第三，中央要加强对基础教育的宏观管理和指导，并根据实际情况加大对中西部困难地区和民族 地区的财政转移支付力度，支持这些地区基础教育的发展。认真实行这样的体制，并加大经费投入，就可以促进我国基础教育持续健康地发展。

---

① 见《国务院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册，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838页)。

为了保证基础教育特别是农村义务教育的经费，当务之急是要采取“一保、二控、三监管”的措施。所谓“保”，就是保证教师工资按时足额发放。确保农村中小学教师工资发放，是地方各级政府的责任，也是稳定教师队伍、搞好农村义务教育的保证。要严格实行教师资格制度，逐县核定教师编制和工资总额，由县级财政部门通过银行把工资直接发放给在编教师。对财力不足、发放教师工资确有困难的县，上级政府要通过调整财政体制和增加转移支付的办法加以解决。所谓“控”，就是控制学校收费标准，坚决制止乱收费，切实减轻学生家长特别是农村学生家长的负担。国务院有关部门要统一制定贫困地区农村义务教育的收费标准和收费制度。其他地区由省级人民政府 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结合当地实际，确定本地区杂费、书本费的标准。所谓“监管”，就是加强对教师工资发放和教育收费情况的监管和检查，完善举报制度，接受群众监督。对于违反规定、不能保证教师工资发放和挪用、挤占教师工资资金的地方，对于乱收费和挪用、挤占中小学收费资金的行为，要及时严肃查处。严禁借收费搞不正之风和腐败行为。

在农村税费改革中，既要减轻农民负担，又要确保义务教育经费的投入。现在最大的担心，就是税费改革后农村义务教育经费的缺口太大。目前，县财政的60%到70%、乡(镇)财政的70%到80%用于教

育。实行税费改革后，教育费附加和集资不能搞了，缺口就出来了。我们工作的一个重要着眼点，是既减轻农民负担，又保证农村义务教育经费的投入。在实行农村税费改革的试点地区，要在减轻农民负担的同时，采取切实措施，确保义务教育经费投入有稳定的来源；没有搞农村税费改革的地方，仍按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现行办法保证义务教育经费来源，并按照国务院的要求建立农村义务教育新的管理体制，为今后的改革创造条件。总之，无论哪种情况，无论什么地方，都必须保证农村义务教育经费的投入。各级政府有关部门和所有学校都要切实加强财务管理，努力提高经费使用效益。

加强基础教育，还要鼓励社会力量办学。要坚持贯彻“积极鼓励、大力支持、正确引导、加强管理”的方针，利用社会力量，多形式、多途径地发展教育特别是非义务教育。要提倡捐资助学。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公民个人对基础教育的捐赠，一律享受国家有关优惠政策，捐赠款在应纳税所得额中全额扣除。国家和地方对捐助基础教育有突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要予以表彰。

三、着力提高基础教育质量。

中小学教育对人的一生发展起着关键性作用。必须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扎扎实实推进素质教育。要适应时代发展和现代化建设要求，端正教育思想，转变教育观念，面向全体学生，培养他们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使学生具有适应终身学习的基础知识、基本技能和方法，具有健壮的体魄和良好的心理素质。为此，要加快课程教学改革和考试制度改革，全面提高基础教育质量。特别要加强德育。现在学校教育中的一个倾向性问题，是对德育重视不够。要对中小学生加强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教育，加强中华民族优良传统、革命传统和国防教育，加强思想品德和道德教育。要对中学生进行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教育。在高中阶段，还要进行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基本观点的教育。中华民族传统道德中有许多非常优秀的成分，要弘扬这些优秀的传统道德，教导中小学生从小立志、做正直的人，树立为国家、为民族的奉献精神。德育工作

要适应新形势的要求，改进方式方法，增强针对性、生动性、有效性。

教师是保证和提高教育质量的关键，要努力建设一支高素质的教师队伍。教师不仅要传道、授业、解惑，更要“学高为师，身正为范”①。广大中小学教师非常辛苦，为基础教育事业作出了很大贡献。但也要看到，还有相当一部分教师不能适应素质教育的要求。要抓好教师培训，提高教师的道德素质和业务水平。要严格把关，选录优秀人才进入教师 队伍；同时，认真核定编制，坚决辞退不合格人员，精减富余人员。

① “学高为师，身正为范”，是中国教育家陶行知的一句名言。

基础教育是全社会的事业，各个方面都要关心、支持。要在全社会树立和普及正确的教育思想，促进教育观念的转变，为基础教育的改革和发展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进一步加快西藏经济发展

(2001年6月25日)

2001年6月25日至27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北京召开第四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出席会议的有西藏自治区党政负责同志，自治区各地、市和自治区直属机关的主要负责同志；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有关计划单列市的负责同志；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和解放军四总部、武警总部的负责同志。朱镕基同志在会上的讲话，曾发表于《西藏工作文献选编(1949～2005年)》，原标题为《关于加快西藏经济发展》。编入本书时，对部分内容作了删节。

一、进一步加快西藏经济发展是十分重要而紧迫的任务。

西藏地处祖国西南边疆，幅员辽阔，战略地位非常重要。党中央、国务院历来高度重视加快西藏发展。早在20世纪80年代，邓小平同志就指出，要“使西藏很快发展起来，在中国四个现代化建设中走进前列”①。1994年，江泽民同志强调：“加快西藏的发展，最根本的是加快西藏经济发展。经济上去了，其他事情就比较好办了。”②进一步加快西藏经济发展，不只是局部地区的问题，而且是事关国家全局的战略问题；既有重要的经济意义，又有重大的政治意义。

① 邓小平《立足民族平等，加快西藏发展》(《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47页)。

② 见江泽民《西藏工作要抓好稳定和发展两件大事》(《江泽民文选》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89页)。

西藏和平解放50年来，经过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建设，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经济建设取得了长足发展。特别是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谈会①以来，西藏自治区党委和政府率领全区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显著成就。从1994年到2000年，西藏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长12.4%。国家投资重点建设了交通、能源、通信、农牧业、

社会事业等一批基础性骨干项目。科技、教育、文化、卫生等各项事业有较大发展。农牧民和城镇居民收入持续增长，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但是，由于历史、自然、社会等原因，西藏经济发展水平仍然很低。经济总量小，自我积累和自我发展能力差。农牧业和生态环境脆弱，基础设施瓶颈制约严重，科技、教育落后。只有进一步加快经济发展，才能尽快从根本上改变西藏的落后面貌。

---

① 继1980年、1984年两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后，中共中央、国务院又于1994年7月20日至23日，在北京召开了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谈会。

加快西藏经济发展，是维护民族团结、祖国统一和国家安全的重要保证。加快发展、维护稳定，是西藏面临的两大任务。稳定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稳定的基础。只有加快经济发展，增强经济实力，不断改善人民生活，才能增强凝聚力和向心力，巩固和发展民族大团结，为西藏的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和群众基础。西藏有近4000公里的边境线，是保障国家领土安全的重要前沿地区。只有加快西藏经济发展，才能在西南边疆构筑起保障国家统一和安全的钢铁长城。

目前，西藏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局势稳定、民族团结、边防巩固，是历史上最好的时期之一，为进一步加快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西藏各族人民有尽快摆脱落后状态的强烈愿望，这是加快经济发展的强大动力。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也为西藏加快发展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

二、明确目标，突出重点，推动西藏经济更快更好地发展。

在中央有关部门的协助下，西藏自治区制定了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五”计划纲要，提出在“十五”期间，力争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长12%以上；到2005年，力争人均地区生产总值进入西部地区前列；到2010年，力争人均地区生产总值达到全国中等水平，为使西藏与全国一道进入现代化打好基础。这样的发展目标是积极的、必要的。西藏自治区和全国各个方面要共同奋斗，努力实现这个目标。

西藏在经济上应有持续的快速增长，以尽快缩小与其他省区市的发展差距。但是，这种快速增长，必须坚持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实现速度与效益的统一；必须以改革开放和科技进步为动力，大力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必须合理利用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走可持续发展之路；必须不断增加城乡居民收入，显著改善人民生活。只有这样，才能使西藏经济进入良性循环，实现持续快速健康发展。

必须清醒地看到，从根本上改变西藏的落后面貌，是一项长期的艰巨任务，需要持之以恒地不懈努力。既要积极进取，争取更快地发展;又要坚持从实际出发，按客观规律办事，注重实效。

实现上述西藏经济发展目标，最重要的是加快基础设施建设，培育和壮大特色经济，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发展科技和教育事业。

基础设施薄弱是西藏经济发展的主要制约因素。必须加快铁路、公路、机场、电力、通信、水利等基础设施建设。经过充分论证和准备，青藏铁路即将开工。建设这条贯穿青藏高原的铁路大动脉，不仅对加快西藏发展具有重大意义，而且对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也有重要作用。一定要精心设计、精心组织、精心施工，力争用六年时间全线建成通车。同时，还要抓紧建设一批关系西藏长远发展的重要基础设施项目，为西藏全面振兴奠定坚实基础。

充分发挥资源优势，形成既有优势又有市场的支柱产业和特色经济。巩固和加强农牧业基础地位，以调整农牧业和农牧区经济结构为重点，搞好农牧业综合开发，千方百计提高农牧民收入。大力培育和发展藏医药业、高原特色生物产业、绿色食品业和民族手工业等特色优势产业，努力把资源优势转化为现实的经济优势。

特别需要强调的是，必须高度重视和切实加快发展旅游业。西藏居于世界屋脊，有独具特色的雪域高原风光和人文景观，对中外游客有着极强的吸引力，发展旅游业潜力巨大、前景广阔。一定要把旅游业作为西藏的支柱产业。这样，不仅可以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使广大农牧民更快地脱贫致富；而且可以扩大西藏对外、对内交流，更好地向世人展现西藏发展的巨大成就。国务院已责成有关部门协助自治区

政府制订西藏旅游业中长期发展规划。要加快与旅游相关的交通等各项配套设施建设，逐步扩大旅游开放范围，简化审批手续，大力培养旅游管理和服务人才，开发各类旅游产品，尽快提高旅游管理和服务水平。

西藏的生态环境非常脆弱，大规模的开发建设会给生态环境带来很大压力。在加快西藏经济发展中，必须十分注意保护生态环境，所有工程项目的论证、设计、施工建设和运营使用，都要充分考虑生态环境的保护。要实施天然林保护工程，加强自然保护区建设。切实搞好天然草地建设与保护，遏制草原沙化、退化。加大对资源和生态系统的勘测、监测和科研力度。


2001
6.29

2001年6月29日，朱镕基在青海省格尔木市出席青藏铁路开工典礼并宣布青藏铁路全线开工。

加快西藏经济发展，必须认真实施“科教兴藏”战略。要不断提高西藏人口素质。大力培养各类人才，合理用好当地人才，积极引进急需人才。要以加强基础教育和扫除青壮年文盲为重点，办好各级各类教育，继续办好内地的西藏中学和西藏班。重点帮助办好西藏大学。大力推动科技进步和创新，努力采用先进适用技术，使现代科学技术在经济发展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积极发展文化艺术、广播影视、新闻出版、卫生、体育等各项社会事业。切实加强文物保护工作。

三、加大扶持力度，积极帮助西藏加快发展。

为了帮助西藏加快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央多年来对西藏采取了直接安排建设项目和投资、实行特殊优惠政策等措施，中央有关部门和15个省市还开展了对口支援。这些对促进西藏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在新的形势下，为了更好地加快西藏发展，要进一步加大对西藏的建设资金投入和实行优惠政策的力度，继续加强对口支援。

经过各方面的充分协商，目前确定国家直接投资建设项目117个，总投资约312亿元(含青藏铁路西藏段投资120亿元)。这样的安排，与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谈会确定的30个中央援建项目相比，增加了87个；与实际完成的38亿元投资相比，增加了274亿元。这些都是西藏急需、条件具备、今明两年内可以开工的重大项目。还有一些需要建设的重点项目，因不能在近期开工而没有计算在内。对西藏今后需要的建设项目，原则上不封口，成熟一个审批一个，争取在“十五”期间多上一些关系长远发展的项目。考虑到西藏的特殊情况，西藏的重点建设项目资金主要由国家来承担。国家投资和中央财政扶持，主要用于农牧业发展、基础设施、科技教育、基层政权相关设施建设以及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着重解决制约西藏发展的瓶颈和突出困难。

中央在增加直接投资的同时，还要实行特殊的扶持政策。现行的优惠政策，能够继续执行的要继续执行，需要完善的在完善后继续执

行。这次还增加了一些新的优惠政策，在财政、税收、金融、投资、价格、工资和产业发展、对外开放、科技教育、人力资源开发、城镇建设、企业改革等方面，都加大了政策扶持力度。这些优惠政策实施后，在“十五”期间，中央财政对西藏的扶持和补助将达到379亿元，比“九五”期间增加一倍。

对口支援工作也要加强。经过认真准备和协调，已经确定有关省市对口支援建设项目70个，总投资约10.6亿元，比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谈会确定的项目数量和支援资金，都有较大幅度增加。

国家采取增加投入、实行优惠政策和对口支援等措施，体现了中央对西藏发展的高度重视，凝聚了全国人民的深厚情意。一定要把这些投入和政策运用好，使之充分发挥应有的效益。所有项目都要纳入西藏发展规划，严格按基本建设制度和程序办事，加强项目监管，严把质量关，用一流的工程队伍、一流的施工监理确保一流的质量，绝不能搞“豆腐渣工程”。所有援建项目既要立足于西藏的长远发展，又要着眼于近期改善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条件，提高生活水平。国家直接投资、中央财政补贴和对口支援，以及西藏当地投资和财政支出，都要尽量多安排一些可以使广大农牧民直接受益的项目。同时，加大扶贫 工作力度，尽快解决尚未脱贫群众的生活困难。


奠

2001年6月29日，青藏铁路开工典礼在青海省格尔木市和西藏自治区首府拉萨市同时举行，朱镕基等同志在格尔木市为工程开工奠基。前排左一为国家计委主任曾培炎，左二为青海省委书记白恩培，右一为财政部部长项怀诚，右二为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王忠禹。

四、中央各部门、各地区要顾全大局，大力支援西藏加快发展。

全国支援西藏、促进西藏加快发展，是中央确定的一项重大战略决策，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责任，各部门、各地区义不容辞，责无旁贷。各部门、各地区要从讲政治、讲大局的高度，把支援和帮助西藏发展的工作做得更好。一是切实抓好已商定的对口支援项目的落实。中央有关部委、对口支援省市和西藏自治区，都要认真落实这次会议所确定的各项任务，做好衔接和协调工作，确保援建项目如期完成。要注意在项目建设中培养西藏当地的管理人才。没有合格的管理队伍和其他必要条件接续，项目不能“交钥匙”。二是继续建立长期相对稳定的对口支援关系。各部门、各地区要根据自身的能力和西藏的实际需要，采取多种形式，在资金、技术、物资等方面，支持和帮助西藏加快发展。人才支援是重要的支援。要继续选调优秀干部和其他各类人才进藏工作。三是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新形势，积极探索新的支援方式和机制。鼓励和支持各地区的各种所有制企业、个人到西藏投资，采取多种方式兴办实业和从事商贸活动，实现互惠 互利、共同发展。

这里需要指出，中央对西藏采取特殊扶持方式和政策，不仅是考虑西藏的特殊困难，而且是着眼于维护民族团结、祖国统一和国家安全，是形势的要求，是大局的需要。加快西藏发展、维护西藏稳定，既直接关系西藏人民的切身利益，也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利益所在。中央对其他民族地区的困难和发展问题，也是十分关心的，并且采取了多方面的措施。当然，中央在制定政策时，需要从全局出发，统筹兼顾，有些方面要区别不同情况。

五、西藏要自强不息，团结奋斗，努力开创经济发展的新局面。

这次中央和各方面对西藏采取的扶持措施，力度之大是前所未有的，为加快西藏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和难得的机遇。而要实现西藏的振兴和发展，归根结底是要靠西藏广大干部群众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开拓进取。切实把中央的关心、全国的支援变成强大的动力，苦干实干。

加快西藏发展，干部是关键。长期以来，西藏广大干部艰苦奋斗，无私奉献，为西藏的发展和稳定作出了巨大贡献。在新的形势下，广大干部要不断提高政治素质和业务素质，自觉发扬“老西藏”精神。各级政府要做到廉洁、勤政、务实、高效，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全心全意为西藏各族人民群众服务。要在各族群众中深入持久地进行爱国主义、社会主义、集体主义教育，进行民族政策、宗教政策和法制教育。旗帜鲜明地反对民族分裂主义，依法严厉打击分裂破坏活动，维护民族团结和祖国统一。

引进外资要做到“三个结合”

(2001年7月4日)

2001年7月3日至4日，全国外资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出席会议的有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分管外资工作的负责同志，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负责同志，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这是朱镕基同志在会上讲话的主要部分，曾 发表于《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册，原标题为《适应新情况新任务，努力把利用外资工作提高到新水平》。编入本书时，对部分内容作了删节。

一、必须深刻认识外资工作面临的新情况。

从1997年召开全国外资工作会议以来，已经有四年时间了。现在召开外资工作会议，是很有意义的，因为国内外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需要及时研究外资工作中的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明确新任务，以利于更好地前进。

首先要充分肯定外资工作取得的成绩。“九五”时期，在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中，我们坚持实行“积极、合理、有效利用外资”的方针，利用外资一直保持良好的势头。即使在亚洲金融危机冲击下，1998年我国吸收外商直接投资仍达到454亿美元。这两年略低一些，1999年为403亿美元，2000年为407亿美元，规模也是很大的。这里还没有包括我国企业在境外发行股票300亿美元左右的筹资。加上这一块，这两年我国在吸收外商直接投资方面仍然居于世界第二位，仅次于美国。这就说明，外资工作的成绩是很大的。这对于扩大投资 需求和出口贸易，对于推动改革、扩大开放、促进发展，都起到了重要作用。当然，也要看到还有一些缺点和不足，主要是引进外资的质量和效益不够高。要认真总结经验，努力加以改进。

应当看到，过去我国资金紧张、商品短缺、经验不足，利用外资主要是为了多吸收资金、多上项目、多增加生产能力。这在一定的历史

条件下是必要的。但是，现在我国经济发生了深刻变化，利用外资工作面临着许多新的情况。

一是国内市场供求关系发生了由卖方市场转为买方市场的重大变化。目前绝大多数生产资料和消费品都供过于求，一般加工工业生产能力约有三分之一得不到充分利用。资金供给也相对充裕，资金已经不是经济运行中的突出问题。在这种形势下，外资工作就不能再把主要注意力放在单纯追求吸收外资的规模上面，而应该致力于提高利用外资的质量和水平。



2001年7月4日，朱镕基出席全国外资工作会议并讲话。右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

二是我国经济发展的体制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随着改革不断深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

性作用越来越大。如果仍然沿袭传统计划经济的某些观念、做法，就会妨碍经济发展，利用外资也就不可能收到好的成效。

三是对外开放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随着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对外开放将进入新的阶段。这既可以为吸收外资创造更好的机遇，同时国内企业也会面临更加激烈的竞争。加入世贸组织后，限制外商直接投资的领域和规定会减少，外资进来的趋势将增强。还要看到，今年以来世界经济增长趋缓，国际资本正在寻找新的投资机会，境外投资者纷纷看好中国市场。例如，摩根大通银行最近对美国跨国公司的调查显示，虽然它们受世界经济不景气的影响会减少对外投资，但仍会增加对中国的直接投资。因此，我们没有理由担心外资不来，而是要考虑怎么更好地把外资引导到我国现代化建设需要的 方面。

总之，在新的形势下，外资工作必须有新的战略思路和举措。观念要转变，领域要拓宽，结构要优化，方式要改进。如果对面临的新情况熟视无睹，墨守成规，还是轻质量、重数量，轻技术、重资金，轻市场法则、重政策优惠，就会影响整个国民经济上新台阶，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也会越来越被动。所以，努力提高利用外资的质量和水平，势在必行。

二、着力调整和优化利用外资结构。

进入新世纪，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面临着艰巨的任务。抓住当前世界经济结构调整和国际资本充裕的有利时机，努力多利用一些外资为我国现代化建设服务，是完全必要的。我们要坚持贯彻中央确定的“积极、合理、有效利用外资”的方针。但在新的形势下，必须根据我国经济发展新任务的要求，调整和优化利用外资结构。

概括地说，今后引进外资要做到以下“三个结合”。

第一，引进外资要同调整经济结构、促进产业优化升级、提高企业效益相结合。 中央已经明确提出，对经济结构进行战略性调整是“十五”计划的主线。今年是实施“十五”计划的第一年，外资工作必须紧紧围绕这一主线，优化结构、提高质量，促进经济结构的调整。在当前国内一般工业品市场已经饱和、生产能力相对过剩的情况下，利用外

资要从一般加工工业为主转为侧重于高新技术产业。同时，要引进高新技术和先进技术来改造、提升传统产业，主要是增加品种，特别是增加缺门、短线品种，提高产品的质量、技术含量和市场竞争力。如果还是不问技术和管理水平，继续单纯引进资金搞低水平的重复建设，就会加剧结构矛盾，造成更大的困难和包袱。那种以为引进外资、扩大工业生产能力就能增加财源的观念，已经大大落后于形势了。

我们还要用更高、更远的眼光看待产业优化升级。这不仅包括工业结构的调整，也包括第一、二、三产业结构的调整，还包括进出口贸易结构的调整。利用外资要从以工业为主转为着重发展第三产业，包括交通、通信、城市公用事业、旅游、环保等方面，加大在金融、贸易以及咨询、会计、律师、信息、广告、资产评估等市场中介服务 业的引资力度。同时，要注意积极扩大在教育、科技、卫生等公益性比较强，对未来社会经济发展具有长远的、决定性影响的行业的合资、合作。

第二，引进外资要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增强企业的国际竞争力相结合。 从总体上看，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初步建立，但要完善起来仍有很多工作要做。特别是在企业经营机制、管理水平等方面，还远不适应在更大的范围、更深入的程度上参与国际竞争的要求。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我国将加大银行、保险、证券等行业的开放度允许外资更多地进入这些行业。这既是着眼于拓展利用外资的领域，优化利用外资结构，更是为了引进国外现代化的管理经验、引进先进技术、引进熟悉国际惯例和资本运作方式的专门人才，提高我国经营管理水平和国际竞争力。

发展市场经济，中介机构很重要。现在有不少国有企业在兼并收购过程中既没有规范约束，也不按国际惯例办事，造成国有资产打量流失。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缺乏有信誉、有权威的中介机构介入企业兼并收购活动，又它们对企业财务状况、资产价值和交易条件作出公正、合理的评估和分析，并对这中介服务的法律后果承担责任。所以，要大胆吸引世界著名的基金管理公司、投资公司等同我们搞合资

经营，同时要加快发展中外合资的会计、律师、投资咨询等中介机构，使外资金融企业、跨国公司以及会计、资产评估、投资咨询等机构能够参与国有企业的改造、改组。

在当今国际竞争中，人才是决定性因素。没有人才，什么事情也干不好。要知人善任，广纳群贤。吸引人才，就得有一套机制和办法。江泽民同志指出，要“加快建立有利于留住人才和人尽其才的收入分配机制，从制度上保证各类人才得到与他们的劳动和贡献相适应的报酬”①。这方面，也要在一定程度上符合国际管理，否则吸引不了人才。但是，工资水平也不能简单攀比，因为国内的物价水平和消费支出结构与发达国家、发达地区有差别。专业人才可以拿高薪，但必须真正有本事，能够为企业创造出更多的效益。如何吸引各类急需人才，外国专家局在新形势下要做更多的工作，发挥更大的作用。港、澳、台地区以及海外华人中的人才，都可以吸引过来。银行、保险、证券和上市公司、国有大中型企业，都要大胆聘用境外经营管理人才和技术人才。

---

① 见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江泽民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90页)。

第三，引进外资要同扩大企业出口、发展外向型经济相结合。 今年以来，受世界经济增速减缓的影响，我国出口增速出现了下降的趋势。这值得我们警惕。问题不仅在于出口减少会对国际收支有影响，关键是如果出口减少了，很多企业得关门，一些职工也要下岗。所以，必须千方百计增加出口。这也是对外资工作的一个要求。

加工贸易是利用外资的一种形式，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功不可没，今后还要继续发挥作用。但是要看到，在国际经济竞争日趋激烈的情况下，靠劳动力成本低、技术含量不高的加工贸易增加出口，竞争者越来越多，市场前途是有限的，而且也难以真正提高综合国力和企业竞争力。如果现在不致力于调整出口结构，将来会越来越被动。广东今年以来出口大幅减速就是警钟。

总之，外资工作要适应我国经济发展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着眼于提高国民经济整体素质，增强国际竞争力和抗风险能力，及时调整工作重点和工作方式，真正实现“三个结合”。在当前引进外资规模已经相当大和国内资金(包括外汇)相对充裕的新条件下，应当把外资工作的重点从单纯吸引境外资金为主转移到引进先进技术、引进现代化管理、引进专门人才方面来，更好地利用外资，以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

三、努力把国内资金用活用好。

目前国家外汇储备达1800多亿美元，银行在境内吸收的企业和个人外汇存款为1340亿美元，共3100多亿美元。这些外汇绝大部分以购买外国债券、同业拆借等方式放在国外，实际上是外国人利用我们的资金。同时，商业银行的人民币存差逐年扩大，目前已达两万多亿元。要采取有力措施，把利用外资同用好国内资金结合起来。

一要积极用好国内的外汇资金。目前国内银行外汇存款中，拆放境外同业的就达630多亿美元。现在国际货币市场利率很低，伦敦六个月的同业拆放利率只有3.7%，而国内一年期的美元贷款利率为5.8%到5.9%，商业银行在国内发放外汇贷款要比拆放境外同业划算。银行要作出若干规定，让国内的企业能够方便地使用外汇贷款。要鼓励国内大型基建项目、技改项目优先使用国内外汇贷款，鼓励商业银行增加对国内企业和居民用于服务类支出的外汇贷款。外商投资企业流动资金不足、符合信贷条件的，也可以允许在我国银行借入外汇贷款。

二要充分利用国内人民币储蓄存款。各商业银行要认真分析存差增多的原因，加快体制创新、机制创新、管理创新，大力提高服务质量和效率。通过增加贷款、改善经营管理，把防范金融风险与支持经济发展更好地结合起来。凡是有市场、有效益的企业和建设项目，都应积极给予贷款支持。既不能滥放贷款，也不能该贷不贷。

三要减少使用国际商业贷款。国际商业贷款利率较高，风险大，在目前我国外汇资金较多的情况下，没有必要再继续增加使用。我国外债余额中，有800亿美元是中长期国际商业贷款。今后一个时期，除了

继续争取外国政府和国际金融机构的优惠贷款外，国有企业原则上尽量少借用国际商业贷款。对已借的国际商业贷款，可以利用当前国际货币市场利率低的时机，争取提前偿还一部分或借新债、还旧债。

四要防止外汇资金外逃。据分析，近几年外汇非法外流比较多，必须采取有力的措施强化外汇监管。海关、外汇管理局等部门要加强对外汇非法出境的管理，并关注内地资金到香港炒H股的情况。绝不能一方面千方百计引进外资，另一方面让外汇资金非法外流。

四、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改进利用外资工作方式。

在外资工作中，各级政府也要转变职能，改进工作方式。这是在新形势下加强和改进外资工作的重要环节。

切实做到政企分开。必须明确，招商引资不是政府的主要任务，而是企业行为。地方各级政府领导人和机关部门负责人一定要明确自己的职责定位。一个时期以来，一些省市，甚至一些县的领导人带领许多部门和企业到境外大规模搞招商引资活动，目前此风愈演愈烈。这是政企职能错位的突出表现。利用外资要实行政企分开的原则，坚持以企业为主体引进外资。吸收外资要真正做到上面讲的“三个结合”，是需要做大量艰苦工作的，要遵循市场经济法则，充分考虑市场、技术等商业因素，投资效果最终也要由企业承担。因此，行政领导绝不能越俎代庖。行政领导直接搞招商引资，不仅扭曲了行政行为，而且劳民伤财，还会滋生大量腐败现象。国务院认为，必须坚决刹住这股风。

坚决纠正竞相出台优惠政策的做法。现在有的地方为了招商引资，违反中央政策和国家法律、法规，在税收减免、土地使用、国有资产处置、产业准入、审批手续等方面擅自出台优惠政策，甚至层层下达指标，要求党政机关、社会团体人人搞引资，并制定引进外资责任制和奖惩考核制度。有些地方还利用报刊、广告、广播、电视等媒体造势，以致不少地方竞相攀比给外商投资优惠。这种做法是错误的，必须坚决予以制止和纠正。

国家对利用外资已有明确的法律、法规和政策措施，不久前还颁布了西部大开发利用外资的若干政策。各地应认真贯彻执行。这里再次强调，各级地方政府都要依法行政，绝不能破坏国家政令统一。任何地方都没有权力制定超越中央政策和国家法律、法规的政策与规定。地方人大、政府有制定地方性法规的权力，但不能与全国人大通过的法律和国务院制定的法规相抵触。绝不允许出现各自为政的现象。各地方要全面清理自行制定的吸引外资的政策和做法，凡不符合中央政策和国家法律、法规要求的，必须加以纠正。

在改善投资“软环境”上下大工夫。这是提高利用外资工作水平的当务之急，也是巩固利用外资成果的必要条件。改善投资环境特别是“软环境”，是政府在利用外资方面的主要职能。经过多年的努力，许多地方的基础设施等“硬环境”已经有了很大改善，但目前突出的问题是“软环境”建设滞后。特别是在保护知识产权、维护外商合法权益、健全法制和信用制度、增加政策透明度以及项目审批和办事效率等方面，都存在亟待改进的地方。不少外商抱怨产品品牌被假冒，乱收费，办事难。外商特别看重“软环境”。有的外商说，一个地方好的信誉和名声是无价之宝，是挣不完的钱；坏的信誉和名声是断财之路、摆不脱的枷锁。这些话值得深思。所以，一个地方要真想把外资工作做好，就必须眼睛向内，下大力气改善投资环境，这是通过自己的努力可以做到的。如果投资环境不好，无论怎样搞招商引资，外商也不会来。

各地要按照中央的部署和要求，进一步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认真查处外商投诉的案件。同时，要强化法治，改革项目审批制度，保护知识产权，提高办事效率，为吸引外资和吸引各类人才创造良好的环境。

要抓紧研究对外商实行国民待遇的问题。这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的大势所趋，是改善投资环境的一个方面，也是优化利用外资结构、提高利用外资质量的一个条件。所谓“国民待遇”，应当是对内资、外资企业一视同仁，公平竞争。如果对外资企业既允许其产品内销，又要给予税收优惠，国有企业如何竞争得过外资企业？当然，这个问题比较复杂，需要周密考虑，采取恰当措施。

关于京津风沙源治理问题的批语

(2001年7月12日，2002年6月2日)

2000年5月12日至14日，朱镕基同志先后在内蒙古自治区、河北省考察京津周边风沙源治理工程情况。2001年6月、2002年5月，国务院办公厅先后两次派人沿朱镕基同志考察的路线进行调查研究。这是朱镕基同志在两份调研报告上的批语。

一

(2001年7月12日)

请岚清①、邦国①同志阅。并请培炎①、春正①、刘江①、怀诚①、恕诚①、宝瑞①、志宝①、振华①同志阅研。去年5月我去河北、内蒙古考察防治沙尘暴问题，当时指定你们成立五人小组负责实施此项工程。现在看来，协调仍存在问题，实施并不顺利。我诚恳、由衷地向你们呼吁，请你们为中国的生态环境着想，为首都人民的切身利益着想，真正重视此项工程，亲自关心，不要放任下面扯皮。我建议由刘江、志宝同志负责此项工程的协调、监督、推动工作，你们能坚持五年，做好此项工作，必将留芳青史。如果推不动，请来找我，如果不来找我，那是你们失职。

朱镕基

7.12

---

① 岚清，即李岚清。邦国，即吴邦国。培炎，即曾培炎，当时任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主任。春正，即王春正，当时任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副主任。刘江，当时任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副主任。怀诚，即项怀诚，当时任财政部部长。恕诚，汪恕诚，当时任水利部部长。宝瑞，即宋宝端，当时任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副主任。志宝，即王志宝，当时任国务院西部地区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振华，即解振华，当时任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局长。

二

(2002年6月2)

请培炎、春正、怀诚、恕诚、青林①、振华、生贤①同志阅。去年7月12日我在国办调研报告上批了一段话(附后)，诚恳、由衷地呼吁你们重视这件事，坚持不懈地推动此项工作，但看来收效不大。为什么下达计划、下拨资金要拖到这么晚？把最好的绿化季节耽误了。明知不合理的政策也得不到及时调整。我再次诚恳、由衷地呼吁你们站好本届政府最后一年岗，为华北沙源治理留名青史。请春正同志负责牵头落实解决存在的问题。抄报岚清、家宝①、忠禹①同志。抄送刘江、志宝等西部开发办同志。

朱镕基

6.2

---

① 青林，即杜青林，当时任农业部部长。生贤，即周生贤，当时任国家林业局局长。家宝，即温家宝。忠禹，即王忠禹。

加强质量监督检验工作

(2001年7月13日)

这是朱镕基同志在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副司级以上干部座谈会上的讲话。2001年4月30日，国务院决定，将国家质量技术监督局、国家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合并，组建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

质量问题始终是我们经济工作的生命线。现在假冒伪劣商品泛滥，已经到了十分严重的地步，许多商品不能让人放心。有的在大米中掺工业油，在酱油里掺甲醛、“毛发水”；有的在白糖里掺吊白块(含致癌物质)；还有“黑心棉”、“黑心菜”、“注水肉”。“黑心棉”这个名字起得很准确，金玉其外，败絮其中，外面一个套子很漂亮，里面用的是废棉花。最近，发现一些地方的血液制品有病毒，有的甚至将带有艾滋病毒的血液制品卖到医院输给病人，真是害人！我两次将有 关材料批给卫生部，要求对这些案例严肃查处，处理结果要公布，在报纸上曝光。

有些假冒伪劣商品已出口到国外。前不久，韩国从进口鸡肉中查出禽流感病毒，就禁止从我国进口禽肉。我对来访的韩国总理李汉东讲，你们不与我们商量，就停止进口，不符合世贸组织规则。他回去后就撤销了禁令。质检部门应该把这样的产品卡在国内，不让它出关。要查清是哪些企业出口的，坚决把这些企业关掉。没有这种精神，怎么能够在世界上站住脚？欧盟国家发生“疯牛病”、禽流感后，就全部屠宰消灭，也不怕曝光。我们国内如果真有口蹄疫、禽流感，就应该公布，不要让这些东西出去害人。只有把问题暴露出来，人人喊打，才会有效果。最近，中国银行把自己的不良贷款比例如实公布了，得到国际上的一致好评，将中国银行评为中国最好的银行、亚洲最好的银行，就是因为它说实话。我们应该有这个勇气，如果连这点精神也没有，那么国家还有什么前途？

今年，党中央、国务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深入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这是要由质检总局负重要责任的。你们要把好“两个关”(出口关和进口关)，看好“两个门”(厂门和国门)。不能再让那些假冒伪劣的商品出口，也不能再让那些国内长线的、乱七八糟的国外产品进口。例如大豆，去年进口了1040万吨，据说今年已经签合同要进口的有1200多万吨，如不控制可能要达到1700万吨，这怎么得了！我们现在库存大豆很多，还进口这么多干什么？而且，大部分进口大豆是转基因产品。按国务院最近发布的《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条例》规定，转基因产品必须加贴标签，没有标签一律不准销售。对于不按规定执行，甚至更改合同日期钻空子的，要严厉处罚。另外，要把住工厂企业的大门，防止假冒伪劣产品进入市场。现在有些被关闭的“五小”企业又复活了，继续搞重复建设，将使一些刚刚脱困的国有大中型企业又陷入困境。对此，我们要坚决采取综合整治措施。希望质检系统的同志在关键时刻发挥重要作用，你们要敢于打、敢于管、敢于顶，不管有多少困难，绝不后退。中央会全力支持你们、帮助你们。

开展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工作几个月来，取得了很大成绩。我这里有一个材料，记录了质检部门查处了多少假冒伪劣案件。这不仅是一本功劳簿，记录了质检系统立下的功劳；更重要的，它还是一本功德簿，你们造福人民，功德无量。你们这是实实在在为老百姓办实事，要充分肯定这个成绩。同时，我们也不能过高估计打假的成果，如果稍有松懈，制假售假就会卷土重来。现在还没有形成完善的制约机制，法律手段也还不够健全。有的人甚至仍有很大的思想障碍：一是某些地方领导总认为打假会影响当地经济的发展。据说，有个县委书记讲：整顿社会治安要宁“左”勿右，整顿市场经济秩序要宁右勿“左”。他的话就是这种错误思想的典型反映。整顿社会治安宁“左”勿右，就会把好人误打成坏人；整顿市场经济秩序宁右勿“左”，那还打什么假？ 二是地方保护主义严重。打别人的假可以，打自己的假不行。自己制造的假冒伪劣商品可以横行天下；别人生产的，即使是优质商品也不让进来。三是有的地方政府充当了假冒伪劣商品的后台和

保护伞。政府机关中的少数腐败分子与犯罪分子内外勾结，沆瀣一气，制售假冒伪劣商品。最近又发生了几起制售有毒食品的严重案例，简直是谋财害命，丧尽天良。我们必须看到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工作的l长期性、艰巨性和复杂性。

在全国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工作会议部署的各项工作基础上，我们还要开展几个大的战役，组织若干专项斗争。一是集中力量，严厉打击直接影响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的假冒伪劣商品，如食品、药品、医疗器械等，并以此推动加大对各种消费品中假冒伪劣商品的打击力度，提高群众消费信心，带动国内消费需求。二是严厉打击出口中的假冒伪劣商品。出口商品必须确保质量，质检总局要特别加强对出口商品的检验检疫。三是继续把好进口关，严防问题疫苗和其他有害商品流入，维护国家安全和人民健康。四是继续严厉打击走私和各种非法进口活动。在开展这些专项斗争中，质检、工商、公安、海关等各有关部门都要密切配合，协同作战，务求取得重大成果。但并不是说打了这几个战役后就天下太平了，需要把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的工作长期坚持下去。通过这项工作，推进我国经济生活全面走上法制化、制度化的健康轨道。

打假要像打击走私一样常抓不懈。1998年以来打击走私的工作确实取得很大成绩，但现在走私活动又猖獗了，特别是成品油的走私非常严重。过去是大油轮到公海，然后用小渔船“蚂蚁搬家”。现在大油轮把油运到公海后，小油轮直接靠上去，明目张胆地走私，这还得了！海关要一打到底，绝不能手软。

我特别强调一点，对关系人民生命健康的食品，质检总局一定要管好。要有计划地、全面地、狠狠地打击那些危害人民生命健康安全的假冒伪劣食品，这关系到老百姓的切身利益，一定要毫不留情。光靠罚款没有用，光撤职也不行，有的人被撤了职还会易地升官。对违法犯罪分子就得抓起来依法判刑！质检部门查出的案子要依法移交司法机关，大案要案要及时报告国务院。

质检总局还有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指导和督促国有大中型骨干企业提高产品质量，尽快达到世界一流水平，这也是国家命运之所在。你们要特别注意培养名牌意识。现在为什么假冒伪劣商品这么多？就是因为国有企业没有成规模的、真正的名牌商品，消费者往往不知道哪个好，搞不清楚哪个是放心商品。要扶持一些大企业、大集团，帮助它们将名牌商品的声誉树立起来，使生产规模越来越大，那时候，假冒伪劣商品就没有市场了。质检总局要把扶持名牌商品作为一项工作任务。要采取各种宣传手段，大力宣传那些每次检验都合格、可以让人民群众放心的名牌商品。如果大中型企业的产品能够达到世界一流水平，那些小打小闹的假冒伪劣商品就好治理了。

质检总局一定要把好进口和出口关。首先要把好出口关，对于不合格产品一定要把它卡在国门之内，有损国家声誉的产品绝不允许出口。同时，要把好进口关。国外怎么限制我们产品出口的，我们也怎么限制他们的产品进来。你们要加强检验手段，必要时财政部拨专款帮助解决。

质检系统的信息化建设非常重要，这方面要舍得花本钱，财政部和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都要给予支持。质检总局在这方面要抓紧赶上去，加快电子执法系统的建设。

要充分认识这次质检总局机构改革的意义。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和完善的重要时期，加强政府对市场的监管，提高政府行政执法部门的权威性，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促进经济健康发展的迫切需要。中央决定，将国家质量技术监督局和国家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合并，组建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同时，将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和新闻出版署改为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和新闻出版总署；并且，将这三个市场监管部门都提升为正部级机构。这是继去年撤销国家经贸委管理的九个国家专业管理局之后，深化政府机构改革、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的又一重大措施，意义非常深远。

第一，强化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的职能，是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必然要求。搞市场经济，要让市场机制在经济活动中起基

础性作用，这就需要公正的执法、监督、管理。如果没有一个公开、公平、公正的竞争环境，就不可能搞好市场经济。因此，加强对市场的监督管理十分必要。

第二，加强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是政府职能转变的一个重大举措。现在我们政府职能的转变还不够，特别是地方政府职能的转变还很不够。一些地方干部热衷于招商引资，开洽谈会、交易会，为企业讲情向银行要贷款。没有真正认识到政府的职能是监管，要公平、公正地执法。那些搞地方保护的人，其实根本没有想明白自己在保护什么。为什么非要保护那些落后的东西？据说在河南的一些市县，竟然不让河南双汇肉联厂设点销售。双汇肉联厂的产品质量达到了国际标准，大规模生产，成本也低，你为什么不让它设点销售？应该让它行销全国。外地的企业到你这个市里、县里来销售，你可以收它的营业税。你搞地方保护干什么？保护那些落后的东西干什么？如果总是这样，你这个地方的经济能够发展吗？所以，政府职能的转变是非常重要的，这次质检体制改革就体现了这个精神。

第三，你们两个机构合并，是我20年的心愿。我在国家经委工作的时候，经委管产品质量，外贸部门管出口商品的商检。体制不顺，当时就想把质检和商检合并。现在终于合到一起了，这符合国际惯例，有利于工作。同时，还成立了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和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由国务院赋予它们一定的行政权力，统一管理、协调、监督这方面的工作。这样，扯皮就少了。

执法部门必须吃“皇粮”，不吃“皇粮”，工资、福利靠罚款，搞得不好，执法机关就会腐败。对于质检单位的专业装备，如实验室的建设、仪器设备的购置、质检手段的改善等所需经费，由财政部每年给予补助。

质检部门在国家经济工作中身负重大责任。我希望质检部门的同志们，忠于职守，勇于负责，严格把关，扎扎实实地为人民群众办实事、办好事，不辜负党和人民的重托与厚望，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作出更大的贡献。

做好三峡工程移民、地质防灾和生态保护工作

(2001年7月17日)

2001年7月16日至18日，国务院三峡工程移民暨对口支援工作会议在湖北省宜昌市召开。出席会议的有有关省、自治区、直辖市和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同志，三峡库区涉及的21个市(州)、县(区)的负责同志。这是朱镕基同志在会上讲话的主要部分。

这次三峡工程移民暨对口支援工作会议，是在三峡工程建设进入关键时刻召开的，非常重要。下面，我再强调几个问题。

一、移民工作进度必须确保三峡水库初期蓄水的需要

三峡工程开工以来，在全国人民的大力支持下，经过三万多名建设者艰苦奋战和各方面共同努力，已经闯过了大江截流、永久船闸高边坡稳定和混凝土高强度施工等世界级难关，取得了很大的成绩。目前，三峡枢纽工程进展顺利，整个工程正朝着2003年6月初水库蓄水、首批机组并网发电和永久船闸通航三大目标迈进。库区移民工作也取得显著成绩，总体上符合规划进度的要求。

现在距水库蓄水不到两年时间，尚有22.8万人有待搬迁安置，其中今年有5万人需要外迁。要按期全部做好搬迁工作，时间紧迫，任务繁重。目前看来，移民工作出现了一些新情况、新问题：一是丰都、巫山两座新县城基础设施的建设进度有些落后。二是135米水位线淹没区内需要迁建的73个集镇中，有33个建设进度落后于计划，其中有的还没有开工。三是港口码头复建进度普遍滞后。同时，还存在部分就地后靠移民生产安置的质量较低，新建城镇的占地移民增加，出省市的外迁移民中有少数人存在迁不出、稳不住的问题。四是库区的库底清理工作滞后。最近，环保总局给我写了一个报告，说还有两年就要蓄水了，但库底清理工作还没有落实。如果不把库底乱七八糟的东西清理干净，一旦蓄水就没法清理了。这些问题在国务院三峡建委第十次会议上都做了研究和部署，关键是抓紧贯彻落实，切实把工作做好，

一定要往前赶，否则就会贻误大局。总之，移民工作已经进入倒计时阶段，各有关方面要进一步动员起来，分秒必争，加快移民工作进度，绝不能由于移民工作滞缓而拖了三峡工程的后腿。

二、认真做好库区移民外迁和工矿企业结构调整工作

1999年5月，国务院三峡工程移民工作会议提出了“两个调整”的方针：一是调整和完善库区移民政策，增加农村移民迁往外省市数量；二是调整和完善企业搬迁政策，加大库区搬迁工矿企业结构调整的力度。两年多的实践证明，这一方针符合三峡库区的实际情况，有利于三峡工程建设，是完全正确的，必须继续认真贯彻执行。要千方百计确保完成移民和企业搬迁任务，千方百计确保三峡工程按时蓄水、发电、通航。



2001年7月17日，朱镕基在三峡工程建设工地考察时与建设者亲切握手。左二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吴邦国。

当前，要集中力量做好移民外迁安置工作。应当看到，做好外迁 移民工作有不少有利条件，有关政策和方案已经明确。当然，这项工作的难度也是相当大的，移民中存在着各种思想顾虑和问题。一是故土难离。让移民离开祖祖辈辈生活的地方，感情一下子难以割舍。二是顾及眼前利益。有些人举家搬迁，眼前利益会受到一些损失，或多或少地存在着抵触情绪。三是有“特殊公民”思想。有些人讨价还价，提出一些过高的要求。四是有相互攀比心理。库区的移民与坝区的移民攀

比，迁往条件差一点地方的移民与迁往条件好的地方的移民攀比。五是对环境不适的担心。移民要到一个新环境，不太容易适应，思想不稳定。因此，无论是库区动员移民外迁，还是其他省区市接收移民，都是一件很麻烦、很难做的事情。但是，我们不能怕这个麻烦。只要大家顾全大局，加强领导，做好工作，这些困难是可以克服的。迁出地各级政府要深入实际，采取多种形式宣传移民外迁政策，做好深入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加强正确引导，搞好组织、协调和服务。三峡工程是造福全国人民的伟大工程，接收和安置好三峡外迁移民是各有关省区市义不容辞的责任。从总体上看，前一阶段有关省区市对移民安置是高度重视的，工作是做得好的。为了圆满完成二期移民任务，还要继续从大局出发，树立全国一盘棋的思想，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满腔热情地做好外迁移民的接收和安置工作，真正把三峡工程和三峡移民工作当做分内的事情来对待，采取切实措施，帮助移民解决好耕地、住房、子女入学等生产、生活问题，使他们搬得出、稳得住、逐步能致富。我国地域广阔，通过外迁多安置一些三峡库区移民是完全可能的。各有关省区市一定要完成计划安排的接收移民任务，能超过得越多越好。同时，要努力提高就近后靠移民的安置质量，抓紧解决部分移民工程进度滞后问题。

我曾多次说过，一个地方移民工作的好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那里领导干部的素质。实践证明，哪个地方的干部素质好、政策水平高、工作做得扎实，那个地方的移民工作就一定做得好；哪个地方的干部只顾自己的利益，工作作风漂浮，那个地方的移民工作就一定困难重重，还会留下后患。重庆市最近调整了移民工作落后的库区县级领导班子主要负责人，移民工作马上就有很大的进步。可见，配备好库区领导班子、提高干部素质是多么重要。要加强对移民资金使用、移民工程建设、移民用地分配和土地出让金使用的监督，增加公开性、透明度，对移民工作中发生的腐败案件要坚决查处，严惩不贷。湖北省、重庆市及库区各级政府要把移民外迁摆在各项工作的重中之重，增强责任心，提高政策水平，扎实工作。我相信，只要各方面齐

心协力，迎难而上，三峡二期工程的移民任务是一定能够如期完成的。

移民工作要与加快库区经济发展相结合，与库区的长治久安相结合。三峡库区外迁移民数量与库区总人口相比，只占很小的比例。我们要在积极做好移民异地外迁工作的同时，抓住西部大开发的机遇，努力发展库区经济，保证库区人民安居乐业、社会稳定。移民工作只是一个阶段性工作，而库区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则是长期的任务。移民工作不能留下隐患，不能影响库区的长治久安。目前特别要注意关心和帮助的是三个困难群体：一是占地移民，约6万人，由于他们的土地被占用建了新城镇，生计无着；二是城市搬迁中有8万多居民，原来依靠街面房经商、做小生意谋生，搬迁后生活没有出路；三是关闭、破产企业的下岗职工20多万人，大部分靠遣散费生活。这三部分共有几十万人，他们的问题解决不好，就会影响社会稳定。各级政府一定要时刻关心这个问题，研究制定一些切实可行的政策措施，努力为他们创造就业机会，切实把他们安置好。

对口支援要与库区经济结构调整相结合，与发展库区特色经济相结合。对口支援三峡库区建设，是中央采取的一项重大措施。各地方和国务院各部委积极响应中央号召，大力开展对口支援三峡库区建设，已取得了重大成果。外省市很多知名大企业来到库区，与当地企业合作、合资，进行组合搬迁，生产名牌产品。库区的企业很快就扭亏为盈，把长期亏损的帽子甩掉了。截至2000年年底，对口支援到位资金达93亿元，有力地推动了库区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发展。对此，要予以充分肯定。今后，这项工作只能加强，不能削弱。现在要注意的是，在库区搬迁工矿企业结构调整中，要坚持把工作重点放在优化结构、提高质量和效益上，尤其是要根据市场需求，优先发展名、优、特产品。库区经济结构的调整，一定要按照全国统一市场的要求，对那些产品没有市场、技术含量低、浪费资源、污染环境的“五小”企业，要采取断然措施，坚决依法实行关闭或破产，并做好职工的安置和再就业工作。该关闭的企业，晚关不如早关，拖得越久包袱越大，会给将来的发展造成很大困难。我昨天到宜昌市，看到那里“小水泥”不少，

还到处冒烟。市委书记孙志刚同志表示，看到一个保证关一个，看到两个保证关两个。没有看见的你关不关呢？我看还有几十个呢，你不关它就污染环境，水泥质量很差，用来盖房子就得垮、得死人。为什么不把这些都关了，让好水泥销进来呢？经济结构调整，一定要着重经济效益，搞规模经济。同时，要通过对口支援，引进名优企业和名优产品，引进先进的技术和管理，采用多种方式对搬迁企业实施嫁接改造。库区各地要抓住机遇，努力改善投资环境，克服地方保护主义，积极发展规模经济。各有关省区市和部门要增强大局意识，进一步加大对口支援的力度，不断拓宽对口支援的渠道和方式，继续为库区经济发展和结构调整作出更大贡献。

三、高度重视三峡库区地质灾害防治和生态环保建设

三峡工程是一个整体，防治地质灾害和进行生态环保建设，是三峡工程密不可分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不仅要把三峡枢纽工程建设好，而且要搞好库区地质灾害防治和周边生态环境保护。只有这样，才可以说三峡工程建设取得了圆满成功。

三峡库区地质灾害隐患较多，绝不可掉以轻心。一是据国土资源部勘察，仅重庆库区影响库岸和移民城镇的地质灾害隐患就有1503处，主要是滑坡、崩塌、危岩等，总体积34.7亿立方米，其中有些是必须治理的。对这个问题，必须高度重视，尽快采取治理措施；否则，就会造成严重后果。今年5月1日，重庆市武隆县发生一起地质滑坡灾害事故，楼房倒塌，造成许多人伤亡。这个沉痛教训，必须认真吸取。二是库区有的新县城地基不可靠。例如，巫山和奉节两个新县城，房子建成后，才发现房基是软土，打几十米深不见基岩。对此，要抓紧做好后评估，采取相应补救措施。三是还有一些尚未查明或者没有认识到的地质灾害，要继续加强调查和研究。现在看来，对库区崩滑体等地质灾害的治理已经明显滞后，因为原来没有对地质灾害进行大面积的勘察调查，情况不是十分清楚，投资打得很少。按照长江水利委员会编制的崩滑体处理规划，急需工程治理的安排了34处。其中蓄水到135米水位前必须治理的21个工程项目，刚刚下达勘察设计计划，基本上还没有动工。如果拖到2003年蓄水后再治理就晚了，到那个时候水

一泡，到处滑坡，会造成重大损失。这个问题是关系到库区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子孙后代的大事，刻不容缓，必须在水库蓄水前抓紧治理。特别是对那些在蓄水后可能产生滑坡的崩滑体，要集中力量，抢先治理。现在最重要的是落实资金来源，不然其他各项工作都上不去。地质灾害防治资金要纳入三峡工程建设概算，从三峡工程建设基金中安排。初步考虑，从现在开始到2003年6月，每年安排20亿元，两年共安排40亿元，专项资金用于治理地质灾害。这些钱绝对不许挪用，如发生挪用，县市级干部一律撤职，要追究省长、市长的责任，要记大过。

现在，长江上游和三峡库区的生态环保问题已相当严重。昨天一来，看到这长江水比黄河还黄，我看长江应该改名字了，叫“黄江”。这就是由于长江上游生态环境保护不力，天然林保护工程以及退耕还林工作没有跟上，水土流失严重，泥沙大量流入长江所致。同时，污染问题也很突出。目前，仅重庆段每年向长江排放的污水就有约13亿吨，其中生活污水3亿多吨、工业污水近10亿吨，生活污水处理率只有10%；工业固体废弃物每年排放量为743万吨，其中危险废弃物达40万吨；累积堆放在长江两岸的废弃物达3000万吨，175米水位以下生活垃圾堆放量达250万吨，这些在蓄水前都需要清理。重庆是四川盆地最低点，是个“漏斗口”，长江上游流域包括四川和云南、贵州的一部分，排放的废弃物和污水都要流入库区，数量相当惊人。另外，每年还流入库区水域大量化肥、农药和其他有机质。如果不加以治理，将来三峡库区的生态环境势必严重恶化，就会变成“臭水坑”、“垃圾塘”。加强长江上游生态环保建设，治理库区生态环境，必须加大投入。这笔资金主要由国家投入，由国家计委在国债资金中安排，再使用部分商业贷款和其他资金。要抓紧落实各项环保措施。国务院有关部门和长江上游各省区市，特别是重庆市、湖北省，要切实加快三峡库区污水和垃圾处理的工程进度。在环保项目的建设方面，国家计委要重点给予支持。环保总局要会同有关部门做好治理环境污染规划，并切实严格执行。对把工业污水直接排入长江、污染库区的企业，要一律搬迁或者关闭。长江流域的县城，都要修建污水处理设施。总之，未经处理达

标的工业和生活污水，不能直接排入长江和库区。必须切实加快长江上游生态环境建设，搞好天然林资源保护，加大退耕还林、退耕还草的力度，国家计委要把这个指标放开一些。昨天在宜昌市，看到山上种地的还不少，岂止25度，45度都有种地的，都得退耕还林。生态环境的治理是长期的事，要锲而不舍，一年投入二三十亿元，搞他个十年，看长江的水是不是变清了。我认为，将来宜昌会成为很大的旅游城市，但一定要搞好城市规划。得想办法把中心区规划好，特别是要把绿化搞好，不要乱盖房子。到这个地方就是要看绿化，谁跑到你这里来看房子？所以，宜昌、重庆等城市要做好城市建设规划，搞好城市绿化。要通过坚持不懈的努力，把三峡库区建设成为青山绿水、经济繁荣、人民安居乐业的新型经济区和旅游胜地。



1998年12月29日，朱镕基考察三峡坝区施工现场。前排左一为中国长江三峡工程开发总公司总经理陆佑楣。

为了加强对地质灾害防治和生态环保建设的领导，国务院决定成立三峡库区地质灾害防治工作领导小组和生态环境保护与建设领导小组。地质灾害防治工作领导小组由国土资源部牵头，重庆市、湖北省和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组成。生态环境保护与建设领导小组由环

保总局牵头，湖北、重庆、四川、云南、贵州等省市和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组成。这两个小组主要负责搞好规划，研究项目，组织协调，抓好落实。各领导小组和各有关部门、地方要切实负起责任，齐心协力，密切配合，把地质灾害防治和生态环保建设的各项工作尽快落到实处。对治理工程项目，要快调查、快规划、快立项、快审批、快实施，做到科学论证、简化程序、加快进行。有关地方要切实用好地质灾害防治资金和生态环保建设资金，绝不能挪作他用；否则，要依法严厉查处。

四、三峡工程是中华民族的千秋大业，必须确保质量第一

借此机会，我要再次强调一下工程质量问题。质量是三峡工程的生命，三峡工程成败的关键在于质量。一切工作都要服从于质量，要牢固树立“质量第一”的思想，确保三峡工程质量经得起历史检验。参与三峡工程建设的各有关单位和广大建设者，都要以崇高的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搞好工程质量建设。我在国务院三峡建委第十次会议 说过：“行百里者半九十”。三峡二期枢纽工程已进入了金属结构和设备安装的关键阶段，质量要求高，技术难度大，绝对不能有丝毫松懈和大意。对工程的每一个细小环节都要严格把关，精心组织，精心施工，精心安装，务必做到万无一失，不留任何隐患。我1998年12月来的时候，跟负责监理的同志照了一张相，我说你们应该站高一点，比施工的都站高一点，比陆佑楣①还要站高一点，你们得为我们把关，为国家把关。所以，要进一步强化工程监理工作，切实加强对工程质量的全面监督和检查。要处理好施工进度和工程质量的关系，坚持质量第一，进度服从质量。在施工中要十分注意安全生产，避免发生伤亡事故。不仅三峡工程建设中要十分注意安全生产，全国各地都要切实加强对安全生产工作的领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防止伤亡特别是防止重大事故的发生。

① 陆佑楣，当时任中国长江三峡工程开发总公司总经理。

目前，三峡二期工程建设已经到了最后冲刺的时候。前几天，中央电视台播放了《世纪梦》，这部影片反映的就是三峡工程建设者的故事，十分感人。一个世纪的梦想、几代人的梦想，就要在我们这里变成伟大的现实！我们一定要以对党、对人民、对子孙后代高度负责的精神，通力协作，扎扎实实做好各项工作，为确保三峡二期工程各项目标如期实现而努力奋斗。

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要做市场秩序的坚强卫士

(2001年7月27日)

这是朱镕基同志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副司级以上干部座谈会上的讲话。2001年4月30日，国务院决定将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调整为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

一、要充分认识新时期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管理经济的重要职能之一是监管市场运行，维护市场秩序，为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的市场环境。没有强有力的监管执法，就没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强化政府的市场监管执法职能，是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必然要求。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是市场监管和行政执法的重要职能部门，承担着规范和维护市场秩序的重要职责。概括起来说，就是要把好市场主体的入门关、当好市场运行的“裁判员”、做好市场秩序的坚强卫士。党中央、国务院决定将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更名为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由副部级升格为正部级，目的就是为了进一步加强市场监管执法部门的权威和地位。希望工商行政管理系统广大干部职工更好地履行职责，不辜负党和人民的重托与厚望。

二、进一步加大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的力度。

近几个月来，整顿市场经济秩序工作取得了初步成效，但问题仍然很严重，任务还十分艰巨。特别是要清醒地看到，当前又出现一些新情况：一是有些违法犯罪分子顶风作案。有的地方制假售假活动仍很猖獗，不少被关闭的“五小”企业和无证经营企业还在生产经营，最近在一些地方发生的重大安全事故多数与此有关。二是暴力抗拒执法案件增加，一些不法之徒公然伤害执法人员。三是有些地方在整顿市场经济秩序工作中避重就轻，甚至还在以各种名义强化地方保护。这些情况说明，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的工作，任务十分艰巨和复杂。我

们必须下更大的决心，用更大的气力，排除一切困难和阻力，坚定不移地把这项重要工作不断推向前进。

大力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是巩固当前好的经济形势和战胜面临困难的重大举措。今年以来，我国经济继续保持良好的发展势头，这是由于中央敏锐察觉世界经济出现新变化，及时采取正确的宏观经济政策，全国上下齐心协力、扎实工作的结果，也是与大力开展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工作分不开的。但是，当前全球经济和贸易增长放缓，世界经济衰退的趋势越来越明显，比我们预料的要快、要猛，这种情况势必对我国经济发展产生不利影响，对此我们必须高度重视。要从多方面采取有效措施加以应对，其中一个重要措施就是继续整顿市场经济秩序，规范市场行为，改善经济运行环境，提高经济质量和效益。前几天召开的全国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领导小组第二次会议，对下阶段工作已做出了具体部署，各地区、各部门一定要认真贯彻执行，务求取得更大的进展。

过去，工商行政管理系统在强化市场监管、维护市场秩序、深化体制改革、加强队伍建设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机构升格以后，责任更大、任务更重了，要在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中发挥生力军作用。当前要重点抓好以下几个方面：一是集中力量继续严厉打击制售假冒伪劣商品的违法犯罪活动。对制售直接危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的食品、药品、医疗器械等假冒伪劣商品的违法犯罪活动，尤其是对制假产地和售假集散地，要重拳出击，确保人民群众的消费安全。二是充分发挥登记注册管理的职能作用。强化企业登记监督工作，严把市场准入关。坚决取缔不符合国家法律、法规要求的各类企业，打击无照经营，从源头上遏制扰乱市场经济秩序行为的发生。三是加大反不正当竞争和反垄断的执法力度。要重点查处不正当竞争和限制竞争行为，坚决打破地区封锁、行业垄断，促进市场公平竞争。四是加强对商标、广告的监管。严厉打击商标侵权假冒行为，加强对商标专用权的保护，对印制假商标、假标识、假包装的企业要从严查处。严厉打击虚假违法广告，净化广告市场。五是继续打击传销和变相传销违法活动。传销在我国还有存在的土壤，不少素质不高的人容

易受骗，被骗的人再去骗亲朋好友，对社会道德形成很大的冲击。要充分发挥新闻媒体的宣传、引导作用，公开揭露传销的欺骗性和严重危害性，提高广大群众自觉抵制传销的能力。工商总局可以成立打击传销办公室，加强对取缔传销工作的组织领导。六是严厉打击走私贩私，对已取缔的私货市场要加强监控，防止死灰复燃。



2001年7月27日，朱镕基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考察。前排左一为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王忠禹，左二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国务委员吴仪，左四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吴邦国，左五为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局长王众孚。

三、努力开创市场监管执法工作的新局面。

面对新形势、新任务，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必须以高度负责的态度和奋发有为的精神风貌，努力把工作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一要切实转变观念，实现职能到位。要适应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形势，彻底摆脱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思想观念和工作方式，从主要监管集贸市场进一步转到监管全国统一市场上来，从主要依靠行政手段管理市场进一步转到依法治市上来。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一定要与所办市场彻底脱钩，绝不能既管市场又办市场，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绝不能明脱暗不脱。既管市场又办市场，这必然产生腐败；不与所办市场脱钩，监管市场就是一句空话。工商行政管理系统与所办市场彻底脱钩，是重大原则问题，绝不能有半点含糊，不能藕断丝连。不愿意脱钩，就必须“脱装”，离开工商行政管理系统。当然，要采取切实措施妥善解决脱钩中遇到的实际问题。对市场、人员、债权、债务，地方一定要接，接了以后，属合情合理的债务，地方确有困难的，中央财政也应该帮助解决。总之，一切都要服从脱钩，债务问题不能成为不脱钩的理由。在这个原则问题上，态度一定要坚决，把市场办管脱钩问题彻底解决。

二要坚持依法行政，严格秉公执法。工商行政管理人员在履行职责时，必须铁面无私，敢于执法，敢抓、敢管、敢碰硬，同一切违法犯罪行为作坚决斗争。所有的行政执法系统，都必须严格执行行政收费和罚没收入“收支两条线”的规定。不能搞按比例返还，要坚决纠正各种形式的收支挂钩，从机制和制度上保证公正执法、严格执法；否则，就不可能避免执法中的腐败行为，就不可能做到监管严格、执法公平。财政部门一定要保证行政执法系统必要的经费，所有行政执法人员都要由财政供养，吃“皇粮”。这方面中央已有明确规定，有关部门必须尽快落实。

三要加强与有关部门的协调配合。质检总局和工商总局的分工已经明确，界限就是“厂门内外”。即厂门之内的监管问题由质量技术监督部门负责，厂门以外的监管问题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负责。质量技术监督部门不要进入市场，市场上戴“大盖帽”的人越多，越不起作用。另一个方面，工商行政管理系统不要另搞一套检验机构，商品质量检验可

以委托质检系统现有的检验力量来进行。两个部门要配合好，共同把市场秩序整顿好。与此同时，要特别注意与政法机关包括检察院、法院、公安、安全等部门协作配合好，从重、从快、从严处理市场犯罪案件。对于法律不衔接、不完善的地方，工商总局要研究如何进一步加强法制建设。

四要加强队伍建设，提高监管水平。总的看，目前工商行政管理队伍是好的，涌现了一批敢于执法、不畏强暴、不怕牺牲的优秀执法人员。对于严格执法、公正执法并作出突出成绩的执法人员要给予嘉奖。但是必须看到，要适应新形势、新任务的需要，还必须在队伍建设上继续下大工夫。特别是要注意加强领导班子建设，加强对省级工商局领导班子的双重管理。省以下实行垂直管理后，省级工商局领导班子的责任更大了。目前省级工商局领导班子的任免，是由地方党委征求工商总局党组意见，这样协管力度不够。你们再向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写个报告，把“征求意见”改为“征得同意”。加强队伍建设，最重要的是反腐倡廉。本届政府提出，要建立廉洁、勤政、务实、高效的政府，把廉洁放在第一位，说明廉洁是最重要的。要严厉惩治执法腐败，加强廉政建设，对那些与破坏市场经济秩序的犯罪分子相互勾结、狼狈为奸的害群之马，必须坚决绳之以法。所有工商行政管理执法人员都要做到忠于职守、勇于负责、刚直不阿，要以清正廉洁的形象、执法如山的威力、坚持原则的精神，做好市场监管执法工作。

五要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改善监管执法手段。商标局的信息管理搞得很好。要注意运用新的信息手段和信息技术来加强市场监督管理；要吸引更多的人才，特别是信息方面的人才；要搞一个全国范围的信息联通网络，和其他部门的监管网络实现互联，财政部在经费方面要给予支持。要全面推进工商行政管理系统的信息化，继续搞好计算机网络工程建设，提高通信、交通和监管等方面的装备水平，更有效地加强市场监管执法。

对破产逃债的要严查

(2001年7月31日)

2001年7月31日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节目报道，为逃废银行债务，四川省中江县委、县政府精心安排，通过县法院违法操作，决定对连续几年经济效益不错、2000年被四川省人民政府评为贸易企业最佳效益30强的中江县丝绸公司实施破产改制。这是朱镕基同志关于此事件的批语。

请岚清①、邦国①、家宝①、罗干、忠禹①同志阅。看了今晚的电视《焦点访谈》后，真感公理何在，国法难容，道德沦丧，党性何存。县委、县政府、县法院沆瀣一气骗国家，转移国家资产，明目张胆，肆无忌惮。名为地方利益，实则县官以权谋私。不信，调查看看。抄报周永康①、张中伟①同志。

朱镕基

7.31

---

① 岚清，即李岚清。邦国，即吴邦国。家宝，即温家宝。忠禹，即王忠禹。周永康，当时任中共四川省委书记。张中伟，当时任四川省省长。

严厉打击黑恶势力及其后台

(2001年8月2日、22日)

2001年7月17日，广西壮族自治区南丹县龙泉矿冶总厂拉甲坡矿发生特大透水事故，81名矿工遇难。事故发生后，具有黑社会背景的矿主与当地腐败官员勾结，隐瞒事故真相。这是朱镕基同志关于此事件的两次批语。

一、这是朱镕基同志在《人民日报》的《信息专报》第66期刊载的《关于广西南丹矿井重大死亡事故的再次紧急报告》上的批语。

二、这是朱镕基同志在公安部《关于广西壮族自治区南丹县公安机关“打黑除恶”工作有关情况的报告》上的批语。

一

(2001年8月2日)

请邦国①、罗干同志批示，并报锦涛①、健行①、岚清①同志。看来可信。如此重大事故必须查个水落石出，严厉打击黑恶势力勾结官员，草菅人命。当前首先要排除一切阻力，查明遇难人员。请经贸委、公安部牵头组织力量坚决贯彻落实。(此事外国媒体广泛报道，并附有照片。)

(抄送曹伯纯①、李兆焯①同志)

朱镕基

8.2

---

① 邦国，即吴邦国。锦涛，即胡锦涛。健行，即尉健行。岚清，即李岚清。曹伯纯，当时任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书记。李兆焯，当时任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

二

(2001年8月22日)

南丹惨案的特点就是私人资本家豢养一批黑恶势力为非作歹，买通官员为其保驾护航，不把这些黑后台及其庇护者挖出来，判以重刑，只抓一些喽啰，南丹乃至广西某些地方不可能拨乱反正。并请锦涛、健行、庆红①同志批示。

朱镕基

8.22

---

① 庆红，即曾庆红。

加快贵州经济社会发展

(2001年8月13日～17日)

2001年8月13日至17日，朱镕基同志在贵州省考察工作，先后考察了黔南、安顺和贵阳等地。这是朱镕基同志在考察期间讲话的一部分。

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为贵州加快发展和振兴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贵州资源丰富，人民勤劳，发展潜力巨大。要统筹规划，突出重点，打好基础，量力而行，积极而稳步地推进各项工作。

一、加快生态环境建设。

贵州的希望就在青山绿水，到处都是青山绿水，才能令人赏心悦目。要充分认识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对贵州经济社会发展的极端重要性，切实搞好天然林保护工程、封山育林和退耕还林，让山青起来，让水绿起来，让人民富起来，使贵州成为长江、珠江上游的重要生态屏障。

这几年，退耕还林试点和天然林保护工作取得明显成效，积累了宝贵经验。实践证明，中央的决策和政策措施是正确的，深受广大群众的拥护和支持。退耕还林工作要在总结试点经验的基础上，适当加快步伐。这方面，思想要再解放一些。特别是贵州，雨水充沛，林草生长快，应该加快退耕还林。现在我国粮食和工业消费品供大于求，是退耕还林、改善生态环境的极好时机，千万不要错过。你们要求增加退耕还林还草任务，可以每年给你们安排100万亩的任务，关键是要真正抓好落实。



2001年8月14日，朱镕基在贵州省龙里县考察封山育林天保工程。右四为国务院西部地区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王志宝，右五为贵州省委书记钱运录，左一为贵州省省长石秀诗。

近两年的实践证明，实施退耕还林工程，是贫困地区脱困的有效途径。要坚持把退耕还林与扶贫脱困工作很好地结合起来。凡是实行退耕还林地方的农民，不仅有了可靠的粮食供给，还有余力从事多种经营和副业生产，较大幅度增加了收入。在退耕还林工作中，必须全面落实中央的有关政策。

要解决好退耕农民的当前生计和长远发展生产问题，支持农民发展当地有资源优势和有市场需求的产业。要通过发展小水电、沼气等解决农民的燃料和农村能源问题，防止滥伐山林，保护退耕还林成果。实施沼气工程，关键是要注重质量，讲求实效，认真总结，逐步推开。你们提出每年由中央财政补助5000万元，用于搞沼气工程，楼继伟①同志已经答应了。我建议，把这5000万元和给你们增加的转移支付资金放在一起，一共安排两亿元。这两亿元由你们统筹安排使用。如果搞沼气有效果，你们也可以多安排一些资金去搞沼气；如果你们觉得暂时不能拿那么多钱去搞沼气，也可以把资金用于别的工程，修路也行，保证发工资也可以。

---

① 楼继伟，当时任财政部副部长。

由于退耕还草当年就可获得收益，因此，退耕还林和退耕还草的补助政策应有所区别，以鼓励和支持农民多造林。要继续搞好天然林保护工程，坚决制止乱砍滥伐。如果把树都砍掉了，贵州生态环境的优势就没有了。对那些“木头财政县”要给予一点补助，让它们不要再砍树。

二、加快实施西电东送工程。

实施西电东送工程，是对西部地区最大的支持。贵州要首先把第一批“四个水电、四个火电”工程抓好，确保按照中央要求的时间和规模向广东省送电。贵州第一批西电东送工程必须抓得实、抓得紧、抓得快，赶快把电站建起来，赶快把输电线路建起来，保证把电送出去。如果你们现在不赶快把第一批电站建起来，就没有理由不让广东省自己上电站。对第二批的“三个水电、四个火电”项目，要认真做好规划，搞好前期工作，先开工建设三个水电站。火电厂一定要利用煤炭资源优势建设坑口电站，盘南电厂可以争取先上，其他的火电厂要根据未来的市场情况再确定上马的时间。我们希望，通过这次电力体制改革，把广东省的电网与西南地区的电网组成一个单独的实体，以便于促进西电东送工程的实施、促进电力企业改善经营管理。不仅要把广

东省的电网和西南地区电网并起来，将来有条件，甚至可以把福建省的电网也并进来。这对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会有很大的促进。

三、加快发展旅游业。

贵州有旖旎多姿的自然风光和古朴浓郁的民族风情。这次，我们参观了天星桥景区和黄果树瀑布。黄果树瀑布的水量比我上一次来时要大，景色也很壮观，发展旅游很有前途。但是，各方面的建设还差得很远，道路建设、配套设施建设、景点建设，都需要请高手来规划，要做全面的规划。要完善基础设施，通往景区的道路要发展高速公路。国务院早就明确规定，不准在公路两旁修坟墓。现在坟已经建了，叫坟主迁坟，有人会说不近情理，但必须要求坟主在公路两旁的坟区四周种树，把坟墓遮起来，让人在公路上看不到坟。要提倡火葬，不能再像现在这样挖山修坟。请省委、省政府下工夫抓好这件事。

党中央、国务院十分关心贵州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希望贵州省委、省政府认真落实江泽民总书记关于“三个代表”的要求，率领全省各族人民团结奋斗，开拓创新，加快建设经济繁荣、社会进步、民族和睦、山河秀美的新贵州。

企业界要进军俄罗斯

(2001年9月9日)

2001年9月7日至12日，朱镕基同志访问俄罗斯并参加中俄总理第六次定期会晤。这是朱镕基同志到中国驻俄罗斯大使馆看望中国驻俄工作人员时的讲话。

我这次是来参加中俄总理第六次定期会晤的。这次会晤取得了比以往历次会晤更大的成果。其原因有三：第一，不久前，江泽民主席和普京总统签署了《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以下简称《条约》)，为两国在新世纪的合作指明了方向，明确了方针。我们在此基础上有了更多的共同语言，很多具体问题都落实了，签订了七个协议。第二，最近两年，中俄两国的经济有了更新、更快的发展。自亚洲金融危机以来，中国经济每年仍保持7%到8%的增长速度。俄罗斯经济发展也很快，去年的增长速度比我们的还高，外汇储备由去年年初不到200亿美元增加到380亿美元。由于两国经济实力都加强了，一些具体合作项目得以较快落实。第三，我们进行了大量工作，其中包括使馆同志们的辛勤劳动，中俄双方谈判人员增进了相互了解，都能平等协商，解决问题，以前见面说话闹别扭的情况大大减少了。打个比方，汽车的磨合期已经过去，现在开始进入快车道了。“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现在，应该是一边耕耘、一边收获了。

目前中俄经贸合作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什么呢？我只讲一个主要问题，就是贸易不平衡。去年的中俄贸易额为80亿美元，中方逆差36亿美元；今年1到7月的双边贸易额为55亿美元，中方逆差已达29亿美元，估计全年贸易额可能达90亿到100亿美元，中方逆差将大大超过去年。现在我国对俄贸易的逆差累计已达240亿美元，这还不包括我们在军技贸易上支付了较多的现汇。很明显，这种情况如不改变，两国经贸进一步发展就有困难。

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呢？我们不能把责任完全归咎于俄罗斯方面，应该看到我们自己的问题。就是说，在世界战略这个大格局里面，我们有些同志对俄罗斯地位的重要性还没有足够的认识，还没有达到江泽民主席和普京总统所签署的《条约》的高度，对战略性和前瞻性的东西着眼不多，因而努力得不够，强调困难太多。我印象最深刻的是，自两年半前访俄以来，俄罗斯无论是基础设施建设还是城市建设都有较大发展，人们的精神面貌也有较大变化。据随行的同志说，商店里的商品比上次访问时丰富得多。俄罗斯的发展速度是很快的，我们绝不可忽视它的重要地位。我们国内有的经济专家估计，俄罗斯经济恢复到原来的水平需要20年，我认为这是“书生之见”。俄罗斯有广袤的国土，只有1.4亿人。俄罗斯的资源条件得天独厚，从圣彼得堡到莫斯科，到处都是绿地，西伯利亚则全是森林。它这两年很幸运，石油涨价大大改善了它的外汇平衡。俄罗斯的国民素质普遍较高，科学技术在历史上就是领先的，再加上资源条件和其他方面的条件，底子厚，经济恢复将是很快的，发展不可限量，绝对不可以低估俄罗斯。



2001年9月11日，朱镕基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宫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

我们在新世纪面临着很大的挑战。如果我国加入世贸组织，能否应对加入后遇到的各种问题，经济上有没有竞争力？不敢轻易说啊！我们也不能“把鸡蛋全放在一个篮子里”。现在，我们对美国的贸易额(包括香港转口贸易)已达1000亿美元。美国说它今年对华贸易的逆差将达700亿美元，我们不承认这个数目，但500亿美元还是有的。我们主要向美国出口一些消费品，在美国经济萧条的情况下，中美贸易再想有很大的发展非常困难。欧盟对我们的出口也采取很多限制。现在真正有发展前景的市场在俄罗斯。中俄两国贸易起点低，去年是80亿美

元，今年顶多达到100亿美元。去年，我们从国外，主要是中东进口了7000万吨原油和3000万吨成品油，花去外汇200亿到250亿美元。这次中俄双方签订了修建石油输送管道的协议①，如果我们把从中东地区进口石油的一半数量转移到俄罗斯，仅此一项一年就是一百几十亿美元，双边贸易额马上就会翻番。再说木材，我们在搞退耕还林、保护天然林，需要进口木材，俄罗斯就是最好的合作对象。俄罗斯的矿产资源也很丰富，有东西、有本钱同我们做生意，而且都是我们需要的。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让它买我们的东西，不然，我们对俄罗斯的贸易逆差就会更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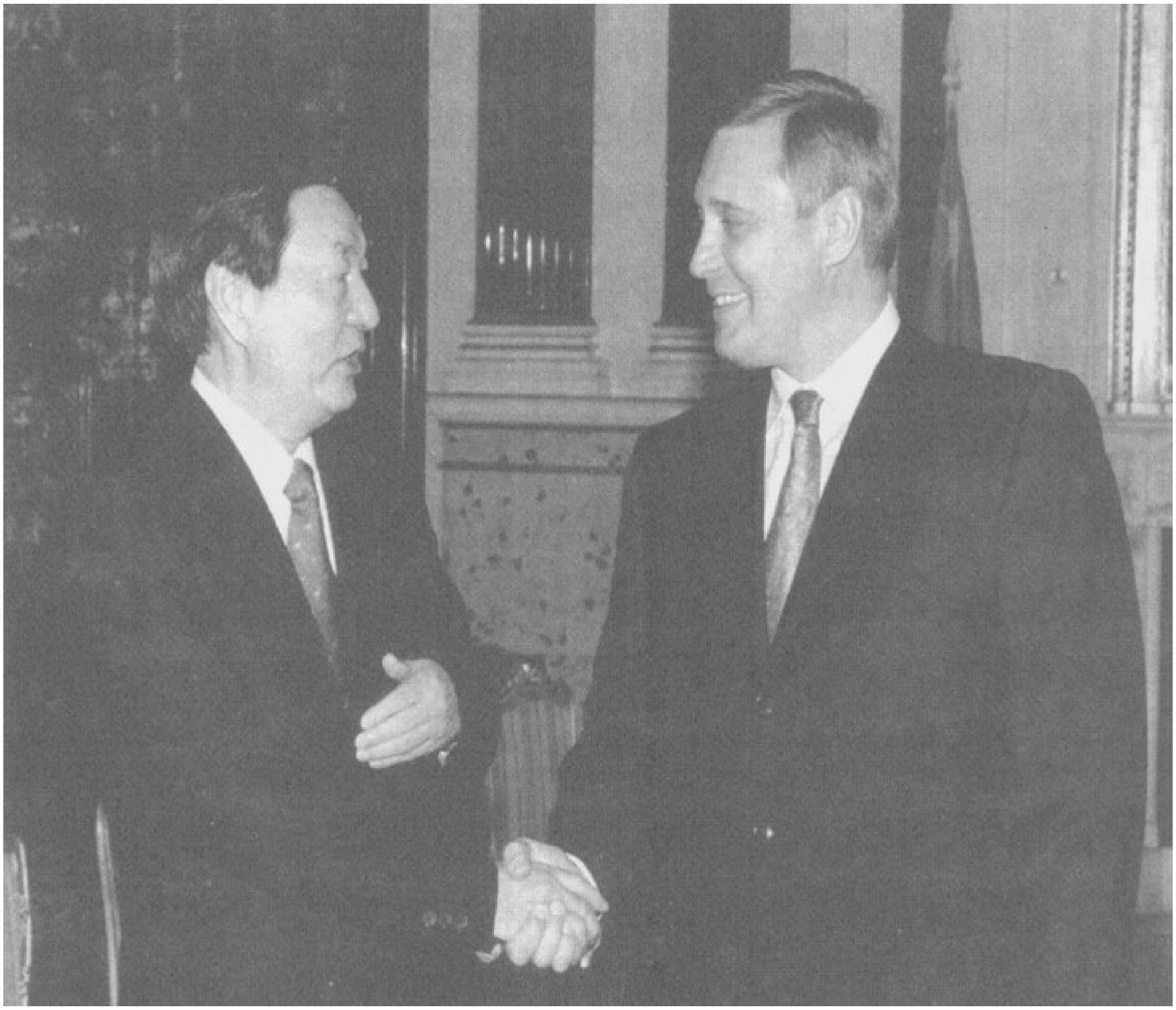
---

① 2001年9月，中俄两国总理定期会晤时，正式签署了《中俄输油管道可行性研究工作总协议》。按照此协议，中国将是俄罗斯远东输油管道的唯一接收国。

现在，我们对俄罗斯市场的开拓远远不够。昨晚我同卡西亚诺夫总理在夏宫的宴会上谈的都是这个问题，他讲得很坦率："现在，俄罗斯人民不熟悉你们的产品，你们的产品有好有坏。"这是客气话，实际上是说我们的产品质量差。我对他讲，可能是中俄两国的"倒爷"把中国的假冒伪劣产品弄到你这儿来了，所以给你造成这样的印象。我们现在的任务就是通过两国大中型企业的合作，共同把"倒爷"倒来的产品挤出市场。我们有价值2000亿美元的商品畅销欧美，也没有听说中国商品质量有什么大的问题。他就说，你们把好东西都给了别人，给我们的都是次的。我说，你不能把"倒爷"倒来的产品等同于中国产品。说到底，就是中国的好商品没有大量进入俄罗斯。我们有些同志过去都是埋怨俄罗斯方面，说它市场经济不发达，行政干预很多，法律不规范，社会治安不好，还有黑社会等等，不具备扩大贸易的条件。总之，责任都是人家的，我们没责任。我认为这样的看法是错误的，现在已到了该转变的时候了。你要来开拓市场，就要敢冒风险。都想到美国、欧洲，谁到俄罗斯来啊？！我们要改变俄罗斯人的观念，让他们明白：中国有好东西，你们只是没有看见。我们也要改变自己的观念，认识到：俄罗斯正在变革，将来的前途不可限量。有人说俄罗斯

人的生活比我们的差，根本不是这么回事。我了解过，他们的人均月收入125美元，还不包括其他收入，比我们人均高得多。莫斯科的人均住房面积20平方米，我们有吗？我们比人家差，应该承认自己的不足。不要回去宣传这儿什么都不好，生活不方便，吃得也不好。我看蛮好的，它有很大的进步。俄罗斯在过去十年，把事情耽误了，政策摇摆不定，谁还想干事啊？现在，他们真正干事了。我们确实都有这样的感觉，这个国家，只要齐心干事，那发展前途是不可限量的。所以，绝对不可轻视俄罗斯。

俄罗斯是大国，也是我们的邻国。在当今世界格局多极化发展的情况下，我们需要同俄罗斯建立长期的战略合作关系。中俄双方的经济是互补的，只要我们努力去做，这种关系可以发展得很好。有人认为，俄罗斯会很快屈服于美国的压力。我同张德广大使及其他同志交换过意见，我们都不这么认为。像俄罗斯这样一个大国绝对不甘屈服于美国的压力，也一定会重视发展中俄关系。我们为了世界的和平和多极化，也要同俄罗斯发展良好的战略合作关系。



2001年9月8日，朱镕基在圣彼得堡会见俄罗斯总理卡西亚诺夫。

我们现在应该努力把中俄经贸和技术合作搞上去，而且要很快地搞上去。为此，首先要解决认识上的问题，打破过去的观念。其次，要解决体制上的问题。为什么我们的产品打不进俄罗斯的市场呢？我们国有企业体制上的问题暴露得越来越多。党的十五大已经提出，要探索实现公有制的多种有效形式，要使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听说华为公司已打进这里的电信市场，去年销售额达1亿美元，这是个民营企业。海尔也正向俄罗斯发展。四川长虹也要打入俄罗斯市场，准备投入3000万美元，建立一个年产100万台电视机的工厂。我认为他们有眼光。我这次在两国总理会晤时对俄方说：“我们要把双方贸易搞上去，就要使中国企业家直接进入你们的市场，请你们支持。”没有开拓

精神和冒险精神，怎么能进入俄罗斯市场？昨晚，俄罗斯总理跟我说："你们就是不会做广告。我在纽约买了件夹克，回来一看标牌是'中国制造'，质量很好。但俄罗斯人只穿土耳其制造的夹克，认为中国的多数是假冒伪劣产品。"韩国"三星"电视机已打入俄罗斯市场；圣彼得堡和莫斯科都有"可口可乐"、"雀巢"、"索尼"的分店、招牌和广告，就是没有我们中国的。其原因归根到底是：第一，我们不重视俄罗斯，这是错误的。第二，我们现有企业体制有毛病。不能全靠国有企业，这也说明国有企业不改革是没有前途的。各类所有制企业都可以进入俄罗斯。不要只看重欧美市场，要实现市场多元化。现在俄罗斯潜力很大，而且靠得住，起码石油、天然气就靠得住。

今天，我同部长们在飞机上开了一小时会，我提出个口号："我们的企业界要进军俄罗斯。"部长们都表示赞成。大家要齐心协力，实行鼓励政策，支持各种类型的企业到俄罗斯来。我提个建议：在莫斯科买块地，建一个高度位居该市建筑物第二的中国贸易中心。谁有勇气进军俄罗斯谁就出钱，成为这个中心的股东。要使这个中心成为展览中心、交易中心、信息中心，既搞零售，又搞批发，也搞展览，把中国的好商品都放进去。一定要有这样一个标志性建筑。建这样的贸易中心，有利于向俄罗斯展示我们改革开放以来的成就，让他们知道，我们好多东西他们还没有。

我昨天向俄罗斯总理建议："请你们派出100人的代表团，由中国外经贸部来接待，把你们需要的商品、从别国进口的商品的样品都带来。我们可以介绍有信誉的大企业展示样品，报出价格，就像招标一样，并提供优惠条件。这样，你们就能买到好东西，中俄的贸易才能搞上去。"刚才，我看了一个材料，现在官方统计的中俄贸易额没有包括中俄"倒爷"的那部分，那部分估计达100亿美元之多，比正常贸易的80亿美元还多。一些"倒爷"搞的是假冒伪劣，偷税漏税，数额这么大，怎么得了！中俄两国都要整顿贸易秩序，整顿之道就是双方大中型有信誉的企业直接接触，互相进入对方市场。

我认为，驻俄使馆的同志们大有可为。中俄合作的发展前途不可限量。双方互有需要，经济互补，各有优点。只要我们做工作，我相信

无论是从当前还是从长远观点看，中俄关系的发展对两国都是具有重大意义的，将会极大地造福于两国人民。

最后，我要再说一句，进军俄罗斯！也就是让中国质量高、价格低的商品和大中型企业进入俄罗斯市场！

会见索罗斯时的谈话

(2001年9月17日)

这是朱镕基同志在北京中南海紫光阁会见乔治·索罗斯时的谈话。索罗斯是美国金融界人士，长期从事国际资本运作，在1973年创立索罗斯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历任总裁、董事长。

朱镕基： 欢迎你出席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举办的国际论坛会议。你的新书在中国出版，我在此表示祝贺。你寄给我的《全球资本主义的危机》已经收到了。我很高兴和你见面。你是从美国飞日本再飞北京的吗?

索罗斯： 经蒙古飞过来的。

朱镕基： 袭击事件发生时，你在美国吗?

索罗斯： 已经离开了。

朱镕基： 我对9月11日美国人民遭受的损失感到震惊，表示慰问和哀悼。据我所知，目前已有51位华人丧生。

索罗斯： 我很难过。

朱镕基： 其中两位是在被劫持的飞机上，其他的都在世贸中心工作。我刚刚看过电视，有一个华人家庭的夫人和孩子，他们在流泪，我也流泪了。你认为这次袭击事件会造成多大影响?

索罗斯： 从经济角度看，美国经济中业已存在的趋势，如经济步入衰退期、消费者心态谨慎、美联储利率下调、股市下跌等等，都将因这次事件而加速发展，时间会提前、速度会加快。当然，衰退期也会因而缩短，这是坏消息中的好消息。同时，美国人减少了外出，这等于将需求迟滞到将来，有利于财政和货币稳定。总之，经济下滑趋势会大大加快，但持续时间会缩短。至于此次事件对美国会造成多大影响，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美国作何反应。美国人当前普遍感到愤怒，

但如果美国政府采取的行动伤及阿富汗或其他国家的平民，将导致恶性循环，希望能够避免。

朱镕基： 我们也担心美国过分的反应会导致阿拉伯世界的反对，使矛盾更加激化。我们理解美国人民的悲痛，但我们不希望看到为了找到拉登，造成平民伤亡而酿成悲剧的结局。

索罗斯： 我个人认为，拉登是一个邪恶的天才，此次恐怖主义袭击事件的策划显示出他的远见。阿富汗内部有许多武装分子反对他，几乎在袭击事件同时(或前一天)发生了针对马苏德①的自杀性袭击，而马苏德就是拉登的对头。所以，拉登对美国的军事反应是有心理准备的。

---

① 马苏德，即艾哈迈德·沙阿·马苏德，曾任阿富汗北方联盟将领，2001年9月9日被谋杀。

朱镕基： 你比较肯定拉登就是主谋?

索罗斯： 我没有确凿的证据，只是猜测。

朱镕基： 大多数人原来预计美国经济将于明年复苏，这种预计会不会因袭击事件而改变?

索罗斯： 袭击事件前，美国经济已下滑至第二阶段。第一阶段的下滑主要集中在技术产业，消费者和起关键作用的消费经济基本不受影响。而现在，已有迹象表明，消费者开始受到影响，经济下滑进入第二阶段。而正是由于此次事件加速了美国经济的下滑趋势，我现在反而更认为，美国经济明年将会复苏。但技术产业由于投资过热，其复苏所需时间更长一些，可能要几年。与目前状况最为相似的是1973年，当时股市繁荣，结构不合理，克服这种状况用了十年时间。

朱镕基： 国会已授权布什总统动用400亿美元处理袭击事件，如果发动战争，这笔钱是远远不够的。这就意味着美国今年将出现财政赤字，这对美国经济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索罗斯： 可以刺激美国经济，但对利率尤其是长期利率将产生不利影响。我原来预期美国经济会下滑，因而大量购买国债，但今天我已开始抛售10年期和30年期的长期政府债券，不过不会卖出6个月的短期债券。

朱镕基： 就是说，美联邦政府会更大幅度地降息？

索罗斯： 短期利率会下降，而长、短期利率之差会进一步拉大。

朱镕基： 我想问的问题都问完了，现在看看你有什么想说的。

索罗斯： 我很高兴时隔12年重访中国。自1989年后一直没能再来。中国的变化和进步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1989年以前，我对中国有所了解，但现在所知甚少。我想问的是，中国面临的主要任务和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朱镕基： 你一下子抓住了最难回答的问题。我们面临的最大问题是什么？王梦奎①教授是经济学家，你说一下。

---

① 王梦奎，当时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王梦奎： 中国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农业和增加农民收入问题、城市人口就业问题和金融体制的改革等。

朱镕基： 我想在王教授回答的基础上再明确一下。我们面临的最大问题是产业结构不合理，需要作很大的调整。现在传统产业已发展到很高的水平，在许多方面，如钢铁和煤炭，产量居世界第一。但传统产业维持目前的生产能力主要是靠政府努力和基础设施的投入，没有政府推动，这些产业就会开工不足。消费品工业主要依靠廉价商品销往欧美等地，但欧美对此类商品的限制越来越严，出口越来越难。如不及时调整，以信息化带动科技革命和产业结构调整，问题将越来越大。尤其是中国农业人口占80%，由于粮食过剩，出口又出不去，价格高于国际市场，农民收入得不到提高或增长缓慢，城乡矛盾将加大。不调整产业结构尤其是提高农业的水平，整个国民经济都会遇到困难。当然，这些都是长远的问题，我们还有几年时间可以做工作，

目前还不会产生尖锐的矛盾。目前的困难是，随着美国经济衰退，日本经济停滞，中国的出口将越来越难。而出口对中国正变得越来越重要，去年出口总值达2550亿美元。现在出口增幅大大降低，我担心今年甚至会出现负增长，成为国民经济的负面因素。为此，我们去年下半年已开始准备，靠动员内需来解决。现在人民对政府有信心，愿意消费，消费在增长，所以出口下降不会影响到我们原定计划的实现。第二个问题是国有企业，可以看出，现在的国有企业越来越不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近几年，我们在国企股份化方面取得了很大成绩，尤其是国企的海外上市，已经筹集到几百亿美元的资金。国内上市企业每年也可筹集1000亿至2000亿元人民币。我们在推进股份制也就是所有制改革方面已有很大的改进。亚洲金融危机的负面影响我们已基本克服，好的一面是中国的投资环境大为改善了。近三年来，外国在华直接投资每年都保持在400亿美元以上，今年将接近500亿美元。但袭击事件发生后，就难以预料了。现在的问题是股市发展快，但不规范，投机行为多，政府监管不够，对人民币没有信心。如何加强监管和规范化很令我们头痛，这方面愿意听听你的意见。第三个问题是银行体制改革。我们过去实行的是国有商业银行体制，最大的问题是不良资产比例过高，最高时曾占到40%。后来我们借鉴美国RTC(处置信托公司)的经验，成立了资产管理公司，将不良资产从银行划出以使这些商业银行规范化、实现自主管理，但问题依然很多。通过改革和加强监管，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今年的不良资产比例下降了3%至5%。我们希望将这些银行变成股份制银行，它们的不良资产虽有相当部分已经划出，但问题依然很多，上市十分困难。

上面谈了很多令我们头痛的问题，不过我们也取得不少成绩。在建立健全社会保险体系方面，这两年取得的成绩还是可以的。社会保险体系现已基本上实现资金收入和支出平衡，当然，还有过去的欠账。建立了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如果家庭人均收入低于当地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国家将提供补贴。

索罗斯： 有没有考虑建立信托基金来管理社会保险基金如养老金等?

朱镕基： 有。中央政府有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各级政府有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有一套独立的体系负责基金的管理，工人向其缴纳养老基金后，由其向全国企业的工人发放养老金。

索罗斯： 有没有考虑将其分成几块以强化金融市场，允许企业设立独立的养老金账户，个人也可以在几家管理机构间作一选择?

朱镕基： 由于我们缺乏有经验和能力的人才，现在的基金主要用于购买政府债券或存入银行吃利息，只允许基金的10%比例进入股市投资。现正考虑如何更好地运用基金。我这里谈的主要是社会保险，不是商业保险。

索罗斯： 我想谈几点看法。中国对外态势很好，就出口竞争力、贸易顺差、迅速发展的国内市场对外国直接投资的吸引力而言，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强的经济体。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中国将不得不开放它的金融市场，这是一次真正的挑战。我认为，中国应首先发展国内金融市场，为对外开放金融市场做铺垫。开放的顺序是很重要的，要分步走，先大力推动国内金融市场的开放，再着手金融市场的对外开放。其他国家如日本有过类似的经历。日本一度曾是世界上最强的经济体，经济快速增长。目前日本工业虽依然强大，但金融体系一塌糊涂。日本的工业产出多少，金融体系就去丢掉多少。中国应避免重蹈日本的覆辙。中国逃脱了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主要是因为它的金融体系对外封闭，如果对外开放，将面临更大的风险，因此，应先加强后开放。你已谈过坏账问题，我认为首先应发展内部银行体系。中国储蓄率高，应给储户提供银行以外的其他金融工具供其选择。至于监管人才，中国并不缺乏，我最近见过两位这方面的优秀人才。但中国的股市基本上只有散户，没有机构投资者，而股市和债券市场的稳定很大程度上依靠机构投资者的参与。养老基金等可由机构投资者而非政府机构按商业原则入市运作。日本的问题就是，它的金融机构只听大藏省的，没有学会对市场信号作出反应，进入国际市场后，要同国际银行界打交道，结果输得只剩下了衬衫。

朱镕基： 你说的还是客气的，你还没有说输得只剩下了裤衩。

索罗斯： 应该创立机构投资者，而且是不受政府控制的。我认为中国有这方面的人才，如留学归国人员及香港、台湾等地华人有这方面的能力，可以在开放前培育中国的金融市场。最后一点，中国要开放，还要允许信息的自由流动、自由讨论、思想自由——如果可以这样形容的话。我在苏联和东欧国家待过较长时间，在这些国家设有基金会，对它们有所了解。我对中国和苏联作过比较：中国政治是成功的，人民支持政府、乐观、有热情。可能是因为我只去过中国东部，对中国了解不够，观点失之偏颇，不过我觉得目前的环境对中国的政治开放和建设开放社会是有利的，民众的心态是建设性的。要知道，变化的历程是非线性的，总有一天形势将变得不那么有利，如果还没能建立起一个开放的体系允许自由表达，就会出现崩溃的严重局面。东南亚的印度尼西亚一度发展很快，雅加达宛如中国的上海，但它的体制中存在着僵化的成分，如政治体制、与美元挂钩的汇率机制等。由于缺乏调节机制，一旦出现问题便导致崩溃和危机。因此，在经济繁荣时应作出一些灵活的安排。

朱镕基： 你的观察很深入，观点也很深刻。中国目前最大的问题在金融市场。中国已实现了经常项目下人民币的自由兑换，但离资本项目下的可自由兑换还很远，有许多问题尚待克服。谈到人才，华人中人才是多，但很多已被外企聘用，成为其驻华代表。

索罗斯： 可以考虑建立合资企业来发挥这些人才的作用。

朱镕基： 我们每年400多亿美元外国直接投资都用于建立合资企业了。中国需要人才激励机制。中国的工资水平低。见到有人工资高就眼红，这种心态不改变，难以吸引国内人才。

索罗斯： 据我了解，中国尚未允许外国共同基金来华建立合资企业。通过这次访问，我有意在中国设立一个合资企业吸引年轻人才前来管理。

朱镕基： 中国尚未允许外国共同基金来华投资，因为我们自己已有的一些基金都不能令人相信，由于监管能力不足，我们的这些基金

在股市上弄虚作假。也许可以考虑你的意见，与外国共同基金合作，可能比自己的基金还要好些。

索罗斯： 这样还可以吸引股市上的散户，他们目前在股市上犹如赌博，而通过共同基金的专业管理可以得到更好的回报。金融市场的发展不光是个监管的问题，主要还是一个文化的问题，如投资心态、行为、标准等，应该向机制化发展。中国有这方面的人才，可以吸引过来。

朱镕基： 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也有开放金融市场包括共同基金的时间表。

索罗斯： 时间表还应提前。应在对外开放金融市场前，利用外国技术和经验培育国内机构。日本在这方面就犯过错误，它到最后一刻才允许摩根士丹利和高盛等进入日本，此前并没对日本企业进行国际化和现代化改造。所以，中国应通过合资企业等方式与外企争夺人才。

朱镕基： 从你的谈话里，我学到很多东西，以后有机会再谈。你有什么意见可直接告诉我，可以写信给我。也可以找他们(指王梦奎、辛福坦①)。

---

① 辛福坦，当时任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副会长。

索罗斯： 我还是找他们。我的公司与投资银行不同。如果可以找到中方合作伙伴，我愿意在中国建立合资企业并持少数股份。

朱镕基： 欢迎。

索罗斯： 大的银行或其他机构都可以从合资企业中获益。

朱镕基： 我更看重你的经验。

走向更加开放和繁荣的中国经济

(2001年9月19日)

2001年9月17日至19日，第六届世界华商大会在江苏省南京市召开。出席大会的有来自世界各地以及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台湾地区和中国内地的近5000名华商。这是朱镕基同志在本届世界华商大会中国经济论坛上的演讲。

来宾们、朋友们、乡亲们：大家好！

在跨入新世纪之际，第六届世界华商大会在中国召开，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我代表中国政府和人民，对来自世界各地的贵宾们表示诚挚的欢迎！

新中国成立50多年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蒸蒸日上，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发展。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中国经济正以雄健的步伐，走向更加开放和繁荣。

近几年，世界经济环境复杂多变，中国经济历经考验。我们成功地抵御了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实现了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今年以来，在世界经济增长明显减缓的情况下，我国经济依然保持了良好的发展势头。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7.9%。1到8月份 和去年同期相比，工业增加值增长10.4%，财政收入增长24.7%，固定资产投资增长18.9%，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10.1%，居民消费价格上涨1.2%；进出口总额3305.32亿美元，增长9.6%，其中出口 1709.94亿美元，增长7.3%；实际使用外商直接投资274.4亿美元，增长20.4%；国家外汇储备在今年9月15日达到1935亿美元。即使世界经济环境还可能出现某些不利因素，但我们相信中国经济仍将继续在快增长、高效益、低通胀的良性循环轨道上前进。



2001年9月19日，朱镕基在第六届世界华商大会中国经济论坛上发表演讲。

上面的这些成绩来之不易，是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驾驭全局，审时度势，及时采取了一系列有力政策措施的结果。我们立足于扩大国内的需求，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并且始终保持政策的连续性和必要的力度，重点是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增加对科技、教育、环保的投入，提高城乡居民特别是中低收入者的收入。同时，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和国有企业改革、改组，采取多种措施鼓励

出口。实践证明，我们实行的方针政策是完全正确的，对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已经并将继续发挥重要的作用。

随着新世纪的到来，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面对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和科技革命迅猛发展的新形势，顺应世界发展潮流，我们将大力实施经济结构调整战略、西部大开发战略、科教兴国战略、可持续发展战略，来显著提高我们经济的创新力、竞争力和抗风险能力，使中国经济以更大的规模和更高的水平持续向前发展。

第一，实施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这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任务。刚才，我讲了一连串数字说明中国的经济总量不算小，当然，人均就很低了。我们的经济总量主要是在一些传统的产业方面占优势，比方去年生产了1.4亿吨钢、10亿吨煤、1.2万亿度电，这些传统产业产品的产量居世界第一，水平已经是很高了。但是，我们的高新技术产业、现代化的金融等服务行业的发展还很落后。当然在某些领域，比方说信息产业，我们并不落后。例如，现在全国的程控电话已经达到1.5亿线，移动电话交换机总容量已经达到1.2亿门，总量超过了美国，居世界第一。这些信息产业设备的生产也是立足于国内，达到了世界的先进技术水平。但是其中的核心技术，比方说集成电路的生产技术和研究发展，还落后于世界上最先进的水平，我们还需要努力。因此，如果不调整我们的经济结构，我们要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的发展，就非常困难。所以，我们在继续推进工业化的同时，要不失时机地加快信息化发展，实现经济和社会信息化，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和整个经济现代化。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加快发展银行、证券、保险等现代服务业，广泛运用先进技术来改造和提升我们的传统产业。

与此同时，我们还要加快农业结构调整，推动传统的农业向现代的农业转变。我这里想讲一个问题：中国人民的吃饭问题。十二亿几千万人口的吃饭问题，始终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有人曾经预言，中国养不活它的人口。确实，我们在1993年到1994年的时候曾经很困难，粮食歉收。当时我们抛售了国家储备粮的一半，来稳定粮食市场。但是从1995年开始，由于我们采取了一系列正确的农业政策，特别是三次

提高粮食价格，从1995年的秋季开始，我们的粮食就自给自足了。而且在后来的几年，粮食供过于求，每年富余几百亿斤存在仓库里面。现在我们粮食的库存已经达到了5000亿斤，包括国家的储备加上周转库存。现在我们伤脑筋的是粮食太多了，也出口了3000万吨，还是太少了。今年、去年都有严重的旱灾，但是粮价一点也没动，因为粮食库存还是多得不得了。虽然国家采取以保护价敞开收购农民余粮的政策，但是在这种供过于求的形势下，粮食的价格逐年都在下降。因此，农民的收入就难以增加。从全国讲，农民的收入每年都增加，但是对粮食主产区来讲，像东北三省、中部地区的几个省，那里的农民收入就有下降的趋势。现在如果不采取调整粮食种植结构的措施，就会出现城乡人民收入差距拉大的问题。因此，我们在加紧调整粮食的种植结构，逐步放开粮食商品化的市场，沿海各省市什么赚钱就种什么，不要再多种粮食了，让粮食主产区发挥它的优势。当然，还有一个最重大的措施，我在后面再讲，就是退耕还林。粮食多了，别再跑到山上去种地了，把树林种起来。不要在洞庭湖区再围湖造田了，把耕地退了，把湖面扩大，增加它的防洪和蓄洪能力，并改善生态环境。恢复洞庭湖以及鄱阳湖、洪泽湖、太湖等等湖泊的历史原貌，恢复范仲淹在《岳阳楼记》里讲的“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我看这个景象的恢复也很快了。这样有利于全面调整和优化经济结构，有利于促进农业、工业与服务业，传统产业与高新技术产业，乡村经济与城市经济良性互动，共同繁荣。这是我们最重要的产业结构调整的战略。

第二，加快西部地区大开发，是实现地区协调发展和为全国经济发展开拓广阔空间的重大战略举措。今后一个时期，西部地区大开发的重点是加强基础设施和生态环境的建设。力争用五年到十年的时间取得突破性进展。目前，西气东输、西电东送、青藏铁路、天然林保护、退耕还林等一批对中西部地区发展有全局意义的骨干工程已经相继开工，进展顺利。关于这几个项目，我稍微说一说。西气东输就是把我们在新疆塔里木油田发现的大量天然气，通过管道输送到上海，全长4200公里，对沿途九个省区市的工业经济及城市的热力供应，都要进行结构调整，这个项目的效益是很大的。这个工程已经进行了国

际招标，今年就要开工，很快就可以建成。不久前，我访问俄罗斯，跟它签了一个建设1400公里输油管道的协议，把伊尔库茨克的石油送到满洲里，从满洲里送到大庆，再从大庆送到全国。从俄罗斯进口石油，比从海上进口要便宜，来源可靠、稳定。西电东送就是我们西南地区四川、云南、贵州、广西有大量的水电资源，开发的成本很低，电价要便宜很多。而广东3000万千瓦的电很大一部分是烧油，烧重油、烧柴油，电价很贵；而且，广东在“十五”期间可能要增加1500万千瓦的用电量。因此，最好的办法就是把西南各省区的水电，通过50万千伏的输电线路送到广东，电价比它原来的便宜得多。既满足了沿海地区特别是广东用电的需要，又能够使我们西南地区的贫困人民更好地脱贫。因此，我们现在不但把几十年想开工而没有开工的水电站，基本上都开工了，而且正在抢修通向广东的几条50万千伏的输电线路，齐头并进。青藏铁路，就是从青海修建到拉萨的1000多公里长的铁路，这条铁路施工难度是很大的，因为它是在4000米以上的高原冻土上施工建设，世界上没有先例，所需资金也是巨大的，但是我们一定要修。我亲自到青海的格尔木，宣布青藏铁路开工了。本来这条铁路四五年就可以修通，但是我们为了保护青藏高原的植被、生态环境，尽量缩小工作面，把建设时间延长到六年，到2006年建成。我已经向外国人宣布，你们有人不是老说西藏没有宗教信仰自由吗？现在修了一条舒适而豪华的客运铁路，请你们愿意到西藏去的，都去看一看西藏究竟有没有人权，究竟有没有宗教信仰的自由，你们自己去看嘛！退耕还林，我在前面已经讲过了，前年、今年，我分别到四川的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甘孜藏族自治州考察。过去这些地区，为了保证吃饭的问题，把地都种在高山峻岭上了。现在，我们的粮食都在仓库里面发霉了，还到山上去种地干什么？根本就没这个必要了，退耕还林，把原来在山上种粮食的耕地改为种树。我在甘孜藏族自治州看到只经过一年半的时间，原来种地的山上，现在全是绿的了，都种上树了，很有希望。我相信，只要五到十年，这个面貌就完全改观了。



2001年9月19日，朱镕基在江苏省南京市接见出席第六届世界华商大会的部分嘉宾。

各位来宾、各位朋友、各位乡亲，你们可以看看南京的绿化情况。应该承认，南京的绿化是多少年的成果，特别是中山陵。我跟南京市和江苏省的领导同志说，你们光在城外种树不行，还要把大树移到这个城市里面来，农民就发财了，不然农民的收入怎么增加？所以，你们今天看到南京郁郁葱葱，是下了很大的工夫啊，光从省内外就移进四万多棵大树。这几年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发展，我都说不清了，因为中国这么大，我没有到所有的地方去啊，但面貌确实全部焕然一新，这就是我们实行正确的发展战略的结果。

回头来讲西部大开发。国家已经决定对西部地区实行重点的倾斜政策，在建设资金投入、项目安排和财政转移支付等等方面，加大了支持的力度，制定了鼓励国内外投资者参与西部大开发的政策措施。广

衰的西部地区正迎来大开发、大发展的新局面。不但我们全国人民关心西部大开发，外国人也非常关心中国西部地区的开发。几乎世界上所有大的石油公司都来投标西气东输。在俄罗斯，我见到普京总统，专门谈到西部大开发。他们表示要参加西部大开发，为此，我们新成立了中俄的工作协调小组。西部大开发是几代人的事情，但是我们在未来的五年到十年要有一个突破性的进展，这是我们一个重大发展战略。

第三，继续实施科教兴国的战略。高度重视发展科技、教育，把科技创新和人才培养放在突出的战略位置。继续推进国家创新体系建设，促进企业成为技术进步和创新的主体，提高自主创新的能力。集中力量在高科技的领域取得重大突破，大力促进科技成果产业化。振兴教育事业，全面提高国民素质。实施人才战略，广纳天下贤才，培养和造就大批适应时代发展需要的新型人才。我们过去有很多优秀的人才都到美国去了，回来的很少。现在，这个情况已经开始改变了，很多在海外的华人学成后，甚至是一些有相当经验的人才，愿意回到祖国来，因为他们觉得中国是有前途、有希望的。我们欢迎他们回来，希望他们回来。我们采取了各种优惠政策欢迎他们回来，他们在外面拿多少钱，我们也可以出那么多钱。实际上，这些在海外求学的、工作的人才，他们并不是要求很高的工资，但是，要给他们一个能够发展的机会。因此我相信，这些人才会越来越多地回到祖国，中华民族振兴的希望会越来越大。

第四，坚持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我们对这个战略的重要性的认识，是经历了一个长期的、痛苦的过程。我们人均占有的自然资源，在全世界算是很低的。过去呢，我们这么多人要吃饭、要发展，所以，我们曾经走过牺牲环境来换取发展速度这条路。不好说它是弯路，因为很可能这是一条很难避免的路，不走这条路，不把地种到山上去，怎么养活这十几亿人口？但是，它造成了严重的后果。山上种田能不导致水土流失吗？，长江、黄河的泥沙就淤积，这样问题就来了。现在可以说，我们对这个教训有了深刻认识，因此，我们将坚决贯彻执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全面加强国土综合整治和生态环境建设，着力

形成有利于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的消费方式和生产结构。建设经济繁荣、山川秀美的美好家园，这就是我们的目标。

为了实施上述的发展战略，我们将坚定不移地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为经济更大的发展提供持久的强大动力。

首先，我们将继续推进经济体制的深层次改革。进一步调整和完善所有制的结构，巩固和发展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格局。目前的格局有了很大的改变。朋友们，1991年，我从上海到中央工作的时候，国有企业产值占整个国民经济的比重是55%，集体企业包括乡镇企业的产值比重约为35%，外资企业以及个体、私营企业产值只占10%。现在是什么情况呢？三分天下了。国有企业只有三分之一了，而且还在减少；集体企业占三分之一；私营企业或者说民营企业加外资企业，已经占到三分之一以上了。所有制的结构有了很大的调整，公有制本身的实现形式也有很大的改变。根据党的十五大的方针，我们积极探索实现公有制的多种形式，最主要的是股份制。国内股票市场的市值已经达到5.5万亿元，很多企业都上市了，提高了它们的透明度，也探索了公有制的实现形式。到海外上市的公司越来越多，特别是我们的大型企业包括中国石油、中国石化、中国移动、中国联通等等，在香港地区和外国的(如伦敦、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募集的资金约300亿美元。我们现在还在进一步建立规范的现代企业制度，进一步全面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我们也正在研究并采取措施，推进电力、铁路、民航、通信等垄断性行业的体制改革。通过完善市场体系、整顿和规范市场行为，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秩序。加快推进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构筑社会“安全网”，为改革和发展营造稳定的社会环境。

其次，我们将以更积极的姿态推进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中国即将加入世贸组织，这个已成定局了。在日内瓦召开的世贸组织中国工作组第18次会议已经通过了决议，就等待11月份召开世贸组织所有成员国部长级会议时正式通过。加入世贸组织后面临的竞争会有多大，我心里也不是很有底，麻烦将会不少，但是我还相信，

中国的企业有足够的竞争力来迎接加入世贸组织以后全面开放的挑战。我们还是有这个能力的。

我们会信守承诺，进一步开放国内市场，扩大开放的领域和地域，有步骤地推进金融、保险、电信、贸易、旅游等服务领域的对外开放，积极开辟利用外资的新形式、新途径。我们要把吸收外资同调整国内产业结构、推进西部大开发、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紧密地结合起来，着重引进先进技术、现代化管理和专业人才。

朋友们，请你们注意我这句话：我们今后开放的重点、引进的重点并不着重于资金，我们现在不是很缺乏资金。我刚才已经告诉大家，中国现在已经有1935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到年底会达到2000亿美元；我们国内的外汇存款有1300亿美元。一方面，我们国内在利用外资，去年是400多亿美元，今年可能达到480亿美元。另一方面，我们国内的外汇资产在国外通过购买债券、拆借等有3000亿美元。中国在利用外资，外国也在利用中资。所以，现在中国并不十分缺乏资金，包括外汇。我们现在缺乏的是先进技术、现代化管理，特别是人才。现在经济的竞争是人才的竞争，我们特别希望海外的华人同胞、海外的学子、留在海外的人才能够回到祖国来。回到国内来发展你们的事业，是大有空间、大有发展余地的。当然，我们必须继续改善内地的投资环境和经营环境，包括改善社会的环境。所以，今年我们开展的整顿社会治安，打击黑社会、恶势力，规范和整顿市场经济的秩序，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下了很大的力气。只有改善了投资环境和经营环境，依法保护投资者的权益，人家才能进来。我想这个需要时间，但是我们决心是很大的，我相信这个目标也会比较快地实现。同时，我们也鼓励有条件的国内企业到境外投资和经营，增进与世界各国的经济往来与合作。比方俄罗斯的市场，我认为将来很有前途。我刚从那里回来，他们进步很快，发展速度很快。他们有资源，这一点是我们没有的优势，所以从俄罗斯一回来，我就号召中国大型的、有信誉的企业，要进入俄罗斯的市场，不要怕风险，俄罗斯将来的发展也是不可限量的。

尽管中国经济目前仍有不少困难，今后也还会遇到这样那样的挑战，但是，我们的有利条件很多。最重要的是我们国内市场巨大，人力资源丰富，社会政治稳定，发展道路符合我们中国的国情。我们的朋友遍天下，特别是有海外广大华侨、华人的关心和支持。我们将继续坚定不移地走自己的道路，完全有信心、有能力战胜前进道路上面的一切艰难险阻，使国民经济得到更好的发展，不断攀登新的高峰。

中国经济的更加开放和繁荣，不仅会大大增进中国十几亿人民的福祉，而且还会给包括广大华商在内的世界各国企业家提供广阔的市场和无限的商机，也必将对世界的繁荣和发展作出更大贡献。我们华人估计有6000万在海外各地，我原来以为我们在海外的移民是世界上最多的。我最近到爱尔兰访问，改变了这个看法。爱尔兰的移民是8000万人，光在美国就有4500万人。这个情况跟我们差不多。那些人当年也是由于战争、饥荒等原因，离乡背井、抛妻弃子，到海外去找生路，现在都发达了。他们对爱尔兰的发展、资金的支持、人才的引进、技术的转让都起了很大的作用，因此，爱尔兰在很短的时间里，从一个农牧业国家跨越式地上升成为工业、科技高度发展的国家。我这次去的时间很短，只有两三天。我去了香农开发区，观摩了它的高新技术。我特别感兴趣的，就是它的海外同胞对国家发展的贡献。

我讲一个插曲。爱尔兰这个国家有它的特点，独立性很强，人民长期为独立而斗争。我在那儿访问期间有一个印象，爱尔兰高层领导人对我们很友好。爱尔兰的普通人民对我们也很友好。我们在街上走的时候，周围老百姓都向我们招手。但是，就是新闻媒体实在是不友好。我在访问期间，看当地的报纸，最大的照片是“西藏独立”和“法轮功”的游行示威，我和他们总理的照片只在报屁股有一幅。我现在说不上“年少气盛”，但年老还是有点“气盛”，就在公开的工商界早餐会上发表讲话时说了这件事。我说，我们中国人民很关心也很了解你们爱尔兰，我们知道你们是一个长期为民族独立和国家建设而奋斗自强的民族，你们发展得很快，我们很钦佩。但是我说，你们了解中国吗？你们只了解中国三件事情：第一，人权；第二，西藏；第三，“法轮功”。我说，除此之外，你们还了解中国什么呢？没有更多。我这个话讲得

有点不太客气，但是没办法，我还是说了。我说，你们爱尔兰是发展得很快，但是你们知不知道中国的发展比你们还快呢？你们爱尔兰有7万平方公里的土地、380万人口，国内生产总值780亿美元，人均2万美元以上，不简单哪！但是，你们知不知道上海只有6300平方公里，它的地区生产总值跟你们的国内生产总值是一样多，我告诉你们“天外还有天”哪。最后，我跟他们的女总统麦卡利斯会谈，谈了一个小时，辩论“西藏问题”就用了50分钟。 这位女总统出生于北爱尔兰，她跟达赖喇嘛有过接触，因此对西藏“独立”特别感兴趣。我就跟她辩论了，我说西藏过去是农奴社会，过的是什么生活？现在跨越式地一下子进入了现代文明社会。它的生活水平和人均财政收入水平，超过了全国平均数好多，那都是中央财政补贴的。她说，人不但要有物质生活，还要有精神生活。我说精神生活，中国的宗教信仰自由是《宪法》规定的，我们没有侵犯，个别事例就很难说了。可你讲你的，她不相信。她说她跟达赖喇嘛接触过，达赖访问了爱尔兰。在爱尔兰，很多佛教弟子都去亲他的手，表示这种“爱心”。她说，我也希望总理阁下能够发挥这种爱心，使西藏人民也爱你们。我就说，总统阁下，任何人要使所有人都爱他、都喜欢他，是不可能的。我说，我知道在国内相当一部分老百姓是很喜欢我的，但是有一部分人对我是恨之入骨。一个人怎么能够让所有人都爱他呀？我们这个代表团里面，所有陪同我访问的部长都坐在这里了，我相信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喜欢我，但我也相信有一小部分人对我对他的批评很不满意，等我下台以后可能要对我进行“报复”。这个总统就说，哎呀，你非常富于幽默感。她说，据她所知，中国人是没有幽默感的，她很喜欢我的幽默感。这时候，我就不好回答了。我怎么回答呢？我只好说，我们国家是一个开放的国家，我们的民族从来都是兼收并蓄、博采众长的。中国有56个民族，历史上都是长期融合的。我心里还有一句话没讲呢，也不好翻译。你说中国人没有幽默感，但两千多年前，西汉时期司马迁写的《史记》里面就有《滑稽列传》了。滑稽者，中国之幽默也。中国人怎么没有幽默感呢？两千多年前就在幽默了。我这个话扯得太远了，但是看起来大家还是很有兴趣的。

现在，我回到这个问题，讲我们华人。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曾指出：几千万华侨、华人是一支了不起的力量，是中国大发展的独特的机遇。长期以来，广大海外华侨、华人以不同方式热心支持和参与中国的经济建设。迄今为止，在华投资的外资企业，大多数的项目和资金是来自于华商。中国经济所取得的辉煌成就，海外华侨、华人功不可没。你们始终不忘乡里之情、桑梓之谊，闯过道道难关，作出许多贡献，你们的创业精神已经载入中国经济发展的辉煌史册。遍布世界各地的华商朋友，有各领域的专业人才，既精通国际市场经济运作，又熟悉中国的传统文化，具有在中国发展的独特优势。不论是已经在中国投资的，还是正在寻找项目的华商朋友，都可以在中国这片热土上找到众多的发展机会，大展宏图。我们热诚欢迎广大华商朋友以各种方式，继续踊跃参与中国的现代化建设。

充满蓬勃生机和拥有广阔前景的中国经济，正以强劲的姿态向新的高度跨越。让我们大家携起手来，为在新世纪实现中国的现代化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奋发努力！

“9·11”事件对我国经济的影响和对策

(2001年9月27日)

这是朱镕基同志在国务院党组第16次会议上讲话的一部分。

美国“9·11”事件以后，国际形势的不确定因素增加。这个事件对美国经济和世界经济的影响究竟有多大，尚难预料。看样子，美国非动武不可，但打也不是那么容易，打起来还不知道会有什么后果。所以，我们必须早做充分准备，深入谋划对策，研究一旦战争爆发，应该采取什么措施。

“9·11”事件的发生和发展，对我国经济的影响将是多方面的，我们一定要有清醒的认识和足够的估计。现在看，最直接的影响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最敏感的是对外汇储备的影响。“9·11”事件发生当天，我正在莫斯科访问。第二天，我对俄罗斯领导人说，由于美元贬值，昨天一天，我国外汇储备(主要是美元资产)账面上损失了40亿美 元。那天，美元兑欧元从0.89美元兑换1欧元贬到0.91美元兑换1欧元，日元兑美元也升值了。从这个情况看，我们改变汇率形成机制的研究还可以继续进行，但现在不宜变动。因为人民币是紧盯美元的，美元贬值，人民币兑日元、欧元也随之贬值，这就提高了我们对日本、欧盟的出口竞争力，部分达到了我们原来的目的。现在改变汇率形成机制不是时机，如果现在实行人民币与美元、日元、欧元一揽子货币挂钩，人民币还有可能升值。所以，这个问题要从长计议，现在还是盯住美元、稳定汇率比较好。我相信，美国主观上还是想保持强势美元政策的。但是美元贬值一点，对我们向日本、欧盟出口也有好处。

第二，对出口会产生很大的影响。近几年，我国出口增长很快，去年出口额达2492亿美元，折合成人民币超过2万亿元，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8.94万亿元的22.4%。如果出口额一年下降10%，当年经济发展速度就会降低两个多百分点，就会有更多的人失业，这是多么大的影响

啊！千万不要低估。大的影响不在今年，而在明年。明年的出口额比今年减少10%，也是有可能的，因为美国的老百姓存在观望心理，消费和投资信心下降，普遍压缩消费和投资开支，不敢坐飞机，也不敢出去旅游了，不少相关企业纷纷裁员。这对美国的购买力影响是很大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应力争保持对美国的出口量， 美国市场还是需要价廉物美的必需消费品的。当然，由于美国经济增长明显减速，我们要增加对他们的出口也是不容易的。现在对美国经济估计最乐观的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它说美国经济今明两年都可保持2.5%的增长速度，这是捧场的话。美国商务部在今年7月底公布，第二季度美国经济增长化0.7%；最近经调整后公布为增长0.3%。很明显，美国经济在今年第三、四季度将是负增长，明年上半年还会负增长。这是大多数人的估计。格林斯潘①认为，要弥补“9·11”事件造成的损失，美国政府需要拿出1000亿美元，这还不见得能真正补偿损失。所以，美国经济趋于衰退是肯定的，日本经济持续低迷也是肯定的，我们要充分地考虑到这个问题。

---

① 格林斯潘，即艾伦·格林斯潘，当时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

第三，对股市的直接影响不会太大。主要原因是我们的证券市场基本上是封闭的。固然“9·11”事件以后这段时间，我们的股市指数有上有下，下得多一点，但这同前一阶段很多事情有关系，包括“银广夏”等上市公司欺骗股民的问题以及调查银行信贷资金入市、减持国有股、增发新股等问题，这些事情对股民的心理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多年来，我们的股市很特别，人家涨我们跌，人家跌我们涨，外部对股市影响不大，关键是国内因素。目前股价下降一点有好处，可以缩缩水，减一点肥，趁此机会挤掉一些泡沫。几十倍的市盈率，怎么得了！道德风险太大，企业都去炒股票，谁去搞生产？但也有一条，就是不要发生股市的大震荡甚至崩溃，一定要努力避免造成社会不稳定。总的来看，目前股市还没有受到很大的影响。

我主要讲以上三条，此外还有其他一些影响，大家要深入研究。总之，既要考虑近期影响，又要考虑长远影响。要多考虑几种可能性，有多种预案，做到未雨绸缪、有备无患。

对于国际经济形势的新情况、新变化，我们要冷静观察，沉着应对；同时，要抓紧研究有力的因应之策。这里，我着重讲以下三点。

第一，最根本的应对措施，是扩大内需。立足国内需求，是我们必须长期坚持的战略方针，在近期尤其重要。内需从哪里来？现在扩大内需的重要措施，在生产建设领域，就是发行国债，加上银行信贷资金配套，拉动经济发展。国债资金又从哪里来？虽然国债主要是向银行发行的，但这些钱还是老百姓的储蓄。在消费领域，直接扩大消费需求，就要增加城乡居民收入，包括给干部和职工加工资、减轻农民负担等。我认为现在要明确提出这么一条，就是要培育和保护来自老百姓的内需。扩大内需不是无限的，不是可以予取予求的。有人告诉我，前两年财政部发行凭证式国债，老百姓头天晚上就开始排队，第二天上午9点多钟就卖光了。这次财政部发行200亿元凭证式国债，20多天前就开始卖了，现在还在卖，没有人抢买了。这是因为居民的购买力已开始分流了。我们管宏观经济的人，特别是国家计委、国家经贸委、财政、银行等部门的同志，要很好地研究这些问题，分析一下究竟还有多大的社会购买力、扩大内需还有多大潜力。不能说一发国债就可以拉动经济，不是这么简单，发国债也是有限度的，所以要重视培育内需。

培育内需是什么意思呢？这是多方面的。从根本上说，必须继续增加城乡居民特别是低收入者的收入。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要继续给公务员加工资和坚决做到“两个确保”①。增加公务员的工资，有利于他们安心工作，也有利于减少腐败现象。公务员的行为，直接影响企业的经济效益。如果政府的工作效率提高了，寻租行为制止了，行政干预、乱收费减少了，企业就会盈利。企业盈利了，才会给职工加工资，才能调动职工的积极性，才能留得住人才。落实这些措施，可以

稳定人心，增强人们的消费信心，拉动消费增长。财政部要从培育内需着眼来考虑问题。

---

① 参见本卷《在二〇〇〇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培育内需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努力增加农民收入，提高农村购买力水平。这几年，由于粮食生产出现阶段性供大于求，粮价回落，农村经济结构矛盾突出，农民收入增长缓慢，以粮食生产为主的地区的农民收入甚至有所下降。这是国内需求不振的重要原因。我国最大的市场需求在广大农村，必须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使农民收入有较快增长。关键是要大力推进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调整，推进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拓宽农民增收途径；同时，切实减轻农民负担，轻徭薄赋。请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负责研究提出增加农民收入的政策措施；农业部要深入研究加快农业结构调整的举措；国务院农村税费改革工作小组要抓紧总结安徽省等地试点经验，提出明年推进农村税费改革的意见。

第二，一定要防止无效的建设。这几年，中央没有或者很少用国债资金安排加工工业项目。但是，不少地方用银行信贷搞的加工工业重复建设仍然很多，比如这两年，仅浮法玻璃就新上了30多条生产 线。还应该注意，基础设施也不能搞重复建设或者过分超前。不能说修高速公路都好，路多了，没有多少车跑，实际上也是一种浪费。城市里修公路环线，同样不是越多越好。所有建设项目都必须讲求实效，基础设施建设也要考虑效益。不然的话，资金压在那里，不能发挥效益，将来就会超过承受能力，到那时国债就发不出去了，因为投入的资金收不回来，财政增收的能力就会减弱。

第三，厉行勤俭节约，反对奢侈浪费。在国际经济环境日趋严峻的情况下，要克服困难，保持我国经济持续稳定增长，还必须合理使用、节约使用一切资源。现在，无论是生产、建设、流通还是消费领域，都存在大量劳民伤财、铺张浪费的现象。有的地方热衷于搞华而不实和脱离实际的“形象工程”、“政绩工程”；有些地方连工资都不能按

时发放，却乱上建设项目，敞开口子胡花钱；有的地方违反规定修建楼堂馆所，办公大楼越盖越大、越盖越豪华；有的地方搞名目繁多的庆典活动，讲排场、比阔气；相当普遍地存在公款宴请、公费出国旅游，以及大吃大喝、挥金如土的现象。凡此种种，耗费了巨额资财，再大的家底也经不起这样挥霍。要坚决刹住这种铺张浪费和奢靡之风，这不仅有利于把有限的财力、物力用于经济改革和发展的急需，而且有利于端正党风、政风。

对这个问题，我要强调几点：第一，要以贯彻落实党的十五届六中全会精神为契机，在全党、全社会大张旗鼓地倡导艰苦创业、勤俭建国、勤俭办一切事业，切实制止各种不切实际、不计效果的错误做法。第二，努力节省开支。生产、建设、流通领域都要大力降低成本和费用。企业、事业单位，机关和学校，都要精打细算，杜绝各种不必要的开支。明年，要对各地区、各行业、各单位节省开支提出明确具体的目标和要求。第三，加强财经监督管理，严肃财经纪律。强化预算管理和审计监督，实施财政专户管理。要严厉查处各种违反规定乱花钱的行为，禁止用公款大吃大喝、游山玩水和进行高消费的娱乐活动，禁止巧立名目的出国旅游。第四，积极调整财政支出结构。要区别轻重缓急，该保的一定要保，如增加农业、科技、教育、环保、国防、政法的投入，落实“两个确保”，增加机关和事业单位人员工资等。该压缩的开支一定要压缩。要把调整财政支出结构，与调整经济结构、大兴艰苦奋斗之风结合起来。

顺便再讲一下外汇储备问题。关于我国目前外汇储备2000亿美元的规模。第一，我认为不多。日本国内生产总值4万亿美元，拥有3900亿美元储备；韩国国内生产总值4700多亿美元，而外汇储备在去年年底达到960亿美元；中国香港、台湾的地区生产总值分别只有1600亿美元、3000亿美元，相当于内地的几分之一，但外汇储备分别在1000亿美元、1100亿美元以上；连新加坡这样小的国家，外汇储备也已达到727亿美元。同这些国家和地区相比，我们这么大的国家，国内生产总值1.1万亿美元，有200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不能算多。第二，按新的口径统计，我国外债已超过1800亿美元。当然，这些外债包括企业借

的，但企业还债也要向国家买外汇。相对于这些外债规模，我们的外汇储备更不算多。第三，外汇储备多了是好事。外汇储备多，说明我们国家有实力，这有利于保持人民币币值稳定。我们在任何时候都有充足的外汇支付能力，人家才愿意和我们做生意。外汇储备逐月增加，是外贸顺差和吸引外资增加的结果，更是好事。总不能盲目扩大进口，减少顺差，如果这样，国内企业也承受不了。第四，当今世界风云多变，在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下，推进改革开放和发展，保障国家经济安全，必须有相当规模的外汇储备。特别是我国即将加入世贸组织，保持充裕的外汇储备，可以应对各种不测之需。第五，国家外汇储备是资本，它可以生息。问题的关键，是怎么经营好外汇储备。应该说，过去这些年外汇储备的经营是不错的，每年都能够保证5%以上的收益率，一年能拿回几十亿美元，即使考虑外汇占用人民币资金的成本，净回报也是很可观的。如果把这些人民币放在国内投资，根本收不来这么多钱。

“9·11”事件以后，国际政治和世界经济的格局肯定会发生巨大变化，对我国经济的影响绝不能低估。这对我们可能是又一次重大挑战，甚至是比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更大的挑战。因为当时的危机只限于亚洲，美国、欧洲的经济还处于景气时期。而“9·11”事件以前，美国经济已开始减速，日本经济进入衰退，欧盟经济总体也不景气，阿根廷等拉美国家正在经历严重的金融危机，东南亚国家也很困难。今后一个时期，世界经济可能会进入一定程度的低迷状态。我国外部的经济环境肯定会给我国经济发展带来相当大的负面影响，对明年的影响会更大。但是，只要我们统一认识，团结一致，应对得当，这也可能成为一次难得的机遇。我们一定要认真贯彻党中央、国务院的各项政策措施，改进党的作风，转变政府职能，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改善投资环境。这样，中国将不仅能成为全世界一个最大的市场，而且可能成为一片投资乐土、一个世界性的工厂、一个最安全的旅游胜地、一个繁荣稳定的伟大社会主义国家。

中国能够成为世界的一片投资乐土

(2001年10月22日)

这是朱镕基同志在会见出席第五届中美工程技术研讨会的海外华人专家时的讲话。本届研讨会由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国家外国专家局、中国国际人才交流协会和美洲中国工程师学会共同举办，来自北美的67位专家与来自中方60余家企业的210多位专家出席。与会的北美专家在考察了25个中国企业后，围绕计算机网络与软件、光电和通信、环境数字电器、机械、石化与化工、医药与生物工程、新材料、能源与环境工程八个领域，与中方专家展开了对口研讨，并提出了不少具有针对性的建议。

同胞们、朋友们：

大家早上好!

我们都是同胞，本是同根生，所以，我还是叫你们海外同胞。我知道你们在各个领域里的专业知识非常深厚，也作出了杰出的成就。我对你们很钦佩。为什么呢？因为我是学工程出身的，至今对工程还怀有很浓厚的兴趣。但是，我跟大家不同，我没有工程实践经验，最多就是架过低压的电力线路，修了一两个变电站。出了大学校门，我基本上就是搞宏观经济了。搞宏观经济最头疼的问题是金融。今年的股市到底会掉成什么样，还不知道呢。我要有关部门赶快及时向我报告，但我也没办法，股票要上要下，政府管不了啊。我当初在清华大学学经济就好了，现在要补课，实在是困难。我有一个美国朋友叫斯蒂格利茨，斯坦福大学教授，在世界银行工作，当过克林顿的经济顾问。听说他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题目是关于不对称信息。他这人非常直爽，批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时够厉害的。他也批评世界银行，由于在世界银行当高级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所以，他批评世行轻些，批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重些，这也是“不对称”的。如果你们有来自斯坦福大学的，请代我向他获奖表示祝贺。



2001年10月22日，朱镕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出席第五届中美工程技术研讨会的海外华人专家。

我在昨天把你们67位的履历表都看了一下，对你们的专业很感兴趣。诸位能在“9·11”恐怖袭击事件以后，不辞辛劳，到中国参加中美工程技术研讨会，这种精神很值得我学习。我非常钦佩你们，对你们表示热烈的欢迎！

中美工程技术研讨会从1993年开始，到现在已经是第五届了，为提高中国的科学技术水平，特别是企业的技术革新水平，起了很大作用。我看到蔡焕堂①先生给我们介绍的转炉炼钢补炉技术，可以极大地提高转炉的炉龄，具有很高的实用价值，当然也有很高的科学技术价值。我只是举了这么一个例子，相信还有很多对中国经济建设，以及对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都起了很好、很大作用的例子。我知道诸位已经去了海尔、武钢、宝钢、华北制药、中石化等内地的很多工厂。

这些是比较好的企业，差的你们还没有看到。我相信，你们能提出很多很好的意见来提高我们的技术进步和技术革新水平。对于你们的意见，我们一定会非常重视。我们对中美工程技术研讨会的意义认识得越来越深了，希望研讨会一直开下去。因为我相信，这样一个研讨会对于中国、美国，对于中美两国之间的友谊与合作，一定会起很多难以估计的作用。最近在上海的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会议②的成功召开，不仅有利于推进亚太地区各成员之间的合作与友谊，而且中美友谊也可以借此契机得到更好的发展。我预祝各位中国之行愉快，对中美两国的友谊与合作作出更大的贡献。

---

① 蔡焕堂，1950年生于台湾地区，曾任第二、三届中美工程技术研讨会冶金组组长。

② 指2001年10月15日至21日在上海召开的亚太经济合作组织第九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及第十三届部长级会议。

我不久前在南京举行的第六届世界华商大会上，敞开讲了几句。我没想到现场有电视直播，要是知道香港凤凰台在现场直播，我就不会那么“放肆”了。当时，我确实是很动情地呼吁海外同胞、海外侨胞、华人学子回到中国来，参加我们的经济建设。说中国经济现在“一枝独秀”，我是不这么看的。一枝独秀，那就麻烦了。一枝独秀，“秀”不了多久，总得大家都好，你才能好啊。大家都不好，你一个人独好，我看恐怕不是这么回事。不论怎么讲，中国的经济始终依靠自己的国内市场。我们采取了各种政策措施，来扩大内需。什么是内需？就是人民的购买力啊。人民不富起来，银行哪来那么多钱？银行没有钱，政府向谁去发国债？人民没有钱，怎么去买消费品呢？我们采取了很多措施去培育、扶持、保护人民的购买力。光给公务员加工资，今年就加了两次。说实话，我的工资比你们的低多了，但话说回来，中国的物价比你们那里便宜得多，买一件东西，在你们那里要十块钱，在我们这里只要一块钱就够了。工资虽然低，但人民生活得还很愉快，因此，积极性比较高，消费信心也较高，我们的内需也一直在扩大。我们也不是不重视国外的市场，这几年，出口对我们非常重要，去年出

口额近2500亿美元，接近我国国内生产总值的四分之一，这个数字很高了。目前，美国经济在减速，欧洲经济低迷，日本经济实际上已进入衰退，我们的出口势必受到很大的影响，但是，我们还是采取各种措施扩大出口。相信美国人民还是需要价廉物美的消费品吧。你总不能说，恐怖主义分子把世贸中心大楼撞倒了，大家就不消费了吧。消费还是需要的，我们的市场也还是有希望的。同时，我们还要开拓新兴的市场，特别是吸引外资在今年有很大的发展。今年1到9月份，我国吸收国外直接投资达320亿美元(不是指签合同，而是指实际到汇)，比去年同期增加22%，增加幅度超出我的意料。这说明，我们的投资环境已经改善了。对中国的投资环境，关于硬件，就是基础设施，我是有把握的；软环境，确实还不太理想，我是指那些法律、法规还不能完全同国际接轨，大有改进的地方。但社会安全还是很好的，我保证你们在这里绝对安全。我们吸引外资，每年都在400亿美元左右。今年搞好的话，可以超过400亿美元。可见，吸引外资还是大有希望的。我们这里安全、稳定嘛。西方老是批评我们的人权，说实话，我们的人权状况还不错嘛。你说我们腐败，我们把腐败分子一个个抓出来，你还要怎么样啊？你说你们搞民主、自由、多党制、普选，对啊，你们搞得很好啊。我们不也在吸收你们好的东西吗？但不好的东西或者是不适合我们情况的东西，就不一定都要吸收了吧。不一定都是一个模式嘛。你们的腐败也不是没有，比我们好一点。我们这里还是有法制的，不是无法无天的。对于现在的世界形势，我承认对“9·11”事件的影响绝对不可低估，可能会改变世界政治和经济格局，但我还是乐观的，还是相信中国只要应对得当，措施符合实际情况，我们的经济在今后几年仍能保持快速增长，就是保持在7%左右，高了也不行。这样的速度还可以保持下去，我们不仅依靠内需，还要依靠外资和出口，最重要的是依靠你们，你们代表了我们炎黄子孙。海外同胞啊，这是一支支持祖国的非常强大的力量。我在第六届世界华商大会上大声地呼吁：“请你们回来！”我讲了以后，心里很虚，因为我们的投资环境不行，你们回来都向我投诉怎么办？但是我也讲了，不是我一声喊，你们就能回来的。如果我们的投资环境不改善，不能让你们在这里生活得很愉快，有用武之地，放开手脚创造自己的事业，你们就不会回

来。我相信，尽管我们有不少缺点，但总是在改进，总是在向前走嘛。现在比较起来，外国人也承认，世界上最安全的地方还是中国。布什总统那么忙，正在指挥打仗，太平洋那么宽，还要战斗机为他的“空军一号”专机护航，要是中国不安全，他怎么会来呢？可见，这里还是一块乐土。我相信，中国将来会是世界的一片乐土，是个世界性的大工厂。大家都搬到这里来，因为这里成本很低，生产出来的产品有竞争力啊。中国将来肯定又是一个世界性的旅游胜地，五千年的文明，有多少文物古迹啊！我们正在修青藏铁路，也准备开通豪华客车，让世界上的人都可以方便地到西藏去看一看，看看那里的藏传佛教文化，看看中国是不是有宗教信仰自由。说我们干预宗教信仰自由，那是不了解实际情况。

各位同胞，我希望你们多来，来了以后，把中国的实际情况告诉美国人民。我不希望你们只说好的，希望你们还要说坏的，并且把坏的告诉我们，或者在报纸上发表。现在是资讯世界，我们都能看到，这样才能改进我们的工作，才能让美国人民对中国有一个真实的了解。我相信，在这个基础上，中美两国的友谊与合作一定会发展起来，而在座各位能够起很大的作用。

在二〇〇一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2001年11月27日)

2001年11月27日至2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北京召开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党政主要负责同志，中共中央有关部门、国务院各部委和有关单位的主要负责同志，解放军四总部和武警总部的负责同志。这是朱镕基同志在会上讲话的主要部分。

江泽民同志今天上午的重要讲话，全面分析了当前国际国内的形势，深刻阐述了明年经济工作的总体要求和主要任务，我们要认真地学习领会和贯彻执行。下面，我根据中央讨论和江泽民同志讲话的精神，就明年经济工作的具体部署，讲几点意见。书面稿子已经发给大家了，过去是讲完以后听取大家的意见，修改以后再发给大家，今天我先把稿子发给大家，主要是因为时间关系，我恐怕没法照这个稿子念下去了。我没有讲到的内容，不是不重要，是没有时间讲了，请同志们会后再看一看。我就对几个重点的问题，突出地说一说观点。

今年的经济形势，总体还是好的。经济增长速度可能超过7%，但主要不是看速度，主要看财政收入。财政收入1到9月份增加20%左右，预计全年增加16%。这个预计不算很高，按这个数字计算，今年的财政收入比去年增收还是会超过2000亿元。另外，外汇储备也有比较大的增加，到今年10月底，已达到2030亿美元。物价也是稳定的，零售物价指数上升1%。所以我想，今年的日子是可以过得去的，而且还保持了去年的经济发展势头。



2001年11月27日，江泽民、李鹏、朱镕基、李瑞环、胡锦涛、尉健行、李岚清等中央领导同志出席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但是问题就在于，趋势是往下走，特别是出口的形势，除了个别月份的速度有所反弹以外，基本上都是一直往下。现在有人预计今年世界经济的发展速度是2%，能不能达到还很难说。前天美国的经济研究局，是个半官方的机构，宣布美国在今年3月份已经进入衰退。我们很难想象一个经济负增长的国家还能够大量增加从中国的进口，所以对此不能寄予太大的希望。欧盟经济受美国经济的影响，发展趋势几乎是与美国同步的。日本已经是长期的低迷了，预计今年是负增长。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出口就不会上去。去年出口2500亿美元，相当于2万亿元人民币，国内生产总值是9万亿元。出口少一大块儿，那么影响是很大的。我算了一下，如果明年的出口比今年下降10%，那就可能影响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速度两个多百分点。这样的话，我们许多生产能力就没法发挥，导致一些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倒闭，导致更多的人下岗。对这个问题，我们把它看得严重一点好，要有思想准备。特别是加入世贸组织以后，国内外的形势都会有变化，如果我们不把困难看得严重一点，那困难到来的时候，就可能措手不及。我们一定要有思想准备，就是说，要看到现在的经济形势可能比1998年亚洲金融危

机后的情况还严重。我就是想提醒大家这一点，要足够地估计困难，这样才能使我们工作更主动一点，办事情的时候头脑更冷静一点。关于具体部署，我突出地讲一讲主要问题，其他问题也要抓，稿子上都有。

一、增加城乡居民收入，培育国内消费需求

现在大家都知道这个道理了，一碰到困难就是要依靠内需。扩大国内需求，这是我们克服困难的一个根本的对策。不扩大国内需求，国有企业就没法生产，也没有财政收入，工人也要失业。那现在问一句：什么叫内需？大家都知道，内需无非就是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你要有大规模的建设，才能带动那些生产资料工业的生产。没有消费需求，消费品也不能生产。归根结底，内需就是老百姓的购买力。老百姓口袋里要是没有钱，就没有消费能力，也就没有内需，银行里就没有储蓄，你发国债搞基础设施建设也发不出去啊！我们现在还没有碰到这个情况，但是我们一定要认识到这一点，如果老百姓口袋里没有钱，老是说“我扩大内需”，那是一句空话。我们分析一下就可以看出，这几年老百姓口袋里的钱其实已经花得差不多了。我问了身边的人，他们买房子，都是要一次性地拿出几万、十几万元，其余的还要分期付款。这几年，城镇干部职工买房子，许多人把多年的积蓄都用光了。现在全国用消费信贷买房子、买汽车、申请助学贷款等等，加起来已经达到6400多亿元，实际上是把购买力给预支了，已经是借钱消费了，有点像美国人了。另外还有种种社会投资，包括买股票、买债券、买商业保险等等，约有两万多亿元。购买潜力最大的应该说是农民，但是现在农民的购买力没有提上来，因为农业结构调整是个长期的任务，很不容易完成，沿海地区做得好一点，中西部地区跟不上。粮食供过于求，粮食价格上不去。上午，江泽民同志讲了，去年遭那么大的灾，粮食减产9%，但粮价丝毫不动，还在下降。今年又是大灾，我们花了50亿元去救灾，粮价还是不动。根本原因就是粮食多了。粮价上不去，农民收入增加得很缓慢。说今年农民收入有恢复性增长，去年平均增长2%，今年增长4%，这个数字也很难查考。沿海地区农民增加的收入多，粮食主产区的农民收入上不去，有些地区的

农民甚至收入减少，不平衡。现在化肥价格已经下降很多，还是没有人买，农民哪里还有钱消费呢？农村电网改造，农业银行一千几百亿元花下去了，还要继续花，那确实为农民的消费提供了方便，有的地方还做到了同网同价。但是，如果农民没有钱买家用电器，他们也用不上这个电啊。因此，我希望国务院各部门以及各地方的同志，都要做一点调查研究。究竟老百姓有多大的购买力、究竟内需还有多大的潜力，好好调查一下。这也说明，扩大内需是有限度的，发行国债也是有限度的，超过这个限度就没有人买了。那么剩下只有一条了，就是发票子了。我希望不要到那个程度。如果我们不从现在开始重视、培育和保护内需，那么扩大内需就是一句空话。要培育内需就要让老百姓增加收入，要保护内需就不能乱花钱。中央讨论应对明年困难的根本措施就是扩大内需。明年要采取一些什么措 施呢?

第一，要适当增加机关和事业单位职工的工资。因为现在公务员的工资还是比较低的，当然跟一些困难的企业比起来是高的，但是跟那些好的企业比起来还是很低的。低工资有低工资的好处，可以提高自己商品的竞争力。因此，现在也不要随随便便地乱提工资啊，特别是企业，有效益的可以提，没效益的就不能提。有效益的也要注意工资的水平，如果一下子把工资提得很高的话，你出口就没有竞争力了。但是我想，公务员的工资现在确实还是应该继续提高。不但是“薪以养廉”，而且确实能够拉动消费。但是也要考虑到一个问题：预计明年一些指标的增幅不如今年，财政收入的增加也有困难，因此，工资也不能提高太多。现在沿海地区提工资基本上没有问题，只要你给指标就可以提，他们自己有这个财力，中西部地区则不行。从去年第四季度开始，提工资就采取除沿海省市以外，其他中西部地区提工资全部由中央财政拿钱，这就是考虑到地方的困难嘛。现在一些地区县乡干部的工资拖欠是一个严重的问题。一方面我们在加工资，另一方面一些县和乡还在拖欠工资，这不是一个讽刺吗？财政部做了一个测算，现在地方可动用的财力，就是把地方自己的财政收入加上中央转移支付的财力，发工资所占的比例在东部地区每个省只有40%或者多一点，中西部地区是50%或者多一点。也就是说，你手里有的钱用来发工资

的只占一半或者不到一半，由此可见，不能保工资发放是没有道理的。也就是说，你还是乱花钱，搞了很多不必要的建设。我们一再讲先吃饭后建设，但是有的地方有钱不去首先保工资的发放，而首先去搞建设，那些建设的效益怎么样也搞不清楚。我说这是没有贯彻好中央的方针，不能这样做。所以，我衷心地说一句，现在发不出工资或者拖欠工资是毫无道理的，就看重视不重视这个问题。我希望明年无论如何把这个问题解决了，别拖欠工资啦！压缩一点别的开支嘛，少出点国，节省一点，一定给大家先把工资解决了。

第二，要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这个问题不解决好，不但没有内需，而且会有“内乱”。

关于城镇社会保障体系，最近几年我们狠抓了“三条保障线”： 一是养老保障，二是失业保障，三是城镇居民的最低生活保障；提出了 “两个确保”，就是确保下岗职工的基本生活费、确保企业离退休职工养老金的按时足额发放。这个从全国总体来讲是保了，收支也大体平衡。但是地区之间很不平衡。好的地区有节余，困难的地区还不能够按时足额发放。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发表的那个数字说99.1%都保了，除黑龙江、云南的一些农垦企业外，全都保了。我看并没有全保，都掩盖在大账下面了。说老实话，我这不是怪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但是从每天很多封人民来信看，确实还没有全保。这其中有养老保险收缴率不高的问题。收不上钱，本来应该是你在工作的时候由企业帮你交养老保险，退休的时候才能给你发养老金，但现在有的企业不交，收缴率恐怕只有百分之八十几，有些地方更低了。所以我认为，现在要解决养老保险的问题，一要提高收缴率。必须作出严格的规定，企业不管亏损不亏损，必须把养老金先交了，这是职工的根 本利益。跟交税一样，一方面要交税，一方面要交养老保险金，不交，你就没有资格当这个厂长。二要扩大覆盖面。所有的企业都应该交，特别是那些新兴的企业，民营、个体的，都得交。它们现在退休的人很少，职工还年轻，交的人多，发的人少，这样才能把这个缺口补上。明年无论如何要采取有效的措施，提高收缴率，扩大收缴覆盖面，把“两个确保”的工作做好。

二、促进农业的发展，扩大农村的市场需求

这是个老大难的问题。江主席在看我这个稿子的时候，给我写了一封信，意思是说我对怎么增加农民的收入还是没有讲具体，他也在日夜思考这个问题。为此我希望在座诸位，我们大家一起日夜思考一下这个问题：如何增加农民的收入？农民占全国总人口的64%，加上进城打工的占到74%，全国八九亿农民，他们的收入上不去，哪有内需？怎么拉动生产？现在的状况确实不能令人满意，富的很富，穷的也很穷。特别是在粮食供过于求的情况下，农民增加收入的困难是很大的。增加农民收入，从根本上说要靠加快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的调整，积极推动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但调整农村经济的结构、农业的结构是极不容易的，而且需要一个比较长的历史过程。这个问题很明显，我们必须做，努力去做，但是它不是那么快地见效。沿海地区做得好一点，做得快一点，因为它对外开放，不需要种粮食来自给自足，可以什么东西赚钱就种什么，由主产区给它提供粮食。因此，它可以种蔬菜特别是种大葱、大蒜、蘑菇等等，向日本、韩国出口，发了大财。但今年，日本、韩国一下子提高关税好几倍，听说山东种的好多大蒜、大葱都出不去了，都烂在家里了。可见调整农业种植结构是个非常难的事情，实行公司带农户，公司必须办得好，不然不知道把农户带到什么地方去了，也许带向破产。农业种植结构要调整，农业的生产力要提高，如果一家一户、小本经营，始终是没有竞争力的。这个问题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解决，这里我就讲几条明年应急的措施。

第一，扩大退耕还林的规模。退耕还林，包括还草、还湖等等。但是我讲的退耕还林，这个“林”是最根本的，要植树造林，才能改变中国的生态环境。当然，造林要“乔、灌、草”相结合，因地制宜。我认为，扩大退耕还林的规模是目前增加农民收入最直接、最有效的一个办法。所以，我再一次地向同志们提醒，每个省都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实事求是，大搞退耕还林。国务院已经增加了退耕还林的指标，而且退耕还林除了补偿粮食外，每亩地给30元苗木费、20元零用钱，现在正是绿化中国最好的历史机遇。这等于给农民发钱了，他们的消

费就可以增加了；然后相应地搞一些依附于林业的资源的开发、利用等等，农民马上就能增加收入。我希望国家计委、西部开发办思想解放一点，我也希望各省区市的同志工作扎实一点，不要搞虚夸，真正地把林造起来，把粮食分到农民的手里。我今年到四川特别是到川西地区看了一下，这样做确实是很有成效的，原来的荒山上现在树木都长起来了。希望各个地方狠抓这项工作。

第二，加快推进农村税费改革的步伐。去年以来，在安徽全省和个别省一些县进行了税费改革的试点。国务院的领导同志都去过，认为试点还是很有成绩的，一个就是确实减轻了农民的负担，“三提五统”不收了，只收农业税及其附加，总体上农民的负担减轻了；另外一个就是农村必要的开支保证了，首先是义务教育，还有很多其他的社会开支。在这两方面，安徽都作出了很多成绩。明年应该怎么办呢？我们想还是要慎重一点，还不能在全国全面推广。东部地区农民的负担不是太重，还有很多生财之路，所以，东部地区搞农村税费改革的进度由东部省市自己定。中西部地区农民负担很重，农民的生计也不多，这些地区在安徽试点经验的基础上，明年可以有一部分省扩大试点，以自愿为原则，中央给予财政补助。



2001年7月18日，朱镕基在安徽省颍上县五十里铺乡粉坊村与农民座谈农村税费改革工作。前排右一为安徽省省长许仲林；第二排左一为中编办主任张志坚，左二为中财办副主任韩长赋，左三为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史纪良，左五为农业部副部长万宝瑞。

第三，继续认真落实深化粮棉体制改革的措施。东部地区粮食的购销全部放开了，让粮食的主销区可以多发展一些高附加值的经济作物和养殖业，同时也为粮食主产区腾出一块市场空间。现在我想讲一个问题，就是加入世贸组织以后，大家要有思想准备，不要让东部地区腾出来的粮食销售空间被美国的粮食给占据了。从总体上讲，我们的粮食价格是很高的，一家一户生产，成本很高，在国际上没有竞争力。这是我们当前一个很棘手的问题。所以在我访问文莱期间，香港记者对我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应该是一件开心的大事嘛！我就开玩

笑说，就我一个人不开心。我说不开心也许过分了一点，其实是有点担心吧，担心什么问题呢？就是农业问题。工业是一个问题，但毕竟我们的工业还有一定的竞争能力，起码劳动力成本便宜，还可以抵挡一阵子，但是也得小心了。第三产业，我们本来就没有现代第三产业，外资进来打垮不了我们什么东西，它进来总还得用中国人，也不是太害怕，我们的银行、证券、保险业都有一点保护措施。现在最担心的就是农业。之所以谈判这么多年，谈来谈去就是跟它谈农业。它就是想大量倾销它的农产品，我们就是要把它顶住，所以拖了这么多年。现在我们保护自己农业的措施就是两条：一条是关税配额，一条是专营。我今天在这里多讲一点，就是我们东部沿海地区还是要顾全大局，如果大量地进口外国粮食，不买中西部地区的粮食，那么中西部地区就受不了；另外，中西部地区也要考虑到，粮食主销区进口的外国粮食要比我们便宜得多，所以要赶快改变经营管理方式，降低粮食成本，不然将来粮食是种不下去的。我们大家都要配合。大豆就是个教训，过去我们不进口大豆，大豆产量也不是很多，所以我提出在东北种大豆，大豆榨油可以代替进口棕榈油，于是东北地区种了一些大豆，最近几年产量也上去了一些；但是我们没有想到美国的大豆一下子冲进了中国的市场，因为我们对它失掉警惕啊！它便宜得很，比我们的大豆便宜一半，出油率又高得多，它是转基因的大豆。今年前几个月已经进口了1100万吨，有人预计全年要进口1700万吨，差不 多相当于我们大豆的总产量，那我们还怎么种得下去呀？现在我们就亡羊补牢，想了一个办法，叫做标识制度。欧洲抵抗美国农产品倾销用的就是这个办法，在包装上面贴个标识，标明这是转基因大豆榨的油，你愿意买就买，你不愿意买就别买了。总之，加入世贸组织以后，有积极的因素，它有助于我们扩大出口或者跟外面的接触，有利于开放。但另一方面，在市场准入的问题上，我们面对越来越激烈的竞争，当然，我们在谈判的时候就设了一道一道的关卡。我们要更好地利用这个积极因素，迎接这个挑战。

三、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

刚才讲了培育和保护内需，把内需培养出来以后才能发国债，这个需求才能变成现实，再去拉动生产。我们原来设想明年国债少发一点，因为很多同志特别是全国人大的很多同志反映，说我们现在发国债发得太多了。去年的国债余额为1.5万多亿元，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15%以上，今年再发1500亿元，有可能接近20%。另外还有很多同志讲，不光是国债，地方也发了很多债券，如果把这个算进去，可 能已经超过警戒线了。我们并不想发更多的国债，也算过账，考虑发1000亿元，但是后来向中央汇报，多数同志的意见还是认为力度不能减弱，因为明年经济面临的困难很大，超过1998年，出口要是有下降，如果内需不扩大，投资不扩大，就不能拉动生产，那会有更多的企业倒闭，更多的人下岗、失业。所以国务院讨论多次，向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报告，最后常委会同意，明年还是发1500亿元的国债。这1500亿元的国债，可以带动银行贷款大概五六千亿元的规模。这样就可以在明年，把本届政府以来所开工的大概2.6万多亿元的国债项目全部完成。举些例子来说，到明年年底，整个长江的堤防可以全部达标，再发生1998年那样的洪水，我们的解放军也未必开到抗洪前线去了，沿线各省市自己可以解决它的问题了。高速公路、铁路、机场这些项目都开工了，完成了百分之七八十。明年这一年，我们大家下定决心，努一把力，把它们统统地完成。这是长治久安之策。当然，一些西部大开发的项目完不了工。像西电东送这样的项目是好得不得了，广西。贵州穷得要死，水电价格很便宜，广东用柴油发电电价很贵，现在把电送过去，这可以使西部地区的各个省财政增收、农民脱困，广东买到更便宜的电。这一步棋把两个地区的经济都搞活了。西气东输，把新疆的天然气送出来到上海，整个沿线九个省区市都可以用气了。通过提高资源税，给新疆财政多作一点贡献，这也是开发西部地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措施。还有南水北调，虽然它不属于西部大开发的项目，但也是非常重要的，要保证华北地区天津、北京的用水。国务院已经初步通过了方案，明年可能开工。这些项目，以后都要继续建设。早两年开工的项目，基本上明年可以完成。中央权衡了上述情况，还是同意发1500亿元国债。尽管我们的债务负担要重一点，但现在看起来，它是一举多得，因为不发这个债，负担会更重。

为什么？银行的钱没法用出去啊。今天，江主席讲银行的存贷差有2.6万多亿元，你要是不贷出去，银行就可能亏损，银行亏损最终还得要财政赔钱。那还不如财政以比较低的利息把这个钱借出来，投入基础设施建设，拉动生产，增加税收，这样财政也就有还款的能力了。另一方面，现在跟1993年时完全不一样，那时没有物资，你大规模地搞建设，钢材价格就从每吨1000元跳到4000元。现在是钢材、水泥生产能力过剩，扩大建设规模完全有物资和设备供应的能力，外汇也有，所以不会引起通货膨胀。如果这个资金不利用，银行就会亏损。另外，大量的企业倒闭，大批的工人下岗，财政还得拿多少钱去维持这个局面呢？这都是很难的事情。所以现在尽管增加了一点财政的风险，但是我们认为这个风险还是能够承受的。



2001年1月5日，朱镕基在重庆市考察西南铝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前排右一为重庆市委书记贺国强，右二为西南铝业(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董事长肖亚庆。



2001年4月9日，朱镕基在湖南省溆浦县低庄镇信用社考察，要求信用社加大对农民的支持力度。左二为湖南省委书记杨正午。

四、继续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和其他各项改革

国有企业三年脱困任务基本完成，但是更大的问题是现代企业制度并没有很好地建立，缺乏制约和监督的机制，所以，国有企业的经营状况还不能够说是好了，还要下很大的工夫。我想特别提醒两个问题：第一，一方面要积极地推动国有企业的重组，不重组、不调整产业结构，国有企业没有出路。但另一方面，在改组、重组的过程中间，要特别注意防止国有资产的流失。这个问题是很严重的，特别是地方的企业，往往是借重组之名，借破产兼并之名，把银行的贷款给

破掉，把银行的债权给破掉。在这方面，银行一定要注意保护自己的债权，不能够轻易地让步。第二，在企业的兼并破产过程中要特别注意安置好职工，维护社会的稳定。有些企业是非破不行的，但一定要考虑到职工的安置，如果你没有方案能够安置好职工，就不要贸然地破产，否则社会不能稳定。

关于所得税的调整。所得税是两个部分，一个是企业所得税，一个是个人所得税。1994年税制改革的时候，把个人所得税全部划为地方税，由地方征收，收入归地方。企业所得税，属于中央的企业收入归中央，属于地方的企业收入归各个省。现在来看，企业所得税按管辖体制来划分，很不利于防止重复建设。地方自己办的企业的所得税是归地方，所以谁都愿意办企业。陕西有这个问题，甘肃也有这个问题，所以这个机制需要调整。就是不管中央企业、地方企业，所得税统统放在一起，共同分享。无论中央企业、地方企业，凡是在你这个地方的企业，都是你的“亲儿子”，都是一样的分成比例。这才有利于西部大开发，有利于防止重复建设，有利于调节中央和地方的利益机制。

另外一个问题是个人所得税完全归地方，而在发达国家，个人所得税一般都是归中央政府的，因为它有利于调剂收入差别。特别是沿海地区个人收入越来越高，所得税越来越多，而西部地区个人收入上不去，它收不到个人所得税，这就不利于调剂收入的分配。所以经过反复考虑，经过中央同意，决定对个人所得税的分配也作一点调整，原来是地方的收入，现在也变为分享的收入，和企业所得税加在一起分成。这样分大概是多少呢？我们想一开始不要分得太多，以2001年为基数，增量分成。你原来收的是多少还是多少，不变，明年比今年增加的部分，实行中央和地方分成，第一年先按五五分成，中央收50%，地方收50%；第二年六四分成，中央收60%，地方收40%，这叫增量分成。中央分成的这一部分，统统转移到中西部地区，中央一个钱不留，支援西部地区的大开发。我想，这个改革对于整个财税体制的完善，对于支援中西部地区，对于防止重复建设，都是有好处的，我们希望能够把这么一个小小调整搞好。另外，我们征收的渠道

一律不变，就是说，原来个人所得税由地税局收的还由地税局收，原来中央企业所得税由国税局收还是由国税局收，原来地方企业所得税由地税局收还是由地税局收。这样就不会搞得天下大乱。反正收了以后再分成、再统算嘛。

关于金融的问题，主要是如何加强对商业银行的监管，抑制不良贷款的上升。证券市场还是要加强监管、要规范，提高上市公司、证券公司、中介机构的质量，要严肃纪律处分，保证证券市场的健康发展。

五、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

这实际上也是培育和保护内需(或者说人民购买力)的一个重要措施。如果都是坑蒙拐骗，那人民群众就没有消费意愿，也就不可能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秩序。我觉得，这个问题首先应该是执法要从严。现在很多的查处流于形式，最后给点行政处分了事。实际上，绝大部分案件都应该给予刑事处分，不是一个行政处分或者罚款可以解决问题的。在这方面要衔接，《民法通则》跟《刑法》要衔接，要做到有法可依、有规可据。

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还要加强技术手段，有好多案子只靠人是查不出来的。像打击走私，当然要依靠党和政府的力量、群众的检举，但是，如果没有电子口岸执法系统，是很难保证打击走私不出漏洞的，这叫“金关工程”。最近税务总局搞了“金税工程”，实现了交叉稽核、电子联网，你这个发票什么地方开的、什么号码、是不是真的，一查就知道，现在已经发挥作用了。这个信息化本身对整顿市场经济秩序是很有效果的，另外也可以推动信息产业的发展，转变政府的作风。

六、转变政府职能，反对奢侈浪费

党的十五届六中全会要求我们坚决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我想这不光是对各个省区市的要求，也是对我们国务院的要求。现在“文山会海”确实是不得了，国家计委、财政部一个部门一年要发几千份文件，恐怕要专门找一批人来看文件啊，结果贯彻文件的人就没有了。

所以就出现这样一种风气，就是“以会议去贯彻会议，以文件来落实文件”。中央开什么会，到省里也开什么会，开完会就完了。中央发什么文件，省里也向下面发个什么文件，是不是落实了也不知道。这个毛病恐怕我们大家都有。我们还是要严格执行过去的一些规定，各个部门召开的会议，除了个别的经过国务院批准以外，不要请省里的领导来参加；省区市开的有关会议，也不要请国务院有关部门去参加。凡是能用电视电话会议或其他方式解决的问题，一般不要再召开大会。

我现在感到，明年面临的困难可能比我们想象的要大一点。在这种时候，大家都要树立勤俭建国的精神，反对奢侈浪费的作风，不要因为形势好，财政手里的钱多，就花钱如流水，讲排场、比阔气。我是担心明年这困难一来，大家手里没那么多钱，结果一些必须的开支都不能保证，那个时候就措手不及啊。所以我奉劝大家，都节省一点。还是保大家的工资发放，保社会保障费用的按时足额发放，保农民负担的减轻，保农民收入的增加。这样才能够稳定社会，大家才能够团结起来，共同战胜困难。

加强舆论监督

(2001年12月6日)

这是朱镕基同志在新华通讯社总社各部门负责同志座谈会上讲话的一部分。

加强舆论监督十分重要。如果没有舆论监督，靠现在这样的行政力量和政法力量，是不足以解决当前许多严重问题的。为什么我拿出很多时间来看人民来信，看《内部参考》，看《焦点访谈》呢？现在不仅中央电视一台有《焦点访谈》，中央电视台有几个频道和地方各个电视台也都有类似的栏目，揭发一些问题，批评一些腐败的现象，我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事情。《内部参考》我看得最多，包括《人民日报》的《信息专报》。最近，广西南丹锡矿死了七八十人，要不是《人民日报》的《信息专报》报道，我还真不知道，那差不多上百人就要冤沉水底了。那个矿主买通了南丹县委书记、县长等领导干部，私自开这个矿，什么安全措施也没有，雇的工人都是湖南、贵州的穷苦农民，死了也没人管。大水一冲，七八十人就沉入水底了，但是县里隐瞒说没死一个人。《人民日报》的记者反映上来以后，我就批给广西壮族自治区的党委书记。我说，《人民日报》记者反映的是真实的，无论如何要把水抽干，活要见人，死要见尸，不能草菅人命。水一抽干，尸体都出来了。那个矿主是用钱买通县长、县委书记，蒙蔽自治区一级的领导。这样的问题，山西的煤矿不知道整改多少次了，我们也不知发了多少通知、文件，还处分了人，但是事故依然，最近仅仅九天之内就爆炸了五次，死了一百几十人。都是小矿主买通了有关部门的负责人，不顾人民的生命，既不交税，又不负责任，大笔大笔的钱进了他们的腰包。现在煤价大涨30%，他们发大财了，却根本不管人家的性命。这些事不认真地揭发，不严肃地处理，这样下去怎么得了？！党的政策怎么贯彻？！我是新华社《国内动态清样》最忠实的读者，每期我都看，看了我就批。根据我的印象，没有人反映我批下去的是完全失实的，当然也可能有部分不是那么完全符合事实。

所以，《内部参考》、《国内动态清样》的作用是很大的，可以帮助领导头脑清醒，让我们知道有些什么问题，这些问题发展到什么程度。去年，我批了200件；今年到11月，就达到200件了。但是现在，效果好像没有过去那么好了。刚开始批的时候，下面都很紧张，领导亲临现场调查研究；现在效果就越来越弱，处理也不像过去那么认真了。河南省夏邑县曹集乡违规集资盖办公大楼，就只给了乡领导一个党内警告处分。我看了以后伤心不已，这件事得判刑的，党内警告哪能解决问题啊！我说这个话不是我泄气了，更不是要打击大家的积极性，以为我对新华社《国内动态清样》不那么重视了，不是这样的。你们的《国内动态清样》我还是照看，究竟怎么批，我还要考虑考虑。我是要讲求效果。你们勤奋工作，大量反映情况，不是我一个人重视，党中央都很重视，中央政治局常委都很重视。你们搞的东西我还是要看，从中了解全国的情况。

当然，以正面报道为主，这是完全正确的，这个方针你们贯彻得非常好，不能让人民群众丧失信心。但是我心里想，不论是三七开，还是二八开、一九开，总不能不揭露问题吧？总不能不进行舆论监督吧？我们共产党员讲究科学，讲究矛盾。不反映矛盾，就不符合事实。作为共产党员、人民的勤务员，我们当然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反映人民疾苦，而且对不良现象要进行揭露、口诛笔伐，这样才能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也才能使人民群众看到信心。如果只是掩饰矛盾，没有解决问题，人民群众还是没有信心。不能说你在那里光宣传“莺歌燕舞”，他们就有信心。他们看到那些问题解决了，他们才有信心啊。所以，我还是强调以正面报道为主，但是一定要有舆论监督。当然，我也知道舆论监督只能起一定的作用，根本的问题是法治。不但是法治，而且整个的精神文明建设都很重要。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谈到信用文化的问题。整个社会如果没有建立起信用文化、精神力量、道德力量，我们的银行、证券市场都是办不好的。欺骗可以不付出代价，借了钱可以不还，这个社会信用就荡然无存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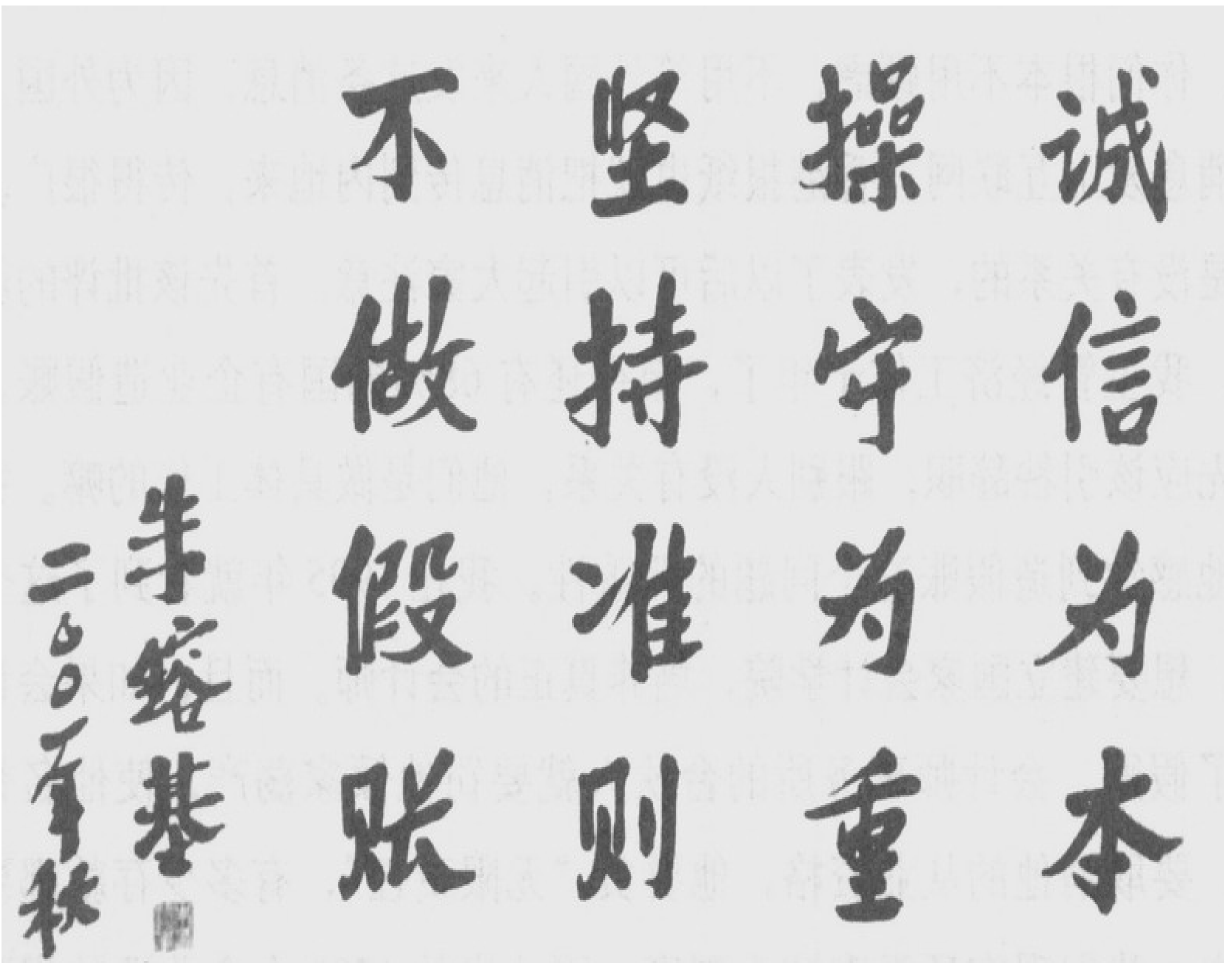


2001年12月6日，朱镕基在新华通讯社考察时参观社史展览室。右一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丁关根，右二为新华社社长田聪明。

我不是过分突出舆论监督的力量，各方面的监督，比方对国有企业的监督，那不是舆论监督能够解决的。体制的问题特别重要，搞了多年的企业改革，但大多数的国有大中型企业还没有建立起现代企业制度及相应的机制。现在看得很清楚，单纯的国有企业体制已经走到头了，因为它没有制约，一把手说了算。党中央明确提出要搞股份制，但股份制如果仅仅是国有企业之间参股，股东大会、董事会对管理层没有制约作用，那么现代企业制度还是建立不起来。我们主张股票上市要向公众披露信息，让股民和公众进行监督，现在看起来这样做也不完全行。还有什么设独立董事，代表中小股民的利益。现在请的那

些独立董事都是经济学家，对谁也不敢得罪，他们敢为中小股民 说话吗？所以，不建立起一种监督制约的机制，还是让那个厂长、经理一个人说了算的话，就仍然不能把国有企业办好。如果企业内部没有一种机制来制约企业领导人的话，国有企业的问题还是解决不了。因此，还是要探索公有制的多种实现形式，并且真正建立起对管理层的制约和监督机制。这其中最重要的一条是不能造假账。最近，审计署审计了1290个企业，严重造假账的占68%。这个消息一公布，马上就被全世界媒体采用。香港报纸大肆宣传，说我们腐败。我不知道你们新华社发了这个消息没有，我估计你们可能有顾虑。其实，你们根本不用顾虑，不用等外国人来发这条消息，因为外国人会把消息发上互联网，香港报纸也就把消息传到内地来，传得很广。这个是没有关系的，发表了以后可以引起大家注意。首先该批评的就是我，我主管经济工作十年了，至今还有68%的国有企业造假账，我首先应该引咎辞职，跟别人没有关系，他们是做具体工作的嘛。我深刻地感觉到造假账这个问题的严重性。我在1995年就看到了这个问题，想要建立国家会计学院，培养真正的会计师。而且，如果会计师造了假账，会计师事务所的合伙人就要罚他倾家荡产，使他名誉扫地，要取消他的从业资格，他要负“无限责任”，有多少存款都要赔进去。我们现在还没有这个制度。刚才讲的1290个企业造的假账使国家损失了1500亿元，多么严重啊！因此，我主张要建三个国家会计学院，广州一个，上海一个，北京一个，但是讲了好几年没有建起来，财政部不给钱，只是拖延。我当了总理以后，这几个国家会计学院建成了。上海国家会计学院第一个建成；北京国家会计学院我也去看了，建成了；广州不够积极，改建在厦门。厦门非常积极，把海岸上最漂亮的一块绿化的地方，500亩，拿来建会计学院。我在今年视察上海国家会计学院，题了个校训：“不做假账”，就四个字。三所国家会计学院是我倡议设立的，经过千辛万苦才建立起来，你们要是给我造假账，我会伤心死的啊！我们辛辛苦苦办的国家会计学院把你们培养出来了，你们都造假账，中国还有希望吗？当然还要有法制，刚才讲的，要罚他个倾家荡产、名誉扫地，看他还敢不敢造假账。在这些方面，我们要做艰苦的工作，建立信用文化，实行讲信用的法治。不然的话，银行、证券、保

险将来都会一塌糊涂，国有企业也都会一塌糊涂。根本问题没解决，经济好、财政好都是暂时的。今年10月份我到北京国家会计学院视察时，他们也让我题词，学院领导向我建议题：“凡我校友，不做假账！”难道不是我校友的就可以做假账吗？因此，我就改成：“诚信为本，操守为重，坚持准则，不做假账。”这样就更全面一点。如果我这一任政府做了一件事情，就是中国不做假账，那我就死可瞑目了。如果将来从国家会计学院培养出来的学生还做假账的话，我就死不瞑目了。不解决这个问题，我们怎么实现工业化、怎么实现现代化？



图为朱镕基于2001年10月29日考察北京国家会计学院时的题词。

我讲来讲去，还是希望同志们意识到你们责任的重大，你们的工作是能够发挥很大作用的，你们是代表人民群众的。希望你们在宣传党的政策、反映人民群众的疾苦方面做得更好，我绝对地支持你们。凡

是我批出去的东西，包括人民来信、《内部参考》、《国内动态清样》 等等，如果下面不重视的，我都要求国家信访局、国务院办公厅去催办；如果回来的报告在一些细节上进行辩解，我就予以驳斥。我已经驳斥过好多回了。总之，请你们相信，我永远是你们忠实的读者和支持者。

加强对出版物市场的监管

(2001年12月13日)

这是朱镕基同志在新闻出版总署副司级以上干部座谈会上讲话的一部分。2001年4月30日，国务院决定将新闻出版署(国家版权局)调整为新闻出版总署(国家版权局)。

今天，我和李岚清同志、丁关根同志以及各有关部门的负责同志到新闻出版总署来，有三个目的。一是表示祝贺，祝贺新闻出版总署机构的调整、升级。这表示党中央、国务院赋予你们的任务更加艰巨，要求你们发挥更加重大的作用。二是表示肯定，你们在党中央、国务院的领导下，做了大量的工作，要肯定这个成绩。我们刚才参观了“扫黄打非”展览，这是加强监管方面的成绩；也看了一个繁荣出版物市场的展览。可以看出来，你们做了很多的工作。三是来给同志们打气、撑腰，希望你们取得更好的成绩。但是还应该看到，出版物市场里的问题还很多，“扫黄打非”是扫不完、打不绝的。要一直打下去，年年打、天天打。这项工作是不可能一劳永逸的，说不定会出现波浪式的起伏，稍微松懈一点，问题马上就起来。因此，必须付出很大的努力，也会有很多阻力。每个地区都有一点保护主义，你表扬它，它很欢迎；你批评它，它就很紧张，而且想出各种办法来阻止你的批评。没有批评就没有监督，也就没有法制了。今天，我们几个同志一起来，表示党中央、国务院，还有各个部门都十分支持你们履行监管职责，促进出版物市场的繁荣。不管碰到多大的阻力，我们都会支持你们，没什么好怕的！我相信，对于严格的执法、严格的监督，地方各级党委、政府也是会支持的。下面，我讲三点希望：

第一，希望新闻出版总署转变职能，强化市场监管，推进新闻出版管理的法制化，同时逐步克服、纠正行业不正之风。

新闻出版管理实际上属于意识形态领域的工作。这项工作非常重要，如果没有法制，这个领域的问题是难以监管的。昨天，国务院通

过了新修订的《出版管理条例》和《音像制品管理条例》。为了适应进一步的市场化，特别是加入世贸组织以后我们面临的新形势，需要补充若干条款。我们一方面要对外开放；另外一方面，还要抵御敌对势力对我们的思想渗透和侵蚀。这个问题值得我们为之作出艰苦的努力和不懈的奋斗。行业不正之风问题不小，新闻出版单位几次出现大问题、出现政治错误，都是因为买卖书号，躲避审查。虽然目前审查的手段并不是十分有效，但是也不能够完全取消。所以，要通过法制化的手段，制止行业不正之风，制止不管政治后果的唯利是图行为。

第二，要加大整顿和规范市场秩序的力度。

我刚才谈到“扫黄打非”不是一项短期的工作，一定要深入持久地开展下去；同样，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也是一项要持续不断进行的工作。出版物市场是个非常重要的市场，假冒伪劣的食品、药品毒害人的生命，而非法出版物会毒害整个年轻的一代人，后患无穷。所以，对解决这个问题一定要下大决心，绝不能手软，而且不能满足于现在的成绩。非法出版物有利可图，而且是暴利，不下很大的力量来打击，是很难把它打下去的，需要各方面的配合，大家协同作战。要认识到，文化市场的整顿和规范，是整顿和规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也可以说是一个非常艰难的部分，要共同努力。

第三，要进一步做好知识产权的保护工作。

保护知识产权是个国际惯例。我们加人世贸组织，签了三个协定，其中一个就是与贸易有关的保护知识产权的协定。我们要履行这个承诺。知识产权不保护，出版物市场就不能够繁荣；如果假冒伪劣产品横行，中国就永远实现不了现代化。因为假冒伪劣产品泛滥，以低价格抢占了市场，优质产品就搞不出来。



2001年12月13日，朱镕基在新闻出版总署考察工作。左一为中宣部副部长刘云山，左二为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杨牧之，左三为新闻出版总署署长石宗源，左四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左五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丁关根。

我非常重视中小学教材问题，因为它是我们农村政策的一部分。当前，我们最担心的事是加入世贸组织以后美国农产品的大量倾销。虽然我们有些保护制度，如关税配额的保护、专营制度的保护，保护制度的过渡期是五年，但在这五年里也未必都能够保护得了，一旦进口农产品形成倾销，市场价格就会降低，农民的收入马上就会减少。因为美国是大规模生产，粮食价格比我们便宜30%到40%，所以，我们面临的压力很大。现在除了要调整农业结构外，还要大量地减轻农民的负担，增加农民的收入，这是我们面临的一个非常严峻的课题。而中小学书本费就是强加在农民身上的一个沉重负担，一年几百块钱的书本费，农民根本无力承担。另外，书本的质量很差，有的是盗版，

甚至是复印出来的。这个问题很值得我们注意。现在，要进行中小学教材出版发行招投标改革试点，由试点地区的省级政府来招标，有资质的出版社来竞标，竞标以后就只能由这个出版社印制，必须这样才行。招标，竞争以后获得承印权，就要保护这个承印权，如果再出现盗版的话，要严厉打击。

我今天特别来拜托大家重视农村中小学教材，对印刷、出版一定要严加监管，把它作为我们党减轻农民负担、增加农民收入的一个重要政策来落实。首先是保证教材的质量，保护知识产权；然后就是减轻农民的中小学书本费负担。你们现在还是两个牌子、一个机构，国家版权局也在这里。招标的时候最重要的是看各竞标出版社的成本，要把成本降到最低，教材特别是农村中小学的教材不要印得那么豪华。我们不是不希望教材印得豪华一点，问题是农民负担不起，要考虑现实。不一定要搞很多彩色套印，就是要把成本降下来。这件事我就拜托你们了，请大家重视。

建立全国社保基金是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举措

(2001年12月17日)

这是朱镕基同志在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第一届理事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

建立全国社会保障基金，是党中央、国务院作出的重要战略决策，是完善城镇社会保障体系的一项重要措施，同时也开辟了筹集社会保障资金的一个稳定渠道。

目前的城镇社会保障体系有三个重要组成部分：一是职工养老保险，二是失业保险，三是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这三项社会保障制度，对维护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发挥了重要作用。那么，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什么呢?

首先，职工养老保险基金的地区分配不平衡。从全国范围来讲，企业养老保险基金收入大约是1800亿元，支出大致也是这个数，总量基本上能做到平衡；但是，地区之间就很不平衡了，各省区市之间差别很大，每个省区市内部也不同，而且这种不平衡的情况可能会越来越严重，中央调剂不了，省区市内也很难调剂。同时，目前我们还没有形成一套约束机制，使企业真正按时足额为在职职工缴纳养老保险费。有的企业即使有能力也不缴费，等职工退休了，再来向国家要养老金。因此，要找到一条有效的路子，依法强化养老保险费的征缴，提高征缴率，扩大养老保险的覆盖面，筹集和积累足够的资金。

其次，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过于依赖财政资金，失业保险基金面临的压力也很大。目前，失业保险基金有一部分被用于下岗职工的基本生活费。下岗职工基本生活费按要求应当是按“三三制”原则筹集，即国家、企业和社会各负担三分之一；现在实际上是三七开，财政要拿70%，企业和失业保险基金一共只承担30%，这种做法必须改变。辽宁省正在进行完善城镇社会保障体系试点，主要任务之一就是不再建立新的再就业服务中心，推动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向失业保险并

轨。待总结试点经验后，再考虑在全国推广。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以后，国有企业下岗职工人数是1000万人。这是统计数，实际上大大高于这个数。经过几年的努力，下岗职工人数已下降到600万人，但由于外部经济环境严峻，明年有可能增加到1000万人。没有足够的准备，是不能克服经济困难、保证社会稳定的。失业保险基金是不够的，只是矛盾还没有暴露出来，因为目前还有再就业服务中心顶在那里，靠中央财政支持。

再次，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没有稳定的资金来源。党中央、国务院非常重视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工作，这件事如果能和社区工作结合在一起，建成一个比较完整的体系，效果会更好。现在的问题是缺少资金。这项工作由民政部门负责，过去主要是搞些“五保”①救济， 财政预算安排的资金很少。中央为了推动这项工作，近年来用于补贴地方的支出几乎每年增加一倍多，去年是8亿元，今年大约是23亿元。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向失业保险并轨之后，职工失业两年以后如果还不能再就业，就要进入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体系。这方面的任务会越来越重，资金投入必须大大增加，不是现在的20多亿元，而应该是上百亿元。中央财政已经尽了很大努力，希望地方财政也要多拿些钱。今后，各级财政预算一定要把社会保障支出打足。如果不这样的话，企业无法改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无法建立，社会稳定也无法保证。

---

① “五保”，是中国农村实行的一种社会保险。农村合作经济组织或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如村民委员会)为了使鳏、寡、孤、独的生养死葬得到保障，对缺乏劳动力、生活没有依靠的成员，在生产上给以适当安排，使他们能够参加力能胜任的劳动，在生活上给以适当照顾，做到保吃、保穿、保烧(燃料)、保教(少年儿童)、保葬。被保住户，称为“五保户”。

当前，城镇企业职工的养老保险和失业保险基金主要依靠参保企业和职工缴费。不少企业现在日子的确不好过，基金征缴相当困难。如果不开辟新的资金来源，社会保障工作将难以为继。为了满足社会保

障资金日益增长的需要，党中央、国务院决定建立全国社会保障基金，从多个渠道筹集和积累资金，建立一个公开透明的、国家的“大金库”，作为储备，发挥补充和调剂作用。



2001年8月16日，朱镕基在贵州省贵阳市主持召开国有企业改革和社会保障工作座谈会并讲话。前排左一为民政部部长多吉才让，左三为国家计委主任曾培炎，左四为国家 经贸委副主任石万鹏。

全国社保基金的主要来源，是减持国有股所得到的资金、中央财政拨款以及其他方式筹集的资金。到目前为止，财政已经拨款近500亿元。这笔钱是经过全国人大同意，从每年财政预算中挤出来的。但仅

靠财政拨款不能解决问题，彩票发行筹集的钱也不多。资金不够怎么办？将部分国有资产变现，可能是一个比较有效的办法。这在党的十五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已经明确提出来了。要选择一些信誉好、发展潜力大的国有控股上市公司，适当减持部分国有股。这样做，是为了促进国有企业的改革和发展，不是搞私有化，没有背离社会主义原则。减持变现的钱要交给全国社保基金，以应对将来可能出现的社会保障问题。这个决策是党中央、国务院经过深思熟虑后作出的，也得到了社会各界的认可，是不会改变的。当然，国有股减持的具体操作办法需要慎重研究，要进一步征求各方面的意见，制订一个切实可行的办法。到目前为止，境内的上市公司减持变现部分国有股，已经划给全国社保基金20多亿元，境外减持也缴了12亿多美元。上述资金都是职工的保命钱，是社会稳定的一个砝码。我想，有了较为完善的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和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这几条保障线，再加上全国社保基金这条资金渠道，就能够做到老有所养、失业有保障了。这是国务院关于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的大体思路和设想。

建立全国社保基金，在我国还是个新生事物。我相信这个事业开创以后，一定能够发扬光大。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成立以来，工作是努力的，成绩是应当肯定的，前途是光明的。有了这笔基金，还要有一套很好的章程来管理它，使它既不流失，又能很好地运营，能够增值。这是为人民造福的事业，意义非常重大。所以，我们请各方面的同志参加理事会，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监督全国社保基金的运作。

关于全国社保基金的运作，我提几点要求。第一，要规范运作。要有一个规范的章程，有一系列管理制度，做每一件事情都要合法合规。第二，要稳健运作。全国社保基金运营的首要原则是安全性。宁肯少赚几个钱，也不要赔本，要有足够的风险意识。第三，要专业化运作。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的人才再多，也是不够的，所以，要选择并委托专业性基金管理公司来帮助运作。在业务问题上，要多征求专业机构、专业人士的意见。为了吸引并留住专业人才，理事会将来要实行具有激励作用的工资制度。第四，要市场化运作。要特别强调公

开透明，不搞“暗箱操作”。我们请来这么多老同志、知名人士来参加理事会，表明事情是摆在桌面上的，账目是经得起推敲和检查的。国家拨了多少钱、怎么用的，哪一笔亏了、哪一笔赚了，都要向社会公布。

对于明年经济形势的严峻性，大家一定要有足够的估计。我们明年碰到的经济环境，有可能比亚洲金融危机时更严峻。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大量的外资和产品会涌进来，国有企业将面临十分激烈的市场竞争。一些企业退出市场后，职工就要进入社会保障体系，社会保障的任务很重。明年，我国进口关税下调，估计财政收入可能会减少两三百亿元，财政将趋于紧张。做好明年的社会保障工作，可能要动用全国社保基金。但我还是希望不要动用，要争取多储备一点，因为这是最后的防线。

我想提醒各位，一定要深刻理解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关于明年经济形势的分析，把困难估计得充分一些，要未雨绸缪，千万不要盲目乐观，否则会出大问题。如果到处都是讲排场、比阔气，花钱如流水，那怎么得了！现在要大力提倡勤俭建国、勤俭办一切事业，各方面都要想办法提高资金使用效益，把有限的资金用在刀刃上。

我对理事会的工作寄予很大的希望。全国社保基金这笔钱很重要，是为子孙后代准备的钱，你们一定要切实管好，对全国人民负责。拜托你们了！

审计工作要突出重点

(2002年1月4日)

这是朱镕基同志在听取审计署工作汇报后的讲话。

审计署去年做了大量工作，对制止犯罪、规范财经秩序起了很大的作用，这是有目共睹的，应当予以充分肯定。党中央、国务院都是支持审计工作的。我们一定要不负人民的重托，不但本身要廉洁，一定要坚持“八不准”①，而且要不怕得罪恶人，为人民执法，刚直不阿，进一步把审计工作做好。下面，我讲几点意见。

---

① “八不准”，指2000年1月28日，审计署作出《关于加强审计纪律的规定》，要求不准由被审计单位安排住宿，不准接受被审计单位安排的就餐和宴请，不准无偿使用被审计单位的交通工具，不准参加被审计单位安排的旅游、娱乐和联欢等活动，不准无偿使用被审计单位的通讯工具和办公用品，不准接受被审计单位的任何纪念品、礼品、礼金和各种有价证券，不准向被审计单位提出与审计工作无关的要求，不准在被审计单位报销任何因公因私的费用。

第一，去年我强调审计工作要突出重点，是觉得审计署没有那么大的力量去搞全面审计，越是全面铺开就越抓不出工作成果，起不到威慑、震动的作用。今年，要继续强调突出重点，并且要对每个重点解剖麻雀，把问题搞深搞透，从完善制度、机制上提出意见。你们虽然抓住了重点，但是如果对重点问题没有摸透，对违规、犯法的各个环节和细节没有搞清楚，那还是找不到能够制止犯罪的机制和措施，也就不可能提出有效的意见。举个例子来说，你们对中国银行的审计是很好的，我希望把中国银行这个例子专门写一个材料，搞深搞透，如果不可能全部搞透，就把一两个案件搞透。比如，用假贷款来补过去的缺口，这是非常恶劣的行为，要如实地揭发出来，如实地报告国务院，然后再来分清责任并决定如何处理。我建议今年把金融审计作为

一个重点。金融是一个容易出问题的地方，有时出的问题比财政还严重。财政不就是一万多亿元资金吗？金融有十几万亿元资金，这里面出问题是不得了的。你们审计了中国银行，对其他几大国有银行还没有审计，要重点抓对大银行的审计。出问题就出在它们身上。今年2月初要开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你们要给我提供材料，写一个经过解剖，比较深、比较细，有分析、有见解的报告给我。不要全面铺开，全面铺开就没有重点了。去年审计了中国银行，今年就审计中国建设银行，一个一个来嘛。

第二，现在犯罪的机会太多了，管理非常松弛。这个检查那个检查、这个监管那个监管，实际上往往是没人管。国有企业就是一个很突出的例子。现在的国有企业领导人、一把手，决策的权力大得很，他一个人就可以决定投资多少亿元，出了问题却撒手不管了，找国务院来救这个企业。虽然有时候从社会稳定的角度考虑，我们不得不去救它，但我一直坚持认为，它自己搞出来的问题我们是不能管的，就是要让它破产。既然是企业决策失误造成的，我们政府就不能管它。现在搞电解铝成风，很多地区都把它作为重点发展行业，还说这是产业结构调整。我看他们是胡来，发展电解铝怎么叫产业结构调整呢？一是没有原料氧化铝；二是用电多，电的成本很高；三是重复建设，没有那么大的市场需求。到处都搞电解铝，不光是搞小的、土的，而且还搞大的，这怎么行？！进口氧化铝一下子增长了一两倍。我已经把这个问题批给国家经贸委了，一定要控制住，不能这么搞呀！我们的银行也是没有这方面的知识，电解铝明明是市场上供过于求的东西，怎么还给它们贷款呢？这么大的项目没有银行贷款能搞得起来吗？我的批语是这么讲的：现在，电解铝又成为浮法玻璃以后的第二个严重重复建设行业。最后产品没销路，欠了银行的贷款没法还，又要求我们去救它，把欠债冲掉，失业的人员还要求我们去安置，一天到晚搞这种无效劳动做什么呀！看了你们揭发出来的案子真是气死人呀！

所以，我觉得审计署重点审计还不够，还要解剖麻雀。审计的结果你们不能不管，你们还负有督促检查的责任，要跟踪追击。要专门找

一批人来跟踪你们查出案件的处理情况。一定要跟踪到底，不能不了了之；否则，就不能敲山震虎。特别是对那些已移交刑事处理的案件，要看它们处理了没有。每年向国务院写两次报告，年中一次，年末一次，报告审计的案件处理了没有、是不是在哪个部门卡住了？你推不动，我们来推呀。李金华①，你们送来的审计报告我都批示了，应该谁来处理就批给谁处理，但是下面的检查就得由你们来做了。他没有处理，你再来告状，说你推不动。审计署的《审计要情》报到国务院，王忠禹同志一定批，我一定看，审计署一定要查，一定要跟踪。

---

① 李金华，当时任审计署审计长。

第三，要完善审计的手段，要搞政务信息化、审计信息化，就叫“金审工程”嘛。一定要利用先进的手段呀，这是一举多得的事，既使我们国家的审计技术水平上一个新台阶，又推进了信息工业的发展。而且，这种审计利用交叉稽核，更加有效。财政部也应该有“金财工程”①，“金财”、“金税”、“金关”、“金审”都得联网，有关部门应该进行充分的协商，要有一个总体的规划，特别是交叉稽核联网的问题，要很好地研究一下。

---

① “金财工程”，是“政府财政管理信息系统”的简称，是政府利用先进的笸息技术，对公共财政进行管理的现代化综合信息系统。

关于审计署和财政部重复监督的问题。你们双方再协商一下，减少重复，降低审计的成本，也转变政府的职能，分工各有侧重，大家都搞点有效的工作。在监督国有企业方面，可以加强税务总局的作用，它应该更有条件、更有手段去检查有关信息是否失真，而且与它利益攸关，信息一失真，它就要少收税。

关于“收支两条线”执行得不好的问题。财政部工作不得力，要负很大责任。搞了十几年，“收支两条线”都没有推行，我下台时怎么交代？今年要下定决心把“收支两条线”搞成，无论如何要严格执行“收支两条

线”，谁敢反对就撤谁的职。这不但对解决今年的财政困难有很大好处，而且杜绝了腐败的一个根源。政法系统乱罚款造成了很坏的影响；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的问题也很严重，它有权呢，戴大盖帽呀，乱罚起款来你是没办法的。第一，从现在开始，执法部门的罚款、收费一律上缴财政，违反这个规定就给处分。第二，你的开支，去年报来的我都承认，但乱发的奖金、补贴我是不会给你增加的，以后怎么办再说。基数一律都认账，报多了将来我要去审计，审计一个，纠正一个。第三，如果不执行、造假账，就撤职。要用半年时间把这个制度巩固下来，收多少钱、支多少钱，都摆得明明白白。审计署要审计它是不是都按“收支两条线”执行，罚的款、收的费是否都入账了。下半年，再对它审计。看它发钱有没有不合法的地方，如果是历史原因造成的，不必去纠正；明目张胆的、做得太过分的，取消它，查出来再酌情处理。审计署在今年下半年要把“收支两条线”当做重点来审计。

关于审计署和财政部驻地方专员办公室的任务有相近的地方，能不能合起来的问题。财政专员办也只能做到重点审计，与审计署审计的内容是重复的。我的意见，把财政部驻地方专员办的战线收缩一下，首先从国有企业收缩，把专员办的精力重点转移到审计国库支付上。不要跟审计署冲突，审计署把审计结果告诉你们，你们负责处理，这不是很好吗？！



2002年1月4日，朱镕基在北京中南海听取审计署工作汇报，并与审计署有关领导合影。前排左一为副审计长翟熙贵，左二为审计长李金华，右一为副审计长令狐安，右二为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王忠禹；后排从左至右依次为：副审计长董大胜、副审计长刘家义、副审计长刘鹤章、中纪委驻审计署纪检组组长王道成、副审计长项俊波。

关于中央组织部监管的企业的审计问题。这些企业都有监事会，监事会整天在那里审计；你们审计署再去审，就应该在他们工作的基础上审，这样可以节省很多工作，避免做虚功、重复审计。你们可以明确：对中央大型企业工委监管的或中央组织部监管的、已经设有监事

会的国有企业，不再进行专业审计，只进行离任审计。进行离任审计，要利用监事会的材料。当然不是说你们要百分之百地相信他们的材料，但在他们工作的基础上去审计可以减少很多虚功。

关于审计署提出国务院《关于违反财政法规处罚的暂行规定》有很多地方不符合实际、应该修订的问题。这个文件要完善，特别是关于处罚的规定已经落后了、过时了。另外，财政部的有关监督条例已经在制订了，要把财政部与审计署的分工搞清楚、协调好，别做那些劳而无功的事情。《注册会计师条例》应该具体化，特别是其中的处罚条款。现在到处是弄虚作假，整个社会没有信用文化，这样下去，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是建不成的。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这些都是基础。外国的法律是很严格的，出了问题，事务所合伙人都要被抄家的，除了保留一辆汽车以外，全部财产都要被罚掉。最近，美国的安然公司破产，安达信做的审计，有包庇这个公司的情况，因而可能被罚款10亿美元以上。没有这些法律，搞什么市场经济呢？如果到处都是假账，靠我们这种从上到下的检查，是查不出什么来的。财政部要研究一下，如果这些条例还没有出台，要研究赶快出台。

关于审计署提出的地方财政随便返还税收问题。地方没有权减免税收，也没有权返还税收。我觉得，有些事情应该在电视等新闻媒体上经常宣传，但现在还在宣传地方的财政税收优惠政策，以吸引外资，这就不对了。早已经规定地方无权减免税了，以前的减免税现在都到期了，地方没有返还税收的权力了。另外，我还有个想法，审计出来有问题的部门这么多，像水利部、教育部等等，挪用救灾款，挪用教育款，都是不应该的。今后财政部分钱只管分账，但钱不到他们那里，行不行？实行国库的集中支付，包括各部门的专款，各部门只告诉财政部这个钱要怎么用，由财政部集中支付。国库集中支付迟迟实行不了，说来说去是各单位顶着，并不是因为这个事情难办。那我现在发一条命令，谁顶着就不给谁钱，让他来找我，行不行？你们财政部有没有决心？这个事情绝对不需要八年，今年就可以完成。我越来越感到你们的信息化手段太不行了，你们应该搞“金财工程”。你们回去讨论一下，为什么今年完不成，写出理由。我给你们创造条件，不用

试点，全国推行，哪个部门不干，就不要给它钱。一个“收支两条线”，另一个国库集中拨付，今年必须完成。时不我待，要赶快抓住这个时机，建立这个德政，老百姓是不会忘记你们的。

关于建立审计公告制度，这个事情一定要搞，这就是使审计工作发挥效果，起到威慑作用。我们现在就缺舆论监督。国有企业的审计结果一出来，问题很大，真把我气死了。你们就登在报纸上面嘛，把那个企业的领导人搞得名誉扫地嘛。只要讲的是事实，群众自有公论。这个制度一定要建立。我本来要求你们要有专人来检查督促审计结果的执行，就要包括这一条，把审计结果公布于众。但是一定要证据确凿，不能夸大事实，否则容易引起社会不稳定。

至于请外国会计师事务所来审计，现在先在中国证监会试点。对新的上市公司，不但要有国内的会计师事务所，而且还要有外国的会计师事务所来审计，审计它的信息和账目。我过去讲过，要依靠会计师事务所的力量；我也特地讲到，要注意一点：请外国的会计师事务所，钱花得很多，但未必有效，来的那帮人实际上并不了解中国的情况。审计署依靠中国的中介力量还是应该的，但是刚才你们讲，60%以上的内地会计师事务所被查出造假账。所以，你们要找会计师事务所来帮你们做中介的话，我劝你们先对它进行审计，审计完了以后再决定请谁，包括请外国的会计师事务所。对政府机构的审计，最好还是请国内的会计师事务所；对国有企业的审计，可以请些外国的会计师事务所。

制止城市规模盲目扩大的势头

(2002年1月9日)

2002年1月9日，朱镕基同志主持总理办公会议，研究加强城乡规划建设管理等问题。这是朱镕基同志在听取建设部负责同志关于进一步加强城乡规划建设管理有关问题的汇报后讲话的要点。

去年经济形势大好，但实际上隐藏着很多问题，今年就可能要逐步暴露出来。现在我们在许多方面，特别是在城市建设方面，存在一种浮夸、铺张浪费、不顾实际情况之风。“安居工程”没有解决，很多房子老百姓还是买不起。一万多块钱一平方米，盖了给谁住呀？这种很危险的倾向现在发展得越来越厉害。全国182个城市都要建国际化都市，怎么得了！忘了中国还有几千万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有些地方连“低保”都保不了，发工资都保不了，就保建所谓的国际化都市。真的搞不成就搞假的，15年的规划要15个月完成，楼盖不起来就临街盖一面墙，自欺欺人！这种作风非常恶劣，就是为了升官、升级。老百姓都看得清清楚楚，但是我们的一些地方领导干部并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我觉得现在搞的这个加强城乡规划监督管理的文件，不单纯是要求加强城乡规划的管理，还要狠刹这股歪风。一方面，职工拿不到工资，农民穷得要命；另一方面，到处要建大城市，大搞国际化都市，高楼林立，都是为有钱人服务的。我看可以把这个文件的重点放在这个方面，加强城乡规划管理可以放在后面措施里讲。前面要把这个问题讲清楚，指出当前存在的这种风气，对有些地方要点名批评，要举例子，然后作一点规定。我觉得现在是不是可以考虑城市先不再扩建。至于城市什么时候扩建，你先做规划，做完五年的规划以后再说。目前就是不要再去占农民的地了，到此为止，城市人口规模有多少人就是多少人，人口还会自然增长呢！工作重点要放在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上，像修上下水道、解决城市交通等。解决老百姓的住房问题是重点，不是去盖那些高楼大厦。如果已经有总体规划，你放

慢建设；没有总体规划，你继续做总体规划，暂时不要动，集中力量把城市的基础设施搞好。

这个文件的主题要改变一下，既是通报又是规定，然后有几条措施。建设部要会同环保、计委、国土资源、旅游、文化、文物等有关部门抓紧进行研究。国务院再讨论一次，然后再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要刹住在城市建设方面脱离实际、好大喜功的风气，包括旅游方面，不要把我们的风景资源、人文环境、自然资源都给破坏掉了。

另外，我建议，建设部和中央电视台联合起来，拍一个电视片，把城市建设中的丑态都揭露出来：三层楼有一层只有一面墙，是假的；一个小小的城市搞一个十几万平方米的大广场；还有违法违规乱搞旅游设施等等，都给他们“扬扬名”嘛！

国税局不能执法犯法

(2002年2月2日)

这是朱镕基同志在审计署《审计要情》刊载的《吐鲁番地区国税局截留增值税1.05亿元用于建高档酒店》一文上的批语。

请怀诚①、继伟①同志阅并派人参加国税局组织查处。国库、财政都徇私放纵，形同虚设，必须彻查严处，以警示财税系统。执法犯法，有何脸面管别人。

朱镕基

2.2

① 怀诚，即项怀诚，当时任财政部部长。继伟，即楼继伟，当时任财政部副部长。

充分利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机遇发展自己

(2002年2月24日)

2002年2月21日至25日，中共中央举办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国际形势与世界贸易组织专题研究班。这是朱镕基同志在研究班上所作报告的主要部分。

党中央、国务院非常重视这次研究班。根据讲课和讨论的情况，我着重讲两个问题。

一、充分利用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机遇

这几天，不少同志的发言中，讲了很多加入世贸组织以后我们如何应对、如何保护自己，而且为了强调问题的重要性，讲得似乎严重了一点。当然，把问题看得严重一点是必要的，但对另一方面，参加世贸组织以后对我们究竟有什么好处，似乎讲得不够。也就是说，讲“防御”的多，讲“进攻”的比较少；讲应对挑战的多，讲利用机遇的少。因此，可能会得出这样一个结论，这么多问题和麻烦，搞得我们应接不暇，那还参加世贸组织干什么呢？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就不会为此进行15年的谈判了。

我们从1986年开始，就恢复我国在关贸总协定的缔约国地位问题进行谈判。在此以前，我国虽然进行了改革开放，但是由于计划经济观念的束缚，对外经济联系还不是那么多。本来我国是关贸总协定的发起国之一，但直到1986年以前我们始终没有积极去进行谈判。1993年，江泽民同志在美国西雅图与克林顿总统会谈，开始进行直接的对话，提出三项原则①，推动了谈判。去年，我们终于加入了世贸组织。这是与我国改革开放的进程、经济实力的增强联系在一起的。在20世纪80年代，我们的经济实力还不是很强，各方面的规章制度也不健全。在那种情况下，如果作过多的让步去参加关贸总协定，确实会造成损失。所以，要有一个不断谈判、互相让步的过程，时间拖了15年。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越来越认识到加入世贸组织的重要性和必

要性。因为对外开放的扩大、对外经济贸易与合作的拓展，对我们经济的发展越来越重要。现在外贸出口情况如何，对国民经济影响很大。如果出口额一年下降10%，就会导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速度减少两个百分点。另外，不参加世贸组织，我们连讲理都没有一个地方，人家可以随便“制裁”我们、歧视我们。参加世贸组织以后，就必须给我们最惠国待遇，给我们国民待遇，给我们非歧视待遇；同时，可以利用世贸组织的规则，解决贸易纠纷，与它们打官司。打官司不一定都会赢，但总是有地方可以打了。

---

① 三项原则，指1993年11月19日，江泽民同志出席在美国西雅图举行的亚太经济合作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期间，同美国总统克林顿举行首次正式会晤时，阐述的我国处理“复关”问题的三项原则：第一，关贸总协定是一个国际性组织，如果没有中国这个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参加是不完整的；第二，中国要参加，毫无疑问是作为发展中国家参加，第三，中国加入这个组织，其权利和义务一定要平衡。

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去年我们跟日本进行农产品谈判的斗争。那个时候，我们还没有加入世贸组织，先是日本对我们出口的大葱、蘑菇、蔺草三种农产品进行“制裁”，把进口关税提高了好多，那我们就没法出口了，山东农民的大葱都烂在家里了。我们认为，日本这样做，不符合世贸组织的规则，于是也制裁它向我国出口的汽车、手机、空调三种产品。我们的大葱不值多少钱，它的汽车可值钱了，我 们也对它提高进口关税。总共谈判了19次，我们寸步不让，最后日本只好妥协，取消“制裁”。它取消我们就取消，它不取消我们也不取消，看谁吃亏？当然，日本的名堂挺多的，又对我们出口的蔬菜进行批量检查农药残余含量，想抵制我们的农产品出口。因此，加入世贸组织后，总算有个仲裁的地方，我们也不是那么好欺负了。我们不但在政治上从来不是好欺负的，就是在经济上谁也别想欺负我们。我们跟日本的贸易现在基本上是平衡的，它赚不到我们的外汇，我们也赚不到它的外汇。尽管贸易量还是挺大的，日本在名义上是我国居第一位的贸易伙伴，实际上我们现在的对外贸易，如果包括转口贸易，居第一位的贸

易伙伴是美国。所以应该说，参加世贸组织使我们有了一个发动“进攻”的阵地，而不只是被动地“防御”。我们要享受别国的最惠国待遇，也必须付出代价，也得降低进口关税，给别国最惠国待遇。当然，我们有一个理由，就是我国是发展中国家，还不能跟发达国家处于平等竞争的地位。因此，我们要有一个过渡期，不能够一下子达到发达国家那样的程度。应该说，在过渡期里，我们还是占有优势的。我们可以利用加入世贸组织这个机会，来扩大出口，你对我们进行反倾销诉讼，我们同样也可以对你进行反倾销诉讼。但在这个方面，恐怕我们的准备工作做得还不够。我们已经在国家经贸委、外经贸部成立了相应机构，专门来对付反倾销。要集中一批专家，专门跟国外打官司，抢占它们的阵地。我们并不是为了找麻烦而参加世贸组织。如果加入世贸组织以后，光是麻烦，疲于奔命，何必搞这个名堂？干脆封闭起来得了，还搞过去的那一套，把我们自己保护起来。那样做固然可以保护自己，但也就不能发展自己。我们的很多体制如果不进行相应改革，就不能适应经济全球化趋势，企业也永远是吃“大锅饭”的企业、受国家保护的企业，经不起国际市场的竞争。我觉得，对这个问题要研究清楚。



2001年10月14日，朱镕基在广东省广州市参观第90届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前排右一为全国政协副主席马万祺，右二为外经贸部部长石广生，右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国务委员吴仪；第二排右二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周光召，右四为广州市委书记黄华华，左一为广东省省长卢瑞华。

我们要利用加入世贸组织这个机遇，更好地“走出去”，增加我们的外贸出口。最近，我看到外经贸部提供的一个信息：前些年在亚洲金融危机冲击下，俄罗斯受到很大损害，经济很疲弱，所以，它对参加世贸组织不积极。据说，已有32个国家提出来就俄罗斯参加世贸组织

问题进行双边谈判。俄罗斯是我们一个很大的、潜在的市场，我们有关部门一定要做好准备，跟它进行双边谈判，争取对我们有利的条件。要研究俄罗斯市场，研究如何进入俄罗斯市场。我在去年访问俄罗斯的时候，在大使馆作过一篇讲话，提出一个口号："进军俄罗斯"。因为俄罗斯这个市场还没有开放，我们的商品对它有很大吸引力。中俄正规的贸易额有100亿美元，不算小。但是，在正规贸易以外的所谓"边境贸易"加"倒爷买卖"也有100亿美元，合起来就是200亿美元。而这种"倒爷买卖"，有些还是好的，可以满足俄罗斯边境地区人民的需要，但也有很多产品的质量非常糟糕，败坏了我们的声誉。我想，边境贸易也不能够取消，但要使它们逐步规范发展。同俄罗斯的贸易对我们是极为有利的，完全不用担心它没有支付能力。它的外汇储备不多，现在约为380亿美元，但有石油、木材，这些都是我们缺乏的。我们的西气东输有个长远资源问题，我国东部地区的石油资源也会逐步枯竭，现在从中东地区进口石油要通过很长的海域。我们要考虑将来的后备石油资源，如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的石油资源。我们实行保护天然林的政策，一个重要条件就在于能够从俄罗斯和东南亚地区进口木材，不然，国内木材的需求怎么满足啊？俄罗斯在叶利钦执政的那个年代不让我们进口它的木材，后来尽管稍微好一点，但戒心仍很大，很担心会变成中国的原料附庸。

从长远来讲，我们绝对不能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把宝完全押在美国和欧盟的身上。现在对美国、欧盟、日本三家的贸易占了我们对外贸易的绝大多数，一定要看到将来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去年我们对美国的贸易顺差，美国人说有830亿美元，我们的统计是280亿美元，如果包括转口贸易，可能有500多亿美元。我们对日本的贸易顺差只有20亿美元，对欧盟的贸易顺差大约是50亿到80亿美元，而在其他地方，我们都拿不到贸易顺差。我们对台湾地区有220亿美元的贸易逆差。另有几十亿美元的贸易逆差是对东南亚地区的，他们对木材出口也是控制得很紧的。去年我们对韩国的贸易逆差也有108亿美元，他们大量的汽车、钢坯、钢材、机械产品、化工原料出口到中国来。对拉丁美洲、非洲，我们都是贸易顺差，他们没有多少产品卖给我们。如

果我们不开拓新市场，只想着美国、欧洲市场，是很危险的，我们对他们的出口基数很大，要再增长一点都不容易。美国经济在去年一减速，我们的出口马上就受到了影响。所以，我们一定要实施出口市场多元化战略，要未雨绸缪，积极开拓新的市场。

我在今年访问了印度，又提出了一个口号："向印度市场进军"。印度是一个很大的市场，有十亿人口，现在确实是相当贫穷。他们不了解中国，还以为我们国家跟他们一样贫穷。在孟买举行的企业家报告会上，有一个企业家说："我感到很奇怪，我前几年去中国的时候，你们的移动电话加固定电话还不到一亿户，没有想到你们现在发展得这么快。"我说，我们现在已经有3.5亿用户，超过美国啦！我们价廉物美的日用家电产品、轻工纺织产品在印度是大有市场的。但是，印度的贸易保护主义是非常严重的，去机场接我的汽车，是印度国产的"甲壳虫"车，两个人坐在里面就显得很挤。我想，印度还没有穷到这个程度吧！他们就是这样，在国内只用他们印度的国产车，贸易保护得很厉害。韩国的贸易保护主义也是很厉害的，虽然他们的汽车工业规模很大，每年向国外出口几百万辆，国内消费一百多万辆，但每年只进口几千辆，国内基本上用国产车。韩国已经参加了世贸组织，但它把自己保护得很好，老百姓都自觉地保护。这次在印度，我让随行的同志到市场上调查了一下，它的家电产品，包括彩电、空调、电冰箱等，价格相当于我国出口到印度的三到五倍，可见我们在价格上有绝对的竞争力。他们保护自己，我们也有办法打入他们的市场，就是搞来料加工。班加罗尔号称"印度的硅谷"，我到那儿的时候对邦长说，我们把家电产品的零部件给你，在你们的工厂组装，股份我们一家一半，你用我们的零部件装配出来的家电产品比你们市场卖的便宜二分之一到三分之二。这样，印度人民就可以买得起，可以改善印度人民的生活，也会增加印度人民的就业机会。那个邦长说，这个办法很好。

我们要进入俄罗斯、印度等国家的市场，在体制、机制上必须有所改变，要特别鼓励民营企业打进这些市场。一些民营企业非常灵活，敢于冒风险。"华为"就是个民营企业，技术很先进，规模也不小，在印度、俄罗斯都有它的企业，搞加工、搞装配。就是要有这样一批敢于

冒风险的人，就是要深入到各个国家去。最近，我国驻阿富汗大使馆反映，国内有好多民营企业给他们打电话、发传真询问，能不能去阿富汗做生意？当地的安全有没有问题？我们有关部门应该提供各种方便，鼓励这些企业“走出去”。去年，我们还决定在俄罗斯建立一个贸易中心，在莫斯科建一个比较像样的建筑让他们看看。在这个贸易中心里，不但搞批发，也搞零售、搞商品展览、办理各种咨询，为中国的企业家到俄罗斯去进行贸易提供方便、提供咨询。对于印度，我们也要想办法尽量地跟进，打破他们的贸易保护主义。

现在很伤脑筋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一些企业家包括民营企业家，缺乏长远的观点，老是做一锤子买卖，捞一笔就算了，这是在败坏国家的声誉。有关部门在质量检验方面既要把好关，也要督促这些企业家树立长远的观点，要在那里扎下根。如果没有一个名牌，维修、售后服务跟不上，那还是占领不了那个市场的。所以，加入世贸组织以后，我们应该充分利用参加世贸组织的地位，利用一切过去没有的条件，充分发挥优势打入国际市场，扩大我们的市场份额，这才是我们参加世贸组织的本意。我们讲过，加入世贸组织有利有弊，如果工作做得好，就利大于弊；如果我们不去做工作或者工作没有做好，那么潜台词就是弊大于利了。我希望这次研究班结束以后，大家既要研究如何保护自己，更重要的是要研究怎么“走出去”，尽快熟悉世贸组织的“游戏规则”，研究各个国家的法律，采用各种方式“走出去”。

我们“走出去”，首先要依靠提高产品质量，不能完全靠低廉的价格。我们具备价格的优势，但是，光靠这个“走出去”是不行的。产品质量差了不行，那只能做一锤子买卖。我现在最担心的，不是我们应对不了挑战，不是经济上会出现什么大问题，而是我们产品的质量。我们很多企业始终没有把质量当做企业的生命，还是靠以量取胜、以廉取胜，而不是以质取胜。如果这样下去的话，我们国家是没有前途的。

所以，我们一定要全面地看待加入世贸组织的问题。要“走出去”，进军一些有潜力的市场。既要讲挑战，更要讲机遇；既要讲“防御”，更要讲“进攻”。也就是说，要以更加积极的态度，认识和应对加入世贸组

织。希望各主管部门和各省区市的领导同志，都要考虑一下本部门、本地区的发展战略，研究国际市场的需要，充分地利用机遇，发挥加入世贸组织的好处。

二、善于在扩大开放中保护自己

加入世贸组织，确实会带来很多的麻烦，但对这些麻烦应该承受，应该愉快地承受，因为我们是为了得到更多的好处。参加世贸组织最头痛的问题，首先是农产品，其次是服务行业，谈判之所以拖了这么多年，主要是在这两个问题上拖得久，来回地"打仗"，最后才达成了我们认为能够承受的一个让步。

关于农产品问题。我们现在主要的农产品国内市场都是供过于求。加入世贸组织以后，国外特别是美国的农产品要以他们的优势进入我国市场。他们是进行大规模的机械化生产，有现代化的销售和服务体系，我们在很多方面确实是竞争不过他们。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现在争取到的，第一个是关税配额保护，就是对几种主要农产品确定一个配额。这个配额并不是一定都要进口，而是有一个限度，在这个配额数量以内进口，享受优惠的关税待遇；如果超过这个配额，我们就加一倍关税。这是一种保护。第二个是专营制度保护。在过渡时期，我们只允许绝大多数配额由国有企业来进口，以便于控制。现在的问题，就是进口的配额还是相当大，只靠关税配额保护难以抑制进口。小麦、玉米、两种大米等四种粮食，现在一年的配额就有1830万吨，所以，我们建立了专营制度来保护自己，但我仍然有些担心。我们已经放开了沿海各省市粮食的种植和收购，也不要求他们自给自足，他们种什么赚钱就种什么，这样就为我们的粮食主产区吉林、黑龙江等地方腾出一个粮食销售的空间。粮食放开的政策从浙江开始，在沿海各省市实行后，非常成功，确实增加了主产区粮食的销售量。我现在担心的是，国外更便宜的粮食要登陆了，它们有比我们粮食主产区粮食更加便宜的优势。这个问题是值得我们注意的，也要想一些对策。这需要大家统一认识，从各方面来实现。人家对付我们有办法，难道我们对付人家就没有办法？人家对我们出口的打火机，可以随便来个

法案就把我们限制住了。我们也要有办法对付他们。至少今、明两年，还不会出太大的问题，我们还有时间来加强自己的地位。

现在有一个大豆问题。大豆没有配额，因为它不算粮食。在2000年以前，我们进口的大豆每年不超过400万吨，2000年进口了1000万吨，去年进口了1380万吨。我们的大豆生产主要在吉林，全国年产大豆1500万吨。去年的大豆进口量就已经接近我们的年产量，国内当然就有一些反映了。但是，我们现在已不能再来搞一个关税配额，再搞什么专营制度了。想来想去只有一个办法，就是由于进口的美国大豆中70%是转基因的，我们就要求必须标明进口的大豆是否是转基因的。如果是转基因的大豆，做成产品后，必须有一个标识，标明这个产品是由转基因大豆制造的。据了解，欧盟、日本、韩国、新西兰都实行这个标识办法。因此，我们在去年5月份制定了《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条例》，并于今年1月份颁布了实施细则。这件事在美国引起了很大轰动，他们攻击中国不信守承诺。去年，鲍威尔①访华的时候说，你们采取措施要慎重，这笔买卖在10亿美元以上，不要因此影响美中关系大局。这次布什②来，也和江泽民主席谈了大豆问题。他那天和我吃早饭的时候，一开始又是谈大豆，说他受到美国农民的压力比我大。我说，不对！我们八亿农民的压力比你们的大。我们实行这个标识办法，不是自己创造的，完全是借鉴欧盟、日本、韩国等国家的做法。我详细地了解了一下，我国大豆与从美国进口大豆的价格差，已经不是很大了。美国大豆出油率高，因为是转基因的。据说，我们现在推广的优良品种，出油率也只差一到两个百分点。只要我们自强、下工夫，我们的大豆不会竞争不过美国的大豆。那么，主要的问题在什么地方？为什么他们销得多，我们销得不好呢？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服务的问题、销售的问题。美国大豆的销售是一条龙服务，你什么时候订货，他们就什么时候按期送到你的工厂里，质量也有保证。而我们大都是个体收购，然后在粮食企业里周转，有时候订了货以后，半年一年都送不来，质量也保证不了。确实存在一些这样的问题，因此，还是要在销售服务方面下工夫，组织一条龙服务，改善服务态度，提高服务水平。我们凭实力，还是可以把对美国大豆的进口水平

压到每年1000万吨左右的，对这个数量过去我们都是能够承受的，没什么太大的变化，不必把这个问题变成中美之间贸易的一个最大争端，甚至影响国家关系。当然，那天我和布什会谈的时候，就大豆问题也进行了反驳。我说，中国是一个农业国，而且农产品都是供过于求。美国现在拼命地对我们施加压力，要把农产品压给我们，但是你们对科技含量稍微高一点的产品，就不出口给我们，这公平吗？我举了两个例子：一个是你们不让我们的运载火箭发射美国制造的人造卫星，你们不向中国出口人造卫星。第二个是，我们买了美国的“黑鹰”直升飞机，买完以后，你们现在不给我们零部件。那不就变成一堆废铁了吗？我问，这公平吗？布什不回答问题，不说公平，也不说不公平，只顾左右而言他，那种气焰好像没有了。布什这次来，整个的会谈气氛还是好的。他原来想提的一些问题都没提，比如要求我们再批准他们进来几个保险公司；指责我们的年度配额工作做得太晚，没有履行对世贸组织的承诺等。因为参加世贸组织的承诺规定，今年的配额和管理办法一定要在去年年底公布，而我们拖到今年2月10日才公布，确实是我们不对。但是，我们有理由呀，我们在去年12月11日才加入世贸组织啊，怎么能这么要求呢？这能算不遵守承诺吗？我们这不已经公布了吗？以后也就不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了。我准备了布什要来质问这个事情，但是他没问，那么我也没讲。还有一些商务方面的要求，他一个都没讲。

---

① 鲍威尔，即科林·卢瑟·鲍威尔，当时任美国国务卿。

② 布什，即乔治·沃克·布什，当时任美国总统。

另外，还有一个服务行业的问题。主要是在银行、保险、证券方面，我们的立场是非常清楚的，也不是没有作任何让步，但让步很少。对资本市场方面的底线，我们守得很紧。在保险方面，争论很大，我们坚持外国保险企业在中国设分公司，最多只能够占50%的股份。尽管过去有过美国国际集团是独资的保险公司，也有过外资的股份达到51%的，但这一次我们就是守住50%这一条线，而且确实是守住了。在银行方面，无非是在允许外资银行做人民币业务、开放一些

地区让它设分行等方面作了一些让步。根据目前我国银行业的情况，我们还是可以经得起这种竞争的，不会有很大的影响。在服务行业方面，尽管谈得很久，但是问题不是太大。当然，我们要赶快完善自己的法律、法规，来应对外国银行进入以后的态势。比如，我们的信用卡使用程度很低，原因是每家银行各搞各的，四大国有银行的信用卡不通用，网点也不够，这就没法在全国推广。现在要急起直追，解决信用卡通用的问题。香港地区有人预言，外国银行进来以后，会搞“一卡通”，要占领我们40%以上的市场。我看这也未必，它要设那么多网点不是很容易；但是，它也可以利用中国的银行网点。对这个问题要注意，我们自己还是要尽快搞上去。在电视、广播、文化方面的谈判，我们的让步很小，这个关也把得很紧，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总的说来，我认为在加入世贸组织以后，农业是需要我们密切关注的问题，这关系到农民的收入，其他问题不是很大。在工业方面，例如汽车，我们成规模的汽车制造厂都是中外合营的，所以不太担心这方面的竞争。当然，最近一个时期进口的汽车成倍增长，是不正常的现象，要加以注意。总之，从我们的规模企业看起来，它们都具有相当的竞争力。目前，外国产品要大规模“打进来”，占领我们市场的可能性不是很大，但是也绝对不能掉以轻心。比方说，中小企业就要注意，汽车生产厂没有问题，汽车零部件生产企业就有问题。对这些都需要认真研究，提高我们企业的竞争力。我相信，我们能应对得了。特别是要研究如何“走出去”，把我们的产品销到国外去，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发展方向。

内蒙古的发展要发挥本地优势

(2002年3月7日)

这是朱镕基同志在九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内蒙古自治区代表团全体会议上的讲话。

我非常高兴到内蒙古代表团来听取同志们对《政府工作报告》的意见。内蒙古是中国北部最大的少数民族自治区，党中央、国务院历来非常重视。1966年，我曾在锡林郭勒盟阿巴嘎旗蹲点一年。我对内蒙古是很有感情的。这些年，内蒙古发展很快、很好。只要各民族人民大团结，一心一意搞建设，内蒙古就会越来越好。

总结同志们的意见，我想提出两点看法。

第一，在产业发展方面，要充分发挥内蒙古的优势。内蒙古各方面的资源都有，但比较起来，还是草原资源最丰富，应该利用它来发挥畜牧业优势。现在我国每年的粮食产量为1万亿斤左右，人均约800斤，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我国人民的食物消费主要是粮食，按现在这种吃粮食的水平，我国的粮食已经过剩了，但如果人们的食物构成中主要是肉、蛋、奶的话，粮食就少了，因为生产一斤肉要消耗几斤粮食。我国人民生活水平总是要提高的，吃肉、蛋、奶的数量总是会逐步增加的，对肉、蛋、奶制品的需求会越来越大。内蒙古应该成为我国一个很好的畜牧业基地。发展畜牧业，也是农牧民群众致富的一个最现实的途径。畜牧产品还可以出口。现在北京市场上的奶制品，许多是进口的，为什么我们自己不能够占领这个市场呢？刚才，通辽市的市长讲养殖业应该优先于种植业，我觉得是很对的。但是，他讲工业要优先于农业，我就不太赞成了。对内蒙古来讲，不一定走与内地一样的发展路子，似乎只有搞工业才能实现现代化、才能致富，不是这样的。内蒙古的产业优势、地缘优势、自然环境优势，都有利于发展畜牧业。这在中国有很大的发展市场，这就是内蒙古的致富之道。我觉得，内蒙古的发展思路应该更加明确这一点。



2002年3月7日，朱镕基在九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内蒙古自治区代表团全体会议上讲话。右一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布赫，右三为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储波，右四为内蒙古自治区政府主席乌云其木格。

但这绝不是说内蒙古不要搞工业，像包头这些地方本身就有矿产资源，发展工业是有基础的，而且已经发展到相当大的规模。也不是说农牧区就不要发展工业。我到新西兰访问的时候，看了它的牧场，也参观了它的肉、奶制品加工厂。那是完全现代化的，是与畜牧业优势相配套的。特别是新西兰有保证畜牧产品高质量的检疫检验配套设施，非常现代化，加工很精细，卫生条件非常好。这是现代化的工业，这种工业是一定要发展的，与畜牧业配套地发展。如果没有这种现代化的加工工业，没有先进的检疫检验设施，生产出来的食品人民

群众就不放心，我们的市场就会被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的畜牧产品占领。所以，这方面的工业和配套设施，我们应该按世界上最先进的、现代化的水平来建设。

我们千万别重复过去那种工业化的路子，搞什么“五小”工业， 遍地开花，村村冒烟，户户起火，大炼钢铁，那条路是走不得的。搞了以后，没有一点竞争力；现在要关闭，又伤透了脑筋。什么小煤矿、小化工、小造纸等等都不能搞。要搞工业，就得搞现代化的、达到规模经济的工业，否则就没有市场竞争力。特别是在边远地区，交通不便，运输成本高，不要说出口，在国内市场也没有竞争力。我们一定要吸取历史的教训，不要以为办一个工厂就能赚钱，结果往往搞不了两年就垮了。原来搞得红红火火的那些乡镇企业，现在不少已经垮台了，它们的产品成本高，质量也不好，怎么能有竞争力呢？内蒙古搞工业，一定要搞现代化的工业，要搞有国际竞争力的工业，否则就不要搞。应该一心一意地把畜牧业的优势发挥起来，把草原建设起来；同时，与此相配套地发展一些现代化的畜牧产品加工工业。

粮食生产也要讲发挥优势。全国粮食已经很充裕，不需要在草原上种粮食。玉米也已经过剩，不出口就都烂在仓库里面了，但价钱又没有竞争力，国外的便宜呀。所以，种粮不是优势的地区，就不要种。我希望内蒙古的经济发展思路要非常明确，过去一些老的观念，已经不适应于目前这种情况。

基础设施建设是一定要搞的，公路要畅通，电信一定要通到村。内蒙古幅员这么广阔，哪个地方一遭灾，如果电话都不通，怎么救灾呢？这些钱一定要花。城市的建设一定要往小而精的方向发展。内蒙古人口也不是那么多，不要把摊子铺得太大。这方面，满洲里就吃了亏，摊子铺得太大。城市的建设，要适当集中，城市的基础设施才好解决，上下水、通气、通电、集中供热都好解决。

第二，要切实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现在，改善生态环境已经刻不容缓、迫在眉睫了，因为荒漠化在发展，土地沙化越来越严重，生态环境日益恶化，不能回避这个现实。内蒙古作为我国北部地区的

重要生态屏障，无论如何要把生态环境建设放在很重要的位置。这不仅直接关系内蒙古各族人民的生存和发展，而且对全国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具有重大意义。



2000年5月13日，朱镕基在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正蓝旗考察草原承包试点情况，与承包了2300亩牧场的牧民毕力格(左二)交谈。右二为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刘明祖，右四为国家环保总局局长解振华。

前年，我带了一些部长考察治理沙化，从北京坐汽车一直到了浑善达克沙地边缘，沿途看到大量土地沙化，感到心情沉重。在河北省丰宁县的一些沙化地区，离天安门直线距离已不到100公里了。所以，我沿途一直跟省市领导同志讲，大家要动员起来保卫党中央所在地的生态安全啊！这个沙漠快要侵袭到天安门了。内蒙古一定要把生态环境的治理和建设放在第一位，尽快遏制生态环境恶化的势头。对这个问题，党中央很重视，国务院很重视。国家为防治荒漠化做了一个规划，并且准备了大量资金。但是事在人为，这是需要发动群众的工

作，光拿钱不行。你们现在已经有很多办法了，关键是要加大工作力度。

发展畜牧业，绝不能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要切实解决草原超载放牧的问题。草原不能再过载放牧了，载畜量不能再增加了。应该把草原的使用权划分一下，实行家庭承包责任制。在此基础上，推行围栏饲养、舍饲圈养；同时加强草原的建设，大力改良草场，发展优质牲畜品种，形成草原生态改善与畜牧业发展、牧民增收的良性循环。要加强各种配套设施的建设，特别是检疫检验。你们要实现无疫区，这确实是要下很大工夫的，我很同意加强这些方面的建设。具体问题怎么解决，要与有关部门商量。如果只是需要中央财政支持2000万元，是没有问题的；问题是批准你们搞无疫区，就必须真正做到，否则就没有国际信誉了。刚才，你们讲能不能把牧业税免掉，在中央转移支付方面给你们一些补助，我是倾向于同意的。具体做法要研究一下，请你们和有关部门协商，我想这是可以考虑的。总得给牧民一些支持，包括财政、物资上的支持，使他们能够实行休牧还草等政策，否则没有措施还是一句空话。中央财政应该给予尽可能的支持，地方财政也要在这方面下一点力量。

改善生态环境、发挥草原的优势，我是非常支持的，并寄予厚望。要全面规划、合理布局、突出重点、注重实效、分步实施，坚持不懈地干下去，下定决心使广袤草原重现水丰草茂，使祖国北疆山清水秀。

浙江要富而思进、富而思源

(2002年3月8日)

这是朱镕基同志在九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浙江省代表团全体会议上的讲话。

我今天十分高兴和浙江省代表团的同志们一起来审议《政府工作报告》，听取大家的意见。刚才，李泽民①同志实际上是在批评我，说盼望了多年我才去过浙江一次。请同志们谅解，作为总理，我不能老到经济发达、钱包很大的地方去，我要到贫困地区去；不然，他们要批评我嫌贫爱富了。浙江我已去过不少次了，也不敢多去了；否则，有人要批评我老跑到浙江去游西湖了。

① 李泽民，当时任浙江省人大常委会主任。

我感到非常高兴的是，浙江省在省委、省政府的领导下，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国民经济发展很快，人民的生活水平也提高得很快，逐步成为一个经济强省、出口大省，各方面工作都做得不错。特别是听到外贸出口已接近上海，我很高兴。我前年在南京开会时说你们要超过上海。现在，你们快要做到了。你们还要向广东、江苏挑战，这也是有希望的。

浙江不但富而思进，还富而思源，表现出来的风格很不错。我就讲一点，去年进行所得税税制改革，个人所得税原来是属于地方收入，改为中央与地方分成；企业所得税由原来中央收中央的、地方收地方企业的，改为统收分成。改革后，沿海经济强省就要多作贡献，有一部分财政收入要交给中央；这笔钱中央一分也不留，全部转移到西部地区去。在这个改革过程中，江苏、浙江表现得最顾全大局，不但没说一个不字，而且是积极赞成，这不容易。这笔钱，本来是能更好地发展本省经济，改善本省人民生活的。但是，浙江省领导顾全大局，认为这一改革有利于全国经济发展，有利于西部大开发，愿意作出贡

献。对此，我认为是值得表扬的。广东表现得也很好，他们的基数大，作出的贡献要比江苏、浙江多，但他们也是毫不含糊地服从中央的决定。这项改革基本上是很顺利地完成了。我从来没想到一项改革能在两三个月时间里就定板，哪一项改革都没有那么快。要是没有你们这几个省带头，服从大局，这一改革就搞不成。你们对西部地区的人民、对国家的大局是作了贡献的。这是第一点。



2002年3月8日，朱镕基在九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浙江省代表团全体会议上讲话。左为浙江省委书记张德江。

第二，粮食购销体制改革首先在浙江实行。过去，很多同志都说我们的粮食总是不放开。实际上，我们的粮食销售已经全部放开，只是粮食的收购没有放开。主要是顾虑，放开后如果不能用保护价敞开收

购粮食，那农民的收入就很成问题了。在东部沿海地区，完全具备放开收购的条件，购销可以全部市场化。但是主产区就不同了，不能贸然放开收购，这我们是有历史教训的。主销区农民不需要都去种粮食，什么赚钱就可以种什么，这样就可以给粮食主产区腾出市场的空间。这项改革，浙江敢于试点。那年，我到浙江调研后马上定板，当即起草文件，然后在沿海地区全面试行，而且效果很好。这项改革意义重大。如果你们每年能从主产区吸纳140亿斤粮食，这将对中国农业的发展作出很大贡献，大大地有利于农业种植结构的调整。这也证明浙江实行改革的效率还是挺高的，贯彻得很准确，落实得很快。

现在，我们还面临一个问题，就是加入世贸组织后，美国的粮食要在江苏、浙江登陆。它的粮食总体上有优势，小麦、玉米、大豆都比我们便宜得多，而且服务设施都比我们好，因此占领了我们很大的一块市场。加入世贸组织之后，我们最担心的就是农产品。我们有保护自己的措施和关税配额、专营制度，但都不那么保险。在这种情况下就需要沿海的同志顾全大局，去买东北的大米，买东北的大豆、玉米。不能贪便宜，贪便宜要吃亏啊！全国经济发展不起来，浙江也好不了。

第三，浙江出口发展比我想象的快，这确实是很不容易的。这证明浙江人有自己的优点、长处，艰苦创业，敢于“走出去”。要发扬这个精神，这是我们应对加入世贸组织的良策。加入世贸组织有利有弊，要经过努力以后才能利大于弊。有利就是可以享受最惠国待遇，外国的关税很低，原来不让我们享受或者给我们很多配额限制，现在他们要放松，我们就要抓住这个机遇“走出去”。但另一方面，我们的关税也得降低，今年降低三个百分点，明年还要继续降。降低关税这一项就将减少600亿元财政收入。去年财政赤字2598亿元，今年预计3098亿元，多打了500亿元，就是因为这个原因。进口关税收入减少，连带着进口环节的增值税也减少了。我们不能总吃亏，要赶快利用这个机会“走出去”，把这个600亿元赚回来。这就要靠你们浙江、广东、江苏“走出去”，就是要有点本事。当然，这不是那么容易的。我上次在中央党校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研究班上讲浙江出口打火机的事。世界上的打火

机主要产在温州，两欧元以下的打火机全是温州生产的。打火机出口到欧盟，欧盟就立一条法规，每个打火机都要加一个连锁装置，让小孩打不开。如果不装，就禁止你出口到欧盟。如果装上这个装置，两欧元就下不来了，价格的优势没有了，就很难出口了。他们总会想各种对策、办法来挡住我们的发展。最近, 美国宣布把进口钢材的税率提高8%到30%，主要是针对三个国家：中国、俄罗斯、韩国。我们的出口量最大，受到影响也最大。俄罗斯和韩国都表态反对了。我们的外经贸部还没有表态，反应很慢，说明我们对同人家打官司这一套还不太熟悉。连欧盟都强烈抗议，施罗德①也发表讲话，说这不符合世贸组织规定，是擅自提高关税。人 家千方百计要堵住我们出口的门，我们“走出去”就要想许多办法，要学会打官司。我非常希望，今年浙江的出口要想方设法再上一个台阶。只有沿海几个省把出口搞上去了，全国的出口才不至于下降，否则很危险。浙江要积极应对加入世贸组织的形势，充分地利用这一机遇，千方百计地“走出去”。这对浙江人民有好处，对全国经济发展也有好处。

---

① 施罗德，即格哈德·施罗德，当时任德国总理。

对河北省高碑店市白沟镇民工中毒事件的批语

(2002年3月28日)

2002年2月27日，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向国务院报送的《关于河北省高碑店市白沟镇民工中毒事件调查情况的报告》反映，数百名在河北省高碑店市白沟镇从事皮包加工的务工人员，由于长期受加工原料苯的危害，不少人患上重型再生障碍性贫血，已有六人(其中童工一人)不治身亡，五人正在医院接受治疗。这是朱镕基同志在该报告上的批语。

此案可能带有全国性(北京丰台区已发现类似事件)，为了保护劳动人民生命健康，严明法纪，必须首先依法严厉惩处有关人员；二要保护劳工利益，责令涉案企业、工厂发还工资、给予民工补偿、对中毒致死人员给予抚恤费、致病者给予医疗赔偿；三要举一反三，加强劳动保护立法，对使用以苯类有毒物质作为溶剂的黏结剂、装饰材料等的企业，必须规定明确的劳动保护条件(如产品质量认证、车间通风条件、 检测手段等)，请法制办会同有关部门立即就此补充立法，两周内报国务院总理办公会审议通告，颁布实行。最后应将此事通报全国，要求各省区市组织全面检查，有案必查，有错必纠，对人民生命健康负责，对违法违规、伤天害理者绳之以法。同时也要查处基层干部是否牵涉在内，包庇作案。

朱镕基

3.28

山西经济发展的思路要调整

(2002年4月2日)

2002年3月29日至4月2日，朱镕基同志在山西省考察工作，先后考察了太原、晋中、临汾等地。这是朱镕基同志在听取省委、省政府工作汇报后的讲话。

我今天主要讲一下山西经济发展的指导思想如何调整的问题。

山西过去是畸形经济，概括地说就是：重工业太重，轻工业太轻，第三产业不行。山西的财政收入主要靠煤炭。现在，重工业太重的情况有所转变，像这次来看的太原钢铁(集团)有限公司，已经调整了产品结构，淘汰了很多普通钢种，向高精尖的方向发展，不仅使生态环境有很大的改善，经济效益也有很大的提高。轻工业有很大的进步，第三产业也开始有所发展。像晋中市的平遥县，下决心把企业、学校、居民等从旧城搬迁出来，这一点就很不容易。把平遥古城开发出来，所取得的效益比开几个大煤矿还好。可以说，山西的畸形经济结构已开始有所改变，但是在指导思想上还需要作进一步的调整。

山西的当务之急，我认为就是改善生态环境和投资环境。现在山西的生态环境太差了。太原的空气质量虽有所改善，但还远远不够。我们沿途看到的多是荒山秃岭、沟壑纵横。黄土多、植被少，有河必干、有水必污，这种状况在山西是比较严重的。山西的生态环境如果这样下去的话，投资环境肯定好不了。投资环境不好，国内外的投资者就不会来。光靠挖几个煤矿，山西是富不了的。晋商发家致富，不是靠挖煤，而是靠到处开银号、开票号，像王家①、乔家②都是这样。所以，一定要把劲头放在改善生态环境上，这样才能改善投资环境，山西才能富起来。这一次我请印度外长到山西来见我，就是想让他来这儿看一看，山西是全国人均财力较少的省，比较穷，但他看了觉得挺满意。说老实话，在印度还找不到几个像太原这样的城市。本来还想在太原找一家五星级宾馆给印度外长住，因为印度人认为自己

很先进、中国很落后，如果在最穷的地方请他住五星级宾馆，他肯定会有所震动。可惜在太原找不到一家五星级宾馆，这一点就不如印度了。印度再穷的城市也有一家外资的或合资的星级宾馆。所以我觉得，山西一定要确立这样的思想：传统的工业化道路，特别是搞原始积累的工业化道路，不能再走了。靠挖煤是富不了山西的，首先要改善生态环境。生态环境不改善不行呀！太原把汾河水一截留，汾河下游就断流了。下游地区要发展，只好取地下水，导致地下水位越来越低。因此我认为，山西经济发展的指导思想一定要作进一步调整，山西的工作重点一定要放在生态环境的改善上。因为生态环境的改善，带来的是投资环境的改善；只有生态环境和投资环境改善了，山西才会有大发展。

---

① 王家，指山西省灵石县静升镇的王氏家族。王民家族鼎盛于清朝康熙、乾隆、嘉庆年间，是当地一大望族。

② 乔家，指山西省祁县乔家堡的乔氏家族。以全国著名的商业金融资本家乔致庸为代表的乔氏家族，鼎盛于清朝末叶及民国初年，家资千万，经营的商业遍布全国。

生态环境的改善，我认为第一位的是退耕还林。这是全国性的政策，不单是西部地区要搞，全国都要退耕还林，山西尤其如此。山西6000多万亩耕地中只有3000万亩产量比较高，剩下的3000多万亩都是低产田，一亩地打不下百把斤粮食。全国粮食是不会缺的，好多潜力还没挖掘出来。粮食多了，为什么还不把部分耕地退掉，搞植树造林，使山川秀美、山清水秀呢？这个工作我喊了四个年头，到今年大家的思想才算比较统一了，但步子还不够大。山西退耕还林只有100多万亩，那是不行的。但如果搞到300万到400万亩，我又担心树苗供不上，工作做不实，容易变成虚夸。这次我到吉县一看，更加坚定了一个信心，那就是退耕还林对于山西太重要了，是改善山西生态环境、促使农民脱贫致富的根本措施。我刚才讲，如果山西退耕还林能搞到400万亩的话，国家就给山西8亿多斤粮食，相当于5.6亿元钱，然后再加上50块钱一亩的种苗费、20块钱一亩的零用钱，这又是3亿多元，全

部加起来将近10亿元，你说农民能不富吗？他们还可以外出打工，找点别的活干，那不就致富了嘛！这次我到山西的最大收获，就是总结出关于退耕还林的四句话：产权是核心，给粮是关键，种苗要先行，干部是保证。前面两句话是吉县县委书记给我讲的。“产权是核心”，主要解决产权问题。产权不明确就没人愿意去种树，更不会退耕了。农民承包的地种了树，树却不归他们了，他们怎么会干呢？“给粮是关键”，一定要每亩给农民200斤粮食。四川在这方面有一条好经验值得推广。在西昌，退耕还林的成绩非常显著，过去的坡地，现在都种上树了。他们在粮食的包装袋子上写上“退耕还林大米”、“退耕还林面粉”，这些粮食在运输的时候，车辆不收养路费，送到农民手里，农民感动得热泪盈眶，从内心里感谢共产党。这是农民脱贫致富的最好办法。“种苗要先行”，是几位部长讲的，种苗是很重要的，没有种苗给农民，他怎么种树呢？“干部是保证”，这句话算是我的一点小贡献吧。香港的报纸最近讽刺我们，说中央的政策再好，基层干部不好也是不行的。如果选拔的基层干部都有良心的话，中国的问题就解决了。这不是对我们共产党的讽刺吗？我们岂止有良心，我们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2002年3月29日，朱镕基在山西省晋中市太谷县任村乡段村考察时看望村民。前排左二为山西省委书记田成平。

这四句话，要把它们写进有关文件里去。这四句话做到了，退耕还林就搞成功了。

对你们治水的思路，我也做一点修改或补充、完善。山西是有河必干、有水必污，连汾河都干了。在这样严重缺水的情况下，只有大力植树造林，才能涵养水分。再经过若干年，河里才会有水。现在你们多修水库是没有用的，坝修得越快，河干得越快。我觉得，修一些拦沙坝是可以的。我们沿途看到的是沟壑纵横，如果在那些地方打一点拦沙坝，不让泥沙进入黄河，这是可以做到的，以后再逐步种树。你

们讲加强以水利为重点的基础设施建设，好像就是要大修水库。太 原这个地方，汾河不修个水库不行，这情有可原。其他地方你们还修水库？我看算了吧。重点要放在改善生态环境上，要使土壤能够涵养水分，不把泥沙冲下去。大力发展节水农业是对的，旱作农业就不要搞了，不缺你们这点粮食嘛。发展林业，种树种草，把山西的黄土盖起来，建设山川秀美的生态环境。

你们发展工业的思路也要调整。小煤矿是绝对不能再搞了。开这些小煤矿，把一大片植被都破坏了。小煤矿再怎么去检查安全生产措施都不行，阳奉阴违，天天死人。去年11月11日至20日，九天时间，山西发生五次煤矿瓦斯大爆炸。这样的小煤矿有什么用处呢？小煤矿的产量要一年一年地减少，将来我们用的煤都应该是大型煤矿开采的，而且要搞“煤制油”，因为煤炭是污染环境的能源。只有大规模开采的煤矿才可以让它保留，小煤矿是不能开的。中国并不缺煤炭，目前煤价上涨是因为我们宏观调控有问题，是暂时的。你们这个汇报稿里有一个地方，就是发展单井规模年产30万吨以上的煤炭企业，要修改。30万吨就是个小煤窑，还发展它干什么？不要吃“煤炭饭”了，吃“煤炭饭”是没有前途的。我刚才讲，一个平遥古城就相当于几个年产几百万吨的大煤矿。发展煤炭工业的思路一定要改变，不能再搞小煤矿了。调王显政来山西当副省长，不是让他发展山西煤炭的，而是叫他来整顿山西煤炭的。王显政的任务就是要把大同、长治、阳泉这些地方的大煤矿发展起来，把小煤矿统统关了。不要说什么合格不合格，小煤矿永远不合格！再说炼焦，沿途看到烟囱林立，给人的印象是工业化的程度很高，其实不然，污染得不得了！要同国家经贸委研究个对策，把小机焦消灭掉，搞大机焦。要想办法整治小煤矿、小炼焦厂，不允许小煤矿去侵占国有资源。

总之，我觉得山西经济发展的思路要进一步完善。在推进现代化大煤矿建设的同时，大力改善生态环境和投资环境，再加上恢复山西人经商的传统，山西完全可以富起来。我希望，你们考虑一下我提的这个山西经济发展或者说是产业结构调整的思路。

对国有商业银行考核评价办法的意见

(2002年4月3日)

家宝①同志：

我看了工、农、中、建四大国有商业银行有关考核评价办法后，总的感觉，各国有商业银行考核体系过于烦琐，有些指标实际上有内在联系，不必重复规定。所谓发展指标中，把存款增长率、人均存款额或人均新增存款额列为考核指标，容易导致高息揽储，弊端很大。我的意见，应取消这些指标。很重要的一点是资金的流动性，当前不少银行为降低近期的不良贷款比例，有意识地多搞长期贷款，掩盖了贷款的风险，因此应加大对贷款流动性考核规定的权重，而且要定期 检查，不能一年算一次账。还有，财政部给各国有商业银行下达的利润指标形同虚设，可以取消。

以上意见，请酌。

朱镕基

2002年4月3日

---

① 家宝，即温家宝。

全力维护企业和社会稳定

(2002年4月9日)

2002年4月9日，中央针对当时企业和社会稳定方面存在的一些突出问题，决定召开各省区市有关负责同志会议，研究部署做好企业和社会稳定工作。这是朱镕基同志在会上讲话的主要部分。

这次会议的主要任务，是从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出发，研究部署做好维护企业和社会稳定的工作。根据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的精神，我讲几点意见。

一、充分认识做好企业和社会稳定工作的重要性与紧迫性

当前，我国政治、经济形势是好的。同时，在改革和发展过程中，也存在不少困难和矛盾，特别是企业和社会稳定方面出现了一些新情况、新问题。今年以来，一些地方先后发生规模较大的企业职工群体性的聚集上访事件。这些事件有几个特点：一是规模比较大，行为激烈，反复性强，持续时间也长。二是出现组织化倾向，跨地区、跨行业串联集体上访的增多。三是境内外敌对势力极力插手。特别是大庆和辽阳发生的聚集上访事件，是近期规模大、影响面广的社会群体性事件。

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所属的大庆石油管理局和油田公司，从2000年开始分流企业富余人员，共依法解除劳动合同关系7.3万人。今年3月1日以来，大庆石油管理局数千名已经与企业签订解除劳动关系协议的人员，到石油管理局机关上访，持续了一个多月，聚集人员最多时达上万人，甚至出现上街游行、拦截列车、阻断交通、损毁车辆等过激行为，至今还没有完全平息。造成这次事件的直接原因，我们认为不是政策上有什么大的偏差。1994年通过的《劳动法》明确规定可以解除劳动合同关系，但是要给予经济补偿，即一年工龄发一个月的工资，一次性发完；以后可以享受两年失业保险；两年后如还没有再就业，可以享受社会救济，现在叫最低生活保障。1994年，国务院

又发了通知，国有企业破产以后，职工解除与企业的劳动关系自谋职业，可以发给三年工资，作为一次性的遣散费，这实际上比《劳动法》的规定还优惠。大庆油田与职工解除劳动关系，一个人给予经济补偿最多的17万元，最低的也有16万多元，相当于他们原来年工资的五六倍，远远超过国家规定的标准。那么，发生这次事件的真正原因是什么呢?

第一，“买断工龄”这个提法不符合事实，也是不正确的。把一次性发安置费叫做“买断工龄”，实际上工龄并没有买断，因为国务院的文件规定得很清楚，工人虽然解除了跟企业的劳动关系，但国家对他原来的工龄是承认的，过去企业或者他个人所交的社会保险费，国家也都承认，将来他退休时，社会劳动保障机构仍然要给他发养老金，所以并没有“买断”。“买断工龄”的错误提法，给工人造成很大的误会，好像不管他了，对他过去的贡献都不认账了，根本不是这么 一回事。

第二，国家政策规定职工有偿解除劳动关系以后，如果再就业了，那么劳动保障关系就接上了，就由新工作单位交社会保险费；如果没有再就业，职工可以自己交社会保险费，交不交完全自愿。交了以后有一个好处，就是退休的时候，养老金给付的标准高。这本来是为下岗工人和解除劳动关系人员着想的一条政策，但是大庆油田在执行黑龙江省政府关于调整养老保险个人缴费方式政策的时候，宣传解释得不够，而且制定的标准由国家规定的两档改为六档，最高的相当于工资的三倍。当然，这是自愿的，你交不交都可以，但这一点并没有给职工讲清楚。他刚拿了十几万块钱的补偿，如果一年要交一万多块，这钱还不够他交十年的，那他有什么安全感呀？这也是工作上存在的问题。

第三，油田的经济效益好转以后，在岗职工的奖金增加得太快，引起部分有偿解除劳动关系人员的心态不平衡。他们觉得解除劳动关系吃了亏，所以要求重新恢复劳动关系，恢复上岗。



2002年3月29日，朱镕基在山西省太原钢铁(集团)有限公司不锈钢冷轧厂考察。左一为山西省委副书记张宝顺，左四为山西省委书记田成平，左五为国家计委副主任王春正，左六为财政部部长项怀诚，左七为国家经贸委主任李荣融，左八为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部长张左己，左九为山西省省长刘振华，右一为太钢董事长陈川平。

第四，部分解除劳动关系人员对如何解决住房和交物业管理费、采暖费等遗留问题，心里不托底，担心没有保障，对子女的就业难也有意见。

第五，思想政治工作不到位。对有偿解除劳动关系人员缺乏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没有及时消除他们的误解，党组织的作用也没有很好

地发挥。

另外，少数别有用心的人利用有偿解除劳动关系人员的不满情绪，传播谣言，进行煽动。境外敌对分子也极力收集这次事件的信息，伺机插手；境外媒体大肆恶意炒作，造谣诬蔑，煽风点火。这也是一个因素。

大庆过去是工业战线的一面旗帜，功不可没。石油行业重组上市、减员增效、提高市场竞争能力的改革方向是对的，也是有成绩的。大庆油田解除部分职工劳动关系，是依法进行的，经济补偿的标准与其他行业和企业相比较，也是很高的。这次出现聚集上访事件，主要是由于有些改革措施没有向群众讲清楚，工作不细致。大庆这样的企业，发生如此大规模、长时间的群体性事件，不仅严重影响了大庆油田正常的生产经营秩序和大庆地区的稳定，而且在国内外也造成了很不好的影响，教训是十分深刻的。

3月11日至20日，辽宁省辽阳市铁合金厂部分职工，因对企业破产后拖欠职工工资、医疗费，经济补偿金没有全部兑现，以及企业领导人员腐败等问题不满，联合其他13家企业的职工，多次大规模上访，前后达十天之久。经多方工作，特别是在公安机关拘留了几个与境外勾结的煽动闹事者以及涉嫌腐败的企业领导人之后，上访事态才趋于缓解。调查结果表明，这起群体性事件发生后，境内外敌对分子极力插手，企图扩大事态。上个星期，我会见了美国17位国会议员，其中一位议员对我说，你们辽阳发生了镇压工人的事件，你如何解释这个问题？我就告诉他，我们从来没有镇压过工人。这是一起由一些“民运”分子操纵的、组织地下工会针对政府的事件，我们传讯了几个人，指挥这次事件的“民运”分子就住在你美国。他不吭声了。

目前，大庆、辽阳两地社会群体性事件的局势虽已得到初步控制，但仍有反弹甚至升级、扩大的可能。金融领域的较大群体性事件也不少。我们一定要充分看到问题的严重性和复杂性，不能漠然置之，掉以轻心。当前，影响社会稳定的因素还大量存在。从国际上看，西方敌对势力继续对我国推行西化、分化战略，境内外敌对势力相互勾

结，不断进行渗透和破坏活动，千方百计利用或制造不稳定事端，一有风吹草动，就大做文章，煽动闹事。从国内看，人民内部矛盾和社会热点问题较多，制约经济发展的体制性障碍和结构性矛盾相当突出，解决这些问题必然要涉及利益关系的调整，企业改制重组、破产倒闭的情况也会增加，人员下岗和再就业压力一时难以缓解。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在带来新机遇的同时，也面临一些新的挑战，一些竞争力不强的产业和企业受、到一定冲击。农民负担重，增加收入困难。一些地方干群关系紧张，“会治安状况不好，消极和腐败现象仍然比较严重。所有这些，都是社会不稳定的因素。我们在推进改革和发展的同时，必须高度重视社会稳定工作，对可能引发不稳定的各种问题，必须未雨绸缪。宁可把困难估计得严重一些，把影响稳定的因素预想得多一些，把应对预案准备得充分一些，这样才能争取主动，防患于未然。

二、当前要努力解决的几个问题

第一，坚持国有企业改革方向，正确处理改革、发展与稳定的关系。国有企业改革多年来已经取得了很大进展，但是任务仍十分艰巨，相当多的国有企业仍然存在体制不顺、机制不活、冗员过多、效率低下等问题。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后，市场竞争更加激烈。不坚持推进改革，国有企业就没有出路，中国经济就没有希望。现在一些企业和地方出现的群体性事件，不是改革本身造成的，也不是党中央、国务院制定的方针政策有什么问题，主要还是由于没有完全执行中央统一的政策，或者是配套措施还不够完善，在执行过程中工作不力，有的是由于部分职工的思想观念还不能够适应新的形势变化。在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过程中，难免会出现一些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改革要坚持，法律要坚持，思想政治工作要做透。在处理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和破产企业职工安置问题上，一定要严格依照国家的有关法律和政策规定办事，妥善解决好解除劳动关系时的经济补偿、接续社会保险关系等相关问题。只要工作做得好、做得细致，问题是可以平稳、妥善解决的。

各地区、各部门在推进国有企业改革时，要统筹考虑财政、就业、社会服务等有关方面，特别是企业职工的承受能力。凡是涉及职工切身利益的改革措施出台，一定要十分慎重。在进行企业改制重组、关闭破产时，首先要保证安置好职工。对企业分流富余人员，要进一步规范并严格执行有关的程序和制度。凡是职工安置和社会保障办法不完善、资金没有落实的，不能进入关闭破产程序。如果有的企业关闭破产涉及职工较多，工作一时又比较难做，就不要急于求成，贸然行事。在制定有关改革的政策时，要从实际出发，注意与相邻地区、其他行业的政策措施相衔接，也要与已出台的有关政策措施相衔接；同时，还要兼顾到企业内部不同群体之间的利益平衡。企业推进内部分配制度改革，也要适当兼顾上市公司与存续企业职工、留岗人员与分流人员的收入和福利水平，差距不能过于悬殊。企业增加职工工资、福利，一定要以提高经济效益为前提。企业效益好转了，也不能乱提工资、滥发奖金和过多增加福利。中央企业实施改制重组、关闭破产和分流富余人员，要与企业所在地政府充分协商，取得地方政府的支持，做好职工分流安置、接续社会保险关系等衔接工作。同时，要更加重视发挥党组织和党员的作用，党的组织不能散，党的工作不能停。对有偿解除劳动关系的党员职工也要加强组织管理。

还要强调，正确的改革政策措施，不能因为遇到困难和矛盾就加以改变，但是，在政策的实施中要周密考虑、精心操作。根据形势的发展变化，有些政策需要完善的，要抓紧加以完善。有些重大的改革措施，在试点没有取得成熟经验之前，不要急于铺开。

第二，千方百计开辟就业门路，切实做好再就业工作。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再就业工作，1998年专门召开了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和再就业工作会议。这几年，下岗职工再就业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从1998年到2000年年底，国有企业下岗职工累计2550万人，已实现再就业1700万人，除办理退休手续和解除劳动关系的，目前下岗职工还有500多万人留在再就业服务中心等待再就业。随着国有企业改革的深入，还将有一些职工下岗分流，甚至失业。同时，社会其他

方面的就业压力也很大。这是一项比较困难的工作，我们一定要努力去做，尽量地做好。

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把就业和再就业作为一项重大任务，加大再就业工作力度，大力开拓就业领域，积极创造就业岗位。要发展具有广阔就业空间的第三产业特别是社区服务业，积极探索开发公益性就业岗位，如卫生保洁、环保绿化、交通管理、治安联防等等。有条件的大中型企业，通过主辅分离、开展多种经营等渠道提供新的就业岗位，尽可能多地安置分流人员。

要认真落实下岗职工再就业的各项优惠扶持政策。近几年，国家已经出台了一系列鼓励再就业的优惠政策，包括工商登记、场地安排、税费减免、资金信贷等，关键是有些地方没有很好落实。据反映，一些地方下岗职工没有享受到再就业的优惠政策，还存在着办证难、登记难、乱收费、乱罚款等问题。最近看到一份材料：一对下岗夫妇开了一间酱肉店，竟要办十多种证，交几十种费。这还怎么再就业啊?乱收费的现象这么严重，必须下大力气加以解决。各地政府要指定专门部门牵头负责，尽快建立健全下岗职工再就业优惠政策检查制度、部门协商通气制度、社会举报监督制度。要组织监察、计委、劳动保障、经贸、工商、税务、价格等部门，进行一次全面检查，对发现的问题要严肃处理。

同时，要加强再就业培训和就业服务，做好对下岗失业人员的管理工作。现在一些下岗职工就业技能低，是影响再就业的重要原因。国外有些好的做法，如订单式培训、对特殊地区和行业进行财政补贴、减免企业社会保险费用、补贴就业困难人员工资等，这些都可供我们研究借鉴。国内不少地方也都创造了一些经验，要总结推广。

第三，加快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构筑“社会安全网”。这些年，社会保障工作特别是“两个确保”①取得很大成绩，为推进改革和发展、保持社会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但还有一些政策没有落实到位，存在不少问题。从目前参与群体性事件的人员来看，有偿解除劳动关系人员和下岗职工等参与的最多；从引发群体性事件的直接导火线来看，主要

是养老、医疗以及工资福利待遇不落实，以及相互的攀比等问题。因此，必须认真扎实地做好社会保障的各项工作。

---

① 参见本卷《在二〇〇〇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当务之急，仍然是落实“两个确保”。要确保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费、离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任何地方都不得发生新的拖欠。各地都要认真检查一下“两个确保”工作的落实情况。要加大对困难行业和困难企业“两个确保”工作监督检查的力度，切实做到不留死角。中央已经加大财政转移支付力度，增加“两个确保”资金，去年共拿出了485亿元，今年预算中已增加到512亿元。各级地方政府也必须大力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宁可减少其他方面的开支，也要增加社会保障资金。

要切实做好“三条保障线”的衔接工作，防止出现脱节现象。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失业保险和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这“三条保障线”构成一个环环相扣的“社会保障网”。搞好衔接工作，就可以保证群众的基本生活，做到“人人无饥寒”，从而保证社会稳定。一些下岗职工本来就有困难，加上一些措施不配套，具体操作办法和标准不统一，如果社会保险关系接续不上，出现断档，就很容易酿成事端。必须做好社会保障的各项衔接工作，解除下岗失业人员的后顾之忧。

与此同时，要切实加强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工作。各级财政都要逐年增大这方面的预算投入，扩大“低保”面，确保“低保”水平。尽快把所有符合条件的城市贫困居民都纳入“低保”范围，做到应保尽保。发放最低生活费补贴时，不要计算脱离实际的“虚拟收入”，而要核查真实生活状况。要按照属地化管理原则，将中央、省属企业，尤其是远离城镇的军工、矿山等企业符合条件的贫困职工家庭纳入最低生活保障范围。对企业改组改制和产业结构调整过程中出现的特殊困难群体，特别是中央、省属企业和城镇集体企业的特困职工家庭，以及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向失业保险并轨中新出现的需要最低生活保障的人员，要作为工作重点，切实解决他们的“低保”问题。

维护企业和社会稳定是全局性的工作，涉及社会各个方面。中央各部门之间、中央各部门与地方之间、地方与地方之间、地方与中央企业之间，一定要加强信息沟通，密切协商配合。对需要研究解决的有关政策问题，一定要各负其责，通过调查研究，及时解决，共同做好维护企业和社会稳定工作。

会见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时的谈话

(2002年4月14日)

这是考镕基同志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并宴请美国前国务卿亨利·艾尔弗雷德·基辛格博士时的谈话。基辛格是来华参加中美《上海公报》发表30周年纪念活动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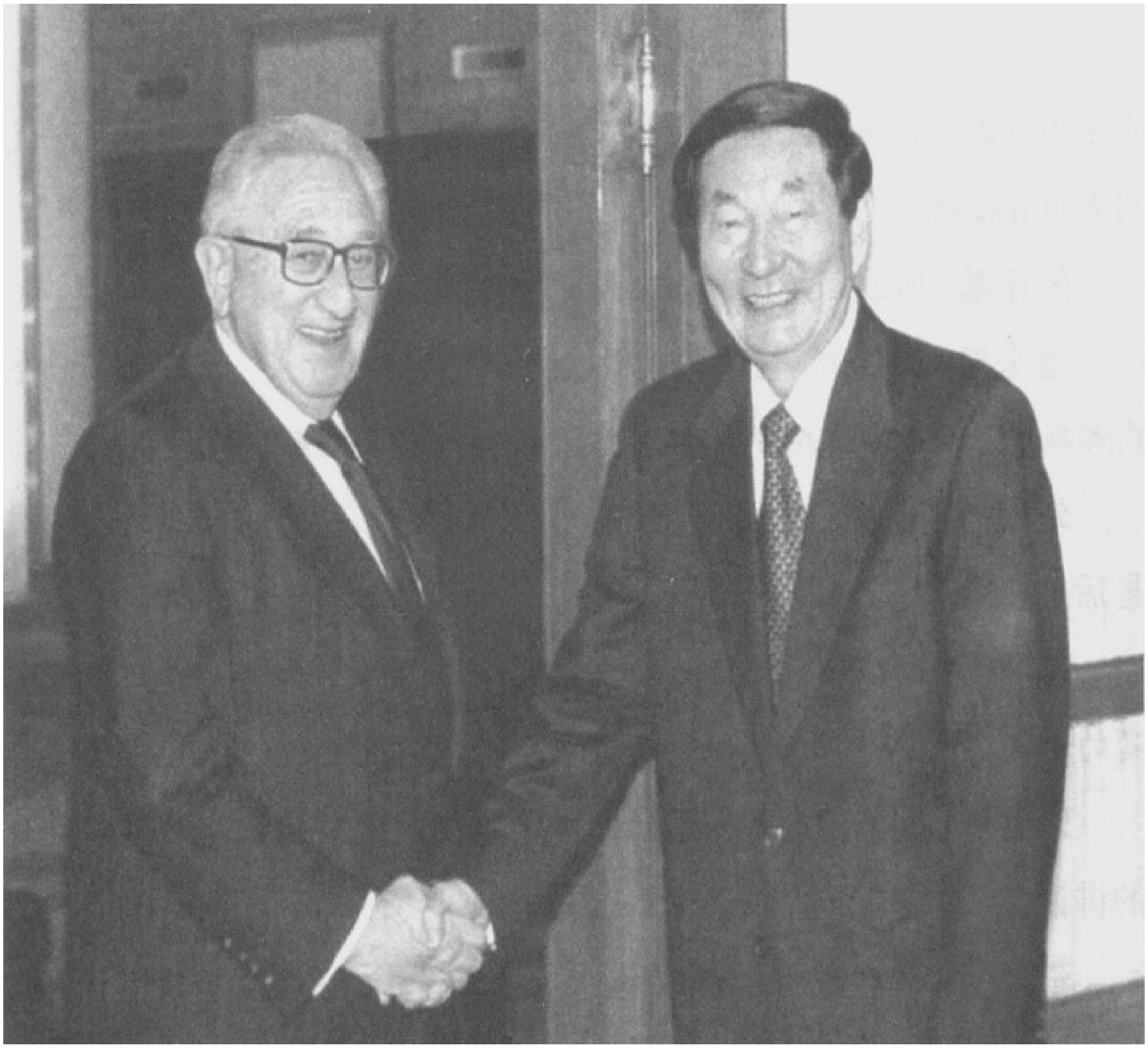
朱镕基： 今天，我非常高兴能与基辛格博士、南希女士和芮效俭大使见面。我昨天刚从海南回来。今年是尼克松总统访华和中美《上海公报》发表30周年，我想这个日子不仅对中美两国关系是个重要的日子，对基辛格博士也是个重要的日子。基辛格博士和新中国的三代领导人都有很好的关系，像你这样的领导人在世界上已经不多了，所以我一定要从海南回来和你吃顿饭。

基辛格： 很抱歉，我无法去海南。我感谢中方的盛情款待。我知道你在过去的十年间发挥了重要作用。我相信两国关系是亚太地区和平稳定的关键。

朱镕基： 你对中美关系作出了杰出贡献，用什么方式来欢迎你都不过分。当然，我们不能用阅兵式来欢迎你，但我们可以用真挚的友谊来欢迎你。

基辛格： 如果用阅兵式的话，那你就把我在华盛顿那里给毁了。

朱镕基： 你与我们的三代领导人都有交往。我是个晚辈，但与你也交往很久了，算是个老朋友。我在与你的交往中，总是得到十分善意友好的帮助，我十分感谢。尤其是我1999年访美时得到你很多的帮助，很感谢。在中美关系忽冷忽热的时候，尤其需要你的帮助。



2002年4月14日，朱镕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

基辛格： 我感谢你在我历次访华期间给予我的款待和对与我谈话的重视。和我谈起你的人都赞赏你的才能、礼貌和敬业精神。在当前形势下，两国关系进入了一个个循环，其中一部分的问题是由于每届新政府都要制定新的外交政策，不同部门在执行外交政策时也有不同，但美中关系的基本方向是积极的。我见到的美方人士都希望中方不要作出一些对抗性的举动。

朱镕基： 我们还是不太习惯布什(指乔治·沃克·布什)总统的一些做法。

基辛格： 他从美国中部得克萨斯来，与纽约人的想法不太一样。他上台有赖于共和党保守派的支持。他正在向既定的对华政策过渡，需要在中国方式和得州方式之间作出调和。中国方式更加间接，而得州方式则是很直接的。

朱镕基： 所以，我们应该多看西部片。

基辛格： 有帮助。重要的是要找到一个合适的方式。我在回国后会向赖斯①女士转达我访华后的印象，但美方需要理解中国的方式。

---

① 赖斯，即康多莉扎·赖斯，当时任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

朱镕基： 开始，我们与老布什和克林顿也有分歧，相处不好；但是后来接触多了，相互了解了，关系变得不错，友谊也就产生了。

基辛格： 相信和布什总统也会这样，但所有的一切都会受到中东问题的干扰。

朱镕基： 你如何看中东问题？我看了使馆报来的你关于中东问题的讲话。

基辛格： 我的观点是应该在外交上取得进展，但不能让恐怖分子认为我们在支持他们。任何协议的达成都需要让步，但让步不能被看成是向恐怖主义所作的让步。因此，我们要小心从事。据我看，两年前以色列从黎巴嫩撤军是把情况搞得更糟了，当时撤军是以一种突然的方式进行的，不要让人认为以色列现在也会突然从巴勒斯坦撤军。这是我的观点。至于美国政府的观点，每几个月就会改变一次，一会儿与我的观点相似，一会儿又不同。

朱镕基： 这也是得州风格?

基辛格： 这是没有经验的表现。巴勒斯坦和以色列考虑问题的方式不一样。以色列是从法律的角度看问题；而阿拉伯世界则比较浪漫，

他们认为一些方法可靠，但事实上并不可靠。

朱镕基： 但对阿拉法特①的安全是必须保证的，不然，阿拉伯世界都会反对美国。

---

① 阿拉法特，即亚西尔·阿拉法特，当时任巴勒斯坦国总统、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主席。

基辛格： 我个人认为以色列军人冲入阿拉法特的官邸是不明智的，其结果是在阿拉法特还活着的时候就把他变成了受人尊敬的烈士。绝对保证他的安全一定要做到。鲍威尔国务卿今天要会见阿拉法特，这样就可以使阿拉法特的安全得到保证。

朱镕基： 我们的使馆说，你认为国防部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很好相处，但我觉得美国国防部的那些人都是站在台湾一边的。

基辛格： 很多人是，但拉姆斯菲尔德看得比较高，大家对他的评价很高。不是所有的观点我都和他一样。他对中方的想法还不了解。在美国，批评中国的人都认为中国大陆决心与台湾摊牌，他们是从军事的角度看待台湾问题的。绝大部分人都不了解中国愿以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除非台湾宣布“独立”。

朱镕基： 我觉得美国的当权派不了解中国，希望他们能多来中国访问。

基辛格： 我想切尼副总统和拉姆斯菲尔德如果能访华的话会很好。他们如果访华，会谈的话题不应是技术性的，应该和今天一样。

朱镕基： 我希望他们的访问可以多少改变他们的看法。赖斯来了一次，希望她的看法有所改变。

基辛格： 赖斯对华没有什么具体的观点，但她了解一些情况总有益处。

当前要抓紧研究解决的几个经济问题

(2002年4月30日)

2002年4月15日至26日，朱镕基同志对土耳其、埃及、肯尼亚进行了正式访问。这是朱镕基同志出访回京后在国务院第57次常务会议上的讲话。

这次出访回来以后，我看了一些简报、材料，感到需要认真分析一下当前的经济形势。

总的看，今年第一季度的经济情况不理想。国家统计局公布，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7.6%。第一季度经济情况比较好的是三个方面。一是国债项目安排得比往年早，起到了拉动经济的作用；二是外商直接投资增长比较快，实际到位资金增长26%；三是外贸出口比原来预计的好一些，同比增长9.9%。

第一季度经济情况低于预期的方面，主要是财政收入增长缓慢。虽然“两税”①收入增长15%，比较好，但由于关税算术平均税率降低了3.1个百分点，加权平均税率降低了4.1个百分点，海关的关税和代征税比去年同期减少48亿元，这个影响很大。财政收入增幅下降，还有其他一些减收因素。如果不努力增加收入，今年的财政赤字就会扩大。对此，必须引起高度重视。同时，近期安全事故比较多，公路、民航、铁路都发生了重大事故。中国国际航空公司成立47年从来没有发生过重大安全事故，半个月前却在韩国发生了坠机事件②。一些地方的煤矿、有色金属矿接连发生爆炸事件，伤亡了很多人。当然，我们这么大一个国家，一点安全事故都没有是不可能的，现在的问题是发生得太多了。社会群体性事件增加也是一个问题。特别是大庆市发生的群体性事件，在国内外的影响都很不好。

---

① “两税”，指国内增值税和消费税。

② 坠机事件，指2002年4月15日，中国国际航空公司执行北京至韩国釜山CA129航班飞行任务的波音767客机，在韩国庆尚南道金海市坠毁。机上166人中，有128人死亡。

我感到，现在对经济形势缺乏综合分析。没有综合分析，就不能对整个经济形势作出正确的判断。每个季度都应该有一个对经济形势的综合分析，要加强这方面的工作。

当前，要抓紧研究解决以下几个问题。

一、关于财政收入问题

我现在最关心的是这个问题。一定要想办法增加财政收入。财政支出增加了，如果不能相应增加收入，赤字就要扩大。今年财政预算已经多发了500亿元的国债，不能再扩大。对此，一定要及时采取有效措施，千方百计增收节支。

第一，要切实加强税收征管。目前税收“跑冒滴漏”现象仍然很严重。特别是私营、个体企业偷税漏税相当普遍。一些拥有几亿、几十亿元财产的私营企业老板，生活极为奢华，却不缴纳个人所得税。这是不允许的，必须想办法解决这类问题。税务部门要去查账，依法收税。在许多国家和我国香港地区，不管你是什么大老板、是什么大官，都要照章纳税，否则就得坐牢。我们无疑要进一步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要继续鼓励和支持它们发展。但各类所有制企业都必须依法纳税，在税收征管上要一视同仁。只靠国有企业交税，这怎么行呢？私营、个体经营者的合法利益应予保障，但是他们的企业必须交增值税、所得税和社会保险费，他们自己的所得也应当缴纳个人所得税，否则就是违法。现在，有些企业和机关、事业单位滥发补贴、奖金，多得惊人，又不交个人所得税，不但造成税收大量流失，还造成相互攀比，导致社会心理不平衡。我们要研究、借鉴国外的做法，强化对各类企业和个人所得的税收征管。

第二，对涉外的一些税收政策，要调整、完善。有些税收优惠政策已经到期了，有些政策应加以修改，或者按照世贸组织的规则加以调整。总的原则是，各类企业要逐步统一政策，公平税赋，目的在于促进平等竞争、增加国家财政收入。今年1月1日起，对生产企业出口货物实行免、抵、退税改革，增值税已开始减收，但出口退税政策还在执行。要严格把关，防止“扁担没扎，两头打塌”。

第三，加强财务管理，节省开支。严格按预算支出，不该花的钱坚决不花，节省一切不必要的开支。没有列入预算的支出项目，即使有需要，也不能随意追加开支。要按照国务院的部署，推行“收支两条线”改革，特别是执法部门如果再不实行“收支两条线”不得了。要彻底改变一些部门和单位用“小金库”滥发奖金、补贴的现象。

二、关于进出口问题

今年3月底，国家外汇储备已达到2276亿美元。因此，在继续抓好出口的同时，适当增加一些进口，不会影响外汇平衡，还可以增加海关环节的税收。对一些不会冲击国内农业和工业企业的产品，可以考虑多进口一点。粮食现在供大于求，不能多进，否则冲击农民，那不得了；汽车不能多进，多进口收不到多少税，还挤占了国内汽车企业的市场。当然，要按加入世贸组织的承诺办事。对有些国内有市场、又不会影响国有企业和农民利益的商品，多进口一点，既有利于增加海关税收，也有利于市场竞争，打击假冒伪劣商品。

从当前情况看，我们可以从外汇储备中拿出一两百亿美元，用于支持外贸出口和“走出去”投资办厂。最近，我出访了几个发展中国家，也接待了一些来访的发展中国家领导人。我国对这些国家的外贸出口都是顺差，这主要是由于它们没有多少我国市场需要的商品。要改变同它们的贸易不平衡状况，一个比较好的办法，就是要鼓励我国企业到这些国家去投资兴办企业，同当地企业合资或合作生产，适当让利，就像我国改革开放初期搞加工贸易的办法那样。我们主要赚元器件、零部件的钱，它们赚加工装配的钱。在对外承包工程方面，可以再放开一点。在国外要能承包到工程，就得带资承包；即使我们的建

筑成本低，有竞争力，但如果不搞带资承包，也难以中标。所谓“带资承包”，就是给外方贷款，一种是无息贷款，一种是优惠贷款，一种是商业贷款，还有一种是无偿援助。要根据不同情况来决定。在外方接受带资承包的条件下，我们可以推荐几家国内公司投标。但是，如果不让我方承包，我们就不给贷款。这样做，可以带动我国的设备、原材料和劳务出口，会拉动国内的生产。为此，要适当放开一点出口信贷的规模。当然，也一定要考虑到在一些国家的投资风险，要看这些国家是否有一定的偿还能力，不能一拥而上。

对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周边国家搞一些工程承包，帮助它们建设一些项目，花点钱是值得的。就像越南、缅甸和巴基斯坦，这些国家同我国关系友好，对它们的投资，实际上是一种“友谊投资”，政治意义重大。当然，我们还是发展中国家，只能量力而行。要根据国家利益和对方的还款能力，确定不同的贷款方式。在国外搞商品贸易中心，既搞商品展销、贸易信息服务，又搞批发贸易、零售贸易，也是促进外贸出口的有效办法，这方面我们与俄罗斯已经开始搞了。

要鼓励各类所有制企业“走出去”，重点还是要支持国有企业“走出去”。我国的一些家电产品、通信产品和其他消费品，都是很有竞争力的。我们的国有企业再不“走出去”，就会越来越困难。同时，也要积极支持一些有实力、有信誉的私营企业“走出去”，开拓国际市场。要扩大出口贸易，还要邀请国外企业家来我国看看，他们了解了我国的产品和市场，就会来做生意。要“放长线，钓大鱼”，着眼于还没有开发的市场。

三、关于整顿市场经济秩序问题

目前，一些地方的市场经济秩序仍然相当混乱，整顿市场经济秩序的工作绝对不能放松。去年整顿了一年，今年仍然是“整顿年”，明年还要整顿。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节目，经常反映一些市场经济秩序混乱的问题，希望各部门的负责人都要经常看这个节目。如果不能每天看，可以跟中央电视台打个招呼，凡是有关经济方面的内容，请他们送一个文字摘要过来。最近，《焦点访谈》揭露某些私营企业生

产质量低劣的“地条钢”①；某些企业在劳动保护、环境监管方面严重违法，损害工人的安全、健康，甚至大量死人等。在《焦点访谈》揭露之前，有关部门、地方领导还不知道，这是很不应该的。

---

① “地条钢”，指以废钢铁为原料，经熔化而成的不能有效地进行成分和质量控制的钢。

当前，有些私营企业用原始积累那一套残酷剥削工人的办法来发展自己，这个问题值得注意。它们只顾追求利润，而置工人的利益和生命、健康于不顾，这是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根本不相容的。各部门、各地方要贯彻“三个代表”的要求，绝不能让这种情况继续存在下去。质检总局、工商总局等部门要切实负起责任。对违法犯罪分子手下留情，就是人民群众的无情。如果再让“地条钢”等假冒伪劣商品横行，将来不知道要垮多少栋楼、死多少人。所以，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打击违法犯罪分子的任务还非常重。国务院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领导小组要继续存在，还得大力推动这项工作，狠狠打击制售假冒伪劣商品等违法犯罪活动。这样，才可以增强消费者的信心，扩大国内的消费市场，国家也才可以增加税收。

四、关于再就业问题

当前要特别重视保持企业和社会稳定，其中非常重要的方面，就是要进一步做好下岗职工再就业工作。对于大庆市发生的社会群体性事件要很好总结教训。现在看来，在做好“两个确保”①的同时，要用更大的力量抓好下岗职工再就业工作。光花钱把人养起来不行，如果没有事干，闲散游荡，无事容易生非。大庆的事件到现在还没有完，有些人还在闹事。从这个事件可以得到一个教训，有偿解除劳动关系的做法不能简单地叫做“买断工龄”，实际上买不断，也并没有买断。今后要慎重，尤其是在像大庆那样原来企业和城市一体的地区。我想到南唐后主李煜的一首词中说：“剪不断，理还乱，是离愁。别是一般滋味在心头。”②我把它改成：“买不断，理还乱，是隐忧。总是一个麻烦在手头。”工龄是买不断的。你把人家几十年作的贡献都买断了，他

能承认吗？还是要采取一套方法，就是国有企业职工下岗出再就业服务中心与失业保险并轨，如果找不到工作，就实行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大庆已经实行“买断”的办法不能动摇，如果动摇，麻烦就更大了，但是教训一定要吸取。深化国有企业改革，还是要精减富余人员，不然企业就难以增强竞争力，但是，精减富余人员的做法也要改进。上市公司如果要精减人员，先要安排他们到存续企业；存续企业安排不了，再安排别的就业门路；实在不能再就业的，就进入社会保险。劳动和社会保障部要从大庆等事件中总结经验教训，检查再就业工作的具体政策措施。辽宁省的试点，要把下岗职工出再就业服务中心同与失业保险并轨结合起来，要把扩大再就业作为试点工作的重要内容。

---

① 参见本卷《在二〇〇〇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② 见李煜《相见欢》。原词是：“无言独上西楼，月如钩。寂寞梧桐深院锁清秋。剪不断，理还乱，是离愁。别是一般滋味在心头。”

要千方百计扩大再就业，在这方面花点钱、多下一些工夫，是必要的，也是值得的。各级财政要专门拿出一笔钱来做这个事。我记得前两年，大连市推广下岗职工在24小时内就可以找到就业岗位的做法。给下岗职工介绍工作，如果你不去、挑挑拣拣，那是你的事，是你的择业观念有问题。各地要专门组织一批人，到再就业工作搞得好的地方学习经验，有关部门也要很好地总结和推广这些经验。对下岗职工要办培训班，提高他们再就业的职业技能。扩大再就业工作要发挥社区、街道的作用，社区、街道的工作要跟上去。对离退休职工要关心，不能把他们打入另册。总之，关键是要高度重视再就业问题。

最后，各部门都要总结今年以来的经济工作，切实加强经济形势分析。上面讲的意见，请各部门负责同志认真考虑。国务院办公厅要发个通知，要求各部门认真总结今年前四个月的工作，全面检查并总结对党中央、国务院确定的各项重大决策、改革措施和重点工作的落实与执行情况，并对今年上半年乃至全年的经济走势作出预测，提出需

要进一步采取的政策措施和建议。今年还有困难，而且困难还相当大，大家不能盲目乐观、掉以轻心。

参观胡雪岩故居后的留言

(2002年5月5日)

2002年5月5日，朱镕基同志偕夫人劳安和女儿朱燕来在浙江省杭州市参观了胡雪岩故居。

胡雪岩故居，见雕梁砖刻，重楼叠嶂，极江南园林之妙，尽吴越文化之巧。富埒王侯，财倾半壁。古云：富不过三代。以红顶商人之老谋深算，竟不过十载。骄奢淫靡，忘乎所以，有以致之，可不戒乎？

朱镕基

二〇〇二年五月偕夫人及

爱女于胡雪岩故居

胡雪岩故居
见雕梁砖刻
重楼叠嶂极
江南园林之妙
尽吴越文化
之巧富埒王
侯财倾半壁
古云富不过
三代以红顶
商人之老谋
深算竟不
过十载骄
奢淫靡忘
乎所以有以
致之可不戒
乎

朱镕基
二〇〇三年五月
偕夫人劳安
于胡雪岩
故居

中国有希望成为世界第一造船大国

(2002年5月5日)

这是朱镕基同志在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等部门《关于出口船和内销远洋船政策问题的请示》签报上的批语。

发展船舶制造对拉动经济增长和劳动力就业，作用很大，而且看得见，不像某些小商品。因此不要等闲看待这个问题，中国有希望成为世界第一造船大国(就吨位比较)。因此，财政部、外经贸部、进出口银行、外汇管理局等有关部门要下决心支持造船业发展。我们现在也有这个条件。

朱镕基

5.5

抓紧做好对三峡库区水污染防治和库底固体废物清理工作

(2002年5月7日)

这是朱镕基同志在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关于三峡毕区水污染防治和库底固体废物清理工作的报告》上的批语。

请岚清①、邦国①、家宝①同志批示。由于时间紧迫，为免遗祸子孙，建议所有资金缺口(包括30%部分和超预算部分)，请主管部门审核后，先由中央垫付，以后再算账。如果由于资金问题扯皮而耽误工程者，要严肃查处。(此项原则适用于库区水污染防治，库底固体废物清理和山体滑坡治理，请计委、财政部、三峡建委、重庆市、湖北省一体周知。)

朱镕基

5.7

① 岚清，即李岚清。邦国，即吴邦国。家宝，即温家宝。

高度重视安全生产工作

(2002年5月8日)

这是朱镕基同志在国务院第58次常务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现在召开一个紧急的国务院常务扩大会议，主要是研究和部署当前安全生产工作。我先讲几个问题。

一、当前交通、生产安全形势严峻。

昨天晚上8点半，北方航空公司的一架MD82飞机从北京飞往大连。机上有103名乘客、9名机组人员，一共112人。晚上9点32分，飞机到了大连上空，机上报告客舱起火，但马上就失去联系了，8分钟后，在大连机场附近海面坠毁。昨天晚上我接到报告后，立即打电话告知王忠禹同志三条意见：(一) 立即派出人员前往事故现场组织抢救，国务院副秘书长尤权，国家经贸委、交通部、中国民航总局各派一位负责同志，于今晚连夜赶往大连，全力以赴组织抢救。(二) 立即将此情况报告中央政治局常委各同志。(三) 立即与中央军委办公厅联系，请给予支持。当时我说，不管怎么样，就是要救人，不管有没有生还的希望，都要尽最大努力抢救。我给王忠禹同志挂完电话，马上就给江泽民总书记去了电话，向他报告了事故情况。江总书记接到我的电话后，指示要尽力抢救，并马上告诉中央军委办公厅派出海军舰艇参加抢救。在此之前，国务院办公厅已与中央军委办公厅联系，李岚清同志也将报告批给胡锦涛同志，胡锦涛同志指示中央军委办公厅要积极配合抢救。国务院组织的事故处理小组，已于今天凌晨2时10分乘飞机赶赴大连。救援和事故调查工作正在抓紧进行。我们要按照江总书记的指示精神，全力做好搜寻、打捞等各项救援工作，并做好遇难人员家属的慰问和安抚工作。辽宁省、大连市和国务院有关部门，要密切配合，协调行动。要根据有关国际公约和国际惯例，做好外籍遇难人员的善后工作。

这次空难事故的原因还没有查清，但这是从4月15日国航飞机在韩国釜山坠毁以来22天时间里，发生的第二次坠机事故。大家都还记得，“4·15”坠机事故发生后，我就立即指出，要注意防止连锁反应，不能再发生空难。这句话我在国务院总理办公会议上也讲过。空难连续发生，造成大量人员伤亡，我们何以面对人民！

还要看到，最近除民航发生了两起重大事故外，公路运输、煤矿生产等方面也是事故不断。仅4月1日到28日，全国煤矿就发生事故125起，死亡329人；其中，一次死亡10人以上的特大事故7起，死亡114人，超过了去年整治前的月平均数。5月4日，贵州省毕节地区威宁县一无证煤矿发生瓦斯爆炸，造成23人死亡、4人受伤。最令人难以置信的是，5月5日，湖北省十堰市的一辆大客车，在行驶途中被山上坠落的一个大石头砸中，死了17人，受伤几十人。

各种事故不断，特别是两次重大的空难事故，影响是非常恶劣的。面对这种情况，我的心情非常沉重，怎么就会频繁地发生这些重大事故呢？我觉得很对不起人民。我建议国务院各个部门，特别是有关主管部门的负责同志，要把互联网上人民群众对我们的批评，让秘书给你下载一些看看。我们不能漠视群众的意见啊！当前交通、生产安全问题严重，必须引起大家高度重视。

二、务必集中精力加强安全生产工作。

从现在起，各地区、各部门和各单位都要坚决采取有力措施，防止各类重大安全事故发生，特别要抓好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切实树立安全第一的观念。安全生产事关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事关社会稳定。一定要从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出发，真正警醒起来，集中力量抓安全生产，坚持安全第一。任何企业都不能为追求一时的利益草菅人命。民航、铁路、交通、矿山，以及各类生产企业，都要认真吸取教训，举一反三，引以为戒，绝不能存有任何侥幸心理。现在有些个体、私营企业老板不管群众的死活，一些公共娱乐场所根本没有消防设施，甚至有的为了干不可告人的勾当，把门

都锁起来，不许里面的人出去，一起火就不得了。国务院各个部门的领导同志一定要切实抓好安全生产工作。

现在，有些同志认为要开党的十六大了，政府快要到届了，心都散了，忙着出国。我不是讲不应该出国，但出国不能耽误工作。我们是共产党的高级领导干部，重任在肩，心不能散，如果该管的事情不管了，怎么行？现在去香港的代表团太多了，有的省一个代表团几百人，最多的达500人；不仅是省级干部带人去，不少市县也纷纷组团去。我多次讲过，招商引资是企业行为，要经过可行性研究，进行许多谈判。一个小城市的代表团跑到香港签好多个协议，不是骗人的吗？我感到，现在由于我们的经济形势好一点，手里钱多了，产生了一股奢靡之风，到处建楼堂馆所。我们表扬一些地方、一些城市的面貌有明显改变，是讲那里的基础设施建设进展比较快，不是讲要到处盖房子。房地产业一拥而上，根本卖不出去，还在那里盖房子。应当指出，改变城市面貌，不是靠多盖房子、乱花钱，这都是老百姓的血汗钱，绝不能任凭这个风气继续下去。

同志们，别把我们当前的经济形势看得太好了，还存在很大的隐忧。如果不警觉，好的经济形势也有可能发生逆转。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们的底子薄，经不起折腾。每个人只要多花国家财政一分钱，就不得了。如果还是那样地乱花钱，今年的日子就过不下去，这是非常危险的。是到了大家警醒的时候了，要当头棒喝，不要忘乎所以。各部门的领导同志要统一步调。今年的改革步子不小，对所得税收入实行中央和地方按比例分享的改革、扩大农村“费改税”范围，这些都是很大的步子，不能掉以轻心。所以，大家都要把心收起来，把精力全部贯注在主管的工作上。首先要抓好安全生产，别死人。我们这一届的内阁成员，有的人还年轻，后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有的人年纪快到了，大家都要给自己的工作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别在这个时候画上一个惊叹号或一个问号呀。大家都要兢兢业业，站好本届政府最后一班岗。

第二，在国务院安全生产委员会的组织下，立即在全国各个领域全面开展一次安全生产大检查，认真查找隐患，堵塞漏洞。我刚才讲最怕人心涣散；死人，就会涣散人心。安全生产抓好了，能够创造很大的效益。处理一次空难要花多少钱，花多少精力！国务院已经确定的安全生产五个专项整治工作(包括民用爆破器材和烟花爆竹、道路和水上交通运输、煤矿安全、化学危险品的储运、公众聚集场所消防)，要继续深入开展下去。特别是公共娱乐场所也要进行整治。这次还要将民航、铁路、水上交通、石油石化、电力、军工等行业，作为安全生产大检查的重点领域。市场管理部门，包括工商管理、质量检查、公安、安全管理等部门，绝不能够手软，对存在安全隐患的企业，该关闭的坚决依法关闭，该停产整顿的坚决停产整顿。重大安全事故的发生，大都与管理不严、安全措施不落实有关。安全生产管理 工作必须加强，要搞好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工作的基础性建设，建立健全安全生产监督管理体系和工作机制，认真落实各项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加强日常安全生产的检查工作，坚决纠正各种违规指挥和作业现象，做到有章必循、违章必究，绝不能姑息迁就。必须确保飞机、船只、车辆、道路等各种设备设施处于良好的技术状态，该淘汰的坚决淘汰，该维修的抓紧维修，绝不能带病运行。

第三，严格执行安全生产责任制。安全生产责任重于泰山。各地方政府一把手，要对本地区安全生产工作负总责。各职能部门要按照各自职责分工，切实负起责任。各企业主要负责人要对安全生产负责任。我们一直在强调责任制，出了事故就要找出事故责任人，出了事故不处分责任人是不行的。要告诉地方的领导同志，不能只靠中央来追究省长的安全生产责任。各地方都要把本地区的安全生产责任制建立起来，发生安全事故就要严厉查处，该撤职的就要撤职。如果这一点还做不到的话，我们党和政府的威信何在呢？国务院在去年已经颁发了《关于特大安全事故行政责任追究的规定》，发生特大安全事故要追究有关领导干部的行政责任，构成犯罪的还要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中央要严格执行这方面的规定，地方各级政府也要切实贯彻执行，严厉查处各种安全事故，严肃追究有关领导者和直接责任人的责

任。各部门、各省区市对造成安全事故的领导人员和直接责任人绝不能讲情面。

我在4月30日的国务院第57次常务会议上有一个讲话，讲了第一季度的经济形势，也特别讲了安全事故，很担心会发生连锁反应。发生一次，可能马上要来第二次甚至第三次。这是我的经验。我再次拜托中国民航总局的领导同志，千万别再摔第三架飞机了，如果再摔第三架飞机，就请你们自己辞职。我希望这次空难事故，能够使我们警醒起来。

三、认真传达贯彻这次会议精神。

第一，各部门领导同志回去后，尽快召开党组(委)会议，传达贯彻这次会议的精神。要认真总结本部门、本系统的安全生产工作。在党组(委)开会讨论了一些具体措施以后，再向司局级以下的干部传达。一方面，传达国务院这次常务扩大会议精神；另一方面，把你们本部门需要整改的问题和准备采取的措施，传达到每个司局级以下的干部。特别是几个重点部门，包括交通运输部门、安全生产管理部门、工商总局、质检总局等，你们开完党组会，研究出具体的措施以后，应该立即传达到部门的全体同志。每个行业都有安全生产的问题。我最近听到一个反映，现在老百姓对食品卫生、家具质量、室内装修，都非常不放心，因为里面含有许多有毒、有害的物质。这些也都是人命关天的事情。如果人民群众没有安全感，还有什么消费意愿？！

第二，请同志们把我4月30日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的讲话再看一看。我那个讲话是要求每个部门都要总结今年第一季度的经济工作，或者前四个月的工作，然后提出改进措施。对第一季度的经济情况绝不可盲目乐观。我们对外讲有时候要说一些鼓劲的话，但千万不要以为经济形势就好得不得了，工作也放松了，这是不行的。现在的经济发展有点危险，几项改革的任务很重，大意不得，搞得不好就会出偏差，财政就要减收，形势就会急转直下。参加世贸组织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我现在越来越感到这个挑战的严峻性。目前是我们最困难的时候，也许度过这一两年困难时期，形势就可以好一点。

同志们，无论如何要把今年的工作做好。今年可能有很多意想不到的困难，碰到很多意想不到的新情况，我们绝对不能掉以轻心。让我们大家共同站好本届政府的最后一班岗，不辜负党对我们的期望，也不辜负人民对我们的信任，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十六大的召开。

深圳改革发展要走在全国前面

(2002年5月10日)

这是朱镕基同志在北京中南海办公室听取深圳市委、市政府负责同志工作汇报后的谈话。深圳市委、市政府负责同志汇报了在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新形势下，深圳加快改革、发展步伐，争取在若干服务业领域率先对外开放，先行先试为全国探路的一些设想、思路和建议。

你们汇报谈到全面优化投资、发展环境，提高城市综合竞争力的问题，我觉得这个问题对深圳来说非常重要，应该作为第一位的工作来抓。深圳要发扬过去在改革、发展的许多方面走在全国前面的精神，为继续走在前面而努力。现在不敢说深圳各方面都已走在了前面，其他省市这些年发展也很快，有些方面走在了你们前面。深圳的干部要有危机感，这样才能使工作有新的进步。

第一，全面改善和优化投资、发展环境，还有许多问题要解决，不仅仅是减少收费、降低企业负担的问题。开放要走在前面，吸引外资，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第三产业都要赶上去。如果不花大力气进一步优化投资环境，特别是“软环境”，那就难以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深圳一定要抓住当前有利的国际机遇，依靠优化投资环境，特别是“软环境”，吸引外资和跨国公司大批地进来。深圳的“硬环境”是不错的，像基础设施、道路交通、电信、城市环境等等，就全国来说也是在前面的。当然，也还有需要进一步改进、提高的地方。深圳当前最重要的是要进一步优化“软环境”，靠“软环境”吸引跨国公司进来。深圳的“软环境”现在不一定有上海的好，上海这几年赶上来了，你们要急起直追。跨国公司很看重“软环境”，包括法制环境、市场秩序，也包括你们刚才谈到的政府行政体制的改革创新、政府行政效率的提高等等。在这些方面，我们还是要看到差距，看到存在的问题，下大力气去改进。目前，在我们国内，不只是深圳，就是上海，在投资“软环境”方面也还是比不过香港。香港是世界上投资环境最好的地

区之一，有很多方面值得我们学习、借鉴。深圳的投资环境，还要注意社会治安问题。看一个城市的投资、发展环境，也包括老百姓能不能安居乐业，安全是最重要的。所以，深圳在这个方面还要急起直追。上海有些经验也是值得你们学习的。我每天都看香港报纸，起码看一份。香港报纸对深圳社会治安存在问题的一些批评性报道还是时常有的，比如抢劫凶杀、“黄赌毒”、黑社会性质团伙犯罪等等，我看了也不全信。但是，我们从中也能发现一些问题，引起我们的重视。深圳要十分注意把社会治安搞好，让人家来这里投资、发展有安全感。现在吸引外资不能再靠优惠政策、靠减免税，地方也无权去减免税。靠这些是不行的，现在要靠硬功夫，这个硬功夫就是改善投资环境，特别是“软环境”。深圳在这方面的条件、基础比上海还要好，而且城市规模没有那么大，情况没有上海那么复杂，人也少得多，总会好办一些。深圳的同志一定要认识到深圳的生命在于“软环境”。

第二，你们汇报提到以树立诚信形象为核心，标本兼治，整顿、规范市场经济秩序。这个讲得很好，希望深圳在这方面也走在全国前面。一个国家、一个地区、一个城市，如果没有信用文化、没有社会的诚信，是不行的。现在，我们国家在这些方面还存在不少问题。可以说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的现象相当普遍。市场经济秩序就是要靠法律来规范、靠法制来保护。还有，要注意对社会中介组织进行整顿，使这些社会中介组织能够比较规范，在社会上重新树立起公正、诚信的形象。

第三，你们提到要加大力度培养、引进高素质人才，我觉得这对深圳来说也是至关重要的。深圳不仅要引进资金和技术，更重要的是要引进人才，特别是熟悉国际贸易、金融、法律、管理的高级人才。深圳有没有活力、有没有竞争力，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看人才的情况怎么样，看能不能大批引进高素质的人才。

我还想谈谈你们提出的希望国务院能够给予支持、帮助解决的几个问题。你们提出加入世贸组织以后深圳希望在服务领域先行先试，在这方面提出了一些具体要求，也有一些设想和措施，我原则上都同

意，你们都可以大胆地去试验。但是，一定要注意做好可行性研究，认真分析、权衡利弊，确实是利大于弊的，对深圳的建设、发展有好处的，对全国发展也是有好处的，就可以大胆地去探索、去试验。比如，你们提到让香港的中小银行到深圳来开展业务的问题、深圳机场与香港机场合作的问题等等。我看，这些在权衡利弊以后，只要是利大于弊的，都可以做。又比如，是不是可以让香港的执业会计师、律师等进入深圳？我觉得这是一件好事，因为这些方面正是我们内地薄弱的地方，香港在这些方面的人才比较多，也积累了一些比较好的经验。我想，你们可以在这些方面大胆去做。但是，香港在这些方面也是良莠不齐的，有一些很好的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也有一些做假账的、没有诚信的。所以，要注意筛选，选择一些好的合作伙伴，引进一些好的中介组织。还有其他一些问题，如深圳在商贸服务、物流等方面对外开放的一些要求和设想，你们都可以大胆地探索和试验。在这些领域的有些方面，我国政府在加入世贸组织的时候有一个总体的承诺。这个总体的承诺是不能突破的，但深圳可以做一些试验，探探路。只要是利大于弊的，都可以先行先试。这些问题，你们可以进一步与各有关部门去商量、研究。还有，你们提到跨国公司、外国财团到深圳来设立总部或者采购中心等，现在受到的主要限制和障碍是个人所得税税率太高。在香港个人所得税税率是15%；到了中国内地来，在深圳也好、上海也好，个人所得税累进税税率最高是45%。这确实是个问题。当然，税法是非常严肃的，从全国来看要很慎重。我现在考虑，深圳既然提出这个问题了，就可以让财政部、税务总局都来研究，让深圳先做个试点，看看情况怎么样。企业所得税也有一个税率高的问题，但这个问题现在对外资有照顾、有优惠，比如经济特区企业所得税税率是15%，其他经济技术开发区企业所得税税率有的是24%。加入世贸组织以后，就要考虑税负公平问题，比如都征25%的企业所得税，不管内资、外资、在什么地区，都一样。这些问题都是下一步要研究的。还有，你们提出证券市场恢复主板或创业板上市的问题。我原来是答应在深圳设立创业板的市场，目前还没有完全实现，原因主要是考虑怎么把握创业板上市时机和创业板上

市的条件是否成熟的问题。现在我国的主板市场还存在很多问题，在这些问题没有能够得到很好解决的情况下又推出创业板，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呢？对于这个问题确实要慎重地考虑。现在，我可以明确地说，创业板市场还是要开办的，还是在深圳上市。我们现在正在对主板市场进行一些整顿，也逐步到位了；国有股减持问题如果能够解决好，对主板市场不会引起大幅度的振荡，在这样的情况下，创业板就可以上市了。目前还是请深圳耐心等待，也不宜现在恢复主板市场，因为创业板迟早要上市，而且时间不会太长，如果又去把主板市场恢复了，不太好。从长远发展来说，全国还是一个主板市场比较好。

最后，我想讲讲你们提到的关于国有企业改革的问题。我觉得你们汇报中有个别的提法要修改，要把握好。比如，你们提到：公益性的国有独资企业要改造为国有控股企业，我建议把“要改造为”改为“可以改造为”。也就是说，并不是所有的公益性国有企业都要减持股份、都要改造为国有控股企业，而是应该根据不同的情况，有些可以减持股份，改造为国有控股企业，有些也还可以是国有独资企业。另外，就是对于一般竞争性领域的国有企业，也不必都要减持股份、都要改制，也不应该全部退出。在一般竞争性领域里，搞得比较好的国有企业，效益比较好、有竞争力的国有企业，就不应该退出，而且要继续办好，帮助它发展壮大；只是那些搞不好的国有企业才让它退出。当然，退出有减持股份、转制改造、关闭破产等多种形式。在关闭破产的时候要注意安置好员工，维护社会稳定。总之，我在这里强调的一条就是，不管是在什么领域，搞得好的国有企业都不要退出，不必都要去减持股份、转制改造为股份制或是其他性质的企业。这点意见也希望你们认真考虑，在实践中把握好这个问题。

会见美国国会众议员时的谈话

(2002年5月30日)

这是朱镕基同志在北京中南海紫光阁会见美国国会众议员吉姆·特纳夫妇和斯潘塞·巴库斯夫妇等人时谈话的主要部分。

朱镕基： 今天非常高兴与两位众议员和你们的夫人，还有韦尔曼①副总裁见面。听说你们到了河北遵化，到了农村，赞助那里的教育事业，并且亲自参加劳动，我非常感动。我们的外长告诉我外交部的两位司长也去了，要是我去，我肯定可以干得和你们一样好，因为我在农村劳动了五六年。我应该代表河北的农民感谢你们，你们为他们做了一件好事。你们这次来对中国的农村有所了解，对中国也有了更好的了解，这对促进两国关系有益。听说你们参观了那里的长城，那段长城从来没有外国人去过。那边路不好，很抱歉，乡村有的地方路还没有修好。最近四五年，市、县一级的路都修好了，县以下的修路任务还很艰巨。我欢迎你们访问中国，先听听你们的意见。

---

① 韦尔曼，即阿诺德·韦尔曼，当时任美国联合包裹服务公司(UPS)副总裁。

特纳： 我以我本人的名义，并代表巴库斯先生夫妇和韦尔曼先生，对我们在中国受到的友好款待和深情厚谊表示感谢。这次能来中国是得益于UPS公司的赞助。UPS公司赞助10万美元在遵化盖了一所新的小学，还赞助了一个电脑实验室，并配备了电脑。在两天时间里，我们和UPS公司的50名雇员共同建成了这个实验室。这次我们访问了北京，也到了农村，中国人民的热情友好使我们难以忘怀。50名UPS雇员、3位议员及其夫人对建筑知之甚少，但两天之内完成了任务，作出了很好的成绩。中国的儿童非常聪明，他们都在学英文，还想学电脑、上网，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提起乡村的道路，我本人来自得克萨斯州的农村，我们的选区就有土路。城乡之间的差异，中国

有，美国也有。这次我们很高兴看到中国的两个方面——城市和乡村。我同意你的观点，我们应该为加强美中友谊而共同努力。UPS公司的韦尔曼先生是个热心人，他希望把从中国得到的回报给中国。巴库斯议员也说今后如果有中国人去华盛顿，他会给予同样热情的款待。

巴库斯： 总理先生，我从小就学习有关中国的知识，中国有几千年的历史，美国只有几百年的历史。两国的共同点是都爱好和平，都不喜欢战争。我们去参观的那段长城所在的地区，在二次大战期间受到过日本人的侵略。在美国历史上，也有外国人想掠夺我们的土地，对我们进行攻击。像中国一样，美国对他人的领土没有图谋，我们两国成为伙伴是再合适不过的。希望两国热爱和平的人民一起为世界和平努力。在遵化的学校，我看到了中国的学生。我自己有五个孩子。让所有孩子都有美好的未来取决于我们两国如何相处，是做朋友还是做敌人。我们总是说儿童和少年的未来，实际上他们的未来取决于我们。我保证作为一名议员，作为布什总统的朋友，我愿与中国爱好和平的兄弟姐妹建立更好的关系，为世界和平作出贡献。你是一个很关心别人的人，你刚才和我们单独照相就体现了这一点。中国的儿童非常友好，遵化的市长人非常好。今天见到你，我愈加发觉自己一直喜欢中国人，愿意成为中国人民的朋友，更希望美国也成为中国的好朋友。

韦尔曼： 总理先生，很高兴给我发言的机会。我们公司在河北没有业务，但我们了解那里的需要。去年10月亚太经合组织上海会议结束后，我就去了河北，走访了几个地方，去了一个满族村和一个汉族村。最后我们决定两个村子都赞助。给钱并不难，难的是亲自来。这段时间对议员来说是紧要的关头，因为他们的同事们正在国内参加战争纪念日的活动，还要为竞选做准备。他们把夫人也带来了。毛主席说过，“妇女能顶半边天”，我们团里的妇女顶起了半个项目。我们这次还经历了一个特别的时刻，在遵化的学校举行了一次作文比赛，每个孩子写一篇作文，题目是《新学校对他们意味着什么》。汉族村庄一个6岁女孩从来没有见过电脑，她在大家面前朗诵她的作文，她念得好

极了，声情并茂，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想我的12岁的孩子做不到她那样。中国有很多需求，美国也一样。我们希望帮助中国满足一部分需求，这次我们只是迈出了一小步，中国有句话“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我们已经走出了第一步，我们从中国学到的远比我们给予的多。

朱镕基： 你这一小步是我从来没听过的，你讲了一个非常感人的故事。你们说做了一件小事，我认为那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能不能请两位夫人也谈谈感想?

琳达·巴库斯： 非常感谢给我这个机会，我非常激动。过去几天的经历不知从何说起。我在美国所从事的职业是教师。我很荣幸能来贵国访问，这里的孩子如此美丽、迷人、可爱。正像几位先生说过的，我们这次得到了非常珍贵的东西，我们知道了自己是什么人。现在我更坚定了自己的想法，要努力促进与中国人民的友好关系。

弗吉尼亚·特纳： 朱总理，感谢你今天上午接见我们。这次来中国访问是我一生最难忘的一段经历。正如几位先生说过的，我们在学校里与中国的孩子们生活了两天，这将是我们永远珍惜的。我们帮他们建好了电脑实验室，我期待着回到美国后，能收到遵化的朋友发来的电子邮件。

我和我丈夫来自得克萨斯州，我们一直认为得克萨斯是天下最大、最好的。来到中国后，我发现中国才是天下最大、最好的。中国人和美国人讲不同的语言，长相各异，但我们的心是一样的。

朱镕基： 正如特纳先生讲的，我非常高兴会见美国的议员，前不久，我见了20位美国参众两院议员。原定谈一小时，实际谈了两个小时，让土耳其的一位领导人等了一个小时。我会见过的美国参众两院议员加起来够整个国会的一半了。

特纳： 非常好。他们来看看中国非常重要。

朱镕基： 我为什么尽可能见美国议员呢?因为我认为美国参众两院针对中国的提案绝大部分是不友好的，包括最近通过的《2003财年国

防授权法》，也是不友好的。我会见的美国议员，谈得都很好，都是朋友。我们两国之间不存在根本利益冲突，可以成为朋友。出现矛盾主要是因为相互不了解。换句话说，就是美国一部分议员对中国不了解。为了促进相互了解，我希望美国国会议员都来中国看看，你们来一次，就能把大部分中美之间的误解消除。我认为UPS做了一件很好的工作，你们把巴库斯议员和特纳议员请来了。希望你们继续努力，把所有的议员都请来，中美之间没有不能解决的分歧。

中美实现关系正常化已经30年了，这30年，两国关系有时很好，有时不那么好，总的来说两国关系一直保持友好状态。根本问题是台湾问题，没有比这更敏感的问题。其实，我跟我见过的美国议员都说，台湾与大陆统一，对台湾、对美国都有利，没有任何坏处。首先，台湾与大陆统一以后，现行的制度不会改变，也不可能改变，台湾可以有自己的军队，我们不会也没有手段去改变台湾的现行制度。其次，台湾既没有资源，也没有市场，它要进一步发展，要依靠大陆的资源和市场。我告诉你们一件事，你们可能不知道，与台湾的贸易，中国大陆是逆差。去年中国大陆的逆差是250亿美元。没有中国大陆的支持，台湾不可能有这样的发展。坦率地说，统一就是要“一个中国”的名，其他什么也没变。但我们必须要这个名，不然，我们的人民不答应。我们坚决不允许“台独”。



2002年5月30日，朱镕基在北京中南海紫光阁会见美国国会众议员。左二为外交部副部长李肇星，左三为UPS公司副总裁阿诺德·韦尔曼，左四为巴库斯夫人琳达·巴库斯，左五为国会众议员斯潘塞·巴库斯，左七为国会众议员吉姆·特纳，左八为特纳夫人弗吉尼亚·特纳，左九为对外友协会长陈昊苏，左十为对外友协副会长李小林。

议员先生和夫人到中国，看到中国人民致力于经济发展，改变贫困现状，渴望和平的生活。中美合作、中国与世界的合作对我们双方、对世界和平都有利。我们希望统一，不会对台湾人民动武，统一后不会改变台湾现行制度，希望美国议员了解这一点，不要给台湾错误信息，使它越来越走向“台独”这一轨道。你们还年轻，1946年、1947年生的吧？我是1928年生的。你们出生时，二战已经结束了。我的童年、青年时代是在流浪、奔波中度过的。我们有着不同的经历，你们不希

望战争，我们更不希望战争。我们并不希望使用武力，希望用和平的手段统一台湾。我们充分相信只要美国不给台湾政权错误信息，和平统一是可能的。为什么不这样做呢？能得到市场、美元，又不需要改变什么。我不想把我的意见强加于你们，只是希望你们了解我们的立场。

UPS 公司的先生，我知道你们有问题。关于快递业务，去年“9·11”事件后，在中国多次发现通过信件传播炭疽病菌。为加强反恐管理，我们颁布了新的快递业务管理办法，规定外国企业在华开展邮递业务要经过中方主管部门的批准。我知道这个办法公布以后，UPS公司、联邦快递公司对法律的内容、方法和透明度都有意见，有强烈的不满。我想请你们谅解中国的处境，我们也是形势所迫，不能不这么做。当然，我们会充分考虑你们的意见。你们可以和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信息产业部谈，请他们做一些增补。我们会保护外企在中国的公平竞争。就我个人说，我很愿意帮你们，因为你们帮我们了。你们请了议员来中国，做了这么好的事，单凭这一点，我个人就想发给你们许可证。

特纳： 我想简单讲几句。美国一贯坚持一个中国，我认为美国政府和国会都支持中国和平统一。但是台湾人在美国国会游说的水平很高。

朱镕基： 我们比他们差多了。

韦尔曼： 最好的说客是外交部李肇星副部长。

特纳： 有时台湾人跟我们谈他们的观点，那仅仅是观点而已。我们也会作出回应，那也仅仅是回应而已。我们希望与中国大陆和海峡的另一边都保持良好的关系。我们确实向台湾发出过好坏混乱的信号，但美国政府的立场是一个中国。我在国会多年，记忆最清晰的事是投票支持给予中国永久正常贸易关系，为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打开大门。我作为众议院军事委员会成员，之所以投那一票，是因为我相信世界的和平、稳定与繁荣有赖于美中两国共同合作、发展友好关系。你了解，在我们的政府框架内，每个议员可以自由发表意见，有时国

会与总统的意见不一致，媒体有时断章取义。你们可能听到过相互矛盾的言论。美国将履行一个中国的承诺。大陆人和台湾人都是中国人，而且经济联系发展得很快。我们应该站在正确的一边，理解一个中国的含义。中国政府在香港的做法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我们愿意为中国的和平统一作出贡献。

朱镕基： 你去过香港吗?

特纳： 没有，我非常愿意去看看。

巴库斯： 要解决台湾问题只有一个方法，就是和平统一、一个中国，这是正确的方法，是解决问题的基础。正如特纳议员所说，在美国，议员不负责制定外交政策，外交政策的制定由总统负责。总统是代表国家的，我们只是代表个人的观点。我将用我的影响力，使美国放下包袱。过去50年，我们相互之间确有误解、恐惧和偏见，这些一旦产生，就很难消除。赫鲁晓夫曾说要埋葬美国，美国害怕苏联的军事力量。我们认为中国是苏联的盟友，因此也惧怕中国。如今赫鲁晓夫已经去世，俄罗斯不想把美国埋葬，美国对俄政策有了180度的大转弯。我们对中国也应如此。今天你讲的中国对和平统一的良好愿望，我看是十分恰当的，希望中国尽早实现和平统一。美国人民愿意与中国人民发展友好关系，愿与中方合作朝着和平统一的方向努力。我们的政府有时言行不一，我们的政策是一个中国，但行动上有时却偏离了这一点。我曾在国会公开质疑过，台湾问题不应该由我们决定，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应该由中国人民自己决定。现在缺少像你这样有才干的、开放的、真诚的、高效率的人士向美国传递信息，你对我们的政策是有影响力的。你有很强的沟通能力，在美国一定会赢得尊重的。

朱镕基： 祝你们访问中国成功，欢迎下次再来。希望下次不仅来3位议员，应该来得更多，来30位最好。特纳议员刚才讲到香港是一个很好的例证。香港回归后，中央政府没有干涉。香港有的报纸每天都在骂中国的领导人，比美国的媒体骂你们的领导人还厉害，这说明我们没有对香港施加任何压力。

做好防大汛、抗大洪的准备

(2002年6月6日)

2002年6月4日至13日，朱镕基同志先后在湖北、湖南、江西、安徽省考察长江防汛工作。这是朱镕基同志在听取湖北省委、省政府工作汇报后的讲话。

我这次到湖北省来检查防汛工作，应该说是第三次了，1998年来了一次，1999年来了一次，再加上这一次。这中间，我还到过湖北省其他一些地方，比方说去年到过三峡、宜昌等。党中央、国务院 对湖北省的工作是非常关心、非常支持的。湖北省的工作在省委、省政府的领导下不断取得进步，特别是在防汛工作方面，可以说是今非昔比了。1998年抗洪最紧张的时候，我到龙王庙去，当时的危急状态今天记忆犹新。到现在，工程已经完成，应该说是坚如磐石了！

今年的汛情出现了一些异常的变化。前三个月，雨量偏多，包括湖北省的江汉关、湖南省的城陵矶，水位都超过了历史同期最高水位。这值得我们高度警惕。同时，我们感到虽然花了大量的资金建设水利工程、堤防工程，但不一定就天下太平了。这方面的钱花了多少呢？全国水利建设的投资在最近四年花了1100亿元，其中用于堤防 建设的是630亿元。这630亿元里面用于长江流域四个省的有397亿元；其中用于湖北省的有200亿元，占了一半以上，约占全国的三分之一。大量的资金投在湖北省，如果在今年汛期，湖北省的堤防特别是荆江大堤还是出了问题，我们没法向全国人民交代。现在是提高警惕的时候了，因为很难保证今年不会发生异常的洪水，何况现在已经出现了异常的情况。从客观的不利情况来看，隐患主要有：

第一，虽然我们投入了大量的资金，建设、修筑堤防，但工程还没有全部完成，大概完成了90%吧。特别是前三个月，由于下雨影响了施工进度，很多工程要到今年年底或跨年才能完成。这就影响了今年抗洪的能力，是一个很大的隐患。

第二，工程的质量很难保证没有“豆腐渣工程”出现。我们1999年曾经在这个地方召开长江流域防洪工作会议，就是为了总结吸取洪湖燕窝大堤出现质量问题的教训，当时引起了各省的注意。绝对不能搞“豆腐渣工程”。工程质量一出问题，千万老百姓要受害。这次我们从荆州、沙市坐汽车到监利，然后从监利乘船到洪湖，再从洪湖坐车到武汉，沿途看到的江堤，总体来说是令人满意的。但是，我感到还是有很多地方没有达标。有的地方种树，没按规则种，甚至种到堤上来了，防护林与堤脚的距离太近了，一旦将来发生管涌，很难发现和找到。特别是砍树的时候，如果没有把根挖出来，根部腐朽，滋生白蚁，就很难保证堤防的安全。前不久出现的文村夹崩岸，就说明堤防的隐患还很多。当然崩岸难免，也不要大惊小怪，但是崩岸的危险是很大的。1998年出了问题的地方，现在加固了，但还有很多未发现问题的地方，那些堤防还是旧的，可能存在隐患。所以，对工程的质量绝不能盲目自满，麻痹大意。

第三，工程建设中还是有挪用资金、截留资金的情况，没有把该用于堤防建设的钱全部花在堤防上，而是挪用、截留了。我不敢说具体金额有多少，但这种情况是存在的，这是产生“豆腐渣工程”的原因。同时，地方资金不配套以及基层政府的乱收费，也影响了建设资金的到位和工程的建设。

尽管上述几个方面都是一些支流，但是，堤防必须万无一失！如果100公里，有几十米出了问题，那不就前功尽弃了吗？！所以，对工程质量不能盲目自满，特别是对堤防的维护、管护是不是到位，我看不一定。举个例子讲，我们到监利的时候，离监利15公里的地方，就在堤上面，有一辆汽车已经烧掉了，剩下一个架子在那个地方，留下了一个坑。我看至少有三个月了，没有人管，没有人把烧掉的汽车挪走，把那个堤补起来。这么一点小事都做不到，找一个拖车不就拉走了嘛。正因为工程和管理里面存在着种种漏洞，特别是工程还没有完全竣工，所以在这种时候，我们必须提高防大汛、抗大洪的意识， 绝不可麻痹大意。



2002年6月6日，朱镕基在湖北省洪湖市考察长江干堤。前排右二为湖北省委书记俞正声。

同志们，我送大家一句话："大意失荆州"哇！这事就发生在你们湖北省，说的是关公大意失荆州。刘克毅①呀！你记住我这句话，将来别在历史上写下一句：刘克毅大意失荆州！那你这几年做的好事，就会被一笔抹杀了。绝对不可以麻痹大意。我已向水利部、长江水利委员会提出目标：现在不是按1998年的洪水来防汛的问题，而应该考虑到如果发生了1954年那样的洪水，我们还能够确保大堤安全，不分洪！现在如果发生1998年那样的洪水，我认为是不成问题的。当时在

毫无设防的情况下，特别在洪湖、监利一带，用化纤袋堆起来的堤岸差不多有两米高，把水挡住了，没有分洪。现在这个堤岸已经提高了1.7米到两米，所以说，遇到1998年的洪水应该不成问题了。如果出现1954年那样的洪水，我提的目标是：不分洪，全力抢险，确保大堤。分洪不得了呀！现在跟1954年的情况根本不一样，那个时候只是淹几栋破房子；现在人口增加了多少倍，财物增加了多少倍，粮食增加了多少倍，房子增加了多少倍，现在是淹不得呀！分 洪以后的损失是难以想象的，多少灾民没有地方安置，那个损失不知道以多少亿元来计算。所以，我希望大家现在一定要提高警惕，做好一切准备工作，一旦发生1954年那样的洪水，应该怎么调度，事先要有预案。我向水利部、长江水利委员会提出了这个任务。你们按照这个目标去做方案、论证。当然，我们也不能人为地去违反自然规律，到时非要分洪不可的话，也要有个分洪的方案，先分到什么地方，后分到什么地方。防大汛、抗大洪，首先要把方案制订好，有什么样的洪水，就用什么样的方案来应对。把指挥系统、信息系统都建立起来，一进入汛期，就定期巡视。对大堤上的“管理屋”，要很好地检查一遍，看他们的工作做得怎么样。我看那些“管理屋”都是一家子一家子住在那里，标准蛮高，但是不是尽了职责要认真检查。所有险工险段、未完工程和可能发生管涌的地方，都要准备好沙石料、化纤袋子，集中在仓库里，堤上已有公路了，到时运输还是比较方便的。沙石料现在就要备，不然到时运也来不及呀！另外，三峡工程建设以后，河流的走势会有什么改变，要作分析；明年6月份三峡工程开始蓄水，蓄水以后对河流的走势有什么影响，也要研究。

---

① 刘克毅，当时任中共荆州市委书记。

总之，我希望大家动员起来，要开一个会，把这些话讲下去，不要麻痹大意。荆江大堤如果出现危险，今天在座的谁也无法向全国人民交代！现在就要做准备。“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只能按照最坏的情况准备，争取最好。不要心存侥幸！我希望在座的各位都要意识到肩

上的责任重大，绝不可以有丝毫松懈麻搏，要迅速做好各项准备工作。

为了支持大家把这个工作做好，这两天，我们在路上商定，资金问题中央财政要给予必要的支持。

第一笔，干堤加固工程资金。过去是中央拿80%，地方配套 20%。经我们调查，地方配套投资实际上都没到位。真的是拿不出钱吗？监利拿不出钱，我倒是相信的。仙桃拿不出钱，我就不大相信了，大楼盖得那么好，怎么会没钱呢？现在，我也不跟你们算这个账了。20%的配套资金，这四年来你们一元钱都没拿，这个堤全是拿中央的资金修的。差了20%，那80%就等于白修。因此决定，这20%的配套资金，具体来说是4亿元，我从总理预备费里面拨给你们，不 要你们还了。湖北省确实有好多市县财政困难，特别是荆州。中央拿出这笔钱的目的，就是希望大家赶快把工程搞完。

第二笔，移民建镇的基础设施建设资金。第一期移民，当时没考虑到移民建镇基础设施的建设，后来我们从第二期开始，对每户加2000元钱，使每户的补助款达到1.7万元。现在这些钱，由中央拿，补到移民建镇基础设施建设不完备的地方。当然，现在第一期、第二期移民补助都在一起了。补助一些钱来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在湖北省就是6000万元。这笔钱由国家计委在国债筹资里面来安排，回去就拨给你们，不需要按进度拨了。



2002年6月9日，朱镕基在江西省九江市考察防汛工作。左一为江西省委书记孟建柱，左三为水利部副部长张基尧，前排右三为江西省省长黄智权。

第三笔，平垸行洪资金。由国家计委在国债筹资里安排，湖北省是1.3亿元，马上拨给你们，赶快搞。这项工程也许有可能在汛期以前抢完。

这三笔钱拨出来了，目的就是考虑到你们财政困难，帮助你们赶快把这些工程搞完，抢上去。有些地方要日夜施工。至于刚才讲抢险防

汛的备料，你们要赶快做规划，报水利部、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我们给你们垫钱，要把这个准备起来，将来这个资金怎么开支，再研究。

此外，你们提出的长江抗洪国债资金由地方转贷的问题，明年开始还本，每年都要付息。这对地方来说是一个负担，因为水利工程本身没什么直接经济效益。我想，这个问题不只存在于湖北省，也不只是反映在长江，而是全国的问题。这个资金怎么处理？我个人的意见，全部转为中央国债，我讲的是用于水利的国债。这个意见还需国务院研究讨论，但对你们来讲，今年不要交了，明年也不要还了，这样至少可以缓解你们的困难。具体办法由国务院讨论后下发文件。

另外，对荆江河势的观察研究、信息预报都要抓紧。从工作方面来讲，我们要从最坏处着想。希望大家同心协力，把今年的汛期度过，不要出任何问题。为了保证荆江大堤不垮，中央全力支持你们！

恢复“浩浩汤汤”的洞庭湖

(2002年6月9日)

这是朱镕基同志在湖南省考察长江防汛工作期间，听取省委、省政府工作汇报后讲话的一部分。

今天谈到移民建镇、平垸行洪，我想谈一个问题，就是何时恢复洞庭湖的“浩浩汤汤”。这个问题值得我们长远地考虑一下。我去年来湖南时写了一首诗①，末了两句是：“浩浩汤汤何日现？葱茏不见梦难圆。”在湖南没有见到洞庭湖的“浩浩汤汤”，我这个梦圆不了，不就“梦断潇湘”了吗？据说19世纪的洞庭湖湖面有6000多平方公里，新中国成立时是4350平方公里，现在是2691平方公里。洞庭湖是全国四大湖之一，是湖南省的“宝湖”，是一个保国安民的湖，也是一个风景生态群落。但是，现在它被分割成不像样子了，乱七八糟的。这主要是因为当时没有饭吃，大家去围湖造田，造成了目前这个模样。现在情况已经改变了，我国的粮食已经供过于求了，这一点袁隆平②作出了很大的贡献。我在1952年到国家计委工作，参与制订第一个五年计划。我记得很清楚，当时粮食平均亩产(包括水地、旱地)是201斤。湖南现在水稻亩产都1400斤了，小麦亩产也是1000斤以上啊。跟新中国刚成立时比较，情况已经大变了。所以，现在就提出来要退耕还林、退田还湖、平垸行洪，恢复水面。水面不仅与中国的生态，而且与世界的生态都有关系。

---

① 朱镕基同志的这首诗题为《重访湘西有感并怀洞庭湖区》，详见本卷。

② 袁隆平，中国杂交水稻育种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



2002年6月7日，朱溶基在湖南省常德市考察城市防洪大堤。左一为湖南省省长张云川。

当然，现在要平垸行洪、恢复水面，困难不小，主要是一大堆人都住在湖区里面，要他们搬走是很难的。要他们搬走，屋子要拆掉，得给他们盖房子，还要给他们开辟生路。所以，这件事太着急是不行的，目前只能够先搞一点“单退”①，有必要的地方搞“双退”②，但还是保留了堤垸分割的局面。我觉得，现在应该为子孙后代考虑这个问题。科技越来越发展，袁隆平不是还要使水稻亩产达到1600斤吗？我看亩产2000斤也有可能，总是有潜力的嘛。所以，现在应该考虑以后

的情况，应该作出规划来，在洞庭湖边上建几个城市，不是大城市而是中小城市，就像常德、益阳这样的城市，把基础设施逐步地建好，然后一年一年地把洞庭湖区的人往这些城市搬。昨天，我们看了“单退”的围堤湖，围提湖里种的是意大利杨树，长得那么快，现在国家缺的就是木材。在围堤湖里面种意大利杨，再来洪水，只要不没顶，它们还是能够生长的，虽然那时候看不到“浩浩汤汤”，也可以看到“郁郁葱葱”嘛！那为什么还要去种粮食，还要跑到湖里面去盖房子呢？可以出一条政策：凡把房子、宅基地平了种树的，收益归自己。这样，大家就都会从湖区搬出来了，搬到城里来，城市的经济就发展起来了，服务行业也就发展起来了。我说，总要有一个长远规划，就是恢复到至少是4350平方公里的湖面。我国东部沿海地区农村比较富，盖的房子已是第四代、第五代了，屋顶像罗马式、希腊式的都有了。但它有很大的弱点：太分散，星罗棋布，也没有基础设施，上下水道不通，看家里都挺好，装修都是富丽堂皇，一出门就一塌糊涂，到处都是垃圾，这是“富裕中的贫困”。我们昨天看的围堤湖新村也有这个问题，没有好的道路。只有把规划搞出来，按规划搞建设，把基础设施建设搞好，我们的国家才能真正实现城镇化，百姓才能真正富起来。无论如何，我们不能把洞庭湖“浩浩汤汤”的目标丢掉，不要认为现在围的这些垸子③都是合理的。现在就要创造条件把它们拆掉，这就要求有城市规划，开辟新的生路。

---

① “单退”，移民建镇项目的一种类型，指退人不退耕。

② “双退”，移民建镇项目的一种类型，指退人退耕。

③ 垸子，指湖南、湖北、江西等地，在沿江、沿湖地带围绕房屋和田地等修建的像提坝那样的防水建筑物。

我希望湖南省的同志们能够看得远一点，不一定是在你们这个任期里面见效，而是在将来子孙后代那里见效。我们的脑筋一定要适应环境、形势的变化，现在不需要到处种粮食，更不要上山下湖去种粮食，那样会破坏生态环境，造成人类的更大损失。农民吃亏就吃亏在

粮食价格便宜。我们要多开辟一点生路，让他们不用都去种粮食，这样粮食价格就会上去，农民就会富起来。所以，传统观念一定要改变。

我觉得应该做一个洞庭湖的发展规划。第一步目标就是湖面恢复到4350平方公里，即恢复到新中国成立时的状态。在沿湖以外的地方去规划几个城市，这围着湖的几个大的城市，将来是旅游城市。整个洞庭湖，再加上周围城市的景观，一个很好的旅游产业就可以发展起来了。外国人也会来投资，因为服务行业起来后，投资环境就改善了。我在岳阳南湖宾馆睡了一个中午，觉得那个环境比长沙好。那个宾馆的电视可以看到中央电视台第四频道，我在长沙看不到。我们湖南人吃亏就吃在封闭，“老子天下第一，关起门来称王”，那怎么行呢？要开放。洞庭湖是一个多美的地方啊！要把旅游、文化结合起来。“诗墙”①是在常德吧？这是一大创造，问题不在于有一个“诗墙”，而在于它有创意，有创造性。西安的碑林流传了上千年。

---

①“诗墙”，指湖南常德以2.92公里长的防洪墙为载体，修建了一座旨在弘扬中华传统文化、加强爱国主义教育的诗墙，命名为“中国常德诗墙”。诗墙荟萃了中国当代名家诗词、书法、美术精品镌刻于一墙，被称为世界上最长的诗、书、画、刻艺术墙。



2002年6月6日，朱镕基在湖南省考察洞庭湖大堤。右二为建设部部长汪光焘。

退耕还林的工作，我是绝对的支持。你们说上报的是500万亩，今年批准了，说是既包括退耕还林，又包括荒山造林。那退耕还林占多少？各占一半。我的看法，你们不要把两者混在一起。我们实行退耕还林，把耕地变成林地，国家补贴你们粮食，然后你们一定要把树种活，这就是我们以政策来推动生态环境的改善。至于荒山造林，那是我们的号召，不是一个指标，是我们大家争取实现的一个奋斗目标。希望你们不但退掉一亩田能种一亩树，还希望你们那个地方如果有荒山的话，也把那一亩荒山种起树来，我们也给你们苗木钱，种了树后的收益都归你们，这是号召性的。不能够把“退一还二”、“退一还三”当做一个政策，那是不行的。没有荒山退什么？所以，不要把两件事混在一起，就只讲退耕还林多少亩。至于荒山种了多少亩，你们自己去

统计就行了，种得越多越好。首先还是要把退耕还林的树种活，如果头一年没种活，第二年也要把它种活。你们不种活，第二年粮食补贴就没有了，所以始终要包活。如果还有余力，又确实有荒 山，你们就去开荒种树，也给一些优惠条件，但这不是作为退耕还林的必要条件。这一点要讲得很清楚，不要把它们混在一起。

紧紧把好机构编制这个关

(2002年6月19日)

2002年6月19日，朱镕基同志接见出席全国编办主任会议暨全国机构编制系统先进集体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的代表。出席会议的有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和各副省级市编办主任，受表彰的全国机构编制系统先进集体代 表及先进工作者，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机构编制工作的同志等170多人。这是朱镕基同志在接见会议代表时的讲话。

机构编制管理工作是一项得罪人的工作，不好做，但这几年我们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国务院组成部门由40个减为29个，编制精简了一半；2000年，又撤销了8个工业局和国内贸易局；省一级的编制也差不多精简了一半，市县乡精简了20%。这次机构改革，全国共精简行政编制110多万个，应该说达到了预期目标。机构改革工作难度很大，同志们克服困难，恪尽职守，为机构改革的顺利进行作出了重要贡献，是很不容易的。

同时，我们还是要给同志们鼓劲，希望同志们继续做好机构改革和机构编制管理工作，因为这项工作的难度越来越大，上述成绩要巩固很不容易，还要做很多工作。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减少行政审批事项的任务还很艰巨，少数市县乡的机构改革还没有完成，防止机构编制反弹的任务也很重。希望大家毫不松懈，再接再厉，锲而不舍地把这些工作抓到底，圆满完成机构改革任务，给人民群众一份满意的答卷。



2002年6月19日，朱镕基、胡锦涛等中央领导同志接见全国编办主任会议暨全国机构编制系统先进集体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代表。前排左一为中办主任王刚，左二为中共中央 政治局候补委员、中组部部长曾庆红，左五为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王忠禹，左六为财政部部长项怀诚。

最近，我察看了长江堤防，走了几千公里。有些地方的同志反映，给机关、事业单位人员加工资，虽然中西部地区是中央拿钱，不需要地方配套，但现在实际人数已经超编20%，等于地方要配套20%。我说超编20%本来就是不合法的，你们为什么还要承认，还给他们加工

资？如果中央承认超编20%，并照此拨钱，那编制还有什么意义？还要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干什么？这件事确实值得我们研究。

国务院在讨论这些问题的时候，李岚清同志也讲到，农村也有这种情况。我前不久到几个省看了几个小学，发现这些小学的老师收入还不低。一般情况下，有10到20年教龄的农村小学老师，每月可以拿1000元左右，校长拿1250元。在农村，现在教师的工资算是很高的。教师工资统一收到县里发，中央专项拿出50亿元。从目前了解到的情况看，这项政策还是有成效的，说明我们关于农村义务教育的政策是正确的。李岚清同志和陈至立①同志都告诉我，现在农村中小学教师也存在超编现象，本来一个教师的工资可以拿1000元，结果他们雇了三个教师代课，1000元分给了三个代课教师，一个人只有300元。这种做法是不合法的，应该制止。现在农村的中小学生又没有增加，怎么还要超编请老师？出现这种情况，不是因为实际需要，而主要是当地乡村干部把七大姑八大姨都弄来当教师，就是因为教师工资高。农民一年的纯收入平均只有2000多元，实际现金收入不超过1500元。所以，很多人搞关系都想挤进教师队伍和干部队伍。对于这些问题，就需要依靠编办的同志，不怕得罪人，坚决把住关。如果不把住关，会把政府的财政冲垮，最后是祸国殃民。都挤进来吃这个“大锅饭”，进来以后又搞乱收费、乱摊派、瞎指挥，这怎么得了！我这次路过1998年发洪水的湖北省监利县，这个县有140万人，全县财政收入才一亿多元，但干部队伍很庞大，怎么维持？

---

① 陈至立，当时任教育部部长。

编制工作有了一些规定，我们也规定了各单位的编制数，但实际工作中不一定都能落到实处。这就需要大家深入调查研究，向中央反映，由中央制定政策来把好这道关。现在似乎有一股风，很多地方都在刮，好像我们的经济实力已经大得不得了，花钱如流水，都在那里大兴土木，都在那里搞所谓“形象工程”、“政绩工程”。我担心这股风要把我们吹倒。与这股风同时吹的，就是各地纷纷要求增加干部、增加编制。中央说加强某项工作，他们就要求增加编制。比如加入世贸组

织，相关部门就要求增加编制；要维护社会治安，就要求增加公安机关的编制；要整顿市场经济秩序，市场管理部门也要求增加编制。这些问题，靠增加编制能解决吗?

中央电视台的《焦点访谈》节目曾报道河北省衡水地区发生“生猪注水”事件，我们整顿了。最近，中央电视台《新闻30分》节目又报道了山东省出现“活牛注水”事件，检验检疫部门还给违法者盖检验合格的章，真是骇人听闻！现在，某些地方的市场经济秩序是放任自流，政府管理不力，简直到了令人吃惊的地步！这是增加编制能解决的吗?检验检疫部门的工作人员把印章都交给别人了，还要这些工作人员干什么？还要增加编制干吗？我看有一个人就够了，就是只要一个局长，他把印章分给大家去盖不就可以了？前天，《焦点访谈》节目报道了湖南省邵阳市隆回县搞假复合化肥的事件。那些人其实都是些骗子，根本就没有合格的生产场地、生产设备，把乱七八糟的东西掺在一起就成了化肥。这些所谓的“复合化肥”虽然包装得很好、很漂亮，但实际上是骗农、坑农。谁允许他们生产的？只要交3000元，质量监督局就发给生产许可证，就可以生产。实际上就是只收费、不监督，那质量监督局有什么用？我看了这期节目以后很生气。我给李长江①同志打电话，请质检总局派一位副局长去调查，先把隆回县的质监局局长撤了，再查他的问题。这哪里是什么编制不 够呢？这是吃着国家的“皇粮”，披着执法的外衣，干的是坑害老百姓的事情。这些问题如果不整顿、解决，增加编制有什么用?

① 李长江，当时任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局长。

最近，我察看了长江大堤，感到比较放心。投入几百亿元，长江大堤确实是加固了。但是，谁知道里面有没有“豆腐渣工程”？这只有靠洪水来考验了。但我在返京后的第二天看到《焦点访谈》节目报道，说长江里面盗采河沙现象还很严重。那些盗采的船都是个体户的，马力很大，一小时可以采2000吨至3000吨河沙，一吨河沙的成本只有4元至5元，运到上海就能卖30元至40元，“黄金滚滚”啊，都进了个人腰包。盗采河沙，破坏性极大，大堤是要垮的。为解决这个问题，过去我不

知批示了多少次，三令五申，但屡禁不止。我们各地政府和水利、交通等有关部门都干什么去了？国务院最近专门通过了关于禁止盗采河沙的条例，执行了半年，结果怎么样？那天，《焦点访谈》节目的记者采访一名女的船老板，问她在那里采沙采了多久？她说一直在那里采。问她最近几天为什么没有来？她说因为总理来了。又问她为什么现在又来采了？她说因为总理走了。我认为这是对我们极大的讽刺！我们有这么多人和部门在管这件事，那么大的一条船在那里盗采，却都视而不见，还要增加编制干什么？！

我们要打破这个迷信，不能说要加强某项工作，就要增加编制。编制多了，要加大工资总额，政府怎么受得了？你们要顶住，把住编制这个关。这是你们的责任，不要怕。过去你们把了关，得罪了人，我已给予表扬。今后，你们还要继续努力，还要继续得罪人，特别是不能再刮增加编制的风，要顶住！希望你们继续以对党和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从大局出发，坚持原则，秉公办事。我相信各级党委和政府都会支持你们，一定会当好你们的后盾。

在这次机构改革前，为了有利于精简机构和编制，我们出台过一项优惠政策，即在机构改革中被分流的人员三年内照发工资。这一政策对推动机构改革和人员精减工作起了很大作用，减少了很多阻力。我们当时只是规定三年内照发工资，但三年以后怎么办，希望这次会议能研究这个问题。如果三年以后这些人的工资还照发，对政府就是一个沉重的负担。解决这个问题，需要有个妥善的办法，请大家一起来研究。

改善西部地区生态环境的根本办法是退耕还林

(2002年7月16日)

2002年7月15日至21日，朱镕基同志先后在甘肃、陕西、河南、山东省考察黄河防汛工作。这是朱镕基同志在听取甘肃省委、省政府工作汇报后讲话的主要部分。

关于生态环境的改善问题，我在这里要明确一点，兰州市的绿化工程搞得是好的，成绩是显著的。但是，我还要说一句话：今后搞不起。搞33万亩绿化，你们花了6.6亿元，平均每亩地要花2000多块钱，这怎么搞得起啊！况且你们引水上山，将来的维护费、电费、水费、人工费等费用都很大，你们也负担不起。

我认为，改善西部地区也包括甘肃省的生态环境，根本的办法是退耕还林。退耕还林的政策在甘肃省还落实得不够。我们坐飞机来的时候，快飞到兰州市时，就看到山上有很多耕地，我不知道那些地到底怎么种。爬那么高的山上去种那么一点地，收来的粮食也不值几个钱，农民有什么效益呢？要告诉农民，每亩地每年给他们200斤粮食，让他们把地退出来种树，我看农民会欢天喜地的。这项政策，现在承诺实行八年，将来还可以再延长嘛。到哪里去找这么好的事情呢？只要把政策给农民讲清楚卞，甘肃省一定能够掀起一个退耕还林的高潮，生态环境也一定会得到改善。现在这个政策还不够落实，而且落实起来的确不那么容易。如果基层干部作风不好，卡人家的粮食，挪用专款，不把钱拨到农民手里，那就落实不了。可以说，改善甘肃省生态环境的关键在于落实退耕还林政策。定了的政策一定要抓落实，要给农民粮、钱和产权。只有掀起这样一个生态建设的高潮，甘肃省的生态面貌才能改善。靠拿钱来种树，那我们种不起。我们现在没有钱，但我们现在有粮，一年的陈化粮有几百亿斤，再这么陈化下去，做饲料都不成了。把粮食给农民，鼓励农民来搞绿化，既可以解决粮食多的问题，又可以改善生态环境，政府和群众都受益。我在四川省看到他们给农民的粮食都用特殊的包装，上面印着“退耕还林大

米”、“退耕还林面粉”，农民感激得不得了。我到农民家里去看时，农民流着眼泪说，政府对我们真是关怀备至啊。我在四川西部确实看到，退耕还林这个政策对水土保持大有好处。把山上的耕地退了以后，山上流下来的水都是清水。所以，我再一次呼吁西部地区包括甘肃省在内，要改善生态环境，就要退耕还林。

刚才，你们提出搞400万亩退耕还林，作为明年的计划。你们要赶快做好准备工作，赶在今年能种树的时间去种。资金要预拨，粮食也没问题。但是你们要赶紧做落实的工作，要层层地去布置，做调查，看农民能够退多少耕地。首先要把政策告诉农民，有了政策他们报的数字才是真的，没有政策他们报的数字有可能是假的。要把农民的积极性调动起来，粮食和资金不能够克扣，不能层层挪用。当然，要把树种活。种不活，第二年就不给粮食，要有一套监督的制度。

我这次来，别的什么也没有答应，就答应搞400万亩退耕还林，希望甘肃省一定要把这个事情做好。我坐在飞机上往下看，实在是揪心，下面都是一片荒山；再看看黄河水，像黄泥沟一样，水比面汤还稠。如果不退耕还林，不绿化荒山，怎么能改善这个环境呢？过去我讲“退一还一”、“退一还二”、“退一还三”，就是说你退了一亩耕地以后，还要帮我种一亩荒山，我给你树苗钱嘛。我再一次声明，这个不是硬性指标，也就是说你退了一亩耕地，我给你200斤粮食、50块种苗费、20块零花钱，这些都给，但我同时希望你再种一亩荒山。种一亩也好、种两亩也好、种三亩也好，开荒嘛，产权归你，树苗钱我出。农民应该是有这个积极性的。但是千万不要变成退一亩耕地就必须种一亩荒山，他没有荒山怎么种？另外，没有劳动力也种不了。先退一亩耕地，种一亩林地，第二年再来考虑绿化荒山也可以嘛，不要卡得那么紧，不要因此影响了农民退耕还林的积极性。

刘家峡水库的绿化要国家拿钱，你们电力公司经理是干什么的? 这个水库你们不去绿化，你们问我要钱，难道你们的钱就只能盖宾馆，不能搞绿化？这没道理嘛！我去看过刘家峡水库，是没有绿化好，工作没有做到家。

关于甘南牧区草场退化的问题，我们正在内蒙古搞试点，看搞得如何再研究采取什么政策。这种事情要发动群众，国家拿钱是没有用的。不是说不能拿一点，我们能给的粮食可以给你们，你们根本的办法是要搞舍饲圈养，不要放大牧，让牛羊把草原给啃光。要把牛羊圈起来养，国家给饲料补助。至于怎么围栏、怎么保护草地，你们就让牧民自己来搞。国家花钱，也不见得能用到该用的地方上去。

再造一个山川秀美的陕北

(2002年7月16日)

这是朱镕基同志在陕西省延安市考察退耕还林、水土保持工作时的讲话。

三年前我来这里，提出了“退耕还林、封山绿化、以粮代赈、个体承包”的政策。当时，我说过三年后再来看一看。三年后故地重游，看到延安的绿化工作有很大进步，生态环境有很大改善，我心里非常高兴。当时我就讲，我们对革命老区、对延安是欠了账的，抗日战争时期几万人在延安这个山沟中，不砍树、不烧炭，就没有活路。这些对生态环境有一定的破坏，我们今天有这个力量把生态环境恢复起来，这叫还债。所以，我们就提倡退耕还林、封山绿化、改善生态环境。现在看起来，这个政策贯彻得不错，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延安的生态环境还是很脆弱，我们不能满足，起码还要奋斗十年，成果才能真正得到巩固，一点也不要放松。所以，退耕还林、封山绿化还要继续搞下去，继续承包到户。我们刚才看到，有些地方还没有完全“退”下来。这么高的山包，跑上去种粮食干什么！要告诉农民不要跑到山顶上去垦地了，咱们不缺这一点粮食。请他们退出来种树。退一亩地给你200斤粮食、50块种苗费、20块零用钱。最重要的是要把树种活，没种活是不行的，只要你种活了，我们都是认账 的，绝对兑现。一定要把树种活了，国家才给你钱，而且无偿给你提供粮食，这是支援农民最有效的手段。退耕还林，我一再讲，要放手干，搞政策兑现。如果生态环境再恶化下去，到处都是荒坡，都变成了沙漠，那怎么得了！只要我们把这个政策落实了，就一定能再造一个山川秀美的陕北。现在已经用事实说明了这个政策是完全正确的，三年时间已经初见成效。我相信，十年以后会大有成效，那时我还要来看一看。希望延安人民继续把这个精神发扬下去，那时延安不仅是革命圣地，而且是秀美山川，会更加漂亮，全国人民都会到这里观光，来接受爱国主义教育。所以，延安是大有前途的。

我觉得，退耕还林要全面铺开，但计划一定要落实。报600万亩，就一定要退600万亩，不要虚夸。只要粮食和钱到了农民手里，树活了，你干3000万亩，我也给你钱和粮食。退耕还林我一直讲，要把政策落实，把工作做扎实。可惜，有些同志就是跟我的认识不一致。没有办法，我只好到处宣传。

至于在沟里打淤地坝，这个是我在1999年来的时候就提出来了，国家补助算一种鼓励，就像吃中药给一个药引子，干活还是要靠群众，因为对他们有好处嘛。淤出的地都是你的，你也不用再到山顶上去种地了，还可以腾出手来搞其他事。这就是政策的作用。

关于种一定比例的经济林，要引导群众选择适宜的好品种。我刚才看路边种的都是苹果树，不要再种味道酸溜溜的那种，根本卖不出去，只能卖一毛多钱一斤。要改良品种，可以找一些农学家研究一下，陕北地区这样的土质适合种什么，然后加以引导。

农村的能源建设很重要。现在看起来，只有解决了农村的能源问题，山才能真正封得住。要农民不烧柴，得有新的替代能源。你们这里有煤，可以烧煤，但又不能烧原煤，还得做成蜂窝煤给农民烧。推广沼气也是一种办法。

我刚才出延安市，觉得你们这个城市拉得太长，一条沟两边都是房子，离城越远房子越次。进城的人口要加以限制，如果人口无限制地发展，延安是没有前途的。现在够挤的了，沟里全是房子。

今天中午，我看陕西电视台的节目，一位什么决策咨询委员会的顾问、教授在发表演说，说什么每个村子只有办企业才能富起来，搞农业就没有前途，我看他是在那里误导。你搞工业，得有资源、市场。你们眉县有个什么尚源村，一个村子办了20个纺织厂，村子就致富了？鬼才相信！我们在全国关了1000多万纱锭，你在农村又上几万锭，哪有市场？20个纺织厂开始红火一阵子，单靠劳动力便宜，但根本没有竞争力，没有规模，没有市场，过年就得关门。农村不要提倡办工业。有的人脑子麻木，好像农民致富就得办工业。现在什么产品

都多，没有办法再搞。还是要老老实实地改善生态环境，调整种植结构。



2002年7月16日，朱镕基在陕西省延安市接见榆林“治沙英雄女民兵连”代表和治沙模范石光银(左一)，右二为陕西省委书记李建国。

我认为，延安是革命圣地，还是要发展旅游业。中国人要了解革命圣地，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会有很多人来的，外国人也会来旅游。我看，现在的基础设施要好好修一修。城市要好好规划一下，现在的延安城市规模就此打住了，不要再盖房子了，再盖房子就没有绿地了，旅游就搞不起来了。如果是青山绿水、秀美山川，城里规划得好一

点，有点绿地，房子少盖一点、盖得精致一点，大家来了住得吃得舒服一点，把第三产业发展起来，我相信延安就有前途。如果处处都是黄土、满眼都是光秃秃，就不会有人来。不要乱搞工业，搞重复建设，害农民。也不要到处去打油井，到处去戳窟窿。多戳几个窟窿出不了多少石油。说实话，全国也不在乎这么一点油。要把地质情况搞清楚，确实有开采价值才去开采。陕西省的小采油、小炼油、小油井搞得过分，整顿一下吧。

进一步把黄河的事情办好

(2002年7月17日)

这是朱镕基同志在河南省郑州市主持召开的黄河中下游陕西、山西、河南、山东四省防汛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

刚才四个省和黄河水利委员会负责同志发言中提出的意见与要求，请国务院有关部门的负责同志分工负责，统筹考虑，研究解决。下面，我讲三个方面意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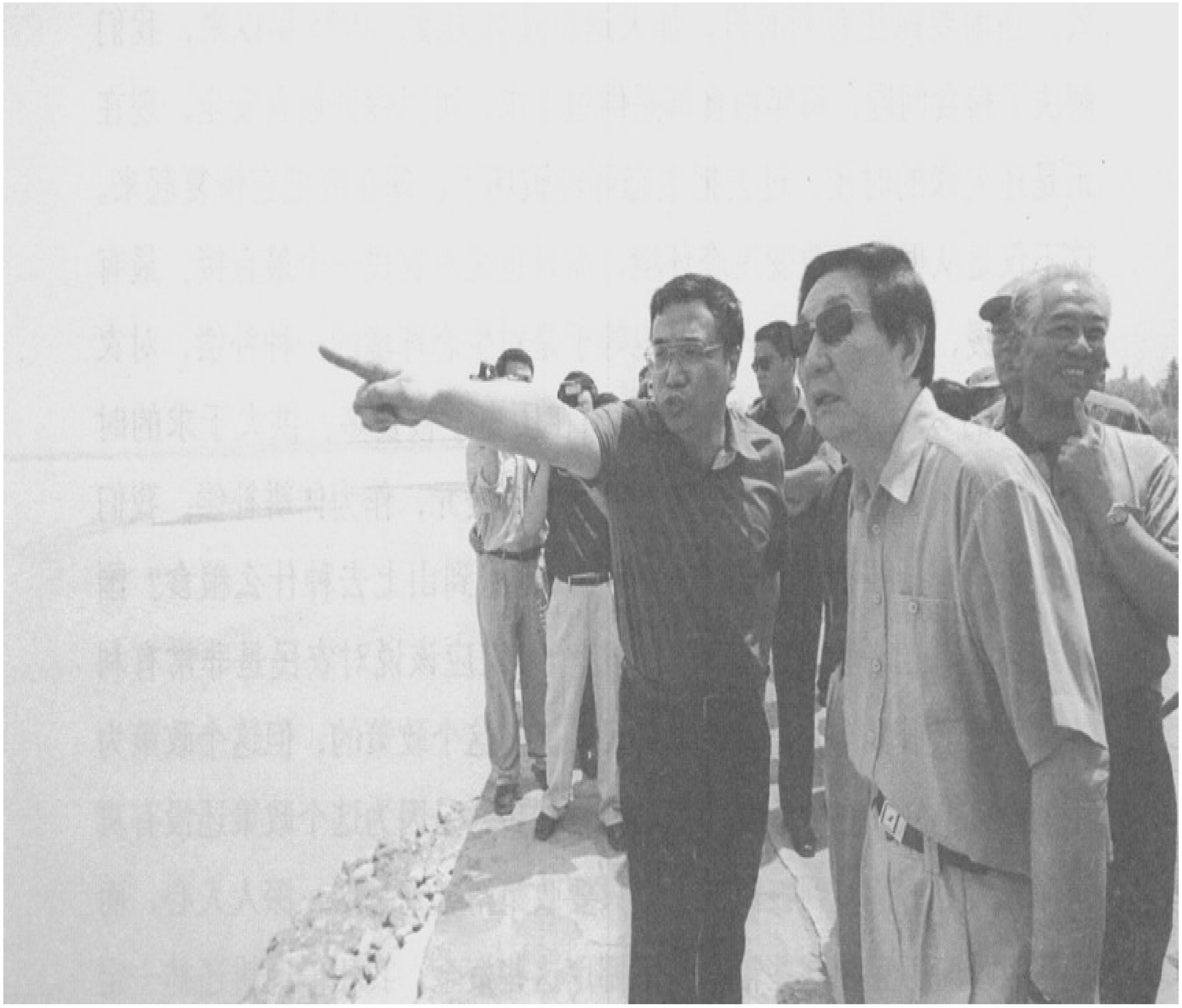
第一，要提高警惕，做好防大汛的思想准备。黄河在历史上三年两决口，但是近50年来岁岁平安，人们的警惕性很难提高起来。应该说，黄河这几十年来潜伏的风险越来越大。黄河已成为地上悬河，一旦某个地方决口，居高临下，一泻千里，后果不堪设想。1998年，我们没有料到九江会决堤，这是很少有的长江决口。今年气候异常，有人说汛期在长江中下游又要出现大洪水，但谁也说不准。刚才，河南的同志讲，中国灾害预测专业委员会的专家认为今年黄河要发水，提醒我们应该提高警惕。前天我看《参考消息》，美国专家讲厄尔尼诺现象已经形成，但比1998年弱一点，究竟会对中国产生什么影响，是不是像1998年那样？是长江出现大洪水，还是黄河出现大洪水，现在还说不清，还是提高警惕为好。前一个阶段，我花了12天时间，跑了长江沿岸几个省，看到1998年以来加大投资力度，长江3500公里干堤修得相当稳固，看起来相当壮观，但我不能保证它不决口，谁也不能保证。曾培炎①同志讲，近四年来水利投资1700多亿元，1998年以来对黄河的投资相当于从1950年到1997年投资总额的2.5倍。但是，对黄河的投入还是比长江的少，黄河恐怕还没有长江那样的提顶公路。长江干提的公路修得相当好，都是水泥路面。特别是刚才李克强②同志讲的，黄河大堤是多少个朝代修的，参差不齐，有很多隐患。所以，提高警惕是非常必要的。今年恰恰又出现厄尔尼诺现象，特别要提高警惕，大家都要做好防大汛的思想准备。

① 曾培炎，当时任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主任。

② 李克强，当时任河南省省长。

第二，要确保今年黄河安全度汛。黄河绝对不能出事，因为一出事就不是小事，就不得了。1998年九江决堤，很快就把口子堵住了，影响很小。而黄河是地上悬河，万一决口是不好堵的。所以，沿黄各个省份和国家有关部门要进一步动员起来，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和国家防总的指示精神，立足于防大汛、抗大灾，做好防汛的各项准备工作。首先，要进一步落实防汛首长负责制，沿黄地区各级党委和政府的主要领导要对防汛工作总负责，切实做到思想到位、责任到位、工作到位、指挥到位，切实把防汛责任落实到人，公之于众，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这是最重要的。其次，黄河水利委员会要抓好对防汛准备工作的检查及防洪工程的建设和维护、管理，积极当好党政领导干部防汛工作的参谋和助手，做好抗洪抢险的技术指导。凡是因责任事故造成重大损失的，一定要严肃追究有关领导和当事人的责任。

第三，要从战略和全局的高度出发，进一步把黄河的事情办好。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摇篮，在这个流域最先创造了中国灿烂的文明。同时，黄河又是一条桀骜不驯的河流，经常会出事。新中国成立以来，党中央和国务院一直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努力把黄河的事情办好。开国后，毛主席第一次出来视察工作就是看黄河。江泽民总书记也多次考察黄河。1999年6月，他在郑州主持召开了黄河治理开发工作座谈会，要求必须从战略的高度认识和推进黄河治理开发。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必须坚持统筹兼顾、全面规划、突出重点、长短结合、合理安排的原则，制定黄河治理开发的近期目标和中长期目标，逐步实现。



2002年7月22日，朱镕基在河南省郑州市花园口黄河大堤考察黄河防汛工作。前排左一为河南省省长李克强，右一为水利部部长汪恕诚。

首先要从源头上治理，加强水土保持，防止水土流失。小浪底水库可以淤沙20年，如果再在上面建两个水库，一共可淤60年。如果60年内水土保持工作还没有做好，就需再建一个水库，有地方建设吗？没地方了。这就是说，给我们的时间就是60年，如60年内不把水土保持工作做好的话，就不能算从源头上治理。我想，60年的时间还是足够的。1999年8月5日我到延安，就提出要“退耕还林、封山绿化、以粮代赈、个体承包”，不能再到山上去种田了。我当时讲，三年以后再来看山上的绿化情况。三年还差20天，我提前到了延安，到同样一个地方

去看，绿化了，可以说初见成效。“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只要认真地去干，三年就可以干出一番事业来。听延安的同志讲，我看的那个地方还不是搞得最好的，吴旗县是当地搞得最好的。我就说三年初见成效，十年应该大见成效。什么叫大见成效？我给他们立了个标准，延河里的水常流不断，而且是清水，这就叫大见成效。如果都这样的话，黄河的泥沙问题也就从根本上治理了。我想，根据延安的经验，三年初见成效，十年大见成效。当前要抓住有利时机，加大退耕还林力度。1995年以来，我们解决了粮食问题，每年粮食都是供过于求，可以保证粮食安全。现在正是还欠账的时候，过去把生态环境破坏了，现在应把它恢复起来。这不仅是从根本上改变生态环境，而且也是对农民一个最直接、最有效的支援，增加农民收入。这也等于是对生态环境的一种补偿，对农民休耕的一种补偿。我们知道美国在历史上粮食多、供大于求的时候，采取休耕的办法，一亩地补助100多美元，作为休耕补偿。我们现在也一样，平原上的粮食吃不完，你跑到山上去种什么粮食？国家给休耕补偿，恢复生态环境，这个政策应该说对农民是非常有利的。我跑了很多地方，农民都是衷心拥护这个政策的，但这个政策为什么没有得到很好的落实和推广呢？我想，是因为这个政策还没有真正深入人心，落实到农民身上。只要政策落实到基层，深入人心，而且各级政府不克扣这些粮食，不挪用这些资金，我相信退耕还林一定会在全国形成一个高潮。这对生态环境的改变是非常有效的，大家一定要抓住这个时机。我每到一个地方，就讲这个道理。我搞不清楚做这样一个好事，为什么老是办不成？当然，从去年下半年以来，办得比较快。搞了三年，退了3000万亩，今年一强调，增加了4000万亩，退耕还林有7000万亩了。这个事情只要落实到基层，落实到农民，就可以全面铺开。我们并没有把基本农田退掉，那是不能退的。就像我在延安看到的河沟地，没让退那个地，恰恰还要求河沟地把粮食产量提得更高。叫你把山坡上的地退了，把植被恢复了，这没有任何危害，不会影响粮食的安全，大家可以放胆去做。如果错过这个时机，仓库里没有那么多粮食的时候，再来干这个事情就比较困难了。

其次，要进一步加强防洪工程的建设。

再次，要合理利用和严格保护水资源。现在工业生产能力大得很，很多国有企业开工不足，许多工人下岗，农村再搞一般加工业等于是在那里制造包袱。现在各个地方办小纺织、小化工、小造纸、小钢材、小选矿，还有小煤矿、小炼焦，这些都是给环境制造极大的污染，而且治理的代价特别大，有些根本没法治，也没钱去治。我是今年3月份去的山西省，从太原到晋南，沿路都是小煤矿、小土焦，烟筒那么多，真是叫“家家点火、村村冒烟”，山上都是光光的，没有植被，冲得沟壑纵横。我看要治理山西，不知道需要多少年。我是有信心的，但需要你们努力。昨天、前天，我看到公路被压得一塌糊涂，一辆汽车可以载40吨煤，什么路压不坏？这样搞下去怎么得了！居然只要缴费就可放行。不整治一下，怎么行呢？大家都要注意防治污染。关于节水的工作也应重视。我这次到兰州，那里的水价1立方米1元钱。我说1元钱没法节水，北京水价现在是1立方米2.5元，到2005年要提高到4元至5元。不提高水价是绝对没法搞节水的，浇地就是大水漫灌，生活用水也浪费。我在北京市就讲，只要把水价提高到和矿泉水价差不多，就不缺水了。所以，不利用价格杠杆的手段去节水，是没招儿的。中国不节水是没有前途的。中国的水资源十分缺乏，从长远来讲，问题会越来越大，城市缺水会成为一个普遍的现象，不节水怎么能行呢？还要搞好水污染的防治。今天，我们看到这里测试水质量的监测站只有一个，准备在黄河上搞十个，要建到临界的地方。山东省与河南省交界的地方要搞测试，监测河南省流进山东省的水质情况；从山东省出口的地方，再监测一下水的质量。这就没有什么说的了，谁的责任清清楚楚，是谁在那里制造污染，把责任分清楚。大家都来加强水污染的治理，别把水搞得一塌糊涂，没法用了。现在搞南水北调，我非常担心在还没有搞成以前，汉江的水就已不能用了。这种危险是有的，因为沿岸都是小选矿场，尾矿都流到河里，污染河水。

同志们，现在黄河主汛期已经到来。我们要提高警锡，振奋精神，全力以赴，扎实工作，确保今年黄河防汛安全，保证改革开放和现代

化建设的顺利进行。

继续搞好辽宁省完善社保体系的试点

(2002年7月24日)

2002年7月22日至24日，朱镕基同志在辽宁省考察工作，先后考察了沈阳、抚顺等地。这是朱镕基同志在听取省委、省政府工作汇报后讲话的一部分。

中央在辽宁省进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的试点，是非常正确的，这项工作也确实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原来我们把这项工作的难度考虑得比较大，觉得要让下岗职工跟企业解除劳动关系是一件非常难的事情，我们早就估计到这个难度。但是辽宁省居然能够把70万人解除劳动关系，还没有闹事，至少没大闹，这是非常不容易的。这为全国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打下一个很好的基础，这个经验是非常宝贵的。在黑龙江省大庆市，也是解除工人与企业的劳动关系，“买断工龄”，尽管花了很大的代价，一个人给十几万元安置费，最高的给17万元，也没有解决问题。“买断工龄”这个提法是错误的，党中央、国务院从来没有过个提法。辽宁人均只花了7000元，最多的是抚顺特钢，花了1.2万元，用这么低的代价就能够办成这件事，社会还能够保持稳定，这个经验应该很好地总结。关键是要做好工作。我想有几个环节是非常重要的。一是经济补偿金一定要落实。二是欠他的债一定要还，认账还钱，而且不能拖得太久。拖得太久将来无人问，企业领导人一换，就变成“白条子” 了。抚顺特钢的负责人认识到这个事情的重要性，下决心“砸锅卖铁”也要把这个钱还了。这个钱不还，是稳定不了的。

三是“低保”要落实。失业保险是落实了，我听说是一个月220元，时间为两年，这是个缓冲，下岗职工可以在这个时间进行培训、再就业等等。万一不行了，一定要有一条“低保”的保障线在等着他，这一点要讲得很清楚。过去讲下岗职工基本生活费制度向失业保险并轨，现在再加一个“低保”，下岗职工就比较放心了。因为失业保险只是管两年，两年以后还找不到工作怎么办？不管是不行的。所以，“低保”是人们最后的一道保障，有了这道保障，他们就放心了。我想，这三点是可以

避免你们这70万人闹事的重要因素。如果你们能够把补偿金落实，欠债还钱比较快，把“低保”跟下岗职工讲得清清楚楚，使他们没有后顾之忧，我相信你们往后的60万人的工作就比较容易做，他们就感到心里踏实。当然，更重要的是要加强再就业工作，这方面国务院正在拟订一系列政策。

我这次到辽宁省来以前，心里还有点疑虑。来了以后经过考察，我认为你们的工作是扎实的，不是钱多就能办好这个事情，也不是钱少就不能办这件事情。关键是党和群众的联系，血肉的联系是不能断的、买不断的。只要做好工作，工人还是能够体谅国家、企业的困难的。希望辽宁省委、省政府和全体同志，要坚定不移地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国有企业的改革方针，也就是“鼓励兼并、规范破产、下岗分流、减人增效、实施再就业工程”。不实行这一条方针，国有企业是没有出路的，中国的经济发展是没有前途的。没有这个机制，什么产业结构调整、企业结构优化、职工素质提高，都是不可能的。也只有实现了这条方针，才能够真正建立起现代企业制度。没有这个机制，你写一百条都是空的。抚顺特钢负责人讲得很清楚，企业一大堆人，都拥到一个岗位上，你用什么管理？企业既没有质量，也没有品牌，更没有效益，吃都吃光了。这么多年以来，抚顺特钢一直都是潜在亏损，折旧不提，企业贷款利息不还，提高库存价格，看起来账面上都是平的，实际上一年都是亏损几千万元、上亿元，这样搞下去怎么行呢？该三个人干的活就三个人干，多余的人就下岗。国家用社会保障体系来保证他们的基本生活，然后让他们再就业。他们得自己努力，不努力就永远只有拿最低生活保障了。没有这套机制，企业怎么能办下去呢？ 一定要坚定不移地实施这个国有企业改革的方针，不要因为大庆出了事就动摇。



2002年7月22日，朱镕基在辽宁省沈阳市大东区职业技术培训中心考察。

现在事实证明，辽河油田就可以不闹事，本来已经蓄势待发了，结果没闹起来。你们要继续做好工作。如果你们70万人解除劳动关系后能够稳住，那还有60万人的工作就比较容易做了。这个工作完成以后，就形成了一个气氛，三条社会保障线就把职工队伍稳住了，而且形成了一种竞争的机制了，大家都要想办法自强、自立，培训后再去上岗。如果在辽宁这样一个老的工业基地，就业门路比较少、第三产业很不发达、工业城市人口又超过了农村人口，在这么困难的情况下，我们能够实现三条保障线，实现对国有企业制度的改革，我相信在全国都能解决。这个问题解决了，产业结构的调整、企业结构的调整、人员素质结构的调整就可以大踏步地前进，中国的经济才能够真正发展起来。希望辽宁省的同志们继续努力，也不要自满，因为欠职

工的钱你们才还了10%到15%，还是打的“白条子”。你们要取信于民，这个事情是不容易的。

谈到“低保”的问题，辽宁省之所以能够稳定，70万人解除劳动关系，还没有出现很大的问题，是因为你们的“低保”范围比较大，129万多人，占全国的十分之一，这个工作抓得早，对社会稳定是很有作用的。我在大连去看过社区工作，做得很不错，比沈阳的工作做得稍微好一点；但在沈阳我们昨天参观的社区，已经建立了电子计算机的存储系统，也还是不错的。我觉得“低保”的问题还是要进行深入的研究，要从两个方面来考虑：一方面，不要使“低保”的标准过高，否则下岗职工就不愿意就业了，就养懒人了；另一方面，也不要搞七折八扣拿不到钱。标准定得很高，每月205元，全省是156元，其实经过七扣八扣给下岗职工的只有60多元，沈阳大概只有30多元，太少了，不足以维持基本生活。这两方面都要兼顾，既不能养懒人，也不能饿着人，这样社会就稳定了。我刚才把沈阳三个区的资料调来看，觉得还需要深入细致地调查。我看这些享受“低保”的人，家庭收入都相当高，每月三四百元、500元，最多的是595元，有没有这么高？职工下岗以后，他没事做，怎么会有这么高的收入呢？所以，我就非常担心，标准定那么高，七扣八扣只给下岗职工60元、30元，这个情况是不是真实的？领导部门、民政部门要进行深入的调查，不要先听汇报，要亲自查账，到每个“低保户”去访问，从各方面来验证。如果真要稳住跟企业解除劳动合同的下岗职工、失业职工，“低保”是非常重要的，包括集体企业，它的职工养老问题应该就是靠“低保”来解决，要做很细致的调查，对每个人的收入张榜公布。把这个工作做好了，我看辽宁省的社保体系试点就可以获得完全的成功。

大力调整农业种植结构

(2002年7月25日～27日)

2002年7月24日至27日，朱镕基同志先后在吉林、黑龙江省考察嫩江、松花江防汛等工作。这是朱镕基同志在黑龙江省考察期间讲话的一部分。

1998年抗洪救灾的时候，我到哈尔滨来过。已经四年了，我感到各方面都有很大的进步。当年被水淹的地方如今都修起了非常好的水利工程，齐齐哈尔、哈尔滨的城市面貌都有很大的改变，应给予充分肯定。下面，我讲几点意见。

一、关于农业结构调整问题。

对于粮食丰收、全省销粮难的形势，黑龙江的根本出路是调整农业结构。不及早调整农业的种植结构、产业结构，就要吃大亏，尤其是农民收入增加不上去。这几年农民收入靠什么增加？是靠打工，这笔收入占农民收入的很大比重。现在粮价低，没有这笔收入，农民的生活是过不去的。

现在，粮食安全的形势已经发生了变化。退耕还林政策之所以推进力度不大，一个重要思想障碍就是老百姓担心粮食安全，怕粮食出问题。我们一定要向老百姓讲清楚，现在农业生产力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实行大规模的机械化耕作，粮食增产还有很大的潜力。另外，粮食品质的改良、科技投入的增加，都使粮食大幅度增产。粮食安全不成问题，关键是调整结构。大米多了你们生产大米，玉米多了你们生产玉米，这怎么得了！粮食年年在陈化啊。陈化粮一旦进入市场，粮价就更低了，那农民就更惨了。当然，黑龙江大米好吃，你们可以往南方销售，但这实际上也不是那么容易的。赶快想办法来开辟粮食销售的渠道，不要再往仓库里增加了。

调整农业种植结构，重点是发展具有黑龙江比较优势的优质大豆。只有大豆这个东西可以顶住进口。我相信你们有这个竞争力。黑龙江

发展大豆的市场空间很大，目前我国一年进口大豆1000多万吨，国内有3000万吨的大豆市场。同时，黑龙江生产的不是转基因大豆，东北亚许多国家，也包括日本，都需要非转基因大豆，这方面正好是我们的优势。我们制定了《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条例》，用这个办法来限制大豆的进口，这正是你们发挥优势的好时机，为什么不赶快急起直追，抓紧调整这个结构呢？目前黑龙江的大豆产量太少了，你们完全可以生产1300万吨大豆。大豆是肯定有销路的，我们还没有占领这个市场。调整农业结构，我在别的省还找不出一个很明确的方向，只有黑龙江，清清楚楚就是大豆，为什么不干?

发展大豆一定要提高品质，降低成本。如果价格还比美国的贵，含渣量还比美国的高，销售供应环节还不及时，黑龙江的大豆还是占领不了市场。要实行大规模机械化操作，改善经营环境，一条龙地供应，利用科技的力量在各个环节改善大豆的质量。

二、关于退耕还林，改善生态环境。

发展不要只顾眼前，要着眼于可持续发展，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统一起来。我们这几十年经济发展很有成绩，但把老祖宗留下的生态环境也破坏得够呛，如果再这么破坏下去，子孙后代就无法生活了。一定要改善生态环境，改变城市面貌，创造一个优美的环境。抓生态环境建设既可以促进群众增收，又可以带动产业发展。比如，多种树，多绿化，树苗价格马上就涨起来了，农民种树也可以致富了，中国也可以出现一个种树苗的行业了。



2002年7月26日，朱镕基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考察防汛工作。右二为水利部部长汪恕诚，左六为国家计委副主任于广洲。

粮食多了，不要只在增加储备上打主意，还要在调整结构上下工夫。粮食多了，靠多收专储粮是不行的。国家的储备粮不能再增加了，再增加储备，就是增加亏损、增加损失！黑龙江的粮食不能再这样种下去了，还是要抓退耕还林，抓产业结构调整。国家的政策是长江以北退耕还林一亩地给200斤粮食，给50元种苗费和20元零花钱，农民对此还是很高兴的。要用这样的政策来推动退耕还林。我们积极支

持你们增加退耕还林面积的要求。只要谁搞退耕还林，不是搞浮夸、说大话，而是扎扎实实地干，要多少粮食，中央就给多少粮食。调整结构的另一个重点是退耕还草，发展奶牛业。现在牛奶还是很有市场的，你们要占领这个市场。要搞一套严格的标准，创出信誉，创出名牌，在全国推广。还要加强湿地保护。要先保湿，任务是现有湿地不要沙化。当然，能不能还湿，可以先搞试验。

需要强调的是，在抓好退耕还林、还草的同时，还要大搞植树造林、封山绿化。你们东北地区有这么好的条件，没那么多人去砍树，为什么不搞大片的森林呢？恢复到努尔哈赤那个时代的状态多好啊! 黑龙江省是高寒地区，树长得太慢了，所以你们得赶快种啊。

城市建设要突出城市绿化，多种树，种大树。现在城市的一个通病，就是多盖房子少种树，甚至砍树，这是一个极不好的倾向。把祖宗留下来的绿地侵占了去盖房子，是没本事，有本事的应该是在盖房子的同时增加绿地面积，这才叫现代化的城市。光盖房子招商是招不来的。还是优美、绿色的环境才能吸引人家来。黑龙江省的各个城市都要注意绿化，要多种树，种大树。齐齐哈尔的树种得是不错的，也很重视绿化。希望哈尔滨更加努力，更加注意绿化，不要光注意盖房子。

加强财政增收节支工作

(2002年9月14日)

2002年9月14日至16日，全国增收节支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出席会议的有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主要负责同志，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解放军有关单位、武警部队和有关大型国有企业的 负责同志等。这是朱镕基同志在会上讲话的主要部分。

最近一段时间，党中央、国务院对今年以来的经济形势进行了全面分析，针对经济运行中的新情况，作出了重要决策，下发了中央10号文件①。根据中央的决定，国务院召开这次会议，专门研究和部署进一步加强增收节支工作。按照中央的精神，我讲几点意见。

① 中央10号文件，指2002年8月1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转发〈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关于当前经济运行情况和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的措施意见〉的通知》。

一、充分认识加强财政增收节支工作的重要性。

对今年以来财政收支中出现的问题，我们必须予以高度重视。1至8月，全国财政收入11657亿元(不含债务收入)，同比增长10.2%，增幅比去年同期下降14.5个百分点，是近几年最低的(1999年至2001年，同期增幅分别为22.8%、19.8%和24.7%)。其中，中央财政收入6123亿元，增长7.7%(按同口径计算，只增长4.6%)。全国财政支出11587亿元，同比增长17.3%，其中，中央财政支出增长6.4%，地方财政支出增长更快，达23.1%，支出增长大大高于收入增长。1至8月全国财政收支相抵，收大于支仅70亿元，而去年同期是收大于支699亿元。显然，完成全年财政预算的任务相当艰巨。

财政收支中的问题在今年前四个月就已出现。国务院于5月中旬召开全国增收节支工作电视电话会议，采取了相应措施。5、6、7 三个

月，全国财政收入回升，同比分别增长19.5%、9.1%和17.9%，但8月份增幅又明显回落，仅为7.6%。整个财政形势仍很严峻。

财政收入增长缓慢的主要原因：一是降低关税的影响。按照我国加入世贸组织的承诺，今年关税税率由15.3%下调到12%。据财政部计算，此项1至8月减收127亿元。原来估计减收更多一些，所以在年中采取了适当增加一部分附加值高、不冲击国内市场的商品进口的措施，使关税减收的幅度有所减少。二是证券交易印花税税率由0.4%降低到0.2%，同时，证券交易量下降，1至8月减收143亿元。三是金融保险营业税税率下降1个百分点，1至8月减收54亿元。四是停止国有股减持，减收121亿元。五是出口退税同比增加61亿元。这五项共减少税收506亿元，致使全国财政增幅下降5个百分点。其中，中央财政减收495亿元，增幅下降9个百分点。同时，由于去年内资企业所得税基数较高和今年头几个月企业效益不够好，企业所得税增收受到影响。这些减收因素，在安排今年预算时已考虑到，但实际情况比预料的还要严峻。

第一，做好财政增收节支工作，确保不突破预算赤字。今年财政预算赤字为3098亿元，这是全国人大批准的，已经比去年增加了500亿元，绝不能再扩大。从目前情况看，如果不做好工作，有突破财政预算赤字的危险。前八个月，财政收支矛盾已经十分突出。今后四个月，一些政策性减收因素还将继续制约财政收入增长，并主要表现在中央财政减收上。今年的预算支出盘子是建立在财政收入连年大幅度增长基础上的，而且财政支出刚性强，已经确定的预算支出很难调减。如果听任财政收入增速继续下滑，支出增速又降不下来，赤字就打不住，整个财政状况将陷入被动。如果中央财政困难了，对地方的转移支付就不能保证，地方也会困难。因此，今年无论如何不能突破财政预算赤字，要守住这道防线。有些地方只看到本地财政收入比较好的局部情况，没有看到全局财政收支状况的严重性，对财政增收节支工作不以为然，这种思想必须克服。



2002年9月14日，朱镕基在全国增收节支工作会议上讲话。右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左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钱其琛。

第二，做好财政增收节支工作，这事关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落实培育和扩大内需的政策措施，发展科技和教育，需要增加财政投入。改革和稳定也需要有财力来保证。例如，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做好下岗失业人员工作、促进就业和再就业，推行农村税费改革、减轻农民负担，完善社会保障体系、落实“两个确保”①和城市“低保”、加强对城镇困难居民的扶贫济困等，都需要有财政投入。如果不能增收节支，国家没有必要的财力，各项政策措施就难以落实，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就会受到影响。

① 参见本卷《在二〇〇〇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第三，做好财政增收节支工作，这是为明年经济工作打好基础的重要条件。今年的财政增收节支工作做好了，不仅可以增加财政收入，有效控制支出增长过快，减轻财政压力；更重要的是有利于完善财政收入正常增长机制，保证财政收入随着经济增长而持续稳定地增加，并有利于建立规范的财政支出机制。如果今年的财政预算赤字突破了，不仅完成不了今年的预算任务，而且将给明年的财政工作乃至整个经济工作带来困难。

总之，加强财政增收节支工作，不仅是考虑当前，而且是着眼长远；不仅是一项重要的经济任务，而且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我们必须从大局出发，以对党和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把加强财政增收节支工作，作为当前经济工作的重点任务，齐心协力，刻不容缓地抓紧抓好。

二、大力做好财政增收工作。

完成今年财政预算，确保不突破财政预算赤字，必须从增收和节支两个方面着手，千方百计开源节流。首先要在增收上下大工夫。近几年，财政增收工作取得很大成绩。各级财政、税务、海关部门贯彻中央关于“加强征管，堵塞漏洞，惩治腐败，清缴欠税”的工作方针，严厉打击各类走私、骗取出口退税、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等涉税犯罪活动，加快推进“金关”、“金税”、“金财”工程等信息化建设，税收征管工作不断加强，促进了财政收入大幅度增长。1998年增收1225亿元，1999年增收1568亿元，2000年增收1951亿元，2001年增收2976亿元(按可比口径计算，增收2400亿元)，四年财政收入年均增长17.3%。但是也要看到，作为财政收入主要来源的税收，流失仍相当严重。无论是国有企业、个体私营企业，还是外资企业，无论是高收入者，还是收入并不高但应纳税的人，都相当普遍地存在偷漏税现象。有些地方违背税法，越权减免税、以费挤税。大量事实证明，增加财政收入具有很大潜力。

一是有些个体私营企业偷漏税十分严重。现在，在企业税收中，国有企业缴税占大头。相当部分的个体私营企业采取不建账、做假账等多种手段隐瞒经营收入，偷税漏税。许多个体私营企业主不从企业开工资，偷逃个人所得税。去年，《亚洲华尔街日报》评出中国大陆十大富豪，经税务部门调查，其中只有极个别人缴纳个人所得税。有的私营企业主搞“空手道”，长期违规经营，偷漏税数额巨大。这些问题的出现，与有的部门和地方在管理上存在的问题及漏洞有关。一 定要吸取教训，对偷税漏税和其他经济犯罪活动，绝不能坐视不管，必须依法认真查处。

二是外资企业偷逃税款相当普遍，方式和手段多种多样：(1) 转让定价，虚假亏损。即用高于国际市场的价格进口设备和材料，然后用低于国际市场的价格出口产品，将利润转移出去。这是目前外商逃税最主要的方式。去年，外资企业亏损面达48.1%，其中相当数量的外资企业存在非正常亏损。(2) 骗取税收优惠。当税收优惠到期进入征税期后，有些外资企业采取注销现有企业、设立新企业的傲法，再次享受优惠政策。(3) 偷逃消费税。我国消费税是按出厂价进行征收。很多外资企业都有自己的销售公司，用较低的出厂价把产品卖给销售公司，从而少缴消费税。(4) 钻税法漏洞。不少外商通过从境内外相关银行借入大量资金，利用税前列支利息，先行分取企业利润，从而达到少缴或不缴企业所得税的目的。

三是各类商贸城、集贸市场随意包税、以费代税现象严重。很多地方的商贸城和集贸市场，对个体工商户大都采取包税方式，实际经营额与税务部门核定的定额差距很大。个体工商户税收漏征漏管现象十分突出。2001年，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登记的个体工商户为2433万户，在税务部门登记的只有1079万户，只占工商登记户数的44.3%。甚至不少个体经营者与一些执法人员相互勾结，有意少包税。有的地方为了局部利益，高收费，低收税，以费代税。据有关部门估算，去年全国各类商贸城和集贸市场成交额为1万多亿元，而税收只有138亿元，仅占成交额的1%多，大大低于应该征收的水平，大量税款流失。

当然，各类商贸城和集贸市场量多面广，又很分散，要把税收全部收上来也有一些困难，但现在确实收得太少了。

四是一些重点行业和国有企业逃税、欠税很突出。特别是一些垄断性行业的国有企业盈利不少，职工收入很高，但同时又是欠税大户。截止到今年7月底，全国企业欠税合计332亿元。其中，石油企业43亿元，石化企业29亿元，烟草企业47亿元，电力企业30亿元，冶金企业33亿元。白酒行业偷逃税款相当严重。最近，税务部门对白酒行业进行了税收专项检查。截至8月底，山西、山东、四川、河南四省检查白酒生产企业287户，发现有问题企业218户，查补税收4.8亿元。

五是进出口环节税收流失额仍比较大。目前，走私方式从大规模走私，变为"蚂蚁搬家"式的走私。不法分子更多地利用价格瞒骗方式偷逃税款，仅今年上半年，全国海关共查处价格瞒骗案件272起，涉嫌偷逃税款3.8亿元，分别比去年同期增长3.9倍和4.2倍。故意压低进口合同价格的逃税行为，也是关税减收的因素之一。

造成税收流失的因素很多，有管理体制不健全、法规和政策不完善、征管手段落后、"金税工程"尚不完善、公民自觉纳税意识淡薄等原因，但征管工作薄弱、对偷税漏税行为惩治力度不够，也是一个重要原因。现在，一些人靠偷税漏税发了财，大肆挥霍，一掷千金，败坏社会风气。如果不对这些人加强税收征管，不但造成贫富悬殊，而且使国家税收减少，从而影响低收入居民收入的增加。部分居民收入差距悬殊，制约整个消费需求增长，也是出现通货紧缩趋势的一个重要因素。因此，必须加大依法治税力度，把应收的税真正收上来。前不久，有关部门依法对个别"名人"偷漏税问题进行查处，起到了敲山震虎的警示作用。总的看，增加财政收入要标本兼治，当务之急还是要强化征管，堵塞各种"跑冒滴漏"，做到应收尽收。为此，要着力抓好以下方面：

第一，必须进一步加强税收征管。要狠抓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等重要税种的税收征管。要严格企业财务制度和会计监督，加大税务稽查力度，严厉打击各种虚开增值税发

票、做假账等违法犯罪行为。对个体私营企业要实行严格的建账制度，强化发票管理和税收征缴。要严格税务登记管理，工商、税务等部门要尽快联网，切实解决一些个体工商户只进行工商登记、不进行税务登记的问题，从源头上杜绝漏征漏管的现象。要大力清缴企业欠税，特别要做好石油、石化、烟草、电力和冶金等重点税源行业的清欠工作。要加强海关税收征管，重点打击通过低报、瞒报进口价格等手段偷逃税款的违法犯罪活动。要继续严厉打击走私活动。要加强对加工贸易进出口货物的监管，堵塞合同核销中的税收流失。

第二；必须坚决维护税法的统一性、权威性和严肃性。近年来，一些地方政府随意出台税收优惠政策，侵蚀国家税收。有的以招商引资为名，滥开减免税口子；有的地方采取“先征后返”方式，掩人耳目，帮助企业偷逃税款；一些经济比较发达、税源充足的地方，在提前完成当年征税任务后，以“涵养税源”为名，不再征税；还有的地方存在卖税买税、异地缴税等现象。随意搞减免税，不仅地方经济最终发展不起来，还会破坏公平竞争条件，破坏全国统一市场的形成。这里再次强调，我国税收政策的调整和税收制度的立法权集中于中央，任何地方和部门都不能越权制定税收政策，破坏国家的税收秩序。要抓紧清理现行各种税收优惠政策。各地区、各部门违反税法统一规定、擅自出台的各项税收优惠政策，要立即纠正和废止，今后不得再擅自出台新的税收优惠和变相优惠政策。

第三，必须坚持依法征税，敢于碰硬。依法征税是税务、海关等部门应尽的神圣职责。不管是谁，只要触犯税法、偷逃税收，都要依法严加惩治。执法部门必须加强自身队伍建设，牢固树立依法治税的观念和依法征税的责任感，讲法不讲情，恪尽职守，执法如山。在查处涉税违法案件中，不论涉及谁，都要严厉惩处。要抓紧依法审判一批大案要案，震慑违法犯罪分子。

第四，必须进一步完善税制，加强相关的配套制度建设。进一步完善对进口税收优惠政策的管理。中央已经确定，对新批准的《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中“产品全部直接出口的允许类外商投资项目”所进口的设备，先全额征收关税和进口环节税，经核查产品确是全部出口

的，分五年全部返还税款。除经国务院特殊批准外，取消现行的进口原材料减免关税和进口环节税的政策。属国家鼓励类的限额以下内外资项目进口设备，缩减免税范围，上收免税确认权限。取消经济特区“地产地销”产品免征增值税的政策。对国家限制出口、属于稀缺资源和战略性资源、破坏环境的产品和引起恶性竞争的部分商品，取消出口退税。各有关地区、部门一定要从大局出发，统一思想和行动，认真贯彻执行这些政策措施。

还要堵塞税制不健全的漏洞。例如，一些私营企业主自己不拿工资，把个人开支列入企业成本，既侵蚀企业所得税税基，也不缴个人所得税。对这类问题要进一步作出明确规定。又如，在严格依法办事方面，也有一些环节需要进一步明确，对偷漏税者如何予以更有力的惩处，应当作出具体规定。

今年实行了所得税收入由中央和地方分享的改革，目的在于进一步规范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间的分配关系，建立合理的分配机制，防止重复建设，减缓地区间财力差距的扩大，支持西部大开发，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目前这项改革进展顺利。1至8月，全国企业所得税完成1676亿元；其中，中央813亿元，地方863亿元。全国个人所得税完成799亿元；其中，中央398亿元，地方401亿元。所得税收入已按照改革方案，分别缴入中央国库和地方国库。在所得税增量中，东部、中部、西部地区都有上缴，东部地区上缴多一些。中央从所得税增量中多分享的收入，全部用于对地方主要是中西部地区的转移支付，一个钱也没有留。中石油、中石化企业所得税的上缴办法，国务院在征求有关地方的意见后，决定暂时仍上缴作为中央收入。

第五，必须在全社会范围内加强税法教育，增强依法纳税观念。任何企业、单位和个人，符合应税条件的，都要自觉依法缴纳税收。权利和义务是对等的。公民在享有正当权利的同时，还需要承担法律规定的各项义务，纳税是重要义务之一，是不能讲任何条件的。在一些国家，税法严峻，六亲不认，即使权势赫赫的政治家、名闻遐迩的大明星，一旦被发现偷税，都难免锒铛入狱，落个身败名裂的下场。要

形成一种舆论，在全社会营造“纳税光荣、偷税可耻”的氛围，努 力培育公民良好的纳税意识，使依法纳税观念深入人心。

最近有一种议论，说我们加强对个体私营企业的税收征管，是打压个体私营经济发展。这纯粹是混淆是非。我们这样做完全是为了国家利益。中央关于鼓励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方针政策，是十分明确的，也是不会动摇的。依法纳税是任何企业和个人都必须履行的义务。依法惩处偷漏税者，与“打压个体私营企业”毫不相干。

三、严格控制财政支出。

大力节省开支、严格控制支出，同样是一项重要而紧迫的任务。当前，有些地方认为形势好得不得了，盲目乐观，忘乎所以，财政支出中乱花钱的现象相当普遍。一是铺张浪费，花钱大手大脚。一些地方和单位举办各种会议、节庆、研讨等活动的名目繁多，比阔气，讲排场，花钱如流水。有的地方组织大型招商团，到境外游山玩水，谈不成几个项目，却造成巨大浪费。二是大搞所谓“形象工程”、“政绩工程”，劳民伤财。有些地方不惜动用巨额资金修建城市广场、豪华 办公大楼和内部高档娱乐设施，耗费大量资财。有的地方工资、社保资金留有很大缺口，而拿很多钱搞沽名钓誉的“形象工程”。三是一些领域重复建设重新抬头。近几年来，玻璃、水泥、冶金、有色金属等行业重复建设现象相当严重。这些重复建设，大多没有经过国家审批。有的地方，采取化大为小、化整为零的办法，逃避国家审批。有些重复建设用的是银行贷款，这与银行贷款审查不严有关，造成巨大包袱，最后还要由国家财政来兜底。一些地方的房地产特别是高档房地产开发也出现过热现象，现在的旅游开发也主要是房地产开发。四是乱开支出口子，挪用财政资金，滥发补贴、奖金。去年，各级审计机关共审计14.5万个单位，查出各类违规金额1908亿元，经过处理，上缴财政172亿元，减少财政拨款和补贴56亿元；审计部门审计检查的378亿元国债资金中，被挤占挪用的有14亿元。一些地方的财政部门带头违反财经纪律，挪用财政资金，影响更坏。

制止铺张浪费、反对奢靡之风，已经到了非下大的决心不可的时候了。大手大脚花钱，暴殄天物，不仅会坐吃山空，更为严重的是滋生腐败，败坏党风政风，损害干群关系。财政资金是人民群众的血汗钱，来之不易，不该花的钱一分也不能花，花钱一定要锱铢必较。挥霍浪费是极大的犯罪。敞开口子胡花钱，对老百姓的疾苦漠不关心，这是绝对不能容忍的。我们要从维护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高度，切实做好财政节支工作。

刚刚下发的中央10号文件，对控制财政支出、节省开支工作提出了明确要求。各地区、各部门都必须认真贯彻执行。

一是加强预算管理，严格执行支出预算。今年，各级财政除对救灾等少数急需的特殊支出外，一律不再追加新的支出项目。即使该项目属合理性支出，也要转由下年预算安排来解决。同时，要大力压缩一般性支出。凡是有可能完不成收入预算的地区，现在就必须调整支出项目，切实减少支出。对违反中央精神、擅自突破预算支出的地区，中央将减少转移支付。二是坚决制止重复建设。制止电解铝、铁合金、玻璃等行业和产品低水平重复建设抬头的趋势，继续依法整顿关闭小煤矿、小钢铁、小水泥、小玻璃和小造纸等，不准以任何借口和形式恢复已被淘汰的落后生产能力。严格控制加工工业项目贷款。对一些房地产投资规模过大、空置率过高的地区，要从严控制房地产贷款规模。停止建设脱离实际、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政绩工程”，严禁新开工建设城市广场、行政办公楼、培训中心和内部高档娱乐设施等项目。对这类项目，财政不得安排资金，银行不得发放贷款，土地管理部门不得提供土地使用权。三是做好财政资金调度工作，保证重点支出。各级政府要保证抗灾救灾支出的需要，安排好水毁设施的建设资金，同时要拨专款保证灾区人民的生产和生活。要保证做好“两个确保”和城市“低保”工作，做到应保尽保。务必要保证工资按时足额发放，有关省份要加大对困难地区的财政转移支付力度，尽快解决欠发工资的问题。

做好财政增收节支工作，是今后几个月经济工作的重点。各地区、各部门一定要把思想统一到中央的工作部署和这次会议的精神上来，

真正把增收节支作为当前经济工作的一件大事，高度重视，加强领导，狠抓落实。要增强责任感和紧迫感，针对自己存在的问题，提出增收节支的办法，实行严格的责任制，切实抓出成效。财政、税务、海关部门要认真履行责任，恪尽职守，严格把关。各有关部门要积极配合税收征管部门的工作，形成增收节支的合力。加大对重点行业、重点资金、重点项目的审计监督，对严重违纪的，要一查到底。各地区、各部门和各单位都要加强财务检查与监督，一旦发现问题， 要立即纠正。

下决心抓好“食品放心工程”

(2002年10月9日)

2002年9月25日，新华通讯社《国内动态清样》第2649期《北京实施准入制度提高食品安全质量》一文反映，2002年以来，北京市政府推出了“肉菜放心工 程”，以流通领域食品准入制度为核心，抓住“监管源头、标准准入”两个关键环节，对进京猪肉和蔬菜实行严格的质量监控。到8月份，蔬菜农药残留超标率、肉品不合格率大幅度下降。这是朱镕基同志在此文上的批语。

食品安全卫生关系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消费信心，也是整顿市场经济秩序的重要任务和“民心工程”。希望有关部门和地区参照北京市的经验，建立和健全一整套市场准入制度，下决心抓好“食品放心工程”。

朱镕基

10.9

统计工作应把“准”字放在首位

(2002年10月28日)

这是朱镕基同志在国家统计局考察时，在机关副司级以上干部和直属事业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座谈会上的讲话。

最近，国家统计局正在庆祝成立50周年。我恰好是在1952年从东北调到国家计委工作的，当时国家计委和国家统计局都在北河沿。那时国家统计局局长是薛暮桥同志，他当时还兼任国家计委副主任；副局长是王思华同志，后来当了局长。我是在国家计委综合局工作，那时的很多人现在都已经不在了。我们那时对苏联统计方法的研究，比现在对统计方法的研究要深得多。我们参加工作一开始就练表格，一张一张表格学习。

我曾经说过一句话：在中国搞经济工作不要太相信数字。我这样说不是否定统计工作，因为保证统计数字的准确性的确很难，数字层层失真不是某一个人的问题。所以，在某种情况下，只能是统计加估计，如果完全按照统计数字来决策可能会犯错误。根据各方面得到的信息、对社会经济的调查和自己了解的情况，来评估统计数据的准确性，并了解数字是如何统计、如何形成的，这对一个经济工作者是非常重要的。目前，确实还有不少同志没有做到这一点。对过去的统计方法，我比较清楚，对现在的统计方法，我没有很好地研究，但我认为这是值得我们很好研究的。什么工作都不可能尽善尽美，也不可能完全反映现实。如果了解统计数字是怎么形成的、经过多少环节、怎样计算，就可以利用经验和各种信息进行分析，比较准确地判断数据的可靠程度，从而有利于正确地决策。

统计工作是我们进行经济决策的重要依据，或者说是主要依据。尽管不能只局限于这个依据，还必须做很多调查，尤其是实际的调查。不了解情况就无法作出正确的经济决策，但有时要想了解一点真实的

情况还真不容易。因此我们说，统计工作对经济走向的判断和经济工作的决策，都是非常重要的。

你们刚才说，我在1998年曾经提出过统计工作要“快、精、准”的要求，现在看来这个说法还不够准确，可能是当时临场没有经过很好推敲。应当把“准”字放在首位。尽管统计数字要做到绝对的准确，甚至于相对准确是很难的事情，但要力求准，不准还有什么用？力求准确是最主要的，是统计工作的宗旨，否则就是骗人。今天我为国家统计局的题词就是四个字：“不出假数”。1958年“大跃进”时曾经吃了那么大的亏，不就是因为相信了一些莫名其妙的数字吗？



2002年10月28日，朱镕基在国家统计局考察工作并题词“不出假数”。右二为国家统计局局长朱之鑫，右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温家宝。

第二才是尽可能“快”一些。把“快”字放在前边是不行的，快而不准等于没用，反而害人。统计工作有年报、月报制度，规定了什么统计数字要在什么时候出来，但为了适应宏观决策的需要，应该尽可能快，这样才能保证及时、果断地决策，发挥它的效力，否则就晚了。回顾1993年的经济过热，其形成的过程很快，从1992年开始，到1993年1月就已经不可收拾了。我记得很清楚，1993年1月1日，江泽民同志请18个省的省委书记和省长分批到北京来，找他们谈话。谈什么？告诉他们，钞票印刷跟不上了，请他们在春节以前千万不要再乱发钱了。1993年一开始，钞票大量发行，春节以后通货膨胀形势越来越严重。经济过热的形成过程是很快的，并且首先动摇银行体系。如果对这些问题能及早有一个准确的反映，我们当时就能够及时作出决策，可能不至于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再比如，我最近提出目前房地产有一点热，如果不注意制止的话，很快就会发展起来。经历过1958年“大跃进”和三年困难时期等年代的人都有这种经验和体会，那时的统计数字也是统计局系统报上来的。

今年国庆节，我在广州看到你们的一个统计数字，说广东省固定资产投资今年前九个月的增长，其中60%是来自房地产，难道这还不够热吗？如果这些房产是卖给个人住的，风险还比较小，将来即使房地产价格崩溃了，只是个人受损失，房子还是他自己住着。但实际上，现在银行有20%到30%贷款是贷给房地产商的，而且盖的都是高档楼，这样风险就大了。很多房地产商是“空手道”，房地产价格一旦崩溃，这些钱是不可能还上的，他们也没有能力还。这一点，我们在1993年已经有过教训。海南岛到现在还没有把“烂尾楼”处理掉呢，我把它叫做“遍体鳞伤”。目前基本建设增长这么快，主要又是靠房地产拉动，我现在说房地产有一点热，如果不注意就会热得很快。今年钢产量达到1.8亿吨，超过了日本和美国这两个世界上最大的钢铁超级强国的总和。与此相对应，带动了建材工业和装备工业的迅速膨胀。对这

些只要看看电视报道就知道了。一些过去名不见经传的钢铁厂一个接一个地扩大生产规模。同志们！你们经历过1958年的“大炼钢铁”吗？那时“以钢为纲”，带动所有装备工业都起来了。现在1.8亿吨钢产量里，60%以上都是建筑用钢材，而且大量的是不合格钢材。这么搞下去有什么效益？我对广东省、深圳市的领导讲了这么个观点，我说：深圳市除了山以外的地方全都盖满了楼，现在还要求惠州再给它划几百平方公里土地，干什么？又是盖楼。对国民经济有什么好处？不需要再“拉动”了。广东省不能再这么搞下去了。在内部讲就是应该“刹车”，别再批地了，别把农民的地都批掉了；在外部讲，就是要严加控制。他们完全同意我的观点。现在的任务是调整产业结构，要发展高新技术和第三产业，不能是老鼠只会打洞，难道中国人只会盖房子呀？ 一天到晚盖房子，到处都是工地，怎么得了！过去我一直不相信生产的钢有一亿几千万吨，都销到哪里去了？现在我相信了。中国国际工程咨询公司也做过一个调查，钢产量确实是1.8亿吨，还需要进口2500万吨，消费量为两亿多吨。我们的国力有那么大吗？这样搞下去，产业结构调整必然实现不了。如果再像1958年那样“以钢为纲”，带动所有的装备工业都发展，搞得规模很大，一旦垮下来，就是几千万人失业、下岗。我不是吓唬人，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节目所反映的只是一小部分，其实问题大极了。某些房地产商唯利是图，偷工减料，虚报面积，答应的条件不兑现，工人的工资也不按时给，情况非常严重，已经没法监管了；有些地方是政府部门和房地产商内外勾结，纯粹是腐败。要想到这种后果，所以，我希望国家统计局能够围绕我讲的这个信息，赶快追踪，进行深入调查，为中央的决策提供依据。像这类事情，我就说你们要快一些。至于年报、月报，你们都按时搞出来了，也无法加快速度。问题是制度外的，一些为中央提供决策信息、决策依据的反映要尽可能快一点。

第三是“精”，无非就是要把统计工作做得更细、更精一些。统计工作无论怎么讲都是非常重要的。你们一天到晚与信息打交道，必须做到准确、迅速地反映信息。如果你们善于捕捉信息，善于进行深入分

析，抓住和发现信息的重要意义，并及时反映上来，那就是你们的水平，也就为国民经济发展立下很大功劳。

统计工作大有用武之地，应该吸引人才，留住人才。当然，如果都像外资企业拿那么高的工资，我们也是负担不了的。在外资企业工作尽管工资很高，甚至比你们的高几倍、几十倍，但要看到，首先，那个工作非常累，不一定每个人都能适应；第二，风险比较大，说不定随时会把员工裁了；第三，毕竟在国家机关工作的成就感、自豪感是外资企业无法相比的。所以，只要我们创造一个能留住和吸引人才、让人才脱颖而出的环境，我认为还是能用比较少的工资来吸引更多人才的，关键还是环境。我们的领导同志应该创造这种环境，使大家在这里工作心情愉快，能够同心同德，有共同的理想，非常融洽地合作，能感受到公平，不是靠跑关系、走门子就可以上去。

总之，我希望国家统计局在党中央、国务院的领导下继续努力，在过去已经取得成绩的基础上进一步开展自己的工作，吸引更多的人才，提高自己的技术手段和技术装备水平，同时还要进行一些体制改革，把国家统计工作推向一个新的水平。这样，我也会感到很光荣，因为我也是跟着国家统计局一起成长起来的。

香港的前途是光明的

(2002年11月19日)

2002年11月18日至20日，朱镕基同志赴香港出席第16届世界会计师大会并访问香港。这是朱镕基同志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欢迎晚宴上的讲话。

感谢董建华特首、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和各界朋友的深情厚谊，今天举行这样盛大的宴会，来欢迎我和我的陪同人员。借此机会，我向香港同胞表示我们最真诚的问候和最良好的祝愿。我也要对在座的各位同事、朋友在振兴香港的事业中所作出的艰苦努力和杰出贡献，表示由衷的敬佩和衷心的感谢！

中国共产党刚刚召开了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选出了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新的中央领导集体。我相信，我们新的中央委员会及其领导班子，将会高举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按照“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要求，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创造更加辉煌的业绩！我也相信，党中央、国务院将继续坚持“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方针；我们也将继续并始终竭尽全力，动用我们一切可以动用的资源和手段，促进香港的繁荣和稳定。



2002年11月19日，朱镕基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欢迎晚宴上讲话。

香港当前面临着困难，但是我们始终认为，这个困难主要是历史原因形成的。几十年以来，香港同胞用他们艰苦的创业精神，创造了香港的繁荣和辉煌。但是，在繁荣的景象中也积累了泡沫，在成功的喜悦中也埋下了隐忧。再加上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这种结构性的矛盾就暴露出来了。这种困难，绝对不是一天两天、一年两年造成的。但是，我相信香港在董建华先生和特别行政区政府的领导下，一定可以克服这个困难。

大家可能要问，你作为国务院总理，能够提出什么治港的良策呢？那我很坦率地告诉大家：我对香港并不了解。我可以讲一个故事。1998年美国副总统戈尔见到我时说："听说你很崇拜格林斯潘①先生。"我听了，不太高兴，我说："我很尊敬格林斯潘先生，我愿意向他学习。但是，他在美国干得很好，到中国来不一定干得比我好。"我搞经济50多年了，对于中国内地经济每一个脉搏的跳动，我都听得出来；但是，我对香港的知识，仅仅限于每天看两份香港报纸，有时候看三份，是远远不够的。我没有在香港生活过，就凭我这每天看两三份香港报纸就能够提出治港的良策？那是江湖医生。但是我完全相信一点，就是香港克服当前困难的力量和办法，就存在于香港的体制之中。因为，香港具有十分开放的经济体制、比较完善的法律制度、效率比较高的政府公务员，特别是有一大批优秀的企业管理人才；跟世界各国有着广泛的联系，是世界、亚洲的金融中心、贸易中心、服务中心。香港的优势并没有丧失，它的竞争力、它的实力依然存在，它完全可以凭借自己的力量，克服当前的困难。

---

① 格林斯潘，即艾伦·格林斯潘，当时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

我的这种认识，来源于分析。环首世界，我们"未见几家欢乐，但见几家愁"。日本已经是多年的经济停滞，它的结构性矛盾并不是那么容易解决，现在也没有看到复苏的迹象。今年11月，我在柬埔寨出席"10＋3"会议①。中日韩三国领导人会晤后，我对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讲，我完全支持你的改革。你现在所用的方法，我在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

以后都用过，你以前两届首相也都用过，但是你们执行的这种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没有我们一贯，没有我们坚决，也没有我们有效。如果我今天处于你的地位的话，我也会像你这么做，我希望你成功。所以，这种困难不只是存在于哪一家。

---

① “10＋3”会议，即东南亚国家联盟十个成员国与中日韩三国领导人会议。

再看欧洲。欧洲的经济比较有活力，但是它的增长速度也很低，失业率很高呀。我们不是说香港的失业率很高吗？但是欧盟国家的平均失业率是11%，德国、法国都在8.7%到8.9%之间。香港最近的数字，已经下降到7.2%了，那你跟欧盟比，你还“望尘莫及”呢！

这两天我跟董特首交谈，他是忧心如焚，很担心财政的赤字。如何来解决香港的财政赤字问题，董特首是费尽了心思，但是我也告诉董特首，你去年不就是600亿到700亿港元财政赤字吗？今年大体上也就这个数嘛。你的财政储备不是现在还有2700多亿港元吗？我说你这个“赤字特首”跟我这个“赤字总理”比起来，你还差得多呢。我的财政赤字去年是2598亿元呀，今年是3098亿元呀，我累计发放的国债余额25800亿元，你赶不上我啊。另一方面，跟美国比起来，我还是“望尘莫及”呀。我看它的财政赤字还要扩大，因为它现在是聚精会神“反恐”啊。我看它那个经济也马上复苏不了，赤字还会扩大。我说董特首，你这个700亿港元的财政赤字水平，至少还可以挺三年，都不会出现净赤字，你还有财政储备呀。因为经济的复苏，要靠产业结构的调整，不是那么容易的，得有一个缓冲的时间。即使三年以后，你把财政储备花光了，你可以到内地去发行香港五十年长期债券，我第一个带头买！我相信内地人民会跟着我一起买，因为他们对香港有信心！香港是中国一颗璀璨的明珠嘛，是有希望、有前途的，有什么可怕！

但是，我认为董特首这种戒慎恐惧的心理、认真负责的精神，是完全正确的。对待财政赤字不可掉以轻心。我也不认为香港的困难现在已经到底了，同胞们、同事们，没到底呀！要有心理准备。我也不认

为我们可以很轻易地开出一个时间表，把香港的经济问题解决了。如果我们这样做，那不但是江湖医生，还是江湖骗子啦。不可能！现在需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准备还有最困难的时期到来，还要进行第二次创业！

但是我完全相信这一点：香港能够克服这个困难，能够重振雄风。希望寄托于我们香港的600万人民，特别是寄托于我们的年轻一代，寄托于我们香港的大学生，寄托于昨天到机场去欢迎我的那些可爱的中小学学生。希望在他们身上。我希望全体香港人民都应该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准备以前辈们所发扬的那种精神，进行第二次创业。

香港的前途是光明的，我们总是以有香港而自豪。我就不相信香港搞不好。如果香港搞不好，不单你们有责任，我们也有责任。香港回归祖国，在我们的手里搞坏了，那我们岂不成了“民族罪人”？不会的。我看报道说，梁锦松①先生不久以前我不记得是唱了还是念了《狮子山下》这首歌。这个电视剧我没有看过，这首歌我更不会唱。但是我把歌词找来了，是顾嘉辉先生作曲、黄霑先生作词、罗文先生演唱的。在梁锦松那次念这首歌词的时候，罗文先生还没有去世，最近他已经去世了，但是我相信，他对香港作出的贡献，会永远铭刻在香港人民的心中。

---

① 梁锦松，当时任香港特别行政区财政司司长。

我看了这个歌词以后，很受感动。我相信在座的参加创业的这些老前辈，更有这种感受。因为歌词的每句话，都充满着真实的感情，而这种真实的感情，会永远发光。我现在就念这首歌词，同大家一起为香港前途共勉：

既是同舟

在狮子山下且共济

抛弃区分求共对

放开彼此心中矛盾

理想一起去追

同舟人誓相随

无畏更无惧

同处海角天边

携手踏平崎岖

我们大家

用艰辛努力

写下那

不朽香江名句

我爱香港！谢谢!

在二〇〇二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2002年12月9日)

2002年12月9日至10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北京召开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各省、省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党政主要负责同志，中共中央有关部门、国务院各部委和有关单位的主要负责同志，解放军四总部和武警总部负责同志。这是朱镕基同志在会上的讲话。

这次会议很重要。对于贯彻党的十六大精神、做好明年经济工作，具有重要意义。刚才胡锦涛同志的讲话，分析了国内外的形势，对明年的经济工作提出了总体要求和主要任务，我完全赞同。希望各地、各部门要认真贯彻落实。下面，我根据中央讨论的精神，就今年经济情况和明年经济工作的部署，讲几点意见。

一、如何看待今年的经济形势

今年的经济形势很好。预计7%左右的经济增长速度可以超过，还可能超过8%，因为除了几个经济欠发达地区以外，各地经济增长速度基本上都超过了8%。应该说这是近几年来比较高的速度，效益也是比较好的，特别是国有企业的利润有所增加。财政收入预计比去年增加1600亿元左右。进出口贸易额增长18%，其中出口增长20%以上。外汇储备在11月底已达到2746亿美元，估计到年底将超过2800亿美元，比年初增加624亿美元。估计今年外商实际投资超过500亿美元，比去年增长20%以上。形势确实是非常喜人的。

有些同志提出，是不是去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当时世界经济形势的估计过于悲观了？现在的体会好像不是那样的。我要就这一问题作些说明。

去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世界和中国经济形势的估计是正确的，也是符合实际的。现在的世界经济形势比去年预计的时候还要糟糕。去年10月份至11月份，估计世界经济发展速度为2.5%，并预计今年1月份

将降低到2.4%，但实际上连2.4%也达不到，现在是在1.5%至2.4%之间。特别是亚洲金融危机时，美国、日本、欧洲的经济情况还是可以的，现在美国、日本、欧洲经济已陷入低迷，出现了全球性的经济低迷。日本的经济发展速度可能要下降到百分之零点几甚至负增长。也就是说，当时中央估计今年的世界经济环境甚至比亚洲金融危机时还要严重，这个估计是不过分的，是符合实际的。而且，现在也看不到世界经济好转的迹象，世界经济形势到明年也还是严峻的，同志们一定要认识到这一点。从这点也看出来，我们所取得的成绩确实是极为不易的。在世界经济低迷的时候，我们抢了人家的市场。我们为什么能够做到这样呢？主要是由于党中央高瞻远瞩，充分地估计到世界经济形势带来的困难，及时地采取了果断的应对措施。具体来讲：

第一是投资拉动提早地发挥作用。今年一开始我们就注重投资的拉动，国家计委抓得很紧，在年初或者说第一季度就把大部分国债项目下达了，比以往每年都早，这就及时地拉动了整个国民经济。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拿高速公路来说，1989年全国只有200公里，1997年是4700公里，到今年年底已达到2.4万公里。最近四年多的投资总额超过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几十年的总和。



2002年12月9日，胡锦涛、朱镕基、李岚清、吴邦国、温家宝、贾庆林、曾庆红、黄菊、吴官正、李长春、罗干等中央领导同志出席中

央经济工作会议。

第二是消费需求的拉动。我们也及时地注意到光靠投资拉动不行，因此去年两次增加机关、事业单位职工工资及离退休人员离退休金。同时，今年特别注意提高低收入群众的收入，提高了企业退休人员的退休金标准，加大了“两个确保”①的力度，城市“低保”的力度比去年增加了一倍，国家在上述方面的投入是很大的。这样，社会消费额就大大增加了。所以，消费需求的拉动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

① 参见本卷《在二〇〇〇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第三是出口的拉动。出口的增长确实出乎我的意料。去年这个时候，我讲过搞得不好出口会变成零增长或负增长，因为市场需求都降下来了嘛。但实际上今年出口增长了20%，这很不容易。我们主要是出口到美国、欧洲、日本，竞争是很激烈的。出口能增长这么多，这里面有政策性的因素，就是我们加大了出口退税的力度，今年出口退税1100多亿元，各项外贸体制的改革也都有利于出口的增长。还有一个有利的因素就是美元对日元和欧元贬值了10%以上。我们的人民币是紧盯美元的，美元贬值等于人民币对日元和欧元也贬值，这是有利于出口的。另外一个因素就是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以后，很多国家消除了一些贸易和非贸易壁垒，放松了配额，让我们扩大了出口，从而拉动了很多消费品的生产和国民经济的增长。但加入世贸组织也有弊，弊就是关税降低了三个百分点，使我们减少了300亿元财政收入。

第四是进口也相应地增加了，比出口差两个百分点，但也增长得很快。我们的外汇储备那么多，贸易也是顺差，当然可以多进口了。出口收不到税还要退税，进口能够收到税，是财政收入的一个重要支柱。我们降低的三个百分点的关税，减少的税收得补回来，这就靠增加进口。所以，我们在上半年有意识地多进口了一批产品，这些产品是不会影响到国内企业生产的，不是重复的进口。比如说，原油我们就可以大量进口，原油我们还没有战略储备，现在要增加战略储备。但可惜我们现在没有储备油罐，就只能利用中石油、中石化现有的油

罐多进口一些。国家计委已经对建储油罐、增加石油的战略储备做了安排。但从长远的战略看还是应该跟俄罗斯合作，把它的石油和天然气从中亚运过来，这对我们的能源战略是非常重要的。今年由于增加了进口，所以财政收入的减少没有像去年预计的600亿元那么多。根据我国加入世贸组织的承诺，明年进口关税税率平均还要降一个百分点。进口关税和财政收入是紧密相连的，所以明年我们还要注意这个问题。今年进出口都这么旺盛，这与我们采取的一些特别措施有关，这些措施也未必年年都能够采用。

最后一条，国际经济形势恶化，既有对我们发展不利的一面，也有对我们有利的一面。比如“9·11”事件以后，出于安全的考虑，很多人就不敢到美国去了，欧洲和中东地区在美国的投资大大地减少了。后来风声鹤唳，搞得很紧张。美国几个大会计公司做假账，也影响了它的声誉。因此，外商到中国的投资增加了，中国的投资环境起码是稳定的，再加上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特别是沿海地区有了很大的改善，物价便宜，又有“价廉物美”的劳动力和管理阶层，外国人愿意来投资。所以，我们今年吸引的外国直接投资创造了历史纪录，可能是五百几十亿美元，成为全世界第一。总之，不是中央对世界经济形势的估计有什么错误，而是由于我们的努力，克服了困难，使我们的经济得到了出乎意料的发展。这是大家努力的结果，是中央正确 决策的结果。



2001年5月，朱镕基在福建省考察厦门国际会展中心。前排左一为福建省省长习近平，左二为福建省委书记宋德福，右一为厦门市委书记洪永世；第二排左三为福建省副省长张家坤，左四为福建省委秘书长黄瑞霖，左五为福建省副省长兼厦门市市长朱亚衍。

但是，另一方面确实也要看到，我们的很多基本问题还没有解决，不要把形势估计得太好了，否则就难以为继了。有什么问题呢？劳动力过剩始终是中国一个最大的问题，农业产业结构调整进展缓慢，农民收入增加缓慢，农村的就业问题亟待解决。而城市下岗职工再就业的问题也十分突出。今年我们做了大量工作，解决了一些问题，但劳

动力过剩这个问题是一个永远的课题。还有一个新的问题：1998年开始扩招，明年这批学生都要毕业了，找不到工作怎么办？就业压力一年一年逐渐加大。下岗职工只要我们做工作就闹不起来，大学生就难说了。现在大学生的期望值也太高，一出大学校门马上就想拿高工资，怎么可能呢！农村也不愿去，那还行啊！这个问题要引起我们注意，这是一个很大的矛盾，在相当长一个时间难以解决。因此，在看到今年好的形势的同时，还要充分估计到我们的困难，绝对不可以掉以轻心。

二、如何把握明年的经济工作

我觉得很童要的一点，是要继续努力解决国内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没有需求怎么发展？7%、8%的发展速度能维持下去吗？所以，一定要注意解决这个问题。但是，要对有效需求作分析，需求包括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现在投资的拉动力度已经很大了，不能再拉了。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已达4万亿元，差不多相当于1997年的两倍，增长得太快了。这里面除6600亿元国债外，都是银行贷款，风险也在于此。关于基础设施建设，只要不搞重复的、过分超前的，就没有风险。加工工业、建筑业都是有风险的。这几年，投资的规模这么大，一下子就冒上去了，几年的投资等于过去几十年的总和，把基础工业和装备工业的生产拉上去了，拉得可怕呀！我们钢的产量1997年是1亿吨还差一点，今年是1.8亿吨钢、1.9亿吨钢材。为什么钢材多于钢呢？进口钢坯，进口的2000多万吨钢材里面包括了钢坯，这些钢还再轧成材，使钢材比钢还多。这个产量等于美国加日本的总和，日本钢产量这么多年就是1亿吨左右，美国是9000多万吨。我们经济总量并不大，只有1.2万亿美元，而日本是4万多亿美元，美国是10万亿美元，我们差远了。如果拉动力量万一上不去，现在靠国债、靠银行贷款，万一这里面安排不当出现风险，一收缩，马上就有大量的职工要下岗。而且，我们钢的生产结构也很不合理，1.8亿吨钢里面只有4000多万吨，也就是20%左右是年产量500万吨以上的大钢厂生产的，其他都是小钢厂生产的。韩国钢产量去年虽然只有4000多万吨，但他们一个浦项钢铁厂年产量就达2700万吨，规模生产，效益好、成本低、人员少。而我们的

钢铁工业是靠“人海战术”搞上去的，发展得这么快，但品种问题解决不了。为什么还要进口2500万吨钢材呀？就是因为汽车板生产不了，好多不锈钢材生产不了，还得进口。随着钢产量的上升，建筑材料、水泥、玻璃的生产都膨胀得不得了，而且大量是“五小”工厂生产的，质量不行。所以，投资的过分拉动，实际就是拉动一些重复生产、重复建设和不够质量标准的生产与建设，这是很危险的。光产量大不行，还要把质量、品种、效益搞上去。那么，大量的钢材消耗到了什么地方呢？盖房子。外国人来上海、北京一看，就说这个进步简直是不得了。其实，他们没有到农村去，没有到县城去，那里也是到处都在盖房子。钢材差不多有一半是用于建筑行业了，搞这么大的规模。盖房子也有个结构问题。从13亿人民的需要来讲，盖多少房子都不够，但现在盖了许多高档商品房，老百姓买得起吗？而不盖高档住房又没有效益。现在房子的空置率在增长，许多中高档房子卖不掉。外国人还没来，房子就盖起来了，资金都压在那儿了。而且，资金的70%都是银行贷款，银行贷款又主要是贷给房地产商，而不是贷给买房子的老百姓，这里面的风险就很大。房地产业里面的弊端大得不得了，里面的门道可多了。我在深圳说过，现在房地产有一点热，不敢说过热，不能再这么干下去了。我现在的提法还是，在局部地区、个别地区，房地产已经出现一点热。同志们，从一点热到过热是很快的，半年就行，我对此有几十年的经验。这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我们一定要考虑可持续的发展。如果拼命加大投资的强度和力度，拉动的后果是难以设想的，会背上很多包袱。最后没有这么大的拉动力量，经济发展速度一掉下来，马上就会乱套。当然，我们没有马上就减低这个力度。比如说国债投资，今年安排了1500亿元，明年发行1400亿元，但今年可以结 转100亿元过去，因此，跟今年差不多，投资力度没有减弱。从国债和总投资的比例来讲是有所减少了，但也没怎么太减弱。

我要讲的命题是，既要注意投资的拉动，更要注意消费的拉动。只有消费的拉动才是可靠的，这是人民大众的购买力，是真实的购买力。过去几年里，党中央、国务院注意了消费拉动，鼓励老百姓消费，不是鼓励公款消费。没有消费拉动是不行的，前进不了。我们为

了解决上一个五年遗留下来的问题，如农村合作基金会、城乡信用社、信托投资公司、供销社的股金部、各种财务公司等等，拿出2000亿元借给各个省区市解决这些问题。一方面，解决了欠了农民的钱不还、失信于民的问题；另一方面，增加了农民的收入，拉动了消费，起了很大的作用。这2000多亿元一投进去，就变成购买力了。搞退耕还林，把粮食和钱给了农民，马上就变成消费。这两年进行农村税费改革，中央财政花了400多亿元，补贴给中西部地区，直接推动了农民的消费。“两个确保”、城市“低保”、提高企事业单位离退休人员离退休金的标准，这些都增加了消费。没有这些拉动，光靠一个国债投资我们的经济就能拉动得了？现在，我们的消费率同世界平均水平比较起来还是低的。什么叫消费率？就是最终的消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因此也叫最终消费率。这个比例我们现在达到了60%，但世界的平均水平是78%到79%，我们还有一段距离。消费的拉动对我们来讲是很重要的，希望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在明年还是要把注意力放在消费的拉动上。总而言之，就是要关心群众的生活，这才是真正的拉动。今年没有增加工资，但是我们已把明年增加的工资打进预算了。要增加工资，要提高低收入阶层群众的生活水平。农村税费改革要扩大试点，退耕还林要扩大规模，这些都是刺激和动员群众消费。现在产品质量不行，许多牌子都是假的，群众最终就会丧失对市场的信心，就没有消费意愿。前一段时间，我们抓了“黑心棉”问题，现在又出现了“黑心垫”问题，国家经贸委正在查。最近，我看到互联网上的一条消息说吉林省通化市的葡萄酒厂已发展到200多家，那就是造假啦，对这个事情要查一查，不要自己破坏自己的品牌。现在要注册一个企业比生孩子容易多了。有的根本没有什么生产设备和质量检测手段，产品就大量上市了。政府的职能之一就是维护市场经济的秩序，要有一个“游戏规则”，政府不管谁来管？整顿市场经济秩序是一个永恒的课题，也是我们政府非常重要的责任。

因此，我要提醒大家，把握明年经济工作的原则是，既要扩大投资拉动，更要扩大消费拉动；既要注意增加产量，更要注意提高质量；既要注意发展速度，更要注意结构调整。我希望各级政府领导，把这

个牢记在心里。单纯追求经济发展速度是没有什么意思的。对今年经济增长8%，我没有多大兴趣。如果是7%就有这么多财政收入，我就挺高兴了。何必要那个有泡沫、有水分的8%呢？！

三、对我们政府的工作作风提点意见

党的十六大前后，大量新的同志提升到领导岗位，这是我们党发展壮大的宝贵机制，使我们党能够兴旺发达，我们国家能够更好地发展。这样"长江后浪推前浪"，不断地更新，不断地提高水平，是一条规律，这很好。但是，我觉得也要请我们各级政府、各部门的领导同志，特别是新上来的领导同志，一定要注意，你们最重要的任务是，根据"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要求，关心人民群众的冷暖，关心人民群众的疾苦。如果我们不关心人民群众的生活、疾苦，那"三个代表"如何体现？我们做领导的不去关心，谁去关心？我现在有一点担忧，就是我们花钱花得太多了！你们看京西宾馆金碧辉煌，钓鱼台国宾馆也是金碧辉煌，人民大会堂更是金碧辉煌，到处都是金碧辉煌。省里也是这样的吧。至少我去出差住的你们的招待所，也都金碧辉煌起来了。不是不要建这些设施，而是我们是不是应"悠着点"？我们的经济发展水平还没有达到那个程度，中国只可能有一个北京，只可能有一个上海，各省也只可能有一个省会城市。不能到处都"开花"啊！现在连县一级都在大兴土木，到处都是工业园区，使我回想起1993年，"热"起来是很快的。我们总应该记得，我们现在农村还有3000万的贫困人口，脱贫的标准并不高。这些贫困人口是非常贫困的。城市还有2000万的"低保"人口，还有1000多万的下岗职工以及大量的离退休人员和生活困难人员。我们能搞那么高的标准吗？特别是新干部上来以后，车子要换，房子要换，办公室要装修，甚至还要建新的。上来的干部也多，从为他们创造工作条件看，这些都是应该的，但是不是可以"悠着点"呢！不怕解决少数人的问题，就怕全国一哄而上，全部要工业化，全部要城镇化，全部都建工业园区，这是不得了的。大家脑子里要时刻想着关心人民群众的生活疾苦，与人民群众共患难，想他们之所想，忧他们之所忧。昨天，我找了一句古话，出自《贞观政要》。唐太宗十分注重治理国家的方法，他说："知其所以危则安矣"，知道危难要来，知道

为什么有危难，你的位子就能坐得稳。“知其所以乱则治矣”，你看到什么地方要动乱，知道为什么会动乱，你就能使社会安定了。还有，“知其所以亡则存矣”。我想，在大好形势下说这些话，也不是无的放矢的。我即将退出总理的职位，在离任之前，不说就没有尽到我的责任。在大好形势下，大家还是一定要居安思危。好多问题并没有解决，随时都可能发生。

我讲的就是上述三点意见，脱开了稿子，供大家参考。主要的要看我的稿子，稿子是正式的。今天是讲点心里话。讲得不对，请大家批评。

努力做好新形势下的财政工作

(2002年12月25日)

这是朱镕基同志在接见全国财政工作会议代表时讲话的一部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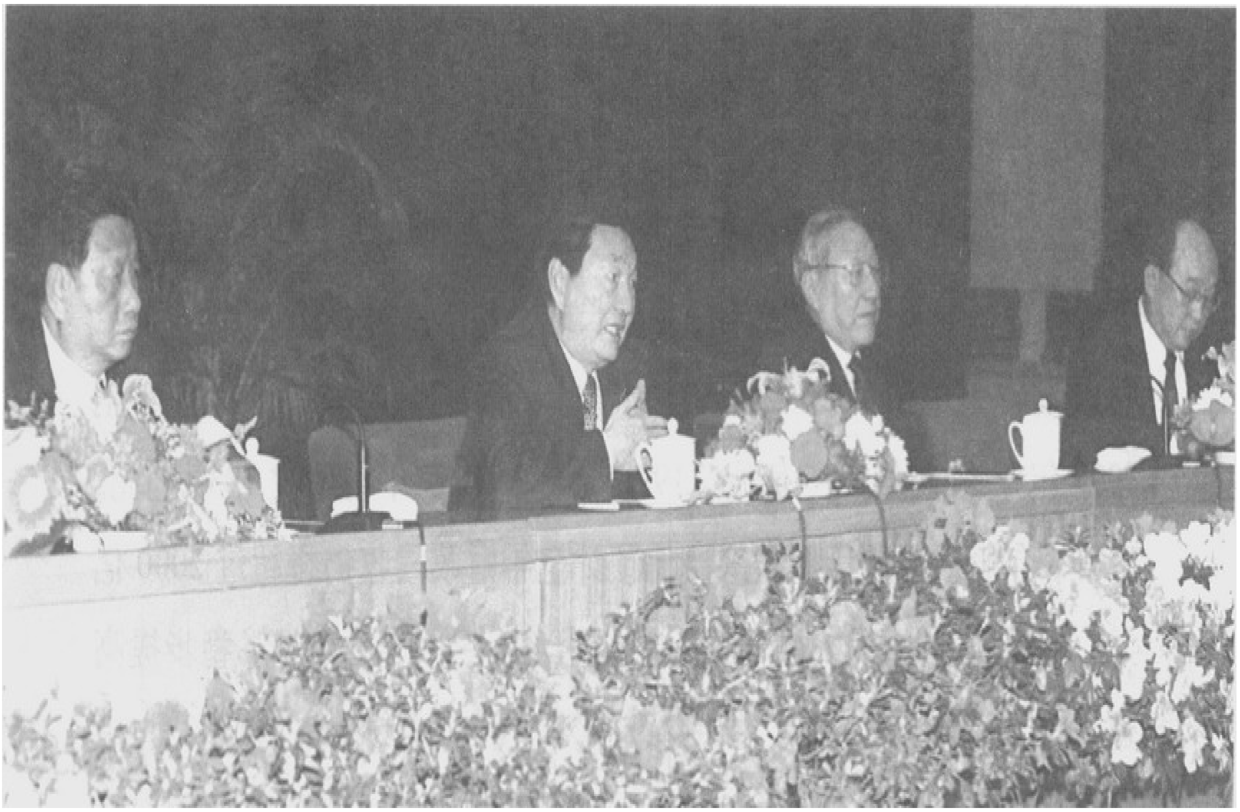
按照会议的安排，我今天跟大家见个面，讲个短话。

应该说，这几年是新中国成立以来财政工作一个非常辉煌的时期。我从20世纪90年代初到中央工作以来，就与财政工作结下了不解之缘，对财政部门和财政战线的干部、职工一直怀有深厚感情。财政工作是经济工作的基础。多年来，财政部门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的方针、政策和部署，顾全大局，知难而进，兢兢业业地工作，为推进改革开放、调整经济结构、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作出了重要贡献。党中央、国务院对财政工作是满意的。现在，国内外都称颂中国经济是“一枝独秀”。回顾走过的路程，我们应该感到欣慰。成绩确实是来之不易的，是大家一步一步走过来的，每走一步都是经过努力奋斗的。我们应该珍惜这些成绩，肯定这些成绩。我主要讲以下三点。

一是不断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建立良好、有效的财政收入增长机制。 记得1992年我主管财政工作时，全国财政很困难，中央财政困难更大，1993年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只有28%。从1994年开始，中央下决心改革财税体制，实行分税制。为推动这项改革，1993年，我们从广东省开始，70天跑了13个省份，做了大量的说服、动员和协调工作。这次改革取得了很大成功，初步规范了国家、企业、个人以及中央和地方的分配关系，调动了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建立了财政收入稳定增长的机制。1994年至2001年，全国财政收入增加了2.14倍，年均增收1505亿元。其中，1994年至1997年年均增收1076亿元，1998年至2001年年均增收1934亿元。尽管今年财政减收因素较多，但预计全年财政增收仍将超过2000亿元。财政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由1994年的11.2%稳步提高到2002年的18%左右。中央

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也由财税体制改革前的28%提高到现在的55%。中央财政实力增强后，对地方特别是中西部地区的转移支付力度不断加大。目前，中央财政对中西部地区的转移支付资金已占这些地区财政支出的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这还不算国债资金对这些地区的投入。如果不进行这次改革，中西部地区的发展不可能达到今天这样的水平，中国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也不可能取得今天这样的成就。这次改革对整个财政工作具有重大影响，奠定了中国财政稳固、平衡和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的基础。

我们还实行了其他一系列的改革，财税体制改革一直没有停步。例如，今年就实行了所得税收入中央和地方分享的改革。按照“存量不动、增量分成”的原则，将企业所得税与个人所得税的新增收入全部改成中央和地方五五分成，这是对财政收入分配又一次重大的调整，是分税制财政体制的进一步完善。改革后，中央从所得税增量中多分享的收入，一分钱也不留下，全部用于对地方主要是中西部地区的转移支付。2002年，中央由此增加对中西部地区的转移支付100亿元左右。这次改革比我想象的更为平稳，大家都顾全大局，服从中央的决定。又如，这两年进行农村税费改革试点，这项改革也很艰难。2000年，先在安徽全省试点；今年，改革试点范围已扩大到20个省区市。中央财政用于农村税费改革的资金，由2001年的80亿元增加到2002年的245亿元，2003年还要继续增加。我们下很大决心进行这次改革，就是为了从根本上减轻农民负担、增加农民收入。此外，交通和车辆税费改革也已经推出，其中车辆购置费改税从2001年1月1日起顺利实施，两年征税超过600亿元。燃油税的改革方案已经制定，待条件成熟时择机出台。



2002年12月25日，朱镕基接见全国财政工作会议代表并讲话。左一为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王忠禹，左三为国务院副总理李贯清，左四为财政部部长项怀诚。

可以说，这些年的财税体制改革，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力度最大、成效显著、影响深远的改革，是决策科学、设计周密、实施有力、运行平稳的改革。通过改革，财政收入大幅度增长，为经济和社会发展提供了强大的财力支撑。

二是认真贯彻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 1998年以来，面对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和国内有效需求不足的困难局面，中央果断地把宏观调控重点从治理通货膨胀转向扩大内需和抑制通货紧缩趋势，从实行适度从紧的财政、货币政策转向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财政部门与各部门、各地方密切配合，认真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1998年至2002年，共发行长期建设国债6600亿元，带动银行配套贷款和其他社会资金形成3.28万亿元的投资规模，到2002年年底累计完成投资2.46万亿元。基础设施是我国经济发展中的薄弱环节，国债资金重点投

向基础设施建设，就像及时雨，很快就取得了明显的效益，并带动了相关行业的发展。这五年，仅中央水利建设投资就达1756亿元，是1950年到1997年全国水利建设投资总和的2.36倍；公路、铁路等交通建设和邮电通信建设都是突飞猛进；国债资金还重点支持了生态环境建设、农业发展、企业技术进步和科技、教育等。同时，通过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多渠道增加城乡居民收入，扩大了消费需求。一是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减轻农民负担。二是增加城镇低收入居民的收入。1998年至2002年，国家财政用于“两个确保”①和城市“低保”的支出共2390亿元，其中中央财政支出1934亿元。三是1999年以来，连续三次提高机关及事业单位职工的基本工资标准和离退休人员的离退休金。

---

① 参见本卷《在二〇〇〇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总之，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有力地拉动了经济增长。虽然由此增加了一些财政赤字和债务，但我们十分重视防范财政风险，始终没有把国债资金用于经常性开支，始终把财政赤字和国债余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控制在“安全线”以内。这几年虽然增加了一点债务，但换来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是成倍甚至是几倍的，远远超过了所负担的债务。有些方面的效益还是无法计算的，像农村电网的改造花了近2000亿元，对根本改变农村的面貌、提高农民的收入，起着不可估量的作用。

三是初步建立了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公共财政框架。 1998年以来，财政部门加强财政法制建设，积极推进部门预算、国库集中收付制度、政府采购制度和“收支两条线”管理等方面的改革，初步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公共财政体制框架。目前，中央和省两级全面推行了部门预算改革，部门的各种财政性资金(包括预算内、外资金)全部在一本预算中编制，财政部门按标准审核并拨付资金。国库集中收付制度已在38个中央部门进行试点，取得良好的效果。政府采购规模不断扩大，2002年的集中采购规模有望突破1000亿元，节约资金100亿元左右。尽管“收支两条线”管理的改革难度较大，但我们还是下决心推

进这项改革，目前已在中央34个部门进行了收支脱钩改革试点。深化“收支两条线”管理改革非常困难，但是如果不改革，我们就不能成为现代化的国家，这方面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金财工程”等信息化建设也不断加快。

总之，在党中央、国务院的正确领导下，这些年是财政体制改革力度最大的时期，是财政实力显著增强的时期，也是财政宏观调控作用发挥最好的时期。广大财政战线的干部、职工艰苦努力所取得的成绩，必将被载入财政事业的光辉史册。

2003年，经济工作的任务相当繁重，面临的困难也很多。在新的形势下，财政部门责任重大，财政工作的任务光荣而艰巨。借此机会，我向大家提几点希望和要求：

第一，各级领导干部要重视财政工作。作为一个领导干部特别是主要领导干部，不懂财政是不行的。必须知道什么是财政的钱、有多少，才能量入为出。国家法律规定，地方财政不能打赤字。但实际上，现在许多地方存在隐性财政赤字，对此一定要高度重视，认真研究解决的办法。要时刻记住：“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①大手大脚花钱，是对人民的犯罪。必须厉行节约，精打细算，坚决制止铺张浪费。要支持财政部门依法行政，做好财政工作。

① 见朱柏庐《朱子家训》。

第二，正确履行财政部门的职责。财政是国家机器运转的基础，是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财政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广大财政战线的工作者要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六大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增强紧迫感，正确履行职责，扎扎实实做好工作。

第三，进一步做好增收节支工作。2003年的财政收支矛盾仍比较突出，要继续大力增收节支。强化税收征管，严厉打击各种涉税违法犯

罪活动，做到应收尽收。调整和优化支出结构，保证重点支出，大力压缩一般性支出。加强财政管理和监督，为国家管好财、用好财。

第四，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要在总结经验、完善政策的基础上，在全国范围内推开。继续完善所得税收入分享的改革。不断深化部门预算、国库集中收付制度、政府采购制度和“收支两条线”管理等改革。进一步完善税制。加快“金财”、“金税”、“金关”工程建设。

第五，切实加强队伍建设。这是做好财政工作的重要保证。各级财政部门要高度重视加强队伍建设特别是干部队伍建设，根据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加强学习，改进工作作风，坚持依法行政、依法理财，造就一支思想过硬、作风过硬、本领过硬的好队伍。

我们的外汇政策是正确的

(2003年1月3日)

这是朱镕基同志在国家外汇管理局机关正处级以上干部和在京参加会议的各地方分局负责同志座谈会上讲话的一部分。

国家外汇管理局创造了很好的业绩。在我主持经济工作的十年里，同志们做了大量的工作，为国家作出了重大贡献，我向大家表示慰问和感谢。

在这十年里，特别是最近五年，我们整个国民经济有很大发展。外汇管理工作也走过了一段艰苦的历程。我记得，在1993年7月份任命我兼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的时候，外汇储备只有180亿美元；到1997年年底，上升到1300多亿美元；2002年年底是2864亿美元，如果把外汇收益和其他收入算上的话，是3380亿美元。同志们，这就是国家的实力呀！说老实话，没有这么大的外汇储备放在这里，我们“走出去”的人不会像现在这样被人家看得起，我们也没有能力对一些发展中国家提供那么大的援助。这种援助不但援助了别人，同时也带动了我们自己的产品出口和工程承包，拉动了国民经济发展。在国际上，如果没有外汇的话，一切免谈。所以应该看到，外汇储备的增加，是我们经济实力增强的一个重要方面。

很多人不懂得这个道理：外汇储备放在那里，并没有吃亏。它就是国家的经济实力，可以预防各种不测的情况，包括世界经济危机。

在发生不测的情况下，它可以稳定人民币的币值。它并不是像有人讲的那样，锁在保险柜里，一天一天在贬值；相反，它实际上还在增值，去年的收益率就达4.8%。我们现在国内存款的利息并没有4.8%这么高。过去历年外汇储备的收益率平均在5%左右，扣除人民币占款的利息后，我们还赚了一个利差。



2003年1月3日，朱镕基在国家外汇管理局储备管理司外汇交易大厅调查了解情况。前排右二为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郭树清；后排左二为国务院研究室副主任侯云春，左三为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

去年国家财政很困难，财政部早已做好收支平衡，快到年底时，突然蹦出来一笔收入，有407亿元，主要就是外汇储备的收益。我决定这笔钱先不要用了，把它全部拨入全国社会保障基金。这个社会保障基金，实际上等于是财政储备，它的来源包括国有企业在海外上市筹集

资金的10%、财政节余拨款、国有股减持的钱等等，现在再加上去年外汇储备的收益，一共有1300多亿元。这笔钱，我们在任何不测的时候，比如世界战争的时候、世界经济危机的时候，无论发生什么不可抗拒事件的时候，都可以用。这和银行的钱不一样，银行的钱不能随便用。随便用银行的钱，就会发生通货膨胀，我们在1993 年就有过这种痛苦的体验。可见，外汇局在外汇管理和外汇储备经营方面所做的工作，对国家、对国民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稳定是起了很大作用的。没有这笔钱，我们就没有这么高的国际声望，我们的国民经济就没有这么稳定，我们对外开放就没有基础。所以，请同志们向大家转达我代表国务院对你们工作成绩的肯定。

国家外汇管理经过了很多的改革。首先一个改革，就是1994年实行汇率并轨。那时候存在两种汇率：一个是官方汇率，5.7元人民币兑1美元；另一个是外汇调剂市场汇率。此外还有黑市汇率，大概是9元多人民币兑1美元，有的地方达到11元人民币兑1美元。当时为确定一个统一的汇率，算来算去，最后定为8.7元人民币兑1美元。汇率并轨起了很好的作用，也是我们金融改革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这样做要下很大决心，要冒风险。现在有人说我们在1994年人民币大贬值， 把人民币币值定低了。其实，他们并不了解当时存在两种汇率的情况，而且调剂市场外汇比重还是占主要的，外贸进出口都是用调剂外汇来交易，所以汇率并轨时我们不是大跃值，人民币是升值了。后来，从1美元兑8.7元人民币升到现在的1美元兑8.28元人民币。

有人说中国在输出通货紧缩，说人民币应该升值。不要听他的！不管别人怎么说，我们稳坐钓鱼台。为什么人民币要升值呢？美元是世界第一大货币，我们现在就紧跟着美元，你升我也升，你贬我也贬，我们就这么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科勒，原来是德国财政部副部长，跟我见过几次面，那时他一再向我推荐要搞一揽子货币。我们也做过一些测试方案，最后我们还是没有采纳他的意见。

我们紧盯美元的政策没有错，而且得到很大的益处。去年，美元对欧元和日元贬值，它贬人民币也贬，对我们增加出口有利，所以我们对日本和欧洲的出口增加了。现在有人预计美元还会贬值，但我认为

美元还会是强势的。当然，如果发生伊拉克战争那就很难说了。我讲这番话的意思，就是我们十年改革和发展的经验表明，增加外汇储备的政策是正确的，我们的汇率政策也是正确的，目前看不到有改变的必要。这两条今后还会继续对国民经济起作用，我们不要动摇，不 要随随便便被人家的言论所迷惑。尽管有各种各样的说法，但我们自己要站稳立场。

1996年实行的经常项目下人民币可自由兑换，也是成功的。当年外汇储备增加了300多亿美元。现在回过头来看，及时地实行经常项目可兑换，促进了外贸的发展，促进了改革开放。在外汇稍有富余的情况下，政策放宽一点是有好处的。我们增加外汇储备最多的一年是去年，有700多亿美元。所以，实现经常项目可兑换的改革是及时的，也是成功的，效果是很好的。但是对资本项目可兑换问题，我们要慎重。不要认为我们可以过早地做到资本项目可兑换，千万别被胜利冲昏头脑。

我们实行的QFII①，实际上并不是资本项目可兑换，只是朝这个方向走了一小步。我们对这件事情是非常慎重的，只批准少数几个单位试点，并限制在非常严格的条件下。但这已经引起全国人大的注意，全国人大有些同志写了报告，对此非常担心，也来找我谈了。为此，周小川②同志写了一份报告，向他们解释了这个问题。报告说明国务院实行的政策，不违反《证券法》，而且在这么严格的条件下试点，也没有什么大的风险。国务院有权拟定这个法规，也应该做这样的改革。当然，如果将这个法规最后一条中写的“几月几日开始实行”改为“试行”，影响就会好得多了，因为一说“实行”，范围就大了。我们以后在立法的时候应该注意这一点，特别是国务院在制定法规时应该慎重一点。

---

① QFII，是英文Qualified Foreign Institutional Investors的缩写，意为合格的境外机构投资者，在我国，具体是指符合有关规定的条件、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可在中国证券市场上投资，并取得国家外汇管理局额度批准的境外基金管理机构、保险公司、证券公

司、商业银行，以及其他资产管理机构。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与中国人民银行于2002年11月联合发布《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境内证券投资管理暂行办法》，规定从2002年12月1日起，合格的境外机构投资者可进入中国证券市场进行投资。

② 周小川，当时任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主席。

做事情一定要考虑中国国情，中国的情况非常复杂，完全套用外国的做法是不行的。美国发生那么多丑闻，几大会计公司，包括安达信、毕马威等，都有丑闻，但他们不怕，相信他们的制度能克服这些问题。不能说这些丑闻对美国没有影响，会影响到外国的投资，但不会很大。中国不一样，中国还没有形成完备的法制，社会上又非常缺乏诚信。没有“诚信”二字，何以立国呀？整顿市场经济秩序应该是我们一个永恒的主题。我想，关于这个主题下届政府还要一直搞下去。在金融界整顿市场秩序也很重要，现在诈骗案有多少呀！所以，我们在开放证券、开放外汇、开放银行、开放保险的过程中，都要采取十分慎重的态度。简单地把国外的东西搬到中国来可不行，条件不一样，人也不一样。现在搞欺骗的人太多，我们每进行一次改革都要考虑中国的实际情况，但是改革不能停顿，还是要锐意改革。

口岸电子执法系统，最早是海关和外汇局联网的，当时与外经贸部还没有联起来，银行也联得不够，现在应该说都覆盖了吧。我是非常支持搞这个系统的。我们搞信息化最早产生效果的，就是这个口岸电子执法系统。在打击走私、出口骗税骗汇等方面，外汇局跟海关总署、外经贸部、税务总局配合得很好。打击走私是从1998年开始的，1999年大见成效。打击出口骗税是2000年下半年从广东开始试点的。如果没有打击走私、打击出口骗税骗汇工作的开展，我们的国际收支不可能发生这么大的转变，不可能积累这么多的外汇储备。这当中，信息化起了很大的作用。

回顾一下我们走过的历程，正确的我们一定要坚持，但缺点也要不断改正。改革开放一定要搞，但一定要慎重。大好形势来之不易，要搞好，艰苦备尝，要搞坏，一夕之间，请同志们务必注意。

全面理解和贯彻党的宗教政策

(2003年1月10日)

这是朱镕基同志在全国宗教厅局长会议暨宗教工作理论务虚会上的讲话。

今天，我来和大家探讨宗教工作的方针政策。说老实话，你们比我内行。那么讲什么呢？我想，讲一点自己的体会吧，也许可以对同志们正在开的宗教工作理论务虚会提供一些参考。

首先，我们应该坚信我们党关于宗教工作的方针政策是完全正确的。我们党关于宗教工作的政策，是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学说，对宗教工作制定的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最全面、正确的政策。这是经过实践检验的，我们国家五十多年的实践证明了这个政策是完全正确的。

看一看全世界的情况，宗教方面的形势非常紧张。巴以冲突是国际形势的一个热点，既有民族的矛盾，也有宗教的矛盾，各种矛盾集中在一起。印巴局势也是民族和宗教的矛盾交织在一起，双方剑拔弩张。在俄罗斯，车臣问题始终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最近发生的人质事件、车臣政府大楼爆炸事件，都说明它也同时反映了宗教矛盾和民族矛盾。即使在发达国家，像英国和北爱尔兰之间，也是两种宗教之间的斗争，看样子它们也找不出很好的办法，尽管它们的经济发展水平都比较高，但也不能解决好这个问题。



2002年7月31日，朱镕基在北京中南海接见第十一世班禅额尔德尼·确吉杰布。

我们国家有56个民族，宗教派别和信教的人也很多。在民族、宗教问题上，我们这几十年应该说处理得相当好，在全世界再也找不出有这么好的，至今没有发生过什么大的冲突。小的问题总是有的，但是没有发生过什么大的事情。当然，我们的工作经验也是在不断地总结、概括、提高、发展。总而言之，实践证明我们党的宗教政策是正确的。我们应该坚信不移，继续认真加以贯彻、实施。

第二，关于宗教工作基本方针的四句话。

第一句："全面贯彻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我们在贯彻宗教工作方针政策的时候，总得有一个主要的思想吧。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这一句，这是工作中应该紧紧把握住的。我们党和政府的有些部门特别是基层组织，在某些地方、某些方面，存在对宗教信仰干预过度的情况。宗教本身是一个历史的产物，每一种宗教、每一个民族都创造了自己的文化，如果过多地去干预，就不但会激化宗教矛盾、民族矛盾，而且会激化人民内部的其他矛盾。某些搞宗教工作的同志，往往过于着急，利用手中的权力来干预宗教信仰自由，而且往往把两种不同性质的矛盾混淆起来，这是不对的。新疆存在"东突"恐怖主义的思想和组织，但不是新疆所有的少数民族都是这样的，不能把它们混在一起。极少数人信仰"东突"恐怖主义，甚至在外国受到雇佣，加以训练，被派到我们国家里进行破坏、分裂活动，但这些人是极少数，不能因此影响新疆群众对宗教信仰的自由。我始终认为，这一条是最重要的。

第二句："依法管理宗教事务"。我们在强调首先要把握住第一条的同时，也不能忽视另外一条，就是依法管理宗教事务。宗教信仰是精神世界的问题，不能干涉，但是信教群众的行为不能违反法律，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我们掌握的分寸就在这个地方。精神世界的问题是没法干预的，但是如果作出违法的行为，那就必须依法干预。

依法管理要真正依法。国务院的《宗教事务管理条例》还没有正式颁布，这说明我们宗教工作的法律、法规体系是不完备的。我觉得，还是有必要完善国务院的法规，国务院的法规也是国家法律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没有法规，管理就有随意性，这是弊多利少的。尽管看起来伸缩性很大、很方便，但是这对于建成一个社会主义的法治国家是不利的。这个法规还是要逐步完善。

第三句："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这里叫"引导"，而且是"积极引导"，就是不能采用行政的手段。行政手段、法律手段只是在第二条"依法管理宗教事务"中适用。如果信教群众违反了国家的法律，影响了社会的稳定、国家的安全，造成了人民内部的不团结，那就要按照法律规定来管理了。"引导"就是从教育、文化、宣传等等方面

来引导，而不能采取行政命令的手段。做到这一点就是要有个度，不能够过分，过分了就适应不了。社会主义社会有一个逐步发展的过程，如果你自己都没搞清楚，要把人家“引导”到什么地方去？你怎么引导？在这个方面，就是要宽松一点，比前面那个“依法管理”要宽松一点。他没搞破坏，也没搞特务活动，没分裂民族、分裂社会、分裂国家，你就不能动不动给他扣上一个大帽子。

第四句：“坚持独立自主自办的原则”。这是我们的特色。我们对基督教事务有一套“三自”方针，有个历史的形成过程。坚持这“三自”，是非常有必要的。特别是随着对外开放的扩大，各种渠道无孔不入，外国的宗教也总是想来干预。这方面我们要做工作。

第三，希望各级党组织、各级政府机关，要进一步重视宗教工作，加强对宗教工作的支持。

我在前面讲了宗教工作的重要性，它并不是只在中国重要，在全世界也都很重要；不但在国内有斗争，在国际上也有更大的斗争，这种斗争与国内是息息相关的。

中央是非常重视宗教工作的。我们在思想上是重视的，但工作做得不够，需要加强。因此，也希望各级党委和政府的主要负责同志以及主管这方面工作的负责同志，进一步重视宗教工作，重视民族工作，把这方面的工作做好。这对维护民族的团结、人民内部的团结、社会的稳定、政治的稳定，保持经济的持续发展，都是非常重要的。

审计署要成为廉政署、法治署、正气署

(2003年1月13日)

这是朱镕基同志在审计署机关和派出机构副司级以上干部座谈会上讲话的一部分。

审计是国民经济运行的卫士，是国民大众的眼睛。审计署是国务院的重要执法机关，是政府监管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很多事情我们看不见，审计署帮我们看清了，一看往往是大吃一惊，骇人听闻。所以，审计署的工作很重要。在审计署工作，工资不高，住房条件也很困难。这五年来，我一直致力于提高公务员的工资。但目前社会分配是很不均衡的，而且收入悬殊还在继续扩大。公务员的收入虽然比一些困难群众高一些，但现在是一个开放的社会，有很多单位在挖国家机关的人才，所以，机关要留住人才，国家必须提高公务员的工资，这对于全体人民也是有利的。另一方面，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也要认识到，我们是国家工作人员，肩负着很重要的使命，要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你们查出这么多大案要案，几千亿元的问题能发现出来，几百亿元资金能收缴国库，这是多么大的贡献呀！人生如斯，足矣！越是重要的岗位，越是要意识到我们对国家所应该作的贡献。这几年，审计署确实做了好多使国务院感到非常满意的事情，这也是人民公认的。



2003年1月13日，朱镕基在审计署考察工作。左为审计署计算机中心主任王智玉。

第一，坚持以真实性审计为基础，在财经领域打假治乱，为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我们现在搞市场经济，放开搞活，如果没有“游戏规则”，没有监管，听任一些人去弄虚作假、欺瞒哄骗，我想我们的市场经济可能比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还要混乱、弊端还要大。我有时候不愿看电视新闻节目，特别是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节目揭露的问题，看了就生气，但又不得不看。这几年来, 我最生

气的就是社会上缺乏诚信，有些人欺蒙拐骗，干那种没良心的事情。特别是在食品、卫生和医药方面，有的人明明知道那是害人的，但还是要去做。我一看就非常动感情，必定给有关部门领导同志打电话过问。我也知道这是杯水车薪，这种事情其实多得不得了，但还必须这么做，我即使在位一个月也要管到底。必须树立和打造一个诚信社会，“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①。如果整个社会没有诚信，互相都在欺骗，多么可怕！这些事情在《焦点访谈》一放完，有关地方和部门很快就组织专人去检查了。过去你们干什么去了？明明就在你们的眼皮底下，只要你们关心一下，天天都可以发现这种事情，如果及时进行治理整顿，社会就不会变成这样子嘛！可惜我们有些政府官员是向上下工夫多，真正为老百姓办事少，或者觉得这种事多得不得了，不愿意去得罪人。因此，你们审计部门肩负着重要的责任。审计署过去做得很好，在打假治乱方面，不怕得罪人，敢于坚持原则。今后要继续坚持这种精神，不要看到别人耍滑头，就不敢去碰硬，遇到事情往后退，不愿意出头。我们要想到，如果都这样下去，中华民族还有什么希望呢？审计人员一定要坚持自己做人的原则。这几年，我明明知道遍地都是假账，但我还是要到处宣传不做假账。你们在2000年对1290户企业会计账目、凭证的真实性进行了一次审计，结果发现有68%的企业会计报表是假的。我现在对那些统计数字，特别是国民经济发展速度指标，都不知道是真是假。国家财政没有收到钱，我就不敢相信那些数字是真的。有的地方经济发展速度达到百分之十几，“政绩”大得很，对此我只是听着，也不否定。我关键是看你给国家交了多少税，这才是主要的。如果搞了半天，经济发展“轰轰烈烈”，但财政很困难，还得向中央要钱，这算什么政绩呀！因此，首先必须充分肯定审计署在打假治乱、打造诚信社会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很好的成绩。

---

① 见《论语“为政》。原文是：“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輗，小车无軏，其何以行之哉？”

第二，坚持突出审计重点，注重揭露和查处大案要案，在反腐败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全面审计主要是为了发现问题，但对一些重点问题还要一查到底，必须有结果。刚才李金华①同志汇报，这几年审计署一共审计了 22项重点专项资金，有5项是多次审计，17项是一次审计。其中粮食审计是一次大规模审计，查出粮食系统许多重大问题。通过检查3万多户粮食企业和2499个农业发展银行分支机构，核减了非正常亏损挂账559亿元，查出粮食等部门挤占、挪用贷款642亿元，为解决粮食企业财务挂账和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提供了重要依据。审计署还检查了国债项目、扶贫项目等，发现了大量挤占、挪用和贪污、浪费的问题。这些年，审计发现的案件有6000多件，移交司法机关后，处理了一大批人，这是个了不起的贡献。当然，这也是中央正确领导和大力支持的结果。凡是审计署报送给我们的《审计要情》，我都必有批示，你们建议由谁来牵头处理，我就批给谁处理。中央政治局常委同志都非常重视，也作了很具体的批示，件件都是落实的。我希望你们要有专人负责，这些问题是不是真正处理了，一定要跟踪到底，绝不能让犯罪分子逍遥法外，不能让他们漏网。公安部门配合得很好，我们只要批了，公安部门都非常积极地配合，努力把犯罪分子抓回来，有的人是从国外抓回来的。所以，你们可以向全体审计人员传达：对查处大案要案工作，中央非常重视，全力支持。你们对发现的问题一定要跟踪到底，如果对方有后台查不下去，就要向我们反映。现在看来，审计署反映的问题基本上是“百发百中”。你们确实做了大量的工作，用了很多心思，为人民作出了贡献。中央是肯定的，老百姓也是肯定的，这就是为老百姓办实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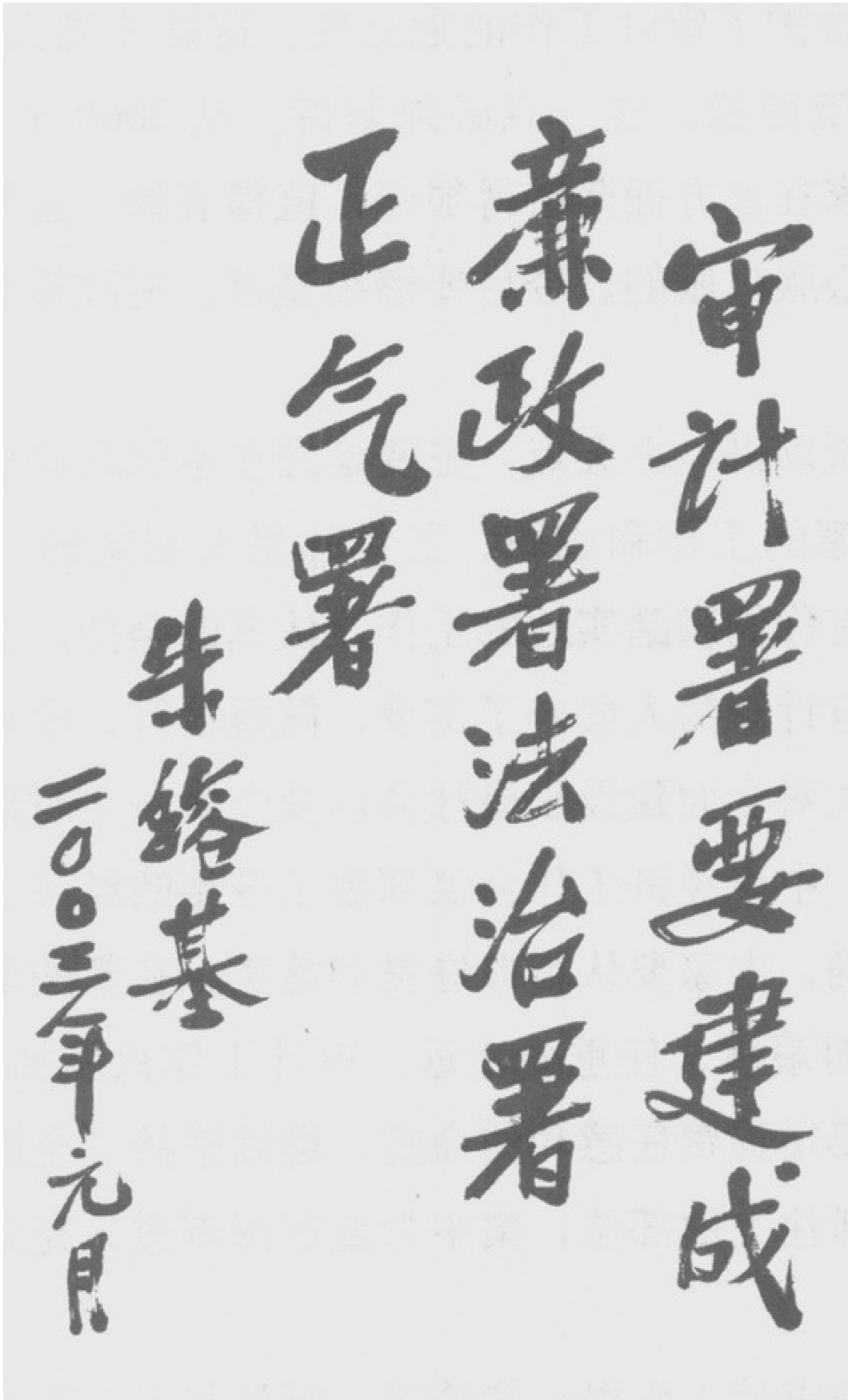
---

① 李金华，当时任审计署审计长。

第三，围绕国家宏观调控目标，切实加强对财政专项资金和预算执行的审计，有力地推动了政府各项改革措施的顺利实施。特别是对财政专项资金和预算执行的审计，这很重要，查出各部门的不少问题。本届政府组成以来，各级审计机关每年组织开展本级预算执行审计，共查出违规问题金额2007亿元，审计处理后，已上缴财政392亿元。预

算执行审计，已经成为各级政府和人大加强预算管理与监督的重要依据。1998年以来，审计机关组织对银行、证券等金融机构的审计，查出违规经营和损失浪费等违法违规问题金额616亿元。审计工作在保障财政资金安全有效运行、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中发挥了 积极作用。

现在国家机关一个很大的弱点，就是权力得不到制约。这是我国政治体制上的一个弱点。本届政府一再强调政府职能的转变，政府的职责主要就是监督管理，是当“裁判员”，不应该当“运动员”，应该严格地、公正地进行监管，维护这个社会的秩序，包括市场经济秩序。说老实话，现在《焦点访谈》节目反映的有些问题可怕得很，有的私人企业什么安全设备也没有，什么安全条件也没有，随便就可以到工商局领执照开业。大家看了吧，辣椒是用硫黄熏出来的，竹笋是用双氧水泡出来的，根本不能吃。这些事正是政府要管的。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工商行政管理总局都是国务院直属的正部级单位，还有卫生部和食品卫生监督、医药卫生监督部门，我对它们施加压力也够多了，批评得也够厉害了，我看它们也是有心无力。到地方上，它们就管不了了。虽然有的部门管下级局长的任命，但地方政府的权力太大。有些部门的权力也比较大，掌管着人、财、物，钱和项目都在它们手里，但审计署也敢碰。审计署每年向全国人大的报告，有的部门会有不同意见，最后我还是支持李金华。我认为，向全国人大暴露国务院的问题没关系，是我领导得不好，工作做得不好，主要不是部门的责任，应该向全国人大报告。对于审计署这方面的工作成绩，应该充分肯定。



图为朱镕基于2003年1月13日在审计署考察工作时的题词。

第四，积极探索党政领导干部和国有企业领导人员的经济责任审计，有效地促进了干部的管理和监督。这些年，通过开展经济责任审计主要是离任审计，为组织部门、干部管理部门提供了很好的考核依据。近几年来，全国共审计党政领导干部11万多人、国有企业领导人近2万人，有4700多人受到党纪、政纪处分和追究刑事责任，对这个工作成绩应该充分肯定。在这方面，审计署直接得罪了一些人，但为人民办了好事，为维护国家利益作了贡献，应该继续坚持和发扬。

第五，不断完善审计制度，促进了审计质量的提高。在这方面，审计署制定了不少制度，完善了审计法规体系。特别是经国务院批准，作出了“八不准”规定。这是1999年审计署汇报工作时提出来的。过去，审计人员的经费要由被审计单位来出。“吃人家的嘴短，拿人家的手软”，作为国家执法人员，代表国家来进行审计，还要吃人家的、住人家的，这怎么行呢？所以，国务院决定由财政拿钱，让审计署实行审计经费自理，严格执行“八不准”，切断与被审计单位的经济联系，维护了审计工作的独立性。这样才能真正地查出问题，才能行得正、坐得稳。这一点必须坚持。从2000年实行“八不准”规定以来，大家在这方面坚持得很好，值得表扬。这样做出来的审计工作才是令人心服口服的。今后要继续坚持，财政等有关部门要给予大力的支持。

我今天之所以讲以上五点，主要是想在本届政府任期行将结束的时候，肯定大家的工作和成绩。工作都是大家做的，我们提了些意见，但如果没有你们脚踏实地的工作、认真的坚持，什么指示都没有用。我认为，审计署为人民办了实事，做得很好，应该予以表扬。

党的十六大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以及今后一个时期的各项任务提出了明确要求，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部署了今年的经济工作，目标很具体，政策很明确，大家要认真抓好贯彻落实。在新的形势下，审计机关的职责光荣而艰巨，任重而道远，审计工作只能加强，不能削弱。审计机关一定要增强责任感和使命感，继续坚持“全面审计、突出重点”的方针，抓住关键部位，集中力量审深审透，充分发挥审计监督作用。

我对今后的审计工作提一些希望，概括起来，就是希望审计署成为“廉政署”、“法治署”、“正气署”。我说审计署要成为“廉政署”，是因为审计署是国务院抓廉政工作的一个重要部门，你们的工作能够促进国务院实现廉政目标。我曾经对国务院工作要求提了八个字：廉洁、勤政、务实、高效。首先是廉洁。只有做到廉洁，政府才真正是代表人民的政府，才能真正符合“三个代表”的要求。其次是勤政。再次是务实。政府所做的事情必须是务实的，不搞什么“形象工程”，不搞那些形式主义的东西，每一件事情都要为了老百姓，对老百姓有利。最后是高效。政府做事，效率要高，不要官僚主义，要做得好一点、快一点。在廉政这个最重要的目标上，审计署负有重要的责任。

我说审计署要成为“法治署”，是因为我国的法制必须完善，个人的权力、部门的权力必须受到制约，国有企业领导人的权力也必须受到制约。审计署是帮助国务院实现依法治国的部门，依法进行检查监督，在这方面负有非常重要的责任，有着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

我说审计署要成为“正气署”，是因为审计工作的阻力很大，各方面的压力很大，做好审计工作必须讲正气。孟子讲：“我善养吾浩然之气。”①文天祥讲：“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下则为河岳，上则为日星。”②做审计工作，就是要有一种坚持原则、无私无畏的立场和精神，审计署一定要树立这样一种正气。邪不压正、邪不胜正，身正不怕影斜。只要自己行得正、立得直，什么问题都能查出来，党中央、国务院就会支持你，就能查出问题、以儆效尤，国家就有望。

---

① 见《孟子“公孙丑》。原文是：“我知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

② 语出自南宋文天祥所作《正气歌》。

值得纪念的五年

(2003年1月27日)

2003年1月27日，朱镕基同志主持召开国务院第九次全体会议。国务院全体会议组成人员出席了会议，有关部门、单位负责同志列席了会议。这是朱镕基同志在会上讲话的一部分。

今天的会议是本届政府最后一次全体会议。过去的五年，是新中国发展史上一个相当特殊的阶段。一是正面临着世界经济不景气，亚洲金融危机对亚洲许多国家都造成了灾难性的影响；二是面临国内大量困难，包括1998年的特大洪水、1999年的相当大的洪水，遭受了自然灾害；又正赶上产业结构调整的关键时期，国内市场不景气、生产萎缩，造成1997年1000万职工下岗失业。回忆这五年，能够走过来，确实不易！没有想到我们不但克服了这些困难，而且还利用这个机遇，极大地发展了自己。虽然不能说这是历史上发展最快的时期，因为我们过去百分之十几的经济增长速度都有过，但确实是历史上经济效益最好的时期、国民经济持续健康稳定发展的时期。我们可以用一些数字来说明这个问题。比如在基础设施建设上，这五年的投资是过去几十年的两倍甚至三倍。这是一个多么大的建设规模啊，不但改变了自然和社会的面貌，也改变了人民生活的状况。我想，这是由于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第三代领导集体高瞻远瞩，统揽全局，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同时，也由于国务院坚决贯彻党中央的指示，具体落实政策，克服了重重阻力，一抓到底，政策到位，项目到位，资金到位，各种监督到位，保证了建设的顺利进行。



2003年1月27日，朱镕基主持召开国务院第九次全体会议。右一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吴邦国，右二为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左一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温家宝，左二为国务院副总理钱其琛。

第一，如果我们不是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正确地实施和加强宏观调控，是不可能取得今天这个成果的。党中央决定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以后，我们集中力量发展基础设施建设，整个面貌就改观了。我们并不是只集中于交通运输建设，在水利建设方面和其他方面也下了很大的工夫和力量，这是长远的投资。这些都发挥了很大的效果，不但拉动了生产的发展，把原来萎缩的国内市场带动起来，而且支持了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与此同时，我们还实行了稳健的货币政

策，严格地控制信贷，主要是保证企业的流动资金和国债项目的配套资金，没有造成全面的过热。这才使我们有可能在这五年里面，发了6600亿元国债，也贷出了两三万亿元的银行贷款，使财政收入每年都增加，创造了历史最高纪录，过去一年增加财政收入几百亿元，而这几年每年增加1000亿元到2000亿元。中央把这些大幅度增加的财政收入，大量地转移支付到中西部地区去，中西部地区的农村义务教育和基础设施建设才有今天这个局面。在这五年里，曾三次增加机关、事业单位人员工资，中西部地区增加工资都是中央拿的钱。这样有利于逐步缩小东西部地区的差别，至少使这种差别没有急剧地加大。

第二，如果我们不是始终坚持以农业为基础，坚定不移、扎扎实实地解决“三农”问题，也不可能有今天这样好的局面。这五年，我们在农村、农业、农民问题上下了很大的工夫，特别是着眼于提高农民的收入。为了促进农村的义务教育，中央财政帮助地方给教师发工资、搞教室危房改造。为了解决农村合作基金会、城乡信用社的问题，我们发放再贷款2000亿元，主要是还给农民。为了减轻农民的负担，在农村搞“费改税”，中央一年要拿出几百亿元，去年拿了250亿元，今年拿了300亿元，今后还会拿更多。帮助一亿多农民到城市里来打工，使农民增加了一大笔收入。我们要始终牢记这一点：农业是基础，要扎扎实实地去提高农民的收入。这一点，今后绝对不能放松。我们要时时刻刻关心农民，不要轻视农民，不要以为现在形势好了，就应该去搞汽车、搞房地产、搞什么主题公园，把农民丢在一边了。国民经济缺了农业这条腿是绝对不能前进的。社会购买力主要是在农民，农民的购买力不提高，国民经济怎么能够持续发展?

第三，如果我们不是始终坚持改革开放的方针，敢于跨越，进出口就不会大幅度地增加。没有进出口大幅度的增长、外汇储备大幅度的增加、投资环境大大的改善、外国直接投资大幅度的增加，是不会有今天这个局面的。我们原来曾经预计亚洲金融危机以后，有两年或三年外贸出口可能会出现负增长，但由于实行了一系列的政策措施，而且一抓到底，结果外贸出口不但没有出现负增长，反而是大幅度地增长。特别是去年，全世界的出口停滞不前，有的国家甚至萎缩，我们

却大幅度地增加。另外，因为我们坚决打击走私，打击出口骗税，海关税收大幅度增加。对走私、骗税、骗汇的人不能手软，这方面还要严抓。如果没有这几年的打私行动，外贸怎么能出现今天的局面？不可能的！我们也确实没有想到外商直接投资能增长这么快，去年外资实际到位528亿美元，位列全世界第一，我们讲的是外商直接投资。外商直接投资促进了国有企业的改革，改进了企业的经营机制。这些都是我们过去不能想象的。

第四，如果我们不是始终坚持科教兴国的方针，把大量的资金投入教育领域，我们的教育和科技事业的发展也不会有今天的局面。首先是农村义务教育事业实现了根本性的转变。过去是欠教师的工资，几个月甚至两三年都没有发过；现在工资能按时发了，在农村谁都想去当教师了。我们把工资收到县里来发，等于中央财政给了保证。这件事情有极大的意义，因为一个民族没有教育水平的提高是没有前途的。我想，这五年义务教育的发展，是历史上所没有的，包括高中的扩招、职业教育的发展等等，极大地加强了我们民族的实力。这不仅是一个经济的实力，而且是一个可持续发展的战略资源。

还有一条，我们如果不是始终坚持以社会稳定作为一个前提，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我们也不可能有今天这样好的局面。从1997年以来，我们在建立、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和实施再就业工程方面做了大量深入细致的工作，出了不少政策，中央财政为此花了很多钱，这些钱都是从中央财政预算里拿的。中西部地区都要靠中央补助。特别是再就业服务中心的建立，中央财政拿60%，地方财政拿10%到20%，基本上都是财政拿的钱，还有一部分是从社会保障基金中的失业保险里拿的。没有这个，社会怎么稳定？人心哪能有现在这样安定？这是一点也不能放松的，特别是去年我们出台的新的再就业政策，一定要继续把它贯彻到底。绝不能忽视这一点，忽视这一点就到处出事，怎么搞建设？辽宁省作为全国的试点，基本上已经获得了成功。其他省区市都可以参考它的经验，把社会保障体系搞得越来越完善。这是一个安定社会、安定人心的百年大计。

所有这些成绩的取得，都是党中央高瞻远瞩、指挥若定的结果，同时也与国务院各部门包括我们今天全体会议的成员、全体工作人员的努力分不开。过去的五年对我来讲，是我生命历程中最值得纪念的五年，因为我有可能给老百姓更好地办一点实事。我也相信对在座的诸位来讲，过去的五年也是你们生命历程中值得纪念的五年。水利部的同志们，你们回忆一下，这五年间你们干了多少事情，过去你们什么时候能够干这么多事情！大江大河堤防，全部整修达标了，安然度汛。去年我的眼睛已经很不好，医生要我动手术，但我没有动，就是一定要到长江、黄河、松花江、嫩江沿线走一遍。在烈日炎炎之下，凡是我在1998年、1999年曾经去过的地方，我去年都去走了一遍。我不去看，我不放心，如果又是“豆腐渣工程”怎么办？如果在我卸任前夕，来一次大洪水把大堤冲垮了，我怎么向老百姓交代？看了以后，我放心了。当然，我只能是重点地看一看，但是我从这个对比看出钱没白花。这些堤防的工程质量不是一点没有问题，国债项目的资金不是没有被挪用过，但总体来说这个钱花的值得，成效是看得见的。在长江、黄河、松花江、嫩杠流域生活着这么多的人民，要靠这些江河才能够滋养生息。要是不能保证防汛安全，让人民群众每年有几个月的时间都花在修堤上，他们还怎么发展生产？现在可以说彻底地改变了面貌。

所以，我们大家都应该永远不会忘记过去五年一起工作和战斗过的日子。我特别感到我们国务院全体成员，这五年工作在一起，风雨同舟，和衷共济，我们的关系建立在互相信任的基础上，是一种相互默契。我确实感到我们国务院每一个成员，都在尽心尽力地工作，尽管不是每个人的工作都那么出色，但是我知道每个人都尽了最大的努力，都无愧于这五年。我衷心感谢在座的各位，感谢国务院的全体同志对工作的支持、对我本人的支持。没有这种相互的信任、互相的默契，过去的五年里我们不可能作出这么大的成绩。我只要说句话、打个电话，大家就知道是什么意思，不用我说太多的话，大家就都一起去干。应该说，这是我人生历程中生活最愉快的五年，也是体会到自己还有一点价值的五年。这个价值就是，我跟大家一起，确实能为老

百姓办一点实事。当然，在过去的五年里，我对同志们有过很多批评，也许有些同志感到跟我在一起不太自在。不管我批评得对或者批评得不对，我都请同志们谅解，请同志们相信我是出于公心。大家还了解我这个人吧，不搞阴谋，没有私怨。在这最后一次全体会议上，我一方面对同志们的努力、作出的贡献表示感谢，向同志们对我本人的支持表示感谢；另一方面，也请求同志们对我过去五年工作中的缺点、失误或其他方面的问题予以谅解。

对今后的工作，党的十六大已经确定了方针，中央的各次会议已经做出了部署，我们要坚决执行。因为本届政府就要到期了，我现在感到有点儿担心的就是一件事。我想对那些留下来继续工作的同志们说一说，提醒你们注意，我现在最担心的是经济过热，我已经担心一年了。我不会公开地讲这个问题，我只在领导层来讲这个问题，我就是担心经济过热。现在有很多的苗头，如果不加以注意的话，经济状况就会一发不可收拾。我搞了50多年的经济工作，我能深刻体会到我国的这种“综合征”，日子稍微刚好过一点，就搞浮夸的作风、盲目的自满、莫名其妙的折腾、无知的决策。我讲过房地产的过热，但是我发现绝大多数同志都还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总是首先来一句话：“总体上都是非常好的”，然后说那么一点点的问题。绝对不是这样！这种过热是不得了的，1993年就是房地产的过热，结果现在的海南岛还是“遍体鳞伤”。我看外国的报刊，都在讲中国的泡沫经济已经形成，房地产过热，风险太大。我们银行的同志一定要意识到这一点，因为这些钱都是银行的。我再一次向银行的同志忠告：你们也许这两年就升官了，你们也许就不会再干银行工作了，以为出了问题可以让后来人收拾。本届政府的金融体制改革还没有完成，还没有建立健全机制；但是在没有建立这个机制之前，我们共产党人已经搞了几十年经济了，还是应该负责任的吧。你们别把这个包袱留给后人，盲目地发展。我非常担心的就是搞“城镇化”。现在“城镇化”已经跟盖房子连在一起了，用很便宜的价格把农民的地给剥夺了，让外国人或房地产商搬进来，又不很好地安置农民，这种搞法是很危险的。这跟中央的政策精神根本不符合，我们曾经多次讨论过，就怕这个东西。中央政策

研究室有一份简报《造镇运动劳民伤财》，我建议大家看一看。简报讲的是河南洛阳农村地区，从2001年开始“造镇”，遍地开花，搞了两年，既没有统一的规划，也没有资金的来源，反正是大搞房地产、圈地。没钱怎么办呢？本来是单层的房子，在靠街的一边盖一道墙，造成一个看起来好像是两层、三层楼的样子。这种做法我们过去已经有了，不是他们的创造发明，都是假的呀！我不知道他们的钱从哪儿来的，乡政府、县政府哪有这个钱？要不就是银行的钱，要不就是挪用了教育资金。我看中央政策研究室的这个简报，问题比国务院的简报揭露得要尖锐。1993年是在大城市，在海南、北海这些地方搞，将来要是全面开花，都来“造镇”，形成运动，那怎么得了！我们银行的同志一定要警惕。你们老说在大好形势下，不良贷款在下降，我就是不相信。

还有，现在搞主题公园成风。在国外都没这么搞的，迪斯尼公园，美国有两个、法国有一个、日本有一个。现在主题公园在中国很多地方全冒出来了，外国人自己不出钱，你的地卖给人家很便宜，破坏了国家的土地资源，另外还用你的钱。搞这个东西干什么呀？！现在很多地方的农民连饭都没的吃，还搞什么主题公园，谁去看呀？上海搞迪斯尼公园没有搞成，于是要搞个主题公园。天津要搞主题公园，现在北京又要搞主题公园，两个主题公园挤在一起；美国两个迪斯尼公园还隔得很远呢，一个在洛杉矶，另一个在佛罗里达。我们挤这么近干什么？我是坚决要收紧。最近国务院下了一个通知，不是说在限额以上不允许搞，而是一律都要经国务院批准才能搞。四川恐龙公园恐怕没有多少人知道吧，林业系统搞的，占地九平方公里，跟澳大利亚一个银行合作，就为了盖一座五星级宾馆。

现在搞汽车也成风。去年汽车降价，大量汽车进口造成了这种形势，银行也给贷款。我想，小汽车不是我们发展的方向，不要造成一种狂热，年轻人都以拥有自己的小汽车为荣。我们早就讲过，中国不是这样的国家，这个观点我到现在都没有变，应该以发展公共交通为主。现在北京交通拥堵得一塌糊涂，2008年怎么开奥运会啊！各种基础设施、交通设施、管理设施等管理的水平都不适应。上海的汽车数

量现在比北京少一半，还到处都塞车，2010年怎么开世博会呀！还有车位，也是个大问题。发展公共交通这条方针一点不能动摇。没有那么多石油啊！同志们，去年进口7000万吨原油，还不算成品油走私，某些省走私还相当厉害，现在不知道进口了多少油了，我们自己只生产1.6亿吨，而消费达到2.6亿吨，这能维持下去吗？好在我们现在有外汇可以进口，将来怎么办啊？没有油，哪能这么去发展小汽车呢？公共交通始终是我们的一个弱点，一直没有发展好。现在我每天就担心两件事：一件事是煤矿不断爆炸、死人；另一件就是交通事故多，不断地死人。今天早上看到一份材料，广西百色地区一辆农用车超载，拉了30多个人，一翻车17个人死了。农用车是不合格的汽车，但是遍地开花，这是非常可怕的。到处死人，天天死人，我作为总理天天看到这个东西，自己又拿不出办法来，你们说我多揪心！在发展公共交通上，我们还有多少事情要做啊！要把公共汽车、长途汽车制造业好好地发展起来，把那些农用车、不合格汽车都淘汰掉，农用车不许上路，公安交通管理要严格，不要动不动以影响农业为借口。人命关天的大事，不去把精力放在这个方面，而去搞什么小汽车，这一旦成风可不得了！不是说不要发展小汽车，而是不要把目标定得那么高，不能一哄而起都去搞小汽车。小汽车一搞上去，需要一系列的原材料的供应都搞上去，将来一垮下来又全部都垮。搞什么东西一哄而起都是不行的。

总之，希望留在岗位上的同志们，一定要注意不要被大好形势冲昏脑袋。这五年，形势的确很好，我们自己都没有想到会这么好，但是绝不可以盲目地乐观，然后就浮夸，就折腾。我们历史上有过这种教训，形势发展都是有周期的。我们不要走历史的老路，这就是我留给同志们的一句话。只要在这个问题上不出毛病，其他问题上就好办了，就不会形成一个全国性的问题、不可收拾的问题。对经济过热一定要从严控制，国务院就是要搞得严一点。

最后一点，国务院各部门负责同志在贯彻廉洁、勤政、务实、高效方面，是比较好的。我以自己拥有这么一个团队感到自豪。不是说没有问题，但问题还是比较少的，大家都是兢兢业业地在工作，今后务

必也要这样。胡锦涛同志讲了“两个务必”①，还是要更多地保持与人民群众的紧密联系，倾听他们的呼声，接受他们的投诉，为他们撑腰，帮他们说话，解决他们的困难。我这五年或者说我过去十年，主持经济工作，一直是想这么做，我也尽了我的最大努力。如果我们只听下面报喜不报忧，冲昏自己的头脑，听不到人民群众的呼声，绝对搞不好我们的工作，连判断都是错误的。毕竟还有一个《焦点访谈》节目，各省区市也还有一些来信来函反映问题。我过去几年里每晚是一定要看《焦点访谈》，我觉得我作为总理，如果不去关心人民的疾苦，我当什么总理！我看完后必定打电话，不是打给部长就是打给书记。尽管我知道打电话只是针对几个农民或者几个老百姓的问题，但是我能为这几个农民、几个老百姓申冤，能够解决问题，我觉得好受一些，大事办不了，办了一点小事也好。有时也想不打电话了，反正这种事情多得很；但转过念来一想，我还是要打。我希望同志们今后还像我在位的时候一样，重视来自人民群众直接的投诉、直接的呼声，帮他们解决问题，哪怕只是一个人的投诉、一封人民来信，哪怕就是为了这一个人。我不知道批了多少人民来信，这总算贯彻了我们国务院廉洁、勤政、务实、高效，为老百姓办实事这个宗旨。希望同志们能够继续发扬这种精神，绝对不要听信报喜不报忧的、吹捧的、浮夸的、说大话的那一套，还是要自己眼见为实，尽管现在很难看到真实情况，但是只要坚持还是会知道的，这就是我最后提的希望。我现在不好说我们要站好最后一班岗，对我来说是最后一班岗，不过距离换届还有一个半月左右，但对绝大多数同志来说，你们都不是站好最后一班岗，还要继续在岗位上工作。毕竟是本届政府告一段落了，我们还是要把本届政府的工作善始善终，完美地画上一个句号。只要我们能够办的事情，尽可能在本届政府任期里面办好、办完。全国“两会”即将到来，希望同志们认真参加会议，虚心听取意见，更地修改我们的《政府工作报告》，改进我们自己的不足，这就是我对同志们的希望。

---

① “两个务必”，指2002年12月，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河北省西柏坡学习考察时，要求全党重温毛泽东同志在1949年3月召开的党的七

届二中全会上的重要讲话，牢记毛泽东同志当年倡导的“两个务必”，即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大力发展公共交通

(2003年2月1日)

2003年2月1日，朱镕基同志到北京市看望工作在一线的公安民警和公交职工。这是朱婊基同志在北京市公共交通总公司44路公共汽车北官厅站看望公交职工时的讲话。

今天是农历大年初一，我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向大家拜年，祝大家春节好。我也通过你们，向北京市交通运输系统、公共汽车行业、出租汽车行业全体同志，表示我们新年的最良好的祝愿。你们辛苦了！我们在家里过节，你们在这里执勤、值班，你们的辛苦，换来的是全市人民的幸福、快乐、团聚，安安稳稳地过新年。你们的工作确实很有意义，我也代表我的全家向你们表示感谢！

同志们，我当过市长，我最重视公共交通运输，我到上海去首先解决的就是交通问题。当时，上海堵车是不得了啊。我就提出一个目标：将来从上海任何一个地方到另外一个地方，不能超过一个小时。现在这个目标可能快要实现了，但是上海堵车还是很厉害，比北京还厉害。所以，还要下更大的工夫解决交通问题。说老实话，我就是不赞成每个人都去买小汽车，这不符合中国的国情。中国就是人多啊，哪一个国家都没有像中国这样，百八十万人口的城市多的是。怎么能够每家都有一部小汽车？哪个城市都受不了啊，不能这样做。哪有那么多油啊，油大部分要靠进口！还有汽车排放尾气，那个污染就更厉害了，严重影响人们的身体健康啊。我认为，现在小汽车生产有点过热。我不是不主张发展小汽车，可以适当地发展，生活水平高的人可以买汽车，但是政府不要花那么多钱去补助、去推动，这不符合中国的发展方向。现在就是要大力发展公共交通，发展公共汽车，发展城市轻轨交通，还可以发展磁悬浮高速列车。

我们大家要充分认识发展公共交通的重要意义，一定要大力发展，而且一定要加强管理。北京市现在有190多万辆汽车，交通已经很紧张

了。上海只有100万辆汽车，交通设施也比北京先进，但是还堵车，为什么？管理不好。最近，我到上海去，给他们提出了这个问题。他们也已经认识到了，正在研究如何加强管理，计划在全市建设最现代化的交通信息系统，实现电子控制。要让群众出门到处都可以上公交车，到处都有“的哥”、“的姐”，感到出行很方便，没有必要自己去买个小汽车，还要一天到晚伺候它。



2003年2月1日，朱镕基到北京市公共交通总公司44路北官厅站，看望春节期间坚持运营的公交系统干部职工。

昨天中央电视台的春节联欢晚会，有几个节目是歌颂“的哥”、“的姐”的，都体谅到他们的辛苦。我刚到上海工作的时候，那里有几百家、上千家出租汽车公司，管理乱得一塌糊涂，乱收费现象很严重。

我当时就要求成立一个大众出租汽车公司，给它新买了1000辆“桑塔纳”汽车，对公司服务和管理作出严格的规定，一下子就改变了出租汽车行业的面貌。我知道北京市过去在这方面也下了很大的工夫。现在全国各地出租汽车司机闹事的不少，就是因为管理得不好，中间的剥削太厉害了。因此，在行业管理上还是要下工夫的。总之，我们一定要把更多的精力和注意力放在发展公共交通方面，不要放在发展小汽车上面去啊！

Table of Contents

封面一

封面二

图

编辑说明

做好退耕还林还草试点工作

关于用再贷款帮助地方金融机构还债保支付问题

淘汰过剩产能要采取经济手段

国税局要杜绝营私舞弊行为

对商业银行违规贷款要严厉查处

加快政府信息网络建设

关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工作的几点意见

关于新疆发展的几个问题

重视基础科学研究

搞好首都的环境治理和市政建设

给袁宝华同志的信

转变政府职能，改进工作方式

深入开展打击骗取出口退税的专项斗争

在二〇〇〇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在二〇〇〇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的总结讲话

对审计特派员办事处执法犯法问题要严肃查处

农村信用社改革要因地制宜

制定更加具体的粮食购销政策

司法公正，国脉所系

关于旅游业发展的几点意见

清理整顿财政部门办的公司

更加重视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

加强和改进金融监管

在九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湖南省代表团全体会议上的讲话

农民问题的关键是增收减负

香港应该是稳定第一，团结为重

改善生态环境是中西部地区发展的关键

湖南要优先安排治山治水

教师是教育的根本推动力

在张维庆同志来信上的批语

清华的精神是追求完美

关于四川三个少数民族自治州的经济发展问题

把基础教育放在更加重要的战略地位

进一步加快西藏经济发展

引进外资要做到“三个结合”

关于京津风沙源治理问题的批语

加强质量监督检验工作

做好三峡工程移民、地质防灾和生态保护工作

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要做市场秩序的坚强卫士

对破产逃债的要严查

严厉打击黑恶势力及其后台
加快贵州经济社会发展
企业界要进军俄罗斯
会见索罗斯时的谈话
走向更加开放和繁荣的中国经济
“9·11”事件对我国经济的影响和对策
中国能够成为世界的一片投资乐土
在二〇〇一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加强舆论监督
加强对出版物市场的监管
建立全国社保基金是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举措
审计工作要突出重点
制止城市规模盲目扩大的势头
国税局不能执法犯法
充分利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机遇发展自己
内蒙古的发展要发挥本地优势
浙江要富而思进、富而思源
对河北省高碑店市白沟镇民工中毒事件的批语
山西经济发展的思路要调整
对国有商业银行考核评价办法的意见
全力维护企业和社会稳定
会见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时的谈话
当前要抓紧研究解决的几个经济问题

参观胡雪岩故居后的留言
中国有希望成为世界第一造船大国
抓紧做好对三峡库区水污染防治和库底固体废物清理工作
高度重视安全生产工作
深圳改革发展要走在全国前面
会见美国国会众议员时的谈话
做好防大汛、抗大洪的准备
恢复“浩浩汤汤”的洞庭湖
紧紧把好机构编制这个关
改善西部地区生态环境的根本办法是退耕还林
再造一个山川秀美的陕北
进一步把黄河的事情办好
继续搞好辽宁省完善社保体系的试点
大力调整农业种植结构
加强财政增收节支工作
下决心抓好“食品放心工程”
统计工作应把“准”字放在首位
香港的前途是光明的
在二〇〇二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努力做好新形势下的财政工作
我们的外汇政策是正确的
全面理解和贯彻党的宗教政策
审计署要成为廉政署、法治署、正气署

值得纪念的五年
大力发展公共交通

Table of Contents

朱镕基讲话实录（第一卷）
- 封面
- 封面一
- 封面二
- 封面三
- 图
- 编辑说明
- 关于质量管理和技术监督工作
- 搞活国营大中型企业要强调内因为主
- 调整企业组织结构
- 地方政府是地方煤矿的安全责任者
- 振兴阜新首先要振奋精神
- 做好棉花的产供销工作
- 清理三角债要抓住固定资产投资拖欠这个源头
- 对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意见
- 大力发展船舶工业
- “正点”是民航服务质量的中心
- 加快技术进步，搞好国营大中型企业
- 对江西发展的几点意见
- 控制重复建设的关键在银行
- 重大技术装备国产化最重要的是质量
- 机关要为基层办实事
- 关于搞好国营大中型企业的几个问题
- 关于组织“中国质量万里行”活动的批语
- 大力调整工业内部结构
- 加强有色金属矿山的行业管理
- 抓紧制定《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转换经营机制条例》

充分认识发展信息产业的重要性
领导干部要廉洁奉公
国务院生产办要服务好、 态度好、廉政好
全面正确地理解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精神
为学与为人
海南要保护好旅游资源
质量是企业的生命
煤炭行业扭亏增效的关键是提高劳动生产率
希望大寨发展得更好
关于放开和调整煤价的批语
关于首钢改革发展的意见
缓解铁路运输紧张状况
棉花购销体制要改革
对民航发展的想法
在部分省市股票市场试点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
关于通用航空公司空难事故的批语
坚决打击走私活动
一定要把深圳经济特区办好
广东的实践证明了改革开放政策的成功
关于当前经济形势和 宏观调控的意见
总结清理三角债经验， 防止产生新的拖欠
在一九九二年全国经济工作会议上的总结讲话
加快铁路建设与改革步伐
搞好金融宏观调控
实行真正的政企分离
积极稳妥地进行棉花流通体制改革试点
防止通货膨胀要始于“青蘋之末”
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 能够成功结合
加强宏观调控的十三条措施
认真抓好“菜篮子工程”

关于整顿路风问题的批语
金融工作“约法三章”
整顿财税秩序，加快财税改革
统一认识，勇于改革，做好金融工作
解决资金紧张的八条措施
切实加强外汇管理
关于外贸出口工作和 汇率制度改革问题
假冒伪劣商品影响国家的形象
分税制将会促进广东的发展
关于实行分税制问题致江泽民、李鹏同志并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信
分税制改革有利于中西部地区发展
信息要真实、及时、准确
银行信贷要堵邪路、开正门
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树立全民环保意识
精心组织实施分税制改革
在一九九三年 全国经济工作会议上的总结讲话
关于平抑粮价的批语
平抑粮油价格，稳定市场供应
关于如何处理不同意见的批语
基础设施建设要统筹规划、量力而行
继续整顿金融秩序，严格控制信用总量
正确处理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关系
会见美国财政部部长本特森时的谈话
切实抓好农副产品的生产和供应
把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办成世界第一流的经济管理学院
把大庆建设得更好
严防金融诈骗
搞好粮食价格和购销体制改革

纪念宦乡同志
卖地收入首先要用于安置拆迁户
稳定农业生产资料价格
对平抑与粮食有关商品价格的意见
着力改善国有企业经营管理
关于加快纺织行业结构调整的批语
朱镕基讲话实录（第二卷）
封面
封面一
封面二
图
编辑说明
房改试点的政策
跨出金融改革关键性的一步
市场经济也需要政府管理
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保障体制
加强银行稽核监督工作
警惕金融、财政“双松”导致通货膨胀
会见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格林斯潘时的谈话
杰出的经济学家——薛暮桥
注意防范三峡工程建设的风险
现代企业制度改革试点的几个问题
企业改革中要防止国有资产流失
上海要努力搞好国有企业改革
在一九九四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的总结讲话
深化改革，完善税制，强化征管
加强国家外汇储备和外债的管理
在胡乔木著作出版座谈会上的讲话
就全国人大检查《农业法》执行情况的报告给中央领导同志的信

会见日本大藏大臣武村正义时的谈话
加快金融改革的步伐
关于当前的货币政策
坚持和完善农村购销政策
国有企业改革不能只在产权上做文章
农村“四荒”拍卖必须规范
证监会决不能搞权钱交易
在全国科学技术大会上的讲话
关于党的建设与经济建设的关系
银行业要加强经营管理
关于北京市的经济工作
值得纪念的两年央行行长经历
认真做好棉花收购工作
新疆发展经济的思路
云南要把旅游业作为支柱产业
关于京西煤矿问题
加强同发展中国家的经贸合作
祝贺陈岱孙先生九五华诞
信访工作是体察民情的重要渠道
采取有效措施，促进贫困地区脱贫
铁路建设要雪中送炭
在一九九五年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的总结讲话
加强对住房公积金的使用和管理
银行系统要建立健全的会计制度
要加快小化肥厂的技术改造
国有小型企业改革不是“一卖就灵”
致薄一波同志的信
关于江西经济工作的几点意见
加快退税速度，防止出口大量下降
致李政道先生的信

要调整完善加工贸易政策
上海发展中需要注意的几个问题
金融系统要坚决反腐败
认真总结扶贫工作的经验
对税制改革要坚定不移，坚信不疑，坚持不惑
继续推进农村金融体制改革
搞好金融保险市场对外开放
管理科学，兴国之道
关于企业破产和资本重组问题
关于解决棉花调销困难的意见
在金融改革与发展专题研究班上的讲话
扶贫工作的关键是选好贫困县领导干部
加快粮食购销体制改革
艰苦奋斗，改变凉山面貌
采取措施防止股灾
在一九九六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的总结讲话
关于宏观经济和财税工作的几个问题
戏剧要起到教育、激励人民的作用
大力推进企业改革，积极实施再就业工程
粮食丰收之后怎么办
关于住房制度改革问题
银行要提供优质服务
关于严禁高利吸储的批语
会见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格林斯潘时的谈话
对金融犯罪要严厉法办
关于粮食购销工作的几个问题
关于完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几个问题
棉花多了是一种愉快的负担
搞股份制不要刮风
在何梁何利基金一九九七年度 颁奖典礼上的讲话

对“卖企业”问题的批语
基本医疗保障要低水平、广覆盖
关于搞好轻工集体企业的意见
落实“出疆棉”政策
深化金融改革，防范金融风险
在机械、电机工程手册再版座谈会上的讲话
在一九九七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的总结讲话
认真吸取亚洲金融危机的教训
朱镕基讲话实录（第三卷）
封面
封面一
封面二
图
编辑说明
在国务院第一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
妥善解决下岗职工的分流安置和再就业问题
政府机构改革要决心大、步子稳、工作实
各大银行都要成立中小企业信贷部
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刻不容缓
银行与所办公司必须彻底脱钩
把握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的重点
会见美国财政部部长鲁宾时的谈话
竭尽全力，确保长江大堤安全
严厉打击走私犯罪活动
赤峰可以建设成为旅游城市
把保证群众的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
农村电网改造要集中力量打歼灭战
对证券公司的违规行为应严肃处理
教育和科技的发展也是硬道理
发扬抗洪精神，抓好灾后重建

保护森林资源是千秋万代的伟业
关于救灾和灾后重建问题的报告
和《焦点访谈》节目组座谈时的讲话
关于当前经济形势的若干问题
海关是守卫国家经济利益的长城
关闭广东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是正确的
会见美国迪斯尼公司董事长埃斯纳时的谈话
国有大中型企业三年脱困大有希望
搞“豆腐渣工程”就是对人民犯罪
在一九九八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审计工作任重道远
海南要保持青山绿水
确保三峡工程建设质量，妥善安置三峡移民
水利工程建设要保证质量
加强对金融工作的领导与监督
会见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格林斯潘时的谈话
把“两个确保”落到实处
信访工作是联系群众的重要渠道
新疆经济发展要解决好“一黑一白”的问题
国务院办公厅要为各部门树立好的榜样
给郑惠等同志的信
会见美国国会议员代表团时的谈话
在美国总统克林顿举行的欢迎仪式上的讲话
在美国总统克林顿举行的欢迎晚宴上的讲话
粮改工作要完善政策措施
加强对非法集资的监管
彻底整顿信托投资公司
尽快制订和颁布上市公司管理条例
彻查逃废银行贷款事件
科学的未来在于青年

海关要从湛江走私案中吸取教训
加快住房制度改革
扶持中小企业要有选择
推进国防科技工业的改革和发展
搞“豆腐渣工程”公理难容
克服麻痹思想，做好防汛准备工作
完善宏观调控政策措施，制止经济增长下滑趋势
地方政府机构改革势在必行
加强长江中游的整治刻不容缓
治理黄河必须搞好上中游水土保持
坚决停止砍伐天然林
四川省要成为天然林保护工程的尖兵
坚持不懈地打击经济犯罪
加快民族地区发展的几点意见
进一步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的几个问题
开发西部地区主要从三个方面着手
高度重视质量技术监督工作
要热爱机关事务工作
会见美国贸易代表巴尔舍夫斯基等时的谈话
在一九九九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在一九九九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的总结讲话
致出席全国计划会议全体同志的信
钢铁工业要控制总量、调整结构
关于当前的财政政策
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意义重大
化解和防范金融风险，加强金融管理和监督
在国务院第五次全体会议上的讲活
农业结构调整必须贯彻“三为”
让优秀文化艺术世代相传
对政策研究工作的几点要求

发挥好信访工作的三个作用
海关要重振雄风
搞好农村“费改税”试点工作
粮食保护价必须高于种粮成本
在陈祖涛同志来信上的批语
会见欧盟贸易专员拉米时的谈话
经济上要防范三个风险
“三农”问题的严重性不容忽视
缅怀李富春、蔡畅同志
坚持按保护价敞开收购农民余粮的政策
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的几个问题
加紧培养科技人才
电力体制必须改革
农村合作基金会等机构的债务主要由地方偿还
朱镕基讲话实录（第四卷）
封面一
封面二
图
编辑说明
做好退耕还林还草试点工作
关于用再贷款帮助地方金融机构还债保支付问题
淘汰过剩产能要采取经济手段
国税局要杜绝营私舞弊行为
对商业银行违规贷款要严厉查处
加快政府信息网络建设
关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工作的几点意见
关于新疆发展的几个问题
重视基础科学研究
搞好首都的环境治理和市政建设
给袁宝华同志的信

转变政府职能，改进工作方式
深入开展打击骗取出口退税的专项斗争
在二〇〇〇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在二〇〇〇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的总结讲话
对审计特派员办事处执法犯法问题要严肃查处
农村信用社改革要因地制宜
制定更加具体的粮食购销政策
司法公正，国脉所系
关于旅游业发展的几点意见
清理整顿财政部门办的公司
更加重视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
加强和改进金融监管
在九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湖南省代表团全体会议上的讲话
农民问题的关键是增收减负
香港应该是稳定第一，团结为重
改善生态环境是中西部地区发展的关键
湖南要优先安排治山治水
教师是教育的根本推动力
在张维庆同志来信上的批语
清华的精神是追求完美
关于四川三个少数民族自治州的经济发展问题
把基础教育放在更加重要的战略地位
进一步加快西藏经济发展
引进外资要做到“三个结合”
关于京津风沙源治理问题的批语
加强质量监督检验工作
做好三峡工程移民、地质防灾和生态保护工作
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要做市场秩序的坚强卫士
对破产逃债的要严查
严厉打击黑恶势力及其后台

加快贵州经济社会发展
企业界要进军俄罗斯
会见索罗斯时的谈话
走向更加开放和繁荣的中国经济
“9·11”事件对我国经济的影响和对策
中国能够成为世界的一片投资乐土
在二〇〇一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加强舆论监督
加强对出版物市场的监管
建立全国社保基金是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举措
审计工作要突出重点
制止城市规模盲目扩大的势头
国税局不能执法犯法
充分利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机遇发展自己
内蒙古的发展要发挥本地优势
浙江要富而思进、富而思源
对河北省高碑店市白沟镇民工中毒事件的批语
山西经济发展的思路要调整
对国有商业银行考核评价办法的意见
全力维护企业和社会稳定
会见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时的谈话
当前要抓紧研究解决的几个经济问题
参观胡雪岩故居后的留言
中国有希望成为世界第一造船大国
抓紧做好对三峡库区水污染防治和库底固体废物清理工作
高度重视安全生产工作
深圳改革发展要走在全国前面
会见美国国会众议员时的谈话
做好防大汛、抗大洪的准备
恢复“浩浩汤汤”的洞庭湖

紧紧把好机构编制这个关
改善西部地区生态环境的根本办法是退耕还林
再造一个山川秀美的陕北
进一步把黄河的事情办好
继续搞好辽宁省完善社保体系的试点
大力调整农业种植结构
加强财政增收节支工作
下决心抓好“食品放心工程”
统计工作应把“准”字放在首位
香港的前途是光明的
在二〇〇二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努力做好新形势下的财政工作
我们的外汇政策是正确的
全面理解和贯彻党的宗教政策
审计署要成为廉政署、法治署、正气署
值得纪念的五年
大力发展公共交通